

世界四大情报组织系列

(共四册)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世界四大情报组织系列

(共四册)



Table of Contents

超级潜伏——前苏联克格勃绝密行动

前 言

第一章 “契卡”之父：克格勃的缔造者

一个职业的革命家

“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

他的雕像矗立在克格勃大楼前

第二章 佐尔格：来自东京的神秘电波

一个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德国青年

东京的辉煌

向莫斯科发出警报

最后的使命

东京受审

第三章 国家追杀令：托洛茨基暗杀事件

被驱逐出境的领袖

铁镐击头死于非命

第四章 潜伏在希特勒身边：“红色乐队”遍布欧洲的情报王国

主动请缨的“红色乐队”

潜伏在希特勒身边

惊心动魄的“大赌博”

第五章 无所不能的“拉多小组”

魂牵梦萦莫斯科

了不起的“露西”

活到战后的大间谍

第六章 科学间谍:他帮助苏联造出原子弹

一帆风顺的博士

不计报酬的“科学间谍”

他毕竟是科学家

第七章 “剑桥五杰”之一：“间谍王子”菲尔比

进入军情六处

“伏尔科夫危机”

获得列宁勋章

第八章 “剑桥五杰”之二：为信仰而战的间谍

“剑桥五杰”之盖伊·伯吉斯

“剑桥五杰”之唐纳德·麦克莱恩

“剑桥五杰”之哈罗德·金·菲尔比

“剑桥五杰”之安东尼·布兰特

“剑桥五杰”之约翰·克恩克罗斯

第九章 “金唇行动”：“国徽”窃听四任美国大使

第十章 千面间谍大师

天生一块间谍的料

巧设“掉包计”

截获盖世太保的“冒名顶替”计划

千面间谍

第十一章 “燕子”行动：法国大使落入温柔陷阱

来自最高领导人的命令

落入温柔的陷阱

克格勃戏弄大使

第十二章 绝美暗杀：他让世界胆寒

偶然做了克格勃杀手

获得红旗勋章

逃往西方

第十三章 美国U-2飞机被神秘击落

克格勃紧急受命

一颗特殊的螺钉

U-2凌空炸开

第十四章 谁偷了英国皇家海军核心机密

变身加拿大人

“布兰达二号”

情报小组意外暴露

最后的归途

第十五章 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威风扫地的超级“鼯鼠”

语言天才

屡建奇功

生死博弈

成功越狱

第十六章 伸向美国绝密情报的黑手

蹩脚的间谍

打开美军最重要的一扇门

美军核心机密被窃

意外的悲惨结局

第十七章 震惊世界的罗森伯格夫妇间谍案

初涉谍海

内弟入伙

绝情陷害

坦然赴死

第十八章 女船王的丈夫竟是克格勃

希腊女船王的两次失败婚姻

巧设“美男计”

曲终人散

第十九章 差点使“北约”瘫痪的间谍教授

受人欢迎的教授

克格勃主席亲自接见

拒绝出逃

第二十章 电子“鼯鼠”使英美情报联盟损失10亿美元

找上门来的情报员

一只14年的老“鼯鼠”

第二十一章 怪异的“鸳鸯间谍”

神秘领域

进入中央情报局

疯狂参加性游戏俱乐部

第二十二章 扑朔迷离的尤尔钦科叛逃事件

尤尔钦科上校跑了

他出卖了同志

昔日恋情难依旧

假戏真做

第二十三章 疯狂作案的“鼯鼠”家庭

有心无意做了间谍

疯狂搜集情报

家族间谍网

第二十四章 克格勃老牌特工家门前叛逃

一个老牌克格勃的隐秘

奉命返回莫斯科

逃离莫斯科

谁出卖了他

第二十五章 克格勃“超一流间谍”

绝不背叛祖国

最有威望的间谍

第二十六章 他使法国原子能机密荡然无存

克格勃巧抛诱饵

克格勃的影子无处不在

最终走进监狱

第二十七章 埃姆斯——世界上报酬最高的间谍

被5万美元收买

多名美国间谍死在他手上

美国历史上最大一场抓捕“鼯鼠”行动

第二十八章 美军军衔最高的克格勃间谍

老朋友出面招募

为克格勃效劳

大意中圈套

第二十九章 “完美间谍”汉森

从小就有间谍梦

他能翻美国的家底

独一无二的间谍手法

终露庐山真面目

第三十章 “新克格勃”特工抓获“石头间谍”

不知不觉做了英国人的间谍

间谍实况录像

附录一：克格勃概述

附录二：克格勃名称的变更

附录三：克格勃历任主席

附录四：俄罗斯（克格勃）间谍学校

无敌较量——英国情报组织绝密行动

前 言

第一章 百年演变，军情六处步履维艰

由秘密到公开的漫漫历程

二战的艰难岁月

冷战后的军情六处

第二章 世纪沧桑，军情五处宝刀不老

军情五处的起源和发展

二战成了军情五处发展的契机

冷战前后的军情五处

军情五处的局长们

第三章 文洛悲剧，英国特工败走麦城

一名“反纳粹主义者”找上门来了

慕尼黑啤酒馆响起了爆炸声

阴差阳错的悲剧

第四章 仿造“哑谜”，“超级机密”克敌制胜

仿造“哑谜”密码机

布莱奇雷庄园诞生“超级密码”

惨烈的大不列颠战役

第五章 妙招迭出，纳粹德国屡遭惨败

考文垂上空的“月光奏鸣曲”

击沉“海上巨无霸”

粉碎“沙漠之狐”的“蝴蝶梦”

“超级机密”的成功与代价

第六章 致命反击，“类人猿”计划暗杀成功

海德里希实施“白色方案”

希特勒为海德里希送葬

利迪希村成为二战纪念馆

第七章 “北极行动”，谍报战波诡云谲

劳威尔斯和他的女友一起被带走了

英国特工成了“北极行动”的战利品

麻木的英国情报机关

第八章 “肉馅行动”，“马丁少校”拯救3万盟军

“肉馅行动”出台的前前后后

“马丁少校”的尸体安葬在西班牙

“马丁少校”的遗物

一个真正的“马丁少校”

第九章 瞒天过海，“霸王行动”大功告成

“北方坚韧”的欺骗计划

“南方坚韧”的欺骗计划

他当了5个星期的蒙哥马利元帅

第十章 扑朔迷离，一代特工演绎“007”

“花花公子”又交上了“桃花运”

“三轮车”和“三驾马车”

胡佛的傲慢和代价

在里斯本还有一个特殊的间谍网

美女和“血浆”的考验

“风流间谍”成了“007”的原型

第十一章 呼风唤雨，“月亮女神”谍海传奇

婚姻的不幸让她开始寻找新的情人

正式授予她“辛西娅”的代号

查尔斯·布鲁斯成了她主攻的目标

密码改变了二战的进程

第十二章 不让须眉，一代美女谍海沉浮

“伯爵小姐”成了“邦德女郎”

“一个微笑就足以拉回一支大部队”

一袋来自波兰的泥土撒在她的坟墓上

“公主间谍”死于纳粹枪下年仅30岁

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

第十三章 “鼯鼠”潜逃，英国情报局颜面尽失

被克格勃招募

搞掉第五科科长考吉尔

莫斯科已经把伏尔科夫解决掉了

“金，鸟儿飞掉了”

逃到莫斯科后获得“红旗勋章”

第十四章 改变信仰，“间谍王子”投靠苏联

朝鲜之行让他成了克格勃的间谍

英国当局判处他42年徒刑

越狱成功

第十五章 追查“鼯鼠”，情报局进入多事之秋

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

局长成了“疑似鼯鼠”

克格勃情报站长叛逃到英国

第十六章 谋杀未遂，利比亚放弃核计划

雅虎网站爆出惊天机密

“洛克比空难”发生以后

军情六处代表会见卡扎菲之子赛义夫

第十七章 秘密窃听，牵动王室万缕千丝

窃听器装到首相官邸

军情六处只是想通过车祸让戴安娜王妃流产

塞浦路斯的监听站可以听到北京飞机降落的声音

第十八章 谍海沉浮，特工命运天上人间

戴维·谢勒男扮女装成性感女郎

汤姆林森在网上公布名单报复军情六处

特工“T”逃亡西班牙不知所终

第十九章 “师生”联手，虐囚丑闻惹火烧身

“X训练营”培训了5名中情局局长

“师生”联手半个世纪

伊拉克战争和虐囚丑闻

军情六处与塔利班不干不净

炭疽炸弹和英国王子

第二十章 英美同谋，共同窃听世界风声

“英美协定”共同打造曼威斯山窃听网

香港几乎成了“间谍之都”

共同打造“Q博士”

第二十一章 英俄谍战，魔高道高未有穷期

关于英俄谍战的“口水战”

英俄谍战源远流长

英、美、俄三方谍战演“小品”

第二十二章 走出神秘，英国特工公开招聘

招募特工的途径

利用“007”的影响力招募

招募特殊的“拆弹部队”

教官是旧中国的上海警察

尾 声：著书立说，情报机构立碑树传

窃声风云——美国中央情报局 绝密行动

前言

第一章 独立战争，华盛顿首创“诺尔顿”

“诺尔顿”开创美国情报史

“亲英奸商”霍尼曼

反间谍高手

伪造了一张完整的波士顿报纸

黑奴间谍詹姆斯

多诺万的情报协调局

“珍珠港事件”催生了美国战略情报局

第二章 冷战初开，中情组改成中情局

帕克上校的报告宣判了战略情报局的死刑

杜鲁门终于同意成立中央情报组

中央情报局成立

第三章 铁幕重重，组织严密叹为观止

“中央情报局——右转弯；非经许可，车辆不得入内”

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机构

公开招聘

“魔鬼训练”

第四章 美苏争锋，两大阵营暗战烽烟不断

效仿“白银行动”

U-2飞机的飞行员被带上被告席

“美国之音”每隔一小时广播一次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杰尼弗行动”花费3.5亿美元

第五章 “肃鼠行动”，安格尔顿成了“瘟神”

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

神秘的斯尼帕拉开了“肃鼠行动”的序幕

安格尔顿成了中情局的“瘟神”

第六章 “鼯鼠”现形，美苏谍战何时了

特大“鼯鼠”埃姆斯现出了原形

又一大“鼯鼠”罗伯特·汉森落网

2010年美俄双方的间谍交易

第七章 美元开道，中情局阴影笼罩世界

“马歇尔计划”就是“烧钱”

“匈牙利事件”中的难堪表现

“在我的任内，卢蒙巴终于死了”

对卡扎菲的第8次谋杀计划出台了

第八章 秘密行动，拉美后院永无宁日

“幸福计划”和“死亡名单”

颠覆巴西、海地和圭亚那

中情局在智利得逞的“三点式”计划

第九章 颠覆古巴，卡斯特罗历尽劫难

组成了一支500多人的“古巴旅”

“猪湾登陆”计划开始实施

成立“推土机换取自由委员会”

谋杀行动达638次之多

“古巴导弹危机”

第十章 英雄末路，切·格瓦拉丛林殒命

出生在阿根廷的“红色罗宾汉”

假护照被跟踪追击的中情局特工识破

“不要开枪，我是切·格瓦拉”

永远的格瓦拉

第十一章 祸及亚洲，东亚中东倒戈相向

“杜鲁门主义”成就了岸信介政府

色情片《良辰美景》中的“苏加诺”

中情局又向印尼伸出黑手

“地下大使”飞往沙特阿拉伯

第十二章 染指朝鲜，蓝鸟工程祸及萧墙

中情局获悉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

麦克阿瑟对“准军事行动”感兴趣

“蓝鸟工程”和“洋蓍工程”

第十三章 打压伊朗，恩怨情仇半个世纪

英国秘密情报局最早提出“阿贾克斯”行动

打手制造群众事件

伊朗再次发生政变

“蓝光”行动弄得沸反盈天

“伊朗门”事件

第十四章 兵犯越南，玩火自焚终无赢家

中情局说“美国不应放弃越南”

中情局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播撒碘化银

中情局和“凤凰计划”

尼克松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

第十五章 大兵压境，巴拿马司令成囚犯

都是巴拿马运河惹的祸

推翻诺列加的政变闹剧

中情局局长曾经吹捧诺列加是“中美洲的反共堡垒”

诺列加逃进了梵蒂冈大使馆

诺列加被判处145年监禁并且终生不得保释

第十六章 斩首行动，伊拉克总统被判绞刑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被美国人处以绞刑

“海湾战争”结束后中情局局长被迫辞职

中央情报局成了布什政府的“替罪羊”

第十七章 养虎成患，本·拉登在劫难逃

成立“拉登处”

本·拉登终于被击毙

“虐囚门”和“十大酷刑”

第十八章 反恐无期，阿富汗战乱何时了

每年耗费100亿美元的战争

中情局成了美国政府的“红人”

中情局的“影子战争”和“黑水公司”

“搞笑”的事件和“18支秘密部队”

第十九章 走马换将，奥巴马看好帕内塔

中情局成了美国的“文化部”

莱昂·帕内塔当上中情局局长

本·拉登和伊朗“铀浓缩”

附 录

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

前 言

第一章 犹太人艰难复国 摩萨德横空出世

这里没有停止过战争

成为联合国第59个会员国

摩萨德在“愚人节”成立

第二章 摩萨德出师不利 巴格达损兵折将

令人匪夷所思的巴格达之行

情报站长在公开场合说希伯来语

第三章 哈雷尔走马上任 摩萨德基业初成

哈雷尔当上了“辛贝特”首任局长

摩萨德总部只有12个人

哈雷尔的“反间谍”战

总理的朋友果然是间谍

哈雷尔“忽悠”美国中央情报局

第四章 万里奔袭阿根廷 捉拿纳粹艾希曼

热带美女爱上了纳粹头目的儿子

女特工的生日礼物

拍下了艾希曼的照片

“你的党卫军证号码是多少”

第五章 哈雷尔功成身退 马尔金史上留名

艾希曼成了“脑震荡病人”

被告席上的防弹玻璃罩

哈雷尔呈交了一封辞职信

第六章 走马上任阿米特 外交策反两成功

阿米特把“131部队”并入摩萨德

“准外交”和“六日战争”

美女特工找到了“猎物”

条件是加付100万美元的酬金和家人的安全

“米格-21”降落在以色列空军基地

以色列电台的新闻震惊世界

第七章 叙利亚绞杀科恩 摩萨德痛失爱将

天生的间谍

神秘的阿拉伯富商

公司对面就是总参谋部大楼

不速之客夤夜造访

“绝妙的宴会”背后

为“复兴社会党”筹措了一万美元

最后一份电报

各国首脑和罗马教皇参与拯救行动

第八章 “香槟间谍”现原形 五千战俘换回来

一个没有接受“割礼”的犹太人

“育马专家”来到埃及

“香槟间谍”

“两年前我们就对你进行了‘扫描’”

神秘的小轿车开到了导弹基地

浴室里的微型电台

他的身价是5000名埃及战俘

第九章 “诺亚方舟”显神威 导弹快艇越重洋

5艘导弹快艇不翼而飞

秘密军火协议

瞒天过海

惹恼了戴高乐总统

挪威商人找上门来了

“诺亚方舟”午夜起航

第十章 收买瑞士工程师 偷得图纸20吨

“我将进入纺织业”

以色列空军面临瘫痪

工程师的巧遇

“我需要200万美元”

“火化计划”

偷运到以色列的图纸足足有20吨

以色列将“鹰”式战斗机送上了蓝天

第十一章 摩萨德偷梁换柱 “高酸铅盐”成了铀矿石

战争背后的交易

大漠深处的“纺织厂”

莫名其妙丢失的铀

最糟糕的旅行

百密一疏

铀矿石丢失震惊全世界

第十二章 午夜惊魂慕尼黑 全球追杀“黑九月”

“慕尼黑惨案”

机场枪战

“死亡名单”

“上帝的复仇”开始行动

又有两个人从“死亡名单”上抹去了

喋血贝鲁特街头

盯上了第八个目标

最丢面子的暗杀

头号人物丧命街头

“死亡名单”画上句号

第十三章 秘密会晤显身手 “霹雳行动”救人质

“霹雳行动”始末

乌干达总统大发雷霆

第十四章 “美人计”窃取机密 核计划胎死腹中

萨达姆的原子弹之梦

摩萨德特工推销香水

一个开法拉利轿车的商人

一声爆炸价值9000万法郎

彻底摧毁核反应堆

第十五章 “摩西行动”结硕果 杰哈德惨遭暗算

局长下台

“摩西行动”

来自突尼斯的情报

赛义德镇午夜枪声

第十六章 “短剑”千里追杀 叛国者终进铁窗

被解雇的“危险分子”

核机密卖了5万美元

邂逅神秘的美丽女郎

手掌上写着“我是在罗马被劫持的”

18年以后旧事重提

第十七章 阿尼斯通走麦城 摩萨德转换新角色

“阿尼斯通事件”

“柏林墙”倒塌后的连锁反应

第十八章 “安曼行动”惨遭失败 铁腕局长力挽狂澜

拉宾遇刺身亡

失败的“安曼行动”

摩萨德丑闻不断

“铁腕局长”的定点清除计划

第十九章 达甘执掌摩萨德 谍战智斗本·拉登

“嘴咬尖刀”的情报“一哥”

炸弹落在“天堂酒店”

摩萨德唤醒“休眠”特工

摩萨德局长的“成绩单”

第二十章 “迪拜门”谍影迷茫 以色列有口难辩

总理签署了“死亡通知书”

被称为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败笔

多国护照节外生枝

“鹰派”作风树敌无数

“我们提供杀手般的低价”

第二十一章 女杀手天生丽质 准总理政坛称雄

摩萨德“美女特工”不再是秘密

四年间先后担任过七个部的部长

“她是玫瑰，也带刺”

第二十二章 新一代无意谍战 摩萨德路在何方

摩萨德向来是一枝独秀，占尽风光

摩萨德屡屡失手，风光不再

摩萨德公开招聘

附录：摩萨德历任局长名单

摩萨德大事记

超级潜伏——前苏联克格勃绝
密行动

前 言

间谍通常被称为“全世界第二古老的行业”，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孙子兵法》第十三章“用间”就是专门讲如何使用间谍的。人类进入20世纪，间谍活动更是成为获取军事、政治、经济及其他机密信息的重要手段，间谍活动几乎渗透到所有部门。各式各样的“间谍战”进行得如火如荼、愈演愈烈。

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KGB）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与美国的中情局、以色列的摩萨德、英国的军情六处并称为世界四大间谍组织。克格勃的影子像幽灵一样随处可见，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从事各种秘密活动。创造了许多间谍史上的奇迹，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情

报人员，为捍卫国家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克格勃从早年的“契卡”开始在国内就享有至高的特权，经历了几次名称变更，其特权得到不断的巩固，影响力日益上升。在一般人的眼里克格勃几乎无所不能，可以在任何领域采取行动。在苏联时期，克格勃名义上归属苏共政治局领导，事实上直接听命于苏共总书记。克格勃主席在苏联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安德罗波夫就是由克格勃头目升任苏共总书记的。

克格勃在世界各地拥有庞大的情报网络，唯有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才可与之相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哪里有可取的“情报”，哪里就有克格勃出现，其触角遍布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克格勃机构庞大，资金充足，收买间谍时往往也出手大方。苏联时期资金再困难，也不会穷到克格勃。克格勃巅峰时期，人员曾达到80多万人。

克格勃不仅花了大笔金钱，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完整的人名档案资料库系统，还有一大批高科技专业人才为克格勃服

务。古今中外的间谍窃取情报所运用的方法都差不多，无非是使用偷听、偷看等手段，但间谍武器却变化无穷，花样不断翻新。这些专家们不断开发研制出新颖别致的高端间谍工具，往往使克格勃情报人员能出奇制胜，战胜对手，取得成功。以窃取情报为目的的间谍战，随着电脑时代的来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利用电脑直接进入对方核心部门的计算机系统获取机密情报，这种更加便利、隐蔽、有效的方法又成为俄罗斯情报部门最重要的间谍活动之一。

此外，在间谍的招募、培训以及间谍武器的开发使用上，克格勃都具有世界超一流水平。无论是前苏联克格勃还是如今的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都有一处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都注意训练“特色间谍”，重视使用性间谍来招募情报人员，如早年闻名于世的“燕子”(女色情间谍)和“乌鸦”(男色情间谍)，此外还有同性恋间谍。克格勃的女间谍“燕子”利用自己的胴体诱捕猎物，曾多次成功地获取到秘密情报。

俄罗斯人对特工这个职业一直怀有景仰之情，

他们认为从事情报工作要拥有国际象棋大师的智能和宇航员的坚韧。苏联解体前后，克格勃系统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与非议，一度声名狼藉。民主派蓄意攻击克格勃过去胡作非为，“残酷镇压”群众，使克格勃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恐怖”的象征。

俄罗斯前总统、现任总理普京曾是一名克格勃官员，在他身上具有浓厚的“克格勃情结”，他始终以克格勃的经历为荣。普京高度赞扬俄安全人员坚定地捍卫国家利益，充分显示了“爱国主义、竞争能力、高度的人格和职业准则”，并希望重振俄安全机构的雄风。普京说：“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光辉的时刻，展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和勇气。”经过普京一系列的努力，现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的克格勃形象已经大为改善，成为无所不能的“英雄”的象征，而特工们也再次昂起了头。

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卢比扬卡广场的克格勃鼻祖捷尔任斯基的雕像，1991年被民主派推倒，2004年9月经普京批准重新恢复，并举行了隆重的雕像安放仪式。

本书描写了克格勃百年历史中的经典案例。这

些一流间谍的经历充满着惊险、神秘、悬念和刺激，无需加工雕琢，本身就是一篇篇真实而精彩的故事。

第一章 “契卡”之父：克格勃的缔造者

在世界情报组织中声名赫赫的克格勃前身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它是苏维埃政权独特制度的独特产物。“契卡”曾多次改名，最后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KGB）而闻名于世。

有“铁腕费利克斯”绰号之称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是“契卡”的创始人，他的雕像矗立在苏联克格勃大楼前。他也是克格勃系统领导人中唯一死后在苏联各地有塑像的人。

他用那双冰冷的眼睛忠诚地为苏联各地站了70多年岗。

一个职业的革命家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故乡属于现在的白俄罗斯明斯克州斯托耳勃齐区，当年是俄属波兰维尔诺省奥希米扬内县。1877年9月11日，捷尔任斯基出生于该县捷尔任诺沃庄园一个有点文化的小地主家庭，父母是犹太人。小时候，他立志要当一名大主教。

1887年8月，捷尔任斯基进入维尔诺第一中学学习。读中学时他迷上了马克思主义。1894年秋，他加入维尔诺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从维尔诺中学自愿退学，他认为这样能广泛地接触社会，从而更好地“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从此，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并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宣传家”。他经常出现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做宣传活动。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

1897年3月，捷尔任斯基从维尔诺转移到科夫诺从事革命工作。7月，他第一次被捕，被流放到维亚特省，为期3年。但1年以后他就逃跑了，回到了维尔

诺，从那儿又去了华沙，鼓动工人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

1900年他再次被捕，在华沙城堡和谢德列茨基监狱服刑。1902年他被流放西伯利亚，为期5年。在路上他就跑了，跑到了国外，在那个时候这并不困难。然而很快他又回来了。1905年7月又被捕入狱，但此时发生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秋天，他遇上了“10月大赦”。1906年底他又被捕了，其后被保释。

1908年他又一次被捕、受审、流放西伯利亚，这一次是去叶尼塞省。然而捷尔任斯基很快又逃跑了，其后就在波兰工作。

1912年他又被逮捕，这回他被判处3年苦役，在奥廖尔服刑。服刑期满后被带回莫斯科。1916年又因过去的事受审，再次被判6年苦役。但是这次他没有服满刑期：二月革命把他和所有的政治犯都解放了。

在捷尔任斯基的整个革命生涯中，有11年在监狱中度过。1917年二月革命后，捷尔任斯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不久由于工作出色，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处理党的全部组织工作。

捷尔任斯基是十月革命重要的组织者之一。十月

革命前被选入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和领导十月武装起义的军事革命党中央。10月24日，他受命领导占领邮局和电报局的行动。临时政府未做抵抗，政权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

十月革命胜利后，他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枪决的权力对‘契卡’无比重要”

从1917年10月20日开始，捷尔任斯基的主要工作转移到创建并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上。12月20日，根据列宁的指示，成立了苏维埃俄国的国家安全保卫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是该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各级地方苏维埃相继成立了肃反委员会。1918年苏维埃政府在运输部门、军队和边境地区成立专门的肃反机构。它拥有很大权力，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根据列宁提议，捷尔任斯基担任了“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同月，在彼得格勒的豌豆街2号挂牌办公。

“契卡”就是后来令世人闻之胆寒、感觉神秘莫测的克格勃（KGB）前身。“契卡”成立之初，由于他们刚好搞到一大堆皮衣，“契卡”的工作人员都穿上了皮

衣。因此，皮衣就成了“契卡”的身份标志。“契卡”的工作人员们喜欢这些皮制服，并不是因为他们预感到了皮制服装将会摩登走俏，而是因为皮制服里不会长虱子。在那些年头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虱子会传播伤寒，而伤寒使人大批大批地死亡，在前线和后方都是一样。

但是不久以后，全国都以极为恐惧的心情开始谈论起“穿皮外衣的人们”来了。

1918年1月，著名的女作家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在她的日记中写道：“位于豌豆街上的这个‘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非常奇怪和可疑。主要的暴行都是从那儿发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在私下谈话里说：豌豆街2号是他们的‘保卫科’。那儿当然有经验丰富的密探，都是些老的。天天他们都能揭发出某些‘密谋’来。”

“契卡”直属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契卡”总部也于1920年搬到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即现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大楼内。克格勃一直把宝剑和盾牌作为自己的象征：盾牌保卫革命，宝剑打击敌人。在克格勃的训练

手册中一直引用捷尔任斯基的一句名言：一个“契卡”主义者应该心地善良、沉着冷静、清正廉洁，为捍卫革命成果作殊死斗争。



克格勃前身——“契卡”的徽章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前排坐者）忠诚而铁腕地捍卫着苏维埃政权

“契卡”最早的工作手册是《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契卡”情报工作方法简介》。这些手册在撰写时借鉴了不少沙皇保安队的谍报技术。尽管“契卡”是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机构，但是“契卡”还必须不断地向资产阶级情报机构学习，学习他们的经验和技术手段。“契卡”早期的任务主要是对内的“一个用革命的手段来对付反革命的机构”，所谓反革命就是指布尔什维克的所有反对派和阶级敌人。

“契卡”在国内外的间谍行动不仅深受沙皇保安队的传统影响，还吸收了布尔什维克在地下活动时期所

取得的经验。很多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以前都能非常巧妙地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开展地下工作，以至于十月革命后他们仍然保留着化名。比如，我们熟悉的列宁，他的真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还有斯大林也是化名，他真名叫格奥尔基·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

“契卡”的首任领导人捷尔任斯基身材挺拔修长，留着山羊胡子，面容清癯消瘦，戴一副夹鼻眼镜，彬彬有礼，一副标准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害怕他的人叫他“身穿骑兵大衣的山羊胡子刽子手”，有人叫他“吸血鬼”，有人叫他“躁狂疯人”，有人叫他“暴虐狂”。那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制造了著名的“洛卡特事件”的英国外交官洛卡特曾这样描述他：“捷尔任斯基的举止无懈可击，言谈也很得体，只是没有丝毫的幽默感。最奇妙的是他的眼睛，那双深陷的眼睛闪烁着狂热信仰的冰冷光芒。他从来都不眨眼，似乎他的眼皮是瘫痪的。”他的那双眼睛最能说明他的职业。

十月革命后，新生政权苏维埃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正需要捷尔任斯基这样的坚强战士。捷尔任斯基与他的部下一昼夜工作18个小时，他们身上有一

种类似清教徒的自我牺牲和禁欲主义的精神。那时，有些人开始追求奢华的物质生活，而捷尔任斯基生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清水和工作。他只有办公室没有家，工作、吃、住全部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捷尔任斯基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后整整一年的时间终日埋头工作，没有休息日，也没有任何业余活动，从不看戏也不看电影。因其坚韧顽强的意志和严于律己的作风，他得到了“铁腕费利克斯”的绰号。

捷尔任斯基拒绝享受任何其他人没有的特权，从来不吃小灶。一个老兵负责在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就餐的普通食堂为他打饭，如果老兵给他拿来什么好吃的东西，捷尔任斯基就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老兵，问道：“今天其他人吃的也是这些吗？”老兵赶紧回答：“是的，是的，大家吃的都一样，捷尔任斯基同志。”

捷尔任斯基和他领导的肃反委员会，打击反革命的主要手段有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等，而采取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最初，列宁没有想到革命成功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规模会如此之大。渐渐地他意识到，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和解上，而使用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了自己。

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布尔什维克与其唯一的政治盟友——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很快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电影《列宁在1918》里有一组典型的画面，形象地诠释了双方严重的对立：一位衣着破旧的富农想和列宁辩论，说到一半，列宁打断对方的话激动地说：“你们富农存在一天，就得给我们粮食。如果你们用武力对付，我们就消灭你们。这就是我们工人和农民的真理！”而社会革命党人放话：“我们要把你们派去的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揪着后脖领子从农村扔出去！”

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组织具有高度神秘性，是一个行动和手段不受司法机关约束、无任何规则和底线的机构。“契卡”也不隶属任何地方党政机关。它无所不管，从消灭反动派到抓怠工、投机倒把、小偷小摸等等。而最令人恐惧的是“契卡”杀人无须请示批

准，说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并可以随意枪决。捷尔任斯基说：“对‘契卡’来说，有枪决犯人的权力是无比重要的。”捷尔任斯基是个仁慈而善良的人，但他必须执行列宁的指示——一切都是因为巩固红色政权的需要。

在监狱中服刑11年之久的捷尔任斯基，比谁都更明白镇压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一方面，他厌恶并极不情愿降低到沙皇暗探局的水平，他憎恨奸细。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们是怎样轻而易举地就蒙骗了沙皇的警察和狱卒的，他不愿重复敌人犯过的错误。

1918年2月18日，在“契卡”的负责人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密探只用于投机倒把一类案件的侦破，对政治敌人不采用这种手段，对他们的斗争只用‘干净’的办法，通过苏维埃人员的思想促进来进行。”

整整一个月之后，在又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禁止“契卡”使用密探打入敌人内部探听情况的办法。然而，良好的愿望在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便逐渐消失了。

捷尔任斯基被认为是个外行，但正是他开始实行

在囚室内“整治”犯人的办法：把密探装扮成犯人送入牢房从而探询出犯人在审讯时不肯招供的情况。这种被称为“放鸭入笼”的办法直至今今天还在被利用。

对政治案件的侦查从一开始就利用派秘密奸细潜入敌人内部“卧底”的方法来进行。侦查员只要能弄到犯人的口供就好。告密者、“线人”、密探——这些就被认为是侦查的主要工具。

捷尔任斯基并不认为“契卡”是秘密侦查机构、反间谍机关或政治警察机构，在他看来，“契卡”是有权独立消灭敌人的特殊部门。他写道：“契卡”工作人员是革命的士兵，他们不用去做什么侦查或暗探的工作，专门人才用不着去干这种事。不应把警察的工作交给“契卡”这样的战斗机构去做。

1918年6月12日，各地肃反委员会代表会议上的党团通过了以下决议：

- 1．可以利用秘密侦查人员；
- 2．排除保皇派——立宪民主党人以及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们的著名积极领导人；
- 3．注意并监视将军和军官们的行动，观察红军、指挥人员、俱乐部、各种小组以及学校等的动向；

4. 枪决那些有名的、确已被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投机倒把分子、抢劫犯和贪污犯；

5. 在地方上禁止各种资产阶级的、妥协派的和庸俗低级的报刊出版发行；

“契卡”证件



6. 建议中央解除乌里茨基同志在彼得格勒“契卡”中的职务，用一名更加坚定不移和雷厉风行的同志来代替他，以便坚决、不屈不挠地推行对那些要扼杀苏维埃政权与革命的敌对分子进行无情打击与斗争的策略.....

1918年8月29日，彼得格勒的“契卡”领导人乌里茨基被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第二天，列宁在莫斯科米海尔松工厂演讲遇刺，女凶手卡普兰被抓获。与电影

中的卡普兰的形象不同，此人实际上是个半瞎子，在昏暗中连开四枪，列宁身中三发子弹。枪响人散，只有她在原地不动。捷尔任斯基和“契卡”的同志们迅速反击。三天后，卡普兰被枪毙。

大规模逮捕开始了。一切受怀疑的人都被抓了起来。然而在那个时候，如果能找到有影响力的人物，或者遇上不很凶的侦查员，还有可能被释放。

沙皇时代著名的外交家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洛普欣也被捕了，他被带到了豌豆街。“契卡”的一个侦查员对他说：“请坐吧。您怎么回事，老爷子，跟投机倒把的搞在一起了？别干这些，干点儿别的事吧！”

洛普欣回答说，他跟那些人搞在了一块儿完全是偶然的。于是，侦查员说：“好吧，我可以放了您。不过我现在很累，也很饿了。咱们这么办行不行：我去吃晚饭，您坐到我的椅子上来，自己写一份审讯记录。您自己审问您自己——就照着这个样式写。”

洛普欣不仅为自己，还为自己的同伴们写了根本不曾进行过的审问记录。侦查员回来之后，把那几份记录看了一遍，就把所有的人都放了。

捷尔任斯基和“契卡”的工作卓有成效。彼得格勒

抓了1000多个反动分子，一半被枪决，一半被扣为人质。《红色报》刊登了这500个人质的名单，并以《对白色恐怖的回答》为题，发出苏维埃的严厉警告：“要是我们的领袖们哪怕掉一根头发，我们就会把那些在我们手中的反动分子一个不留地都杀掉！”

莫斯科大学历史和哲学系教授、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他的思想自传《自我认识》中记述了一段他与捷尔任斯基的交往。那是1920年，别尔嘉耶夫第一次被捕，审讯他的正是捷尔任斯基。别尔嘉耶夫回忆说：“在夜里12点我被带去审问。我被领着经过长长的阴森的走廊和楼梯，最后，我们经过比较洁净和光亮的走廊，进入很大的房间。这里异常光亮，地上却铺着白熊皮，在左边靠写字台的地方，站着我不认识的穿军装戴红军星的人。他让我坐下并对我说：‘我叫捷尔任斯基。’这是‘契卡’创始人的名字。我对捷尔任斯基说：‘我打算直接说出我想说的东西，这是符合我的思想家和作家身份的。’捷尔任斯基回答我：‘我们期待于你的正是这个。’那时我决定提前讲出要向我提出的问题。我讲了45分钟，作了整个的演讲，我所说的带有唯心主义性质，我努力讲清楚在怎样的宗教、道德、

哲学的基础上我是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捷尔任斯基很注意听我讲，只是偶尔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我长篇发言后，捷尔任斯基表示喜欢我的直爽，但仍给我提出了某些问题。我坚决不谈别人的事。我已经有了受审的经验。在审讯结束时捷尔任斯基对我说：‘我现在放了您，但是您在问题没解决以前不能离开莫斯科。’以后他又转身对明仁斯基说：‘现在很晚了，我们这里盗匪活动猖獗，能否弄辆汽车送别尔嘉耶夫公民回家？’”

在别尔嘉耶夫的笔下，捷尔任斯基并非一个面目可憎的人。

他的雕像矗立在克格勃大楼前

1919年1月，捷尔任斯基奉列宁命令，作为斯大林的副手协助处理皮尔姆事件。此后，捷尔任斯基成为斯大林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事件处理完毕后，经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联名建议，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合并，新部门称内务人民委员部。1919年3月，捷尔任斯基任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同年，他以俄共(布)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8月，

他被任命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主任。

1920年5月，西南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对委员会部分委员的表现强烈不满，警告中央委员会如不换上捷尔任斯基，那么对盘踞在乌克兰的波兰军的进攻将无法发动。于是在列宁建议下，捷尔任斯基担任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5月，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负责后勤的西南战线后方司令。6月，在捷尔任斯基的有力协助下，斯大林仅仅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击溃了波兰第2集团军，粉碎了波兰第3集团军的进攻，彻底扭转了苏波战局。

列宁曾经高度评价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列宁满怀激情地说：“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时，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和蓄意破坏。”

当时，在革命阵营里普遍的观点是，知识分子最不可靠。1922年，捷尔任斯基成立了一个“知识分子

处”，负责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知识分子的材料，逐步建立起完备的知识分子档案，也由此开始形成了完整的情报体系。

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超过25万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国内战争结束时，“契卡”裁减了一半人员，肃反委员会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帕乌”），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被任命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

同肃反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它的职权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

但是，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从未

停止过正常的运转。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根据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还可以枪决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据说，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的事迹十分感人。1926年7月20日，捷尔任斯基出席联共(布)中央全会。捷尔任斯基情绪激昂，像个不知疲倦、精神抖擞的战士，针对“反对党内反对派”的话题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严厉批驳了那些背离列宁路线的人。捷尔任斯基也是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以及极端混乱的状态，我就感到恐惧。”



矗立在卢比扬卡广场的捷尔任斯基雕像

接着在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开始赞扬自己的工作精神，费奥多尔·福明是早期肃反工作人员，也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职位最高的“契卡”，他回忆当

时的情景时说：“捷尔任斯基理直气壮地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吗？那就是我从不顾惜自己。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存在，我就会全力以赴同它们作斗争。’”当捷尔任斯基说到“我从不顾惜自己”时，大礼堂里的中央委员们大声应答：“对！”

捷尔任斯基说的话无疑是真的。为了革命理想，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当时的俄罗斯，新生的革命政权刚刚诞生，连年不断的战争破坏使得苏维埃许多地方“千里无鸡鸣”。在阴谋和反革命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敌人的血腥包围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超人的精力，以秘密警察的红色恐怖手段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他大无畏的精神，敏锐、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大会发言刚过去3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猝然离世，享年49岁。

他死后被葬于莫斯科红场。他的画像、死后拓的石膏面模、拓的手纹以及他的军装都装进玻璃柜中，摆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的会议厅中，供人们瞻仰。

但是，随着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日益膨胀，人们淡化了对捷尔任斯基的敬仰，他的肖像不仅越挂越少，而且越挂越小。二战后，他的石膏像和手纹干脆被从克格勃军官俱乐部中拿走。

20世纪50年代末，在克格勃中央大楼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竖起了一座捷尔任斯基的塑像。塑像大理石底座旁边总是摆放着鲜花。克格勃第一总局的军官们早晚都要进行一次献花的仪式。1991年“8·19”事件后，民主派推倒了捷尔任斯基雕像。捷尔任斯基广场被更名为卢比扬卡广场。

2004年9月11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上举行了一场不同寻常的雕像安放仪式，被推翻的捷尔任斯基雕像又重新竖立在广场中央。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说：“重新竖立捷尔任斯基的雕像并不意味着要回到过去的时代，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卢日科夫的讲话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俄罗斯右翼势力认为，竖立捷尔任斯基的雕像不是建筑学上的问题，因为捷尔任斯基雕像是残酷镇压和恐怖制度的象征；而左翼力量则认为，捷尔任斯基是秩序和公正的象征。

第二章 佐尔格：来自东京的神秘电波

举止高雅、气度潇洒的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位毕业于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的著名记者竟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一个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德国青年

1926年捷尔任斯基病逝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由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夫维奇·明仁斯基领导。1934年7月10日，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局，其职责包括对内进行政治监督、对外进行反间谍渗透和情报侦查，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再次归属于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1936年，雅戈达被斯大林免去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久，被指控为反革命杀人犯和外国资产阶级的间谍，经过司法公开审判后被他当初的下属枪决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继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职务。他运用斯大林赋予的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庞大而高效的组织体系，对苏联的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整肃，开展揭发党和革命的敌人的告密运动，弄得整个苏联几乎人人自危。

1938年，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接任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家安全总局和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联手，继续加紧向苏联境外派遣和发展情报人员，编织跨国间谍网。

1943年4月，国家安全总局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中再

次分离出来，名称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1946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正式成为两个苏联国家部一级的政府机构，名称也从此改为苏联内务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国家安全部被撤销，其工作被并入贝利亚兼任部长的内务部。

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间谍佐尔格取得的杰出成就，就是这一时期苏联情报部门工作成就的直接反映。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的一个小镇上。父亲是位工程师，为附近一家瑞典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后来成了银行家。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得多。佐尔格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柏林，在郊区利奇特费尔德居住下来。

佐尔格小时候敏感而胆小，非常害怕黑暗，卧室里必须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但他热爱体育，经常运动使他体格健康。佐尔格读高中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

战。

一次战斗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治疗。伤愈后，回到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拿到毕业证书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三周后他再次负伤，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

治伤期间，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两次在战壕中作战，冥思苦想，却不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精神上感到十分困惑，不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意义。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广泛涉猎古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他的思想逐渐明朗，觉得眼前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了。此后，他决心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后进入基尔大学学习，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学博士。不久，佐尔格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积极参与建立青年人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花大量时间培训德共地方组织的干部。当时，他的公开职务是大学

助教、报纸编辑和记者等。他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了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佐尔格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1924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情报部门的官员。佐尔格作为与会代表有机会与苏联人深入接触，由此也彻底改变了佐尔格的人生轨迹。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

佐尔格在莫斯科受到上等的礼遇。很快，他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苏联国家安全总局的情报人员，专门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此后的几年，佐尔格受命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莫斯科开始把情报和宣传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为此，

苏联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许多间谍小组来到中国，这里面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



青年时代的佐尔格（左一）

1929年，莫斯科派佐尔格前往中国。他原本就喜欢中国文化，因此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经过一番

乔装打扮后，办理了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旅行护照，然后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一个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社签订的，一个是与《农业报》签订的。佐尔格对《农业报》的经理说，他打算研究中国的农业状况，并为该报撰稿。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状况对了解整个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报社经理对他的见解大加赞赏，并表示积极支持，他还通过一位朋友为佐尔格搞到一张由德国外交部宣传处写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的介绍信。

1929年11月，佐尔格离开柏林，于1930年元月到达上海。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一位报务员。不久，苏联派来协助工作的无线电技术专家马克斯·克劳森也到达上海。佐尔格立刻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他持德国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结识了许多在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

佐尔格以德国记者的身份先后到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搜集中国的情报，了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基本情况。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

特莱女士，通过她结识了日本大阪《朝日新闻》驻华记者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

佐尔格作为一位记者，周旋于德国总领事馆的社交圈子和记者联谊会之中。他从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那里了解到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部队编制、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关系等情报；依靠德国教官搜集到了南京军火仓库的平面图。佐尔格所搜集到的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转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在上海进行谍报活动的三年经历，大大丰富了佐尔格的谍报经验。他的勇气也经受住了考验。

东京的辉煌

回到莫斯科后，佐尔格本想休整一下，利用空闲时间，根据自己搜集采访到的一手材料，写一部有关中国农业方面的书。不料，三天后总部找他谈话，将他派往日本建立秘密情报小组。当时苏联当局觉得，

日本和德国的合作严重威胁到苏联远东的安全。佐尔格前往日本的主要任务是，摸清日本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进攻苏联等问题。总部给他指派了两名助手：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和日本人大崎。按事先计划，佐尔格先行到达日本后，这两人会相继与他联系。

接受了任务的佐尔格，像上次去中国一样，先到柏林寻找合适的掩护身份。自然最合适的身份还是记者，他在中国做记者时在《社会学》杂志和《农业报》上发表的文章产生很大影响，已赢得“熟悉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他这次回到柏林，好几家报纸和杂志慕名而来，主动聘请佐尔格担任特约记者。最后，他选定影响颇大的《柏林交易所报》、《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兰的《商业评论》。

1933年7月，一切准备就绪。佐尔格怀揣德国护照踏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国港口瑟堡，从那里乘船经纽约到横滨，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当时的东京政治气氛十分沉闷，暴力事件时有发生，人人自危。一年前，首相犬养毅在官邸遭一伙年轻军官枪击。就在佐尔格到达东京前两个月，发生了

一起企图刺杀全体内阁成员的阴谋事件。日本名义上是由一位神化的天皇统治，但天皇并不能直接行使权力。因此，这个国家实际上由军人和官僚机构控制着。由于日本陆海空三军存在嫌隙，尤其是陆军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而日本的政策和目标往往摇摆不定，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驱动下，日本政府甚至会采取轻举妄动的路线。日本人表面上守规矩重礼节，表现得笑容可掬、彬彬有礼，往往叫人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刚到东京的佐尔格，对日本人保持着高度警惕，但他很快熟悉了环境，对付日本人繁复的礼节也感到游刃有余了。

到达东京的当天佐尔格就拜访了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还没上任，佐尔格受到使馆人员的热情接待，他们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此时，希特勒刚当上德国总理，大家都急切地想了解国内的情况，得知他刚从德国来，立刻围上来向他提出种种问题。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佐尔格博士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提问，显示出他是个有地位的消息灵通人士。初次见面，佐尔格便给使馆官员们留下深刻印象。通过特殊关系，佐尔格搞到了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日本外务省

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

第二天，佐尔格登门拜访天羽，此人也是日本外务省重要的新闻发言人，红极一时。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只有各国驻东京的大牌记者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经天羽荣二介绍，佐尔格结识了许多知名的日本记者和驻东京的外国记者。

不久，佐尔格东京间谍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他们开始了有组织的情报搜集活动，不定期地交换和分析情报。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而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的私人秘书，近卫在日本内阁中属强力派，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

不久，佐尔格东京间谍小组发展了第四名成员宫木佑德，宫木十分善于搜集各种有价值的情报，佐尔格称赞他为搜集情报的“艺术家”。

到东京后，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德国纳粹党，一年后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在佐尔格看来，要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必须从德国大使馆入手，而要获得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他有一句话成为著名的间谍名言，流传很广，那就是：不要把手伸向

保险柜，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底，德国新任助理武官奥特到东京上任。佐尔格拿着奥特在《每日展望》做编辑的一位密友的信拜访奥特。这位朋友在信上不仅对佐尔格的能力大加赞赏，而且说他在人品和政治上完全可信，作为朋友佐尔格是个不可多得的人。奥特武官在柏林曾阅读过佐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有关日本的文章，对博学多才的佐尔格印象深刻。当年奥特上校40岁刚出头，佐尔格刚满39岁，年龄相仿的人也容易沟通，加之在一战中，他们都曾经是德国军人，打过仗负过伤，共同的经历使他俩一见如故。

奥特一心想着好好表现自己的才能，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当时，他正因为自己送给柏林的报告由于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没受到柏林的重视而发愁。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奥特的欢迎。从此，奥特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总是先同深知日本国情的佐尔格交换意见。佐尔格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情报，或者提出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充实了奥特所写报告的内容和分量。报告送上去后，奥特经常受到柏

林的表扬。由于佐尔格的帮助，奥特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佐尔格更成了奥特家里的常客。

佐尔格与使馆人员的关系本来就搞得不错，大家看到奥特武官与佐尔格称兄道弟，关系密切，对佐尔格越发另眼看待，因此他在使馆的地位非同一般。

1936年初，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势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有权控制财政收支和干预政治事务，并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资源用于战争。他们提出口号：“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这是一群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法西斯式的好战狂。为达到目的，他们可以不惜一切，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集团的行动，根据对大崎和宫木搜集到的情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日本青年军官团正准备发动武力政变。

事发前，佐尔格写了一份相关的分析报告。报告送往莫斯科之前，他决定向德国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但他们三人谁都不相信这件事，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未予重视。

1936年2月26日清晨，东京1400多名士兵在青年

军官的指挥下迅速占领了日本政府所属的几幢大楼，包括陆军省城市警察局和国会。同时还袭击了首相官邸和几位显贵的公馆。首相死里逃生，而两名前首相则死于非命。

武装叛乱事件果真爆发，德国大使馆这才想起佐尔格提供的情报，佐尔格的威望陡然大增。

苏联情报机构对佐尔格下达了新的任务：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以及日本对苏联的真实意图。

佐尔格从奥特和德国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而且谈判一度终止。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奥特无意中漏出了这样一句话：德日之间的谈判又重新开始了。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奥特武官却不再提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报告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同样的消息。1936年4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同德国外交部就签订同盟条约一事举行过多次谈判，因日方不愿意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所以谈判难以深入。此外，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崎找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入手，尽力搜集更多的情报。

但是无论从奥特武官还是从大使那里，佐尔格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由此推测，很可能谈判对大使馆也是保密的。

正当佐尔格心急如焚的时候，机会来了。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获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交部根本没有参加谈判，负责谈判的人，日方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德方是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特让佐尔格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况。他还让佐尔格发誓，决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佐尔格当然立刻答应保密，很快一封用军用密码写成的电报发往柏林。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回电中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结果还没出来。此外佐尔格还了解到许多谈判细节。

柏林派来一位特别信使哈克，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秘密访问东京的。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尔格，哈克顿时容光焕发、异常兴奋，张开双臂奔向佐尔格，亲热地说：“你好，

佐尔格，还记得吗？当年我和你是同坐一架飞机飞抵日本的。”佐尔格也喜出望外，紧紧握住哈克的手：“当然！见到你很高兴。”他们3人去东京一家著名的大饭店，要了一个单间喝酒叙旧，为哈克来到东京接风。几杯酒下肚，彼此的话就越来越多了，哈克告诉佐尔格，他深受卡纳里斯的信任，曾参与德日谈判，并告诉佐尔格这次东京之行的使命是给大使带来一个秘密指令，要他们在日本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同盟。哈克说，德日谈判的障碍来自日本方面，因为日本人不想过早地同苏联人打仗。但德国希望与日本签订军事同盟条约，造成苏联腹背受敌，减轻德军的压力。为了早日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来属于德国，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为了达成协议，希特勒给军事同盟披上“防共协定”的外衣，即所谓的“同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说到底就是为了对付苏联。哈克还说，德国方面相信谈判不会半途而废，他们还会给协定加上一些秘密条文。

这次偶然的相遇帮了佐尔格的大忙。这些重要情报，佐尔格都迅速地报告给莫斯科，经苏联国家安全

总局汇报给苏联政府。因此，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已掌握情况。

1937年近卫出任日本首相，这对佐尔格的情报小组极为有利。大崎利用同学的关系早已结识近卫。大崎是一位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正是新首相需要的人才。近卫上台后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作为他的智囊团，他不仅邀请大崎参加，还要他担任中国部的负责人。这样，大崎得以直接参与日本国家政治事务，并很快成了近卫首相的密友和谋士，可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而佐尔格也因此能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情报。佐尔格从大崎那里获得了诸如日本内阁同军部政策的统一问题，军需物资生产计划和对华行动计划等。根据对所获情报的分析，佐尔格得出结论：近期内日本不会对苏作战，但它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7月10日，日本首相近卫、陆相杉山和外相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佐尔格作为外国记者参加了招待会。

佐尔格想知道德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他问大

使：“我们德国记者是否应该支持近卫？”大使把刚从柏林发来的电报给他看。电文中提到，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日军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就小了。由于日本下不了决心进攻苏联，德国人非常恼怒，对德日签订同盟条约也冷淡了。德国外交部宣称，他们不打算没有报偿而白白奉送礼品（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由于两国各有各的打算，一时无法结成同盟。

第二天，佐尔格从大使那里知道，日本外相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武器，并坚持要求德国从南京召回他们的军事参谋人员。

综合上述种种情况，佐尔格向莫斯科汇报：日本人企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打算对苏作战。但实际上近期内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进攻苏联。

当时在欧洲战争一触即发，斯大林十分担心苏联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他指示苏联情报部门千方百计弄到日本近期会不会对苏开战的情报。佐尔格的这份情报很快传到斯大林那里，令他一颗悬着的心暂时放松下来。

1938年3月柏林来电，授予奥特武官少将军衔，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终于如愿以偿。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紧紧握住佐尔格的手，表示能有今天的荣誉，与这些年来佐尔格无私的帮助分不开，为此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佐尔格已经在德国大使馆有了自己单独的办公室。他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成新闻简报，挑选较重要的新闻给使馆高级人员阅读。然后着手编新闻摘要，发给侨居日本的德国人。此外，他还编辑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他的办公室设在使馆的二楼，紧挨着德国新闻社的监听室。佐尔格干这份工作定期从使馆获取报酬，但他不愿进入使馆的正式编制内，这样可以免掉许多不必要的审查。此时，因与奥特大使的特殊关系，德国驻东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向佐尔格敞开了，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德国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办公室拍照，然后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40年，佐尔格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之前，德国《法兰克福日报》正式

聘请他担任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佐尔格成了纳粹党的大红人。

向莫斯科发出警报

1940年，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多次谈判终于在东京签署，日本成为缔约国成员，苏联处于腹背受敌之中。那时，纳粹德国的铁蹄已经占领了波兰和法国，又虎视眈眈地瞄准了苏联。苏联一时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德国究竟什么时候会进攻苏联，成了苏联情报部门迫切需要掌握的消息。

由于佐尔格在德国中特殊的地位，他搜集这个情报是最有优势的。那些日子里，佐尔格抓住一切机会了解德国国内的动态。恰好这时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故意问他：“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信使耸了耸肩说：“管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

佐尔格大吃一惊，感到强烈的震动，这是佐尔格第一次获得可靠情报。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

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于是，佐尔格充分利用与德国大使馆的密切关系，仔细阅读使馆收到的从柏林发来的大量电文。经反复分析比较，佐尔格终于发现，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德军第4和第12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再次向苏联情报部门发出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德军已集结了80个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1941年3月5日，莫斯科又收到佐尔格的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准备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佐尔格在德国使馆经常见到来东京出差的德国信使或德国国防部工作人员，他们都谈到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移动，还说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通过克劳森的秘密电台接二连三地向莫斯科报告。

有一次在与大崎的讨论中，佐尔格指出存在突然

爆发苏德战争的极大可能性。大崎说：“如果德国需要苏联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那么苏联可能会作出经济上的让步，以求免于一战。”佐尔格说：“如果德国提出这种要求，苏联当然会屈服。但我所担心的是德国根本不提这类要求，而是进行突然袭击。”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在大使馆与特使聊天中，佐尔格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苏联战俘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德国东线的威胁。

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带来了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德军170~190个师已聚集在东线。一旦进攻开始，苏联红军将彻底崩溃，苏维埃政权在两个月内完全瓦解。

5月30日，佐尔格再次向莫斯科情报部门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

清晨，发完电报回到自己的住所时，佐尔格在门

口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来寓所找他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他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果然，大崎脸色苍白地告诉佐尔格：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进攻苏联。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对此日本大使宣称，在请示本国政府之前，他不能作出任何允诺。

佐尔格听到这番话，连寓所的门都没进，立即跳上车，掉头驶向克劳森的寓所，拉起克劳森十分急促地说：“发报，立刻向莫斯科发报，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急电发出后，佐尔格心急如焚地等待指示。奇怪的是，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任何答复。

佐尔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再次口授电文，命令克劳森立即发出：“再次重复：17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不宣而战，向苏联边境发动进攻。”

莫斯科终于给他们拍来电报表示感谢，但电文中没有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这令佐尔格感到非常费解。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

本来佐尔格的情报可以挽救整个苏联的命运，遗憾的是，苏联政府没有对佐尔格的情报予以重视，战争准备不充分，所以战争初期一溃千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不管怎么说，佐尔格对德国袭击苏联事先作出了最精确的预告，在世界谍报史上留下一则堪称完美的情报杰作。

最后的使命

战争爆发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另一方面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进攻，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德国使馆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奥特将军指示在日本的全体德国军官集中力量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促使日本进攻苏联。德国武官甚至制定了日本进军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作战计划。尽管日本外相松冈4月份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签署了日苏中立协定，但他不止一次地向德国保证，一旦德苏开战，日本不

会信守中立，仍将袭击苏联。

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中。6月26日苏联情报部门指示佐尔格：“告知日本政府作出的有关苏德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进行了何种新动员，部队调遣到中国作战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苏联远东边界移动的情况。”佐尔格围绕这些问题开始搜集情报。

事实上，早在3个月前，佐尔格和大崎就已着手研究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并收集到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军队的数目、驻扎的地点，师团长等主要军官的姓名等。根据已掌握的情报，以及对近来形势的分析，佐尔格间谍小组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

7月2日，日本内阁和军方举行御前会议，陆海军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重新部署了中国北方前线和西伯利亚边境等地的兵力，拟定了中国华南前线和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方案。会议通过决议：日本将争取中国的战事圆满解决，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无论向哪个方向都能迅速派遣军队。



目光冷峻的佐尔格天生就具有做间谍的素质
会议一周后，奥特大使收到日本政府有关会议决策的通告。

奥特大使把日本的声明单方面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准备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大崎则告诉佐尔格：日本近卫首相的看法是，日本为中国的事情已忙得不可开交。加上他对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毫无把握，摸不到底，因此不愿与苏联交战。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佐尔格推理出初步的结论：日本将采取措施稳住北方局势，而不是真想向苏联开战，但在南方向印度诸国发动进攻则是无疑的。佐尔格将此情报电告了莫斯科。

为弄清日军的最新动向，佐尔格小组开始紧张的工作。大崎制作出一张详细的图表，设法摸清调往中国东北日军部队的数量，以及日本为进攻苏联在中国东北进行准备的情况。至于日本进行战事动员的详细计划由宫木搞定，佐尔格则负责从德国使馆搞情报。

大崎对情报进行分析发现，日本应征入伍的新兵，有的发冬装，有的则发夏装。因此一时无法搞清楚日军去南北方向的比例。大崎决定亲自前往中国东北实地调查。

佐尔格则勾画出日本大规模战事动员的整体趋

势。动员大致分三个阶段进行，总共为两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为15天，计划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万人，7月底以前军队征用100万吨商船作为战时运输。佐尔格还注意到，战事动员进展缓慢，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

8月20~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所保留，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可以开始作战：第一，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三倍；第二，有明显迹象说明苏联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大崎把这个情况向佐尔格作了汇报。

佐尔格根据日本春秋两次战事动员的情况，在大崎对日军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资源、生产、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支和军事力量等大量数据和材料分析，得出结论：日本无力进行长期的战争，不可能同时多面出击。9月6日，他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

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

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接到佐尔格的情报，苏联立刻调整了战略部署，苏联最高统帅部从东部转移11个步兵师和坦克师，共25万人。苏联的军用列车满载着这些步兵和坦克部队，一列接着一列，日夜不停地调往西线，去参加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佐尔格提供的准确情报，让这些部队大胆增援莫斯科，最终使苏联取得卫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东京受审

佐尔格东京小组的活动其实早就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注意，日本情报部门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秘密电台发出的电文，但一时无法破译出来。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东京反间谍机关也全力投入了行动。

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曾到德国使馆拜访过奥特大使，佐尔格从奥特那里知道，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佐尔格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迟早会暴露自

己的小组。但是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同千百万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1941年10月18日清晨，身穿着睡衣拖鞋的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埋伏着的一群日本特高课特工逮捕。第二天，克劳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佐尔格东京小组间谍案，逮捕的有关人员共35人。

1941年11月23日清晨，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捕。两人因“叛国通敌”罪被日本警察局拘留。电文进一步解释说：“经与日方再三协调，日本外务省才答复说，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进行间谍活动。我已提出要知道目前的审讯结果以便通报国内，但日方说，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此事应予保密，一时无从了解。”

佐尔格被捕的消息在东京传开了，人们莫不目瞪口呆。德国记者同行立即联名写信给大使，表示支持佐尔格，认为日本人对她提出的指控有问题。他们前

往监狱给佐尔格送东西，并要求去探望他。

奥特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助理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认识，并一直把佐尔格看做交往很深的私人朋友，是他最可信赖的同胞。因而奥特大使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人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的说法。

奥特将军认为佐尔格绝不会有叛国的嫌疑，这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不幸的佐尔格成了日本上层人物反德阴谋的牺牲品。奥特在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文中说：“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警方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近卫首相的秘书保持联系。”当时，近卫内阁刚倒台不久。1941年10月，正是日美谈判的关键时刻。因此奥特在电文中接着说：“关于日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说已落入佐尔格手中，因而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的可能性。当前东条英机首相直接掌管警察。我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事。”

德国外交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

“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事。”小岛说，“根据

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警察决不会决定逮捕他。”

经再三追问，小岛才含糊其辞地透露：佐尔格很可能被指控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奥特大使得知此消息，依然为佐尔格辩护说：“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

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听到此消息，奥特大使简直如五雷轰顶。心情复杂的奥特大使最后一次去看望了他。奥特大使只被允许提三个问题：

“你的身体怎么样？”

“我很好，谢谢你。”

“伙食怎么样？”

“还好，谢谢。”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佐尔格？”

“谢谢，我什么都不需要。”

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奥特就被撤销了大使职位，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佐尔格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

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苏联已经收复了所有国土，大军直指柏林。也是这一天，日本东京巢鸭监狱里，佐尔格与大崎一起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终年49岁。

佐尔格死后，他的恋人为他在日本东京的多摩公墓建了墓地，每年都要来这里纪念他。

佐尔格死了，可是直到死他都不知道，在苏联内务部和总参四局的档案里，他已经成了一个“完全投靠了日本和德国的间谍”。此后多年，苏联情报部门一直没有承认佐尔格的身份。

一直到了20年后的1964年，赫鲁晓夫偶然看到了一部外国电影《佐尔格博士你是谁》，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件真事，赫鲁晓夫非常震惊，随后下令授予佐尔格苏联英雄称号，苏联因此开始全面纪念英雄佐尔格，为他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莫斯科和他的家乡巴库都为他建立了纪念雕塑，出版了大批

相关书籍。莫斯科的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

著名记者、德国大使馆资料分析员、德国纳粹党员、德国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员、德国博士、苏联间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佐尔格是20世纪苏联乃至世界情报史上最伟大的间谍明星。

第三章 国家追杀令：托洛茨基暗杀事件

苏联时期，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追杀事件就是刺杀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曾是苏联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是苏联早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在中国的地位相当。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成了斯大林的政敌，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均被解除。苏联最高法院缺席判决其死刑，克格勃派出暗杀小组，在墨西哥成功暗杀了托洛茨基。

被驱逐出境的领袖

苏联情报部门是组织海外追杀行动的高手，其中

三次最成功的追杀行动曾轰动整个世界：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列夫·利比特在德国慕尼黑被枪杀；保加利亚作家马尔科夫在英国被克格勃毒死；托洛茨基喋血墨西哥城震惊了整个世界。

1879年11月7日，托洛茨基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富农家庭，原名列昂·达维多维奇·布隆斯坦。1896年他参加了地下社会主义小组，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898年托洛茨基因参加工人运动遭到逮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4年后，他逃离西伯利亚，用“托洛茨基”名字的假护照逃到伦敦，从此“托洛茨基”这个名字比他的真名更出名。

在伦敦他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与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创办了《火星报》。不久，托洛茨基与列宁发生论战，成为孟什维克中的一员，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26岁的托洛茨基回到祖国，被工人群众推举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06年他再次被捕，12月被判处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次年2月在押解流放地途中逃脱，流亡国外。此后，托洛茨基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活动。

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托洛茨基当时主张采

取激进的不断革命立场，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把革命推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由美国返回俄国，于5月17日抵达彼得格勒，当即发表演说，鼓吹革命应立即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被推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7月，革命失败，托洛茨基被俄国临时政府逮捕。在狱中，托洛茨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受到列宁的热烈欢迎，在牢房中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9月初，托洛茨基被临时政府释放出狱。

当时，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正在全力准备武装起义。托洛茨基出狱后就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从而成为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10月10日，在列宁主持下，布尔什维克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会议，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上，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政治局，共推选出7名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成为其中之一。

斯大林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起义（十月革命）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

托洛茨基同志。”托洛茨基甚至坐装甲列车冒着枪林弹雨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差点被炸死。列宁曾对朋友、著名作家高尔基说：“除了托洛茨基，谁还能给我迅速地组织起一支上百万人的强大军队？”

十月革命胜利后，被列宁称为“红军的缔造者”的托洛茨基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党内，托洛茨基都被授予仅次于列宁的领导职务。在1918~1921年中央全会的会议记录本上，托洛茨基的名字总是跟在列宁后面，排在第二位。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并列挂在一起；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发言结束均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在欧美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的威望非常高。当时西方各国普遍认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非托洛茨基莫属。

列宁病重期间，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携手联合，结盟为“三驾马车”，为攫取最高领导权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列宁弥留之际，对党内的团结和稳定十分关注，担心党内出现分裂，对自己的接班人问题提出了看法。当时，苏共正在召开“十二大”。列

宁担心自己无法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便口授了一封《致代表大会的信》，后来这封信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在信中，列宁口述了这样的内容：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

无论列宁说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托洛茨基手握“圣旨”，在夺取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是有优势的，但他干了一件对政治家来说非常幼稚的事，结果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时，他出版《论列宁》一书和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论列宁》是托洛茨基纪念列宁的文章汇编。由于自负性格使然，托洛茨基在书中不乏强调自己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十月的教训》一文是托洛茨基为《一九一七年》一书所写的序言，是为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和德国共产党起义失败一周年而写

的。文章中翻出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年反对十月革命的老账。

托洛茨基的做法彻底惹恼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相继发表了《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路线往何处去》等文章和报告。斯大林也先后发表了《论列宁》、《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和演说，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声援。他们都抓住托洛茨基抬高自己这一弱点大做文章，将其上纲为“主义”之争，指责托洛茨基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取代列宁主义。报纸上还公布了托洛茨基1913年粗暴攻击列宁的信，整个形势使托洛茨基陷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被列宁称为“红军的缔造者”的托洛茨基

终于，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成为失败者。1925年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行，解除了他的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给予最严厉的警告。1926年

他不再是政治局委员，1927年10月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一个月后被开除出党。

1928年1月20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把托洛茨基拖上汽车，强行将他驱逐出莫斯科，发配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偏远的阿拉木图距离莫斯科4000多公里，没有电灯和自来水，连一条像样的街道都没有。在阿拉木图，托洛茨基虽然受到严密监视，但他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半年时间，他发出的信件和电报有1300多件。1928年12月中旬，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派员沃伦斯基从莫斯科赶到阿拉木图，专门向他发出警告：必须无条件地停止领导党内反对派的活动，否则将把他驱逐出苏联国境。托洛茨基提出了强烈抗议，并给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了一封信，声称反对派的活动不具有反革命性质。他抗议对他的流放，坚决要求参加政治活动，继续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进行斗争，声称要他停止政治活动意味着要他停止为国际无产阶级利益进行斗争，而他，托洛茨基，从事此种斗争已达32年。在他全部生命中那些有意识的岁月里，他从未间断过这种斗争，因而不愿屈从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最后通牒。

1929年1月18日，苏共中央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将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国境。投反对票的是布哈林、雷科夫和托姆斯基。就在苏联政府通过各驻外使馆，仔细研究哪个国家同意接收托洛茨基时，上次来过的那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使又来找托洛茨基了。这一次特使向他出示了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会议所作记录的摘要。该摘要说，鉴于托洛茨基从事组织非法政党这一反革命活动，决定将其驱逐出苏联。得悉这一文件后，气得发疯的托洛茨基当即向那位特使写下了如下“收据”：

1929年1月20日向我宣读了1929年1月18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会议通过的，形式上非法实质上犯罪的决议。П.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狂怒地大喊大叫，说这一决议实质是犯罪，一个未经国家法庭批准的决定，其形式是不合法的。但这种反抗毫无意义。22日黎明，托洛茨基和妻子、儿子在押送人员的强制下，一起上了大客车。一路上大雪纷飞，走了7个多小时才到达30公里外一个林

中小火车站，登上了一辆押送他的专列。

托洛茨基提出要去德国，沃伦斯基电告莫斯科请示。在等待上面答复的日子里，暴风雪降临了。每天早上，火车拉着唯一的一节车厢，到最近的一个大站去搞食品。12天后，他们终于接到通知，德国拒绝收留托洛茨基。专列只好掉头向南开去，前往土耳其方向，这是当时唯一一个愿意收留托洛茨基的国家。

2月10日，专列终于驶达黑海著名港口敖德萨。托洛茨基一行被安顿在“伊里奇”号油轮上。托洛茨基一家和4名保镖随“伊里奇”号在黑海的滚滚波涛上航行了几天来到土耳其。这里是托洛茨基流亡国外的第一站，前后待了4年。

1932年2月20日，托洛茨基得到通知，苏联政府决定剥夺他的苏联国籍和公民权，同时剥夺他的妻子娜塔丽娅、儿子谢多夫和女儿季娜伊达的苏联公民权。

自那以后，这位鼓吹世界革命的“终身漂泊的船长”，不断变换住处，四处流浪。1933年7月，托洛茨基以治病为由进入法国。在巴黎，有人闯进他的住所，砸开了一个保险柜，烧毁了近70公斤文件，都是

一些十月革命前后的珍贵资料。1935年，托洛茨基来到奥斯陆。1936年8月5日，托洛茨基出去钓鱼的时候，一帮法西斯分子袭击了他的住宅，他们企图抢走一些档案材料，搜集他从事非法活动的证据。1937年1月9日，托洛茨基乘坐挪威的油船“路德”号抵达墨西哥。

无论流浪到哪里，托洛茨基都在不停地工作，一天也未间断过。他撰写了大量的书籍、文章和抨击性小册子，作品中的主人公均是最终战胜对手的勇士，托洛茨基以此表达自己必胜的信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和家人的命运却一个比一个悲惨。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是托洛茨基的结发妻子，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集中营里悲惨地死去。第一次婚姻使托洛茨基有了两个女儿——季娜伊达和尼娜。尼娜在父亲流放阿拉木图期间患肺结核死去；季娜伊达同父亲一样被驱逐出国，1933年在德国自杀身亡。托洛茨基第二任妻子谢多娃给托洛茨基生下两个儿子谢多夫和谢尔盖。小儿子谢尔盖是苏联工艺学院的教授，托洛茨基还在克里姆林宫时，他就已经离家出走。谢尔盖厌恶政治，喜爱体操和杂技，后来又钻

研机械技术，还出版了一本有关发动机的书。他拒绝同父亲一道流亡。1932年1月，《真理报》刊登了一则简讯，题为《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尔盖企图毒死工人》。在这之前，谢尔盖已被流放到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疆区。这则消息刊登后，他便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最后死在集中营里。他的妻子在他被捕前一年半宣布离婚，但也没有逃脱惨死的命运。

谢多夫随父亲一起流放，并成为父亲工作上一名得力助手。在巴黎时，谢多夫得了阑尾炎，到巴黎米拉勃街一家白俄出资开办的诊所做阑尾炎手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给他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可是很奇怪，第二天，医务人员发现他发着高烧，手术切口处有一大片淤血。于是，医生立即给他做了第二次手术，但这次手术无济于事。1938年2月16日，他死在这家诊所。托洛茨基立即对儿子的死因发表声明。当时，尽管他拿不出直接的证据，只援引了六七件间接的材料，但他坚持认为，儿子的死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为。托洛茨基在日记里绝望地写道，他的孩子在血腥的政治漩涡里一个个死去。全部亲人中只剩下妻子和八岁的外孙子谢瓦，那是女儿季娜伊达的儿

子。儿子的死使托洛茨基意识到，下一个就该轮到自己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早就盯上他了，只是条件一时还不够成熟。

对托洛茨基而言，除了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外，他携带的档案安全也是他的一桩心事。他开始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联系出售这批档案。1940年初，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以15000美元买下全部档案。托洛茨基附带提出几个条件，其中一条是，这些档案40年后才能公开，这样能使与他曾有通信来往的人“免受迫害”。

在这段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一直进行着反斯大林主义的活动。他写了大量著作反对斯大林和苏联，坚持和宣传他的《不断革命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支持无政府主义者，遭到了斯大林主义者的仇视。一个震惊世界的跨国追杀阴谋终于开始实施了。

在斯大林授意下，内务人民委员会负责人、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亲自制定出谋杀托洛茨基的完整计划，并指派苏多普拉托夫领导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去执行谋杀任务。斯大林接见了苏多普拉托夫，亲自对他讲，立即物色可靠的人选，要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

务。行动小组的任何要求都将得到无条件的满足和支持，有关秘密小组的行动情况直接向贝利亚报告，而不必向其他人汇报。同时，斯大林和贝利亚要苏多普拉托夫记住，执行此次任务的所有责任，所产生的任何后果都由他承担。

苏多普拉托夫很快被任命为情报局副局长。在墨西哥具体指挥谋杀行动的叫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根，是一个长期活动在国外的老牌内务部特工，曾在西班牙处决了不少所谓有背叛嫌疑的苏联军事顾问。

然而他们精心策划的第一次谋杀并没有成功。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秉性是一清二楚的，因此，他对自己的安全格外小心。他有一个专门的警卫班子，他的秘书汉森兼任警卫队长。托洛茨基有一名贴身保镖叫罗伯特·谢尔顿·哈特，是一个25岁的美国人。到墨西哥不久，他就被苏联内务部特工收买了。

1940年5月23日轮到哈特值班，凌晨，按照事先约定，哈特悄悄地打开了大门，20多名身着军装和警服的男子冲进了托洛茨基住宅，这伙人对各个房间的位置十分熟悉，他们径直扑向托洛茨基的卧室，用自

动步枪朝床上猛烈扫射。托洛茨基的妻子很机灵，听到枪响，猛然翻身把托洛茨基扯到床下，贴着墙角紧紧趴在地上，这样他和妻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次，托洛茨基还算走运。袭击者用自动步枪同时对托洛茨基的外孙子谢瓦住的房间、托洛茨基的书房和卧室扫射了300多发子弹。但受伤的只有托洛茨基的外孙子，一颗子弹擦伤了他的脚。整个袭击持续了20分钟，他们以为托洛茨基一家都被打死了，出门抢了两部汽车，并带走了哈特。后来，暴徒们知道托洛茨基没有死，担心警方找到哈特，为了灭口就把他干掉了。大约过了一个月，人们找到哈特的尸体，他被埋葬在一名参与这次刺杀行动的人的私人花园里。

暗杀发生后，墨西哥警察赶到现场调查，托洛茨基把右手放在嘴边，不无幽默地低声说：“偷袭的策划者是约瑟夫·斯大林，是苏联内务部格鲁乌执行的。”

贝利亚知道暗杀失败后，在别墅里召见了苏多普拉托夫。在听了暗杀流产的汇报后，他命令苏多普拉托夫立即准备策划新的行动。两天后，他们带着新的暗杀计划一起去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别墅觐见了斯大林。

虽然托洛茨基流亡国外，但他一直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一言一行都非常关注，仔细地阅读托洛茨基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凡是在各国报刊上发表能够找到的，他一篇也不放过。斯大林桌上摆着一本专门的文档夹，里面存放着托洛茨基最新发表的文章和书籍。当时，斯大林获知托洛茨基正在撰写他的传记，而托洛茨基手上掌握着大量足以败坏他名声的文件资料。斯大林对此非常恼怒，迫切地需要销毁这些秘密文件，消灭传记作者本人。斯大林听了苏多普拉托夫的汇报，当即批准了苏多普拉托夫新的暗杀行动，并留他们一起吃晚饭。苏多普拉托夫自然受宠若惊，决心尽快干掉托洛茨基，报答斯大林对自己的器重。

新一轮暗杀计划由一个叫拉蒙·梅尔卡德的人执行。拉蒙的母亲卡里达德·梅尔卡德是艾廷根的情人，艾廷根作为苏联内务部特工在西班牙工作时与卡里达德勾搭上了。卡里达德虽然已是半老徐娘，却仍然风姿绰约，仪态万千，保持着西班牙土生白人女性的种种魅力。艾廷根将自己的情人卡里达德发展为苏联间谍。当卡里达德知道儿子拉蒙与托洛茨基的女秘书西

尔维娅的关系后，便向艾廷根推荐拉蒙去执行暗杀托洛茨基的任务。

枪击事件发生后，大难不死的托洛茨基搬迁到墨西哥城近郊的姚肯别墅。这里戒备森严，日夜有人守卫。四周围着高高的围墙，只有一扇大门可以进入，所有进出的人员都必须经过严格检查。有位美国朋友劝说托洛茨基秘密前往美国，寻找安全的避难所，但被托洛茨基拒绝了。他说自己要勇敢地公开地面对自己的仇敌和朋友。后来，托洛茨基勉强接受墨西哥当局的建议，加固他的住宅区，他悲愤地说：“这哪是家，这是中世纪的监狱。”

6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各地做了一次旅行，朋友送给他一件防弹背心，他不愿穿。回家后，有人建议今后对来访者一律搜身，他也不赞成。接待客人时，他也不喜欢警卫人员站在旁边，给客人不自在的感觉。

他不知道，此时此刻危险正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铁镐击头死于非命

拉蒙·梅尔卡德持伪造的加拿大护照来到墨西哥。护照上的名字是弗兰克·杰克逊，比利时人。不久，艾廷根也来到墨西哥。在墨西哥的秘密接头点，拉蒙与他的母亲以及艾廷根见了面。他们一起分析了托洛茨基别墅的警戒系统，商量刺杀使用的武器，最后决定使用登山运动员所用的冰镐。这种武器容易躲过警卫的检查，而且冰镐比一般刀子更凶猛，暗杀时不会发出太大的响声。艾廷根提供给拉蒙足够的活动经费。

早在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时，拉蒙曾出现在巴黎的会场，他伪装成托洛茨基主义的积极拥护者，自我介绍说他叫莫尔纳尔，是比利时莫尔纳尔家族的贵族，父亲在战前做过比利时驻伊朗公使。在这次会议期间，拉蒙自称也是托派成员，结识了一位名叫西尔维娅的美国姑娘，她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硕士，托洛茨基的狂热崇拜者。这个相貌一般的老姑娘与英俊的拉蒙邂逅，很快坠入情网，而拉蒙挥金如土，对西尔维娅关怀备至。

1940年1月，西尔维娅到达墨西哥，开始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一天，拉蒙突然出现在西尔维娅面前，他紧紧搂住西尔维娅狂热地亲吻，西尔维娅又惊又

喜，感觉非常幸福。从此，拉蒙每天送西尔维娅去托洛茨基处上班，下班又来接她回去。因经常出现在托洛茨基的住所，拉蒙与托洛茨基的警卫们混得很熟。警卫们知道拉蒙是西尔维娅的情人，对他也格外客气。但拉蒙从不轻易打听和走进托洛茨基的住所，只是坐在豪华轿车里，在门外等候西尔维娅。

3月，拉蒙第一次走进托洛茨基的别墅，仔细观察了别墅的内部情况。5月27日，拉蒙偶然在院子里见到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正与自己的外孙子玩得很开心。拉蒙送了一架玩具滑翔机给托洛茨基的小孙子，小家伙乐坏了。从此，托洛茨基对拉蒙的印象一直很好。作为礼节，托洛茨基夫妇邀请他与全家共进早餐。此后，拉蒙来别墅的次数并没有增多。托洛茨基似乎对此人有所警觉，但也未怀疑拉蒙有什么不良的动机，只是觉得他有时比较“轻浮”。

1940年8月20日，天气晴朗，托洛茨基起床后感到格外宁静和安详。下午刚过5点，紧张工作一天的托洛茨基放下笔，走进了院子，来到兔笼旁喂兔子。这时，拉蒙走进了院子，只见他身穿雨衣，还戴着帽子，托洛茨基夫人娜塔丽娅觉得十分奇怪，又没有下

雨，大热天怎么把自己裹得这么紧。拉蒙可能看出大家的疑惑，连忙说：“怕是要下雨。”

他向娜塔丽娅要一杯水喝。娜塔丽娅端出一份茶点，拉蒙连连摆手说：“谢谢，我肚子很饱，吃不下去，来杯凉水就可以。”拉蒙向娜塔丽娅说明来意：他带来一篇修改好的文章，想请托洛茨基再看一遍。娜塔丽娅就把拉蒙带到兔笼旁，托洛茨基接过拉蒙的文章随手翻了一下，他对文章的内容不感兴趣，可既然拿来了，就得给他看一下，托洛茨基说：“这样吧，我们到书房去看你的文章。”

托洛茨基坐在桌前，很认真地阅读手上的打印稿，拉蒙就站在旁边。当托洛茨基刚刚看完一页，凶杀开始了。

事后，拉蒙是这样交代的：“我把雨衣放在一个柜子上，悄悄掏出那把冰镐，然后紧闭双眼，用尽全身气力，向他的头部猛砸下去。”凶手本来以为一镐下去，托洛茨基就会哼也不哼一声死去。没料到，在拉蒙举起冰镐的那一瞬间，正在阅读的托洛茨基把头稍微动了一下，从而改变了冰镐打击的部位，使受伤的程度减轻了一些。当时，托洛茨基发出一声尖锐的叫

喊，声音十分惨人。托洛茨基转过身来，咬住凶手的手，并耗尽全身力气抓住了冰镐。此时，托洛茨基的头盖骨已被打碎，血流满面，他抓起桌子上的墨水瓶、书籍甚至录音机掷向凶手，继续与凶手搏斗。他被拉蒙摔倒，又艰难地爬起来。听见惨叫声，娜塔丽娅和警卫们冲进了书房，他们看见托洛茨基已经摇摇晃晃，站立不稳，但身躯仍然紧紧依着门框，不愿在凶手面前倒下去。警卫人员扑向凶手，一名警卫用枪托将拉蒙击倒。娜塔丽娅赶紧搀扶托洛茨基躺到一张席子上，托洛茨基突然吐出一句：“娜塔丽娅，我爱你！”声音凝重、庄严又充满了感情，娜塔丽娅早已泪流满面。“照顾好娜塔丽娅，她跟了我很多、很多年。”他转而用英语对秘书说，“事情终于发生了，这就是终点。”

外面传来拉蒙的嚎叫和哭泣声，一帮警卫怒气冲天，正在狠揍凶手，托洛茨基平静地说：“告诉小伙子们不要打死他，必须让他招供，说出背后真正的凶手。”拉蒙求饶地说了一句：“是他们逼我干的，他们把我母亲关了起来。”警卫们追问：“谁把你母亲关了起来？是不是苏联内务部？”拉蒙·梅尔卡德一口否定，

说此事与苏联情报机构无关。

此时，在离托洛茨基别墅不远的偏僻处，一辆小汽车停在路边，艾廷根和拉蒙的母亲卡里达德分别乘坐两辆汽车，在那里等候接应拉蒙。按原来的计划，拉蒙悄悄地打死托洛茨基，立即溜出别墅与艾廷根会合，然后逃离现场。托洛茨基一声惨叫，使这一计划落了空，拉蒙当场被抓。后来，艾廷根发现别墅门口来了不少警车和一辆救护车，知道事情不妙，赶紧开车跑掉了。

闻讯赶来的医生经过细心检查，发现托洛茨基的左臂和左脚已经麻木，脑部受伤的神经开始影响肢体的运动。医生急忙把受重伤的托洛茨基送往医院。晚上7点多钟，墨西哥最好的医生进行了会诊，5名外科医生给托洛茨基做了脑部手术。医生发现伤口有两处，右侧的颅骨已经被击碎，碎片嵌入了脑髓，脑膜严重受伤，部分脑组织彻底破坏。当晚7时25分，托洛茨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托洛茨基的骨灰被埋在别墅院子里，一块白色石碑立在墓前，上面插了一面红旗。

墨西哥警方对凶手拉蒙进行了审讯，他极为冷

静，自称杰克逊，比利时人。不管警方采取什么样的审讯措施，要他交代杀人动机时，拉蒙总是一口咬定暗杀是个人行为，与任何组织无关。拉蒙被捕后，警方从他身上搜出一份事先写好的遗书。在这份遗书中，拉蒙首先简述了一下自己的历史，然后详细讲述了自己杀害托洛茨基的动机，他说自己是比利时莫氏家族的独生子，在法留学期间，由于受西尔维娅的影响而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并因此来到墨西哥向托洛茨基求教。但托洛茨基却是个伪君子。特别是有一次，托洛茨基竟要求他去谋杀斯大林。因为有西尔维娅这样一位可爱的恋人，他拒绝了托洛茨基的要求，结果被托洛茨基痛斥了一顿。于是他才决定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埋葬这个伪君子。

墨西哥警方对拉蒙的遗书内容做了详细调查，结果发现遗书的内容多系捏造。首先，比利时政府断然否认了莫氏家族的存在；其次，当西尔维娅被询问托洛茨基是否曾派拉蒙谋杀斯大林时，西尔维娅不仅气得大骂拉蒙“胡说八道”，而且还要求与拉蒙对质。见到拉蒙后，西尔维娅极其蔑视地说：“无耻！卑鄙小人！”

墨西哥这个国家没有死刑，这次暗杀行动中的凶手拉蒙·梅尔卡德，经墨西哥法庭的审判，受到最严厉的惩处：被判20年监禁。在狱中，拉蒙并未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他被关在单人囚室，宽敞而舒适，里面设施齐全，甚至还可以看电视。他的妻子一周探视他两次，妻子暗暗告诉他，有人准备帮助他越狱逃跑。拉蒙听到这一消息表示坚决拒绝。他是圈内人，知道这是苏联内务部出的点子，以帮助他逃跑为借口趁机轻易地将他除掉，杀人灭口。拉蒙深知待在监狱里比在外面安全。

托洛茨基的死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众说纷纭。莫斯科《真理报》只用寥寥数行字报道说，托洛茨基被一个“幻灭的追随者”杀死了。

拉蒙凶杀案很多年来一直是个谜。事情的真相被披露时已经是1950年了。一个叫海默·拉蒙·梅尔卡德·德尔里奥的人自称是拉蒙的亲兄弟，曾在马德里大学执教。他说他的兄长拉蒙和他的母亲都曾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过，母亲卡里达德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情报部门暗杀托洛茨基的行动中起到关键作用。

另一位揭露暗杀托洛茨基真相的是苏联驻澳大利亚外交官、克格勃军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彼得罗夫1953年叛逃到西方，在叛逃之前，他在内务部的档案中看到刺杀托洛茨基的案宗，知道拉蒙·梅尔卡德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这个彼得罗夫，第一次向世界媒体披露拉蒙·梅尔卡德是西班牙人，苏联内务部特工。也就是说，斯大林是杀害托洛茨基的元凶。暗杀成功后，所有参加那次暗杀活动的人员都获得了国家最高奖赏。刺客的母亲卡里达德·梅尔卡德获列宁勋章，由加里宁亲自为她授勋，贝利亚送来一箱1907年装瓶的葡萄酒，商标上还绘有沙皇的双头鹰标记。艾廷根将军也得到一枚列宁勋章。

但两位组织领导暗杀托洛茨基的克格勃将军命运却很悲惨。苏多普拉托夫当年接受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命令，1940年，在卢比扬卡特设一个处，专门组织实施消灭托洛茨基的行动计划。1953年8月21日，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他的办公室里被捕。当局指控他参与了贝利亚的阴谋活动，图谋杀害苏联政府成员，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他在狱中度过了15年的漫长岁月，刑满出狱后，他几乎丧失了行走能力。艾廷根的命运与

他的上司苏多普拉托夫一样，1954年，军事法庭判了他12年监禁，但几年后就被释放。后来，艾廷根在莫斯科一家出版社工作，人变得老成持重了。

拉蒙在墨西哥监狱里待了20年，1960年刑满重新获得自由。1961年，苏联政府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克格勃给拉蒙发放薪金，每月给他400卢布，相当于一名少将的退休金。拉蒙在莫斯科的索科尔得到一套不大的住房，享受每年夏天在马拉霍夫卡疗养的权利，这就是刺杀托洛茨基的全部奖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似乎把他忘掉了。他开始在莫斯科艰难地生活，物质生活极度匮乏，没完没了地排队购物，搭乘挤得满满的冰冷的无轨电车。无论是拉蒙，还是他那位墨西哥妻子都不会讲俄语，一切都那么令人压抑、难受。拉蒙夫妇最终承受不了沉重的思乡之情，大约在1975年，拉蒙离开莫斯科去了古巴，当了卡斯特罗的顾问。1978年拉蒙在古巴去世，终年65岁，遗体被秘密运到莫斯科安葬。

第四章 潜伏在希特勒身边：“红色乐队”遍布欧洲的情报王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情报部门把特雷伯派到比利时，创建了一个代号为“红色乐队”的庞大情报网，深入到希特勒身边，获取德军最高参谋部的最机密情报，情报网被盖世太保破获，特雷伯等人被捕。特雷伯将计就计，巧妙地进行了名为“大赌博”的反间谍活动。

战后，特雷伯回到苏联，却被克格勃逮捕，关押了9年多才回到自己的故乡波兰。

主动请缨的“红色乐队”

1938年，战争的阴霾笼罩了整个欧洲大陆上空。法西斯德国吞并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入侵波兰，苏德战争也一触即发。

为了摸清德国人的战争意图和底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下辖的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决定，委派特工前往西欧开展针对纳粹德国的情报活动。波兰籍犹太人、共产党员利奥波德·特雷伯受命组建一个主要由外国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组成的庞大情报网，代号“红色乐队”。

苏联情报组织选中的特雷伯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报工作经验的人。

利奥波德·特雷伯，1904年2月23日出生于波兰加里西亚省的一个小镇。

1920年，16岁的特雷伯离开中学，到钟表店学手艺，并加入了波兰共产党，成为塔尔格市党组织的领导人，不久被选进全国党的领导班子。

1923年，克拉柯维娅的工人举行反饥饿起义，宣布总罢工，并占据城市。政府派出手持长矛的马队，镇压工人运动，双方发生了流血斗争，持续了好几天才平息下来。特雷伯因积极参加罢工斗争而上了政府

的黑名单，从此再也无法找工作。他只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转入地下活动；一条是到巴勒斯坦去，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1924年4月，他和一帮犹太小伙子动身去了巴勒斯坦。1928年，巴勒斯坦经济萧条造成工人大量失业，许多犹太人受其影响大批离境。1931年，他向党组织要求去苏联学习。1932年初夏，他到达莫斯科，随即进入马什列夫斯基大学读书，毕业后分配到《真理报》犹太文版工作。经过苏联相关部门的考查，特雷伯被吸收进入军事情报机构主办的特别培训班，开始接受间谍的专门训练。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他受到当时的苏联军事情报局负责人别尔津的赏识。培训班毕业，情报部门对他的评价颇高，毕业鉴定上写道：“这个人有着冷静的头脑、热烈的情感、钢铁般的意志，以及过人的才智和卓越的领导才能，是做情报工作的合适人选。”而特雷伯对自己选择了情报工作是这样解释的：我当特工并不是出于爱好和天赋，我也不是军人，我唯一的雄心就是和法西斯势不两立。

1936年，特雷伯开始独立执行任务。每次他都完成得很出色，但是苏联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让他

忧心忡忡。特雷伯认为自己具备从事情报工作的能力，而莫斯科关系错综复杂，他不太适应，最好能到国外从事情报工作。

希特勒即将席卷欧洲，苏德之间的血战不可避免，而苏联是必须保卫不可的。1937年7月，特雷伯经过反复思考和斗争，构思出一个规模宏大的谍报计划，并拟出了方案。这个计划简单地说就是借周游欧洲的机会，组建一个遍布欧洲的情报网。他把这个计划向别尔津将军作了汇报。

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1924年起曾两度担任红军情报部部长，20世纪30年代初，他参加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总局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

在别尔津发展培养的众多间谍中，最著名的当属佐尔格，这位在间谍史上有着传奇经历的英雄，正是别尔津的慧眼识才，亲自登门到访，才为格鲁乌工作的。当时佐尔格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有着敏锐的头

脑、渊博的政治知识和对国际事物有着精辟见解的人。”

同样，特雷伯也给别尔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雷伯就情报网的人员问题向别尔津将军作了这样的说明：“我在每一个国家，需要3名助手，这些人员必须具备三种能力：第一，具有领导一个小组的才能，不用管他是不是俄国人；第二，具有技术知识，能够建立发报网，培训报务员；第三，军事专家，能够就地精选收集的材料。”他将计划报告了别尔津将军，别尔津非常欣赏他的计划。

当时苏联国内开始搞肃反，别尔津自身都朝不保夕，说不定哪一天就被肃反掉了。但别尔津还是表示了对构建间谍网的支持，建议特雷伯先到德国或邻近国家站稳脚跟，建立一个稳定的基地，把联络、掩护、经费等基础工作做好，形成一个核心组织。等德国在欧洲发动战争后开始行动，替苏联搜集相关情报。可是别尔津又苦恼地说：“我们在德国已经有一个小组，但上级党的领导指示，不赞成我们在德国开展情报工作。”别尔津敲着办公桌下定决心，授意特雷伯先干起来再说。

接着，他们谈到办公司解决活动经费的问题，别尔津说：“你认为用经商作掩护，可以解决各小组的经费问题，我却不敢有大的指望。根据我们20多年的情报工作经验，这个办法无一不落空。我们为这种作为掩护的投资，没有一个不是亏得一干二净。”

特雷伯说：“您听我说。问题不仅在于替苏联政府省几个钱。战争一打响，从莫斯科领取经费一定十分困难。也许过去经营商业作掩护的人不太内行，不会赚钱。我相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行是会赚钱的。我的计划是在比利时开设一家进出口公司，并在几个国家设分公司。”

“搞这么一家公司，要花多少钱？”

“从小做起。给我出一万美元，做公司一个股东。”

“你想仅仅花一万美元，就能赚到足够的钱，供你们在整个战争期间自给自足？”

“是的，我就打算这样。”

“不管情况如何，反正过几个月，你再来要钱，我照样给你。现在最迫切的不是搜集军事情报，而是解决人员的经费问题。”

这次谈话，他们俩都很愉快，别尔津将军非常看中特雷伯的才干，最后他嘱咐特雷伯说：“在战争爆发以前，你必须尽量小心谨慎，让你的情报网冬眠，直到开战之前决不要惹事。你们的组织是完全独立的。我们会给你提供电台，派遣报务员。其他人员你得想法自己招聘和培训。”

当时别尔津将军与特雷伯讲好了，只要特雷伯准备就绪，就可以马上动身。可是起程的报告送上去，一两个月仍然不见动静。到了年底，特雷伯才从其他渠道获悉，情报部门发生变故，他们建立情报网的事情可能流产了。在德国建立情报基地的计划得到别尔津将军和斯蒂加的热烈赞赏，但是违背了苏联最高领导的意图。

1938年3月，特雷伯忽然接到一位上尉的电话，叫他去一趟情报局办公大楼。在上尉的办公室特雷伯被告知：关于建立情报网的计划可以马上实施。护照上他的身份是加拿大的魁北克人，所以不要求他一定会讲英语，在布鲁塞尔的接头人是苏联商务代表团的一位职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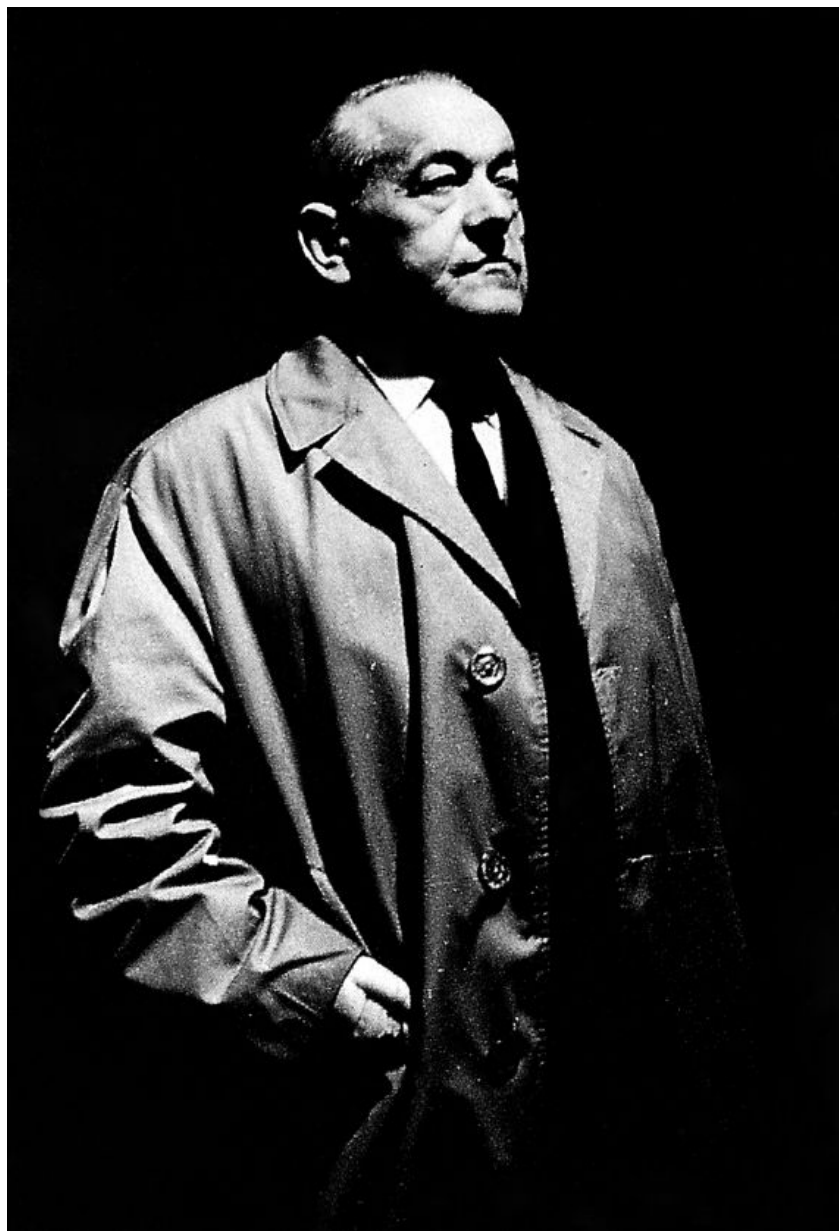
动身前，特雷伯去见情报局的新领导，在别尔津

的办公室里，新的领导接见了特雷伯。此人也是一位将军，对特雷伯彬彬有礼，他说：“我们完全采取原定的计划。”许多年后，特雷伯才知道别尔津将军在肃反中被斯大林处决了。

特雷伯经列宁格勒和斯德哥尔摩到达比利时。在布鲁塞尔换领了新护照，改名亚当·密克莱，职业是加拿大实业家，打算在此定居开业。

特雷伯要在比利时开办企业和建立情报站，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1937年，特雷伯出差到巴黎，中途在布鲁塞尔逗留了几天，拜访了一位老朋友，名叫莱奥·格罗斯沃格尔。莱奥出生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柏林读书。1925年，他抛弃一切，跑到巴勒斯坦，积极参加当地共产党的各项工作，是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他在那里结识了特雷伯，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1928年，他到比利时定居，因为他有两位本家在布鲁塞尔经营一个工厂，名叫“橡胶王”，不久他便当上了工厂的商务经理。



特伯雷创立了遍布欧洲的“红色乐队”情报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战胜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莱奥始终没有背弃他原来的信仰。这位受

人尊敬的实业家，在布鲁塞尔工商界颇有名望，仍然替第三国际和近东各国的共产党担任联络。当时，特雷伯与他商定摆脱一切别的工作，建立一个情报网，今后就一心一意专搞情报工作。

特雷伯到达布鲁塞尔后立刻与莱奥开始筹办一家自己的企业。“橡胶王”主要生产雨衣，莱奥计划利用国外众多的分公司办一家进出口公司，推销雨衣。就这样，一家“国际优质雨衣公司”于1938年秋天在法律上正式成立。莱奥担任公司经理，特雷伯成了股东。由于莱奥经营有方，这家公司很快就兴旺起来，企业发展很快。

1940年5月，北欧各国的分公司也搞起来了，而且生意都不错。公司跟意大利、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企业都有业务往来，甚至和日本的企业也有买卖。

1938年初夏，特雷伯的妻子露芭带了第二个儿子埃德加来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潜伏在希特勒身边

经商的初步成功，让特雷伯在布鲁塞尔站住了

脚，达到了利用商业作掩护的目的，这时苏联情报局开始派人来协助特雷伯情报网开展工作。1939年春天，来了个叫卡洛斯·阿拉莫的乌拉圭人，这个年轻人信仰坚定，但头脑似乎有些简单。阿拉莫在苏联国内叫做米凯尔·马卡罗夫，是个苏联军官，曾在西班牙共和国空军中参加过战斗。

特雷伯第一次与他见面定在安特卫普动物园。上午8点半，阿拉莫准时来到见面地点，但与特雷伯擦肩走过，假装不认识，匆匆离开了动物园。过了3天，重新在原来的地方约会，阿拉莫早就来到，但不仅没朝特雷伯走过来，反而急忙跑掉了，弄得特雷伯莫名其妙。后来，苏联商务代表团的联络员波尔沙科夫告诉特雷伯，阿拉莫之所以不跟他接头，是因为有人跟踪。特雷伯觉得奇怪，自己怎么没觉察到，便问是什么样的人在跟踪。

波尔沙科夫告诉特雷伯：“阿拉莫发现两次都有人在跑步，而且是同样的面孔。”

特雷伯笑起来说：“这个家伙肯定是个傻瓜。那些人那儿跑了10年，他们每天都在动物园跑步。”

阿拉莫来布鲁塞尔之前，在莫斯科情报中心接受

了3个月的收发报训练，当然这不足以培养出高手来，但他为人的品质很快给了特雷伯好印象。阿拉莫自然也享受到商业掩护的好处，他被派到奥斯当德担任“橡胶王”分公司的经理。

1939年夏天，情报局又派来维克多·苏库洛夫，也是个苏联军官，取名文森·谢拉，别号又叫肯特。他和阿拉莫正相反。阿拉莫一直不愿意学习经商方面的知识，而肯特却十分积极，他到布鲁塞尔大学报了名，学习会计和商业法。

接下来，特雷伯展开了一系列间谍网的筹备工作。比如，开始建立与苏联情报局无线电收发报的直接联系，招募可靠的情报人员组建交通员队伍，在中立国普遍布置邮政信箱等等。

1939年底，特雷伯接到苏联国内几次指示，苏联情报局的新领导打算停止搞欧洲间谍网，不再派人到“橡胶王”工作，而且给特雷伯发来几封电报，叫特雷伯马上把阿拉莫和肯特送回莫斯科，而把莱奥派到美国去，叫特雷伯回莫斯科。

特雷伯回信说：“德苏战争绝不可免。如果情报局决定要阿拉莫和肯特回国，那也可以。但我和莱奥必

须坚持，我们不能让亲手缔造的东西毁于一旦。”特雷伯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必须坚持下去，决不能半途而废。

5 月10日凌晨，德军向西进犯，轰炸了布鲁塞尔。特雷伯赶到肯特家写一封密码电报。3位比利时警察到了纽堡街特雷伯的家，他们对露芭说：“我们是奉命把你们带进集中营的，赶快准备好一两天的干粮和替换衣服，马上动身。”原来特雷伯虽然入了加拿大籍，但在他们看来，特雷伯的祖先仍算德国人。比利时政府已经决定把第三帝国国民以及沾亲带故的人统统关起来。

露芭并不惊慌失措，而是请3位警察在客厅坐下。她对警察们说他们原籍桑波尔，是在波兰境内。她搬出拉鲁斯大百科全书，请警察们翻阅核对。警察迟疑一下，表示回去请示后再做决定。警察前脚走特雷伯后脚就到家了，听露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特雷伯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一刻也不能停留。警察一定还要回来，那时就成了瓮中之鳖。”

特雷伯全家躲了起来，开始了地下生活。特雷伯先住在邻近的莱奥家，重新换的护照上名字叫让·吉尔

伯，出生在安特卫普，职业是实业家。

德军占领巴黎几天后，特雷伯就到了那里，他们决定把情报网取名叫“红色乐队”，在巴黎建立“红色乐队”的总部。1941年1月13日，他们在布鲁塞尔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叫做西梅克斯戈，由肯特负责。接着在巴黎也成立一家叫做西梅克斯戈的公司，阿尔弗雷·科尔班担任公司的总经理。

1940年12月13日，希特勒签发第21号指令，这个计划开头一句话说：“德军必须准备就绪，在对英战事尚未结束以前，即行对苏联发动闪电战。”“红色乐队”情报网及时向苏联情报部门送去了情报，他们把德军作战计划的详细部署都报告给苏联情报部门，内容有德军将大规模轰炸列宁格勒、基辅、维堡以及德军共出动多少个师团等。

同年2月，特雷伯发出一份详细的电报，报告德军从法国、比利时抽调了多少个师派往东线。5月里，特雷伯通过在巴黎的苏联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转送出一份德军准备攻击苏联的情报，此份德军作战计划标明，原定5月15日向苏联发动的攻势后来改期了，德军重新确定了最后攻击日期。5月12日“红色乐队”又通知莫斯

科：德军在边界线上集中了150个师。

1941年6月21日，特雷伯接到情报员的报告，证实了德军在第二天向苏联发动进攻的消息。他马上跟莱奥·格罗斯沃格尔赶到巴黎苏联大使馆，报告了德军的意图，但苏联武官根本不相信，他说：“你们完全搞错啦。我今天碰见了日本武官。他刚从柏林回来。他说德国根本不准备打仗，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

特雷伯根据近日搜集到的大量情报，相信手下情报员的报告是正确的，坚持要求武官把他起草的电报发出去。深夜他们才回到旅馆休息，凌晨4点钟，熟睡中的特雷伯被人吵醒，旅馆经理站在房门前，大声呼叫：“完啦，吉尔伯先生，德国打进苏联啦！”

1940~1943年间，“红色乐队”的吹鼓手（间谍）向苏联军事情报局提供了1500多份各类情报。这些情报包括德军的军工生产，具体内容有军工原料的采购、运输，新武器的设计制造。例如，“红色乐队”把德国新式战车“老虎T6”的绝密图样弄到手，并马上送到了莫斯科，苏联军工厂经过模仿借鉴，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出了KV型新坦克，其性能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德国的坦克。

1941年底，特雷伯电告苏联情报局局长：“德国麦赛希密特飞机厂赶制一种新型歼击机已经有3个月。发动机是新式的，时速可达900公里。新飞机的图案已拍成微型胶卷，送往莫斯科。”过了几个月，苏联飞机厂也制造出一种新型歼击机，性能超过德国的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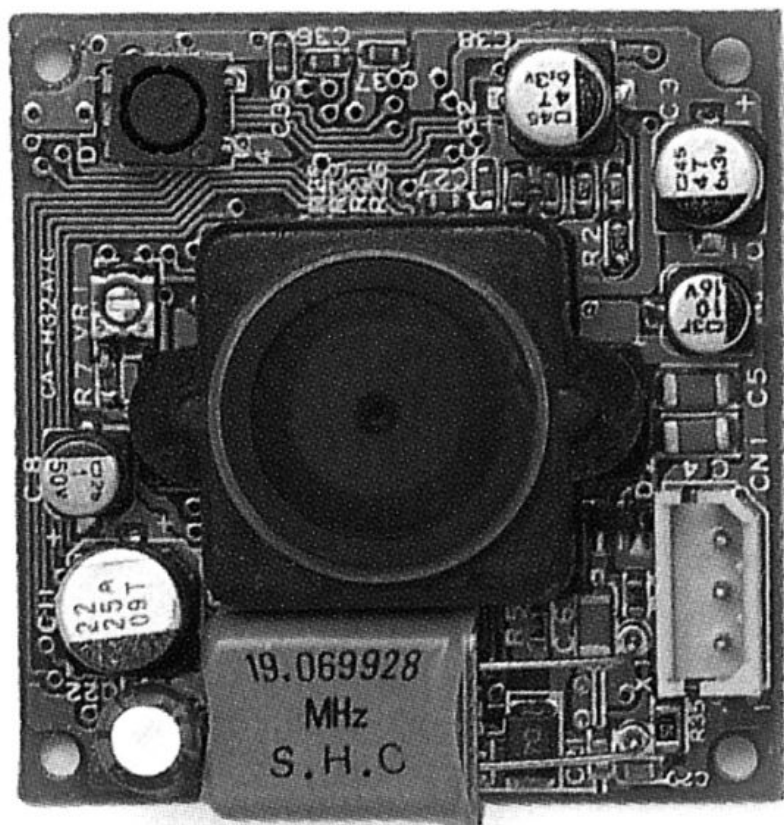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许多有关战局的情报：德军拥有师团的数量、武器装备、作战方案等。

“红色乐队”的一位情报员曾任希特勒最高统帅部的速记员，经常参加希特勒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详细记录了希特勒和众将领的发言，并将记录抄本提供给苏联，从而使苏军总部对德军发动的攻势了如指掌。就是这位速记员于1941年11月12日，提前9个月报告了德军将进攻高加索的情报：“第三号方案以高加索为目标。原定11月行动，现改1942年春季。5月1日，部队应全部布置就绪。自2月1日起，后勤部将全力以赴。出击高加索兵力的各个基地展开如下：罗佐瓦亚、巴拉克莱沙、组古耶夫、贝尔戈罗德、阿希丁卡、克拉斯诺格勒，总部设在哈尔科夫。”

“红色乐队”情报网人员、设备配备逐渐完善，他们在柏林有3台发报机，比利时有3台，荷兰有3台。一

些港口设备、要塞的图纸，军用地图，机构组织图等没法用电报发出去的资料，“红色乐队”就用相机拍照利用微型胶卷传递。当时，在法国搜集到的材料，大部分交由苏联驻巴黎的武官苏斯洛巴罗夫带出去，一部分情报由“红色乐队”成员送出去。特雷伯和莱奥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先租一间卧铺车厢，另外一名情报员再去租一间车厢，最好两间有门可通，两间里面有一间空着。检查员一走，情报员便离开自己的车厢，走进另外一间，把藏着微型胶卷的笔塞进电棒里，然后返回自己的车厢。

“红色乐队”卓有成效的工作方式和对工作的高度热情使有价值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微型摄影机是克格勃为特工配置的先进设备

惊心动魄的“大赌博”

从欧洲战争一开始，城市上空的电波就嘈杂起来，各国的特工纷纷用密码进行情报交流。德国的监听站也一直处于紧张忙碌状态。克朗茨监听站从1941年6月发现了神秘的信号，到1941年9月3个月间共截

获了250份无法破译的密码电报，都是发往莫斯科的。

德国总部接到专家的电报，仿佛遭到晴天霹雳。

希特勒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纳粹头子暂时停止内讧，联手行动。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情报人员以及各式各样的警察、特务全体出动，抓捕苏联间谍。

1941年11月，比利时的一家发报电台首先被发现。正在发报的索菲被当场抓获。另一个发报员卡米也被抓走了。

第二天，一无所知的阿拉莫来到这里，被抓了个正着。阿拉莫正在回答纳粹盘问的时候，特雷伯也到了。当时宅子里一片狼藉，典型的抄家模样。聪明的特雷伯什么都明白了。不等对方盘问，他主动掏出了证件。证件上写着持证人吉尔伯是工程局派驻巴黎为国防军收罗战略物资的。宪兵看了证件后给他的上司打了电话。

特雷伯被释放了。

阿拉莫和卡米遭到了酷刑，可是他们什么也没说。德国情报局的线索暂时中断了。

坏消息不断传来。接手比利时情报小组的艾弗雷莫夫由于没有经验也很快被捕了。严刑之下他招供

了，有30个人被捕，西梅克斯戈公司也被监视起来。

1942年8月，柏林小组的60个成员被捕。随后，针对法国小组的行动也开始了。

1942年11月12日，肯特夫妇双双被捕。盖世太保几乎没有花费什么力气肯特夫妇就什么都招了。

11月19日，盖世太保突袭了与“红色乐队”有密切关系的西梅克斯戈公司，公司的负责人阿尔弗雷·科尔班夫妇被带走了。

11月24日，科尔班夫人终于熬不过盖世太保的审讯，将特雷伯牙医的住址告诉了秘密警察杰林。杰林和皮普中尉11点30分赶到了牙医诊所，在病人登记本上找到吉尔伯的名字，这是特雷伯公开使用的化名。他们从牙医那里获知特雷伯下午来看牙，马上布下一张大网，准备逮捕“吉尔伯”。

1942年11月24日，特雷伯按照预约的时间去看牙医。下午2点，他走到牙医家那幢楼房前，向左右两边瞧了两眼，两旁没有发现形迹可疑的人，于是走上楼伸手按诊室的电铃。大夫亲自来开门，特雷伯觉得奇怪，通常都是助手来接待就诊的人。候诊室里也是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大夫把他引进诊室。接着推

他坐上治牙的椅子，然后叫他仰头靠紧椅背枕垫上。忽然，身后有响动，听见背后有人大叫一声：“举起手来！”

身旁已经站着两条大汉，都握着手枪。特雷伯慢腾腾地举起手来，平静地说：“我没有武器。”

特雷伯站起身来，盖世太保给他戴上手铐。特雷伯对杰林说：“你真幸运。今天逮不住我，我们就要等到打完了仗再见啦。”

杰林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他兴奋地说：“我当然高兴，我们追踪你已经追了两年。凡是德国占领的地方都找遍了。”

特雷伯由3名盖世太保簇拥着坐上汽车，前有汽车开道，后有汽车殿后，飞驰而去。他们将特雷伯送到弗雷纳监狱。盖世太保押着特雷伯走过空荡荡的走廊，在最后一间牢房前停下，特雷伯被推了进去，门叭嗒一声关上了。

然后，杰林就打电话给希特勒和希姆莱，报告抓住了“大头头”。

侦破“红色乐队”这个庞大的情报网，使纳粹高层感到非常兴奋。盖世太保头子缪勒提出了一个利用“红

色乐队”的方案：策反“红色乐队”被捕人员，以“红色乐队”名义向莫斯科报告有关英、美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假情报，分化、瓦解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希特勒批准了这个代号“大赌博”的计划。

负责“红色乐队”案件的盖世太保别动队开始策反被捕的“红色乐队”成员。而对于特雷伯这个“红色乐队”的主要领导人，别动队未敢对其进行策反。从11月25日，起别动队头子杰林开始向特雷伯宣扬“德国的最终目标是与苏联议和”，他们只是想通过“乐队”与莫斯科取得联系之类的鬼话，企图欺骗特雷伯，使之自愿加入“大赌博”行动。

在策反其他“红色乐队”成员的工作与企图绕过特雷伯与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的工作失败后，杰林于12月25日开始接连几天与特雷伯单独谈话，继续欺骗并以特雷伯和其他“红色乐队”被捕人员的生命安全为威胁，要求特雷伯加入“大赌博”行动。

而此时，“红色乐队”的另外两名重要成员卡茨和莱奥·格罗斯沃格尔分别被捕。“红色乐队”的电台所剩无几。已投靠盖世太保的肯特和艾弗雷莫夫利用已策反的电台继续向莫斯科发报，并逐渐取得莫斯科的信

任。

为了尽量拯救被捕的部下和破坏敌人的计划，特雷伯表示同意参加“大赌博”。

卡茨与格罗斯沃格尔被捕后，虽经酷刑，仍英勇不屈。特雷伯向杰林指出，卡茨是“红色乐队”的核心人员，应该加入“大赌博”。杰林同意特雷伯去“劝说”卡茨。特雷伯见到卡茨后，用暗语指示卡茨参加“大赌博”。

特雷伯在被监禁的地方用极巧妙的方法写了准备发给苏军情报中心的关于“红色乐队”暴露和“大赌博”行动的详细报告，并在报告中与情报中心约定：如果情报中心认为有必要搞“大赌博”，那就由中心局长于1943年2月23日来电为红军节和特雷伯的生日道贺；如果不同意，请继续发送平常的电报。

然后，特雷伯与卡茨以去和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接头为名，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将报告秘密交给联络员朱丽叶，委托她转交法共地下组织，将报告发给莫斯科。

1943年2月23日，肯特的策反电台收到情报中心来电：为红军节和特雷伯的生日道贺。

主动权转到了特雷伯手中。苏联情报中心开始和别动队做起了“有趣”的游戏：情报中心一边对此时的所谓“红色乐队”发送的各种情报，包括关于英、美与德国单独媾和的假情报表示满意，一边不停地索要德国军事情报；别动队一边对情报中心“中计”感到兴奋不已，一边又不得不将德军的真实情报（当然主要是西线的情报）发给情报中心。

“大赌博计划”的荒谬使负责提供德军真实情报的德军总参谋部和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斯泰特感到非常惊讶和愤怒，甚至一度与盖世太保就此事发生了冲突，但被纳粹高层压了下来。西线德军的真实情报仍源源不断地发到莫斯科，莫斯科又将情报转给英、美，这些情报为西欧第二战场的开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此时，特雷伯仍在为保护已被捕和未被捕的“红色乐队”成员做着努力。

特雷伯告诉杰林，多年以来有一个专门的反间谍组，十分秘密地保证“红色乐队”的安全，他必须在以前经常去的地方和规定的时间出现，这样安全组的人可以跟随他的踪迹，否则就意味着他出事了，可他却

不认识这个组的人。

这种情况在间谍工作中是完全可能的，特工出身的杰林相信特雷伯的话，他允许特雷伯在便衣的暗中陪同下，在规定的时间内出现在他以前常去的地方，同时派遣大批别动队员在那些地区进行搜查，以捉拿那些安全组成员。而特雷伯却经常挑选高峰时间，在巴黎街头热闹的公共场所出现，这样一来，别动队就得浪费大量的人力去搜查那些根本子虚乌有的安全组。杰林的警察机器在空转，“红色乐队”还能自由活动的战士并没有受到干扰。由于经常外出活动，别动队的警惕性放松了，注意力分散了，于是通往自由的小门渐渐地向特雷伯打开了。

1943年4月，情报中心发给“红色乐队”一份关于东线战况的电文，说是要让“红色乐队”对战争局势有个准确的概念。电文的内容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精确的伤亡情况。由于德军总参谋部隐瞒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真实的伤亡情况，这份电文使纳粹上层真实地了解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引起了柏林的恐慌，而别动队却为此立了一功。因此，他们对特雷伯更加信任了，负责贴身监视特雷伯的盖世太保伯格

甚至与特雷伯关系十分密切。

1943年6月，别动队头子杰林的喉癌病发，被调离别动队，由另一个盖世太保潘维茨来领导别动队。潘维茨是个凶残、狡猾的家伙，曾镇压过捷克的反德斗争。他的到来给特雷伯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8月13日，“红色乐队”又一重要成员包利奥尔在巴黎北郊的皮埃尔特被捕。他的被捕使特雷伯面临一次巨大的危机。特雷伯交给朱丽叶的给情报中心的报告是由包利奥尔转发的，如果盖世太保从他身上突破，特雷伯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特雷伯与卡茨也将会有生命危险。

更大的危机于9月10日再次来临。那天，法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里昂的电台被盖世太保破获，同时还缴获一大批文件、电文和密码。特雷伯发给情报中心的报告很有可能就是从这里发出的。特雷伯暴露的危险越来越大了。

9月11日，纳粹密码专家沃克博士率密码破译组来到巴黎，对法共电台密码进行破译。

特雷伯不能再等了，他决定逃走。

那个负责监护特雷伯的警察伯格每天都来弗雷纳

监狱，将特雷伯带到索赛街的警察局。

每天押送特雷伯去警察局的车开始有两辆，后来只有一辆，车上除了伯格和司机，还有一个盖世太保特工。时间久了，特雷伯与伯格混得很熟，并取得了他的信任。伯格由于遭遇家庭不幸的打击，感情很脆弱，身体也不太好，天天拿酒当药喝，每天都诉苦，说胃痛得厉害。特雷伯关心他的健康，劝他去治病，说他以前也胃痛，经一位名医介绍，到巴伊药房买了一种药吃很管用。哪一天路过罗马街15号巴伊药房，就去找那种药，肯定能找到。

1943年9月13日11点30分，伯格来到监狱。他和特雷伯上了车，开出了监狱大门。快到巴黎市区了，伯格把特雷伯的身份证和一枚500法郎的硬币交给特雷伯。

车到了巴伊药房门前，以为伯格还在打盹。特雷伯用手肘轻轻碰他一下，对他说：“我们到了药店，你一块去吗？”

伯格的回答令特雷伯难以置信，他说：“你去把药买了，然后赶快回来。”

特雷伯担心是个圈套，以为伯格是想考验他，于

是十分冷静地说：“可是，伯格，这个药房还有一个出口。”

伯格笑着说：“我完全信任你。再说，你知道吗？我太累了，不愿上楼梯。”

用不着伯格说第二遍，特雷伯走进药房马上就从另一头走出去。几分钟后，他便进了地铁站，坐着地铁无目标地走了几站路，然后出地铁站口转乘公共汽车，12点30分，特雷伯到达圣杰尔曼。特雷伯获得了自由。

此后两天，特雷伯在路弗尔附近的奥拉托利教堂度过，后又到了一个叫白宫的养老院，装扮成一个多病的养老者，由一个女看护照应。特雷伯请了一个叫梅太太的帮忙料理生活，她是特雷伯一个老姑母，忠心耿耿。她也是特雷伯的联络员，一次外出送信，梅太太被警察逮捕，特雷伯只得赶紧离开养老院。

特雷伯接连4天在外面流浪，一次偶然走到了一幢楼房前，想起楼里住着一个护士，名叫吕丝太太，以前给特雷伯打过针，彼此都很熟悉。更重要的是，在特雷伯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认识吕丝太太，这样就相对安全得多，于是特雷伯决定去找吕丝太太。 晚上

10点，特雷伯上到四楼，按了按门铃，吕丝太太开了门，她仔细打量特雷伯好一会儿，脸刷地一下白了。

“你怎么啦，吉尔伯先生。”那个好心的女人喊道，“你病了吗？”

“吕丝太太。”特雷伯对她说，“我是个犹太人，从集中营逃了出来，盖世太保正在追捕我，你能够把我留在你家里几天吗？坦率地告诉我，我请求你，行还是不行。要是不行我也不怪你，我马上就走。”

吕丝太太泪水盈眶，声音十分激动，回答说：“怎么，你怎么能想到我会拒绝你呢？”

她把特雷伯带到一个房间，对他说：“这里是安全的，你要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去给你找点喝的。”

特雷伯掀开床罩，雪白的床单，暖和的被子。于是，他一头倒下去昏睡了过去，特雷伯实在是太累了。

幸亏遇上了吕丝太太，特雷伯才找到一个安全舒适的藏身之地。在吕丝太太的帮助下，特雷伯开始想办法与法国抵抗组织联系，寻找“红色乐队”小组幸存人员，努力恢复“红色乐队”情报网。

1944年8月27日，巴黎已经解放了。特雷伯还特

地去了弗雷纳监狱，想了解一下被捕的“红色乐队”其他朋友们的遭遇，经监狱留守人员的介绍知道，他们几乎全部被盖世太保杀害了。

1944年11月23日，苏联来的一架飞机在巴黎着陆，随机来的人员中有莫里斯·多列士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诺维科夫上校，他负责遣送莫斯科提名的俄国人回国。诺维科夫很友好地接待了特雷伯，告诉他不久就可以乘这架飞机返航苏联。

1945年1月5日，特雷伯终于坐上飞机，身上带着苏联护照，用了个假名。同机的共有12人。在欧洲许多地区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因此，去莫斯科的航线必须绕一个大圈。飞机首先向南飞行，然后经过马赛和意大利，到达北非美军占领的一个机场。在这个中途站过了两天，受到极好的接待。飞机再次起飞，途经开罗飞回苏联。

特雷伯回到莫斯科受到严厉的审讯。在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他被带进一个房间，里面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他觉得十分疲劳，无力地倒在椅子上，一点力气也没有。特雷伯觉得脑袋空空洞洞，一片茫然，他摸摸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胳膊，怀疑自

己是否真实存在。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替苏联效力，却被克格勃当成囚犯。

“将军同志。”特雷伯向审讯他的人说，“我并不是为一个公司集团而工作。战争期间，我领导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个军事情报网，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

特雷伯说：“我到达莫斯科时曾向情报部门的两位上校提出一些建议，至今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红色乐队’情报网全体人员的荣誉问题。我要求见苏军总参情报部领导人，把事情讲清楚。”

一切申诉都无济于事，没有人理睬他。

1952年1月9日，特雷伯被判处15年监禁，后来又改判为10年。特雷伯彻底失望了。

一年后，特雷伯被召到监狱长办公室，老将军拿出1953年7月的一份《真理报》，递给特雷伯说：“你读读这份报纸，贝利亚这个‘人民的敌人’已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驱逐出共产党，并解除了他在内务部的一切职务。新的内务部领导决定重新调查被囚禁的人，你名列第一批复查人的名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清白

无辜的。”

1953年12月，一个新的侦审官接手办理特雷伯的案子。审问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大白天，说话态度也完全变了。负责侦审的军官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历史，不再讲“红色乐队”是西方国家情报网的特务，而是说特雷伯与他的战友都是“对纳粹主义斗争的英雄”。

1954年1 月，复查工作结束了。侦审官告诉特雷伯，他把结论送交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不久后，他就可以获得释放。1954年5 月23日，特雷伯被召到苏联内务部，一名军官向他宣读了最高军事法庭的决定：特雷伯完全恢复名誉，过去对他所提出的一切控诉都被宣布为没有根据的。

特雷伯向苏联内务部提出，他想回到波兰，重新踏上祖先的故乡。在被囚的岁月里，特雷伯就是怀着这个希望活下来的。1957年4 月，特雷伯接到苏联有关部门的通知，他被批准回波兰去。

回到波兰后，他积极投身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1983年在耶路撒冷逝世。

第五章 无所不能的“拉多小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内瓦活跃着一个著名的间谍网络——“拉多小组”，向苏军提供了大量的机密情报，有力地帮助了苏联赢得苏德战争的胜利。德军参谋长弗兰茨·哈尔德感叹，当时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中，任何战役行动计划还未打印成文字之前就被出卖给了敌人。而苏军总参谋部甚至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首先是在瑞士日内瓦赢得的。

魂牵梦萦莫斯科

拉多·山多尔，匈牙利人，1899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名门望族家庭。据说他6岁的时候看到一幅俄国地

图，面对如此广袤无垠的国土，他心中便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长大以后，一定要到俄罗斯看看。从此，俄罗斯大地成为他魂牵梦萦的地方。由于从小喜欢地理，日后他成了一位极具天赋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

读大学时，他学的是法律，精通匈、德、俄、英、法五国语言。后来，拉多接触了马克思主义，阅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随着对马列主义的逐渐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更令他向往，去俄国的愿望也就更加强了，他迫切地想知道那里所发生的一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旧的奥匈帝国在政治、军事等方面彻底崩溃，匈牙利出现了暂时的权力真空。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匈牙利也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1919年3月21日，在苏联共产党的指导下，由匈牙利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组织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9岁的拉多·山多尔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身创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他参加了红军，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成了匈牙利红军的政治委员，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匈牙利的苏维埃共和国制订了雄心勃勃的社会经济计划，但是却受到协约国的军事进攻。当时的匈牙利红军在抵抗协约国进攻中曾经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共产党在内政上采取的镇压措施引起了人民的反对，导致军事斗争最后失利。革命失败后，拉多和许多共产党人一样被迫流亡国外。

拉多流亡国外时，在大学里学的法律用不上了，他就改学自己一直喜欢的地理，凭着自己丰富的地图地理知识，先后在柏林、巴黎等地开办新闻社。

希特勒上台后，拉多和他的新闻社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发表了大量揭露德国法西斯野心的图文。纳粹德国甚为恼火，希特勒曾公开点名指责新闻社是第三帝国的公敌。纳粹报纸也对新闻社进行了围攻。

拉多担任过巴黎地理学会专业刊物的编辑，经常为各种刊物撰稿，为报刊绘制形势地图。他参加了《苏联世界大地图》的绘制工作。在地图的绘制过程中，他发现缺失很多确凿的材料，而要找到准确的资料只能亲自去莫斯科。1935年，拉多作为独立新闻社的负责人，前往苏联收集业务资料。

在莫斯科，他遇到了一位匈牙利同行。这位匈牙

利人说，他认识苏军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在他那里能搞到不少有用的资料，于是拉多和这位同乡一起拜访了苏军总参谋部。其实这位苏军军官是一个搞情报工作的，他也知道拉多新闻社的情况，并对拉多的工作表示赞赏。苏军情报部门希望能与拉多合作，共同为反法西斯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拉多当时并不清楚苏联人的具体打算。后来，他又去了一趟苏军总参谋部，并会见了情报部部长乌里茨基。拉多与乌里茨基谈得很融洽，双方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基础。几天后，乌里茨基亲自拜访了拉多，向拉多摊牌，邀请拉多为苏联情报部门服务。最终他们达成了协议，拉多成了一名苏联间谍。

乌里茨基认为新闻社是一个很好的掩护，要求拉多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站，从事搜集秘密情报的活动。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他们商定情报站设在比利时或瑞士。

1935年12月，拉多结束了独立新闻社在巴黎的业务，前往布鲁塞尔，但布鲁塞尔的警察总监坚决不同意新闻社在比利时开业。于是，拉多按第二方案去了瑞士，同样遇到不少麻烦。面对许多苛刻的条件、预

料不到的困难，拉多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足智多谋的应变能力。1936年5月，拉多终于办完了一切手续，得到了在日内瓦的3年居住证，获准在日内瓦经营新闻图片社，同时还领到了妻子和岳母的入境签证。

1936年8月，新闻图片社正式开张，地址在日内瓦洛桑街113号。这是一幢六层公寓，拉多在里面租了四间房子的一套单元。新闻图片社的全部业务，包括草图的设计、地图的绘制和说明文字的编写都在这里进行，工作人员只有三名：拉多和他的妻子及一名制图员。此外请了一个会计，隔一段时间来整理一下账目，登记造表。新闻图片社的业务主要是绘制、出版政治、经济形势图，客户对象主要是报刊、图书馆、大学的地理系、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大使馆，流亡在日内瓦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曾来新闻图片社订购图册。

1937年6月底，拉多·山多尔按照苏联总部的安排，前往巴黎与总部代表见面。在指定的地点他们用暗语接上了头。来人自称柯里亚，根据总部的指示，今后拉多将由他领导，联络地点在巴黎。1938年4月，柯里亚突然出现在日内瓦拉多的工作室，这是极少发

生的事情。柯里亚告诉拉多，总部已任命拉多为瑞士情报组组长，今后拉多将独立开展工作，他是来向拉多告辞的。

拉多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柯里亚奉命调回莫斯科，回去不久就被肃反枪决了，据说，他本人曾有预感，回去后很可能被逮捕，可是他是一个爱国的理想主义者，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去。

柯里亚临走前给拉多介绍了一个叫奥托·平特尔的人，此人代号是“派克博”，职业是国际社会主义新闻社的社长，在瑞士政界、外交界和新闻界人脉甚广。他是拉多情报网的第一个情报员。此时，拉多自己也建立了几个情报来源点。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拉多情报小组成员还有：埃德蒙·哈麦尔和奥利加·哈麦尔夫妇。埃德蒙是一位无线电技师，在日内瓦开了一家附设修理部的无线器材店。此外，还有亚历山大·金·富特和克里斯蒂安·施奈德（代号“泰勒”），施奈德有个“露西”情报小组，也一起划归拉多领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到一年的时间，德军占据了大半个欧洲，希特勒下一个目标是谁？拉多把情报

搜集的重点放在德军的动向上。此时，拉多·山多尔已建立了两条与莫斯科联系的通信线路。埃德蒙和妻子从日内瓦发报，亚历山大·富特在洛桑工作。这样保证了拉多与莫斯科的联系畅通无阻。6月6日，拉多向苏联发出了警告：根据派克博在日本大使馆获悉的情报，德军结束西线战事后，将对苏联采取行动。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拉多小组数次向莫斯科提供情报，预告德军将要进攻苏联，并把德军兵力数量、兵力部署、德军进攻乌克兰的路线等都摸清楚了，甚至把德军发起进攻的准确时间都预报给了莫斯科。

与此同时，德军谍报局的监听站检测到了拉多小组的电台电波，只是一时无法确定电台的准确位置。由于长期监控，德军监听员甚至获悉拉多小组无线电发报员的手法及其呼号。1941年6月，德军监听站还破译了几封电报，而这些电波均来自中立国瑞士。

1941年6月16~17日夜间，德国的克兰采监听站发现一个不明身份的无线电厂两次以同一密码通信出现。克兰采监听员与布列斯特监听员通话后，判定出电报信号来自日内瓦湖地区。根据呼号特点，德国电

报专家断定此人以前也出现过，但出现次数不多。

18日清晨，德军译码局局长吉列将军，盖世太保头目米勒和帝国安全总局情报处长、党卫军将军瓦德尔·舍连别格都接到相应的报告，知道日内瓦出现神秘的无线电谍报员。因为没有密钥，德军电报密码专家也无法解读电文。党卫军将军舍连别格凭直觉判断，间谍电波如此活跃并非偶然，可能与德军即将袭击苏联有关。

舍连别格这个推测是正确的，拉多小组当天发来的一封译电放在了苏军情报部长戈利科夫的办公桌上：德国军队正向苏德边界增兵，并完成了从希腊向波兰的兵力投送。战争将在6月22日爆发。

4天后，6月22日黎明时分，希特勒军团越过了苏联边界。

了不起的“露西”

通过施奈德的情报渠道，拉多小组增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露西”。正是因为有了露西的帮助，拉多情报小组才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最有效、最隐蔽的情报组织。

拉多领导的拉多小组情报网，在战时究竟给莫斯科提供了多少情报？这些情报是怎样和在什么地方搞到的呢？这些问题至今恐怕都很难彻底说清楚。但可以肯定，拉多情报小组由于有了露西的加盟，得以在战争期间向苏联提供大量有关德军动向的情报，从而为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正确决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露西”这个名字是拉多起的，意思是情报来自卢塞恩。露西不仅仅指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情报网络。这个情报网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鲁道夫·罗斯勒，另一个是卡雷尔·赛的拉切克。鲁道夫·罗斯勒和克里斯蒂安·施奈德早在1935年就相识，当时同在瑞士国际劳动局工作。早在柏林时，鲁道夫就与德国外交部和军界的高级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

鲁道夫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一个小城市考夫博伊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7岁的鲁道夫参军走上了战场。战争结束后，他转业做了一名记者，在奥格斯堡做过报纸编辑。他原在柏林工作，纳粹上台后他到了瑞士，开了一家书店。此人神通广大，与瑞士情报机构关系密切，瑞士军队总参谋部还发给他一个特别证件，上面写着“请各机关和个人给鲁道夫以援助，

以便完成使命”。

有人说鲁道夫是一个情报分析奇才，他的大脑就像个档案库，能在瞬间提供有关德军的详细情况。后来事情败露，鲁道夫遭到逮捕，瑞士警方在他的房间搜出近两万张资料卡片。鲁道夫在法庭上承认，这些卡片经过他的分析，可以变成第一流的情报。审问中鲁道夫交代，他的情报除了自己搜集的以外，主要来源于卡雷尔·赛的拉切克，这是一名捷克情报军官，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在瑞士活动。赛的拉切克的情报源于德军最高统帅部，他同那里的不少持不同政见的德国军官关系密切，这些人正在进行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并及时向他提供了大量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机密情报。

经过七八年的苦心经营，到1942年前后，拉多情报小组已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链式谍报网：柏林情报源——鲁道夫——施奈德——赛的拉切克——组长拉多·山多尔——莫斯科。通过这根秘密链条，大量重要情报从柏林流向苏军情报部。

鲁道夫是一个间谍天才，非常善于组织搜集重要的机密情报。除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渠道外，在德

军其他重要部门，他还有4名重要间谍。据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握的材料，这些人很可能包括：德军总参谋部少将汉斯·斯特，他于1944年7月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事情败露后，与自己的上司、海军中将卡纳里斯一起被处以绞刑；曾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的汉斯·吉泽乌斯；反对派保守党领导人卡尔·哈德勒，谋杀希特勒未遂后也被处以绞刑；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弗里茨·别特策利上校。

莫斯科多次要求拉多·山多尔查明被招募间谍的真实姓名，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通过了解情报员的身份，以证明情报的真实性。拉多向莫斯科报告说，要搞清露西情报网柏林情报员的真实身份不太可能。比如，鲁道夫同与他直接联络的人严格约定，彼此不得直接见面，发往莫斯科的一切联络信函中柏林情报人员均用假名等。听了拉多的汇报，苏军总参情报部才决定“暂停身份验明工作”。

渊博的地理地图知识、敏锐的分析能力，也使拉多·山多尔在看似平常的事情中发现重要的情报。一次，德军某部给新闻图片社寄来一个紧急订单，要他们绘出大幅地图后，找出去某地区的最佳路径，并在

图上注明。拉多一看就知道这是为某个战役做准备，于是电告莫斯科总部，告知德军这支部队可能要进攻苏联某个地区。后来，苏军预先在那里进行了埋伏，有备而战的苏军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又有一次，拉多·山多尔在制作某份地图时，发现对方对某个并不太重要的地区十分关心，隐约觉得那儿肯定有什么问题，于是电告莫斯科，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苏联方面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地方就是苏军准备空降的地方，看来内部有人告密，于是撤销了计划，苏联情报部门经过调查，挖出了隐藏在内部的一名德国间谍。

拉多小组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替苏联搞到不少有关制造原子弹的情报。早在1942年中期，拉多·山多尔的情报网收到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秘密电报。电报上写道：“莱比锡的海森堡教授正致力于铀链式反应分裂出原子能用于军事的专题研究。查明什么方法可实现铀元素链式反应、铀同位素的分裂和获得大量镭的方法，搞清海森堡在何处、哥本哈根博拉实验室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名单。”

一个月后，拉多给莫斯科回电：“通过皮埃尔已查明，用中子轰击同位素铀235可使这种原子核爆炸，并

发展到3至4个能量单位。它们落在同位素铀235新核子上，又会发生新的爆炸。这些连续爆炸被称为链式反应。”

7月初，拉多再次向莫斯科报告：“莱比锡的物理学家海森堡已不再进行铀原子轰击试验，因为德国人已不信任他，并把他排挤到独立研究的大门外。这项工作已交给物理学家季赫茨。巴黎的乔利奥教授和其妻子正在夜以继日地研究原子分裂问题，苏黎世的海尔鲍教授也在致力于这项工作。”

此外，拉多还得知德国人试图用铀浓缩方法提高各种爆炸物的威力，德国人正在巴黎进行回旋加速器的试验等情报。拉多还告知莫斯科，德国人不会造出原子弹。证据是，美国原子计划策划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汉斯·贝特认为：德国科学家在核研究领域并无多大成就。德国人想建核反应堆，但在1945年之前他们只能艰难地走过一半的路程。



拉多·山多尔既是间谍小组的负责人，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地理学家

二战刚开始不久，拉多决定必须自己拥有一部电台，便于直接与莫斯科联系，他吸收了一位22岁的意大利姑娘玛格丽特·博利作为小组的联络员兼报务员。并指示在日内瓦的小组成员、无线电技师埃德蒙为玛

格丽特组装一部电台。

整个二战期间，拉多·山多尔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他几乎每天都要同小组成员碰面，对各类情报进行分析综合，然后提出处理意见。尤其在苏德战争前后，苏军总参谋部迫切需要有关德军东线兵力部署、德军作战计划等方面的秘密情报。小组几部无线电台每天都要发报几个小时。发报时间越多，被德军发现的几率就越大，自然危险也大，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顾不上个人的安危，必须加紧工作。

由于拉多小组预先获得德军行动的准确情报，苏军最高统帅部知彼知己，制定出斯大林格勒合围德军的计划，最终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33万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做了俘虏。此战后，德军元气大伤，苏军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但希特勒不甘心失败，调集了90多万大军，2000多架飞机，1万多门大炮，准备在库尔斯克与苏军再度决战，以夺回战场主动权，这就是德军所谓的“城堡”行动，即库尔斯克会战。在库尔斯克战役前夕，拉多小组高速运转，通过各种有效的渠道，不仅了解到德军详细的作战计划，而且知道德军进攻的时间，知道德军在什么地方强渡

第聂伯河。甚至连德国最新“虎”式坦克的生产量，以及投入东线作战的日期都弄到手了。此外，拉多小组还查明了德军飞机生产能力、飞机产量、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这些珍贵的情报对苏军赢得库尔斯克会战胜利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此役，德军损失了50多万人，1500多辆坦克，3700多架飞机。纳粹德国从此一蹶不振，开始走向彻底失败的道路。

库尔斯克大会战



1944年7月20日这天，希特勒在他的大本营内召开会议。希特勒正在侃侃而谈，施陶芬贝格上校坐在希特勒身边，趁人不注意将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会议桌下，然后悄悄地离开了元首大本营。随

着一声巨响，会议室的墙壁和窗户被炸毁。可是，希特勒却像幽灵一般逃出了死亡陷阱，只是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震成轻伤。

这起刺杀希特勒的事件就是拉多·山多尔小组一手策划的。

刺杀希特勒的施行者施陶芬贝格上校曾为拉多小组提供了不少机密情报，间接接受日内瓦拉多·山多尔的指示。当时，拉多获悉德军一些上层军官对希特勒的愤怒已达到极点，于是指示施奈德掌握的“露西小组”，在能够接近元首的军人中物色勇士，寻找机会干掉希特勒。德军反希特勒的高层军官受到“露西小组”的影响，经过精心策划，开始采取行动。而有些“露西小组”的成员，比如汉斯·斯特少将、施陶芬贝格上校直接参与了刺杀希特勒的行动。

对拉多小组在二战期间发挥的巨大作用，苏军总参情报部是这样评价的：“拉多小组的情报网广大无边、能力无限。”

拉多·山多尔领导的情报网，仅仅在1942年就向苏联发出了800多封密码电报，大约1100页。1943年1月1日至6月15日，苏联情报机构从拉多那里获得了750

封电报。在1942~1943年间，拉多·山多尔情报小组向苏联人提供了3000多页机密文件。拉多·山多尔还创造了一项奇迹：二战中几乎所有大一点的间谍网都遭到破坏，而拉多·山多尔是唯一活到战后的大间谍。

活到战后的大间谍

拉多情报小组的无线电波时而从日内瓦出现，时而从洛桑出现，当时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瑞士的各大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日内瓦湖法国一侧出现了装有雷达探测器的汽车。据称，是德国人在寻找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电台。日内瓦的居民们也议论纷纷。拉多读了这条消息心神不安，心里完全清楚德国人是冲他们来的。但拉多他们没有停止工作，只是通知小组成员保持高度警惕，尽量减少每次发报的时间。

通过反复监听，德军谍报局发现有3部电台与外界保持着频繁联系，并基本确定了电台的位置，其中日内瓦有两部。德国党卫军舍连别格将军准确地推测到，这些电台是在为莫斯科工作，他决心一定要消灭这个“红色三套车”。

1943年8月，应党卫军舍连别格将军个人邀请，瑞

士警察总头目毛勒出访柏林。舍连别格将军把活跃在瑞士境内的3个电台的资料摆到毛勒面前，要求他尽快破获。

二战期间，瑞士恪守中立，战时希特勒对瑞士中立国的地位基本上还是尊重，舍连别格接待毛勒时也算彬彬有礼，但对间谍电台这件事上态度十分强硬。他威胁说，如果这些无线电台继续在瑞士活动，将给两国关系蒙上阴影，瑞士的中立国地位也将受到威胁，而由此所发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瑞士负责。

瑞士方面妥协了，决定协助德国摧毁地下电台，瑞士警方决定由特雷尔中尉负责侦破工作。9月9日，多部车载探测器出现在日内瓦的大街小巷，结果他们发现了新的无线电信号。经过跟踪监测，渐渐把目标锁定在佛罗里桑大街的一所住宅里，身份不明的无线电波正是从那里飞向天空的，而这里就是拉多小组重要成员、无线电器材店老板埃德蒙夫妇的住处。

瑞士警方没有马上动手抓人，以免打草惊蛇，只是把埃德蒙夫妇的住宅严密监控起来，等到破获了其他两处电台，再开始统一行动。

9月25日，玛格丽特的电台方位也被瑞士警方测

定，同样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尽管警察做得非常隐蔽，玛格丽特还是发现屋外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大门也有人看守。她赶忙向拉多汇报了情况。拉多命令她立即停止发报，同时指派埃德蒙前往玛格丽特的住宅，取走了电台。后来，警方在埃德蒙夫妇的无线电器材店里发现了玛格丽特的电台。

10月10日，拉多·山多尔向莫斯科汇报了发生的情况，建议改变电台的工作时间和使用波长，但这份电报被盖世太保破译了。

10月13日24时，到了与莫斯科约定的联系时间，奥莉加开始发报。警察破门而入，冲进了他们的房间，警察缴获了一架刚刚发完电报的电台，几封电报稿和密码簿。与此同时，警察包围了埃德蒙夫妇的住宅，从他们家里搜出了两部电台，其中一部是从玛格丽特家里转移过来的。警察冲进玛格丽特的住宅时，她没在家里。最后警方在她的情夫、盖世太保秘密间谍汉斯·彼德尔斯的床上抓到了她。

11月20日午夜，无线电员亚历山大·富特正在接收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突然，十几个警察破门而入。紧急状况下，富特非常镇静，他在蜡烛上烧掉了电报

稿，砸坏了电报机。被捕后，警察对他进行审讯，富特说自己是个无线电爱好者，与拉多他们毫无关系。警察找不到证据，只好释放了富特。随后西西及丈夫鲍威尔、鲁道夫和其他几名情报人员都先后被捕，“拉多小组”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在抓捕拉多情报小组成员的行动中，瑞士出动了70多名警察和大批警犬，日内瓦警察局局长亲自坐镇指挥，宪兵司令和瑞士警察总局政治处处长协助其工作。

瑞士联邦安全局长罗热·马松上校向舍连别格少将通报说，瑞士政府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当时，纳粹德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瑞士人清楚战争的最后胜利属于谁了，因此，他们也不想过分得罪苏联、英国和美国，免得把关系搞僵。所以，时隔不久，瑞士警方释放了所有被捕人员，条件只有一个：不得离开瑞士，随时等候法院的审判通知。

1945年10月22日，伯尔尼军事法庭以拉多小组对德国实施非法间谍活动为由审理此案，施奈德被判蹲狱一个月，鲁道夫·罗斯勒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直到1947年10月，日内瓦法庭对拉多小组间谍案

进行开庭审理，拉多·山多尔缺席被判处一年监禁，并被勒令十年内禁止访问瑞士。与其一同受审的还有无线电员富特、埃德蒙夫妇以及玛格丽特。

拉多小组遭到毁灭性打击时，拉多·山多尔却幸运地逃脱了追捕，在瑞士藏了起来。1944年9月，拉多与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组织取得联系，在一个法国少校的帮助下，搞到了法国游击队给他们的证件。9月24日，拉多和妻子叶琳娜逃往刚从德军手里解放出来的巴黎。

1944年10月26日，拉多·山多尔来到了苏联驻巴黎外交使团。在这个使团里有一个苏军总参情报部的特工，他立即向莫斯科汇报了拉多的情况，莫斯科方面指派亚历山大·诺维科夫中校与拉多保持联络，帮助拉多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诺维科夫一点儿也不知道拉多小组的情况，对拉多夫妇根本不关心。拉多·山多尔开始以为苏联情报部门会像对待英雄一样迎接他，然而却遭到如此冷遇，心里感到非常失落。

一天，拉多在使团驻地的走廊上遇见了自己的部下亚历山大·富特，原来富特也归诺维科夫联系。但是，诺维科夫没有在他面前提起过富特，这自然引起

了拉多·山多尔的警惕。他第一次感觉到有人不信任他。更令他痛苦的是诺维科夫收走了他的个人证件，只给他一个名为伊格纳季·库利舍尔的苏联公民遣返证书。1月8日，拉多·山多尔带着这个证书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

亚历山大·富特也乘同次航班飞往莫斯科，他们坐在不同的客舱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几个军官监视着他和富特的一举一动，拉多浑身感到不自在，心里很不舒服。

早在1942年5月，苏军情报部长普伊利乔夫中将亲自给拉多小组发了一封电报，对他们在战争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声称，苏联最高统帅部将授予拉多·山多尔列宁勋章，给亚历山大·富特颁发红旗勋章，埃德蒙夫妇颁发荣誉勋章。然而到了莫斯科后，等待拉多·山多尔的不是勋章，也不是鲜花，而是手铐。

1946年12月，苏联国家全部特别会议以间谍罪判处拉多·山多尔十年监禁。理由很简单，苏联内务部怀疑拉多领导的瑞士情报网已经被西方情报机构渗透，那么拉多也就成了西方间谍了。未经任何调查审讯，拉多被投进苏联内务部的卢比扬监狱。拉多·山多

尔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为之冒死努力工作的苏联情报机构竟然会这样对待他。



人民友谊勋章

1954年11月拉多·山多尔被释放。随后他离开了莫斯科，回到了阔别30年的祖国。在布达佩斯，他见到了自己亲爱的妻子叶琳娜和已成年的儿子。匈牙利接受了他，给他恢复了名誉。他以罕见的速度在学术界恢复了自己的地位，被授予自然科学博士、经济学博士，担任了匈牙利皇家地理学会主席、匈牙利大地测量和制图学会主席，并且成为联合国地名专家组成员。

1956年，苏联最高法院以“无犯罪要素”撤销了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对拉多·山多尔的判决。

1972年，苏联总参情报部向拉多·山多尔表示抱歉。拉多·山多尔被授予苏联一级卫国战争勋章。此后他多次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地图专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并被授予人民友谊勋章。

第六章 科学间谍:他帮助苏联造出原子弹

1949年春天，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美国联邦调查局断定是苏联间谍窃取了美国原子弹的核心机密。1950年，著名物理学家福克斯被英国警方逮捕。

福克斯是地道的德国人，却倾向社会主义苏联，他身在英美原子弹研究核心机构，却玩起自己根本不懂的间谍游戏，源源不断地为苏联提供原子弹研究核心机密。

1993年，俄罗斯原子科学家们终于公开承认，福克斯提供的情报帮助他们制造了原子弹。俄罗斯联邦授予福克斯人民友谊勋章。而这时，福克斯已经去世5年了。

一帆风顺的博士

福克斯于1911年12月29日出生在德国达姆施塔特附近的一个小城镇，父亲埃米尔·福克斯是路德教牧师。13岁开始，福克斯就随父亲参加基督教联谊会活动。1931年初，全家迁到基尔市。福克斯先后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和基尔大学，攻读数学和物理，在大学读书期间福克斯放弃了路德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者、社会民主党党员，后来又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1933年希特勒上台，福克斯的父亲因持社会主义观点被纳粹分子抓进监狱。他的母亲和妹妹伊丽莎白也遭到纳粹迫害，母亲不甘受辱喝盐酸水自杀了。后来，他的姐姐参加了反纳粹活动，在面临被捕的关键时候也卧轨自杀了。他的另一个妹妹克里斯杰勒移民美国。整个家庭的不幸遭遇对福克斯的政治态度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一生无比痛恨纳粹主义，为反对纳粹法西斯从未停止战斗。

1933年春，为躲避基尔法西斯冲锋队的迫害，福克斯在一个年轻女子的帮助下隐藏了5个月，并由她协助秘密越过边境线，以难民的身份坐汽车到达巴黎。

当时，他贫困交加，身无分文，党组织指示他应该出国去完成学业，以便希特勒统治崩毁后回来重建新德国。

1933年10月，福克斯从法国去了英国，以难民的身份在英国内政部外侨处登记。此时，他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随身带的一只帆布包外一无所有。他在萨默塞特住了几个星期，最后被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录取，攻读物理和数学。他的导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涅德尔·莫特教授，莫特教授知道福克斯的困境后，同校方联系，免去了福克斯的学费，还帮助他搞到一笔奖学金。福克斯成为莫特教授的第一个研究生。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勤奋好学，在物理学领域显示出卓越的才能。

在布里斯托尔，福克斯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在英国的地下小组，主要负责宣传工作。英国有一个“对苏文化联系协会”的组织，该协会经常组织戏剧表演。福克斯是协会的积极分子，曾成功地扮演了维辛斯基。他的导师涅德尔·莫特看了他的演出大为震惊，在教授眼里，福克斯是个勤奋好学、性格温顺、待人谦逊的青年，而维辛斯基则是当时苏联司法界一个冷漠无情的

头目，福克斯却将这个人物演得惟妙惟肖、十分到位。

1937年11月，福克斯获得数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接着，他进入爱丁堡大学，在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斯·波尔教授的实验室继续深造，波尔教授非常欣赏他的才华。1939年，福克斯又在爱丁堡大学获得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拿到了卡耐基研究奖学金，并留在爱丁堡大学工作。这位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的德国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1940年5月，德军占领法国。英国向德国宣战，福克斯作为敌对国德国公民被拘留，他申请加入英国国籍不但没有获准，而且多次受到有关部门的审查，甚至纳粹分子也写信给英国当局，揭发福克斯是共产党员。所幸福克斯的表现一直很好，也没有查到他与共产党人联系的确切证据。所以他仅作为敌对国的侨民被押送到加拿大的魁北克。很幸运的是，装着福克斯档案的货船被德国鱼雷击沉，在他周围已经没有人知道他的底细。1940年底，他在恩师的帮助下又回到爱丁堡大学工作。

1941年春天，英国决定在伯明翰成立原子弹秘密

研制委员会，由德国科学家鲁道夫·皮尔斯牵头负责。皮尔斯教授也是一位反法西斯主义者，他在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原子弹研究实验室，在朋友的大力推荐下他找到福克斯，热情邀请福克斯到他的实验室工作。皮尔斯教授告诉他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军事研究，具体内容没有得到允许暂不能说，但这项研究工作意义深远，尤其需要像他这样的理论知识深厚的人才加入。原子弹研究的绝密计划代号为“丘勃·阿洛伊”。通过审查后，福克斯在《官员保密法》上签了字，进入了皮尔斯教授的原子弹研究实验室。在研究室工作期间，福克斯解决了一系列铀弹课题中重要而复杂的数学问题。

原子弹研究是个牵涉面很广的巨大工程，为了协调各大学科学家的工作，英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合金管”公司。领导“合金管”公司董事会的枢密院院长、丘吉尔战时内阁阁员约翰·安德森爵士对福克斯印象很好。在他的大力推荐下，1942年8月7日，福克斯终于向英王宣誓效忠，加入了英国国籍。

不计报酬的“科学间谍”

其实，苏联也一直在关注着原子弹的研究，所有的科研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当中。苏联政府向情报部门发出特别指示，要尽快搞到英美原子弹研究的进展，最好能搞到详细的资料。寻找一个“科学间谍”成了最好的选择。在经过反复的挑选、调查之后，福克斯进入了苏联国家安全总局的视线。

令苏联国家安全总局高兴的是，早在1941年深秋，信仰共产主义的福克斯在了解原子弹研究的实际意义后，就认为应该把这里的情况告诉苏联。当时，德军刚开始实施“巴巴罗萨”战役，正全面进攻苏联，已经逼近莫斯科城下。福克斯认为苏德之战是西方同盟国蓄意挑起的一个阴谋，有意造成苏联同德国决一死战、两败俱伤的局，他们好从中渔利。出于对纳粹的仇恨，以及对英美同盟国的不满，福克斯决定向苏联提供他所掌握的原子弹研究情报。

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找到西蒙·戴维多维奇·克雷默，克雷默找到了福克斯。

克雷默是以驻英武官身份为掩护的苏联情报部门的军官。克雷默与福克斯联系上后，发现福克斯根本没有做情报工作的经验，就教他出门与接头人见面，

先坐出租车兜几圈，看有没有人跟踪，再到约定地点见面。福克斯觉得坐出租车兜几圈花销太大，又浪费时间，而且也不见得安全。福克斯宁愿到地铁站这种人群密集的地方接头，这种地方更安全些。在此后的5个月中，福克斯同克雷默会面了3次。克雷默获得了用铀可以制造原子弹的信息，以及用分离铀同位素的气体扩散法原理所得的实验报告。福克斯将自己正在撰写的原子能研究报告的副本也交给了克雷默。

1942年，福克斯受英国有关部门的委托，开始监视德国原子弹的研究进程。同时，英国秘密情报部门提供一些有关原子弹研究的情报让他进行分析。福克斯平时工作勤奋，生活低调，没有不良嗜好，又能出色地完成情报部门交给的任务，因此深受上级的信任和好评。

1942年夏，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加强了对原子弹研究情报的搜集。情报总局安排了专人与福克斯接头，这个人叫索尼娅，在英国的化名叫布鲁尔小姐，自称是从纳粹德国逃出来的犹太难民，当时在一户富裕的德国侨民家做佣人。福克斯接到指令，将原子弹研究方面的情报交给布鲁尔小姐。有意思的是，福克斯并

不知道布鲁尔小姐具体属于哪个情报部门，也不清楚自己为苏联情报机构哪个部门工作。

1943年9月，福克斯受美国人邀请随英国代表团飞抵美国，在考察美国原子弹研究基地前，他们在华盛顿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例行的保密证书。由于福克斯已经被英国当局认为是可信赖的代表团成员，美国安全机构没有对他做进一步的忠诚调查，就准许他阅读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秘密报告，美国人研究原子弹的每一个细节问题福克斯都了如指掌了。

11月，福克斯到达美国核武器研究基地洛斯阿拉莫斯小镇。令人喜出望外的是，他不仅正式成为美国原子弹研究“曼哈顿工程”中的一员，而且成为了“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助手。福克斯同美国人就气体扩散工艺交换了意见，共同拟定了今后的工作计划，他被安排负责一座大型气体扩散工厂的设计工作。

福克斯到了美国后，一直想办法与苏联情报部门取得联系，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保密监控非常严密，切断了基地所有人员的对外联系，外面的人想见福克斯几乎不可能。

苏联秘密情报机构驻纽约的间谍拉蒙德得到国内

提供的信息，知道福克斯有个妹妹克里斯杰勒移居美国。于是，拉蒙德设法找到了克里斯杰勒。克里斯杰勒也是位反法西斯主义者，同情社会主义苏联，在她的帮助下，苏联情报机构重新与福克斯建立了联系。

1944年1月的一天下午，福克斯拿着一只手球，按照预约赶到纽约东赛特区大街上与拉蒙德见面。在拉蒙德的印象中，福克斯身材修长，目光呆滞，是一个完全不谙世事的科学家。两人一起乘出租车来到一家餐馆。

他们边用餐边聊天，福克斯告诉拉蒙德，他为“曼哈顿工程”工作，这项工程是要把通过核裂变所产生的原子能用于军事。福克斯的研究室有严格的安检系统，没有特殊的间谍工具，福克斯是无法将原始资料带出研究室的。他凭着熟练的记忆，向拉蒙德口述了原子弹研究的一些细节问题，绘制了一些说明性的图纸资料。

听了福克斯的讲述，拉蒙德惊呆了，这位老牌间谍全身高度紧张，格外兴奋，他从未想到自己能够获得如此绝密的原子弹情报。拉蒙德赶紧表明，福克斯将能为此得到巨额酬金。福克斯淡淡一笑说：“我钱够

用，我这么做只是信仰你们的事业，想帮助苏联，支持你们反对纳粹德国的战斗。”

在日后的会面中，拉蒙德发现福克斯的生活极其简朴，并且一直没有结婚。拉蒙德曾问及他为何单身，福克斯说：“帮助苏联人是我自己的决定，我很高兴这么做。但我十分清楚，我随时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所做的事哪怕出一点错，都可能招来致命的后果，个人随时都有可能死去，我不想让妻子和孩子为我难过。”

有些项目的研究报告由福克斯负责，他就直接把初稿交给拉蒙德。福克斯后来回忆说：“我同其他科学家一起，准备了某些高级机密的文件，被称作军事序号系列。我先写出草稿，然后把草稿誊抄一式两份送出……无论什么情况下起草的文件，校对稿和原作一般都要退还给我。由于文件内容的高度机密性，为了有效地控制和安全起见，两份文件中的每一份都要编号。我个人保留最初写下的草稿，多数情况下这些草稿都是很正规的，我就把我这些草稿交给与我联系的拉蒙德……”

1944年8月，福克斯突然被调到洛斯阿拉莫斯一个

绝密的原子实验室。当时，全美核物理精英几乎都集中到这里，其中获诺贝尔奖的就有12位，他们在进行原子弹的最后组装工作。离开前福克斯来不及与接头人打招呼，苏联情报机构又一次与福克斯失去联系。

苏联人决定再去找福克斯的妹妹克里斯杰勒帮忙。但这次拉蒙德的行为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他们开始调查这件事，事态的发展对福克斯和苏联情报机构都极为不利。

1945年7月16日，美国研制原子弹进入了最后的时刻。新墨西哥州北部圣菲附近的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试验场，荒无人烟的大漠上耸立着一座钢塔，原子弹就在钢塔上。试验开始，霎时，天地间电闪雷鸣、飓风怒吼，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试验成功了。

7月24日，波茨坦会议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轻描淡写地向斯大林透露了成功制造原子弹的消息，可这位苏联首脑几乎面无表情，好像根本没听懂杜鲁门在说什么。不久以后，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其巨大的杀伤力震撼了全世界。

为粉碎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斯大林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加速苏联研制原子弹的进程。

1945年底，斯大林以辉煌的古战场“鲍罗金诺”为名，重新命名了苏联的核研制项目，上千名专家夜以继日地投入研制工作。

1945年12月，在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的圣菲，在福克斯妹妹的帮助下，拉蒙德与福克斯又接上头。与往日一样，福克斯又交给拉蒙德不少机密情报，福克斯告诉拉蒙德他参加了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并对试验做出了详细的分析。他带来了有关制造铀原子弹的设计图，一份有关原子弹厂房及设备情况的报告，特别谈到一台进行复杂数字运算的高速计算机。此外，他还透露了生产钚用的反应堆是水冷却，以及钚弹的设计制造方法。就这样，福克斯的情报使苏联科学家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2008年美国公布的核爆炸相关图片

1946年1月19日，福克斯又把美国原子弹的尺寸、里面的装填物质以及在引爆现场观测到的情景和测量结果交给了苏联安全总局的人。苏联核研究所的专家们如获至宝，这些美国经过无数次试验才得到的数据使苏联人加快了原子弹研究的进度。

1946年底，苏联建成了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取得了控链式核反应的巨大成功。

这时，英国首相艾德礼决定不依靠美国，自己单独研发原子弹。福克斯从洛斯阿拉莫斯回到英国后，被任命为位于哈鲁艾尔的原子能科学研究中心理论研

究部主任。

得知福克斯回到英国并担任要职，苏联认为这又是一次获得英国原子弹情报的好机会，情报部门立即派出一位资深间谍弗克里索夫到英国，并很快与福克斯建立了联系。

1947年初，福克斯走进伦敦北部一家旅馆的高级酒吧，手里拿着一份《论坛报》，在一把约定的长椅上坐下来。同他接头的苏联特工弗克里索夫拿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好久没跟苏联人联系，福克斯似乎情绪不很高，没有过去那么舒畅。弗克里索夫是个经验丰富的老间谍，他以极大的耐心与福克斯周旋，与以往不同的是，福克斯这次接受了一张100英镑的银行支票。在此之前，他只接受过几笔小钱，是拉蒙德给的活动经费。当时在英国，100英镑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事后，福克斯解释说，这笔钱是一种象征，表示他答应从事这件事情，他没有退路了，拿了别人的钱就得干下去。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是福克斯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觉得自己正在从事的活动欺骗了同事和朋友，他反复考虑后决定与苏联人保持往来，但提供的情报要越来越少。从此，他与弗克里索夫每隔两三

个月才在伦敦见面一次，福克斯给苏联人一些英国原子弹研究的机密情报。

1949年春天，苏联制造出命名为“南瓜”的原子弹，并在当年的秋天引爆成功。

他毕竟是科学家

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美国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苏联这么快就造出原子弹。美国人认为，就当时苏联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苏联要研制出原子弹至少需要20年。美国人不相信这是事实，以为苏联人吹牛，假宣传。他们派出间谍搜集苏联相关情报，出动高空侦察机取回苏联爆炸物放射性尘粒进行分析，种种情况均可证明，苏联的确成功爆炸了原子弹。

美国人把眼光转向自己内部，开始怀疑核研究部门出了问题，是苏联间谍窃取了美国原子弹的核心机密，联邦调查局在相关部门展开拉网式调查。

1949年9月中旬，美国联邦调查局破译出克格勃于1944年拍发的电报，其中一份电报内容令他们十分震惊。因为里面介绍了气体的扩散过程，而且还有提取

标准铀用到的决定性技术。由此联邦调查局断定，参加“曼哈顿工程”的英国代表团里一定有间谍。联邦探员兰菲尔查阅了当初能够接触到与电报内容相关学术论文的人员名单，发现该论文的作者为福克斯。他调出福克斯的档案，找到一份从纳粹那里得来的关于福克斯的记载，上面称早在1933年就发现福克斯是共产党员。显而易见，福克斯成为最大的嫌疑分子。

这时，苏联驻加拿大武官处译电员古津科投靠西方世界，向美国人供出了拉蒙德的间谍身份。联邦调查局调查拉蒙德时，联想到他数次与福克斯妹妹克里斯杰勒的接触，于是，福克斯再次受到怀疑。

这时，英国人也感觉苏联在原子弹研究上有间谍行为，对能接近原子弹研究核心机密的人员进行逐个排查。英国反间谍机关军情五处接到联邦调查局情况通报后，他们先不动声色，故意在福克斯的同事中间制造一种互不信任的气氛，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则捏造假证据，说拉蒙德已经供出了福克斯。检察官也放出风声，说军情五处已有足够的证据起诉福克斯犯有间谍罪，接下来就是听他的供词了。

福克斯原本就不是一个职业间谍，而是一个科学

家，根本不懂情报部门在审讯时所采用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花招，没有几个回合他就招供了，向英国军情五处坦白交了自己的全部间谍行为。

对福克斯原子弹泄密案，最感到恼火的是美国人，福克斯向苏联人提供的原子弹研究的情报大多来自美国，于是美国提出要引渡福克斯到美国受审，英国当局拒绝了这一要求。

1950年2月2日，英国警方正式逮捕了福克斯，并以触犯国家保密法的罪名对他提出起诉。福克斯在监狱里平静地等待最严厉的判决，尽管早有心理准备，想到这么年轻就结束生命他还是异常痛苦的，当法官宣判他被处以14年徒刑时，他不敢相信是真的，以为自己听错了。直到他的辩护律师本克走过来说是14年监禁，他才缓过神确信是真的。英国人没有判他的死罪，理由是福克斯向盟国提供了国家机密，而不是敌对国，因为二战期间英苏是盟国；另一个考虑是福克斯是国际著名物理学家，对英美研制原子弹都有过贡献。

福克斯的国籍问题被提交到剥夺国籍委员会。福克斯既没有申辩，也没有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他在写

给委员会的信上说，他效忠谁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从被捕开始他就一直很真诚地与有关部门合作。1951年2月12日，根据英国内务大臣的建议，审判委员会以不忠为理由，正式剥夺了福克斯的英国国籍。

福克斯进了牢房，英美就福克斯事件对苏联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苏联人根本不承认，后来闹得相互找借口驱逐外交官。

福克斯心情非常平静，在狱中与其他人相处和睦，经常拿出自己的食物和香烟与大家共享，他热心地教那些爱学习的犯人科学知识。不久，监狱长安排他在图书馆管理图书，他非常认真细致地投入这项工作。由于狱中表现良好，1959年6月22日被减刑提前释放，这样，他在英国监狱里度过了9年多时光。

福克斯在警察的护送下来到伦敦机场，登上飞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柏林的班机，他在机场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布自己依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愿意成为东德公民，并且愿意为新社会而工作。几天后，他的入籍申请得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批准。

东德热情地接待了他。在故乡人眼里他是一位坚强的社会主义战士，更是一位卓有成效的伟大科学

家。他成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院士。1964年9月，东德核物理研究所所长哈维希教授叛逃到美国，福克斯博士便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为民主德国核物理研究所所长，在他喜欢的理论物理学领域辛勤工作，一直干到1979年退休。

回故乡不久，福克斯同他少年时代的恋人格蕾塔·凯尔松结了婚，终于过上了安稳的家庭生活。

奇怪的是，福克斯出狱回到民主德国后，苏联人没有去关心他，情报部门对他十几年忠心耿耿的合作，为苏联原子弹研究作出的贡献也保持沉默，更不用说表示应有的谢意。这多少使福克斯有些失落。

1988年2月28日，福克斯病逝，安葬在民主德国著名的共产党活动家公墓，苏联仍然未派任何人来吊唁。然而，随着美、英、德、苏等国众多秘密档案解密，福克斯为苏联原子弹爆炸所做的事情已成公开的秘密。

1993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哈里顿曾说，福克斯为苏联提供了内容广泛的情报资料，为此，全体苏联人民应该向他致以深深的谢意，感谢这位英国著名科学家为了信仰帮助苏联窃取美国的原子弹核心机密，

使苏联用短短4年时间就研制出原子弹。

这一年，俄罗斯原子科学家们终于公开承认，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主要是根据福克斯提供的情报制造出来的。俄罗斯联邦授予福克斯人民友谊勋章。而这时，福克斯已经去世5年了。

第七章 “剑桥五杰”之一：“间谍王子”菲尔比

20世纪中期，在闻名世界的英国剑桥大学里，接连爆出惊人的克格勃间谍事件。5位出身英国上层社会的剑桥大学学子，如今身居英国最高权力机构要职，却秘密为苏联克格勃提供了几十年的重要情报。消息一出，举世震惊。

5位剑桥学子是克格勃在海外招募并组建的最有价值的间谍小组。他们为什么要为克格勃工作？是叛国求荣，还是另有隐情？在长达几十年的潜伏生涯里，他们如何一次次化险为夷？“剑桥五杰”书写了世界间谍史上

最不寻常的一段传奇故事。

进入军情六处

20世纪20年代，在欧洲战场形势还很不明朗的时候，苏联的对外情报工作范围很广泛。对英国的情报渗透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怎么才能在英国建立一个高效的情报网呢？那些英国共产党员往往行动太激进，容易引起英国情报部门和政府的注意，况且他们大多出身于工人家庭，打进英国上流社会的机会也很少。最后苏联情报部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堪称完美的计划：找几个出身高贵、前途光明的大学生，组织一个工作小组，想方设法把这些人安插到英国的各个国家机关去，最好安插到英国情报部门中去。

毫无疑问，剑桥大学毕业的菲尔比和他的4个朋友成了最理想的人选——这是一群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均出身豪门，同毕业于剑桥大学。

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剑桥大学的毕业证为菲尔比一群人打开了许多扇门，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最机密的信息，这5个人很快就在英国政府部门身居要职。此后，不断有来自战争中的西班牙、摩

拳擦掌的德国和刚刚研制出核武器的美国的情报发回莫斯科，举世瞩目的库尔斯克会战因为“剑桥五杰”提供的情报使苏联成了最后的赢家。

毫无疑问，“剑桥五杰”是苏联招募的最实干、最优秀的外国的间谍。

在“剑桥五杰”中，菲尔比无疑是最出色的。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出生于印度的安巴拉，父母都是英国人，他的父亲哈里·菲尔比是英国派驻印度殖民地的一位高官，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家。父母为了让菲尔比受到更好的教育，当到了上学的年龄，菲尔比就被送回英国的学校读书。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历史系。受新思潮的影响，进校后他很快就加入了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并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

他接触到批评工党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除大量阅读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外，他还参加学会组织的各种气氛热烈的讨论会。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菲尔比确立了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1932年，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满腔热情只身前往。经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他在维也纳参加了一个地下共产主义小组。

当时，克格勃正在为建立情报网挑选合适的人选，出身高贵、热情活跃的菲尔比首先进入了他们的视线。克格勃邀请他加入情报机构，为苏联这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工作。对共产主义有着强烈渴望的菲尔比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1933年5月，菲尔比带着新婚的妻子利兹回到了英国。回来后，他和往日的政治朋友断绝了来往，不再谈共产主义了，经常出入德国大使馆。不久，他加入了纳粹阵线组织——英德联谊会，并在其中担任了不少职务。他想搞到一笔纳粹的经费，创办一家旨在促进英德关系的商业刊物。为商谈此事，他曾几次到柏林找德国宣传部洽谈，与戈培尔会晤。此时，他的正式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而他又把业余时间花在追逐女人身上，给人的印象俨然是个沉迷风月的花花公子。

1937年2月，苏联情报部门秘密指派菲尔比持英国护照，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西班牙，

因为当时由苏联支持的左派“共和军”与德国和意大利支持的佛朗哥的军队正打得不可开交。菲尔比的任务是以随军记者的身份跟随佛朗哥的军队作战，深入到佛朗哥法西斯占领区，在重要的地方潜伏下来，搜集有关佛朗哥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手资料。菲尔比完成得非常出色，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

一次，他和另外3名记者乘车在路上行驶，突然遭到炮击，小车被一发炮弹击中，他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其他3人全部被打死了。为表扬他的勇敢精神，以及他出色的报道和时政分析，1938年菲尔比获得了由佛朗哥将军亲自授予的十字军功勋章。他因此成为佛朗哥指挥部的官方记者，并且有机会接触机密情报，菲尔比把这些机密情报迅速报告给了莫斯科。

更大的任务在等着菲尔比。苏联情报机关要他想方设法打入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获取第一手资料。这也是他们在英国建立情报小组的目的。

1939年10月以后，德军攻击法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法国上空战争风云迅速聚集，《泰晤士报》要菲尔比从西班牙撤回英国，菲尔比顺水推舟地同意了，随后被派往西线英国部队做随军记者。

1940年夏天，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泰晤士报》国外新闻编辑告诉菲尔比，英国国防部的一位上尉托他问菲尔比是否“可以做些有关国际方面的工作”，菲尔比立即表示愿意去。经过与几位身份不明但显得很有权威的人会谈后，菲尔比被通知到英国秘密情报局报到。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各个部门都在招兵买马，检查制度也比较混乱，对菲尔比的历史调查只是例行公事地问了一下军情六处，对方查了一下档案后回答说：“没有问题。”菲尔比顺利地进入了军情六处。

苏联情报部门得知这一消息喜出望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时，苏联最担心的是英国与德国法西斯单独媾和，以及改变战争方向把火引向苏联，因此指示菲尔比汇报这些情况，并尽量设法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1940年到1944年，菲尔比和“剑桥五杰”中的其他人都归安纳托利·鲍里索维奇·戈尔斯基（安纳托利·格罗莫夫）领导。

戈尔斯基1907年出生，1936年被派往伦敦任苏联大使馆一个小小的非外交职位的技术人员。1937～

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伦敦间谍机构的清洗给了他完成任务的机会，他因此也升了官。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训，接着就晋了职，最后以负有外交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身份被派到伦敦。

菲尔比进入英国情报机构不到一年就从破坏活动科调到特别行动执行处，最后又调到从事反谍报活动的第五科担任伊比利亚组组长，而第五科科长考吉尔是菲尔比剑桥大学时的好友。第五科的基本任务是获取国外有关针对英国的谍报活动情报。

一个偶然的机，菲尔比发现军情六处的档案室就在第五科隔壁，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好事。

第五科除了窃取无线电通讯情报外，还使用相当复杂的技术偷拆外交邮袋。当时欧洲大陆烽火连天，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被切断，所有的外交邮袋均需空运。飞机误点的情况经常发生，各国信使抵达机场后，经常会听到飞机因气候恶劣或发生技术故障而误点的通知。于是，信使们只好坐在候机室里守候他们的邮袋，这时，机场保安人员会很有礼貌地来帮助那些信使：“老兄，你看我亲自把它锁起来，在你回来前保准不会出事。”信使们大多非常乐意

接受机场的帮助，如释重负地出去游山玩水。

信使离开后，保安人员就会立即通知早在等候的第五科专家们，他们开始解开邮袋的绳结，启下封条，取出里面的东西进行拍照。最后，也是最难的工作是把邮袋里的东西一丝不差地放回原处，并且极其精确地照原样重新系好绳结、贴上封条。

菲尔比不错的学历，加之做记者丰富的社会阅历，使得他所具备的能力明显比一般人强。二战后期，菲尔比的表现越来越好，由于其表现突出被调到反间谍处。

随着战局的明朗，菲尔比接受了克格勃新的任务：搜集英国秘密情报局情报处第九科的所有情报。

1941年，两名苏联特工——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和奥尔曼·乌兰暴露之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为了研究有关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专门成立了第九科。此时，战争即将结束，西方国家与苏联的摩擦和冲突日益明显。英国政府确定苏联是未来的假想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开始把他们的工作重点转向了苏联。第九科专门负责刺探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情报，进行对苏联的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

克的影响。

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是严格保密的，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菲尔比同苏联情报人员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战争结束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军情六处的规模将会急剧缩减，第九科和第五科都是反间谍部门，极有可能合并，而新合并的单位在军情六处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莫斯科中心通过菲尔比的上司对他下达命令：“不惜一切手段谋到第九科科长职位……”

要想成为第九科的科长，进而成为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必须搞掉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

菲尔比明白，他应该先寻找同盟者，而最好的同盟者就是与考吉尔有矛盾的人。考吉尔是一个居功自傲的人，树敌不少，与考吉尔作对的同盟者不难找。菲尔比首先想到维维安上校。此人负责军情六处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也是考吉尔的顶头上司，但考吉尔根本瞧不起他，经常把他甩在一边，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感到十分不满。

菲尔比第一次与维维安上校交谈，就达到相当满

意的效果，以至于维维安主动地问他：“现在，该怎么对付考吉尔？”菲尔比知道自己不适合讲得太多，但他巧妙地暗示维维安上校去找高官告考吉尔的状，败坏考吉尔的名声。

菲尔比还想到了一个可以制约考吉尔的人，那就是军情六处首席参谋官。此人头脑清醒，思路缜密，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具备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菲尔比非常敬佩他，认为他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当时，考吉尔同军情五处关系搞得很僵，互相老是作对。在战争的压力下，为了更大的共同目标，短时期内彼此还可以容忍，但这种局面不可能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如果首席参谋官知道这些情况，肯定会对考吉尔施加压力。

所以，当维维安再次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故意说，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建议维维安最好去问问首席参谋官，把考吉尔的情况顺便说说。

菲尔比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见的面，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似乎进展得很顺利。首席参谋官甚至主动打电话给菲尔比，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他。菲尔比和他愉快地见了面，首席参谋官显然是

在考察菲尔比，而菲尔比也尽可能地作出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恰好这个时候，考吉尔遇到了不小的麻烦，这件事帮了菲尔比的大忙。考吉尔曾以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名义起草签发了一封信，是写给美国中情局局长胡佛的。他在信中措辞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政治利益而牺牲情报工作的做法。当然，考吉尔说的有许多是事实，但是这类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的。

外交部的官员很不满意，在信上写了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使英国秘密情报局成为取笑的对象。”外交部的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维维安把这份差事交给了菲尔比。信写好后，维维安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他们没做任何修改便把菲尔比写的文稿交给了局长的秘书，信件很快发了出去。第二天，维维安告诉菲尔比，他跟外交部的官员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

军情五处的人和考吉尔的矛盾日益加深，他们把考吉尔看成是部门之间斗争的众矢之的，几乎是公开

与他抗衡。

考吉尔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矛盾也公开化了。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部下亲信也相互攻击。对方怕闹大了影响不好，暂时妥协作一些退让，但考吉尔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使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菲尔比巧妙地通过局长老部下的关系，将密码专家们对考吉尔的强烈不满告诉了秘密情报局局长。

维维安召见菲尔比，让他看了自己写给局长的报告，里面详细叙述了维维安与考吉尔争吵的整个经过，主张战争结束后，在和平时期必须对反间谍机构进行根本的改革。维维安在报告中提名菲尔比为第九科科长居里的继承人，还特别详细地对菲尔比的能力进行了一番赞赏，说菲尔比是担任这个职务的最佳人选。

几天后，秘书打电话通知菲尔比说局长要见他。

他走进了局长的办公室，当听到局长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知道自己的好运降临了。局长把维维安

的报告拿给他看，并告诉他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他接替居里，担任第九科科长。

没过几天，菲尔比走马上任，接替居里做了第九科的科长。

菲尔比积极利用“技巧高超的打击”为英国情报小组带来了各种机会，终于成了克格勃“五杰”中最优秀的一个间谍。

为了明确第九科的工作职责，使其地位合法化，菲尔比向局长建议由他起草一份章程，经局长签发执行，授权他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负责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担任第九科科长后，菲尔比的办公室迁到了位于百老汇大街的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菲尔比已经走近秘密情报局的核心。

一天，维维安跟他说，简·阿切尔马上可以到第九科工作，第九科有阿切尔加入将如虎添翼，人员配备也就圆满了。

菲尔比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但又找不到充足

的理由来拒绝。阿切尔是大家公认的军情五处最有才干的女性情报官员之一。她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对共产党活动特点的研究上，是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著名专家。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苏联红军情报局的官员克里维茨基将军就是阿切尔审问的。她从克里维茨基那里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说苏联情报机关已把一名年轻的英国记者在内战时期派到了西班牙。毫无疑问，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就是菲尔比。

幸好阿切尔这个人还不错，她性格倔强，讲话严厉，富有幽默感，菲尔比与她相处彼此都很愉快。但他对阿切尔从来不敢掉以轻心，一直谨慎地防范着。

为了消耗阿切尔的精力，让她整天都把时间花在事务上，菲尔比让她负责处理科里当时所能搞到的共产党活动方面的情报，其中包括大量有关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的电报，这些资料很多生动地反映了共产党人及盟友在反纳粹斗争中的献身精神。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他们通过研究共产党报刊和监听共产党国家广播所得的资料，分析推测他们现实活动的情况。同时通过监视苏联和东欧的外交人员以及窃

听大使馆的方法来获取情报。



20世纪最出色的特工——哈罗德·金·菲尔比（右一）

菲尔比的工作极其谨慎。在其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最大地保护了苏联的利益。克格勃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

菲尔比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为正处于战火中的苏联提供了最为珍贵的援助。

那时，德国人发明了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恩格玛密码机。英国潜艇在1941年8月得到了这台密码机。可是密码被破译了以后英国并未对外公布消息。菲尔比把英军破译的德国情报送给了苏联红军。

1943年苏德进行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坦克大战

——库尔斯克会战。苏军虽然付出了近80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但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次大战中，苏联红军总是能提前对德军予以打击。这里有很多是菲尔比的功劳。根据已掌握的情况，菲尔比向苏联发出警报：德国集团军拟于7月初对库尔斯克弧线地区发起强攻。这个情报让苏联军队对敌军进行了提前打击。

当年负责和“剑桥五杰”联系的一位克格勃情报员在晚年回忆：

我们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情报部门的功劳。而且，我们不仅取得了战役的胜利，还摧毁了德国人的信心，因为通过菲尔比，我们得到了太多的情报，英国人用恩格玛机破译的德方密码情报，均被菲尔比截获。所以，他们对德军部署及作战计划有了相当的判断。应该说，丘吉尔先生已经就其中某些问题和斯大林先生做了沟通，但其中大部分情况他们并未涉及，不过，得益于菲尔比的情报，我们获取到了德军关于这次战役的所有情报。

菲尔比的这些情报，对于苏联来说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因为他的情报，苏军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对德战争胜利后，盟国几乎在顷刻间反目成敌。苏联迫切想知道英美的每一个意图，作为未来谈判的砝码。

菲尔比向克格勃发来了及时的报告：美国决定对日本进行核打击，英国也企图用这次核轰炸对苏联进行震慑。菲尔比的情报使斯大林掌握了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从而胸有成竹地与他们周旋。

“伏尔科夫危机”

然而不久，伏尔科夫案件发生了，菲尔比差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945年8月的一个早晨，菲尔比刚在办公室坐下，局长就把他叫过去，让他看一份文件，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汇报材料。里面讲了这么一件事：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有一位名叫康斯坦汀·伏尔科夫的副领事，他向英国总领事馆提出，要和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他说他公开身份是副领事，实

际上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的情报官员。伏尔科夫说如果同意他到英国政治避难，他将详细提供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以及苏联在国外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声称自己知道在英国的3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他强烈要求英国人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英国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外交部规定，只有能真正评定材料重要性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菲尔比看到这份材料大吃一惊，为了使思想平静下来，他有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

菲尔比对局长说：“这件事极为重要，我希望有点时间做些深入的研究，然后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局长要他回去认真地思考一下，明天一早就向他报告。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自己的办公室，告诉秘书除非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许打搅他。菲尔比觉得还有希望挽回局面，因为谈到潜伏的苏联间谍，伏尔科夫至今还是含糊其辞，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以

便与英国人讨价还价，这也使菲尔比有希望化险为夷。

他迅速地把伏尔科夫的情况向克格勃进行了汇报。

同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觉得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一趟，与伏尔科夫面谈，让他和他的妻子住进英国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秘密据点，然后设法把伏尔科夫偷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

第二天早上菲尔比向局长报告说，他们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这个案子可能很重要，但利用邮袋联系太耽误时间，他建议应该派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到现场处理这个案子。

局长说，他头天晚上在俱乐部里碰见了军情五处驻开罗负责远东地区情报事务的道格拉斯·罗伯茨准将。他打算把罗伯茨派到伊斯坦布尔负责处理伏尔科夫案子。对局长的提议，菲尔比没法提出反对意见。

午饭后，菲尔比回到百老汇的办公室，发现局长正在等着他。一见面局长就很失望地告诉他，罗伯茨有个克服不了的坏毛病，就是害怕坐飞机。他已经安

排好下周初从利物浦乘客轮回去，局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没办法使他改变计划。

这个结果正中菲尔比下怀，于是他直截了当地说：“准将有自身的困难，我只好建议由我替代他去。”

局长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

几天后，菲尔比坐上了飞往伊斯坦布尔的客机。在飞机上，他在思考到伊斯坦布尔后如何开展工作。外交部已答应由伊斯坦布尔英国领事馆副领事佩奇帮助菲尔比与伏尔科夫重新建立联系并安排见面。同伏尔科夫见面时，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做陪同和翻译。让菲尔比感到焦虑的地方是谈话有使馆秘书在场，如果伏尔科夫为了达到能来英国的目的，讲出在英国政府机构中苏联情报人员的姓名，秘书把事情传了出去就十分麻烦，他也可能会暴露。菲尔比决定首先做的是稳住使馆秘书，使他明白自己的职权范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他没权同伏尔科夫直接谈论情报方面的问题，而他到伊斯坦布尔的任务就是要阻止伏尔科夫谈这方面的情况，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由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来审问他。如果伏尔科夫真露出什么惊人情报

来，菲尔比则会暗示秘书伏尔科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细，在情报的真实性还未确定之前，此事属于国家绝密，绝对不允许外传。

到达伊斯坦布尔以后，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伊斯坦布尔情报站站长麦克雷详细讨论了这次行动的计划。菲尔比决定，第一步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而最理想的联系中介自然是英国总领事馆的佩奇。

第二天清早，麦克雷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提出希望当天下午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约伏尔科夫会面。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最后确定在佩奇的办公室，认为那里是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因为日常佩奇同伏尔科夫有领事事务来往，最自然的办法就是由佩奇请伏尔科夫到他的办公室来谈谈。

佩奇拿起话筒，拨通了苏联总领事馆找伏尔科夫，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含含糊糊的声音。佩奇一脸迷惑，挂断了电话，说：“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

佩奇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

就是伏尔科夫。这个人哪里是伏尔科夫啊！我同他交谈过几十次，对他的声音十分熟悉。”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是接线员的声音，说伏尔科夫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她还替自己连接过伏尔科夫。

他们面面相觑，沉默了好一阵子。最后菲尔比说：“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明天我们再联系，碰碰运气。”他强烈地感觉到一定是发生了重大事情，而事态的发展对自己十分有利。当天下午，他给局长写了一份简短的密码报告，汇报了情况。

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佩奇对着话筒说：“喂，喂，请帮我找一下伏尔科夫。”接线员说：“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着便是“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佩奇仍不甘心，决定亲自去苏联总领事馆找人。不到一个小时佩奇就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他对菲尔比说：“真是活见鬼了，苏联总领事馆的人居然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伏尔科夫这个人。”

听到这个情况，菲尔比马上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克格勃接到了他发出的信息，解决了伏尔科夫的问题，这个案子已彻底了结了。

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的报告，认为这次任务的失败在于迟缓的邮袋联系方式。

获得列宁勋章

1947年5月，菲尔比被派往伊斯坦布尔，担任英国军情六处土耳其情报站站长，公开的身份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一等秘书。两年后，他接到伦敦的指示，派他到美国去任职。他当时就在主楼里工作，具体任务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长年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件。从此以后，他看到的每一张纸、听见的每一段话、参加的每一次会议，只要是他认为对苏联有用的，他马上就会告诉克格勃。北约和西方国家针对苏联的很多重要情报，就是这样经由菲尔比传到了克格勃。

菲尔比向克格勃报告说，对日本进行轰炸后，美国人已经不再掌握成品核炸弹，美国铀储备告罄，但在实验室中，核战争试验正在进行。菲尔比截获的情报被即刻报到莫斯科，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所以同时

报给三个人：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人民内务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和国家元首斯大林。

在去美国前，英国一位反间谍老手跟他谈到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的情报活动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是英国驻美国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泄密。

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名单开列出来，与此案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重点嫌疑人是麦克莱恩。他是剑桥5人组的成员，现在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

菲尔比立刻向克格勃进行了汇报，并在华盛顿郊区与苏联联系人见面，通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苏联情报密码已破译完毕，麦克莱恩处境特别危险，必须立即作出决定。

1950年8月，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伯吉斯是菲尔比剑桥时的好友，也是剑桥5人组成员。当年，菲尔比把伯吉斯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军情六处作为回报。两人曾在军情六处一起共过事，他

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就会暴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暴躁的脾气使他在大使馆的工作很不顺利，他嚷嚷自己也不想干了，急于回伦敦去。

3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亚连续3次超速开车，使得州长对有人如此滥用外交特权提出强烈抗议。加上他不检点的生活作风，比如与同性恋来往，在盛大的外交聚会上调戏美国情报官哈维的妻子，因此，英国大使要求立即把伯吉斯调走。1951年4月，伯吉斯接到通知，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了。这也正合伯吉斯和菲尔比的心意。

菲尔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了营救计划的每个步骤。他要伯吉斯到伦敦后先要和苏联联系人接头汇报全部情况，然后带着写有约会时间和地点的纸条去办公室找麦克莱恩，再次碰头时就把他所面临的危险处境全部告诉他。

菲尔比心里十分清楚，在调查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的时候势必会怀疑到他。他决定化被动为主动，用提供帮助解决英国大使馆泄密案件的办法，设法转移对

他的怀疑。伯吉斯起程回伦敦后，菲尔比给局里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他们不必对大使馆的雇工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这样做只是浪费时间。应该从苏联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供词入手，把他所提供的资料与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间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对一下。

军情五处听从菲尔比的建议，把克里维茨基的供词跟大使馆泄密问题的材料相互核对后，给菲尔比送来了一份6个人的名单，名单上就有麦克莱恩。此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从破译的苏联领事馆电文中也发现英国情报机构隐藏着一名代号“霍默”的苏联间谍，此人可以直接读到丘吉尔与杜鲁门之间的电报通讯，联邦调查局把目标锁定在麦克莱恩身上。

菲尔比立即同苏联人联系，催促他们抓紧时间营救麦克莱恩，更加希望伯吉斯早点行动。

一天清晨，军情五处驻美国代表佩特森给菲尔比打来电话，说刚接到伦敦发来的一份很长的特急电报，而他刚给秘书放了一周的假，问菲尔比的秘书是否有时间。听到这情况，菲尔比心都快跳出来了，肯定出了大事，麦克莱恩被捕了吗？他马上答应带秘书

过去帮忙。他若无其事地走进佩特森的办公室。佩特森脸色凝重，轻声说：“那家伙坐船溜掉了。”



列宁勋章为苏联的最高荣誉，早期为银质，后改为白金

菲尔比彻底放心了，但仍装出吃惊的样子：“是麦克莱恩吗？”

“是的。”佩特森回答说，“更糟糕的是，伯吉斯也跟他一块儿走了。”

后来菲尔比才知道，伯吉斯返回英国后将情况告

菲尔比拆掉了他房里的秘密通讯设备，将这些设备埋到乡村的一片树林中。他知道，自己肯定要休整一段时间，而且这段时间可能会拖得很长，虽然他值得怀疑的地方很多，但他们根本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这一点是最关键的。菲尔比决定继续潜伏下来。

事情果真如他所意料的那样，1952年，外交部把他召回伦敦，对他进行了秘密审问，虽然他们拿不出证据追究菲尔比的刑事责任，但菲尔比被迫离开了军情六处。

菲尔比重操旧业从事新闻写作。1956年9月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期间，他以《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周刊记者的身份前往中东贝鲁特工作，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

1962年，苏联情报机关的高级官员乔治·布莱克被捕，而他认识菲尔比。这一回，菲尔比被确认为苏联情报人员。

1963年1月23日晚，菲尔比在贝鲁特秘密失踪。

7月30日，苏联《消息报》报道，苏联政府宣布为菲尔比在莫斯科提供政治庇护。菲尔比出现在了莫斯科。他的叛逃轰动了整个世界，更让英美情报机构丢

尽了面子。

为了表彰菲尔比的功绩，1965年，苏联政府先后授予菲尔比列宁勋章、红旗勋章、人民友谊勋章等最高荣誉，并晋升他为克格勃上将。

此后，菲尔比在莫斯科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他出版的自传体小说《我的秘密战争》畅销一时。

1988年，76岁的菲尔比离开了人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苏联在莫斯科西郊的孔策沃烈士公墓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

菲尔比是苏联最成功的谍报人员，作为一名克格勃间谍，他在英国的情报中心潜伏了近30年。在“剑桥五杰”当中，菲尔比的表现被公认是最为出色的。从表面上来看，他是一个真正的英国绅士，工作也相当得力，如果他能够继续隐瞒身份的话，他或许能够创造一个奇迹——成为英国军情六处的领导人。

第八章 “剑桥五杰”之二：为信仰而战的间谍

剑桥5人小组的成员除了都是剑桥大学毕业、前途远大的社会精英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为了信仰而战。在为苏联提供情报的多年里，他们甚至不要一分钱报酬。他们互相掩护，互相配合，演绎了世界情报史上一段最神奇的故事。

“剑桥五杰”之盖伊·伯吉斯

在“剑桥五杰”中，人们一般习惯把盖伊·弗朗西斯·伯吉斯视为5人中的第一个。伯吉斯1910年出生于伦敦，父亲是一位英国海军军官，母亲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伯吉斯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20岁那

年，他考取了剑桥大学历史专业。在剑桥大学里，伯吉斯因帅气、聪明且喜欢社会活动而小有名气。

读大学期间，伯吉斯非常热衷于社会工作。剑桥大学里有个很有威望的左派组织，名叫“剑桥传道者”，成员都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伯吉斯就是其中的一员。后来，伯吉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读了不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向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当时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已经成功地把菲尔比招募了，正准备为菲尔比组织一个间谍小组，他们在伦敦一些高校秘密招募情报人员，条件是候选人必须信仰共产主义。这些被招募的克格勃间谍要设法进入英国的各个国家机关，或到英国情报部门中去。伯吉斯自然属于最合适的人选。大约在1933年秋天，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一起被秘密招募，开始了他们的间谍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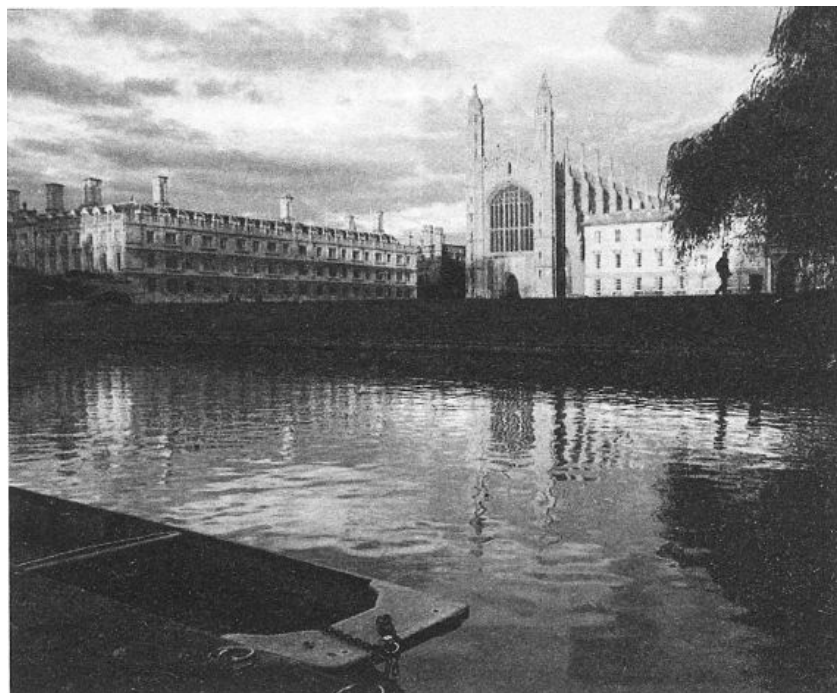
1934年6月，伯吉斯因病辍学。病愈后，伯吉斯进入新闻界，曾担任过英国BBC广播电台主持人，后来进入英国外交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伯吉斯在英国外交部办公室工作，做过英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秘书。

伯吉斯是“剑桥五杰”中第一个开展行动的人。

1938年，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在秘密行动局基础上成立D处时，他感到机会到来了。D处的秘密行动被称为“在非和平时期以不使用武力为手段向潜在敌人进攻”。英国未参战之前D处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各种可能性”，它所找到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利用无线电电台向德国进行无线电转播。由于具有在BBC的工作经验，以及在秘密情报机构的各种关系，伯吉斯很自然就成了D处的理想候选人。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伯吉斯凭借自己的魅力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第一处（政治情报处）副处长。

伯吉斯最初显然不具备情报工作的经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伯吉斯提供的开展“积极行动”的方案一般都要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有一些伯吉斯提供的计划方案常使苏联情报部门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比如伯吉斯曾经提供了一份在德国实施暗中破坏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由D处制定的，它被视为破坏“齐格菲南部防线”方案，可是执行人员却是两名被遣送回国的德国人，他们之中一个人完全失聪，另一个人几乎失明。



世界一流学府——剑桥大学

总的来说，伯吉斯最初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菲尔比也调到了他那里。

二战开始的头几个月，菲尔比以记者的身份在英军阿腊斯的参谋部度过。1940年 6月，法国投降并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菲尔比回到伦敦，并利用关系希望在英国情报机构谋职。曾任剑桥历史教授的弗兰克·贝尔奇负责国家通讯密码学校人员招聘工作。菲尔比没被录取。贝尔奇认为菲尔比不适合破译情报的工作。沮丧的菲尔比只好等待时机，寻求新的应召途径。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盖伊·伯吉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菲尔比突然被召去谈论“军事工作”（指的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话除梅克富小姐外，伯吉斯也参加了。

“由于伯吉斯出席，我开始尽我所能地自吹自擂，将我所认识的高层人物一一列举出来。他们俩时不时交换一下眼光，伯吉斯狡猾又充满鼓励地对我点点头。后来我才知道，我白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一切早都定好了。”

战争期间，伯吉斯与另一位“剑桥五杰”成员安东尼·布兰特爵士一起，将大量盟军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提给了苏联情报部门。他利用职务之便轻易地将外交机密拍成微缩照片提供给苏联情报机构。他提供的有关核心机密经常被摆到斯大林的大办公桌上。

“剑桥五杰”当中最先暴露的是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

194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一个神秘的电波从英国大使馆持续地向克格勃发送信息，并且持续有几年之久。美国特工发现了三四个嫌疑人。其中一个便是麦克莱恩。麦克莱恩处境非

常危险。在菲尔比的帮助下，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一起失踪了。直到1956年两人在莫斯科露面，人们才知道，他们早在1951年的时候就跑到了莫斯科。

伯吉斯到了苏联后，因为思乡而酗酒，最后于1963年去世。

“剑桥五杰”之唐纳德·麦克莱恩

“剑桥五杰”中第二个人名叫唐纳德·麦克莱恩，1915年出生。麦克莱恩的父亲是一位自由党派的政治家，曾担任过英国教育委员会主席。麦克莱恩在中学时就认真地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考入剑桥大学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两人经常在一起热切地讨论当前的时政问题。

1933年秋，麦克莱恩和伯吉斯一起被苏联克格勃秘密招募，开始了他们的间谍生涯。

1935年10月，麦克莱恩进入了英国外交部，成为“剑桥五杰”中第一个打入英国政府要害部门的人物，他先后担任过英国驻法国、美国、埃及等国的外交官员。

令克格勃没想到的是，麦克莱恩后来竟被调到英

国情报五处（反间谍）和六处（对外情报）担任重要职务。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机会。从1944年开始，麦克莱恩在英国驻美国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那时正值二战时期，丘吉尔与罗斯福和杜鲁门之间沟通的文件等极有价值的资料都被他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莫斯科。因此，斯大林对英美之间的情况非常清楚，苏联与英美外交上往往能占据主动，麦克莱恩功不可没。



被英国军情五处监视的麦克莱恩的住宅

麦克莱恩对苏联情报部门的最大贡献是向苏联报告了英美有关核武器研究的进展，同时提供了美国的铀储备量的准确数字。有了这些数据，苏联科学家能准确地计算出美国人可以制造多少枚原子弹。

麦克莱恩还最早向苏联透露了“马歇尔计划”的真正企图。“马歇尔计划”本质上是个一石数鸟的妙计，其核心就是通过该计划替代德国的战争赔偿，以美国金融势力集团主宰欧洲重建，严重打击苏联经济。

《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公告》中明确了苏联从德国获得的战争赔偿，可以用德国的机器设备、工业企业、汽车、轮船、原材料等形式来支付，当时苏联的战争损失极其严重，几乎丧失了出口赚取外汇的能力，因此德国的战争赔偿将成为苏联经济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外部资源。“马歇尔计划”的核心就是变相废除德国对苏联的战争赔偿，代之以美国向欧洲提供金融援助。虽然表面上该援助同时也向苏联和东欧开放，但“马歇尔计划”所提出的经济自由化等条件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从而间接将苏联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正是麦克莱恩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马歇尔计划”的底牌。苏联不仅拒绝加入该计划，同时还强力阻止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并且加速从德国运走各种重工业装备，从而避免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1951年5月25日是麦克莱恩38岁生日，已经暴露的他和伯吉斯一起逃到苏联，获得了苏联克格勃的上校军衔。据说，麦克莱恩后来加入了苏联科学院进行研究工作。

“剑桥五杰”之哈罗德·金·菲尔比

哈罗德·金·菲尔比，早年信仰共产主义，1934年加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他从事间谍活动30年，创造了间谍史上种种奇迹。这位“鼯鼠中的鼯鼠”被西方间谍问题研究专家一致公认为20世纪最出色的特工。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局局长雷昂尼德·谢巴尔申少将说：无论以任何尺度来衡量，菲尔比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剑桥五杰”之安东尼·布兰特

安东尼·布兰特出身于英国典型的上层社会，刚满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被任命为英国驻巴黎大使馆神甫。他的家搬到了法国巴黎，在巴黎平安温馨地生活

了10年。受父母的影响，布兰特从小就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从外表看安东尼·布兰特是一个感性十足的艺术家的，与冷面理性的间谍格格不入。但在1935年，布兰特去了苏联，被招募为苏联间谍。

苏联情报组织要求布兰特用两年时间打入英国安全局。1939年10月布兰特来到明利梅诺参加为期五周的培训班，主要学习一些军事侦察基础知识。毕业时，他获得了战地警备队大尉称号，前往法国。

布兰特从法国写信给伦敦，抱怨他的工作毫无意思，请求英国政府把他安排进秘密情报机构或英国安全局。布兰特的朋友维克多·洛希尔在英国安全局工作，他把布兰特介绍给盖伊·里德尔——B局局长（反间谍局）。虽然英国安全局对布兰特的底细还不清楚，但里德尔还是把他留了下来。布兰特很快就开始工作：监视中立国的使馆，尤其是那些敌对国情报机构可能感兴趣的使馆。他的出色才能逐渐得以显露，布兰特很轻松地博得了英国情报局的好感。后来的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局长迪克·怀特回忆道：

他对所有上司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并

使所有人都喜欢上他。我喜爱艺术，他就常常在餐厅吃饭时坐到我身边大谈艺术。没想到后来他把我们都出卖了。他是个有教养、令人愉快的人，与他打交道我也感到很愉快。如果不亲自体验，你是无法理解被一个并肩工作的同事出卖的感觉。

安东尼·布兰特爵士也曾在英国军情五处从事情报工作，二战期间，将大量破译的德国军事情报提供给苏联情报部门。

二战结束前，布兰特被英国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国，寻找英国温莎公爵与希特勒之间沟通的可能性，并传递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德国亲戚之间的通信。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1956年，布兰特被英国王室晋封为爵士，成为可以自由出入王室的女王艺术顾问，后来又担任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英国科陶德艺术学院院长、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和英国皇家艺术院的院士，成为了一位艺术界的权威，是一位体面而受人尊重的艺术史专家。

1964年，一个曾在剑桥留学的美国人指认，布兰特曾招募他为克格勃工作，至此布兰特终于暴露了。

英国安全部门展开调查，但一直没找到确凿的证据。直到1979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点名布兰特曾是前苏联间谍，英国舆论哗然。在铁的事实面前，布兰特爵士最终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行为。

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为前苏联情报部门效劳时说：“30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觉得是共产党和俄罗斯建立起了一个唯一坚固的反法西斯堡垒，而西方民主国家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我相信如果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当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不久，布兰特的爵士封号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剥夺。但是，英国政府没有追究他的刑事罪责。也许，看在王室的面子上，政府不便下手。而后，布兰特一直在英国平静生活，1983年因心脏病在家中去世。

“剑桥五杰”之约翰·克恩克罗斯

“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成为世界情报界的一个重大悬疑。多年以来，人们对“第五人”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直到1985年，克格勃特工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到英国，撰写了一本《克格勃全史》，经他的披露，第五个人终于浮出水面。

剑桥五人组的第五个人名叫约翰·克恩罗斯，1934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在进入剑桥大学之前，他已经在巴黎加入了共产党，据说是先认识了布兰特，然后经过伯吉斯的介绍加入苏联情报组织，成为“剑桥五杰”之一。

1936年他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此后，他又在秘密情报机构、通讯密码学校任职。

1942年夏，当英国情报机构以密码形式发给苏联的情报数量大大减少时，约翰·克恩罗斯开始以明码提供情报。1942年 3月他成功地尝试了菲尔比两年前所未做成的事——他进入了英国政府通讯密码学校。虽然他在学校的时间不到一年，但他在学校的那段日子正是苏德战争的关键阶段。克恩罗斯的主要任务是截获、分析德军无线电通讯内容。

4 月30日，英国人将德军准备进攻库尔斯克高地的情报发往莫斯科，同时还有通过“谜语”截获的德军情报机构侦察到的在这一地区苏军力量的材料。克恩

克罗斯此时发送的情报不仅有截获的电文，而且还包括了英国行政部门有意略去的（担心会暴露情报来源）带有部队和分队部署的情报。

库尔斯克战役前最能吸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是有关德国空军的部署情况。苏联指挥部因为担心德军会在5月10日开始进攻，便在5月6日这一天，在从斯摩棱斯克到亚速海长达1200公里的地带上对德军17个机场进行了炮击。打击目标的选择是在克恩克罗斯所提供情报的帮助下制定的。德军损伤惨重，在5月7日和8日又继续对德军机场实施集中密集打击。这三次密集轰炸是二战期间苏联空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后来，戈尔斯基代表莫斯科对克恩克罗斯提供的情报转达了特别的谢意。

当时，克格勃第一总局是这么评价克恩克罗斯的：“除菲尔比外，克恩克罗斯的功绩与‘五杰’中的任何一个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盖伊·伯吉斯



安东尼·布兰特



唐纳德·麦克莱恩



哈罗德·金·菲尔比

“剑桥五杰”中的四人

至此，“剑桥五杰”已经全部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他们给世界间谍史留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对于“剑桥五杰”来说，他们投身于克格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把在共产国际队伍当中和法西

斯主义进行秘密战斗，看做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来追求的。他们甚至拒绝接受苏联政府的经费和酬劳。除了信仰，他们别无所求。

第九章 “金唇行动”：“国徽”窃听四任美国大使

监听与监视一直是苏美之间间谍战的重头戏，曾演绎出不少精彩的故事，“金唇行动”作为一次近乎完美的窃听行动是苏联特工引以为荣的惊世之举，也是美国中情局的耻辱，并成为世界间谍史上屈指可数的经典之作。

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各主要战场形势发生根本转折，盟国已经取得战略进攻的主动权，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成定局。美、英、苏三国首脑于1943年11月12日至12月1日在德黑兰举行会晤，商讨加速战争进程和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德黑兰会议结束后，斯大林

预见到战后世界格局将发生变化，今后的矛盾将是美苏两大集团的斗争。

斯大林回到莫斯科立即召见苏联秘密警察头目贝利亚。斯大林说：“贝利亚同志，如何能及时准确地获得美国对苏情报，事先掌握美国人的动态？”贝利亚脑子反应极快，也可能早已思考过这个问题，他答道：“斯大林同志，办法是有的，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手段对美国大使阿维列拉·卡里曼的办公室进行窃听。斯大林同志，这事我去办。”

窃听专家们开始绞尽脑汁，设计窃听使馆重要位置的行动方案。贝利亚于12月17日向斯大林报告说，针对美国使馆专门研制的窃听设备搞好了，并顺利通过检验，性能“无与伦比”，功效“令人称奇”。

这种特制窃听器被命名为“金唇”，将被安放到美国大使办公室里，这次行动也被命名为“金唇行动”。“金唇”窃听器在当时的确代表了世界顶级水平，它不需要电池，也不需要外来电流，当时的反窃听设备不可能捕捉到任何信号。“金唇”可以接收到300米以内大耗电量振荡器所发出的微波脉冲，理论上讲“金唇”工作寿命可以无限延长。从外表上看，窃听器就像

一个带尾巴的蝌蚪。

要将“金唇”安放到大使办公室并非易事。为此，苏联特工费尽心机尝试了种种办法，比如，曾在美国使馆内制造了一起火灾，但是那些扮成消防队员的特工始终没有机会进入卡里曼大使的办公室。

最后，苏联特工想出将窃听器藏在礼品中送给美国大使。于是，几十种贵重工艺品送进了克格勃高官的会议室，经过精心筛选，黑色檀木制成的斯基泰盾牌、两米长的猛犸象牙、瑞典国王送给尼古拉二世的象牙电话机以及用象腿骨制成的一米高的纸篓被确定为“金唇”载体。

贝利亚特地请来窃听器研究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贝尔格和伊奥费对选定的礼品进行最后检验。两位专家检测后一致认为，这些礼品无法胜任运载“金唇”的使命，最佳选择是根据“金唇”的特殊性能制作相应礼品。贝利亚接受了两位专家的意见，并指示礼品制作与窃听器安装工作要同步进行。



藏于美国国徽中的“金唇”窃听器

1945年2月，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面。克格勃决定抓住这一机会实施“金唇”计划，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找个合适的理由把美国大使哈里曼从莫斯科引到克里米亚。撒个甜蜜的谎言，这对贝利亚来说太简单了，很快苏联特工制定出一整套诱引方案。

2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布消息，苏联将要在黑海之滨举行“阿尔台克全苏少先队健身营”开营典礼，苏联少先队员向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丘吉尔首相发出敬请光临的邀请。请柬中十分动情地写到，诚挚感谢两位政治家在战争期间对苏联人民的帮助。苏联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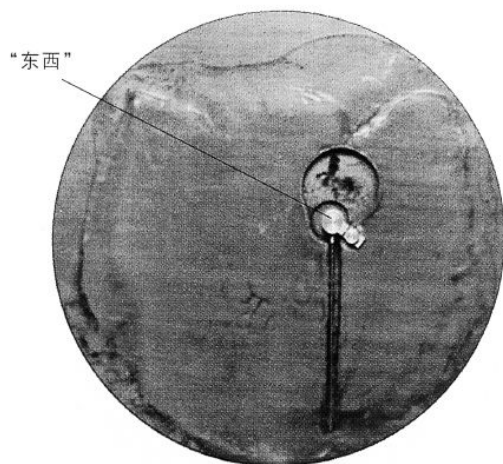
道美国人单纯，爱出风头，不会轻易放过表现自己的机会。尤其孩子们的邀请是一向自我标榜“平等与博爱”的美国人绝对不会拒绝的。苏联特工也预料到，当时二战进入决战时期，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不可能应邀而来，唯一办法就是委派其他官员前来参加孩子们的活动，而最合适的人选自然非两国驻苏大使莫属。

结果不出苏联特工所料，美国大使卡里曼与英国大使如期从莫斯科赶到黑海之滨出席开营典礼。

开营活动洋溢着热烈的友好气氛，孩子们热情地演奏了美国国歌，用英语合唱美国国歌，卡里曼大使完全沉浸在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之中。活动进入高潮，4名苏联少先队员抬着一枚制作精美的巨大木制美国国徽走到卡里曼大使面前，斯大林的私人翻译瓦列里·勃列日科夫马上向贵宾们介绍：这枚美国国徽做工十分考究，用料更是上等，整个国徽是由名贵的紫檀木、黄杨木、红杉木、柔美棕、波斯帕罗梯木、红木及黑木拼装而成。



国徽的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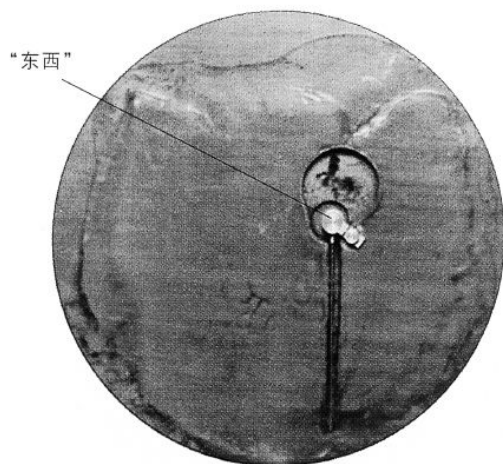


“东西”

国徽的背面



国徽的正面



“东西”

国徽的背面

制作工艺如此高超精湛，卡里曼大使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它放哪儿最合适呢？”勃列日科夫不失时机地低声对卡里曼说：“就把它挂在您的办公室，英国人肯定会嫉妒得发疯。”

1945年2月，这枚内藏苏联窃听器的美国国徽开始正儿八经地悬挂在卡里曼办公室，代号为“自白”的窃听行动便开始了。这枚国徽一挂就是8年，8年间，“金唇”送迎了4任美国大使。有意思的是，每一位新大使到任后从墨水瓶到地板全部要更换一新，但唯独没人动这枚美国国徽。为了与国徽相协调，甚至连大使办公室的窗帘家具色调也作了改变。国徽无与伦比的艺术气息与神圣地位，赢得了4位美国大使的钟爱，因此不可轻易变动。而在这8年时间里，“金唇”每时每刻都在为苏联人不知疲倦地工作，传送出了多得无法计数的机密情报。

美国中央情报局发现“金唇”窃听器后觉得是一种耻辱，一直羞于向世人公开。1960年5月，苏联击落由鲍尔斯驾驶的美国U-2高空侦察机后，华盛顿才公开“金唇”的秘密。当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卡勃特将

那枚精美的国徽和“金唇”窃听器拿到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会议上做了一番展览。

美国特工和英国特工也曾多次试图制作同样的窃听器，但都达不到预定效果，“金唇”的秘密技术无法破译。时至今日，苏联特工的“金唇”窃听器依然陈列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博物馆内。这次近乎完美的窃听行动既是苏联特工引以为荣的惊世之举，也是美国中情局的耻辱，并成为世界间谍史上屈指可数的经典之作。

第十章 千面间谍大师

克格勃一直以人才济济著称。克格勃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也一直受到同行的敬佩。20世纪最神奇的间谍大师威廉·亨利科维奇·菲舍尔就是其中的一个。

菲舍尔获得过列宁勋章，被称为“苏联英雄”。他的间谍人生非同寻常：二战时打进了纳粹德国情报机构核心部门；“冷战”时期，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14年。

这位当代王牌间谍深通谍术，善于伪装，精通六国语言，成功地扮演了各种不同角色。西方谍报机关称他为“千面人”。他在掩护自己的间谍身份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一

直被作为教育和培养间谍新手的教材。

天生一块间谍的料

2003年7月11日，俄罗斯对外情报总局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纪念100年前诞生的传奇优秀特工威廉·亨利科维奇·菲舍尔，远在大洋彼岸的菲舍尔昔日对手、美国情报部门的一名负责人也感叹说：“要是我们当年在莫斯科有三个像菲舍尔这样的特工，就会对苏联的情况了如指掌。”

20世纪20年代，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想要找语言人才以便培训去英语国家开展工作的间谍，有人向他们推荐了菲舍尔。

菲舍尔，1903年7月17日出生在俄罗斯高加索地区。他自幼天资聪颖，极富语言天赋；他的模仿能力也是一流的，各种各样的方言，他略加模仿都能惟妙惟肖。菲舍尔除了酷爱学习语言外，还对摄影艺术、绘画、音乐、文学感兴趣，尤其在摄影和绘画方面造诣颇深。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证件

伦敦大学毕业后他回到莫斯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里教外文，同时开设了英语、德语和波兰语的课程。尤其是他一口纯正的德语和一个地道的德国人一模一样，要不事先表明他的身份，人们很可能以为他是个德国人。

1925年，他应征加入了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军区第一无线电团服役，学习无线电机务技术，成为军队里一名无线电技师。

1927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发现了菲舍尔的语言天赋，招募他去当英文教员，用他地道的英语培养那些即将到英语国家开展工作的间谍。同时，情报部门对他进行了长期的秘密考察，认为他是个难得的谍报人才。5月7日，他被吸收进情报机关接受训练，以便去国外从事秘密工作。他改名为鲁道夫·利贝尔。

1936年，菲舍尔被任命为一所专门为秘密情报站

训练无线电操作员的一所学校校长。

1939年底，德军侵入波兰后，菲舍尔受命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开展对德国的情报工作。1940年初，菲舍尔在克格勃的安排下迁往苏维埃立陶宛共和国首都里加。户口簿上记载，他是一个地道的德国人，父母在俄罗斯双亡，自己曾是汽车修理工，只身一人无处投靠，于是决定迁居里加，开一家汽车修理厂。

到里加后，菲舍尔立即加入了德国少数民族俱乐部。当时盖世太保通过这个俱乐部秘密地建立起第五纵队，并审查每一个新来德国人的档案。菲舍尔对纳粹主义表现了很浓厚的兴趣，很快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

菲舍尔在里加结识了年轻的工程师亨里希·施瓦茨科普夫，两人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亨里希也是德国人，父亲是德国一所大学里的电子学专家，1940年初被人野蛮地杀害了。叔父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是柏林盖世太保的一名上校。

亨里希获得苏联当局同意迁居德国的签证，前往德国柏林。克格勃觉得这是菲舍尔打入盖世太保的绝好机会，就派遣菲舍尔与他一起乘火车西行。

亨里希因为有叔父帮忙，在德国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里谋得一份差事，从事帝国情报工作。而菲舍尔也由于亨里希叔父的过问和作保，在盖世太保的一个部门谋得了开汽车的一份差事。

1941年 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菲舍尔被编入作战部队派往东线。一次，菲舍尔所在的部队在作战中将苏军包围了。激战中，苏军一辆坦克突然冒死突围。德军情报局头目施坦因格里茨认为这辆苏军坦克一定携带重要文件，所以才企图突围寻求援助。因此，他命令德军炮兵集中火力攻击，这辆坦克很快被击中了。施坦因格里茨立即命令突击小组冲上去，到坦克内搜取文件。



耀武扬威的盖世太保们

此时，苏军阵地上强大的火力压过来，德军突击队员尚未接近坦克就被一批批打死。见此情景，菲舍尔判断这辆坦克非同一般，一定肩负着特殊使命，里

面一定有重要文件，他担心苏军文件会落入德国人手中。菲舍尔要求加入突击苏军坦克的战斗。得到批准后，他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爬了两个小时才钻进坦克。里面的乘员已经全部阵亡，菲舍尔在死者身上找到文件立刻将其销毁了。

他爬出坦克朝内扔了一颗手雷，引爆了里面的炮弹，彻底摧毁了坦克。在往回爬时，他的腿部中弹受伤。

菲舍尔这一勇敢表现不仅保护了苏军重要文件，使其免落敌手，同时他的勇敢也增强了盖世太保对他的信任。为此，他得到了一枚德国勋章。

1942年秋天，莫斯科把一份有关亨里希父亲情况的材料交给了菲舍尔。材料详细叙述了亨里希的父亲鲁道夫·施瓦茨科普夫的死亡经过：鲁道夫的弟弟维利想发展他加入纳粹组织，但遭到鲁道夫的拒绝，并且不答应把苏联边境地区的无线电通讯和一些重要材料交给纳粹分子。于是，维利·施瓦茨科普夫下令打死了哥哥。杀害自己的兄长后维利又假装真诚，把侄子亨里希接来，介绍他参加了希姆莱的党卫军帝国元首保安队。亨里希对父亲的死一点都不知情，一直为自己

有一个纳粹军官的叔父而自豪。

亨里希对纳粹德国当权者很不满，经常流露出对苏联的好感与热爱，通过立陶宛里加的旧关系，他开始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代表联系。

这一天，在约定的时间亨里希赶到见面的地点，却遇见了菲舍尔，他大吃一惊，感到不安，转身就想溜走。菲舍尔望着他的背影，心平气和地说：“莱茵河。”亨里希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这是联络暗语，于是回答：“伏尔加河。”两人相视一笑，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们沿着莱茵河慢慢散步，菲舍尔拿出那份关于他父亲被害的材料给他。亨里希了解了真相后情绪异常激动，他恨恨地说：“猪狗不如的畜生，他必须去死。”菲舍尔劝他这仇一定要报，但在目前的环境下需要冷静下来，希望亨里希同他合作，并肩与法西斯分子战斗。就这样，亨里希成为菲舍尔的一位得力助手。

巧设“掉包计”

1943年秋天，希姆莱的得力干将、海外政治情报

处头目、党卫军准将瓦尔特·舒伦堡向军事情报局要一名年轻的军官，直接归他领导。条件是：此人是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并且具有从事间谍活动的才能；受过高等教育，精通几国语言，而且禀性谦逊；还必须是纯种雅利安人，对元首绝对忠诚并且是经过考验的纳粹党员。结果菲舍尔被选中了，所有这些条件他都符合。舒伦堡准将不仅是希姆莱的副手，而且掌握着德国的整个情报网。菲舍尔当了他的副官后升任为党卫军中校。他向莫斯科总部报告了自己的新职务。

1944年初夏，德国陆军参谋长克莱勃斯将军与军队情报部门制订了一个“旋风—南方”计划：组织突击小分队秘密深入苏联后方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把首次打击的目标定在苏联喀尔巴阡山地区。在那个地区已集合好一支由30人组成的战斗小分队，德军准备空投施瓦茨堡上尉去担任突击小分队的指挥官。

这一天，舒伦堡给菲舍尔打了一个电话，要他立即前往负责国外活动的特别作战部，该部头头马尔策上校请他到柏林措森火车站接一个人。作战部领导克莱茨告诉他，他要接的那个人就是被派到俄国后方执行重要任务的施瓦茨堡上尉。

菲舍尔开着小汽车直奔措森车站。正赶上车站遭到盟军飞机的轰炸，四周到处是爆炸声。菲舍尔赶紧奔向四号车厢，见到一个身穿德军上尉制服的人手里拿着一只很大的黑皮包。菲舍尔走过去说“旋风”，那个人一听站起身来，跟着菲舍尔下了火车。菲舍尔让施瓦茨堡上尉坐到后排，然后驾驶小汽车快速离开轰炸区，到了安全区域，菲舍尔把车停下来回头看看坐在车后面的上尉，发现上尉已经被弹片炸死了！

菲舍尔立即给马尔策打电话，报告措森火车站正在遭受轰炸，施瓦茨堡不知去向。这消息引起一片惊慌，施瓦茨堡的皮包里有“旋风—南方”行动计划，而特别作战部没有人认识施瓦茨堡，手头又没有他的照片。

菲舍尔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策划一场大的行动。他在一个路边报亭停下车，这个报亭是菲舍尔的联络点，他向店主卡尔买了一份报。卡尔从菲舍尔那里接过一张折了两折的马克。菲舍尔悄声说：“这个，今天要发出去。”然后他故意兜了几圈，在市郊一幢灰色的楼房旁边停下车。27岁的米歇尔是房子的主人，也是菲舍尔从事情报工作的得力助手。菲舍尔和米歇尔仔

细研究了施瓦茨堡黑皮包里的“旋风—南方”计划。考虑了各个方面的情况，最后决定由米歇尔冒充施瓦茨堡上尉空投到苏联境内，配合苏联安全部门把这个行动小分队一网打尽。

菲舍尔匆匆赶回特别作战部向马尔策汇报。菲舍尔说，很有可能在混乱中施瓦茨堡上尉没有等接他的人赶到，自己到柏林来了。正说着，秘书报告，施瓦茨堡上尉到了。上尉走进办公室，向他们叙述了措森火车站遭轰炸，由于站内没有防空设施，他只好跑出车站搭了一辆卡车来柏林。

此时，卡尔向莫斯科发出秘密电报，报告了他们截获的德军“旋风—南方”行动计划的详细内容，并向莫斯科汇报了他们谍报小组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得到了总部的大力支持。

特别作战部也向德军小分队发出电报，要他们做好准备迎接指挥官施瓦茨堡上尉。在苏联喀尔巴阡山区，德军小分队克里格尔中尉回电：“一切准备就绪。”

柏林机场，马尔策上校和克莱茨送“旋风—南方”小分队指挥官进入机舱，飞机很快消失在天空。在

返回的路上克莱茨说起在喀尔巴阡山临时领导行动小分队的克里格尔中尉认识施瓦茨堡。听了这句话，菲舍尔为之一震，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克里格尔一看来人不是施瓦茨堡上尉，那事情就彻底败露了。米歇尔的处境十分危险，需要设法帮助他。

这时，在俄罗斯喀尔巴阡山区一个偏僻的小村里，克里格尔中尉和伙伴正在等候施瓦茨堡的到达。村口一身村民装束的德军上士发现沿着小路走来一位苏军中尉军官，背上背着一只挎包。那个军官看见了上士就停下来，笑着问道：“小伙子，请问看林人谢苗·马卡罗维奇住在哪里？”

这是接头暗号，上士马上回答说：“谢苗·马卡罗维奇去里沃夫了，3天以后才能回来。上尉，你终于来了，克里格尔中尉正在等你。他说与你是老朋友，在波兰一起打过仗。”

米歇尔大吃一惊，表面不露声色，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冒死拼一下。他们来到村庄，一走进屋里就看见克里格尔中尉。克里格尔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克里格尔熟练地从桌上操起一支自动步枪，嚷了起来：“这个人不是

施瓦茨堡上尉，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安静点，中尉，我当然不是施瓦茨堡上尉。总部临时改变了决定，命令马上就到，你们可以去核实一下。”

克里格尔轻轻地放下自动步枪，问道：“你的名字和军衔？”

米歇尔说：“党卫军上尉弗里德里希·博勒。”

克里格尔冲着报务员大叫：“伊万，你立即去问问总部。”

这时，米歇尔只有孤注一掷了，他相信菲舍尔会想尽办法挽救他，要是柏林来电对他不利，他就准备拼死一搏了。

这时在柏林，特别作战部值班报务员托斯克正在值班。菲舍尔已在电台前守候了6个小时，托斯克突然听到“旋风”的呼号，说：“‘旋风—南方’出现了。”菲舍尔说：“我来记录。”报务员口述道：“‘旋风—南方’指挥官是否换成了博勒上尉，是否把指挥权交给这个新来的？”

菲舍尔篡改了电文中的内容，并将“博勒”的名字换掉了。然后拿着电报稿走到隔壁房间里，对马尔策

上校说：“‘旋风—南方’来电了。”马尔策把电报看了两遍，疑惑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菲舍尔机敏地答道：“上校先生，我认为是克里格尔不想交出指挥权，他没有做好行动的准备。”马尔策点点头，说道：“立即回电，指挥权交给新来的指挥官。一切按原定计划执行，立即开始行动，随时报告战斗情况。”

在柏林作了证实以后，米歇尔接手了小分队的指挥权，行动小组准备执行任务。与此同时，喀尔巴阡山地区内务人民委员会反情报部门负责人麦尔尼钦科少校得到苏军比斯特罗夫将军的一道命令，要他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于当天18点以前消灭“旋风—南方”小分队，但不能伤害小分队指挥官杜蒂斯中尉，并要保证把他安全地带到他那里。

在通往前线的一条公路上，德军小分队大部分人扮成已经缴械的德军俘虏，米歇尔和几名军官身穿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制服，押送着俘虏，正沿着公路向后方走。紧靠米歇尔身边的是一名手持自动步枪的上士。队伍后面跟着一辆蒙着篷布的农家大车，里面装着枪支和弹药。看到这支队伍远远地走过来，早已等候在路边的苏军麦尔尼钦科少校示意他们停下来，他

大声嚷道：“队伍指挥官，出列。”

米歇尔跑步过来敬礼：“我是杜蒂斯中尉！”

“证件呢？”

米歇尔从挎包里拿出证件。少校看完证件，把证件还给米歇尔。此时，少校与米歇尔闲聊起来，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递给中尉一支。米歇尔接过了香烟，但是没有点燃，而是放进了口袋。

米歇尔悄悄地对少校说：“西南方向五公里，报务员藏在村后的山洞里。少校同志，祝你一路平安！”他没把话讲完，因为他看见克里格尔中尉向他们走来。

米歇尔故意一个人走在队伍的末尾，他拿出少校给他的那支香烟，悄悄地弄开，抽出一张字条：计划在四公里处逮捕这批人。

远远看到隧道了，克里格尔中尉命令上士带七八个人去隧道埋炸药，把路过隧道的列车炸毁，这样，交通起码要中断10天。按照“旋风—南方”里的计划，当苏联人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地区，小分队再把横跨德聂斯特河的大桥炸断。

米歇尔和克里格尔中尉带着小分队走近隧道口，这时，大路两边树丛里出现了大批手持自动步枪的苏

联士兵，他们逮捕了克里格尔和伪装成俘虏的德军。与此同时，麦尔尼钦科少校带领部队包围了那个山洞。他们在山洞里抓获了德军报务员，从洞里搜出一只背囊，里面有一部无线电台。至此整个德军小分队被苏军一网打尽。

截获盖世太保的“冒名顶替”计划

一天晚上，菲舍尔在一家小咖啡馆里遇到了熟人哈克中尉。两年前，哈克在东线司令部当报务员，菲舍尔曾随党卫军高级军官到他所在的部队视察。当时正赶上苏军炮击，德军地堡被苏军炮弹击中，哈克被炸伤卡在倒下的几根横梁中间。菲舍尔冒着炮火把他拖了出来，一边趁机把掉在废墟里的密码本拿走了，而哈克却非常感激菲舍尔，因为他救了自己的命。

哈克见到菲舍尔非常兴奋，他紧紧拥抱了菲舍尔。哈克穿着盖世太保少校军服，看来他已离开国防军。那个夜晚，他们坐了很久，喝着酒，彼此倾心地交谈着。哈克很坦率，自吹自擂，大谈自己在盖世太保里的成绩。哈克说他在柏林的盖世太保总部大楼工作，如今他用化名秘密住在柏林市郊一幢有花园的房

子里。

几天以后，哈克邀请菲舍尔到他家去做客。他们坐在陈设豪华的客厅里，那里摆着许多艺术品。哈克夸耀说：“我亲爱的利贝尔，所有这一切跟这个房间里的一样东西相比，都算不了什么。”

哈克把他带到客厅角落的一只箱子前，弯下腰打开盖子，里面是一叠放得整整齐齐的档案。哈克平静地说：“你随便看吧，可能对你有用，里面有海德里希最重要机密名单档案。你知道名单上有些什么吗？里面有帝国首脑们的档案，从元首一直到缪勒。”

菲舍尔开玩笑说：“你准备写第三帝国史啊。”

哈克站起身，从箱子里抽出一本大相册，相册每页并排三张大照片，他打开一页相册，指着三张照片说：“这第一张是盖世太保的一位上校，第二张是达豪集中营里的一个犹太人，第三张仍然是那位上校，只不过进行了整形手术，使他跟那个犹太人的面貌相像。这本相册共有700个这样面貌相同的人。你现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菲舍尔平静地说：“缪勒在准备自己的地下力量。”

“对，是这样。”哈克点了点头说，“明天晚上，我如果没有回到家里，你就把箱子带走，算是我报答你救命之恩吧。”

菲舍尔问：“什么意思？”

“缪勒约我明天去见面，目的想让我也成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但是我不想干！”哈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郑重其事地说：“请拿着。到时你就把全部档案交给你的上司舒伦堡，他会把缪勒最机密的东西成为他囊中之物而感到高兴。”

为了使菲舍尔更信服，哈克叙述了一段自己耳闻目睹的怪事。哈克问：“你认识京特尔少校吗？”

菲舍尔点了点头说：“认识。”

“他死了。”哈克继续说下去，“那一天，他们为他举行了葬礼。公告里说他在柏林一次车祸中丧生。我们都去参加了葬礼，并献了花圈。我喜欢京特尔这个人，所以葬礼举行的那天晚上我决定到他家里去一趟，把留在我这里的嘉奖令送给他家里人。

“我走进京特尔的家门，他们看见我来了几乎都感到惊奇。我也感到奇怪，他们的情绪都很好，没有刚刚失去亲人的那种悲伤。我把嘉奖证件交给京特尔的

老婆。突然，我发现烟灰缸里有一支正在冒烟的雪茄。我知道，他们全家人只有京特尔一人抽雪茄。其实只是‘京特尔’这个名字死了，京特尔已改变面貌成为另外一个人了。”

制造面貌相同的人，这是盖世太保的一个庞大的计划。他们把一些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或其他犯人，公开宣布恢复他们自由，其实将他们全部秘密杀害。然后，挑选出一批盖世太保骨干分子，通过整容手术制造出面貌相同的人，冒名顶替潜伏到民间社会。除了核心的人员外，谁都不知道盖世太保有这样的诊所。他们制造面貌相同的对象，是那些没有任何亲友的集中营犯人。盖世太保那些一丝不苟的专家们在这件事上是不放过任何细节的。显然，缪勒预料到这场战争将输掉，从而着手准备盖世太保的地下活动网。这个活动网由1000名特务组成。

第二天晚上，菲舍尔在住处给哈克家打了两次电话，没有人接。假如哈克出事了，菲舍尔必须赶在盖世太保前面拿走箱子。但如果当晚去，又可能落入圈套，盖世太保也会急着找到哈克的住处。凌晨4点，菲舍尔给哈克家打了最后一个电话，仍然没有人接听，

于是开车前往哈克的住宅区。他把车停在路边树荫下，然后慢慢地步行到大门口。窗户一片漆黑，花园里寂静无声。菲舍尔仔细观察四周的动静，确信附近没有人时，就开了门摸黑走了进去，又观察了一会儿，看看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就跑进客厅抱起那只箱子，快步走出门，开车回到家里。

他把箱子里所有的重要资料用缩微相机依次拍下来。然后，他撬开地板，把箱子放进去。过了几天，他找个机会把相册原件交给舒伦堡，得到这些极其珍贵的材料，菲舍尔得到了舒伦堡更大的信任。

第三天，菲舍尔开着车拐到报亭，他把一个装着微型胶卷的纸袋留下，店主卡尔顺手给了他一份报纸。菲舍尔看到头版下角刊登了一则哈克的讣告：哈克少校“因车祸受伤过重当场死亡”，报纸刊登了汽车相撞的图片、撞坏的汽车和哈克的尸体。

哈克是真的死了，还是以另一副面孔出现在别的地方，这对于菲舍尔来说仍然是个谜。

不久，苏军逼近柏林，在攻克柏林的隆隆炮声中，菲舍尔神秘地失踪了。

几天后，一架军用飞机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

降落，菲舍尔从飞机上走下来。在机场迎接他的只有他的妻子和一直与他保持联系的莫斯科总部负责人。

千面间谍

二战结束后，苏美关系大大激化，“冷战”开始。美国作为苏联的最大对手自然也成为苏联情报机构的首要目标。美国计划对莫斯科实施核打击，同时对苏联展开大规模的谍报活动。苏联特工部门面临的任务是，必须选最得力的人员打入美国内部，以便获取核打击预警情报和新式核武器的生产装备情况。菲舍尔再次被选中。1946年，菲舍尔在国家安全部特工局局长科罗特科夫的亲自监督下开始接受严格的特工训练。

1947年，在完成特殊训练后，菲舍尔被安插在一个德国难民营，伺机打入美国。

他以画家和艺术摄影师的身份，先抵达加拿大。1948年11月，菲舍尔从加拿大魁北克出发到达蒙特利尔，乘船在纽约登岸。

11月底，苏联特工格里古列维奇与菲舍尔在纽约秘密见面，他给了菲舍尔1000美元，三份以埃米尔·罗

伯特·戈德富斯身份开具的文件，包括真实的出生证明、伪造的征兵卡和纳税证明。这样菲舍尔摇身一变成了戈德富斯。而真正的戈德富斯1902年8月2日出生在纽约，14个月时就夭折了。

苏联情报部门这一次没有安排他搜集情报，给他的指令是做好长期隐蔽的准备，组织一个庞大的间谍网。

起初菲舍尔在纽约百老汇附近的一家旅店安顿下来，在杂耍游艺场找到一份工作。由于菲舍尔多才多艺，为人诚恳，他所住的那家旅馆的员工很快就喜欢上了他，把他看成是最好的客人。他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和魅力，善于接近人，直率开朗，对人宽厚谅解。

在这段时间菲舍尔搜集了很多有关核设施的情报，寻找并策反能够获得这方面信息的人员，寻找并恢复同战时特工的联系。因工作出色，他于1949年8月荣获红旗勋章。

1952年，菲舍尔以画家和艺术摄影师的身份，在布鲁克林租了一套公寓，并在五层楼上布置了一个工作室。菲舍尔在绘画方面有很高的天赋，从小就喜欢涂鸦，在意大利一年多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用在绘画

上。因此，他在纽约的公开身份是一名画家。如果菲舍尔深夜楼上还亮着灯光，或者房间里有谈话声，一般来说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会理解为艺术家习惯夜生活。

菲舍尔经常出入于画廊和艺术博物馆，经常对当时的流行画派作品品头论足，俨然一副专家的派头，他推崇拉维坦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也毫不隐瞒自己不喜欢抽象派绘画作品的态度。他曾对另一位艺术家说：“你知道吗，我认为绝大部分现代艺术都正在走向死胡同。”

菲舍尔画室的马路对面就是美国司法部大楼。从自己的窗口他就可以直接观察到出入这幢重要大楼的美国最有地位的一些人。

这一年，菲舍尔向莫斯科报告，需要一名助手协助他。不久莫斯科就安排了一个名叫雷诺·海哈南的克格勃中尉做他的助手。1952年10月，海哈南的妻子留在莫斯科，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安排一个女人假冒他的妻子，海哈南偕他的“新婚妻子”来到纽约。

一个多月后，菲舍尔在指定地点给海哈南投下了第一封指示信。信是拍成微型胶卷藏在一枚空心镍币

里的。

10月22日，海哈南在纽约中央公园散步，随意走上一条小街，在格林餐厅旁边的路标牌上，按上了一个不显眼的红色图钉。这是莫斯科给他规定的联络信号。但奇怪的是，海哈南一直没有找到这封信。

1953年8月的一个晚上，菲舍尔终于和海哈南联系上了。但是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没有好印象。

1954年春，海哈南接到菲舍尔的命令，将潜伏在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克格勃特工的报告放进秘密信箱，以便克格勃纽约情报站能取走这份报告。海哈南竟然没有把报告送到，如此简单的任务都完不成，菲舍尔十分恼火。

不久之后，菲舍尔让海哈南收听莫斯科电台，将克格勃总部对他们的指示抄录下来。海哈南说这项工作他做不了，因为他压根儿没有学过莫斯科秘密电码，菲舍尔大为惊讶，很不高兴地说：“你究竟能干点什么？知道莫斯科电码，这是情报人员必备的最基本的知识。”

菲舍尔看见海哈南整日闲逛，无所事事，很不利于长期潜伏。如果没有个合适的身份做掩护，说不定

哪一天会出事。菲舍尔听海哈南吹嘘过他的照相技术如何高超，就出资让他在新泽西开一家照相馆。开始营业后，菲舍尔发现海哈南是在胡乱瞎吹，这种技术很难有顾客上门。

1956年，菲舍尔从莫斯科休假回到纽约，设法与海哈南联系，消息发出去了，投递点上没有回应，也不见任何联络信号。过去了大半年时间找到了海哈南，原来照相馆开了一个礼拜就关门了，他自己跑到墨西哥旅游去了。菲舍尔这回没有发火，反而笑笑说“辛苦了”，心里却想好了处置他的办法。几个月后，莫斯科来电，指示海哈南回国休假，同时将其军衔晋升为少校。海哈南听到晋升的消息，十分惊讶，自己来美国这么长时间没搜集到一份有价值的情报，间谍没有发展一个，可以说一事无成，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更别说做出成绩，立下功劳。而且他早就看出菲舍尔对他印象不佳，如今反而为他请功升官。细细一想，海哈南惊出一身冷汗，这样做只是稳住他，回到莫斯科等待他的可能不是升官，而是严厉的处罚。

海哈南打定主意不回莫斯科。菲舍尔给他买好

票，给足旅费，但几次他都找借口溜掉了。1957年4月，菲舍尔亲自把他送上开往巴黎的“自由”轮船，到了勒阿弗尔，他与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弄到200美元。但他没有去莫斯科，而是直奔巴黎，决定到美国大使馆自首，投靠西方社会。

1957年4月26日，海哈南走进了美国驻法国大使馆，提出要面见使馆安全官员。他结结巴巴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说自己是克格勃潜伏在纽约的间谍，他的上司叫戈德富斯，掌握着一个庞大的间谍网。关于戈德富斯更详细的材料，海哈南也无法提供，因为菲舍尔十分谨慎，从不向任何人提供自己的地址，不向任何人谈自己的真实姓名。海哈南说，只知道他住在布鲁克林。

早在195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已经有了一个线索。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布鲁克林，一个名叫詹姆斯·博扎的13岁男孩，卖完当天的报纸回家，边走边把玩手上的一枚5美分的硬币。一不小心，硬币掉在地上不停地滚动，他追上去，用力一脚踩住。他拿起这枚硬币时，发现这枚硬币已裂开了，而且像一只小盒子那样可以关上，在硬币里面装着一小卷微型胶卷。

报童觉得很奇怪，有些害怕了，不知道硬币里藏着什么秘密，就把硬币交给了警察局。他们把那卷微型胶卷冲出来后，发现上面书写着一系列数字。情况很清楚，这些数字是电报密码，藏着重要的机密，但无奈破译不出来，警察局把微型胶卷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

直到海哈南投靠美国，自称是苏联克格勃特工，联邦调查局才想起那卷至今没有破译的胶卷，就拿给海哈南破译，也顺便检验一下他是真克格勃还是个冒牌货。微型胶卷上的内容破译出来了，就是那封戈德富斯写给海哈南的信，只是海哈南一直没有收到。

在布鲁克林，围绕小詹姆斯卖报的地区，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缩小包围圈。不久，画家埃米尔·戈德富斯就成了重点嫌疑对象。



传送情报的硬币

菲舍尔此时已经接到国内的通告，海哈南没有回到莫斯科，直觉告诉他海哈南出问题了，自己有可能被出卖。因此，他决定暂不回到布鲁克林的工作室。

1957年6月27日，纽约市东28街5号累瑟姆大酒店，3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走到839房间门前。一位特工叩响了房门，一会儿门开了，3名特工立即挤了进去。一名特工说：“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戈德富斯先生，

希望你能同我们合作。”

菲舍尔很平静，一直沉默着。移民调查局的官员罗伯特·沙恩贝格走进房间，说：“戈德富斯先生，你是1948年用美国公民安德烈·凯奥蒂斯的护照进入美国的。”菲舍尔说：“是的。”沙恩贝格说：“戈德富斯先生，你本人并非安德烈·凯奥蒂斯，由于你非法进入美国，你被逮捕了。”

在菲舍尔住处，特工找到了密码本，从一支空心铅笔里找到18卷微型胶卷等不少证据。

1957年8月4日，纽约东区布鲁克林联邦大陪审团指控菲舍尔犯有如下罪行：一是从事搜集军事情报的秘密活动，并阴谋把军事情报交给苏联；二是非法进入美国。1960年6月，大陪审团的指控全部成立，威廉·亨利科维奇·菲舍尔被判处30年徒刑。

在狱中，菲舍尔情绪稳定，积极锻炼身体，他相信，一有机会苏联就会营救他的。果然，不久机会就来了。

1960年5月初，美国有报纸报道，一架U-2型气象飞机迷失航向，进入苏联上空，因而被击落，驾驶员鲍尔斯失踪。

5月9日，赫鲁晓夫宣布了美国U-2飞机的间谍飞行和这次飞行的不光彩的下场，并在《劳动报》上发表了被击落的U-2飞机的照片。最后，莫斯科宣布美国驾驶员鲍尔斯还活着，他已交代了U-2飞机执行的间谍任务。华盛顿被逼得走投无路，被迫承认U-2飞机是从事间谍飞行。

这时，华盛顿考虑是否建议进行间谍交换。联邦调查局希望菲舍尔最终会同美国合作，因此反对交换。中央情报局则想把自己的驾驶员要回来，以便了解1960年5月1日在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不远的苏联上空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最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意了关于交换间谍的建议，时间定在1962年2月的一天。



格利尼克铁桥因为当年美苏经常在这里进行间谍交换而被称为“间谍桥”

交换地点在波茨坦市格利尼克铁桥的两端，一侧是联邦德国，站着许多美国陆战队员，一侧是民主德国，集聚了不少苏联克格勃警察。菲舍尔坐在汽车里看见一座很大的铁桥，桥头有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英文、德文和俄文写着：“你现在进入美占区。”汽车停下，美国人中有人走下车，同站在那里的那个人交换了几句话，然后示意，让美方人员过去。个头高高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站在两个苏联人中间。

苏联代表大声地用俄语和英语喊着：“交换！”美国代表威尔金森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很快地宣

读，他证明菲舍尔已获释，文件是由约翰·肯尼迪总统签署的。菲舍尔跟威尔金森握握手，从容地走过两个地区交界处的白线。苏联同志拥抱了菲舍尔，他们一起走向铁桥民主德国一端。

58岁的菲舍尔回到了苏联，结束了在美国14年的间谍生涯。

美国一位著名政治家在交换仪式后感叹道：“我们用苏联的一条鲸鱼换来了美国的一条小鱼。”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为了表彰菲舍尔的卓越功绩，苏联最高苏维埃授予菲舍尔一枚列宁勋章，并命名他为“苏联英雄”。

克格勃曾经把菲舍尔作为“冷战”时期在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最成功的典型加以宣传。他的肖像也被永远地悬挂在对外情报总局的荣誉室内，供后来的特工们瞻仰和学习。

1971年，菲舍尔病逝于莫斯科。

第十一章 “燕子”行动：法国大使落入温 柔陷阱

1956年，戴高乐任法国总理已成定局，而戴高乐一旦入主爱丽舍宫，其亲密朋友莫里斯·德让很可能执掌法国外交部。于是克格勃制订了一个控制莫里斯·德让，从而影响法国外交政策的计划。

为了拿下法国大使，克格勃第二总局负责人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中将亲自出马，挑选组织“燕子”和“乌鸦”向法国大使馆挺进……

来自最高领导人的命令

1956年6月的一天，克格勃对外情报总局向尤里·

瓦西列维奇·克罗特科夫下达指令，设法收买法国大使莫里斯·德让。而且上司明确表示：这是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命令。

法国驻苏联大使德让是戴高乐将军的密友。当时，戴高乐任法国总理已成定局，而戴高乐一旦入主爱丽舍宫，德让很可能执掌法国外交部。克格勃知道把莫里斯·德让发展成间谍是难以办到的，但可以想个办法控制莫里斯·德让，再通过莫里斯·德让影响戴高乐和法国的外交政策。

那天，莫斯科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尤里·瓦西列维奇·克罗特科夫接到通知，立即赶往莫斯科旅社。他的上司、克格勃上校奥尼德·彼得洛维奇·库纳文约他在那里见面，说有重要的事情商量。克罗特科夫并不是克格勃的正式成员，他的职业是一个戏剧作家和电影作家，但他喜欢从事间谍活动，危险活动所带来的刺激令他兴奋。

克罗特科夫与克格勃很有缘分，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1936年给贝利亚画了一幅肖像，贝利亚非常喜欢。贝利亚执掌内务部后将这幅画像印制出来，挂满了苏联大小城市。由于父亲的关系，克罗特科夫结识

了不少克格勃朋友。1946年，克罗特科夫自愿成为一名特聘的克格勃人员。

库纳文见到克罗特科夫，很着急地说：“克格勃决定收买法国大使，命令来自最高当局，是赫鲁晓夫本人下令要把大使弄到手。”

克格勃这次之所以选择克罗特科夫来执行这个任务，是因为他经常以俄罗斯文化人的身份出现在社交场合，很容易与外国人沟通。在他的诱导下，已经有几十名外国官员和新闻记者被克格勃招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克罗特科夫是一位猎艳高手，一直在帮助克格勃物色可以用来勾引外国人的漂亮姑娘。

库纳文给克罗特科夫安排了具体任务，他说：“大使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我们先从他的外围开始，想办法搞定大使馆武官路易·吉博。你的任务是专门对付大使夫人，必须控制她，使她听从我们调遣。你必须把她弄上床。”

克格勃对法国大使莫里斯·德让的关注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早在二战初期，德让还是戴高乐自由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时克格勃就开始搜集有关他的材料，十几年的积累，有关德让的档案资料已经很丰富了。

1955年12月，德让被任命为法国驻苏联大使，克格勃就在德让的寓所安装了窃听器。

德让一行到达莫斯科后，克格勃就一直监视着他们，法国大使的司机、德让夫人的贴身侍女都是克格勃情报员。克格勃经过仔细调查，没有发现法国大使有丝毫不忠于祖国的倾向，但了解到已经56岁的德让大使对女色有着强烈的爱好。克格勃决定以此为突破口，双管齐下，用“燕子”和“乌鸦”向大使和大使夫人同时发动进攻。

几天之后，库纳文上校把克罗特科夫介绍给米沙·奥尔洛夫，此人是克格勃的情报员，负责勾引法国大使馆空军副武官路易·吉博的妻子吉内特·吉博。奥尔洛夫是莫斯科有名的美男子，是不少青少年作为偶像崇拜的歌唱家，有着吉普赛人的气质，勾引女人十分拿手。参加他们这次会面的还有一个克格勃中尉鲍里斯·切尔卡申，化名卡列林，冒充外交官。

两个月前，德让夫人和一群法国妇女去黑海某疗养地度假，奥尔洛夫和克格勃中尉切尔卡申奉命扮装为度假的单身汉跟踪到那里。在疗养地，切尔卡申制造了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德让夫人。大使夫

人玛丽·克莱尔年过40岁，但风韵犹存。

回到莫斯科后，他俩又常在外交场合见面。这时，库纳文上校指示切尔卡申邀请德让夫人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玩，以便克罗特科夫能有机会与德让夫人相识。德让夫人与丈夫商量后接受了邀请，并表示要带吉博夫人和使馆另一官员的女儿同行。

克格勃为这次出游做了十分周密的安排，库纳文征用了一艘高功率警艇。警艇经过油漆和装修看上去像一艘游艇。克格勃特供商店给他们准备了羊肉、酒、水果等。在游玩的过程中，奥尔洛夫向吉博夫人大献殷勤，克罗特科夫则主要与德让夫人交谈。他们一起游泳、野餐和愉快地聊天，大家都玩得非常尽兴。克罗特科夫与德让夫人关系密切，就像认识多年的老朋友。德让夫人郑重地邀请他们参加法国的国庆招待会，克罗特科夫和奥尔洛夫都欣然答应。

在国庆招待会上，德让夫人把他们介绍给大使，大使立即用流畅的俄语对他们表示欢迎。吉博夫人把克罗特科夫和奥尔洛夫领去见她的丈夫，吉博武官冷冷地看着他们，用一口标准的英语与克罗特科夫他们说话。克罗特科夫非常不舒服，感觉到吉博是一个不

好对付的人。

克罗特科夫与德让夫人之间的友谊日益发展，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乌鸦”行动进展顺利。克格勃决定对德让大使采取“燕子”行动，指挥“燕子”行动的是奥·米·格里巴诺夫中将，他是克格勃第二总局局长。

为了打进法国大使馆的社交圈，格里巴诺夫冒充苏联部长会议的重要官员奥·米·戈尔布诺夫与法国大使交往。克格勃少校维拉·伊凡诺维娜·安德列耶娃扮成格里巴诺夫的妻子。安德列耶娃雍容华贵，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是社交场上惹人注目的活跃人物。

克格勃的情报员、著名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夫妇与德让夫人是老熟人，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米哈尔科夫对德让夫人说：“这位是戈尔布诺娃夫人，文化部翻译，她的丈夫是部长会议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样的高官要人自然是德让夫妇希望结识的。安德列耶娃以她“丈夫”的名义邀请大使夫妇来府上做客，大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戈尔布诺夫夫妇的邀请。

落入温柔的陷阱

为了招待大使夫妇，克格勃主席谢罗夫把自己城

外的别墅借给了格里巴诺夫，作为“戈尔布诺夫”在莫斯科的公寓。克格勃的特工们分别装扮成苏联作家、艺术家、演员和政府官员们出现在“戈尔布诺夫”的别墅里，他们个个像绅士一样彬彬有礼，高雅而有教养，让德让夫妇觉得他们置身于一个欢快和谐的圈子里。格里巴诺夫像朋友一样经常与德让大使联系，也把一些对大使有用的内部消息透露给他。安德列耶娃也与大使夫人混得火热，常拉德让夫人到郊外去看乡间景色，使她慢慢习惯和丈夫分开活动。

克罗特科夫与德让夫人关系密切，彼此把对方称为最好的朋友。但德让夫人是个极其正派的女人，克罗特科夫一直无法与她发生肉体关系。

1958年初，格里巴诺夫中将决定将目标集中到大使身上，利用克罗特科夫和德让夫人之间的友谊，让克罗特科夫安排“燕子”诱骗德让大使。

莫斯科女演员莉佳·霍凡斯卡娅30多岁，长着圆溜溜的大眼睛，胸脯丰满，非常有魅力。她刚离婚不久，前夫是苏联驻法国外交官，曾随丈夫在巴黎生活过，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也非常熟悉西方那一套社交礼节。格里巴诺夫中将看中了莉佳·霍凡斯卡娅，认

为她是诱惑德让大使最合适的人选。当时法国很希望与苏联加强文化方面的交流，格里巴诺夫便利用法国人这方面的愿望，开展多种苏法文化交流活动，邀请法国大使参加，利用这些机会安排莉佳慢慢与德让大使接近。

在克格勃的直接安排下，苏联文化部出面举办了一次“吉赛尔”芭蕾舞影片专场放映会，邀请了大使参加。放映会是在一幢有着浓烈俄罗斯风格的大楼里举行，克罗特科夫主持仪式，莉佳作为翻译就坐在德让大使身边，有几次，她借倾听对方说话的机会，有意贴近大使。放映开始后，四周暗淡下来，莉佳轻轻地靠在德让身上，侧着头细声给大使介绍剧情，故意把头发拂在他的脸上。影片放映完后，主持人克罗特科夫又请莉佳为大使夫人当翻译，以便她们相互认识。

3天后，克罗特科夫给德让夫人打电话，说星期五晚上苏联民间文化交流协会将举办一个晚宴舞会，邀请她和她的丈夫参加。德让夫人与克罗特科夫已经是老朋友了，欣然应允。

克格勃包下了布拉格饭店的主餐厅。晚会的主要目的是为莉佳提供进一步勾引大使的机会。同时，库

纳文和克罗特科夫又另外安排了两只“燕子”，她们都不到30岁，金发碧眼，非常漂亮，作为后备力量以方便大使多样选择。姑娘们容光焕发，活泼可爱，她们围着大使大献殷勤，百般魅惑。这天晚上，德让大使玩得很愉快，为此邀请大家下周到大使馆吃饭。

在大使馆吃饭的那天晚上，德让夫妇非常随便，和蔼可亲，心情十分愉快。大家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欣赏古典音乐。德让夫妇还领客人们参观了整个大使馆。德让大使很开心地与大家聊天，他对几个女人都表示了好感。克格勃把宝押在莉佳身上，尽量制造机会，让她跟大使单独在一块。

克格勃新的行动开始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安德列耶娃邀请德让夫人一起去郊游。与此同时，在两天前，克罗特科夫给德让大使打电话，邀请他参加一个曾留学法国的格鲁吉亚画家的画展，大使很爽快地答应了。德让夫人一出门，德让大使也乘着大使馆的雪佛兰汽车来到展览会场。克格勃仍然安排莉佳担任大使的翻译，她和克罗特科夫在大门口迎接大使，德让大使与莉佳已见过面，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彼此问好。参观期间莉佳一直陪伴在德让大使身边。

参观结束德让准备离开，莉佳说：“大使先生，请您把我顺便带到我的寓所，是不是太麻烦您了？”大使回答说：“我感到很荣幸。”

克格勃特意为莉佳准备了一栋独立的小楼，汽车到了小楼前，莉佳示意雪佛兰汽车停在路边，莉佳没有立即下车，而是轻声细语地说：“大使阁下，进去喝一杯咖啡吧，体验一下苏联普通市民的生活，您不会拒绝吧？”

德让大使一愣，没有吱声，但还是跟着莉佳下车了。德让大使从莉佳的住处走出来，已是两小时之后。莉佳马上向库纳文报告，她与大使已经发生了性关系。库纳文指示莉佳：“进一步加深与大使的特别关系，但有时要摆点谱，不要显得他随时都可以接近你。更重要的是，要让大使相信，他在莫斯科干这种事很安全。”克格勃眼下还不想借此事讹诈德让，让德让尽管放心大胆地享受俄罗斯美色。

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可以说一切进展顺利，但这时候库纳文上校发现了一个问题：利用莉佳与大使上床这件事能够损坏德让大使的名声，甚至可以搞臭他，但无法以此讹诈德让大使，因为莉佳是一个离婚

的女人。必须让德让大使与一个有丈夫的女人搞上，至少要大使知道姑娘有丈夫，后面的戏就好演了。

1958年5月，克格勃认为戴高乐任法国总理已成定局，于是加快了对德让大使的行动，他们要想方设法抓住这条大鱼。库纳文说：“这件事一直是很重要的，现在它的重要性更增加了十倍。”克格勃决定把莉佳从这一行动中撤出来，因为她现在没有丈夫，而她的前夫在巴黎又很有名，法国大使馆可能有人知道她已经离了婚。她按照库纳文的吩咐，告诉德让大使她将离开莫斯科一段时间，为一部影片拍摄外景。

格里巴诺夫中将从德让大使曾接触过的女演员中选定洛拉来代替莉佳。洛拉不仅有一张漂亮的脸，还有一双修长的腿和丰满的胸脯。此外，她身上还有一股无所顾忌的野性。洛拉在莫斯科没有居住许可证，更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房，过着很不稳定的生活。克格勃向她许诺，如果你与我们紧密配合把事情搞成功了，我们负责给你弄到一间住房。而且干完这件工作以后我们决不再麻烦你了。

克格勃为她编造了如下背景：她丈夫是一个机械工程师，目前被派往外省，正在参加一个大项目建

设。库纳文特地提醒洛拉，在她和德让大使的关系到了一定程度时，必须找个合适的时机向大使透露她的丈夫是个无比嫉妒而又十分残忍的人。

在克格勃的安排下，在一个外交酒会上，在克罗特科夫介绍下，洛拉认识了德让大使。洛拉确实是个火辣厉害的角色，不到一个月她就和德让发生了性关系。此女子极度疯狂，床上功夫了得，把德让大使弄得神魂颠倒，与莉佳相比，他们的关系更热烈。洛拉完全征服了大使。

通过洛拉的温柔陷阱实施对德让大使的控制，前后进行了两年多。格里巴诺夫中将认为到了收网的时候。当他们得知德让夫人外出度假时，克格勃立刻安排洛拉躲起来，不让德让找到。原先那些常与大使见面的漂亮姑娘也集体消失了，克格勃设法让大使接触不到任何一个女人。

克格勃戏弄大使

格里巴诺夫中将从外地调来一个高大剽悍的克格勃军官米沙，让他住进莫斯科旅社等候命令。克格勃的技术人员在洛拉的隔壁安装了无线电监视器，组织

了几个监视小队，轮流监控洛拉和大使的所有行动。10天后，克罗特科夫打电话给德让：“大使阁下，明天周末，玛丽又不在家，我们一起出去野餐怎么样？我要带一个女伴来，另外还有洛拉，她刚回来。”德让大使听到洛拉的名字，想到与洛拉幽会的欢乐，马上就同意了。

格里巴诺夫中将在莫斯科饭店召见库纳文、洛拉和米沙等人，他对库纳文和米沙说：“我要你们把他痛打一顿，真正让他感觉到疼痛，要让他吓破了胆。但我警告你们，不允许打坏他。”

第二天早晨，克罗特科夫和他的女友乘车在前面，德让和洛拉的车紧跟其后。克格勃早在他们经过的地带布控，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车子很快出了城区，直往郊外驰去，在一个紧临小溪的树林旁，他们停下车，然后开始野餐。

按照预先计划，傍晚6点前德让他们必须赶到洛拉的住处。克罗特科夫见时间差不多了就建议回去。在离城还有七八公里的地方，德让大使的车停了下来，克罗特科夫很紧张，担心发生意外，急忙下车跑过去询问是怎么回事。德让大使说：“没什么，一切都很

好。洛拉突然想要去那边的池塘游泳。”

克罗特科夫气得快要发疯了，这女人太任性了，他极力克制住自己的怒火，跑过去劝说洛拉：“亲爱的，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干吗要到这么肮脏的臭水坑里游泳呢？”

洛拉大概刚才喝了酒，极度兴奋，她一边脱衣服一边狂笑不止。她没有游泳衣，穿着一身浅色内衣，从水里冒出来如同赤裸，看似一丝不挂。

洛拉是个极有心计的“燕子”，她借酒兴故意在池塘游泳，把德让大使撩得心神荡漾。一进洛拉的住处，德让大使就将她紧紧地搂住。洛拉见机说：“莫里斯，有件事我忘记告诉你了，我接到我丈夫的电报，他这几天就要回家了。”

已经晕了头的德让欲火难熬，哪里管得着其他的事，抱起洛拉宽衣解带。

格里巴诺夫守候在窃听器前，焦急地等待洛拉从卧室发出信号，然后通知米沙和库纳文动手。洛拉终于说出了暗号语，米沙和库纳文立刻向洛拉的房间跑去，迅速用钥匙开门。

“是我丈夫！”洛拉惊叫起来。

“我坐了一天飞机，赶回来和你见面，可你干的是什么事啊！你是这么欢迎我的？”米沙暴跳如雷，“老子宰了你们！”

洛拉哀求道：“哦，米沙，我求求你，他是个大使，你不能动他。”

米沙怒骂道：“我管他是谁！”说完，他扑向德让，抡起拳头猛揍起来，洛拉也挨了几下。她不停地大声尖叫：“住手！你要打死他了！他是法国大使啊！”这时，库纳文走过来，自称是米沙的朋友，劝阻住了米沙。米沙仍然愤愤不平，扬言要去告发大使，不把他搞得驱逐出境绝不罢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的丑事。德让大使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地听着，极力保持着绅士风度，优雅地穿好衣服走了。

德让大使一头倒在汽车的后座上，对司机说：“开车，回去。”汽车发动了，他用双手紧紧捂着脸。

晚上8点，德让大使准时赶到格里巴诺夫的别墅，这也是克格勃计划好的，两天前格里巴诺夫就给大使打电话，约他参加今晚的宴会。宴会结束时已是深夜11点，客人们陆陆续续告辞了，德让大使故意拖到最后走。大使将格里巴诺夫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遇

上一件相当糟糕的事，我需要你帮忙。”于是，他讲述了自己与洛拉的关系，以及几个小时前所发生的事情。格里巴诺夫说：“这件事很麻烦，如果他向法院告你，在法律上洛拉的丈夫占上风。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他真闹得满城风雨，那就可能会断送你整个政治前途。”

德让说：“我只能依靠你去帮我摆平此事。你能给我的任何帮助，我都会万分感谢。”

格里巴诺夫答应一定尽力帮忙，因为他们是好朋友。

接下来几天，格里巴诺夫一直和德让大使联系，说已经多次找人去说情，并给这个男人施加了一定压力，但是这个丈夫很固执，死要面子。他安慰大使说：“虽然事情有点麻烦，请大使放心，我们警告他不要胡闹，不能破坏苏法两国关系。我们已经说服他了，他保证不再声张。这件事已经摆平了，应该没事了。”

由于捏住了德让大使的秘密，格里巴诺夫与他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大使对他感激不尽。克格勃则放长线以便钓大鱼，等待着有朝一日德让大使在

巴黎身居要位，再好好利用一下。因而格里巴诺夫继续巩固与德让的友谊，对他极力笼络，百般优待，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只是德让大使做梦都没有想到，与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格里巴诺夫竟是克格勃第二总局的将军。

洛拉悄悄地消失了，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库纳文授意下，莉佳又出现在德让大使身边，浪漫的法国人从未怀疑过莉佳，不知不觉向莉佳透露了不少对克格勃有价值的情报。

1958年，路易·吉博上校和夫人吉内特被调离莫斯科，但是不久又被调了回来。通过暗藏在他房间里的窃听器，克格勃获知，这对夫妇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克格勃马上意识到有机可乘，还是使用老办法，让吉博与几个女人交往，直到其中一个终于和他勾搭上为止。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962年夏天。有一天，三个穿便衣的克格勃找到吉博，态度强硬地拿出一套他与那个女人私通的照片，告诉他要么秘密地与克格勃合作，要么准备公开受辱。吉博上校被此事闹得心神不宁，最后精神彻底崩溃。1962年7月30日，吉博上校在办公室自杀身亡。

吉博上校的死大大地震动了克罗特科夫，他认为这实际上是一场谋杀。经过数月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秘密准备，1963年9月2日，他趁与一些苏联作家和艺术家出国旅行的机会投奔了英国，向英国情报机关展示了有关克格勃特工的相关资料，并揭发了克格勃对法国驻苏大使的所作所为。英国向法国和美国通报了情况。

1964年2月9日，巴黎《世界报》报道：莫里斯·德让大使即将从苏联回国。在德让大使的告别会上，气氛极为亲切，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德让大使在驻苏联的8年时间里和苏联一些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然而，德让大使一回到国内，就被法国领土监护局进行了审讯。

克格勃针对大使的秘密行动到此结束。

第十二章 绝美暗杀：他让世界胆寒

博格丹·斯塔申斯基是克格勃一名杀手，因数次暗杀行动做得干净利落，成为这一行的高手。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列平亲自授予他一枚红旗勋章。但他厌倦这种杀手生活，想做一个干干净净的平常人。20世纪60年代初，斯塔申斯基叛逃到西方，并第一次向世界公开了克格勃从事暗杀活动的秘闻。此事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

偶然做了克格勃杀手

1953年斯大林病逝后，苏联将国家全部和内务部合并为苏联内务部。1954年3月13日，苏联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决定成立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赫鲁晓夫任命谢罗夫大将为主席。

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推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新成立的克格勃不仅继承了其各个前身的国内安全和反间谍职能，而且把对外情报活动作为同美争霸的战略措施加以大力发展，把颠覆破坏、心理作战、劫持暗害等阴谋活动也纳入情报任务范围。克格勃的间谍们犹如一个个幽灵，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世界的各个角落。

克格勃的特工里人才荟萃，有百发百中的狙击手、艺高胆大的爆破专家、头脑灵活的电脑黑客，也有飞檐走壁的攀岩高手和“深海杀手”蛙人。克格勃的杀手们像幽灵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往往不动声色便置人于死地，像狼一样凶狠，像狐狸一样狡猾，他们屡屡成功的暗杀行动令世界胆寒。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个。

1931年5月，博格丹·斯塔申斯基出生于乌克兰西部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个老实勤奋的农民。村民信奉东正教，大多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斯塔申斯基从小聪明伶俐，性格内向。1948年4月，他从乌克兰利沃夫

大学预科班结业，接着在乌克兰利沃夫师范学院攻读数学。他未来的志向是毕业后回家乡做一名教师，挣钱补贴家用，减轻父亲的压力。

人的命运往往因一起偶然事件彻底改变。1950年夏，斯塔申斯基无票乘火车，被铁路部门捉住，车站勒令他去向利沃夫的交通警察局报告。当时任何乌克兰人听到这一命令都会害怕，因为交通警察局里设有一个苏联国家安全队，是苏联的一个情报机构。

按照指定时间，斯塔申斯基赶到苏联国家安全队，一个叫西特尼柯夫斯基的上尉接见了斯塔申斯基。上尉只字不提逃票的事，而是详细地询问斯塔申斯基的家庭和家乡的情况。坐在上尉面前，斯塔申斯基感到很不安，他觉得眼前这位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怪怪的，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果然，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告诉他，他的家庭成员卷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并警告他说，乌克兰人反对苏联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肯定会被逮捕、流放甚至被处决，融入苏联大家庭才是唯一出路。

19岁的斯塔申斯基很快明白了上尉的弦外之音，如果想保护自己的家庭，他必须向苏联提供乌克兰民

族主义组织的地下名单，以及他们活动的情报。只有这么做，他的家庭成员才可以免遭逮捕。

斯塔申斯基内心十分矛盾，自己为克格勃做事就是为国家效力，是正确的事情。但又想到自己是乌克兰人却去害乌克兰人，感情上又接受不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后还是在一份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书面声明上签了字，并发誓绝对保密。当时，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给他取了个化名，叫“奥列格”。

此后，斯塔申斯基遵照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的指示，把家乡发生的一切事件都记下来，定时上报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他偶尔得到小笔报酬，大多时候只是获得一些精神上的鼓励。

1951年2月，西特尼柯夫斯基指示他必须打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个组织的内部，设法弄清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谋杀诗人加洛斯拉夫·加兰的详细情况。

几天后，斯塔申斯基声称国家安全部门正在追捕他，获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的信任。后来，他向克格勃提供了谋杀加洛斯拉夫·加兰的人的名字。西特尼柯夫斯基对他的工作很满意，认为斯塔申斯基已具备成为一名优秀间谍所需要的素质。斯塔申斯基

也因提供的情报质量高而得到克格勃的赏识，他的名字列入了情报部门的薪金名册，开始正式发给他工资，月薪900卢布。这也意味着斯塔申斯基已得到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认可。

1952年，斯塔申斯基作为安全部门的正式雇员，被送往基辅接受特工训练。在基辅受训期间，首先由政治教官进行政治洗脑，学习德语。每天接受严格的间谍技能训练。1954年，苏联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KGB），原国家安全部并入国家安全委员会。两年间谍学习结业后斯塔申斯基正式成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东欧处特工。上司准假，他回家乡看望了父母，告诉家里人他在基辅工作。

1954年底，斯塔申斯基埋没自己的真实姓名，顶替一个叫约瑟夫·莱曼的人出现在生活中。莱曼1930年11月生于波兰陆柯维克村，日耳曼族人，已经病死在监狱。斯塔申斯基为了做得像真莱曼一样，在苏联和波兰情报部门的军官陪同下，用他小时候的名字“凯佐”到莱曼的家乡游览，去莱曼曾生活过的地方旅行，熟悉一切与莱曼有关的情况。最后，斯塔申斯基以莱曼的名字、身份被派往德国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

苏联控制区，接受克格勃将军塞尔盖·亚历山大洛维奇的领导。

1956年，他奉命前往慕尼黑监视那些敌视苏联的乌克兰流亡者。这些乌克兰人总是渴望独立。他监视的对象叫列夫·列别德，是《乌克兰独立报》的编辑。斯塔申斯基要尽可能掌握列夫·列别德所有的活动及日常生活规律。只要列夫·列别德一离开编辑部的办公室，斯塔申斯基便紧紧尾随。

第一次盯梢时，斯塔申斯基感到非常不自在，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自己，甚至感觉列别德已发现他了。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斯塔申斯基戴上了墨镜。他环视周围的人，发现只有他一人戴着墨镜，又感到不自在，结果又取下了墨镜。斯塔申斯基努力使自己平稳下来，慢慢克服了恐惧心理。他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掌握了列别德的一切活动及生活习惯，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间谍。

1957年9月，斯塔申斯基去向他的上司汇报工作情况。克格勃上司脸上带着神秘的表情对他说：“到动手的时候了，莫斯科来人了，你去见见他。”斯塔申斯基这时才知道，监视列别德的目的是为谋杀他做准备。

他一夜未合眼，心怀恐惧和不安，不知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官员会带来什么。

在柏林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斯塔申斯基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武器专家会面，此人叫塞尔盖，他给斯塔申斯基看了一件新式暗杀武器，该武器外表像是一根金属管，人的手指头粗细，长约175cm，由三节短管拧在一起而成。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玻璃针管里装有毒药。这种水雾状的毒药以气体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喷射出来，在大约50cm距离内将气雾射到人的脸上，这个人吸入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这种氰化物毒气杀人不留任何痕迹。

塞尔盖颇有些得意，他用手指在脖颈前一画说：“这气雾杀人不留丝毫痕迹，不可能查出是谋杀。”他当场演示了如何装拆射击喷毒枪，要求斯塔申斯基第二天必须亲自实习射击。

第二天，斯塔申斯基跟着塞尔盖走进附近一片小树林里。塞尔盖将他带来的小狗拴在一棵树上。然后，他给了斯塔申斯基一片防毒药片，并告诉他，在

执行暗杀任务前必须吞下防毒药片，不然，射击毒雾后自己也会倒地身亡。斯塔申斯基握着暗器，心烦意乱，手轻轻抖动，小狗舔着他的脚，无辜地向四周看着。他有点不忍，转过脸，在距离小狗大约40cm的地方发射了这种武器。没有任何爆炸声，小狗当即倒地，经过短暂的痉挛，毫无声息地死去了。塞尔盖又递给他一根玻璃针管，说：“发射这种武器后，你要立刻弄破这个解毒针管，吸它的气雾，这样你就不会受到伤害。”



毒气暗杀枪

塞尔盖离开东德的第二天，暗杀密令下达了，斯塔申斯基必须在10天内运用这种新式武器去执行刺杀列别德的任务。1957年10月9日，他从东柏林飞抵慕尼黑，按照塞尔盖教给他的办法，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片，然后前往卡尔斯普勒茨大街一带，等候列别德的出现。

10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列别德下了电车朝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的寓所走去，斯塔申斯基发现后，马上尾随跟着进了寓所门厅，同时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

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列别德毫无戒心，正从裤兜里拿钥匙，斯塔申斯基快步走到列别德身边，将武器对准他的脸扣动开关。没有惊叫声，也没有流血，只有列别德倒下去的沉闷响声。

斯塔申斯基立即冲向门外，在门厅里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他快速离开卡尔斯普勒茨大街，将那件武器扔进小河里。

斯塔申斯基不慌不忙地赶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在法兰克福待了一夜，第二天飞往东柏林。

列别德突然死在自己门前，引起社会各界种种猜测，有人曾怀疑是克格勃干的，但经法医检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问题。媒体报道，列别德死于突发心脏病。

获得红旗勋章

1958年5月，斯塔申斯基接受新的秘密任务。“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缔造者康诺瓦尔克上校被谋杀，他的追随者准备搞个墓前追思仪式。斯塔申斯基奉命前往鹿特丹，监视他们的行动。凡是参加仪式的

人他都拍了照。停在墓地外面的一辆挂着慕尼黑车牌的蓝色奥普·甲必丹汽车引起他的注意，他发现这辆车的主人就是追思仪式的主要演讲人斯捷藩·班德拉。班德拉不仅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慕尼黑的领导人，而且是乌克兰抵抗运动领导人中干劲最大、最杰出的一个，他与西方的联系也最密切。在克格勃计划干掉的乌克兰人黑名单中，班德拉排在最前面。班德拉人脉很广，背景复杂。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关一度都同班德拉有过密切联系。他在当地乌克兰移民中是一个颇具声望的人。



红旗勋章

班德拉对外使用“波普尔”的身份做掩护，此人行动诡秘，行踪不定，甚至连班德拉的手下也难以确切知道他的行踪。克格勃特工一直在寻找机会干掉他。

1958年末，克格勃头目向斯塔申斯基下达了监控

班德拉的命令。

斯塔申斯基根据上次墓地上拍摄到的照片和自己亲眼观察，牢牢熟记了班德拉的形貌和他那辆轿车。他几乎找遍了慕尼黑的大街小巷，终于有一天，斯塔申斯基发现了班德拉，并跟踪班德拉来到了慕尼黑克雷特梅厄街7号。在确定这就是班德拉的住所后，斯塔申斯基趁班德拉不在住所之际，利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班德拉的房门，搜查了班德拉的房间。斯塔申斯基把有关班德拉的详细情况报告了他的上司。

克格勃在最后下达必须杀死班德拉的命令前，斯塔申斯基奉命前往莫斯科。斯塔申斯基希望这次杀人的勾当别让他干，因为他恋爱了。

在柏林的一次周末舞会上，斯塔申斯基认识了一位21岁的德国姑娘，叫英格·波尔，后来他们相爱了。波尔和她全家都反对共产主义制度。斯塔申斯基担心，一旦波尔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会不再爱他。

莫斯科方面发现斯塔申斯基在偷偷摸摸地恋爱，这是决不允许的。但上司没有找他的麻烦，在一般情况下，像他这样严重违纪是要受到处分的。克格勃认为他是刺杀班德拉的最佳人选，必须让他把这件事做

完。

1959年4月，斯塔申斯基与英格·波尔秘密订婚了。

在莫斯科克格勃第一总局东欧处，克格勃将军格奥尔基·阿克森捷维奇接见了斯塔申斯基。将军告诉他，班德拉已经被苏联政府判处死刑，并决定由斯塔申斯基充当行刑者，干掉班德拉。斯塔申斯基很不情愿执行这个任务，又不敢公开推辞。他找借口兜圈子说，班德拉通常随身带一名保镖，他一个人执行谋杀任务有一定难度。阿克森捷维奇说已经考虑过这种情况，这次给他配了一支双管发射器，可以同时刺杀两个人。阿克森捷维奇特地介绍，那种暗杀武器在技术上比两年前有相当改进，以前使用的枪管射击后会洒出一些玻璃小片，现在已经不会了，现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斯塔申斯基返回慕尼黑后继续加紧跟踪班德拉，极力寻找下手的机会。1959年5月16日，机会出现了。这一天班德拉驾着汽车回来，将车停在路边，开门下车。斯塔申斯基紧紧握着大衣口袋里的武器，不知道是恐惧还是疑虑，或者是怕发射后被侦破。想到

自己和波尔的爱情，斯塔申斯基握着武器的手始终没有抬起来。他离开了现场，心情烦躁，很害怕克格勃的追查，懊悔自己胆小。他将暗杀武器扔进了古格尔穆尔河。

为了瞒过克格勃官员，斯塔申斯基设想出种种借口，而这些借口往往自相矛盾，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但莫斯科方面很平静，没有责备他，克格勃仍然不愿放弃对斯塔申斯基的希望。

10月，斯塔申斯基再一次接到必须杀死班德拉的命令。他心里明白再也躲不过去了。

1959年10月的慕尼黑，气候宜人，阳光柔和。斯塔申斯基靠在齐柏林大街67号对面的一个大门旁，手上拿着一份刚出版的报纸，看看报纸，又抬头看看蔚蓝的天空。出门前已经吞服解毒药片，此时正感到口干舌燥，斯塔申斯基努力让自己镇静，做出轻松的样子。他很清楚，班德拉知道自己的生命一直受到威胁，因此随时都处于戒备状态。

一辆蓝色奥普·甲必丹汽车驶近了67号大楼，车上下来的正是班德拉，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保镖。斯塔申斯基一下轻松了许多，他快步跟着班德拉进了

大楼。当他正要上楼梯时，一个妇女大声说着话走下楼。斯塔申斯基不能让这个女人看到他，于是，他迅速向电梯间方向走去。躲过了这个女人后斯塔申斯基慌忙爬上楼梯，来到班德拉门前，他看到班德拉的右臂上挎着一只杂物袋，正在用力抽着卡在锁眼中的钥匙。斯塔申斯基迎上去问道：“下班啦？”他永远忘不了那一瞬间，眼前闪过一丝白雾，班德拉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瞪着惊恐的双眼，立马失去了知觉瘫倒在地。

斯塔申斯基已经有经验了，他迅速拿出纱布包着的解毒剂，扭破口子吸入气雾。他环视四周，发现楼道上没有其他人，便不慌不忙地离开了这所房子。第二天，斯塔申斯基乘头班飞机飞往东柏林，马上赶到苏联占领军司令部，向克格勃上司报告他已完成任务。东柏林克格勃的负责人安德烈将军对他成功地完成任务感到非常满意，并且告诉他，莫斯科将授予他红旗勋章，要他前往莫斯科受勋。

接受红旗勋章，过去对斯塔申斯基来说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事，他连做梦都没想过能得到如此高的奖赏。可是想到要去莫斯科，他与英格·波尔的关系会得

到克格勃的认可吗？会强迫他们分手吗？斯塔申斯基不由心情沉重起来。他知道勋章只是一种虚幻的、毫无实际价值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可以过一种更美好、更自由的生活。

斯塔申斯基飞往莫斯科，克格勃情报总局技术处的官员询问了整个刺杀过程的每个细节。苏联人认为：“这次谋杀做得没有像上次那样完美无缺。”事后证明，克格勃的技术官员判断是准确的。西德警察当局对班德拉突然在门外死亡做了调查，并且在进行尸体解剖时，发现班德拉脸上有一道极小的划痕，而且残留着细微的玻璃碎片。西德警方开始怀疑是由氰酸致毒而死。

为了逃避西德警方追查，克格勃决定在事情平静之前，将斯塔申斯基留在莫斯科。12月，克格勃主席谢列平召见了斯塔申斯基，亲手授予他红旗勋章，详细询问了谋杀班德拉的经过和现场情况，并鼓励他干得不错，今后有更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去做。克格勃为他安排了18个月的军官训练，并让他开始学习英语，准备到美洲执行任务。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斯塔申斯基非常想念英格·波

尔。离开德国时他去跟波尔辞行，谎称去波兰出差，自己可能会离开很长一段时间。如今可能再也回不了柏林与波尔生活在一起。这时，他开始考虑要逃脱自己所厌恶的杀人行当，产生了逃往西方的念头。

这次来莫斯科之前，斯塔申斯基的柏林上司已向莫斯科打了报告，说他经常与一个德国女孩密切来往。为此，克格勃特勤处的官员对他提出忠告：这种爱情对一个克格勃情报人员来说是完全不适宜的，他不应该和一个外国女人结婚。然而，斯塔申斯基十分机智地辩解道，他认识这位女孩已经好久，如果就此将她甩掉事情将更难收拾。他同这个德国姑娘结婚可作为一种掩护而有助于任务的完成，同时也为他在西德的身份合法化打下基础。最后，克格勃特勤处的官员答应再仔细考虑一下他的建议。

他鼓足勇气直接向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允许他同英格·波尔结婚。谢列平起初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斯塔申斯基又重申了自己的理由：结婚更有利于他开展情报工作，能更好地掩护今后进行的暗杀活动，他的结婚是为了克格勃的事业。

最后，谢列平特批，同意他们结婚，但是有一个

条件，那就是必须让他的未婚妻英格·波尔来莫斯科，接受克格勃相关的调查，从而确保她的可靠性。

斯塔申斯基明白，一旦英格·波尔到了莫斯科就会被当做人质留在这里。斯塔申斯基思考再三，决定再冒死向克格勃上司建议：在没有摸清英格·波尔的真实想法前，不便叫波尔到莫斯科来，万一波尔反对他，不支持他的事业，那他就暴露了。

当时上司没有表态，说会周密考虑他的情况。那几天他忐忑不安，不过，这次他总算交了好运，他被告知可以回一趟东柏林，和波尔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同时必须问清楚，如果你们结婚，她是否愿意全力协助你的工作，如果她能保证，那你们就可以双双来莫斯科。但决不能把谋杀列别德、班德拉的事情告诉她，一点消息都不允许走漏。要是不能符合上面的条件，就不允许他们结婚。

逃往西方

1959年圣诞节，斯塔申斯基抵达东柏林。克格勃要他原地待命，等候总部指示。斯塔申斯基担心事情有变，心想必须尽早见到英格·波尔，彻底放弃杀手职

业，逃出克格勃的控制。斯塔申斯基决定再冒一次大风险。他故意绕了好几个地方，已有丰富特工经验的他知道如何甩掉跟踪，在确信没有尾巴后，他转向西柏林，径直朝英格·波尔工作的一家理发店走去。

斯塔申斯基推开理发店的大门，英格·波尔正在为一位顾客理发，当她看到朝思暮想的斯塔申斯基时，拿推子的手禁不住颤抖起来。她激动地投入斯塔申斯基的怀中，眼泪止不住地淌下来。

斯塔申斯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双面生活，他毫不顾忌地把她的一切全部告诉了波尔，只是那两次谋杀行动始终没有勇气说出来。他向英格·波尔表白，心中只想早些和她结婚，逃出这个令他恐惧的间谍圈子，和波尔一起生活在一个幽静的小村庄，拥有自己的家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波尔没有责备他的欺骗，反倒对他进行了安慰，并建议说：“既然你想逃往西方，为何不马上就走呢？”

斯塔申斯基说：“现在不能行动，我的一切都受到克格勃特工监视，稍微不慎我就会被克格勃找到并杀掉。所以一定要周密策划好每一步行动，否则会造成

无可挽回的损失。”

斯塔申斯基内心的西方世界不一定是西德等欧洲国家，他更想去美国过新的生活。因为在美国，离苏联会更远一些，自己也会更安全一些。

英格·波尔信任斯塔申斯基，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决心，开始为他们的出逃计划秘密地做准备。他们决定按照克格勃的要求去莫斯科，向莫斯科方面申请结婚。这样会有很大的风险，然而为了消除克格勃的怀疑，他们必须这样做。

英格·波尔假称去华沙出差，告别了父母，他们从波兰辗转来到莫斯科。他们在莫斯科待了两个月，上司好像把他们给遗忘了，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街上游玩，斯塔申斯基带着波尔走遍了莫斯科的每一条大街，有时他俩在公园一待就是一天。

克格勃对英格·波尔考察的结论是，此人天真而简单，对斯塔申斯基十分忠诚，他们结合有益于斯塔申斯基的工作，克格勃上司没有发现他们打算逃跑的企图。

有一天，克格勃特勤处官员给他们带来许多革命书籍，并宣布：经克格勃最高领导同意，你们被批准

结婚。

按照英格·波尔父母的意愿，斯塔申斯基和波尔的婚礼在西德的一座新教堂里举行了。克格勃不同意他们采用宗教式的婚礼，但斯塔申斯基强调，举行这种仪式他被怀疑为克格勃间谍的可能性就会小得多，他的上司又被他说服了。

1960年5月，他们接到克格勃的命令，返回莫斯科。

这次接见他们的是一个克格勃女官员，由这位女官员给斯塔申斯基培训德语，纠正他的音调。同时，斯塔申斯基还自学英语，为以后到美国生活做准备。波尔惊恐不安，十分不耐烦，催促斯塔申斯基快点采取行动。

斯塔申斯基显然是在犹豫，多年的间谍生涯使他非常清楚，如果他敢耍花招，无论逃到天涯海角克格勃都不会放过的。

9月，波尔发现自己怀了孕。他俩兴奋不已，经过一再争取，波尔得以返回东柏林待产。1961年3月31日，英格·波尔给斯塔申斯基发来一份电报，告诉他们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斯塔申斯基打报告给克格勃

主管部门，请求允许他前往东柏林探望妻子和儿子，上司断然回绝了他的请求，反而责备他说：“我们已经两次延长了你妻子在柏林的停留时间，现在她应该回莫斯科来。”

4个月后，英格·波尔打电报给斯塔申斯基，告诉他，他们可爱的儿子病逝了。接着，斯塔申斯基又接到他岳父发来的电报，沉痛地要求他参加自己儿子的葬礼，最后看上儿子一眼。斯塔申斯基用近乎哭泣的声音向上司诉说了这一切，要求前往东柏林。这一次上司口气终于软了下来，答应调查清楚他的孩子确系自然死亡后他才可以作一次短期的探亲。

8月10日，斯塔申斯基在一个名叫尤里的克格勃特工陪同下飞往东柏林。葬礼定于8月12日在靠近边界的达尔哥夫墓地举行。斯塔申斯基计划就在这一天逃跑。

葬礼如期举行，那一天英格·波尔表现得非常平静，在走向墓地的路上，她眼中噙着泪水，嘱咐她的16岁的弟弟弗里茨，待会儿他们要离开一会儿，不要发出声音大惊小怪。弗里茨有意把许多花圈摆在墓地周围。斯塔申斯基和英格·波尔借着花圈做掩护，来到

墓园尽头一所房子的后面，沿着旁边的栅栏，几乎是贴着地面爬行，避开了克格勃特工的视线，穿过一片灌木林，他们到达了安全地点。

两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西柏林的盖桑德布兰嫩车站。随即，他们找到西德政府相关部门，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寻求政治避难。他们终于成功了。

1962年10月19日，斯塔申斯基受到审判，他被指控谋杀了列别德和班德拉。因为是自首，他得以从轻处理。西德司法当局以间谍罪和杀人罪判处斯塔申斯基监禁8年。法庭特别说明：“本庭所做的判决，并非在毁灭被告，而是帮助被告赎回罪过。”

1968年新年前夕，斯塔申斯基被提前释放。为了防止克格勃追杀斯塔申斯基，美国人用军用飞机把他秘密接走，从此改名换姓在美国定居。

时隔40多年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SVR）派遣了一名特工，计划暗杀流亡英国的俄政府通缉要犯、前商界巨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这名俄特工计划在别列佐夫斯基到伦敦一家法庭参加听证会时，用一支灌有毒液的特制钢笔实施刺杀。然而，这名接受暗杀任务的特工十分不安，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使命，并向

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举报了此事。人们发现，前后两名投诚的特工所交代的暗杀手法有着惊人的相似。有人说尽管“冷战”结束已10多年，俄情报机关仍然没有放弃克格勃曾使用的暗杀“剪除异己”的方法。

第十三章 美国U-2飞机被神秘击落

1960年5月1日，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一声爆炸，号称“侦察之王”的美国U-2高空战略侦察机被击落，消息震惊了世界。有人说是用萨姆导弹打下来的，但当时苏联没有射程那么远的导弹；有人说是克格勃搞定的，U-2毁在一颗小螺钉上；甚至有人说，UFO导致了U-2飞机坠毁，“天外来客”帮了苏联的大忙。

U-2飞机究竟是怎样被击落的？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个不解之谜。

克格勃紧急受命

1960年5月1日，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业中心一声巨响，入侵的美国高空侦察机U-2凌空炸开。消息传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十分震惊：U-2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可达25000m，苏联当时尚未拥有20000m以上升限的歼击机，而地空导弹的射程也不够，U-2究竟是怎样被击落的呢？

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就使用飞机在苏联上空进行照相侦察，窃取苏联国防建设以及远程轰炸机、弹道导弹、潜艇和核武器等情报，但效果令人很不满意。后来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在苏联上空进行侦察的任务由美国空军移交给美国中情局。为此，中央情报局提出一个计划：制造先进的喷气式超高度侦察机来收集情报。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4年11月24日批准了该计划。

1954年12月9日，中央情报局同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签订了20架U-2飞机的合同。1955年7月15日，首架U-2样机按期完成，经试飞完全达到设计要求。该新型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可达25000m，是普通飞机的两倍以上，打破了由英国人保持的22707m升限的世界纪录。作战半径为3200公里，续航时间可达8小时。飞机

外表为了避免反射阳光涂成黑色，被人形象地称为“黑寡妇”。

1956年5月初，首批4架U-2侦察机开始服役，并由美空军C-124型运输机空运到英国。为了掩人耳目，美国对外宣称U-2是一种专为美国航空航天局服务的气象研究机，隶属于某临时气象侦察大队。6月11日，为了减轻外界对U-2的猜测带给英国的压力，同时也为了加快对北约国家进行侦察，U-2部队起程转移到德国法兰克福以西莱茵河畔的威斯巴登。到达威斯巴登不久，U-2换装了更强劲的J57-P-37A发动机，彻底解决了以前空中熄火的问题。

U-2飞机上的侦察工具起主要作用的是航空侦察照相机。它使用的是B型照相机，照相机透镜是由著名的莱卡公司研磨的。这种操作轻便、分辨率极高的拍摄系统放在狭小的舱内。理论上讲，U-2飞机每次出航，能在15000m高空拍下宽200km、长4300km范围内地面景物的清晰图像，可冲印出4000张照片用于情报分析。而且操作简便，只需使用一个通断开关就可控制。后来更新型的U-2飞机可以安装合成孔径雷达，穿透遮障侦察浅层的地下设施。还可以安装全景摄影、

多光谱分析仪，以及能接收雷达信号、通信信号的电子侦察设备等。

艾森豪威尔总统没有马上批准U-2侦察机对苏联进行高空侦察，但默认U-2侦察机先对苏联周边的东欧国家进行一些试探性侦察。1956年7月2日，两架U-2侦察机分别对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波兰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侦察，所拍摄的照片非常清晰。

于是，中央情报局再次请求艾森豪威尔批准对苏联境内进行高空侦察，中情局官员认为侦察行动不会引起美苏对抗。因为U-2侦察机如同空中幽灵，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高空间谍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无踪无迹，因为苏联人的雷达不可能侦察到56000m之外的飞行目标。此外，U-2侦察机所达到的飞行高度使苏联防空导弹和战斗机无法对其构成威胁。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态度终于开始松动，同意U-2侦察机可以先对苏联的边疆地区进行侦察，如苏联东北部的堪察加半岛、贝加尔湖和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

1956年7月4日，U-2侦察机从西德威斯巴登起飞，经过波兰波兹南市再飞向白俄罗斯，然后向北飞

到列宁格勒，再飞越苏联的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最后回到西德空军基地。这次飞行覆盖了苏联的明斯克和列宁格勒，那里有苏联的远程轰炸机基地、海军造船厂和军事训练场等重要军事目标。这是U-2 高空侦察机第一次侵入苏联领空。

7月5日，U-2侦察机又大胆地对苏联的基辅、明斯克、莫斯科等地进行间谍侦察，并拍摄到一批苏联首都的高空照片。通过照片，中央情报局发现了位于莫斯科附近制造米亚-4重型喷气轰炸机的飞机制造厂、位于卡哈姆科的火箭发动机厂和位于加里宁格勒的导弹工厂等重要军事目标。这是U-2侦察机唯一一次对莫斯科的侦察，驾驶员维托也成为了唯一驾驶U-2侦察机飞越莫斯科上空的美国飞行员。

事实上，U-2侦察机一进入苏联领空就被苏联防空雷达准确地捕捉到，而且苏联空军米格-19飞机也升空拦截，无奈最高升限只能达到18500m，远远掉在美U-2侦察机的下方，而U-2 高空侦察机轻松地在20000m以上高空飞行。同样，防空火炮对U-2侦察机也构不成任何威胁。



号称“侦察之王”的U-2飞机是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王牌间谍机

U-2高空侦察机第一次侵入苏联领空后，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立即得到报告。1956年7月10日，苏联就美空军侵入苏联领空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附上U-2侦察机入侵的详细路线图、机型。当时执行拦截任务的米格-19飞机无法靠近目标，驾驶员不能准确地观察，误认为侵入苏联领空的是美国空军某种双引擎中型轰炸机。

1956年7月19日，面对苏联政府的强烈抗议，美国人狡辩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的，目前没有哪个国家的军用飞机能飞那么高。随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对美国入侵其领空提出抗议。艾森豪威尔连忙召集中情局局长杜勒斯了解有关情况，并下令在没有获

得他本人批准的情况下禁止U-2飞机随意飞越苏联领空。总统虽然下令由他直接掌控U-2侦察机是否进入苏联领空侦察，但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严格执行，U-2侦察机对苏联的入侵依然时有发生。

1957年7月8日，一架从阿拉斯加埃尔森空军基地起飞的U-2侦察机对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侦察，这是U-2侦察机首次从美国本土起飞执行对苏联的侦察任务。1959年6月9日，U-2侦察机飞越苏联乌拉尔地区，对苏联的导弹试验基地进行了侦察。侦察结果显示，苏联正在扩大他们的导弹发射基地。

同年的下半年，美国U-2侦察机又多次对苏联进行空中侦察，拍摄到了苏联重要工业和军事设施分布的详尽情况。可以说，凡是苏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工业和军事设施，都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了解得一清二楚。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得意地说：“U-2侦察机收集的情报，比起地面上任何特工人员来说，要更快、更可靠、更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讲，其有效手段只有直接从苏联机关和实验室取得的技术文件才可媲美。”

U-2飞机在苏联领空肆无忌惮地搜集军事情报，使

得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十分恼怒，多次召集歼击机和防空导弹设计专家、防空部队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下令抓紧时间研制新武器和训练出色的飞行员。他对防空部队司令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一定要给我设法打下一架U-2飞机，美国人太狂妄了。”防空部队司令实在是想不出什么高招，硬件拼不过人家，只好忍气吞声让赫鲁晓夫臭骂一顿。

万般无奈之下，赫鲁晓夫只好使出了最后的武器——把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找来，要他想办法把U-2侦察机弄下来。

谢列平说：“直接打不下U-2飞机，那就想其他办法让它自己掉下来。”他向赫鲁晓夫保证，克格勃有办法搞定U-2高空侦察机。他会制订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详细计划，圆满完成这个任务。

一颗特殊的螺钉

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克格勃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快打掉一架U-2间谍飞机，杀杀美国的威风。克格勃主席谢列平亲自主持实施这个精心策划的计划。

1960年4月初，克格勃第一总局中东处负责人马林

科夫飞往阿富汗，按照约定的时间，在一家穆斯林饭店与一名叫穆罕默德·伽兹尼·汗的人见面。穆罕默德是帕坦族人，在巴基斯坦生活过，仍有亲戚在巴基斯坦。他曾是一名空军飞行员，在苏联受训时秘密参加了克格勃组织。

马林科夫亲自赶到阿富汗，穆罕默德预感到有重要的事情，寒暄几句后马林科夫转入正题：“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机场，驻扎着美国U-2高空侦察机中队，它们经常侵入我国领空侦察情报，威胁我国安全。你必须设法进入机场，完成一项总部交给的任务。”穆罕默德问道：“什么任务？”马林科夫没说话，将自己带去的手提箱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只木制小方盒。打开盒盖，取出一只亮晶晶的东西。马林科夫说：“这是一枚带有磁性的特殊螺钉。将螺钉安到U-2飞机高度仪右上方，替换原来那颗螺钉，就大功告成了。”说罢，又从手提箱里拿出5万美钞递给穆罕默德，说：“这是你的活动经费，有什么困难吗？”穆罕默德说没有。马林科夫站起身说：“我要说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就看你的行动了，祝你好运。”

穆罕默德送走马林科夫，再次取出那枚螺钉看了

又看，怎么也看不出这枚螺钉与普通螺钉有什么不同。

马林科夫离开阿富汗的第二天，穆罕默德进行了简单的准备，立即动身前往巴基斯坦，从吉巴尔隘道附近的一个村庄混进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找到他的一位亲戚。通过这位亲戚又花钱买通了美国空军基地食堂的一名管理员，一个叫牟尼伊·汗的巴基斯坦人。牟尼伊·汗帮助他冒名顶替做了一名食堂清洁工，顺利地混进了美国军用机场。

食堂门前场地就可以看见飞机跑道和停机坪，穆罕默德一边做清洁工作，一边留心观察机场内的情况。在一道道令人望而生畏的电网、岗哨的保护下，U-2飞机停在机场的东北端，一般人根本无法靠近。一连几天，他借故很晚下班，利用运送食堂垃圾的机会，偷偷潜进U-2飞机的停机坪附近，用红外望远镜进行观察。他除了仔细观察停机坪周边的环境，还详细记录下了岗哨换岗、查岗的时间，岗哨与飞机的距离，流动哨位的路线和活动规律。比如固定岗一般都是一个小时一换；流动岗是30分钟巡逻一次。进一步观察，他又发现左边第一架U-2飞机视线上有个死角，

哨岗上的哨兵无法看到飞机的左侧。如果计算好流动岗哨经过的时间，趁哨兵换岗精力分散之机，完全可以悄悄地登上飞机而不被发觉。

一天中午在食堂听到几位美国飞行员闲聊，穆罕默德得知第二天他们有飞行任务，执行任务的是一个叫鲍尔斯的飞行员，此人驾驶的U-2飞机机号为T300，而令穆罕默德兴奋不已的是，T300号机的机位就是左边第一架。这天夜里，穆罕默德潜伏在停机坪外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一动不动地静静等待。穆罕默德看了一眼手表，凌晨两点，这正是他计算好的最佳时间。他赤着双脚，迅速躬身跑入停机坪，敏捷地钻进T300飞机驾驶舱，蜷缩着身体，用手在驾驶舱的仪表板上一点点摸索着，借助微弱的光亮，飞行员出身的穆罕默德很快摸到了高度仪的塑料外罩，又摸到右上方的那颗螺钉，于是，他取出带来的起子，摸索着对准螺眼，用力往下拧。螺钉终于松动了，他小心翼翼地取下螺钉，然后又把自己带来的那颗螺钉塞进去，再慢慢拧紧。穆罕默德毕竟是飞行员出身，对飞机相对比较熟悉，加之受过克格勃的职业训练，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不慌不忙。

该做的全做了，他看了一眼表，此时正是流动岗哨往这边来的时间，穆罕默德索性闭起眼睛，龟缩在驾驶舱休息。等流动岗哨走远了，他瞅准时机爬出驾驶舱，顺着来路飞速跑进黑暗中。

U-2凌空炸开

1960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庆祝游行。这一天距离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全世界都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使东西方关系有所缓和。

东方刚泛起鱼肚白，巴基斯坦白沙瓦机场一片宁静。清晨5点20分，鲍尔斯身着特种飞行服爬进T300号U-2飞机，5点40分，U-2侦察机腾空而起。按照指令，U-2侦察机飞行路线为：咸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阿尔汗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鲍尔斯驾机侦察的重点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在那里，苏联正在建设洲际导弹发射基地。飞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鲍尔斯的飞机已到达咸海东南上空。他看到了咸海以东约20公里处的丘拉坦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发射场，他打开照相机，进行了拍照。云层时合

时分，飞行3小时后他来到车里雅宾斯克以南数十公里处，云层消失了，左方出现一片乌拉尔山景，山头白雪盖顶，两侧田野翠绿，这里正是春天。鲍尔斯把发现的机场、油库、大建筑群等一一标在地图上。已经飞行了4个小时，乌拉尔地区重要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映入眼帘，鲍尔斯又是一番紧张的拍照。

U-2侦察机刚一进入苏联领空，立即被苏联防空部队雷达网发现，并严密地监视着。莫斯科苏联国家空防指挥中心内，空防司令比留佐夫站在大会议桌后，面对着一幅苏联地图。一名上校举着飞机模型在地图上不停变换方位，每隔几分钟，他就向比留佐夫汇报入侵飞机的方位、速度和高度。比留佐夫左边站着空防航空司令萨维茨基等人，一群军官围在他们四周。

在一阵刺耳的警报声中，一架架米格歼击机呼啸着驶上天空，一枚枚萨姆型地空导弹也高高地昂起了头。接到战斗警报，防空军歼击航空兵某部副大队长鲍里斯·阿依瓦江大尉和飞行员谢尔盖·萨弗洛诺夫上尉驾驶着两架米格-19歼击机，迎着晨风双双起飞。这时已是7时03分。起飞后，在地面指挥员的引导下，他们迅速向U-2侦察机靠近。

望着后下方追来的米格-19歼击机，鲍尔斯吃了一惊，苏联人的飞机怎么能飞这么高？他连忙拉动操纵杆加大油门，驾机向上爬行。鲍尔斯心中掠过一层阴影，觉得今天不大吉利。他把飞机上升到20000m高空，好不容易把米格-19甩掉，按预定的航线寻找目标、侦察、照相、录音。眼见U-2飞得越来越高，米格-19飞不上去，阿依瓦江大尉他们只好遗憾地降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科利佐沃机场，并迅速加好油，等待再次起飞拦截的命令。

8时43分，等候已久的阿依瓦江大尉和萨弗洛诺夫上尉再次受命起飞，继续拦截U-2飞机。可是，他们在空中转了几圈，连U-2的影子也没有发现。

U-2侦察机进入秋塔拉姆地区，三个导弹营中的两个及时进入战斗状态。眼看来犯飞机已接近导弹的射程距离，雷达一刻不停地密切跟踪这个不速之客。U-2飞机却突然掉转机头，慢慢地向北飞去，然后往西，直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驻扎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几个导弹营正严阵以待。因为在歼击机起飞拦截U-2的同时，部署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防空导弹团也接到了战斗命令。团参谋长沃罗诺夫少校此时正代理

导弹营营长的职务指挥导弹营作战。

鲍尔斯驾着U-2侦察机刚进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就被搜索雷达发现，制导军官和导弹操纵员牢牢锁定目标。沃罗诺夫少校一声令下，随着火光闪烁，3枚导弹直插云天飞向U-2侦察机，可是，只有一枚导弹射向预定目标，其余两枚导弹竟然没有动静。工程师们进行了紧急检修。结果发现，原来制导室正处在导弹发射架与U-2侦察机之间，三点成一线，发射角为零，导弹当然发射不出去了。正在朝目标飞去的那枚导弹现在成了他们唯一的指望了。空中出现一团火花，几秒钟后，传来一阵低沉的爆炸声。此时正是莫斯科时间上午8点57分。目标迅速从雷达屏幕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的“雪斑”。沃罗诺夫和他的部下都没有意识到导弹已击中U-2侦察机。此时，导弹营指挥所的雷达屏幕上目标与干扰交织在一起。沃罗诺夫营的制导军官将绿色的“雪斑”误认为是敌人施放的金属箔条，进行干扰以躲避导弹攻击，营长同意了他的判断。而实际上，此时的雷达屏幕上显示的是飞机碎片的回波。几分钟后，当沃罗诺夫意识到敌机可能已被击中时，屏幕上的小碎点也消失了。因为飞机的碎片已坠落地

面。与此同时，沃罗诺夫附近的另一个导弹营也朝着爆炸的U-2侦察机发射了3枚导弹。

事实上导弹并没有击中U-2侦察机，而是在它尾部后面爆炸，四处飞扬的弹片击中了U-2侦察机，U-2开始摇晃起来，长长的机翼折断、分裂，随后慢慢四处飘散。当然，U-2飞行员看不到这一切。鲍尔斯驾着U-2侦察机正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寻找新型火箭基地。突然机身一震，他回头一看，机尾冒出黄色火花，接着发动机熄火，飞机向下坠落。鲍尔斯心里一沉，飞机急速下坠，难道是发动机爆炸？在他的思维中，苏联人的炮火是打不着飞机的。他并不知道高度仪被做了手脚，自己的实际飞行高度远远低于20000 m。但鲍尔斯来不及多想，向挪威布德机场发出“小狗68”的紧急呼号。为了逃生，鲍尔斯决定弃机跳伞。U-2侦察机上安装了弹射跳伞装置，并有一个定时爆破装置与其相连。飞行员只要一按电钮，弹射装置就可将飞行员弹出，当飞行员弹射70秒后，飞机会启动自毁系统炸毁，从而销毁飞机上一切间谍活动的证据。

鲍尔斯凭着自己多年的飞行经验猜测，这个定时装置很可能是个骗人的把戏：哄着你弹射跳伞，同时

引爆身后的炸药，达到毁机杀人灭口的目的。到那时候，在新闻发布会上政府官员便可面对记者信誓旦旦地让上帝作证，他们什么都没有干，把间谍活动赖得一干二净。所以，他这次跳伞，没有按上司规定的操作程序使用跳伞装置，而是甘冒风险用手打开座舱盖，用自身的力量从急速下坠的飞机中翻滚而出，再拉开降落伞。这一个错误决定使得苏联人在地面上找到了U-2较完整的残骸。沃罗诺夫最先看见美国人的降落伞，他命令部下赶紧奔向飞行员着陆地点。

此外，有一个小插曲令苏联人心中不愉快：两架米格-19歼击机仍在继续执行搜索和攻击目标的任务，在一次次的盘旋飞行后，长机阿依瓦江和僚机萨弗罗诺夫失去了联系。这时，恰逢舒加耶夫少校的导弹营加入战斗。目标观察员发现一个标高为11000m的目标。营长认为这正是敌机，索罗多夫尼科夫少将亲自下令向目标开火。在导弹的呼啸声中，一幕撼人心魄的悲剧发生了：萨弗罗诺夫上尉驾驶的米格-19歼击机在自己的国土上被自己的导弹击中，命丧黄泉，那时他还不满30岁。而长机阿依瓦江在搜索盘旋中，发现晴空中有一块云团。他操纵飞机向云团俯冲，这才

使他幸免于难。

为掩人耳目，苏联方面对防空导弹误击己方歼击机一事守口如瓶。1960年5月，苏联颁布了嘉奖击落间谍飞机有功人员的命令，21人荣获勋章和奖章。萨弗罗诺夫上尉被授予红旗勋章，但为保密，嘉奖令中删掉了“死后荣获”的字样。直到30年后的1990年，苏联《红星报》才详细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郊区公路上，一位驾车带着朋友去附近村庄度假的司机突然听到空中传来爆炸声，巨大的响声吓他一大跳，他们停下车，跑出来往空中张望，只见空中散落着一些冒烟的黑点，还有一顶降落伞正徐徐下落。司机开车朝降落伞着陆点奔去，几分钟后，他们帮飞行员解开了降落伞绳索。他们不知道飞行员身份，问飞行员感觉如何，是否受伤，发生了什么事。那飞行员沉默不语，他们都觉得奇怪。

“你是保加利亚人吗？”司机问，这里的人都知道来自华沙条约国家的飞行员经常在附近机场接受训练，那名飞行员摇了摇头，于是他们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收了他的手枪，让他坐在汽车前座上。这时，他们当中有个人无意中注意到鲍尔斯手枪上的图案

和“USP”，就在汽车仪表盘上的灰尘上写下了“美国”两字，鲍尔斯点了点头。他们决定把俘获的飞行员交给沃罗诺夫的导弹部队，于是带上鲍尔斯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

鲍尔斯被押到莫斯科后，当即被送到克格勃总部进行审问。他开始并不打算承认自己的间谍活动，对一些苏联已经知道的问题，比如飞行路线、时间等就如实说出，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普通飞行员，不过是受雇来跑一趟，职责无非是按按开关钮，此外一无所知。但他并未能坚持多久，因为一个细节使他露了馅。有人在桌上鲍尔斯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拣出了一枚带有可致人命的毒药大头针。鲍尔斯这下可吓得不轻，除间谍罪外，苏联人还会判他杀人罪。大头针露出马脚，他只得如实招供。

赫鲁晓夫决定跟美国人玩一次捉迷藏的游戏，看看对方会编造些什么谎言再痛加揭露，后发制人，以洗雪多年来的屈辱。他让外交部发表抗议，只是说苏联边境受到侵犯、敌机已被防空部队击落，至于此事在何处发生、飞行员的命运如何只字不提。果然不出赫鲁晓夫所料，美国人认为在20000m的高空飞行员即

使从飞机中弹出来也很难存活，而且U-2飞机上有自毁装置，不会有把柄落在苏联人手里。后来，苏联人抗议了大半天，却拿不出确切的人证物证，美国人更加自信U-2已机毁人亡。于是，美国国务院发表公告称：“5月1日，星期天上午9点左右，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架从事气象研究的U-2飞机在执行一项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主持的气象考察任务时失事。”随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进一步声明说：一架搜集气象资料的飞机在土耳其东南部飞行途中，因驾驶员缺氧失去知觉，误入苏联领空。声明中还添加了一些其他细节。

5月11日，赫鲁晓夫参观U-2飞机残骸，并下令在一家公园里展示这一胜利品。这家公园曾陈列过二战时期缴获的德国武器。许多外国记者围着赫鲁晓夫，他愉快地回答了记者们的各种提问，并即兴发表了一场生动的演说。

在莫斯科展览的这架U-2飞机的残骸，外形上看很像滑翔机，机身狭窄，机翼长15米，飞机上的照相、录音机、雷达和无线电都完好无缺。不久，在最高苏维埃一次全会上，赫鲁晓夫针对美国人对U-2飞机失事的说法进行了一一反驳。他在会上宣读了鲍尔斯的有

关供词，描述了飞机的飞行路线，列举了飞机残骸中发现的各种侦察设备，向众人出示了那些冲洗出来的照片，照片清楚地显示了苏联机场、核武器储备地点和核工厂。拍摄质量很高，能看到战斗机在停机坪一字排列开来，油箱和指挥中心大楼也清晰可见。



U-2飞机被击中后在莫斯科以东的乌拉尔山区坠毁，苏联人对其残骸进行研究。

如今人赃俱获，毫无准备的美国人陷入极其难堪的境地。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出面承认是他亲自批准这些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的。

“U-2飞机事件”给苏美关系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邀访问美国，这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也是历史上苏联政府首脑第一次赴美访问，意味着美苏之间出现了某种缓和气氛。根据访问期间双方达成的协议，将于来年5月在巴黎举行苏、美、英、法四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包括西柏林问题在内的各项紧迫的国际问题。还约定，此次最高级会晤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应邀访问苏联。可是，U-2侦察机被击落和鲍尔斯被俘，使美、苏、英、法四强高峰会议流产，中断了原定于6月份举行的苏美裁军会议。艾森豪威尔访苏计划也被取消。

华盛顿一直以为苏联的飞机和火箭根本不可能将20000m以上高空飞行的U-2飞机打下来，但是苏联人确实做到了，并声称自己拥有神秘的最新式导弹，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予以严厉指责。赫鲁晓夫甚至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要求把联合国总部迁出美国。东西方“冷战”再起，接着是古巴导弹危机，人类几乎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驾驶U-2飞机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后来在莫斯科受到审判，他被判处3年徒刑和7年劳役。1962年，他与一名苏联间谍作交换而返回了美国。这样，上世纪60年代苏美间一场精彩的演出正式降下帷幕。而克格勃

作为这一出戏的幕后导演，无疑是最大的成功者。

第十四章 谁偷了英国皇家海军核心机密

波特兰是英国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属于北大西洋防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人在这里进行着各项尖端技术和装置的研制及安装工程。这些研制不仅对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的潜艇构成威胁，而且能就近打击苏联目标。为了解除威胁，克格勃竭尽全力打入该基地，刺探英国和西方的海军核心技术机密。

克格勃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派出了一位间谍高手。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间谍战围绕着波特兰展开，演绎了一段惊心动魄的间谍传奇。

变身加拿大人

朗斯戴尔是苏联克格勃一名耀眼的间谍明星，他的真实名字叫科伦·特罗菲莫维奇·莫洛迪，1922年出生于苏联，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

1933年，10岁的莫洛迪被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姑母家，在伯克利一所私立学校念了5年书，在语言方面颇具天赋。1938年，莫洛迪返回苏联。他在莫斯科外贸学院读大三时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就看上了他，将他列为秘密特工候选人。两年后，莫洛迪大学毕业就加入了克格勃。克格勃教官这么评价他：这个青年人乐观向上，对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具备从事情报活动的杰出才能。

到32岁时，莫洛迪已升任克格勃对外情报部门的小头目，多次被派往国外执行任务。

1954年，莫洛迪刚过完33岁的生日，克格勃给莫洛迪下达了一个全新的任务：以加拿大人朗斯戴尔的身份前往英国搜集秘密情报。

莫洛迪潜伏英国是肩负着特殊的重大使命的。早在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不顾参议院的反对，批准

美国与英国签订共享核秘密的协定，向英国转让原子核动力潜艇的设计方案和技术资料。英国凭借这些技术才得以研制出自己的“无畏”号核潜艇和一系列遏制苏联海军的秘密武器，从而形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抗苏联集团军事链条的重要一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后，为最大限度地发挥缔约国的军事功能和节约财力物力，向各缔约国统一分工安排了最适合各国军事能力的防务任务。其中在核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两项任务分给了美国和英国。承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核保护伞的空中战略核打击力量由美国负责，而西方水面下的防务计划则交给了英国皇家海军。此次，莫洛迪的英国之行，就是设法搞到英军潜艇的核心技术机密，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机密情报。

莫洛迪为了完成此项重大任务，首先着手在伦敦建立了一个间谍网，其工作重心在英国的港口城市波特兰。

赶往英国之前，莫洛迪必须先到臆造出来的“祖国”加拿大去一趟。在那里他熟悉和了解了伪造的曾在加拿大工作的地点和环境，此外，还需要补办一些手续。他顶替的戈登·朗斯戴尔是加拿大人，母亲是一个

芬兰移民，名叫阿嘉·保苏，她很早就去了加拿大，1920年与杰克·伊曼努尔·朗斯戴尔结婚，1924年生下戈登·朗斯戴尔。后来，因与丈夫不合，20世纪30年代中期，保苏带着儿子戈登·朗斯戴尔回到父母的家乡——芬兰的卡累利。1940年芬兰战争爆发，小朗斯戴尔只有16岁。苏联人占领了卡累利，并把这块地方变成了苏联的一部分。此后，戈登·朗斯戴尔的护照就落到了苏联情报机关手里，戈登·朗斯戴尔父母的下落从此无人知晓。

戈登·朗斯戴尔回到苏联，曾在苏联海军中服役。事后，据英国情报人员说，真实的朗斯戴尔1955年就病故了。



莫洛迪通过多种身份掩护，发展了多名间谍，为克格勃获取了大量英国军事情报。

莫洛迪拿着朗斯戴尔的护照秘密来到了加拿大，像真的回到自己的故乡一样，他详细地了解那里的种

种情况，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奔走各部门，补办完善一系列确认自己身份的证件、证明。他向多伦多市政府相关部门申请获得重新补发的出生证，考取了汽车驾驶执照，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并领取了会员证。他用补发的出生证办理了一本加拿大新护照。经过此行他已具备了一个加拿大人应有的北美地理知识和所有必备的证件。此后，他去了美国，与克格勃在纽约的间谍组织接了头，接受了下一步的活动指示和经费。

1955年3月3日，莫洛迪以朗斯戴尔的身份从纽约乘“美国”号客轮来到英国。合法的加拿大护照，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使莫洛迪很快就融入了英国社会，站稳了脚跟。为了便于掩护自己，他在伦敦沃尔杜尔大街一栋现代大楼里开设了一家公司，主要经营自动电唱机生意。此外，莫洛迪在摄政公园附近的一栋白色楼房的六楼租了一套公寓。

在伦敦安顿下来后，莫洛迪开始与克格勃伦敦情报站建立联系。为了这次见面，克格勃经过周密的策划，非常谨慎。这一天，莫洛迪先把车开到泰晤士河边的一个停车场，然后，穿过几条街道走进一家烟雾缭绕的三等电影院，坐在最后一排，在一个单号的座

位底下找到一张纸条。第二天，莫洛迪去摄政王公园散步，随意地走进靠近水池的电话亭，里面有一本伦敦的电话簿，按照纸条的指示，他翻开第77页，找到一个用铅笔画过线痕的电话号，他拨通了这个号码，对方说请问找哪个部门，莫洛迪说找规划部。对方报出了一个电话号。按照事先与克格勃伦敦站的约定，这个电话号的数字组合代表郊区列车的某个车次、车厢和座位，而坐在那个位置上的就是莫洛迪要见的联系人。

一小时后，在开往郊区的火车上，莫洛迪很顺利地与伦敦克格勃情报站接上头，情报站给他带来了克格勃总部新的重要指示：目前东西方关系紧张，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美苏关系随时有可能破裂。虽然苏联已经有了威力强大、打击精度高的远程核导弹，但西方开发装备了以核能为动力的北极星式潜艇，此潜艇隐蔽性能强，不易被发觉，具备接近苏联本土打击目标的能力。为了帮助苏联摆脱这种被动态势，克格勃迫切需要了解“无畏战舰”号潜舰上装配的侦测深海潜艇噪声的潜艇方位测定仪，以及潜艇气味分析仪和“冰眼”等西方最先进的潜艇技术机密。

莫洛迪今后的任务就是在波特兰与代号“布兰达二号”的间谍联系，以便设法获取这些高级机密情报。

“布兰达二号”

莫洛迪也没有见过克格勃间谍“布兰达二号”，只知道此人可以搞到英军最新核潜艇的核心机密，目前潜伏在英国的波特兰市。

波特兰是英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位于英格兰东南角，与法国隔海相望，拥有良好的深海港，加之扼制英吉利海峡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得它历史上一直是大英帝国海军力量的重要基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波特兰海军基地不仅拥有军港、造船厂和大型船坞等设施，还具备尖端潜艇技术和各种高端海军装置研究、试验和制造等多种能力，这是个集各种功能于一体的海军战略中枢。英国水下防务计划的潜艇技术工作全部集中在波特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波特兰海军基地有2万多名工作人员，从事侦察和摧毁敌方潜艇武器的研究工作。

当时，英国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无畏战舰”号正在装配美国北极星式核潜艇技术设备，英美的打击目

标是苏联正在服役的350~400艘以常规动力推动的潜艇，以及正在研制的几艘核潜艇。西方把“无畏战舰”号核潜艇视为对付苏联核动力潜艇和常规潜艇的有力威慑手段，构成了西方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链条。

“无畏战舰”号潜艇上安装的尖端装置是集多种装置为一体的综合性侦测装置。主要有：根据美国最新科技成就开发的潜艇方位测定仪，该装置可在水中发出辐射距离数十海里的超声波测出敌方潜艇位置；当时最先进的反潜艇技术装置，可以把引力场中任何轻微的振动变化都测出来，即使在深水下也极为有效。这在当时是无法加以抗衡的侦测手段。克格勃最感兴趣的反潜艇技术就在于此。

代号为“布兰达二号”的克格勃特工名叫哈里·霍顿。此人是波特兰海军舰艇研究中心的高级职员。他16岁就参加了英国海军，一待就是20多年。

1945年二战结束，霍顿复员改任文职。因他曾长期在海军服役，熟悉海军情况，被派到了华沙，成为英驻波兰使馆海军武官奈杰耳·奥斯廷上校身边的工作人员。

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战后的波兰市场物资匱

乏，黑市猖獗。比如美国新研制的盘尼西林和其他特效药品在黑市上的价格比黄金还贵。霍顿垂涎其高额利润，非常热心做黑市买卖。在华沙，霍顿结识了一位叫克利斯蒂安娜的波兰女郎。此女风流多姿，与霍顿一见如故，两人频频幽会。不久，克利斯蒂安娜又把自己一些朋友介绍给霍顿，怂恿霍顿利用外交邮袋的便利以及手里握有英镑、美元的优势进行特效药的黑市买卖。从此，霍顿财源滚滚。可是，好景不长，1950年，霍顿因屡次酗酒被遣送回国。霍顿没有料到，他的这段富裕而浪漫的华沙经历实际上是波兰情报机构按照苏联克格勃的旨意精心编导排演出来的。霍顿所进行的黑市药品交易的每一笔买卖，与这位迷人的波兰女郎每一次幽会都被无一遗漏地记录存案。

哈里·霍顿被遣送回国后，在波特兰海军基地找到一份工作。期间结识了一位名叫爱塞尔·伊丽莎白·姬的小姐。伊丽莎白·姬已经46岁，仍过着独身生活。

伊丽莎白·姬是波特兰海军技术资料管理科的秘书，负责将各种用于海军的新技术和装置的试验结果填写在各类报表上，归纳装订成册，然后存档保管。由于他俩在相近的部门上班，常常见面，惯于向女人

献殷勤的霍顿就用自己的车送伊丽莎白·姬上下班，这样他们的交情逐步加深，常凑在一起喝杯咖啡闲聊，关系日益密切。

而改变霍顿命运的另一件事情出现在1958年1月。那天，霍顿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说是要告诉他关于克利斯蒂安娜小姐的消息。霍顿一听情绪十分激动，急于想知道昔日情人近况的他匆匆赶到约定地点。这个神秘的拜访者没有告诉他克利斯蒂安娜的情况，而是直截了当地要求霍顿提供英国海军的情报。当时，霍顿断然拒绝了，他说：“我是政府的雇员，政府明令禁止这样做，否则将受到惩罚。”这位陌生男子冷冷地说：“如果你拒绝与我们合作，那就别怪我们不给你留面子，你好好想一想在华沙都干了些什么？如果你记性不太好，我这里有资料，你不愿给我情报，我倒想把这些东西给英国海军部的人看看。”霍顿不再说话，在沉默不语中他屈服了，做了一只潜藏在波特兰的“鼯鼠”。事实上，根据叛逃到西方的波兰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戈列涅夫斯基提供的材料，霍顿刚进入波特兰海军基地，他的材料就被送到了苏联克格勃手里。

此后，霍顿陆续提供的一些情报都送到克格勃总部。克格勃给了霍顿一个代号“布兰达二号”。至此，克格勃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把霍顿交给已经在伦敦站稳脚跟的莫洛迪，由莫洛迪向他布置窃取英国海军核心机密的任务。

1960年 6月的一个周末，颇有绅士派头的莫洛迪走进了霍顿在波特兰的住宅，他脸露微笑地自我介绍道：“我想，你就是哈里·霍顿先生吧！我是亚历克斯·约翰逊，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海军武官。”

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海军武官突然出现，霍顿颇感意外。看到霍顿困惑的表情，莫洛迪说道：“我到波特兰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海军舰艇技术研讨会，随便访问一些朋友，有些我们彼此认识的朋友向我提到你，建议我来拜访你。”说着还真的提到几个曾在二战印缅战区和华沙美国大使馆工作过的几个美国海军军官的名字。这一下霍顿相信了莫洛迪美国海军武官的身份。他们很有兴致地聊了起来，莫洛迪先向霍顿介绍了几位海军旧友在美国工作的近况，后来又谈到美国在潜艇新技术研制方面的进展，并涉及到一些很专业的细节，听起来完全是一个在潜

艇技术领域造诣精深的专家。

莫洛迪具有高超的谈话技巧，以及驾驭语言的天赋，看似轻松地聊天，他既能达到某个谈话目的，又不会留下丝毫功利的痕迹。霍顿完全被套进去了，主动把话题转移到潜艇方位测定仪上来。莫洛迪在讨论这项核心技术时也非常巧妙，从不正面问一些关于潜艇方位测定仪的问题，而沿着潜艇方位仪的效能所产生的种种影响，自然而然地结合美国海军的类似技术加以讨论。每当霍顿说上一两句内行话或纠正他的一些不够准确的说法时，他都会用一种赞赏的目光看着霍顿，似乎对霍顿有如此精湛的专业知识钦佩不已。霍顿也对自己能博得一位美国海军武官的赏识颇感得意，不知不觉地谈了不少潜艇方位测定仪的情况。

莫洛迪见谈话已经达到预期目的，瞧瞧窗外蔚蓝的天空，谈起波特兰海岸美丽的风景，顺便又把话题扯到高雅的艺术方面，非常巧妙地冲淡了刚才话题的敏感氛围。霍顿表示他和他的朋友想观看正在英国的苏联国家芭蕾舞团的演出，热情的莫洛迪则答应为他们买好7月9日星期六晚上该团在伦敦公演的戏票，并约定那天再见面。

当天晚上，霍顿回忆与这位美国海军武官的谈话才意识到自己落入了此人的圈套，这个人绝非是他所声明的身份，可能是克格勃的一位高级间谍。他不得不钦佩此人的精明，通过闲聊让霍顿在谈话中承认自己了解潜艇方位测定仪和一系列潜艇技术，以后找他索要潜艇方面的情报，就没有任何借口拒绝为克格勃窃取这方面的情报。

情报小组意外暴露

霍顿开始源源不断地给克格勃提供海军基地的机密情报，后来，他又把女友伊丽莎白·姬也拉下了水。

莫洛迪出手大方，机智幽默，与哈里·霍顿接上头以后，克格勃对波特兰基地的渗透日见成效。霍顿和他的女友伊丽莎白·姬也十分乐意与莫洛迪打交道而完全没有受雇于人的感觉。莫洛迪看起来完全不像一名间谍，讲起话来轻松愉快，脸上常带着微笑，就像是一个可信赖的朋友。莫洛迪这种驾驭手下间谍不同凡响的能力还表现在无论布置多么危险的任务都以非常轻松的口气叙述，像玩扑克牌游戏那样探讨一些间谍手法，霍顿和姬女士对他都有好感。特别是伊丽莎白·

姬，总是以女性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活动。她认为这个嚼着口香糖、一口纯正美国口音的朋友更像是一个奔放不羁的美国人而不是一个克格勃间谍。加之，每次会面莫洛迪都送给他们一笔数目不小的英镑，使霍顿和伊丽莎白·姬窃取机密情报的热情大增。

他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波特兰基地附近的小咖啡店或在伦敦老维克戏院附近的滑铁卢大街见面。这些定期会面双方都会准时出现，从未出现过差错。莫洛迪给霍顿和姬女士一张列着12个问题的纸条作为他们在海军基地开展间谍活动的目标。霍顿和伊丽莎白·姬围绕着这些问题进行活动，在一次又一次的会面中给莫洛迪带来大量的机密情报。他们向克格勃提供的情报主要有：英国皇家海军新型战艇的设计和规格；正在建造的核潜艇“无畏战舰”号照片；英国皇家海军部对各舰队的命令；波特兰海军基地的地图等。此外，伊丽莎白·姬从文件柜中偷出涉及高级机密的潜艇方位测定仪的7本试验记录册，霍顿将其拍成照片后交给了莫洛迪。这些情报使克格勃及时掌握了英国尚未投入使用的战略性武器“无畏战舰”号核潜艇和西方最先进的潜艇方位测定仪的机密情报。

每次从霍顿和伊丽莎白·姬手中获得情报后莫洛迪都会开车来到伦敦西区的鲁斯利普镇克兰利路45号。这是一幢带有花园的非常幽静的房屋，里面住着一对苏联特工夫妇，护照上写明他们是新西兰人，男的叫彼得·克罗格，女的叫海伦·克罗格。他们经营一家专卖古书的小书店，克罗格的公开身份是书商兼业余摄影师。

克罗格夫妇是莫洛迪领导的间谍网中的重要成员。克罗格夫妇在这里将霍顿和伊丽莎白·姬提供的情报拍成微缩胶片，秘密联络员从这里拿到胶片，然后转送到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克罗格夫妇对克格勃忠心耿耿，处理问题稳健老练，他们高效的谍报工作使莫洛迪的间谍活动如虎添翼。

这样的好日子大概维持了大半年，当这个间谍组织事事顺利，大量情报滚滚而来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使他们露出了破绽，被牵扯出来。

1960年春天，波特兰海军基地安全官员弗雷德·霍斯金收到基地武器工厂一名摄影师的控告信，这位摄影师反映他收到一封匿名信，上面写着“你是个肮脏的犹太鬼”，信笺上还画了一个代表纳粹的徽号，他怀疑

这是哈里·霍顿所为。几天之后，这位摄影师的上司也收到一封类似的匿名信。海军安全部门对霍顿进行了调查，虽然否定了他与匿名信事件有牵连，但他的更重要的问题却暴露了出来。

当时，霍顿每个月的薪俸只有710英镑，而他却花近10万英镑买了一幢别墅，还买了一辆法国雷诺公司制造的太子牌高档汽车。他和伊丽莎白·姬经常去豪华旅馆度周末，并吹嘘自己一周喝酒要花掉二三十英镑。他在波特兰老榆树酒店盛宴招待朋友，成为酒店消费最大方的顾客。这些太离谱的消费引起安全官员霍斯金的怀疑，并把霍顿的情况上报了伦敦警察厅。与此同时，波兰军事情报局副局长戈列涅夫斯基投奔了西方，向英国提供了克格勃间谍打入波特兰的内幕。伦敦警察厅会同负责反间谍活动的陆军情报局第五处立案对霍顿进行侦察，霍顿作为涉嫌间谍活动的重要嫌疑人受到监视。

负责监视的特工发现霍顿和女友伊丽莎白·姬在伦敦滑铁卢街老维克戏院附近与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会面，霍顿交给对方一个小旅行袋，然后从这个男子手中接过一个信封。他们立即盯上了与霍顿接头的那个

男子，一直跟踪到他上了自己的汽车。那是一辆白色斯蒂佩克牌汽车。特工起初以为这是一名波兰驻伦敦的情报官员，但在他们调查了这辆汽车牌照后发现这辆汽车的主人是一个加拿大人，叫戈登·阿诺德·朗斯戴尔，职业是经营出租自动电唱机的商人。于是，警方对朗斯戴尔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英国军情五处的特工们在沃尔杜尔街莫洛迪的办公室、白色大楼六层他居住的套间都安装了窃听设备，另外还在附近设置了目测观察站。所有与莫洛迪来往的人和电话均受到调查，然而最初几个月几乎一无所获，但是特工们坚持不懈地侦听。一天，在监听中他们听到霍顿说：“不，我今天不能来，要过几天才能来。到时候再联系。”

8月初，霍顿又与莫洛迪约好了接头地点，在老维克戏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这一天，特工早已在斯蒂夫咖啡馆周围埋伏好了眼线。霍顿和朗斯戴尔会面时，两名军情五处的特工靠近他们坐着。莫洛迪对霍顿和伊丽莎白·姬说他要去美国谈生意，所以9月份就不同他们见面了，但他在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一定会赶回来同他们会面的。霍顿问莫洛迪最近两名投靠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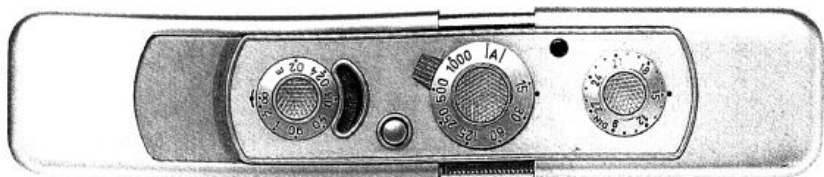
联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技术专家威廉·马丁和贝诺·密契尔是否已平安到达苏联，莫洛迪向他们保证两人确实已经跑到了苏联。特工还偷听到莫洛迪问：“你的提包里一定有不少东西吧？”霍顿略带幽默地回答：“除了剃须刀，还有一些睡衣一类的东西。”莫洛迪说道：“请你记下以后会面日期。”霍顿说：“可以。”莫洛迪说：“会晤将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地方在……接头人坐在那里的一辆汽车里。”特工看到霍顿又把一包东西交给了莫洛迪。后来，特工听到霍顿说：“不，我今天不想拿钱。”这时，特工已掌握了可逮捕他们的证据，但是他们并未马上采取行动，因为还需要等一等，看有没有更为重要的间谍出现。

警方决定进行全天候24小时监控，种种迹象表明朗斯戴尔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间谍，要对他跟踪而不被发现极为困难。因此，警方动用了20多个特工人员，把一天24小时划为6段，轮流值班跟踪的特工不断换人。这样莫洛迪即使看到有人在身后跟着走，但都是陌生的面孔，同一个人不会出现两次，不致引起疑心。

8月27日，莫洛迪从白色大楼六楼公寓出来，一直

走到大波特兰街米德兰银行。跟踪的特工发现莫洛迪在银行存放了一只箱子和一个棕色纸包，不久，莫洛迪便突然失踪了。

军情五处获得米德兰银行董事长的同意，撬开了莫洛迪存放物件的保险箱。他们从保险箱中取出箱子和纸包，带回军情五处在圣保罗的实验室。两名特工小心翼翼地把箱子里的东西摊放在桌上，进行了仔细的检查。这是一个职业间谍使用的工具包，工具包里有两台专门用于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一台是米诺克斯牌，另一台是普拉克蒂拉牌。米诺克斯牌照相机里还有一卷照过的底片。他们把这卷底片冲印了并进行翻拍，然后又把它放回相机。这些照片看起来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都是莫洛迪在布拉格和一个满面笑容的女人的合影。箱子里还有一本如何学打字的书，经验丰富的特工一看就知道这与密文有关。特工用细小的光束对每页纸的边缘进行了检查，发现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凹痕。莫洛迪就是用这些书页作为他密写的复写纸来书写那些看不见的密文。



米诺克斯相机。莫洛迪用此相机为克格勃拍摄了大量的秘密文件

箱子里还有一只放在木碗里的龙森牌打火机。通过对打火机进行X光检查，发现打火机底部是空的，里面装了许多小东西。特工们用橡皮吸球和小镊子把这些东西夹出来，原来是两本微型的一次性密码本，其中一本就是正在使用的，在折好的那页纸上还有一张地图参考资料清单。军情五处的特工看到莫洛迪的密码本，马上就知道这是苏联密码，由此推断，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克格勃间谍网。

如果把莫洛迪的密码本抄录下来，并跟踪信号，军情五处的反间谍特工就能利用莫洛迪同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来破译莫斯科的密码。但遗憾的是，莫洛迪的箱子里没有信号计划，这样特工也就无法知道他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了，因为每周莫斯科发来的电讯是不计其数的。于是，英反间谍特工加大了对莫洛迪进行窃听的力度，找出莫洛迪在他的接收机上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

后来事实证明，军情五处所做的窃听计划全是徒劳，他们未窃听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克格勃已获知莫洛迪暴露了，本来莫洛迪已经撤回苏联，但隐藏在英国军情五处的苏联内线出现危机，这样克格勃必须在莫洛迪和那个内线之间作出选择：是掩护莫洛迪还是掩护那个内线。莫洛迪担负了那个掩护的角色。

10月17号，莫洛迪回到了在沃尔杜尔街的办公室。

最后的归途

1960年底，反间谍人员跟踪莫洛迪到了伦敦西区的鲁斯利普镇克兰利路45号，发现莫洛迪一进去就没有出来。显然，他与房子的主人关系极为密切。这样持新西兰护照的克罗格夫妇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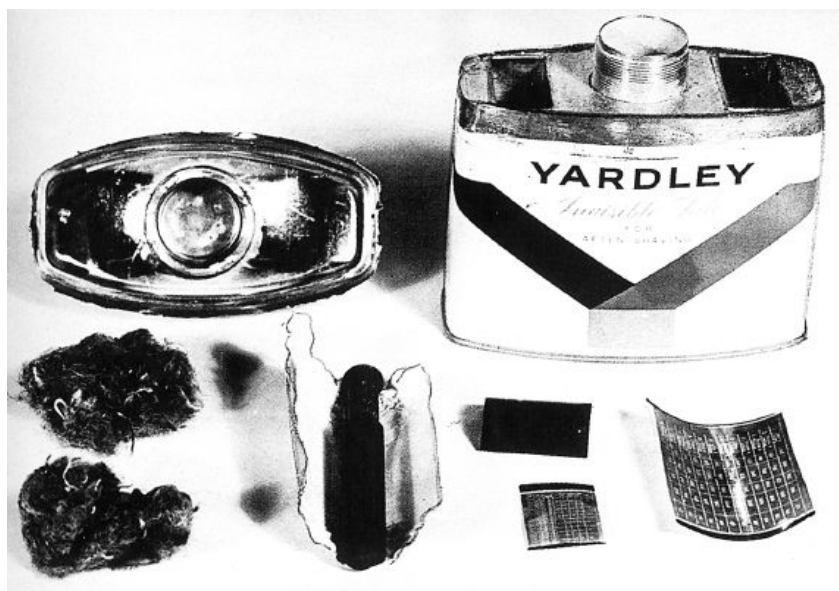
这时，英国军情五处收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密电：华沙组织有一位高层情报官员将投奔西方。如果这一官员叛逃，那么霍顿、莫洛迪甚至还有克罗格夫妇都会被他的叛逃所惊动。英国警方决定在他们撤退之前把他们抓获归案。1961年1月7日，是莫洛迪约定

与霍顿接头的日子，英国反间谍人员布置在他们经常会面的滑铁卢大街一带。下午3点，霍顿和伊丽莎白·姬小姐乘火车到达伦敦，他们在车站附近的一个市场逛了一阵，买了点东西，然后沿着老维克戏院向滑铁卢大街走来。一辆斯蒂佩克牌小车也开了过来，莫洛迪从车里出来，与霍顿他们并排走在一起。莫洛迪从伊丽莎白·姬小姐手里接过一个购物篮，这时，六七个反间谍人员立即围上来，用手铐一一将他们拷上。在购物篮里，特工发现3本潜艇方位测定仪试验结果小册子的胶片，以及其他关于核潜艇武器和技术的机密照片。

为了防止克罗格夫妇逃跑，特工在一个多小时后迅速赶到伦敦西区克兰利路45号逮捕了他们。英国安全部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们进行了指纹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他们就是1951年美国破获的美国原子弹间谍案中被通缉的两名在逃的重要成员，这个间谍集团的首犯罗森伯格已于1953年被处死刑。克罗格的真实身份是犹太裔美国人，海伦·克罗格的真名是洛娜·特巴隆·佩卡，波兰裔美国人。克罗格夫妇真实身份被揭露后，英国反间谍机构大为震惊。



克罗格夫妇



克罗格夫妇家的厨房下面隐藏的给莫斯科发送紧急情报的高速发报机

伦敦警方对克兰利路45号进行了彻底的搜查。警方发现这幢神秘的房屋简直就是一个“间谍活动中心和

银行”，各种间谍设备应有尽有。在客厅旁边的一间房屋里有一块活动地板，打开地板可沿阶梯下一个两米左右的深坑，深坑通向一个地下室。地下室里有一个功率强大的高速发报机，可以与莫斯科及世界各地的间谍组织直接联系。在卧室旁边的一间房屋里，警察在一个打火机里找到一个夹层，里面藏有两张载有无线电联络信号的胶片底片和6卷一次性使用的密码。在二楼房间里发现了识读微缩文件的设备和微型胶片阅读器。此外，还发现了8本护照和分藏在多处的数万美元的现钞、旅行支票，以及其他间谍器材。接着，警方又搜查了摄政王大街莫洛迪的公寓，在一盒爽身粉里藏有一个微型胶片阅读器，无线电联络的信号和密码则藏在几节假电池里。

1961年3月14日，波特兰间谍案的5名间谍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在审讯中，霍顿声称自己是受了威胁而被迫充当间谍的，并向法官表示愿意检举本案其他人的罪证和帮助当局指认苏联和波兰间谍的照片，以换取自己免受刑事处分，但被法官拒绝。伊丽莎白·姬承认自己有罪。面对不容否认的大量证据和法庭的严厉指控，克罗格夫妇始终装聋作哑，拒不承

认。而莫洛迪则不惜牺牲自己，主动帮克罗格夫妇承担责任，以保全自己的同志。

3月23日，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帕克宣布了对5名间谍的判决。其中，莫洛迪被判刑25年，克罗格夫妇各判20年，霍顿和伊丽莎白·姬分别判了15年。波特兰间谍案的开庭审判引起了英国及世界新闻界的关注。

1964年4月11日清晨，在联结东西柏林的一段公路上，苏联用英国间谍韦恩交换回了莫洛迪，莫洛迪回到了苏联。

4月27日，莫洛迪被授予克格勃上校军衔，同时获得苏联“国家安全部门荣誉工作人员”奖章。5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命令，授予他红旗勋章，颁布命令上说：“鉴于他在完成特殊任务时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强，特授予此勋章。”

获释后的莫洛迪不忘旧日的间谍伙伴，力促苏联有关当局以交换的方式使克罗格夫妇获释。1969年，克格勃用因间谍罪被捕的英国商人交换回克罗格夫妇。

1970年夏天，莫洛迪在一次宴会中因饮酒过度突然去世，时年47岁。他被葬在专为苏联功勋间谍辟置

的公墓里，墓碑上刻着：苏联英雄科伦·莫洛迪上校之墓。

第十五章 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威风扫地的 超级“鼯鼠”

“柏林隧道丑闻”使英美情报机构在全世界面前栽了大跟头，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被克格勃耍了，而出卖他们的正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官员、双重间谍布莱克。

这位“鼯鼠”中的“鼯鼠”给克格勃提供过无数重要的情报，多次让英美情报部门上当受骗，损失惨重。被捕后，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但他说自己并没有负罪感。

他奇迹般地逃出戒备森严的伦敦监狱，平安到达苏联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如果说“剑桥五杰”中的菲尔比让秘密情

报局从“超级机密”的光环中跌入黑暗的深渊，而布莱克则在秘密情报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彻底摧毁了英国情报系统的声誉。

语言天才

1922年11月11日，乔治·布莱克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父亲是出生于埃及开罗的犹太人，是一位金融学家，做过埃及总督的财政顾问。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

父亲病逝后，13岁的布莱克离开荷兰，到埃及跟叔叔亨利·科里尔一家生活，进入开罗的英语学校读书。亨利·科里尔是埃及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布莱克少年时受到叔叔的影响，很早就知道社会主义。

1940年德军入侵荷兰，布莱克参加了当地的抵抗运动，担任抵抗组织的信使，很好地完成了几次传递情报的任务。后来有人告密，为了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布莱克来到英国。战后他因这段经历获得了荷兰女王授予的四级拿骚十字勋章。

来到英国后，布莱克加入了皇家海军，被分配到一艘扫雷艇当水手。布莱克的语言天赋很快显露出

来。他精通英语、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在战争年代这样的人才太难得了，于是他被送到军官学校接受培训。布莱克以优秀的成绩通过考试，被授予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海军中尉军衔，先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被派到特别行动委员会荷兰分部从事密码电报的截收和破译。

1945年4月，布莱克到蒙哥马利司令部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布莱克晋升为海军上尉，在汉堡的英国军舰上担任情报军官。他写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情报分析材料，得到上司的赏识。当时国家情报部门招聘工作人员，他的上司为布莱克写了一封热情的推荐信，但情报局没有聘用他。

此次应聘受挫并没有影响布莱克对情报工作的兴趣，经过思考分析，布莱克认为自己落聘主要是没有情报部门急需的特长。二战后，世界格局已发生变化，法西斯德国灭亡后，苏联成为英美的主要敌人，国家情报局的工作重点自然也转移到苏联，自己虽然精通几个国家的语言，却唯独不懂俄语，要发挥自己的语言优势进入情报部门必须学好俄语。布莱克请了长假，用一两年时间专攻俄语。1947年，他再次去应

聘，情报局官员肯尼思·科恩对他的俄语水平非常满意。科恩查阅了布莱克的档案，对布莱克进行了考察，认为他阅历丰富，勤奋好学，能在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完成工作，是一个理想的情报人员。在科恩的推荐下，情报部门录用了布莱克，并送他到剑桥大学唐宁学院进一步学习俄罗斯语言和文化。

1948年，经过几个月的强化学习后，布莱克到英国外交部报到，他的公开身份是外交部官员。外交部有个秘密情报局，他实际身份是该局九处一科的特工。1949年初，布莱克被派往汉城重建那里的情报机构，担任该机构的特工负责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攻占了汉城，布莱克和英国大使馆其他人员没来得及撤走，全部被人民军关进了战俘营。

苏联国家安全部政治教育部派来专家格列戈里·库兹米奇，试图策反这些英法外交官今后为苏联服务。库兹米奇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布莱克与他谈得很投机，几次接触下来，布莱克私下告诉库兹米奇他已经信仰共产主义，愿意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并声明自己是出于信仰为社会主义苏联服务，不接受任何报

酬，也不必提前释放他。

布莱克在战俘营待了18个月，1953年3月，布莱克和英国公使等大使馆人员被释放回国。回到伦敦，英国使馆人员受到外交部的热烈欢迎，布莱克被安排休养了一段时间，休假结束后他被分配到军情六处克伦威尔街分部工作，专门负责窃听和秘密拆检外交邮件。

屡建奇功

汉城之行彻底改变了布莱克的命运，他从此成为克格勃安插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间谍。在军情六处克伦威尔街分部工作时布莱克就和苏联驻伦敦的情报人员接上了头，把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程序、内部机构设置以及全局工作人员名单提供给了苏联克格勃。

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西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内设了个工作站，1954年4月，布莱克被任命为工作站技术行动部副主任。他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驻德苏联军队的情况，并想办法物色愿意为英国效力的苏军军官。在西柏林工作的4年里，布莱克向克格勃提供了英国秘密情报局东欧间谍分布情况。英国情报部门在社会主义国

家发展的间谍先后有400多人被布莱克告诉了克格勃。布莱克与苏联人来往他的上司是知道的，但他们以为他是故意向苏联人提供假情报，物色能为英国情报机构效力的苏联间谍。布莱克作为潜伏在英国情报部门的“鼯鼠”，已显示出一个特工的机智。

布莱克为克格勃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使克格勃的叛徒——民主德国安全局局长罗伯特·比亚里克“消失”了。

1953年，民主德国安全局局长罗伯特·比亚里克与英国秘密情报局联系，要求政治避难。在英国特工的帮助下比亚里克秘密叛逃到了西柏林。对这类大人物的安全秘密情报局非常重视，给予了高规格的保护。因为英国人很清楚，苏联克格勃对待这样的叛徒绝不会心慈手软。比亚里克改名换姓后被秘密情报局安置在西柏林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并在比亚里克的公寓里安装了保险锁，窗户上焊上了铁栏杆，接通了能及时与英国安全官员联系的警报器。比亚里克也清楚自己的危险处境，所以他几乎从不出门。



乔治·布莱克是潜伏在英国军情六处的克格勃“鼯鼠”，身为双重间谍的他为克格勃铲除了多名内部间谍和叛逃者。

1956年2月，比亚里克见两三年都平安无事，一时冲动决定到外面走走。几次都没事，比亚里克的胆子大起来，后来干脆连保镖都不通知经常一个人单独在公寓附近散步。

事情就那么巧，布莱克的住处与比亚里克的公寓正好在一个街区。布莱克偶然发现了比亚里克，立即通知了西柏林的克格勃。2月的一天，比亚里克又单独出门了，他刚走到小巷口，一辆小汽车突然停在他身边，从车上跳下两个壮汉，他们抬起比亚里克塞进小汽车立即开走了。

比亚里克突然失踪，英国政府多次向苏联政府提出交涉，但苏联人坚决否认他们知道比亚里克的下落，英国人知道是克格勃干的，但没有证据也无可奈何。从此，比亚里克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英国人没有怀疑有人告密，只怨这个比亚里克太粗心了。

布莱克干的第二件大事就是抓获了克格勃叛徒波波夫。

彼得·波波夫原是苏军情报局的特工。1953年，由于向往西方社会，他决定暗里投靠美国中央情报局。他将一张小纸条扔进了一位美国外交官的汽车里，美

国人按照小纸条上写的联络方式与他建立了关系，中情局非常看重波波夫的价值，这个人也没辜负中央情报局的厚望，不久就成为战后为西方提供情报最有成效的间谍。他在维也纳工作的两年时间先后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近400名为苏联效力的西方间谍资料，而每次索取的报酬只有100美元。有意思的是，他说是因信仰而背叛自己的国家，布莱克也因信仰共产主义而替苏联效劳，可没想到波波夫最后栽倒在布莱克手上。

1955年，波波夫从维也纳回莫斯科休假，苏军情报局把他派到东柏林工作，因工作调动他和中央情报局失去了联系。波波夫到东柏林后写了一封信给联系人——中央情报局的基斯瓦尔德，向他介绍了自己工作变动情况。他托付正在民主德国访问的英国军事使团转交，英国军事使团按流程先将信给了东柏林的情报站，这样，波波夫的信就到了布莱克的办公桌上。信是按时转交给了中央情报局，但在交信之前布莱克已拆开信看了。不留下任何痕迹对做过邮件检查的布莱克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

波波夫很快被召回国内，此事并没有引起他的警觉，以为是工作的正常变动，最多是他搞情妇的事被

上司发现了。但回到国内后上司并没有提此事，只是通知他留在国内工作。他有些紧张，以为出事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中断了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直到两三年后才重新接上头。1959年10月16日，波波夫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与中情局的兰格尔利接头。当他们在拥挤不堪的汽车上交接情报时被当场抓获，兰格尔利被带到苏联安全部门接受询问。他当即提出抗议，要求苏联人对他予以外交豁免，90分钟后，兰格尔利获得自由。美国人否认了苏联对兰格尔利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并以随意拘留外交人员为由向苏联当局提出抗议。

波波夫的下场可就惨了。苏联《消息报》刊登了批判波波夫的文章，叙述了波波夫整个犯罪的事实。波波夫是二战结束后苏联第一个投靠西方的重要情报官员，国内民众一片怒骂声。波波夫也自认罪有应得，心甘情愿接受任何严厉的惩罚。苏联情报部门为了杀一儆百，释放对这种叛徒的气愤，当着众多同事的面将波波夫活生生地投进熊熊燃烧的火炉中。

然而，布莱克作为一个成功的间谍最辉煌的战绩还应该是一手策划了“柏林隧道”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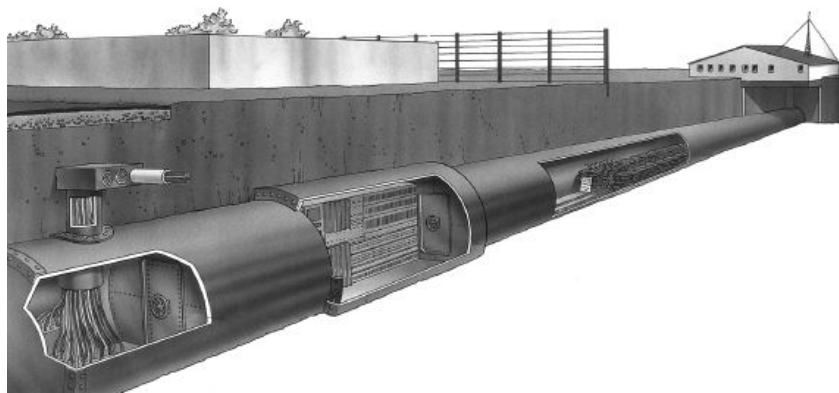
1953年，英美情报部门获得消息，在距离美军占领区边界约550m有一条民主德国的电缆线，这条线缆主要用于军事，可同时供430多对电话通话。英美制订了一个“黄金行动”计划，准备挖一条长450m、直径约1.8m的隧道通到东柏林电缆前，然后采取英国工程师设计的搭线方法，实施昼夜窃听。

为了不引起东德的注意，他们先要在要挖掘的隧道上修建了一座美军空军的雷达站。1954年，美军一个工兵小分队开始了挖掘工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耗资2500多万美元，隧道终于完工了。隧道的主体部分是窃听室，对应东柏林430多对电话线路安装了430多台窃听器，昼夜进行窃听录音。英美情报部门以为，通过隧道可以窃听到苏联与民主德国军政要员之间的通话，以及苏联军事管制总部、苏军驻东德防区与华沙的电话。他们相信，柏林隧道将成为一个巨大的情报源。

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事前隧道窃听室没有听到半点征兆，英美情报机构于是对窃听资料重新进行梳理，发现窃听的资料数量巨大但有价值的不多。英美情报人员觉得很奇怪，一时又

找不出其中的原因。

1956年4月22日，苏联通信兵进行例行的电缆维修。一名通信兵一脚踩空掉进隧道，柏林隧道就这样无意中暴露了，苏联人拿柏林隧道大做文章，召开记者会公布英美的丑闻，指责美国人入侵苏联管辖区，让记者和大量民众进入隧道参观，把隧道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向公众开放。英美媒体也大肆宣传，认为隧道窃听是情报行动成功的典范。直到1961年，布莱克间谍身份暴露后英美情报机构才知道自己被克格勃耍了。



1954年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共同策划实施了柏林隧道计划，以提供苏联向西方进行行动的最前沿情报，然而克格勃轻易地让这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原来隧道尚未正式开工时布莱克就把这项绝密计划告诉了克格勃，苏联将计就计在线上传递一些无足

轻重的东西，甚至一些假情报。到需要曝光的时候才设计了一个通信兵掉进隧道的故事，以便保护布莱克。

1959年初，布莱克申请调回伦敦秘密情报局总部。考虑到他在西柏林工作已经4年，总部同意了他的要求。布莱克回到伦敦时间不长，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英、法、以三国发动入侵埃及的战争，企图夺回苏伊士运河，不料遭到失败。英国意识到必须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于是决定派一位能够掌握多国语言的人到那里工作，自然就想到“语言天才”布莱克。于是上司派布莱克到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为进入中东工作做准备。

布莱克到达中东不到一个月，一个叫霍斯特·埃特纳的双重间谍供出了他。

原来在西柏林期间，布莱克结识了一个双重间谍霍斯特·埃特纳。此人原先居住在民主德国，与英国秘密情报局有联系，后来逃到联邦德国为联邦情报机构工作。但他的生活方式过于奢侈，不久被解雇了。1957年他又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接上头，一边为英国人服务，一边向苏联人出卖情报。布莱克在上司的授意

下曾用马克斯·德·范弗里斯的名字同埃特纳接触过，布莱克对埃特纳的底细并不了解，而埃特纳是个非常精细的人，他发现布莱克是一个双重间谍。

埃特纳喜欢在外面搞女人，钱大多花销在吃喝玩乐上，他妻子受不了，气急之下向联邦德国安全局告发了他。西德安全局逮捕了埃特纳，指控他向苏联人提供情报。埃特纳承认了自己的双重间谍身份，并主动供出另一个叫“范弗里斯”的双重间谍，说是这个英国人收买他为苏联提供情报。而这个范弗里斯就是布莱克，联邦德国向英国情报机构通报了有关情况。英国人没把埃特纳的口供当一回事，因为当时布莱克与埃特纳接触是得到上司允许的，布莱克非常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生死博弈

1959年3月，美国驻瑞士大使馆收到一封匿名信，写信人自称“狙击手”，表示愿意向美国提供苏联间谍在西方国家活动的情况。“狙击手”称克格勃已经弄到一份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文件，上面列有英国在波兰的情报人员名单。美国中央情报局把这个情况通报了英

国秘密情报局。秘密情报局的高层大吃一惊，一时又搞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这么大的事肯定要追查，但却不知从何处下手，弄得草木皆兵，气氛格外紧张。

“狙击手”继续向中央情报局透露：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隐藏着一个十分活跃的克格勃间谍，此人代号“钻石”。秘密情报局对波兰情报站特工逐个排查，对情报局总部也查了个遍，还是没发现任何线索。情报局这么大的动作布莱克自然马上就知道了，这颗“钻石”紧急向克格勃报告：波兰情报部门有一个为西方效力的间谍，不知其人真实身份和名字，代号为“狙击手”，此人已对“钻石”构成危险，要求立刻清除该隐患。“狙击手”和“钻石”都知道对方的存在，都在极力弄清楚对方的真实名字，都清醒地意识到彼此能把对方置于死地。

“狙击手”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间谍，为美国人提供情报，但此人行为极其诡秘，连中央情报局都不知道他的国籍和真实身份，只知道他和克格勃联系密切。克格勃得到布莱克的情报通知了波兰，建议立刻开展清除内部奸细的调查。令人没想到的是，主管这次调查的戈列涅夫斯基正是代号“狙击手”的间谍，

他的真实身份是波兰军事情报局副局长。

大吃一惊的戈列涅夫斯基沉不住气了，他知道“狙击手”不挖出来，克格勃决不会歇手。三十六计走为上，戈列涅夫斯基借出差到了东德，然后秘密潜入西德，等到波兰方面有所察觉，他已经逃到了美国。

得知“狙击手”到了美国的消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专家立即前往美国，准备详细询问那份名单的情况。戈列涅夫斯基知道英国秘密情报局依然没有查出“钻石”，心里大为不满。他提醒英国人，克格勃不是从秘密情报局总部和波兰情报站获得名单，而是秘密情报局柏林情报站一位特工提供的。戈列涅夫斯基告诉英国情报人员：1960 年以后，代号“钻石”的间谍在柏林突然失去了联系，提供机密情报的渠道也中断了。到这时，秘密情报局的专家才恍然大悟，知道该如何去挖出这只“鼯鼠”。

调查人员紧急查阅了柏林情报站工作人员的档案，经反复查对，很快发现1960年调离情报局柏林情报站的只有乔治·布莱克，此人可能就是“钻石”。当时布莱克正在中东学习阿拉伯语，对此毫不知情。经过筹划，秘密情报局电告黎巴嫩情报站站长古拉斯·埃里

奥特，通知他赶回伦敦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并要他顺便通知布莱克一块回伦敦参加会议。

两天后，布莱克走进了秘密情报局的办公大楼，他被通知立刻去六楼的局长办公室，局长迪克·怀特和两名负责反间谍的官员正在等着他。其中一位官员对布莱克讲，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向外国人出卖情报，因此他必须接受调查。布莱克矢口否认对他的指控，他说：“这是有人陷害，我会对所有的问题做出解释证明我是无辜的。”怀特局长说：“你有申辩的权利，但必须回答我们的问题。”

一个上午，布莱克以种种借口为自己辩解，在审讯人员紧紧追问下他开始前言不对后语，神情恍惚。下午，布莱克强打精神硬撑着，好不容易熬过了一天的审讯。可是第二天审讯又继续进行，布莱克终于受不了无休止的审问承认了对他叛国的指控，并招供了所从事的间谍活动。怀特局长听了汇报这才松了口气，这只狡猾的“鼯鼠”终于挖了出来。事后，怀特局长庆幸地说：“如果布莱克打死都不招供，我们拿他也没办法，我们什么证据都没有，仅凭戈列涅夫斯基的口供难道能治他的罪？”

布莱克在供词上签字后，警察局探长路易斯·盖尔和监察官把布莱克带到鲍街警察局，在那里进行审讯和取证后对布莱克提出正式的起诉。

成功越狱

1961年5月3日，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以叛国罪对乔治·布莱克进行宣判。因为布莱克的叛变，导致42名英国间谍死于非命，为此，英国司法当局判处布莱克42年徒刑。这是英国自废除死刑以来最严厉的判决，也是当代英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徒刑。

布莱克被关在伦敦北郊的沃姆伍德·斯克拉布监狱。

斯克拉布是个规模很大的监狱，里面设施完备，警戒森严，整个监狱四周围着6米高的围墙。

布莱克刚进来时被当做重点监护的犯人安排在一个单人牢房，监狱警察经常搜查牢房。像布莱克这样的重点监护犯人是允许到户外参加体力劳动的。布莱克表现非常规矩，安静地待在单人牢房，从不与警察顶嘴吵闹。不久，监狱解除了对他的重点监护，将他与其他犯人关押在一起。布莱克与犯人们相处不错，

他很乐意帮助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知识和阅历都很丰富的人。监狱发挥他的长处，让他教授德语、俄语和阿拉伯语。

有一个叫肖恩·伯克的犯人与布莱克住在同一排牢房，这个人重义气也很有头脑，他们相处得不错。

1966年夏末的一天，布莱克找到伯克，脸色凝重地说：“老兄，有一件事我考虑好久了，需要你帮助。”

伯克一脸轻松地说：“什么事，很重要吗？”

“我没有钱财，如果你拒绝我完全理解。” 布莱克说，“何况这事要冒风险。”

“你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伯克有些紧张。

“我在牢里要关42年，这对我不公平，伯克，我想请你帮助我逃走。” 布莱克见伯克没有反应，说：“你不必马上做出决定，可以考虑几天。”

“乔治，我不必考虑。” 伯克拍拍布莱克的肩膀，诡秘地笑了笑。

布莱克同伯克详细谈了自己的越狱计划，伯克补充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他们估算整个行动需要700英镑。布莱克有一张儿童时代的照片，上面一共有3个孩

子，他把照片撕成两半，一半给了伯克，另一半在他母亲探监时给了老人家。布莱克告诉伯克，当他母亲看见另半张照片就知道伯克是他儿子的朋友，会提供经费。

伯克假释出狱后就去见布莱克的母亲，正好布莱克的妹妹也在，当伯克说明自己的来意，老人家显得很为难，布莱克的妹妹当即表示不赞成哥哥越狱，也拿不出700英镑。伯克很失望地离开了母女俩。

伯克没有放弃帮助布莱克逃跑的计划。他在商店买了一部步话机，借探狱的机会给了布莱克，解决了他与布莱克联络的问题，并说一切会按计划进行。后来，伯克找到了他的朋友迈克尔·雷诺，很动情地讲述了布莱克的遭遇和计划，雷诺对布莱克十分同情，认为他做间谍不是背叛，只是意识形态不同而已。雷诺答应给他们提供资金。

10月18日，伯克在约定的时间与布莱克通话，再次详细地商定22日的越狱计划。22日夜晚，监狱里放电影，警察和犯人绝大多数都去看电影了。布莱克偷偷地从电影院溜了出来，牢房长廊静悄悄的空无一人，塔楼办公室一名值班警察在打瞌睡。布莱克顺着

下水管爬到牢房外，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伯克往围墙内抛入绳索和老虎钳，布莱克抓着绳索爬上围墙，剪开铁丝网往下一看，伯克正站在一辆小汽车旁边朝他挥手。墙太高，布莱克有点犹豫，这时一辆汽车从远方开过来，他一惊，闭上眼往下一跳，重重地摔在地上。伯克抢上一步拖起布莱克，塞进后车门，然后迅速发动汽车，一溜烟跑掉了。

布莱克在监狱里突然消失，当晚就成为伦敦电台和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判处42年的双重间谍成功越狱，就像一则精彩的传奇故事震惊了世界。伦敦警察局组织大量警力开展大规模的追捕，他们监控了伦敦所有对外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东欧各国的大使馆也受到监视。

布莱克预料到伦敦警方会四处搜捕他，于是，他就躲在伯克租来的房子里不出门，吃喝由伯克送来。下一步计划布莱克已经想好，等到风头渐渐平息下去，雷诺将护送他去西柏林，现在首先要找关系弄假护照。拿到伯克搞到的假护照布莱克很满意，他用职业的眼光也看不出这张护照有任何问题。

这一天，下着蒙蒙细雨，布莱克坐进了雷诺夫妇

的小汽车，一路朝多佛尔海峡方向行驶。布莱克躲在车内，由雷诺夫妇应付检查。他们很顺利地到达多佛尔渡口，由此乘渡船到达法国经比利时到联邦德国，布莱克在柏林下了车，并很快进入民主德国与苏联大使馆接上头，在克格勃安排下乘飞机飞往苏联。

雷诺则掉头由原路返回英国，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布莱克抵达莫斯科受到热情接待，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

莫斯科郊外的早上，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在一座别墅前的草坪中，两位老人坐在椅子上悠闲地交谈着，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倘若此情此景让英国秘密情报局得知定然羞愧难当、气急败坏。因为这两位老人都是秘密情报局的叛逃者、克格勃的间谍明星。其中一位是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间谍”的金·菲尔比，另一位与菲尔比一样，也是苏联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的获得者，继菲尔比之后创造世界谍报史又一个奇迹的乔治·布莱克。

布莱克在莫斯科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上班，市中心有他的公寓，郊外有乡间别墅，每月从俄

罗斯情报部门领取退休金，生活得非常幸福。退休后，他打破沉默，撰写了《我的间谍生涯》一书，回顾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2007年11月12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公开为乔治·布莱克授勋，庆祝这名令英国军情六处恨之入骨的双重间谍85岁寿辰。

第十六章 伸向美国绝密情报的黑手

20世纪60年代，克格勃成功打开了美国欧洲信使中心的地下机要库，以致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精确地计算出究竟要花多少钱才能弥补那些还可以弥补的损失”。

而对克格勃来说，从美国信使中心弄来这些文件，等于参加了美国最高决策会议，不仅有无法估量的情报价值，也再次证明了克格勃的无所不能。

没有人想到，做下这一惊天大案的克格勃间谍罗伯特·李·约翰逊竟然是一个智商不高、一事无成的美国家伙。他跑去投靠克格勃，克格勃也觉得他弱智，不太看得起他。但他凭借奇好的运气，阴差阳错地成为克格

勃历史上最成功的间谍之一。

蹩脚的间谍

罗伯特·李·约翰逊，1920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他从小就不是个机灵的孩子，反应迟钝且固执，在家里与父母相处不好，读高中的时候跑去加入了美国陆军。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战场上表现平平，他既没有立功也没晋升当官。战争结束后大部分士兵都退伍回家，而约翰逊继续留在军队，随部队驻扎在西柏林，希望找到一个晋升的机会。

约翰逊一直渴望出人头地，他认为是军队没有给他提供机会，许多战友获得晋升而他未得到赏识，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曾告发一位中士放债骗人，可是上级军官并没有惩罚这个人。因此，约翰逊感到非常失望，觉得美国军队十分糟糕，令人气愤，一心想要报复。他决定投靠苏联军队成为一名轰动世界的反叛分子，那样就可以在莫斯科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公开谴责美国军队的黑暗，自己也会一举成名。

当时的东西柏林由美、苏、英、法四国共管，约翰逊的部队驻扎在柏林，有机会与苏联人接触，但他

不知道该如何与苏联人交谈，他就逼迫自己的女友黑迪去找苏联人联系。黑迪是一个妓女，与约翰逊相恋已经4年，急着想和约翰逊结婚。约翰逊说：“你能和我一块投靠苏联人，我们就结婚。”

黑迪为了爱情终于答应了约翰逊的要求，她在大街上转悠了十几天，终于走进苏军兵营，找到一名苏军军官结结巴巴地把自己的来意讲了一遍。1953年2月22日上午，约翰逊和黑迪与自称怀特夫妇的克格勃官员见面。约翰逊大骂军队对他不公平，要报复美国军队，说他可以到苏联去召开记者招待会，上广播电台演讲。苏联人对他所讲的似乎不太感兴趣，只是不停地询问约翰逊过去的的生活，以及他目前在军队的情况。苏联人对他要求移居莫斯科的事没表态，分手的时候邀请他过两周再来谈一次。

3月初，约翰逊和黑迪又来到东柏林。这一次，克格勃军官怀特见到他就说，他们建议约翰逊不要到苏联或东德避难，而是继续留在军队里，可以经常向苏联人提供情报，这是报复军队最好的办法。约翰逊说，他不知道怎么做间谍。怀特说，不会可以学习。约翰逊迟疑了一下，答应可以试一试。

1953年4月，约翰逊与黑迪结婚。他向军队告假到巴伐利亚度蜜月，实际上，他和黑迪进入东柏林后，乘火车到勃兰登堡城，作为克格勃的客人在那里度蜜月。在此期间，克格勃派专人给他们传授间谍知识，对约翰逊进行了训练，黑迪被培养成一个交通员，发给她假证件和一双后跟挖空以便藏胶卷的皮鞋。

约翰逊夫妇回到柏林开始为克格勃工作。负责与他们联系的克格勃官员名叫波拉，真名叫弗拉基米尔·瓦西列维奇·克里沃舍伊。27岁的波拉性格爽朗，能讲一口地道的英语，熟悉美国事务，经常被人误认为美国人。当时她刚到柏林工作，像对待小孩子一样体贴照顾约翰逊，并且彬彬有礼地大献殷勤。波拉知道约翰逊没有什么政治信仰，所以在约翰逊面前从不提政治，也不谈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是让他形成一种认识，觉得通过苏联人他将来可以出人头地。

约翰逊当时的职位无法接触任何情报，在波拉的精心策划下约翰逊申请调到了美军柏林司令部情报处。他在那里表现出对做间谍的极大热情，不加选择地拍摄了一大堆文件资料，连夜偷运出来，实际上这些东西对克格勃来说没有多大价值。波拉对他说：“我

们赞赏你的努力，但我们只需要秘密文件，老兄，记住，秘密文件，不是去收购废品垃圾。”尽管约翰逊听得似懂非懂，但依然很卖力。

一天午饭后，办公室没有人，他就趁机拍下墙上一张标明苏军在东德部署情况的地图。一个月后他在东柏林见到波拉，非常得意地拿出胶卷，特意介绍了那张地图。

遇上这么一个脑子转得慢的笨蛋，波拉哭笑不得地说：“老兄，我们并不需要一张美国的地图来了解我们自己的军队部署在什么地方。”

约翰逊喝酒搞女人蛮在行，做间谍智力确实有点问题。正当他心情郁闷无计可施的时候，他遇上好朋友詹姆斯·艾伦·明特肯鲍中士，3年前他们在得克萨斯州的福德堡分手。

明特肯鲍35岁，身材魁梧强壮，却长着一双无神的棕色小眼睛。他谨小慎微，目光老是闪烁不定，因此，被士兵们称为“幽魂”。他也是个缺乏生活目标和意义的人。约翰逊决定拉明特肯鲍中士入伙，将他介绍给克格勃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明特肯鲍竟然十分乐意协助约翰逊，帮他猎取有价值的情报。

等候在东柏林一家咖啡馆的波拉，看到约翰逊领着一个陌生人来，十分恼火。她气愤地问道：“这个人是谁？”

约翰逊急忙解释，说明特肯鲍是他的好朋友，在搜集情报活动中帮了他不少忙。波拉这才放下心来，态度变得友好。波拉在与明特肯鲍交谈中敏锐地觉察出明特肯鲍是个同性恋者。克格勃一般对这种人比较感兴趣。克格勃认为，有此倾向的人常常伴随着性格上的错乱失调，心情会动摇不定，容易受到巧妙的操纵。同性恋者内心深处将自己与整个社会隔绝开来。他们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心情压抑孤独；他们身上还蕴藏着一种潜在的冲动力，随时准备报复整个社会。

1956年7月，约翰逊奉命退役。当时他已36岁，除了当兵无其他谋生手段，仅有的5000美元积蓄不到3个月时间花得一干二净，只好怂恿黑迪重操旧业去当妓女。白天，他参加函授学习；晚上，就用黑迪的钱去喝酒、赌博。到年底，黑迪生病不能再干了，于是他们的生活又陷入困境。

1957年1月的一个早晨，明特肯鲍突然出现在约翰逊的家门口，说自己刚从柏林回来，他交给约翰逊一

个信封，里面有25张20美元一张的旧钞票，明特肯鲍说：“这是波拉送给你的礼物。他们希望你回到军队里去同我一块干，他们答应每月给你300美元。”真是天上掉下馅饼来，山穷水尽的约翰逊想也没想马上满口答应了。

克格勃交给约翰逊一项新任务，搜集美国刚刚开始大量部署的导弹情报。当然，苏联人并不企望他能获得制造导弹的技术性机密，只是让他在导弹基地工作时能够拍摄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照片。克格勃要求约翰逊参加空军，但空军不接受，他只得重新加入陆军，并保留原级别。4月，陆军把约翰逊派到加利福尼亚州，在帕罗斯弗尔迪斯半岛一个新的导弹基地做守卫。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约翰逊通过明特肯鲍给克格勃送去了一些导弹的照片，他还成功地用虹管吸取了火箭燃料的样品。克格勃给了他2000多美元报酬。

1959年，约翰逊调到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郊外的布里斯堡。他在那里继续把拍摄到的导弹照片和其他秘密情报经过明特肯鲍转送给华盛顿的苏联驻美大使馆。不久，他又被调到法国奥尔良的一个美国军事基地。明特肯鲍奉命前去与他联系，并告诉约翰逊，克

格勃官员将在巴黎与他直接会面。

1960年新年刚过，约翰逊就根据明特肯鲍的指示驱车前往巴黎。一个自称维克托的人与他见了面。

维克托真名叫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奥尔茹尔莫夫，29岁，是当时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和约翰逊夫妇走进一家不大的酒吧，闲聊了一阵后，交给约翰逊一个装有500美元的香烟盒，说：“这是我们的见面礼物，你能来巴黎我们很高兴，你是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相信今后你会搜集更有价值的情报。”

此后，他们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晚上在巴黎奥良门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见面。1960年夏天，维克托不停地鼓动约翰逊申请调到巴黎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秋天，黑迪得了精神病住进巴黎附近的陆军医院。约翰逊以就近照顾妻子为由，请求调到巴黎地区工作。但他面试没有通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拒绝接收他。之后，他偶然和一个负责收发的中士谈起此事，中士对他说：“如果你想调到巴黎，可以到奥利机场附近的军事信使中心试试看。”约翰逊问道：“那地方是干什么的？”“有点像邮局，负责传递机密文件材料。”中士说，“那地方守卫很严，所以时常有警卫位

置的空缺。”

不久，约翰逊调往信使中心的要求通过例行手续被批准了。

打开美军最重要的一扇门

美国军事信使中心在巴黎郊外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只有一幢低矮厚实的方形混凝土建筑，四周围着高高的铁丝网。它是美国在欧洲存放核心军事机密和外交机密的大本营。对美国人来说，它是全欧洲所有设施中最重要的地方。

对于苏联来说，这个中心实在是太重要了。从华盛顿送给北约组织、美军驻欧司令部和美国地中海第六舰队等的一切重要文件、密码系统和密码设备，均要先送到这个中心，经过分类后再发送到最后目的地。美军驻欧司令部发出的一切标有绝密和机密字样的材料也都放在这个中心，然后转送华盛顿。

美军信使中心安全保卫工作十分严密。唯一的大门通向前面的一间办公室，武装警卫每天24小时值班。办事员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后面是一座巨大的钢铁地下室。要进入地下室必须通过两道铁门，第一

道铁门上有一根金属门闩，门闩两头都有密码锁。第二道地下室的铁门有一把结构极其复杂的用钥匙开的锁。因此，不知道两把密码锁的密码，没有第三把锁的钥匙，谁也进不了地下室。从将军到士兵，谁也不得单独待在地下室里。按照规定，只要地下室开着，至少要有一名军官在场。约翰逊调到信使中心使克格勃看到了获取地下室机密文件的希望。

约翰逊到信使中心上班后，维克托增加了同他见面的次数，表现出对中心站的极大关注，详细询问了中心站方方面面的情况，最后要求他设法进入地下室工作，成为中心站的一名内部工作人员。1961年底，经过安全部门例行公事式的调查，没有发现约翰逊任何不良记录，他终于取得了参与绝密事项的资格，得以进入地下室工作。

信使中心的文件一般都装在吕宋纸大封袋里送来，上面常有红色或蓝色的火漆封印，有些还有简明的标记，指明保密的级别。克格勃非常希望搞到那些关于北约组织的力量和战略的绝密资料，以及核打击计划等。

维克托推测信使中心可能装有隐蔽的警报系统，

非工作时间打开地下室的铁门就会发出警报。他指示约翰逊一定要找到警报系统的电线或仪器，必须认真检查建筑的每一个地方。维克托打听到地下室的墙壁每隔一定时间要油漆一次，于是他出主意要约翰逊在中心下次上白色油漆时主动请求做这项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就是约翰逊这类警卫做的，后来中心刷墙约翰逊自告奋勇地参加了，他认真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地下室有警报系统。

进入地下室最大的障碍是那三把锁。这个困难似乎是不可克服的。维克托交给约翰逊一块香烟盒大小的模型胶泥，并指示他带在身边，寻找机会拿到地下室的钥匙，在胶泥上按下膜印。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与约翰逊一块上班的年轻少尉有点恶心，他命令约翰逊退出地下室，自己则冲到外面去呕吐。他“砰”的一声关上地下室的门，但匆忙之中忘了拔下钥匙。约翰逊趁机迅速取下钥匙在胶泥上压了一个印。

约翰逊很有成就感地把胶泥交给维克托，可是下一次接头时，维克托告诉他，印子不太清楚，不能精确地复制出钥匙。维克托丝毫没有责备他的意思，鼓励他说：“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还有更好的机会。”



用于复制钥匙的印模工具

一天值班，约翰逊指着地下室一个金属小柜随意问带班的军官：“这里边装着什么东西？”“里面没有装东西。”军官随手打开没有上锁的柜子说，“瞧，它是空的。”约翰逊看见柜子的确是空的，但他眼睛一亮，发现柜子角落里有一把钥匙，这是地下室的备用钥匙。傍晚，约翰逊偷偷把钥匙塞进口袋。晚上，他非常仔细地印了三个钥匙印子。

第二天上班，当军官全神贯注地处理一大堆新来的文件时，他悄悄地把钥匙放回原处。三个礼拜后，维克托将一把锃亮的钥匙拿给约翰逊，说：“我们已经

有不错的开头。”

根据维克托新的指示，下一步是要设法弄到锁的密码。因此，当军官开密码锁的时候，约翰逊有意站在旁边，企图记住锁的密码组合。一次，一个军官对他大声呵斥起来：“约翰逊离我远点，开锁时不准站在我身后。”约翰逊吓出一身冷汗，心想这下彻底完了，好在那位军官没有再追究下去。维克托听说了这件事也很紧张，他反复告诫约翰逊，再也不要这样干，绝对不能表现出对柜子、钥匙感兴趣的样子。

1962年6月，信使中心按照通常的保密条例改变了其中一把锁的密码。一位上尉度假回来，打电话向另一个军官询问新号码组合。对方拒绝在电话里回答，但经过协商，同意说出一些数字，并说只要把这些数字以某种方式加在原号码上，就能得出新的号码组合。上尉记下那些数字，并进行了计算，然后随手把纸条扔进了废纸篓。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约翰逊在旁边很仔细地听上尉通话。快下班的时候他开始打扫卫生，从废纸篓里找到那张纸条，并很快送到维克托手里。克格勃技术人员轻松地组合出密码锁的密码，维克托异常兴奋，

克格勃离地下室又近了一步。维克托指示约翰逊找个理由主动要求在周末值班，因为周末和夜间信使中心只有一个值班的守卫。如果这期间有信使来守卫就去请军官来开门。克格勃认为，周末是潜入地下室窃取情报的最佳时机。

上了一个礼拜的班，到了周末卫兵们都盼望去巴黎寻欢作乐，谁都不愿意待在空无一人的信使中心，尤其是星期六下午6时至星期日上午6时那一班。于是美国陆军规定，谁这一天值班可以补休两天。即便是这样也没有人愿意值班。当约翰逊向上司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带妻子去看病申请每周星期六夜晚值班时，上司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值周末第一个夜班时，约翰逊等到凌晨2点多钟，对照维克托给的一组数字，在密码锁上按下一组号码，锁“啪”的一声弹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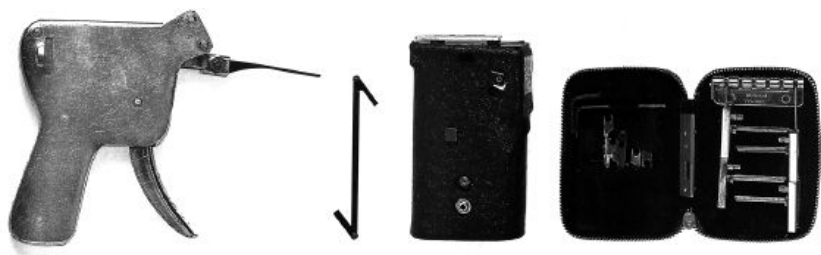
只剩下最后一把密码锁。随着成功的可能性增大，克格勃加强了对此次行动的力量。7月的一个星期一早上，约翰逊驾车经过一个立交桥下。按照约定，等在路边的维克托和另一个苏联人迅速上了约翰逊的车。

“这位是费利克斯，他将和我们一起工作。” 维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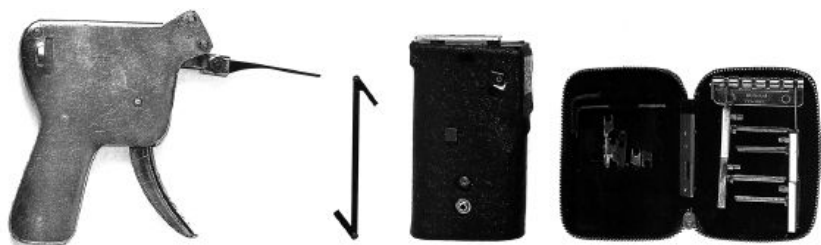
托说，“你现在已经是大人物了，苏联高层都在关注你的成败。”

10月初，费利克斯在一家酒吧与约翰逊见面时先喝了几杯白兰地，他们开车往郊外驶去。在一片小树林旁边停着维克托的小车，费利克斯从维克托的车上拿来两个纸盒放在约翰逊的小车上，然后他们继续往前开了2公里，最后停在路边。费利克斯从纸盒里拿出一个直径大约10厘米的圆形金属盘和一个高约20厘米的厚厚的金属圆锥，另外，一张纸上写着使用说明书和安装图例。

“这是我们专家研制出来的一台特殊仪器，你就叫它小型X光机吧。”费利克斯说，“你只要把仪器安装在密码锁上，它能自动拍下密码锁内部机构的X光照片，我们的专家根据X光照片，就能计算出开锁的号码组合。”



撬锁枪和电动撬锁装置



对照说明书，费利克斯耐心指教约翰逊如何安装，并告诉他，把仪器安装在密码锁上后，至少要远离密码锁5米，因为这个装置工作时会产生对人有害的放射线。等上30分钟再把仪器取下来，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周末值班，约翰逊按照费利克斯的吩咐将仪器安置在密码锁上，30分钟后才取下仪器。到接头那一天约翰逊把仪器还给了费利克斯。不久，苏联专家准确地测算出另一把锁的暗码。至此，克格勃通向信使中心的障碍全部被攻克。11月30日，费利克斯得意地将密码数字交给了约翰逊，并告诉约翰逊，根据克格勃高层决定和专家的意见，12月15日他必须进入地下室。

当天晚上，费利克斯驾着自己的奔驰汽车，带着约翰逊熟悉15日行动时交付信袋和取回信袋的路线、地点。他们沿着奥利机场驶向一条偏僻的公路，汽车

停在天桥附近的一个拐角处。费利克斯说：“午夜12点15分，我在这里等候你，当你驾车接近的时候，我向你招手似乎想寻求帮助。你停下车来把文件袋给我。我们估计，那时你离开你的岗位不超过5分钟。”

他们的车拐上乡间小道，大约又行驶了8公里，到了一处荒凉的小墓地旁边。费利克斯说：“凌晨3点15分，我在这里把文件袋还给你。”

墓地上空冷风呼啸，气氛阴森可怖，约翰逊心神不安地说：“你怎么挑这么一个吓死人的地方？”

“你说哪里合适？凯旋门吗？”费利克斯说道，“没有人深更半夜来这里。这是我们在附近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

费利克斯下了车，从行李箱中拿出两个一样的法国航空公司的蓝色提包，将其中一个拿给约翰逊，说：“你把文件装在这个提包里。在第一个会面地点把提包交给我，我再把另外一个提包给你。”约翰逊打开提包，看见里面有一瓶法国白兰地，四叠夹肉面包，一个苹果，另外在餐巾中裹着四片白色药片。费利克斯说：“酒中有催眠剂，可以使人很快酣睡，在我们行动期间，如果有人来到你的值班室，不想马上离开，

你就请他喝一杯。你陪他喝一杯之前，偷偷地吞食两粒药片，5分钟后再服两片，这样酒对你就不会起作用。来人酣睡后，你就可以安全地离开，取回我们这里的文件袋。”

从墓地出来，费利克斯驾车带着约翰逊前往巴黎郊外，在D33号公路约23公里处他们下车走到一棵树下。费利克斯挖出一块石头，用力一推石头成为两半，里面是空心的。费利克斯说：“遇到紧急情况，在这块石头里可以拿到你的加拿大护照、身份证、美元和一枚1921年的美国银币。然后你立刻赶到布鲁塞尔，每天上午11点钟到福莱大街第100号街区，左手拿着一份伦敦《泰晤士报》。我们的代表会接近你，拿着一枚1921年的美国银币问是不是你丢失的，你也拿出你的银币说我的硬币没有丢失，然后听从来人的安排。你将安全地逃到苏联，并会受到热情的欢迎。”

费利克斯再三强调，采取行动的星期天约翰逊离开信使中心后如果不发出安全信号，克格勃的逃跑计划就自动生效。发出安全信号的方法是在一个电话间旁扔下一个“好运”牌香烟盒，里面用铅笔写上一个“X”字母。

约翰逊是个不长记性的人，克格勃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那一段时间让费利克斯与他频繁接触，反复地演习行动中每一个步骤，让他熟悉、牢记所有这一切。在12月14日，费利克斯带着约翰逊进行了最后一次演练。分手时费利克斯说：“祝你好运！我们在等待着你的成功。”

美军核心机密被窃

第二天夜里，约翰逊在信使中心打开收音机，11点电台报时他校准了手表。

40公里外的巴黎苏联驻法大使馆，克格勃的一批技术专家从莫斯科经阿尔及利亚飞到巴黎，此时集中在三楼一个小房间里。他们必须在一小时之内，将约翰逊窃取来的文件打开封口，把内容拍摄下来，然后把封口按原样不留任何痕迹地封上。

午夜12点50分，约翰逊开始行动了，不到两分钟时间，他就打开了地下室的三把锁，他进到里面迅速把信件塞进蓝色航空手提包，然后提着满满一包文件，锁上地下室和中心的大门，跑向自己的雪铁龙小汽车，驾车离开了信使中心。费利克斯正在路边等

候，他们很快交换了手提包。凌晨3点15分，约翰逊在墓地拿回了蓝色航空手提包。他将所有信件重新放回地下室，一切都和演习时一样准时、准确。

以假乱真的岩石隐藏容器



星期日早晨约翰逊下班回家时，大量的美国军事机密已经在飞往莫斯科的路上。

12月22日晚上，约翰逊再次轻易地进入地下室，遵照费利克斯的指示有挑选地拿文件，这次约翰逊专门猎取那些两三天前才送来的新文件，其中三分之一是密码资料。

26日，费利克斯见到约翰逊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非常得意地说：“我接到指示，代表苏联部长会议

感谢你对和平事业所作的贡献。我们送去的文件资料非常重要，价值很高，有的文件赫鲁晓夫同志都亲自看了。为了表彰你的贡献，已决定授予你红军少校军衔。这里还有2000美元的奖金，上级特意委托我带给你。”

约翰逊窃取的机密文件轰动了莫斯科高层，而对克格勃来说，从美国信使中心弄来文件就等于参加了美国最高决策会议，不仅有无法估量的情报价值，也再次证明了克格勃的无所不能。后来有知情者评论，凭这两次窃取所得的美军机密情报，足以保证苏联打一场决定性的胜仗。

约翰逊一下成了克格勃的宝贝疙瘩，进入一流间谍行列。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克格勃采取了非常谨慎的策略。约翰逊进入地下室窃取文件要经过苏共政治局的直接批准。

费利克斯通知约翰逊，今后潜入地下室的时间至少要间隔四到六周，而行动计划必须提前两周准备好。到时候莫斯科的技术专家也要过来，他们需要有合理的出国理由，有的还必须经过其他国家转道巴黎，而这一切又不能引起法国人的任何怀疑。因而在

约翰逊每次进入地下室之前，克格勃有一大帮人忙前忙后地精心准备，弥漫着紧张而又激动的空气。

1963年的一天，约翰逊又进入了地下室，同以前一样窃取了一提包信件。事情弄完后，他下班回家睡大觉。中午时分，他出去买面包，发现费利克斯的汽车就停在他家附近。维克托和费利克斯钻出汽车，阴沉着脸看了他几秒钟，一言不发地转身驾车走掉了。约翰逊十分纳闷：昨晚我们进行得很顺利，他们跑来干什么？干吗又不答理我？突然他恍然大悟，自己忘记在电话间旁边留下香烟盒，没有给他们报平安。

一向温文尔雅的费利克斯后来见到约翰逊大发脾气，愤怒地说：“由于你的疏忽大意，惊动了从巴黎直到莫斯科所有的人，大家都忙着替你准备逃跑。现在够麻烦了，我得花费一两天时间写报告去解释。”

信封处理工具包。这套工具能够打开大部分类型的信封，并重新密封。



“我忘记了。”约翰逊甚至有些感动，“十分感谢你们的关心。”

1963年4月20日午夜12点，约翰逊已经是第七次进入地下室，他首先把刚从华盛顿送来的两个特别的封袋装进提包，然后用信件将提包塞满。午夜12点15分，约翰逊顺利地与费利克斯交接完毕。可是3点10分已经过了，约翰逊却没有到达墓地附近，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费利克斯开始焦急起来，也许有什么人来到信使中心，拖住了约翰逊，也许路上出了什么岔子，或许事情败露他被逮捕了。弗利克斯在墓地等到凌晨5点，认为不能再等了，如果天亮了文件就无法送回去了。约翰逊一旦被捕，整个行动计划也将因此而

毁掉。他决定孤注一掷，驾车直奔奥利机场，将车停在离信使中心仅10米的地方。他迅速把装有文件的蓝色航空提包扔到了约翰逊汽车的前座上。费利克斯离开时心里非常沮丧，苦心经营且取得巨大成果的窃取行动，就这么彻底终结了。

其实，像上次忘记发出安全信号一样，约翰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与费利克斯接头回来喝了几杯酒，2点多钟趴在桌上舒舒服服地睡着了，直到5点多钟才醒过来。他一看表也慌了神，疯狂地跑向汽车，发现了前座的航空提包。他把信件放回原处，转身刚关上地下室的门，手还没有离开大门上的锁把，就听见身后有人说：“你在检查夜里有没有人开锁，偷偷地溜进去？”约翰逊吓得差点惊叫起来，待转过身来，气愤地说：“你把我吓死了！怎么6点不到，你就跑来了。”走进办公室的是一个年轻的下士，准备换约翰逊去吃早饭。他说：“我睡不着就过来了，这样你可以早一点下班。”

约翰逊智力比较低下，但运气少有的好，他可不愿向克格勃承认自己睡着了，因为自己太愚蠢才差点儿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和整个行动。事后他向费利克斯

解释，那天快到午夜3点，有个军官送来特急文件，办完事打算在中心休息一会儿，而且拒绝喝酒，结果一直待到5点以后，他根本无法脱身。费利克斯他们完全清楚约翰逊在说谎，但又搞不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不过他们看到约翰逊平安无事，也就不再深究了。

为慎重起见，克格勃决定暂时中止窃取行动。他们要保住已取得的丰硕果实，不愿轻易地去冒更大的风险。因为通过约翰逊偷窃的文件，苏联人详细了解了北约组织的防御体系；知道了一旦在世界各地发生了突发事件美国将采取什么应急措施；清楚地知道，苏联在防务上有哪些弱点暴露给美国。这些机密的泄露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此外，有了约翰逊提供的情报，美国的密码系统已失去保密作用。

9月，克格勃发现一切正常，准备恢复偷窃行动。这时约翰逊获得升迁，他被调到巴黎塞纳区圣罗兰司令部。1964年5月，陆军为了照顾约翰逊能就近照料妻子，把他调到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任职，当时黑迪已经住进了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治疗精神病。离开巴黎前夕，费利克斯和维克托在巴黎一家饭店为他饯行。

意外的悲惨结局

约翰逊回到美国，妻子黑迪的病情有明显好转，不久从医院搬回家居住。到了9月，黑迪的精神分裂症和妒忌再一次发作，来势凶猛，不可抑制。一天，夫妇俩在饭馆吃饭，黑迪认为邻桌的一个妇女在勾引约翰逊，突然跳起来掀翻桌子，抓住那女人的头发，劈头盖脸地猛打。还有一次，他们在一家超市购物，黑迪又无中生有地认为约翰逊和一个女顾客调情，偷偷地走到约翰逊身后一脚踢在他屁股上，他往前一撞，碰倒在货架上。黑迪不仅经常高声叫骂着下流话，大吵大闹，还不分时间和场合斥责约翰逊是间谍，常常吓得约翰逊魂不附体。

更要命的是，黑迪没完没了地强迫约翰逊与她同房，让约翰逊不堪忍受。约翰逊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但医院坚决不接收，要求他再等些时候。可是一等再等医院就是拖着不接收。无计可施的约翰逊决定一走了之。

约翰逊在阿林顿的弗吉尼亚银行取出仅有的2200美元存款，先是驾着汽车漫无目标地兜来兜去，后来

坐上长途班车，一路颠簸流浪到拉斯维加斯，租了一间小房间，天天出入赌场。失踪30天后，陆军把约翰逊视为逃兵了，请求联邦调查局对他进行追捕。

联邦调查局的两个特工访问了黑迪，从她颠三倒四的话语中特工大致搞清楚了约翰逊出逃的原因，本来调查到此结束了。谁知过了几天，特工得知黑迪在里德陆军医院治疗精神病时曾几次说到自己的丈夫是间谍。于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又来找黑迪，特工们是有备而来，交谈没有几个回合，黑迪捂脸哭泣，把她知道的所有事情语无伦次地全部供述了。

联邦调查局紧急与陆军联系，陆军当局迅速地证实了一些事实，这样，通过黑迪联邦调查局挖出了一个间谍网络。

第二天早晨，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来到阿林顿城明特肯鲍的住处，当时他在那里做房地产推销员，特工发现他已经跑了。3天后，明特肯鲍在北加利福尼亚被捕，经审讯他招供了一切。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在各地搜捕约翰逊。

1964年11月25日，走投无路的约翰逊走进雷诺市警察局投案自首，承认自己是个逃犯。此时他已身无

半文，外面混不下去了。不久，他被押送到华盛顿，接受间谍案的调查，这才明白自己做克格勃间谍的事败露了，他供认了一切。

1965年7月，约翰逊和明特肯鲍各自被判处25年徒刑，但他给美国和西欧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挽回的。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其中有些是无法弥补的和无法精确计算的。假如我们现在对这些损失尚未察觉，而战争已经爆发，美国一定会遭受致命的打击。”

1972年5月18日，约翰逊的儿子罗伯特从越南战场归来，提出要去监狱探望自己的父亲，约翰逊非常高兴。然而罗伯特走进探视间，当他父亲伸出手想和儿子握手时，罗伯特突然拔出匕首刺进父亲的胸膛。一个小时后，约翰逊痛苦地死去，时年52岁。

罗伯特对自己杀父的行为拒绝做任何解释，面对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询问，只说这是个人的私事。

第十七章 震惊世界的罗森伯格夫妇间谍案

20世纪50年代，苏联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英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被警方以间谍罪逮捕，一大批的克格勃间谍相继暴露，美国的罗森伯格夫妇因之被判处死刑，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对因间谍罪被处死的平民。判决震惊了整个世界，连罗马教皇也向艾森豪威尔发出呼吁，希望能免除罗森伯格夫妇一死。

50多年后，一段尘封的历史暴露出令人震惊的真相：罗森伯格夫妇间谍案中女主角埃塞尔的弟弟大卫·格林格拉斯当年为了明哲

保身，作伪证把姐姐与姐夫送上了断头台。

初涉谍海

朱利叶斯·罗森伯格，1918年5月出生，他和妻子埃塞尔·罗森伯格都是美籍犹太人。由于从小表现出对宗教的强烈兴趣，他的父母原本以为他会成为一个牧师。没想到，他在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热爱社会活动，信仰共产主义，崇拜社会主义苏联，加入了共青团。

罗森伯格的妻子埃塞尔，1915年11月28日生于纽约。埃塞尔天资聪明，从小学习成绩优秀，还有一副好嗓子，成为一名歌唱家是她儿时的梦想。15岁中学毕业后她进入一家船业公司做了秘书。其间，埃塞尔对政治发生了浓厚兴趣，开始频频参与企业工人组织的活动，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罗森伯格与埃塞尔可谓一见钟情。相识不久，埃塞尔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政治理想与自己一致的年轻人。1939年两人结婚，婚后的生活十分甜蜜，但由于埃塞尔身体不好，不得不辞掉工作做起全职主妇。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一家人已经过上了舒适的中产阶

级生活。他们的两个儿子迈克和罗伯特相继出世，夫妻俩沉浸在为人父母的喜悦中，享受着家庭生活带来的乐趣。

1942年春，罗森伯格在纽约一家无线电厂担任信号检查员，由于工作关系，罗森伯格能够接触到许多有关电子工业发展的新情况。他具有的专长和身份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苏联驻纽约贸易机构的克格勃人员塞米诺夫主动与罗森伯格接触。

罗森伯格思想倾向社会主义苏联，非常赞赏像苏联这样替普通老百姓谋福利的国家。加之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又是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力，罗森伯格非常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有这些思想基础，塞米诺夫很快获得罗森伯格的好感，在他的极力鼓动下，罗森伯格答应为克格勃服务。

1943年，塞米诺夫奉命回国。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里的克格勃特工费克利索夫接替了他的工作。11月的一个星期天，费克利索夫在确信自己没有跟踪后走进纽约曼哈顿商业区的一个电话亭，给罗森伯格的寓所打了一个电话。费克利索夫通报了自己的姓名，

双方用预定暗语聊了几句。不一会儿罗森伯格开车过来了，费克利索夫警觉地扫视四周，快步跨进罗森伯格的汽车。然后，汽车直奔郊外，在一家小酒店，费克利索夫提出了莫斯科所需要的情报。

起初，罗森伯格将有价值的资料偷出，夜晚躲在家里用手抄一遍，再联系时间给费克利索夫交货。一般资料留在家里的时间很长，容易被人发现，不安全，再说手抄也容易出差错。1944年6月，费克利索夫交给罗森伯格一台莱卡照相机，罗森伯格开始用相机拍摄文件，既安全效率又高，提供的情报数量也增大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森伯格向苏联提供了美国国防工业的一些重大技术发现，其中最有价值的是美国无线电引信军事情报。无线电引信是导弹的“千里眼”，它可以大大提高导弹命中目标的精确度。美国军方对无线电引信的生产是高度保密的，防范十分严密。罗森伯格直接掌握的机密资料不多，但他是一个非常心细的人，利用工作之便，凭着极大的耐心和专业知识的留心搜集。他积累了一些废弃的引信零件组装出一个完整的引信。后来，他又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

把引信带出工厂：预先算好清洁工运送垃圾的时间，每天把一个部件当做废品扔进垃圾桶，随后跟着运垃圾的车辆，在垃圾场把零件捡回来。如此操作十几次后一部完整的引信就偷运出了工厂。

12月27日，费克利索夫和罗森伯格在郊区一家饭店里见面。用完晚餐，费克利索夫起身顺手将餐桌下一个礼品盒提起，对罗森伯格微笑着说他先走一步，就这样，引信被当做礼品拿走了。费克利索夫将引信送到莫斯科。苏联军工部门立即进行细致的研究，仿造出自己的产品，大大提高了苏联导弹的命中率。

内弟入伙

1946年夏天，克格勃总部通知费克利索夫，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苏联于二战期间在美国建立起来的间谍网，克格勃在纽约的一切秘密活动都要立即停止。这是因为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情报机构得以从国外战场上抽出身来对准国内。负责侦听和破译工作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韦诺纳”的绝密计划，目的是要破译苏联的通讯密码，这个计划很快被莫斯科知道了，所以急令在美国的间谍停止活动。一个闷

热的夜晚，费克利索夫和罗森伯格在纽约的一家饭店见面，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费克利索夫告诉罗森伯格今后同克格勃恢复联系的暗号和地点，并给他1000美元以备急用。

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停止了一切间谍活动，罗森伯格可以好好休整一下，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搅乱了夫妇俩风平浪静的生活。罗森伯格二战前期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二战结束后罗森伯格事实上退出了共产党，几乎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早年一块参加社会活动的一名朋友因事被联邦调查局搜了家，特工们在他家找到罗森伯格的党员证。经联邦调查局进一步调查，发现罗森伯格原来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公司接到联邦调查局的书面通知，决定辞退罗森伯格。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二战结束了，“冷战”接踵而来，美苏不再是同盟伙伴，而变成了利益争夺的对手。在美国看来，任何与苏联和共产主义挂钩的人都是危险的，而潜伏在美国军工部门的共产主义者则更加危险。

罗森伯格的内弟大卫·格林格拉斯是一名青年军官，1944年，他作为一名军队里的机械师被派到洛斯

阿拉莫斯工作，这里是美国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一个重要的原子实验室。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成熟掌握原子弹制造技术的国家，美国对自己的“独门绝技”自然严加看管，决不能让它泄露到外人手中。而大卫·格林格拉斯的特殊身份很容易获取核武器研究项目的有关机密。

1945年1月，格林格拉斯回到纽约度假，与罗森伯格说起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工程，以及参与这项工程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并画了一张高能爆炸内引爆装置模型的草图，介绍了这项工程的大概情况。罗森伯格希望格林格拉斯搞一些原子弹方面的秘密情报，并说明这些情报是送给苏联人，美国是苏联的盟友，苏联人理应得到这些情报。

当时格林格拉斯没有表态，说自己要回去好好想一想。第二天他表示愿意同罗森伯格合作，提供洛斯阿拉莫斯工程的总格局情况以及雇员的人数，正在进行的试验和在那里工作的科学家名单。

1945年9月又轮到格林格拉斯休假，他从洛斯阿拉莫斯回到家里，与姐夫罗森伯格又聊起原子弹的情况，并把自己所了解的全部写了下来，还画了一张草

图。格林格拉斯提供的情报经罗森伯格整理，源源不断地送往莫斯科。罗森伯格向格林格拉斯支付了丰厚的酬劳。就这样，格林格拉斯成为了罗森伯格的内线，开始通过各种渠道窃取有关原子弹的绝密情报。

绝情陷害

1949年8月29日，苏联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核武器的军事强国。这个消息令苏联人欢欣鼓舞，同时也让美国人感觉到不祥的征兆。美国政府坚信苏联绝不具备独立研制原子弹的能力，因此怀疑一定有间谍在暗中帮助苏联人，搜集美国原子弹方面的机密情报。1950年2月，在英国哈鲁艾尔原子能科研中心，时任理论物理组组长的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被警方以间谍罪逮捕，指控他向苏联提供了英美两国有关原子弹制造的绝密情报。

福克斯一案震惊了世界，福克斯被西方认为对苏联原子弹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审问中，福克斯供认他的接头人叫拉蒙德，自称是一个化学家，但他对拉蒙德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于是，英美两国

的安全机构全力寻找这个叫拉蒙德的人。后来，联邦调查局把怀疑对象集中到哈里·戈尔德身上，因为3年前联邦调查局侦破了一起间谍案，审讯中案犯曾说起过哈里·戈尔德，而这个人正是个化学专家。

1950年5月23日，警方搜查了哈里·戈尔德的房间，随即将他逮捕，戈尔德承认自己就是与福克斯接头的拉蒙德，对从事的间谍活动供认不讳。戈尔德在候审期间向联邦调查局警员交代，他除了与福克斯联系外，1945年还曾去阿尔伯克基与一位美国低级军官联系，收取洛斯阿拉莫斯工程的原子能资料。这个军官不到30岁，身高大概1.75米左右，长着黑头发，体格非常健壮，他的妻子可能叫露丝。

根据戈尔德的口供，联邦调查局列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戈尔德辨认了老半天说，其中有两个名字像是与他联系过的军官的名字。第二天，联邦调查局给他看了一些相片，戈尔德从中挑出了一张说此人极像洛斯阿拉莫斯的那个间谍，而戈尔德指认的那个人正是大卫·格林格拉斯。

1946年2月，格林格拉斯从军队退役后与他的姐夫罗森伯格一起在布鲁克林工程公司上班。他曾经以收

集纪念品为名大肆盗窃政府财产，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并搜查了他的房间，那张照片就是在格林格拉斯的房间找到的。戈尔德认出了格林格拉斯，从而也把罗森伯格暴露出来。

戈尔德的被捕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纽约先驱论坛报》刊登了戈尔德的大幅照片，罗森伯格拿着一份报纸来找格林格拉斯，他让格林格拉斯看看是不是与他接头的那个人，格林格拉斯说不是那个人，格林格拉斯的老婆也坚持说不是。罗森伯格却肯定地说就是那个人。接着罗森伯格建议他们夫妇立刻离开美国到苏联去。他们夫妇坚决不同意，说他们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分手时，罗森伯格给了他们夫妇1000美元的旧钞，希望他们早点做决定。几天以后，罗森伯格再次找到格林格拉斯，又是一番苦口婆心，讲清楚了事态的严重性。格林格拉斯有些烦了，就哄骗罗森伯格说，他们正在着手准备离开美国。这次罗森伯格又给了他们4000美元，露丝高兴地收了下来。

1950年7月15日下午，两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敲响了格林格拉斯的大门，出示了搜查令，特工在房间找到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没有发现其他有用

的证据。在一堆照片中特工拿走了一张格林格拉斯身着军服与妻子的合影，正在联邦调查局受审的戈尔德看了照片，肯定地说就是他。16日，格林格拉斯被逮捕。走进审讯室，他就供出了自己的老婆和姐夫罗森伯格，但没有牵连到他的姐姐。格林格拉斯告诉警方自己只是遭人利用，真正的幕后主谋是他的姐夫朱利叶斯·罗森伯格。

罗森伯格被联邦调查局传讯，但他矢口否认与间谍活动有任何联系。

7月17日，格林格拉斯的老婆露丝供出了埃塞尔·罗森伯格，并说罗森伯格在餐桌上让露丝说服格林格拉斯提供情报，当时埃塞尔一直在场，也就是说，埃塞尔也参与了间谍活动。两天后，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是被蒙骗的，大卫·格林格拉斯也指控了他的姐姐埃塞尔，并向警方表示愿意在法庭上作为证人指证他们。这天，朱利叶斯·罗森伯格被逮捕。8月11日，他的妻子埃塞尔·罗森伯格也被逮捕。

当时联邦调查局确实并没有掌握任何证据证明埃塞尔·罗森伯格也从事了间谍活动。然而，在以后的庭审中，格林格拉斯夫妇提供的证词却把他的姐姐埃塞

尔推上了断头台。

罗森伯格夫妇和格林格拉斯受到联邦大陪审团传讯后都以阴谋从事间谍活动罪受到起诉，格林格拉斯服罪，承认从事过间谍活动，并出庭作证。

格林格拉斯详细叙述了在洛斯阿拉莫斯服役期间，罗森伯格是如何诱惑他参与间谍活动的，他如何把搜集到的有关原子弹的机密情报交给罗森伯格，又是如何与戈尔德接头联系。他举证说罗森伯格曾送给他一个盒子，但只有一半，盒子的另一半在戈尔德手里，那是被用来做情报交接时的暗号。事后，他出示了盒子，确实与戈尔德提供的吻合。

格林格拉斯向法官揭发：他的姐夫罗森伯格在戈尔德间谍案爆发后多次怂恿他逃亡苏联，但都被他坚决拒绝了。后来，罗森伯格看见他迟迟不行动没有离开纽约去苏联的意思，又提出他至少必须先到墨西哥避避风头，为此给了他4000美元。那一捆钱被他用胶带粘好，一直藏在壁炉的烟道里，事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果然在烟道里找到了那笔钱。

联邦调查局还在罗森伯格家中找到了一些出境签证照片，再经过对为他拍摄这些照片的摄影师的调查

核实，证实罗森伯格也有逃往墨西哥的打算。因此联邦调查局断定，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确实是一名长期潜伏在美国的苏联间谍。

在说到自己的姐姐时，格林格拉斯口气坚决地说：“她有一架‘雷明顿’牌便携式打字机，我经常看到她在秘密地打文件，这无疑是在为苏联情报部门服务。”

检察院在掌握了充分证据之后对罗森伯格夫妇提起诉讼。1951年3月6日，纽约联邦法院开庭审理罗森伯格夫妇，他们被指控共谋从事违反“1917年间谍法案”的间谍活动，对这种罪名的最重处罚是死刑或3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检察官指控三位被告：在战争期间，在我们历史的紧要关头参与反对我国的密谋活动。他说，将会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罗森伯格夫妇是如何劝说格林格拉斯从事间谍活动的，而他们通过格林格拉斯窃取了关系到美国国家生存和世界和平的武器——原子弹的情报。

法庭强调由于案件触及军事机密，不便公布罗森伯格夫妇所犯罪行的具体细节。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苏联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最大的敌人，他们决不会饶恕投敌叛国者。因此尽管律师、群众等社会各界强烈谴责、抗议审判结果，但政府仍然没有改变决定。这时东西方“冷战”已经开始，美苏关系非常紧张，美国国内弥漫着强烈的反共情绪。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对罗森伯格夫妇的审判一开始就笼罩着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罗森伯格夫妇在辩护律师布洛克父子的陪伴下镇定自若地走上法庭，显示出独具的严肃和冷静，仿佛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所有人都在期盼目睹一场唇枪舌剑、精彩绝伦的世纪审判，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证人们依次出庭指证罗森伯格夫妇之后，夫妇俩表现得非常平淡。罗森伯格拒不承认自己是间谍，但当要求对此作出解释时，他说除了在法庭上听到过的以外，他说不出原子弹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学过核物理等课程，他没有试图劝说格林格拉斯夫妇离开这个国家，也没有给他们夫妇提供过旅费，他和妻子根本没打算逃离这个国家。总之，否定了对他所有的指控，表现得既傲慢又不合作。而埃塞尔和她的丈夫一样，甚至还表现出对法庭的藐视，她全面证实了丈夫的证

言，宣称自己是美国的忠实公民，从未参与过间谍活动。她强调说，她弟弟和弟妹说的一切是假的。

陪审团原本就比较信服人证物证，再加上被告夫妇态度冷漠，甚至有藐视法庭的味道，陪审员们失去了对罗森伯格夫妇的同情心。

1951年4月9日，纽约联邦法院重新开庭，法官考夫曼当庭宣布：“根据已被证实的罪行，判处罗森伯格夫妇死刑，在5月21日星期一开始的一周内依法执行。”法官是这样陈述量刑理由的：罗森伯格夫妇的罪行比谋杀还要严重。在杀人案中，一个犯人杀掉的只是他手下的受害者，而罗森伯格夫妇的行为使苏联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的预言提前好几年制成了原子弹。考夫曼认为：共产党人因此才侵略朝鲜，造成了5万多人的伤亡。也许还有上百万无辜的人为他们的叛国行为付出代价。

考夫曼法官说，埃塞尔·罗森伯格在本案中非但没有劝阻她丈夫从事那些卑鄙行径，反而加以鼓励和帮助。在这一罪行中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同谋。埃塞尔申辩说：“事实上，除了在审判期间我听到的情况外，我不知道任何别的情况。我在法庭上讲的都是我知道的

真实情况，现在我不打算编造谎话。”

坦然赴死

宣判后的当天深夜，罗森伯格夫妇被转押到新新监狱的死囚牢房。两人的牢房只相隔二三十米，他们大声呼唤对方的爱称，相互鼓励。埃塞尔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她唱起歌剧《蝴蝶夫人》中有名的唱段《他将在晴朗的日子归来》。犯人不约而同地为她鼓起掌。罗森伯格非常激动，突然叫道：“埃塞尔，再唱另一段。”埃塞尔唱起同一歌剧中的《啊！愉快的夜晚》。纯正优美的歌声感染了监狱里所有的人，一名犯人甚至觉得是在听音乐会。此后，在被囚禁在新新监狱的漫长日子里，每当埃塞尔在这边唱歌的时候，罗森伯格就能听到，她总能用甜美的歌声消除丈夫的疑惧。

4月10日，法院开庭审判格林格拉斯，本来以为揭发了自己的姐姐和姐夫，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会让他获得很轻的判决，结果地区检察官一开口就提议判他15年徒刑，后来法官考夫曼果然判处格林格拉斯15年徒刑。

罗森伯格夫妇通过律师提出了上诉，后来又有来自社会各方要求延期执行的呼吁书、请愿书和申请书。法官提出的行刑日期一再延期。在漫长的等待中，他们只能在每周四下午才能见面。除此之外，唯一的联系就是信件，夫妻俩交换了大量的信件，他们在信件中互诉衷肠，相互鼓励。这些情意绵绵的信件同时被他们的律师复制，用在他们的孩子所写的《我们是你们的儿子》一书中，被广泛阅读。这些感人至深的信件使罗森伯格夫妇得到广泛的同情。

1953年6月10日，上级法院最后驳回罗森伯格夫妇的上诉，决定于6月18日行刑（后又延期一天）。从6月10日至18日，罗森伯格夫妇间谍案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轰动。世界各地发生了几百起支持罗森伯格夫妇的示威游行。罗马教皇向艾森豪威尔发出呼吁，希望总统能免除罗森伯格夫妇一死。在巴黎，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谴责美国“野蛮地迫害忠良”；在爱尔兰，中央情报局都柏林情报站遭到燃烧弹袭击；伦敦的交通被抗议者堵塞；意大利许多城市发生了持续15分钟的罢工。即使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们也存在意见分歧。那些相信罗森伯格夫妇是善良无

辜的人经常聚集在联邦法院门口，手举标语，为夫妇俩喊冤叫屈。

联邦调查局在量刑的同时指出，如果罗森伯格夫妇愿意招供，可以为他们减刑。但从作出死刑判决的1951年4月9日到执行死刑的1953年6月19日，罗森伯格夫妇始终拒绝跟联邦调查局合作，在审讯中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6月19日，死刑马上就要执行了，罗森伯格夫妇的两个儿子迈克和罗伯特在律师的带领下，站在白宫门前祈求美国总统不要让他们成为孤儿。总统对他们要求宽赦的申诉书还没有明确表态，罗森伯格夫妇剩下最后一线希望。下午2时，白宫新闻秘书告诉等候的记者：“总统拒绝介入此事。”艾森豪威尔不介入此事其实就是表示赞同法院判决。事后，总统在给他在韩国服兵役的儿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罗森伯格夫妇被处死，只是死了两个人，但他们向苏联提供的原子弹制造技术，却能杀死成千上万的人。”



朱利斯·罗森博格



埃塞尔·罗森博格

罗森伯格夫妇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以“间谍罪”处死的平民，这一间谍案曾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引起巨大影响。

1963年6月19日晚上8点整，行刑的时辰到了，朱利叶斯·罗森伯格走在通往行刑室长长的走廊上，一位年轻的犹太教教士走在前面，嘴里诵着《圣诗》第23首的词句：“是的，纵然我在死亡的幽谷漫步，我也不惧怕魔鬼，因为你与我同在……”他被固定在电椅上，一条电极接到他腿上，另一条电极连着头盔戴到他头上，此时，他平静地凝视着前方，嘴角略显一丝笑意。刽子手合上了电闸，高达2000伏的电流穿过罗森伯格的身体。8点6分，监狱看守宣布罗森伯格已经死

亡。

埃塞尔紧随其后，她异常平静地与两年来一直看护她的女看守吻别，然后径直走上电椅。不幸的是埃塞尔在接受第一次电击后没有死亡，于是行刑人员给她进行了第二次，从她的头部一次又一次冒出一缕缕白烟，情形惨不忍睹，10分钟后埃塞尔也死去。

大卫·格林格拉斯在监狱服刑不到10年于1960年获释出狱，他和妻子团聚后，两人隐姓埋名过着隐居生活。直到2001年，79岁的格林格拉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时事》杂志采访时，出人意料地表示自己曾在50年前的审判时作了伪证。格林格拉斯承认自己确实是在姐夫罗森伯格的鼓动下为苏联提供过有关原子研究以及核引爆器的情报。但针对姐姐的指控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格林格拉斯不无坦白地说，当时他之所以将姐姐、姐夫一并指控为主谋，是为了替自己和妻子洗脱罪名。担心妻子被卷入其中并坐牢才因此说谎，让姐姐当了妻子的替罪羊，他也因此这些供词而逃过死刑。

在当年的证词中，他指控姐姐埃塞尔曾用一台“雷明顿”牌打字机为他打印向莫斯科传递情报的副本，在

检方看来这正充分证明了埃塞尔的间谍身份，法院也正是因此给埃塞尔定了罪。但事到如今，格林格拉斯才承认这些不过是他为了自保编造的谎言：“我不知道谁打印了这份材料，坦率地说，我都记不起是否曾有人打印过那份材料，我对当初发生的已经失去记忆……我没有想到这些话会对埃塞尔造成怎样的影响。”

格林格拉斯承认自己时常被这段往事困扰，但他的妻子总这样安慰他：“看，我们还活着。”格林格拉斯说，如果有一天遇到两个外甥，他会跟他们说，对他们父母的死感到难过，但他不会为当初作伪证道歉。“我并不知道谁下达了死刑令。既然当年出卖了自己家人，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我吃得下、睡得着。”虽然他已经是快入土的老人，却仍然是一副无赖的嘴脸。

事实早已证明，埃塞尔·罗森伯格对丈夫的行为虽然表示支持，但埃塞尔自己并不是间谍，她从来没有同克格勃工作人员见过面，被判处死刑是不公正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开了原子弹间谍案的档案，档案也证实了这种观点：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确实是苏联

的间谍，而埃塞尔·罗森伯格却从未参与。

第十八章 女船王的丈夫竟是克格勃

女船王克里斯蒂娜经历了两次失意的婚姻后把绣球抛给了一位苏联人，他们的婚事曾使世界为之一震。

整个婚姻的过程都是克格勃一手设计的，企图利用“美男计”掌控希腊女船王，进而控制这支排位世界第三的巨轮公司。苏联人的计划顺利得手，女船王陷入情网不可自拔，与克格勃“乌鸦”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西方国家花了很大力气才使女船王从情网中挣扎出来，得以结束这桩以政治为目的、以色情为手段的婚姻。

希腊女船王的两次失败婚姻

奥纳西斯是世界著名船王，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世界屈指可数的大富豪。他的家族拥有一支总吨位为600万吨共52艘巨轮的大船队，规模位列世界第三，在当时甚至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海军还要庞大。

船队总部设在蒙特卡罗，而船队则分散在世界各地。这个庞大的船队在12个国家中有90家公司，与217家银行有业务来往。中东的原油很大一部分由该船队运往世界各地，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从中东进口的石油也由该船队负责承运，因而这支船队对西方国家的石油供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这么说，奥纳西斯船队的一举一动直接牵动着世界石油运输业的神经。

希腊船王不仅拥有庞大的船队和金额达20亿美元的家产，还有一个供奥纳西斯家族休闲游乐的岛屿。这个小岛叫斯科皮奥斯岛，总面积达800平方公里。斯科皮奥斯岛风景秀丽，是扼制地中海北端的战略要地。

这位希腊航运巨头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叫亚历山大，女儿叫克里斯蒂娜。他对爱子寄以厚

望，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对女儿视如掌上明珠，自小百般宠爱。1953年，克里斯蒂娜3岁时，奥纳西斯斥资2000万美元建造了一艘以女儿名字命名的、世界上最豪华的私人游艇。

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克里斯蒂娜娇生惯养，倔强任性，是一个地地道道挥金如土的千金小姐。她每年从父亲的信托基金中领取75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用于乘私人飞机去世界各地旅游观光。无忧无虑、呼风唤雨的生活养成了克里斯蒂娜高傲孤僻、目空一切的性格。

阿里斯托特·奥纳西斯跟他的结发妻子离异后，1968年同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结了婚，这桩婚事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然而，人们的好奇心还没有淡化，这对夫妇就已经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了。

令老船王悲痛欲绝的事发生了：1973年1月22日，24岁的儿子亚历山大乘私人飞机失事，脑部受到重伤。老船王派专机请英美等国的名医前来抢救，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一天后，亚历山大终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儿子横祸而死，妻子缺少爱心，老船王在双重

打击下一蹶不振，从此大病缠身，长期卧床。

1975年3月15日，奥纳西斯因普通的伤风感冒引起了并发症，经多方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他唯一的继承人——24岁的女儿克里斯蒂娜成为了庞大的奥纳西斯轮船公司的女船王，并且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她继承了遍及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海运公司，以及造船、旅游、航空、矿山、地产等产业，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私人商船队与1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

巨大的遗产由她一人继承，她深感责任重大。克里斯蒂娜继承父业登上船王的宝座不久就面临着艰难的困境：世界航运业进入大萧条时期。这是航运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其持续时间之久、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连续5年海运业都没有恢复元气，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船只被迫闲置，奥林匹克海运公司也受到巨大的冲击。公司被迫取消老船王在1973年订购的6艘超级油轮，为此被罚款1700万美元。27万吨的奥林匹克“勇敢”号油轮第一次远航中就遭搁浅，尽管从保险公司那里得到5000万美元的理赔，但仍有高达1000万美元的损失。

克里斯蒂娜的体内蕴藏着父亲勇斗好胜的血统，

敢于迎接挑战，果断地担当起重任。她在公司董事会上郑重宣布：“先生们，从现在起，奥林匹克海运公司任何需要做出决策的事都必须首先向我请示。”

与此同时，她深感自己知识远远不够，尤其业务上还比较陌生。父亲曾送她到纽约船运公司学习业务，但她并没有认真学习，只是应付一下。如今她才真正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一切都必须从头学起。她开始谦虚地请公司的高级职员、技术人员给她讲课，学习海运方面的知识和企业管理经验。克里斯蒂娜还仔细研读父亲留下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着老船王一生商场博弈获胜的奥秘，蕴藏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这笔无形资产给予克里斯蒂娜巨大帮助。她永远记住了父亲笔记里的一句话：把危机当做一次绝好的发展机遇。

克里斯蒂娜充满自信、机敏能干，终于以女强人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她开始改组奥林匹克海运公司的经营班子。父亲生前考虑到女儿年纪轻，不谙世事，在遗嘱中特别关照克里斯蒂娜要挽留和重用那些曾经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才。她完全遵照父命，并考虑到自己尚缺乏经验，决定在公司选出一位经验

丰富而又德高望重的人出任总经理，这样克里斯蒂娜毫不犹豫地把大权交给了公司元老安德森。安德森50多岁，希腊裔美国人，担任过艾克森石油公司油轮运输部主管，经营过世界上最大的包船业务。他善于经营大笔交易，足智多谋，具有世界一流企业家的才干。安德森出任公司总经理后迅速稳定了公司的局面，而下属们都像对待老船王一样对克里斯蒂娜忠心耿耿。

由于世界石油危机，奥林匹克海运公司业务严重衰退，公司大批海轮也闲置在地中海沿岸港口。为了度过困境，克里斯蒂娜及时调整了自己的船队，将那些没有竞争力、设备落后的船只果断淘汰掉。截至1983年，她把11艘过时的巨型油轮送进了拆船场。同时，又将10艘大油轮租给大石油公司营运，这样公司可以赢得稳定的巨额收入。最后她又毅然决定停运船队中14艘油耗大、赢利小的船只，同时向银行贷款购进5艘省油的中型油轮，从而更新优化了船队，成了一支更加现代化、更具竞争力的船队。

这样一来，克里斯蒂娜的船队不仅没有在大萧条中破产，反而略有盈余，每年的收入保持在1500～

2000万美元之间。在全球海运公司纷纷倒闭的背景下，克里斯蒂娜所取得的成绩无疑令人惊喜，让世人对她的经营才能刮目相看。克里斯蒂娜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不仅守住了老船王的家业，而且有了长足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老船王同杰奎琳离婚后，杰奎琳一直与克里斯蒂娜争夺奥纳西斯的遗产，这个遗产官司打了18个月。1977年，希腊最高法院判决克里斯蒂娜以2600万美元的款额收购杰奎琳名下的不动产，其中包括斯科皮奥斯岛和豪华游艇中杰奎琳所占有的份额。从此杰奎琳在奥林匹克海运公司不存有股票，也不是董事会的董事，总之与老船王的遗产毫无关系了。对这个仅与父亲做了几年夫妻的女人，克里斯蒂娜并没有好感。

事业上的成功让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成了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但她长相平平，谈不上美貌。出生在那种特殊的家庭环境，加上父母缺乏感情、过早离婚的影响，使她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孤僻放纵、目空一切、喜怒无常的性格。因地位特殊，她的婚姻关系关系到整个船队的命运，一直以来受到世人瞩目。克里斯蒂娜不到30岁却已结过两次婚。她在婚姻上一波

三折的传奇经历也成为西方报刊争相报道的热门话题。

1970年，老船王奥纳西斯对外宣称：女儿克里斯蒂娜和希腊另一家大航运公司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安德烈亚迪斯已正式订婚。从这门婚事上，人们不难发现老船王把女儿的终身大事也纳入到他船队的未来发展规划中。然而事与愿违，克里斯蒂娜对父亲包办的这门亲事采取排斥的态度。更令人吃惊的是，1971年夏，克里斯蒂娜毁弃婚约，违背父命，下嫁给美国的一个年近51岁的房地产商布克。老船王一怒之下，也采取了极端办法，断绝了每年给克里斯蒂娜750万的生活费用。一向娇生惯养、挥金如土的克里斯蒂娜万万没有想到父亲会来这一手，顿时感到手足无措，她只好于当年12月12日宣布与布克离婚。克里斯蒂娜经历了第一次婚姻失败。

1975年2月，生命垂危中的老船王仍念念不忘与实力雄厚的亚历山大船运公司合并的计划，他要求女儿克里斯蒂娜答应嫁给亚历山大·安德烈亚迪斯。看着即将离开人世的父亲，克里斯蒂娜百感交集，不忍心拒绝老父亲最后的要求。为了让父亲满意地离开人世，

她同意了这门亲事。 1975年7月，老船王死后仅3个月，克里斯蒂娜第二次结婚，新郎是希腊船务和银行业大王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安德烈亚迪斯。克里斯蒂娜本来就对这门婚事十万个不愿意，只是遵奉父命勉强结了婚。结婚后夫妻俩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感情十分不牢固。尤其婚后，克里斯蒂娜发现这个银行家之子、苏黎世大学的高才生原来是个不通世事的书呆子，彼此的性格格格不入，根本说不到一块。这场婚姻勉强维持不到两年，便不欢而散了。她对人说：“在我短暂的人生中未曾有过多少欢乐！”

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她能把自己的“轮船王国”管理得有条不紊，然而她在爱情的征途中却屡战屡败，找不到真正的爱情。她所说的真正的爱情，就是所爱之人是真心实意地爱克里斯蒂娜本人，而不是爱着她的钱财。遇上这样的意中人，克里斯蒂娜就愿意把一切托付给他。

巧设“美男计”

苏联对希腊油船队早就表露出极大的兴趣，一旦苏联握有这支船队，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控制中东石

油的出口，使西方各发达国家不能及时得到石油，进而严重影响它们高速发展的工业，造成国家内部不稳定，从而战胜它们。为此，苏联最高当局密令克格勃要想尽一切办法与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拉上关系，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达到控制她的目的，让她为苏联的战略目的服务。

由于历史的原因，希腊油船队与西方各发达国家业务联系比较多，关系也十分密切，这点对苏联是极为不利的。苏联一直在寻找时机。他们对船队的女继承人克里斯蒂娜更是百倍关注，对她的脾性、爱好、婚姻状况了如指掌。

时机很快就被他们等到了。1976年，世界爆发了石油危机，中东各产油国接连不断地宣告石油减产。克里斯蒂娜庞大的船队因油源不足，生意清淡，陷于不景气之中。于是，公司调整经营策略，决定将部分船只租赁出去，这给克格勃提供了接近奥林匹克海运公司的绝好机会。苏联当局决定，让苏联航运公司出面同克里斯蒂娜的奥林匹克海运公司谈判租船业务，苏联准备租用5艘巨轮，租期5年，并特别邀请克里斯蒂娜访问莫斯科。

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接到苏联航运公司打算租用大型油轮的电报后心中十分高兴。一旦租赁协议达成，就可解奥林匹克海运公司的燃眉之急。于是，她拿定主意要尽力促成这件事，并决定前往莫斯科，亲自出马与苏联航运公司谈判。

克格勃的初步目的达到了。克格勃进行了下一步策划，即让她坠入情网，和她建立亲密关系，达到控制她的目的。为此，吸引女船王的男人首先应该精通航运业务，其次感情细腻，非常成熟。因为克里斯蒂娜是一个经历了两次失败婚姻的年轻女人，更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大企业家。

克格勃物色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人与克里斯蒂娜打交道，他叫谢尔盖·考佐夫，公开身份是苏联海运部货船司油船科科长。考佐夫毕业于莫斯科外语学院（克格勃专门培训情报人员的学校），这所学校毕业的特工女的叫“燕子”，男的称为“乌鸦”，是专门以色情手段执行任务的克格勃间谍。

考佐夫年届40岁，已有妻女，相貌并不英俊，头发稀疏，但两眼炯炯有神，具有一种讨女人喜欢的奇特魅力。此外，他谈吐风雅，很会甜言蜜语，往往能

让女人十分开心。而且他精明干练，思路敏捷的办事能力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一行人马飞到莫斯科。苏联航运公司把他们当成贵宾进行了隆重的接待。而且接待规格相当高，苏联政府的要员也出席了宴会。航运公司总经理在致欢迎词时对克里斯蒂娜本人进行了十分得体的赞扬，女船王听了心里感到特别舒坦。接着又频频举杯敬酒，表示了亲密合作的诚意。

第二天进入谈判，其貌不扬的苏方谈判主角考佐夫起初并没有引起克里斯蒂娜注意，随着谈判的深入，克里斯蒂娜发现坐在对面的这位身材不高的中年人具备极强的业务能力，精明而不乏风趣，果敢而充满细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魅力。

双方就希腊油船的吨位、船况、租用时间、租金、船的维修、船员安排以及海关限制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商谈。考佐夫对所谈的问题不仅十分熟悉，而且提出的意见既深刻又中肯，该坚持的坚持，该让步的让步，有理有据，让对方心悦诚服。他思路清晰，语言简洁明了，并能切中要害。考佐夫在谈判中的表现让女船王十分钦佩。自她主管奥林匹克

海运公司以来，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像考佐夫这样头脑冷静、反应敏捷、举止优雅的谈判对手。总之，这位精通航运业务而难对付的谈判高手在克里斯蒂娜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双方最后顺利地达成了满意的协议，都感到今后合作前景美好，心情十分舒畅。尤其是克里斯蒂娜和考佐夫两位谈判主角，通过这次交往，互相有了深层的了解，博得了对方的好感。

当天晚上，考佐夫借故赶到克里斯蒂娜住的宾馆，向女船王表示友好，庆贺合作成功。克里斯蒂娜以主人的身份热情款待了他。两个人在客厅里喝着法国上等香槟，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聊天。考佐夫口齿伶俐，语言风趣，知识渊博，俨然一个大学者。考佐夫总是恰到好处地向女船王大献殷勤，并不时地投出含情脉脉的目光。当他们两人谈兴正浓时，考佐夫又恰到好处地很有礼貌地站起来，准备告辞。

第二天下午，克里斯蒂娜对考佐夫进行了礼节性回访，女船王内心隐隐约有想见到考佐夫的愿望。在克里斯蒂娜看来，考佐夫不仅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且在她的油船队面临困境时能鼎力相

助，实在是她心目中理想的情人。这位经过专门训练的克格勃“乌鸦”自然心领神会，更加热情地对克里斯蒂娜表示了体贴和关怀，因此，他们这次见面谈话兴致更浓，也更随便。他借斟酒之机，顺势大胆地紧靠克里斯蒂娜坐了下来，并借酒盖脸，在谈话中常辅以动作，有意无意地去接触女船王的身体。对此，克里斯蒂娜不但不躲闪，而且红光满面，大有来者不拒之意。

此后，克里斯蒂娜又与考佐夫单独幽会了几次，他们的感情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而与日俱增。本来谈判圆满结束后，按照原计划安排的日程到了克里斯蒂娜回国的日期了，但这位女船王因遇到了心上人就临时决定再在莫斯科逗留几天。苏联当局表示真诚的欢迎，考佐夫更是形影不离地陪着她游山玩水，调情逗乐。考佐夫的殷勤体贴正好填补了克里斯蒂娜两次婚姻破裂后心灵上的空虚，使她深陷爱河而不能自拔，自以为心中渴望的人终于找到了。

克格勃获知克里斯蒂娜在巴黎有一栋别墅，而且她很喜欢住在巴黎。克格勃为了使他们有机会进行经常性的接触，便派考佐夫前往巴黎，担任苏联航运公

司驻法国办事处的主任。得知考佐夫到达巴黎后，克里斯蒂娜喜出望外。从此，考佐夫经常出入她的豪华别墅，并经常陪伴女船王漫游世界、游山逛水。

考佐夫与克里斯蒂娜频繁约会引起了法国情报部门的警惕，很快发现了他们的私情，并识破这是克格勃的“美男计”，企图控制女船王。此事对法国震动不小，他们委婉地对女船王进行了规劝，提出了忠告，但克里斯蒂娜对此毫不在意，仍然沉浸在恋爱的幸福中。

克格勃了解到克里斯蒂娜已深陷情网后便抓住时机让航运公司通知考佐夫，要他立即赶回莫斯科，有意在感情上折磨一下克里斯蒂娜。

考佐夫久不回巴黎，克里斯蒂娜心急如焚，有时一天十几个电话打到莫斯科，航运公司总是以种种理由，说考佐夫有重要的工作要做，一时离不开莫斯科。一向争强好胜、呼风唤雨的她怎能受得了这种望眼欲穿的苦恋，人都快疯狂了。撩起她热恋中的焦虑，这正是克格勃所需要的效果。

一天傍晚，克里斯蒂娜终于接到考佐夫的电话，他说自己一直在伦敦出差，如今闲言冷语太多了，给

她打电话很不方便，两天后他将回到莫斯科，考佐夫希望在莫斯科见到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惊喜万分，不假思索地满口答应下来。1976年10月的一天，克里斯蒂娜以谈租船业务为由，乘坐她的私人专机抵达莫斯科。考佐夫捧着鲜花在机场迎接了她。克里斯蒂娜在莫斯科的几天，对考佐夫含情脉脉，形影不离。经过这次时间不算长的分离，克里斯蒂娜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考佐夫，她找到了真爱。于是，两人花前月下，甜甜蜜蜜，很快便私订终身，并约定各自尽快地离婚。

克里斯蒂娜回国后开始办理与安德烈亚迪斯的离婚手续。在克格勃的操办下，考佐夫的离婚手续自然十分顺利。考佐夫不仅很快同他的苏联妻子娜塔沙离婚，而且官升一级，成为苏联航轮公司油轮部部长。

克里斯蒂娜觉得这是喜事临门，值得庆贺一番。于是由考佐夫出面大宴宾客，在酒会上考佐夫发布了他与克里斯蒂娜即将结婚的消息。

1978年8月1日，克里斯蒂娜身穿白色婚纱，挽着神采飞扬的考佐夫的手臂，在婚礼进行曲中，按俄国人的风俗举行了婚礼。新郎和新娘向结婚登记员宣

誓，保证将终身相爱，白头偕老。这位拥有亿万财富的希腊女船王与新郎住进莫斯科一套两室半的公寓里。克里斯蒂娜表示她将长期在苏联生活。当天，塔斯社发布了消息，顿时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

这时的克里斯蒂娜已完全陶醉在幸福、喜悦、憧憬未来的美梦之中，对考佐夫更是一往情深、倾心爱慕。她对前来采访她的新闻记者说：“我的适应性很强。我将不会惦记我已习惯的游船和夜总会的生活。我相当长时间不会回到那里去，我对在这里度过大部分时间将感到高兴。”她还亲自上市场排队购买家用食品，在午餐后自己动手洗碗。克里斯蒂娜过去的两次婚姻生活中都没有孩子，她在莫斯科新婚不久便表示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在这里诞生。”

在克里斯蒂娜的提议下，她和考佐夫一起到遥远的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畔共度蜜月。考佐夫对克里斯蒂娜继续大献殷勤，温存体贴，哄得女船王团团转。尤其是考佐夫的床上功夫更是佳妙绝伦，为博得克里斯蒂娜的欢心，他使出各种手段，不断地翻新花样，倾其所学，使得这个已结过两次婚的年轻女船王身心愉悦无比。

曲终人散

克里斯蒂娜对于此次婚姻称心如意的表示，使奥纳西斯家族和希腊官方深感忧虑。假如考佐夫夫人在苏联生下个小考佐夫来，遗产便将顺理成章地归入苏联人的腰包了。也就是说，奥纳西斯的庞大资产、船队和小岛就要落入苏联之手，那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雅典安全机关特别提到那个私人小岛，一旦被苏联人控制，那么这个岛屿将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希腊船王的头号主顾是美国。这支庞大的油船队一旦通过考佐夫之手被苏联控制，美国长期依赖的海外石油运输线就将受制于苏联，更为重要的是，那个风景秀丽的斯科皮奥斯岛，苏联人可不会仅仅用于休闲度假，极有可能把它作为苏联海军的一个基地，将为苏联进入东地中海提供极大的方便。而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也将受到严重威胁。

美国人恨得咬牙切齿，一口咬定考佐夫是克格勃间谍，并说得有根有据。西方国家各大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对女船王的婚事大肆报道。记者甚至当面质询克里斯蒂娜：“你的情人是克格勃间谍吗？”克里斯蒂娜

根本不相信美国中情局那一套，她反唇相讥：“你怎么知道他是克格勃间谍？难道他穿着间谍衣服和戴一副墨镜吗？我可以肯定他不是间谍，因为我爱他。”

10年前，克里斯蒂娜的父亲曾把瑞士一家银行买了下来，这家银行吸引了一批国际知名人士的秘密存款。而今克里斯蒂娜嫁往苏联，自然使这些富豪们忧心忡忡。一旦这家银行的业务机密泄露给了苏联，对他们无疑是极其不利的。他们纷纷致电瑞士的伯尔尼，试图解除这场特殊的婚姻。

慢慢地，一度被爱情蒙住双眼的克里斯蒂娜渐渐也觉察出考佐夫另有心机。考佐夫在平日看似探讨航运业务，实则是想了解西方各国石油供需矛盾，以及价格、运输等情报。后来，甚至以丈夫的身份出面直接干预油船队与西方国家的业务，这就引起了克里斯蒂娜的警觉。

新婚的热情刚刚过去，克里斯蒂娜开始对莫斯科刻板单调的生活感到了乏味。她劝说考佐夫搬到巴黎阔绰豪华的别墅里去住，在那里也便于管理船队。但考佐夫的护照一直申请不下来，克里斯蒂娜不得不告别自己的丈夫独自回到巴黎。然而，克里斯蒂娜刚

走，考佐夫就马上同他原来的妻子娜塔沙和女儿卡佳会面，并送给妻子裘皮、钻石等贵重物品。这件事传到克里斯蒂娜耳朵里，她大为光火，开始正视过去的种种传闻。这时克里斯蒂娜接到报告，公司同西方石油商谈判的机密文件、报表开始经常泄露出去，经希腊情报部门证实系奥纳西斯家族内部的苏联间谍所为。

回到巴黎不到一个月，一位克里斯蒂娜认识的记者来拜访女船王。他说：“考佐夫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给您带来了证据。”他边说边从黑皮包里拿出一摞照片。照片上的背景是她在莫斯科度过新婚之夜的家，而如今在“家”的客厅里坐着母女两人，记者指着她们说，一个是考佐夫的前妻娜塔沙，一个是考佐夫的女儿卡佳。克里斯蒂娜想起一些关于考佐夫的传言，她开始相信朋友们的忠告，克里斯蒂娜的感情彻底转变了，考佐夫的行为已让她无法容忍。其他的照片她不想看下去，克里斯蒂娜说：“你把照片和底片留下，这是一万法郎的现金支票，你快走吧。”

这名新闻记者走后，克里斯蒂娜又气又恼。在事实面前，她开始有所醒悟。冷静下来的克里斯蒂娜也

开始着手秘密调查，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她认真思考了与考佐夫恋爱到结婚的全部过程，她不得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克格勃一手导演和精心安排的。考佐夫确实是一只多情而狡猾的“乌鸦”。于是，她下决心同考佐夫离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奥纳西斯家族几代人挣下的这份家业毁在自己手中。她邀请了美国、法国和瑞士的律师为她办理离婚手续提供支持和咨询。

这位女船王也不愿把这段令她伤心的婚事和盘托出，不然，自己将成为别人的笑料，会自己毁掉自己的名声。她想好说好散，考佐夫看到了这一点，便趁机进行勒索。他提出离婚可以，但从做她丈夫的那一天起，女船王及其公司的一半收入应当属于他，考佐夫计算了一下，共计12250万美元。克里斯蒂娜又气又恼，顾不上脸面了，决定与他打离婚官司。

1980年2月，考佐夫最后同意以一条油轮为条件，结束与克里斯蒂娜这段不太光彩的婚姻。1980年5月，这对夫妻在瑞士圣莫里斯法庭上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克里斯蒂娜给了考佐夫一艘78000吨的油轮。至此，希腊女船王同苏联“乌鸦”的罗曼史才告结束。



陷入克格勃温柔陷阱的希腊女船王克里斯蒂娜

当时，克里斯蒂娜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则简短声明：两个星期前，我和谢尔盖·考佐夫在瑞士圣莫里斯离了婚。离婚是在和睦的状态下进行的。按照协议，他获得一艘油船。

声明内容简洁，语气平和，整个西方社会看到这项声明长吁一口气，危机终于过去了。

事实上，考佐夫在这桩婚姻中得到的并不像表面那么少，克格勃也不是一无所获。

西方国家包括希腊安全部门专家断言，一些石油生产国和美国的有关石油运输和储量的数字已经部分地泄露了。当时，奥纳西斯公司就伊朗国王是否下台的分析，以及在石油运输和储备上准备采取的措施已经不再是秘密了。英国《每日快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公开披露：“谢尔盖·考佐夫，这位娶克里斯蒂娜·奥纳西斯为妻的俄国人，直至他们上月末离异之前一直是克格勃的特务。他的任务是向莫斯科提供有关西方石油的储备、供应和运输的具体情报。”

1984年3月，克里斯蒂娜第四次披上婚纱，新郎是法国一家制药厂的继承人，名叫蒂埃里·鲁塞尔。婚礼盛况空前，诸多达官显贵纷纷出席。克里斯蒂娜又显

示出挥金如土的豪气，仅她的礼服上就嵌有1.5万颗金刚石、4000颗珠宝和2万米银丝，这种铺张实在令世人惊讶。1985年1月29日，女船王克里斯蒂娜在巴黎生下一个女儿，名为阿蒂娜，奥纳西斯海运帝国又有了新一代的继承人。有意思的是，离婚后的克里斯蒂娜仍然对考佐夫念念不忘，十分眷恋他们在一起的日子。而在英国从事航运业的考佐夫也不忘旧时的情人，仍经常去巴黎同女船王相会。即便后来克里斯蒂娜同法国人结婚，但婚后她与考佐夫依然藕断丝连，情意绵绵，有时还一起外出旅行。

第十九章 差点使“北约”瘫痪的间谍教授

上世纪50年代末期，“北约”的秘密文件源源不断地流往苏联，西方世界部署在华沙集团的间谍网络被破坏。对苏联而言，“北约”几乎已经不存在秘密。

造成这一切的克格勃间谍汉布尔顿，是英国经济学博士，加拿大拉法尔大学经济学教授，一位拉丁美洲问题的权威专家。因其卓越的贡献，当时的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与他会面。在西方间谍中，汉布尔顿是唯一得到过此殊荣的人。

在加拿大渥太华有一条名叫拉斯金的幽静街道，汉布尔顿的家坐落在街中间。这是一栋小巧玲珑、质

朴大方的砖瓦房，1922年5月4日汉布尔顿就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乔治·汉布尔顿是英国人，在法国一家加拿大报社工作，汉布尔顿在法国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

汉布尔顿的母亲是爱尔兰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德语，非常关注欧洲的政治经济情况，家里总是高朋满座。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和加拿大社会名流在此自由畅谈，大发宏论。汉布尔顿在孩童的时候，母亲就给他规划好了理想的人生。在母亲心目中儿子应当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心胸开阔、意志坚强，并具有挑战旧世界的勇气。在母亲的影响下，年轻的汉布尔顿立志成为一个大人物，一定要出人头地。读中学的时候他曾对自己的姐姐说：“要使自己变得重要，要让更多的人注意你，只有重要人物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1949年4月，一个春天温馨的夜晚，贝西·汉布尔顿夫人又在家忙于招待四方来客。今天在众多的客人中有一位苏联人受到她的特别关照，他叫鲍罗廷，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这位年轻人彬彬有礼、举止优

雅、谈吐大方，颇有绅士风度。贝西·汉布尔顿夫人非常欣赏鲍罗廷的才华，觉得如此年轻优秀的人物有必要介绍给儿子认识。

鲍罗廷的真实身份是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负责国外情报的第一总局的官员。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网刚刚遭到彻底破坏，他到加拿大的任务就是发展苏联情报机构在加拿大的间谍网。其实鲍罗廷已注意到汉布尔顿，那天汉布尔顿和鲍罗廷谈得十分投机。后来，鲍罗廷又打电话给汉布尔顿，约他出来喝咖啡，他们沿着尼多运河边的小径散步，无所不谈，鲍罗廷觉得汉布尔顿做一个间谍有很大的潜力，心里已把他列为重点发展对象。汉布尔顿也觉得两人特别投缘，愿意向他倾诉自己的心事，希望得到他的肯定。汉布尔顿表示愿意为苏联做些事情，希望今后与鲍罗廷有合作的机会，共同做一些大事。

1951年，鲍罗廷突然从汉布尔顿的视野中消失了。

1953年，汉布尔顿去了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准备将来做一名经济学家。此时，汉布尔顿已经结婚成家，与夫人居住在巴黎远郊的一座别墅

里。

1956年，汉布尔顿即将结束学业。一天，两位来客叩开了汉布尔顿的家门，其中一位就是鲍罗廷。当时，汉布尔顿又惊又喜，热情地与鲍罗廷拥抱在一起。寒暄之后，鲍罗廷向汉布尔顿介绍了自己同行的客人——保罗，也是一位苏联人，汉布尔顿一边热情地与保罗握手，一边把客人引进了客厅。

当年，鲍罗廷调离加拿大去了英国任职。但克格勃对汉布尔顿的关注一直没有放松，并有专人负责记录汉布尔顿的行踪。现在汉布尔顿硕士快读完了，到了与克格勃合作的时候了。

鲍罗廷问起汉布尔顿今后的打算，汉布尔顿说打算继续攻读经济学，伦敦经济学院已经录取了他，准备去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研究16世纪西班牙的经济问题。不料，鲍罗廷哈哈大笑起来：“朋友，西班牙经济问题随便什么时候都可研究，我看你应该更关心现实的经济社会，去做个有影响的大人物，这是你母亲的心愿，也是你的早年理想。”

汉布尔顿一愣，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鲍罗廷说：“伦敦经济学院可以晚几年去，目前，你可以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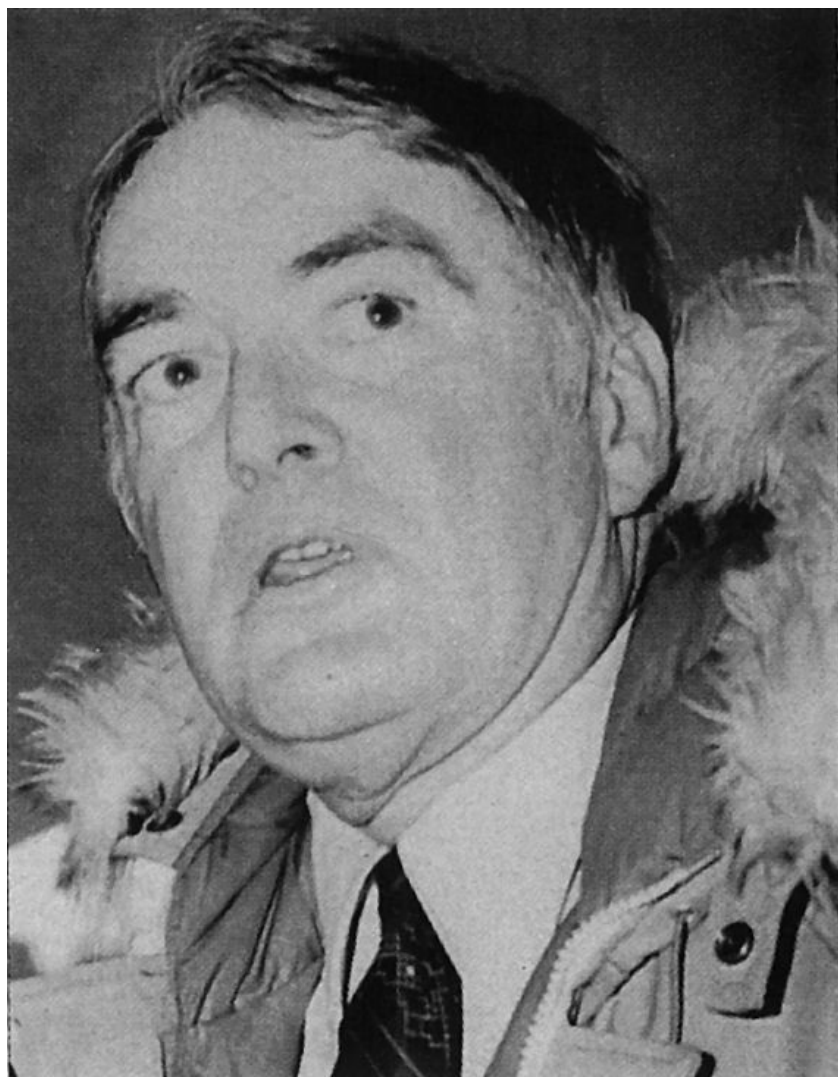
申请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工作。只有去了那里，我们才能实现早几年在渥太华商谈的合作。”

汉布尔顿思路全乱了。看见鲍罗廷他们的口气不容置疑，他答应向设在巴黎的“北约”组织国际秘书处经济金融科申请，表示愿意到那里工作。巧合的是，汉布尔顿的父亲有一位朋友在“北约”经济部供职，以前常去他家，认识汉布尔顿。他见到汉布尔顿的求职报告便热心推荐，“北约”有关部门约他见了一次面，不久就通知他去上班。

作为“北约”组织的经济学专家，汉布尔顿的主要工作是分析“华约”各国和“北约”各国的经济情况，指出它们各自的优点和不足、潜力和局限。他们提供给“北约”组织的研究成果报告是“北约”政治家们做出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因而他可以接触到“北约”的机密文件，包括“北约”组织各成员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评价，“北约”组织各成员国军队的装备和物资、西欧国家的经济应急计划等，这些都是苏联极感兴趣的机密。但克格勃对汉布尔顿非常有耐心，保罗与他接触只是聊聊天，一起喝杯咖啡，有时也扯到汉布尔顿的工作，汉布尔顿也只口头讲些一般性的文件内容。克

格勃的眼光和目标更长远。

克格勃心理学家对汉布尔顿进行了评估和分析，认为他喜欢适量的刺激，需要压力的胁迫。一次，保罗与汉布尔顿在西西里餐厅用晚餐，保罗还未开口询问，汉布尔顿习惯性谈起工作中接触的一些文件内容，当然，是一些并无多大价值的东西。保罗依然保持着微笑，说他非常欣赏汉布尔顿超人的记忆，随手拿出一张巴黎地图，位于东北部的7个地铁站被画了圈。保罗说：“我们需要更安全、更刺激、更智慧的约会方式。我们每个月见面一次，时间定在每月第一个礼拜的星期五，见面地点在地铁站，不管见到或没见到，下一次见面按顺序移到另一个地铁站。”听起来有些麻烦，汉布尔顿却很有兴趣，对约会非常重视。从此，地铁站的秘密会面，为约会搜集情报的准备，赶赴约会的紧张状态，这一切成了汉布尔顿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并乐此不疲。



汉布尔顿并不是一名专业间谍，也并非收取金钱的“鼯鼠”。克雷勃利用他在学术上的成功获得了大量机密情报。

一年多时间里，汉布尔顿以口述的方式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虽然机密情报甚少，但他对于这种工作很有热情。 1957年秋，保罗在地铁站与汉布尔顿碰头

后，他们走进车站附近的一座小教堂，保罗拿出两个纸袋，一个纸袋里装着2000美元，全是20~50元的旧钞；另一个纸袋装着一架莱卡牌的微型照相机和30个胶卷，足够拍1000张照片。保罗第一次对情报的质量提出了要求，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有价值的机密文件上。他让汉布尔顿以工作需要为名设法把文件借出来，下班偷偷地带回家，再用莱卡相机拍下来。

汉布尔顿迟疑了一下，接过了装相机和胶卷的纸袋，但不愿意接受美元，他说自己做这些不是为了钱。保罗笑笑，说你不必为苏联政府财政节省经费。汉布尔顿最后还是拒绝了。到下次见面的时候，汉布尔顿没有让克格勃失望，他交给保罗的两卷胶卷里有两份机密文件和一份绝密文件，都是来自“北约”组织地地道道的真货。

此后，“北约”组织的秘密文件通过汉布尔顿源源不断地流向苏联。保罗告诉汉布尔顿，他提供的情报极有价值，总部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克格勃精心策划培植汉布尔顿用了七八年，现在到了丰收的时候，克格勃总部特地在巴黎组建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处理有关汉布尔顿的事务。

1958年，汉布尔顿与妻子离异，单身汉的生活更加无拘无束。保罗不停地向他索要情报，而且对文件的机密等级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北约”1970年军事实力目标规划的报告等。汉布尔顿还曾向克格勃提供了一份有关西方世界部署在华沙集团间谍网络的文件，这些间谍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由此造成一些西方间谍莫名其妙地在莫斯科被发现，使西方情报部门一直找不到原因。这一年，汉布尔顿向克格勃提供了大约800页机密文件，平均每天两页多，工作效率非常高。对苏联来说，“北约”组织已基本无秘密可言。奇怪的是，汉布尔顿一直拒绝接受克格勃的报酬。苏联解体后公布的档案表明，克格勃一共支付给汉布尔顿1.8万美元。

1959年11月的一个阴雨天，汉布尔顿驱车到巴黎郊外，在一家汽车旅馆与保罗见面。保罗带来一只旅行箱，里面有一台专门为汉布尔顿特制的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带录音功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频率，到了规定的时间，只要打开收音机调准频率就可将莫斯科的指令录制下来。此外，保罗给了他一个密码本，一次性的密写信笺和几本黄皮小笔记本。收音机记录下

来的是4个数字一组的代码，在保罗的指导下，汉布尔顿很有兴趣地学习了密码和莫尔斯电码。

这事让汉布尔顿兴奋了好一阵子，如今可以直接听到莫斯科的声音，无需保罗这个中介，这让他觉得自己神奇诡秘、与众不同。许多年后他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一想到能把收音机调到一个指定的频率上，同千里迢迢之外的莫斯科进行联络，接受到专门给我发来的电报，真叫人激动不已。”莫斯科确实也很看重他，送给他的收音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旦汉布尔顿遇到麻烦，比如身份暴露了，莫斯科可以通过收音机及时通知汉布尔顿前往他住处附近的街心花园，克格勃在那里有一个秘密投递点，汉布尔顿可以拿到一本护照，以及到维也纳后如何进行联络的信息。然后，有专人护送他经奥地利前往苏联。

汉布尔顿醉心于间谍游戏，间谍生涯满足了他的好奇心，虽然因怕被发现而产生的恐惧感挥之不去，但他还是喜欢窃取情报时的那种状态。他整天神秘兮兮的，不知在忙什么，很少关心老婆家庭。他与第二任妻子菲奥雷感情也日渐淡薄，吃完晚饭，就把自己反锁在书房，忙碌到深夜。菲奥雷与独守空房差不

多。有一次，菲奥雷一觉醒来仍不见丈夫的身影，跑到书房门前，顺着钥匙孔往里瞧，看见汉布尔顿正用照相机拍照文件，当时惊出一身冷汗，她明白丈夫在干什么，从此不再过问丈夫的事，感情也更加淡薄了。

受人欢迎的教授

攻读博士学位，做一名大学者，一直是汉布尔顿想完成的心愿。他在“北约”一直没有升迁的机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读博士的想法更迫切了。

一次与安全部门的一位官员聊天，话题扯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新近破获了一起间谍案，这位官员说，哪个地方有机密情报哪个地方就可能有间谍。“北约”这么庞大的机构，完全可能潜伏着一两个“鼯鼠”。安全官员发现汉布尔顿脸露惧色，笑笑说，没什么可担忧的，做间谍迟早会暴露的，能隐身10年就算是奇迹了。再说，我们这些人就是专门对付间谍的。

通过这次聊天，汉布尔顿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那就是做间谍迟早一定会暴露。他越来越意识到这件事的风险性，自己至今没被发现，但命运之神不会永

远垂青他。只要安全部门查阅一下他借阅各类机密文件的次数和时间就能发现问题。因此，汉布尔顿决定抽身不干了，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去过一种宁静的学者生活。

汉布尔顿心里十分清楚，克格勃不会轻易同意他的想法，必须想出一个能充分说服保罗的理由。1960年2月的一个礼拜天，汉布尔顿与保罗在一家餐厅用过晚餐，喝了点葡萄酒，保罗情绪很不错。汉布尔顿是有备而来，他不慌不忙地对保罗说：“‘北约’安全部门正对我进行职业忠诚审查，我怕过不了测谎测验。”

“出了什么事？”保罗有些紧张，他与汉布尔顿交往多年，第一次听到对方这种不安的语调。

“我的妹妹到民主德国旅游，西德情报机构发现她去过苏联领事馆，他们怀疑这种行为不是偶然的。”

“就这些吗？这可能是个误会。”

“我想也是，但测谎测验这一关如何通过，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汉布尔顿满脸沮丧地说，“不早点防患，我出事只是迟早的事。”

保罗非常失落。他们合作一直很顺利，收获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数次受到克格勃总部的表彰，他的

军衔晋升了两次。汉布尔顿一旦出事，目前来之不易的局面都得结束。保罗虽然心里不情愿，但有一点他是非常有原则的，就是汉布尔顿无论如何不能出问题。分手时他说：“你要稳住情绪，我回去立即向总部汇报，后天，我会约你见面。”

3天后，他们在近郊一家咖啡店又见面了，保罗告诉他，放在公园秘密投递点的护照他随时可以取走，一路有专人护送他到苏联。如果确信他们有指控你的证据立刻就动身，到地方后可以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你在“北约”组织遭受到的迫害。汉布尔顿连连摆手，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他准备辞职。两年前，他与上司谈过自己的想法，自己36岁了，很想早点实现到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计划，再拖几年恐怕就没有机会了。上个礼拜，他又提起辞职的事，上司认为他的抉择是恰当的，并对他进行了口头保证，如果他去伦敦经济学院读博士，“北约”组织有什么麻烦上司会帮他办妥，离开时可以得到评价甚高的推荐信。

出乎汉布尔顿的意料，保罗听了他的叙述，没有坚持要他去莫斯科的意见。他承认目前是汉布尔顿安

全退出的最佳时候，而去伦敦经济学院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有在“北约”组织工作的经历，再经过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术锤炼，汉布尔顿会前途无量，在世界经济学术界将大显身手。

汉布尔顿听了保罗一席话喜出望外，万分感谢。保罗向汉布尔顿表示，苏联会时时刻刻关注他的进步，并叮嘱他，回去后立即销毁所有与克格勃联系的证据，与克格勃的联系从此停止。说完这些，保罗与汉布尔顿非常友好地握了握手。离开咖啡店时，保罗微笑着说：“学业完成后，我们仍然有机会见面，多保重。”说完，保罗消失在巴黎的夜色中。

当天晚上，汉布尔顿按照保罗的嘱咐，销毁了照相机，砸烂了收音机的全部电路，毁掉了密码本、密码信笺等所有的间谍工具。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只大旅行箱里，在一个傍晚开车到郊区一条小河边，将旅行箱彻底烧毁了。

汉布尔顿辞掉了“北约”组织的工作，也结束了5年的间谍生涯。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感觉心情特别的轻松。

1960年底，他去了一趟维也纳，想放松一下自

己。离开的前一天，他突生好奇心，想试一试保罗曾给他的一个应急电话管不管用。电话一拨就通了，对方客气地问道：“请问，你找哪位？”汉布尔顿说：“我想订一张去巴黎的机票。”对方说：“今天没有去巴黎的机票，只有明天去伦敦的。”汉布尔顿说：“我到什么地方取票？”暗号对上了，当天晚上，他去了约定取票地方，是一家高档酒店，苏联人已在包厢里等候，他们又对了一遍接头暗语。两人坐下来，悠然地喝着葡萄酒，聊的是一些轻松的话题，维也纳的美丽景色，市井风俗。苏联人只问了一句：“需要我帮忙吗？”汉布尔顿说，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自己来维也纳只是旅游。

大家都说克格勃薄情冷漠，人一走茶就凉，维也纳之行使汉布尔顿切身感受到克格勃还是蛮有人情味的，苏联人没有忘记他，仍然把他当朋友，是真心愿意帮助他。从维也纳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那里有苏军的空军基地，汉布尔顿一旦有事，在苏联人的帮助下，他可以坐苏联人的飞机直达莫斯科。

1961年初，汉布尔顿拿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入学

通知书，克格勃没有给他现钞，而是通过一个商务机构给他汇来一笔经费，这次汉布尔顿没有吱声，默认了这笔报酬。汉布尔顿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1963年底，汉布尔顿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43岁。

有意思的是，在他即将离开伦敦经济学院时，鲍罗廷突然出现在汉布尔顿眼前，汉布尔顿又惊又喜，他问起保罗，他说非常思念这位老朋友。鲍罗廷告诉他保罗已调回国内，这回又给他带来了新朋友。汉布尔顿这才注意到鲍罗廷身后有个人。

鲍罗廷介绍，这位中年人叫卡捷西亚，从此将代替保罗与自己联系，联络的方式与在巴黎的一模一样，只是把巴黎的地铁换成了伦敦的地铁。此后，卡捷西亚经常来看望汉布尔顿，基本上都是闲聊，一块散散步，最后在一起吃顿饭。他们从来不谈间谍的问题，卡捷西亚给人的印象和蔼恭谦，非常有耐心。汉布尔顿很喜欢与他交往。

1964年春，汉布尔顿告诉卡捷西亚他将去加拿大，魁北克的拉法尔大学聘请他为教授。卡捷西亚表示真诚的祝贺，在一起用晚餐时喝了一瓶不错的法国

葡萄酒。和往日见面时一样，他们没有说到任何与间谍有关的事情。克格勃培植间谍是非常有耐心的。

到拉法尔大学不久，汉布尔顿就喜欢上自由自在的学者生活，他知识渊博，又有“北约”组织的工作经验，所教授的几门课受到学生普遍好评，成为拉法尔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不到一年，汉布尔顿就在学校出了名。后来，汉布尔顿学术研究的重点一度放在拉丁美洲问题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

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聘请汉布尔顿担任援助秘鲁计划的顾问，秘鲁领导人贝拉科斯将军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以及稳健的办事风格，聘请他担任政治顾问。在汉布尔顿策划下，贝拉科斯将军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过去的生活渐渐淡忘，汉布尔顿在学者生涯中获得满足。然而，克格勃却没有忘记他。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有专人负责收集他的档案，追踪他的发展轨迹。他在学术界和政治上的成功使克格勃更加看重他身上巨大的价值。

一天，汉布尔顿接到一个电话，是卡捷西亚打过

来的，说话的语气非常委婉，他告诉汉布尔顿自己正在拉法尔豪华餐厅等待他的光临。

克格勃主席亲自接见

卡捷西亚告诉他，老朋友们希望他申请希伯来大学一个研究课题，去一趟以色列。卡捷西亚拿出一张希伯来大学课题目录，说：“申请过程中有难处，我们可以帮忙。” 汉布尔顿问道：“我去以色列干什么？”卡捷西亚说：“你有两件事要去弄清，一是在苏联的犹太人大量移民以色列，他们应该怎样在以国生存；二是以色列目前核研究状况。” 听了卡捷西亚下达的任务，汉布尔顿又陷入矛盾之中，他想拒绝不再为克格勃服务，可内心又有行动的冲动。卡捷西亚笑道：“教授，你是去搞学术研究，为苏联人也是为全人类服务。”

希伯来大学向汉布尔顿发出了邀请信，作为访问学者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专题研究。以色列人非常友好，汉布尔顿无论在图书馆查阅资料，还是与希伯来大学教授们切磋交流，他们都尽心尽力为汉布尔顿的研究提供方便。对卡捷西亚所说的第一个问题，汉布

尔顿很快写出了很有分量的分析报告，详细叙述了苏联犹太移民如何迅速渗入以色列社会。移民问题可以去采访，深入典型的地方调查。

第二个问题难度大多了，核武器是个非常敏感而绝密的问题，他只能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此外，他从调查以色列著名物理学家入手，采取旁敲侧击的方法，尽量搞清楚他们目前研究工作的情况，从而得出以色列早就开始研究原子弹并已具备了制造原子弹能力这一结论。两份报告深得苏联高层的好评，成为苏联决策者制定以色列政策的重要参考资料。而这样的分析报告也只有像汉布尔顿这样的教授间谍才能完成。

汉布尔顿在海地度假，结识了新的情人玛利亚·弗勒斯。1975年7月8日，他带着弗勒斯飞抵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一如既往热情地欢迎汉布尔顿教授的到来。但汉布尔顿发现此次来访有些不对劲，凭直觉感觉有人暗中监视他。一次出门回到旅馆，他发现有人进过房间并仔细搜查了他的行李。

其实，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早就盯上了他。起初摩萨德只是调查他研究移民问题的动机，后来发现汉布

尔顿借阅大量有关核物理的资料，研究以色列物理学家。随着调查的深入，摩萨德怀疑他是克格勃间谍。汉布尔顿并没有十分吃惊，照常与情人弗勒斯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他心里清楚以色列是一个法制国家，没有确切的证据是不会动他的。不过他还是缩短了在以色列的旅程，取道雅典和贝尔格莱德前往维也纳，保罗在那里等候他。

在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广场，汉布尔顿见到了保罗，老朋友见面亲切而随和，他们沿着多瑙河慢慢走着。保罗说，请汉布尔顿到维也纳来是得到苏联最高当局的指示，今天空军派来专机接汉布尔顿去莫斯科，有重要人物约见他。

汉布尔顿乘坐的飞机在莫斯科郊区军用机场缓缓降落，汉布尔顿一出现在舷梯口就看见卡捷西亚在向他招手。他们登上一辆白色的伏特加小车，在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驶进莫斯科近郊的一栋别墅。卡捷西亚说：“你在莫斯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在20天的时间里，我们会举行多种研讨会和深层次的工作讨论会，会见高级客人。克里姆林宫希望听听你关于苏联美洲政策的真知灼见。”

汉布尔顿在莫斯科受到高规格接待，独自享受一栋别墅，冰箱里装满了法国葡萄酒、伏特加、鱼子酱、大马哈鱼以及许多叫不上名的苏联特产。一辆配备了司机的伏特加小车随时听他使唤。他拜访了克里姆林宫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官员，会面时轻松友好。他们一起品尝鱼子酱，喝着伏特加。官员们出自对西方的好奇心向汉布尔顿问东问西。他们虚心地讨教拉丁美洲的相关问题，听汉布尔顿献计献策。在卡捷西亚的陪同下汉布尔顿参观了列宁格勒博物馆、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大学等风景名胜。莫斯科古老独特的文化历史给汉布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天，卡捷西亚匆匆赶来告诉汉布尔顿，一位重要人物将与他共进晚餐。汉布尔顿问是哪位高官，卡捷西亚笑着说，你会因今晚的见面而感到荣幸。晚上7点，汉布尔顿已被安排坐上餐桌，大家等候主要客人的光临。7点10分，餐厅门被打开，一位身材魁梧、脸色略显疲惫、戴着金属框眼镜的男人走进餐厅，大家连忙礼貌地站起来。这人走到汉布尔顿跟前，伸出手握住汉布尔顿说：“欢迎你到莫斯科来。”

卡捷西亚介绍道：“这位是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安

德罗波夫同志。”汉布尔顿怎么也没想到是赫赫有名的克格勃主席接见自己。他感到很拘谨。但安德罗波夫举止温文尔雅，言谈随和，更像一位学者，很难与人们想象中的严厉冷酷的克格勃挂上钩。安德罗波夫很快使汉布尔顿轻松起来。

席间，安德罗波夫询问了几个问题，比如，美国与犹太人的关系、苏联犹太人移民对犹太世界的影响、“北约”组织的情况。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汉布尔顿已经说了好几遍，所以回答安德罗波夫提问时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而且状态非常轻松。安德罗波夫说：“我们在美洲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需要能影响舆论的人，像你这样的人，汉布尔顿教授。在西方的选举中，一个像你这样有造诣的人是可以获得高级政治职位的。你参政所需要的经费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

汉布尔顿能够受到克格勃主席的亲自接见，并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下探讨问题，这对一个西方间谍来说是十分罕见的。克格勃给了汉布尔顿最高荣誉，也可看出汉布尔顿不是一般的小间谍，而是一位对苏联决策者产生影响的重要人物。

一周后，汉布尔顿坚持要离开莫斯科，理由是学校有个由他主持的学术会议，下月初在魁北克举行，与会学者来自欧美各地，他必须赶回去接待。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他并不喜欢莫斯科，尤其是这里的社会气氛。

临走前，克格勃给他配备了一大堆间谍工具：一个卫星短波接收器和一个显示器，莱卡微型照相机，一个装有微型胶卷的空心圆珠笔和密码表等。克格勃仍然对汉布尔顿寄予厚望。

拒绝出逃

1977年深冬，纽约西区的一条大街上，克格勃北美地区负责人赫尔曼驾车去给手下的间谍投递指令，路过一只消防栓，他放慢车速，随手将一根5cm长的铅管扔下车，本来接受指令的间谍就跟在后面，一辆巡逻警车突然插了上来，正好看见铅管飞出车窗，以为扔下了什么爆炸物，急忙截住了赫尔曼，连同那截铅管一并带回了警察局。经仔细检查，警察发现铅管里藏着一封密写信。他们很快把赫尔曼移交给联邦调查局，经过两三天的突击审讯，赫尔曼承认了自己的

间谍身份，同时供认汉布尔顿是一个重要的克格勃间谍。

1978年5月，三位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官员飞抵华盛顿，参与对赫尔曼的审讯，最终确定了汉布尔顿的间谍身份。他们立即通知国内皇家骑警队严密监控汉布尔顿，但警察发现汉布尔顿去欧洲度假了。

5月的维也纳阳光明媚，汉布尔顿接到克格勃的紧急指令赶到接头地点，他钻进一辆小汽车，车里的保罗脸色凝重，省去了往日的寒暄，低声说：“有人叛变了，可能出卖了你。我们的通讯受到监控。”

“这不太可能，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

“要正视危险，停止一切联系。我们建议你去莫斯科，现在就可以跟我一块走。”

汉布尔顿断然拒绝了保罗的建议，他的母亲和10岁的孩子在渥太华等着他，说什么也不能抛开他们说走就走。此外，汉布尔顿非常自信，给克格勃干了30年，虽然也有过麻烦，但都是一些小风小浪，从未有过真正的险情，他相信自己的运气不错。保罗见一时说服不了汉布尔顿，只好与老朋友告别，他交给汉布尔顿一只装满美元的纸袋，动容地说：“我只能帮你这

些了，收下吧！”汉布尔顿下了车，他听见保罗在车里说，再见，朋友。

汉布尔顿不听保罗的警告，按原定计划继续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吉达，用了几周时间完成了他的海湾国家石化工业的研究，然后去了巴黎、贝尔格莱德，又到了伦敦。总之，在一年时间，他访问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可以看出他心神是不安的，比较烦躁。

1979年11月4日，三名加拿大皇家骑警队官员陪着检察官弗兰克·普拉特，走进了魁北克圣福瓦2445号公寓的大门。

“是汉布尔顿教授吗？”

“是的。”

“这是搜查证，我们需要搜查你的房间。”

这时汉布尔顿想起保罗的警告，但一切都为时晚矣，30年的间谍生涯从此结束了。

1980年5月，加拿大司法部宣布，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将不对汉布尔顿进行起诉。自此之后媒体对这件案子的兴趣也慢慢消退了。但是两年后，汉布尔顿在伦敦访问时被捕，并根据《官方秘密法案》对他进

行了审判，判处了他10年监禁。

克格勃最有价值的海外间谍之一——汉布尔顿教授就这样结束了他的间谍生涯。

第二十章 电子“鼯鼠”使英美情报联盟损失10亿美元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向英美电子侦察机构渗透成为克格勃对外情报活动中的重点，而杰弗里·阿图尔·普赖姆是当时克格勃在英国最重要的电子间谍。

杰弗里·阿图尔·普赖姆是个小人物，英国皇家空军一个军士，而且性格孤僻、人品低劣，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因自己特殊的岗位，掌握了英美最先进的电子侦察系统，为克格勃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机密情报，潜心为克格勃效力14年。美国人说，他给英美情报联盟带来的损失达10亿美元。最后，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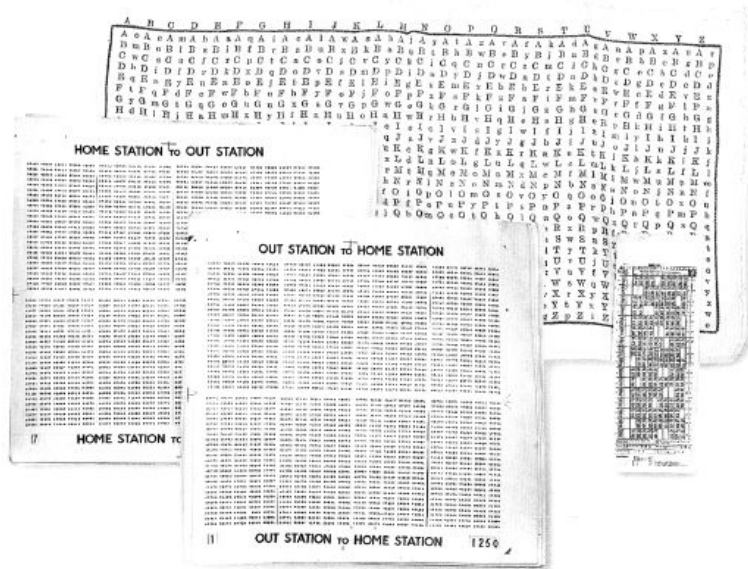
赖姆栽在自己老婆手上。克格勃埋怨道：都是女人惹的祸。

找上门来的情报员

1968年1月初，杰弗里·阿图尔·普赖姆在英国度过圣诞节后返回西柏林哈托夫电子侦察基地，他是英国空军设在联邦德国西柏林无线电监听基地的电子侦察军士。在通过柏林的苏联检查路口时，普赖姆交给苏联军官一张字条，上面介绍了他的身份和职位，并请求苏联情报机构派代表同他联系。他说他有一些苏联人感兴趣的话题，希望约个时间见面。对于这个自称掌握英美秘密军事情报的人，克格勃自然非常愿意与他聊聊。

普赖姆在给苏军的便条中请求克格勃情报人员同他在利亚布尼茨地铁站的餐馆见面。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普赖姆一身休假装束走出门，伸手准备拉开车门时在门把手上发现了一张用磁铁吸住的纸条，上面指定的接头地点是东柏林的腓特烈地铁站。克格勃行事多疑多变，大概因为还不太熟悉普赖姆，害怕普赖姆是个陷阱，于是临时变换见面地点。当然，主动找上

门的普赖姆被克格勃毫不费力就招募了。这是“剑桥五杰”之一克恩克罗斯间谍案暴露事隔25年后，苏联情报机构又一次成功地把新的“鼯鼠”打入英国超级机密的情报部门。



常用的一次性密码本

在一般人眼里普赖姆属于身心不太健全的人，上中学时他就经常旷课，并且不容易与人相处。大学毕业后加入英国空军，被派往英国空军设在西柏林的无线电监听基地，在基地服役期间，他离群独处，不善言语，与人交往非常困难，在别人的印象中他是个性格极为孤僻的人。此外，他在性生活方面存在严重缺陷。不能过正常性生活的困扰使他产生出一些怪异的

行为。1962年他开始打一些内容淫秽的电话。1969年，他第一次结婚并很快破裂。加上在军队干了许多年迟迟得不到晋升让他感到非常不满。普赖姆渐渐地把所有个人问题、事业上的失意都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他开始热心于社会主义思想，通过阅读《苏维埃周刊》，收听苏联及东欧国家电台的节目，了解苏联和东欧各国情况。他非常向往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替克格勃效劳是出于自愿，是对自己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

普赖姆这个人没有特殊的才能，军中职位很低，但他占据的特殊岗位却给克格勃提供了英国电子侦察最重要的情报。普赖姆被克格勃招募后受到克格勃上层高度重视，认为将要开创情报工作一个全新的领域，为此克格勃彻底改组了原先负责电子侦察的机构，强化了“电子侦察”的领导和组织。克格勃电子侦察工作最早由第八局负责，同时，第八局还负责密码和克格勃联络的安全保障工作。后来，在尼拉古·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领导下组建了新十六局，专门负责电子侦察。

第十六局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定：禁止同间谍在其工作国接头。第十六局最中意的见面地点是维也纳、赫尔辛基和马德里，这三个首都城市均在苏联华沙集团之外，而且克格勃在那里有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普赖姆在柏林苏军检查站留下来的便条没有送到克格勃负责外国情报工作的第一总局，而是转给了相对慎重的第三总局在柏林的情报人员。虽然第三总局主要负责苏军内部的安全问题和监视工作，但它有时也能招募一些在德国服役的西方军人，不过大多是中下级军官。第三总局热心招募普赖姆是有想法的，因为第一总局在对外情报工作上成果颇丰，威望日渐膨胀。于是，他们打算搞出些大动作，更好地与第一总局竞争一下。

克格勃第三总局紧紧抓住普赖姆不放，断然拒绝第一总局接管自己的间谍“明星”。他们让普赖姆在芬兰或奥地利选择一个城镇，作为同克格勃特工会面的地点。也许由于普赖姆懂德语，他选择了奥地利。

1968年8月，普赖姆在英国空军服役期满。在他投入新的工作之前，克格勃打算利用一段时间进行专业培训。普赖姆被秘密接到卡尔斯霍尔斯特的克格勃办

事处，学习使用发报机、加密技术、微型点状发报和使用“米诺克斯”微型相机的技巧，并专门有人给他讲解如何利用“邮政信箱”。普赖姆的代号被确定为“劳伦茨”。每天课后他被锁在房间里过夜。一个礼拜后，普赖姆途经汉堡飞往英国。随身的旅行箱里装着一次性密码、密写用的一大堆材料和400 英镑现金，当然，这些东西都藏在箱子夹层中。

1968年9月，普赖姆进入伦敦监听破译分析小组，这个专门从事解密的小组设在圣丹斯塔齐山。经过上岗前培训，1969年秋天，他通过语言考试后被任命为小组的密码破译员。克格勃总部通过广播电台通知他设置伦敦近郊的“邮政信箱”。在伦敦郊区一条小河边的树林里，普赖姆选择了在一棵枫树下设立了“邮政信箱”。他之所以选择小河边，一是这里靠近公路；二是小河很长，经常有人在河边钓鱼，是个很好的掩护。不久，他在信箱里拿到了莫斯科克格勃总部的祝贺信和400 英镑。

一只14年的老“鼯鼠”

1976年，通过俄语考试，经有关部门的审查，普

赖姆进入政府联络总部所属的切岑赫姆通讯监听中心工作，这是克格勃对外情报机构一直希望普赖姆能去的地方。在那里从事的工作就是把所有截取到的外国通讯予以破译解码。这里可以接触到所有经过破译的苏联绝密情报，同时还能接触到美国两颗间谍卫星截获到的资料。在那里他负责整理截获的苏联资料。

由于普赖姆可以广泛接触政府联络总部的秘密文件，克格勃通过广播电台指示他搜集相关资料。不久，他与克格勃的联系中断了，因此，他在政府联络总部搞到的部分情报一直到了1980年与克格勃重新接上头时才转交给克格勃特工。

在政府联络总部工作的普赖姆仍不大讨人喜欢，人们认为他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他为克格勃效力14年，一直没有引起英国情报部门的怀疑。除了工作特点决定他属于少量秘密专业人员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之外，在联络总部怪诞异常的人也不在少数，人们见多不怪。人们认为他之所以沉默寡言是因为婚姻不幸和心中气愤不满造成的。眼看着那些能力不如他的同事都得到了升迁，他抱怨说这仅仅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而已。

普赖姆同自己的接头人见过很多次面，这些自称“伊戈尔”或“瓦利姬”的克格勃特工详细询问有关他和哈托夫电子侦察基地与电子侦察有关的工作。普赖姆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一再表示自己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才为克格勃工作的，但每次他还是能得到30~40英镑。

他和克格勃的联络方式主要是通过“邮政信箱”和莫斯科电台。此外，1970年在以色列、1971年在罗马、1972年在塞浦路斯他都见过负责联系自己的克格勃特工。与苏联人见面他认为是一定意义的，他与苏联人的理想一致，而这个共同理想出奇地简单：双方都在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贡献力量。

克格勃情报人员对他说：“我们只渴望和平，而帝国主义者希望战争。”他相信这些话是正确的。

1977年9月，普赖姆离开了政府联络总部，之后他干过出租车司机、酒贩子，与克格勃失去联系有3年之久。1980年克格勃特工同他恢复了联系并说服他在维也纳见面，在那里他交出了15卷以上的胶卷以及一些照片和录音带，这些是他离开政府联络总部后保存下来的。克格勃特工没有指责他离开政府联络总部，也

没指责他同克格勃中断了联系，只是力劝他重新回到政府联络总部工作。离开维也纳时，克格勃给了普赖姆600英镑。

1981年，按照约定普赖姆去了波茨坦，克格勃特工就他提供的那些文件、图片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作了一些解释。这一次克格勃建议他到比孔斯菲尔德的英国军队中教授俄语，这样他就可以为克格勃挑选一些合适的人，为苏联情报机构效力。对克格勃的建议普赖姆仍然未做出肯定的回答。离开波茨坦时，他又得到了4000英镑。

普赖姆与克格勃合作期间苏联人对他也不太放心，担心他会遇到很大的麻烦。问题倒不是担心他不知如何隐秘地拍摄机密文件并将其转交克格勃，而是苏联人也知道普赖姆自身存在严重的精神问题。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他又开始了第二次婚姻，但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不正常。1982年夏，普赖姆因对未成年少女的下流行为被警方拘留。他的行为激起妻子的愤怒，普赖姆曾将自己是克格勃间谍的身份告诉过妻子，在警察局接受询问时妻子一怒之下告发了他。于是，他被英国反间谍机关被捕，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这时，

英国军情五处和政府联络总部才查出他的间谍行为。据美国国家安全局专家评估，普赖姆给英美情报系统带来的损失有10亿美元。14年间，普赖姆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包括政府联络总部的行动、编制和有关国内外基地情况等等，所提供的情报对克格勃从事监听和破译的部门来说确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但说损失10亿明显估价过高，这只能说明美国人对造成严重损失的英方不满。

普赖姆的人格是非常低劣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行为下流的惯犯。他与二战末期出现的克格勃间谍不同，当时最重要的间谍菲尔比、布兰特等“剑桥五杰”都是出于一种信仰而为克格勃工作。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个个犹如高空飞翔的鸟，充满激情和野心。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克格勃在英美那种有理想、有天赋的间谍已销踪灭迹。但普赖姆的间谍活动却具有一定开创意义，在间谍史上留下浓重一笔。某种意义上说，他从事的间谍方式预示着电子间谍时代的来临。

第二十一章 怪异的“鸳鸯间谍”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多名潜伏在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美国间谍暴露，他们或进了监狱，或突然失踪。间谍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奥戈罗德尼克自杀案更使美国中央情报局恼火万分。其实这一切都是克格勃间谍——科切尔夫妇一手策划的。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任职的卡尔·科切尔博士知识渊博，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一副高级知识分子派头；他的妻子花容月貌，才华四溢，在一家杂志做编辑。非常奇怪的是，他们还是一对热衷于性游戏活动的夫妇。他们真的是为了寻找刺激吗？

神秘领域

1934年9月21日，卡尔·科切尔出生在捷克布拉迪斯拉发市，是一名犹太人后裔。他家境殷实，聪明伶俐，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中学开始在首都布拉格求学，先后毕业于英语语法学校、法语中学和查尔斯大学，1958年获普通物理学硕士学位。卡尔·科切尔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大学学的专业是物理，但他同时在布拉格研究院学习电影理论和剧本创作。大学毕业后，他应聘到布拉格电视台做文字编辑，业余兼职为教育、科学和工业新闻等节目撰写稿件。1961年，卡尔·科切尔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技术学院任教，被聘为数学副教授。做了不到一年他又转行去了布拉格广播电台成为一名电台节目主持人。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总想找到自己最理想的事业，他自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

1963年春，在一次新闻出版界的酒会上，他第一次见到汉娜就被她的美貌迷倒。汉娜金发碧眼、肤色嫩白、楚楚动人，当时在一家杂志社做英文翻译，祖籍是奥地利。科切尔坠入爱河，猛追比自己小10岁的

汉娜小姐。当年他们就结婚了。

当时捷克是苏联的小兄弟，1962年底，捷克情报部门受克格勃委托四处物色特工。卡尔·科切尔精力充沛，适应能力强，在布拉格社交场合上是个很活跃的人，很快引起捷克情报部门的注意。他们调来科切尔的档案，觉得这个人条件很不错，于是派人与科切尔接触，认为科切尔极富做特工的才华。科切尔觉得间谍这个职业很刺激，能成就一番事业，于是马上同意加入克格勃接受培训。后来，汉娜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克格勃，不仅没有丝毫的反感，反而表现出比科切尔更浓厚的兴趣，催着科切尔引荐她也加入。她说她喜欢这种极富冒险和挑战的工作。应科切尔的请求，捷克情报部门全面考核了汉娜，觉得条件尚可，但还不是十分满意。捷克人把情况报告给克格勃，没想到苏联人很快批准了，并指定汉娜为科切尔的未来工作助手。从此，一对震惊西方世界的间谍鸳鸯出世了。

科切尔夫妇各自以非常正当的理由辞退了工作，他们先是在布拉格的一所间谍学校接受基本培训。他们将来的工作地点在美国。他们俩的英语本身都不错，学习的重点放在熟悉美国人文历史、地理风俗和

社交礼节上。一年后，他们转到苏联继续学习，在克格勃间谍学校主要接受专业知识培训，接受专门的特工训练。比如如何搜集转送情报，如何使用交通、通讯工具，应付测谎机的方法，以及窃取、反跟踪等。此外，他们还着重研究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职业特点、招募特工的方法。

在此期间，克格勃技术部门专门为科切尔夫妇重新编写了一份档案，伪造了相应的证明文件。捷克情报部门通过相关渠道，散布消息称科切尔夫妇具有反苏倾向，为他们夫妇去美国工作制造意识形态背景。

1965年仲夏，3年特殊训练结束，在克格勃的精细安排下，科切尔夫妇分别回到布拉格为去美国做准备，科切尔在社交场合故意发表对当局不满的言论。9月，科切尔夫妇回到科切尔的家乡布拉迪斯拉发市，几天后，他俩跟亲朋好友辞行，到奥地利看望汉娜的父母。入境规定期限快到了，他们并没有回国，而是走进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请求移居美国政治避难。科切尔说在捷克自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由于对本国政府强烈不满，已经受到捷克情报部门严厉警告。科切尔拿出一些相关文件，有政府部门下达的警示书，有

科切尔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以及对他的反击。他说在国内自己已受到监视，随时都有可能关进监狱。美国人可不是那么好哄骗的，起初并没有轻信科切尔的说辞，大使馆官员表现并不热情。他们将这一情况向国内进行了汇报，经中央情报局的调查证实科切尔没说谎，态度就变得十分热情。他们让科切尔夫妇安心等待。

12月4日，美国方面接受了科切尔夫妇政治避难的请求，唯一的条件是要他们发表一篇公开声明才能去美国。几天后，科切尔夫妇顺利地登上飞往美国的班机，开始了新的人生。

科切尔夫妇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纽约。克格勃的计划是让他们必须尽快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寻找合适的工作做掩护，打进美国敏感要害部门，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经美国移民局的引荐，新闻署对科切尔很感兴趣，安排科切尔到“自由欧洲电台”做顾问，为这家反共电台撰写文章。科切尔对继续学习很有热情，1967年，他申请到政府奖学金，进入布鲁明顿洲的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获得历史硕士学位后接着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

士，197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有意思的是，科切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的导师是布热津斯基，此人后来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拿到博士学位的前一年，瓦格纳大学已聘用科切爾为哲学讲师。科切爾文理兼修，熟悉英、法、德、俄四国语言，在同事、学生眼里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开了一门政治哲学的课，结合东欧现行社会主义体制进行分析，其精辟独到的观点赢得师生的赞赏，被学校当局认为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学者。

进入中央情报局

科切爾的妻子汉娜对学问不感兴趣，是个很知道享受的女人。她年轻貌美，经常出现在华盛顿社交场上，总是充满着激情，加之为人随和、可爱，因此人缘极广。她喜欢珠宝就开了家钻石店，资金上自然得到克格勃的大力支持。钻石店经营得蛮不错，汉娜利用销售钻石的机会结识了不少华盛顿上层名流的夫人。这些贵妇经常光顾她的钻石店订制钻石首饰。汉娜经常要到欧洲各国购入货源，这样就为他们夫妇与克格勃情报人员接头、传送情报提供了方便。

科切尔夫妇因政治避难来到美国，所以一直把自己装扮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并极度仇视共产党。当时网球明星伊万·伦德尔想购买他们在纽约东区的一套公寓，遭到他们的拒绝，理由是伊万·伦德尔具有捷克血统。

1971年科切尔获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一年后，他的妻子汉娜也成为美国公民，一切都非常顺利。到1972年，他们夫妻俩移居美国已经快7年了。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春季招聘工作，科切尔觉得各方面条件成熟了，应该是行动的时候了。科切尔仔细研究了中情局公布的录用新人的条件，精心准备了一份自己的档案。他将自己的材料和申请书寄往中情局招聘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很快有了回信，认为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并约他去华盛顿市进行面试。

科切尔与中情局人事处的官员在一家酒店见面，彼此谈得很轻松。他对对方提出的许多问题作出回答，人事处官员对他比较满意，告诉他在酒店等候通知，准备接受下一步审查，尤其是测谎测验。幸亏科切尔有心理准备，又接受过克格勃的严格训练，面对那一道道稀奇古怪的心理测试，一般人早就垮掉了，

但他却顺利地通过了测谎。

1973年3月，科切尔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式雇用，随即科切尔夫妇迁居华盛顿。

科切尔被分到中央情报局苏联情报处上班，主要工作是将中情局获得的俄文、法文和捷克文等情报译成英文，这样他接触到了大量机密情报。年底，汉娜利用出差欧洲的机会与捷克情报部门联系上了，当时捷克情报部门还不敢启用他们，而是报告了苏联克格勃。后来科切尔夫妇不仅为捷克情报部门服务，也归克格勃总局领导。于是，他们正式开始为克格勃工作，代号“雷诺”。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按部就班工作了一段时间，科切尔对自己的工作不太满意，认为没有任何创造性，刻板单调。但他表现得非常积极，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与同事关系融洽，博得大家的信任，同时他主动配合上司工作，适时表现出自己的才能。3个月后，科切尔给上级主管部门写报告说自己目前的工作太简单，与自己的实际能力不相符，难以充分施展才华。中情局苏联情报处的主管官员也认为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很快将科切尔调到一个研究部门，成为中央情

报局一名高级情报分析员，并有权介入美国情报系统的“屏风”计划。

科切尔新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依据情报部门提供的大量机密情报，以及自己翻译的有关苏联和捷克的情况，评估和预测以苏联为首的华沙集团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新的动向和变化，并撰写情报分析报告，适时向相关部门提供咨询和建议。由于工作性质和范围的特殊，科切尔有权阅读中情局很多部门的机密情报，与同事交流研究成果，以调研的名义约见外派的情报人员。在自己掌握的大量情报中，科切尔挑选出有价值的东西转交给捷克情报部门，再由捷克人报给克格勃，或者由科切尔的妻子借到欧洲做生意的机会与克格勃线人接头，将情报直接送出去。

为了高效保密地获取情报，汉娜从欧洲给科切尔带来一款新式的微型照相机，这是克格勃技术部门开发出来的。这款照相机外观就是一支普通的钢笔，平常也可当钢笔用。当发现有价值的情报资料时，科切尔就用钢笔照相机拍下来，再由妻子汉娜将微型胶卷送出去。科切尔脑子反应敏捷，属于高智商的人。他不仅工作效率高，而且送上去的情报分析报告大多很

有见地，获得了上司的赞赏。所有这一切给科切尔提供了很好的保护，使他窃取情报的行为不易被发现。

由科切尔替中央情报局翻译的有关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档案以及中情局大量的情报，经科切尔夫妇之手源源不断地流向克格勃，其数量之多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他们对克格勃的贡献是巨大的，就连当时的克格勃总头目安德罗波夫也曾亲口称赞他的情报“很有价值”。科切尔的情报致使多名潜伏在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美国间谍暴露，使他们进了监狱或突然失踪。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奥戈罗德尼克的间谍自杀案。

1975年，科切尔向克格勃华盛顿情报站提供了中央情报局在不发达国家开展反苏活动的机密情报。在科切尔的反间谍情报中，特别提供了中央情报局收买一名苏联外交官的证据，遗憾的是只知道事情的真相，不知道外交官的名字。经苏联反间谍人员调查终于发现，这个“鼯鼠”叫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奥戈罗德尼克，此人出生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到外交部工作，后调到苏联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在哥伦比亚被美国中情局策反开始向美国人提供情报。1974年，奥

戈罗德尼克调回国内，被安排在苏联外交部国际司上班，使他有可能会接触莫斯科与各驻外使馆往来的机密文件。他利用工作之便将机密文件拍摄在微型胶卷上，按事先约定的接头方式秘密地送给中情局特工。在两年的时间里，奥戈罗德尼克向美国中情局提供了近百份苏联外交部机密文件和有价值的资料。

1976年，克格勃反间谍部门根据科切尔提供的详细证据逮捕了奥戈罗德尼克，在审讯中奥戈罗德尼克表示愿意交代犯罪事实，并答应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他抱怨审讯室的钢笔不好用，请求使用自己的钢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他接过自己的钢笔时，迅速取出藏在里面的毒药服下，死在了审讯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奥戈罗德尼克间谍自杀案。美国中央情报局损失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内线，恼火万分。

疯狂参加性游戏俱乐部



装有微型相机的钢笔

科切尔的妻子汉娜到美国后主要充当科切尔的联络员，与克格勃沟通，领取活动经费，接受新的指令，科切尔所有情报的传送都是由她完成的，而且干得非常漂亮。由于有她的掩护科切尔任何事无须出面，极大地减少了暴露的机会，他俩夫唱妇随做得天衣无缝，是一对很成功的间谍鸳鸯。

汉娜不仅貌美，而且待人热情大方，善于与人交际，在社交场上很讨人喜欢。人总有自身弱点，汉娜本质上是个追求物质享受的贪婪女人。1975年，科切尔因给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秘密情报获得苏联人5万美元的奖赏，汉娜马上用这笔钱买下市区一套公寓，同时添置了不少高档家具。按科切尔的薪水计算，他们拿不出这么多钱。

此事引起中情局内勤处官员的注意，他们调查了科切尔夫妇的经济状况，发现科切尔购房没有用贷款，全部付的是现金，而且汉娜的钻石商店虽然名气不小，却盈利不多，仅能维持日常费用。中情局开始对科切尔不放心，采取了一系列调查措施。1976年，苏联人突然逮捕了奥戈罗德尼克让中情局安全部门觉得很奇怪，他们开始怀疑此事与科切尔有关。虽然他

们为此进行了进一步调查，但苦于没有确切的证据，让科切尔夫平平安安地渡过了难关。

科切尔夫夫妇有一个疯狂的嗜好，那就是非常热心参加性游戏活动。他们夫妇加入一个叫“丘比特神殿夫妻”的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每个周末聚集到饭店共进晚餐，其实就是荒唐的“换妻”聚会。吃足喝够后，这对夫妇各自寻找自己中意的性伙伴，开房间共度良宵。他们还参加地下集体性狂欢，加入性群交俱乐部之类的自由性交团体，痴迷般参加各种性游戏活动。这些组织和活动大多是在地下进行的，体面人绝对耻于介入。1978年，纽约市连续发生几个案子都与地下性群交或换妻俱乐部有联系，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对这类场所展开调查，在监控中发现，出入这种场所的不仅有下三烂的贱民，其中还有不少政府官员、医生、律师和军人。

联邦调查局特工还注意到，科切尔夫夫妇是这类活动的常客，每周来三四次，有时夫妇俩一块来，有时各自单独来。联邦调查局认为科切尔夫夫妇热衷此类怪异的活动，其中可能存在不可告人的原因。联邦调查局将科切尔夫夫妇的行为与中央情报局通了气，联系到

早先发生的几件事，中央情报局对科切尔夫妇所谓的“性开放”高度警觉，除了协助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查外，为了尽量降低可能出现的漏洞，开始以合适的理由减少科切尔的工作量，限制他的接触面，巧妙地将科切尔负责的重要事务移交他人。

科切尔对所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可能是一向太顺利了，他根本也没有留心周围发生的变化，照常上班寻找机会窃取情报。空闲时夫妇俩忙着去性活动场所淫乐。许多年后，科切尔夫妇已退出情报部门，当有人问及这段往事时他们透露，当时他们夫妇感情很好，性生活也没有问题，去那种地方也不光是为寻找性刺激。据他们所知，在假日酒店性开放俱乐部里面至少有10多人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他们去那里主要是交结朋友以便猎取情报。汉娜承认与那些美国政界要员、企业家、教授上床共欢，获取情报如鱼得水。尤其一些私人情报，比如这些人的嗜好、性生活习惯和情感状态等在别处很难获取，而这些人物的隐私一旦被克格勃掌握，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诱惑、讹诈等手段布下陷阱使其为克格勃效力。

1983年，中央情报局特工收买了捷克情报部门的

一位官员，科切尔夫妇的间谍身份才被彻底暴露出来。这回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把监控的重点放在汉娜身上，在情报秘密投放点汉娜被当场抓获，随后拘留了科切尔。联邦调查局对他俩分别进行审讯，很快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克格勃间谍身份，并交代了从事窃取情报的事实。

一年后，克格勃为了救出狱中的科切尔夫妇向美国人建议，允许关押在苏联监狱的持不同政见者阿纳托利·夏仁斯基移居以色列，作为交换条件，美国释放科切尔夫妇回捷克。阿纳托利·夏仁斯基是苏联籍犹太人，8年前他因无法实现移民以色列的愿望而采取极端的手段劫持飞机飞往以色列，结果被苏联安全部门逮捕，判了死刑。苏联政府迫于国际舆论改判为无期徒刑。

苏联的建议马上得到美国人的响应，因为西方国家一直在设法营救夏仁斯基。1985年，美苏达成交换协议，科切尔夫妇很快回到捷克，在那里他们像英雄一样受到了热情欢迎，获得捷克政府颁发的勋章，苏联人也给予科切尔夫妇多项奖励。

第二十二章 扑朔迷离的尤尔钦科叛逃事件

维塔利·谢尔盖那维奇·尤尔钦科是克格勃第一总局主管对美国和加拿大情报工作的负责人。这个克格勃重量级人物刚刚升迁不久却坐着美国人的飞机逃跑了，成为整个“冷战”期间叛逃到西方职位最高的克格勃官员。

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没从喜悦中回过神来，3个月后，尤尔钦科就像去某地休假结束了一般又回到莫斯科。他说自己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绑架了。

是真？是假？他的叛逃扑朔迷离，如同一场儿戏。

尤尔钦科上校跑了

1985年7月24日，苏联一个科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应邀到罗马参加学术会议。克格勃负责加拿大情报的高级官员维塔利·谢尔盖那维奇·尤尔钦科随团来到罗马。当然，尤尔钦科的工作是为了保护科学家的安全并监控这些科学家，顺便搜集一些情报。其实，尤尔钦科还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想借此行实现自己蓄谋已久的计划。

8月1日清晨，古老的罗马城微风徐徐，宁静而安详的街区开始热闹起来。尤尔钦科告诉他在苏联大使馆的同事自己要出去散散步、逛逛街景，顺便到梵蒂冈教廷走走，看看博物馆。他漫不经心地走过几条街道，以职业的目光瞧了瞧四周，突然，尤尔钦科朝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所在地维亚·位莱托大街走去。他先钻进了一个电话亭，给美国大使馆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打了一个电话，通报了自己的名字和职位，表示愿意投奔美国，自己目前已经在大使馆门前的大街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天上突然掉下的一块大馅饼让他欣喜若狂，他请尤尔

钦科立即过来，自己马上出去接应。

尤尔钦科对美国是很熟悉的，他曾担任过苏联驻美大使馆的安全官员，在华盛顿生活过5年。他的英语虽然带有浓重的口音，但说得相当不错。从外表看，这位身材魁梧、衣着考究、蓄着红色小胡子的苏联人更像一个美国人。

尤尔钦科刚刚被提升为主管美国、加拿大等国情报的副处长，如此重要的岗位让他在美国人眼里被视为重量级人物。中央情报局在罗马的情报人员立即将这一消息电传到美国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得到报告后，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行动处负责人乔治·克莱尔、反情报科科长格斯·哈撒韦无不喜形于色、异常兴奋。威廉·凯西指示中情局立即派专机去罗马，当天夜里就接走了躲避在大使馆的尤尔钦科，专机经那不勒斯和法兰克福，最后降落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机场。在那里，中情局早有等候的车队将他接到中央情报局总部。

美国中央情报局不着急从尤尔钦科身上挖掘多少有关克格勃的重要情报，他们首先要做的是解决内患，急着要搞清楚有多少潜藏在美国情报机关里的苏

联间谍。美国情报部门也已感觉到有内奸，只是苦于挖掘不出来。中央情报局组成了一个尤尔钦科事件小组，由反情报科科长格斯·哈撒韦领导。

夜幕降临，苏联驻罗马大使馆的人员见尤尔钦科迟迟没有回来开始觉得不安，大使一面急忙派人出去寻找，一面向国内报告。第二天仍然不见尤尔钦科的踪影，苏联大使馆向罗马警方通报了尤尔钦科的情况。克格勃驻罗马的情报人员对尤尔钦科的突然消失感到惶恐不安，他们断定这位有25年克格勃经历的资深间谍，在自己官运亨通的大好时刻却投奔了西方社会。

8月8日，苏联驻罗马大使馆大使拜会了意大利外交部部长吉乌奥·安德烈奥蒂，转交了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信件。要求意大利政府帮忙查清尤尔钦科失踪的情况，以及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和现在何处。意大利方面答应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忙寻找，这只不过是外交辞令，说说而已。几天后，意大利公开发布消息，苏联外交官尤尔钦科在罗马失踪。

他出卖了同志

尤尔钦科住进中央情报局在兰利的一栋秘密房子，格斯·哈撒韦他们开始对他进行询问。鉴于尤尔钦科事件的重要性，联邦调查局的爱德华·奥马利和菲利普·帕克也参与了调查。尤尔钦科说潜藏在美国情报机关里的苏联间谍他知道两个，其中一个代号叫做“罗伯特”，原先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尤尔钦科说，他不知道此人的真实姓名，也没见过他，只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准备派这个人去苏联，到中央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站工作，不知何故没有走成。1984年秋天，罗伯特在奥地利会见过克格勃的高级官员，向苏联提供了秘密情报。

尤尔钦科的口供证实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担忧，他们一直怀疑内部出现“鼯鼠”，苏联间谍渗透进了中央情报局内。因为几周前苏联方面借故逮捕了中情局莫斯科情报站的保罗·斯托姆博，并以间谍罪将他驱逐出境。他们所发展的间谍阿道夫·托卡契夫等也被抓获。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苏联的活动已停止，苦心经营多年的谍报网几近瘫痪。中情局反情报处处长格斯·哈撒韦已经知道“罗伯特”的真实姓名，这个人叫爱德华·霍华德，是中央情报局负责苏联地区的情报官员，尤

尔钦科对罗伯特的描述正好符合霍华德的特征。

1983 年，中央情报局决定派霍华德到莫斯科情报站工作，这是他第一个海外岗位，他很兴奋。后来在接受例行的测谎器检验时被查出有吸毒和偷窃的行为，因而被解雇。此后他搬到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一直心怀不满。哈撒韦深知霍华德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早已盯上霍华德，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发现霍华德多次徘徊在苏联大使馆的附近。

尤尔钦科供出的另一个间谍的代号是“朗先生”，他也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名字，但他曾经见过这个人。“朗先生”曾在马里兰州伏特麦德的美国国家安全署工作过。1980年，尤尔钦科在华盛顿苏联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这个人曾给他打过电话，并到苏联大使馆送过情报。“朗先生”告诉尤尔钦科，美国已发现苏联在鄂霍次克海海底安装的秘密电缆是用作传送机密的军事通讯。中央情报局特工乘美军潜艇进入该地区，在那里安装了一台最先进的窃听设备，获取苏军大量的军事情报。事关重大，尤尔钦科将情报紧急报告国内，十几天后，美国一艘潜艇去那里取窃听资料时意外地与一艘苏联潜艇相撞，此后，中央情报局的

窃听设备也不见了。中央情报局怀疑内部有人泄密，苏联人故意制造潜艇相撞事件，拿走了窃听装置，无奈没有任何线索。如今真相大白，中央情报局按照尤尔钦科的描述开始在内部寻找“朗先生”。

接连不断的烦琐询问和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使尤尔钦科开始情绪烦躁，流露出极大的不满。哈撒韦下令暂停询问，给了尤尔钦科一大笔钱让他到外面放松放松。凭着职业特工的敏感尤尔钦科明白，所谓的放松并非自由轻松，他发现周围有中情局的特工跟踪。尤尔钦科再不想出去了，大部分时间在屋里蒙头睡觉。几天后，烦琐的询问又开始了。

尤尔钦科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披露了尼古拉·夏德林1975年在维也纳神秘失踪事件的真相。

夏德林的真实姓名是尼古拉·阿尔塔莫诺夫，曾经是苏联海军中最年轻的驱逐舰舰长，后来与他的波兰籍未婚妻乘汽艇穿过白令海峡叛逃到美国。克格勃企图说服他为苏联做间谍，但是他却应中央情报局的要求做了美国的双重间谍。1975年，他被中央情报局派到维也纳去与克格勃会面时神秘地失踪了。据尤尔钦科说，在会面时克格勃的人员企图将他麻醉后劫持到

苏联。当他们在汽车后座搏斗时克格勃特工下手太重，意外地将他杀死了。

几次讯问后，中央情报局将尤尔钦科送到弗吉尼亚州弗里德利克斯堡附近的一所二层的楼房里。这里到华盛顿只有40英里，交通十分便利。尤尔钦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行为受到限制。昔日风光无限，一向掌握别人命运的大人物，如今过上这般生活实在难以适应，尤尔钦科心里很不愉快。为了让尤尔钦科高兴，愿意继续为中央情报局效力，中央情报局在金钱上满足他，先后给他上百万美金，并答应，如果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年薪不低于八万。尤尔钦科仍然闷闷不乐，直到有一天他向中央情报局官员提出要去加拿大看自己的情人。

昔日恋情难依旧

尤尔钦科要看望的情人叫瓦伦蒂娜，是尤尔钦科在华盛顿苏联大使馆工作时认识的。瓦伦蒂娜·叶列斯柯夫斯卡娅的公开身份是位女医生，实际上她是尤尔钦科的下属、克格勃的特工。瓦伦蒂娜年轻漂亮，身材高挑丰满，是个性感十足的女人。因工作关系尤尔

钦科与瓦伦蒂娜接触密切，渐渐他被瓦伦蒂娜迷住了，陷入爱河。初到异国他乡的瓦伦蒂娜对尤尔钦科的热情帮助自然心存感激，这样他们开始了一段罗曼史。

后来瓦伦蒂娜嫁给外交官亚历山大·叶列斯柯夫斯基，如今瓦伦蒂娜随她的丈夫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任职。孤独沉闷的叛逃生活让尤尔钦科十分怀念这段柏拉图式的恋情，尤尔钦科希望重新点燃他们之间的爱情火焰，他甚至想象说服瓦伦蒂娜跟他一起到美国生活，那样自己的生活才会更快乐幸福。

他请求中央情报局允许他会见瓦伦蒂娜。中央情报局同意了，并作了周密的安排。中央情报局的官员汤姆森先飞往加拿大的渥太华，再开车赶到蒙特利尔。在加拿大情报机关帮助下他们选择了一家可靠的大酒店，订了一个套间。一切精心安排妥当后，尤尔钦科在两个保安人员的陪同下飞往美国边境城市普拉茨堡，然后驱车进入加拿大境内。之后由加拿大方面负责，一路送至蒙特利尔酒店。加拿大的情报人员对瓦伦蒂娜的住处进行了观察，掌握她丈夫的活动规律。在确定瓦伦蒂娜的丈夫已外出后他们便通知等候

在房间里的尤尔钦科给瓦伦蒂娜打电话。

瓦伦蒂娜听出是尤尔钦科的声音，表现得十分恐慌，显然她已知道他叛逃的事，立即挂上了电话。尤尔钦科再次拨通电话，动情地讲了许多，瓦伦蒂娜慢慢平静下来。当尤尔钦科邀她出来见面时她显得非常犹豫，但是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一块坐了十几分钟，喝了一杯咖啡，瓦伦蒂娜流着眼泪拒绝了他恢复关系的请求，语气非常坚定。尤尔钦科心里明白他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他瘫在沙发上精神几乎崩溃。

自此以后，尤尔钦科情绪低落，越来越消沉。瓦伦蒂娜的拒绝使他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他原先把美国看成自由富裕的天堂，钱现在有了，可几乎失去自由。他对中央情报局的保卫如影随形的做法十分恼火。由于弄到了这样一个大牌的叛逃者，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威廉·凯西到处摆功，把他叛逃的消息和提供情报的事四处炫耀、大吹大擂，令他十分反感。

尤尔钦科失望了，开始重新盘算自己的未来。

11月4日星期日，住所里只有中央情报局两位职员，尤尔钦科说冬天快到了，请年轻的汤姆士·哈南陪他到弗吉尼亚的曼纳萨斯的百货商店买冬衣。路上尤

尔钦科又说服哈南一块去乔治城吃法国大餐。尤尔钦科在服装店试装间溜了出来，给苏联大使馆打了告急电话。后来，尤尔钦科故意选择一家非常热闹的餐馆吃饭，他借上洗手间的机会从餐馆厨房跑了出来，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几分钟后，他乘坐出租车到了苏联大使馆门前。门口已有人在等候他，一下车就立即把他带了进去。

假戏真做

11月5日下午4时，苏联大使馆的新闻参赞鲍里斯·马拉霍夫打电话给美联社驻国务院的记者，宣布下午5时30分将召开新闻发布会，维塔利·尤尔钦科出席。

在苏联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尤尔钦科先用英语，然后用俄语告诉记者们：8月1日上午，数日紧张的工作后尤尔钦科很想放松一下自己，于是决定去罗马梵蒂冈博物馆参观。11时30分，他从博物馆出来，在旁边一家餐馆吃饭，快结束时对面来了一位40岁左右的男人，他把随身带的雨伞放到餐桌上。不一会儿，他感觉头晕眩，肚子发胀想吐，想起身离开却浑身无力.....

尤尔钦科说：“不知道我失去知觉过了多久，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感觉浑身软绵绵的，脑袋发沉，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直到一个高个子美国人走进来告诉我，我当时晕倒在餐馆饭桌上，是他们救了我。这时我才知道已到了美国，自己被中央情报局麻醉后绑架了。”

尤尔钦科宣布：“我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所发生的一切是美国人设下的陷阱和阴谋。”他谴责中央情报局在绑架期间对他的虐待和造谣生事，并使用非人道手段对他进行精神折磨，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他还指责中央情报局以金钱、美女为诱惑，说服他背叛自己的祖国，为中央情报局服务。他声明，除了从报纸上读到的消息外，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罗伯特这个人。

最后，他将自己如何与苏联大使馆取得联系，成功地逃离中央情报局的故事说得有声有色，做了一次精彩的表演。接着，苏联大使馆发言人代表苏联政府指责美国人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是十足的恐怖主义活动，并对美国提出强烈的抗议。

消息见报后，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本来克格勃高官叛逃中央情报局是居功自傲、沾沾自喜，现在无功

不说，还弄得美国政府陷入十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美国总统里根命令凯西局长加强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整顿。



特工必备的应付各种情况的工具包

中央情报局紧急发表声明，大呼自己冤枉，说尤尔钦科在罗马自愿叛逃，主动向美国政府请求政治避难。尤尔钦科留在美国还是返回苏联，应该是他自己的选择，美国人坚持应该在一个不受苏联强迫的环境下同尤尔钦科会面，以便弄清他的真实意图。

“尤尔钦科事件”的真相成了一个谜。苏联人似乎对真假不感兴趣。其实，通过内线克格勃早已经知道

实情，不过克格勃决定将计就计，不仅没戳穿尤尔钦科，还用尤尔钦科自己编的故事做反美宣传，保住了苏联人的面子。

11月6日，尤尔钦科在大使馆官员的陪同下来到杜勒斯机场，在候机大厅有记者问：“你要回苏联吗？”尤尔钦科大声说：“是的，我要回家。”说完登上苏联民用航空公司的飞机。

尤尔钦科回国后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还被嘉奖，重新回到克格勃第一总局工作。1986年，美国媒体炒作说尤尔钦科已被枪毙，而且出现了不少版本，开始苏联没有理睬，后来发现中情局越说越邪乎，连忙让尤尔钦科露面辟谣，东德电视台特地为他做了个访谈节目。

据说，苏联解体后尤尔钦科去了莫斯科一家银行做了保安工作。

第二十三章 疯狂作案的“鼯鼠”家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海军经常发生一些怪事：无论事先采取多么严格的保密措施，只要美国海军舰艇进行大规模的行动，苏联人的舰船就会如幽灵般地出现在附近，而美国舰船追踪苏联潜艇的那一套绝密方法，在苏联人面前却全都失效了。

这一切直到沃克间谍案暴露后才真相大白，原来是沃克这只大“鼯鼠”在搞鬼。他给苏联提供了大量有关密码的密钥资料，能破译美国舰艇之间的所有密码通信。约翰·沃克在长达17年的间谍活动中所提供情报的种类和价值，都堪称空前绝后。

有心无意做了间谍

约翰·沃克的童年并不快乐，父母嗜酒如命，经常发生口角，不久，他们就分道扬镳。从此无人管束的他滑入犯罪的泥坑，十几岁时就有4次破门偷窃的记录，打架斗殴更是家常便饭，总之是一个十足的小无赖。他的哥哥阿瑟当时在军队，觉得必须帮助这个弟弟。沃克中学辍学后17岁那年，哥哥让他加入了美国海军。

进入海军后，沃克变成另外一个人，日常生活中他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很招女性喜欢。他工作干得也不错，先后在水面舰艇和潜艇上从事重要的机密通讯工作，经过培训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无线电报务员，从水手晋升为海军准尉。在长官的眼里他表现一直不错，海军有一份鉴定是这么评价他的：非常忠诚、责任心极强、为人正派、颇富幽默感。特别重视本人和海军的荣誉，严格服从海军的原则和传统。他待人友善，和朋友们相处和睦。

1957年，沃克与芭芭拉结婚，婚后5年他们生了4个孩子。芭芭拉一直是个好妻子，好母亲。沃克在家

乡开了家咖啡馆，以补贴家庭日益沉重的开销。1968年初，沃克患上了急性抑郁症，情绪跌入了低谷。此时，家里开办的咖啡馆倒闭了，负债累累，生活陷入了困境。当时他刚调到大西洋美国潜艇指挥联络中心，做了一名通讯值班军官。他觉得升迁毫无希望，工作单调又没有多少油水，生活枯燥乏味，令人厌倦。

一天，他在值班室当班，一群水兵在闲聊，其中一个水兵开玩笑地说：“如果给苏联人当间谍的话，我就出卖舰艇密码。”那口气就像银行出纳要挪用公款，不过是举手之劳。另一位水兵接着说：“好主意，那东西肯定值钱。”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沃克心头一动。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天空下着霏霏细雨，沃克驾车去了华盛顿，进入市区后他把车开进停车场，然后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苏联驻美大使馆。正好使馆里面出来一位苏联人，他走上前急促地说：“我想与使馆安全官员谈谈。”苏联人十分惊讶，但马上镇静下来，抬头瞧了他一眼，把他带进了使馆，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一位克格勃军官接待了他。

克格勃在接待这种不速之客方面有严格规定，只是仔细倾听对方的叙述，记录来人提供的情报，确定其职业和接触机密的程度，以便搜集资料对来者进行调查，一般都不会作任何评论。

沃克说他是美国海军二级准尉，负责通讯工作，有机会接触大量机密文件。克格勃军官微笑着示意他讲下去，沃克表示他愿意出卖美国军用密码，但必须每周付给他1000美元。当他具体说到可提供KL-47型密码机的30天密钥表时，克格勃军官表现出极大兴趣，于是打破了初次见面保持沉默的规矩，约定一个月之后再见面。

可能是沃克的情报太有诱惑力，克格勃这次算是豁出去了。虽然他们对沃克还一无所知，他提供的一切可能是假的，或许沃克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以此做诱饵引克格勃上钩，一个月后与他见面的克格勃军官可能当场被捕，但是，美国海军密码系统资料的重要性值得克格勃军官冒险赌一把。

会面结束后，克格勃军官给他裹上一件长大衣，戴上帽子，从后门上了一辆小车。他坐在后座，两边都有一人遮掩。车子在城里不停地兜圈子，确定无人

跟踪后让沃克下了车，沃克在停车场开着自己的车回到部队。

一个月后，在一个叫亚历山大的百货商场门口，人来人往，纷杂拥挤，沃克快步钻进克格勃军官的小汽车，沃克给克格勃军官带去了KL-47型密码机上使用的30天密钥表，以及几张解密卡。资料很快得到克格勃技术部门的确认，他们从沃克提供的第一份密钥表就看出了沃克的巨大价值。当问到还能提供什么情报时，沃克说：同潜艇和美驻欧海军机构进行联络的KWR-37密码系统的全套资料，KG-13、KL-11和KL-7型密码机的资料，拍发给大西洋潜艇和水面保障船的密电。

这些情报资料实在是太宝贵了，因为只要搞到密码，对方就无机密可言。有关密码通讯的重要性，美国国家安全局保密处处长埃尔·克拉克曾很专业地说：“只要让我获得你的密码，你就再没有一点秘密了。我用不着偷你的空袭计划，我用不着知道你的核控制命令，我也用不着了解你的外交通讯。如果我获得了你的密码，我就了解你的一切致命性秘密。”对于密码的价值，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美国有一套完

整的保密措施，所有的美国密码系统和器材都是由国家安全局设计制造，文件资料统一印制。密码机、密钥表以及技术手册从制造出来到销毁或退回国家安全局均有专人负责，有着完整的造册记录。为保护通讯机密的安全，美国政府每年要花掉数亿美元。沃克带来的情报价值的分量无论怎么夸大也不为过，因此沃克的出现惊动了克格勃最高层。为应对新的电子间谍战，甚至导致了克格勃电子侦察机构大改组。

此次见面，克格勃军官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说沃克的工作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为了他的安全，只有万不得已时才直接见面，今后联系将通过“邮政信箱”进行。他们确定了“邮政信箱”所在地点，克格勃给了他一台微型“米诺克斯”相机。

沃克觉得在大西洋美国潜艇指挥联络中心用“米诺克斯”拍一些秘密情报和密码材料是再简单不过的任务了。最后，克格勃军官给了沃克一个鼓鼓囊囊的纸袋，这个纸袋让沃克欣喜若狂，里面装着一大叠50美元面额的钞票，一共有5000美元。克格勃很少如此出手大方。沃克自己要求的报酬每周才1000美元，如今只提供了一次情报就给了这么一大笔，沃克是铁了心

要做个超级“鼯鼠”。克格勃也是下了大赌注。

巨大的利益激发了沃克贪婪的热情，他往往主动出击，四处寻找情报源。此人在情报搜集方面富有创造性，天生是块做间谍的料。不用点拨，他就知道哪些通讯资料克格勃感兴趣。回到大西洋美国潜艇指挥联络中心，他陆续偷偷地复制了美国海军使用的KWR-37型密码机的技术手册，提供了该型密码机的密钥卡。

根据这本手册，克格勃技术部门可以造出具有KWR-37同样功能的密码机。为了进一步方便苏联人的破译，几天后，沃克通过“邮政信箱”又给苏联人带去机密情报的原件，这样可以帮助苏联人更好地掌握美国的密码体系。通过沃克提供的情报，苏联人几乎可以阅读美国海军的所有加密情报。

美国海军通讯的核心机密经沃克之手大量流向苏联情报机构，就连苏联人都有些紧张，感到有些应接不暇，担心出事。这些情报对苏联来说太珍贵了，无论如何不能轻易失去沃克这只难得的“鼯鼠”。因此，克格勃建议放慢提供情报的节奏，减到每三个月一次。通过“邮政信箱”克格勃不断地劝他多加小心，不

安全的事情不要去做，“如果认为有危险就不要动手”。

疯狂搜集情报

克格勃第十六局负责沃克的间谍工作，按照第十六局的严格规定，沃克与该局的联系人只能在第三国见面，所以每年沃克都去印度孟买或奥地利的维也纳。在一次会面中，克格勃联系人兴奋地告诉沃克，由于他对世界和平的卓越贡献，他获得了苏联海军将军的军衔。沃克很客气地表示：“请替我向他们表达深深的感谢。”

1968年2月开始，沃克向克格勃不断提供密钥卡、密钥表、技术手册以及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资料。可以这么说，破译美国潜艇、基地和保障船之间的密电来往所需要的一切条件，沃克都为苏联准备好了。依靠沃克出卖的机密情报，苏联破译了成千上万份美国情报。沃克间谍案暴露后，有人严厉批评美国海军的保密系统存在严重的漏洞。沃克被捕后，想起自己第一次出卖情报的地点，曾调侃地说：“连百货商场里的安全工作都比海军要好得多。”

沃克给美国海军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美国海军“天蝎”号核动力潜艇1959年加入美国海军。这艘“鲉鱼”级攻击潜艇长76.5米，宽9.5米，排水量3500吨，水下航速20节，水面航速35节，装配“马克”型鱼雷23枚，这种重650公斤的鱼雷射程可达5海里。火力强大的“天蝎”号核动力潜艇是那个年代潜艇中的霸王。1968年5月17日，“天蝎”号核潜艇随所属的美国海军第6舰队完成为期3个月的海上任务，返回诺福克海军基地的途中突然与基地失去了联系，神秘地在大海中消失了。美国海军组成专门的委员会开展调查，事后秘密调查报告称：弗兰西斯·斯拉特里中校指挥的“天蝎”号核潜艇，曾与跟踪上来的苏联潜艇进行了交战。显然，苏联海军“E”级核攻击潜艇早有准备，美海军“天蝎”号核潜艇只来得及发射一枚鱼雷，就被苏联核潜艇的鱼雷拦腰击穿。大量海水涌进潜艇的控制室，通过管道奔向核反应堆，发动机室舱壁破裂，紧接着发生剧烈的爆炸。“天蝎”号核潜艇连同99名官兵全部沉入大西洋海底，无一幸存。

由于沃克向克格勃提供了美国海军通讯密码等一整套机密情报，从而使苏联情报部门破译了“天蝎”号

核潜艇的通讯密码。“天蝎”号核潜艇一改变航线，处于孤独一艇的状态时，一直尾随其后的苏联舰艇便跟了上来，悲剧也就发生了。

1970年，沃克调离了大西洋美国潜艇指挥联络中心，到一所通讯学校做应用研究室主任。他已习惯那种刺激冒险的间谍生活，因此到学校不久他就提出希望到海上舰艇服役。一年半后，他的申请得到批准，被分配到“尼亚加拉瀑布”号快速供应船上负责通讯工作，这艘现代化的大型海军供应船与海军各种作战舰艇都有密码通讯联系，拥有多种型号的密码机、技术手册以及使用90天的密钥表。

一登上“尼亚加拉瀑布”号供应船沃克便开始搜集相关情报，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在供应船上他负责通讯密码材料的签收、登记，本来另有专门的保管员，他借方便工作的理由配备了保险柜的钥匙，偷偷拍摄了所有有价值的秘密资料。他利用休假、出差等机会，将秘密情报投放到“邮政信箱”，从克格勃手上换回美金。

1974年夏末，沃克离开了“尼亚加拉瀑布”号供应船，回到诺福克大西洋美国潜艇司令部做参谋。到

1976年，美国海军决定对现役军官进行一次常规的背景调查，其中有对国家和军队的忠诚等问题。沃克获悉后心惊胆战，自知做了亏心事，害怕不能通过测谎。1971年，海军也搞过一次军官背景调查，当时他正好调到通讯学校不久，就花了3美元刻了一枚图章，伪造了一份背景调查合格的表，塞进自己的档案，以此证明在原单位刚接受了调查，得以蒙混过关。学校这方面管理相对松一些，在潜艇司令部他不敢再次造假，不仅风险大，自己也没有这个勇气。于是，他决定退伍回家。

不做现役军人但间谍还要干下去。再说沃克已经把从事间谍活动作为自己的事业，不想半途而废。那种令人心跳加速的经历让他有一种莫名的快感。间谍活动使他的生活与众不同，甚至有了了不起的成就感。克格勃已授予他海军将军军衔，自己已经是个大人物了。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一旦退出海军现役就搞不到情报了，那自己就成了一个废物，克格勃必然会将他抛弃。沃克只有一个办法：开辟新的情报来源。

经过几天的筛选，沃克看中了他以前的部下杰里·惠特沃斯海军准尉。此人先后在“尼亚加拉瀑布”号供

应船、“星座”号和“企业”号航空母舰上服役，担任密码资料保管员等职务。沃克发现惠特沃斯一直在偷偷抽食大麻，而且在他31岁刚刚离婚后立马就去追求一个16岁的少女。由此，沃克认为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惠特沃斯不仅爱占小便宜，还梦想着发大财。有一次，他对沃克说，只要能得到一大笔钱，就是犯滔天大罪也不怕。沃克与惠特沃斯关系一直不错，因此，沃克相信惠特沃斯会加盟与他一起干。

1976年夏，沃克拜访了惠特沃斯，如沃克事前所料，他没花多少口舌就说服了惠特沃斯。一开始，沃克就坦率地讲自己在做秘密军事情报生意，价钱卖得很高，很轻松地挣不少钱。惠特沃斯听后稍微有点惊讶，但马上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沃克接着说自己干了很长时间，只要小心点，被抓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惠特沃斯心动了，很痛快地就同意一块干，沃克当即拿出自己的4000美元送给他，惠特沃斯非常感激地收下了。

从海军退役后，沃克与人合伙开了一家侦探事务所，但业务一直做不起来，他的情绪非常沮丧。正是这个时候，沃克接到了惠特沃斯的暗号，告诉他搞到

了一批货，并相互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惠特沃斯情绪显得有些激动，毕竟第一次干这种会坐大牢的买卖。惠特沃斯带来的大量胶卷中包括美国海军3个密码系统的技术手册和3个月的密钥以及不少明文电报，这些密码资料几乎把美国海军彻底曝光了。

这是一批上好的货物，沃克当然非常满意，高度评价惠特沃斯是个做大事的人物，当即又从自己口袋里拿出8000美元。惠特沃斯一见到大笔钱，马上兴奋起来，觉得自己干得很成功，像个大人物。惠特沃斯扬扬得意，但美国海军却因他的出卖行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弥补他造成的损失，美国海军可能要花上百亿美元。

家族间谍网

沃克与妻子芭芭拉的感情一直不和谐。芭芭拉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从小受的教育是做人必须诚实，对国家要忠诚。她19岁嫁给沃克，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当然芭芭拉没有任何怨言。沃克调到大西洋美国潜艇指挥联络中心任通讯官后情况发生变化，1968年，沃克在当地买了一桩坐落在富人区的别墅。芭芭

拉带着孩子搬进了豪华的新居。

芭芭拉感到十分惊讶，沃克变得非常有钱，不仅买房买豪华家具，还买了游艇，后来甚至买了一架私人飞机。人也变得神神秘秘，周末很少回家。一天，沃克上班去了，出于怀疑和好奇的心态，芭芭拉偷偷溜进沃克的书房，四处盲目翻找。当她拉开书桌抽屉时发现一个铁匣，里面装有胶卷、手绘地图，还有一些照片。此外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需要舰载直升机旋转部件情报。芭芭拉这才彻底明白了，沃克利用职务之便偷窃机密情报，他的钱是出卖海军机密情报换来的。芭芭拉惊出一身冷汗，差一点晕过去。

几天后，芭芭拉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这一天，沃克下班回到家，她决定要劝阻他，让他立刻停止这种可耻的卖国行为。当沃克知道妻子偷看了他的秘密立即暴跳如雷，狠狠地给了芭芭拉一个耳光。芭芭拉骂他卖国贼，沃克为了堵住芭芭拉的嘴，强迫芭芭拉跟他一起出去投放情报，并威胁说如今你也是同案犯，告倒我你也要坐牢。

受到沉重打击的芭芭拉陷入绝望，精神濒临崩溃。她开始借酒消愁，慢慢饮酒成瘾，很多时间喝得

醉醺醺的，几次下决心告发沃克但都没有这个勇气。有一次，她甚至拨通了联邦调查局的值班电话，听见对方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但最后她还是搁下了话筒。

就这样，这个可怕的秘密一直折磨着芭芭拉，直到他们结婚16年后的1976年，芭芭拉与沃克离婚，带着两个儿女与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这个沉重的秘密依然压在她身上。

沃克的儿子米歇尔·沃克由于成绩太差没能进入大学，在父亲的鼓励下1982年也加入了海军。1983年7月，米歇尔回家休假，当时他在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作战室服役。晚饭后，父子一起在客厅看电视，跟儿子谈话无须拐弯抹角，沃克说：“如果你能搞到机密文件，交给我，你就会挣大钱。这事做起来并不难。”米歇尔并不感到丝毫的惊讶，从小他就知道父亲会用某种神秘莫测的方式挣钱，母亲曾数次在喝醉的时候说他父亲是叛国者。长大后，母亲每次说要告发沃克，米歇尔都会极力劝阻，说父亲出了事肯定会影响他在海军的前途。如今作为现役海军，他非常清楚父亲在说什么。米歇尔问：“你一直就是这么挣

钱？”沃克回答：“是的，一星期就可以搞到1000美元，你能再找到挣这么多钱的工作吗？”米歇尔动心了。父子没再说什么，继续看电视。

米歇尔再次回家时，口袋里已揣着一份机密文件，他把文件交给父亲问：“这是不是你需要的东西？”沃克瞅了一眼，说就是这些文件，干得不错。1984年4月，沃克给了儿子第一笔1000美元，并对儿子说，弄些绝密的资料文件更值钱。

有了几次经历，米歇尔胆子就大了，他熟练地把机密文件偷出来，复印后交给沃克，又把文件偷偷地放回去。当然，他最终还是被自己的父亲害了。沃克间谍案暴露后，美国海军反间谍机构向“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发了电报，当时“尼米兹”号停泊在以色列海法港，米歇尔当即被戴上手铐。在押送回国的路上米歇尔一直在哭，只有22岁的他个头不高，体质单薄，长着一张孩子脸。那时候年轻的米歇尔还不知道，等待他的是25年的牢狱生活。

沃克的哥哥阿瑟·沃克是一位退役海军少校，沃克把他也拉入了间谍网。1968~1973年，阿瑟也在诺福克服役，当时他在海军大西洋潜艇舰队战术学校教授

反潜战术。后来他在VSE公司工作，这是一家负责维修海军舰船的企业，搞不到什么机密情报。沃克在给克格勃的情况汇报中也提到，阿瑟接触面比较窄并且有限，很难搞到有价值的机密情报。阿瑟从事间谍活动受到惩罚，是被他弟弟沃克害苦了。

1984年11月17日，芭芭拉终于下定决心拨通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当时喝得半醉的她断断续续地告诉对方，8年前与她离婚的前夫约翰·沃克出卖海军机密情报，是苏联克格勃的间谍。沃克很有钱，却从来不给她抚养费。一星期后，一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来找芭芭拉，他耐心地听完芭芭拉的叙述，结果发现芭芭拉说话与上次在电话里讲的一样，叙述混乱，事实不清，缺乏逻辑联系。当时他认为这个女人不是个神经病就是个酒鬼，于是客气地向芭芭拉表示了感谢，回去后写了份报告，例行公事编号入档，并注明此件属间谍事件，但无进一步调查的价值。

1985年2月，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局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份档案，巡视官员意识到这份档案的潜在价值，他们可能错过了一次重大间谍案的破获。于是，他立刻将档案复印件发给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

部，同时，也发了一份给沃克所在的城市诺福克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至此这件事才引起联邦调查局上下的重视，并由一个叫约瑟夫·沃尔芬格的特工负责调查。

沃尔芬格仔细研读了档案文本，也认为芭芭拉的指控是真实的。芭芭拉揭发沃克曾逼迫自己的女儿劳拉出卖军事情报，在沃尔芬格的安排下，两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访问了劳拉。沃尔芬格是想用劳拉的口供来证明芭芭拉所言的真假。谁也没有料到，面对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劳拉异常的镇静。当问及沃克是否在出卖海军机密情报时，她没有半点犹豫地说：“是的，他与苏联人搞情报交易。”

联邦调查局从联邦大法官那里获得监视沃克的许可，沃尔芬格便在诺福克开始调查沃克。几天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再次找到芭芭拉，进行了一次气氛平和的长谈。芭芭拉承认自己长期酗酒，但特别声明知道今天有客人，她没有喝酒，因此语言清晰，思路有条理。她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沃克是个间谍，而且已经做了十几年。

联邦调查局对沃克的行踪和电话进行监控，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5月17日，事

情有了变化。这一天，沃克接到表弟的电话，得知他姑母逝世了，葬礼定于19日举行，表弟请求他前去出席葬礼。自小沃克的父母就经常吵架，后来又离异了，他们俩对沃克基本上没有照料过，沃克全靠姑母抚养成人。出于人之常情，这个葬礼沃克无论如何都要参加。不料，沃克支支吾吾地拒绝了，说那一天有急事要办，必须去北卡罗来纳，请表弟谅解。后来，另一位表兄也打来电话，恳请他把手上的事往后推几天，过去见姑母最后一面，沃克执意说事情不能推迟，他必须亲自去办理。沃克的表兄非常伤心，差一点在电话里吵起来。

这个电话引起沃尔芬格的兴趣。他查了一下日历，5月19日是星期天，有什么事非要这一天去办，而且非要他亲自去，对出席姑母的葬礼都可断然拒绝？沃尔芬格在台历19号这一页重重勾了个圆圈，并在这一天增派了监视沃克的车辆和人员。

19日清晨，街道上静悄悄的，沃克走出了别墅的大门，机警地朝周围扫视了一眼，快步奔向车库，钻进了自己的雪佛兰小汽车，小汽车向市区开去。途中，沃克停了两次车，像是在核实地图的标记。有一

次，他还倒车往回开，显然，这么做是看有没有人跟踪。小汽车穿过诺福克城区走了一阵，然后右拐向西。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明白，他们的对手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老手。

特工们远远跟着沃克的雪佛兰，通过保密无线电保持联系，并随时向沃尔芬格报告情况。沃克的车又往北上了64号州际高速公路，沃尔芬格接到报告分析：朝北方行驶，意味着沃克可能会去华盛顿，说明沃克的活动是由克格勃华盛顿情报站负责，那么他们接头的地点肯定在华盛顿附近。沃尔芬格马上与联邦调查局华盛顿分局取得联系，通报了沃克的情况以及所处的位置，华盛顿分局随后做好了布控准备。

此时，联邦调查局派出了一架直升机，出动了20多辆警车，沿64号州际高速公路往华盛顿方向对沃克进行全线监控。沃克也非一般的小“鼯鼠”，他是一个颇具天赋的间谍，联邦调查局强大的监控力量曾一度丢掉了目标。得利于直升机的空中优势，联邦调查局在傍晚时又发现沃克，此时他已经进入华盛顿地区，联邦调查局华盛顿的特工出动增援。

沃尔芬格接到监控人员的报告，一辆车牌号

DSX177的马里布牌蓝色轿车驶入监控地区。沃尔芬格下令靠近轿车进一步观察，不一会儿，联邦特工报告，驾驶这辆车的是一位男子，并描述了男子的年龄和相貌特征。此外，车里还有一位女人和一个孩子。沃尔芬格随即敲动笔记本电脑键盘，输入上述信息，显示屏上出现结果：此车属于苏联驻美大使馆，开车人是大使馆三等秘书，名叫阿列克谢·卡琴科，据联邦调查局掌握的材料分析，此人是一名克格勃军官。看到这些资料沃尔芬格兴奋起来，此人可能正是沃克的联系人，还带着老婆和孩子作掩护。

在一个岔路口沃克下了高速，小车在一根电线杆前停下来。他下了车悠闲地走动，很随意地将手上一只七喜牌饮料罐放在电线杆旁，然后开车离去。

一会儿，跟踪上来的特工杰克逊·洛在电线杆旁发现了饮料罐，他拿起饮料罐察看了一番，罐体上部被画了个橙色的圈。杰克逊明白，这是沃克的联络标志，向克格勃示意他已经进入约定地区，可以按预定的方法投递情报。于是，杰克逊把饮料罐放回原处，并通过无线电话将情况告诉了全体监控人员，随后又补了一句：“小心那只饮料罐，这是个有力的证物。”

杰克逊的同事误解了他的意思，他们经过电线杆时拿走了饮料罐。

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卡琴科开车也到了电线杆附近。结果，他围着电线杆找了老半天也未见到七喜牌饮料罐，他惊恐不安，不知是沃克因故取消了行动，还是出现了意外。卡琴科决定立刻中止行动，驾车飞速离开现场，朝华盛顿市区奔去。

所有发生的一切沃克并不知道，在距离电线杆约7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垃圾存放处，按原定计划，他将一只装有情报的食品袋埋在一堆垃圾里。沃克离开后，跟踪上来的特工很快在垃圾堆里发现了食品袋。里面藏着一大捆机密文件，共有120多份。根据文件签收显示，大部分文件来自“尼米兹”号航空母舰，而沃克的儿子正在该舰服役。此外，有一封沃克写给克格勃的汇报信，就是在这封信里沃克提到了自己的儿子，他说这批文件是“X”提供的，他现在正在搜集大量材料。“我打算去取他的最好的材料，希望你们定好第二个约定的日期。”虽然他用“X”代指儿子米歇尔，但一看食品袋里文件上标示的来源，就很容易找到沃克的儿子。

沃克的汽车开进一个小镇，在一家食品商店前停下来，他买了些食品和饮料回到车上。一小时后，他重新上了高速公路，又在另一个岔路口下了公路，来到两棵紧邻的大树前，在两棵树之间反复摸索着，显然，他在寻找克格勃留给他的美元和指令。翻找了十几次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他站在大树前仔细察看地形地貌，觉得没有搞错，他不甘心，又回到大树跟前，甚至犯忌打开电筒搜寻。突然，他想起了垃圾堆下的情报袋，连忙开车去投放食品袋的地方。

沃克发现装情报的食品袋不见了，惊出一身冷汗，一向精明的他迷糊了。如果克格勃拿走了食品袋，必定会在两棵大树间放一个包裹，这一二十年都是按这个规矩联络，从来没有出现过意外；克格勃在垃圾堆取走食品袋，不去大树下也会把包裹留在这里。假如发生了变故，克格勃取消这次行动，那也会在大树下留下通知。现在垃圾仍是那堆垃圾，只有“垃圾袋”不见了。沃克预感事情不妙，于是匆忙驾车前往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城。联邦特工杰克逊等一大帮人在后面跟踪。沃尔芬格下令不要在高速公路上拦截沃克，他身上肯定带了枪，但是要紧紧盯住他不能有任

何的松懈，等他停下来，无论在什么地方立即实施抓捕。



沃克间谍网成员：约翰·沃克的儿子米歇尔·沃克（左）、哥哥阿瑟·沃克（中）、朋友杰里·惠特沃斯

深夜12点多，沃克的车在洛克维尔的拉马达旅馆前停下，他觉得十分疲倦，打算在这里休息一下。他锁好车，走进旅店开了房间。跟踪过来的联邦特工对旅店实施了严密控制，随后调来大批警察增援，将旅馆围得严严实实。

凌晨1点，沃克房间的电话铃声响了，特工冒充旅店保安说：“沃克先生，很抱歉打扰你了，有辆新雪佛兰汽车是您的吧，有个酒鬼撞坏了您的车，请下楼处理一下。”沃克扔下电话，穿上衣服下楼，正骂骂咧咧走过拐角处，突然，两支手枪顶住了他的脑门，亨特说：“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把手抱在脑后。”他没有

反抗，很顺从地照亨特说的做了。

审讯时，沃克没有作任何抵赖，像叙述一个传奇故事一样交代了他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事实。他说，他干这一行完全是为了钱，利欲熏心。他想减轻对儿子米歇尔的惩罚，同意供出同伙惠特沃斯。

5月20日上午，联邦特工敲响了惠特沃斯的门，一个长着满脸络腮胡须的男子拉开门，特工说：“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

“请进吧。”惠特沃斯声音有些发颤，他把来人领到客厅。联邦特工继续说：“因从事间谍活动，今天凌晨沃克被捕了。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你参与了他的间谍活动。”

接着阿瑟·沃克和米歇尔也先后被捕。至此，隐藏近20年、带有家族性质的间谍网终于大白于天下。

自从沃克充当苏联间谍后，美国就经常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怪事。一位海军高级将领曾发牢骚，无论事先采取多么严格的保密措施，只要美国海军舰艇进行大规模的行动，苏联人的舰船就会如幽灵般出现在附近，好像美军的行动计划每次都给苏联一个副本，美国海军几乎无机密可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拥有

技术优势的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大洋都很容易捕捉到噪音过大的苏联潜艇，无论苏联潜艇走到哪里美国海军都能准确地追踪到目标。70年代末80年代初，情况有了变化，苏联人的潜艇不仅噪音变小了，而且美国舰船追踪苏联潜艇的那一套绝密方法在苏联人面前失效了。反之，苏联潜艇往往潜伏在某海域等着美国潜艇出航跟踪，这只能证明，苏联人事先知道美国潜艇的出航时间。上述发生的一切直到沃克间谍案暴露后才真相大白，原来是沃克这只大“鼯鼠”在搞鬼。他给苏联人提供了大量有关密码的密钥资料，使苏联人得以破译美国舰艇之间的密码通信。

后来，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贡站站长的沙里克说，在越战期间，越南人常常能事先知道美军B-52轰炸机的出动，甚至了解B-52轰炸机下一个投弹目标。美军指挥官对此非常恼怒，觉得不可思议。这位站长当年奉命破解其中的秘密，可是一直毫无进展，沃克的出现让他为自己当年的无能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他说沃克不仅提供了海军各系统的情报，还出卖了其他武装力量、政府、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情报。

1985年10月28日，在美国巴尔德摩联邦法院，法官宣布判处约翰·沃克无期徒刑，判处其儿子米歇尔·沃克 25年徒刑。

第二十四章 克格勃老牌特工家门前叛逃

被称为“世界上空前最大的搜集秘密情报的间谍机构”的克格勃，一直被欧美媒体描绘成“令人不寒而栗”或“神秘”、“恐怖”的代名词，克格勃则针对欧美的间谍常常会投靠自己，宣称克格勃工作者个个都是对信仰和事业绝对忠诚的人。

任何情报机构都有叛逃者，克格勃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事件就是一个给克格勃带来巨大损失的例子。该事件导致英苏相互驱逐对方31名人员，也创下了间谍在克格勃眼皮底下首次成功越境逃走的纪录。

一个老牌克格勃的隐秘

戈尔季耶夫斯基全名克里斯托弗·戈尔季耶夫斯基，1963年正式成为克格勃的一员。

他在克格勃莫斯科总部先后工作了9年，人脉颇广，与克格勃高层关系密切。此后，他两次前往克格勃哥本哈根情报站工作，主要负责搜集政治方面的情报。

戈尔季耶夫斯基本来凭借着自己的资历和工作能力，在克格勃里前途无量。然而，从1968年夏天起，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

这一年，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的自由之梦，也深深触动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他本是搞政治情报的特工，也许是黑幕了解太多了，他开始对政治非常反感，于是他开始与西方情报部门联系，试图找一条新的出路。

1974年底，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试探性地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接触，从此开始扮演双重间谍的角色。

1978年，他被克格勃派往英国伦敦执行任务。

一直主管政治情报机构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自身丰富的经历就是个巨大的情报库。1983年起，他开始陆续向莫斯科发去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长篇报告，总是得到好评，引起苏联高层的关注。戈尔季耶夫斯基向苏联最高领导层提供的政治情报被认为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连戈尔巴乔夫都直接审阅过他的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出色表现巩固了他在伦敦的地位。

到1985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克格勃内部的声望已经很高了。1月，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召回莫斯科克格勃总部，被任命为驻伦敦的情报组织负责人。

与此同时，戈尔季耶夫斯基积极替英国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他利用回莫斯科汇报工作的机会想方设法详细地了解克格勃第一总局的情况。此外，在工作期间或出差休假时，他和许多克格勃高官、重要外交官和政府官员交谈，搜集了大量情报提供给英国人。戈尔季耶夫斯基事后回忆说：“真是不可思议，只要在这些高层官员的办公室里随便坐坐就能探知许多东西，他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几部电话，电话的多少则往往表明它们‘主人’地位的高低。”

戈尔季耶夫斯基与克格勃负责国外情报的第一总

局欧洲情报局副局长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个人关系密切。他以汇报工作为借口，经常去格鲁什科的办公室，一坐就是一个钟头。通过旁听他的电话，戈尔季耶夫斯基获得不少机密情报，这比任何高级窃听器都省事得多。

1984年12月，即将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了英国。在访问期间，戈尔巴乔夫每天会得到三四份情报汇编，其中大部分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有时，对未来情报工作的重点，戈尔巴乔夫会陈述自己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这些看法对苏联大使馆及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活动有着直接的指导性意义，也是极有价值的情报。这些讲话通过戈尔季耶夫斯基很快出现在英国情报官员的案头。戈尔巴乔夫可能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平生第一次国际谈判，给他汇编情报、提供咨询意见的竟是一个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

奉命返回莫斯科

1985年5月17日，戈尔季耶夫斯基收到克格勃总部的电报，命令他火速前往莫斯科正式接受新的职

务。并被告知，克格勃主席、政治局委员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和主持第一总局工作多年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将军要接见他。

这封电报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奇怪的是电报对当时驻伦敦的苏联大使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波波夫触动很大。此人一向目中无人，以前他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之间曾有摩擦，此时他立即抛弃前嫌，满脸笑容，慈父般地叮嘱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同上司见面时该如何行事。

情报人员的第六感觉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事情可能不妙。盯着这封电报，他感到手心出汗，气闷心慌。听完波波夫大使一番忠告不久，莫斯科又来了第二封电报，通知他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谈话的题目。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在莫斯科等待他的一定是个巧妙伪装的陷阱。但他马上平静下来，进行自我安慰，是长期扮演双重间谍身份的压力过大让自己多疑了，也许在莫斯科等着他的只有桂冠。

5月18日，是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伦敦的前一天，也是他三年来最忙乱的一天。他忙着为去莫斯科作准备，并且要准备好给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的汇报

材料。下午他去了一趟布鲁姆斯贝里区的科来姆斯·菲尔兹公园，要将5000英镑转交给一个英国秘密情报人员。情报站的技术人员正在赶制特殊的工具，他们用成型纸做一块中空的砖。戈尔季耶夫斯基把包在塑料纸里的250张20英镑的纸钞放进去，将“砖”放进一个塑胶小袋中，然后带领自己的女儿玛丽和安娜出去散步，在公园里他和女儿玩耍的时候，偷偷将“砖”藏入公园北墙与小路之间的草丛中，内线会按指定时间捡走“砖头”。

5月19日，大使馆的那辆老福特车清早就来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门前。他告诉家人，去莫斯科的时间不会很长，让他们安心留在伦敦。与家人辞别后，小车直奔肯星特·海依艾的希楚机场。

在莫斯科谢列梅捷夫机场走出飞机，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直觉告诉自己气氛确实有些不对。在机场出口处边防检查员仔细翻阅他的绿色外交护照，好像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然后当着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面打了两个电话，大概是报告他到了。最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不安的是没有人来接他，不过他后来得知，上级派来接他的车弄错了地方去了另一个机场。

戈尔季耶夫斯基拦了辆的士，回到了列宁大街109号自己的住宅。开门时，他马上就发现住所被人搜查过。他和妻子赖拉总是故意将门上的三个锁栓锁两个，而这次却是三个都锁着。初看房里的东西好像一切原封未动，但仔细一看，他还是发现浴室里用玻璃纸包着的纸巾有被摸过的痕迹。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清楚，房里除了床底的一摞书外，克格勃找不出所需要的东西，这些书是他从国外带回来的，其中许多书包括全套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是被苏联官方列为禁书的。然而许多苏联外交官都带这些书入境，这是公开的秘密。

临睡前戈尔季耶夫斯基给第一总局第三处处长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格里宾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回来了。格里宾没说几句话，戈尔季耶夫斯基感觉到他的语调冷冰冰的，再一次证实戈尔季耶夫斯基的直觉是对的。

5月20日早晨，第一总局第三处的一名军官也就是两年前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的弗拉基米尔·切尔诺夫，开着自己的捷达车来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接他去第一总局办公楼。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安置在总局第三处

一个空房间里，等了老半天没有人答理。戈尔季耶夫斯基主动问起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会面的事，得到的答复是：首长什么时候决定接见，我们会尽快通知你。

接下来的整整一周什么动静都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整天无事可做，等待召见，每天守在电话机旁坐到晚上8点。

他几次催问，办公室总是找出各种托词，要么说克留奇科夫这周日程好像安排得很紧，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要开许多会，切布里科夫则只有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克留奇科夫谈话之后才能见他。于是，他拿出自己关于英国情报工作的报告作进一步修改，核对有关英国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数字资料。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好修改的，他只不过是借此消磨时间。

5月27日，中午快下班的时候，第一总局副局长格鲁什科将军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研究对英国最高机构渗透的新战略。他们乘坐格鲁什科的黑色伏尔加小车前往第一总局建在郊外的克格勃内部酒店，那里已备好酒宴恭候他们，克格勃几

位高级官员正等着他们。格鲁什科问道：“喝点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戈尔巴乔夫正发起反酗酒运动，显得很犹豫，没有吭声。格鲁什科好像早有准备，朝服务员招招手，一个服务员送上一瓶亚美尼亚白兰地为他们斟满酒杯，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没有推辞。

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讶的是，格鲁什科开始详细询问他家里的情况。酒喝得差不多，他们开始吃着甜点，同桌的克格勃将军戈卢别夫和反间谍处负责调查内部失密工作的布达诺夫上校也插话闲聊，当然，大家都说些无关紧要的事，酒席上气氛显得很轻松。服务员又拿来了一瓶白兰地，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酒杯被再次斟满。喝完这杯酒，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得不对劲，头开始晕眩，说话时舌头不听使唤，无法支配自己的意识，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立刻明白酒里下了麻醉药。

戈尔季耶夫斯基隐隐约约看到格鲁什科走出了房间。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坐在桌旁没走，接着他们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他们询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些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特工的情况，特别详细问到一个人

号叫“法维尔”(意为告别)的逃到法国的间谍。此人在克格勃科技间谍局干过，两年前被人干掉了。然后就是些更具体的问题，比如突然问道：“你怎么可以让女儿读《我们的在天之父》，宣传有神论思想？”戈尔季耶夫斯基极力想保持清醒，他不停地提醒自己，暗暗地说：“我让人灌醉了，我很清楚。但我理不清头绪。我知道他们的卑鄙行为，他们监视我，偷听了我和母亲、妹妹的谈话，他们在住宅里安装了窃听器。”接着，他们又问了他放在床底下的书，为何私藏索尔仁尼琴的著作，把这些反苏的书籍带入国内。

再往下就不是婉转地询问了，而是直奔主题，严厉地审讯。他们直接指责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戈卢别夫提到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名字，说道：“是他收买了你，我们全都知道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硬撑着，心里不停地重复：别开口，别开口。然后他们离开房间，只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人，过了一会儿戈卢别夫回来了，对他说：“老实就好，再讲一遍。你怎么不记得了，你不是刚刚还承认了吗？”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头晕目眩，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对他说：“我没说，没有说。”然后他就什

么也不记得了。

第二天早晨，戈尔季耶夫斯基醒来时发现自己在一间卧室里，头异样地疼痛，浑身乏力。这时门被推开，出现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模样的人，男的站在门口，女的给他送来咖啡。戈尔季耶夫斯基喝了一杯咖啡头舒服些。想起昨天发生的事，他不觉一阵战栗，长叹一声，心想：“完了，死定了，逃脱不了。”

早晨9点30分左右，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来到酒店房间，看两人的样子好像没有异常的变化，昨天在酒席上的审讯就像没发生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渐渐又产生了一线希望，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糟糕。一会儿，戈卢别夫就离开了，布达诺夫留了下来。虽然他早有耳闻，布达诺夫是克格勃中最危险狡诈的人物，但布达诺夫很温和、很随便地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你都去过英国什么地方？”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对苏联外交官来说通常被限制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活动。而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以外交身份作掩护的。他谨慎地说：“只到过布拉克普耳、布里奇顿和哈罗盖特，那还是因公出差。”

布达诺夫去过伦敦，说：“那地方从没听说

过。”随后他语气一转，怪怪地说：“你昨天表现得倔强好斗，你很自信啊。说我们又在搞1937年那样的大清洗，迫害异己，这就不对了，过一段时间我会向你证明我们在做什么。”他最后安慰戈尔季耶夫斯基说，“你已经表示了歉意，可以回去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家后，马上给格鲁什科打了个电话，告诉对方自己身体不太舒服，今天不能去上班，并说：“如果昨天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请原谅。”格鲁什科让他在家好好休息，有事会及时通知他。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憋不住，颇有点怨气地说：“不过那两个家伙的行为也太令人费解了。”格鲁什科在电话里打哈哈，用夸张的语气说：“正相反，他们是两个很可爱的人。”戈尔季耶夫斯基马上意识到，他们的谈话都录了音。他在家冥思苦想待了两天，他不知道自己的抵赖还能骗他们多久，但至少还有活命的可能。经过前几天的交锋，戈尔季耶夫斯基判断他们只是怀疑，还没有拿到证据，因为格鲁什科将军对《我们的在天之父》和床底下索尔仁尼琴的著作这些无足轻重的事都抓住不放，表明他们手上没有确切的证据，案子只是建立在一些间接论证上，他还有希望

逃脱。想到这些，他沮丧的情绪渐渐缓和多了。

逃离莫斯科

5月30日上午，戈尔季耶夫斯基准时赶到总局第三处上班，有人通知他立即去格鲁什科的办公室。格鲁什科坐在写字台后的皮椅上，戈卢别夫和满脸阴沉的第三处处长格里宾坐在桌前的沙发上，格鲁什科说：“昨天我和克留奇科夫同志几乎一整天都在谈论你的事，你心里清楚，你欺骗我们很长时间了，为此，你在英国的工作就到此结束，我们通知你的家人马上回到莫斯科来。但我们认为，你虽然不能在第一总局工作，但可以继续留在克格勃其他部门任职，你的意见如何？”戈尔季耶夫斯基清楚，审问并没有结束，这不过是缓兵之策，先稳住他，等着他与英国情报机构联系或在其他什么事上暴露。他虽然被监视起来，但容许他自由走动。

戈尔季耶夫斯基避重就轻地装糊涂，他知道自己并没有暴露身份，故意不停地埋怨说，审讯的时候他有些昏昏沉沉，可能是吃的东西有点问题。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脸委屈地说：“我实在不明白，

你们这样对我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已决定停止我在第一总局的工作，作为一名军官，我接受你的决定。”格鲁什科一直担心戈尔季耶夫斯基会争执不休，此时听了他的表态，觉得很满意，愉快地说：“谢谢，谢谢。”

戈卢别夫走到戈尔季耶夫斯基身边，握着他的手，关心地提醒他把床底下的反苏书籍交到第一总局的图书馆去，免得惹麻烦。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妻子赖拉、两个女儿也回到莫斯科，他们决定去休假。戈尔季耶夫斯基获得两个月的假期，他打算好好陪着妻子女儿，轻松愉快地玩几天。想到即将到来的分别，失去美满恬静的家庭，他心里就一阵酸痛。

6月20日，他们全家准备去外高加索的赖拉父亲的家，戈尔季耶夫斯基需要时间为出逃做准备，他难过地送走妻子女儿，决定去克格勃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疗养院。疗养院在莫斯科以南100公里，这里曾是斯大林的远郊别墅。

一天，同住一幢楼的老同事伯里斯·博恰罗夫见到他，神秘地问道：“老兄，伦敦出什么事了，我们只得

将所有秘密情报人员召回，所有的行动都泡汤了，最近有消息说，你的副手跑掉了。”待他们下次再见面，博恰罗夫的态度就完全变了样，显然他受到了警告。所发生的事给戈尔季耶夫斯基敲了警钟，他必须加快出逃步伐。

在疗养院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副轻松休闲的样子，一边做些医疗保健体操、读读书，一边仔细盘算自己的出逃计划。不知是不是偶然，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屋的正好是一个警卫，而对他的监视是由当地的克格勃负责。比起莫斯科的特工这些人可就简单多了。他每天的生活也同样重复、简单，出去跑步，看见的总是那几张面孔，总是在同一灌木丛里停下来解手。

戈尔季耶夫斯基利用疗养院图书馆的藏书研究了所有的边境地区地图和导游手册。当然，他必须小心翼翼，拿着书站在书架旁，而从不坐到阅览室桌前，他借阅的书籍没有一本与出逃有任何联系。一个克格勃军官曾问他看俄土战争的书干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填补一下知识空缺。”

6月30日，他的两个孩子去他那儿待了一天，那是

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女儿们。晚上，将她俩送上电气列车时他久久地拥抱她们，直到车门要关上了他才跳下来。在疗养院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曾以不同借口去了两趟莫斯科，寻找机会同英国秘密情报人员联系。他成功地与英国人接上了头，这一切克格勃竟全然不知。

有一次，他步行20多公里到最近的一个车站，想借此推算自己越境时所需要的时间。

他最后见到赖拉是在百货商场，他们上那儿买东西，此刻是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生中最沉重的时候。赖拉也想不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她轻轻地吻了一下丈夫的嘴唇，戈尔季耶夫斯基微笑着轻声说：“该再温柔些。”他知道，若出逃成功，他们将要分别好几年，如果不逃走，那么，几个星期后他将被当做叛徒处死，这对家人将是更大的打击。

7月10日，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克格勃疗养院回到莫斯科的寓所。在逃亡计划实施前两周，戈尔季耶夫斯基制造了许多假象来蒙蔽监视人员。比如，他与朋友、亲戚约好在星期日聚会，而那个星期日按计划他已逃离莫斯科了。他还精心维修了自己的拉达小汽

车，以保证它不出故障。

7月19日下午4时，他身穿旧短裤、白背心，手里拿着一个塑胶包，照例出去跑步，监视人员对他常在列宁大街跑步已习以为常，对他不再十分留意。戈尔季耶夫斯基穿过街心公园，汇入闹市人群，朝火车站奔去，按事先计算好的时间，他上了一趟即将开动的火车。两天后，在一个叫泽列诺戈尔斯克的小镇他与等候在那里的英国人会合，然后坐上英国人的汽车驶向苏芬边境，再也没有回来。

戈尔季耶夫斯基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创下了克格勃历史上一个已暴露的间谍首次成功越境逃走的纪录。

谁出卖了他

戈尔季耶夫斯基成功地为英国服务了近20年，他是怎么暴露的呢？

事情还得从1985年4月说起。

1985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部反间谍处处长阿尔德里奇·埃姆斯走进了苏联大使馆，表示愿意为克格勃效力。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位负责在全世界对抗克格勃对中央情报局进行渗透的官员，这位知道隐藏在苏联情报机构里的每一个中央情报局间谍的官员，竟然会自己找上门来为克格勃效劳！这样的好运令克格勃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

6月13日，埃姆斯将十几个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最重要的苏联情报来源的名单交给了克格勃。在这以前，克格勃从来没有在一次会见中得到数量如此之多的绝密情报。

埃姆斯后来说：“我所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也无法对自己解释清楚：没有任何先决条件，没有要求任何报酬，我就自动地把最为机密的情报交给了克格勃。可以说，这些情报包括了在世界各地所有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克格勃和苏军情报局官员的材料。克格勃方面的反应直到现在还让我感到惊讶，他们说为了表示他们的感激，他们为我准备了200 万美元。”

美国情报机关的官员们倾向于认为埃姆斯是唯一揭发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人，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埃姆斯在 6 月份交出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

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到英国后，与英国人克里斯

托弗·安德鲁合著了《克格勃全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07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戈尔季耶夫斯基公开授勋，以表彰他为英国所做的一切。

第二十五章 克格勃“超一流间谍”

在“冷战”以来的美苏情报大战中，苏联总是能略胜一筹，克格勃的超一流间谍亚库什金功不可没：他手下有一批“享誉世界”的“精英”间谍，如美国海军通讯官约翰·沃克间谍小组、美国国会工作人员兰迪·杰弗里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处处长阿尔德里奇·埃姆斯等。这些人向克格勃泄露了大量美国军方和情报机关的秘密情报，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作为这些间谍的领导者 and 指挥者，亚库什金自然是名噪一时，被美国《华盛顿邮报》称为苏联“最有威望的克格勃间谍”。

绝不背叛祖国

1923年初春，亚库什金出生于彼得堡一个名门望族家庭。他的祖父是十二月党人，参加过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武装起义。亚库什金喜欢从事间谍颠覆活动，善于把握大局，血液里流动着祖辈不安分的基因。

1941年，正是苏联卫国战争最艰难时期，亚库什金参加了苏联红军，做了一名坦克兵，作战非常勇敢。1947年，亚库什金退役，考入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学习。枯燥的课程使亚库什金提不起兴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一位搞育种的老教授讲课，后来又跟着老教授去了几回集体农庄，亚库什金开始对农业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亚库什金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学位，他主动申请去农业部门，在苏联农业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出色的工作表现很快使他脱颖而出，不久被提拔为农业部长的特别助理。

在农业部的工作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使他有可能会出国，熟悉国外的情况，广泛接触国际社会。1960年，亚库什金作为苏联代表团成员曾到日内

瓦出席了一个联合国农业会议，当时他的护照上标明的身份是苏联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司的顾问。苏联外交使团官员在国外的活动一直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监视的重点，一位曾负责监控过亚库什金的联邦特工后来报告说，他们认为亚库什金进入苏联农业部时就被克格勃招聘为特工，甚至推测亚库什金之所以顺利地进入农业部，可能他已经被克格勃列为发展对象。也就是说，至少从1960年开始，亚库什金已经为克格勃工作了。

1962年9月15日，亚库什金到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17次会议。这是他第一次来美国，时间3个月，参加会议的公开身份是苏联政治和安全委员会的顾问组成员。亚库什金在纽约的行踪引起美国人的关注，很快被联邦调查局正式列为监视对象。

1963年7月3日，亚库什金再次到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此次的身份是大会语言与文件局苏联代表团的负责人。对亚库什金的间谍身份，美国联邦调查局认为已确凿无疑，因此对他进行严密监视。但尽管联邦特工知道他从事间谍活动，可就是抓不到任何把柄。实际上，此时的亚库什金已经被克格勃总部任命为苏

联驻联合国使团情报站的站长，成为克格勃在美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在纽约期间，亚库什金风度翩翩，言谈举止颇有外交家风度。他喜欢穿剪裁合体的灰色西装、上浆衬衣和素色领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待人彬彬有礼，偶尔表现出苏联人特有的伤感和幽默，很有魅力。他在美国颇有人缘，为克格勃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1969年，亚库什金奉命返回莫斯科。回来后，他主要从事情报研究工作，他喜欢读书，尤其读了不少有关情报方面的书籍。他对美国颇有研究，给克格勃总部写的一些美国情报研究报告对克格勃高层制定美国情报策略很有参考价值。

6年之后，亚库什金以苏联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再度踏上美国领土。1975年3月28日，他抵达目的地华盛顿。苏联新使馆刚建成不久，他住进了舒适气派的苏联驻美大使馆，这时他的实际身份是克格勃美国情报站站长。他主管的范围不仅仅是美国，克格勃所有在北美地区从事秘密情报活动的间谍都归他管。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在美国进入最活跃的时

期。1977年，他被晋升为克格勃上校军衔，成为驻外级别最高的克格勃军官。

克格勃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日益猖獗，联邦调查局十分恼火。他们根据内线以及投靠过来的克格勃官员提供的情报得出判断：亚库什金是克格勃美国情报网的负责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官员说，亚库什金在华盛顿手下的特工也许多达数百名。当时，亚库什金在情报界的影响力非常大，有不少崇拜者，很多人把历尽艰险搜集来的情报心甘情愿地提供给他。但联邦调查局也不得不承认，亚库什金太狡猾，联邦特工拿他没有办法。

从专业素质的角度来看，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很欣赏亚库什金的才能，以至于联邦调查局决定看看是否能够把他拉拢过来。亚库什金喜欢漂亮的女人在外交圈里已是公开的秘密，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在酒宴或舞会上亚库什金向貌美的女人大献殷勤。联邦调查局决定用“美人计”试一试。联邦调查局特工获知亚库什金与纽约市的一名女子交情不错，便派人说服这名女子进一步与亚库什金加深感情，引诱亚库什金上钩。

在联邦调查局的安排下，这个女子主动与亚库什

金频繁接触，亚库什金显得十分高兴，与这位年轻美丽的金发女子打得火热，对其言听计从。负责此事的联邦特工认为到时候了。于是，这名女子在华盛顿“五月花”饭店的豪华酒吧里预订了位子，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座位就在旁边，假装顾客暗地里监控。亚库什金如约而至，两人心情都很愉快，喝了差不多一瓶法国葡萄酒。借着酒兴，女友极力宣讲美国如何富裕自由，像亚库什金这样重要的人物如投靠了美国不仅会获得巨额财富，还可以永远拥有她。亚库什金深情地望着女友，忧伤地说，他真心仰慕美国人的自由与财富，这个国家展现的勃勃生机和强大力量使他震撼，但他对自己的祖国忠贞不渝，决不会背叛。

当这名女子试图说服他为联邦调查局服务时亚库什金表示，他在克格勃位高权重，虽然说不上腰缠万贯，但钱基本上够他花销。联邦调查局有什么给他，值得他冒那么大的风险？女子一时话语短路，不知如何回答。这时，一直在旁边桌子上监听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走了过来，向亚库什金亮明了身份，希望他能够与联邦调查局合作，这样并不影响他在自己国家的地位，甚至对他的发展有帮助。亚库什金脸带笑意，平

静地听着对方滔滔不绝。他呷了一口酒，不急不慢地说：“先生，请打住，你凭什么说我是克格勃，我是苏联外交官，你这话有问题，要承担后果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非常尴尬。亚库什金站起身，故作轻松，开玩笑地反问道：“如果我投身美国，你们打算怎么办？让我当华盛顿市市长？”亚库什金轻轻拥抱了一下女友，又与联邦特工握握手，然后平静地离开饭店。苏联大使馆离饭店不远，他散步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最有威望的间谍

亚库什金的机智、沉稳为他赢得了很多的成功机会，但有时过度的自信也让亚库什金产生错误的判断，出现重大失误。

一天，有人向苏联驻美大使馆邮箱里投放了一个大信封，里面有一些美国的机密文件以及写信人的姓名、地址，此外还有一封要求与苏联人合作的信。这些东西被送到了亚库什金的办公桌上，他随便地翻阅了一下，认定这是美国情报机关设下的圈套，下令将纸包交给了华盛顿警察局。结果投送人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此事经媒体报道，亚库什金才知道此人是真心

投靠，所附的机密文件内容也是真实的，一个送上门的间谍被他给葬送了。当然，尽管出了这么大的失误，并没有影响到亚库什金的高升。

亚库什金的才华得到了克格勃高层的赏识。当时的克格勃最高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非常器重他。1982年元月初，安德罗波夫在莫斯科秘密会见了亚库什金。原来，深知苏联局势的安德罗波夫预感到苏联正在走向土崩瓦解，如何挽救庞然大厦的倾塌，只有靠奇迹发生了。安德罗波夫对亚库什金说，已经担任了18年苏共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身体极度衰弱，时日无多。而安德罗波夫很有可能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新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希望自己上台后有一番作为，能够彻底扭转苏联的颓势，使国家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而要想如此，首先必须将苏联从与美国激烈的军备竞赛中拔出来，这样，苏联需要与美国人谈判，双方做出必要的让步，那就要更多地掌握美国各方面的情报，心中有数才好跟美国人讨价还价。因此这一时期的间谍情报活动对安德罗波夫来说尤其重要。如果能在美国核心部门楔入一个“钉子”，能够全面掌握美国政府的一举一动，那无疑对安

德罗波夫的振兴计划有极大的帮助；其次，充分利用间谍情报活动造成的影响，把华盛顿的注意力分散开来。

亚库什金返回华盛顿不久，又被安德罗波夫召回了莫斯科，晋升为克格勃第一总局一处处长。第一总局一处（负责美国和加拿大地区）一直是克格勃最大的地区性间谍组织，并且始终在扩展。上世纪60年代，一处只有一个副职，70年代又增加了两名。在克格勃各个机构中唯有一处的处长由克格勃将军担任，也有一处才在国外设立多个间谍机构，在美国就有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3个情报站。鼎盛时期，克格勃在美国和驻联合国代表团内活动的人数有220多人，最少的时候也有120人。因此，一处是克格勃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

克留奇科夫当上第一总局局长后在一处专门设置了一个“北方小组”，主要工作是协调对美国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小组的第一任组长是瓦季姆·克里比琴柯，他以前是克格勃驻开罗情报站的负责人，曾策反了开罗情报机关负责人纳赛尔·萨米·沙拉夫。当时，克格勃驻世界各地的情报站都接到上司的

指令，要他们建立对付“重要对手”的小组，随时组织“战役”，打击美国布置在那里的军事目标。这些小组通常由来自政治情报机构、国内反间谍组织甚至于科技情报机关的军官组成。“北方小组”的军官经常巡视驻外机构，检查“重要对手”小组的工作情况。



尤里·安德罗波夫，1967~1982年担任克格勃最高领导，1982年11月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亚库什金接任一处处长后重新调整了一处的工作重点，他认为克留奇科夫所施行的传统的间谍方法已经过时，必须用新的对敌斗争方法来训练他的人马。基于美国的大量国家机密已经公开，许多秘密已为人们所熟知，亚库什金对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进行了全面调整。在安德罗波夫的授意下，亚库什金成立了一个高度机密的克格勃行动小组，命名为“西北小组”，行动目标直接锁定美国政府、军队和情报机关。任务有二：搜集各方面的机密情报；在美国国会、白宫和军队制造不安定因素，也就是挑拨离间。此后，克格勃在美国所有的间谍都由亚库什金通过“西北小组”统一指挥，所有的情报搜集计划都必须获得亚库什金的批准才可执行。为了保证“西北小组”能放开手脚做出成绩，安德罗波夫下令克格勃各部门必须全力支持，这自然包括巨额活动经费的划拨。

亚库什金配合克格勃总部的要求，指示华盛顿情报站负责人组织实施了代号为“高尔夫”的行动，他们散布捏造的材料，破坏美国政策的信誉，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金·基尔克帕特里克威信扫地。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姑娘们的最好朋友》的文章，其中披露了金·

基尔克帕特里克和南非共和国的“秘密联系”。文章还附有一张伪造的南非共和国大使馆参赞给基尔克帕特里克夫人的信的副本，信中有南非军事情报机构领导人的“问候和感谢”，并说在先生生日之际寄去一份礼物，以“表示我国政府的谢意”。

接着克格勃又搞了“塞壬-2”行动，利用A处的伪造文件揭露美国干涉波兰内政。这一行动在西方没有引起多大关注，但这样的欺骗手段在第三世界倒是获得了巨大成功。

为了加强北美情报工作的领导，便于直接指挥华盛顿的情报活动，1982年下半年亚库什金返回华盛顿，继续全力以赴执行安德罗波夫的命令，绞尽脑汁寻找攻击的突破口。曾在亚库什金手下工作的一名克格勃军官说：“亚库什金经常对我们说，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离间美国白宫与国会之间的关系，给他们制造混乱，增添麻烦，分散美国人的精力。其次是想方设法弄到白宫、五角大楼的机密情报，以及美国所有先进武器装备系统的情报。”

据研究当代间谍史的专家分析，亚库什金对苏联情报工作最大的贡献在于发展了几名世界一流的间

谍，这对苏联来说非常难得。其中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反间谍处处长阿尔德里奇·埃姆斯。

1985年4月16日，埃姆斯走进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主动提出要背叛他的国家。亚库什金当时正在大使馆，他得到报告后自己没有出面，指示一位名叫切尔卡申的人负责接待埃姆斯。对这种主动找上门来的，亚库什金一般都不太相信，总怀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设下的圈套。

事后，切尔卡申向他汇报了情况，并转交了埃姆斯写给他的一封密信。这封信中揭露了至少3个双重间谍的名字。当时埃姆斯要求得到5万美元现金。亚库什金要切尔卡申谈谈对埃姆斯的看法，切尔卡申说：“我的兴趣不那么强烈，刚才见埃姆斯的时候我没有做出太积极的反应，对这件事我还有点怀疑。”

亚库什金笑道：“切尔卡申同志，这回你的判断是错误的，埃姆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反间谍处处长，他不会拿自己当诱饵，你看这份名单真名实姓，他是冲着钱找我们的。”一个月后，埃姆斯再次来到苏联大使馆，苏联人已确定埃姆斯提供的情报是真实的，并完全相信他是真的要叛国。亚库什金决定亲

自与埃姆斯见面，双方约好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1985年5月17日晚上，亚库什金来到“五月花”饭店的高档酒吧里与埃姆斯会面。双方谈话直奔主题。亚库什金说：“我们的美元没有问题，只要情报有价值，我们会支付足够的报酬。”通过这次会面亚库什金与埃姆斯建立了秘密而稳定的情报供求渠道。临分手时亚库什金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了他，里面装着整整5万美元。

此后，埃姆斯与亚库什金共进晚餐十几次，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埃姆斯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秘密情报。在近10年时间里，苏联克格勃正是利用了埃姆斯提供的情报粉碎了中央情报局20多次对苏行动，造成至少10位美国间谍被苏联秘密处死。同时，埃姆斯还向克格勃官员提供了中情局在海外的50多个秘密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处反间谍人员名单、公开身份等。埃姆斯的背叛给中情局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在亚库什金手上投靠克格勃的还有美国海军准尉沃克，由于沃克的出卖，克格勃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美军电子侦察的重大突破。

后来，沃克不仅自己为克格勃效力，还鼓动全家

人为克格勃搜集秘密情报。克格勃利用沃克提供的机密情报掌握了美国海军潜艇部队的大量机密，尤其进入到最神秘的通讯系统。

1986年底，亚库什金返回莫斯科。回国不久，他坐上了克格勃的第二把交椅，主管海外情报工作。他充分利用克格勃在美国数量庞大的间谍网络继续搜集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情报，真正做到了为克格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均无法挽回苏联分崩离析的命运，眼见苏联已经积重难返，亚库什金明智地选择了从克格勃退休，在莫斯科过起隐居生活。

据苏联媒体报道，隐居后的亚库什金拥有一个藏书量惊人的私人图书馆。他非常关注新书出版，仍在不断收集各种自己喜爱的图书，平日与妻子待在家中，安安静静地享受读书之乐，拒绝了一切社会活动。

1991年，苏联解体后，亚库什金曾一度在俄罗斯著名的通讯社塔斯社担任国际事务顾问，虽然他密切关注着时局变化，但行事极为低调。当然，俄罗斯情报机关并没有忘记这位立下了赫赫功勋的超一流间

谍。1993年，在俄罗斯情报机关的极力争取下，克里姆林宫批准授予他“情报工作特别奖”，成为苏联唯一获此殊荣的克格勃间谍。

1994年，亚库什金与世长辞，享年71岁。

第二十六章 他使法国原子能机密荡然无存

20世纪80年代，苏联急于了解西方国家的核研究进展，克格勃找到了在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的核物理学博士坦珀维尔。他明目张胆地在办公室复印一份又一份机密文件，提着装文件的塑料袋大摇大摆地走出单位大门。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这种游戏太危险，打算洗手不干，可是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坦珀维尔间谍案暴露后，法国官方人士惊叹，这是二战后军事间谍活动中最重大、最严重的事件，给法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

失。

克格勃巧抛诱饵

上个世纪50年代，坦珀维尔出生于法国北部的一个小城。在这个宁静而温馨的小城，本该欢快的童年却由于父亲的病逝，在他9岁的时候就过早地结束了。从此，他与母亲相依为命。自幼智商很高的坦珀维尔学习成绩一直全优，从小学到大学连连跳级，他大学读的是物理系，做博士生攻读的专业是核物理，并顺利地通过博士答辩，拿到了学位。

坦珀维尔的母亲没有固定工作，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家庭经济情况一直不太好。坦珀维尔读大学的时候就利用课余时间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补贴家用。他口才特别好，天生就是块做老师的料。他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非常吸引学生，加之对待学生平易近人，极富耐心，很受学校师生的欢迎。坦珀维尔依靠课余教书不仅解决了大学读书所需的费用，而且不再囊中羞涩，口袋里还有可花的零用钱。

坦珀维尔后来被分配到萨克尔研究院，即法国原子能中心分院工作。当时他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核物

理学家，但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到一所学校上课，多挣一份工资。他觉得钱远远不够用，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1987年的一天，坦珀维尔在学校上完课出来，来到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刚坐下来，一位高个子中年人坐到坦珀维尔对面。此人彬彬有礼，笑容满面，自我介绍说自己叫谢尔日，早就听说坦珀维尔知识渊博，课讲得特别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他是仰慕坦珀维尔的大名而来。谢尔日夸了坦珀维尔大半天，最后说自己的物理知识还不错，但数学知识就很浅薄，需要补补课。因此，他想请坦珀维尔给他补习一下数学。一堂课他愿意付300~400法郎，每堂课结束即用现金支付。坦珀维尔听此人吹嘘他老半天，没有实际的内容，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但一听说现金支付却马上来了精神。他们很快就把教数学的事谈好，商定第二天就开始上第一节课。

谢尔日对坦珀维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学习也非常认真，勤学好问。课堂学习结束后，好客的谢尔日常常邀请坦珀维尔吃法国大餐，海阔天空地闲聊，与坦珀维尔套近乎，不久他们就混得很熟。谢尔日对坦

珀维尔讲，他很羡慕坦珀维尔渊博的知识，想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阅读一些有价值、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料。坦珀维尔对谢尔日热爱学习的精神非常赞赏，说很高兴为他提供帮助。起初坦珀维尔借给谢尔日的一些资料很一般，大多是各种知识类杂志、工作简报以及一般性科技知识介绍，这些东西都不涉及法国核工业机密和核物理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他们的关系日渐密切，彼此间无所不谈，处得像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在坦珀维尔的眼里谢尔日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是一位绅士，而且出手大方，至于谢尔日干什么工作、住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坦珀维尔是个不爱管闲事的科学家，也从未问过谢尔日。

其实，谢尔日是搜集法国情报的苏联克格勃特工，公开身份是苏联驻法大使馆二等秘书，真名叫谢尔盖·斯米廖夫。他接到克格勃总部指令，在法国原子能研究中心以及下属机构物色合适人选，发展成为克格勃提供情报的间谍，他接近坦珀维尔有其明确的目的。经过深入调查，他发现坦珀维尔正是他所需要的人，于是设计出一个圈套让坦珀维尔陷进去而不可自拔。

一天，谢尔日又请坦珀维尔到一家著名的餐馆吃饭。他们喝了一瓶很高档的红葡萄酒，坦珀维尔有几分兴奋，精明的谢尔日认为时机到了，趁机向坦珀维尔提出需要阅读一些有关核原子方面的资料，坦珀维尔一愣，略显惊讶。谢尔日马上接着表示，为此他会付很高的报酬。当时，坦珀维尔看了谢尔日一眼，没有吭声。谢尔日也没有再说下去，换了个话题继续喝酒。三天后，坦珀维尔约谢尔日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喝了一杯咖啡，闲聊了一会儿，坦珀维尔起身告辞时递给谢尔日一个大信封，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东西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谢尔日喜出望外，意识到自己达到了目的。

第二天，谢尔日来找坦珀维尔上了最后一堂数学课，他送给坦珀维尔一只纸袋，里面装着4000法郎。坦珀维尔又惊又喜，没想到钱来得如此容易，但心里又有些害怕，他非常清楚这是一项冒险的游戏，弄不好会进监狱。但金钱的诱惑是巨大的，为了钱坦珀维尔决定铤而走险。

谢尔日与他约好了接头的时间和地点，提出自己需要哪些资料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开出的价码。一

夜之间，谢尔日变成了老板。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尔日的胃口越来越大，对坦珀维尔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巴黎市郊有一些小酒馆，1988年1月到9月，坦珀维尔和谢尔日每两个月就在其中一家酒店见面，时间一般在晚上八九点，这些酒馆远离闹市，幽静而不引人注目。每次都是谢尔日先到一步，不一会儿，坦珀维尔悠闲地走进来，很随意地在谢尔日桌前坐下。他们总是要一瓶红葡萄酒，谢尔日酒量很大，遇上心情好的时候，另外还要喝上一杯威士忌。夜静人稀，酒足饭饱后，他们走出酒馆，彼此不动声色地交换手上的纸袋。

谢尔日得到从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带出来的机密文件，自然非常满意。作为回报，谢尔日塞给坦珀维尔一个鼓鼓囊囊的纸袋，里面装着2000~40000不等的法郎现钞，令坦珀维尔心满意足。

谢尔日对坦珀维尔说，他在一个科研部门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增强科研能力，需要坦珀维尔给他提供这些机密文件。至于科研单位的名称、工作内容，谢尔日没有说，坦珀维尔也懒得去问。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真相是什么，他不

敢深究。

随着盗窃情报的增多，坦珀维尔承受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一度想洗手不干了，谢尔日警告他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就是躲到天涯海角他也会被找回来。最让坦珀维尔感到恐惧的是，谢尔日对他所有的事了如指掌，远远不止接触时他说的那些，再隐秘的私生活他都非常清楚。坦珀维尔害怕了，失去了逃脱的勇气，认为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谢尔日手上，只得强打精神干下去。

坦珀维尔在单位人缘很好，他年轻活跃，待人和气。这位颇有才华的核物理学家凭着自己出色的工作，深得上司的赏识。经权威部门的推荐，1989年10月1日，坦珀维尔正式上调到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

克格勃的影子无处不在

谢尔日得知坦珀维尔调到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比坦珀维尔本人还高兴，那里可有拿不尽的机密情报，于是，他更加紧紧盯住坦珀维尔不放。坦珀维尔到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后经过严格的审查，获准有资格接触国家核研究机密。

到法国原子能研究院上班不久，上司就交给坦珀维尔一项重要任务，让他加入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同其他核物理学家一起研究分析法国在穆鲁罗瓦岛历次核实验的结果，并写出有规律的分析报告。法国在太平洋地区多次进行代号为“火山”的核实验，随后，坦珀维尔获准接触“火山”计划的大量情报资料。

在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坦珀维尔继续为克格勃提供机密情报。从1989年9月至1990年4月，坦珀维尔先后向谢尔日提供了40多份有关核机密的文件，其中有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年鉴。通过查阅年鉴，苏联就可详细了解法国当年在军事方面利用原子能的情况。坦珀维尔上调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受益最大的是克格勃。

坦珀维尔不是一个很专业的间谍，他猎取情报的方式有时看起来简直幼稚粗心，令人不可思议。他经常在法国原子能研究院秘书处办公室大大咧咧地复印一份又一份机密文件。身边人来人往的却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在干什么，更不说有人盘问。即便是偷偷摸摸出卖机密情报，内心极端恐惧，坦珀维尔也带着几分法国人的浪漫情结，喜欢在酒店与谢尔日会面，一边喝葡萄酒、听爵士乐，一边与克格勃买卖机密情报，

而且这种方法一直没变。在为苏俄情报机构效力的6年里，他先后出卖法国有关核机密情报6000多页，其中大部分标有“火山作战计划”字样。

这些文件包括：“火山作战计划”各阶段工作总结；1979~1990年间法国在穆鲁罗瓦岛核爆炸的分析报告；1991年4月法国4次核爆炸各种数字指标。以上文件资料涉及到法国核武器爆炸的相关情况，这些情报虽然未提及核武器制造方法，但通过对这些文件资料的分析研究，苏联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法国在1989~1990年间核武器所达到的技术水平，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核武器研制。坦珀维尔出卖的法国原子能研究资料看似一般的情况介绍，实则属于国家核心机密，其泄露对法国国防安全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坦珀维尔明知自己身处险境，可是欲罢不能，并且胆子越来越大，经常在办公室公开地把复印或拍摄好的资料装进日常用的袋子里，提着袋子大摇大摆地走出原子能研究院，没有人盘问过他。与谢尔日接头需要约定一些暗号，他懒得去动脑筋，联想到看过的一些间谍影片，索性就直接模仿电影中的特工，比如

在奥尔斯市一座游泳馆旁边的电话亭前放一块橙子皮，即表示有重要的事情需要马上会面。如果谢尔日有什么急事要找坦珀维尔，他就把一些花瓣撒在奥尔斯桥靠岸的第一个桥墩下。反过来，如果坦珀维尔有情报要送给谢尔日，他就在奥尔斯桥墩下放一个空火柴盒，谢尔日取走情报后，随手拿走火柴盒换上一包“登喜路”牌香烟。尽管有这些联络方法，谢尔日给坦珀维尔送钱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在小酒馆会面，到时两人像往常一样喝上一杯。

克格勃的胃口越来越大，谢尔日隔三差五地向坦珀维尔要这要那，而且要求越来越高，已不满足他仅提供法国核爆的情况介绍。1991年6月的一天，坦珀维尔驱车去了郊外，他走进一家名为“礼拜六”的小酒店，谢尔日已经坐在一张小方桌前。坦珀维尔刚坐下来，他就急不可耐地表示希望坦珀维尔想办法调往拉哈格核材料工厂，那里生产的核军工产品很有价值，克格勃对此很感兴趣，愿意花大价钱。

坦珀维尔一听头都大了，心里很不痛快，但他不敢当面拒绝谢尔日。后来，谢尔日又提出他们还需要法国最新的代号为“西尔瓦”的国民计划，以及代号

为“普柳里尔”的军事计划等方面的情报。坦珀维尔心里暗暗叫苦。坦珀维尔开始思考出路，首先要想办法摆脱谢尔日的纠缠。这游戏太危险，不能再玩下去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决定找个地方躲起来。1991年，坦珀维尔辞掉了原子能研究院的工作。

巴黎的远郊艾松镇有一所中等学校，此地环境优美，虽然远离巴黎闹市，但交通便利。坦珀维尔选择了这所学校作为自己的隐身地。校方看了他的简历，很快就聘请他为学校的物理课教师。坦珀维尔重操旧业，与以往不一样，这回做老师是专职的。可能是离巴黎太近的缘故，坦珀维尔始终摆脱不了谢尔日的阴影，担心谢尔日不会轻易放过他，随时都会找上门来。他决定再走远点，经过多方努力四处联系，两个月后，坦珀维尔没有告诉任何人，悄悄地离开了巴黎，来到法国南部城市奥尔斯市。他自以为自己的计划人不知鬼不觉，从此可以安下心来轻松地生活。可是没过多久，一天傍晚，坦珀维尔正在奥尔斯公园散步，一位小男孩跑过来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在公园大门左边的小酒店等你。”坦珀维尔读到“小酒店”三个字，马上明白来人是谁了，他是又气

又恼又无可奈何。谢尔日说得不错，无论坦珀维尔躲到哪里，都逃不脱克格勃的手心。

最终走进监狱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坦珀维尔以为终于摆脱了克格勃的纠缠，从此高枕无忧，可以安安心心地过日子了。可没料到，俄罗斯对外情报机构全盘接管了克格勃在法国的活动。谢尔日离任回国后把坦珀维尔的情况向俄罗斯情报机构作了详细汇报，俄罗斯情报机构的特工列涅接替了谢尔日的全部工作。列涅的真名叫瓦廉京·马卡罗夫，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处三等秘书。

连接头的方式都跟谢尔日一样，坦珀维尔接到约定见面的字条，在奥尔斯一家小酒馆第一次与列涅碰头。列涅自报家门，他没有立刻向坦珀维尔索要情报，而是很随意地拉扯些闲话，态度和蔼亲切，不像谢尔日那样待人生硬。相互熟悉以后列涅也开始对坦珀维尔指手画脚，列出需要弄到的情报清单，催着坦珀维尔去搜集。坦珀维尔早就不想干了，他对列涅的要求能拒绝的就尽力拒绝，能拖的就拖，心里暗暗盘

算着如何甩脱列涅。

1992年6月的一天，列涅与坦珀维尔见面，此次列涅的态度十分强硬，希望尽快得到西方对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研究情况。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苏联最大的核电站，1986年4月26日核电站发生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灾难性大火造成放射性物质泄漏，污染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苏联对核事故消息的封锁和应急反应的迟缓。列涅还劝说坦珀维尔回法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最好能去拉哈格核材料工厂，他们迫切需要该工厂的相关资料。

坦珀维尔快崩溃了，他不知如何走出困境。他整日提心吊胆，神经每时每刻都绷得紧紧的。他平时深居简出，行踪诡秘，天一黑就大门紧闭，龟缩在家里。

两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彻底使他得到解脱了。

潜伏在伦敦的克格勃间谍奥钦柯，在苏联解体后主动投靠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了不少克格勃在西方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其中，他提到了坦珀维尔。

1992年9月11日，英国内务部长致函法国司法部长，通报了奥钦柯提供的情况。法方接到英方情报

后，反间谍部门立即采取紧急行动，派出两名特工火速赶往奥尔斯市，对坦珀维尔进行严密监视。9月14日下达了逮捕坦珀维尔的命令。上午9时，坦珀维尔刚要跨出家门，两名特工和警察突然冲进门来。坦珀维尔还没回过神，特工抢上一步给他铐上手铐，随后将坦珀维尔押上警车，留下一名特工带着警察开始彻底搜查坦珀维尔的房间。

坦珀维尔间谍案暴露后，法国官方人士惊叹，这是二战后军事间谍活动中最重大、最严重的事件。据法国情报部门透露，1987~1992年6年时间里，坦珀维尔出卖国家机密大约获得苏联及俄罗斯人200万法郎的报酬。

坦珀维尔因“向外国情报人员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15年监禁。他被囚禁在巴黎圣持监狱的一间单人牢房里。

第二十七章 埃姆斯——世界上报酬最高的间谍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反间谍处处长埃姆斯东窗事发后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是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间谍丑闻。埃姆斯对美国所造成的损失需要数年的修补才能弥合。

而苏联有关情报专家则骄傲地说，埃姆斯极大地提高了苏联（俄罗斯）情报部门的安全性。克格勃正是利用他提供的情报，粉碎了20多次对苏联谍报行动，致使至少10名美国间谍被苏联处死。

一向小气的克格勃，却对埃姆斯慷慨大方，先后支付250万美元的报酬，也使埃姆斯成为世界上报酬最高的间谍。

被5万美元收买

阿尔德里奇·埃姆斯1942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他在念中学时就被同学公认为班里最机智的人。1957年在芝加哥大学读了两年就主动辍学了。他的父亲在中情局工作，是一位从事间谍活动近40年的老牌特工。受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就想做一名特工。16岁时在父亲的支持下他参加了中央情报局为雇员子弟举办的夏季就业计划。1962年2月，埃姆斯继承父业走进了中央情报局大门，作为行动指挥处的一名特工接受培训，这项培训持续了6年。

埃姆斯虽然还不算中情局的正式员工，但他进入了核心部门，成为一名外勤官员。同其他担任情报分析任务的同事相比，他算是幸运的。

1968年，作为中情局一名正式员工，埃姆斯被安排到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反间谍处工作。他在那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并不感到满足。那是一个很

死板的地方，最糟糕的是他不敢告诉人家他是一名特工。他总是对人说他是外交官，在国务院工作。这种日子很不好过，他的妻子南希也很不满。

到中情局苏联东欧处上班不久，他接受了第一个任务：到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发展间谍。虽然他接受过6年专门的训练，但他的工作表现并不理想，甚至不懂如何拉拢引诱对方，如何与目标交谈。不过，埃姆斯的运气比较好。不久，他得到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上司派他到一所外语学校学习俄语，时间是一年。

1981年，埃姆斯从安卡拉调到了墨西哥城，他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墨西哥使馆参赞，秘密职务是中情局墨西哥情报站站长。有人说，墨西哥城是一座谍报活动的圣城，古巴人、苏联人、美国人在咖啡馆里明争暗斗，演绎着种种精彩的谍战场面。

地方变了，似乎运气也变了，埃姆斯开始交上好运。1982年初，在一次小型晚会上埃姆斯与哥伦比亚驻墨西哥使馆文化专员玛利亚·罗萨里奥·卡萨斯邂逅。玛利亚出身于波哥大名门望族，漂亮迷人。父亲是波哥大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曾出任托利马省省长，一度

还被推选为哥伦比亚的总统候选人；母亲是一所大学的文学教授。玛利亚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16岁时就掌握了6种语言，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著名的安第斯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该校有名的教授。玛利亚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厌倦了院校生活，总想换个环境。1982年玛利亚投身外交界，出任哥伦比亚驻墨西哥大使馆文化参赞。

此时，埃姆斯与妻子南希已经结婚10年了，但没有孩子。南希对埃姆斯的冒险工作不感兴趣，因此两人的感情出现了危机。风姿绰约的玛利亚吸引了正处于婚姻危机中的埃姆斯。但是，玛利亚的背景远非埃姆斯所知道的那样单纯。玛利亚早在1981年就被克格勃招募，负责搜集中美洲方面的情报。

埃姆斯没有向他的上司报告和玛利亚相好的事，因为按照中情局的制度是不允许的。后来事情闹大了，也没引起中央情报局安全官员足够的重视。在他们看来这种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生活在间谍世界里的人都很孤独，而装扮成外交官的驻外特工生活尤其苦闷，他们不仅要过一种双重生活，而且还要遭到那些真正的外交官的歧视。因此，像埃姆斯那样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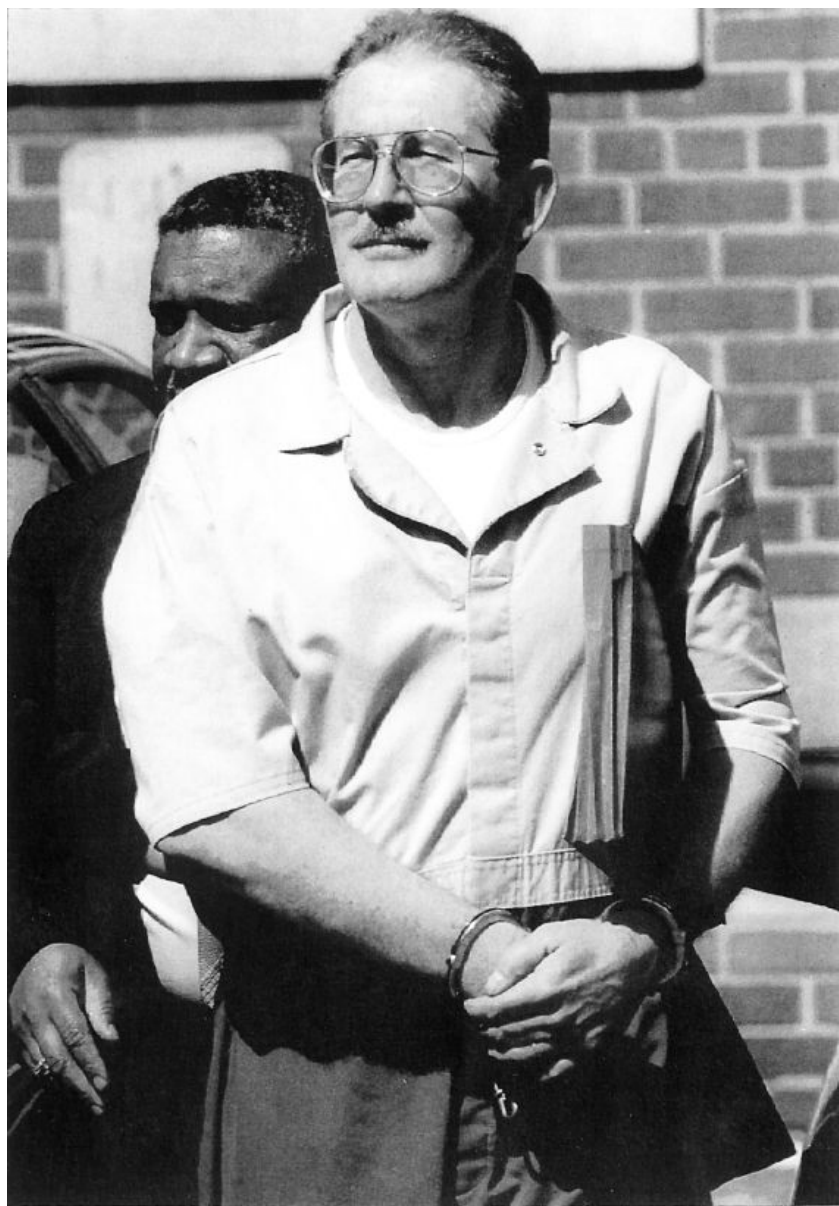
酒浇愁、玩玩女人，在中央情报局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也许是玛利亚给他带来的好运，埃姆斯很快被调回美国，担任中央情报局对苏联东欧反间谍处处长。这在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中层职位，但位置很重要。“冷战”时期，美国长期以苏联、东欧为对手，对付苏联、东欧国家情报机构的渗透是中央情报局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因此，这个职位也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

埃姆斯的工作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在形形色色的苏联人中寻找可能被中情局招募的“猎物”。这些潜在的目标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酗酒，婚姻失败，事业无成，寻花问柳等。

埃姆斯在忙于招募苏联人，有趣的是苏联人也看中了埃姆斯，克格勃敏锐地感觉到埃姆斯具备一个变节者的所有条件，若利用上这个人，克格勃可以从中央情报局取得意料不到的突破。于是，克格勃就开始对他进行长达6个月的劝降工作，埃姆斯毕竟是从事反间谍工作的，克格勃的策反活动也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得手。但在这场马拉松式的交往中埃姆斯始终处于劣势，面对金钱的诱惑，埃姆斯终于屈服了。

1985年4月16日，埃姆斯走进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主动提出要背叛他的国家。克格勃军官切尔卡申当时在大使馆负责反情报工作，他是第一位会见、评价和指示埃姆斯的克格勃官员。埃姆斯的第一个叛国举动是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呈交了一封密信，信中揭露了至少三个双重间谍的名字。当时埃姆斯要求得到5万美元现金。切尔卡申回忆说：“当时我们没有做出太积极的反应，对这件事还有点怀疑。”切尔卡申向莫斯科发了一封电报，希望克格勃负责外国情报的第一总局对埃姆斯的背景进行考查。不久，切尔卡申被召回莫斯科，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当埃姆斯一个月后再次来到苏联大使馆时，切尔卡申及其上司已确信他是真的要叛国。



阿尔德里奇·埃姆斯是美国中情局的要员，却成为克格勃在“冷战”时期发展的最大的“鼯鼠”。他给美国情报组织造成的损失之惨重无法计量。

埃姆斯后来在监狱中回忆道：“我需要钱。那时候

我的生活非常动荡。我刚从墨西哥回国，正在闹离婚，并准备与玛利亚结婚。我欠了很多债。我那时候已无法理智地考虑问题了，脑袋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甚至产生过抢银行的念头。但是，我选择了我认为最容易实现的一种，那就是为苏联人工作。你知道我是干这一行的。那时候克格勃的工作很不景气，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同我的状况差不多。我想，如果我同他们联系，他们是会同意帮助我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得到了钱，渡过了难关，而他们则得到了情报，得以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当时，埃姆斯是中情局负责招募苏联人充当间谍的官员，因此，他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苏联大使馆，而被视为工作的需要。1985年5月17日，切尔卡申打电话给埃姆斯，约他出来一起共进午餐。在得到埃姆斯愿意提供情报的允诺后，对方给他一个大信封，里面装着一叠100美元面额的现钞，一共5万美元，埃姆斯一阵狂喜。埃姆斯这么回忆当时的心情：“当我从克格勃那里拿到第一笔5万美元的报酬时，我是挺兴奋的。5万美元，这相当于我一年的薪水。你想想，苏联人一次付给我的报酬相当于中央情

报局一年给我的薪水，我无法不动心。当然，有些时候，我心里也是有些内疚的。毕竟，我在中央情报局干了这么多年。但我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

多名美国间谍死在他手上

克格勃付出的金钱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埃姆斯利用他得天独厚的位置，为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绝密情报。克格勃正是利用他提供的情报粉碎了20多次对苏联的谍报行动，使至少10名美国间谍被苏联处死。

在埃姆斯出卖的美国间谍中，有一位特别著名，他就是苏军情报部门的波尔雅科夫将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伍尔西曾说：“波尔雅科夫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招募的间谍中最出类拔萃的，是一颗最珍贵的宝石。”

波尔雅科夫1921年出生在乌克兰，二战期间做过炮兵军官，战争结束后进入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在军事情报机关工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先后两次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前往联合国工作，在美国指挥没有外交身份作掩护的苏联间谍，取得很

大的成绩。此间有人给他起过“黑夜大礼帽”、“风笛低音管”等雅号。

1961年，波尔雅科夫主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接触，自愿为美国人提供情报。但他不要美国人的钱，最多只接受一些打火机、钢笔等小礼物，每年不足2000美元。在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20多年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向美国传送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机密情报。

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他被派到缅甸仰光从事针对中国的情报活动。不久又调回国内，出任苏军情报局中国处主任。他提供给中央情报局的关于中国和苏联关系破裂的来龙去脉的重要文件，帮助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制定了对华政策，促使了尼克松总统访华。

1974年，波尔雅科夫晋升为少将军衔，从此，他有了获取超出他工作范围之外情报的机会。为了向美国联络人发出信号，他总乘坐途经美国大使馆的电车，经过大使馆时启动一下藏在口袋里的微型“爆发”式发射机，美国大使馆便会收到他发送的信号。

波尔雅科夫还常常使用一种只有他和接头人才掌握的特殊的化学显影技术的胶卷。利用这种谍报技

术，他拍摄到100多份由苏军参谋部发行的保密杂志《军事思想》月刊，这些资料对分析苏联军事状况极有参考价值。美国人通过波尔雅科夫提供的情报证明了苏联领导人并不是狂妄的战争疯子，某种程度上也阻止了美国人对战争的过度关注。

后来，波尔雅科夫突然与中央情报局失去联系，没有人知道这位美国超级间谍的命运。直到1990年1月，苏联《真理报》报道说，1988年3月15日迪米特·波尔雅科夫将军因间谍罪被处以死刑。后来中央情报局证实，虽然没有人知道波尔雅科夫是如何死的，但波尔雅科夫是被埃姆斯出卖的，是埃姆斯最重要的牺牲品。波尔雅科夫选择了背叛自己祖国的道路，但他也被另一个背叛者出卖了。

此外，还有两位前途无量的克格勃军官栽在埃姆斯手上。克格勃中校马尔季诺夫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收买的间谍，埃姆斯出卖的第一批间谍中就有他。1980年11月，马尔季诺夫和妻子来到华盛顿，公开身份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实际上是克格勃派往美国搜集科技情报的官员。1982年，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盯上了马尔季诺夫。这个特工具备工程方面的专

业知识，经常出席华盛顿地区各种科学技术性会议，在会议上他认识了马尔季诺夫，并和他进行过多次交谈。这个特工发现马尔季诺夫有很多与众不同地方，是一个很特殊的俄国人。于是，中央情报局派人设法与他单独取得联系，极力收买他，最终将他发展成为间谍。中央情报局在银行为他开了一个户头，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万一出事他叛逃到美国后可以使用。马尔季诺夫喜欢这种刺激，他并不认为替美国做间谍有什么不对，因为他并不认为美国人是他的敌人。

美国联邦调查局想通过马尔季诺夫了解那些被派到华盛顿的克格勃官员，以便监视他们的行踪，发现一些可以被美国情报机关收买的“鼯鼠”。中央情报局则对克格勃在美国搜集什么样的情报，以及如何进行间谍活动等感兴趣。马尔季诺夫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很多文件的复印件。

被埃姆斯出卖的另一位克格勃军官是谢尔盖·莫特林少校。1980年夏天，莫特林少校被派到华盛顿，同马尔季诺夫一样，公开身份也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他到华盛顿不久就被联邦调查局收买。

埃姆斯身为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处处长，自然十分清楚这两个间谍的所有情况。如今埃姆斯已经开始为苏联人效力，这两个间谍的存在对埃姆斯的安全也构成了严重威胁。1985年6月13日，埃姆斯在与克格勃联系人丘瓦辛接头时，把这两个人的情况告诉了苏联人。克格勃为了保护埃姆斯的安全，一直没有对二人动手。

1985年底，莫特林在苏联华盛顿大使馆的任期结束，奉命回国。临行前，他向联邦调查局承诺，回国后继续向美国提供情报。1986年初，他在与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接头时被逮捕，不久被枪决。

1986年11月，克格勃叛逃者尤尔钦科从华盛顿返回苏联，马尔季诺夫奉命陪同他回国。对这趟差事马尔季诺夫的妻子娜塔莉娅觉得有些蹊跷，因为像这类任务通常并不是她丈夫去执行，显然莫斯科在找借口让他回去。10天之后，娜塔莉娅接到丈夫的一封信，说他在搬运行李时膝盖上旧伤复发住进了医院，希望她带着孩子回国照料。娜塔莉娅立即动身回国。可是，飞机刚一着陆，克格勃官员就把两个孩子送到她母亲那里，而把她抓到监狱进行审讯。克格勃官员告

诉她，马尔季诺夫犯的是叛国罪。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克格勃曾多次对她进行审讯，并允许她探望丈夫。马尔季诺夫于1987年5月29日被枪决。

美国历史上最大一场抓捕“鼯鼠”行动

就这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调查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招募到的两名苏联大使馆人员不久就被调回莫斯科，随即被处死。联邦调查局认为，一定是内部出了问题。

1991年4月，一个清新凉爽的上午，中央情报局反间谍中心的情报分析家保罗·雷蒙德和他的上司从兰利驱车前往胡佛大厦，与联邦调查局的有关头头商谈两家携手联合反间谍的事宜。圈内人都知道，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已多年不和，互不买账。如今两家情报部门都被那该死的“鼯鼠”搞得心神不安，大家只有摒弃前嫌，携手合作。

几天后，联邦调查局经验丰富的反间谍专家吉姆·米尔本和他的同事奉命来到兰利，与雷蒙德的反间谍小组合作，联合开展代号为“天光”的调查行动，调查美国情报界内部的奸细。而联邦调查局总部首席反间

谍专家卡鲁索受命组建一个行动小组，负责调查逮捕隐藏在中央情报局里的“鼯鼠”，其行动代号为“演员”。

“天光”和“演员”两个小组同时启动，开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抓捕“鼯鼠”的行动。他们先是调阅大量有关档案资料，了解那些被出卖的间谍相关情况，针对知情者各自拟出了一份嫌疑者名单。然后，行动小组逐个对嫌疑者进行排查。他们首先从个人劣迹、不良行为、家庭和收入等方面开始，比如此人是否酗酒，是否有吸毒行为，婚姻是否美满，有没有擅离职守的记录，是否有不明收入来源等等。根据这些情况被列入嫌疑者名单的大约有200多人。经过进一步细致调查，到1992年秋，名单上的名字减少到40多个。

根据以上调查范围，阿尔德里奇·埃姆斯自然被列入嫌疑者名单。调查者发现，他的不检点行为很多，他的名次在名单上逐步前移。此外，在一次例行的测谎中，他在测谎器上的波纹异常。

与此同时，克格勃也嗅到了危险。他们非常重视埃姆斯这只大“鼯鼠”，于是采取严密的措施保证埃姆斯谍报活动的安全。联络手法和地点时常变换，他与克格勃接头的地点很少在美国国内，多是安排在墨西

哥城、波哥大，甚至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这对埃姆斯来说也不是难事，凭借他特殊的身份，自由地飞来飞去是没有问题的。埃姆斯一般不通过联系人直接会面，而是使用“秘密信箱”进行联系。每次接头前，克格勃在原先约定的地方做一个记号，表示埃姆斯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去接头。而埃姆斯则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用白粉笔画一个白道，表示他知道了。如果要改变计划，他们之间另外约定了一些联络方法。就是这种既简单又安全的方法，埃姆斯与克格勃特工使用了9年。

克格勃还采取了许多措施来保护埃姆斯。有一次，埃姆斯与一名苏联外交官在华盛顿一家饭店吃饭，切尔卡申突然出现在饭桌旁，埃姆斯大吃一惊。因为联邦调查局了解切尔卡申的底细，并对他进行监视，埃姆斯担心自己被人揭穿。后来，切尔卡申解释说：“我们知道中情局经常让它的特工接受测谎，测谎器可能会问埃姆斯最近是否与克格勃特工有过非正式接触。我们故意制造一次意外的会面，这样，就可以说那个人在他试图招募一名苏联外交官时走了过来。对此测谎器是辨别不出来的。”

这时，一位叛逃到美国的克格勃特工向联邦调查

局提供了潜伏在美国的间谍情况。根据对这些情报的分析，埃姆斯的嫌疑越来越大。“天光”调查小组加快了调查速度，他们根据埃姆斯生活奢侈的特点，首先从他的经济状况入手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埃姆斯有大量不明收入，他当时的年薪为6.9万美元，从1985年4月至1993年8月，他的总收入不过34万美元，可是同期他支出的费用高达130万美元。他还买了16.7万美元的股票，通过信用卡支付各种费用45万美元，光电话费就接近3万美元。

“天光”调查小组负责人雷蒙德看了这些调查记录后拍案而起，大叫道：“他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的钱，又是买豪华住宅，又是买这些汽车。可以肯定，这家伙有问题。”

“天光”调查小组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不管美国情报界内部还有多少“鼯鼠”，埃姆斯肯定是其中之一。

1993年初，埃姆斯被列为怀疑对象后总部及时调动了他的工作，将他调任为缉毒中心黑海地区科的负责人，以减少损失。

1993年5月12日，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埃姆斯进行

刑事调查，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证据，以证明埃姆斯是一个间谍，当然最好能抓到现行。调查的代号是“夜行人”，负责人是莱斯利·怀泽。怀泽是个老资格的反情报官员，以前侦破过很多类似的案件。

怀泽迅速组成一个行动小组。6月3日，怀泽下令监视埃姆斯的一切行动。此后，埃姆斯住宅的周围不间断地出现垃圾清运工、草坪修理工、送货杂工等。6月11日，怀泽手下的特工开始窃听埃姆斯的电话，埃姆斯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怀泽的监视之下。

经司法部门批准，6月23日，怀泽小组对埃姆斯的住宅进行了秘密搜查，结果发现了不少证据。他们从埃姆斯家中搜到了144份机密文件，其中大部分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有关。他们在壁橱里找到一个箱子，里面有一封克格勃写给埃姆斯的长信，此外还有一本银行账单记录，上面记录了1985年到1993年期间，埃姆斯因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苏联人先后支付给他大约250万美元，是莫斯科雇用的外国间谍得到报酬最多的一个。

怀泽小组从埃姆斯家里的垃圾桶中找到了一盒废弃的录音带，经过技术处理后，播放出了这样一句

话：“除了在阿拉斯加要得到一笔现金外，我还希望你们以更安全的方式给我汇一大笔钱。”后来调查证实，这笔钱共8.7万美元，他从阿拉斯加回来后，以他妻子玛利亚的名义分别存在当地两家银行。搜查完毕后，怀泽小组在埃姆斯的房间装了监视器，在过道上安装了微型摄像镜头，并在他的电脑上加装了一种特殊的电子侦测器。

7月20日，趁埃姆斯到联邦调查局总部办事的机会，怀泽小组利用复制的钥匙打开埃姆斯的汽车安装了一个电子目标发射器，借用这种跟踪装置，怀泽可以随时掌握埃姆斯的汽车所在的准确位置。

9月9日深夜，埃姆斯和妻子驾车从一条近路进入华盛顿市区，埃姆斯边开车边与妻子说笑。汽车开到宁静的加菲尔德大街，突然来了个U型急转弯。怀泽小组开始担心埃姆斯发现了被跟踪，但仔细分析，埃姆斯不像注意到有人跟踪。最后怀泽小组发现，加菲尔德大街是埃姆斯与俄国人的联络点，俄国人利用联络点安排与埃姆斯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9月15日深夜，怀泽小组的特工从埃姆斯的家门口换走了垃圾箱。他们从中发现了一张撕碎了的小纸

条，经仔细拼合，上面出现这么一句话：“我想10月份在波哥大会面。”

10月，埃姆斯告诉他的上司，他要在本月去波哥大看望他的岳母。8日，埃姆斯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保罗出现在迈阿密机场候机大厅，特工查看了登机记录，他们根本没有去波哥大，当时，他的岳母也不在波哥大而是在美国。经核实，埃姆斯是去了加拉加斯，在那里与克格勃见面。

10月9日清晨，怀泽小组再次搜查了埃姆斯家。搜查持续了七八个小时，内内外外反复查了几遍。联邦调查局的计算机专家从埃姆斯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联络点和情报放置点的详细指示图、会面的详细记录等等。此外，还发现了大量中央情报局的机密文件。

11月1日，埃姆斯飞往波哥大，跟踪而来的怀泽小组将埃姆斯与克格勃可能会面的地点都监视起来，不料还是扑了个空。11月2日，埃姆斯和克格勃联系人卡列特金避开了怀泽，在另外一个地点顺利地完成了会面。

怀泽未能当场抓获埃姆斯，不禁感叹：此人毕竟

不是一个平庸之辈，而是受过专门情报和反情报训练的行家里手。他毕竟还担任过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最大情报机构的反间谍处处长。

从波哥大回来后，埃姆斯夫妇没有任何可疑的行动，出入家门都小心翼翼。作为一个老牌特工，埃姆斯肯定感觉到了周围的异常现象。连埃姆斯的邻居对周围出现的各种闲杂人员都感到可疑，何况作为反情报专家的埃姆斯。同时，怀泽小组的特工发现，埃姆斯住宅的周围不断出现一些陌生人，经反间谍专家分析，极有可能是俄国的情报人员。最令怀泽担忧的是，根据日程安排，埃姆斯可能近期因公出国，谁也没办法保证他会按时回国，逃到俄罗斯的可能性很大。于是，联邦调查局决定逮捕埃姆斯。

1994年2月21日，埃姆斯吃过早餐准备去兰利总部上班。他打开崭新的“美洲豹”轿车的车门准备发动汽车。突然，车门口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客气地说：“阿尔德里奇·埃姆斯先生，我是联邦调查局的莱斯利·怀泽，因涉嫌间谍案你被捕了。”

怀泽的话音刚落，埃姆斯就瘫在了车里，口中喃喃自语：“完了，这一天终于来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人就怀疑中央情报局内部有苏联间谍，但一直无法将其挖出。埃姆斯曝光后，人们心中的怀疑终于破解了。美国舆论普遍对埃姆斯间谍案作出强烈的反应。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埃姆斯间谍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间谍案。

1994年2月22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皮克林分别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白宫认为，这次间谍案是对两国“伙伴”关系的一次严重破坏。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则利用埃姆斯一案大做文章，攻击政府过于信任叶利钦。中央情报局立即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俄罗斯主动召回与埃姆斯一案有关的驻美外交官。2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参赞亚历山大·李森科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他在7天内离境。

俄罗斯的反应则要平和得多。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不要把政治领袖卷入这一纠纷。叶利钦总统的发言人科斯季科夫指责美国对间谍案反应过度，试图“相互猜疑，恢复‘冷战’心理”。2月27日，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接受全美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埃

姆斯间谍案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美国大可不必为此而震惊，因为俄国和美国尚未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更没有达成彼此停止秘密情报活动的协议。俄通社-塔斯社强调说，基于个别利益的考虑，情报事务仍有必要存在，美国军方领导人也曾多次表示，他们并没有计划结束美国对俄情报工作，既然如此，俄国为什么不能在美国从事情报活动呢？在从事情报活动方面俄罗斯与美国拥有同等的权利。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科列斯尼科夫则公开承认，埃姆斯在美国为俄罗斯工作，“他揭露了窃取俄罗斯情报的美国间谍，保护了俄罗斯的利益”。

美国政府驱逐了李森科，俄罗斯自然也要采取对等措施。3月1日和3日，俄罗斯官方宣布捕获了一名英国间谍和两名美国间谍，并宣布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詹姆斯·莫里斯因从事与职务不相称的间谍活动，被俄罗斯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他在7天内离开俄罗斯，还指控美国驻苏大使馆二秘凯利·汉密尔顿与间谍案有关。

1994年4月28日，美国联邦法院对埃姆斯进行公开审判，莱斯利·怀泽在长达30多页的公诉书上指控埃

姆斯在9年的时间里出卖了大量国家机密，与克格勃进行情报交易在100次以上。埃姆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最后，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和偷税漏税罪判处埃姆斯终生监禁，不得上诉，并罚款25万美元。

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埃姆斯将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他的妻子玛利亚·罗萨里奥·卡萨斯被指控犯有间谍罪和偷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第二十八章 美军军衔最高的克格勃间谍

乔治·特洛菲莫夫每年领取高达7万多美元的退休金，过着悠闲安逸的生活。但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东窗事发，25年前从事的隐秘活动，会在自己古稀之年大白于天下。

在美苏两国几十年明争暗斗的间谍史中，乔治·特洛菲莫夫上校至少创造了三项之最：一是向苏联出卖情报时间最长；二是美军有史以来军衔最高的克格勃间谍；三是年龄最大，被捕时他已有74岁。

老朋友出面招募

乔治·特洛菲莫夫出生在德国，父母是俄罗斯移民，他小时候随父亲迁居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正式公民。他接受的是美国教育，身上却承载着俄罗斯血统，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特洛菲莫夫后来为苏俄效力，出卖美国国家机密，固然有贪图金钱的成分，但不可否认还有情感因素。

1953年特洛菲莫夫参加了美国陆军，3年后退役。1959年，他再次加入军队，在美国陆军后备役情报中心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969年他被派往西德纽伦堡，在美军驻西德纽伦堡联合审讯中心美国陆军分部工作。他干得很顺利，职位得到不停的升迁，最后做到联合审讯中心的主任、美国陆军上校，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25年，直到1994年离开西德回国。

“冷战”期间，联合审讯中心的主要工作是专门负责审讯从苏联及华沙集团其他各国跑出来的难民，以及叛逃到西方的政府官员、克格勃军官；搜集苏联和华约成员国相关情报，分析估测这些国家对美国情报了解的程度。作为“联合审讯中心”的最高长官，特洛菲莫夫上校有权随意调阅发到该中心或者由该中心发往美国陆军总部所有的绝密情报和保密文件。这是个

非常重要的位置。

早在1969年，特洛菲莫夫刚刚调到西德美军纽伦堡联合审讯中心克格勃就注意到了他。克格勃西德情报站分析，根据特洛菲莫夫当时的状况极有可能愿意为苏联服务，是“可争取的最好对象”。克格勃对特洛菲莫夫进行了综合考虑，认为特洛菲莫夫是俄裔人，父母是俄罗斯移民，身上流着俄罗斯人的血液，所以对俄罗斯民族和国家有一定的感情。他少年时代生活在德国，俄裔的德国好友不少，而在美国几乎没有亲密的好朋友。一个外来移民在美国没有什么根基，家境并不宽裕，尤其是特洛菲莫夫本人对金钱看得比较重。这些都是争取他的有利条件。

克格勃西德情报站将对特洛菲莫夫的策反报告上报了总部。不久，克格勃总部指示，特洛菲莫夫有权接触大量的绝密情报，通过他这条渠道可以为克格勃弄到对苏联造成潜在威胁的情报，要将特洛菲莫夫列为重点招募对象。

当时，克格勃派一个名叫伊格尔·苏斯米赫尔的间谍招募特洛菲莫夫，伊格尔的公开身份是德国东正教神父，曾先后在维也纳和奥地利做过东正教主教。这

种安排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他们都是苏联移民，从小都生活在西德，两人曾是孩提时代的同学，而且关系非同一般。

一天，特洛菲莫夫收到当地一个知名社团的邀请到一家酒店参加一个宴会。在克格勃的精心安排下，特洛菲莫夫与伊格尔“无意中”碰面，老朋友见面自然格外亲切，很快约好了下一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对方是自己少年时代的朋友，又是一个知名的神父，特洛菲莫夫对重逢的旧友不仅毫无防备之心，还把伊格尔当做值得信赖的老友倾诉自己的心里话，公开流露出对美军薪水制度的不满，埋怨自己手头拮据，钱一直不够用。

一次，伊格尔邀请特洛菲莫夫来喝茶，他说自己收藏了一些地道的俄罗斯红茶。在静谧的书房里，弥漫着温馨的茶香，他们谈起了俄罗斯的风物人情，谈起了白桦林。当时，特洛菲莫夫流露出浓重的俄罗斯情结，伊格尔意识到自己的策反计划能成功。

伊格尔将与特洛菲莫夫几次交谈的情况迅速向克格勃西德情报站负责人汇报，克格勃总部下令，可以向特洛菲莫夫摊牌，不惜重金招募。

他们再次见面时，伊格尔直接表示希望特洛菲莫夫能与他合作，他愿意出大价钱收购联合审讯中心的审讯资料，及其所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当时特洛菲莫夫没有表态，看得出他内心震动了，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沉默地看了看伊格尔。伊格尔温和地笑笑说，如果特洛菲莫夫不愿意的话，就当他说什么都没说过。

为克格勃效劳

几天后，特洛菲莫夫约伊格尔在一家俄国餐厅共进晚餐，像往日一样谈得很融洽。分手时特洛菲莫夫拿出一个大纸袋，说里面有些文件，让他回去看看是不是他们需要的。伊格尔欣喜若狂，连忙说：“会的，他们会感兴趣。”

特洛菲莫夫挺认真地说：“你们要开出合适的价钱。”不久，特洛菲莫夫收到克格勃第一笔钱，他觉得很满意。

就这样，特洛菲莫夫开始为克格勃服务，成为一名隐藏极深的苏俄间谍。在此后为克格勃猎取情报的行动中这只“鼯鼠”行为诡秘，做得天衣无缝，从没失

过手。他与伊格尔也成为间谍界一对“完美”的搭档。克格勃先后为特洛菲莫夫取代号“安特伊”、“马基慈”和“科苏尔”。伊格尔用“埃克尔”的名字与特洛菲莫夫联系。克格勃定期给特洛菲莫夫发活动经费、情报奖金和特别奖励金。特洛菲莫夫工作更加卖力了。

特洛菲莫夫将联合审讯中心的审讯材料偷偷带回家，夜深人静时拉上窗帘进行拍照，然后将胶卷经过伊格尔交给克格勃。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向苏联提供了几千页的情报资料，为此他从克格勃那里得到了差不多30万美金的报酬。

特洛菲莫夫在25年的任职期间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不仅仅是联合审讯中心的文件，可以说，只要克格勃需要他无所不卖。比如，美国设想向苏联发动战争的计划，美国军备需求的高度机密以及美国情报机构侦察目标的相关文件，美军掌握的苏军和华沙集团的军队作战指令，苏联、华沙成员国和其他国家生化战汇报资料和情报，美军驻德情报信息报告等。所有的这些情报都是美军战略性情报，涉及美军在欧洲的战略企图和情报目标，这些情报的泄露无疑将危害到美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行动。

这些被特洛菲莫夫“返销”到克格勃的情报至少有两个作用，一是帮助苏联人摸清了自己有多少情报落入了美国人手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情报了解的深度，克格勃为此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二是克格勃反间谍特工以这些情报为线索追查到泄露者，逮捕了不少潜伏在苏联和其他华沙国家境内的美国和北约的情报人员。负责此案的美国佛罗里达州检察官坦言，任职期间畅通无阻地可以接触重要情报使得特洛菲莫夫成为“精美绝伦”的超级间谍。

克格勃非常欣赏特洛菲莫夫的工作业绩，由于他出色的表现，克格勃总部为他颁发了最高荣誉的红旗勋章，还专门邀请他到专供克格勃享用的奥地利度假村消遣。

1994年，因伊格尔疏忽大意出了一些问题，德国当局曾以间谍嫌疑逮捕了特洛菲莫夫和伊格尔，德国反间谍机构怀疑特洛菲莫夫从事“与身份不符的间谍活动”。特洛菲莫夫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对德方的指控坚决给予否定。由于美军在德国的特殊地位，加上德国反间谍机构拿不出特洛菲莫夫在德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确切证据，不得不马上释放了他，但德国人对他很不

信任，宣布他5年内是“不受德国欢迎的人”。特洛菲莫夫平安无事，躲过了一劫。5年后伊格尔病逝，特洛菲莫夫所进行的间谍活动已死无对证，他彻底放松了，以为再不会有人找他的麻烦。

特洛菲莫夫在德国是不能继续待下去了，美国军方为避免特洛菲莫夫再带来麻烦建议他退出现役。1994年，特洛菲莫夫正式退役，军衔是上校。他回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帕塔，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长期生活在德国的特洛菲莫夫虽然一生结过5次婚，但晚年的家庭生活依然平静和睦，退休后他一年可领取7万美元的退休金。平时他还干了一份零活儿，在当地的一个食品店里帮顾客打打包。

大意中圈套

其实，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在1992年就盯上了特洛菲莫夫，此后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调查。事情的起因是当年一名克格勃军官米特罗欣叛逃英国，在他携带的几大箱克格勃机密情报资料中，有不少涉及克格勃安插在英美等国的间谍活动情况。英美等国的情报机构组织人员对这些情报进行了仔细研究，一个化名

叫“马基慈”、“科苏尔”或者叫“安特伊”的人引起反间谍专家的注意，此人经常向克格勃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从这些情报的保密级别来看，这名间谍并非一般工作人员，显然只有级别较高的军官才有权接触这些文件。

英美德等国情报机关联手开展调查，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发现这位具有几个化名的克格勃间谍实际上接受一个名叫伊格尔的德国东正教神父领导。伊格尔神父其实是克格勃在德国的情报人员。此外，这名间谍恰巧也在特洛菲莫夫任主任的美军驻德纽伦堡审讯中心工作。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伊格尔神父与特洛菲莫夫有着频繁的接触，他们两人曾是孩提时代的同学，而且关系非同一般。美国联邦调查局推测这位有几个化名的克格勃间谍就是特洛菲莫夫，但联邦调查局追查到伊格尔时，此人已病逝。虽然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放松对特洛菲莫夫的监视，但一直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

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美军方情报部门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调查小组，前后花了八九年时间，也未把这只隐藏极深的“鼯鼠”挖出来。直到1999年，联邦调

查局实施了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才让特洛菲莫夫自己钻了进去。

一位装扮成俄罗斯特工的联邦调查局密探来到佛罗里达州的帕塔，他找到特洛菲莫夫，用联络暗号与特洛菲莫夫接上头。此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自称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特工，公开身份是俄罗斯驻美大使馆官员。他对特洛菲莫夫说，希望能确定特洛菲莫夫曾为克格勃效力过的事实，如果身份得到肯定俄罗斯很想继续招募他。第一次见面，特洛菲莫夫疑心重重，表现得非常谨慎，他说听不懂“俄罗斯外交官”说的话，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美军退役军官。第二次约见他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担心会遭到拒绝，不料，特洛菲莫夫爽快地同意了，他反复盘问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许多问题均得到满意的答案。对方拿出几张苏联间谍的照片让他辨认，特洛菲莫夫都能叫得出这些间谍的名字。

特洛菲莫夫的疑心彻底消除了。联邦调查局特工哄骗特洛菲莫夫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准备还清拖欠他的一些情报经费，此外，决定对他们这些曾为克格勃情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员给予一定补偿。听到

这些话特洛菲莫夫精神大振，感谢俄罗斯没有忘记他，立刻滔滔不绝起来。

面对着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特洛菲莫夫开始绘声绘色地大谈自己的间谍经历，为表示对俄罗斯的忠诚，他将手放到自己的胸前低声对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说：“我不是美国人。”他还吹嘘说，自己曾如何将文件带回家拍照，然后将胶卷交给克格勃。这一切都被事先埋伏好的联邦调查局特工的摄像机清晰地录了下来。

联邦调查局认为已有证据充分证明特洛菲莫夫的间谍罪成立，决定以间谍罪将他逮捕。扮成俄罗斯特工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又约特洛菲莫夫见面，声称过来送钱给他，特洛菲莫夫愉快地答应了。当他高高兴兴地赶到接头地点，联邦调查局特工早已埋伏在那里，等待他的不是钞票而是冰凉的手铐。

2000年6月15日，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地区司法办公室向媒体发布消息，退役陆军上校特洛菲莫夫因从事间谍活动被逮捕。消息传出，许多美国人感到很意外，“冷战”结束快10年了，克格勃已成为间谍故事片的素材了，现实生活中竟然仍存在克格勃间谍。周

围熟悉他的人根本不相信特洛菲莫夫是苏联间谍，他们都认为一定是联邦调查局搞错了。特洛菲莫夫在德国服役时的同事沃尔特·巴格尔说：“特洛菲莫夫当年在陆军对苏联政权简直恨透了，他的祖辈曾遭到过布尔什维克的清洗，所以，他的父母才流亡到德国。他与苏联有着深仇大恨。因此，他决不会向苏联出卖情报。”

2000年6月25日，佛罗里达州检察机关以间谍罪起诉特洛菲莫夫。美国助理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指出，特洛菲莫夫是美国间谍史上军衔最高、隐藏最深、向苏联出卖情报时间最长的“至善至美”的间谍。特洛菲莫夫站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法庭的陪审团面前，接受向苏联出卖情报的犯罪调查。由6名男性和6名女性组成的陪审团听取了特洛菲莫夫和他的律师丹尼尔·赫南德的辩护。

要判特洛菲莫夫犯有间谍罪也并非容易的事，特洛菲莫夫当庭拒绝接受上述指控，否认自己犯有间谍罪。对此，法庭还传讯了一名前几年叛逃到美国的克格勃间谍奥莱格·卡卢金。卡卢金当庭作证说，他曾与特洛菲莫夫在德国和奥地利讨论过他如何为克格勃

工作的事情。特洛菲莫夫对陪审员说，这纯属是一种受想象力影响的假设。特洛菲莫夫坚持说，他不是间谍，而只是因为太想钱做的白日梦，想象成为间谍可以搞到很多钱。当时，他的钱不够用，非常需要钱。当问及怎么能认出那些苏联间谍，他说那完全是一个巧合，就像做猜谜游戏一样。

最后法庭拿出铁证，出示了那盘1999年特洛菲莫夫与那名假扮的俄罗斯特工接头的录像带时，特洛菲莫夫立即进行了反驳。他说，他当时完全是开开玩笑的，生活单调无聊，吹吹牛想找点刺激而已，他举了个例子：“就像有人问你愿不愿意出售布鲁克林大桥似的。”他很有说服力地反问法庭：“如果你说可以，那是否意味着桥就被卖掉了呢？”检察官指责特洛菲莫夫曾在德国任职期间将美国向苏联发动战争的计划、美国军备需求的高度机密以及美国情报机构侦察目标的相关文件出卖给了苏联及其他华约国家。12名陪审员在观看了有关特洛菲莫夫从事间谍行动的录像带后都认为特洛菲莫夫犯有间谍罪。当地法官苏姗·巴克卢宣读陪审团对特洛菲莫夫的裁决时，特洛菲莫夫笔直地站着，面无表情。而他的妻子失声痛哭。

美国佛罗里达地区法院对特洛菲莫夫进行最后宣判，他的余生将在牢狱中度过。佛罗里达地区法官苏珊·巴克卢在评论特洛菲莫夫一案时说，此案的审理与判决就是对那些被政府委以处理重大国家机密的情报人员的警示，一旦他想出卖情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那么，必将遭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第二十九章 “完美间谍”汉森

2001年全世界最有名的人不是本·拉登，也不是乔治·布什，而是一个名叫罗伯特·汉森的联邦调查局（FBI）探员。时年56岁的汉森为FBI服务25年，其中竟有15年的时间是在为苏联和俄罗斯效力，以6000页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文件，换得140万美元的报酬。

汉森是FBI历史上挖出的最大的一只“鼯鼠”。他拥有高超的电脑知识，自由出入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的资料库；他出卖了“总统防卫计划”，苏联一颗洲际导弹就可能使美国群龙无首，整个国家防卫体系都掌握在他手里；他供职的联邦调查局不识他的真面目，

而克格勃也弄不清楚为他们服务的究竟是谁。

美国传媒称他为“完美的间谍”。

从小就有间谍梦

罗伯特·汉森，1944年4月18日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小时候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他性格温和，做事有主见，但不太喜欢与人合作。1966年，汉森在诺克斯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接着在西北大学攻读牙科专业硕士学位，1968年又转到经济系。1971年，他获得西北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1973年成为注册会计师。

汉森的父亲霍华德·汉森曾是芝加哥的一名警察，可能受父亲的影响，汉森从小觉得做警察不错，尤其做秘密警察充满刺激，需要很高的智商，适合他这样的人去做。14岁那年，他读了大间谍菲尔比的回忆录《我的秘密战争》后，就决心以菲尔比为师，做一名了不起的大间谍。巧合的是，芝加哥警察局招聘警员，他一去就被录用了。可能由于他有会计方面的专

长，便被分配到一个反贪特别小组担任调查员，主要负责调查警察的犯罪情况。他做得很顺手，工作十分出色，因此得到上司的赏识。

1976年1月，汉森加入了联邦调查局，开始在印第安纳州工作。后来受重任穿梭于纽约与华盛顿总部两地。由于在大学曾学习过俄语，他专门负责监视苏联驻美大使馆以及其他苏联官方机构，在联邦调查局颇为吃香，连连升迁，很受器重，不久他开始负责间谍与反间谍行动。

1979年的一天，汉森走进苏联一家商业公司设在纽约的办事处，这个办事处一直受到他监控，因此汉森心里十分清楚，这个挂着经商招牌的办事处其实是苏联军事情报局的联络点。汉森找到办事处负责人，表示自己愿意为苏联情报部门服务，并坦然地说：“我不需要很多钱，但要保证我最终能安全地离开美国。”

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馅饼让苏联人好不兴奋，自然满口答应。当时，汉森提供了三份情报。由于这些情报，一个为美国人效力17年、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代号“地狱”的间谍就这样栽在汉森手上。“地狱”真名叫鲍里雅科夫，在莫斯科通过中间人向美国人提供情

报，公开身份是苏联军事情报局的一名军官。

做了这件事情后汉森有些后悔，担心事情败露毁掉自己的前途。他神色不安的状态很难瞒过朝夕相处的妻子。汉森的妻子邦妮在一所天主教学校做宗教课教师，在妻子的严厉追问下，汉森如实向妻子交了自己的间谍行为，并发誓再也不做这种不光彩和危险的事。看到汉森诚恳的悔悟，邦妮安慰他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事情很快会过去。她原谅了自己的丈夫，没有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汉森向妻子坦白交代后，为了洗刷自己不洁的灵魂表示彻底的悔过，他专门前往天主教堂，在一个叫奥特的牧师那里忏悔。牧师原本打算劝汉森主动自首以减轻自己的罪过，当听说汉森拿到了上万美元的酬金又劝汉森将这笔钱捐给慈善机构，以求得良心的平安。牧师也不再说去政府自首的事了。汉森便将一万多美元捐给了印度修女特蕾莎。



罗伯特·汉森在联邦调查局从事反间谍工作期间自愿成为克格勃的一名“鼯鼠”，向克格勃出售了大量机密文件。

从此，汉森确实洗心革面不再与苏联情报机构发生任何联系，安安心心地在家里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汉森有6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已在2000年开始上大

学。在邻居们的印象中汉森是一位很有教养，做事按部就班、斯斯文文的公务员。他爱家庭爱孩子，从不与人发生争执，说话轻声慢语，一看就是位典型的绅士。夫妇俩笃信天主教，每到周末就带着孩子前往天主教堂做礼拜。

这种平静而理性的生活事实证明只是表面现象。汉森内心是个不安分的人，做像菲尔比一样的大间谍的梦想早已烙在他的潜意识中，随时都可能支配他的行动。1985年，他被调往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作为苏联情报方面的资深专家很受上司器重。两年后，汉森升任苏联部副主任，随着职务的升迁，他几乎接触了有关美国对苏联进行情报活动的全部资料，同时还可以接触到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的反谍报文件。可以这么说，联邦调查局情报部门所有的事情，包括所有的资料、方法、技术和目标，只有少数人才能知道，汉森是其中之一。

汉森开始耐不住寂寞，五六年后他又重操旧业，一发不可收拾。当年汉森第一次与克格勃做情报买卖时，进入联邦调查局工作只有二三年，心里还十分恐慌，现在已变得老练多了。

维克多·切尔卡申是苏联克格勃美国情报站的主任，克格勃上校军衔，一个典型的“冷战”时期苏联情报人员的形象，表情冷漠、目光犀利，其谍报风格大胆谨慎，城府深不可测，公开身份是苏联驻美大使馆外交官。汉森知道这个人的底细，他与切尔卡申接触过，并且印象不错，确信此人是个情报高手，反间谍经验丰富。汉森决定主动找切尔卡申联系，协商合作，向克格勃提供情报的事。汉森选择他作为出卖情报的对象可谓惺惺相惜，棋逢对手。事实证明，他这一步是走对了。

1985年10月1日，汉森亲自把一封信放进切尔卡申住宅门前的信箱。在这封信里，汉森表示他可以马上向苏联提供美国情报机构的最高机密文件，所有资料均来自原始文件，但需要支付10万美元。汉森在信中强调，为安全起见，他绝对不暴露真实身份，苏联人也不必去搞清楚。他只会用代号“P”或“贝克”等化名与苏联情报人员联络。这封信件自然是打字稿，最后署名为一个大写字母“P”。

切尔卡申喜出望外，立即向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汇报，总部指示克格勃美国情报站尽一切可能满足汉森

的要求，并按照汉森的方式全力配合其行动。汉森一出手就与众不同，一般的间谍活动中间有个联系人，间谍要与中间人见面。但是无论是前苏联还是后来的俄罗斯人联系，汉森从来不露面，俄罗斯人也从来没有见过“P”。汉森很巧妙地控制着自己的间谍活动。

克格勃替汉森取了个代号“拉蒙”。

他能翻美国的家底

汉森开口就是10万，克格勃也很爽快地照单付钱，苏联人如此大方一是知道汉森的价值，要放长线钓大鱼；二是因为汉森提供的情报确实物有所值。比如，汉森的情报提供了三名已被美国人策反了的克格勃特工名单。不久，切尔卡申找了个合适的理由，将三位在华盛顿工作的克格勃特工骗回莫斯科，在机场将他们秘密逮捕。克格勃对叛徒从不心慈手软，经秘密审讯后其中两人遭到枪决，一人被监禁。

美国政府有个所谓的“政府连续性计划”，也即社会上传闻的“保护总统一计划”，多年来一直被列为美国头号国家机密。比如，计划中有一套中央定位系统，一天24小时对总统法定继任人，即在总统无法履行总

统义务时的法定继任人进行跟踪，而总统和继任者不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出现。另外还有两个辅助系统，一个名为“应急导弹通讯系统”，于导弹发射后通过无线电与地面部队保持联系；另一个名为“打击后指挥与控制系统”，是由一个具备发起报复性打击能力的飞机组成的网络。此外，美国安全部门还在几个国家公园和度假地修建了应急指挥中心。

这个计划表明，如果美国遭到苏联导弹甚至是毁灭性核武器的攻击，美国总统和总统指挥系统不会瘫痪，而且美国具有强大的核反击力量。汉森把“政府连续性计划”的具体内容透露给了苏联，这可是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危的核心机密。美国最高领导层的藏身之处已被苏联掌握，一旦战争爆发，苏联一颗洲际导弹就可能使美国群龙无首，影响到整个国家防卫体系。后来，为了评估汉森出卖的情报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损失，中央情报局专门成立了一个“破坏控制评估”小组。据说，汉森这一情报的价值不是几十亿美元，而是数千亿美元。

汉森出卖的机密情报大多是重量级的，对美国安全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20世纪80年代，他出卖了一

项情报——美国在苏联驻美大使馆下面挖掘地道。抛开这一情报的无形价值不说，为修建这条秘密地道美国人就耗资数亿美元。

挖掘地下秘密通道窃取情报是中央情报局的拿手好戏。20世纪50年代，中央情报局伙同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柏林挖掘了一条地道，直接连通了驻德苏军总部的地下通讯电缆，借以获取大量情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50年代那条英国人修的地道被一个叫布莱克的英国人出卖给苏联，而美国人修的这条地道被美国人出卖给了苏联。而且两条地下通道结果也一样：建造通道的是外国人，但使用通道的可是苏联或俄罗斯人。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要求美国政府允许在华盛顿建造新大使馆，理由是原使馆馆舍过于陈旧，空间过于狭小，已经不能满足外交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的需要。新馆址选在一个叫阿尔托的小山坡上，苏联人从这里可以监听到华盛顿上空的所有微波和电话通讯。1973年，苏联新大使馆落成。美国人不放心了，苏联使馆成为心头之患，美国人先是花了近亿美元为电信系统安装反窃听装置，后又花费数亿美元配备专门设

施和人员用于监听苏联使馆，防备使馆可能造成的危害。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商定，索性挖一条地道，直达苏联大使馆下面，窃取大使馆内的情报。地道耗资数亿美元，里面安装了各种最尖端的窃听设备，与其他地面设施一起组成了一个窃听苏联情报的庞大系统。在通道里可以监听到苏联大使馆与国内的来往电讯，甚至可以听到苏联大使馆里的人说话。

美国人做手脚，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弄出了当今世界最先进、最昂贵、最有效的窃听系统。其实，苏联人早已心知肚明。制订挖掘苏联使馆地下通道的计划汉森几乎从始至终都参与了，因此，美国人在华盛顿挖掘地道从一开始苏联就知道了。苏联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提出抗议，美国人地道是挖不成了，但联邦调查局必然要追查泄密的原因，那么汉森就有暴露的危险，而对苏联来说汉森太重要了，无论如何要保护好。苏联采取的办法是：你美国人有钱就去挖吧，我们还会给你提供些情报，让你们高兴高兴，不过情报是真是假你们自己掂量。结果美国人费尽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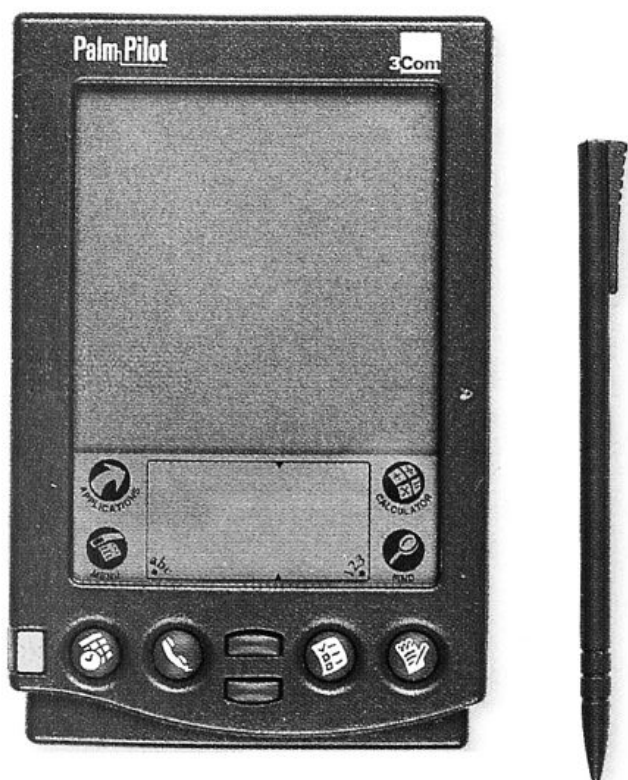
机，花费了数亿美元，除了搜集了大量的假情报外，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到头来空欢喜一场。

华盛顿地道事件暴露后，美俄之间吵得不可开交，大打口水仗。

1995年2月，汉森调任联邦调查局驻国务院外交使团办公室的高级代表，他在那里负责部门间反间谍的工作。美国国务院二楼设有汉森的办公室，他的主要工作是代表联邦调查局监视外国外交人员在美国的活动，工作上负责与国务院进行协调。国务院给予汉森不受检查的特权，他可以接触有关外国使节活动及身份的机密资料，能自由进出国务院办公大楼保安禁区。因此有人说汉森不是一般的人，他能翻美国的家底。

与老一代间谍不同，汉森具备了现代电脑知识，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计算机程序员。在联邦调查局的同事中，熟悉黑客技巧的汉森有电脑高手的名声。早在1992年，他曾提醒当时的联邦调查局苏联处主任雷蒙德·米斯罗克和行动处主管罗杰·沃德森，局里新建的内部网不够安全。他俩对汉森的说法表示怀疑。为了证明自己的意见是对的，汉森以非正常渠道轻松地进入

了米斯罗克的个人电脑并下载了一些文件，然后摆到米斯罗克的办公桌上。汉森是联邦调查局内部网自动文件支持系统的常客，这个系统里面储存着联邦调查局的各类保密资料。汉森在联邦调查局的机密系统里搜集有关希拉里、切尔西和弗里的资料。作为计算机爱好者，汉森拥有多部电脑，家里还安装了一台服务器。



第三代掌上电脑。汉森对电脑和网络等技术非常娴熟，通过掌上电脑，他可以娴熟地在互联网上展开工作。

有一次，汉森提供一个磁盘给俄罗斯情报部门，俄方抱怨汉森的磁盘是空的。汉森回答俄国人，你们使用一下第40模式。这是个简单的操作，磁盘只有使用正确的秘密方式才能读出内容。

有一张汉森用过的5英寸软盘，资料记录在软盘磁轨上，汉森把资料存入81、82和83条磁轨，一般情况下，电脑只能读出80条磁轨容量，汉森设置一个特别程序便能读出软盘上包括81~83条的所有内容。汉森是个信息时代的间谍，善于运用高科技手段从事间谍活动。

汉森对网络巨大的潜在空间非常敏锐。早在1991年，汉森就向俄罗斯人建议：在华盛顿成立一个电脑工作室，利用计算机新技术的便利直接进行交流。

由于汉森派驻美国国务院负责监控各国驻美外交官，他的电脑可以随意连接本单位的计算机系统，可以随意上网查阅。在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官员中，汉森的安全等级在同等资历人员中最高。他有权进入仅限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13个政府情报机构使用的、处于高度机密状态的内部网。这套高度机密的通讯系统可以说是间谍的互联网，联系各地民间和军方

情报人员，核心机密内有英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国的情报分析。此外，美国国防部有个测绘及信号情报部，主要负责广泛收集和保存从各国得来的高科技情报。跟踪各种潜艇、导弹、飞机等高科技武器，分析这些武器的各种技术指标和功能，建立秘密数据库。汉森是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专家，他可以通过电脑进入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的资料库，用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如果汉森出卖了这些东西，那美国遭到的将是灭顶之灾。”

汉森东窗事发后，美国成立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调查汉森间谍案对美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损失，并对联邦调查局的内部网进行了彻底的安全检查。首先美国人要搞清楚在为俄罗斯人效力期间汉森对网络造成了多大损失，有没有在网络中留置后门等恶意程序便于俄国人继续窃取秘密信息。然后，联邦调查局拿到专项拨款，对计算机系统进行了一次全面升级。

独一无二的间谍手法

汉森由于先后出任多个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危

的职位，所以他可以合情合理地接触到大量与苏联或俄罗斯有关的绝密情报，甚至是美国政府内部最敏感最机密的部分。他获取情报拥有的便利条件就是中情局的特工也无法做到。所以，汉森向苏俄出卖的情报无论是从数量来说，还是从质量来说都是触目惊心的。

汉森提供给苏俄情报机构的情报涉及面广、价值高，很多属于国家核心机密。比如，中央情报局有关核计划的绝密文件；潜伏在苏联和俄罗斯境内，尤其是克格勃内部的美国间谍名单；美国对苏联和俄罗斯的间谍行动方案，美国的反间谍技术、资源和手段；美国对苏联和俄罗斯间谍案的调查等。

为何要做出卖国家的间谍？汉森一是喜欢间谍工作的刺激，渴望成为像菲尔比那样的间谍英雄，实现儿时的梦想；二是无法拒绝金钱的诱惑。他甚至直接开价，给克格勃接头人写信说：“这一次送去一盒文件，当然是美国知识界最敏感的高度机密。为此，我觉得你们起码得付10万美元。”后来，汉森抱怨太多钱反而麻烦，花不了，储蓄也不合算。于是他提议俄国人用钻石支付报酬，他当时想自己用不上，或许有一

天他的孩子们需要这些东西。

汉森清醒地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风险，2000年秋，在给俄罗斯情报机构的信里说：“近来，美国法律做了一些修改，我给你们提供的帮助是可以被判死刑的。所以，我确实承担一些风险。”他提出，俄罗斯要为他逃亡准备方案，要有应急措施。他说：“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因此，他随身皮包里一直放着两样东西——护照和手枪，随时准备逃亡。

汉森为苏联和俄罗斯所做的特殊贡献无人可以替代，克格勃和俄罗斯情报部门相当满意，给予了他高度评价，先后送给他活动经费和奖金超过100万美元，还有钻石等其他报酬。此外，俄国人在莫斯科以汉森的名字开了个账户，账上存款大约80万美元。

汉森与其他暴富的间谍不一样，生活非常简朴，花钱从不大手大脚，更别说摆阔讲排场。他住在华盛顿郊区，是一栋两层的砖木房，带车库，价值约30万美元，家里陈设一般。这种价位的房子，他这样的美国政府公务员都能买得起。夫妇俩开的小车也是普通型的福特车，外加一辆1993年生产的用于郊外旅游的面包车。

汉森暴露后，很多间谍专家对他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进行了多角度分析。有人认为，汉森具有超凡的间谍天赋，干间谍能使他获得刺激和快感，天生就喜欢做这一行。他隐藏了27年才被发现，其隐身能力在间谍中可谓超一流，他有像剃刀一般锐利的思维能力。这种超群的能力主要来自其内心的优越感。他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出色，出于对高超的间谍技巧的沉迷，利用间谍这项极具风险的行为向人证明自己聪明过人。因此，也有人说他出卖美国机密情报可能是出于一时高智商的冲动。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克格勃也处于瘫痪状态，俄罗斯对外情报还没理出个头绪，他们与汉森长时间没联系。汉森曾写信给俄罗斯情报部门说：“我愿意牺牲生命来帮助你们，可是你们却把我浪费了。”1995年，汉森被派驻美国国务院外国事务办公室，俄罗斯对外情报局重新与汉森联系上。从此，汉森又狂热地为俄罗斯人提供美国的重要情报，直到有一天他给俄罗斯人送情报被当场抓获。此事也可证明，汉森为俄罗斯情报部门效力不仅是出于自愿，而且很主动。

汉森从事间谍活动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他认为越是所谓先进的、复杂的东西越不保险。自1985年10月起，汉森一直用普通邮件的方式与莫斯科进行联系，信由打字机书写，信末署名“拉蒙·加西亚”，信封地址署名一般是“吉姆·贝克”或“G·罗伯特松”。他的联络方法也与众不同，很少自己主动出击。按照事先约定，克格勃需要情报时就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一则卖车广告，内容为“道奇汽车1971年出厂，外交家系列，车况良好（需作引擎维修）。有兴趣购买者请于下周一、三或五下午电话联系。”汉森看见报纸上的广告，就会用电话联系，联络时双方需要说出暗语，汉森会自称“拉蒙”，而对方则会说：“对不起，那卖车的人不在，请你留下电话号码。”联系上了，克格勃就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提取情报。

汉森和苏俄情报人员约定的情报秘密传递点通常都是在华盛顿郊区和森林里。汉森规定了一套联系方法，看似简单普通却非常安全有效。比如，他们约定一个路标作为联系地点，俄国人通知汉森要取情报了，暗号就是在路标的侧面纵贴白色胶带，表示已准备好提取情报包裹。汉森在路标侧面横贴白色胶带，

表示东西已经放好。俄国人顺利地把情报拿了，给出的暗号是在路标侧面贴白色胶带，表示东西已经收到。

汉森用这样的方法与对方保持沟通，拒绝会面。假如情况有变化或要更改时间地点，也有特殊的联系暗语。比如，如果汉森在回信地址中出现“芝加哥”，表示汉森希望下一次秘密交换时间定在下周一。

汉森自编了一套密码系统，非常有创意，比如，在通信中凡涉及到年、月、日时间数字时，通常都要加上6，这样3月16日就写成9月22日，傍晚7时也就是凌晨1时。

汉森和克格勃的联系地点也变化莫测，仅华盛顿和弗吉尼亚情报转送点就有11处，总是选择那些最普通、最不惹人注意、交通便利的地方做联系点。比如华盛顿下城区的灯柱，他曾留下特殊的记号通知对方，将要传送一个机密包裹。汉森家附近有一家公园，就在公园里的一座桥下设置了一个投放点存放各类机密情报包裹，等待俄罗斯人来取，方法简单，行动方便。这种公共场合没有人会察觉到异常。

终露庐山真面目

2001年2月18日，一个平常的礼拜天下午，在汉森家周围以及弗吉尼亚维也纳小镇弗克斯通公园，几十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扮成游客，随意地分散在各个角落，严密地注视着汉森家和公园里发生的一切。而监控重点在公园里的一座小桥，小桥两头是草地，树下长椅上三三两两地坐着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汉森全然不知晓。傍晚5时左右，汉森手提一个公文包，悠闲地踱进公园。他仔细环顾四周，确信四下十分安全，便迅速把一个小包裹塞进木桥下一个隐蔽处。他过小桥向公园另一边走去。此时，埋伏在四周的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一拥而上，把汉森按倒在地，夺下公文包，戴上手铐。

随即，特工将汉森带回其住所，开始对房屋进行彻底的搜查，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当天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弗利宣布，汉森已被正式逮捕。此后几天，美联社播发了消息，美国各大报陆续用显眼的版面大量报道这起震惊世界的间谍案。广播公司赶制专题片，取了个有意思的片名：

《完美的间谍》。

2月18日，汉森被联邦调查局特工捕获的消息公布后，俄方才知这个长期向他们提供绝密情报的人竟然是联邦调查局的资深反间谍官员。

汉森是如何被揪出来的呢？

早在汉森被捕的两年前，联邦调查局怀疑国务院官员布洛克是莫斯科的间谍，暗里对布洛克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方。正待进一步调查取证时调查人员突然发现，布洛克的行为举止变得一切正常，找不到半点破绽。显然，有人通风报信了，布洛克已经知道自己在被调查，从而停止了活动。联邦调查局上层开始警觉，内部可能隐藏着“鼯鼠”。

不久，又发生一件奇怪的事，美国在华盛顿进行了一项耗资数亿的电子侦察工程，这项历时10余年的大投资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可是从其建成起，美国人没有得到过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联邦调查局上层下令一定要找出原因。其实原因不难找，俄罗斯人已经知道这个信息工程，令联邦调查局恼火的是无法确定是谁泄露了这个机密。

联邦调查局断定，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或

其他政府要害部门有“鼯鼠”，而且是个大家伙，知道很多国家高级机密，必须彻查。

联邦调查局从全国各分局调集50多名特工，组建了一个强大的“猎鼠小组”，由联邦调查局主管反间谍的副局长直接指挥，秘密开展调查活动，对每一个怀疑目标认真排查。

其实，早在1997年6月，就有人对汉森提出怀疑。当时，联邦调查局特工厄尔·皮茨因间谍罪被铺，在接受审讯时交代，他怀疑汉森与一起电脑数据被窃有关，因为他曾发现汉森试图从电脑中获取他无权知道的信息。这个情况很快被汇报到联邦调查局上层，但上层对这起已经过去了的电脑数据失窃事件不感兴趣，没有任何反应，审讯人员也没有作进一步调查。汉森平安躲过一劫。

1999年，俄罗斯驻联合国外交官谢尔盖·特列杰科夫叛逃到美国，这位俄国对外情报局军官告诉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内部隐藏着俄罗斯情报机构的间谍，他的真名不清楚，只知道他的代号为“P”。

特列杰科夫没有逃往美国前在为中央情报局效力时，曾将美国间谍提供给俄罗斯的情报又转到中央情

报局手里。调查人员发现，所有泄露的秘密文件都可追溯到汉森那里。终于，汉森作为最大的嫌疑对象浮出水面，被联邦调查局锁定。

像汉森这种高智商老牌特工反侦查能力极强。汉森十分自信，即使莫斯科泄露了秘密他也不会被发现，因为他没有留下任何真身痕迹。大半年里，联邦调查局探员对汉森的调查毫无收获。但这回联邦调查局上层下了狠心，要不惜任何代价挖出潜伏在自己心脏的大“鼯鼠”。他们获知一位曾为中情局效力的苏联特工知道“P”的线索，于是花巨资买到有关“P”的机密档案，这份档案存有“P”的一个录音，经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反复试听，仔细分析比较，最后确定是汉森的声音。联邦调查局探员开始跟踪汉森，汉森走到了末路。

汉森先后向俄国人发出了27封信，提供了22袋情报，多达6000页。汉森许多间谍行为与计算机相关，比如利用计算机向俄方联络人传送经过加密的信息，从FBI的计算机网络盗取数十份文件，用软盘下载、转移秘密资料，定期扫描内部计算机网络，查看自己是否受到怀疑或被人监控等。

2001年5月16日，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桑德里亚法庭的联邦大陪审团以间谍罪对罗伯特·汉森提出起诉。长达109页的起诉书指控汉森犯有19项间谍罪，一项从事间谍未遂罪，一项图谋间谍活动罪。

起诉书认为，汉森背叛自己的国家长达15年之久，暴露了3名双重间谍的身份，导致其中两人被处死。汉森借此获取了价值140万美元的现金、珠宝，在俄罗斯银行开设巨额账户。他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些罪名成立的话，汉森可能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每项罪行还将被处以25万美元或更高的罚款。

汉森在法庭上态度强硬，拒不认罪，甚至拒绝做出答辩。汉森的律师否认对汉森间谍罪所有的指控，围绕汉森间谍案，控辩双方进行了激烈辩论。后来汉森开出认罪的条件，经过双方讨价还价，7月6日，汉森终于与司法当局达成协议：汉森承认曾向俄罗斯出卖情报的罪行，并愿意同联邦调查局充分合作，检察官将免除对他的死刑控诉。但如果联邦调查局官员不满意汉森的合作或者认为他在说谎，汉森有可能将再度面临死刑。

2002年5月10日，汉森在美国一家联邦法院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第三十章 “新克格勃”特工抓获“石头间谍”

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加紧了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进行民主意识渗透，大力支持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通过社团组织对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培植反对派，影响选举。

西方国家的险恶用心引起莫斯科的高度警觉，俄罗斯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外国驻俄人员的监管。几个英国人的反常行为也进入俄罗斯反间谍部门的视野。

2006年1月22日晚，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特别报道”节目播放了一段录像，详细记

述了英国人在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的实况录像。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间谍大战愈演愈烈。

不知不觉做了英国人的间谍

2004年夏天，莫斯科市民弗利·柯罗捷耶夫在莫斯科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招聘信息管理员的广告，广告标题非常诱人：“充满魅力的工作、不错的经济收入等待着你。”应聘人员的条件为：具有大学以上的学历，政治、经济等专业的更好；精通英语、掌握电子技术、能熟练使用电脑的人员尤为欢迎；有社团组织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弗利·柯罗捷耶夫当即拿起电话报了名。

第三天，邮局给弗利·柯罗捷耶夫送来了这家公司的面试通知书。

弗利·柯罗捷耶夫，莫斯科某工程学院电子工程专业毕业。他和家人住在靠近郊区的一栋普通公寓里。当年俄罗斯经济不太景气，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柯罗捷耶夫在好几家公司做过，所从事的职位与自己所学的专业毫无关系，目前在一家百货公司仓库做货物

配发员，工作很辛苦，薪水却不高。

在约定的时间里柯罗捷耶夫来到那家外企公司。负责面试的考官是两位英国人，其中一位是柯罗捷耶夫在伦敦认识的朋友。

有一次，柯罗捷耶夫所在的百货公司要在英国订购一批货，由波兰转运俄罗斯。公司采购部主任去英国签订合同，需要带一位助手协助工作，恰巧采购部的人出差了，主任临时选中了他。在伦敦出差期间，柯罗捷耶夫结识了英方一位职员，两人交谈甚欢。英国人说，公司马上就要派他去俄罗斯，在英国公司驻俄莫斯科分公司工作。柯罗捷耶夫说，读大学的时候自己就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热心参与学生会工作，早已是“民主和保护人权发展中心”的资深成员。两个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在这个场合再次见面他们没有像熟人那样热情地打招呼，只是如初次见面一样礼貌地点点头，这是他们事先约好的。在伦敦见面的时候，这名英国人就与柯罗捷耶夫约定好，他们到俄罗斯公司登报招聘员工，柯罗捷耶夫马上电话报名，其他的事就交给他办。

面试自然顺利地通过了，柯罗捷耶夫很快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待遇很优厚。柯罗捷耶夫喜形于色，觉得自己真是遇上贵人了。

柯罗捷耶夫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搜集莫斯科各类社团组织的活动情况、人员组织状况、资金来源渠道等，以及公司临时委派的工作任务。公司给他配发了专用的掌上电脑，规定了信息收集、整理和发送等一整套操作方法。

柯罗捷耶夫十分看重这份工作，根据公司的工作要求制订出详细的计划，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首先，他与早先熟悉的很多社团成员恢复了联系，包括一些仍热心社团活动失去联系多年的大学同学。他的工作颇有成效，两三个月就收集了不少信息，经整理分类存储在笔记本电脑里。发送信息更简单，他只要带着掌上电脑去市郊休闲小公园，如同普通游客在公园随意散步，打开掌上电脑，接通电脑特设的链接，再点击一下“发送”，整个过程几秒钟就完成了。在培训试用期，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除300美元工资，英国朋友另外发给他700美元奖金。

柯罗捷耶夫有文质彬彬的外表，初次见面给人感觉不错，加之他善于交际，出手大方，在社团组织圈内有广泛的人脉，很快形成了一张由新老朋友组成的关系网。朋友们源源不断地提供信息，柯罗捷耶夫隔不了多久就去小公园一趟。为增加发送频率，他有意将大量资料分成多次发送，以表现自己工作的勤奋。这样，英国公司的奖金也源源不断。

柯罗捷耶夫的信息发给谁？这些信息做什么用？柯罗捷耶夫不知道，他没有问过，公司也没有说明。其实，柯罗捷耶夫是在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他已经成了英国人的间谍。

柯罗捷耶夫常去的那个公园是莫斯科临近郊区的一处街心公园，园内坡地上长满青草和荆藤，四处散落着各种大树，一看就知道这座小公园有些年头了。2005年仲秋的一天，英国驻俄使馆一等秘书马克·德伊斜挎只休闲帆布包，像其他游人一样悠闲地在公园里漫步。最后他随意地在一丛灌木前的草地上坐下，拿出笔记本电脑摆弄，敲动着键盘像在写东西，又像在玩什么游戏。他站起身又在公园闲逛了几分钟后，若无其事地离开街心公园，跑步回到英国大使馆。

马克·德伊在驻俄大使馆公开的身份是一秘，私下里代表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与俄罗斯非政府组织联络工作，并以“全球财力基金”的名义和身份向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通过马克·德伊得到资金的有“反刑讯委员会”、“民主和保护人权发展中心”等许多俄非政府组织。

英国驻俄使馆工作人员克里斯托弗·皮特也经常到街心公园，举止行为和时间与马克·德伊一模一样，甚至行走的路线都一样。

常去公园的还有32岁的安德鲁·弗莱明格，英国驻俄使馆档案管理员。这一天，刚下过一场小雨，地上仍然湿漉漉的。他戴一顶太阳帽，穿件蓝色运动衫慢步走进街心公园，在小道上走了几圈，突然快步朝一丛灌木走去，迅速环视四周，见没有人便钻进灌木里。他弯下腰，在地上的枯叶中拿起一块石头，迅速放入肩上的小背包。一会儿，弗莱明格走出街心公园，打车回英国大使馆。傍晚，弗莱明格又返回街心公园，从背包里取出石头，放回灌木丛里。

柯罗捷耶夫在英国公司越做越顺，公司老板对他很满意。不久，英国老板交给他一件新工作，这是一

项美差。柯罗捷耶夫是民间社团组织“民主和保护人权发展中心”的早期成员，但一直不算核心人物。英国人告诉他，公司希望“民主和保护人权发展中心”有效发展，决定为其提供赞助，由柯罗捷耶夫出面联系协调此事。有人给钱的好事，“民主和保护人权发展中心”当然求之不得。钱是柯罗捷耶夫弄来的，会员们对柯罗捷耶夫充满敬佩，这使他在“民主和保护人权发展中心”的地位飙升，很快进入领导层。柯罗捷耶夫在社团组织中地位的提高反过来对他搜集社团组织各种信息更有帮助，信息质量和数量都得到明显改善，柯罗捷耶夫的个人收入自然也大幅增加。

社交场所活跃的柯罗捷耶夫引起俄罗斯安全部门的注意。安全部门对他进行了监控，发现柯罗捷耶夫经常出入街心公园。

当时俄罗斯联邦的大环境是，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加紧了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进行民主意识渗透，他们大力支持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通过社团组织对独联体国家进行民主改造，培植反对派，影响选举。这些非政府社团组织的活动经费有的直接来自西方国家。莫斯科大约有四五万个民间组织，其中四分之一

接受了西方资金。

西方国家的险恶用心引起莫斯科的高度警觉，俄罗斯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外国驻俄人员的监视。马克·德伊、安德鲁·弗莱明格等英国人的频频外出行为也进入俄罗斯反间谍部门的视野，结果发现他们都常去同一个街心公园。联想到柯罗捷耶夫的种种行为，俄罗斯安全部门判断公园里肯定有问题，但他们去街心公园没有和任何人接触，到底去干什么？安全部门决定先秘密逮捕柯罗捷耶夫。

审讯中柯罗捷耶夫招供了他知道的全部事实，以及他被英国人招聘的整个经过，并把英国公司配给他的掌上电脑等工具交了出来。当时，不仅是他不知道这是进行间谍活动的最新电子装置，安全部门的情报官员在柯罗捷耶夫身上也没获得直接有力的证据证明英国大使馆人员进行间谍活动。

间谍实况录像

俄罗斯安全部门加大了监控力度，重点仍然放在街心花园。

一天，弗莱明格背个双肩休闲包又来到街心公

园，跟踪的特工看见弗莱明格钻进灌木丛拿起一块石头放进包里。弗莱明格离开后，特工特地去灌木丛察看，地上除了散落着几片枯叶以外没有什么可疑东西。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弗莱明格又到了街心公园，又是钻进了灌木丛捡石头。细心的特工再次钻进灌木丛察看，发现地上多了块石头，也就是说弗莱明格把拿走的石头又放回来了。特工将石头拿回去翻来覆去地检查，发现与普通的石头没有不同的地方，为免打草惊蛇，他把石头放回原处，立即赶回局里汇报。

俄罗斯安全局感到其中必有隐秘，于是决定利用夜晚时间对石头进行秘密检查。他们把石头搬到实验室仔细研究。从外形上看它与普通石头没有什么两样，用手掂掂感觉分量上稍轻些，再用手指轻轻地弹石头，从声音上可以听出石头中间有空洞。石头涂有特殊的密封胶，不透气。后来，通过X光透视发现了其中的玄机：石头中间被挖空，里面塞满了各种电子装置，有电子发射器、加密情报接收机、蓄电池、特种保护装置，如防止石头受潮的干燥器等。俄罗斯安全局专家认为，这块石头是一种新型的间谍工具，操作

起来非常简单。

至此，俄罗斯安全局弄清楚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英国情报人员招募的线人柯罗捷耶夫在约定时间来到街心花园，怀揣一台普通的掌上电脑，走过石头时电脑会自动处理信息，把情报传送到石头内的电子接收装置，存入电子间谍档案。几天后，英国情报人员来取情报，利用红外线下载功能，同样能将石头内的情报传输到掌上电脑上。俄罗斯安全局专家透露，“石头”传递情报速度极快，在20米距离内1~2秒全部搞定，顺畅无阻。

显然，石头中的电子装置似乎还不够完善，工作不太稳定。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英国使馆档案保管人员弗莱明格才经常在这一地区出没，带着电脑从各个方向接近石头，好像在调试设备。在确信旁边没人时走近石头，小心翼翼地将它拿走。

为拿到有力证据，揪出“石头”的真正主人，俄情报部门仍然将间谍石头送回原处，除了反间谍人员的跟踪监控外，在灌木丛对面的大树上安装了摄像头。联邦安全局对公园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监视，拍录下了英国驻俄使馆一等秘书马克·德伊、英国驻俄使馆档

案管理员安德鲁·弗莱明格等4名英国人伪装成大学生模样，背着挎包，像赶路一样快步走过石头，收取情报的场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拿到证据后，由于对方享有外交豁免权，并没有立即以间谍罪逮捕4名英国外交官，而是借用电视媒体给予了曝光。

2006年1月22日晚，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特别报道”节目播放了一段录像带，详细记述了英国间谍从事间谍活动的实况录像。画面上清楚地显示了弗莱明格走近石头接收情报的场景。俄电视台主持人不无讽刺地说：“瞧，这次这个东西不好使了……如果没有信号，他就只能一次次地重复走下去。”另一个画面显示，有一次，他干脆把石头抱走，带回大使馆进行修理。

当画面出现马克·德伊的身影，节目主持人解释说：“瞧，他开始走近石头，怀揣掌上电脑。你们将看到加密情报是如何传递或接收的。不过，这次这个间谍工具似乎不好使了，他先是朝一个方向行走，然后拐到另外一个方向。显然，他没有成功。之后他走到灌木丛里，似乎是在小解，实际上是在掩饰自己的行动。然后再次走近石头，重复一次。”

最后节目主持人介绍说：“国家安全部门最初以为

这是一个传统的普通间谍工具，伪装成石头的情报箱。但是，后来经专家研究发现，石头内隐藏有电子装置。去年底，俄联邦安全局反间谍人员成功挖出一伙以英国使馆为掩护的英国间谍。反间谍人员发现了英国人这种非同寻常的间谍工具。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间谍工具，据联邦安全局透露，4名英国外交官中至少有1名与很多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有联系，并向这些组织支付资金。该组织在2004年接受了英国驻俄罗斯使馆2.3万英镑的捐赠，当时签署捐赠协议的正是马克·德伊。”

对于俄罗斯情报部门的指控，英国外交部发言人1月23日称：“我们对此感到担忧和惊讶，对间谍指控表示吃惊。我们与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并没有间谍性质。英国否认任何与俄罗斯非政府组织有不恰当的关系。”该发言人同时表示，英国政府确实对俄罗斯的人权组织提供过资金援助，但所有援助都是公开的，而且是为了俄罗斯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为了对非政府组织实施严格的控制，防止国外势力资金介入颠覆俄罗斯政权，2005年12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非商业性组织管理法》，并由俄

罗斯总统普京于2006年1月10日签署生效。此外，普京总统还签署了《非政府组织法》，上述法律有效地限制了俄罗斯非政府组织与外国势力的交往活动，社会组织不得随意接受国外机构的援助。

俄罗斯电视台选择这种时间播放英国间谍从事间谍活动的实况录像，英国负责俄罗斯问题的专家认为，该期节目是为迎合普京总统的该项法案，警告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在接受国外援助时必须谨慎小心。

附录一：克格勃概述

2010年3月29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卢比扬卡与文化公园地铁站相继发生爆炸，这两起恐怖分子所为的事件导致30余人遇难，60余人受伤。提起卢比扬卡，人们立刻会想到苏联的克格勃，因为这里曾是苏联克格勃总部的所在地。如今，卢比扬卡是俄联邦安全局总部的所在地，是俄罗斯强大的特种勤务机关的中枢，担负着保卫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

克格勃系俄文“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词缩写的译音，1954年3月13日成立。1991年苏联解体，克格勃于同年12月解散，原克格勃第一总局独立出来，成为直接归属俄联邦总统领导的独立情报机构，即目前的“对外情报局”。

克格勃（KGB）的职权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相当。克格勃以实力和高明而闻名于世。在苏联时期，克格勃的影子在国内随处可见；在国外，克格勃的特工渗透到各个角落，从事各种秘密活动。在世界间谍大战中，也只有苏联的间谍组织在规模、设备装置、人员编制以及活动能力上与美国不相上下，在部分领域甚至超过美国同行。“冷战”时期，世界上只有两个情报机关拥有全套现代化搜集情报的能力，其中一个是美国的情报机关，另一个就是苏联的情报机关。在20世纪的国际间谍大战中，克格勃是唯一有实力与美国间谍机构争夺天下“老大”的情报机关。

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一度达到50多万人，总部机关有1万人，间谍、反间谍和技术保障等部门有20多万人，边防军有30多万人。在苏联国内有150多万线人，在国外有25万情报人员，年预算为100亿美元。

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布）中央领导认为，对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包围不仅远远没有被打破，而且，二战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更加广泛的反苏阵营，攻击新生政权苏维埃的方式变得更加隐蔽、狡

猾，更具有国际背景。为更加卓有成效地打击隐蔽的敌对活动，必须建立一支从个人素质、组织体系到技术保障等方面能够胜任这种特殊斗争的队伍。这支队伍要比“契卡”更加精干、更加隐蔽、更加灵活和更加有效。在这样的背景下，1922年2月6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契卡”组织，成立国家政治保卫局和民警机构。

苏俄国家政治保卫局接收了“契卡”被撤销后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归属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范围与“契卡”相比受到很大的限制，再没有独立处决罪犯的权力，但它仍然同“契卡”一样散布于全俄社会的各个重要部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成立后，国家政治保卫局改为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平级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并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中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主席保留一个固定的席位。

1926年捷尔任斯基病逝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由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夫维奇·明仁斯基领导。2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斗争形势的复杂变幻和苏联国内政局的发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范围和其在国家政权

机关中的地位又渐渐上升了。

1930年4月7日，苏联颁布一项法令，把苏联的边防部队和在各地设立的众多劳改营也划归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同时规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可以使用各种方式参与对苏联新闻、出版、电影等各种媒体的监督和审查。

1934年7月10日，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改组为国家安全局，其职责包括对内进行政治监督、对外进行反间谍渗透和情报侦查，这个秘密警察组织再次归属于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1936年，雅戈达因“不能胜任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党集团的斗争”被斯大林免去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不久，雅戈达被指控为反革命杀人犯和外国资产阶级的间谍，经过司法公开审判后被他当初的下属枪决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继任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职务。此人个头矮小，行为诡秘，有人称其“冷血侏儒”。他吸取前任肃反不力最终名败身亡的教训，运用斯大林赋予的几乎是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庞大而高

效的组织体系对苏联的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整肃，开展揭发党和革命的敌人的告密运动，弄得整个苏联人人自危，对谁都不敢相信，包括自己的家人和最知心的朋友。

1938年，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贝利亚接任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贝利亚上台后首先将叶若夫时期重用的助手和亲信清理出内务人民委员会。1939年2月，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批评内务人民委员会滥施职权致使以肃清十月革命以来混入苏联共产党内异己分子为目的清洗运动无限制地扩大化的错误》的决议案，责成贝利亚对前一时期内务人民委员会所做的工作进行调查。这样贝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清除异己的行动也就名正言顺了。1939年3月，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贝利亚当选为政局候补委员。

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国家安全总局和总参谋部的情报总局联手，继续加紧向苏联境外派遣和发展情报人员，编织跨国间谍网。同时在贝利亚的支持下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消灭间谍局”，具体负责对内侦查和防止国

外间谍的渗透，对外负责对敌后进行侦察和破坏。另一方面还负责向敌对国家派出间谍搜集情报。在卫国战争中，消灭间谍局在苏联军队各方面军中都设立了派出机构和特派人员，在后方和敌占区也活跃着无数为其工作的组织。1942年，消灭间谍局正式交由最高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总局领导。

1943年4月，国家安全总局再次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分离出来，名称仍然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1946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正式成为苏联两个部一级的政府机构，名称也从此改为苏联内务部和苏联国家安全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国家安全部被撤销，其工作被并入贝利亚兼任部长的内务部。

贝利亚被处决后，1954年国家间谍情报和安全工作从内务部中分离出来，成立形式上隶属苏联部长会议，实际上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并由苏共总书记直接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工作计划由政治局批准，重要问题直接向政治局报告，日常工作由苏共中央书记处领导。这就是克格勃。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任克格勃主席。从此苏联情报组织体制也就基

本定型了。

1958年谢列平出任克格勃主席，以后的几十年中，克格勃领导人多次更迭，机构人员不断扩大，从国内到国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在苏联国家政治体制中占据重要地位，曾被誉为“国家的栋梁”。克格勃全盛时期遍布全球的间谍达9万多名，安插在国内各级权力机构的特务不计其数。同时，克格勃负责克里姆林宫和政治局首脑的安全警卫。克格勃的权力大于任何一个党政机关。

克格勃规模庞大，机构复杂，组织结构十分严密。克格勃委员会下设4个总局，分别是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总局，7个直属局，6个直属处，形成一个局中有局、处中有处的庞然大物。

第一总局是对外情报侦查部门。负责指挥苏联在国外的除军事间谍和重大政治阴谋之外的所有活动。通过派遣到世界各国的驻外人员和秘密潜入到别国的间谍、情报人员进行搜集情报、窃取秘密或破坏、颠覆等活动。总局下设3个分局，2个特别所，16个常规处：

科技情报局（T局），主要任务是从苏联各地的理

工院校选拔一些高才生送进克格勃情报学校，结业后分配到T局工作。T局不仅有权决定出席国际会议的科学家人选，而且还派员随团出国，他们大部分以外交官、科学顾问、公司代表等合法身份为掩护从事科技情报搜集活动。此局下设4个处级单位：情报所、反间谍所、假情报处、行动处。

秘密活动局（S局），主要负责间谍情报人员的选择和培训，并派遣以伪装身份潜入他国的克格勃特工进行秘密活动。

分析研究局（I局），它是间谍情报活动的科研机构，负责研究、分析、总结间谍情报活动的经验、规律，并提供间谍情报活动的技术性设计和原则，以求指导和不断改善间谍情报活动。

此外，第一总局还设有若干个直属处，负责对某国或某地区的间谍情报活动，如美国处、英国处、拉美处等等。或是按业务性质划分负责某种专项业务的直属处，如负责炮制、伪造各种假情报的假情报处；负责暗杀、绑架的行动执行处；负责为情报人员提供在外国进行间谍情报活动所需掩护手段和技术性措施的掩护处；负责提供间谍情报活动技术工具的工具处

等等。

第二总局，又称国内防谍局。主要负责管理、监控在苏联境内的外国人，对各国驻苏使馆人员以及其他外国人进行侦控，并对某些外国人进行收买、策反，以对抗外国的情报和间谍活动。苏联很多导游、翻译、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这个局的成员。

国内防谍局下设12个有编号的处，其中有6个处是负责对付外国驻苏的外交人员的。另外6个处则分管外国游客、外国通讯社人员、外国留学生、外国商人、外国海员和申请出国的苏联人、电脑工作人员以及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中重大的贪污、贿赂等案件。此外还有一个政治安全机构、一个工业安全局和一个技术支持组。

第四总局，又称边防总局。负责指挥和管理一支属于克格勃的边防军，这是一支人数三四十万，装备精良的海陆空部队。克格勃通过这支边防武装力量控制全部陆、海边境，负责陆、海边境的警戒和巡逻，进行出入境检查，搜集邻国情报，对国外敌对目标进行破坏、颠覆和组织武装叛乱等活动。该局下设10个边防军区。

第五总局，又称秘密警察局，成立于1969年。主要负责取缔打击反苏分子的组织 and 活动，消灭政治上的异己，监控国内人民的反抗，加强对居民的控制，监视国内的知识分子。五局下设5个部（局）1个处。分别控制管理苏联国内的宗教信仰、民族矛盾、大俄罗斯主义等问题。1990年，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撤销了第五总局，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宪法保卫局。共有20个处，主要分管情报、反情报、假情报、行动执行、伪装、联络通讯、假护照、档案、人事等工作。

克格勃7个直属局：

军队监察局，该局下设12个处，主要任务是通过监视陆海空三军，搜集各方面情报以便掌握、控制军队，防止发生政变或其他越轨行动。

监视调查管理局，负责训练克格勃官员和专职间谍。全局拥有3500多名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专门进行跟踪、监视等间谍活动。

通讯管理局，负责通讯联络、通讯密码的制定和翻译，掌握着苏联同国外工作人员之间的一切密码，控制一切相关的通讯、侦查等现代化设施。

技术管理局，负责制造和供应间谍活动的工具和

仪器。拥有一大批科学家秘密研究制造各种化学药品、毒品和杀人器械等。

警卫管理局，负责保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等党的高级干部及政府部门的安全，并严密监视和这些要人接触过的机关及人员。

工业机关保安管理局，主要负责保卫重要研究中心、特殊生产机关和机要部门的安全，下设6个部，分管重工业、军火工业、核研究中心、对外贸易、外商、外国海员等部门。

人事管理局，这是克格勃组织的神经中枢，直接受苏共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领导，负责克格勃的人事调动和吸收新成员。

克格勃6个直属部：

特别调查部，主要负责对克格勃和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格鲁乌）各级领导人的调查，办理相关专案，每个专案都要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亲自过目。

国家通讯部，负责控制国内全部电台、电视台等资讯系统。

保密检查部，负责保卫克格勃总部的安全，防止

内奸和泄密行为的发生。

经验核对部，负责对苏联国内外间谍活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和综合评估。

财政经济部，负责克格勃的财政预算和开支，掌握克格勃的财政经费。

档案登记部，又称档案中心。负责克格勃的全部档案，并随时将其综合、整理，编出索引。除此而外，还负责管理培养间谍的学校。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资料部门。

除了以上总局、局、部、处等组织机构外，克格勃还设有几个特殊的部门：

驻外情报站。站下设5个科：情报科、反间谍科、科技情报科、潜伏支援科、行动破坏科。克格勃为开展国外的间谍情报活动，在苏联驻各国的使馆内都设立了驻外情报站，其活动由第一总局领导。

特别后备队。这是克格勃内部专门以文化、贸易活动为掩护从事间谍活动的部门。

“信号旗”秘密特种部队。“信号旗”在机构上归克格勃第一总局管辖，直接听命于第一总局局长，是该局的一个特别行动处。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敌人的大后

方从事侦察情报活动，破坏敌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目标。动用“信号旗”必须经政治局同意。每一位“信号旗”战斗人员都必须掌握跳伞技能，学习格斗，能够熟练使用国内外的各种轻型武器。1992年1月，“信号旗”划归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安全部。此外，总部还设有两个特殊的部门：一个是高级俱乐部，一个是戒备森严的卢比扬卡监狱。

苏联克格勃拥有许多特权。克格勃主席在党内身居要职，他们既是国防会议成员，又是政治局委员，比任何其他部门的领导人都有更大的影响。他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国内安全部队，并控制着全苏情报系统源源而来的情报。1978年，克格勃从部长会议下属的委员会升格为国家一级的委员会，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力。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克格勃第四任主席安德罗波夫一跃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克格勃也走到了末日，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本是安德罗波夫最得意的接班人。他能够在克里姆林宫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靠的就是克格勃的全力支持。但是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克格勃不断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和

非难。

“8·19”事件后，克格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克留奇科夫被捕入狱。8月24日开始，戈尔巴乔夫成立了以巴卡京为首的领导班子，对克格勃进行了彻底改组。主要是削减职权，撤销一些机构，大批裁员和罢黜官员。特种部队被移交给军队，警卫部队由总统直接管辖。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后，其安全机关也受各自共和国管辖。俄罗斯曾是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唯一没有设立克格勃的共和国，这样苏联克格勃就全部移交给了俄罗斯联邦，苏联克格勃的总部大楼就变成了俄罗斯联邦克格勃总部大楼。

1991年10月，苏联国务委员会做出撤销克格勃的决定，在原克格勃的基础上成立了3个各自独立、各司其职、机构平行的间谍情报机关：

对外情报局，第一任局长为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该局负责国外情报的搜集、分析和综合。

联邦安全局，第一任局长为瓦季姆·巴卡京。该局负责反间谍、反恐怖活动、反毒品走私、反贪污以及同有组织的犯罪作斗争。

保卫国界委员会和边防军联合司令部，第一任司

令为伊里利·卡利尼琴科。该机构负责边界保卫及其协调工作。

至此，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情报机关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终结，克格勃已不复存在。但克格勃带给人们的神秘感，以及遍布全球、无孔不入的间谍故事，依然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去窥视其中的秘密。

附录二：克格勃名称的变更

~~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

~~国家政治保卫局~~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国家安全总局~~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国家安全总局~~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

~~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部~~ 10月对外情报机构归情报委员会管辖）

~~内务部~~ 3月

~~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

附录三：克格勃历任主席

~~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 1894-1946年任斯基 （“契卡”）

~~维亚切斯拉夫·鲁道夫维奇·明仁斯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亨里希·格列戈里耶维奇·雅戈达~~（内务人民委员会）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会）

~~拉夫连季·伊万诺维奇·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会）

~~弗塞维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

~~拉夫连季·伊万诺维奇·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会）

~~弗塞维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 / 国家安全部）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国家安全部）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国家安全部）

~~拉夫连季·伊万诺维奇·贝利亚~~（国家安全部）

~~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国家

安全部)

伊万·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谢列平(克格勃)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谢米恰斯特内(克格勃)

弗拉基米尔·安德罗波夫(克格勃)

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费多尔丘克(克格勃)

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克格勃)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克留奇科夫(克格勃)

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巴卡京(克格勃)

附录四：俄罗斯（克格勃）间谍学校

为了培训出世界一流特工，克格勃曾组建了200多所间谍学校，培养出数以万计的情报人员，这些情报人员或散布在苏联各地，或渗透到世界各个国家。苏联解体后，闻名于世的克格勃分为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克格勃下属的庞大的间谍学校网也相应缩小了规模，但所保留下来的各类间谍学校仍继承着克格勃时期的独特训练方法。两个局各自拥有专门的间谍学校，培养从事间谍和反间谍的专业人才。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负责培养和向国外派遣间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则负责国内的反间谍工作。俄对外情报局所属的间谍学校大都位于非开放地区，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些学校都严格保密，当地的老百姓即

使在那里生活多年也不知道那里有一所间谍学校，外人也根本无法进入，因为学校的外围有安全部门的精锐部队驻守，整个学校都在严密保卫之下。没有特别通行证，谁也别想跨进学校的大门。

这些高级间谍学校录取新学员的条件近乎苛刻，要求非常严格，要经过层层审查。学员正式录取前一般都已经接受了三至四年中低级间谍学校的培训。整个中低级间谍学校的培训是这样的：

克格勃选中的培养对象，先进入基础培训学校进行考察和筛选，学员主要接受思想意识方面的教育。在整个基本训练的过程中学校竭力让学员相信：他们已经被物色为把党的事业作为终身职业的人。典型的基础培训学校如设在高尔基城的马克思恩格斯学校。进入这一学校的学员必须接受为期4个月的基础课程训练，课程包括世界工人运动史、苏联共产党历史。在这段时间里，学校除了对学员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使其养成听从指挥、遵守纪律的习惯之外还要摸清其思想倾向，了解其特长，确定其是否适合从事错综复杂的谍报工作。进入马克思恩格斯学校的学员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要从事谍报工作，只知道他们已经被党组织

选中，将来要成为党的行政人员。

训练结束后学校即能确定每一个学生将来适合做什么工作。第二阶段的训练随即开始，这一训练是在维尔霍夫诺耶（离喀山90英里）的列宁技术学校进行。在12个月的训练中，学员开始接受实际谍报工作训练。为期一年的训练从一个月的体育锻炼开始，目的是把学生锤炼得“钢铁般坚强”，内容包括爬坡、攀登、越野、游泳。即使在训练中发现有学生不适合做谍报工作，这种艰苦训练还是能使他们受到锻炼，以胜任别的工作。

体育锻炼课程结束后是自卫术的训练，如柔道、徒手自卫术和其他方式的攻守技术，各种武器的分解和组合，熟练的射击技术，爆破器材的使用，如何自制炸弹和地雷。从这个阶段开始，学员们要接受谍报工作训练，如微缩技术、摄影技术、麻醉药的使用，如何在酒、巧克力、食物和香烟中放置毒药，每种药品发作时的临床症状等等。

通讯技术也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学员们要学习使用录音机和收音机、微型收听器、收发报机，掌握基本的密码学和密码解读方法。经过一年培训后通过一

系列的考试，受过严格训练的学员最后都能如期毕业。但即便是成绩最好的学员也不一定被安全机构录用，只有那些被认为“适合到国外工作”的学生才会到莫斯科总部去接受量才录用的考查，那些被认为适合在国内工作的学生，则被直接分到克格勃总部。经过前两个阶段情报训练的学员只是情报机构的基本工作人员，还不具备到国外从事谍报活动的能力。派到国外活动的特工必须接受高级情报学校的培训。通常只有最受信任、最有前途的特工才能进入高级情报学校。

进入高级间谍学校前要做许多行为和心理测试，主要看他是否具备成为一名派往国外特工的基本素质。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列别捷夫曾说：“如果哪位候选人加入时第一件事就谈钱，那么我们会对他说，你来错了地方。这种人今天在为我们工作，明天就会变节，给出价更高的雇主卖命。”安全机关进行初步筛选，然后经过考试由间谍学校决定是否录取。

新学员被录取后，进校门的第一件事是彻底更改个人资料，包括间谍学员的姓名、年龄、出生地、爱好以及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职业、姓名等，对他们而

言，做情报工作不仅仅是选择了一个职业，而且还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重新生活，彻底从自己原有的生活中消失。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所属的高级间谍学校中规模最大、课程设置最多的当属卡兹纳间谍学校。卡兹纳间谍学校坐落在俄罗斯古比雪夫东南约100公里处，校园面积为42平方公里，整个学校如同一个规模不小的城镇，但在地图上无法找到间谍学校的任何标记。校区被划分成若干个区域，分成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区域，每个区域都按照该国的某个社区模拟设置环境。区内的所有商店、储蓄所、建筑物、餐厅、电影院、宿舍楼等，全部按照模拟城市社区的风格设计和布置。区域街道上跑的车辆、人行道上走的行人、值勤的警察等与所在国某街区完全一样。比如是在英国区域，那么商店里摆满了英国的香烟、服装、食品和其他日用品，还有英国出版的《太阳报》等各种报纸，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使未来的间谍对伦敦的生活习以为常。他们跟英国的居民一样住在酒店、旅馆、公寓、别墅里，完全处在一个跟英国城镇毫无二致的环境之中。这里的男女可以交际，但有

一条：任何时候不能说出半句俄语来。酒店的招待员、商店的售货员，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人都是通过特殊途径从国外直接聘请来的。这样的环境对于学生的培养自然是相当有利。总之，学员生活学习在其中，仿佛真的走进了某一个英语国家，融入其社会之中。俄罗斯人称这样的间谍学校为“间谍城”。走进间谍城，就像来到了万国建筑博物馆，里面尽展各国风情。

卡兹纳间谍学校也是最奇特、最神秘的间谍城之一。该校的学员都是从全俄高等学校的学生中选拔的，首先经过严格的人格操守审查，个人行为不能有任何污点，个人档案和家庭背景也不允许有任何疑惑不清的地方，学员除了健康的体魄和敏锐的头脑外，外表、气质也必须与所要去从事间谍活动的国家公民十分相似。

学员入学后，根据录取的班级国（以国划分，如美国队）进入该国区域中学习和生活，学习的过程是较为漫长的，一般需要5~10年。卡兹纳间谍学校设有侦查、反侦查、技术（密码破译和无线电通信）、军官进修轮训和外语等专业。在特工业务课程中学习时

间最长、要求最严的是“电报术”和摄影，因为发报、解除密码、加密、拍照等是特工最基本的技能。而外语是他们的公共课，是必须熟练掌握的基本功，学员毕业时至少精通3门以上外语，其中对象国语言的口语水平要达到与自己母语一样娴熟和地道的程度。

在众多的间谍专业课程中，擒拿、格斗、驾驶、爆破、射击、犯罪心理学、侦查等都要求样样精通。此外，“暗杀”课程早在克格勃时期就被列为间谍学校的主要课程之一，克格勃行动执行部专门负责政治谋杀、绑架和破坏等活动，因其活动充满血腥，往往是鲜血飞溅，所以在内部被称为是干“湿活”的。上这门课有其本身的特色，授课内容、时间都较其他一些课程不同。为了让学员易于理解接受内容，学校运用了多种形式，除放映教学观摩影片外还放映一些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相关故事片，并请克格勃对外谍报局行动执行部的暗杀专家来讲解、分析他们亲自参与的谋杀行动。

学员的毕业分配是秘密进行的，采取单独通知的方法，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动向。一部分人进入俄罗斯外交、外贸部门，以合法的身份进入工作国。很大一

部分人冒充对方国的公民，秘密潜伏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此时，他们已经彻底忘记自己是俄罗斯人。

除针对英语国家的加兹纳间谍城外，苏联还建立了针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间谍学校，如针对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的“契他伊斯卡雅”，针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沃斯托奇纳亚”，针对非洲国家的“诺瓦亚”，针对东欧国家的“索尤兹纳亚”，针对西北欧国家的“普拉霍夫卡”等等。

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东北70英里处的普拉霍夫卡学校，其北部负责培训派往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的特工，西南部负责培训派往荷兰的特工，南部培训派往奥地利和瑞士的特工，东南部培训派往德国的特工。如加兹纳间谍城一样，普拉霍夫卡学校的每个区布置得同指定国家一样，并按照加兹纳间谍城的原则训练学员。格鲁乌设有非法派遣特工培训中心，但中心并没有固定的处所。

苏联叛逃者苏沃洛夫说，苏联叛逃者中没有一人能说清这个非法培训中心的所在，原因就在于它分散在格鲁乌的各个安全房屋里。这样的安全房屋遍布莫斯科地区，隐蔽在其他建筑物中间。房屋内部的陈设

与非法派遣特工即将潜伏的工作环境十分相似。他的全身穿戴、吃的食品、抽的香烟甚至刮脸刀都是从目标国进口的。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部录音机，连续不断地播放着对象国家的广播新闻。从受训的第一天起，非法派遣特工就必须阅读对象国家的报纸、杂志，欣赏对象国家的电影。他的教官大都是前非法派遣特工，他们看同样的报纸，听同样的广播，努力引导受训者熟悉即将潜入的陌生环境。经过若干年培训以后，受训者将记住对象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它的每一支足球队组成、每一家饭店和夜总会的营业时间，尽管他还没有到过这个国家。

近年来计算机网络迅速普及，间谍学校强化了电脑网络培训，学员们个个都是电脑高手，随着英美特工纷纷利用网络从事间谍活动，学校还专门开设了“电子间谍”方面的课程。要培养一流的特工，需要实力雄厚的师资力量，俄罗斯安全机关下属的间谍学校汇集了各类顶级专家，他们在继承自己独特的培训方法的同时，还大胆借鉴英美两个国家的间谍训练经验，培养出了大批技艺精湛的高级情报人员，为维护国家安全以及获取外国重要情报做出了特殊贡献。

此外，“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大打间谍战，苏联需要更多数量的特工。克格勃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改革了间谍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推出了“谍报人员速成班”。这种“速成班”简化、删除了原先的部分内容，将完成学业的时间定为12个月。为便于教学，“速成班”采取集体教学方式，所以招募学员也是一次性进行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立了对外情报局和联邦安全局，对原克格勃进行了改组和裁员，造成苏联特工部门的人才严重流失，大批原克格勃官员成为社会上甚至国外安全机构炙手可热的“抢手货”。他们有的成了职业杀手，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利用特长创办私人保安公司，还有的则被西方财团、公司、科研组织甚至情报部门聘用，公开搜集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里的情报。由于这些人原来长期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掌握侦查与反侦查的技术，个个都是窃听等领域的专家，所以联邦安全局很难真正控制他们，这也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了隐患。

负责国内安全工作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情报学校相对少一些，该局下辖一所侦查学院和5所短期进修

学校，主要培训在国内活动的安全人员。分别位于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新西伯利亚、圣彼得堡、叶卡捷林堡等地。以情报侦查学院为例，该学院主要培训高级情报人员和管理干部，设有侦查、反侦查、技术（密码破译和无线电通信）、军官进修轮训和外语等5个系，如果招来的是中学生则要在这里学习5年；如果是大学毕业生则学习2年。招生时，考生向当地安全机关报名，由地方安全机关进行筛选，经过考试由学院决定是否录取。这里的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学院的条件非常好，愿意报考的人非常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级潜伏：前苏联克格勃绝密行动 / 程景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17-2636-4

I. ①超… II. ①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②克格勃—史料 IV. ① I25 ② D75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6442号

超级潜伏——前苏联克格勃绝密行动

作 者 / 程 景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孙东博

封面设计 /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8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23.75

字 数 / 250千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45.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36-4

无敌较量——英国情报组织绝
密行动

前 言

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构中，英国的情报机构可谓是“百年老店”——从1909年改组至今，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如果要上溯到16世纪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最早的情报机构，那就有近500年的历史。所以说，英国情报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情报机构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这种机构的“开山鼻祖”。

英国情报机构也是最神秘的机构，它一直秘而不宣，其组织和行动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比起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以及中情局，还有前苏联的克格勃，英国情报机构的透明度小得多。原因就是英国人似乎都崇尚“绅士风度”，对这种偷偷摸摸的行

为自然难以启齿。但是，自从小说《007》问世后，弗莱明就把一位充满魅力和冒险精神的英国间谍介绍给了这个世界；而影片《诺博士》公映后，又让詹姆斯·邦德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让地球人都知道在那个雾蒙蒙的英伦三岛，有一种从事这种职业的人。所以说英国情报机构既是最神秘的，又是最公开的。

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构中，英国情报机构的发展和演变也是头绪纷繁、复杂多变的。经过百年的变迁和多次整合，其变化的轨迹也呈多元发展，其演变过程漫长而又复杂。

早在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就创设了秘密情报机关，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于1855年在军队中建立了地形测量和统计局，这是英国现代情报机关的雏形。

但是在维多利亚执政时期，英国对情报工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英国女王认为她的海军霸权地位完全能够维护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因此，就把情报工作交给那些外交官

和领事们来做。尽管从1887年开始，大英帝国设置了军事情报总局，在军队内创建了海军情报局和陆军情报局，并且在1893年将地形测量和统计局改名为情报署，但是由于历史的偏见，英国情报机构一直形同虚设，作用不大，直到布尔战争失利之后，英国人才开始认识到情报的重要性。

布尔战争发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时随着英国殖民主义势力的不断扩张，非洲大陆成了它觊觎的目标。当英国的军队入侵非洲后，那些最早来到南非的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不得不大规模地向东北方向迁徙，让出自己的殖民地，并在19世纪30年代，建立了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自从在南非发现钻石矿和金矿之后，英国垄断资本迅速获取了惊人的利润，让当地的布尔殖民主义者分外眼红，为争夺采矿权，他们和英国人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而且愈演愈烈。

1899年10月11日，当布尔人企图获得南非开矿权的要求再次被英国人拒绝后，布尔人就开始向大英帝国宣战——布尔战争由此爆发。

战争初期，布尔人主动发起猛烈攻势，英国军队由于过于轻敌，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12月13日，英军在科伦索对布尔人展开了激烈反击。当时英军指挥官布勒将军的进攻计划是兵分三路，全线出击，并且明确了三路英军最终会合的地点。但是，由于布勒将军发给三路英军指挥官的地图出现了错误，标错了最终会合点的位置，结果使这个攻击计划漏洞百出，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同时，由于情报工作的疏忽，布勒将军对布尔人的兵力部署和行动意图一无所知，三路英军不是找不到进攻的目标就是中了对方的埋伏，最后导致科伦索战役以英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英军损兵折将，伤亡两千多人，几百人失踪，而布尔军队仅仅阵亡8人，伤30人。如此悬殊的战绩对比，让骄横的英

国人实在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整个战役从12月10日开始，到15日停火，英军在东、中、西三条战线全部失利，总共损失2800多人，在英军史上被称为“黑暗的一周”。布勒因战事失利不得不引咎辞职，丢掉了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位置。布尔战争的失利，让英国政府和情报部门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强烈的指责。大英帝国此时才开始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开始了对情报工作的重视，从而对英国情报机构进行了较大的整顿和完善。

经过整顿和改革之后，英国情报机构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工，英国陆军情报局主要从事搜集国外军事情报的工作，同时还负责动员和本土防务；而反间谍工作则由海军情报局负责。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多年。

当年英国的军事情报总局（简称“军情局”），是一家机构臃肿的情报部门，直到1963年以前，它一直隶属于英国战事部，后隶属于英国国防部的国防情报组。“军情

局”下面设置了多个军情处，各个军情处均有不同的用途，成立时间也各不相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竟然发展成了19个军情处，而且都有自己的代号。带有“MI”开头的19个军情处成立的时间和职能大致分别如下：

MI1——成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解码及行政，现已取消。

MI2——军情二处，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管二战中东及远东、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及苏联、中南美洲地区的情报，现已取消。

MI3——军情三处，主要管理东欧的军事情报，现已解散。

MI4——军情四处，负责二战时期的地图情报工作，1940年4月被合并。

MI5——军情五处，成立于1909年10月，负责英国的对内军事情报，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职能一样。1931年改名为英国安全局。

MI6——军情六处，成立于1909年10月，负责英国的对外军事情报，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职能一样，后改名为秘密情报局。

MI7——军情七处，负责战争宣传，1940年7月被合并到英国资讯部。

MI8——军情八处，正式名称为电信情报局，负责在二战德国人的“闪电战”期间拦截及解读由纳粹德国电台播放的军事新闻情报，后来被合并到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

MI9——军情九处，成立于1940年12月，负责秘密援助纳粹德国占领区的义勇军和受伤之盟军，协助被德国俘虏的英国士兵逃走（直至1941年12月），现已解散。

MI10——军情十处，负责武器及技术支持分析，后被合并到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

MI11——军情十一处，负责战场保安情报，现已解散。

MI12——军情十二处，与英国资讯部的监察部门合作负责秘密监察，现已解散。

MI14——军情十四处，原来的军情十三处，因德国战略情报的重要而成立，直至1943年春天，负责纳粹德国及其占领区之高空照片情报，已被合并到MI6。

MI15——军情十五处，负责MI14以外地区的高空照片情报，1943年春天其职能被英国空军部夺去后负责领空防卫情报，已被并合到MI6。

MI16——军情十六处，1945年成立，负责科学情报。

MI17——军情十七处，1943年4月起为英国军事情报局局长之秘书处，现已解散。

MI19——军情十九处，1941年12月接替MI9负责审问敌方俘虏以获取情报，现已解散。

此外，还有MIL (R) ——负责与俄罗斯的情报机关联络，现已解散。

19世纪末，由于经济迅猛发展，英国开始对外扩张，不断地扩大其领地并在世界各地强占殖民地，疯狂地进行掠夺，聚敛了大

量的财富，使大英帝国进入了空前的鼎盛时期。为了加强对世界各地的殖民统治，进行更有力的掠夺，大英帝国加强了海军建设，使当时的英国海军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并且有效地控制了世界贸易航道，把英国的米字旗几乎插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由于英国海军的强大，造成了军事情报总局和海军情报局地位的悬殊，1904年，英王竟撤销了军事情报总局。1907年，英国内阁设立了“帝国防务委员会”，退休的海军情报局局长查尔斯·奥特利被任命为“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秘书。尽管如此，当时英国情报机构的改革步伐还是缓慢的。1907年查尔斯·奥特利和他的助手莫里斯·汉基在调查时惊奇地发现，当时在整个欧洲，竟然连一个英国特工人员也没有。

更可怕的是，查尔斯·奥特利和他的助手竟然将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态一直保密下来，让大多数国家以为英国在世界上已经拥有最广泛、最复杂的情报机构。这实在是自欺欺

人的掩耳盗铃之举。

直到1909年，为解决德国间谍在英国活动日益频繁的状况，英国情报机构才根据时任首相阿斯奎思的建议进行改组。1909年8月，在防务委员会的支持下，查尔斯·奥特利建议成立一个“秘密情报局”，负责情报搜集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了内阁的批准。不过当时的那个秘密情报局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即“军情六处”）。

当时，查尔斯·奥特利把秘密情报局（也称“保密局”）分为国外和国内两个不同部分：国外部分由皇家海军上校曼斯菲尔德·卡明领导，后来扩展为今天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又名“军事情报总局六处”，简称“军情六处”，代号为“MI6”）；国内部分由弗农·凯尔上校筹建，后发展为军事情报总局五处（简称“军情五处”，代号“MI5”）。

后因各个军情处职责多有重叠，最后将19个军情处合并为三个，即军情五处（MI5）、军情六处（MI6）和英国国家通信

情报局（GCHQ）。它们的具体职责是：

军情五处（MI5）现称为英国安全局，负责保护英国境内外的公民及其利益，防范针对国家安全的任何威胁，由英国内务部负责，其职能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尽管MI5从1931年就改名为英国安全局，但其体制从未真正脱离过MI5的含义，因此至今还被普遍称为MI5。

军情六处（MI6）现称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基本职责是在英国境外搜集情报以支持政府的安全、防务、外交和经济政策，并从事间谍情报和国外反间谍活动。它工作的重点是防范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政局不稳、犯罪活动和贩卖毒品等被认为与英国国家安全有直接关系的领域。由英国外交部负责，其职能相当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大约从1920年开始MI6被称做英国秘密情报局，并作为法定名称正式记入《1994年秘密情报法案》中。尽管几年前官方就不再用MI6这个名字了，但一般大众普遍

继续用它来描述英国秘密情报局（SIS）。

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GCHQ）又称政府通信总部，是英国为其情报服务提供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通信情报的机构，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信号情报搜集机构，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齐名，而历史要比美国的国家安全局还要悠久。由于政府通信总部获取情报需要监测各种各样的通信和其他电子信号，因此其驻地分散在世界各地。它是现代密码解析工作的倡导者，也是世界计算机技术的发明者。

通信情报局的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两个密码破译机构——英国海军情报部的“第40号房间”和英国陆军军情一处B科。1919年，这两个单位合并为政府密码学校，开始由英国海军部领导，后来被秘密情报局接管，由秘密情报局局长兼任政府密码学校校长。到了1943年二战期间，该机构转由英国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领导，到了1946年又改名为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主要职责就是为

英国国防部、外交部和其他执法机构提供相应的情报。

冷战之后，英国情报机构仍然维持着秘密情报局、安全局、国防情报局（DLS，包括空军情报局和海军情报局）、政府通信总部（GCHQ）等几大情报机构；此外，还有负责监视英国境内恐怖分子活动的英国伦敦警察局（苏格兰场）等情报机构，共有从业人员2万余人，年预算资金达11亿美元。但在上述众多的情报机构中，比较著名的还是秘密情报局（MI6）和英国安全局（MI5），其队伍最为庞大，是英国参与世界范围内谍报斗争的主要机构。再加上政府通信总部（GCHQ），号称是英国情报机构“三驾马车”。

从以上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英国的秘密情报局（MI6）和安全局（MI5）当年都曾经是陆军部军事情报局的一员，但是这段历史却是很短暂的，人们只是出于习惯才一直使用这两个番号。

这“三驾马车”尽管有具体的分工，但还是经常统一协调行动，并互通情报。从1960年开始，安全局、秘密情报局和政府通信总部的技术人员组成了一个“辐射情报委员会”，每两个星期开一次碰头会，进行情报交流和工作协调。这是英国情报界战后重要的委员会之一，它的成立打破了三个情报机构之间壁垒森严的局面，从而能协调行动。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英国的安全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成为英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因此，英国情报机构正在把它们的资源转移到上述领域，在一些重大的国际行动中，都能见到英国情报机构的身影。当年英国情报机构曾参与对伊拉克武器核查小组，后来又在阿富汗建立了情报网；在巴尔干半岛危机期间，英国情报机构曾试图暗杀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等等。

近年来，英国的国防开支呈下降趋势，而

用于情报机构方面的开支却有上升的势头。
2000年，三大情报机构的总开支由1999年的
7.13亿英镑增加到7.76亿英镑，其中还不包
括英国财政部另外拨付的1.44亿英镑。

百年风云，演绎着英国情报机构的百年精
彩和诡谲。

第一章 百年演变，军情六处步履维艰

有英国“情报之父”之称的独腿将军曼斯菲尔德·卡明创建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军情六处虽然步履维艰，几经挫折，但却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大英帝国的情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不过，时任新局长穿泳裤的形象网上曝光后却引得众说纷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赞其“腿真漂亮”。

由秘密到公开的漫漫历程

军情六处（现称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世界情报组织中是一个响亮的名字，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

一直是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工作，不受政府领导，政府部门的名单上没有它的名字。

军情六处的创始人是赫赫有名的皇家海军上校曼斯菲尔德·卡明，他也被称为英国“情报之父”。

曼斯菲尔德·卡明是一个独腿的海军军官，有着许多怪癖。他总是神秘兮兮，因而他所缔造的军情六处也就一直笼罩在那种昏暗、神秘的气氛中。卡明总喜欢摆弄一个金框单片眼镜和使用绿墨水写字。为使自己的身份保密，卡明担任第一任处长后，一直是用一个“C”（代表Chief——“首脑”之意）字母签名。从此以后，军情六处一直被外界称为神秘的“C”。由于他开创了先例，后来军情六处接任的领导都被称为“C”。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刚刚组建五年的秘密情报局还没有来得及在陆军部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就被移交海军部，与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海军情报机构合并。由于当时海军情报局的实力非常强大，许多情报工作都是由海军情报局完成的，秘密情报局就只能是敲敲边鼓、跑跑龙套而已。

1915年英军重组陆军部，秘密情报局又重归陆军部，成为军事情报局一处C组。1916年改组时，秘密

情报局在英国远征军总部中安排了专职人员，负责情报指导工作。

英国早期的情报工作，由于安全没有保障，因此处境十分困难，情报工作的难度也相当大，许多情报都是由一些临时人员提供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共有235名情报人员被德国判处犯有“间谍罪”，其中有55名被认为是替秘密情报局工作的。在1909年至1918年间，秘密情报局一直在陆军部、海军部、外交部之间调来调去。虽然它没有确定的归属，但还是在荷兰、德国和埃及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站，安插了许多特工人员，积极指挥反间谍活动、审讯俘虏、从敌占区搜集情报、协助组织和安排流亡者和战俘的逃亡路线等。当时秘密情报局还在纽约建立了办事处，同苏联的情报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25年辛克莱海军上将接替了卡明，成为军情六处的第二任处长。这个新上任的辛克莱也同样有许多怪癖——他永远戴着一顶比他的头颅小得多的圆顶礼帽；如果在会见中哪句话不对惹翻了他，他会掉过转椅面朝墙壁，用背对着来访者表示愤怒。

1939年11月4日，辛克莱死于癌症。他在这个位

置上待了14年。辛克莱在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之际，提请英国内阁会议任命他的副手斯图尔特·格雷厄姆·孟席斯接替他的职务。

孟席斯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他的游说总能令人眼花缭乱，至少能受到王室的欢迎。孟席斯当时四十多岁，年富力强。他的继父是国王的密友。孟席斯本人不仅具有特别的政治资本和社交活动能力，而且还相当富有。他是伊顿贵族学校的毕业生，虽然从未上过大学但加入了精锐的近卫军，并且一年后进入近卫队。他经常在伦敦一家专属绅士们骑马纵狗打猎的俱乐部消遣娱乐。这个大英帝国的情报局长的位置，是孟席斯本人渴望已久的职位。但是孟席斯的上任并不是那样的一帆风顺。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秘密情报局长在任命每个继承人前都要进行一番紧张的游说活动，其竞争程度之激烈可想而知。所以在很早之前，英国海、陆、空三军就达成了一项非正式的协议，由每个军种轮流坐庄，轮流派人担任局长。第二任处长辛克莱原先是海军情报局局长，在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之后当上了秘密情报局局长，所以这时应该轮到陆军或空军

了。

1939年11月，当任命事宜提出来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首相张伯伦会以战时权宜之计为由，置三军之间达成的协议于不顾，任命海军情报局局长约翰·戈弗雷海军少将担任军情六处处长一职。但是在经过一番认真的权衡之后，首相张伯伦选择了辛克莱的副手孟席斯，任命他为军情六处第三任处长。

1939年11月，孟席斯如愿以偿走马上任。然而，他的局长生涯从一开始就遇上了麻烦。

当时的英国普遍都在强调间谍活动靠不住，并且都在怀疑情报机构存在的必要。此时正是二战前夕，纳粹德国正日益强盛，大量的德国间谍渗透到英国本土，活动猖獗，而军情六处有关德国间谍的情报却越来越少，英国情报机构因此多次受到质疑和指责。

同时，由于秘密情报局在白厅又一直没有真正可靠的后台，第一任局长卡明有关苏联的不准确情报使秘密情报局失去了信任，即使搞到真正有价值的情报，白厅也不相信。而当秘密情报局未预见到意大利入侵阿尔及利亚和德国进军莱茵地区后，白厅对秘密情报局就更不感兴趣了。卡明的继任辛克莱又没有把

纳粹德国当做主要的工作对象，当二战爆发后白厅需要德国情报时，辛克莱居然无法提供。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孟席斯上台之后工作步履维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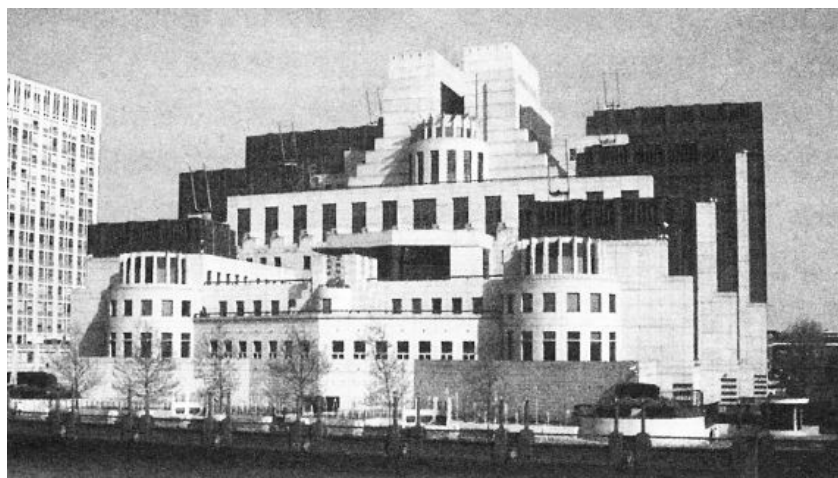
但是，由于孟席斯后来的努力，加上他与新上任的首相丘吉尔保持着良好关系，终于迎来了秘密情报局最辉煌的时期。其中最明显的转折点就是对德军密码的破译，让军情六处扭转了局面，成了新首相丘吉尔最信任的机构。

在孟席斯接任后，英国外交部就接收了秘密情报局，此后又接收了密码学校，由秘密情报局局长担任校长。于是孟席斯毅然抛弃传统的刺探情报观念，把目光投向了刚刚接管过来的密码学校，决心依靠密码学校，截获和破译德国的电报而从中获取情报。孟席斯果然如愿以偿。他通过设在布莱切雷庄园的密码破译机构，利用英国人的“炸弹”密码破译机，破译了纳粹德国的“埃尼格马”密码，为盟军赢得二战最后的胜利立下了奇功，也为军情六处的发展带来无限生机，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组织机构也由此逐渐完备。

但是自从1992年正式公开了身份以后，军情六处就一直受到不明人士的威胁。当年，一名被解雇的情

报人员就将军情六处所有情报人员的名单泄露到因特网上，引起了一阵恐慌。

1995年，军情六处总部搬到了位于伦敦维多利亚区泰晤士河畔一幢20层的大楼内办公，对外称“政府电信局”。这栋充满特色的大楼由建筑师特利·法拉设计，它成了伦敦的主要地标之一。为了做好新建大楼的安全工作，军情六处不惜花费巨资，把总部大楼的楼体建得就像堡垒一样坚固无比。2001年9月21日，军情六处的大楼遭到一枚不明炸弹的袭击，不过大楼毫发未损。



英国军情六处所在地

军情六处的防范措施非常严密，据说带张纸片都能报警。该处前工作人员汤姆林森曾因私自保留了总部的详细结构图而于1998年被开除。据他回忆，在通

往主楼的过道上，有六道自动防护门，工作人员要排队依次穿过这六道门才能到达主楼的工作间。

军情六处一直忠于保密的传统。近些年虽然公开了一些自己的材料，但是那只是这个神秘大楼的极微小的一部分。地面上的15层大楼只是这个总部大楼的一部分。据官方资料称，这幢大楼在地下还有5层，那里才是军情六处最隐秘的地方。军情六处最重要、最需要极度保密的各部门都在那里工作。那里的计算机中心就是用来监控可能的恐怖袭击事件的。

二战的艰难岁月

丘吉尔担任首相后，情报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大量才华出众和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从大学、商业界、知识界纷纷应召加入秘密情报组织。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爆发后，英国还从监狱里释放了不少偷窃技术高超的保险柜撬窃犯等刑事犯罪分子，要他们为盟军服务。其中大多数人获准参加突击队，少数人参加军情六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制锁、撬保险箱和爆破。这看来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战时对策，因为按英国招收间谍的标准来看，理想的间谍是一个

出身于上等社会、有经济收入、性格开朗的年轻人。他必须受过比一般人稍高的教育，英俊、勇敢、顽强、冷静和客观，一如银幕上的“007”詹姆斯·邦德。英国的情报机构历来都重视从牛津和剑桥这两所世界名牌大学中招收间谍。

1939年，军情六处内设一个专门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的D处。1940年7月22日，根据丘吉尔首相的命令，新成立的特别行动处将D处接管。特别行动处的任务是在海外进行破坏活动。特别行动处由英国经济战争部部长休·道尔顿博士组建，不久，弗兰克·纳尔逊爵士接替道尔顿，成为该处的总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情六处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不过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为同盟国战胜法西斯轴心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8年，德军越过德奥边境入侵奥地利，军情六处驻维也纳情报站长被捕，在德国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中，这位站长招了供，结果使军情六处在奥地利的情报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1939年11月9日，发生在荷兰边境文洛小镇的“文洛事件”，让军情六处从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渠

道。“文洛事件”后又遇上财政困难，军情六处一时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

1940年5月，德国的“闪电战”使英国不得不关闭了在欧洲的情报网，军情六处只剩下在中立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情报站。

1942年5月，由特别行动处组织参与了暗杀纳粹党卫队保安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事件，又一次引起了德国法西斯分子百倍的疯狂报复。仅在布拉格就有1万多人被捕，至少1300人被杀，位于布拉格附近的一座小村庄所有的男女老少无一幸免，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

特别行动处值得称赞的成绩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实施的一系列欺骗行动，有力迷惑了希特勒，分散了德军的主力，非常成功地拖住了德国精锐的装甲部队，延误了他们抵达沿海地区的时间，为盟军赢得“霸王行动”的主动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情报机关是随着它的海外扩张和侵略而不断发展，并跃居世界王者地位的。但是在战后，英国情报机关的活动，尤其是对国外的情报工作亦日趋消沉。为了弥补这一点不足，英

国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采取分工责任制。英国对其目前仍有较大影响的旧殖民地地区仍然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情报活动，而对其他地区，则依赖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必要的情报。

冷战后的军情六处

冷战结束后，英国谍报机关这个神秘的老字号也在发生着变化。在一些谍报部门中，长期以来一直由男性独霸天下的局面正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军情六处已经有一大批英姿飒爽、活力四射的女谍报人员，并且占据着越来越多的重要位置。现在，在英国军情六处所招收的执行特殊任务的谍报队伍中，女性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男性。

2002年在伊拉克，军情六处有五个主要的情报来源，但在伊战后的调查核实中，其可靠性遭到质疑。正是军情六处的错误情报，导致前首相布莱尔的“伊拉克可以在45分钟之内发射生化武器”成为危言耸听，最后贻笑大方。随后，大多数提供过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等秘密情报的伊拉克密探都被撤换。但没有任何高级官员因为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情报的失察，受到解雇或降级处理。

据英国《卫报》2010年6月12日报道，由于在伊拉克战争前大量假情报被炮制，英国军情六处采取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举动——聘请了一位商界人士担任高级情报质监员，监控所有机密情报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这位高级情报质监员代号为“R先生”。另外军情六处还为其专门设立了一个名为“非执行主管”的职位，确保间谍人员搜集情报的有效性。

据悉，“R先生”将同军情六处其他四位高级主管拥有同样的地位，他是仅次于军情六处正副局长和五位总管的人物。“R先生”将负责对英国驻全球各地间谍搜集来的情报进行评估和判断，从而改变军情六处内部管理混乱、情报搜集者同情报评估者之间职权交叉、模糊不清的现状。

军情六处现在还拥有2500多名员工，年预算超过2亿英镑。

2009年11月1日，英国秘密情报局迎来了一位新的掌门人，他就是53岁的约翰·索沃斯。军情六处向来重视背景，包括学历和履历，所以，其高级官员大多

出自英国精英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也有“世袭”传统——父子两代都在该机构任职的例子也不少。



MI6 SECURITY SERVICE

军情六处徽标

索沃斯是继1968年“外来者”约翰·伦尼获任军情六处首脑以来，第二位“空降”掌门人，也是二战以来第二位没上过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首脑，上一位是20世纪70年代担任军情六处首脑的莫里斯·奥德菲尔德。

索沃斯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他本人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物理和哲学专业，后来在英国圣安德鲁大学、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军情六处实习，之后被派往也门共和

国担任过情报人员，但他对搜集情报工作不感兴趣，不久就“跳槽”到外交部，被派驻南非。

当时英国驻南非大使是罗宾·伦威克。伦威克是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最器重的大使，得到罗宾·伦威克的青睐是索沃斯后来开拓仕途的重要财富。布莱尔上任后，立即发现索沃斯的才能。一名观察家说：“他（布莱尔）有点厌烦了那些拿腔拿调的上流精英阶层总教训他不该做什么。约翰·索沃斯有点像他自己——直爽、随意但很有权威——我觉得他（布莱尔）在索沃斯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点影子。”

索沃斯2001年被任命为英国驻埃及大使，2003年布莱尔将他派往伊拉克，负责评估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的局势。索沃斯到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不久就发回一份题为《伊拉克：出了什么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英国政府必须尽快出台以巴格达为中心的战略。他抨击美国对巴格达的管理呈现“难以置信的混乱”，建议英军接管巴格达防务。索沃斯还曾经作为英国外交使团负责人参与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由于索沃斯大学时曾学习物理专业，所以使团的一名成员说：“他可能是使团中那个真正明白核弹是怎么回事的

人。”

2007年至2009年，索沃斯任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2009年6月16日，英国首相办公室宣布索沃斯成为军情六处新的负责人。索沃斯虽拥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但他在情报工作方面却资历浅薄，不少人对其任命持保留态度。在索沃斯接受任命不久，他的妻子谢利·索沃斯就将数十张家庭生活照曝光于社交网站，更让人质疑他的专业素质。

谢利·索沃斯似乎没有意识到丈夫新职位的敏感性。就在英国首相办公室6月16日宣布索沃斯将成为军情六处新局长当天，谢利就在著名社交网站“脸谱”的个人主页上，用象征军情六处“一号人物”的代号“C”称呼丈夫以示祝贺，并将45张丈夫与家人或朋友的生活和工作照上传在上面，其中，有一张索沃斯扮酷的照片，其造型姿势完全是“抄袭”了“007”系列电影主角詹姆斯·邦德的经典形象，唯一不同的是，索沃斯身上只穿了一条泳裤。

英国有关部门发现后，迅速删除了网页上所有的照片，但是这些照片还是出现在英国的各类报刊上。

甚至连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也不忘就此事和索沃斯开玩笑，她在祝贺索沃斯荣任军情六处掌门人后对他说：“你的腿真漂亮。”

索沃斯出任军情六处掌门人后，“他的生活会立刻发生改变”，军情六处一名内部人士如此形容索沃斯今后的生活，“他的朋友不可能给他家里打电话或写信，他将从正常生活中消失，住在伦敦中部的一个秘密地点，而不是自己家里。他的安保措施每周必须接受评估，司机会采用不同的路线把他从住所送到办公室。”

不管怎么说，新的掌门人约翰·索沃斯的出现，让英国人对一直受到困扰的军情六处又寄予了新的希望。

第二章 世纪沧桑，军情五处宝刀不老

军情五处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英国本土的安全和反间谍，一战期间，他们一天之内竟抓获了21个德裔间谍；二战期间，成功实施了著名的“肉馅行动”和“铜头行动”；“冷战”结束后的任务是监视公众人物和工会领袖，最后连首相也逃脱不了其困扰，甚至连唐宁街10号也成了其窃听的目标，并且闹出了一个英国版的“水门事件”。

军情五处的起源和发展

军情五处（MI5）现称英国安全局，是英国实施国内安全和反间谍工作的主要机构。“MI5”实为“第五军事情报局”的缩写字母，尽管1931年就改名为英国安

全局，但其从未真正脱离过军情五处的含义，而且至今还被普遍地称做军情五处。英国内务部负责军情五处的事务。在英国前首相梅杰执政期间，他把军情五处划到了政府的名下，业务上对英国外交部负责，为政府处理安全、防务、外事、经济方面的事物搜集情报。

军情五处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时德国间谍在英国四处活动，港口和造船厂是他们的首要目标。1909年，阿斯奎思首相领导的英帝国国家防务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来调查和解决德国间谍问题。工作小组随后提出了一个创建保密局的建议，并从军队里抽调两个军官开展工作。其中一位是弗农·凯尔上校，他当时在国防委员会的情报科工作，是有名的“中国通”；另一位是来自皇家海军的曼斯菲尔德·卡明上校。他们合作创建了保密局，由凯尔领导的军事作战局五处（MI5）负责英国本土的反间谍工作，保卫国内的安全；由卡明负责的“军事作战局六处”（MI6）派遣英国特工去德国搜集海外情报，以了解其战略计划。后来，人们还一直沿用凯尔名字中的字母“K”称呼军情五处的首脑，就像沿用卡明名字中的字母“C”称呼

军情六处的首脑那样。



军情五处首任掌门人弗农·凯尔少将

从1909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间，凯尔和他的军情五处至少查获了36起德国间谍案，为保卫英国国内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天，凯尔和他的助手在前往苏格兰的火车上，偶然听到两个中年男人在用德语交谈。其中一个说，他接到一封从波茨坦来的信，询问有关英国备战的情况。对话立即引起了凯尔和他的助手的注意。后来经过调查，他们得知收信的那个男子是利思市孔雀旅馆的德裔老板霍尔斯坦。军情五处对那家旅馆进行了搜查，查获了来自德国情报机构的所有信件，并且获得了霍尔斯坦与德国情报机关的联络点。凯尔通过这些地址和信件，确认了德国情报机构在英国各地建立的间谍网和各个间谍人员的身份，获知了这些间谍的信箱号码和接头地点。凯尔和军情五处的这次行动，是早期邮件拦截行动的成功范例。由于那次行动的成功，英格兰和苏格兰警方在1914年8月4日一天之内，竟然抓获了21个德裔间谍。

军情五处的创始人凯尔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后来担任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局长长达三十余年，使这个创建时规模很小的机构，到1939年时已成为具备许多专

业分支的庞大部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情五处随着英军参战也不断地扩大。大量有才能的人进入了军情五处，发挥他们非凡的才能。出于战争的需要，整个英国都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追捕间谍、叛徒和破坏分子。后来在海军部的情报机构“第40号房间”还配备了破译人员破译敌方的电报密码。

1916年，军事作战局五处改称为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但这只是机构名称上的改变，其地位、活动和人员并没有因此而变化，在编制上仍然是陆军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并对陆军大臣负责，可是它取得了独立地位，可以直接与首相联系。

然而，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缺乏吸引人的魅力，他们干的是不显眼的工作，而且功劳常常是他人的，所以军情五局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自然也就不够风光。由于军情五局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没有发挥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事情报总局的规模开始缩小，从1918年的八百余人逐步下降到三百余人，有一些人试图取消军情五局，把它合并到其他部门，但由

于凯尔的坚决抵制，那些人没有获得成功。

1919年11月21日，星期天，由奥蒙德·温特上校领导的英国联合情报局在都柏林地区遭到了迈克尔·科林的爱尔兰共和军的袭击。在枪战中，有14名联合情报局的人和皇家爱尔兰警察厅的两名警察被打死，这对军情五处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而爱尔兰共和军在这次袭击中，只有一人被击中。后来，这一天被称为“血腥的星期天”。

1931年，评估对国家安全所有威胁的责任移交给了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后，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局改名为英国安全局。这是该局现在使用的正式名称，当然，人们还是习惯称其为军情五处。

军情五处总部原来设在伦敦梅菲尔区柯尔曾大街一座八层楼里，后来迁到泰晤士河畔豪斯的造价上亿英镑的新总部。在总部内存放着大约200万人的档案。除总部外，在伦敦的梅菲尔、圣詹姆斯、卢卡姆斯伯里各区都设有办事处、训练所。在英国掌管的其他领土上，军情五处也设有情报机构和海外站。此外，它还与军情六处共同使用建在格罗夫公园的侦查中心。

1937年，军情五处的参谋人员（总共28人）从克

伦威尔路搬到了米尔班克的泰晤士大厦的两层楼办公，后来他们又搬到了霍斯费旦拐角的居住地区。此时，凯尔已经预感到新一轮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他对那些潮水般涌入英国的大陆难民深感不安。到1937年夏天，已经有2万多涌入英国的德国人向警方登记，而这些外侨中就混有大量的希特勒“第五纵队”的人员，那些人都是一流情报人员。为此，凯尔多次向上级反映，要求扩大机构增强军情五处的作战能力。经过一番努力，凯尔终于得到了扩充军情五处的许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八个月，军情五处获得了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机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二战成了军情五处发展的契机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近，军情五处规模扩大了好几倍。尽管如此，到了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后，它还是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不能有效地应付欧洲战场的复杂局面。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军情五处的活动往往只能是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这种局面直到1941年其机构改组后才有所改变。

随着军情五处迅速扩大，办公的地方越来越紧

张。于是，凯尔只好把一部分机构搬迁到沃尔姆伍德丛林中的一座监狱中办公。当时他还准备建立一座特别监狱，把属于军情五处的犯人单独关押。这样既解决了民政当局不能提供这种住所的困难，又可以让这些犯人与外界隔绝。他任命前特别处的军官斯廷森去找这样一个合适的拘留中心，最后，他选中了里士满附近的哈姆康芒的拉齐米尔大楼，那里成了军情五处的临时特别监狱。

在整个二战期间，军情五处有相当多的内部机动人数，许多英国妇女加入到了英国情报机构。那些妇女一般是先到登记科工作一段时间，在那里填写表格和进行归档工作，然后逐步升到秘书的职位，少数妇女成为军事情报官员。

随着战争的继续，军情五处所承担的任务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起初，它致力于英伦三岛和英国内部的保安工作。后来，则是派人员与在海外战场组建的许多特别行动小组一起执行任务。到战争结束时，其工作重点又转移到了战略欺骗、派遣间谍和肃清残敌，而在内部又作出了进一步改组。

1940年5月10日，温斯顿·丘吉尔被任命为英国首

相，军情五处被排在新首相的改革计划之内。这一天，德国开始进攻法国、比利时和荷兰，英国内阁会议就在这种背景下召开了。

会后，首相丘吉尔莫名其妙地解除了凯尔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局长的职务。第二天，在丘吉尔晋见国王前几个小时，三军参谋长成立了英国本土防务指挥部。同时，英国内阁准备建立一个特别小组监督军情五处的工作。

丘吉尔上台之初，军情五处的日子并不好过，比如1939年10月4日德军对斯卡帕弗洛进攻，击沉了英国海军“皇家橡树”号军舰，造成843名水兵丧生。其实，这是海军当地的预防水下攻击的措施不得力造成的，与军情五处没有什么关系，但丘吉尔却认为是军情五处的罪过；还有1940年1月的皇家弹药库爆炸案事件，丘吉尔也将责任归咎在军情五处的头上。就是这两件本来与军情五处毫无关系的事，使凯尔被撤职了。这不仅让凯尔本人感到惊愕，也使整个军情五处感到愤愤不平。



军情五处旧址

1940年11月，戴维·皮特里被任命为军情五处的新局长，他决定对军情五处进行一些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情五处由30个办公室组成，分为“行动”和“管理”两个部门。在归属问题上，军情五处名义上曾先后归属陆军部、内政部管辖，但它实际上一直是首相直接控制的。

二战期间，军情五处成功地实施了一系列的行动，其中最著名的有“肉馅行动”和“铜头行动”。军情五处设计的这一系列的冒名顶替的欺骗行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肉馅行动”让1943年7月盟军在西西里登

陆获得圆满成功；1944年的“铜头行动”同样让德军统帅部错误地认定盟军将要在法国的加来地区登陆，而把防守诺曼底地区的2个坦克师和6个步兵师抽调到加来地区，从而大大减轻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的压力，促成了这次战役的顺利进行。

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军情五处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各处的基本结构并未触动。它主要由局长、副局长、秘书处和其他七个处编成，每个处都有自己的字母代号，由一名处长领导，几名副处长和处长助理协助处长工作。这七个处分别是：行政处、反间谍处、保安处、军事联络处、外侨处、国外控制处、政党处。

反间谍处是军情五处最重要的一个部门。第一任领导人是贾珀·哈克准将，后来由盖伊·利德尔接替。该处下设许多科组，其中包括塔尔·罗伯逊的一科一组，主要对付德国间谍；一科三组，负责反破坏；五科一组和三组，负责反颠覆。同反间谍处有密切联系的是其他有关的情报单位，如休·特莱弗·罗伯所在的无线电保安局，在萨里的哈姆康芒审讯中心和邮政总局的信件截收队。反间谍处许多工作人员是在战争期间被破

例征召录用的，由律师、学者、正规军人、记者以及一些游手好闲的人组成。

反间谍处在英国的重要工作基础是地区保安联络军官网，总共有12名地区保安联络官。他们与地区专员、当地驻军司令和警察局长密切合作。艾伦·麦基弗上校领导整个联络网。

军情五处在处理反间谍事务时一直都有一种被掣肘的感觉，那是因为英国法律没有授予军情五处拘捕权，它要拘捕间谍必须通过英国伦敦警察局或是别的警察部门，这样非常容易贻误战机，也确实给军情五处增添了许多麻烦。这种状况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改变。

1945年5月，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时，军情五处着手减少活动，让大量的工作人员复员，这意味着它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了。

冷战前后的军情五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情五处的主要任务是清查英国共产党的活动和苏联间谍的渗透活动，这些行动让其内部出现了信任危机。特别是苏联支持德国建

立“柏林墙”之后，情报来源被切断，一度使军情五处再次陷入危机之中。

另一方面，战后的军情五处也极大地受执政党的影响，特别是首相对它的信任程度决定了它是“膨胀”还是“萎缩”。这时的军情五处不再那么声名显赫，它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败而有些不尽如人意。许多情况下还得依靠美国的情报机关才能进行有效的间谍活动。但是它高效的运作方式、缜密的组织机构、丰富的作战经验仍然是各国间谍不可小视的克星。

二战以后，西方的情报机构把注意力转移到冷战方面，军情五处也不例外。它当时的主要职责就是“反谍保安”，防止别国、特别是共产党国家的情报间谍活动。这一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类似，但它不享有警察权力，不能进行人身搜查；如需搜查和逮捕，必须会同伦敦警察厅进行。

冷战结束后，军情五处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国际国内的恐怖活动，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在国内进行的恐怖活动，防止英国核武器、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技术的扩散泄漏，调查国内工会以及其他“抗议组织”的政治活动，防范国外针对英国所从事的各种间谍活动。它

依靠广泛的秘密情报人员进行窃听、监视、邮检等手段实施自己的职责。

一般情况下，军情五处仅在英国本土活动，遇有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它也执行海外任务。总之，对军情五处来说，英国的国家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情报机构不仅要对付由纳粹主义崛起引起的问题，而且还要对付爱尔兰民族主义问题。

冷战时期，情报部门和政治家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其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就是英国首相威尔逊宣布他自己成了军情五处的监视目标。1947年10月，他发现有人进入他的家中，一些个人资料被窃，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破门而入的痕迹。此事发生后，他宣称自己成了军事五处的监视目标。他确信军情五处的右翼成员阴谋反对他，想让他下台。据说该阴谋与威尔逊对莫斯科的常规访问和他与苏联政党的联系有关。

14个月后，威尔逊令人吃惊地辞去了首相职务。

那时，不仅是威尔逊，很多威尔逊内阁的高级领导人都成了军情五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监控目标。

除此之外，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军情五处还通过它不断扩大的部门，监视公众人物、记者、教师、和平主义者、律师和内阁大臣。许多著名人物都成为它的监控目标。

对所谓的颠覆运动的跟踪持续了很多年，耗费了军情五处大量的人力物力，建立了数以百万计的档案。而与此同时，真正需要关注的地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例如北爱尔兰，那里虽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军情五处和其他情报机构（包括军情六处）的竞争中，那里却一直处于低效、管理混乱、错误迭出和自相残杀的状态中。当时曾有一次由军情五处领导的行动，其目的原本是揭露宗派主义杀手，但是由于假情报的干扰，最后竟变成针对工党政府部长们的行动。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普遍开始反对情报机构对人民进行的监视活动。然而，军情五处对普通市民的监控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它对通讯系统的监听也变得更加普遍。

自1909年成立以来，军情五处一共公布了100万份档案，涉及100万个人名。这些档案大部分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但是，与世界其他地方积累的文件和数据相比较，这个数字还不算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8万份二战以前的档案被销毁。1988年，还有约50万份档案作为调查目标保存在军情五处。这中间有4万份属于最高保密级别，以缩微胶片的形式保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有关官员才可以用口令读取这些资料。另外还有25万份档案也作为保密材料保存，但是军情五处的职员在目前工作中可以使用。

在20世纪60年代，因为以前的记录已被销毁，一些间谍案件的调查遇到了困难，所以英国政府采纳了对文件不作销毁处理的决定。即使如此，冷战结束后，经审查，仍有11万份档案被打上记号销毁，其中包括苏联和“华约”国家情报局试图从英国颠覆组织中招募间谍的行动。显然，在那个时期，英国有数以千计的人仍处于监视之下，其中包括当时的“核裁军运动”主席布鲁斯·肯特。

不仅如此，甚至连唐宁街10号也成了军情五处窃听的目标，并且闹出了一个英国版的“水门事件”。

军情五处窃听唐宁街10号与麦吉尼斯之间通话的

惊人内幕被媒体曝光后，不亚于在英国政坛引爆了一枚原子弹。“新芬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英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声称结束对“北爱共和军”成员的监视和秘密行动，但暗地里却继续对“新芬党”和“北爱共和军”成员不信任。

实际上，军情五处的任务正在变得更加艰巨。日益增多的恐怖分子使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忙碌。2007年11月5日，军情五处的负责人乔纳森·埃文斯说，英国的恐怖组织正在想方设法招募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参与恐怖活动，其中一些孩子年仅十四五岁。英国境内参与恐怖活动的人可能多达4000人。在过去的一年里，英国境内的恐怖分子增加了一倍以上。

埃文斯表示，“基地”组织正在策划从巴基斯坦、索马里、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向英国发动恐怖袭击。埃文斯还透露，他计划进一步增加军情五处的人手，到2011年把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增加到4000人。

军情五处目前大约有2000余名雇员，其中妇女约占二分之一，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大约为四分之一。军情五处的女情报人员大多有学位，与男同事一样献身于情报工作。她们比男士更谨慎，不容易暴露

身份，更擅长于搜集和整理各类信息，素质较高。该局录用雇员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英国的文官体系进行筛选，其次是通过在报纸上刊登匿名“广告”吸收新人。

据估计，军情五处每年的经费大约在3亿英镑左右，其中44%用来打击国内恐怖活动，26%用来打击国际恐怖活动，反间谍和防扩散活动占25%，反颠覆活动占5%。

1992年，英国内阁将对付最为棘手的爱尔兰共和军恐怖活动的任务交给了军情五处，让其提供爱尔兰共和军进行恐怖活动的情报。

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军情五处面临三大目标：集中力量打击北爱尔兰的恐怖活动，防范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协助侦破恶性的有组织犯罪。英国政府也加强了对军情五处的支持力度，为其增加了大量的经费，并批准其招募新人，扩充实力。军情五处在英国情报机关中的地位大为提高。

军情五处的局长们

英国情报机构的所有人事任命一向被视为最高机密，从来不对外透露。在1993年以前，军情五处总负

责人全部由英国首相秘密任命，他们的身份也从不公之于众。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军情五处的掌门人也第一次公开了他们的身份。

现将这15位掌门人的姓名及有关资料介绍如下：

第一任局长：弗农·凯尔少将。任职时间：1909年—1940年。1909年，当时还是上校的弗农·凯尔与他人一起创建了秘密情报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成功地捣毁德国设在英国的间谍网，为避免重要情报外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军情五处历史上首位女局长斯特拉·雷明顿

第二任局长：A·W·A哈尔克。任职时间：1940年—1941年。他一直是凯尔的得力助手，长期是该机构“B活动区”的负责人，属于过渡性人物。

第三任局长：戴维·皮特理爵士。任职时间：1941年—1946年。他任职时是安全局历史上最为繁忙的一段时期，进行了许多成功针对纳粹德国的情报活动。

第四任局长：珀西·西利托爵士。任职时间：1946年—1953年。他任职期间主要是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间谍组织，粉碎在英国进行的外国势力的颠覆，其中包括揭发剑桥间谍帮。1955年他出版了自传，成为出版自传的首位安全局局长。

第五任局长：迪克·怀特爵士。任职时间：1953年—1956年。1953年他开始担任安全局局长职务，1956年调至秘密情报局担任局长职务。他是唯一接连担任这两个情报机构局长职务的人。

第六任局长：罗杰·霍利斯爵士。任职时间：1956年—1965年。他曾被指控为苏联的秘密间谍，后来发现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第七任局长：马丁·弗尼瓦尔·琼斯爵士。任职时间：1965年—1972年。

第八任局长：米歇尔·翰利爵士。任职时间：1972年—1978年。

第九任局长：霍华德·史密斯爵士。任职时间：

1978年—1981年。

第十任局长：约翰·琼斯爵士。任职时间：1981年—1985年。

第十一任局长：安东尼·杜夫爵士。任职时间：1985年—1987年。

第十二任局长：帕特里克·沃克爵士。任职时间：1987年—1992年。

第十三任局长：斯特拉·雷明顿夫人。任职时间：1992年—1996年。她是英国第一位担任这一职务的女性，也是该机构第一位被公开身份的总负责人。

第十四任局长：史蒂芬·兰德爵士。任职时间：1996年—2002年。

第十五任局长：伊莱扎·曼宁厄姆-布勒夫人。任职时间：2002年至今。布勒是前检察总长、大法官雷金纳德·曼宁厄姆-布勒爵士的女儿，毕业于牛津大学，她意志坚定，而且相当固执。

第三章 文洛悲剧，英国特工败走麦城

一个自称是反纳粹地下组织成员的德国间谍找上门来，英国情报人员竟然认敌为友，和他们共商推翻希特勒的大计；随着慕尼黑啤酒馆的一声爆炸，希特勒毫发未损，倒让英国情报网全军覆没；两名英国特工交代的口供材料多得编成了一本书，却最终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度过了整个二战时期。

英国情报局从此凄风苦雨，几乎面临改组的厄运。

一名“反纳粹主义者”找上门来了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出兵进犯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全面爆发。斯图尔特·孟席斯就是从这一

年开始出任英国军情六局局长，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孟席斯早年就读于伊顿公学，毕业后任皇家近卫军步兵团和近卫军骑兵团军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上尉军衔。他从1915年12月开始从事情报工作，1919年起供职于英国军情六处。1939年出任该处负责人，是军情六处的第三任负责人。上任后，他把军情六处的主要工作重点放到了荷兰。在荷兰还没有被德军占领之前，英国政府就在荷兰首都海牙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实际上是军情六处驻荷兰的一个情报站。

英国驻荷兰办事处设在海牙阿姆斯特丹市区一条僻静的大街上。负责人是亨利·史蒂文斯少校。其真实身份是英国军情六处驻海牙情报站的站长。他正指挥着一个庞大的英国间谍网，准备渗透到德国内部开展间谍活动。

史蒂文斯少校有一名得力的助手叫佩恩·贝斯特，是一名上尉军官，他在荷兰已经居住多年了，长期从事间谍工作。当时，贝斯特在阿姆斯特丹市开办了一家大陆贸易进出口公司，为他的间谍活动作掩护。公

司位于阿姆斯特丹市的涅维·尤伊特莱格大街15号，这里成了英国军情六处特工们活动的前沿阵地。

德国情报机关此时也在荷兰从事间谍活动，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情报站很快引起了德军保卫部和德国党卫队保密局特工们的注意。战争开始后不久，德国人决定对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进行一次试探，摸摸他们的底细。

1939年9月初的一天，贝斯特在公司的邮箱里发现了一封没有寄信人地址的来信，信上说一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德国反纳粹主义者要与史蒂文斯少校和贝斯特上尉见面，有重要的情况向他们通报。贝斯特收到这封信之后，立即向史蒂文斯少校进行了汇报。史蒂文斯少校看了这封信之后，觉得事情虽然有些突然，但却是个机会，于是就决定不管对方是谁，先同他见上一面，以探听虚实。

一向谨慎的史蒂文斯少校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情报站已经成了德国人侦破的对象，他和他的同事贝斯特落入了德国情报部门精心设置的陷阱。那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反纳粹主义者”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而是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的一名反间谍人员，

代号为“F479”，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破坏英军在荷兰的情报网。

一个秋风萧瑟的雨夜，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按照信中事先的约定，穿着黑色的长风衣，开着公司的小货车，来到阿姆斯特丹市区一家偏僻的小酒馆里，同这个名叫弗兰茨·费希尔的德国人见了面。见面之后，费希尔自我介绍说，他是德军内部一个反希特勒地下组织——“黑色乐队”的代表，此行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英国人对这个“黑色乐队”是否有兴趣，愿不愿意会见一下这个地下组织的其他一些重要成员？费希尔当时还承诺，如果英国人对“黑色乐队”的行动感兴趣，他可以帮助英国人同德国境内的其他一些反纳粹组织联系，结成一个反战同盟，共同从事反对希特勒纳粹政府的事业。

英国情报机关早就听说在德军内部有一个名叫“黑色乐队”的秘密反纳粹组织，其成员包括一些老资格的德国将军和军官，他们的领导人是曾任德军总参谋长的贝克将军。这些人深信，这场由希特勒亲手发动的世界大战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军事冒险，将会给德国带来一场灾难，所以一直在密谋推翻现行的希特勒纳粹

政权。史蒂文斯少校也知道，英国政府一直非常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因此他对这名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表现出了很大兴趣，希望通过这个费希尔与“黑色乐队”取得联系，获取德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但是，作为一名身负重任的职业特工，史蒂文斯少校对这名自动找上门来的德国人还是将信将疑，表现出一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因为他的上级、局长孟席斯爵士曾一再告诫过他，对纳粹德国情报部门的反间谍能力不可低估，避免落入圈套。当时孟席斯本人对“黑色乐队”的态度是谨防中计，但又不拒绝与之接触。所以，那次会见的场面还是很令人尴尬，因为双方都各自心怀鬼胎，算计对方。表面上他们在轻松地喝着那种荷兰女人们喜欢喝的松子酒，品味着酒杯中那淡淡的松子的香味，但是他们却是在小心翼翼地谈着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话题，仔细捕捉每个词汇所传递的信息。经过一番小心的试探之后，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认为眼前的这个“黑色乐队”的代表不会有什么危险，就表示同意会见费希尔所谈到的“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费希尔这时才告诉他们，那位“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叫斯切梅尔，是德国

陆军运输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官。

费希尔所说的“斯切梅尔上尉”并不是什么“黑色乐队”反纳粹组织的代表，而是德军一个重要的情报官。“斯切梅尔上尉”真实的名字叫沃尔特·施伦堡，是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情报处的国外情报科科长，还任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之职。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期间，他又担任了保安警察与陆军总部的联络官。1939年10月，施伦堡被海德里希调入中央保安局四处E科（该科负责反间谍工作）担任副科长，后晋升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专门负责侦破地下抵抗组织。就在这时，他听说英国的秘密情报局愿意与德国军队内部的反希特勒组织联系，立即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开始加入了这次行动。

这次行动计划是由德国党卫军帝国保安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一手策划并亲自指挥，直接向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汇报，最后上报希特勒本人批准实施的。他们想通过这次行动了解英国与德军内部反纳粹组织的联系情况，从而将这个组织一网打尽，破坏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整个情报网。

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沃尔特·施伦堡事先进

行了充分准备，他特意搬到位于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居住了一段时间，观察真正的斯切梅尔上尉的一举一动，掌握了他的生活习惯，并搜集了有关他的全部背景资料，直到认为万无一失。

这次会见费希尔首战告捷，他已经初步取得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信任。几天以后，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又应邀同费希尔见面了。由于有了上一次会见的铺垫，这一次见面就不显得那么拘谨了。三个人见面之后，不但态度热诚，而且还直截了当地谈到了一些具体的工作计划。从此他们三个人就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就像真正的反纳粹盟友一样。

10月30日，费希尔通知史蒂文斯说，斯切梅尔上尉即将到达荷兰边境的文洛镇，马上就可以同他们见面了。警惕性极高的史蒂文斯少校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斯切梅尔上尉”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就请自己的好朋友——时任荷兰情报局局长的范·代·普拉斯谢上校出面，在荷兰边境扣留这个“斯切梅尔上尉”，然后进行审查，以确认其真实身份。于是，普拉斯谢上校就派了手下精明的德克·克劳普中尉协助贝斯特来完成这一任务。



莱因哈特·海德里希

按照费希尔所提供的时间和车次，克劳普中尉和贝斯特在火车上找到了那个即将进入荷兰境内的德国运输部队的“斯切梅尔上尉”，把他带到了当地的警察局讯问，并且仔细检查了他所有的证件，但是并没有发现和他的姓名、身份不相符的地方，在他的行李中

也没有发现值得怀疑的东西，于是克劳普中尉和贝斯特就相信了这个“斯切梅尔上尉”，遵照临行前史蒂文斯的指示，由贝斯特亲自开着一辆蓝色的别克轿车，把“斯切梅尔上尉”送到了约定的见面地点——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涅维·尤伊特莱格大街15号，史蒂文斯已经等候在那里了。

在大陆贸易公司的一间密室里，史蒂文斯和这个冒名为“斯切梅尔上尉”的沃尔特·施伦堡进行了长达一天的会谈，最后还搞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中包括设法推翻纳粹政权，立即与西方媾和，恢复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独立等等。为了进一步取得英国人的信任，施伦堡甚至还信誓旦旦地请求，事成之后，希望英国政府对德国的新政权要采取“平等”态度。

沃尔特·施伦堡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家伙，见面没说上几句话，就获得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的信任。他向史蒂文斯少校透露说，当时一些德国陆军军官正在密谋一项推翻希特勒政权并同盟国一起恢复和平的计划，并且透露了许多重要的细节，诸如“黑色乐队”的组织机构，一些组织成员和负责人的名单。“斯切梅尔上尉”的这番话，很快就让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放弃了必

要的警惕，因为这对英国情报机关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情报。当天晚上，那个冒充“斯切梅尔上尉”的施伦堡居然还在阿姆斯特丹住下来了，同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共进晚餐。好客的史蒂文斯用牡蛎盛情款待了这位尊贵的盟友。史蒂文斯还像老朋友一样，同施伦堡谈起了音乐、绘画艺术还有诗歌。因为“斯切梅尔上尉”是来自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市，而杜塞尔多夫市是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抒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的出生地，于是他们又找到了许多关于这位诗人的话题。在两军对垒、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能找到一个人聊一聊这种浪漫而又高雅的话题的机会并不多，所以两个人就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聊得十分开心。

第二天，为了进一步欺骗英国人，施伦堡给史蒂文斯介绍了一位新来的客人——陆军医生“豪斯曼上尉”。其实这个人是施伦堡的一个好朋友和同伙，真实的身份是柏林大学和沙里特医院的心理学教授，名叫马克斯·德·克利尼斯。施伦堡却介绍说他是“黑色乐队”的领袖人物贝克将军的得力助手。

看上去风度翩翩、富有涵养的克利尼斯作为将军的副官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史蒂文斯就像信

任施伦堡一样，很快就相信了这个克利尼斯。克利尼斯进一步透露说，他的上级，也就是“黑色乐队”的一名“将军”在近日内即将飞往伦敦，与英国方面的政府要员举行最高级别的会谈，如果会谈成功，“黑色乐队”就要开展新的行动了。信以为真的史蒂文斯给了施伦堡一部衣箱式无线电台和一本密码，让他们使用“ON—4”呼号，与英国军情局直接进行联系。

10月31日下午，贝斯特又开着他那辆蓝色的别克牌轿车，把这两名德国人送到了荷兰边界。在文洛小镇下车之后，施伦堡和他的同伙克利尼斯在荷兰边境接受了哨兵的检查之后，匆匆地越过边境，消失在迷蒙的雨雾之中。

德国人的阴谋诡计终于骗取了谨慎的英国人的信任。会谈一结束，史蒂文斯就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孟席斯汇报了情况，孟席斯也为这次会谈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不过，孟席斯还是警告史蒂文斯，在自己与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交换意见之前，不要再与德国人继续谈判，同时还再次提醒史蒂文斯一定要小心谨慎，提防德国人搞鬼，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后来，史蒂文斯同“斯切梅尔上尉”他们又多次见

面。 有一次，“斯切梅尔上尉”建议改变一下他们约会的地点，希望能到荷兰边境的文洛小镇去。“斯切梅尔上尉”的理由是，文洛虽然是荷兰边境的一座小镇，但是那里却有一家很不错的咖啡馆；同时还可以为到阿姆斯特丹市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他每次到这里来不仅要接受荷兰方面的检查，他自己还要编出许多借口，才不会引起自己的上级和军方的怀疑。对于“斯切梅尔上尉”的这种建议，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就同意了。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当时根本不知道，“斯切梅尔上尉”的建议，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阴谋。就是荷兰边境的那个文洛小镇，最终让他们和英国情报局在荷兰的情报网兵败麦城，毁于一旦。

慕尼黑啤酒馆响起了爆炸声

几天之后，英国军情六局果然收到了“ON—4”发来的消息，称那位“将军”将在11月9日飞往伦敦，会见英国方面的高层领导人。孟席斯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认为那“将军”可能就是贝克将军本人，于是就安排了一架皇家空军飞机预先飞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以

便“将军”可以从那里乘飞机前往伦敦；同时，孟席斯也指示史蒂文斯他们，为了预防万一，不要再到荷兰边界与德国人会谈，如果有问题需要商讨，必须到海牙或者是阿姆斯特丹。因为史蒂文斯曾向他报告过，11月9日，也就是那位“将军”飞往伦敦的同一天，史蒂文斯将和“斯切梅尔上尉”在荷德边界文洛小镇的那家巴克斯咖啡馆会面，商谈一些事情，然后前往丹麦，再乘飞机飞回英国。

这时，精明而又狡猾的施伦堡知道自己已经骗住了英国人，就一心想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他的上司海德里希也同意了，看看会有什么收获。11月8日傍晚，施伦堡早早地上床休息了，以便明天能有充足的精力对付那两个英国人。午夜时分，他睡得正香，床头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听筒那边传来的居然是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的声音。电话里的希姆莱怒气冲冲，他声称，当晚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参加纳粹老战士年会时，现场发生了爆炸，“好几名党内老同志被炸死，损失相当大”。



“文洛事件”的策划者施伦堡

原来就在1939年11月8日下午，希特勒由他的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一个秘书陪同，从柏林乘飞机抵达慕尼黑。他要到慕尼黑东南郊一家名叫贝格

勃劳凯勒的大啤酒馆，亲自参加“纳粹政变纪念日”活动，并要发表演说以鼓舞士气。因为正是在16年前的1923年11月8日晚上8点45分，在几百名纳粹党徒的簇拥下，希特勒站在这家大啤酒馆的桌子上，喊出了“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发动了政变。

纳粹成功登上德国政治舞台之后，每年都要在这家啤酒馆举行纪念活动，希特勒亲临现场发表演说。1939年的这一天也不例外。

不过由于战争的原因，希特勒坚持要在当晚赶回柏林。他专机的飞行员担心大雾会影响回程的飞行，建议希特勒改乘火车返回，因此晚上的纪念活动只得缩短时间，希特勒的演讲改在晚上8时提前进行。

当晚8时，希特勒身穿深褐色党卫军服，在约瑟夫·戈培尔和其他随从的陪同下走进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登上讲台。讲台后面以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为背景，党旗后面有一根巨大的石柱。当时希特勒并不知道，石柱里面正藏着一枚定时炸弹，是由一个叫格奥尔格·埃尔塞尔的年轻人制作的。炸弹上面的计时器正在悄无声息地走着，它已经被设置好了爆炸的时间。只要时间一到，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将同这根石柱

子一起粉身碎骨。

格奥尔格·埃尔塞尔被称为“孤独的投弹手”。这个出身贫寒的德国共产党员是德共属下一支准军事力量“防卫军”中“红色先锋营”的一名成员。他在1938年秋就作出了要刺杀希特勒的决定。因为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纳粹势力在德国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刺杀希特勒变得更加艰难与危险，但仍有许多人选择使用暴力来对抗纳粹，36岁的格奥尔格·埃尔塞尔就是其中之一。

1939年8月初，埃尔塞尔离开家乡来到了慕尼黑。他随身携带了一个木质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工具：刨子、锤子、锯子、锉刀以及藏在特殊夹层里的炸弹，除此之外，他还带有50公斤炸药、6个计时秒表以及雷管、电线、电池。埃尔塞尔用自己的真名登记，在找到住处以后，开始了暗杀希特勒的准备工作。

埃尔塞尔每晚9点左右来到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用餐。大约一小时之后，他会悄悄溜到一个贮藏室里，直到啤酒馆关门，大门上锁为止。此后他便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7时半左右。此时，啤酒馆的工作人员来上班了，他便悄悄从后门

溜出去。

11月2日晚上，经过两个月艰苦的工作，埃尔塞尔终于将炸弹安放进了石柱，计时器也准备完毕。他把爆炸时间设定在11月8日晚上的8点45分，往年希特勒的演讲都是在8点30分准时开始，到9点30分准时结束，前后持续一个小时。而到了8点45分的时候，他的演讲将进入高潮。因为这个时间是他人生转折的一个标志，也是德国当代史的一个标志。

可是，当天晚上8点希特勒一走进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后，就提前开始了他的演讲，省去了往年那些老一套的开场白和对1923年纳粹党发动的那次叛乱的赞扬，因为他心里一直惦记着当晚赶回柏林的事。这一次希特勒演讲的重点是猛烈抨击丘吉尔和英国政府，以他天生的演讲才能为那些狂热的纳粹党徒打气。希特勒的这次演讲出人意料地只持续了三十来分钟，就在一片喧闹的掌声与欢呼声中结束了。大约在8点30分左右，他在一群纳粹高层的簇拥下提前离开会场，迅速向火车站赶去。而埃尔塞尔设计的爆炸时间却是在8点45分。就是这十来分钟之差，让希特勒躲过了一劫。如果他晚走十几分钟，世界未来的局势将发生怎

样的变化就很难说了。

原先有3000多人的大厅，这时只剩下大约100来人，这些人大多是演奏音乐的人和清理杯子的酒吧服务生。在8点45分的时候，石柱里的那颗定时炸弹准时爆炸了。爆炸达到了预期效果，大厅中央放置炸弹的石柱被炸得粉碎，同时还炸塌了楼台和大厅的屋顶。石柱附近的桌椅成了木头碎片，演讲台成为一堆粉末。爆炸造成8人死亡，至少62人受伤。

就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一片狼藉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踏上了返回柏林的火车离开了慕尼黑，当火车中途停靠在纽伦堡时，他才得知爆炸的消息。

炸弹爆炸时，埃尔塞尔已经来到了通往瑞士边境的途中。由于欧洲大陆又一次燃起了战火，这里的边境检查更加严格。他来到边界栅栏附近准备越境时，不幸招来德国边防军士兵的盘问，他被捕了。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出卖了他——当时他身上除了带有一把剪断栅栏的钳子外，还带有一张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明信片，一根引信，一枚“红色前线战士协会”的徽章和几张制造炸弹的图纸。真不知道埃尔塞尔事先为什么没有将这些东西处理掉，难道说是要留作纪念吗？



慕尼黑啤酒馆爆炸事件中希特勒意外逃脱

经过五天漫长的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埃尔塞尔到底顶不住了，终于在11月13日招供了。不过他并没有供出任何共犯，并且声称没有得到任何外国的帮助。他刺杀希特勒完全是出于信仰和对纳粹政权的仇恨。那些审讯他的纳粹党徒见再也问不出什么新的名堂，就把他送到柏林城外的集中营关押起来。1945年2月，格奥尔格·埃尔塞尔被转移到慕尼黑郊外的达豪集中营，最终死于党卫军的枪下，连尸体也被残忍地焚烧了。

格奥尔格·埃尔塞尔事件发生后，希特勒大发雷霆。不过，他并不相信这只是个普通的德国人的个人行为，而认定此次暗杀行动是由英国情报部门策划并

实施的。尽管并没有任何情报能证实这起爆炸事件同英国有关，但纳粹当局还是以这起爆炸事件为由头，悬赏20万美元寻找英国情报部门与暗杀有关的线索。德国的新闻界也跟着起哄，一时闹得尘嚣甚上。希特勒本人也决定立刻对英国人实施“报复”，命令取消原定的那个“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决定以英国的荷兰情报站为突破口，武力绑架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两名英国特工，并把他们押送到柏林。

既然元首已经作出了决定，海德里希只有立即执行。他找来一位擅长绑架的下属——党卫军一级突击队大队长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命令他带领20名精心挑选的党卫军士兵前往荷兰配合施伦堡完成这一任务。冷酷的瑙约克斯是执行这种任务的行家里手，德国保安局的暗杀、绑架等活动大都由他负责。接到命令后，他立即带领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士兵出发了。

11月9日一大早，施伦堡与匆匆赶来的瑙约克斯仔细商量了行动计划，一行人乘车从杜塞尔多夫出发了。与此同时，施伦堡通知了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的史蒂文斯和贝斯特，约他们下午2点30分在荷兰边境的文洛小镇那家咖啡馆见面，说是有重要情报告诉他

们。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还不知道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发生了爆炸事件，出于对施伦堡的信任，他们决定如约前往文洛小镇同他见面。

下午2时左右，施伦堡按照约定时间提前来到了荷兰境内文洛镇的巴克斯咖啡馆。这是一家很普通的边境咖啡馆，遮阳篷上装饰着带条纹的图案，附近有一个不大的儿童游乐场，一切似乎都很平静。然而，就在距离边境线不远处的德国境内，瑙约克斯和他手下的党卫军士兵已经埋伏在一个隐蔽点里，正在紧张地等待着施伦堡发出的信号。

大约2时20分左右，贝斯特开着那辆蓝色别克牌汽车，沿着狭窄的街道缓缓驶来。这辆车里总共有三个人，除了贝斯特之外，还有史蒂文斯和荷兰情报人员克劳普。快到那家咖啡馆时，他们似乎发现了气氛有些异常，因为有人在一个拐弯处探头探脑地朝这里张望，于是他们立刻把车停了下来，并且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武器，将子弹顶上了膛。他们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觉得并没有什么异常，于是就把车子慢慢地开了过来，最后停在咖啡馆前面。他们的一举一动被站在咖啡馆门前的施伦堡看得一清二楚。施伦堡看到绑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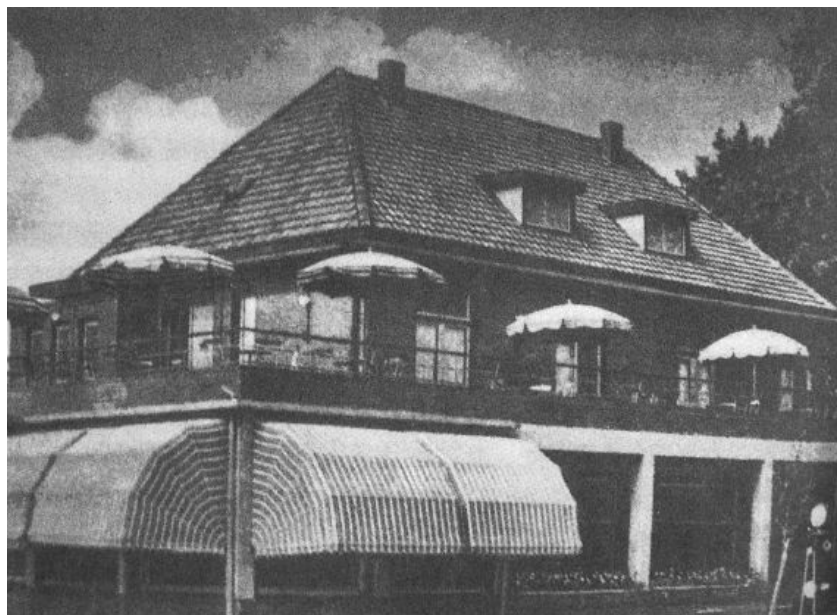
的时机已经成熟，马上向璫约克斯发出了行动的信号。

正当史蒂文斯他们停下车来准备下车时，一辆深褐色的敞篷军用大卡车从德国方向呼啸而来，撞断了边境栏杆，径直朝咖啡馆冲来。车上满载着配备自动武器的党卫军士兵。据守边境哨所的荷兰士兵不知所措，正要上前阻拦时，两名党卫军士兵开始用冲锋枪扫射，两名荷兰哨兵当场倒在血泊之中。贝斯特一见事情有变，立即发动车准备逃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那辆大卡车已经冲到了咖啡馆门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璫约克斯和四名党卫军从还没有熄火的车上跳下来，打开别克车的车门，把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从车内拉了下来，并且抢走了他们的公文包和散落在车上的所有文件。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被戴上了手铐。荷兰特工人员克劳普见势不妙，马上掏出了手枪，但是两支冲锋枪同时向他扫射过来，克劳普的身体几乎被打成两段。

璫约克斯命令手下把贝斯特和史蒂文斯拖到大卡车上，调转了车头，向德国方向驶去。英国情报局在荷兰最重要的两个特工贝斯特和史蒂文斯就这样落入

了德国人之手。他们当天就被押到了柏林，扔进了保安局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8号的地下室里。

文洛小镇的旅馆，史蒂文斯和贝斯特就是在这里被绑架



希特勒对这次绑架行动十分满意，他在总理府里亲自接见了施伦堡、瑙约克斯和其他参加行动的党卫军人员，并授予他们每人一枚铁十字勋章。

这就是英国情报史上不堪回首的“文洛事件”。

阴差阳错的悲剧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被捕之后显得十分紧张不安，他们深知纳粹党卫军审讯人员的残酷。在此之前，英

国秘密情报局并没有对情报人员进行训练，告诉他们一旦被捕后应该怎样对付审讯，怎样保守秘密。此时，史蒂文斯与贝斯特唯一期望的就是，那些盖世太保们不要对自己进行严刑逼供，否则他们肯定受不了。史蒂文斯还一直惦记着那份没有来得及销毁的英国特工名单，因为这份名单上，除了有英国派往荷兰的特工的名字和潜伏地点之外，还有英国派遣到欧洲各地的特工人员的名字。他为此感到由衷的羞愧与自责。

史蒂文斯和贝斯特没有经受得住盖世太保的严刑拷打，采取了同德国人合作的态度。因为还没有等到盖世太保们挥动皮鞭，史蒂文斯已经崩溃了，他把所有知道的事情和盘托出。史蒂文斯知道得太多了，以至于盖世太保们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才把他说出来的东西消化掉。后来德国的情报机构把他们招供的内容汇编成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英帝国的情报工作报告》。他们把这本书发给纳粹情报机关的特工们，差不多是人手一册，供他们学习借鉴。在这份厚厚的书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况被介绍得一清二楚。这真帮了那些纳粹特工的大忙。

由于贝斯特与史蒂文斯和德国人主动合作，他们在纳粹集中营不但没有受到酷刑，反而受到了特别的优待。在整个关押期间，他们还享有娱乐健身活动，不时到集中营外边打打网球，甚至还能到慕尼黑大戏院去享受一番，当然，他们身后还是有人跟踪的。尽管如此。他们仍担心盖世太保会把他们两人杀了，那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他们在集中营里度过整个战争时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们才恢复自由。史蒂文斯还当了一名翻译，但是他的后半生却极为凄凉。

贝斯特出狱后回到了乡下，一直在乡间居住。尽管他远离政治中心，但是当英国政府把“文洛事件”的全部责任推给秘密情报局的时候，秘密情报局又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贝斯特的身上。英国秘密情报局中的一些人甚至还苛刻地认为，他们俩还真的是要感谢德国纳粹。正是由于纳粹把他们抓去了，他们才保住了一条性命，活到战争结束，而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在战场上牺牲，或者是死在当年的伦敦大轰炸中。面对这样的非议，贝斯特并没有过多的在乎。随着战争的结束，一切都成为历史；何况当年战争来临的时候，自

己并没有袖手旁观，应该说同样是出生入死战斗过。在那样的年代又有谁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贝斯特怀着平静的心情居住在自己乡间的房子里，活到了90多岁才寿终正寝。

不过这起“文洛事件”，的确让英国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使得他们在欧洲大陆苦心经营的情报系统濒于瓦解。贝斯特和史蒂文斯领导的谍报网曾经是英国情报机构获取纳粹情报的重要渠道。由于他们的被捕，整个谍报网群龙无首，完全瘫痪了。八个月后，法国的沦陷实际上断送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情报活动，军情六处的活动也不得不从零开始。

由于这次事件的发生，德军内部那个“黑色乐队”从此也销声匿迹了。那些本来准备推翻纳粹政权的将军们这时也不得不小心起来，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时时都在提防盖世太保找到什么把柄。这个反纳粹组织也名存实亡了。

“文洛事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情报战线的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克制不复存在，坐在咖啡馆里刺探情报的时代从此结束，使用武力成为家常便饭，情报战由此开始升级了。

其实整个“文洛事件”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是一场连孟席斯和他的整个秘密情报局都无法预知的阴谋。这次事件还出现了另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就是孟席斯的对手、希特勒的谍报局长威廉·弗兰茨·卡纳里斯。

卡纳里斯1887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十分富有且颇具权势的家庭。1905年他怀着崇高的爱国心加入了德意志帝国海军，1916年夏天，他被德国间谍机关派往西班牙，开始了自己的情报生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卡纳里斯由于以前的海上服役经历而被委派去指挥潜艇，先后在“柏林”号、“西里西亚”号巡洋舰及威廉港分舰队司令部任职，参加过多次暗杀行动。1923年，卡纳里斯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中与戈林的结识是他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当时他信誓旦旦地向戈林表示，可以协助希特勒上台。

戈林听后大喜过望，在他的引荐之下，卡纳里斯向希特勒送交了有关德军全体军官的材料，这些材料详细记述了德军军官的政治倾向和经济情况。这对希特勒日后控制德军军官层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3年1月，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总理冯·施莱歇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准备通过立法来取消容克地主的津贴，以此缓和失业危机。为了保密，施莱歇把这一改革方案的文件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内。卡纳里斯神通广大，竟然将文件的副本偷出来交给了希特勒。希特勒拿到文件副本后有了十足的政治资本，当他把文件摆在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保罗·冯·兴登堡面前时，基于保护容克地主利益的需要，兴登堡不得不把施莱歇赶出了内阁，希特勒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德国的总理。

自此，卡纳里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35年起任隶属陆军部的谍报局局长，曾先后参与过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苏联入侵的活动。但是卡纳里斯对希特勒也是颇有不满，他曾经私下对心腹说：“我觉得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如果遭受失败，无疑是个灾难；但如果希特勒获胜，那将是更大的灾难，因此谍报局不要做哪怕使战争延长一天的事。”

卡纳里斯对希特勒的不满与日俱增，他想通过各种手段来阻止希特勒的对外扩张。作为情报局的头目，他所能做的当然就是把希特勒的计划透露出去，

让希特勒不敢贸然行动。

当然，对于卡纳里斯在德国的政治倾向，英国秘密情报局早就熟知了，因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秘密情报局的谍报人员马希尔就对孟席斯说，卡纳里斯对希特勒有很大意见，可以争取过来。但是，卡纳里斯是德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领导人，秘密情报局深知这项工作的艰难。

但是，不管英国秘密情报局怎样推测，卡纳里斯自己正在设法与秘密情报局取得联系。而且，卡纳里斯还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手是与国外取得联系，与西欧国家谈判一下停战协议；另一手是准备在国内发动政变，逮捕希特勒等人。



“纳粹谍王”卡纳里斯

卡纳里斯把与外国联系的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属下奥斯特。作为人事处长，奥斯特掌控着谍报局的整个电讯联络系统，这为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奥斯特找到了秘密情报局的联系人路德维希·米勒，让米勒来往

于德国与英国之间。

希特勒进攻西欧的“黄色方案”计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传出去了。希特勒大为恼怒，立刻让卡纳里斯去调查。调查自然是毫无结果。不过，希特勒毕竟是老奸巨猾，既然敌人已经知道了“黄色方案”，干脆来个将计就计。在德军A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斯泰因的建议之下，攻击方向改为人迹罕至的阿登山区，然后攻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趁势再从西、北两个方向进攻巴黎。至于进攻的时间更是一再改变，这样就使奥斯特屡次向西欧国家提供了虚假的情报，以至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对奥斯特情报的信任大打折扣。

1940年，希特勒进攻北欧，卡纳里斯让奥斯特把这个消息告诉秘密情报局，但是秘密情报局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竟然置之不理。

卡纳里斯的屡次报告毫无效果。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国的空军突然盘旋在荷兰上空，一场突击战斗就这样打响了。毫无准备的荷兰自然是失败了。秘密情报局对德国的突袭十分惊诧，在世人的批评声中，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除此之外，卡纳里斯还建立了自己与秘密情报局

的联系渠道，那就是通过英国海外情报站伯尔尼情报站进行活动。1939年，波兰被德国占领，波兰驻德国的军官希曼斯卡上校的夫人就成为中间的联系。而卡纳里斯也派出了一名属下到瑞士，并以外交身份保护希曼斯卡夫人，许多机密情报就是这样迅速传出，交到了伦敦秘密情报局的手中。

当初，最先与英国秘密情报局驻海牙情报站站长史蒂文斯联系的人是费希尔。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费希尔竟然是一个双面间谍。几年前，他决然地反对纳粹的独裁统治，并且面对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逃出了德国。但是他马上又开始后悔了，就通过关系打探自己是否还可以为德国政府效劳。当时德国正是用人之际，有这样一个愿意为国家效力的人，何乐而不为呢？

费希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家伙，他顺利打入了反对希特勒地下组织的内部，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当费希尔与贝斯特见面的时候，他宣称德国统治阶层内部有一个反对希特勒的地下组织“黑色乐队”，很多高级军官都在里面。但是费希尔对这些高级军官的情况却始终缄口不言，这无疑是给英国秘密情报局

留下了一个悬念。

其实早在战前，英国就知道了德国阵营内部有人对希特勒不满，甚至在德军总参谋部内也有反对希特勒的密谋活动。张伯伦政府虽然对德国宣战，但苦于军备虚弱，不敢真正大规模对德军作战。如果英国能“通过某些渠道”直接向德军呼吁，很可能取得极有价值的成果。

不过，丘吉尔反对同德军妥协。但是，他的反对无济于事。尤其是当卡纳里斯为首的情报局特务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大英帝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也不免让英国人感觉可信。在贝斯特和史蒂文斯与德国人接触的时候，孟席斯最希望他们在文洛小镇见到的，应该是希特勒的谍报局长卡纳里斯将军。

所以，1939年11月9日对孟席斯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他觉得自己正在执行一场伟大的任务。这个任务一旦成功，历史也将会重写。他在办公室焦急地等待着来自荷兰情报站的消息。英国若是能够采用这样的方式来改变这场战争，那么无疑将会是孟席斯最大的功劳，从此可以叫任何怀疑自己能力的人闭嘴。

那天凌晨5点钟，贝斯特与史蒂文斯在荷兰情报军官克洛普的带领之下，前往荷兰的文洛小镇时，心里也有一种使命感。他们认为马上就要见到的是一位反希特勒的德国领导人。贝斯特与史蒂文斯想象着，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将要因他们而改变，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飞黄腾达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

当时在车上，贝斯特一直在不停地抽着香烟，或许只有吸烟才能掩饰住他内心的激动。史蒂文斯当时则是不停地在记录着什么。当贝斯特问他在干什么时，史蒂文斯说，他正在列出一个荷兰秘密情报局的谍报人员名单，一旦欧洲的战事发生改变，这些谍报人员就能全身而退。但是他们当时谁都没有想到，正是那个“斯切梅尔上尉”——施伦堡，改变了“文洛事件”最后的结果。

施伦堡是以德国最高统帅部运输部的霍普特曼·斯切梅尔上尉的身份出现的。遗憾的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太不专业了，否则这个“斯切梅尔”究竟是不是档案中的斯切梅尔，是很容易搞清楚的。

“文洛事件”发生后，卡纳里斯的谋划也彻底地落空了。从此他完全失去了英国人对他的信任。后来任

凭他如何向英国人解释，为他们提供情报，但英国人就是不予理会。不久以后，希特勒不仅解除了卡纳里斯谍报局长的职务，而且还把他送上了绞刑架。

“文洛事件”发生之后，英国的秘密情报局也经历了一场大的变动。当时丘吉尔已经是英国的首相了，他极力建议成立一个联合情报机构，并打算将秘密情报局撤销。但是，海陆空三军的情报部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根本不希望自身的权力受到限制，因此纷纷反对。

于是，孟席斯也因此而得以继续在幸存下来的秘密情报局中任职。

不过，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孟席斯的秘密情报局也发生了新的改变。他依靠密码学校的力量，不仅成功地破译了德国的“哑谜”密码，而且制造了“超级机密”，协助英军屡建奇功——秘密情报局从此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第四章 仿造“哑谜”，“超级机密”克敌制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实施“黄色方案”，长驱直入横扫欧洲，“哑谜”发出的“埃尼格马”密码更是如天书无人能破译；不料“黑色乐队”爆出惊天秘密，布莱奇雷庄园由此变得更加神秘。英国情报局仿造出“炸弹”终于成功破译了德军密码，“超级机密”从此成了英国克敌制胜的法宝，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在伦敦大轰炸中折戟沉沙。

仿造“哑谜”密码机

英国记者安东尼·布朗写的《兵不厌诈》一书在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军与德军在北非战场决战时有这

样一段话：

阿拉曼战役一开始，隆美尔军队失败的命运就注定了。……隆美尔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都被“超级机密”暴露。隆美尔成了最没有希望的将军了。他给希特勒的一系列密电，蒙哥马利都通过“超级机密”看到了……而希特勒发给隆美尔的复电，蒙哥马利有时甚至比隆美尔看到得还要早……

那么，什么是“超级机密”呢？

这还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数年前德国纳粹使用的一种特殊密码说起。

早在1938年8月，战争的火药味已开始在欧洲弥漫了，敏感的人们已感觉到战争迫在眉睫了。英国人的神经也不可能迟钝，他们急切想得到德国的确实情报。此时46岁的孟席斯是秘密情报局的副局长，兼任陆军部军事情报处德国科的科长。因此他的重任就是监视、搜集有关德国意图和德军的实力及部署的情报。

为了解德军的情况，英国所有的情报机器都动起来了，有关第三帝国的军事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到孟席斯手中。但是，英国政府要迅速而准确

地掌握希特勒的秘密，光靠情报部门的官员同德国军官的闲谈是不够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掌握德国的电报密码，特别是军用密码。

但是“文洛事件”之后，德国人不断地更换电报密码，再加上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情报网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英国秘密情报局进入了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

此时，欧洲战场上风云突变，德国人迅速在北欧登临，并实施了蓄谋已久的“黄色方案”。1940年4月，希特勒集结陆军、空军入侵比利时、法国，所向披靡，横扫欧洲，很快就占领了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和比利时。

6月3日，德军占领了巴黎，德国法西斯的旗帜挂上了埃菲尔铁塔。这时，滞留在法国领土上的近50万英法联军也被迫后撤到敦刻尔克，随之而来的就是二战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撤退从1940年5月26日开始进行，至6月4日结束，历时9天。此次撤军共有338226人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其中英军约21.5万人，法军约9万人，比利时军约3.3万人。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同时动用各种舰船861艘，其中包括渔船、客轮、游艇和救生艇等

小型船只。短短10天时间，这支前所未有的“敦刻尔克舰队”把34万大军从死亡陷阱中拯救出来，为盟军日后的反攻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创造了二战史上的一个奇迹。



敦刻尔克大撤退

在整个撤退过程中，有226艘英国船和17艘法国船被德军炮火击沉。英国空军在掩护撤退过程中总共出动2739架次，损失飞机106架。英军战斗机和地面高射炮火击落德机约140架。有一艘“兰开斯特里亚”号豪华邮轮，被征用为撤退军事运输船，被德军炸沉，死亡至少3500名英军士兵。英国政府事后一直封锁信息，近年才得解密。

就在军事上溃不成军的同时，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欧洲战场上的情报战也同样是损失惨重。因为随着许多国家被占领，英国在欧洲大陆的谍报机构土崩瓦解，它的海外联络站点被迫撤销，谍报人员逃的逃，散的散，狼狈万分。在这样的大战时期，情报机构就是军队的耳朵和眼睛，这时突然失聪失明了，让各个军种对秘密情报局深感失望，一时怨声载道。

不过，孟席斯却是镇定自若。在德军大举进攻之时，孟席斯正在组织人马破解德军的军事密码，此时已经有了重大进展。

希特勒在获取德国政权后，就使用了一种不同于当时所有国家使用的新的军事密码，这种军事密码就是由“哑谜”密码机编制的，人称“埃尼格马”密码。“哑

谜”密码机被广泛地运用到军事上，而且实验证明，“哑谜”密码机方便实用，很难破解。尽管多年以来，英国秘密情报局已经成功地截获并破译了德国的多种军事、外交和商业密码电报，但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容易。

早在1938年7月，英国秘密情报局驻柏林情报站的代号为“1200”的情报员报告说，德国陆军正在试验一种叫“哑谜”的密码机。此事被报告给了秘密情报局负责人辛克莱。辛克莱于是就交给孟席斯一项任务，要他弄清这个机器是怎么回事。

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孟席斯很快就搞清楚了，原来“哑谜”是一个名叫胡戈·科赫的荷兰人发明的机器。科赫于1919年10月在海牙取得了一项“秘写器”的专利权，后来将其转让给德国的工程师和发明家奥特舍尔比乌斯。奥特舍尔比乌斯根据胡戈·科赫的设计方案造成了一台机器。

机器造成后，奥特舍尔比乌斯又根据爱德华·埃尔加爵士的《谜语的变化》一书的说明，把这台机器称为“哑谜”。奥特舍尔比乌斯的模型是简单的旋转密码机，在1923年国际邮政协会大会上首次公开展出。

1924年，德国邮局用“哑谜”密码同国会互致贺词。这部机器在美国的《无线电新闻》上宣传过，也在维也纳犯罪学研究所科学部主任西格弗里德·特克尔博士写的一本书中提到过。

奥特舍尔比乌斯又把“哑谜”的专利权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当时，希特勒已经当政，德国部队的重新武装和改组正在进行。德军统帅部的将军们走遍实验室和工厂车间，搜索一种能够保守机密的新型密码机，于是就发现了这种机器。

当时对“哑谜”进行评估的是德军的埃里希·菲尔基贝尔上校。菲尔基贝尔上校后来当上了德国军队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通信兵首脑。菲尔基贝尔上校对这部机器进行了试验。试验表明“哑谜”价格低廉、坚实耐用，便于携带、操作和保养，而且能够产生大量密码。菲尔基贝尔上校断定：即使是最先进的译码技术也不能把它破译。如果不知道编码程序，这台机器对于敌人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哑谜”非常适用于军事保密通信。希特勒相信了菲尔基贝尔上校的报告，于是“哑谜”得以进入德国军队的各个领域。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个埃里希·菲尔基贝尔上校，

后来也成了德国反纳粹地下组织“黑色乐队”最活跃的策划者之一。他派人把这个情报首先告诉了法国人。

法国密码解析局的高级军官居斯塔夫·贝特兰将军后来回忆说，1937年的夏天，一个德国人向伯尔尼法国大使馆毛遂自荐，表示愿意为法国工作以反对“第三帝国”，并且声称他自己就是“第三帝国”密码总局的军官。他还说，他的动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他的代号为“来源D”。当时贝特兰将军并不知道代号为“来源D”的那个德国人，其实就是德国负责考察“哑谜”的菲尔基贝尔上校派来的，是“黑色乐队”的成员。

“来源D”的建议很快被报告给了法国密码解析局的官员路易·里韦。但是法国人一开始并不相信，他们认为这个代号为“来源D”的德国人可能是一个德国间谍。

但是，路易·里韦却不这样认为，他说，这可能是一次不能再来的机会，他派了密码解析局的纳瓦尔上尉去到瑞士的首都伯尔尼去了解情况。纳瓦尔对那个代号叫“来源D”的德国人审问了很长时间，然后报告说，他是一个“由于贪婪而叛国的人”。可是据他透露，德国技术人员已经制造出了一部完全新型的编码译码机，这就是“哑谜”。纳瓦尔奉命给这个德国人一

笔“适当的报酬”，希望他能够弄到一台这样的机器，然后再给他一大笔钱。

几天后，“来源D”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再一次见到了纳瓦尔，虽然没有给纳瓦尔带来“哑谜”机器，但是却给了他一本关于使用“哑谜”机的说明书、一本德军军用密码和一本密码译本。当天晚上，纳瓦尔就把这本说明书拍照下来了。第二天，他把这本说明书交还给了那个德国人，同时还给了他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报酬。

纳瓦尔回到了巴黎，向法国密码解析局的高级军官居斯塔夫·贝特朗将军作了汇报。贝特朗认为，有了“来源D”提供的资料，利用巴黎郊区一家工厂的精密工具和生产能力，是能够生产出一台“哑谜”的复制品的。通过阅读“来源D”送来的资料，法国人开始具备了读懂德国最机密的密码的能力。只要“来源D”能继续提供编码的变换情况，他们就能够破译德国人的密码。

1938年7月，孟席斯也得到一个情报，一名秘密情报局驻布莱格的特工吉布森少校向他报告说，他在华沙遇到了一个波兰籍的犹太人，名叫理查德·莱温斯基，此人有不少有关“哑谜”密码机的相关资料，并声

称他曾在德国首都柏林制造“哑谜”密码机的秘密工厂当过技术员和理论工程师。后来因为他是犹太人，就被驱逐出德国了。他向英国大使馆的人提出，可以把这些密码机的资料卖给英国情报局，并且凭自己的记忆和能力，可以为英国制造一台最新式的军用“哑谜”密码机。作为报酬，他要求给他一万英镑并给他及其亲属颁发英国护照和法国居留许可证。

孟席斯接到这个情报后，当然非常兴奋。但是，一向谨慎的孟席斯怀疑这是德国人的圈套——把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驱逐”出德国，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但他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于是马上报告了秘密情报局。秘密情报局让他派出专家与那位犹太人联系，以辨别真假。

孟席斯立即召来两名英国最著名的密码破译专家诺克斯和图林，让他们赶赴华沙去同莱温斯基见面。孟席斯对他们说，如果情报真实，就可协同吉布森把这个犹太人和他的妻子送到巴黎，把他们交给威尔弗里德·邓德代尔司令官照管。邓德代尔当时是英国情报局驻巴黎的情报官员，英国情报机关给他的代号是“2400”。

诺克斯和图林接受任务后，马上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上了“金箭”特别快车，四十八小时内就到了华沙。他们同理查德·莱温斯基在华沙的居里夫人博物馆见面了。莱温斯基肤色黝黑，瘦削驼肩，年纪四十出头。邓德代尔司令官后来说，莱温斯基使他想起“一只拨弄算盘的乌鸦”。

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和甄别，英国秘密情报局认为这个莱温斯基的话是可信的，因此就决定答应他的条件，给了他一万英镑，另外还有英国护照和他及他妻子的法国居留许可证。吉布森少校和另外两个人把莱温斯基和他的妻子护送到了巴黎，由邓德代尔负责照管。

邓德代尔把他安排到塞纳河岸边一座十分隐秘的公寓里，并为莱温斯基复制密码机的工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莱温斯基凭着自己的记忆，不久就大功告成，仿制出了一台“哑谜”机。

莱温斯基仿造的“哑谜”机二十四英寸见方，高十八英寸，装在一个木盒子里。机器两边分别接有两台电动打字机。密码员如要把普通文字讯号变成一个密码文稿，他需要做的只是查一查密码键位本，找出是

哪一个月、哪一天发的电报，然后找出相应的键位，插上插头接通电源，在左边的打字机上打出讯号，电动脉冲就会把这些信息送到线路复杂的转盘上，这样，电文就译成了密码，而后再传送到右边的打字机上。当译成密码的电文传送到目的地时，密码员按照来电的指示，在一台相应机器上按下相应的键，左边的机器上就打出了译成密码的电文，而右边的机器就及时地打出电报的原文稿。

在发明这种密码系统以前，所有的情报机关都是用手工缓慢地、细心地将电文译成密码的。“哑谜”机仅仅是变换了一下编码程序，就能够生产出无数的密码字母。看来这真是一台奇妙的机器，怪不得希特勒那么相信“哑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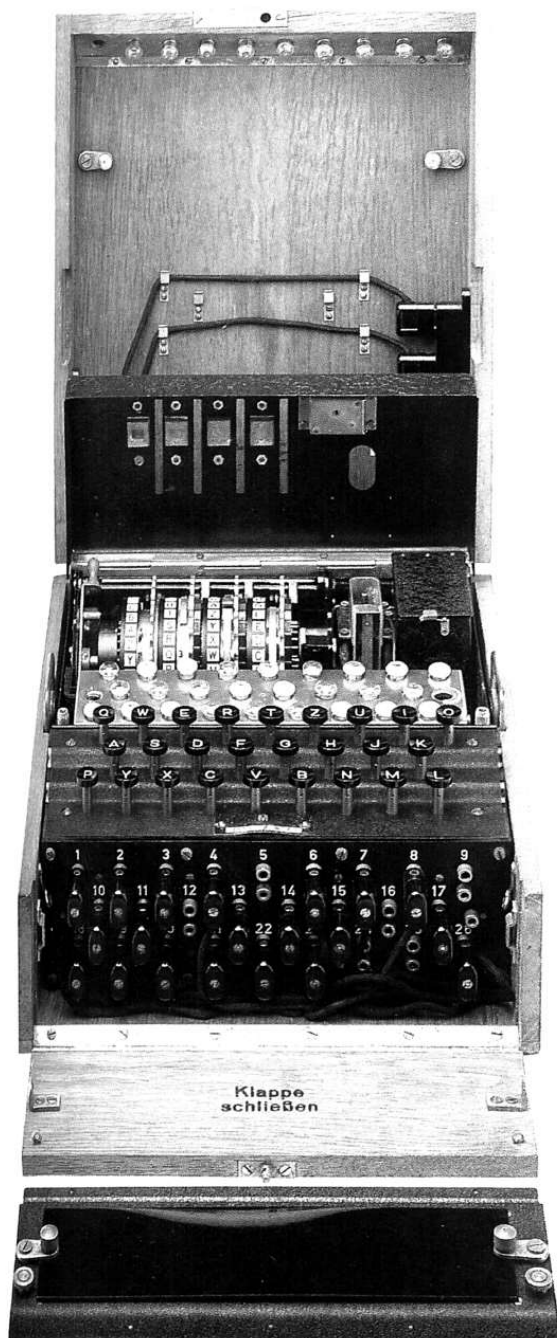
据有关情报说，当时希特勒根据埃里希·菲尔基贝尓上校的建议，让德国从最高统帅部到三军团级司令部全都用上了“哑谜”机，用它来把希特勒、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以及凯特尔主要作战将领阿尔弗里德·约德尔将军和他的全体人员的通讯译成密码；德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也在使用它，甚至连德国的潜艇都装备了这种

机器。

据说，当时希特勒曾批准把“哑谜”机卖给他的盟友日本和意大利。日本人曾把“哑谜”当做海军和外交通讯的主要密码机使用，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也在使用它。后来“哑谜”还卖给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不过对即将当上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孟席斯来说，最重要的是德国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也在他的主要通讯线路上使用这样的“哑谜”机，特别是在柏林和马德里之间使用它。如果英国和德国交战，那么卡纳里斯将是孟席斯的主要对手。

布莱奇雷庄园诞生“超级密码”

不过当时的的问题是，如果要利用“哑谜”机去推断所有德军司令部日日夜夜、成年累月为发布命令而经常变换的编码程序，必须以超人的速度进行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数学运算，这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莱温斯基曾告诉他们说，如果不能掌握它的编码程序也就不能破译德国的密码。因此，还要制造出另外一种机器，来完成“哑谜”真正的实用价值。



埃尼格马密码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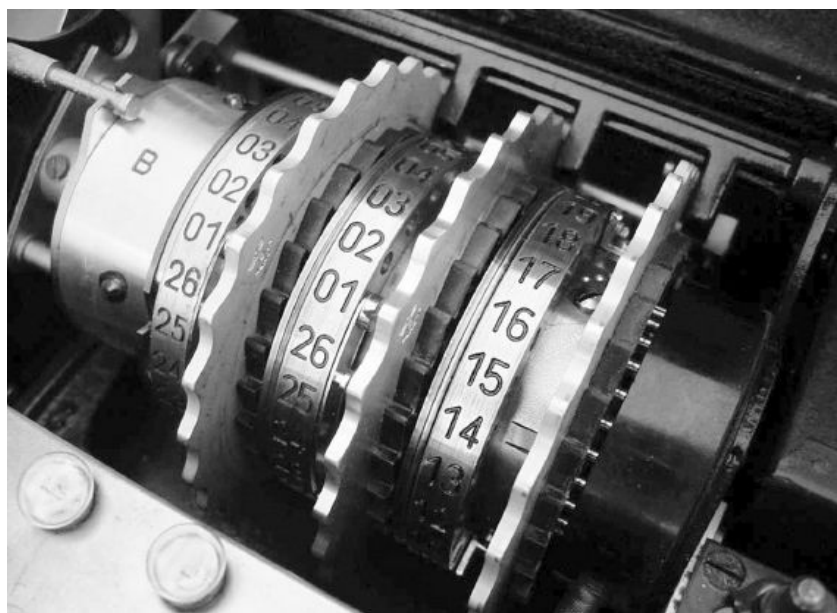
孟席斯命令诺克斯和图林一定要弄清“哑谜”机的编码系统和程序，制造出一种能破译德国人“埃尼格马”密码的机器来。

1938年底，两个密码破译专家和英国的工程师们在莱温斯基提供的有关密码情报的帮助下，很快制造出了一种叫“炸弹”的机器。这种机器不仅能模仿和解释德军使用的上千个“哑谜”的活动方式，还能准确地破译德国主要司令部用“埃尼格马”密码系统发布的电文，推断出他们经常变换的编码程序。

这台“炸弹”密码破译机看上去很像一台老式办公用打字机。它是一个铅色柜子，大约八英尺高，底座大概八英寸宽，其形态看起来像一个老式的有钥匙孔的柜子。它的前部有一个普通的键盘，但是在上端真正打字机键敲打的地方，则是闪现微光的另一个字母的扁平面。当操纵者触动键盘上的某个键时，譬如字母“A”，另一个不同的字母，譬如“P”便闪现在机器上端。操作时密码员按动字母“A”键，电路沿弯曲的复杂线路一连穿过四个转盘，然后撞击反射器，再沿不同的线路返回穿过转盘线路，机器上便闪现出“P”字母。随着转盘的变换，电子线路也随之完全改变，而改变

转盘或线路，就意味着产生一组组新的编码。

按照这种方法译成密码的电文，发给拥有同样一台机器的电报员后，对方把机器的转盘和插头调整到像发送机器一样的位置，那么他只要打出密码，上述发报过程即可颠倒过来，从而准确地还原电文。这台两米多高的机器，实际上是一部最早的机械式数据计算机，可以破译德军的“埃尼格马”密码。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输入和使用人员经验的积累，使用这种机器解密的效率越来越高。



布莱奇雷是英国一座神秘的庄园，位于伦敦郊外一片绿树丛中。它是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但奇怪

的是，在这座装饰华丽的大厦周围，还有不少小窝棚，看上去极不协调。原来，这里就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破译“埃尼格马”密码的机构所在地。那些小窝棚是因为破译工作量增大，庄园的房间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员和设备而仓促盖起来的。英国人将“炸弹”机放在布莱奇雷庄园的三号房子里。三号房是布莱奇雷庄园里的尼森式大房子，是英国情报机构的密码破译中心。

在这座神秘的庄园里，聚集了众多的杰出人才。这些人留着长发，衣冠不整，身着破破烂烂的花呢上衣，皱皱巴巴的灯芯绒裤子，看上去行为又有些古怪。他们有的是数学家和语言学家，有的是国际象棋大师和方格字迹填写专家，也有的是电气工程师和无线电专家，更有银行职员和博物馆馆长。



布莱奇雷庄园。二战期间英国情报人员就是在这里破译德国密码

这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除了在这里工作的人员以外，只有英国国家首脑人物和最上层的情报官员才能到这里来。至于其他人，无论职务高低，一律“谢绝入内”。

这里工作人员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利用这台先进的机器，破译德军发出的“埃尼格马”密码电报。“埃尼格马”密码电文成了整个二战期间英国情报机构最为重要的高级情报来源。由于它的价值无可比拟，英国情报机构为这一超级情报取了个代号“厄尔特拉”。

“厄尔特拉”是英语“ULTRA”的音译，意即“超级机密”。它代表一种新的秘密等级，比英国现行的“最秘密”、美国的“绝密”等级别都要高。后来凡是从布莱奇雷庄园发出的情报一律使用“超级机密”这个代号。

1940年5月的一天，天空明净，阳光明媚。在大选中获胜当上英国首相不久的丘吉尔正在他的办公室忙碌着。这时，已经是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孟席斯走到他的办公桌前，向他递交了一张纸条。此时，孟席斯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光芒。

丘吉尔接过纸条扫了一眼，只见上边写着有关德国空军人员调动和驻丹麦德军的补给分配等详情。这份情报的价值不大，丘吉尔看过之后，就随手将它扔到了桌上。但是，当首相抬起头来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孟席斯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重新拿起情报仔细看着，然后抬头问道：“是它？‘超级机密’？”

孟席斯微笑着站在那里，什么话也没说。其实已无须回答什么了，他那一脸掩饰不住的喜悦早已说明了一切！这张小小的纸条意义非同寻常，它正是英国情报人员在波兰技术人员的协同下，在布莱奇雷庄园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利用“炸弹”破译机破译的第一批

德军通过“埃尼格马”密码系统发出的军事情报。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超级机密”成了丘吉尔及盟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张王牌，德军所有的军事行动对英国秘密情报局来说，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1940年夏天，当希特勒正在波兰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候，“炸弹”几乎成功地破译了德军所有的军事情报。

为了保护这项成就，丘吉尔多次要求孟席斯要保证这台“炸弹”的绝对安全。他曾对孟席斯说：“现在有一个严峻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卫‘厄尔特拉’的安全？因为只要德国人还没有觉察到他们的‘哑谜’发出的‘埃尼格马’密码被破译，这项成果就有着巨大的用处；倘若德国人发现英国人已经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德国人势必作出调整。如果他们更换了另一种发报途径或者是更换了密码，要想再一次破译就难上加难了。”

孟席斯马上采取了一系列严密措施来保卫“厄尔特拉”。在温特博瑟姆的建议下，在德国人将要占领波兰与法国之前，孟席斯同法国和波兰的情报专家们进行了商量，决定将一切有关“哑谜”的重要文件、机器和

人员都集中在英国。几个月后，除了工作需要的材料，波兰人将有关“哑谜”的一切资料都交给了英国人，这些资料在严密戒备的情况下被护送到伦敦。事实证明，这是英明的防范措施。

这时，“炸弹”仍然在布莱奇雷庄园继续运转。当德国人于1939年9月侵犯波兰时，英国和法国终于向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宣战了。孟席斯立即作出决定，有关“炸弹”密码破译机的事一律保密，不得外传，要排除破译人员落入敌人手中的危险。因此，布莱奇雷庄园不但警卫森严，而且凡进入庄园工作的工作人员都被郑重告知，一旦进来就非到战争结束不能出去。

同时还作出规定，凡是通过“炸弹”获得的“超级机密”在英方的文件上或宣传时，一律要进行“伪装”，称这些情报是通过其他来源获得的。比如情报文件开头都要写成是“从字纸篓中获得下列内容”，或者是“据可靠内线来源”等字样。



一名士兵输入电文，另一名士兵读出指示灯照亮的编码字母，记录下来后由电台发射出去

另外，对“超级机密”的分发范围也作了严格的控制，所有这方面的情报仅限于秘密情报局局长、海军情报处处长、空军情报局局长和空军参谋部情报处处长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从不直接下发到集团军司令部以下单位。

最后还规定，凡是有关德军舰艇和坦克活动的情况，都不得由“炸弹”单独采取行动，以免使敌人怀疑其密码安全出了问题。而且在对于德军舰艇和坦克实施轰炸前，必须事先进行一些常规的空中侦察，务必还要让德军的防空雷达能捕捉到英军空中侦察的信息，让他们误以为这种空中侦察就是英军的情报来源。

孟席斯当时还命令建立了特种联络系统，规定今后凡是截获到了“哑谜”密码电报，全部交给英国秘密情报局破译。

由于有了以上的措施，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希特勒一直认为自己的“哑谜”密码机和使用的“埃尼格马”密码系统是绝对安全的。因此德国人还在那里日日夜夜地研制新的密码程序，随时更换新的密码，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正是来自布莱奇雷庄园的“超级机密”，才让英国人对纳粹德国法西斯的还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时英国人取得第一个最大的胜利，就是让希特勒精心策划和发动的“海狮计划”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惨烈的大不列颠战役

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后，希特勒已经占领了整个西欧大陆，现在就只剩下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了。这时北起挪威、南到西班牙的全部太平洋地区已经被德国控制了，大英帝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同时英国在战争中也已经遭受严重的损失。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英国的陆军正在整编，国民警卫军也还在受训，特别是武器弹药奇缺。当时英国只剩下了大约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另外就是幸存下来的700架战斗机和500架轰炸机。至于英国的皇家海军，也因德国海上及空中的封锁，已经失去了与法国舰队联合作战的条件。如果仅凭着这些武器装备要保护数千里长的海岸线，来和希特勒的军队抗衡，实在是有点勉强。所以当时英国处境十分危急。

1940年7月2日，希特勒发布了第一道入侵英国的作战命令，7月16日又发布了具体的作战命令，即“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十六号指令，也就是所谓的“海狮计划”，叫嚷要清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8月1日，希特

勒再次发布了对英进行空海战争的指令。

于是，一场空前惨烈的大不列颠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希特勒的“海狮计划”主要由德国的空军来执行。在8月间，德国空军集结了2669架战机，其中有1015架轰炸机、346架俯冲轰炸机、933架战斗机和375架重型轰炸机，大有炸平英伦三岛之势。

大不列颠战役一开始，丘吉尔就亲临指挥作战，下令将所有能战斗的飞机都投入这场空战。

戈林对英国大规模空中攻势的“鹰计划”是从1940年8月15日开始的。在此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通过“炸弹”已经破译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德国人的空袭路线和出动飞机的数量以及运用的具体战术都一一掌握，并且获悉，戈林对英国大规模空袭的日子是8月15日，他把这一天定为“鹰日”，企图一举摧毁英国皇家空军。

英国得到情报之后，就开始了积极的防御准备，他们布置好合适的火力，对敌人的主攻力量则是集中防御。同时，丘吉尔为了鼓舞人民的斗志，对英国人民宣称：“我们必须把下周左右看成是我们历史上非常

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可同下述时期相比：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在逼近海峡，而德雷克正在打他的滚木球戏的时刻；纳尔逊挺立在我们和驻扎在法国布洛涅的拿破仑大军之间。”

当时已成为帝国元帅的戈林对这次胜利毫不怀疑。他认为，德国空军能够在四天之内，全部摧毁英国战斗机在英国南部的防御，从而为登陆入侵开辟道路。他拥有三支庞大的航空队可以实现这个巨大的目标：第二航空队在凯塞林元帅指挥之下，从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进行活动；第三航空队在斯比埃尔元帅指挥之下，基地在法国北部；第五航空队在施登夫将军指挥之下，驻在挪威和丹麦。前两个航空队总共有战斗机929架、轰炸机875架、俯冲轰炸机316架，第五航空队拥有轰炸机123架和双引擎ME-110型战斗机34架。英国皇家空军保卫帝国本土的力量为700架到800架战斗机。

戈林在8月13日下令在第二天开始实施“鹰计划”。作为战斗的序幕，12日对英国的雷达站进行了猛烈的袭击，五个雷达站被击中并受到损坏，一个雷达站被炸毁。德国人这时还不了解雷达对英国的防御的重要

性，因此没有继续袭击这些雷达站。在13日和14日两天，德国人大约出动了1500架飞机，主要是袭击英国空军的战斗机机场。德国空军损失了47架飞机，英国空军损失了13架。

从8月15日开始的大规模空袭，使伦敦这个大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整整一个月中，变得疮痍满目、浓烟滚滚。

1940年9月15日，丘吉尔一早就从首相乡间官邸契克斯驱车来到设在伦敦郊区的阿克斯布里奇的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所。保卫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的第二大队的作战中心就设在那里。丘吉尔来到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所查看情况，亲临指挥。一场决定性的空战就要开始了。

此时，雷达与高射炮早就处于警戒状态，丘吉尔在俯瞰巨大平面地图台的弧形座位上观察到德国空军在海峡上空集结，英国皇家空军进入相应的准备状态。德国空军的目标是伦敦。“超级机密”已经通知了德军这一意图的所有情况。皇家空军中队长威洛比·德布罗克勋爵命令他的中队在英格兰南部的上空战斗，从一个方块到另一方块，好像是在照管一个轮盘赌。

而在海峡的另一边，德军帝国元帅戈林也在亲自指挥。他穿着雪白的军服，上面镶着金饰，正在格里普涅角高山上的指挥所里眺望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当飞机引擎扇动涡旋的气流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声时，这片宁静的天空即将被洒上血色。超速转动的飞机引擎，增压器开动的吼叫声和空中机枪的扫射声，打破了炎热天空的沉寂。

9月15日中午时分，200架德国轰炸机在600架战机的掩护下，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出现了。天空中像是一大片乌云黑糊糊地涌过来。英军的雷达打开了。德国机群显现在荧光屏上，像一只乌鸦的翅膀滑行在荧光屏上。英国战斗机司令部注视着进攻者的聚集，并且做好了准备。丘吉尔从荧光屏上抬起头来，摸摸额头。空军司令很干脆地下达了命令：“出击！”皇家空军的飞机悉数升空，在距伦敦不远的地方拦截德国机群，憋足了劲的炮弹雨点般朝德国机群里钻。德国人在逼近英国首都以前就遭到拦截，虽然有几架飞机穿过去了，但是很多飞机被驱散了，另外一些还没有把炸弹扔下就被击落。德国机群的队形很快被打散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架轰炸机钻过了弹雨飞向伦敦。德

军战斗机抵挡了一阵后，终因遭受了太突然的打击，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攻击，只好掉头而去。

丘吉尔长长地出了口气。空军司令非常高兴，随即命令战斗机抓紧时间加油、检修，两小时后准备再次战斗。

到了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果然德国空军又开始进攻，一支更为强大的德国机群飞过来了。英军立即派出五个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中队迎战德国第一批机群，英格兰东南地区的上空战火通红。直到下午五点左右，英国皇家空军终于击退了德机的进攻。在这一天的空战中，德国空军未能为入侵创造先机，反被英国空军打得落花流水。英国皇家空军仍然控制着英国的领空。

据英国方面宣布，这一天有56架德机被击落，其中包括34架轰炸机，另外12架在返航和着陆途中坠毁，还有80架飞机是带着满身的弹痕着陆的；而英军在空战中仅丧失了26架飞机，其中包括20架“飓风”和6架“喷火”，另外还有7架伤重报废。

9月15日这一天，是大不列颠战役的转折点，正如丘吉尔后来所估计的，是这场战役的关键。戈林在第

二天下令改变战术，规定白天使用飞机不再是为了进行轰炸，而只是作英国战斗机的诱饵。他吹嘘说，敌人的战斗机“应当在四五天内消灭”。但是希特勒以及陆军和海军的司令们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在决定性的空战之后两天，9月17日，希特勒把“海狮计划”无限期推迟了。

在英国的历史上，英国一直是成功地用海上的力量保卫自己，而这一次却是用战斗机作为盾牌抵御了希特勒的入侵。丘吉尔将这天称为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激烈的一天。二战以后，英国将9月15日定为大不列颠“空战日”，以纪念这一辉煌胜利。

正是由于英国的“超级机密”掌握了德国人的密码破解程序，使德国纳粹的一切举动都暴露在了英国人面前，从而让皇家空军在反击时做到了知己知彼，突击准确，为空战胜利助了一臂之力，终于使这场大不列颠战役成了英国人的希望与辉煌。而德国人在空战失利后，一直都迷惑不解，最后也没弄清英国是怎么预先设防的。

“超级机密”第一次为英国人赢得了大不列颠空战的胜利。

第五章 妙招迭出，纳粹德国屡遭惨败

为了保护“超级机密”，英国人放弃了对工业城市考文垂的防空措施，使德军的“月光奏鸣曲”得逞，考文垂遭到了毁灭性的袭击。但是考文垂的放弃却让英国人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大西洋上击沉了德军的“海上巨无霸”——“俾斯麦”号战列舰，歼灭了德军的潜艇部队“狼群”，保障了自己的补给线的畅通无阻；在北非战场上击败了“沙漠之狐”，让德军元帅隆美尔的“蝴蝶梦”再次破灭；获得德国人制造原子弹的信息，让德国人的原子弹之梦化为泡影……

考文垂上空的“月光奏鸣曲”

大不列颠空战虽然粉碎了希特勒的“海狮计划”，但是英国首都伦敦这座美丽的城市也被炸得惨不忍睹，于是1940年11月8日，英国皇家空军也对德国首都慕尼黑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大空袭。希特勒暴怒了，疯狂地叫嚷：“要对英国进行特别的报复！”

1940年11月12日，“炸弹”发出的“超级机密”告诉英国人：德国空军将在11月14日至15日有月光的晚上，对英国工业城市考文垂市进行毁灭性轰炸，其行动代号就叫“月光奏鸣曲”。

考文垂城建于1043年，市区面积大约30平方英里。当时拥有25万人口，距伦敦100多公里，这里地处英格兰内陆中心，在建筑上、历史上和工业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还是英国主要军火库之一。

考文垂有著名的圣芳济教堂和圣特里尼蒂教堂。14世纪奠基的圣迈克尔大教堂被认为是哥特垂直式建筑最美观的式样之一。16世纪初期建造的半木材建筑福特医院，14世纪圣玛利商会修建的市民活动中心圣玛利大厅都是这里重要的建筑。同时，这里的阿姆斯

特朗-惠特沃斯工厂制造轰炸机，阿尔维斯工厂制造飞机引擎，戴姆勒、希尔等工厂制造装甲车、载重汽车和小轿车。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机床厂也在那里。这一切都将面临毁灭的威胁。

“超级机密”破译的情报表明，除考文垂之外，英国的伯明翰和沃尔弗汉普顿两座城市在11月份有月光的夜晚，也将会分别遭到德军代号为“雨伞行动”和“整块行动”计划的袭击。破译的情报详细地说明了德军空袭考文垂的战术过程。这次空袭由德军著名的战斗机大队100队作前导。德军战斗机大队100队驻扎在布列塔尼半岛上，临近瓦恩的默康是德军的一支导航空军机群。这些飞机将在无线电导航器的制导下飞往考文垂，投下燃烧弹引起大火，作为主要轰炸机群寻找目标的标记。在这次空袭中，他们将要投下约15万枚燃烧弹，1400枚高爆炸弹和130个降落伞地雷。轰炸战斗机大队100队所引起的大火，目的在破坏救火队要使用的总水管，然后扩大火势，使救火队不能集中精力扑灭主要火区，轰炸机将交替投掷燃烧弹和高爆炸弹，采用波浪式轰炸战术。

关于“月光奏鸣曲”的情报送到丘吉尔的司令部

后，英国最高司令部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保卫考文垂。是不是要加强考文垂的防空措施，是不是要提前下达命令对考文垂的消防救护和医院部门发布秘密警告？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被丘吉尔否决了。因为丘吉尔考虑的是，一旦考文垂造成恐慌，英国的损失将更为严重，因为德国的情报局就会感觉到他们的密码系统出了问题。

“先生们，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我的渴望也和你们一样。但是我想到了一个为难的问题，那就是‘厄尔特拉’的安全。我以为，任何超出一般性的防御措施，都会使德国人怀疑到我们已经获得了空袭情报，难免就会怀疑到他们的密码系统出了问题。”丘吉尔突然提高了声调沉重地说，“不！决不能冒着使敌人产生怀疑从而更换更新型的‘埃尼格马’的风险！”

于是，英国人最终作出了一个悲剧性的决定——不加强考文垂的防空力量，只是加强伯明翰和沃尔弗汉普顿两座城市的空防设施。

1940年11月14日晚，皎洁的月光洒满考文垂市，整个城市就像是笼罩在一片银白色的轻纱中。晚上7点刚过，低沉的飞机引擎声隐隐传来，随即尖厉的空袭

警报声响彻城市上空。5分钟之后，德国的飞机在考文垂的上空盘旋，发出刺耳的嗡嗡声。

当天傍晚19时07分，考文垂市民防管理员接到一份紧急电报，上面写着“空袭警戒提高到黄色，德国空军向该市逼近”。3分钟之后，警戒提升至红色级别。工作人员立即通过喇叭在全市广播，提醒市民警戒。然而，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了。毫无思想准备的市民们眼睁睁地看着德军的飞机蝗虫般地飞临城市上空，在他们头顶上轰鸣。让他们感到恐慌的是，英军的防空炮火根本无力阻挡这些空中强盗，只是象征性地向空中断断续续发射着毫无威力的炮弹。

几分钟后，第一批敌机投下了燃烧弹，引起了冲天大火，后继机群以此为标记投下更多燃烧弹和高爆炸弹，考文垂城顿时变成一片火海。“月光鸣奏曲”就这样奏响在整座考文垂城。

德国飞机在连续10小时的轰炸中，投下了509枚高爆炸弹和无数普通炸弹，让考文垂人引为骄傲的圣迈克尔大教堂坍塌了，5万多所房屋被摧毁，许多地区被夷为平地。还有不计其数的输电线路、污水处理系统、铁路都被损坏了。即便是一个星期之后，一些地

方仍旧燃烧着火焰。



千年古城考文垂的标志性建筑在不列颠空战中几乎被摧毁
一个德国的记者称这次空袭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袭击”，他详细描述了整个城市的情况：大地好像是崩裂了，大量熔岩喷向空中。在返航途中，远远望去，1000米高的火一般的烟云，像灯塔一样照得满天通红。

德国人的轰炸机在飞向考文垂的途中，只有一架被击中。情况在伯明翰与沃尔弗汉普顿地区就好得多了，德国人对沃尔弗汉普顿的轰炸行动完全被击败了。德国人知道英国的空防突然加强了，大概他们认为英国人是利用无线电情报系统得到了情报。他们没有怀疑自己的“哑谜”密码已被破译。

考文垂这座著名的工业城市就这样变成了一片废墟，一个曾经繁华的城市就这样变得如此凄凉。很多人都对它被轰炸表示哀悼，为死去的人叹息，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是英国计划的一部分。为了保护他们的“超级机密”，他们只有权衡利弊得失，让考文垂这座著名的工业城市作出牺牲。

《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在空袭之后，立刻前去采访，眼前的一切使他惊呆了，“考文垂现在像是一个遭受地震破坏的城市”。是的，这次空袭中，500多人死亡，其中的100多人无法辨认尸体，只好一块埋葬在

一个公墓里面；800多人重伤，4000多人轻伤。这个城市是为英国的密码系统以及秘密情报殉难了，也是为整个大英帝国殉难了，更是为整个欧洲、整个二战殉难了。它的殉难换来的是光辉灿烂的明天。

击沉“海上巨无霸”

就在考文垂惨剧发生后几个星期内，一些事件证明丘吉尔关于承受一切风险去保护“超级机密”的决定是正确的。

1941年3月中旬，英军通过“炸弹”破译了德国空军和意大利舰队的“哑谜”密码电讯，获悉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计划对在地中海上航行的英国船队进行大规模的袭击，进攻的日期是1941年3月27日。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地中海舰队英军总司令安德鲁·坎宁汉爵士得到“超级机密”的警告之后，立即命令驻扎在那里的英国舰队马上整装待发。这个英国舰队包括3艘战列舰、1艘航空母舰和9艘驱逐舰。

为了不让在轴心国的那些间谍发觉英国舰队的意图，坎宁汉故意身穿便服，带着他的高尔夫球棒上了岸。可是天一黑他就秘密地回到了他的军舰上，然后

派一架森德兰水上侦察机，到意大利舰队的维托里奥·维内托旗舰上空去侦察，目的是让意大利人相信，英国人的情报是从空中侦察得来的，而不是破译了“哑谜”的密码。

3月28日，英国海军的4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同它的分舰队会合后，在马达潘角外同意大利人交上了火，给意大利人来了一个措手不及。大部分意大利舰队被击沉或被严重击伤。

1941年5月上旬，由38艘商船组成的一个英国船队，载着军队、大炮和坦克到埃及去，载着大量的威士忌等普通货物到美国去，分别开进赫布里底群岛以北的大西洋。商船成三行并列前进，由驱逐舰和花型护卫舰组成的护航舰队护航。但在5月7日，平静被打破了。一艘德国潜艇找到了这个船队的踪迹。它是德国海军最新、最精良的“U-110”潜艇，由德国海军中最勇敢、最大胆的舰长之一的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海军上尉指挥。英国的“阿塞尼亚”号被击沉，112名乘客和船员丧生，其中有28人是美国人。

当英国船队通过能看见格陵兰海岸的水域时，伦普又指挥他的“U-110”潜艇再次发起攻击，结果又击中

两艘英国商船。伦普停留在能用潜望镜观察的深度来看攻击的结果。但是他的好奇心却决定了他的命运。这时，英军的一艘小型护卫舰看见了他的潜望镜，立即用十枚深水炸弹组成的爆炸网轰击这个水域。不一会儿，伦普的这艘“U-110”潜艇浮出水面，它的船身和炮塔平台被打得弹痕累累。

英军舰长约翰·贝克—克雷斯韦尔在他的“猎犬式”驱逐舰上，正要指挥他的驱逐舰去撞击潜艇，但是他发现潜艇上德国士兵正在向水中跳，于是他就决定把德国人的这艘潜艇俘获。

“猎犬式”驱逐舰上的英军登上潜艇后发现，“U-110”潜艇完全被德军放弃了。潜艇上有完整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密码本、收发讯号纸卷、技术图表和手册。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台“哑谜”机就摆在那里。它的操作指示、手册、密钥表和空轮全在。于是这艘完好无损的“U-110”潜艇就被英军给拖走了。贝克—克雷斯韦尔用他的最高级密码通知了英国海军部，报告了自己的战绩，然后就向冰岛驶去。

当时所有参加这次战斗的英军都得到各种荣誉，但是却被警告不准泄露俘获潜艇的事。这件事一直保

密了二十多年，直到1966年，英国海军部才允许公布俘获德军“U-110”潜艇的经过。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长期以来大部分的物资来自进口。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很多物资都是从殖民地漂洋过海运过去的。因此，只要切断了英国的供应线，就是断了大英帝国的补给线，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了。希特勒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他说：“英国的补给线被切断之日就是它不得不投降之时。”丘吉尔也是再三强调，英国人民的一切都源于这条生命线，整个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胜利。

德国在扩军备战的时候，开始无限制地制造潜艇。潜艇花钱少，见效快，威力也很大。德国的海军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认为，德国与英国进行海上作战主要就是进行吨位战，以此击沉英国的商船，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对英国的作战胜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前四个月里，德军潜艇先后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3万吨级的战舰、2万吨级的航空母舰和114艘商船，这些战果对德国来说是一种

辉煌，对英国人来说却是奇耻大辱。

俘获“U-110”潜艇，并缴获了潜艇上的“哑谜”机和德军的秘密文件之后，英国秘密情报局及时破译了德军海军最近更换的密码，于是开始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又成功地摧毁了德军的“埃塔普”舰队。

“埃塔普”舰队是德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立起来的一支特殊舰队，它是二战时期向德国海军提供情报、食物和燃料的工具。到了1941年，“埃塔普”在海上拥有许多大型的现代化的补给船，专门向在北大西洋英国供应线上进行阻击和抢劫活动的德国强大水上作战舰队提供补给。成功地摧毁了德军的“埃塔普”舰队后，那些德军舰队没有了情报来源，同时也断绝了补给，这为英国人保障自己的补给线，有力地打击德军在大西洋的舰队提供了前期保证。

摧毁德军的“埃塔普”舰队之后，英国人又对德军大西洋舰队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其中最大的战果就是击沉了德军当时称为“海上巨无霸”的“俾斯麦”号战列舰。

“俾斯麦”号战列舰是纳粹德国海军的一号舰。它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所建造的最大的、也是火力最强的战列舰。德国人为了纪念19世纪德国“铁血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特地把这艘战舰命名为“俾斯麦”号。

“俾斯麦”号在1939年2月14日下水，于1940年8月24日正式服役。首任舰长为恩斯特·林德曼海军上校。

“俾斯麦”号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任务，就是在1941年5月18日实行的莱茵演习行动，伴随它一同出动的还有德军的重型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和多艘战舰。舰队当时由德国海军上将刚瑟·吕特晏斯指挥，主要目的是袭扰盟军的船舶以使英军派出护航运输队，转移地中海的英国皇家海军力量，令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的部队能顺利由克里特岛入侵利比亚。

在这次海战中，“俾斯麦”号被三发炮弹击中，二号燃料槽受损破裂，泄漏出大量重油，但其损伤程度相较于英国人的惨重损失，实在是微不足道。因为“俾斯麦”号在不到10分钟内，便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最引以为傲的舰队。



海上巨无霸“俾斯麦”号战列舰

丹麦海峡的海战失利之后，英国人通过他们的“超级机密”，很快就确定了“俾斯麦”号的位置和行动意向，于是就集结了大量的军舰前来围击，这其中包括约翰·托维上将指挥的本土舰队和詹姆斯·索默维尔中将指挥的地中海H舰队。5月24日，“俾斯麦”号遭到从“胜利”号航空母舰上发射的剑鱼式鱼雷机的攻击，但仅造成了轻微的损伤。随后“俾斯麦”号转向前往法国圣纳泽尔以修理损伤。此时它的行动更加缓慢，英国海军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俾斯麦”号马上就要被擒获。

可是到了5月25日凌晨3时左右，“俾斯麦”号却突然失踪了，监视它的英军“萨福克”号失去了它的消

息，受伤的“俾斯麦”号在茫茫的大西洋里自由地游弋了大约30个小时。此时，“俾斯麦”号的舰长以为已经甩掉了追捕者，于是向柏林发电报告局势。但是在5月26日8时52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炸弹”准确无误地截获了这个电报并且及时破译了它，于是，“俾斯麦”号的位置又在英军的海战图上确定下来了。“俾斯麦”号正全速向布列斯特前进。

英国人马上从北爱尔兰的洛厄恩派出了海岸巡逻机进行空中侦察，其中一架飞机发现“俾斯麦”号正在离布列斯特约700英里的洋面上向这个港口行驶。于是英军“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的两架携带鱼雷的“剑鱼式”飞机马上腾空而起与英国战舰一起发动攻击，“俾斯麦”号被3枚鱼雷击中，其中1枚击中舰尾，沉重的结构受到损坏后向下压迫到舵机，导致“俾斯麦”号的舵角卡死在15度。“俾斯麦”号再也无法躲开英国舰队的攻击，速度再度降低，而且很难控制航向。

5月27日晨，皇家海军派遣了大量军舰前往拦截“俾斯麦”号，包括“英王乔治五世”号与“罗德尼”号战列舰在内的8艘战列舰及战列巡洋舰，另外还有2艘航空母舰，几乎集中了英国皇家海军约半数的力量。8点

左右，“英王乔治五世”号与“罗德尼”号战列舰迅速接近“俾斯麦”号，并用16英寸和14英寸的主炮进行轰击。“俾斯麦”号由于舵机失灵，航向不定，还击效果不佳，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英军的上百枚大口径穿甲弹、数百枚小口径炮弹以及1枚鱼雷击中。英国“多塞特郡”号重巡洋舰随后在近距离又发射了3枚鱼雷，全部命中。10时39分左右，“俾斯麦”号终于舰身起火，黑烟翻滚，舰身翻转过来，最终沉没于布列斯特以西400海里水域。全舰将近2000人，只有110人被救起。

击沉“俾斯麦”号的胜利不仅仅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功劳，也应该归功于秘密情报局的“超级机密”。英国人的这一胜利表明，考文垂为了“超级机密”的安全而做出的牺牲是完全必要的。

1942年10月下旬，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部队的给养频频告急，如不能及时得到供应，他的部队将难以支撑下去。希特勒督促有关人员尽快派出军需船运送给养，并发电报通知了隆美尔。当隆美尔收到这封电报时，英国的布莱奇雷庄园已经把它破译了出来。

很明显，如果隆美尔得到这些军用物资，他就可

能站住脚跟。所以，必须坚决阻止这些军需品的运送。然而德国人这次派出的5艘运输船沿不同航线行驶，而且海上大雾弥漫，如果这5艘船只都遭到袭击，那么“超级机密”就会有暴露的危险。

1942年10月26日，负责监督“超级机密”保密程序的温特博瑟姆用保密电话向丘吉尔说明了他进退两难的处境：哪一个更重要？是击败隆美尔，还是保护“超级机密”？

丘吉尔踌躇了好半天，才下令击沉这些船只。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甘愿冒“超级机密”被暴露的风险的几次不多的行动之一。

10月27日天刚亮，20架英国轰炸机分别从卢卡和哈勒法机场起飞，在托布鲁克沿海雾中追上了第一艘运送给养的“普罗什比纳”号。在战斗中，皇家空军的20架飞机损失了6架，但“普罗什比纳”号还是被击沉了。后来，皇家空军的飞机又在托布鲁克西北的雾中借助照明弹发现了“特里波里诺”号油轮。这艘船也被击沉了。它的伙伴、另一艘油轮“奥斯蒂亚”号于28日拂晓也被鱼雷击沉。同一天拂晓，皇家空军的飞机在托布鲁克以北10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扎拉”号，也用鱼

雷击沉了它。它的同伴“布里俄尼”号虽然勉强进入了托布鲁克，但在卸汽油之前也被英国飞机击沉了。

隆美尔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恰恰在他的部队进入这次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时，英国人却一夜之间几乎把他的全部军需品报销了，这种高度的“巧合”使隆美尔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于是他给德国本部发了一份长电，要求调查一切可能泄密的来源，搞清楚在海上雾的情况下英国人到底是怎么发现这些运输船只的。但是，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人最终也没能弄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到了1943年，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情报战几乎到了白热化。当时德国已经在自己使用的“哑谜”密码机上进行了改装，加了4个转轮，从而使英国的密码破解工作更为困难了。仅此一项，英国就增加了6000多人，每天破译2000多个信号。尽管英国的破译工作进展迅速，几乎能将所有截获的密码破解，但是，这却是一种高成本的付出。

1943年开始的时候，邓尼茨指挥的德国潜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经常在大西洋出没。然而仅仅是在5月的前20天里，德国海军就损失惨重，41艘潜艇沉没

在大西洋里了。这时英国人从“超级机密”中知道邓尼茨开始担心他的密码和通信联络是否可靠，他发给各潜艇指挥官的信号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英国人对德国海军部的潜艇战争计划的内幕已有所了解。英国海军部曾多次非常突然地指挥船队改变航向，绕开有潜艇群的海路，这样做除非掌握了准确的情报，不可能有其他原因。

德国海军部也在解读英国海军部的密码，最后得出结论说，英国船队之所以改变航道，不是由于德国海军通讯部门的内奸透露了情报，就是由于英国潜艇追踪室的人诡计多端，也可能两种原因都有。这次调查仍然没有怀疑“哑谜”的安全性。

这时，邓尼茨不得不把他的“狼群”从大西洋上撤回。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德国的潜艇更是损失惨重。但直到二战之后撰写回忆录的时候，邓尼茨还是信誓旦旦，认为德国海军的密码没有问题。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英国人的“超级机密”，让他的“狼群”葬身于大西洋的波涛之中，从而也成就了英国大西洋海上战役的骄傲。

粉碎“沙漠之狐”的“蝴蝶梦”

在北非战场上，后来成为德国陆军元帅的一代名将隆美尔同样败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手下。

隆美尔是希特勒的爱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获得了三枚十字勋章。1938年，隆美尔调任希特勒大本营卫队长，并陪同希特勒巡视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隆美尔受到希特勒的重用，1940年2月，他被任命为德国王牌军第7装甲师师长。在德军闪击西欧的侵略战争中，隆美尔指挥第7装甲师冲锋在最前面，一路所向披靡，先后攻克比利时、阿拉斯、索姆，直捣法国西海岸，被法国人称为“魔鬼之师”。

1941年2月，隆美尔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非洲军团司令，前往北非援救被英军打得一败涂地的意大利军队。他到达北非的黎波里前线后，立即作了一次侦察飞行，得出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的结论。他指挥装甲部队冒着沙漠风暴勇猛穿插，全速前进，打得英军猝不及防，节节败退。隆美尔因此名声大振，赢得了“沙漠之狐”的美名，接着被晋升为陆军元帅。

隆美尔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及时获取了有关英国的情报，而在情报的搜集过程中，“康多尔小组”功不可没。这个“康多尔小组”的领导者是约翰·厄普勒。

1942年4月，厄普勒到达北非，他身上除了带着两部美国牌子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之外，还带有一本小说《蝴蝶梦》。“康多尔小组”的密码就是来自于这本小说。

“康多尔小组”的第二号人物是蒙卡斯特尔。他是厄普勒的同事，也是他的好朋友。在开罗，他们认识了一个叫黑克麦斯·法赫米的著名肚皮舞舞女。不久，法赫米小姐就透露了自己的间谍身份，承认自己为穆斯林和埃及军队里面的自由军官反英组织提供情报。她的情报主要来源是她的情人——驻开罗英军总司令部的一位名叫史密斯的少校。

当厄普勒透露自己是为隆美尔工作时，法赫米小姐就安排他们认识自己的情人史密斯，并且让他们等史密斯外出或者是睡觉的时候，偷看他的秘密文件。厄普勒把有用的情报通过由《蝴蝶梦》编成的密码发给德军总部。就这样，英国的军事情报就被源源不断

地透露给了德国，从而帮助隆美尔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到了1942年6月，英国方面开始警觉，大力追查情报泄密的途径。厄普勒的一次失误，终于让秘密情报局发现了蛛丝马迹。

一天晚上，厄普勒身穿着英国上尉的军服在一家俱乐部喝酒，但是他所带的埃及货币已经用完了，身上只有英镑了，所以就支付了一张英镑。殊不知，英镑在当时已经被禁止通用了。他喝完酒之后，又到了另一个酒吧，同样是用英镑支付了他的酒钱，然后就领着一位漂亮女子过夜去了，最后还给了那位女子20英镑，并答应还会来找她。

让厄普勒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漂亮女子竟然是一家犹太间谍组织的成员，是为英国秘密情报局服务的。事后她向她的上司汇报说，从口音她已经判断出那个厄普勒不是英国人，而是一个德国人，他身上还带有大量的英镑，而且挥金如土，看样子不是一般的游客或者生意人。上司听了她的报告之后，也觉得这个叫厄普勒的德国人身份可疑，于是就让她与厄普勒继续交往，以便摸清他的底细。和厄普勒再见面的时

候，这位女间谍就发现了厄普勒有一本《蝴蝶梦》，上面还有许多方格子以及相关的字组。她意识到这应该就是密码，因此就顺手抄下了每一行第一组的密码。

碰巧就在这时，有两名德国人因为袭击西波姆无线电情报连被捕，他们的包里也有一本《蝴蝶梦》，把两件事情一联想，立即就引起了审讯者的怀疑。很明显，这本书是作为特殊的密码在使用。秘密情报局迅速采取了行动，对蒙卡斯特尔与厄普勒实施抓捕。

抓捕的时候，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正在一条小游艇上玩。一见情况不妙，蒙卡斯特尔就迅速潜入水底，打开游艇里的暗门，把收发报机和那本《蝴蝶梦》以及所有的电报都扔进了尼罗河里。但是当他想逃走的时候，却被英国人给抓住了。

厄普勒当时一见英国人来了，就灵机一动，把自己的袜子卷起来，朝前来追捕的人扔过去。英国人一见，以为是一颗手榴弹，就立刻趴下，不久才发现原来是虚惊一场。厄普勒这样做的目的是给蒙卡斯特尔争取更多的时间，让他处理好那些东西。厄普勒最终还是被逮捕了。

那个肚皮舞舞女黑克麦斯·法赫米也被抓到，但是在她身上却没有任何收获。在审问的时候，他们三个人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后来，英国人在水底下的淤泥里找到了那台收发报机。令人庆幸的是，收发报机的频率仍旧指向雅典德军指挥部发报的频率。

当时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工想冒充“康多尔小组”给德国人发报，但是他们不知道密码，只好把蒙卡斯特尔与厄普勒二人关了起来。蒙卡斯特尔企图自杀却没有成功。最后，英国人终于找到了那个曾经到厄普勒房间里抄下密码的女间谍，由她提供了蒙卡斯特尔与厄普勒的密码组，以及在《蝴蝶梦》中相关的页码。尽管材料不足，但对那些谍报专家们来说，有了这些东西就足以破译整个密码了，于是他们就用这个密码向隆美尔的军队发出了第一份假情报。

当时隆美尔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康多尔小组”已经被英国人破坏了，依然相信他收到的每份情报，于是他就在那些假情报的误导下，对北非战场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1942年8月初，隆美尔准备在非洲对英国发动战略攻势。当时德国与英国的军队依然在阿拉曼地区对峙

着。隆美尔这位出色的军事家清楚地知道，要想征服埃及就必须迅速转移。于是他打算流动作战，迅速突破阿拉曼防线，然后趁势摧毁英军元帅蒙哥马利的军队，挺进开罗。从他收到的军事情报中得知，英军在阿拉曼防线南端的兵力非常薄弱。因此，隆美尔打算将自己的军队秘密南移，形成一个“口袋阵”，然后把英国的军队装进阿拉曼的口袋，将其歼灭。

当隆美尔指挥自己的部队南移的时候，他还留下了大量的假卡车和假坦克以迷惑英军空军的侦察，不让英军的飞机发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同时，隆美尔还命令部队禁止发电报，这样英国军队也就不会侦察到他们的行踪。不过，隆美尔这个天才的计划最终还是泄露了——隆美尔为了得到德国海军在补给上的支持，就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德国海军指挥部，同时还把自己的意图报告给了德国空军，以取得空中支持。这一切当然都是通过密码机完成的，但是英国人通过“超级机密”，已经把他的密码全部破译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对隆美尔的战略意图、德国海军和空军的行动了如指掌。于是英军马上作出了相应的部署，蒙哥马利的行动几乎与隆美尔的行动是同时进行的。



隆美尔（右）和加里波第将军出现在的黎波里一次阅兵式上

当蒙哥马利在迅速调动他的军队去迎击隆美尔的军队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却有些担心：即便是知道了德军的意图，要想消灭德国的军队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对方的统帅是隆美尔。正如丘吉尔所说：“隆美尔在任何时候都能以装甲部队的突击，发动摧毁性的进攻。他能够从金字塔旁边过来，在到达尼罗河以前，除了一条运河外，他几乎是不可阻挡的。”

英国人马上就在古老的金字塔旁边建立了自己的前沿司令部。当时蒙哥马利、丘吉尔还有其他高官参

谋都在商量对策，最终决定给隆美尔发送假情报，引诱其上当。于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工就以“康多尔小组”的名义给隆美尔发送了一封电报，说现在埃及的英军正在等待援兵，希望隆美尔能抓住这个机会马上出击。隆美尔得到消息之后自然是非常高兴，他甚至高声称赞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这些间谍们真的是太伟大了！

1942年8月24日，隆美尔给柏林发电报说，他将在8月30日到31日发动进攻。9月1号，隆美尔的进攻开始了，蒙哥马利早就严阵以待。他先在隆美尔进攻的路上设置了一个雷区，当德国的工兵进入雷区清扫的时候，英国的飞机开始出动了。英国空军在沙漠上空投下了照明弹，就像舞台上的聚光灯一样把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照得一览无遗，紧接着就是无数的炸弹倾泻而下。

9月3日的早上，隆美尔来到战场上视察，看到遍地是被烧毁的德国战车。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之下，隆美尔只有后撤。不过这位军事天才在给养不足的情况下，率领着不到10万人一直与70多万英国军队进行周旋，想引诱英国的装甲兵进入自己的射程之内。但是

久经战火考验的蒙哥马利岿然不动，隆美尔只好无奈地退回到自己的阵地。

这场战役结束了，英国仅用了小部分装甲车部队参加战斗，死伤1000多人，损失了80多辆坦克以及18门大炮。隆美尔的损失则惨不忍睹，伤亡4000多人，损失了50辆坦克和20门大炮。

后来，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司令对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说，他对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工作表示钦佩，对情报工作人员表示致敬。那些秘密情报工作已经大大简化了指挥官的任务，并且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超级机密”的成功与代价

二战后期，德国人非常有希望造出原子弹，如果那样的话，今天的历史将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和挪威的情报部门派出11名勇士历经千难万险终于炸毁了德国的重水工厂，才使得德国的原子弹梦想破灭，又一次挽救了人类。

1941年10月的一天，孟席斯收到来自瑞士的情报员的一份绝密电报：德国人正在研制原子弹。孟席斯

看完电报十分吃惊，他没有想到德国人这么快就将原子核分裂的试验成果用于制造原子弹，一旦原子弹研制成功，首先受害的将是英国。他立即召见挪威流亡政府的情报局长利夫·特隆斯塔德。

孟席斯将电报给特隆斯塔德看了之后问他有什么高见。

特隆斯塔德没有马上回答孟席斯的问题，他也早就听手下人报告说德国人正在秘密研制原子弹，前不久德国人还向挪威诺尔斯克·海多罗电气化学工厂订购氧化重水。

沉默了一会儿，特隆斯塔德反问孟席斯：“你知道制取铀235过程最重要的减速剂是什么吗？”

“重水。”孟席斯毫不迟疑地回答。

“对，我手下的情报人员报告，世界上生产重水的工厂极少，盟国没有生产足够重水的能力，要想大规模生产重水，至少需要一年半以上的时间。所以即使盟国现在研制原子弹，速度也要晚于德国。”特隆斯塔德看了一眼孟席斯接着说，“挪威南部的一家重水工厂是德国的唯一的重水来源，炸毁这家工厂是破坏德国人原子弹计划的最好办法。”

孟席斯提出能否用低空轰炸的方式炸毁重水工厂，特隆斯塔德说处于崇山峻岭中的工厂很难发现，无法用飞机低空轰炸，唯一的办法就是派突击队。

孟席斯听取了他的意见，之后迅速组建人员进行训练，准备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一个代号“山猫”、名叫史吉纳兰德的西欧人先期潜回挪威获取有关工厂的情报，他很快便弄到了许多有关德军和重水工厂的情报。

孟席斯有过无数次向欧洲大陆派遣敢死队的经验，但是向挪威派遣敢死队还是第一次。斯堪的纳维亚山脉横贯挪威全境，这里的每一座山都充满了危险，恶劣的气候更是让人难以忍受。孟席斯和特隆斯塔德联合制定了代号“飞燕”的攻击爆破计划。

这支由英、挪两国情报人员组成的突击队飞抵工厂上空时，因天气恶劣，两次跳伞都没有成功。1942年10月中旬的一个夜晚，4名“燕子”第三次登机。他们在距工厂160公里的一座山谷空投，很顺利，但是当他们把散落各地的装备器材找齐却用了两天。在以后的半个月时间里，他们把装备搬到预定地点，并与史吉纳兰德取得了联系，通知突击队分乘两架由轰炸机牵

引的滑翔机向工厂飞去，然而没想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重水工厂已成为兵营，突击队全部遇难。

孟席斯只好放弃了使用滑翔机计划，又制定了更周密的声东击西计划：先派人去炸德国人新建的水电站，再派突击队去炸工厂。

要炸的水电站是重水工厂生产的关键，由于大量的德军被派去防守，只留下少量德军防守重水工厂，突击队员终于炸毁了德国生产原子弹的关键重水工厂。

派去炸毁重水工厂的10名挪威突击队员有5人返回伦敦，另有5人在当地坚持进行抵抗活动。史吉纳兰德留在原地继续监视海多罗电气化工厂，不久孟席斯接到了他的报告：被炸的重水工厂已修复，又恢复生产了。

根据孟席斯的请求，美军派轰炸机又炸毁了工厂的发电站，使工厂再一次陷入瘫痪。于是德军不得不准备将海多罗工厂的设备以及储存的重水运往德国生产。史吉兰纳德向伦敦请求炸毁装载重水设备的火车驳船。得到批准后，他与另一名潜伏下来的叫本泽的伪造证件专家共同努力，炸沉了驳船。

失去了重水，德国人不得不中断原子弹的研制计划。秘密情报局和11名勇士拯救了盟国，改写了战争结局，也拯救了人类。

“超级机密”使德国人的一个又一个计划破灭了。可是，令世人疑惑的是，后来英国通过“超级机密”破译了纳粹德国在前苏联和欧洲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但是他们竟秘而不宣。

2000年6月26日，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宣布解密40万页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和英美战时情报机构提供的绝密情报档案。让历史学家和普通民众深感震惊的是，当年英美盟国通过破译纳粹安全机关的绝密情报，确实知道纳粹大屠杀计划，而且对计划的细节也了如指掌。

1943年夏天，英国伦敦郊区布莱奇雷庄园的“埃尼格马”密码破译小组的专家们，连续破译了驻罗马纳粹安全总部发给柏林总部的绝密电报，上面清楚说明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意大利犹太人的步骤和方案。

“埃尼格马”密码破译小组立即派专人将情报火速送交英国的最高领导层。此时，只有包括首相丘吉尔在内的极少数英国政府官员有权看到“埃尼格马”密码

破译小组提供的绝密情报。这些绝密电报同时也呈交给美国政府最高决策者的手里。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途径获得的可靠情报再次证实了纳粹德国准备屠杀犹太人的计划。提供这些情报的是潜伏在纳粹德国各要害部门内的盟国间谍，其中最重要的间谍之一便是潜伏在纳粹德国外交部的弗里兹·科尔贝。这位纳粹德国的外交官经常利用前往中立国瑞士的机会与美国战略勤务办公室的特工杜勒斯秘密会面。

新解密的绝密文件说明，科尔贝当时就向杜勒斯提供过关于纳粹德国将在1943年底消灭意大利犹太人的惊人情报。实际上，英美两国政府早在1943年年初就知道奥斯维辛等死亡集中营的真相。

既然英美当局事先已经知道纳粹要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为什么却保持了沉默呢？从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英美当局用沉默换取纳粹的技术与合作来发展自己；二是要维护形象，怕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新解密的档案和文件说明，英美等二战盟国在战后曾有计划、有步骤地网罗成百上千名头号纳粹科学

家，甚至帮助一些双手沾满犹太平民鲜血的纳粹冲锋队官员逃离欧洲，前往南美以换取他们的合作。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情报专家蒂莫斯·纳夫塔里是美国国家档案馆指定的专门评价新解密的档案资料的两名专家之一。他坦率地说：“实际上，当时罗斯福或者丘吉尔哪怕发表一个公开声明也能挽救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生命，或者最起码引起他们的警觉，使他们有机会逃脱纳粹的种族大屠杀。然而，两位著名的领导人却选择了沉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损害英美两国的密码破译行动。”

这也是为“超级机密”保密付出的最惨重的代价。

第六章 致命反击，“类人猿”计划暗杀成功

德军一举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希特勒任命心腹海德里希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新总督，他炮制“白色方案”颠覆了波兰，建立了6个屠杀中心，让600万犹太人死于他之手，于是一个暗杀海德里希的“类人猿”计划出笼——一颗装有致命的肉毒杆菌的弹片将他送上了西天。

从此德军疯狂报复，美丽的利迪希村成了德军的屠场。

海德里希实施“白色方案”

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在地理上具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是希特勒向东侵略扩张、解决德国“生存空间”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因此德国早有扫除障碍、吞并捷克的野心。1938年慕尼黑会议之后，德国实施“绿色方案”，于1939年3月15日侵占了捷克本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第二天，希特勒就宣布成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企图把捷克变成德国永久性的殖民地。

自从被德国占领以后，捷克就成了德国名副其实的兵工厂。德国人在这里强迫捷克人为他们生产各种武器，然后源源不断地供给了德国的前方部队。然而，捷克并不是一个让希特勒放心的地方。捷克共产党为了收复自己的国土，一直领导工人和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城市的工人和学生也在不断举行示威游行，罢工斗争和秘密破坏活动更是此起彼伏。于是希特勒在1941年9月，任命他的心腹海德里希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新总督，企图以高压政策稳定这里的局势。

海德里希是法西斯德国的党卫军头目，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魔头。海德里希出生于1904年3月，是一位音乐专科学校校长的儿子。优裕的家庭生活使他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也让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因为深受家

庭环境的影响，他从小就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曾经立志当一名音乐家。可是，在1922年应征入伍、加入了德国皇家海军之后，海德里希的生活和人格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海德里希一开始就在有“纳粹谍王”之称的卡纳里斯手下服役，并且同卡纳里斯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海德里希经常到卡纳里斯家里做客，并在那里为他演奏小提琴。尽管卡纳里斯后来与希特勒同床异梦，想早日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并没有影响海德里希。

在部队里，海德里希以严守纪律著称，得到了卡纳里斯以及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信任和赏识。后来在未婚妻莉娜的帮助下，他在希姆莱手下谋得一个职位。当年的希姆莱可不是个一般的角色，他年仅27岁时，就成了党卫队的全国副领袖，后来成为盖世太保总管，是第三帝国第二号权势人物。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后，希姆莱成为慕尼黑警察局长。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海德里希也成为慕尼黑警察六处的头目。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清查党内的叛徒。这项工作令海德里希很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因为他手中掌握了对许多人的生杀予夺大权。此时的海德里希已经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的狡诈、机警，以及预感危机的能力都超过了一般人。这种与生俱来的警觉以及趋利避害的能力，让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到1938年二战前夕，海德里希已经成为希特勒的得意门生了。

希特勒让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共同炮制了一个“白色方案”，准备发动对波兰的进攻，并且要嫁祸于波兰人。

1938年8月4日，海德里希开始执行“白色方案”，当时他把这个方案称为“希姆莱方案”。海德里希命令他的士兵换上波兰游击队服装，在德国与波兰边界的一个小村子制造波兰军队袭击德国哨所的事件。

为了能一举成功，8月10日晚上，两辆汽车来到波德边界的格莱维茨小村，7名煤矿工程师拿出波兰政府的文件与证明要求住店——其实他们是海德里希派来“踩点”的。在后来的十几天里，海德里希让盖世太保们准备一批死尸，让他们身上穿着波兰制服，于是一场“演习”开始了。

8月31日，一批身穿波兰军服的德国人在约克斯的

指挥下冲进了格莱维茨电台，迅速占领了电台后就冲向播音室。他们用冲锋枪指着吓得不知所措的播音员，高喊着“举起手来！”还朝天花板乱开枪。

这时，约克斯命人把电台工作人员绑起来，塞进地下室，然后让翻译用波兰语进行播音，广播海德里希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德国领导人要把欧洲引向战争，和平的波兰正面临着威胁和侮辱，波兰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希特勒……

就这样，无数正在收听广播的德国人，听到了波兰人的声音和夹杂其间的枪声。这次事件的全过程只有四分钟。四分钟之后，约克斯就带着人马溜得无影无踪了。电台门外，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血淋淋的穿着波兰军制服的尸体。

9月1日，德国的所有报纸、电台、广播都无一例外地刊发了同一条新闻：波兰暴徒进犯德国。与此同时，德国的军队越过波兰边界，向华沙进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这样被点燃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内，海德里希屡建奇功，1941年9月，他被希特勒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新总督。

海德里希上任后，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占领法规，实施法西斯专政和“连坐责任制”，实行极端残暴的统治。他在捷克大肆屠杀知识分子、宗教人士和社会活动家，强迫中小学生接受日耳曼教育，其手段残忍，令人发指。1942年初在万湖会议上，海德里希不无自豪地向他的下属们说出了屠杀犹太人的“壮举”，称已经有50多万犹太人被解决在了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他还信誓旦旦地指出，战时的条件已经不适合移民政策的实施了，德国人要不分疆域地解决犹太人。

就在这种情况下，波兰建立了6个屠杀中心。犹太人像猎物一样被装上列车，迅速地运往集中营。

由于恶劣的条件、令人窒息的环境和疾病，这些犹太人还没有到达集中营就死掉了四分之一。男女老幼们像动物般走进死亡之室，他们吸着毒气，半个小时后都死去了，僵硬地倒在里面，横七竖八的没有一点空隙。这些死尸不久就被浇上柴油，烧成了灰烬。

海德里希已经成了一个杀人的魔鬼。在此期间，大约有600万犹太人死在他的手上。

海德里希当然知道这样的事情为人类所不齿，所以这些事情总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不过，德军的一

些下级军官为了邀功，经常把这些事情向上汇报。当电报发出的时候，就被英国特工截取了。但是，英国人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超级密码”不外传，对海德里希和纳粹的暴行也是讳莫如深，秘而不宣。

不过，海德里希在“文洛事件”上的表现，让英国秘密情报局恨得咬牙切齿，现在他又在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地下抵抗运动，作为捷克的保护国，英国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于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就和捷克反对纳粹的地下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制定了一个代号叫“类人猿”的行动计划，决定暗杀海德里希。

希特勒为海德里希送葬

1941年12月28日深夜，一架不明国籍的远程飞机在欧洲上空飞行，机舱里乘坐着9名捷克斯洛伐克人。为首的两人一个叫詹恩·库比斯，另一个叫约瑟夫·加比希克。他们是奉命回国刺杀海德里希的。

加比希克是一名普通的捷克青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辗转跑到英国，参加了流亡在那里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情报组织。他和库比斯都是B处1科A组成员，专门从事暗杀活动。一年前，他们曾在瑞士

成功地打死了民族败类、“捷奸”卡吉姆少将，一度使许多“捷奸”闻之丧胆。

为了实施这次暗杀行动，他们被送到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训基地接受训练。训练结束后，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委员会领导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接见了他们，亲自向他们交代了“类人猿”行动计划，然后带着这支9人的特别行动小组返回自己的祖国，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在临上飞机之前，孟席斯还对他们说：此次行动是生死决斗，如果有难处，可以提出来，甚至可以再换人，但一旦答应，必须成功。

库比斯和加比希克没有说什么，只是毅然地走上了飞机。经过4个半小时的飞行后，9名行动小组的成员借着朦胧的夜色，在利迪策波希米亚城附近的上空跃出了机舱，悄悄地空降在白雪覆盖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终于以这种方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为了掩护这次在德军占领的欧洲上空的长途飞行，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军阵地和重要目标发动了一次牵制性的空袭，以转移德军雷达和战斗机部队的注意力。

在捷克反纳粹地下组织的协助下，库比斯和加比

希克领导的这个特别行动小组潜伏下来了。在后来的5个月时间里，他们一直为实施“类人猿”计划进行准备。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掌握海德里希的活动规律，了解他的行踪，然后再决定对他下手的时间和地点。

为了摸清海德里希的行踪，特别行动小组费尽了脑筋。他们在布拉格市区和周围的乡村一带活动了几个月，几乎是一无所获。那位狂妄自大的纳粹头目上任之初的日子里，基本上是深居简出，很少招摇过市；但在破获了一些地下抵抗组织，枪杀了许多地下组织的成员之后，他又“勇敢”得简直有些鲁莽，外出时常常只带几个武装护卫，有时甚至连卫兵也不带，只有他和司机两个人开车出来。但是要找到他的行动规律却不是那么容易。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打开了海德里希通向死亡的大门。

有一天，安插在海德里希办公室的一个内线传出来消息说，海德里希一只心爱的古董钟表坏了，他的秘书正在找钟表匠来修理。那个内线叫玛丽，是个中年妇女，是海德里希办公室的清洁工。捷克反纳粹的地下抵抗组织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同库比斯和加比希克的行动小组一商量，决定马上派一个名叫约瑟夫·诺

沃特尼的人混进海德里希的办公室去摸一摸情况，趁机搞清海德里希这些日子的活动日程。

约瑟夫·诺沃特尼不仅是布拉格全城最有名的钟表匠之一，而且还是布拉格抵抗运动的地下组织成员。当时他在十字街头开了一家小小的钟表修理铺，以此为掩护进行反纳粹的抵抗运动。

1943年5月23日上午，一辆菲亚特小汽车来到诺沃特尼的钟表修理铺，把他接到了海德里希的官邸。海德里希的秘书把诺沃特尼领到了办公室，要他尽快地把这只钟修好。并且对他说，这只老式座钟是海德里希的心爱之物，是他从老家带来的，是他家的祖传之宝，一定不能弄坏了。

诺沃特尼把那只钟检查了一番，发现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修起来还是很容易的，要不了半个小时。但是为了寻找机会弄到情报，他还是把那只并没有多大问题的钟大卸八块，拆得七零八落，然后一遍又一遍地认真检查，装了又拆，拆了又装，装作很费劲的样子，目的就是想把这个一直站在一边监视自己的秘书支开。

诺沃特尼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一看到这个钟表匠

在翻来覆去地摆弄这些零件，一遍又一遍地没完没了，那个秘书显得有点不耐烦了。他看看这个钟表匠不像个危险分子，平时也听说过他的手艺不一般，就放松了警惕，对诺沃特尼说：“你在这里给我好好地修，我还要去干我的事。不过你一定不能乱跑，出了门给卫兵打死了就是活该。”

秘书一边说，一边点上一支烟，到隔壁的房间去了。

诺沃特尼一见秘书走了，就一边继续摆弄这些零件，一边朝四处张望。那个秘书中间还推开门进来了两次，不过他每次进来，都只见诺沃特尼满手的油泥，干得挺认真的，把零件拆得满桌都是。秘书看了看没说什么就又走开了。

等到秘书出去后，诺沃特尼又在仔细搜索，果然发现桌子上的文件筐里有一张纸，上面隐隐约约有几行字，记录着5月27日海德里希的日程安排。这真是天赐良机！诺沃特尼左右一扫，见屋里无人，只有通向隔壁秘密房间的那扇门半掩着。诺沃特尼定了定神，自言自语道：“唉，这手怎么全是油。”边说边迅速从文件筐里抽出那张纸，眼睛盯着隔壁房门，用这张纸

擦擦手，然后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

过了好久，秘书又进来了，发现诺沃特尼已经把钟安装好了，正在调试，效果还真不错，秘书还对诺沃特尼夸奖了几句，然后把他送出了办公室。诺沃特尼离开了海德里希的官邸。

秘书喊来了清洁工玛丽，叫她把海德里希办公室认真打扫一下，因为这里刚才已经让诺沃特尼弄得乱七八糟。玛丽把纸篓的东西全部倒进了一个专用的垃圾袋，拉到楼下的垃圾窖去了。

几小时后，海德里希5月27日的行程表就落到了英国特工的手中，摊在了特别行动队队长库比斯和加比希克的桌上。看着那张皱巴巴的沾满了油渍的纸，库比斯一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这一次决不能让这个魔王跑掉！”

原来行动队从这张行程表中发现，海德里希的职务已经有了变动，5月27日他将奉命回国改任新职，也许从此以后不再回到捷克来了。加比希克坚决地打了个手势说：“那就让他的血流在这里，祭奠被他杀害的冤魂！”

英国特工仔细地看了海德里希行程安排后，和特

别行动小组商量了一下，决定就在5月27日这一天动手，把伏击点选择在布拉格郊区特罗雅大桥附近。因为那条公路通向赫拉德卡尼城堡的海德里希司令部，也是海德里希从官邸到外地的必经之路；同时，这条公路到特罗雅大桥那里有一个巨大的“U”字型大转弯，所有的汽车经过那里时都必须减速通过，是个伏击的好地方。

经过充分准备，1942年5月27日一大早，执行“类人猿”计划的特工行动小组出发了。加比希克、库比斯、瓦尔锡克等特别行动队员按预定方案进入各自的位置。他们埋伏在特罗雅大桥附近，在那个拐弯处等待海德里希的汽车出现。他们穿着雨衣，里面藏着由英国最新制造的司登式冲锋枪和手枪，并且带上了一种致命的有毒手榴弹。

为了确保“类人猿”计划的成功实施，英国情报部门决定使用他们代号为X的秘密BTX武器。这是一种经过改装的手榴弹，重约一磅，弹内装有致命的肉毒杆菌毒素。这是当时已知的最毒的天然毒物，一直被作为具有惊人效力的候选毒剂加以储备。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一个5万人口的城市中，只要0.015 ~ 0.24

公斤的BTX污染源，就可在数小时内造成上万人的中毒和死亡。

按照预先分工，加比希克是第一杀手。他臂上搭着雨衣，站在布拉格城外盘旋公路转弯处等候着。库比斯是第二杀手。他站在离加比希克很近的地方。在急转弯前90米处通往荣芬—布列钦村的小山坡上站着第三个人，他是瓦尔锡克。再过去180米，还有一个人站在马路对面等候，这个人叫杰米利克，他的任务是一发现海德里希乘坐的那辆绿色梅塞德斯敞篷汽车开出来后，就马上吹响口哨发出信号。

上午10时许，海德里希走出了他的官邸，带着一只棕褐色的牛皮公文包，里面装着执行希特勒大规模屠杀命令的行动计划动身前往柏林。出发前，他吻别了金发碧眼的妻子和妻子怀里的孩子。他正要准备上车时，他的秘书突然走了过来提醒他说：“将军，您的司机病了。这个新司机的技术不太熟练。我看是否换辆车，带上警卫？”

海德里希的这辆车是梅塞德斯 - 奔驰150型，连司机在内只能乘两个人，因式样古怪，早就该淘汰，但由于海德里希爱好古董，特地找人加以改进，提高了

速度，从此就一直使用这辆车子。他认为越是古老陈旧的东西，越能体现一种身份的高贵。在他看来，凡是新鲜和时髦都是属于那种暴发户式的人物。

所以，他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了秘书的话，打开车门坐上去，朝司机摆摆手，车开了。

10点半的时候，站在马路对面的杰米利克发现了海德里希的梅塞德斯车出现，他马上向同伴发出了信号，叫他们进入伏击点，准备战斗。

海德里希像往常在布拉格大街上行驶一样，汽车上插着党卫军旗帜，一副威风凛凛、派头十足的样子。汽车驶到特罗雅大桥的拐弯处减慢了速度。此时海德里希正坐在车里尽情地享受着温暖的阳光，他并不清楚，死神正缓缓向他走来。

加比希克和库比斯看清了车上左右飘动的两面德国国旗和党卫队队旗，并辨认出海德里希那苍白的面孔。突然，加比希克端起冲锋枪冲到了公路中间，瞄准了前方的弯道，当海德里希的汽车完全进入加比希克的有效射程时，他立即瞄准海德里希并且猛扣扳机。

没有想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加比希克扣动了

扳机后，子弹并没有射出枪膛。他的枪卡壳了。

这时，海德里希猛然发现路旁突然钻出个人来举枪对自己射击，便一边急忙掏出枪来准备还击，一边命令司机立即停车。狂妄自大的海德里希愤怒极了，他连想都没有多想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然后倚靠在车前的玻璃后面朝加比希克开枪。

库比斯一见加比希克的枪卡壳了，就立刻从隐蔽的地方冲了出来，从怀里掏出了那颗有毒的手榴弹，用力把它朝海德里希的汽车扔了过来。随着一声巨响，汽车的玻璃被炸了个粉碎，在一片滚滚浓烟中，海德里希受伤了，那些致命的弹片和玻璃屑嵌进了海德里希的身体。

海德里希和司机从车上跳了下来，想继续追杀那两位刺客，但是由于伤势过重，海德里希还没走多远就不得不待在原地动不了了，他痛苦地呻吟着。库比斯和加比希克这时已经消失在公路的转弯处。

枪声惊动了一队路过此地的德军巡逻队，他们把海德里希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发现海德里希的胸部和腹部多处被弹片击中。

捷克第一流的外科医生霍尔鲍姆主刀，为海德里

希做了手术。手术比较成功，伤势也似乎向好的方向发展。医生帮他从体内取出了好几块弹片和玻璃屑，并且清洗了几处伤口。包扎好了后，医生们认为海德里希的伤势并不怎么严重。

但是到了第二天晚上，海德里希的伤势发生了让医生们没有预料到的变化。海德里希感到周身不适，呼吸极度虚弱，皮肤干燥，目光呆滞，瞳孔散大，视觉模糊，口干舌燥，渐渐出现眩晕，所有的伤口都化脓了……又过了两天，他的伤情进一步恶化，出现进行性肌肉无力，伴有面部麻痹以及四肢和呼吸肌肉麻痹等症状。多种症状的出现让医生毫无办法。

到了6月3日，海德里希病情日益恶化，再好的医学专家也无回天之术了。医学专家作出的结论是，由于弹片把病菌可能还有毒物带进了体内，并沉积在胸膜、膈膜以及周围的组织中，细胞发生凝聚并增生，使生命中枢的主质器官受到严重损伤。最后，医生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海德里希发着高烧，痛苦地在病床上接受死神的折磨。

在受伤后的第7天，6月4日，海德里希这个杀人如麻的恶魔，终于一命呜呼了。



“具有铁石心肠”的人——海德里希

在赫拉德卡尼城堡，海德里希的尸体用党卫军的旗帜包裹起来，在重兵的护卫下，首先运往柏林的帝国中央安全局总部，他的棺材被放在胶轮炮车的尾座上，由希特勒的私人卫队、党卫军的“阿道夫·希特勒”支队护送到威廉街的帝国总理府，进行国葬。希特勒穿上他的浅灰色军装，戴着黑纱，把一个用兰花做的花圈放在尸首旁边，他称赞海德里希“是我们大日耳曼理想的最伟大的捍卫者之一，是个具有铁石心肠的人”。

海德里希的死去，让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帮凶。在葬礼上，希姆莱把由党卫军首脑人物组成的“骑士团”成员全部召集到海德里希的灵柩旁边，他即兴发表了一篇很“动人”的演说，号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位历史人物。他说：“你们这位被谋杀的首领正如元首在他的葬礼上所说的，他确是一个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但正当他身处权力巅峰的时候，命运有意将他调走了。”——海德里希死的时候年仅38岁，他本来很有希望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

希姆莱还说，对海德里希的追念，应当使他们竭尽所能将工作做好，特别是在国外情报工作领域内。

他对这些首脑人物说，他们“在这一特殊领域”的工作成就“尚不能和英国的间谍活动并驾齐驱”，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尸首就足以证明这点。

在一系列的仪式完毕之后，海德里希的棺材被送进墓地，送丧的队伍也慢慢地向墓地走去。盖着党卫军旗帜的棺架上，放着一尊海德里希的面部塑像。海德里希的墓前站满了纳粹的高官显贵，在这一群送葬的帝国显贵中，还有海德里希的老对手、德军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那天，他那蓝色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声音“激动得发哑”。他对施伦堡说：“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人。他不在了，我也失去了一个朋友。”不过，人们不知道他是装的，还是出于真心。

利迪希村成为二战纪念馆

“类人猿”计划获得了极大成功。海德里希死去的消息马上传遍了整个世界，让那些在苦难中的犹太人、捷克的地下抵抗组织和英国、法国等同盟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在海德里希奄奄一息的时候，希姆莱到医院里同他见了最后一面。这个纳粹头目知道海德里希已经不行

了，就只好安慰他说，一定要为他报仇。希姆莱的这种承诺，总算让这位纳粹头目在临死之前得到了些许慰藉。

葬礼仪式一结束，希特勒就咆哮着要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要用千百万人来为海德里希殉葬。居住在特瑞金斯特的“特别居留区”的3000名犹太人被立即送到了死亡营。

希姆莱也马上开始了他的报复行动。他对党卫军的将军施伦堡说，海德里希被刺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施伦堡作为党卫军国外情报处处长，必须拿出行动来。当时布拉格的党卫军一个个惊恐万状，如果在缉捕凶手的行动中毫无结果，希特勒无疑会狂性大发，对他们大开杀戒。他们对海德里希之死，个个都负有责任。于是他们在布拉格对捷克人发动了一场大搜捕。共有1万多人被捕，至少有1300人被处死。

最野蛮的报复行为发生在利迪希村。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坐落在一个低矮的峡谷内，村里尽是沙石墙红瓦房，围着一座古老的巴洛克式教堂，教堂的四周点缀着片片草地，风景旖旎。妇女们在田间劳作，工人们下矿山挣钱，所有的村民都过着一种自给自足

的生活，对政治，他们是兴味索然。

然而，6月4日，也就是海德里希一命呜呼的当日，盖世太保第一次搜查了这个小村。他们肆无忌惮地闯进居民的家中，对每一个居民进行讯问，对他们进行恐吓和威胁。但是，除了居民的财物外，盖世太保一无所获。

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个村庄与海德里希的死有什么关系，德国人只有一个借口：小村子里有两个村民的儿子是捷克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现在正在英国。此外，德国人声称在这个小村子发现了机枪，英国的伞兵也曾在这一地区降落。但是，他们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观点。

五天后的1942年6月9日，一队保安警察在党卫军小队长马克斯·罗斯托克的带领下开进了利迪希。那一天，柏林正在为死去的海德里希举行葬礼，卡尔·博姆打电话给希姆莱，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利迪希与海德里希之死有着直接的联系，建议摧毁这个小村。

晚上，党卫军地区总队长卡尔·弗朗克从柏林打来电话说，遵照元首的指示，应对利迪希村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枪毙所有的成年男性公民；第二，将所有

女性居民关入集中营；第三，将儿童集中在一起，合格的送到帝国党卫军家中接受德国化教育，不适合进行德国化教育的儿童要进行其他形式的教育；第四，在消防队的帮助下将这个地方烧毁，夷为平地。

博姆领受命令后，亲自前往利迪希指挥这次行动，随行的还有布拉格的盖世太保头子奥托·格施克博士和科拉迪诺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维斯曼。此时，警察已经将利迪希小村围得水泄不通。



耀武扬威的盖世太保们

借着附近钢厂高炉的火光，盖世太保把全村老少赶到村中广场。特别行刑队在谷仓四周的墙上竖起了一排床垫，防止流弹反弹回来伤及自己。他们将成年

男性和男孩子从人群中挑了出来，一次枪毙10人。最后，村子里199名15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处决，195名女性村民被送进集中营，95名儿童被送到中转营，其中只有9名被认为值得进行德国化教育而活了下来，其余的儿童则销声匿迹。

屠杀结束后，一份早已拟好的稿子在广播中播出：在搜捕刺杀党卫军上将海德里希的凶手的过程中，有充分事实证明该村居民支持并给予这些凶手以帮助。除了帮助凶手外，这些居民还参与了其他敌视德国的行动，例如，私藏弹药和武器装备，违法持有发报机、帮忙英国伞兵，并且囤积大量特殊的军用物资……

利迪希这个和平的村庄就这样被化为了一片平地，所有的房屋都被烧光了，甚至灰烬都被推土机全部推进了村前的那条峡谷，就连利迪希村这个名字也在德军的图册和文件中抹掉了。

很多年以后，利迪希这个苦难的村庄，成为一座二战的纪念馆和博物馆，人们永远地记住了她。

“类人猿”计划，带给那些反法西斯的人们不仅仅是辉煌与鲜花，还有泪水与苦难。

第七章“北极行动”，谍报战波诡云谲

纳粹德国占领欧洲大陆后，西欧各国的地下抵抗运动如火如荼。英国秘密情报局成立了“特别行动委员会”，大力招募和训练各国青年到敌占区进行谍报活动。不料，纳粹情报局反间谍组织“阿勃韦尔”也伺机而动，利用抓捕的英国特工实施“北极行动”，从此，欧洲大陆谍报战波诡云谲。

劳威尔斯和他的女友一起被带走了

1945年10月，二战刚刚结束，荷兰一家报纸就公开披露了一条消息说，从1942年3月至1944年4月两年多的时间内，有数十名荷兰情报人员死于德国人精心设计的“北极行动”之中。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英国情报

部门故意这么做，其目的是迷惑希特勒和他的高级将领，使他们相信盟军会在荷兰登陆。

这条消息一经曝出，荷兰人立即群情激愤。荷兰议会率先向英国政府提出公开指责，并要求马上对该事件进行调查。但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关于“北极行动”的调查却一直没有结果，成为二战中一个难解的谜团。

所谓“北极行动”，其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德国之间进行的一场间谍战。

二战爆发后，德军以“闪电战”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欧洲大陆即将全部落入纳粹德国之手，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欧洲大陆多年经营的情报网全部付诸东流。当时身为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孟席斯于心不甘，尤其是秘密情报局因为“文洛事件”造成的耻辱更是令他想重振雄风。因此，他积极与欧洲各国流亡政府的情报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希望能重建英国的情报网络。

孟席斯的这一举措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丘吉尔刚刚上台时，对英国情报机构并不看好，甚至还准备进行强有力的整顿，解散秘密情报局，然后另立炉灶重新组建新的情报机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英国情报机构成立了一家“特别行动执行局”。它的任务主要是进行反间谍。当时很多人认为，德国人之所以在战场上能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就是因为德国在欧洲很多国家安置了专门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的“第五纵队”。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丘吉尔在英国也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执行局”（或称“特别行动委员会”）。丘吉尔宣称，除了以正规部队在战场上同德国人面对面对抗之外，还要利用谍报人员深入对方的腹地，在欧洲大陆燃起大火，让熊熊的火焰烧遍欧洲，烧毁纳粹德国。

在此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行为还是很“绅士”，除了“文明”地收集情报之外，并不在德国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当时秘密情报局只有一个代号为“D”的行动处，是专门从事颠覆破坏活动的；另外，英国陆军部有一个“GS小组”，也是一个具有同样性质的组织。到1940年7月16日，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成立后，秘密情报局的D处以及陆军的GS小组都并入其名下。此外，特别行动执行局为了培养自己的特工队伍，还建立了一所专门培养特工的秘密学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一下

子就招募了一万多人。这些人当中有英国人，也有欧洲大陆其他各沦陷国的进步青年。他们加入英国情报机构后，都是以一种狂热的民族精神从事间谍活动。当时由于形势紧急，许多人根本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就被派往战场，到欧洲大陆为盟军搜集战时情报。

由于英国秘密情报局威望很高，当时各国成立的抵抗组织大多由其指挥。荷兰的地下抵抗组织也是如此。

1940年5月荷兰沦陷以后，英国人为了援助荷兰地下抵抗组织，与荷兰当地的各地下情报组织建立了秘密联络。英国秘密情报局还在荷兰情报局设立了一个“荷兰处”，向荷兰的地下抵抗组织派遣了很多情报人员，同时在人力、物力和情报等方面对荷兰给予了有力支援。

在英国人的支持下，荷兰的地下抵抗运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他们贴传单、搞宣传，进行袭击和爆破，让入侵荷兰的德军惶惶不可终日。在希特勒的催促之下，德国盖世太保头子施伦堡召见了纳粹德国驻荷兰的反间谍机构“阿勃韦尔”头目吉斯克斯少校，命令其尽快将荷兰抵抗组织的秘密电台一网打

尽，并利用破获的英方电台向英国方面传递假情报。施伦堡将这次搜查和利用对方电台的行动命名为“北极行动”，由吉斯克斯的反间谍处负责执行。

正是这个“北极行动”，成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滑铁卢”，而吉斯克斯也让英国的军情六处遭受了重大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北极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是由于吉斯克斯的运气好——就在他走马上任后没几天，一个荷兰告密者就找上门来，令他毫不费力地逮捕了刚刚潜入的英军特派员休伯特·劳威尔斯上尉。

那是1942年3月的一个傍晚，一个健壮精干的男子从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拐上大街。他身着褐色的呢子大衣，脸上捂着口罩，手里还拎着一只笨重的箱子。他一边急匆匆地朝前走，一边不时回头张望，看看有没有被人盯梢。这个男子就是休伯特·劳威尔斯上尉。

劳威尔斯走在刮着寒风的大街上，发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个在1899年和1907年曾两次举行过国际和平会议的城市，曾被誉为“和平圣地”，如今也成了纳粹德国铁蹄下的牺牲品。昔日繁华的大街已是车马冷落，行人稀少，笼罩在一片战争

的恐怖之中，只有那些插着党卫军旗子的德军车辆不时从街上疾驶而过。

这时，一队德国巡逻兵迎面走来，一个个荷枪实弹，笨重的皮靴敲击着古老的街道。他们昂首从劳威尔斯身边走过，表现出一种占领者的傲慢和威严。

劳威尔斯同德国巡逻兵擦肩而过，拐进一条幽静的小巷，来到一幢紫红色的两层小楼的门前。当他确定没有被人跟踪后，就举手按响了门铃。不一会儿，一个面目清秀、衣着华丽的年轻姑娘开了门。她是劳威尔斯多日没有见面的女朋友乔伊娜。一见是劳威尔斯，乔伊娜又惊又喜，张开双臂扑过来想要拥抱他。劳威尔斯却悄悄地摆了摆手，提起箱子，一闪身进了门，反手把门锁上了，然后同她依偎着朝屋子里走去。

然而，让劳威尔斯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关上大门时，离大门不远处的路灯背后突然钻出一个人来。那个人疾步来到小楼前，记下了门牌号——“法伦海特大街736号”，然后悄悄地离开了。

很快，这个人来到了“阿勃韦尔”驻阿姆斯特丹办事处吉斯克斯少校的办公室，他对吉斯克斯说：“尊敬

的少校，我可以帮您抓获一个刚刚从英国派来的间谍，不过我需要钱，而且是很多的钱。”

吉斯克斯看了看眼前这个面目猥琐的荷兰人，心里立刻产生一种厌恶感。他压根就不相信这个荷兰人的话，认为这个荷兰人肯定是看了悬赏告示后来骗钱的，便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发现从伦敦来的人都带着一只大皮箱，箱子里装着电台。”告密者一脸神秘地答道。

吉斯克斯一听哈哈大笑。“你当真认为英国人就像你说的那么笨，装电台还用固定样式的箱子？”

见吉斯克斯不相信自己，那个告密者就拍着胸脯打保票，说只要吉斯克斯舍得花钱，他完全可以帮他们抓到一个让他们非常感兴趣的人。不过即便如此，吉斯克斯少校还是不相信，并且叫他赶快离开，不要浪费他的时间。那个告密者一听，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小本子，在吉斯克斯面前晃了晃说：“你们不是要找那些潜入荷兰的英国间谍吗？我刚才就发现了一个。我知道他在哪里，地址就在这上面。如果去晚了让他溜了，你们就自认倒霉吧。”

吉斯克斯先是半信半疑，但转念一想，自上任

后，侦破荷兰地下组织的工作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上司施伦堡已几次打电话来表示不满。吉斯克斯决定，还是先去看一下再说。

于是，吉斯克斯亲自带领一队德国宪兵，跟着那个告密者去了法伦海特大街，并且调出四辆无线电测向车从四个不同的方位，缓缓地驶向小巷深处那幢两层的小楼。果然，无线电测向车一进入那个范围，车顶上的无线电天线像是被磁铁吸住了一样，一动也不动。吉斯克斯少校就像猎犬闻到了猎物的气味，心中不由得一阵狂喜。

此刻，测向天线正在显示，法伦海特大街736号的那栋两层小楼里有人正在发报。为了不惊动发报人，吉斯克斯少校传令测向车子在距目标200米处停下来，然后带领武装宪兵迅速包围了楼房。吉斯克斯亲手按响了门铃。

二楼东头一个窗帘紧闭的房间里，休伯特·劳威尔斯上尉已经发完了最后一组电码，长舒了一口气。此时他接过女友乔伊娜递过来的一杯咖啡，顺手放在桌子上，然后把女友乔伊娜紧紧地搂在怀里。

劳威尔斯是荷兰陆军的一名上尉，两年前敦刻尔

克大撤退时，他也随着英法联军来到了英国，随即被特别行动委员会录用，并接受了谍报训练。一个星期前，他携带电台被空投潜回荷兰，负责一个地下组织与伦敦的联络。为防止被德国人发觉，他每两天就要转移一个发报地点，今天下午到了阔别两年的女朋友家里。劳威尔斯上尉以为自己的行动很诡秘，不会被人发现，哪想到那个倒霉的大箱子却把他给出卖了，这也是英国情报部门的疏漏。这种特制的装电台的箱子，在伦敦还算普通，但到了荷兰就变得十分显眼了。劳威尔斯刚从海牙车站下车，就被那个一心想发大财的告密者给盯上了。

一阵门铃声惊破了劳威尔斯与乔伊娜的缠绵之梦。他就像触了电一样一把推开女友，走到临街的窗前，撩起窗帘的一角向外窥探。劳威尔斯的脸顿时“刷”地一下变得惨白。他看见了按门铃的陌生人，还看到了楼下的小巷子里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德国宪兵。

劳威尔斯迅速地取出打火机，点燃了桌上的电报文稿。当他正要向伦敦发出警报并捣毁发报机时，德国兵已经翻过了围墙，跳到了院子里，向楼上冲来。

不一会儿，房门被德国兵一脚踢开，劳威尔斯和他的女友乔伊娜一起被带走了。

英国特工成了“北极行动”的战利品

人赃俱获，这一下让吉斯克斯上校好不得意。

可是，怎样处置这个英国间谍和他的电台呢？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吉斯克斯大脑中酝酿成熟——他要把劳威尔斯手中的电台控制在自己手里，仍以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名义与伦敦保持联络。这样一来，吉斯克斯不但可以获得英国军方的情报，同时还可以让英国政府把战时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英吉利海峡对岸空投到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北极行动”就能成功实施了。

不过，吉斯克斯知道，要想成功地实施自己的计划，劳威尔斯可是个关键人物。首先得让他屈服，听从自己的摆布，不让英方看出破绽。为了让劳威尔斯屈服，吉斯克斯指挥手下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但是，劳威尔斯就是不就范。审讯已经持续了很久，记录纸上仍是一片空白。

于是吉斯克斯就亲自出马，开始对劳威尔斯发起

心理攻势。他像一个老朋友一样，推心置腹地对劳威尔斯说：“上尉先生，再好好想想，跟我们合作，会对你有好处的；如果你再要顽抗下去，后果你应该清楚，到时候会后悔的。”

但是，无论吉斯克斯怎样软硬兼施，劳威尔斯就是一直守口如瓶。他对德国人有一种刻骨的仇恨。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都是以“借道”的方式占领了荷兰，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遭受到了空前的劫难。他怎么会向这些强盗屈服呢？

吉斯克斯见这些招数都不能达到目的，只好使出他最后的“杀手锏”。

吉斯克斯对劳威尔斯说：“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必须对另外一个女人负责，她就是你的女朋友乔伊娜小姐，那个年轻而又漂亮的荷兰姑娘！”

吉斯克斯说着，按了一下桌上的电铃按钮，一扇侧门被打开了。劳威尔斯转过头去，他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他心爱的女朋友乔伊娜已经被剥得只剩下“三点式”了，正被几个人高马大的德国兵紧紧地按着。

“劳威尔斯，亲爱的！你快救救我啊……”感情脆弱的姑娘满眼含泪，在恐惧而痛苦地哀求着。她想挣脱那些罪恶的手回到劳威尔斯的怀抱，但是却被那些德国兵拉住了。

劳威尔斯一见，不由得怒火中烧。“放开她，她是无辜的！”劳威尔斯猛然站起来，但是马上也被几只强有力的手按在椅子上。

吉斯克斯阴森地笑了笑说：“不，上尉先生，你怎么能不顾事实地说她没有罪呢？她为你提供了发报场所，甚至和你一起工作，难道说没有罪吗？根据占领区治安法，她和你一样，都是要被判处绞刑的，或者是将被押往东方的某个集中营，比如达豪，甚至还有奥斯威辛！”

听到从吉斯克斯嘴里蹦出来的血淋淋的地名，吉斯克斯脸上一片苍白。这时，劳威尔斯又听到吉斯克斯阴险地说：“不过，由于这位姑娘年轻而又漂亮，所以我们并不想马上把她送到那种地方去。我手下的这几位兄弟都想同她玩玩，尤其是想当着你的面……如果你再要保持沉默，我只有同意他们的请求了……”

“好吧，我乐意效劳。”劳威尔斯终于受不了了。

为了自己的女朋友，他只好委曲求全。他声音低沉地说：“我答应你们的要求。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得马上释放我的女朋友！”

“这好办，现在就可以当场释放。”吉斯克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还有，你们还必须保证从伦敦回来的每个荷兰人的生命安全。”劳威尔斯想了想，又提出了一个条件。

这次吉斯克斯却没有那么快答应了。他只是说这事他说了不算，但是答应向自己的上级汇报。

吉斯克斯和劳威尔斯之间的这笔交易终于成交了。吉斯克斯成功地控制了劳威尔斯，顺利地完成了“北极行动”的第一步。

第二天上午，在吉斯克斯的授意下，劳威尔斯的第一份假情报传到了伦敦秘密情报局总部，内容是关于德军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在这封电报中，吉斯克斯还向上级报告了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不过，让吉斯克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劳威尔斯在向伦敦发报时竟然巧妙地向伦敦总部发出了警告——因为派遣他来荷兰之前，伦敦特别委员会同他约

定，发回伦敦的所有电报中的第16个单词必须故意拼写错误，以此作为安全保险的标志。如果伦敦接到的电报中的第16个单词的拼写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这份电报有诈，或者是发报人发生了意外。劳威尔斯就按照这个约定，在给英国伦敦总部发电报时，把每一个单词都拼写得准确无误。劳威尔斯确信伦敦总部的那些情报官们看到这份电报后，能读出其中的危险。

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伦敦总部收到这样一份有明显警示暗号的电报竟然毫无察觉，那些情报官们好像根本就不记得，有过那样一种约定，没发觉劳威尔斯已经发生了意外，而是一如既往地按正常情况同他联系。就是这种疏忽大意，酿成了大错。

三天后，劳威尔斯收到从伦敦总部发来的电报，报文说“将派彼得·道伦上尉携电台空投入荷，协助你工作，请按规定信号做好接待准备”，并且详细地列出了空降地点、时间、联络信号和接头方式。



二战期间英国情报机构使用最广泛的无线电收发报机

当电文从劳威尔斯的笔下译出时，他的手都在发抖。这并不是糊弄德国人的虚假电报，它的真实性无可怀疑。那个马上就要空降到荷兰的彼得·道伦不仅是他的好朋友，而且还是和劳威尔斯一起同期接受报务训练的同学。眼看着他也要同自己一样，落入纳粹德国人的魔掌，劳威尔斯能不担忧吗？劳威尔斯心急如焚，但又束手无策，只有老老实实在地把这份译好的电报交到吉斯克斯手中。

吉斯克斯见到这份电报后，不由得一阵狂喜。眼

看又有一名英国特工自投罗网，他能不高兴吗？他马上命令手下按照电报上的内容分头行动，准备活捉彼得·道伦。

海牙近郊有一个斯丁威克镇，镇旁有一块平坦的荒地，荒地连着一片茂密的森林。这就是那封电报中事先规定的空投地点，一切都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此时，正值午夜十二点，在这片荒地上，三只分别包着红、蓝、白三色布的手电筒射出三道强光，划出一块标志明显的三角形空降场地。吉斯克斯带着一帮德国士兵隐藏在周围的丛林中，劳威尔斯也在其中。不一会儿，一阵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没过多久，夜空中出现了几个小黑点，向三角地带的中心飘落。首先着陆的是几个箱子，最后一顶降落伞下吊着的是一个人。劳威尔斯知道，这个马上就要着陆的人就是彼得·道伦。他真的不敢走出那片埋伏的丛林。但是吉斯克斯和几个德国兵反抓住他的手，押着他向前走去。彼得·道伦平安着陆了。他一边收伞，一边向来人亲切地打招呼：“你好，劳威尔斯，你干得真不错！咱们可又在一起了。”

但是劳威尔斯却一直没有做声。正当道伦要上去

拥抱自己的战友时，几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道伦不由得惊叫一声：“劳威尔斯，你这是开什么玩笑！”

还没有等道伦说完，吉斯克斯一挥手，几个德国兵一拥而上，将道伦绑了起来。就这样，彼得·道伦成了吉斯克斯的第一个俘虏，也是“北极行动”后的第一个战利品。

从此以后，同样的情形接连不断地重复。一批又一批携带电台的盟国情报人员和大量的物资被空投到荷兰，吉斯克斯也一次次照单全收。事后，吉斯克斯还命人将所得到的各种物资和经费一一登记造册。

为了保证“北极行动”的顺利进行，吉斯克斯略施小计，经常命令劳威尔斯给英国情报机构施放烟幕，把一些情报发给伦敦英军情报机关。那些情报大多都是他虚构的，即使是真有其事，也是无关痛痒的“马后炮”，这对英国情报机构来说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还对英军作战方案的制定产生一种战略误导。比如有一次，一个德国占领军上校暴病身死，吉斯克斯一面严密封锁消息，一面却指示劳威尔斯向伦敦报告，说是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杀死了德军的一名高级军官。为了

配合这种假情报，第二天，吉斯克斯假戏真做，煞有介事地在荷兰的多家报纸上登出一则假消息——伦德尔上校不幸以身殉职……

为了骗取英国人的信任，吉斯克斯可谓是费尽心机。有一次，他派人炸沉了鹿特丹港的一条已经报废了的德国空货船，然后又指示劳威尔斯向伦敦报捷，说是英国情报机构的人干的，结果英国情报机关马上发来嘉奖电奖励那些“有功人员”。吉斯克斯利用这个机会，命令劳威尔斯再向伦敦发报，要求总部再多增派人员，再多拨活动经费和军用物资来。

吉斯克斯通过这种手段，使“北极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收获越来越大。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控制了荷兰地下组织的14部电台，不断地向英国情报机构发送各式各样的情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英国情报机构骗得团团转。同时还捕获了所有空降到荷兰的盟军情报人员和武装人员，几乎破获了荷兰当时所有的地下抵抗组织。

麻木的英国情报机关

面对吉斯克斯阴险的“北极行动”的屡屡得手，作

为一名英国情报人员的劳威尔斯，真是心急如焚。因为吉斯克斯的这种阴谋，完全是借自己的手实施的。自己已经不自觉地成了德军情报机关的帮凶。为此，劳威尔斯深受良心的谴责，痛不欲生。于是，他冒着被枪毙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在发报时加上一些起到警示作用的信号，希望伦敦总部能够发现异样。但是，劳威尔斯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每次发报时，那些德国情报人员就坐在他身边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只要一见报文有异样，就立即按下开关施放干扰，并且把劳威尔斯关到隔壁的房间里暴打一顿，让他吃尽了苦头。尽管如此，劳威尔斯却始终也没有放弃这种努力。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的报警信号发出去了，伦敦方面一定会识破德国人的阴谋。

有一次，劳威尔斯趁那个监视自己的德国人不注意，在一份报文中又插入了一些不易发现的虚码，向伦敦总部发出了警告信号。但是让劳威尔斯没有想到的是，伦敦那边仍然麻木不仁，事后一切都没有改变。劳威尔斯绝望了，他没有想到有口皆碑的英国情报机构，竟然是如此徒有虚名！

让劳威尔斯更没有想到的是，不仅他冒着生命危

险发出去的那些报警信号始终没有引起英国情报机构的警觉和重视，就连后来他的战友彼得·道伦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逃回伦敦，当面报告了荷兰的失误，都没有引起情报局那些头目的重视。

彼得·道伦自从被德国人抓捕之后，就一直被关押在一个叫哈伦的监狱里，和那些空投到荷兰后被德军抓捕的英方人员关押在一起。

哈伦是荷兰第二大城市鹿特丹港口附近的一个小镇，位置相当偏僻。德国人入侵后，这里的居民大多数都远离故土，流落他乡了。德军就在这里设立了监狱，关押那些被抓捕的荷兰地下抵抗组织成员、盟军的战俘和空降到荷兰的英军情报人员。道伦被关押在哈伦监狱之后，由于他拒绝与吉斯克斯合作，又在监狱里常常领头聚众闹事，结果被单独关押在四层楼顶层的一个单人牢房里，吃饭、用水都是由德军看守送进来，并且不许到楼下的院子里和其他囚犯一起放风。

那天晚上，道伦着陆后被捕的一刹那，就明白劳威尔斯出事了。在后来被捕的人中，他又发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道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心想必须立

即通知伦敦。

但是，怎样把消息传出去呢？房内有一根自来水管通楼下房间，并且他的报务班同学、英军中尉霍姆斯就关在楼下。于是，道伦就准备通过这根水管来传递消息。一天晚上，道伦找了一根小木棒，有规律地敲击着那根水管，就像在发报机上敲击键盘一样。可是接连敲了几下，楼下都没有反应。但是他并没有不灰心，又重复这个动作，继续接着敲。终于楼下有了回声。道伦知道，受过报务训练的人对长短有序的敲击声会有一种职业的敏感，他决定和霍姆斯玩一次电报游戏。

“我是道伦，请回答！”道伦用莫尔斯电码给霍姆斯发报。

“我是霍姆斯，我是霍姆斯！”霍姆斯在楼下应答。

道伦兴奋极了，他扬起木棒，继续发报：“速通知伦敦，我已被捕，所有的潜入人员都被扣押，电台控制在德国人手里！”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情报通过霍姆斯之手，七转八转竟然传到了伦敦。可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别行

动委员会得到这个消息后，却是将信将疑，不知这个情报是真是假。他们给劳威尔斯发出一份电报进行试探。电文要求荷兰地下抵抗立即组织炸掉科特威克电台的发射塔，并指定要彼得·道伦带队指挥。特别行动委员会当时认为，如果德军的电台发射塔没有被炸，就说明劳威尔斯和道伦等情报人员的确是被捕了，就可以证明通过霍姆斯传来的这份情报的内容是真的。那么，今后他们只有以另外的方式同荷兰方面联系。

当劳威尔斯把这份电报译出来之后，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伦敦方面已经开始怀疑了。他把电报给吉斯克斯看了。吉斯克斯当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设在科特威克的电台一定是不能炸的，因为它是德国海军与在大西洋活动的德军潜艇进行指挥联络的主要通讯工具，这样昂贵的代价他付不起。但是，吉斯克斯最后还是想出了办法，他要劳威尔斯以道伦的名义回电说：“袭击计划近日内实施，请静候佳音。”

四天后，由德军控制的荷兰报纸登出一则消息：“昨晚，一伙武装分子袭击了科特威克电台，但被守军打退，袭击者中有三人被击毙，其中一名是这次袭击行动的指挥者彼得·道伦。”与此同时，伦敦方面也

收到了一封电报称：“袭击失败，彼得·道伦上尉遇难。”——这当然是吉斯克斯的“杰作”。

不过，尽管有了报道，还有了电报，但伦敦方面还是不放心，于是又发出一条新的指令，要求荷兰地下抵抗组织马上开辟一条从荷兰经比利时、法国到西班牙的交通线，掩护在西欧境内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返回英国。不过这样的任务对吉斯克斯来说不用犯难，因为这不会危害“北极行动”的安全，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于是，在德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这条交通线很快建立起来了，许多落难的盟军飞行员真的安全返回了伦敦。这条交通线的建立，让特别行动委员会怀疑动摇了。他们最终认定，所谓来自道伦的情报都是盖世太保的反间计，从此对这方面的情报一概不予以理会。

对于在牢房外所发生的这一切，身陷囹圄的彼得·道伦却一无所知。当他看到仍然不断有新的英国情报人员被捕时，还以为是霍姆斯并没有把情报及时送出去。于是他就决定冒险一搏，自己设法越狱，逃回伦敦去报警。

道伦开始作越狱的准备。他发现牢房的窗户被砖

堵住了大半截，只留下上方一小块地方透光；楼下院子里白天黑夜都有哨兵巡逻，一到夜晚，几只强光探照灯就对着窗口，把整个监狱和院子照得如同白昼。要是从窗户中逃出去是不可能的。他又看了看紧闭的牢房门，他发现牢房虽然紧闭着，但门上有一个扇形的气窗。道伦开始从这个门上打主意了。

这座监狱是临时改建的，以前应该是一座旅馆，内部结构未作改变。整个监狱的防卫内松外紧，门外的长走廊只有一个流动哨，但庭院的围墙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围墙外面每200米就有一个岗哨，每个哨位除了有哨兵，还都备有探照灯和警犬。警戒虽然森严，但并不是没有办法。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道伦拧下了门上方气窗的插栓，趁着走廊里的哨兵打盹的工夫，从气窗爬了出来，躲进了斜对面的洗手间。楼房的背面很僻静，道伦靠他当侦察兵时练就的攀登功夫，翻过洗手间的窗户，顺着窗户旁边的一根下水管溜到了地面。他蹲在墙根下观察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动静，才找到了墙角下的一个泄水洞。刚好那个泄水洞的栅栏坏了，有一根废钢筋倒在那里，道伦就用这根废钢筋撬开了几块砖头，从洞中爬出了围墙。

哨所的探照灯不时扫过围墙，趁黑暗到来的一霎，道伦疾步钻进一片小树林。当时正下着大雨，警卫没有发现这个雨夜的逃亡者。于是道伦就沿着一条涨水的小河沟，消失在雨夜之中。

第二天上午，吉斯克斯得到彼得·道伦潜逃的报告后，大惊失色，连日来的喜悦的心情也一扫而空。因为他心里明白，要是让道伦跑回了伦敦，那么他的杰作——“北极行动”就要寿终正寝了。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英美盟军渡海反攻的风声正紧，柏林急需从“北极行动”中获得盟军渡海作战的情报，道伦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越狱逃跑了，真太不是时候了。

吉斯克斯立即指挥警卫人员在监狱四周进行搜捕。但是由于大雨冲刷了所有的痕迹，就连警犬也找不到目标，搜捕行动一无所获。在离监狱3公里处有一个小火车站，吉斯克斯查看了一下火车站的火车时刻表，发现在每天的凌晨三点钟左右刚好有一班火车路过这里，于是吉斯克斯就自信地断定，道伦肯定已经乘车离开了哈伦。于是吉斯克斯下令在荷兰全境展开大搜捕，同时密切注意伦敦的变化。

出乎意料的是，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不但道伦

没有找到，就连伦敦方面也没有反常的举动，“北极行动”仍然在顺利地进展。吉斯克斯猜测，那个道伦肯定没有逃回伦敦，也许是在途中发生了意外。他见“北极行动”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也就放松了对道伦的追捕。

其实，彼得·道伦那天晚上越狱后并没有走多远，就躲藏在距离哈伦监狱仅两公里远的一座修道院里。原来，在战争爆发前，道伦经常到哈伦来玩，因为他一位中学时代非常要好的女同学杰妮就在这座修道院里当修女，他经常来看她，他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熟悉。那天晚上逃出来后，他就一路狂奔，径直向修道院跑去。

在杰妮和院长的掩护下，道伦在这座修道院的一个地下室里躲了三个月。直到这场搜捕风波平息之后，道伦才辞别了那位善良而美丽的修女杰妮和修道院院长，化装后进入了比利时，再经法国，最后到达了中立国西班牙，终于在1943年底的圣诞节前夕，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英国货船。

彼得·道伦上尉的突然归来，让特别行动委员会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因为据荷兰来电报告，这个彼得·道伦上尉早就在袭击科特威克电台的战斗中“遇

难”了！道伦来到伦敦后，把自己所掌握的有关德军正在实施的“北极行动”情报进行了详细汇报，这让特别行动委员会的那些人如五雷轰顶。他们知道，假如这个道伦所报告的情况都是真的，那么他们的错误就犯大了，这如何向丘吉尔战时内阁交代？应该怎样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呢？特别行动委员会的首脑们举棋不定，他们不愿自己否定自己。最后，他们竟然作出了一个残忍的决定——以道伦已经是德国“双重间谍”的罪名，又把他投入英国人的监狱。这种结果是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几个月逃回英国的彼得·道伦上尉始料不及的。直到1943年11月，又有两名英国情报人员逃回了伦敦，再一次说明了事情的真相，彼得·道伦才被释放出来。

这时英军已经损失惨重。从欧洲大陆反馈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当时道伦所报告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英国所有空投到荷兰的情报人员和军用物资完全落入纳粹德军之手。特别行动委员会这才决定暂停对荷兰的空投支援，但继续保持与荷兰的电报联系。到了1944年3月底，英国的情报部门开始对“荷兰地下抵抗组织”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从此便不再将重要的消息传

给荷兰地下组织。可是直到这时，吉斯克斯还通过劳威尔斯和自己控制的电台向英国方面询问：假如盟军在欧洲登陆，荷兰的地下组织应该如何配合？需要采取哪些行动？但是伦敦的回电总是避而不答。

这时距离盟军准备实施在诺曼底登陆的“霸王行动”只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英国情报机构再次失误，泄露了“霸王行动”的登陆计划，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吉斯克斯已经意识到，肯定是那个道伦出了问题，看来自己精心策划的“北极行动”该到收场的时候了。于是在1944年4月1日，吉斯克斯指令在荷兰参加“北极行动”的10部电台同时向伦敦特别委员会发出一份内容相同的电文，全文如下——

近两年来，我们收到95次空投，共计有电台75部，枪8000支，子弹50万发，炸药3万磅，另有经费50万荷兰盾，足够开一个小银行。我们的合作一直很默契，很有成效。近来我们感到，你们似乎要甩开我们另有所为，我们对此感到格外遗憾，因为在这个国家里，长期以来我们是你们办事的唯一代

表，并且取得了双方满意的效果，但是我们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你们想向大陆进行大规模的拜访，我们将对来访者采用我们一贯的殷勤态度，并且会给予同样热烈的欢迎！

吉斯克斯之所以选择在4月1日发出这样的电报，来揭开成功实施了两年多的“北极行动”的真相，是有其特殊用意的。因为每年的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总是以“谍报鼻祖”自居的英国情报机关收到这样的一份电报，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英国特别委员会收到这份电报后，除大骂自己的上司孟席斯无能，大骂德国佬阴险狡诈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英国秘密情报局长孟席斯也只好自认倒霉，大风大浪都闯过的他竟然在小河沟里翻了船。

事实上，英国在战后统计表明，在整个“北极行动”期间，英国空投到荷兰的52名特工（其中有英国特工10名）有47人被杀，同时，整个荷兰地下抵抗组织还有1200人因此而丧生。英国情报机关的失误，导致自己的谍报人员和盟友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

1945年10月底，荷兰议会组成了一个以法官丹克博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专门就荷兰情报人员白白牺牲一事进行调查。荷兰政府要求英国相关负责人到荷兰调查委员会听证，但这个要求被英国拒绝。英国最后勉强同意了丹克前往英国调查，但是当丹克要求调阅相关档案时，却被告知所有文件在一场突发的大火中被烧毁了，结果使调查无法进行。

“北极行动”让德国情报机构大获其利，但是英国情报机构在此期间也并不是毫无作为。

1940年9月，一架德国战斗机将一名叫施密特的德国间谍空降到英国剑桥附近的一座小山上，结果很快就被英国安全局给逮捕了。原来早在施密特飞往英国之前，英国安全局就已经得到了情报，知道这几天内会有德国间谍“光临”，于是他们早就守候在那里。

施密特被带到英国安全局之后，并没有被处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安全局建立了自己的“双重间谍”系统，在1941年初成立了一个直属于国防部领导的机构——“双十委员会”，使“双重间谍”为己所用。所以，施密特在被带进安全局接受审讯之后，也

成了一名“双重间谍”，化名为“塔特”，从此一直为英国情报机构服务，成了“双十委员会”手中一张非常重要的牌。

塔特执行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给德国谍报机构发了一封平安到达的电文。几小时后，德国谍报局回电说“祝贺你平安抵达，所需物品将由专人送达”。这样，英国版的“北极行动”就开始上演了。从此之后，德国情报机构就接连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把自己的情报人员送到英国来同这个塔特接头，而这些被派遣到英国的德国间谍的命运可想而知，不是受伤就是被捕。与此同时，英国警方还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一番以迷惑德国人，让他们以为那些暴露了的德国间谍都被英国人处理了，而那些没有暴露的还是安全的，他们所发来的情报还是真实可靠的。这样一来，德国情报机构对这个化名塔特的特工所发的情报总是有求必应。

1941年，塔特又向德军谍报局报告说，他受到了英国警方的传讯，主要原因是没有兵役登记。不久，塔特又发报说，由于自己的一个朋友帮忙，这才逃过一劫。塔特说这个朋友是某公司的职员，现在弄假成

真了，他在这家公司必须坐班，只有到了周末才能自由行动，如此一来，很多发报工作就不能由自己亲手完成，只能由自己手下的报务员代发了。德国谍报机构的那些头头脑脑，对此不仅表示同意，而且对塔特的成功潜伏表示赞许。从此，英国“双十委员会”就直接控制着电台，同德国谍报局联系，经常发出一些真实的但是并不重要的信息。

不久以后，塔特又向他的上司发报说，自己已经取得了英国的完全信任，并且成了英国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德国谍报局得知之后，欣喜万分，他们认为，自己的特工人员已经进入了英国上层社会，这样就能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于是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夕，德国谍报机构就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让他去办。他们指示塔特利用记者身份，去调查一下盟军的兵力集结情况。“双十委员会”得到这个消息后，觉得大战在即，这件事非同小可，于是决定来一个将计就计。几天后，他们以塔特的名义向德方发了一封电报，电文称他已经来到怀城工作，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铁路职员，了解到了美国的第一集团军正在港口待命……

这个“塔特”还在电文中分析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可能性就非常小，而加来就成了盟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就是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情报，给德国谍报局造成了一种致命的错觉。

德国谍报局一直以为塔特是在为德国效命，因此纳粹德国在战争结束之前，还向他授予了“铁十字勋章”。但是这并不能打动塔特，因为他已经是盟国的一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塔特并没有回到德国，更没有接受德国的国籍，而是永久性地居住在英国，成了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在英国过着体面的生活，直到逝世。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轰动一时的“北极行动”成了二战中一个不解之谜。在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在对这件事情进行质疑，有人说是因为英国情报机构的严重迟钝造成的恶果，但也有人指出这是因为英国秘密情报局与特别行动执行局“内讧”造成的。但是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失误终究是不可饶恕的。

第八章 “肉馅行动”，“马丁少校”拯救3万盟军

找来一具无名尸体，把他打扮成“马丁少校”，并给拴上一只装有“机密文件”的公文包，然后让他落入德国人之手——这就是英国情报局著名的“肉馅行动”；德国人认真地研究了“马丁少校”携带的“机密文件”之后，果然言听计从将战略要地西西里岛变成一座空城，从而让盟军的“火炬计划”得以顺利进行——没有想到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却发现“马丁少校”原来真有其人。

“肉馅行动”出台的前前后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2年秋天，战局已经开

始发生明显变化，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正在酝酿之中。盟国已经到了由被动转入主动的关键时刻。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开始准备反攻；轴心国中的日本在太平洋战区惨遭失败；德国隆美尔军团在北非遭到沉重打击，希特勒的狂飙军队再无当年之勇，一场艰苦卓绝的北非战争正将这个战争狂人逐渐逼入死角。整个世界战局对美英联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极为有利。

1942年7月18日，丘吉尔与罗斯福总统的代表霍普金斯就同盟国作战计划问题在英国伦敦进行了磋商。7月25日，双方统一了意见，确定盟军将在北非实施代号为“火炬”（原代号为“体育家”）行动的登陆作战计划。

整个冬天，英美联军都在为这个计划作准备。

1943年的春天终于来了，北非战争也进入尾声。1月14日—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又在刚解放的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了秘密会谈。法国的戴高乐也参加了。这就是著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当时罗斯福曾邀请斯大林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被拒绝了。当时正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关键时

刻，斯大林没有办法离开苏联。

卡萨布兰卡会议历时10天。在这次决定二战未来进程和命运的会议上，盟军高级将领的眼光几乎都集中投向了地中海上的最大岛屿西西里岛。因为西西里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进攻德国本土、打通地中海交通线的主要障碍，如果能够顺利攻占，那么盟军在地中海的运输线将会安全顺畅，同时也会分散德军对苏联前线的压力，增强对意大利的压力。会议最后作出了一项重大的军事决策，就是将盟军发起对西西里的进攻，作为打败意大利的第一步，利用北非的胜利打通地中海航道，来对希特勒的同伙墨索里尼发动两栖作战。只等1943年秋北非战役结束后，攻占西西里岛，实施“火炬”登陆计划。

西西里岛由于地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德国和意大利对该岛实行了重兵防卫，在这个面积仅有2.5万多平方公里的岛屿上，部署了13个主战师和1400多架飞机，总兵力达36万人。在西西里登陆作战之前，战争双方都虎视眈眈，暗自揣摩着对方的战略意图。无论是德意还是英美，他们的考虑重点都在西西里岛，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当时所说的那样：“除了

傻瓜，谁都会明白下一步是西西里岛。”

可面对辽阔的海峡，面对德意庞大的守军、坚固的工事和德军的精良装备，盟军如果只靠武力强攻西西里岛，肯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么，用什么办法调虎离山，迷惑希特勒，让希特勒把岛上的守军调走一部分呢？

经过研究，盟军统帅部认为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必须要让希特勒错误地判断，由于西西里岛太过于明显，盟军不可能进攻西西里岛，或者是不光是进攻西西里岛一个方向，还有可能进攻其他地方，比如说会在南欧沿海其他地区实施大规模登陆。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把西西里岛作为防御的重点，使进攻西西里岛的行动按计划顺利实施。

那么，怎样才能让希特勒作出这种错误的判断呢？当时英国情报机关和“双十字委员会”都在煞费苦心想办法。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只有制造假象，误导这个狡猾的纳粹头目。

英国海军情报处的官员伊温·蒙塔古海军中校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说可以让一位盟军将军给另一位在北非前线的将领写一封信，在信中明白无误地透

露盟军不准备进攻西西里岛的信息；然后找一具尸体，把这具尸体打扮穿戴成一位中级军官的样子，将信放在这具尸体上，然后把这具尸体放在海里，让潮汐把它送到德国的“盟友”西班牙的海岸。只要对方发现了这位“军官”和这封信，就可以达到欺骗德国人的目的。

蒙塔古中校的这个方案尽管看起来有些荒唐，但不能说不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双十字委员会”就同意了他的这个想法，并责成英国皇家空军代表查尔斯·乔芒德莱与蒙塔古一起，共同负责筹划这个欺诈计划，并把这个计划命名为“肉馅行动”。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半个月后，查尔斯与蒙塔古就开始仔细推敲这个方案的每一个细节。因为这个方案不能有一丝疏漏，否则就会前功尽弃。几天后，他们终于拿出了一份详尽的行动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寻找男性尸体一具。尸体年龄约35岁，身高1.85米，体重80公斤，无外伤，肺部应有少量积水，身穿陆战队少校野战军服，无帽，外着橘黄色救生衣（便于打捞）。

（2）计算好潮汐，用潜艇把尸体运到毕尔巴鄂

港，抛弃尸体。

（3）把装有密件的文件袋系在尸体的腰带上，造成飞机失事保护文件的假象。

（4）把尸体装入特别容器内，里面塞满冰块，重量为180公斤。容器外面用油漆写上“光学机械”字样，通知潜艇乘务员要试验新式武器。

（5）预先知道本计划的人仅限于直布罗陀军港的谍报处长和潜艇艇长。

（6）以上行动完成后，电告“‘肉馅计划’实施完毕”。首相拍板后，由潜艇秘密运送“肉馅”。

报告拟定后，立即签名呈送到军事情报总局五局。当时军情五局的局长是戴维·皮特理爵士。他认真看了这份报告之后，觉得没有什么疏漏之处，就在报告上批上了几个字：“计划可行。速密送唐宁街10号。”

几天以后，这份行动方案就正式批复下来了，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场最大的军事欺诈行动“肉馅行动”拉开了序幕。

“马丁少校”的尸体安葬在西班牙

蒙塔古和查尔斯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一具符合要求的男性尸体，然后将它进行乔装打扮后来充任“肉馅”。遗憾的是，伦敦和盟军占领区虽然不乏尸体，但大多数死因都非常明显，与因飞机海上失事而死亡的情况根本不相吻合；更为困难的是几乎每一具尸体都有亲属认领，而且亲属们都不愿意让亲人的尸体被再次用于某种秘密目的。

正当蒙塔古灰心丧气之际，验尸官班德利·珀切斯帮了他们大忙，为他们找到了一具无人认领而又是死于肺炎的年轻人的尸体，于是实施“肉馅行动”的第一步才算有了眉目。

接下来，他们就秘密地对这具尸体进行改造，蒙塔古和查尔斯曾设想这个人应该是个陆军人员，但根据常识，如果英国国防部得到报告说是一名军官的尸体被冲到了西班牙的海滩上，那么，这个消息在国防部内很快就家喻户晓，它同样也会传播到其他可能与之稍有关系的人的耳朵里。这样，德国人便很快就会发现，这是个骗局。

经过慎重考虑，蒙塔古只好让这具“肉馅”充当皇家海军陆战队中的一员，并给他取了个新的名字叫“威

廉·马丁”，因为，当时公开的《海军名册》中同名同姓的“威廉·马丁”就有好几个，而且都是中级军官。即使是德国人搞到了一份英国皇家海军的《海军名册》，他们对此也会深信不疑。

接着蒙塔古又把这个“威廉·马丁”打扮成一名乘坐飞机携带文件的军官，其身份是“英国联合行动司令部坦克登陆艇专家、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作战参谋马丁少校”。为了能更真实地迷惑德国人，他们还得伪造出更多的“机密文件”和其他的一些“私人信件”，使德国人相信那位“威廉·马丁”少校正是在递送这样的“机密文件”和信件时，由于飞机出事不幸遇难，让这些“机密文件”落入他们手中。

炮制那样的“机密文件”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关键是密件的形式和内容都要做得恰到好处。形式不当，内容不巧妙，敌人不会轻信；但两者都做得太过分，容易让敌人认出是圈套。怎么办？经过反复论证，英国谍报机构最后决定，由英军总参谋部上将阿奇博尔德·奈爵士亲自出马，假装给英国驻北非突尼斯的远征军司令部华德·亚历山大将军写一封亲笔信。这封信不能是一件谈论盟军计划的公函，而应是朋友之

间的普通通信。并且，写信人不愿收信人的副手看到信中的内容，才由一名军官当面递交。重要的是，这封信的内容表面上写别的事，但在某个段落里却“不小心地”泄露了盟军的计划，在字里行间遮遮掩掩地透露出了一点军事情报，表明盟军不打算进攻西西里岛。比如说，盟军统帅部经过多次考虑后，决定让亚历山大将军指挥的突尼斯军队（归属艾森豪威尔将军统辖）西进，攻击撒丁岛；让亨利·威尔逊将军指挥的埃及部队（归属蒙哥马利统辖）东进，从希腊长驱直入，强攻巴尔干半岛。事实上，当时盟军缺乏登陆艇，绝不可能多线作战。

阿奇博尔德爵士在信中解释了为什么参谋长们不能同意艾森豪威尔所要求的把某个岛屿（不是西西里岛）作为强渡地中海的掩护目标。信末，他又顺便加上了一句，说埃及的威尔逊将军处境很困难，“艾森豪威尔定会赞成把西西里岛作为他的掩护目标”。这封信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用漫不经心的方式，透露出西西里岛仅仅是作为进攻的掩护目标，当然，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万一德国人得知盟军进攻西西里岛的正确情报，他们还以为这只不过是盟军的一种欲擒

故纵的手段，而没有要攻打西西里岛的意思。

另外，蒙塔古中校还准备了一封由联合作战总指挥路易斯·蒙巴顿勋爵签署的信，信中除了抛出上述“事实”外，还要求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安德鲁海军上将，确保将这封“写满了私房话”的信，安全递交给亚历山大将军。英方情报人员事后得知，信中那些蹩脚的“私房话”确实帮了英国人的大忙，让德国人毫不怀疑地认定盟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不是西西里岛，而是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

除了这些能以假乱真的私人信函之外，英国情报人员还临时杜撰了一些相关的“机密文件”。这些密件内容的伪造当然也是要小心谨慎的。蒙塔古中校把密件的样稿起草后，立即呈报英军最高当局。英军总参谋部担心稍有不妥，就真的会被德军识破。但是没有想到这些所谓的“机密文件”上报到首相丘吉尔那里，他看了之后很感兴趣。丘吉尔高兴地说：“即使计划失败也无关大局嘛！”丘吉尔的一句话，减轻了蒙塔古中校等下属们不少的心理压力。

就这样，既有这么重要的私人信函，又有这样一些盖有“机密”和“绝密”的“机密文件”，另外再加上一些

与军队有关的军用图表和“马丁少校”的一些私人物件——其中包括有他出入伦敦司令部的过期通行证，有一封银行经理通知他透支的信件，钱包中是他未婚妻帕姆的一张相片（实际上是战争办公室一位女雇员的照片），还有两张4月22日的戏票存根，以表示那天晚上“马丁少校”还在伦敦同他的未婚妻一起看戏；另外还有一封来自他父亲的言词粗鲁的信，内容是反对他这段草率的战时婚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把一个军用公文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其目的无非是使德国人更加信服罢了。

1943年4月19日5时10分，一艘运载“马丁少校”尸体的“塞拉夫”号潜艇从格里纳克港驶出。这项工作由英国海军上将克劳德·巴里爵士一手安排，他命令皮克逊少校所指挥的皇家潜艇“六翼天使”号改变航期，以备蒙塔古随时调用。4月19日，蒙塔古从停尸室里取出了从1942年11月就冷藏在那里的“肉馅”，运到了停靠在圣洛赫港的“六翼天使”号潜艇上。几分钟后，肩负绝密使命的“六翼天使”号潜艇便载着“马丁少校”的尸体，踏上了驶往大西洋加的斯湾的征程。“六翼天使”号潜艇在北非登陆作战时，曾执行过秘密运送美军

四星上将马克·韦恩·克拉克将军的任务。艇长皮克逊少校有执行情报任务的经验。蒙塔古中校很看重他。

潜艇航行了几天后，于4月27日凌晨2点左右抵达西班牙西南部的预定海域。艇长皮克逊少校一声令下，装着“马丁少校”的容器便被4位军官从浮槽中搬了上来，放在甲板上。这时艇长皮克逊少校对几位军官严肃地说：“今晚大家看到的明天必须忘掉，这关乎英国的胜利。谁走漏了风声，军纪严惩。”

潜艇上的五十余名水兵均被反锁在舱里。那些军官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因为这是潜艇上第一件需要如此保密的事。那件银白色的容器被打开了。令军官们吃惊的是，容器里既不是光学仪器，也不是什么新式武器，而是一具身着军装的尸体！4时30分，在艇长皮克逊少校的低声命令下，尸体和一只橡皮救生艇一起放到了海水中，滑向大海。“马丁少校”出征了，军服里面的腰带上紧紧地系着一只军用公文包。

1943年4月30日深夜，在西班牙西南部城市韦尔瓦港外的海面上，漂来了一具男尸和一个充了气的橡胶救生艇。第二天上午，出海打鱼的渔民发现后，把尸体拉上小船，连同那只橡皮艇一起拖到韦尔瓦古老

的摩尔斯渔镇的乌姆布利亚沙滩。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穿着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战地军服、佩带少校肩章的军官的尸体，腰带上用链条拴着一只公文包。他们急忙向韦尔瓦军事当局报告了此事。随后，数百名渔民和他们的孩子围着这具尸体，看着西班牙军警对尸体进行检查、拍照。很快，西班牙当局就把这具尸体送到附近的华尔斯医院进行解剖。解剖结果表明，尸体活着坠海溺死，肺部有少量海水，估计尸体在海上漂流了三到五天。

他们从死者身上找到的文件表明，此人是英国联合行动司令部的参谋“马丁少校”，在乘飞机前往盟军地中海联合舰队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落海身亡。西班牙海军办事处查明尸体身份后，便将此事通知了英国驻韦尔瓦的领事，但由于西班牙当局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很密切（这也正是英国人把投尸地点选择在西班牙的原因所在），西班牙人在通知英国人的同时，也通报了德国在西班牙的间谍。行动迅速的德国间谍立即抢先一步，在英国领事认领尸体之前，已经将“马丁少校”身上的公文包取走了。正如一位海军专家所预言的那样，德国间谍和西班牙人完全按照蒙塔古所希望

的那样进入了角色。

德国间谍比西班牙海军办事处的人狡猾得多。他们从信的寄发地点、日期到收信地点的邮戳，一一反复核证。这一切当然都是无懈可击的。要知道，为了使这套材料无懈可击，英国谍报部门费了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每一个细节都作了反复的推敲。德国间谍把里面的那些所谓的“机密文件”全部偷拍下来，马上将影印件送到德国柏林鉴定去了。

柏林当局接到驻西班牙特工的报告后，一面立即着手进行鉴定，一面指示提供更加详尽的细节。纳粹谍报局的那些官员仔细研究了这些文件之后，认为都是极有价值的重要情报。蒙巴顿写给美国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的信，信中谈到两国联合作战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英军副总参谋长、陆军上将阿奇博尔德·奈爵士的一封信上说，为了迷惑敌人，打算利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来掩护对希腊的登陆作战。德国人看到这些信件后，如获至宝，欣喜若狂。

英国驻韦尔瓦领事馆人员并不知道“肉馅计划”，因此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向英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报告了此事。英国驻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大使塞缪尔·霍

尔爵士愤慨地要求西班牙当局立即归还这些重要的信件。后来，海军武官希尔加斯中校从西班牙海洋部取回“马丁少校”的那个公文时，发现那里面所有的文件都被人翻阅过。于是五天以后，伦敦方面收到了驻马德里英国大使馆海军武官的第一个报告，报告称，“驻韦尔瓦领事馆副领事从西班牙宪兵那里认领了漂流在海上的陆战队少校马丁的尸体。”关于那只“军用公文包”及文件的事却一句也没有提到。

收到这份报告后，伦敦立即对马德里大使馆发出训令：“马丁少校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务必照会西班牙当局查明其下落，但应注意不要让西班牙当局了解到文件的重要性。”

大使馆很快回电：“西班牙政府全部完好地移交了马丁少校的公文包及其他遗物。”

当那只军用公文包送到伦敦，英国情报机关马上使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检验，从夹在纸上的夹子是干的这个疑点，确定文件已被德国人用盐水软化纸张的技术全部拆开拍照复制了。英国情报机关知道，他们已经大功告成了。

于是，蒙塔古和查尔斯又马上写出了一份报告，

称“肉馅行动”已经按计划完成。几天以后，英国首相丘吉尔收到了一份电报，上面写着几个字——“肉馅整个被吞下”。

为了进一步麻痹对方，英国海军公证司把“马丁少校”的名字登录在阵亡将士登记册上。在5月28日的《泰晤士报》上，英国官方公布了一批包括“马丁少校”在内的英军阵亡将士名单，并发了讣告。

经过英国驻西班牙使馆的多方交涉，“马丁少校”的尸体按照正式军礼在韦尔瓦安葬。英国人为使这个骗局更加逼真，除了向西班牙表示了谢意之外，还派人陪同“马丁少校”的“未婚妻”专程赶到西班牙的韦尔瓦，向“马丁少校”的坟墓献上了一只花圈。英国驻韦尔瓦的副领事还为“马丁少校”立了一块简朴的白色大理石墓碑，还刻上一些简单的碑文：“威廉·马丁生于1907年3月29日……为国捐躯，光荣甜蜜！愿君安息。”

德国情报机构这时还有点不大放心，于是又派出藏身伦敦的间谍进行调查。德国间谍很快搞到了4月29日英国海军公布的阵亡将士名单，代理少校威廉·马丁名列其中，身份、姓名与西班牙发现的尸体情况完全

一致。接着，潜伏在西班牙的德国间谍也向柏林报告：马丁少校的尸体已按正式军礼安葬在韦尔瓦。

英国情报机关和伦敦方面所做的这一切，是这样的天衣无缝，德国人开始信以为真。

“马丁少校”的遗物

在德国方面，德国情报局为了辨别这些情报的真伪，专门指令由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科长冯·罗恩纳上校负责鉴定工作。也许是英国人设计的圈套太逼真了，颇为精明的罗恩纳竟然找不到一丝破绽，对文件的真实性深信不疑。罗恩纳的结论是：情报完全属实，盟军的登陆地点将是意大利的撒丁岛或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而对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只不过是佯攻。这正是德国人迫切需要了解的情事情报，因而，德国谍报人员迅速将全部文件拍摄下来，派专人送往柏林，准备当面向德军最高统帅部请功，并且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报告，称“文件的可靠性无可置疑”。

报告对希特勒产生了预期影响，尽管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依然意识到盟军极有可能进攻西西里岛，但希特勒更愿意相信“马丁少校”所泄露的“情报”，

他拒绝承诺为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防卫增加军队，还对他的军事防御部署进行了调整。

5月12日，希特勒在一份命令中明确指出：“在即将结束的突尼斯战斗之后，可以预料，英美联军将试图继续在地中海迅速行动……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最危险的地区有下列各地：在西地中海有撒丁岛、科西嘉和西西里，在东地中海有伯罗奔尼撒和多德卡尼斯群岛。对此，我要求一切与地中海防御有关的德军指挥机构迅速密切合作，利用一切兵力和装备，在所余不多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加强这些危险地区的防务，其中首先应加强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的防务。”

1943年5月12日，希特勒下令海军采取紧急对策，停止了在西西里岛的布雷行动。5月14日，希特勒在他的盖希丽尔别墅会见了墨索里尼，颇费口舌地说服了墨索里尼，将驻在意大利的德军精锐部队紧急调往了希腊。他透露了“马丁密件”的内容后，得意洋洋地对墨索里尼说：“我想这的确是真的！在我们举棋不定时，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墨索里尼说：“我总有一种预感，觉得盟军还是要进攻西西里岛。”

希特勒加重语气说：“直觉总没有情报重要。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情报！情报！”

第二天，希特勒召开了最高统帅部作战会议，命令加强撒丁岛的防务，并大大加固了希腊的工事，建立岸边障碍物并沿岸边布雷，此外还把西西里的鱼雷艇调到那里，并把第一坦克师从法国转移到希腊。他命令所有与地中海防御有关的德军指挥部迅速密切协同，集中全部兵力和武器，在6月30日前完成对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的集结和部署。意大利纳粹头目墨索里尼这时也对此深信不疑，下令将西西里岛驻守的兵力、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器材全部调往希腊，在西西里岛仅留下两个师的守军。

另外奉希特勒的命令，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也被派往希腊，组织一个集团军群，会同随后从法国南部调来的第1装甲师，在希腊东部的爱琴海域设下三道防线。希特勒又从苏德战场抽出两个装甲师，命九天内抵达希腊。同时，他又把党卫旅派往撒丁岛，从西西里岛抽出装甲部队加强科西嘉岛的防卫。而在盟军要登陆的真正地点——西西里岛，其防御力量却相当薄弱。



1943年7月10日英军成功在西西里岛登陆

当陆军元帅隆美尔把他的大本营搬到希腊后，盟军就集中主力，于1943年7月9日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实施“火炬”行动计划，神速突破了防守薄弱的西西里岛。当盟军主力在西西里岛的东南方突破时，

希特勒仍蒙在鼓里，他毫不理会惊恐万状的墨索里尼的请援要求，不但不增援西西里岛，反而进一步调兵遣将加强希腊的防守力量，因为他认为，盟军进攻西西里岛，只不过是佯攻罢了。

7月22日，盟军占领了半个西西里岛，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还坚持他的判断，甚至指示最宠信的隆美尔元帅，准备在希腊和盟军决一死战。

1943年7月24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成功。这对于德军来说是绝对意外的。以假乱真的“肉馅行动”计划帮助盟军成功地攻占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

在这次战斗中，德意军队伤亡及被俘人数多达22.7万余人，而英美军队仅伤亡2.1万余人。据估计，由于“肉馅行动”的成功实施，至少挽救了3万盟军将士的生命，这让丘吉尔深感自豪。

直至这时，希特勒才如梦方醒，但为时已晚。他日夜等待的希腊大决战，连一点影子也没有。难怪历史学家在评论这场精彩的欺诈行动时说：“德国人为得到‘肉馅’而兴高采烈，更为‘肉馅’的骗局而五脏俱裂。”

而此时，还有谁比设计这个“肉馅行动”的伊温·蒙

塔古海军中校更为兴奋呢？在英国伦敦，曾担任法官工作的蒙塔古和他的妻子伊丽丝一起，品着上等葡萄酒，尽情地欣赏着这场由他导演的好戏。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个绝妙的圈套，世上根本不存在的‘威廉·马丁少校’，出色地为我们完成了一项举世皆知的壮举。”

直到战后的1953年，伊温·蒙塔古才向人们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希特勒至死也“没有搞懂”的“超级机密”。“肉馅行动”计划实施的过程，一点一滴都透着英国情报机关的精明，他们在欺骗伪装计划中滴水不漏，连最细微的技术情节都处理得十分周全。整个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令世人拍手叫绝。

一个真正的“马丁少校”

不过，“肉馅行动”还有个很精彩的“尾声”——

1956年，好莱坞拍摄了经典影片《冒充者》（又译《谍海浮尸》）。在这次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一具经过盟军情报人员精心“包装”的浮尸。多少年来，关于其真实身份一直众说纷纭，多数人倾向于他是一名酒鬼。

直到2004年8月，一本最新出版的新书

《“HMSDASHER”号的秘密》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当年那具“谍海浮尸”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于1943年阵亡的英国皇家海军少校约翰·梅维乐。

据《“HMSDASHER”号的秘密》一书介绍，1943年，经过改装后的英军“HMSDASHER”号航空母舰在驶经苏格兰克莱德海口时突然爆炸，当时正在舰上服役年仅37岁的梅维乐少校不幸在灾难中当场身亡。之后，英国海军为他在附近海岸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且将其“遗体”安葬到了当地墓地。

然而让悲痛欲绝的家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梅维乐的遗体其实并未入土为安，而是在经过一番精心“包装”之后，被“二次利用”，赋予了一个虚构的身份——“威廉·马丁少校”。

梅尔维尔死后，留下了妻子埃玛和女儿伊泽贝尔。在梅维乐阵亡后整整60年里，他的家人们一直被蒙在鼓里，而他的女儿伊泽贝尔·马克凯每年都要前往位于苏格兰海岸的亡父的“墓地”祭扫。60年来，她竟然不知道年年凭吊的只是一座空墓。据伊泽贝尔称，当她父亲去世时，她只有3岁，英国皇家海军将她 and 母

亲带到苏格兰阿德罗森的一座公墓墓地前，对她们称，牺牲的梅维乐就埋葬在这里。

直到60年后，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斯蒂尔敲响她的家门，告诉了她事情的真相。伊泽贝尔说：“当我听到父亲死后所做的一切后，我被一种巨大的荣誉感笼罩着。”

伊泽贝尔说：“尽管二战时西班牙曾经为‘马丁少校’举行过葬礼，但德国人后来可能又挖走了他的尸体，进行第二次尸检。我和我的儿子非常渴望知道我父亲的尸体如今在哪里，我希望历史学家和德国官员们可以帮我解开这一秘密。”

在梅维乐死亡61年后，伊泽贝尔在驻地中海英国皇家海军的帮助下，正式为自己的父亲“马丁少校”举行了一场纪念仪式。据悉，这是英国军方第一次正式认可“马丁少校”正是已故二战英雄约翰·杰克·梅维乐。

2004年10月8日，梅维乐去世61周年的祭日，在驻塞浦路斯英国皇家海军的帮助之下，伊泽贝尔从家乡苏格兰专程前往驻塞浦路斯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为先父领奖。在英国皇家海军巡逻艇上，众人举行了一个简朴而又隆重的纪念仪式。巧合的是，这艘巡逻艇的

名字竟然与梅维乐当年阵亡时所在航母同名。驻塞浦路斯英军发言人丹尼斯·巴尼斯在纪念仪式上称：“毫无疑问，这是英国皇家海军对约翰·梅维乐，这位‘冒充者’的最高嘉奖。”

驻塞浦路斯英国海上空军中队的指挥官马克·希尔面对伊泽贝尔女士及众多到场来宾致辞道：“约翰·梅维乐以‘马丁少校’这个艺术化身，永久地保留在经典影片《冒充者》中。但是，今天大家齐聚这里是为了纪念约翰·梅维乐这位现实中的男子汉。”

虽然父亲的荣誉迟到了整整61年，可是作为女儿的伊泽贝尔女士依旧激动不已。她说：“如果我父亲真的拯救了3万名盟军士兵的生命，我将为此感到十分荣幸。”

第九章 瞒天过海，“霸王行动”大功告成

盟军为“霸王行动”而实施的“杰伊”计划是一个系统的欺诈工程，其中包括6项大的蒙骗计划和36项附属计划：几个子虚乌有的“集团军”煞有介事地忙忙碌碌；喜剧演员代替英军元帅蒙哥马利过了五个星期的“元帅瘾”，有意思的是，后者却差点儿被他的上司送上军事法庭。

“北方坚韧”的欺骗计划

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经过长期的交涉和争论之后，终于达成了对法西斯德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英美将于1944年5月在诺曼底登陆，苏军也将在东线同时发动攻势。这个作战方案，

就是著名的“霸王行动”。

为此，从1942年起，盟军就在紧张地进行着各种准备，除了筹备成立欧洲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统一组织指挥这次行动外，英美两国还动员了几乎本国内所有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一时间，伦敦城内将才云集，英伦三岛战云密布，盟军在倾其全力准备最后的生死一搏。

然而，这种准备并不足以保证盟军在“霸王行动”中取得胜利。因为早在1942年，德国就敏感地察觉到，英美有可能在欧洲联合行动，通过登陆来开辟第二战场。这年3月，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第40号元首指令，指出欧洲所有沿海地区都面临着盟军登陆的危险；1943年11月，希特勒又发布了第51号指令，进一步重申第40号指令的内容，强调登陆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并把丹麦至法国的沿岸列为主要防御地段。

更为重要的是，德军虽然已在苏联、意大利和北非遭到巨大损失，但它仍然十分强大。仅在西线，就有将近100万军队据守在“大西洋壁垒”后面，这堵墙是人类历史上仅次于中国长城的最庞大的一系列堡垒工事。倘若德国人判断出盟军登陆的确切地点，他们就

能以逸待劳，将登陆部队全部消灭在海滩上。即使“霸王行动”在诺曼底取得了立足点，希特勒也会迅速把兵力集中起来，使盟军难以向前推进半步。

因此，盟国阵营对“霸王行动”能否成功并没有多少把握。即将出任远征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这一次，紧张的情绪和气氛都是空前的。因为我们不是在冒一次战术行动失败的危险，而是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指出：“要摧毁那些用现代火力装备起来的由训练有素的将士防守着的钢铁工事，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小。只能用出奇制胜的办法。”也就是说，只有在进攻时间和地点上使希特勒措手不及，“霸王行动”才有可能取胜。可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当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员和装备在英格兰集结准备进攻时，怎么才能不被德军发现？仅凭安营扎寨的地点，就足以使希特勒推断出，诺曼底是他们的目的地。即便这一数量众多的人员和武器能够隐蔽起来，他们又怎能在离港登船时不被发现呢？因为有些进攻部队需要花费近两天时间才能渡过海峡。当德国

的飞机、雷达、哨兵和间谍都处在高度戒备状态时，要想使盟军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不被希特勒发现，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到了1943年冬季，双方都已经知道对西欧某个地方的进攻已是指日可待了，双方还知道这次进攻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德国人对进攻时间和地点的了解。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伦敦监督处受命制定一个“对敌人实施心理欺骗”的计划。此刻，在监督处处长约翰·比万上校私人助理布弗里小姐手中，就拿着这份计划的最后文本。计划长达7页，第一页的顶端画着5条绿杠，标明文件属于特别机密等级。绿杠上方印着一行醒目的话——“这份文件是英国政府的财产”。这是英国最重要的国家文件的标志。横杠下面写着“绝密”、“不许外传”等字样。它是伦敦监督处首领比万上校和温盖特中校的杰作，而丘吉尔首相则是其最早的策划人和热心的支持者。

1943年12月一个阴云密布的傍晚，伦敦威斯敏斯特。丘吉尔的临时指挥部内，专门负责隐蔽战线上特种心理作战的伦敦监督处的成员，正在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胆也

是最复杂的一项心理欺骗计划——“杰伊”计划。这一计划将被用来掩护1944年春天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海岸登陆的“霸王行动”。这一隐蔽战计划能否顺利实现，将会对大战的结局发生重大影响，甚至会改写历史。

按照伦敦监督处的设想，“杰伊”计划将从五个方面为“霸王行动”提供掩护，它们包括窃取情报、反间和保密、敌后特别行动、政治宣传和心理欺骗。其中心理欺骗是秘密武器的最后一招，也是一切行动中最为机密的一项。“杰伊”的目标就是通过这些手段使希特勒深信，盟军进攻的目标不是诺曼底，而是斯堪的纳维亚、巴尔干半岛、法国的加来海峡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在“杰伊”计划中，包括6个大的蒙骗计划，36个附属计划以及一些零散的相关计策。

其中，专门围绕诺曼底登陆的欺骗计划被命名为“坚韧”。它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用来牵制德军在斯堪的纳维亚的27个师，称为“北方坚韧”；另一个用来把德军最精锐的装甲部队第15军拴在加来地区，称为“南方坚韧”。

伦敦监督处召开会议，准备在把“杰伊”计划提交给华盛顿的盟军联合参谋部会议前，宣读和通过该计

划的最后草案。实际上，这个计划早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就已经得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首肯，同意将其作为同盟国心理欺骗行动的总方针。所以，这次极其重要的秘密会议很快结束。根据丘吉尔的提议，计划被重新命名为“卫士”计划。因为丘吉尔在几天前描述“杰伊”计划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在战争期间，真理是如此宝贵，因而必须用谎言去保卫它。”

根据“卫士”计划，这场心理欺骗战的范围将覆盖参战双方和每一个中立国家。它由伦敦监督处负责组织实施，在监督处认为需要时，英国情报局、美国战略情报局、英国特种行动局以及盟军中专门从事欺骗的单位的特工人员，甚至包括盟军的政府首脑和国家机构都将其服务。为了取得苏联的支持，比万于1944年1月29日专程飞往莫斯科，同苏军总参谋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和协调。3月3日，双方达成协议，“卫士”计划从此开始正式成为苏、美、英三国一致行动的纲领。

“卫士”计划成功的有利条件是很多。首先，英国已经掌握了德国的无线电密码，并且通过这一“超级

机密”，知道希特勒对盟国行动的预测方向在加来海峡；此外，德国派到英国的间谍几乎全部落网，不少人已向盟国投降，成了“双重间谍”。

英国有一个专门控制双重间谍活动的“双十委员会”，可以利用这些人来散布关于“卫士”计划和“坚韧”计划的假情报。由于在英国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德国几乎全部依赖无线电侦听和空中侦察或者依靠盟国方面“走漏”的点滴消息来搜寻“霸王行动”的秘密，盟国完全有可能让德国人得到一些有意编造的消息。尤为重要的是，德国的两大情报机构——谍报局和党卫军安全局正在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它们辨别实情的能力已经大为下降。因此，伦敦监督处对“卫士”计划的成功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他们也清楚，“卫士”计划也潜伏着致命的危险性。不管假情报多么富有说服力，也不管所使用的特殊手段何等高明，只要在整个欺骗链带上有一个小小的裂痕，真相便会暴露无遗。随着登陆准备工作的进展，要把希特勒的注意力从海峡地区引开变得越来越困难。伦敦监督处并没有绝对把握在所有的环节上都能智胜德国总参谋部。

然而，伦敦监督处和盟军的将士，却依然决心同希特勒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心理较量，他们义无反顾地拉开了欺骗大战的序幕。

“卫士”计划在北欧的组成部分是“北方坚韧”计划。它的主要目的在于诱使希特勒把他部署在丹麦、挪威和芬兰的27个师在登陆日之前一直滞留在这些国家，坐等英美苏军的联合进攻。

“北方坚韧”建议虚构出一次代号为“斯凯岛”的登陆行动方案，这一方案将确定以下内容：英国的第4集团军——一支拥有25万人的强大军队——正在苏格兰集结，它将配合美国第15军和一支并不存在的苏联部队，准备向挪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北方坚韧”计划的着眼点是希特勒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特殊迷恋和敏感。他一直视这一地区为德国生命线，截至1943年11月，驻在挪威的德国军事力量已经多达38万陆军、1个装甲师和一支庞大的空军。有一个时期，希特勒甚至把他的全部主力舰和大部分潜艇都部署在那里，“北方坚韧”计划正是基于这一情况来展开各种欺骗活动的。

1944年3月2日，前英国骑兵中校麦克劳德接到了最高司令部的一封加急电报，要他立即前往伦敦向国内驻防军通信主任理查德·巴克准将报到。在那里，麦克劳德被告知，他已被任命为即将神秘出世的虚幻部队——英国“第4集团军”的幕后指挥官。

巴克指示他说：“你要在爱丁堡组建一支并不存在的部队，而后利用无线电通讯使德国人相信这支部队的真实性，并作出向挪威登陆的姿态，把德国军队牢牢拴在挪威。”巴克强调，要让德国人觉得第4集团军的总司令似乎是英国前驻德武官安德鲁·索恩将军，这是一位每逢重大战役行动便会参与指挥的杰出指挥官。

麦克劳德接受任务后，于1944年3月6日来到了爱丁堡。他在爱丁堡城几栋古老的房子里建立了他的“第4集团军”司令部。司令部下共有22名军官，据说他们“都刚刚超过现役年龄”，另外还有334名应征报务员，这些为数甚少的男人和妇女开始编造一个集团军的弥天大谎。

两个年纪较大的少校和6个下级军官被派往斯特林建立起一个“军”，其他几个人则到敦提建立了另外一

个“军”。截至这个集团军“移防”到英格兰东南部准备“入侵”加来海峡为止，它已经有了2个军部、1个空降师、4个步兵师、1个装甲师、1个装甲旅——共有25万名官兵，35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并配备有自己的战术空军。

“第4集团军”的建制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就是模拟一个正在集结的集团军所发出的全部无线电报，以便让德国人来窃听。这绝不像拍发一些漫不经心的电报那样容易，因为这些电报必须逼真和具体，电报的性质和发报设备都要体现各个级别的特点而且要互相配合和印证。

麦克劳德精心地组织了这一活动。到1944年4月初，苏格兰的上空开始充满各种密码电报、明码电报和无线电电话的信号，“营”在跟“旅”讲话，“旅”在跟“师”讲话，“师”转接到“军”，“军”又转接到“集团军”。

这些详细的、有时乱作一团的电文，散布出了一系列与“斯凯岛”行动有关的信息。如“步兵第10集团军的史密斯上尉准备立即向艾维埃莫尔报告滑雪训练的情况”，“第2军汽车连索要发动机在低温、高原情况下

工作的使用手册”，“第7军要求立即派来早已同意派出的那些讲授登山法的教官”，“第80师急需补充1800双铁钉鞋和滑雪带”等等，这些电文看似支离破碎，但是只要将它们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就能得到一个临战前夕忙碌的集团军的全部行动信息。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德国人很快就测出了第4集团军的位置。不久，一架德国战斗机来到爱丁堡上空进行扫射，这是该“集团军”在整个大战期间所经历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战斗洗礼。电台和人员都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拍发电报的工作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

为了加深德军对“第4集团军”的印象，“双十委员会”还通过双重间谍“玛特”、“杰夫”及时向德国提供有关证据。这两个人都是1944年派到英国的德国间谍，但他们在英国一上岸就被逮捕，随后便为英国服务。他们所携带的密码和联络时间表都被用于同德方控制人员联系。

“玛特”提供的情报说：苏军已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来到爱丁堡协调进攻挪威的行动，而在斯特林显然有一个英国的第2军司令部存在。“杰夫”的报告则说，

据他发现，英国第7军现正驻在敦提。当德国人要他描述一下“第4集团军”的识别符号时，他明确地答复道：“它是方形的，一半为蓝色，另一半为红色，上面有一个金色的8字符号，但没有下面那个半圆圈。”

为了配合此项计划的顺利进行，报界和电台也对上述欺骗行动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渲染和夸张。有一天，当地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条关于“第4集团军足球比赛”的新闻，另一天，英国广播公司还广播了一篇第7军“随军一日”的报道。有的报纸还报道了“第2军管乐队”在爱丁堡演奏乐曲的消息和第4集团军一名少校结婚的新闻……一时间，这些子虚乌有的假新闻充斥着当地的报纸和电台节目，好像当地真的有一支队伍庞大的“第4集团军”一样。与此同时，还有数以百计的木制双引擎飞机出现在苏格兰机场上，一大批准备参加“霸王行动”的战舰也开到苏格兰沿海以助声威。

英国在挪威的间谍们也积极参与了这项欺骗活动。伦敦不断要求他们了解挪威哥伦山脉的积雪情况；劳马河上的桥梁能否通过中型坦克；德国山地部队有什么装备以及具备何种作战能力。与此同时，苏联也根据莫斯科协议开始履行他们在“北方坚韧”计划

中所承担的义务。他们向德国人披露说，苏联正准备于1944年6月发动一次北极战役以夺占挪威的佩萨莫。而德军也确实在挪威水域发现了一些苏联潜艇。

为了配合无线电通讯和报纸宣传，英国特种部队还于1944年春天对挪威的工业和军事设施发起了一系列“打了就跑”的袭击行动，这些袭击都带有登陆攻击前“预攻战术”的特点。德国的军舰、发电站、炼油厂、铁路纷纷被炸，无数零星的骚扰使德国驻军惶惶不可终日。

此外，伦敦监督处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特别措施，以便让德国人感到对挪威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比如英国的本土舰队在挪威沿海寻衅；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增加了他们在芬马克上空的照相侦察飞行；特种行动局拍发了大量电报，仿佛是向挪威抵抗力量下达指示；英国广播公司的丹麦语节目进行的隐语广播也骤然大量增加……一切都是那样煞有介事在制造一种大战在即的假象。

在各方面的周密配合下，“北方坚韧”计划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希特勒相信盟军很快会向挪威发动登陆进攻，他不仅让原来驻守挪威的部队留守该地，而且

还加强了那里的防务力量。到1944年夏季，德军仅在挪威一地就留守了13个陆军师，9万海军部队，6万空军部队，6000名党卫军和1.2万名准军事人员。这些部队中包括一个机械化装甲师，一个小型的然而却是威力强大的潜艇和鱼雷艇中队，一支空军部队——这一切，对于诺曼底战场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些德军部队一直在挪威等待着盟军的登陆，尤其是那个“第4集团军”发起的进攻。但他们最终却没有等到那一天。

“南方坚韧”的欺骗计划

就在“北方坚韧”计划全面展开的时候，“南方坚韧”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是一个更加大胆和宏伟的欺骗行动，它要虚构出一个拥有50个师、100万人的集团军！此时，正在英国南部集结的部队实际上只有两个集团军：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和布莱德利属下的第12集团军，他们将是担任诺曼底登陆的主力。伦敦监督处试图通过各种特殊手段引导德国人相信，还有第三个集团军——美国“第1集团军”——正在英格兰的东南部集结，准备从加来海峡发起进攻法国的战役。如果德国人确信了第1集团军的存在，那么他们就

会认为盟军的主攻地点是加来海峡，即使发现了诺曼底方向的登陆意向或行动，也可能将其视为佯攻而置之不理。所以，“南方坚韧”的主要任务是把德国的注意力引往加来海峡。

为了伪造美国第1集团军，艾森豪威尔决定启用乔治·巴顿将军这张秘密王牌。巴顿在二战中素以作战勇猛和作风粗野、举止狂妄而闻名。在北非“火炬”战役中，他曾指挥盟军于76小时内一举攻占了1000英里长的非洲海岸；在西西里岛，他以1.6万名盟军的代价，消灭了16.7万轴心国的部队（其中包括3.7万名德军）。但有一天，他的火暴脾气和急躁情绪突然发作，动手打了一名美国伤兵两个耳光，结果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此后，巴顿被调往克拉克将军那里听候调用。由于德国人深信巴顿肯定要在重大军事行动中担任指挥职务，所以他的动向便成为德国判断盟军攻击目标的一个重要依据。正因如此，艾森豪威尔才决定使用巴顿来实施“南方坚韧”计划。

1944年1月26日清晨，一架C-47军用运输机载着巴顿降落在英国谢尔顿的美军基地。随后，艾森豪威尔在伦敦接见了巴顿。巴顿希望能够指挥美国第3军，

艾森豪威尔答应了这一要求，但同时提出，第3军到达欧洲之前，巴顿必须为另一支部队服务，这支部队就是所谓的美国“第1集团军”，它是“南方坚韧”计划的核心力量。艾森豪威尔任命巴顿担任这个集团军的司令官。

根据“南方坚韧”计划，美国第1集团军将包括加拿大第1军、美国第3军和另外50个师的兵力。其中的一部分部队是实际存在的，但并不归巴顿指挥，任务也不是在加来海峡登陆，而另外一大部分纯属虚构。整个第1集团军的任务就是作出从加来海峡发起主攻的姿态，诱使希特勒把精锐部队放在加来地区。巴顿作为盟军的一名“常胜先锋”，恰恰有条件完成这一使命。



巴顿将军

巴顿开始以第1集团军统帅的身份出现在英国。他经常到 Grosvenor 广场去拜访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利，还受到了布鲁克的接见，并被授予高级爵位；有时他还乘专列前往苏格兰，会见第3军的前卫部队；当载着几千名美国士兵的“玛丽女王”号驶进港口时，巴

顿则堂而皇之地在一群欢呼的将士前大步走过；他还视察了德军战俘营，同英国绅士和贵族亲切交谈……

总之，除了向英国报界正式宣布美军已经来到英国之外，巴顿的活动基本没有或者很少进行保密。与此同时，“双十委员会”下属的双重间谍也纷纷向他们的控制人员报告巴顿的最新行踪。1944年3月20日，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在一项通报中写道：“现已查明，曾在北非以其胆略和效率而闻名的巴顿将军，目前正在英格兰担任某种高级军事职务。”同一天，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也含糊其辞地宣布，巴顿已经放弃了他在第7军的指挥职务，另有重要任用。

就在巴顿四处活动的同时，这支伪造的“第1集团军”也在拼命效仿那个虚假的英国“第4集团军”，通过无线电信号向德国人证实自己的存在。这些信号有的模拟一个军司令部或一个师司令部的存在，有的则冒充一个装甲团或工兵营。一时间，在英格兰的上空，到处充满了由各个部队发射的零星分散的无线电信号，德军监听人员曾将监听到的对话汇集成一本8英寸厚的册子，其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女王第1皇家团报告，在辎重列车内发现数名未经特许的民妇，我

们是否可以把她们带到加来？”

为了掩护蒙哥马利的真正进攻部队，通信技术人员专程从其真正的司令部所在地普茨茅斯到多佛尔城堡敷设了通信专线，使其来往电讯均从多佛尔发出。而且，为了防止德军用无线电定向手段寻找盟军的真实集结地点，盟军空军还向德国前线的无线电设施连续发起了一系列猛烈的空袭，并将瑟堡附近的德军通信情报司令部夷为平地。

除了用看不见的电波欺骗德国的无线电侦听机构之外，伦敦监督处还玩弄了一些高精尖的直观把戏，用以欺骗德国的空中侦察机。从5月起，德国的飞行员突然发现在不少地方出现了一些兵营、医院、油料库和野炊厨房，他们还观察到许多大炮、飞机和坦克停放在野地里。但他们并不知道，所有这些装备都是假的，都是用帆布、胶合板和充气橡胶制成的“模型”。德军飞行员还侦察到，在多佛尔港和泰晤士河口，有大约400艘登陆舰正在集结。而实际上，这些“登陆舰”不过是伦敦一家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道具，从外表上看去，每艘“登陆舰”的烟囱都冒着烟，四周水面上油迹斑斑，缆索上晾晒着衣物，摩托舰在各舰之间开来

开去，在水面上留下了道道航迹。从飞机上甚至还能看到这些舰艇上的水手，这些水手实际上都是英国部队中的老弱残兵。到了夜晚，有意安排的灯光又勾画出这些虚构的车场和港口设施的轮廓。为了暗示还有相当数量的装备藏在树林里，到处都有通向树林的车轮和履带的模拟痕迹。



“霸王行动”成功上演

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盟军还制造了另一个假象，那就是在多佛尔港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假输油码头，以便让德国人感到，这里是为进攻部队提供汽油的输油管道的终点。伦敦监督处请来了英国当时最优

秀的建筑师、皇家科学院建筑学教授巴西尔·斯宾思，由他负责设计和制造这座史无前例的“杰作”。在舞台设计师们的协助下，斯宾思用脚手架、纤维板和旧下水管道搭起了大约3平方英里的码头工区，输油管线、储油罐、发电站、消防队、车场、栈桥，凡是真正石油码头应该配备的设施全部应有尽有。鼓风机扬起冲天的尘土，好像码头建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而实际上整个工地只有区区数十人在工作。

英国国王和蒙哥马利都亲自“视察”过码头，艾森豪威尔则在一次晚宴上向“码头建筑工人”“致以谢意”；多佛尔市的市长甚至公开发表谈话，对“本市目前正在建设的新项目”表示满意，认为尽管该设施的“确切用途要等到战争结束后才能公之于众，但它必将给本市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为了迷惑德国空军的侦察机，英国的战斗机不断地在码头上空盘旋，好像是在保卫这一设施。工兵则用燃烧原油的方法，使码头上空烟雾弥漫。只有当一切都安排好之后，才会故意将一些德国的侦察机放入该区，而且只让它们待在3万米以上的高空，使摄像机无法分辨出码头设施中的破绽。每当海峡对岸的德军

远程炮群对码头进行袭击时，一些工人便四处点火，造成被“击中”和“起火”的假象。

一些经过精心策划的消息也陆续通过报刊“泄漏”出来。当地报纸“读者来信”专栏围绕最近涌入这一地区的“大量外国军队”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愤怒的牧师纷纷写信，“严厉谴责”自从“美国大兵和波兰坦克车手”进驻该地区以来，已使当地发生前所未有的“道德崩溃”。他们举例说，在马汉姆的美军伞兵基地周围，曾经发现了“大量的避孕套”。有的报纸则偶尔刊登一些订婚消息，如“少尉，弗吉尼亚人，系驻英第9空降师现役军人，现与英格兰诺里奇市的P小姐订婚”等等。在电台的“情人娱乐”节目中，也时常播放美军官兵家属为其亲人点播的歌曲，这一切都将使仔细搜集情报的德军情报部门产生心理错觉。

尽管采取了上述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措施，伦敦监督处仍然认为，在德军情报专家的眼里，最可信赖的还是那些已经潜入英国境内的间谍。于是，向德国人证实美军“第1集团军”真实性的任务，落到了一些经过“双十委员会”精心挑选的双重间谍身上。虽然在使用这些间谍时需要格外谨慎，因为只要有一点失误，

便会给整个“卫士”计划带来后患无穷的损害，但伦敦监督处还是决定起用4名双重间谍，作为演奏这一欺骗乐曲的“第一提琴手”。他们分别是达斯克·波波夫、波尔、“珍宝”和“嘉宝”演主角，其他的双重间谍则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协助和配合。

在这些间谍中最了不起的是达斯科·波波夫，1944年2月他到里斯本向其德国操纵人递交了一份美国“第1集团军”的战斗命令，从而在德国情报机构建立起了“第1集团军”的基本印象。另一名则是以“布鲁斯特”而闻名的波尔。他告诉他的德国老板，他已经被分配到了巴顿的司令部充当波兰最高统帅部和美国“第1集团军”之间的联络官。每天午夜时分，布鲁斯特便拍发出一份详细描述“第1集团军”战备情况的电报，使德国人好像从内部看到了“第1集团军”的全部动态。而“珍宝”——一个俄国血统的法国女人，“嘉宝”——一个西班牙人，则分别以各自的身份不断向德国人报告有关“第1集团军”的信息。

此外，还有不少双重间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一名代号为“塔特”的间谍就向德军情报局提供了一份8月间调运“第1集团军”到进攻出发港口的铁路时间安排

表；另一位化名“布朗克斯”的阿根廷妇女，用德国人给她的密码表，巧妙地把一些假情报隐含在日常电报中。1944年5月15日，她发电报向里斯本圣灵银行提取50英镑用于支付牙医费用。根据密码表，钱数在这里代表进攻地点，这份电报的意思是：盟军的进攻点将是波尔多地区，而德国第11装甲师恰好驻扎在那里。于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将那个师按兵不动。

伦敦监督处的官员最后还找到了另外一个空前绝妙的欺骗途径，那就是利用被俘的德军高级军官，让他以耳闻目睹的形式直接向德军参谋总部面陈美国“第1集团军”及其进攻意向的情况。在监督处官员的不懈努力下，终于物色到这样一位人物——德国前非洲军团司令汉斯·克莱默将军。克莱默于1943年5月在突尼斯被盟军俘获，后来转送到了英国。由于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盟军决定应瑞士红十字会的要求将其遣返回国。

1944年5月，克莱默乘车从威尔士战俘营解往伦敦审讯中心。在途中，盟军有意安排他经过“霸王行动”的集结地，并让他看到大量的飞机、舰队和装甲部队。巴顿还以“美国第1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请他吃

饭，许多师级指挥官同他会见，异口同声地强调要在加来登陆。但有一点克莱默是不知道的，那就是他所在的具体地点。虽然他到的是英格兰西南部，但别人告诉他是英格兰的东南部。他并没有办法去分清这一切，因为自二战以来，英国所有的路标都已被去掉。

克莱默返回德国后，他向上司及同事详细通报了他在英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发生这些见闻的地点。这可以从戈林在战后所说的一段话中看出来。戈林说：“我们的一位高级将领曾经被英国俘获，后来通过战俘交换回到德国，在他被释放之前，英国人曾极力给他洗脑，让他观看了堆存在英格兰东南部的大量物资和装备。他回来之后，还感到这些情景历历在目，并且带有一种失败主义情绪。”而这恰恰是伦敦监督处的目的所在。

事实证明，利用克莱默来证实美国“第1集团军”的策略是十分聪明和重要的，因为会有谁会怀疑一位荣获过铁十字奖章的德国装甲兵上将、一位对希特勒绝对忠实的人物呢？

按照“卫士”计划的总体设计，盟军还在地中海区域实施了代号为“齐柏林”的欺骗行动。这一行动旨在

送出以下信息：即应斯大林要求，盟军同意推迟对欧洲的进攻，转而首先进攻巴尔干半岛，以迫使希特勒的盟友退出战争。信息表明，盟军将同时从几个方向发起登陆作战——英军从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美军从南斯拉夫北部的伊斯特拉半岛；波兰军队则从阿尔巴尼亚。之后，它们将沿黑海向罗马尼亚展开两栖进攻，并收复土耳其。

在“齐柏林”行动中，大部分欺骗任务是由英国第12军——一支像英国的第4集团军和美国的第1集团军一样虚构的部队来完成的，其主要手段同“北方坚韧”和“南方坚韧”行动基本相似：设在利比亚托普鲁克的海军无线电台模拟各种通讯信号；盟军空军大量增加了对巴尔干国家和爱琴海航线的袭击；伪造的登陆艇也不断出现在地中海南部和直布罗陀海峡。伦敦监督处甚至雇佣了以嘴快闻名的中东印刷工来为进攻部队印制介绍预定攻击区域情况的小册子。

为了欺骗行动显得活灵活现，伦敦监督处还替虚构的登陆选定了准确的日期，随后又以各种借口推迟了三次。其中，有一次是苏军要求稍晚一个月，以便他们能够及时赶到巴尔干参战。

德军似乎并未想过，“北方坚韧”、“南方坚韧”和“齐柏林”计划所宣传的对斯堪的纳维亚、加来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进攻是根本不可能同时进行的。他们已被盟军虚张声势的逼真表演所迷惑，因而也像相信“坚韧”计划一样相信了“齐柏林”计划。希特勒和他的情报人员一致认为：巴尔干半岛正面临着严重的威胁，所以从1944年2月起，他便再没有向诺曼底方向增派一兵一卒，相反，4个德国精锐师，其中包括3个装备精良的装甲师，则从法国转移到了东欧，以准备迎战英美法军的“联合进攻”。

至此为止，“卫士计划”已经顺利实现了其掩护“霸王行动”的主要战略目标。在诺曼底登陆日前夕，从各个渠道传来的信息都证明“卫士计划”取得巨大成功。5月23日，美军在瓦尔蒙顿缴获了一台德军藏在密林中的车辆，车内发现了一份德军5月份的作战纲要。这份纲要详细介绍了这个月内德军的兵力部署情况。

从兵力分布上可以看出，希特勒已经根据“卫士计划”所提供的情报分散部署了他的作战兵力。5月30日，盟军又通过“超级机密”破译了一份希特勒和其日本盟友大岛浩男爵的谈话要点。在谈话中，希特勒表

示相信“坚韧”行动和“齐柏林”行动的说法，认为盟军在地中海至少配备了80至90个师的兵力，甚至可能还有七八个空降师。他还认为，尽管盟军的登陆地点可能会选在诺曼底，但其进攻的矛头最终是要指向加来区域。因此，他把西线最强大的4个装甲师抽出来作为自己亲自控制的预备队，以便能随时增援加来方向。仅此一举，就大大削弱了德军在诺曼底地区的抗登陆能力，为“霸王行动”的成功增添了一枚重重的砝码。

就在德军统帅部及其情报机构费尽心思去追踪那些无中生有的军队之时，盟军却已在英国秘密集结了一支约200万人的真正进攻力量。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居然是在德国侦察机和间谍网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实在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当600艘战舰、5000只运输船、1万架飞机和300万吨军需物资云集在攻击出发地时，希特勒再想改变这一切都已为时过晚了。

他当了5个星期的蒙哥马利元帅

尽管有了“北方坚韧”、“南方坚韧”和“齐柏林”这样的欺骗行动，英国情报部门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于是

在诺曼底登陆行动前夕，又精心设计了一次罕见的富有戏剧性的欺骗行动，即“铜头行动”。这一行动在战后曾被加上了诸多浪漫色彩，并以“蒙哥马利的幽灵”的传奇故事而广为流传。在整个“卫士计划”中它虽然是一个有趣的插曲，但却是关键的一招棋。正是“铜头行动”最后彻底欺骗了德国人，让他们知道了“蒙哥马利”的行踪。

1944年3月14日，英国特种战委员会的副主任杰维斯·里德中校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张剧照，上面是一名酷似蒙哥马利的陆军中尉，他名叫梅里克·克利夫顿·詹姆斯，生于1889年，曾是一位不出名的澳大利亚演员，当时正在皇家军乐团服役。他曾在伦敦喜剧院照了一张头戴贝雷帽的剧照，结果被刊登在伦敦的《新闻时报》上，编者在这张酷似蒙哥马利的剧照旁边特地附加了一个说明：“你不要弄错了，他不是蒙哥马利——他的名字叫詹姆斯！”

看到这张照片后，里德中校灵机一动，脑子里冒出一个几乎荒诞的点子：为什么不让詹姆斯扮装成蒙哥马利，诱使德国人加深其错误判断呢？他马上找到了艾森豪威尔，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艾森豪威尔

对这一设想大为欣赏，于是这个以无名小卒扮演大军主帅的欺骗计划，被命名为“铜头行动”，成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欺骗行动。



蒙哥马利

1944年1月，在北非指挥盟军击败了纳粹德军的蒙

哥马利回到英国，受命指挥即将展开的盟军反攻欧洲大陆行动。英国情报机构高层立即意识到，也许从现在开始，德国特工将监视蒙哥马利的一举一动。伦敦监督处的官员认为，如果在诺曼底登陆前一两天，让蒙哥马利出现在地中海的某地，德国人肯定会认为，盟军不会在一周内发动登陆战，这样，法国诺曼底地区的德军就可能放松戒备。

为混淆视听，分散德军的注意力，英国军情五处就着手实施这一代号为“铜头行动”的战略欺骗计划。

军情五处找到了詹姆斯，让他冒充英国陆军元帅、西北欧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在伦敦监督处的导演下前往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进行一次“巡视”。詹姆斯答应了。

詹姆斯外表酷似蒙哥马利，也有瘦削的脸庞和灰白色的胡子。为了让他达到可以以假乱真的程度，他必须学会蒙哥马利独特的语气和神态。军情五处专门安排了蒙哥马利的贴身助手训练詹姆斯，要他熟悉蒙哥马利元帅的一切生活习惯、言谈举止，连吃饭时麦片粥中要不要放牛奶和糖的细节也不放过。甚至安排詹姆斯中尉与蒙哥马利元帅生活在一起，进一步模仿

和体会，直到人们无法辨别真伪为止。

出身于演员的詹姆斯中尉果然不负众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个任务，让自己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同蒙哥马利元帅一模一样。不过只有一点例外，那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詹姆斯失去了右手的中指，而真正的蒙哥马利元帅则以其标准的军礼闻名。所以后来在很多的场合下，这位“蒙哥马利”元帅一般都是戴着白手套。

一切准备就绪以后，1944年5月25日傍晚，詹姆斯装扮的蒙哥马利元帅在众多高级将领的簇拥与欢送声中，搭乘首相专机飞往直布罗陀进行巡视，然后飞往阿尔及尔。这次“巡视”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德军统帅部认为，英国登陆部队的司令官非蒙哥马利莫属，如果蒙哥马利不在英国，盟军就不会发起登陆作战；二是根据德军情报机构对蒙哥马利行踪的暗中监视，“蒙哥马利”巡视可以促使其判断蒙哥马利目前正在非洲对部队进行遥控指挥，从而可以牵制驻扎在卢瓦尔河以南的4个装甲师。

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军方侦察到当地一名西班牙联络官莫利纳是一名德国纳粹间谍，

打算将其骗到英国受审。军情五处认为，如果让莫利纳亲眼看到蒙哥马利在直布罗陀出现，这条情报就会很快被送到柏林。

在飞行的途中曾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为了让詹姆斯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随行人员给他服用了安眠药。可是，夜间的寒冷使詹姆斯无法入睡，他悄悄起身进入厕所，将偷偷带在身上的一瓶杜松子酒拿了出来。此前，里德早已向他声明，为保证此次任务成功，他必须戒酒。但此时酒瘾发作，他将半瓶酒喝了下去。当随行人员找到他时，他已摇摇晃晃，站立不稳。

飞机再有两个多小时就要到达目的地，詹姆斯却完全处于昏睡状态。随行人员十分着急：如果下飞机时人们发现詹姆斯有饮酒迹象，计划就会彻底泡汤。因为在此之前，里德也发现了两人的不同：蒙哥马利憎恨烟酒，所以一向滴酒不沾，而詹姆斯则嗜酒如命。如果一个一身酒气的蒙哥马利走下飞机，那就会把事情搞砸了。于是随行人员被迫采取紧急措施：将詹姆斯的衣服脱光，放在机舱通气孔前冰冷的气流中，让他清醒。还对他进行按摩和拍打，使他呕吐，

同时重新给他刮脸，以便消除脸上的喝酒迹象。经过一番忙碌，詹姆斯终于清醒过来。

1944年5月26日凌晨，飞机抵达直布罗陀，由詹姆斯假冒的“蒙哥马利”在人们的欢迎中走下飞机。随后，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将他送到总督官邸，总督伊斯特伍德亲自出迎，并于当晚举行了欢迎宴会。

直布罗陀海湾对面西班牙的阿尔赫西拉斯是德国谍报局的前哨基地，“蒙哥马利”的到来自然逃不过德国间谍的眼睛，于是，有关“蒙哥马利”的消息迅速传回了德国。“碰巧”在同一天，莫利纳也被邀请到总督官邸和总督秘书议事。他被特意单独留在一个能清楚看清前院的房间里。当蒙哥马利标志性的黑色贝雷帽出现时，直布罗陀总督立刻迎上前去，配合道：“你好，蒙特，很高兴见到你。”

“Rusty（伊斯特伍德的别称），你好吗？”随后两人一同走进官邸，共进早餐。几个小时后，当总督在院子里送别“蒙哥马利”时，总督秘书又“碰巧”带着莫利纳走过院子。“蒙哥马利”离去后，莫利纳赶忙向总督秘书打听有关他来访的详情，不胜其扰的秘书只得“无奈”透露：蒙哥马利正要赶往阿尔及尔。

得知这一情报后，莫利纳如获至宝，立即驱车离开。他一回到家里，就拨打了一个紧急电话，将这些信息紧急汇报给了柏林德军统帅部。

由于詹姆斯惟妙惟肖的模仿动作，几乎让所有人都信以为真，相信蒙哥马利到了直布罗陀，并且很快就要飞往阿尔及尔。5月27日，“蒙哥马利”乘飞机到达阿尔及利亚。地中海盟军最高统帅亨利·威尔逊和英美法参谋人员到机场欢迎。随后，“蒙哥马利”入住圣乔治饭店。顷刻间，“蒙哥马利”到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阿尔及利亚。在随后几天中，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挂着三角旗的参谋部车辆，在摩托警卫的护卫下，载着“蒙哥马利”风驰电掣地去参加一个又一个会见，德国间谍也不停地把这些消息一个又一个地报回德国。

至此，“铜头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盟军的诺曼底登陆计划得以顺利展开，让希特勒再一次上了英国人的当。

1944年6月6日凌晨，百万盟军突然出现在诺曼底海峡，随后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法国海岸，经过两年多周密准备的诺曼底登陆战役正式打响了。半个小时后，英、美、加三国远征军分别从五个滩头（从东到

西的代号为：剑滩、朱诺滩、金滩、奥马哈和犹他滩）登陆成功。犹他滩的美军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在三个小时内就肃清了海岸地区的德军；在奥马哈滩头，美军经过一天苦战，也占领了一条纵深约两英里的阵地。到黄昏时分，其他滩头的英国和加拿大军队都有了稳固的立足点。诺曼底登陆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初步胜利。



诺曼底登陆

7月25日，盟军全面发起战役总攻。8月1日，巴顿又率美军第3军投入战斗，与蒙哥马利形成铁钳夹击之势。盟军长驱直入，势不可挡，溃不成军的德军向塞

纳河方向仓皇逃窜。

8月15日，盟军以50万兵力在法国南部发起“铁砧”行动，四面受敌的德军全线崩溃。18日，盟军渡过塞纳河向巴黎挺进。28日，巴黎获得解放。至此，诺曼底登陆作战和与之配套的“卫士”行动宣告胜利结束。

有趣的是，詹姆斯从阿尔及利亚回来之后，遭到了周围人的怀疑，因为他有五个星期没有上班，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的上司、同事以及家人都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他的重新出现立刻引起了同事们的议论。有人说，他因嗜酒成性，伤及身体，住进了医院；有人说，他外出行骗去了；还有人说，他有间谍嫌疑，被关进了监狱。他的上司则愤怒地指责他擅离职守，声称要将他送上军事法庭。



在诺曼底登陆战役抢滩成功后,美国当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马歇尔曾秘密到达诺曼底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詹姆斯始终缄口不语。直到二战结束后，随着军情五处公布了“铜头行动”的细节，詹姆斯才向外界公开了他当年“失踪”的秘密。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原来过了5个星期的“元帅瘾”——不过此时，人们已经不再把詹姆斯中尉当成蒙哥马利元帅了。

第十章 扑朔迷离，一代特工演绎“007”

“双重间谍”达斯科·波波夫被西方谍报界誉为“谍报天才”，又因他经常喜欢与两个女人同时上床而被称为“三轮车”和“风流间谍”，但是他巨大的魅力却让英国秘密情报局长孟席斯也曾对他赞叹不已，说他“太诡计多端”。他潜伏于纳粹“狼穴”，却为盟军的胜利甘冒种种危险并取得巨大成就。他的谍报生涯堪与詹姆斯·邦德相媲美，一直被认为是“007”的原型。他留给世人的名言是“要使自己在风险丛生中幸存下来，最好还是不要对生活太认真了”。

“花花公子”又交上了“桃花运”

二战期间，英国秘密情报局经常利用“双重间谍”为自己服务，其中最成功、也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例子应该是“007”的原型达斯科·波波夫。

波波夫1912年出生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一个富商的家庭。他从小养尊处优，锦衣玉食，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波波夫是个语言天才，能说流利的意大利语、法语、英语和德语。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名律师，一直混迹于社交场合，见多识广，认识了西欧国家许多知名人士。

1940年，年仅28岁的波波夫已是当地一个名声不错的律师。然而就在这年2月的一天，正在南斯拉夫家中度假的波波夫忽然接到柏林来的一份电报，上面写道：“急需见你，建议2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大饭店见面。你的挚友约翰尼。”波波夫看见电报后便火速赶往约定的地点。

原来，这个约翰尼就是约翰尼·杰伯逊（又译“强尼·杰布森”），1936年波波夫在德国南方布雷斯高的弗赖堡大学与之相识。因为性情相投，他们把对方看做是自己最亲密的生死挚友。因此波波夫收到电报，为友谊所驱使，急匆匆地踏上了去贝尔格莱德的旅途。

波波夫在塞尔维亚大饭店见到了好友约翰尼。约翰尼看上去忧心忡忡，对波波夫发牢骚说：“希特勒正在把德国人培养成傻子。在那些比狼犬还敏感的间谍的帮助下，他可能会吞并全世界。”过了一会儿，他又盯着波波夫真诚地说道：“伙计，现在我急需你的帮助，需要立即行动。现在德国有5条船封锁在特里斯特，其中有一条是我私人的，想把它卖给某个中立国家，我已经设法搞到了许可证。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哪个中立国愿意购买这些船呢？”波波夫反问道，“如果英法拒绝承认许可证，那么他们将先下手抢走这些船只。”

“对了，这就是我叫你来的原因。你必须利用你有利的社会关系，去办成这笔生意，而且绝对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

一听此言，波波夫一下子就明白了约翰尼的用意。波波夫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好友的请求，并且觉得此举深合自己的心意。因为他正想借助自己国家的特殊地位（当时南斯拉夫还是与德国亲善的中立国）为反法西斯事业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与约翰尼取得一致意见后，波波夫就直接找到了

英国驻巴尔干国家的商务参赞斯德雷克，并对他全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准备假借某个中立国之名，将5艘商船卖给英国。几天以后，伦敦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且汇来了购船的钱。两周后，接到通知的约翰尼从柏林带来必要的文件，将德国货船易手他人。



“谍报天才”波波夫

事后，两人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只不过两人庆祝的目的不同——波波夫是为自己对英国有所帮助而高兴，约翰尼则是由于赚了一笔大钱浑身舒畅。酒过三巡，约翰尼对波波夫说道：“老朋友，不瞒你说，我已经是德国军事情报局‘阿勃韦尔’的人，上次请你帮助也是上头示意我这么做的。他对你的行动非常

满意，希望能跟你好好谈谈。”

波波夫一听，心里紧张得怦怦乱跳：“你们的头儿是谁？他为什么选中我？”

“我们总头目叫威廉·卡纳里斯，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与我们俩很相近。我在他面前极力推荐你，说你是个谍报天才，能派上大用场，于是老头便让我试一试。结果没想到你干得这么漂亮！我想，你一定对我的建议感兴趣吧？”

“我……我不知道要干些什么？”

“哦，一开始并不需要有什么惊人之举。只要搞一些有关英法方面的小道消息就可以了。像你这样经常混迹于外交界和政界的人很容易搞到这样的东西。”

“好吧，约翰尼，看在你的分上，我就帮你这个忙。”

“你现在就着手搜集情报。至于什么时候同头头见面，我会通知你的。”

于是，波波夫又去找了英国商务参赞，把有关情况向他一一说明。这位矜持的英国佬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继续与那个家伙保持联系也许是件好事。你需要的情报我会派人送给你的。”

过了半个月左右，约翰尼领来一位德国使馆官员，对波波夫介绍道：“这是门津格少校，我的顶头上司。他想跟你聊聊。”

那位门津格少校也不隐瞒，开门见山地对波波夫说：“我们在英国有许多情报人员，其中不少是很精明能干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像你一样能通行无阻的人，你的社交关系可以打开许多门路。有些情报不是在马路上就可以搞到的，但是你可以帮我们的忙。同样，我们也会十分慷慨地报答你。”

波波夫按照英国方面的授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并在第二天大清早跑到英国大使馆通报这个消息。这次与他接触的是英国秘密情报局驻巴尔干的头目，化名为“史巴雷迪斯”。听了波波夫的报告后，这位情报官员说道：“你就准备为那些德国人‘效劳’吧。要设法与他们搞好关系，要求他们给你开展工作和做好旅行准备的时间。我的意思是，他们有可能派你到伦敦或某个中立国家去。另外我还要告诉你，让他们知道你在伦敦有一个朋友，是位懂行的外交官，他目前急需用钱，而且你认为他可以帮你的忙，通过外交邮袋来传递情报。”

波波夫很快就放风给门津格，约他见面详谈。一见面，波波夫就告诉门津格说自己在伦敦有一个朋友，而且是一个外交官。门津格一听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你那个当外交官的朋友是谁呀？”

“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此人绝对可靠。”

“那太好了！”门津格一边说着话，一边扳开公文包的锁扣，伸手取出一个金属小瓶，说：“瞧！你把这个东西给你的朋友，这是密写剂。”接着，门津格又吩咐约翰尼负责向波波夫说明如何使用密码、如何接头联系等具体事项，还给了他一个代号“伊万”。门津格对波波夫说：“为了保密和联系方便，你今后就用这个名字吧！”

这次见面结束后，波波夫便正式作为一名德国间谍人员展开了自己的“业务”。

波波夫偷偷与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取得联系，把这一切向那个叫“史巴雷迪斯”的英国特工汇报了，并且发展了自己的“下线”，组织了一个为英国服务的情报网络。

几星期后，按照约定地点，史巴雷迪斯向波波夫下达了一项重要任务，要他搜集德国人有关“海狮行

动”的所有情报。这时波波夫才想起门津格曾经对自己说过，他即将被派往英国去搜集有关英国的城市地貌、人口分布、政府机构、军事设施等情报。现在他才明白，原来是要他为希特勒即将实施的“海狮行动”提供轰炸目标。

波波夫接受了史巴雷迪斯给自己的任务，并且向他介绍了两名新近吸收的情报员。波波夫最近发展的两名情报员有一个是他的哥哥伊沃，另一个是大学同窗尼古拉斯·鲁卡斯。英国秘密情报局在南斯拉夫的情报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半个月后，波波夫接到门津格的一个电话，要他到罗马维亚芬尼多街的巴黎咖啡馆去和一个人接头。他来到了巴黎咖啡馆，一边呷着咖啡，一边等待着与他接头的人。按照事先商量好的接头暗号，他把一份南斯拉夫的《政治报》打开，把一包“摩拉乏”牌香烟和一盒南斯拉夫火柴放在桌上。不一会儿，一个教授打扮的人走到波波夫跟前同他搭讪。

“你是第一次来罗马吗？”

“不，我从来来过几次。”

“噢，不过有些地方还值得再去逛逛，我可以当你

的导游。”

“不，谢谢……好吧，那我就去参观一下梵蒂冈。”

“我是研究梵蒂冈的专家。今天上午天气很好，我们时间还很充裕，要不要我去雇辆马车呢？”

“好主意。”

男子的回答和事先规定的暗语完全一样。暗语对上后，两人雇了辆马车向国家公园驶去。到了西斯廷教堂，这个男子突然从衣服里抽出一打裸体女人照片，并开始向他推销这些女人。波波夫哈哈大笑起来，原来这个来接头的人只是个皮条客。因为巧合，仅仅因为巧合，波波夫和他的对话与暗语吻合了。他告别了那个皮条客，匆忙地赶到了巴黎咖啡馆。波波夫约的“导游”——那个真正的接头人在咖啡馆里已经苦苦等了四个小时。

更让波波夫没有想到的是，那位前来同他接头的“导游”原来是自己的朋友约翰尼。约翰尼这次给波波夫带来了上峰的指示，他对波波夫说道：“海狮行动计划暂时搁浅了。空军总司令戈林元帅要亲自指挥战鹰狂轰伦敦和英国的港口，因此上级派你到里斯本去

收集有关情报，希望你能马到成功！”

波波夫一听觉得有点奇怪，就问到了里斯本找谁接头。

约翰尼说：“你在那里的领导人是卢道维柯·卡斯索夫少校，真名叫欧罗德，是阿勃韦尔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头目。你可以用公用电话和他取得联系，就说找卡尔·施米特接电话。然后会有人告诉你说，他很高兴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见到你，并且告诉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不过你要提前一小时到指定的地点去，那里会有一个女人从你身旁走过，向你使眼色，然后你就跟她走好了。”

按照约翰尼告诉的接头办法，波波夫到了里斯本后，很快就找到自己的新上司——卢道维柯·卡斯索夫。这个卡斯索夫办事果断、干练，见面后他命令波波夫住在一家德国人控制的阿维士饭店。同时又指派阿勃韦尔三处驻里斯本的头目克拉默上尉对波波夫进行严格的审查。证明一切都正常后，马上开始亲自教波波夫使密码、投寄信件，还给了他一架莱卡照相机和一本使用说明书。

波波夫住进饭店不久，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他每次到餐厅用餐时，都发现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一次又一次地向他暗送秋波、频递媚眼。波波夫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心想自己是不是又交上了“桃花运”。但是想到自己初来乍到，还是没敢马上轻举妄动。

有天晚上，波波夫碰巧在电梯里又遇到了那位姑娘。当时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那姑娘火辣辣的眼睛里冒出的全是色情之火，就差没有扑到他的身上了。但是由于是第一次正式见面，波波夫也不知对方的底细，因此就没有进行过过多的交谈，只是礼节性地打了个招呼，就分手了。

波波夫回到自己的房间就到洗澡间洗澡去了。但是当波波夫几乎是赤条条地走出时，突然发现那位在电梯里见到的姑娘已经躺在自己的床上。她穿着一件几乎是透明的丝质睡衣，青春的胴体几乎暴露无遗。

一见波波夫进来了，这位姑娘竟然大大方方地倒了一杯威士忌，对他说道：“来吧，有趣的男人，跟我喝一杯。”说着便凑过来在波波夫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假装没有发现自己的乳房已经重重地碰在波波夫光洁有力的胳膊上。

两个人礼貌地碰了一下杯子后，那位姑娘又说：“能陪我干了这一杯吗？”

波波夫不动声色地干了，等待着对方的反应。

“我对你的身世很感兴趣，能谈谈你的故事吗？”那位姑娘一边说，一边又给他倒了一杯酒，向他淡淡一笑。

姑娘假装羞答答的样子使波波夫起了疑心。他一边漫不经心地喝着酒，一边顺着这个女人的意思讲了一大堆自己所谓的经历，那些信手拈来的童年趣事竟然几次把那个姑娘逗得捧腹大笑。

看来那个姑娘对波波夫编造的故事十分满意，不知不觉地现出了本来面目。原来这个姑娘也是一个德国间谍，这次就是奉卢道维柯·卡斯索夫少校之命来对波波夫进行考察的，看看他是否具备一个真正间谍的素质。没有想到这个小伙子竟然“英雄能过美人关”——对波波夫的考察让她感到十分满意。

后来，波波夫竟然把那只还没有喝完的威士忌酒瓶递了过去，对那个姑娘说：“对不起，我想睡了。如果你睡不着的话，你就把它带回去吧。你已经在情场上搞到了你所需要的故事。”

第二天，波波夫向他的新上司卡斯索夫进行了日常汇报，卡斯索夫严肃地对他说：“关于那个姑娘的事，你以后就不要再追查了。上面对你的表现很满意，他期待着你从伦敦带来的好消息。”

从此，波波夫成了德国情报机构阿勃韦尔一名合格的间谍，正式用那个“伊万”的代号为他们工作。

为了到伦敦同英国的情报机构领导人见面，波波夫找到了一个非常合理的借口，说是要给南斯拉夫的一名外交官送一些经费。阿勃韦尔同意了他的要求，并且让波波夫顺便搜集一些详细的情报。在里斯本的几十天里，波波夫以自己的机智通过了卡斯索夫的审查，获得了他的信任。

“三轮车”和“三驾马车”

几天后，这名双重间谍就搭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伦敦。波波夫一下飞机，一个面色红润的男人就迎了上来。

“波波夫先生吗？我是乔克·堆斯福尔，是军情六处的，史巴雷迪斯已经通知总部说你要来。见到你真高兴。”说着，拿起他的行李招呼他上了车，来到了萨瓦

饭店。在秘密情报局的安排下，波波夫很快见到了安全局的负责人罗伯逊。

照例，英国的情报机构对波波夫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接着在英国情报人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很多地方。如果从英国回去之后，波波夫说不出什么来，他很难通过德国人那一关。当然，英国人也为他提供了许多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的情报，帮助波波夫回去获得纳粹长官的信任。

在英国期间，波波夫在罗伯逊的陪同下，走进了他后来真正为之服务的情报机构——英国军情六处的大门。这是一套由情报机关租用的舒适的公寓式建筑。在这里，大约有十二三个官员对他轮番地进行了四天严厉的审问，就差对他拷打了。在一切都表明真实可信后，他又被带到一间陈设考究的办公室，被推荐给一位五十来岁、身材瘦弱的权威人士。经介绍，波波夫才知道，眼前这位军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军情六处负责人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也是后来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

“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你能够适应我们的工作方式。我的所有情报员都要向我仔细汇报的。顺便说一

下，我还要表扬你的汇报呢。希望你能到我家和我们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孟席斯热情洋溢地说。

波波夫和罗伯逊一起来到了孟席斯的家。主人热情好客，特别是孟席斯太太，更是举止得体、温柔善良。她一见波波夫，就立即把他介绍给一个名叫嘉黛·沙利文的迷人姑娘。

嘉黛是奥地利一个纳粹头子的女儿，但因她反对父亲的信仰，逃到英国来了。嘉黛似乎对波波夫很有兴趣，她那双迷人的大眼睛充满了柔情蜜意。看着这个女子，波波夫感到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暗流冲击着自己的心房。他真希望能和这个姑娘多待一会儿。

几天以后，波波夫在军情六处人员的协助下，为德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他们让波波夫拍了一个伪造飞机场的照片，记录了一些飞机和军舰的数目与型号，还拍摄了许多重要地区的军事防御设置和地形图。波波夫还利用卡斯索夫给的莱卡照相机，拍了许多英国皇家海军方面的“情报”。后来德国人得到这些照片后赞赏不已，认为这些情报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

不久，那位让波波夫动心的嘉黛姑娘也来到了他

的身边，成为波波夫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伴侣。她的狂野放浪让波波夫大开眼界。她经常带着波波夫参加各种宴会，把他介绍给所有值得拉拉关系的伦敦社会名流。有时，嘉黛也充当波波夫的老师，帮助他配制密写剂，编写密码信，起草给转信人的明文信。当然，这时嘉黛还频频地为波波夫提供上乘的床上服务，让波波夫一次又一次大汗淋漓……每次完事之后，波波夫总要把头习惯地放在嘉黛那魅力无穷的大腿内侧，回味刚刚结束的那一幕幕的惊心动魄。每当这时，波波夫便知道自己这一辈子也许再也离不开这个女人了。

在嘉黛的调教和帮助下，经过一番考察后，英国军情局正式招募了他，给了他一个代号——“侦察兵”，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双重间谍”。

当时，他一边为英国人搜集情报，一边又多次用密写的方式，为他德国的主子卡斯索夫提供大量的假情报，把那些德国人哄得晕头转向。这样过了一段日子之后，孟席斯觉得应该让波波夫再次回到德国的情报机关去。因为只有回到了德国谍报局，才能更好地为英国搜集情报。于是孟席斯就让波波夫给德国情报

头子卡斯索夫写信，谎称由于情报太多、体积太大、分量太重，不宜邮寄，必须回里斯本当面转交。

卡斯索夫很快就同意了波波夫的建议，因为他们也需要获得更多的关于英国和盟军方面的情报。一切都按照军情六处的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

波波夫即将再次回到德国驻扎在里斯本的情报中心，心中不由得涌起一阵临战前的激动。只是在动身前往里斯本之前，嘉黛驱车送他到机场时，波波夫才感到一阵由衷的失落和孤独。飞机升空了，望着逐渐模糊的伦敦塔，波波夫不由得在心里高喊：“我会回来的，亲爱的！”

到了里斯本，遵照事先制定的联络办法，波波夫很快便和上司卡斯索夫接上了头。在一所别墅里，卡斯索夫对波波夫进行了一番细致且持久的审查。他对情报的每个细枝末节都要追根寻底，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盘问，以便发现新的动向。波波夫还向卡斯索夫推荐了他吸收的两位情报人员嘉黛·沙利文和狄克·梅特卡夫，说这两个人愿意为德国情报机构报务。并且还对卡斯索夫坦言，那个性感的嘉黛·沙利文已经不止一次同自己上过床，与自己的关系非同一般。

卡斯索夫一听就像一只机警的猎犬嗅到了猎物的踪迹一样，连续不断地提了许多问题。最后他十分谨慎地说：“想办法深入地摸一摸他们的思想状况。在谍报工作中，一定要做到绝对的了解和控制。一个出色的间谍，绝不会把自己的安全与色情混为一谈。”

就这样，嘉黛和狄克也被发展为双重间谍。不过与阿勃韦尔其他的双重间谍不同的是，他们是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和波波夫自己挑选的，而不是德国人挑选的。阿勃韦尔给他们分别取了代号，嘉黛叫“胶水”，狄克叫“气球”。由于嘉黛的父亲是个纳粹分子，波波夫就说她是出于“爱国”的动机才为德国充当间谍，可以利用嘉黛在伦敦的社会关系，专门搜集政治情报；至于狄克则是因为“贪财”，才向阿勃韦尔出卖情报。

英国情报局让波波夫和他的两名新成员组成一个“南斯拉夫小组”，代号“三驾马车”。

随着两名情报员招募成功，波波夫在德国情报机关阿勃韦尔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了。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不断地将德国发展火箭、德军战略部署以及国内防御等方面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报告给英国人，得到了英国方面很高的评价。

在业余时间里，波波夫经常与一位离了婚的法国伯爵夫人保持着亲密联系。他的英国上司知道他有这个爱好，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他们干脆将波波夫的代号由“侦察兵”改为“三轮车”，据说就是因为波波夫喜欢同时与两个女人上床。他也因此被称为“风流间谍”。

为了获取德国方面的信任，波波夫的间谍小组“三驾马车”当时还制订了一个代号为“迈斯德计划”的洗钱方案。在此之前，德国情报机构阿勃韦尔给间谍们的情报费总是用外汇支付。而按照英国的法律，凡进入英国的外国人，其所带外汇都得换成英镑。换钱时，每张英镑上的顺序号都要记下来。一旦情报小组中的一人被捕，那么通过他腰包里的钞票号码就可以将其他的人一网打尽。为了避免这种被发现的危险，“三驾马车”找到一个有钱的戏院老板，同意由他出面兑现英镑，然后用他账户上另外的钱来支付给“三驾马车”，这样就可以鱼目混珠了。这计划得到阿勃韦尔的大加赞赏。

当时为了阻止德国人的毒气战，波波夫通过“气球”给阿勃韦尔送去了一个报告，说英国对即将发生的

毒气战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从而使德军完全打消了发动毒气战的念头。

胡佛的傲慢和代价

1941年7月，德国人派波波夫前往美国建立一个间谍小组。他们交给他一个缩微照片胶卷，上面列出情报搜集的主要目标，其中一项就是对珍珠港海军基地港口布局、设施以及兵力部署的详细调查。临行前夕，卡斯索夫对他说：“日本可能要同美国开战，我们也不能坐视。美国人老是在我们的后背搔痒，给丘吉尔和斯大林提供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使我们的士兵一个个被美国坦克碾得粉碎。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如此猖獗下去！要赢得这场战争，必须先发制人，而间谍战是首先应予重视的。我们在美国的组织被中央情报局搞得一塌糊涂，这帮家伙已经成为美国反间谍机关的笼中之鸟，等待着束手就擒。因此，我们将重新组织一个与德美联盟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的前哨情报站。很走运，你被选中做开路先锋。”

波波夫通过自己发现的种种迹象，也判定日本人很有可能袭击珍珠港。三十年后，波波夫发表了他的

战时回忆录，让世人大为震惊，因为他说到达美国后，事先警告过联邦调查局，日本打算袭击珍珠港。他曾试图亲自把这个情报交给胡佛，不料遭到冷遇。

波波夫在回忆中说，当他在里斯本准备起程去美国的时候，他已经从他的好朋友约翰尼那里得到一则情报。有一次，德国的部分情报人员在大西洋的一个孤岛上开会时，约翰尼告诉波波夫说，最近他去了塔兰托，那里曾是意大利的一个海军基地，集中了意大利的战列舰“利托里奥尼”号、“加富尔”号和“杜伊利奥尼”号等全部的家当，此外还有许多巡洋舰和其他的战舰，港内还有规模巨大的造船厂和油仓库。结果在1940年11月12日晚上，那里遭到了英国航空母舰“光辉”号上的舰载机的袭击，意大利的许多军舰和设施都被摧毁了。这一次“塔兰托之战”成了成功偷袭的典范战例。当时，日本人就要求德国人提供这次“塔兰托之战”空袭的详细情况。德国驻东京的空军参赞巴龙·格罗瑙估计日本可能会在六个月内，大概是1941年年底，就会采取类似“塔兰托之战”的空袭方式发动一次突然袭击。

波波夫问：“你认为日本人会袭击哪里？”

约翰尼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

在临行之前，德国情报机构把一个缩微照片胶卷交给了波波夫，上面列出情报搜集的主要目标，其中一项就是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珍珠港海军基地港口布局、设施以及兵力部署的详细调查。

波波夫根据约翰尼提供的信息，又结合自己拿到的这个缩微照片胶卷，通过综合分析后，敏感地判定日本人很有可能袭击珍珠港。波波夫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英国情报机关，他们极为重视，命波波夫传达给美国。

这时，波波夫以“南斯拉夫新闻部驻美国特派员”的身份飞往纽约，开始了他的美国之旅。

波波夫此行的使命有两个：在德国方面，他要探明由美国开往英国的货船离港日期以及其船上所载的武器资料和军用物资等情况，密报德国情报部门；在英国方面，则是通过英国军情五处的协调，见一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及时通告日本人将会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消息。

1941年7月12日，波波夫抵达纽约，随行的有英

国情报官员佩珀。两人顺利地通过了美国纽约海关的盘查，有人将他们引到已经预订好的华尔道夫大酒店，并且很快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局长助理厄尔·康内利和纽约特工头子珀西·萨姆·福克斯沃思。波波夫给他们介绍了德国最新的情报缩微技术，还交给他们有关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时间表，既有德国情报机构的缩微件，也有普通的文件。

可是，纽约特工负责人珀西·萨姆·福克斯沃思却对珍珠港的情报持怀疑态度。他对波波夫说：“这看起来太详细具体了。时间、地点、方式等等一应俱全。看起来好像是个圈套。”于是他对波波夫推托说：“这个问题只能由埃德加·胡佛先生作出决定。”经过一番例行公事般地对话后，福克斯沃思便告辞了，临走时只是祝愿他玩得尽兴，重要的话题一个也没有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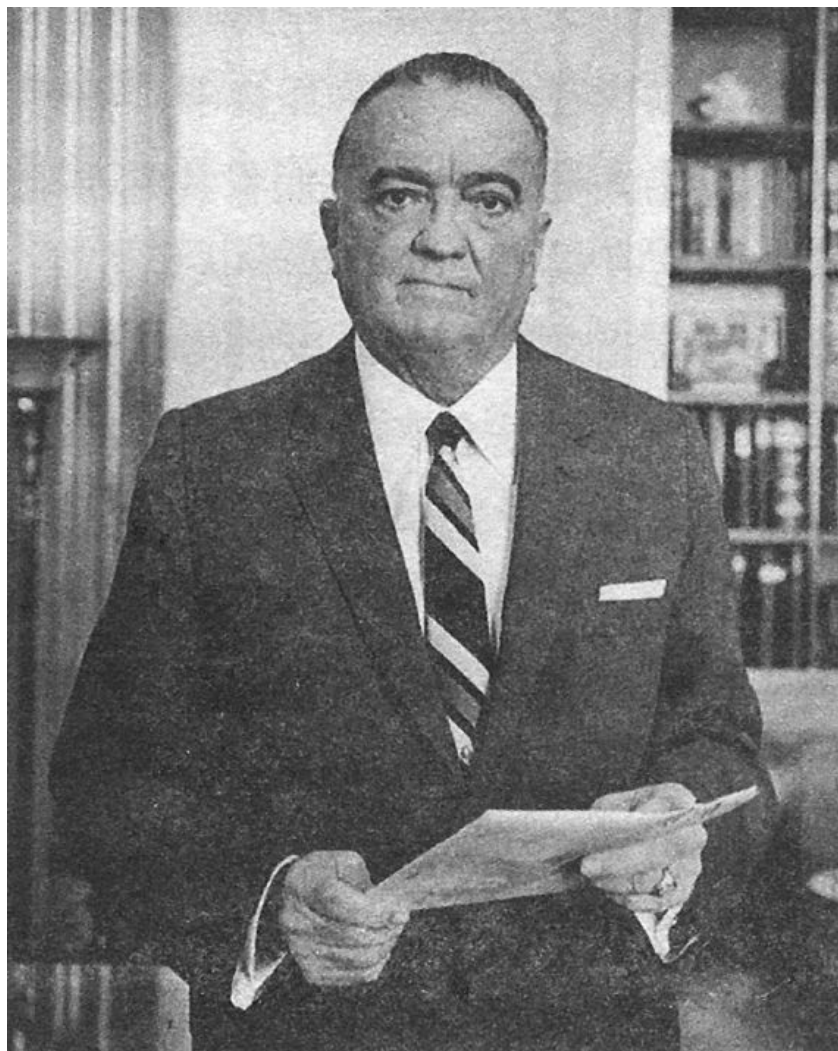
后来波波夫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波波夫对胡佛说：“我到美国，是为了帮助你们备战而来。我曾以各种方式给你们带来了严重的警告，确切地提醒你们，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什么方式和什么人将向你们国家发动进攻。”但是这次见面是很不愉快的，胡佛好像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波波夫扫兴而去。

波波夫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人介绍，没有寒暄，没有礼仪，我走进福克斯沃思的办公室，胡佛已经坐在写字台后面，像抡大锤的人寻找铁砧一样。福克斯沃思一声不吭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胡佛带着讨厌的神色瞅了他一眼，气得脸都发紫，咆哮着说波波夫是个“假间谍”。这次会见只持续了短暂的几分钟。波波夫同联邦调查局的接触几乎变成了一场“吵架”。原来联邦调查局根本不信任他，在波波夫一进入美国后，联邦调查局就派人对他的行动进行跟踪调查。

凭着自己独特的魅力，这位“南斯拉夫新闻部驻美国特派员”来到纽约后，很快就成了纽约社交圈里的一位明星人物。波波夫在他下榻的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酒店里，经常与好莱坞著名女演员约会。他们经常结伴出游，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滑雪，在佛罗里达海滩晒太阳。后来波波夫竟然还在纽约富人区买下一套高档住宅。在纽约的几个月时间里，波波夫居然已经欠下了8.6万美元的债务。因此联邦调查局长胡佛十分瞧不起这位花花公子，认为波波夫只知声色犬马，挥金如

士，根本就不务正业。因此，他对波波夫所提供的有关日本可能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根本不屑一顾。联邦调查局甚至还准备逮捕一位给波波夫送钱的纳粹信使。



美国联邦调查局首任局长埃德加·胡佛
得知美国人对波波夫的这种态度后，英国情报局

十分担心他的真实身份会暴露，于是就命令波波夫撤出美国。五个月后的一天，波波夫终于离开了美国。哪知几乎就在波波夫离开美国的同时，日本人成功偷袭了珍珠港，波波夫的情报终于得到了验证。但是此时已经为期已晚，美国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回到德国后，波波夫用早就准备好的借口为自己在美国的失败开脱。他指责德国情报局切断其资金来源，给的钱太少了，使他无法与掌握情报的高层人士接触，他的上司卡斯索夫竟然相信了他的解释，又给了波波夫一大笔钱，让他再到英国去发展间谍网。于是波波夫又回到了英国伦敦。

在里斯本还有一个特殊的间谍网

1942年11月，波波夫再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为了迷惑德国人，到了伦敦后，军情五处为他提供了几份“价值较高”的情报，让他交给德国人，其实这都是盟军对德国发出一些假警告，但却使波波夫重新获得了纳粹的信任。

这一次去英国，德国人又把3名德国情报人员塞到波波夫的间谍网里。为了不引起怀疑，波波夫只好同

意。但是当他们来到英国后，波波夫便通过英国警察当局拘捕他们。为了避免嫌疑，英国方面机警地掩护了破案的真实动机，把一个为英国情报局服务的双重间谍也抓了进去。

当时波波夫的工作就是给德国人提供假情报和进行策反工作，帮助英美联军更好地实施“火炬”计划前的欺诈行为。1944年3月，波波夫向德国人提供了盟军在法国登陆的详细兵力表，其实这就是盟军代号为“坚韧行动”的战略欺骗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分散希特勒的注意力。德国人果然如获至宝。约翰尼写信给波波夫说：“我祝贺你成为元首的最好特工，他对你笃信不疑。”

当时在英国情报机构的支持下，波波夫的“三驾马车”给阿勃韦尔送去了许多“政治情报”，对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心理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情报混淆视听，加重了德军战争即将失败的心理压力，从而对战局产生错误判断，使德国军队在西线保持最大的数量，减轻了东线战场上苏联前线的压力。

当时英国海军想让德国人对东海岸的水雷区产生一个错觉，“三驾马车”的任务是把虚构的布雷图送给

德国人。为此，“三驾马车”设计了一场戏：有一个叫伊文·蒙太古的英国海军参谋总部人员，因为是犹太人，因此对德国人要打赢那场战争怕得要死。他听了许多关于集中营的可怕故事，如把人放进烤箱里烤死等，很想讨好德国人。波波夫想办法和此人结成了好友，并通过他设法把那些绝密的海防图送给德国人。于是，有关英国海军的水雷布置图就这样到了德国情报部门手中。德国情报机关把那张虚构的英军布雷图作为“绝密情报”呈送给元首，使希特勒打消了从东海岸进攻英国的想法。

在一次与卡斯索夫的谈话中，波波夫根据卡斯索夫无意透露的一宗德国间谍活动的案件，帮助盟军抓获了一名隐藏很深、危害极大的纳粹间谍，为“诺曼底”登陆计划的顺利实施扫清了情报方面的障碍。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下午，波波夫去要活动经费，并抱怨说给自己的钱太少了。卡斯索夫连忙解释道：“请相信我，我们已尽了全力。为什么我们没有给你更多的钱呢？原因是我们把一大笔钱给了我们的一個情报员，这个人出身清贫、地位低微，但他向阿勃韦尔提供了难以相信的重要情报。”

波波夫趁机问了一声：“什么样的情报呢？”

毫无戒备之心的卡斯索夫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多更好的情报。这其中包括军事的、政治的，甚至有德黑兰会议记录和盟军将要进行的一次大型两栖登陆的消息。”

“我不相信。一个地位低下的人不可能搞到这些，他一定是一个身处要位的人。他是谁呢？”

“我告诉你吧，事实上他是你的同乡，离杜布罗夫尼克不远。”

这个消息立即引起波波夫和英国军情六处的高度警觉。他们从各方面推测认为，此人很可能是阿尔巴尼亚人，因为杜布罗夫尼克离阿尔巴尼亚边境最近。军情六处立即开始对所有能接触德黑兰会议记录的人员进行了排队摸底。很快目标被锁定在英国驻安卡拉大使的一个阿尔巴尼亚籍的随从身上，此人的化名叫“西塞罗”。随着“西塞罗”的被捕，德国在英国中枢机构中的间谍网被打击殆尽。

作为策反的一大成果，波波夫最大的功劳就是让纳粹间谍约翰尼也倒向了英国一边。1943年夏天，波波夫终于成功策反了当年将自己招募成纳粹间谍的约

翰尼，使他也成了一名双重间谍。约翰尼被策反后，英国情报局给他的代号是“艺术家”，从此他一直为英国人服务，向英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但是一年以后，约翰尼由于有“来历不明的收入”而被盖世太保逮捕。英国军情局担心波波夫会暴露身份，于是就让他“消失”了。

大约在1943年4月中旬，军情六处派波波夫和约翰尼一同去调查德国人正在试制的一种具有很大杀伤力的新武器。这种武器叫FZG-76型火箭，英国人后来把它称为V-I火箭，或叫“战车”式火箭。很快，两人发现在德国皮尼蒙德附近的两家生产小型飞机的工厂正在研制一种发射装置，并了解到他们还批量生产一种无人驾驶、能运载一吨重的炸弹的单翼飞机。英国皇家空军马上派出轰炸机群对该地区进行了密集式轰炸，使德国人的生产瘫痪了半年之久。

就在英国人频频发起强大的间谍攻势时，德国人感到必须加强自己的谍报组织的建设，于是阿勃韦尔拟订了一个“太上皇”总反攻计划，在阿勃韦尔内部展开了一场评价间谍的活动，旨在提高阿勃韦尔谍报人员的素质，挫败盟军的情报攻势。

为了不让德国阿勃韦尔对自己的活动进行深入调查，以免从中发现“纰漏”，同时也是为了能打入“太上皇”行动中去，波波夫进行了一系列的反侦察活动。通过约翰尼的牵线搭桥，波波夫认识了阿勃韦尔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此人叫卡姆勒，是阿勃韦尔一处的中尉情报长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潜伏在世界各地的德国间谍所搜集到的情报作出评价，并转送到柏林。他也是德国情报机关中层人士中最有可能接触“太上皇”计划的人。于是波波夫便想方设法地和他搞好关系。

卡姆勒是个孤芳自赏的人，他从来不屑对那些特务组长拍马屁，所以他与卡斯索夫、克拉默等人的关系很不融洽。波波夫就抓住他这一弱点，经常在卡姆勒面前发牢骚，说卡斯索夫根本没有什么才能，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舒适职位，恬不知耻地抬高自己而已。时间一长，卡姆勒果然把波波夫看做是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对他几乎无话不谈。他偶尔还有意无意地和波波夫在一起，议论和评价一些纳粹特务，从而让波波夫了解到许多幕后消息。

他从卡姆勒那里发现，在里斯本还有一个阿勃韦

尔的特殊间谍网，代号叫“奥斯特罗”。这个发现使波波夫感到一阵紧张。因为他原认为自己的间谍网是纳粹德国摆在西欧唯一的一张王牌，没有想到现在又有了一个“奥斯特罗”。看来德国人可能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或者是想通过“奥斯特罗”来侦察自己。波波夫认为必须尽快除掉这个“奥斯特罗”组织，防止后院起火。

通过约翰尼的大力协助，波波夫终于查清了这个组织的活动情况。原来“奥斯特罗”这个间谍组织的头头是一个名叫科斯勒的博士。此人原是前奥地利骑兵军官，后就职于阿勃韦尔在布鲁塞尔的情报中心站。科斯勒博士是个犹太人，但却是阿勃韦尔的高级军官。

科斯勒领导的“奥斯特罗”共有3名间谍，分别叫“奥斯特罗1号”、“奥斯特罗2号”和“奥斯特罗3号”。“奥斯特罗1号”和“奥斯特罗2号”在英国，“奥斯特罗3号”在美国。这个组织潜伏的时间很长，隐藏得很深，甚至连卡斯索夫和克拉默等人都不能掌握其动向。他们也只听命于柏林方面的指示，由卡姆勒的秘书费罗琳充当联络人。

波波夫立即将这个重要的发现通告了军情六处。军情六处意识到“奥斯特罗”对“三驾马车”的潜在威胁，如果德国情报机关对它的信任超过对波波夫的信任，不仅会阻碍波波夫参加“太上皇”计划，而且会使波波夫暴露。于是，英国情报当局决定清除这个组织。

为了不使清除工作引起阿勃韦尔的疑心，危及英国的双重间谍网，军情六处决定采取借刀杀人的办法。为了败坏“奥斯特罗”的声誉，“三驾马车”向柏林发出了许多得到证实了的真实情报。德国情报局把这些情报同“奥斯特罗”送去的情报进行对比后，发现这个本来寄予厚望的“奥斯特罗”不仅没有好好地工作，反而还有“通敌”的嫌疑，觉得它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于是就把这个“奥斯特罗”给清除了。不过，波波夫的“三驾马车”也由此引起了德国人的怀疑，失去了打入“太上皇”行动中心的机会。

美女和“血浆”的考验

为了阻挠德国人的反攻策略——“太上皇行动”，英美决定尽快实施反攻计划——“海王星计划”。为了保证反攻计划的顺利进行，军情六处要求波波夫按照

既定计划行事。首先要使德国情报机关相信，反攻将在加来海峡开始，而且在第一批部队登陆之后，紧接着就有第二批实力更强的部队在同一地区登陆。同时，在波尔多地区可能也有一股部队登陆。此外还要让德军最高统帅部相信，盟军还存在虚构的“三支军队”，分别是“美1军”、“英国第12军”和英国“第4集团军”。

由于这一系列间谍战的成功，盟军以极小的代价顺利地完成了“海王星计划”，使德国人的反攻阴谋遭到彻底失败。正当英国人沉浸在胜利在望的狂热和乐观情绪之中时，波波夫的“三驾马车”情报组奉命回到里斯本的“狼穴”中，等待执行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当时由于德国谍报部门在“海王星计划”中损失惨重，情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急需休养生息。因此，在初到里斯本的一个多月中，波波夫轻松得简直没事可干，于是便到当地的赌场里散心。

一天，波波夫正在赌场赌一种赌注不限的“百花乐”时，突然来了一群朋友向他打招呼问好。他们中间一位皮肤白皙、棕发碧眼的比利时姑娘引起了波波夫的兴趣，朋友们把她介绍给波波夫，说她名叫露易

丝。

当露易丝同波波夫握手时，其热情程度显然使波波夫感到与她在一起远比连续赌钱更为快慰，于是他提议到酒吧去喝一杯，露易丝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从酒吧再到波波夫的房间，一切都很自然。晚上一度春风之后，露易丝看上去还是那么纯洁多情。然而到了清晨三四点钟时，波波夫醒来却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躺在床上。这时他发现通向客厅的门开着。波波夫顿时警觉了起来，听到他隔壁办公室的抽屉被打开的声音。这下他明白了——这个露易丝原来是阿勃韦尔派来监视自己的！

幸好波波夫从来不在房间里放重要的文件，所以就索性让露易丝翻了个够。几分钟以后，露易丝踮着脚尖走进了卧室。波波夫装成睡着的样子。露易丝轻轻地又躺在他的身旁。波波夫见时机已到，便翻个身，用胳膊肘支起身子，装出睡眼蒙眬的样子说：“亲爱的，睡不着吗？”

露易丝转过身来，趴在波波夫的身上说：“我不是有意要把你弄醒，我是想找支香烟。”

听了这句话，波波夫把胳膊从她身上伸过去，到

床头柜里拿了一包香烟。

“呃，这里才有香烟呢，抽一支吧。”

“真不好意思，”露易丝喃喃地说，仍然把波波夫抱得紧紧的，“我已穷困潦倒，想找点钱花，可是达斯科，我绝不是一个小偷，这是我第一次……”

波波夫缓缓地把露易丝从身上推开，然后对她说：“你应该更巧妙一些，我的外衣就在那边，口袋里装满了筹码，你不是看着我把它塞进口袋里去的吗？你只要捞一把到赌场把它们换成现钞就行了嘛！好吧，你要钱就拿吧，不过你究竟是为谁工作？”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露易丝假装生气了。

波波夫气愤之极，就伸手打了她一个耳光。这个女人开始哭泣起来，但还是不肯吐露真情。波波夫见状也不再逼她了，于是就抓紧时间，再一次同她云雨一番，心里却有了一种报复的快感。

经过这件事后，波波夫越来越感到自己处境危险，预感到德国人要变个花样对他进行审查了。果然，过了几天，约翰尼突然从柏林赶来，对他说：“明晚你将要向反间谍处的施劳德和纳森斯坦汇报工作。还有一个从柏林来的人，他是专门来审问你的。这是

我在几小时之前从密码处搞到的真实消息。到时你要汇报的情况是属于绝密级的，既重要又紧急。他们将追根究底，使你绞尽脑汁。他们也不会像卡斯索夫那样彬彬有礼。”

“放心吧，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波波夫胸有成竹地说。

约翰尼却严肃地说：“当然，我知道你是一只真狐狸。只要你保持清醒的头脑，你是可以用智斗取胜的。但如果他们使用测谎血浆的话，那怎么办？”

“测谎血浆？那是什么玩意儿？”波波夫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这是新从实验室里试制出的一种妙药，叫硫喷妥钠，是一种破坏人的意志的新药，是一种属于巴比妥类的药物。据说静脉注射后很快产生硫喷妥钠麻醉，故称静脉麻醉药。那时被注射的对象就不会说假话。你应该试一下，阿勃韦尔驻里斯本的情报站最近运来了一些硫喷妥纳。”

“约翰尼，你相信这种硫喷妥钠的性能吗？你要知道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我承认你对酒精的抵抗力是很强的。但这玩意儿

是一种致幻剂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的抵抗力如何。”

“你能不能搞点那种药，让我先有个准备。”

“我想想办法，也许能搞到。”约翰尼说。

下午3点左右，约翰尼果真拿了几支硫喷妥钠回来，并带来一名懂行的医生。此人对硫喷妥钠的作用颇有研究，并且对纳粹仇恨有加。

“25毫克，”医生用皮下注射器量了量剂量，“这个剂量足以使神经系统处于半麻痹状态。如果你有什么事就到隔壁的房间来找我。几分钟以后，你就会有反应的。”

波波夫被注射了硫喷妥钠后，很快就感觉头晕、恶心、想睡觉。眼前所有的事物都好像显得非常有趣而奇怪，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可爱。当波波夫感到舌头膨胀到口腔都装不下时，就对着一旁的约翰尼叫道：“约翰尼，来吧，开始吧。你就从我们戏弄那几个盖世太保笨蛋（指他们在弗赖堡大学的小闹剧）那儿开始提问好了。”

约翰尼开始问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胡乱地问到波波夫的家庭、童年时代以及大学时代等情况，接着便

把问题转到英国，问他在那里的活动情况和所接触过的人。下面是他们测谎录音记录的片段：

.....你不喜欢德国人吗？

不。

不喜欢纳粹党徒吗？

不。

不喜欢希特勒吗？

不。

你为什么在奥斯拉俱乐部里捣乱那次集会呢？

只是闹着玩。

你自己知道你干的什么好事，你进行政治煽动。

我当然知道，我要不知道那才怪呢。不过，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这是约翰尼和波波夫之间的一段对话录音。有许多问题波波夫不是回避，就是否认，或是撒谎。虽然

他说话有些困难，但回答的答案却证明他的头脑还是很好使的，看来在药力完全发作的情况下，波波夫还是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

“药性有点过去了，约翰尼。”一个小时以后，波波夫说道，“我甚至连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可是醉得够呛，这是我一生中醉得最厉害的一次。”

到了晚上，为了进一步试验自己对硫喷妥钠的承受能力，波波夫主动要求医生把测试量加大到50毫克。这次几乎把波波夫搞垮了。朦胧中，他只知道约翰尼在询问问题，但不知道在问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做了回答。他只觉得自己好像翻了一个跟斗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波波夫被猛地摇醒。他睁开双眼，看见约翰尼站在自己身旁，眼前摆着十分丰盛的食物。

“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表现得怎么样？”

“现在是下午5点整。昨晚你表演得精彩极了，我正想推荐你参加好莱坞奥斯卡金像奖的角逐呢！据说奥斯卡本人是世界上表演失去知觉的最佳演员。我几次审问你，第一次是刚注射以后，另一次是你熟睡以

后，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你，一点情况都没从你的嘴里泄露出来。现在，你应该养精蓄锐，打起精神对付今晚的审讯。”

当天晚上，柏林来的审讯专家米勒少校对波波夫进行了冗长而有步骤的审查。他对波波夫的每一句话都要进行仔细的分析，但却从来不用威胁的口吻，表面上让人感到他在设法体谅你，帮助你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是一种使受审者不感到拘束的技巧，显然他是想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来宽慰对方。经过6小时的审讯，米勒才对波波夫温和地说道：“你看上去似乎非常疲倦。但是，很抱歉，我们还有不少情况想向你了解。刚好，我这次从柏林一个朋友那里弄了些上等吗啡，这种滋味真是赛过活神仙！咱们一人来点吧，也好把这讨厌的公事打发了。”

说着，便叫军医拿来了两支药水，并让医生先给自己注射，然后用期盼的目光注视着波波夫。波波夫明白这是德国人在耍魔术——那支给米勒注射的药水充其量只是蒸馏水而已，而要给自己注射的却是硫喷妥钠！但事情是明摆着的，自己必须注射！想到这儿，波波夫表现出十分高兴的样子接受了注射。不一

会儿，他开始感到头晕目眩，两脚悬空。波波夫知道是药性上来了。这时，只听米勒又问起了有关“太上皇”行动和德国双重间谍网被英方侦破等方面的问题。幸好波波夫对此早有准备，他的回答毫无破绽。

长达9个小时的审讯结束后，米勒对波波夫说道：“希望你能答应我们去与古特曼（波波夫的报务员费里克的化名）取得联系，告诉他再搜集些具体的情况，我们急着要，等你回到英国再搜集恐怕为时太晚了。”

这席话表明德国人认为波波夫还是可以信任的，他们可能不久要起用他。果然没过几天，德国反间谍处修改了卡斯索夫要波波夫留在里斯本的计划，要他尽快回到伦敦去领导那里的间谍小组，并给他提供了一笔相当数目的活动资金。

从1940年到1946年6年时间里，波波夫经常往返于葡萄牙和伦敦之间，他把纳粹的秘密交给伦敦，再把编造的秘密交到德国人手里，然后再从德国人手里拿到大笔的现金供他自己从事情报工作和挥霍。他当时的职业是高风险，但享受的也是高报酬。比如1942

年10月14日到10月21日仅7天的时间内，德国人一次性就给了他2.5万美元，再加上6000葡币，另外承诺事成之后，在11月10日到20日期间，再付给他7.5万葡币。

当然，波波夫并不招摇过市。因为对一个真正的间谍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露痕迹，不动声色，不被注意，不被跟踪。波波夫运用各种各样的反间谍手段，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潇洒英俊的外表，强健的身体，聪明冷静的头脑，过人的技能以及风光体面的身份和挥金如土的奢华生活，即便拥有这一切，但他却依然要时刻面对生死的考验。但幸运的是，波波夫总是凭自己的机智和那么一点点运气化解开，活下来了。

1944年5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军情六处的人急匆匆地赶来对波波夫说：“达斯科，艺术家（约翰尼的化名）已被捕。听说是与金融走私有关。但德国人已经查到了他的通讯册。总部希望你趁敌人还未发觉，赶快回里斯本通知其他人员转移。”

听到这个消息，不啻五雷轰顶，波波夫禁不住一阵晕眩，潜伏在德占区的谍报人员很可能被德国人

逮捕起来，严刑拷打，直到用各种卑鄙的手段结束他们的生命。于是，波波夫星夜兼程地赶到里斯本，开始营救和组织逃亡工作。

然而事实证明，一切都为时太晚，几乎在“三驾马车”手下的欧洲谍报人员都没能逃脱纳粹的魔爪，就连他本人，在营救过程中也险些被纳粹抓获。

很快，纳粹德国就在盟军的大炮声中土崩瓦解了。作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的“三驾马车”的工作也彻底结束了。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那些年来，波波夫一直拒绝接受英国情报机构付给他的报酬。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出了两个理由：“一是我非常乐意为一个我全心崇敬的国家服务；二是德国人付给我的薪水已经够我花了。”

不过在当时，英国情报机构（主要是军情六处）还是要经常资助他。在军情六处有一份档案就这样写道：“1941年3月14日，星期五，‘三轮车’在莎威的餐厅用餐后，发现口袋中的钱不够付午餐的账单。看来他在前一天夜里花了不少钱。”

二战结束后，波波夫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他被称为英国谍报史上最著名的“风流间谍”，同时被西方

谍报界誉为最勇敢、最快乐的谍报天才。那些谍报同行们一致公认他具有巨大魅力和个性上的吸引力，就连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也对他赞叹不绝，说他“太诡计多端”。

战争结束后，波波夫在法国南部定居。1974年，波波夫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间谍与反间谍》。他在回忆录中对间谍生涯有这样的描述：“这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无孔不入、无处不在，胜利了不可宣扬，失败了不能解释。我的武器就是谎言、欺骗和谋杀。但我并没有觉得内心不安，因为这只是战斗对我的考验。”他还在《间谍与反间谍》这部回忆录中为世人留下了一句耐人琢磨的名言——“要使自己在风险丛生的环境中幸存下来，最好还是不要对生活太认真”。

波波夫的晚年是在平静中度过的。在游人熙熙攘攘的英国海德公园的公墓群旁，天真烂漫的孩子们总能发现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不分春夏秋冬、不管雨雪风霜，每个星期天的黄昏都会在这里安详地坐上那么一两个钟头。他就是为二战立下了赫赫功勋的世界超级双重间谍达斯科·波波夫。

面对如血残阳，这位老人是在默悼亡友，抑或是

在怀念往事？也许每个人都会对此作出不同的回答，但每个人都会明白，历史不会忘记这些为人类幸福而奉献自己的英雄们！

1981年，波波夫结束了他传奇而精彩的一生，享年69岁。

“风流间谍”成了“007”的原型

波波夫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是他的故事并没有被时间所湮没。他是养尊处优的富家阔少，又是拈花惹草的风流公子；他是纳粹德国最信任的间谍之一，又是英国情报局最成功的双重间谍。他的谍报生活堪与伊恩·兰卡斯特·弗莱明小说中的主人公詹姆斯·邦德相媲美，而且其间谍生涯的紧张性和危险性更加激动人心，充满着罪恶与仁智的殊死搏斗，因此波波夫被世人公认为是“007”詹姆斯·邦德的原型。许多专家认为，詹姆斯·邦德身边围绕着那么多漂亮的“邦女郎”以及他身上那种令女人无法抵挡的魅力，都是来自达斯科·波波夫这个原型。

“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兰卡斯特·弗莱明在1929至1933年间，曾任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二战爆

发后，他成了英国海军情报处处长的私人秘书，一直在英国海军情报处工作。他曾经搞到过最完整的西西里岛防御工事和雷区分布图，为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创作邦德这个形象奠定了基础。1940年到1944年，弗莱明和波波夫曾分别为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是同事和战友，因此彼此之间相互了解。

弗莱明从情报机关退休后，就开始了创造“007”。在他的笔下，当年那些熟悉的生活和无数间谍朋友又回到了他的身边。他一共写下了15部关于“007”的故事。据说弗莱明是这样设计詹姆斯·邦德的：英国国籍；编号007；身高183厘米，体重76公斤，蓝眼睛，黑头发，肤色较黑；右脸颊、左肩、右臂都有疤痕；擅长射击、飞刀、搏击、滑雪；精通法语、德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对其他的语言也很有天赋。

在战后的解密档案中，对弗莱明有这样的描述：仪表堂堂，智力超群，和同事相处融洽，讨人喜欢。最喜欢射击和散步，但讨厌房间里有鲜花，喜欢鱼子酱和不甜的马提尼酒。他的这些爱好不禁让人想起电影中“007”的种种特质。电影中的“007”詹姆斯·邦德也

像他一样讨厌房间里的鲜花，也喜欢鱼子酱和不甜的马提尼酒。于是有人说他自己就是“007”。

1952年1月，弗莱明写出了詹姆斯·邦德惊险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豪华赌场》，到54年后的2006年，这部小说被拍成了“007”系列电影中的第22部《皇家赌场》。



詹姆斯·邦德的创造者伊恩·弗莱明

自第一部“007”电影于1962年10月5日公映后，詹姆斯·邦德的形象便开始风靡全球，到今天历经40多年一直长盛不衰。在全世界共有超过20亿人次的观众看过“007”。

那么，“007”为什么能在银幕如此走红？到底有没有“007”这个人呢？4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真正的“007”到底是谁？弗莱明笔下的“007”和他众多的间谍朋友中间哪一个最相似呢？

弗莱明对他笔下的“007”有过这样的描述——经历在完成两次暗杀任务之后，邦德获得了杀人执照，英国军情六处“007”号间谍正式诞生。而他的第一次任务，就是监视一名恐怖分子。身为军情六处第一赌博高手的“007”被派前往赌场执行任务。并不完全信任邦德的上司M，安排了一个漂亮迷人的女特工监管交给“007”的赌金，这让邦德很是不爽。但当两人出生入死多次躲过致命袭击之后，他们互相吸引，邦德甚至为她萌生了退隐江湖的念头。然而，致命危险接踵而来……

这就是小说和银幕上“007”的经历和命运。后来，细心的读者从达斯科·波波夫回忆录《间谍与反间谍》的某些章节中，看到了他是如何为了反跟踪溜进赌场拿公款豪赌，而当他压下5万美元赌注的时候，那个跟踪他的人是如何脸色变得铁青，对他怒目相向的。而当他最终收回赌注时那个人又是如何笑容满面的——

1941年，皇宫饭店。我身上带着德国间谍机构给我的8万美元美国之行的行动资金。我打算把这笔钱交给英国情报机关军情六处。我把那8万美元带在身上而不存在饭店里，是不愿引起别人的注意。但下楼时我仍然发现不管是喝咖啡还是吃饭，总有个男人跟着我……

两本出自不同间谍之手的文学作品，对同一个场景的回忆和描述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显然，这两个写书的间谍之间原本就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波波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和弗莱明确实在里斯本相遇，在我准备去美国前的几个星期中，他成天跟在我后面，也许他把那天晚上赌场里发生的事情发展成了邦德的冒险故事。”——这也应该就是詹姆斯·邦德和小说原型波波夫之间最接近的写照了。

后来看过“007”小说的波波夫在回忆录中还这样描述过他和詹姆斯·邦德的关系：“有人告诉我，弗莱明说他小说中邦德这个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我这个典

型和我的经历写成的。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邦德，恐怕在间谍舞台上他难以生存48个小时。”

“007”的创作者弗莱明曾经在路透社当过记者，而波波夫则是一个南斯拉夫的富家子弟，人脉极广。显然，这两个人都具有明显的间谍特质。如果说弗莱明以波波夫为原型创造了“007”系列，而波波夫又几乎全盘否定了“007”的真实性。那么这个“007”原型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如何成为间谍的呢？真正的间谍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对于人们关于谁是“007”原型的猜想，伊恩·弗莱明唯一的一次表态是在1962年10月，当时他称“邦德”是一个真实间谍的传奇版本，这个人也许就是威廉·斯蒂芬森。

当年威廉·斯蒂芬森的公开身份是英国安全协调局组建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丘吉尔把威廉派到纽约，让他秘密组建英国安全协调局——英国情报机构在西半球的总代理，同时还是丘吉尔安排在罗斯福身边的私人代表。在他的推荐下，罗斯福让多诺万开始负责美国战时的情报机构。不久多诺万成立了“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因此威廉被认为是中央

情报局的“始祖”级前辈，他曾经为美国培养了5名中情局局长。

二战期间，威廉另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加拿大成立了“X训练营”。从1941年到1945年，先后约有2000名英、美、加等国的特工在此接受训练，其中包括美国日后的5名中央情报局局长。伊恩·弗莱明当年也在“X训练营”接受过训练。“007”系列小说《金手指》中有一个抢劫诺克斯堡的情节，灵感就来自威廉的“黄金计划”。

因此应该说，无论是弗莱明小说中所创造的“詹姆斯·邦德”，或者是影片中的“007”，都应该是英国情报机构一代特工的集体亮相，是他们的群体形象。

无论是弗莱明笔下的“邦德”还是银幕上的“007”，都是所向无敌，从不失手，潇洒俊逸，给人一种智慧和阳刚的美感。然而小说毕竟只是小说，电影毕竟只是电影，现实生活中各种间谍的命运却是不尽相同。

1957年6月，一具身穿潜水服的尸体被冲上了英格兰南部的一片海滩。由于长时间在海水中浸泡，尸体的脑袋和双手已经没有了，很难辨认。各种资料显示，他很有可能就是莱昂内尔·克莱伯。他的公开身份

是英国皇家海军退役军官，在执行一项绝密的潜水任务后就再也没有上来。半个世纪后的2007年，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一些有关莱昂内尔·克莱伯的档案，但没有明确透露他失踪或死亡的原因。英国国家档案馆称，有关莱昂内尔·克莱伯的档案还要到半个世纪后的2057年才能全解密。

二战期间，有的间谍活了下来，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也有许多间谍离奇地死亡或神秘地消失了。他们经历了什么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或者根本就没有资料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

也许有一天，他们的档案资料会跟达斯科·波波夫的一样，通过“007”詹姆斯·邦德这个不朽的艺术形象重见天日而永世长存；但大多数间谍只能是像莱昂内尔·克莱伯一样，留给这个世界一个长达百年的世纪之谜，甚至是一种永远没有真相的遗憾。也许这就是间谍的人生。

1999年，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在拍摄“007”系列电影《纵横天下》时，选用了军情六处的总部大楼作为背景。军情六处总部大楼也因此第一次走入了全世界的视野。于是来军情六处总部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商家更是借此机会，及时开发出一条环军情六处总部大楼的旅游线路。但旅游者也只能看一看总部大楼的外景，想象一下“007”间谍的工作罢了。

第十一章 呼风唤雨，“月亮女神”谍海传奇

代号为“月亮女神”的英国美女间谍辛西娅天生丽质，谈吐优雅，知识渊博，风趣幽默而又大智大勇，利用外交官夫人的身份在西方上流社会呼风唤雨，游刃有余，让无数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多次窃取重要情报改变了二战的进程，深得西方“情报之父”斯蒂芬森的器重，历史学家赞誉她“一个美国女人又一次挽救了大不列颠”；她留给世人的名言是“我觉得单靠一些‘体面’的办法就无法赢得战争”。

婚姻的不幸让她开始寻找新的情人

在英国近百年的情报史上，曾出现过一大批卓越的女性间谍，有“月亮女神”之称的辛西娅就是其中之一。

辛西娅原名贝蒂·索普，1910年11月22日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镇一个高级海军军官的家庭，父亲乔治·赛勒斯·索普少校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曾被派赴世界各地作战。一战时父亲索普在古巴住了一段时间，辛西娅的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并且在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

1921年，辛西娅全家迁往夏威夷。索普少校那时正在珍珠港指挥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也许是在世界各地的随军生活，让少年的辛西娅喜欢冒险和刺激。在学校里她总是努力表现得与众不同，同学们不敢做的事情她总能做到。与同龄人相比，辛西娅是一个很有见地而且显得特别成熟的姑娘，11岁的时候父母决定由她的姐姐陪伴她到瑞士的一所女子学校接受教育。

辛西娅在欧洲生活了一段时间就返回了美国，进入了马萨诸塞州的达纳·霍尔学校读书。15岁时，辛西娅已经漂亮得惊人。一头棕红色的头发，一双深绿色

大眼睛，丰满而坚定的嘴唇，加上窈窕的身段，虽然很少面带笑容，但却吸引了许多男人的目光。

不久，辛西娅又被送到了瑞士的一所进修学校去接受教育。这种学校是专门培养青年女子进入社交界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再后来她又去了欧洲，返回美国后又进了韦尔斯利的一所学校继续学习。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和培训，辛西娅逐渐成为一个有主见、风度高雅、相当成熟的女郎。

辛西娅进入社交圈后，吸引了众多的追求者。正当她蓓蕾初绽、对男性充满强烈渴望时，她遇到了英国驻美大使馆商务处的二等秘书阿瑟·帕克。阿瑟·帕克是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比辛西娅大20岁，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过伤，健康状况一直欠佳。辛西娅选择嫁给他，是一个令人迷惑的抉择。

辛西娅那时还不到20岁，身材苗条、金发披肩，一双大眼睛像碧波荡漾的湖水般妩媚动人、令人心醉。据一位外交官说，她的目光和身材不论在什么场合，对男人都是一种挑衅。那时，在辛西娅周围不乏各种国籍、各种职业和各种职位的帅小伙子，年轻、英俊而潇洒，但她都没看上。而那个帕克不仅健康状

况不好，而且还自负、浮华、反应迟钝、理解力差，辛西娅与他显然不是同一个类型的人。有人说辛西娅之所以愿意和帕克结婚，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她已经怀了帕克的孩子。

1930年4月，辛西娅和帕克正式举行了婚礼。然而婚后两人不断发生激烈的冲突。辛西娅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就开始寻找新的男人，从一个又一个的情人身上寻求慰藉。

1931年，帕克被调到智利的圣地亚哥当商务专员，辛西娅就同一个富有的智利大亨打得火热，而且还以她惯常的大胆和他一起玩马球。后来，帕克被调到西班牙任职，辛西娅又和西班牙空军的一位高级军官有了私情。她特殊的外交官夫人身份让她迅速成为社交界的明星。她似乎永不疲倦地穿梭在社交界名流中，无论是政界、军界还是外交部。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辛西娅开始积极协助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她设法使被捕入狱的一些飞行员获释，并帮忙让不少佛朗哥将军的支持者逃跑。辛西娅的这种“亲佛朗哥”行动惹了不少麻烦，英国大使馆不得不让帕克带着辛西娅离开西班牙，到华沙去任职。

1937年夏天，帕克被调往波兰，辛西娅随同来到了波兰的首都华沙。她当时27岁，越发显得成熟而有风韵，身材依旧婀娜多姿。这时的辛西娅因为长期以来深受上层社会环境的熏陶，谈吐优雅，知识渊博，风趣而且幽默，这一切使得她更加成熟和完美。她所具有的双重品质——正视一切危险的惊人的勇气，以及她特有的别人无法仿效的诱惑男人的魅力，都充分地显示出来。她热衷于冒险，间谍这一行在她眼中被视为一种富有挑战性的职业。她在西班牙时就已经被英国秘密情报局吸收参加了情报活动，所以她一到波兰，英国情报局驻华沙的特工人员立即同她接上了关系。

当时整个波兰笼罩在战争的迷雾里，英国政府急需有关内战各方的情报，英国秘密情报局驻扎在波兰的情报官也深感自身力量的薄弱，于是想扩展自己的队伍。他们找辛西娅进行了一次秘密而严肃的谈话。这位多才多艺的业余间谍从此正式登上了舞台，走上了自己漫长的间谍生涯。

这时，纳粹德国的扩军备战已经到了高潮，英国正密切而又紧张地注视着希特勒的动向。德国的近邻

波兰，很明显将是希特勒进攻的首要目标；同时，波兰又是夹在德、苏两大强国中间的缓冲地带，是两大强国谍报人员活动的热点，在这里将会搞到对德国和苏联两方面都有价值的情报，这就为辛西娅的间谍工作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平台。

很快，她就被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的机要副官看上了，这个男人很快就掉进了她布置的情网。辛西娅后来对她的传记作者说：“我一听说他的职务，就拼命地勾引他，即使他长得像魔鬼撒旦我也不在乎，因为我需要他，我很高兴。”

辛西娅在华沙的最大成就，就是坚决而果断地把这个波兰小伙子诱入了她的圈套而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这个小伙子尽管是个副官，但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当时他不仅深得波兰外交部长的信任，而且经常代替外交部长去捷克斯洛伐克和德国执行秘密使命，得以接触各种各样的机密文件。

辛西娅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她生活中这一激动人心的新角色。为了能捕获这样的一个人物，辛西娅作了精心的修饰。她尽管衣着朴素，但却显得清纯动人，这个副官被辛西娅弄得神魂颠倒，心甘情愿地把一些

机密文件从他的上司贝克上校的办公室拿出来交给她复制，然后再送回去。

有一次，这个副官竟然给辛西娅偷来了德国军用密码机“哑谜”的详细图纸。他很兴奋地对辛西娅说道：“亲爱的，德国的这种密码机是当今最先进的自动加密的机器。它加密的电文，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破译。我们需要时时了解这个强大邻国的打算，总参谋部的密码破译处为了加快破译过程，已经仿制成功了这种复杂的‘哑谜’机，贝克上校对此事很感兴趣，这就是他要来研究的‘哑谜’的详细图纸。”很快，辛西娅就通过秘密情报局的特工，把这张关键的图纸送到伦敦。

“起初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秘密情报局一位正在研究并试图掌握这种新型密码机的特工说，“这正是我们要急于了解这种密码机的整个链条中所缺少的一环。”辛西娅搞来的那张图纸，在后来英国人复制“哑谜”机的时候，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辛西娅作为机要副官的情人，经常与他一起出访布拉格和柏林。尽管她并非密码专家，甚至对这个相当复杂的领域一无所知，但是她每次出访柏林回来

后，总能从波兰秘密情报局那里获得德国国防军密码系统的索引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情报。当时英国情报局的官员认为，在辛西娅所提供的情报中，有一些是英国已经掌握的，但这并非毫无价值，它可以用来证实已获悉的情报的真伪；而她所获得的新情报往往是极为重要的。

正式授予她“辛西娅”的代号

辛西娅的成功引起了英国情报部门安全协调局大头目威廉·斯蒂芬森的注意。他毫不犹豫地断定，辛西娅是一个有价值的、可胜任更重要工作的业余间谍。斯蒂芬森本人是电子学和密码学的专家，当年正是因为他预见到欧洲大陆不久将会沦陷，英德之战不可避免，才建议英国在美国纽约建立了情报和反间谍工作的中心——安全协调局。

然而奇怪的是，斯蒂芬森当时并没有马上吸收辛西娅加入英国的情报机关。因为在斯蒂芬森看来，一个多才多艺的业余间谍比职业间谍会表现得更为出色。

但随着辛西娅在波兰的表现越来越出色，英国情

报局不得不考虑将她派到更大的用场上去。于是他们就编出一套谎言，好让辛西娅既能顺理成章地离开波兰，又不会让人怀疑她是在为英国人工作。谎言很快就在华沙流传开来，说辛西娅有向纳粹外交官传递情报之嫌，她的情报是通过波兰外长的机要副官传递给德国人的。由于这位机要副官当时正在寻求与希特勒达成合作的协议，所以这一谎话很快就被华沙人接受了。英国外交部立即决定，必须调派阿瑟·帕克和辛西娅离开华沙。

辛西娅的丈夫阿瑟·帕克被英国外交部派到智利去工作，于是辛西娅随丈夫离开了华沙。

当时智利是一个受德国影响很大的国家。英国情报局认为，辛西娅凭借天才的间谍才能，以及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在那里一定能大建奇功。但是斯蒂芬森却另有安排——他打算让辛西娅先在智利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然后再把她派到她出生的美国去，以便更好地发挥她的外交才能。他认为如果战争爆发，美国开始一定会保持“中立”，那么轴心国的间谍就会云集华盛顿。斯蒂芬森认为，到那时候，辛西娅将在美国大显身手。

所以辛西娅和她的丈夫帕克一到智利，斯蒂芬森就安排让她做一名自由记者，然后再把她派往美国，并且用她姑娘时的名字在那里生活；同时还要让人们都知道，辛西娅已经同她的外交官丈夫分手了，她是单身在华盛顿的。

这是辛西娅第二次来智利了。第一次是在七八年前她与帕克新婚不久时来过这里。这一次到智利，辛西娅已是一位有着丰富经历的社交老手，同时这次智利之行的最终结果，将是她与丈夫帕克的彻底分离。

辛西娅和丈夫帕克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安顿下来以后，就按照斯蒂芬森的安排，忙着为当地的报刊撰写文章，开始以一个自由记者的身份进行活动。没过多久，德国入侵波兰，辛西娅在报纸上撰文批评纳粹德国的侵略行径，而且言辞激烈，一派正气。在智利这样一个亲纳粹气氛很浓的国家里，辛西娅这种公开指责纳粹偏袒同盟国的做法马上引起了智利官方的强烈不满，就连英国驻圣地亚哥那些胆小怕事的大使官员，也对辛西娅的行为极为恼火。

此时，斯蒂芬森已经到了纽约，全面负责谍报工作。在华盛顿，特工人员云集，仿佛成了各国间谍活

动的大都会。斯蒂芬森认为，辛西娅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了。于是辛西娅被迅速召到纽约，并被正式吸收加入了英国安全协调局。

从此，一个代号为“辛西娅”的女间谍就频频活跃于华盛顿和纽约之间，西方谍报史上那个富有诗意和传奇色彩的名字“辛西娅”而由此出现了。英国安全协调局为她在纽约上流社会住宅区乔治敦区租了一栋两层的小楼，这里后来成了辛西娅诱捕受骗者的桃色陷阱。

1940年至1941年冬，安全协调局指派辛西娅完成的首要任务，就是获取意大利海军的军用密码。因此，第一个被诱入这座桃色陷阱的男人就是意大利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海军武官艾伯托·莱斯上将。

几年前，辛西娅与艾伯托·莱斯上将在欧洲就有过一面之交。这一次故友相逢，要进一步交往并不困难。辛西娅这次受命要搞到意大利海军密码，莱斯就成了她的最佳人选。当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莱斯这个身居高位的中年男子，虽然早已有了家室，并且有很多子女，但早已厌倦了自己的家庭，总想找个外遇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同时他对海军武官这份

工作的日常琐事已感到很不厌烦了，每当他被工作弄得疲惫不堪时，总想找个情人放松放松。辛西娅的到来正适得其时，莱斯很快拜倒在辛西娅的石榴裙下，欣然投入辛西娅布下的温情罗网之中。

辛西娅知道如何利用一个男人的感情及其敏感区。在她看来，这就是一种床第和头脑之间的游戏。当然，这还要因人而异，对某些男人先用温情，然后再猛攻其头脑；而对另一些男人，顺序则相反。莱斯属于第一种情形，这就比较容易完成了。同时，莱斯当时对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结成一伙，本来就持有异议，因此当辛西娅向他暗示自己是在为美国情报局服务时，他并没有特别吃惊，而且很感兴趣，于是很快就被说服了，愿意同她合作，马上将意大利海军密码本以及电文密码图表全都交给了辛西娅。诚然，这是一种极为冒险的战术，若一枪不中，或者没有看准，祸患无穷。但是辛西娅就是这么幸运，她不仅顺利地说服了这位意大利海军军官，而且毫不费力地从他那里搞到了大量的意大利海军的军事机密。

辛西娅的这一成功很快带来了惊人的效果。1941年3月28日，英国皇家海军凭借这一情报，成功破译了

地中海东部意大利海军的全部密码，在希腊沿海的马塔潘角附近将意大利的“阜姆”号、“波拉”号和“扎拉”号等巡洋舰全部击沉。按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这一仗在此关键时刻清除了轴心国对地中海东部英国制海权的一切挑战。”

由于意大利海军的失败，这位意大利海军军官莱斯可以为辛西娅提供的情报已经不多了；再说，如果他继续留在华盛顿的话，今后在许多方面都会给辛西娅招致危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辛西娅正是利用莱斯给她传递的情报使莱斯被驱逐出华盛顿的。

莱斯曾告诉过辛西娅关于意大利和德国海军去美国港口破坏船只的联合行动计划。英国情报局收到这条情报后转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马上通报国务院，很快，这位海军上将就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被逐出美国，回到了罗马。

莱斯临走时，辛西娅还是赶到码头向他吻别；不过在吻别的同时，辛西娅并没有忘记向莱斯打听一件事，那就是在他离开之后，还有可能继续为辛西娅提供重要情报的另一些意大利官员的住址。莱斯回到意大利后，仍然渴望他的祖国能从纳粹德国的桎梏中摆

脱出来，并为此而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

英国安全协调局对辛西娅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斯蒂芬森决定给辛西娅安排另一项重要的任务：获取法国维希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密码。法国政府1940年6月向希特勒德国投降后，组成了维希傀儡政府，站到法西斯的立场上去了，英国应该对这个法国傀儡政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但是，斯蒂芬森清楚地知道，比起勾引一个反对纳粹的意大利海军军官来说，这个冒险计划要困难得多。为此，斯蒂芬森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决定：“在从事这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之前，最好亲自去看一看辛西娅，以便面授机宜”——在此之前，斯蒂芬森每一次都是通过报告和中间人与辛西娅联系，自己同这样一位有突出贡献的下属还从未谋面。

1941年5月的一天，一个自称“威廉斯”的人来到辛西娅在华盛顿的住处。辛西娅打量着这个口称“从纽约办事处来”的先生，只见此人瘦小而精干，说话中略带柔和的加拿大口音。此前，辛西娅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威廉斯先生”，她到纽约去也只是向另外两位英国联络人汇报。因此辛西娅一开始便小心翼翼地提防

着，不知“威廉斯先生”是个佯装英国安全协调局工作人员的轴心国特务，还是个试图查明辛西娅真实身份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她小心地与之周旋，拐弯抹角地窥探来人的身份。

来到了一家酒馆，他们一面呷着鸡尾酒，一面以审视的目光探测对方，一场无形的较量开始了。斯蒂芬森一直在寻找她的弱点，考验着她当特工人员的能耐和潜力；而辛西娅则拐弯抹角地窥探他的来头。显然，两人都为对方耍的把戏感到满意。最后，辛西娅根据他的言谈举止认定，这个“威廉斯先生”就是英国安全协调局的首脑，也是自己的上司斯蒂芬森；而斯蒂芬森也同样相信，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辛西娅确实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特工人员。她的反应机敏，是一个难得的间谍，于是就不再隐瞒身份而直接向她下达新的命令。

“是的，不用介绍了，你已知道我就是威廉·斯蒂芬森。眼下，法国维希政府正在策动希特勒扩大战争，并极力阻挠美国参战。所以我们需要得到维希法国大使馆与欧洲之间的一切来往函电、私人信件和明码电报。”

斯蒂芬森有意把问题提得广泛一些，不作太具体的阐述，以便对辛西娅的反应作出评价。这是一个职业谍报头子初次会见他的特工时所惯用的一种测试手段。斯蒂芬森早已从报告中知道辛西娅的高明了，而现在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看，辛西娅究竟高明到什么程度。

“了解当前的形势是重要的，”斯蒂芬森告诉她，“眼下，法国维希政府对大不列颠已谈不到还有什么感情了。且不问他们的动机如何，他们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已饱尝故土被希特勒德国占领是什么滋味，他们希望英国也尝尝这种滋味。法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正不顾一切地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拼命。有一股按照盖世太保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秘密警察势力在华盛顿活动，它的主要目标是防止美国参战，方法是宣传、破坏甚至暗杀。特别要当心暗杀，因为你可能成为暗杀的目标。”

斯蒂芬森向辛西娅吩咐说：“我不得不重复一遍，我们需要得到维希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和欧洲之间来往的全部邮件——函电、私人信件和明码电报。请注意，要的是全部。这是最低要求。”接着，斯蒂芬森又

向她说明，英国安全协调局迫切需要的是解读维希密码的线索，但没有明确地向辛西娅指出她得马上完成。斯蒂芬森已经感觉到辛西娅是那种精明、充满幻想而又富有热情的女人，对她所需要完成的任务，只要说出一点就够了。她的直觉完全可以使她能够举一反三，把其余的全都猜出来。况且，当时对她提出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的要求也是不现实的。

辛西娅在对付异性的问题上，一直有着最大的自信心，然而，这一任务是要求她打入维希法国大使馆并窃取其机密，所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维希法国大使馆有秘密警察组织，对任何一个可疑分子，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干掉。当时以埃德加·胡佛为首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并不掌握她的情况，因此对她难以进行保护；况且，人们都知道胡佛对英国人并不友好。

尽管危险很大，辛西娅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对于她来说，冒险是一种刺激，风险越大，越会激起她尝试的愿望。

查尔斯·布鲁斯成了她主攻的目标

辛西娅并不是一个仅凭自己的姿色周旋于各国大

使馆之间充当临时间谍的女人。在调查和研究了法国维希大使馆的人员情况后，她便明智地作出决定，不能从众目睽睽的华盛顿着手，而应从纽约着手，因为维希法国人集中居住在纽约的比埃尔旅馆里。

开始时，辛西娅时常去看望她在智利结识的那位女友，另外还有一位当了维希法国商人太太的英国妇女。她的那位女友已经嫁给了一名德国伯爵。辛西娅希望能从她们那里了解一些关于维希法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官员的情况。果然这两个女人告诉辛西娅说，那位大使加斯顿·亨利·海耶有些愚蠢可笑，正在和一位已婚的妇女私通，而且他也不喜欢美国的政界人士。辛西娅对这些男女之事并不怎么感兴趣，也知道这两个女人不能提供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就想以采访为借口，自己亲自去摸摸底细，于是就问她们：“知道谁在管理新闻事务吗？”

“他呀，一个让人着魔的人，”智利女友告诉她，“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布鲁斯，过去是法国海军航空部队歼击机的驾驶员。真怪，他怎么会到华盛顿来做这一种完全不是他本行的工作？不过他很喜欢英国。在战争初期，他曾是英法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与英国

皇家空军的军官们有过良好的关系。作为一位现役军官，他对维希法国是忠诚的，但他一点也不喜欢德国人。”

听了女友的这番话以后，辛西娅暗自决定，在维希法国大使馆里，她主攻目标应是查尔斯·布鲁斯。然而她遵循的原则是：目标越高，就愈被重视。她决定以假装采访大使为突破口。

毫无疑问，这一任务对她的机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她先与纽约办事处核实了她从闲聊中得到的关于布鲁斯的情况，结果完全证实了在法国沦陷前一段时期，布鲁斯确实与英国皇家空军一些军官相处得很好。这一消息给了辛西娅极大的鼓励。

辛西娅以美国自由记者的身份要求采访法国大使的申请没费多大周折就得到了答复。大使馆来电话说，大使同意会见美国女记者，但是没有安排具体采访的时间。辛西娅就只好公事公办地同主管新闻事务的查尔斯·布鲁斯联系。她倒真想看看女友说的那位查尔斯·布鲁斯到底是一个怎样让人着魔的人。遗憾的是她第一次未能同布鲁斯联系上。尽管接线员说他可以转告她的话，而辛西娅却坚持等布鲁斯来了以后，她

再亲自打电话和他本人联系。第二天，辛西娅终于同查尔斯·布鲁斯通上话了，并约定了采访的时间。

那一天辛西娅精心打扮一番后，按时来到了法国大使馆。接待她的就是查尔斯·布鲁斯。布鲁斯四十来岁，英俊潇洒。而辛西娅的外貌也不由得让他从心底里感到叹服。眼前这位三十来岁的美女正是成熟的黄金期，一身绿色的套装和她绿色的眼睛搭配得是那样的和谐自然。

布鲁斯把辛西娅请到客厅里坐下，在等待大使到来之前两人开始闲聊。布鲁斯自我介绍了在法国海军服役时获得的荣誉，还无意有意地说出他有过三次婚姻。辛西娅一听立刻暗自高兴起来，久经情场的她当然明白这无疑是布鲁斯向她发出的信号。这时她又听到布鲁斯在关切地问自己：“英国正是交战国，你为什么还拿着英国护照呢？”

辛西娅说：“因为我的丈夫是英国人。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分手了，我已是一个独立的女人了。我去过波兰、西班牙和智利等一些国家，我对这些国家都比对英国有好感。”

布鲁斯听后也相当高兴，就进一步建议辛西娅要

装作一个超脱的世界主义者，他说“这是同大使打交道的最好办法”。不过在会谈时，布鲁斯对战事守口如瓶，他在谈到战争和政治问题时总是很谨慎。后来在辛西娅采访大使时，布鲁斯也在一旁陪同，不断地向她点头，表示赞许她态度的得体。采访结束后，布鲁斯送到门口，吻着她的手说道：“您说想帮助法国，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不过我需要你的合作。”辛西娅深情地盯着布鲁斯。她知道布鲁斯过去对英国人尚有好感，但自从英国攻击了维希法国的舰队后，就对英国怀有敌意，所以特意说起帕克的不仁不义，说起失散的儿子，带着感伤的样子，从而赢得布鲁斯的同情。最后她又说，人的悲剧比起国家的命运算不得什么，又表现出对英国、法国都不偏不倚的态度。

事后辛西娅觉得，自己的这番应酬是成功的，但也并不完全是装出来的。因为通过第一次接触，辛西娅也不得不承认，那位女友对布鲁斯的评价并非言过其实，眼前的这个男人的确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她需要等待布鲁斯进一步的反应。

第二天，布鲁斯上尉送来了一束红玫瑰，并邀请

辛西娅共进午餐。布鲁斯的这种举动完全在辛西娅的意料之中，所以她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在饭店里，布鲁斯看到有一个维希秘密警察正坐在桌子旁，他就向辛西娅透露说，他们的交往会带来危险，这号人总是在盯着他们，给他们找麻烦，因为他们不喜欢法国人同美国人交往。接下来，布鲁斯一边吃饭，一边还坦率地同辛西娅谈起了自己当前的处境。

布鲁斯说，当前由于战争的原因，维希政府决定厉行节约，削减开支，减少驻外人员。大使曾经派人通知过布鲁斯，说他必须马上返回法国。但是布鲁斯压根儿就不愿意这么做。他抗议说，要他回去就意味着又要从事他所讨厌的爬格子的工作，或者更糟糕的，就是跟着轮船从这个码头跑到另一个码头，整天无所事事。大使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是他所能提出的帮助布鲁斯的唯一方案就是，如果布鲁斯能够接受只拿一半薪水的条件，那么他就可以让布鲁斯继续留在使馆里工作，现实就是这样。

辛西娅对布鲁斯的这番话深有感触，她知道布鲁斯的现状非常不妙。领着一半的薪水，生活在华盛顿这样一个物价高昂的都会，还要养一个妻子，对他来

说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他酷好应酬、交际，享受上层社会的生活，微薄的薪金怎么应付得了？于是她开始同情起他来，甚至想到了自己是不是嫁给他。

短短几个小时后，布鲁斯就被带到了辛西娅的住处。布鲁斯迫不及待，辛西娅也不推辞。

他们开始了热恋。

布鲁斯真诚地对辛西娅说，希望同她正式结为伉俪。布鲁斯说，他所能想到的唯一周全的方案，就是要求辛西娅与他一起回法国。至少在维希政府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条件下，他们还可以勉强应付。

辛西娅答应布鲁斯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考虑，但同时又叫他不要对此事抱有太大的希望。对于辛西娅来说，这一次不仅仅是间谍工作的需要，也是一种真正的感情的享受。布鲁斯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机智、多情、聪明而又幽默，确实是个惹人喜爱的好伴侣。在经历了同帕克的那段不愉快的婚姻之后，辛西娅没有想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激情又被眼前这个法国男人给点燃了。她当然不希望布鲁斯回到法国去，希望他能够留在美国。她知道这当然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原因。

后来，辛西娅真的将此事报告了她的联系人。她的联系人一听，认为辛西娅之所以不希望布鲁斯返回法国，是因为她和他的个人关系陷得太深了，这是谍报人员所不允许的。辛西娅则愤怒地回答说，她当然极爱布鲁斯，但她之所以替布鲁斯着想，是因为布鲁斯是维希大使馆内最有可能向英国安全协调局提供所需情报的人。

辛西娅的这番话无懈可击。于是这位联系人就提出，如果布鲁斯同意领取一半的薪水而留在华盛顿工作，那就趁机把他弄到英国这边来。如果真是那样，就得给辛西娅准备一些钱，让她向布鲁斯提供帮助。对这一方法，辛西娅很不赞成，因为她知道布鲁斯不是那种靠女人维持生活的男人。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做法。

辛西娅去请示安全协调局纽约办事处的联系人霍华德。霍华德认为，布鲁斯如此热恋辛西娅，倒是给英国情报协调局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那就是把他弄到英国这方面来，由协调局给他补足薪水。事情虽然很冒险，但也只有这一个办法。辛西娅应该向布鲁斯挑明自己是个间谍，效劳于中立的美国而不是英

国。辛西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决定试一试。

听了辛西娅的坦白后布鲁斯很生气。他对辛西娅大声说：“你简直是发疯了，你一个漂亮的女人去为英国干这种冒险的事，难道想让法国秘密警察把你漂亮的身体扔进波托马克河吗？”

辛西娅动情地抚慰着自尊心很强的布鲁斯。她说：“查尔斯，我知道你是个爱国者，但是我们要在一起，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我起初是为了情报工作接近你，但我们第一次接触时，我就爱上了你，的的确确爱上了你。你厌恶英国人攻击了法国舰队，实际上我是在给美国人服务，你知道美国是我的祖国，我效劳于中立的美国而不是英国……”

爱情战胜了一切。从此以后，布鲁斯成了辛西娅最忠实的情报提供者。凡是法国大使馆一切来往函电文件他都将抄件送给辛西娅。还有使馆的一切活动，比如大使会见了谁，海军武官和陆军武官在做什么等等，都及时向辛西娅报告。这一切对英国来说真是无价之宝。后来，为防止两人的频繁往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辛西娅奉命搬到了沃德曼·帕克旅馆，在那里租了一套房间。布鲁斯和他的全家也住在这里。辛西娅离

布鲁斯的第三任太太近在咫尺，表面上看来像是一个危险的举动，然而这却方便他们在没有任何外界监视的条件下频繁接触，可以更加稳妥地见面。

然而有些时候，布鲁斯也在思考这种行为算不算卖国？自己要不要改变主意？在他思想深处，那个英国攻击法国舰队的事件仍然使他怒火中烧。正在布鲁斯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一天法国大使交给了他一封信，这是法国海军司令部达尔朗上将发来的一份通知的副本，要求他搜集在美国船坞停泊待修的英国军舰和商船的情报。谁都知道，达尔朗与纳粹德国打得火热，很明显他是要把这些情报交给德国海军情报局。这件事一下子激怒了布鲁斯，他生气地对大使说：“不行！替纳粹分子搞情报，这不是法国人干的事儿！”

当天晚上，布鲁斯就把这份通知拿给了辛西娅看。后来，布鲁斯又把海军武官发给达尔朗的几份复电的副本交给了她。复电中指出：“军舰‘击退’号在费城，巡洋舰‘马来西亚’号在纽约，航空母舰‘辉煌’号在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检修……”德国海军对这份电文所作的决定是：“对这些军舰，或者就地炸毁，或者先进行监视，等到其出航后让德国潜水艇伺机而动。”总之要

把这些英国皇家军舰在短短的几星期之内全部摧毁。英国安全协调局得到这份情报后立即对舰队采取了保护措施，否则那些军舰就会成为德国人攻击的靶子。

当辛西娅问他为什么会给她这一情报时，布鲁斯面色严峻地说：“法国人没有给德国人当密探的义务。”从此以后，他成了辛西娅最忠实、最勤奋的情报提供者。凡是辛西娅可能感兴趣的东西，他都能提供。除了口头提供的情报外，他还经常给辛西娅写书面报告。

密码改变了二战的进程

1942年初，英国海军情报局急于获取维希法国海军的密码，给情报人员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于是辛西娅被召到了纽约。她的上司向她明确地提出了英国安全协调局的要求，要她想尽一切办法搞到这种密码。要是换了别人，肯定都会反驳说英国安全协调局的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绝对不可能办到，而辛西娅却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我喜欢干不可能的事。”她愉快地接受了新任务。

一回到华盛顿，辛西娅就立即向布鲁斯提出了这

个要求。但是布鲁斯一听却气得肚子都快炸了。他说辛西娅的老板简直是个疯子，而辛西娅自己也比疯子好不了多少。“难道你不了解密码本是由沉甸甸的好几册组成的，而且总是密藏在机要室的保险柜里？难道你不了解只有大使和首席译电员才知道保险柜的暗码？”布鲁斯狂吼道。

辛西娅明白，她必须适可而止，不能让布鲁斯在已经是最大限度尽职尽责的情况下又让他为难，以致采取放弃的态度。她鼓励他说，自从她和她的外交官丈夫在智利的时候起，她就对有关大使馆机要室的一切情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她说她有时还帮忙把电报译成密码或把密码译成电报。辛西娅及时地提醒布鲁斯说：“如果你不能搞到这种东西，那么首席译电员如何？”

“他叫贝诺瓦，是一个倔老头子。”布鲁斯回答说，“谁都拿他没有办法。再说，他就要退休了。”

“那么，谁将接替他的职务？”辛西娅问。

布鲁斯做了一个鬼脸，“他的继承人是一个职业外交家，是一个机敏异常而又诡计多端的人。”

于是辛西娅就以她特有的方式开始行动。她贸然

前去拜访了贝诺瓦，发现贝诺瓦确实如布鲁斯所说，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家伙，对维希政府忠心耿耿。何况贝诺瓦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辛西娅即使是貌若天仙，此时对他来说也已经是无动于衷了。所以这一次拜访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于是辛西娅就把目标对准不久后将接替贝诺瓦的继任人德·L. 伯爵。

她了解到，伯爵的妻子和孩子住在华盛顿市郊，他自己在市内另有一套公寓。辛西娅还发现，他的妻子当时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凭以往的经验辛西娅知道，一个做丈夫的在这种时候是最有懈可击的，加上他单独住在一套公寓里，就更容易被攻克。尽管有了上次对贝诺瓦的失败，是不允许再有这次行动的，但是辛西娅却是个爱冒险的人，这种敢作敢为激发着她的勇气。

辛西娅甚至没有与伯爵预约，就径直去按他房间的铃说是有急事要见他。德·L. 伯爵接见了她。尽管战争期间，官方总是警告外交官们要采取充分防范措施，谨防间谍，这足以使伯爵心存戒备，对辛西娅的突然来访抱有怀疑，但他还是欢迎她的到来，并说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居住。辛西娅就坐在他面前，这是一

个典型的一对一的场面，两个颇具诱惑力的行家里手面对面碰在一起，旗鼓相当。辛西娅思想上早有准备，如果这位即将上任的机要员给了她所需要的情报，她就可以陪他上床；机要员则认为，如果能在艳福上稳妥地捞点外快就捞，但决不愿因此毁损其外交官的前程。

辛西娅还是决定采取铤而走险的策略。她开始施展自己的本领，试图说服德·L. 伯爵。她明白地告诉对方自己是为美国工作的，她也热爱法国，希望看到法国恢复完全的独立，为此她需要海军密码。只要得到这个密码，那么他就能得到相应的酬金，她会设法使他为此而得到经济的报酬；若密码索引每次有所更改他都能通知她，还可以定期给他预付的酬金。她早就打听到了，这位德·L. 伯爵的薪水并不高。同时辛西娅还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只要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他“要什么都行”。虽然这个德·L. 伯爵也渴望得到辛西娅动人的身子，但考虑到自己的前程，还是婉转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这一次失败，给辛西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受到了一次强烈的性虐待一样。因为这位法国外交官

公开对她说：“做爱不过是游戏罢了。人们在做爱的时候就像在下棋一样，虽然相当专注，但不过是为棋盘上得以多吃掉一个棋子高兴高兴而已。”原来在德·L. 伯爵眼里，这个美丽动人的少妇辛西娅只不过是一个棋子罢了，这让辛西娅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耻辱。

然而第二天，德·L. 伯爵却突然来到辛西娅的住处。一向自信的辛西娅认为伯爵已改变了主意，便请他进了自己的房间。当伯爵答应把密码本借给她以后，她就毫不犹豫地同他上床了，结结实实地让自己为他做了一回棋子。然而辛西娅哪里知道，自己犯了一次天大的错误——因为德·L. 伯爵在事后声明：“亲爱的，你的行动太让我开心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此时此刻。至于密码本，我改变了主意……而且我觉得我有责任向我国大使报告。”

“卑鄙！”辛西娅愤怒地骂道。

德·L. 伯爵一边嬉皮笑脸地重复着“卑鄙、卑鄙”，一边头也不回得意地走了。更糟糕的是，伯爵走出房间时，恰好被布鲁斯看到了，布鲁斯气得简直发了疯。他走进房间，见辛西娅还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就狠狠地打了辛西娅几个耳光。他不能忍受自己的情

人被别人占了便宜，而且他知道还有更大的危险。布鲁斯无不担忧地对辛西娅说：“他刚才已经看到我了，那个混蛋！如果他向大使报告了，我俩都完了。你将会被维希的秘密警察扔进波托马克河，我也同样。”

“那么，你走吧。”羞愧的辛西娅抽泣着。

然而，不久他们又平静了下来，布鲁斯把辛西娅抱在怀里，深情地吻个不停。这时辛西娅也开始埋怨布鲁斯没有答应自己。她说如果他先答应了帮忙，这样的事情本来是不会发生的。布鲁斯也表示道歉与和解。当冷静下来后，两人都意识到彼此都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布鲁斯毫不怀疑德·L. 伯爵肯定会向大使告发辛西娅，并竭力踏着他向上爬。因此他警告辛西娅，她正处在被维希政府的秘密警察暗杀的危险中，而且他自己也可能面临同样的灾难。辛西娅的危险还在于她很可能已经危害了整个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工作，不适宜再去打维希法国使馆的主意了。于是两个人开始商量，如果德·L. 伯爵真的把这件事报告了大使，该如何去应付。

第二天，大使果然对布鲁斯说：“德·L. 伯爵向我报告说，那个美国记者贝蒂·索普曾经引诱他出卖机密，

并答应可以给他一大笔酬金。你与贝蒂·索普很熟，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布鲁斯显得很冷静，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说，辛西娅是一个颇有声望的美国记者，出生于一个良好的家庭，父亲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在华盛顿很有影响。他还提醒大使，既然现在美国已不再是中立国了，要是在这个时候去捅这个马蜂窝，恐怕不是审慎之策。

正当大使在沉思之时，布鲁斯又说：“大使先生，你应该清楚德·L. 伯爵是一个惯于寻花问柳的人，他在华盛顿另住一套公寓的用途不是很明显吗？他一定是受到了辛西娅的拒绝，才编出了这种故事予以报复。您应该知道德·L. 伯爵是个惯于造谣中伤的人，他还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您与德·瑞朗男爵夫人……这个家伙是个臭名昭著的流言蜚语传播者，他的饶舌会损害整个法国的利益的。”

大使听了布鲁斯的这番话，既吃惊又尴尬，他本来就担心自己与德·瑞朗男爵夫人私通的事被外人知道，没想到竟然有人在外面散布这种消息。大使这时对布鲁斯不但不再深究，反而心存感激，第二天就把

准备接替贝诺瓦的德·L. 伯爵调离了机要室。从此，布鲁斯倒成了大使的心腹。

赶走德·L. 伯爵之后，辛西娅和布鲁斯虽然摆脱了他们眼前最大的威胁，但是，如何把密码本弄到手依然是个问题。经过进一步的商议，两人决定，唯一的办法是夜盗机要室。辛西娅把这个主意汇报给了纽约，并给他们绘制了一张大使馆详图，图中特别介绍了机要室的位置和结构。值得庆幸的是，机要室位于使馆大楼的底层，房间有一扇窗子，窗子外面是长满树木的草坪。

对于辛西娅的建议，英国安全协调局的最初反应是不同意，他们认为偷盗大使馆是一个秘密情报组织发疯了的典型表现。但是却有两个原因改变了斯蒂芬森的看法：第一，首相丘吉尔在伦敦已等得焦急难耐，不断来电催问，密码在哪？第二，既然布鲁斯现在已成了辛西娅心甘情愿的同伙，有他做大使馆方面的内应，这事看起来确实存在一线成功的希望。当然，布鲁斯只能做个内线或者在执行计划中充当一下诱饵，这一计划的执行，还需要一个能打开保险柜的真正的窃贼。

到哪去找一个窃贼高手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秘密情报局和陆军总部把一批在全欧洲技术高超的撬保险柜窃贼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分别收编后为自己所用。这些窃贼高手都在哪儿？好在英国安全协调局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已进行合作，或许可以从美国战略情报局那里找到解决的办法。

在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帮助下，斯蒂芬森终于从纽约的一所监狱里找到了一个开保险柜的高手，这个绰号叫“窃贼乔治亚”的人是加拿大人，他答应撬开大使馆的保险柜，但条件是完成工作后立即释放他。

“窃贼乔治亚”是冷静的化身，他显然为他的特异技能感到非常骄傲。来到华盛顿和辛西娅接上头之后，他对辛西娅说，需要进一步了解保险柜和机要室的情况。于是，辛西娅就说服布鲁斯，让他找个借口闯入机要室看看，并把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记在心里。恰好那个老贝诺瓦马上就要退休了，因此布鲁斯就借口同他聊聊，以示告别。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老贝诺瓦仍然坚持，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进入机要室。“你知道关于保密原则的规定的，布鲁斯先

生。你可不能进来啊！”贝诺瓦说。

“但是，这是特殊情况呀，贝诺瓦先生，我总不可能站在走廊里跟你道别呀。”布鲁斯回答说。

布鲁斯被默许可以进入室内，但要求不要在里面逗留时间太长。

布鲁斯只有几分钟时间去观察那只保险柜，去了解它的位置、编码器、报警器什么的。但是布鲁斯并不是干这种事的行家里手，后来当那位加拿大窃贼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才认识到有许多必须要了解的情况他却一无所知。让辛西娅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窃贼乔治亚”不仅有像职业钢琴家那样灵巧的双手，而且还有一种仅凭着盘问就能勾勒出一个保险柜全图的能力。

“给我画一张这个保险柜的草图。”“窃贼乔治亚”对布鲁斯说。

布鲁斯拿出一枝铅笔立即照办。他在草图上把窃贼所问的每点都标了出来，不时地停下来回忆他在机要室里看到的情况。但是，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毕竟太短了，推动锁簧的铰链在哪儿？把手在哪儿？转盘在哪儿？他都回答不上。但是最后这个高明的窃贼还是据此得出了结论：“这是一个莫斯勒牌保险柜，锁上

安有咔嗒咔嗒作响的转向器，大约有4个转向轮。”他估计，他可以在55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这个盗贼带进大使馆。大使馆的保密室从来都是戒备森严的，尤其是在晚上。那些保卫人员腰间都别着手枪，在大使馆来回不停地巡视。不过据布鲁斯了解，大使馆晚上值勤的保卫人员仅有一位。于是布鲁斯就同辛西娅拟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让布鲁斯对保卫人员谎称有一大堆积压下来的工作要干，因此必须在大使馆内加几个夜班，还可能待得很晚。布鲁斯要保卫人员对此事保守秘密，并且显得有些诡秘地对他说：“有一位女朋友会来这里与我做伴……我总不能把她带到旅馆去，免得我夫人怀疑。你明白吗？”

那个保卫人员恍然大悟地笑了。他觉得布鲁斯上尉能把这样的秘密都告诉自己，那是对自己的信任，甚至还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当然，布鲁斯也还没有忘记给了他一笔可观的小费。这样，这个夜间值班员就彻底被收买了。

在后来的几个夜晚，辛西娅都同布鲁斯去大使馆，这位值勤的保卫人员每天晚上都看到辛西娅与布

鲁斯双双进出大使馆，就习以为常了。辛西娅与布鲁斯进去之后就守候在办公室里，仔细地倾听外面的动静。他们一边对着表，一边注意值班员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值班员巡逻很有规律，每走一圈总是60分钟左右。他们想到那个窃贼说过，打开这样一只保险柜需要55分钟，这样说来就只有5分钟的余地，而且还不能有任何意外。这么短的时间实在是太悬了。

“必须让他睡过去。”辛西娅说，“如果让他睡上几个小时就安全了。”他们通过英国安全协调局，找到了一种最新的催眠药物戊巴比妥。一天晚上，辛西娅和布鲁斯把一瓶香槟酒带到了大使馆。他们把时间安排得很准，当那位值勤的保卫人员巡视到他们那儿时，正好看见他俩在喝香槟酒。布鲁斯对值班员说：“今天是我与贝蒂认识一周年纪念日。来，同我们一起干一杯，庆贺庆贺……”

“上尉，值班时间是绝对不能喝酒的……”

“就请你喝这一杯。”

辛西娅热情地递了一杯香槟酒过去，悄悄在里面放了些戊巴比妥。值班员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很快就昏睡不醒了。布鲁斯赶快把那个窃贼带进大使馆开始

工作。



这个老式的莫斯勒牌保险柜很坚固，开保险柜花了很长的时间。布鲁斯和辛西娅都捏了一把汗，生怕保险柜还没有打开保卫人员就醒来了，因为他们知道那种戊巴比妥的效力只能持续5个小时。等到保险柜最终被打开的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去对付那些密码本了。窃贼就把打开保险柜的数字暗码告诉了辛西娅，并指点她怎样重新安上机要室的门锁，让她在第二天晚上去单独完成任务，然后就回到纽约去了。下面的事情就要看辛西娅的本事了。

第二天晚上，辛西娅和布鲁斯又走进了大使馆。幸运的是，值班员第二天并未提及昨天晚上的事情。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突然睡了那么长的时间。当然现在不能再用催眠药去麻醉他了，因为今天晚上只要几分钟就能完事。辛西娅进去后，马上按照那个窃贼

教给的方法拨动数字暗码，但奇怪的是保险柜并没有打开。难道有人改动了暗码？

辛西娅又试了几次，毫无结果，只好和布鲁斯出来了。天一亮他们马上乘飞机赶到了纽约，找到了那个窃贼。在那里，那个加拿大窃贼又教了她一番，辛西娅还在和大使馆一样的保险柜上进行了多次练习，但等到她回到华盛顿在大使馆里一试，又失败了。看来保险柜的暗码已经改动了。

眼看密码本就到手了，现在却一无所获。英国安全协调局的人都急坏了。他们终于明白，辛西娅尽管是个出色的间谍，但毕竟不是个盗窃高手，看来只有再让那个加拿大窃贼亲自去打开保险柜，否则是拿不到那个密码本的。

那么，怎样才能值班员的眼皮底下，让那个窃贼再一次潜入大使馆呢？一天晚上，辛西娅和布鲁斯又走进了大使馆。当他们来到大使馆的时候，发现值班员仍然在不停地巡走。这时，辛西娅突然想出了一个惊人的主意——黑暗中，她和布鲁斯脱得一丝不挂，两人一块躺在地毯上，互相紧紧地扭抱在一起。值班员巡逻折回来了，到处扫视的手电光无意之中照

到地毯上两个洁白的胴体，不由得让手中的手电光多停了几秒钟，然后就慌慌张张地移开了。他当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就连声道歉，赶紧退了回去，再也不来打搅他们。于是他们两人就乘机把那个加拿大窃贼带进了大使馆。

那个窃贼也真有神功，仅仅只用几秒钟就打开了保险柜。辛西娅和布鲁斯马上通过那扇窗子，把密码本传给隐蔽在花园中接应的英国安全协调局的间谍逐册逐页进行拍照。

此时此刻，辛西娅感到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偷盗活动终于结束了，那一大摞厚厚的密码本又被放回到保险柜里。这时，那些间谍们已经不露痕迹地消失在夜幕之中。这是辛西娅一生中感到最自豪的时刻。

胶卷冲洗出来后，被带到纽约，又从纽约送往英国秘密情报局设在布莱奇雷庄园的密码破译中心。在那里，英国人用它很快就破译了一切敌国的密码。维希法国的这个密码本对英国以及美国等同盟国来说，都是无价之宝。当时，盟军正在实施一项在北非登陆的计划，正是这些影印出来的密码本使英美军队对在

土伦、卡萨布兰卡和亚历山大的维希法国舰队各分遣支队的分布、调动等战略部署情况了如指掌。

1942年6月，盟军在征服了马达加斯加之后，着手准备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当年11月，北非登陆成功，盟军几乎没有遇到维希政府军队的任何抵抗。

后来，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一个美国女人又一次挽救了大不列颠。”这个美国女人就是辛西娅。

与大多数间谍不同的是，辛西娅的结局也算“完美”——布鲁斯最终与前妻离婚，并于1946年正式同辛西娅结婚。后来，辛西娅再也没有被派去执行危险的任务，虽然她渴望去做。他们在战后回到了布鲁斯的故乡，住在法国南部佩皮尼扬附近的一座幽静的古城堡。在那里，这一对情人告别了杂乱纷繁的过去，过上了宁静、幸福和没有任何干扰的田园生活，悠然地安度着晚年。

1963年，辛西娅不幸死于癌症。10年之后，布鲁斯也死去了，不过死因不明。据说在辛西娅死后，布鲁斯一直是郁郁寡欢，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也许是当年共同冒险的激情伙伴与爱人已经离去了，没有人

能填补那份空白，布鲁斯情愿早日离开这个世界。

多少年来，西方谍报界专家一致公认，在所有的女间谍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当属辛西娅。在世界间谍史上，辛西娅可以使许多风流艳谍自惭形秽。

辛西娅留给这个世界的名言是——“我酷爱我的美国、英国，后来我也很爱法国。我相信我是一个爱国者。也许我用‘爱情’换取了情报，但我问心无愧。我的工作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人们也是这样说的。在我所遇到的情况面前，我知道对于那些体面的女人来讲可能会退缩的。但我是义无反顾的。我觉得单靠一些‘体面’的办法就无法赢得战争。”

第十二章 不让须眉，一代美女谍海沉浮

“伯爵小姐”艳压群芳，一举夺得“波兰小姐”桂冠，投身谍海成为“邦德女郎”，“一个微笑就足以拉回一支大部队”，被英国首相丘吉尔誉为“最喜爱的女间谍”，最后不幸殒命情场；“印度公主”尽管不是做间谍的料，却能为自由献出30岁的生命；牛津大学毕业后从事情报工作的美女间谍，体现的是女性的另一种潜质……

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

“伯爵小姐”成了“邦德女郎”

在英国的谍报史上，有过许多让人倾慕的美女间

谍，除了有“月亮女神”之称的辛西娅之外，还有一个被誉为“邦德女郎”的美女间谍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

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是与辛西娅同时代的美女间谍。英国“007”系列“间谍小说之父”弗莱明所创作的第一部“007”系列小说《皇家赌场》中的双面女谍琳德，就是以其为原型改编的。

1915年，克里斯蒂娜出生在波兰华沙一个贵族之家，她的父亲是一位体面的伯爵，母亲是一位犹太银行家的女儿。长大成人后的克里斯蒂娜风姿绰约，美艳绝伦，曾在波兰全国选美大赛中艳压群芳，一举夺得“波兰小姐”桂冠。

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后，克里斯蒂娜开始以各种神秘的身份从事间谍工作。她凭借自己的迷人魅力，超群的勇气和智慧，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执行绝密任务，获得了无数价值连城的情报，成为了二战历史上最著名的女间谍之一，也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最喜爱的女间谍”。

在从事间谍活动期间，克里斯蒂娜有过数名情人，包括“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这也是克里斯蒂娜成为著名的“邦德女郎”原型的主要原因。

孩提时代，每年或每两年举行的狩猎比赛是克里斯蒂娜最兴奋的，因为她喜欢父亲起程时身边的那种喧闹和嘈杂。狩猎比赛是在大地主的庄园举行。届时，那些权贵庄园周边的市镇都会举办狂欢的舞会。

正是从父亲那里，克里斯蒂娜继承了深深的种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强烈爱恋。她的父亲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非常了解波兰的历史，并且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教给了女儿。波兰坐落在喀尔巴阡山脉和波罗的海环抱之中，曾多次遭受邻国攻击、占领，甚至一度从欧洲版图上消失。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幸存下来了，因为波兰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结，特别是在受到外来压迫者的威胁或统治时。

在父亲的教诲下，克里斯蒂娜不仅熟悉了祖国的历史，而且成了一名技艺娴熟的女骑手。那时在她的生活中，马厩就是她的精神家园。再也没有什么比坐在马厩里，倾听那些马童和马夫的闲聊更让她开心的了。



“邦德女郎”原型之一克里斯蒂娜



电影中的“邦德女郎”形象

克里斯蒂娜在幸福快乐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克里斯蒂娜很快就被送往

位于波兰西部著名的萨克雷克尔修道院的女子学院读书。这所学校的总部在巴黎，因为培训贵族乡绅家的女子而在全世界享有盛名。

在萨克雷克尔修道院女子学院的时光克里斯蒂娜并不快乐，因为她完全无视这里的规章制度，这让那些善良的修女十分头疼，她们无法驯服这个野性十足的孩子。克里斯蒂娜总喜欢搞一些恶作剧的行为。比如，有位修士在做弥撒时，克里斯蒂娜竟点火烧着了他的法衣。

修道院院长觉得，克里斯蒂娜的这种叛逆精神或许会带坏其他的孩子，于是就向克里斯蒂娜的父母建议，希望他们找另一家更适合伯爵小姐这种热情洋溢的个性的教育机构。就这样，克里斯蒂娜很快被送往另一家管理更加严格的亚齐沃维奇修道院。不幸的是，这时克里斯蒂娜的家族发生了意外，他们的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于是她的父母只好被迫卖掉了庄园，离开故乡。不久，克里斯蒂娜和当地的一位贵族青年查尔斯·格特利希结婚了。

18岁时，克里斯蒂娜虽然已经是一个少妇，但是

仍然非常单纯浪漫。丈夫查尔斯虽然很爱克里斯蒂娜，但他首先是个商人，他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意和钱财。加上克里斯蒂娜和查尔斯的结合本来没有感情基础，所以克里斯蒂娜的这次婚姻很快画上了句号。

和查尔斯的婚姻结束以后，克里斯蒂娜就在考虑将来的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那一次她到扎科帕内去旅游，在一次滑雪时，她从一个非常危险的滑雪坡上飞驰而下失去了控制，眼看就要坠落到旁边一个深不可测的山谷里去。就在这危险的时刻，一位身材魁梧的大个子男人突然出现在面前，伸出手臂搂住了她。这位救命恩人叫乔治·吉齐基。

乔治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富裕家庭。14岁时，乔治和父亲大吵一架，就离家出走了。他登上了开往美洲的轮船，在那里先后做过牛仔和淘金者。后来他成了一名作家，以周游世界的方式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并为自己的作品寻找素材。作家乔治就这样狂热地爱上了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也许是为了消除寂寞，很快就决定嫁给这个并不了解的乔治。1938年11月2日，他们匆匆地举行了婚礼。

当时他们结交了许多朋友，在社交圈里游刃有余。克里斯蒂娜夫妇和驻华沙的外交使团关系也非常友好，这让克里斯蒂娜遇到了很多外交官。有些外交官在克里斯蒂娜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帮了不少忙。克里斯蒂娜开始涉足新闻界，这也为她日后从事间谍活动提供了方便。

一个偶然的機會，乔治·吉齐基被任命为波兰驻亚的斯亚贝巴的领事，他决定先带克里斯蒂娜去肯尼亚，因为当年他曾去那里探险过。

1939年克里斯蒂娜来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当时这里还处于一种新旧交汇的混乱之中。克里斯蒂娜和丈夫吉齐基住进了索尔兹伯里旅店。

正是从这时开始，克里斯蒂娜意识到，嫁给乔治同样是个错误。虽然乔治有时也非常开朗幽默，但他却给克里斯蒂娜一种幽闭恐怖的感觉。

从欧洲传来的消息也越来越让人沮丧。1938年3月，德国人占领了奥地利；一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又落入希特勒的魔掌。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大举进犯波兰，波兰的军队开始了英勇的自卫反击战。

德军入侵波兰后，身在国外的克里斯蒂娜希望为

祖国而战，于是设法回到了英国，主动要求为英国间谍机构“特别行动委员会”工作。随后，她奉命潜入波兰境内，进行反纳粹敌后破坏活动。

不久后的一个偶然机会，她与儿时的朋友安德鲁·科尔斯基重逢，此时的安德鲁已是反纳粹组织的一名骨干成员。两人一起前往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进行反纳粹活动，并双双坠入爱河，成了一对战地情人。不久克里斯蒂娜与吉齐基离了婚，嫁给了安德鲁。克里斯蒂娜受安德鲁的影响，正式加入了英国的情报组织，从此就一直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

在匈牙利期间，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执行过多次充满危险的任务，并向英国情报局提供了许多珍贵情报。1941年初，她向英国通报了纳粹德国坦克部队在苏联边境大规模部署的情况，英国首相丘吉尔据此预言德军将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

当时在他们的团队里面有许多出色而又敬业的情报人员，其中有个叫拉斯基神父的耶稣会教士。此人身材瘦小，脸庞酷似西班牙画家戈雅，据说他是在为梵蒂冈工作。拉斯基神父往返波兰数次，最后他被驻布达佩斯的德军逮捕了。德军把他送到了毛特豪森集

中营，放出了阿尔萨斯猎狗来袭击他，那些猎狗把他撕成了碎片。

波兰被德军占领后，许多人逃到匈牙利，安德鲁负责把他们运往安全地带，安德鲁因此被捕被送进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监狱。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老朋友，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少校。在他的帮助下，安德鲁逃了出来。

10月中旬，有个情报人员赶来向克里斯蒂娜报告说，有16名逃离德国战俘营的英国士兵现藏在华沙的一家聋哑人收容所，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因为外面正在传言，希特勒将会实施“仁慈地杀害”残疾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残疾）的计划。

11月13日，克里斯蒂娜离开了布达佩斯，18日抵达了华沙。克里斯蒂娜径直去了聋哑人收容所，结果却发现英国士兵已经撤离了。当时的领导人坚持要波兰地下组织把他们疏散开来，并请求地下组织帮助他们进入苏联占领区。于是，克里斯蒂娜就自告奋勇，把另外两名英国士兵从波兰送往匈牙利。到了华沙后，这两名士兵的身体情况非常糟糕，医生断定如果不经至少三个礼拜的休养，他们是不适合长途跋涉

的。克里斯蒂娜必须把情报及时送到布达佩斯，不能等那两个士兵康复，所以她就只好把他们托付给自己的那些“步枪手”朋友照料。后来这两名士兵和克里斯蒂娜在贝尔格莱德有过一次愉快的团聚。

克里斯蒂娜在波兰的每时每刻都非常危险。德国人在街上当众抓人，被捕者倘若不能提供真实的证件证明他们是为德国人效劳，他们就会被送去做苦力或被送到集中营。11月底，克里斯蒂娜返回布达佩斯，当时她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患了严重的流感，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但是克里斯蒂娜仍然坚持工作。当时安德鲁不安地意识到，他们一直被人监视着，经常有人跟踪。安德鲁对她说，我们应该搬家了。

但是克里斯蒂娜却不想听到这些话，她说她已经在用火车托运各种文件，她必须等这些文件运到。在这些文件被清理之前，她不能离开布达佩斯。令安德鲁感到恐怖的是，克里斯蒂娜开始咳嗽吐血。

危险终于来了——在那个严寒的冬天，一天清晨四点钟的时候，他们的门铃响了。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立刻明白，那担忧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了。克里斯蒂娜匆忙穿上睡袍，安德鲁急忙安上假腿。这时敲门声

越来越大了。安德鲁打开房门，看到4名匈牙利警察站在那里。他们一言不发地从安德鲁身边走过进入房间。他们把所有的灯打开后，开始有条不紊地搜查每个房间。一切相关的文件早就被克里斯蒂娜事先处理了，所有那些剩下的都是一些五颜六色的旅游小册子，还有一些刊登着旅馆和饭店广告的地图。但是，那些警察还是把这些东西都一点不剩地装进箱子里带走了。

这时安德鲁跟着克里斯蒂娜来到洗手间，后面有个警察紧跟着他们。当时安德鲁拼命想找到一个办法，把那写满了电话号码的记事本扔掉。他用波兰语对克里斯蒂娜说：“这个记事本究竟该怎么办呢？”

有个警察马上命令他们：“不要说话。要是你们想说什么，就用德语说。”

安德鲁回答道：“先生，遗憾的是这位女士不会说德语。如果是那样，我们就不能说话了。”

警察在他们的房间里搜索了一个小时。清晨五点多钟的时候，他们把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推进了一辆宽大的警车里，匆匆忙忙地把他们带走了。在警车里克里斯蒂娜低声对着安德鲁耳语道：“把记事本给

我。”安德鲁摇了摇头。局势本来就已经十分危险，他不想让克里斯蒂娜更深地卷入其中。

安德鲁与克里斯蒂娜被送进了纳粹监狱，分开关押起来。审讯过程中，克里斯蒂娜咬破自己的舌头，伪装出咳嗽出血的模样，盖世太保误以为她得了肺结核，害怕传染的审讯官立即避而远之。在狱中，克里斯蒂娜很容易就赢得一名匈牙利少校的好感。那名匈牙利少校以克里斯蒂娜夫妇生病为由，申请将他们释放回家。

在那位匈牙利少校的暗中帮助下，他们终于获释。那位少校对他们说：“因为斯卡贝克伯爵小姐病了，你们暂时被释放了。但除了有轨电车以外，你们不能使用任何交通工具。你们可以回到公寓，但没有我们允许，不能离开。”

他们在两名穿着便衣的警察的监视下，前往当地的地下组织的情报人员平时集合的地点——哈格里咖啡馆。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都知道，这自然是一个陷阱。他们明白，要是地下组织发现自己的两名成员消失了，现在又突然出现了，其他的人就会出来向他们打听消息，那么这些随行的便衣警察就可以抓住地下

组织中其他的成员。

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沿着街道朝哈格里咖啡馆走去，这时安德鲁果然发现有个朋友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安德鲁小心谨慎地做了一个准确无误的姿势，那小伙子一看就明白了，知道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后面有人跟踪就一溜烟跑了。等到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还有押送他们的便衣警察来到咖啡馆时，并没有人上来欢迎他们。他们坐在桌子边，点了一杯热咖啡和一块三明治。过了好一会儿，那两个便衣警察才告诉他们可以回家了。

“一个微笑就足以拉回一支大部队”

克里斯蒂娜逃出纳粹的魔掌后，先后辗转于土耳其、埃及、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家，一直在为英国的情报机构工作。

1944年7月8日清晨，克里斯蒂娜来到了韦科尔，那里是法国游击队活动的地域。克里斯蒂娜接到了一些重要的任务，其中的一项，就是让她到已经同纳粹德国反目的意大利部队中，担任“招募官”的工作。其中第51阿尔皮尼师曾和德军有过一场小规模的战斗。

德军很轻易地打败了这支意大利部队，把战俘送到法国去修筑防御工事。克里斯蒂娜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逃亡到了马基游击队，一些人则加入了英国特工“罗杰”领导的部队。她的“招募官”工作完成得相当出色。

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执行任务的时候，克里斯蒂娜曾两次被德军抓住，但是由于她的演技太好了，德军很轻易地就相信了她，把她放了。但是第三次，克里斯蒂娜正带领一支意大利游击队，赶往离他们最近的马基游击队时，却和一支德国边境巡逻队遭遇了。那些德国巡逻兵命令克里斯蒂娜把双手放在头上，她照着做了。但是，此时克里斯蒂娜的双手都握着已经拉了弦的手榴弹。克里斯蒂娜用流利的德语对那些德国巡逻兵说，除非他们让她和她的同伴们离开，否则，就和他们同归于尽。那些德军见此情形，知道碰上了一个不要命的，就只好答应了她的要求，乖乖地让他们走了。

克里斯蒂娜的下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去说服德方在拉尔什山坳的一座堡垒驻防的一支军队。这个山坳下的通道是通往周围地带的必经之路，山坳大约有1994英尺高。克里斯蒂娜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才到达山

顶。她成功地找到了已经等在那里的那个波兰籍的联络人，并且和他一起，把那些军人聚集到一起。接着，克里斯蒂娜用波兰语向那群波兰籍士兵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劝说那些波兰籍的士兵离开德国人，回到自己祖国的抵抗组织上，不要再为德国人卖命。在克里斯蒂娜的劝说下，那些波兰籍士兵果然都离开了德军，转而加入了波兰的抵抗部队。当时英国情报界人士曾盛赞她“一个微笑就足以拉回一支大部队”。

然而几乎就是在同时，一位化名为“罗杰”的英国情报局特工被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和他在一起的两名盟军的特工人员，一同被关押在迪涅监狱。“罗杰”不仅是克里斯蒂娜的战友，而且还是她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不过当时“罗杰”还没有暴露身份，克里斯蒂娜马上找到雷诺瓦、茹弗医生以及情报局的其他成员，商议营救的办法。

克里斯蒂娜觉得武装袭击并不是好办法，她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主意：“他们不是还没有暴露身份吗？我看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你们一定要等我从迪涅回来再作打算。”说着她就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赶到了25英里远的迪涅。

克里斯蒂娜一到迪涅，就想弄清楚“罗杰”具体被关在什么位置。她溜进了监狱，一边沿着那幢阴森森的牢房走着，一边大声哼着《弗兰基和约翰尼》这支歌曲。她知道“罗杰”也和自己一样，都很喜欢这首歌，如果“罗杰”听到了自己的歌声，就一定会同她联系。她绕着监狱转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听到回应。就在她失望的时候，克里斯蒂娜突然听到有个人也在唱这首歌。这正是“罗杰”。克里斯蒂娜不禁喜上心头。

克里斯蒂娜听到“罗杰”的歌声后，马上跑过去对监狱的宪兵说自己是“罗杰”的妻子，想知道能否现在同她“丈夫”见一面。

一位老宪兵非常同情这位身体瘦弱、脸上裹着一条乡下女人常用的黑色围巾的年轻妇女。克里斯蒂娜问，她怎样才能得到给她“丈夫”带肥皂和剃须用具等生活必需品的许可。“食物可能对他更有用处，”老宪兵说，“但是，我不能帮你去见你丈夫。在这里，唯一可以帮你的就是艾伯特·申克。他是阿尔萨斯人，担任地方管辖区和盖世太保之间的联络官。”

见到申克后，克里斯蒂娜大大方方地对他说：“上校，盖世太保抓了三名十分重要的盟军特工，我丈

夫‘罗杰’也在其中。我是一名英国特工，蒙哥马利陆军元帅是我的舅舅。盟军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已经登陆了，很快就会打到这里，你应该早就听说了吧。那时，杀害我丈夫和他朋友的人的日子可就不会好过喽。你完全明白，即使我们的人不杀你，那些杀到这里的马基游击队的人也会杀了你，因为你们的手上沾满了他们战友的鲜血，他们一定会对你们进行报复。”

申克听后沉思了一会儿，对她说：“我自己帮不了你任何忙。但是，马克斯·韦姆可以帮你，或许他能帮你打个招呼，因为他是盖世太保的翻译。打这种招呼很危险，而且要花很多钱。不过，假如真像你所说的那样，你是出身名门，那么你肯定能弄到足够的现金让韦姆去打通关系。不过他对任何总数低于200万法郎的钱财从不感兴趣，这可是真的。”

克里斯蒂娜沉着地说：“好的，上校。你安排我和韦姆先生见一次面，我会见机行事的，当然也会感谢你的。”

8月14日下午4点，克里斯蒂娜焦急地坐在申克夫人的公寓里，等着韦姆的到来。这时门开了，韦姆走了进来。他穿着一身盖世太保的制服，腰上别了把左

轮手枪。一见面，克里斯蒂娜再次向他说明，蒙哥马利陆军元帅是她的亲舅舅，然后就和韦姆讨价还价。为了降低酬金，她和韦姆争论了三个多小时。她告诉韦姆说，盟军随时有可能打到这里。她自己和英国军队一直在保持着无线电联络。为了证实自己的话，她还拿出了一些作废的无线电晶体碎片给他看。

“假如我是你，”克里斯蒂娜说道，“我就会仔细考虑我给你提出的条件。正如我对申克上校所说的，假如我丈夫或是他朋友有任何不测的话，你们就会很快遭到报复。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你和申克上校在当地的口碑都很不好。”

韦姆手上沾满了太多人的鲜血，盟军和法国抗德部队肯定要报复他。想到自己的下场，他惊恐不已。他说道：“假如我把他们弄出了监狱，你将会如何保护我？”

“我保证，”克里斯蒂娜回答，“我以英国当局的名义向你保证，假如你把我丈夫和他朋友都弄出了监狱，我会尽一切努力保护你和申克上校的人身安全，让你们免受游击队员的报复。”

韦姆低下头想了想说：“那好吧，我来想办法把他

们弄出去，不过你要给我钱，不能低于200万法郎。”

克里斯蒂娜知道她已经为“罗杰”的生命赢得了时间。她必须尽快筹到钱，以免韦姆改变主意。于是她以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塞纳，她给“自由法国”总部发出了求救信号：“用200万法郎赎回‘罗杰’和他同伴们的性命。”她还补充说时间非常紧迫。她确信阿尔及尔“自由法国”总部一定会作出回应。

8月16日晚上，“自由法国”总部把钱空投下来了。

第四天下午，“罗杰”和那两位盟军的特工人员走出了监狱大门，他们被释放了。

一袋来自波兰的泥土撒在她的坟墓上

因为救过两名英国军官的性命，克里斯蒂娜被授予“乔治十字勋章”；因为救过索伦森少校，法国政府也曾授予她“战斗银星十字勋章”。1945年5月11日，克里斯蒂娜放弃了在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工作，部队给了她100英镑的退役金。随后，这个曾经为英国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女间谍就被英国政府忘得一干二净。

对于克里斯蒂娜的“被弃”，后来的一些史学家认为，她对英国政府参与的一起阴谋事件的内幕非常清

楚。据说当年英国情报机构曾计划暗杀波兰自由军领袖斯科斯基，而作为知情者同时又身为波兰人的克里斯蒂娜，尽管立下了赫赫战功，仍然遭到英国情报机构的无情“封杀”。

当时，英国情报机构“特种行动执行委员会”曾经承诺会给克里斯蒂娜提供一些保障，然而，在后来对待他们这个出色的特工时，却是那样的随随便便。克里斯蒂娜的祖国波兰根本没有任何行动来表彰她的英雄女儿，甚至在克里斯蒂娜寻找最卑微的工作时，都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尽快办理好加入英国国籍的手续，克里斯蒂娜又回到了伦敦。此时的她已经变得贫困潦倒，不名一文了。

克里斯蒂被帕丁顿一家宾馆的被服室聘用。这里每天有一大堆一大堆的毛巾、被单、枕套需要地不停地修补，做这样的事令她很沮丧。想到当年自己曾叱咤风云，如今却沦落到这种地步，于是她辞职不干了。

在不断的努力下，克里斯蒂娜的夙愿终于实现了，她加入了英国国籍。1947年，克里斯蒂娜拿到了英国护照。当时她十分高兴，并且相信这肯定标志着

一个前途光明的新生活的开始。她紧紧握着这份崭新的护照，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日内瓦。在日内瓦，她怀着激动的心情，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去参加工作面试。她未来的雇主仔细检查了她的新护照。

“对不起，格兰维尔女士，”老板把护照还给她说道，“你不是英国人，你只是一个拿到了英国护照的外籍人员。”按照护照前页上的说明，克里斯蒂娜是一位“移居英国的外国侨民”。移民证书上写着“英国内政部编号G26822，1946年11月23日颁发”。

这件事情带来的打击使克里斯蒂娜再也承受不住了。克里斯蒂娜想离开欧洲。人到中年了，孤独的她不由得时时会想起童年时代的生活，想起波兰那绿色的农庄和骑马走过田野的情景。

1951年5月，克里斯蒂娜又找到了一份在“劳海因”号客轮上做女乘务员的工作。她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因为这不仅解决了她的生计，又满足了她想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航行的愿望。

在船上，克里斯蒂娜有教养的举止、沉默寡言的性格和乘客对她的一致好评得到了上司的好评，同时

也引起了一些女同事的嫉妒。昔日纵横谍海、翻云覆雨的传奇女谍却成天做着端茶送水的琐事。

更为不幸的是，1952年，克里斯蒂娜在她工作的远洋游轮上结识了男乘务员乔治·默多尼。当时已经37岁的克里斯蒂娜仍然美貌如昔，默多尼疯狂地爱上了她，他处处照顾克里斯蒂娜，并向她求爱。克里斯蒂娜感激默多尼对自己的保护，和他成了恋人。然而，这个个头矮小、其貌不扬的默多尼原来是个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他对克里斯蒂娜的爱越来越变态，克里斯蒂娜走到哪里，他就跟踪到哪里。克里斯蒂娜实在受不了了，就下决心离开默多尼。

在结束了又一次航行后，克里斯蒂娜回到了伦敦。一天晚上，她和朋友波皮耶吃完饭后回到宾馆，然后抱着一大堆制服准备放到地下室的衣箱里去。在楼梯口，她惊讶地又发现了默多尼。他问她是否真的想离开伦敦，她回答说是的。随后，他又叫克里斯蒂娜把他写给她的信还给他，克里斯蒂娜说已经烧了。突然，默多尼向她猛扑过去，把一把长刀深深地捅进了她的胸部。等救护人员赶到时，她已经离开了人世。

6月21日上午，心情沉重的人们聚集在肯萨尔—格林罗马天主教公墓，为克里斯蒂娜举行了葬礼。经过一个简短的宗教仪式后，护柩者把棺材抬往了墓地。在这些护柩者中，有安德鲁和斯卡贝克上校。法国马基游击队队员把红白相间的国旗放进了坟墓里。为了让克里斯蒂娜在她的祖国的土地下安息，一袋从波兰运来的泥土撒在了克里斯蒂娜的坟墓上。

在葬礼上，她的前夫安德鲁说：“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无畏的人，唯一一位对危险有着深深留恋的女性——除了不能吞吃炸药以外！.....她生来就是为了行动和冒险，危险就是她生活中的主要刺激！她有时文静，但身上有某种东西让所有的女子都黯然失色！”

杀害克里斯蒂娜后，默多尼并没有逃跑，他站在那里，凝视着克里斯蒂娜的尸体，反复说道：“我杀她，是因为我爱她。”

1952年9月30日，默多尼被处以绞刑。在上绞刑架前，他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是：“杀了她才能最终占有她。”这真是一种典型的变态的爱。

2009年夏天，好莱坞开拍了间谍大片《克里斯蒂娜：战争我的爱》，首次披露克里斯蒂娜一生的传奇

经历。只是出于剧情需要，剧中克里斯蒂娜的身份变成了波兰女贵族“克里斯蒂娜·娜斯卡贝克”，其他相关人物的身份和姓名也略有改动。导演霍兰说：“克里斯蒂娜是二战中最非凡的女间谍，最奇丽的谍海玫瑰。她聪明、勇敢、有魅力而且迷人，男人为了她愿意牺牲一切。她是女人中的女人，她的经历是传奇中的传奇。”

“公主间谍”死于纳粹枪下年仅30岁

二战期间，英、德之间曾展开激烈的间谍大战。鲜为人知的是，当时英国情报部门中有一名身份特殊的女间谍——印度公主努尔·艾娜雅特·汗。但是，由于不是当间谍的料，努尔在情报工作中频频出错，但几乎每次都能幸运地化险为夷。这个不合格的盟军女间谍最终死得极为惨烈：被纳粹逮捕后受尽严刑拷打也不吐露半点盟军情报，最终死于纳粹枪下，年仅30岁。

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后来解密的一份长达250多页的文件显示，二战期间，英军曾招募了一名代号“马德琳”的美女间谍，她就是努尔公主。努尔出身于印度南

部一个王公之家，7岁随家人移居法国并在巴黎长大，后在巴黎大学学习儿童心理学，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25岁时，她已是一名成功的儿童读物作家。

1940年，纳粹入侵法国，巴黎陷落，努尔随家人逃到英国。不久，英国皇家空军特别行动署看中了她良好的语言素质，便把她招为特工。但美貌的努尔显然不是块当间谍的料，在特别行动署展开的新学员培训课上，努尔不仅反应迟钝，而且学习起来很没有耐心，几乎每一门培训课的成绩都很差。这一期的培训结束时，特别行动署给这个女学员下的评语是：“笨拙，容易激动，害怕武器，脑筋不太好，不善于保护自己”。评语中的几乎每个字都在表明，努尔只能算是间谍培训班上的笨学员，她干间谍简直就是入错了行。

当时，由于英国在法国的秘密电台陆续被破坏，皇家空军特别行动署急需向前方补充新的无线电发报员。于是在人员紧缺的情况下，年轻的努尔在1943年6月被派往巴黎的一个情报小组，充当无线电发报员，她的代号是“马德琳”。虽然明知道战地危险重重，自己此去是九死一生，但勇敢的努尔还是义无反顾地离

开英国，来到了纳粹占领下的巴黎。

努尔来到巴黎后，由于缺乏情报人员的基本素质，在工作中屡屡犯错。第一次执行秘密传递情报的任务时，她竟将盟军获取的德军驻防图拿在手中，没有采取任何反跟踪措施便径直来到指定的接头地点。而在接头时，由于过度紧张，她怎么也想不起接头的暗号。情急之下，她干脆把地图展开，向路过的每一个行人进行试探，希望通过对方的反应能“撞出”那个接头人员。她的奇怪举动引来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幸好当时并没有德国人和对方的情报人员在场，否则就会惹出一场大祸。就在这时，前来接头的两名地下抵抗组织成员及时赶到，看到这惊人的一幕吓出一身冷汗。他们只得装作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以寻找走失病人为由带走了努尔。

另一次，努尔奉命携发报机来到巴黎郊区的一处旅馆，向伦敦拍发一份长篇电文。在完成任務离开时，她竟然将密码本和记有巴黎全体地下抵抗组织人员名单的工作手册遗失在了旅馆房间里。所幸旅馆老板是个爱国的法国人，一向支持地下抵抗运动。他马上通过工作手册上的电话号码联系上努尔，及时通知

她领走名册。当努尔的法国同事知道这件事后，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实在不敢相信，这就是伦敦派来的“专业人员”！

两个多月以后，努尔决定为安全起见转移发报地点，于是选定了巴黎市区靠近福奇街的一套公寓作为工作室。但她不知道，这个新的发报地点，与盖世太保驻巴黎的秘密总部只有一街之隔。不过，令人称奇的是，这个粗心的女间谍虽然几乎“贴着纳粹的耳朵”传送秘密情报，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一街之外的盖世太保总部却对此浑然不觉。

几周之后，由于努尔的法国上级德里考特变节投靠德国纳粹，盟军在巴黎的情报网几乎一夜毁灭，许多盟军发报员纷纷被捕。但是，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努尔，这个糊里糊涂的“低能间谍”，最后竟成了英国情报组织留在巴黎的唯一发报员。英军解密文件援引当时侥幸逃到英国的巴黎发报员科林的话说：“我很惊讶她能够支撑那么久，当时我们的整个谍报网络都完蛋了。德国人知道了一切，我简直是靠着奇迹才逃离巴黎的。但自保能力如此之差的努尔也能脱险，我只能说是幸运女神格外垂青她。”

出于安全考虑，英军方安排努尔回国，但她拒绝离开，因为她知道，自己在巴黎的工作实在太重要了。但是不久，努尔的好运气也终于到头了。在后来的一次秘密行动中，努尔的一名法国同事蕾妮·加里因为是变节者德里考特的妹妹，没有被允许参加。早就对努尔心存嫉妒的蕾妮一怒之下，就像她哥哥德里考特一样向盖世太保告了密，换来10万法郎的奖赏。努尔就这样成为纳粹的俘虏。

抓住努尔后，德国纳粹简直欣喜万分，因为以努尔英军发报员的身份，她肯定掌握着盟军在巴黎的残余间谍网的关键信息。果然，当德国秘密警察搜查努尔的房间时，从壁橱里搜出了一个笔记本，而且，违反间谍工作常规的是，笔记本上居然还整整齐齐记录着努尔每一次收发的电文！原来，可怜的努尔误解了伦敦的指示——特别行动署让她谨慎处理电文，本意是要求她及时销毁文稿，而她却理解为将电文存档。

随后，努尔被投入巴黎监狱，她曾两次试图逃跑，但均未成功。在接受审讯时，她始终保持沉默。此时，这个工作并不出色甚至相当糟糕的女间谍，令

人惊讶地展现出优秀特工人员才有的素质。解密文件显示，当时，盖世太保审讯主管汉斯·凯菲负责审讯努尔，但自始至终，努尔只对凯菲说了一句话，那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盖世太保头子时，年轻的努尔不屑地说了一句：“我不相信你。”然后转过头去。凯菲后来在一份证词中说：“她被捕后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我们从她那里没有搞到任何信息。”

监狱记录显示，1944年9月11日，努尔被转押到达考集中营，由臭名昭著的纳粹刽子手威海姆·拉帕特对她进行审讯。但是，尽管饱受严刑拷打，她始终没向敌人吐露半点真情。1944年9月12日，拉帕特将她带到达考集中营外的一个偏僻树林中，再次对她毒打了一顿，然后丧心病狂地剥光她全身的衣服。努尔始终咬紧牙关不说话。气急败坏的拉帕特最后掏出手枪顶住努尔的头部，威胁要杀死她。努尔仍不屈不挠，拼尽力气喊出最后一句话：“自由！”一声枪响后，年仅30岁的她倒在了血泊中。

直到努尔牺牲15年后，她的家人才从集中营其他获释囚犯的口中，得知努尔早已遇害。而令努尔的家人略感安慰的是，杀害她的刽子手拉帕特已于1946年

因战争罪被处以绞刑。努尔的侄子大卫回忆说：“战争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寻找努尔的下落，不知她是生是死，但最后证实她已经在战争期间被杀害。小时候我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我的姑姑做了一些非常英勇和了不起的事情。”

努尔大无畏的精神赢得了人们的敬佩。二战结束后，英法政府为了表彰这位“公主间谍”的坚贞不屈，特追授她“乔治十字勋章”和“法国十字军功章”。

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

在英国情报局，像辛西娅、克里斯蒂娜和努尔这样的美女间谍还大有人在。其中一位美女间谍帕克长达30多年的谍海生涯令世人瞩目，关于她的一连串的传奇故事足以令一些男性间谍难以望其项背。

“越战”中期，在河内弹痕累累的街道上，人们经常能够看到一名英国中年妇女，她总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大街上闲逛。人们对此习以为常，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她，当她骑车出城时也没有人加以阻止，她就这样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一些军事设施附近。这名英国妇女名叫达芙妮·帕克，她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英国驻

河内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而实际身份则是军情六处派驻越南的特工人员。她的任务是搜集越南人备战和发展经济的情报。

当时在越南的其他西方外交官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他们在外出时经常受到当地人的监视。但帕克古怪的举动反而成为她的保护伞，没有引起越南政府的怀疑，她在越南的经历也成为当时在军情六处总部中流传甚广的传奇故事。

到了60年代初，非洲刚果处于紧急状态时，帕克又被调往刚果从事间谍活动，她在那里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在她那一代妇女中，很少有人能够在英国情报机构里担任高级军官，能成为著名女间谍的女性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帕克回忆说：“对我来说，间谍职业有无穷的乐趣，而且是没有性别差异的。”不过，她和她的女性同事们还是为了事业而牺牲了个人生活，她们其中有不少人就没有结婚或要孩子。

人们一向认为，施展“美人计”是女间谍们特有的同时也是唯一的才能，但如今，各国情报部门看重的却是女间谍表现出的出色的渗透能力。由于妇女的心

理素质比男性强，而且处事比男性更谨慎，因此在需要从不合作的人口中获取情报时，她们能言善辩的本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28岁的吉莉恩可以说是新一代英国女间谍的代表人物，她的经历就是军情六处培训女间谍的典型过程。

吉莉恩从牛津大学毕业后进入军情六处供职，接受了两年的语言培训。当时除了语言培训之外，还包括使用轻型武器及各种从事间谍工作所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训练。训练结业后，吉莉恩最初被安排在军情六处总部工作，但很快就被派往海外。吉莉恩的第一个职位是在英国驻某个中亚共和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她在那里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关于核扩散的情报。军情六处在冷战后关注的主要问题是防止核扩散，各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以及国际犯罪、恐怖活动等。后来，由于吉莉恩在被派驻的两个国家的工作成绩出色，得到了上司的褒奖并被派往阿富汗接受更为艰巨的任务。

吉莉恩说，从事谍报工作使她真正了解自己的潜能。她认为，女情报人员各有自己的特长，但平和

的心态、坚强的意志和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是她们共同的特点，也是她们能够胜任危险的情报工作的保证。负责培训新进入军情六处女情报人员的史密斯教官认为，越来越多的职业女间谍将会给她们效力的谍报机构的工作方式和手段带来深远的影响。

第十三章 “鼯鼠”潜逃，英国情报局颜面尽失

“剑桥五杰”间谍网成员之一哈罗德·金·菲尔比在英国情报部门潜伏了11年，其中在军情六处担任高级职务7年，直到1963年身份暴露前夜成功逃往苏联。英国情报局眼睁睁看着超级“鼯鼠”叛逃他国，无所作为，真是颜面尽失。

被克格勃招募

哈罗德·金·菲尔比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的成功叛逃使英国秘密情报局蒙羞数十年。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出生，他从小就

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这时剑桥大学的学生们谈论和争辩的并不是学问，而是社会主义思想。苏联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引起了这帮年轻人的兴趣，他们对共产党人羡慕不已，学校里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协会也纷纷成立。

进入学校后不久，菲尔比便加入了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并成为该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也确立了要把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当时，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欣然只身前往。在维也纳，菲尔比与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成员取得了联系并加入了该组织。从此，他就开始为这个强大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家而尽力工作。那是1934年。



“剑桥五杰”的核心菲尔比

菲尔比的公开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业余时间则花在追逐女人方面，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在维也纳时他住在一

个犹太人的家里，结识了房东寡居的女儿利兹·弗里德曼。利兹当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并且为共产国际工作。菲尔比经常同利兹在一起散步，最后爱上了她并同她结婚了，他因此也成了共产国际中的一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克格勃对菲尔比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快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但是菲尔比的第一次努力失败了。

菲尔比有口吃的毛病，这让他幸运地免除了兵役，但是当他申请加入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密码学校时，却遭到了拒绝。他们认为像菲尔比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菲尔比感到很沮丧。

就在这时，菲尔比意外地遇到了一位记者，为他的前途指明了方向，这位记者就是《每日镜报》的史沫特莱女士。史沫特莱神通广大，当时就是一位出名的左翼分子。她先是在比利时任职，后来随着溃败的大军退到了法国，然后又横渡海峡来到了英国。正是那一次在渡船上，她遇到了菲尔比。由于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识，他们一见如故。

当时史沫特莱就问菲尔比今后有什么打算，菲尔比说他可能到英国的海军中去服役，因为这样可以直

接为反法西斯出力。史沫特莱一听就说，像你这样的人去参军太可惜了，你能够做更多更好的事情来打败希特勒。她的言外之意就是，你应该和苏联情报机构取得联系，和他们合作才能发挥你更大的作用。

菲尔比一听，就说自己已经好久没有同苏联人联系过，不知道此路能不能走得通。史沫特莱就说，她可以帮忙。当时菲尔比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当一回事。没想到几天后，史沫特莱真的给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她说已经把菲尔比推荐给英国秘密情报局了，过几天会有人找他。菲尔比大吃一惊，没有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就这样实现了。

一天，《泰晤士报》国外新闻部主任编辑把菲尔比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国防部的一位上尉问他是否“可以做些有关国际方面的工作”。菲尔比立即答应。经过与几位身份不明但显得很有权威性的人士会谈后，菲尔比被叫到英国秘密情报局去报到。菲尔比对自己轻易地被录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知道这一定是史沫特莱已经为自己联系好了的。

当时英国情报机关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只不过例行公事，查了一下他的档案后就果断地认为“没有问

题”。

菲尔比被分配在D处工作。D处1938年才成立，主要任务就是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因为在德军占领奥地利之后，在英国朝野上下就弥漫着一种对间谍恐惧的心理。他们认为德军之所以能在欧洲一步步地得逞，最大的原因就是德国有一个“第五纵队”在欧洲各国从事颠覆和破坏活动，为德军充当内应，因此英国人也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D处同其他处合并，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执行局”，专门从事恐怖活动。

但是这种工作并不是菲尔比所希望的，于是他退出了“特别行动执行局”来到了情报局第五处工作，从事反间谍工作。

菲尔比进入军情五处之后，除了窃取无线电通讯情报外，还奉命搞一些其他形式的窃取活动。他还使用过相当复杂的技术拆看外交邮袋，猎取对象是波兰和捷克那样的中立国和较小的盟国。

随着菲尔比的表现越来越好，他的职责范围也越来越大。二战后期，他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国。

随着对德战争即将结束，英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开始把他们的目标转向了下一个敌人——苏联。打算成立第九科，专门负责苏联的情报工作。

菲尔比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由于第九科的活动非常注重保密，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动。菲尔比向苏联情报机构的联系人克罗托夫通报了此事，克罗托夫立即与莫斯科联系。莫斯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菲尔比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成为秘密情报局第九科的科长。

搞掉第五科科长考吉尔

此时，菲尔比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搞掉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克罗托夫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唯一的可能就是把这两个部门进行合并。新

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克罗托夫问菲尔比，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菲尔比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菲尔比似乎感觉到他已得到了擢升的暗示。

克罗托夫又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是让你担任现在的第五科科长这个职位，情况将会怎样？”

菲尔比回答说：“这将意味着重要的擢升，我将会有更好的时机决定事情的进程，其中包括我的职务和我的工作。”

克罗托夫对这个答复感到很满意。

克格勃总部的指示很快就来了，明确通知菲尔比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自己成为新成立的秘密情报局第九科的科长，并且保证自己能成为秘密情报局未来反间谍部门的负责人。总部还指示菲尔比，不管采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包括搞掉现任第九科的科长居里和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

菲尔比知道，居里的任命不过是一个过渡，搞掉他不难，麻烦的是考吉尔。考吉尔在秘密情报局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当年就是他负责“超级机密”的安

全；而他领导的第五科在对敌斗争方面同样是卓有成效，到战争后期，第五科一共查获了3575件间谍案，逮捕了675名间谍。

菲尔比明白，为了达到当上新成立的第九科科长目的，他首先应该寻求同盟者。他首先选择了维维安上校做自己的同盟者，尽管他的力量很虚弱。维维安是秘密情报局副局长，也是考吉尔的顶头上司，名义上负责秘密情报局的所有反间谍活动，但考吉尔根本就瞧不起他，因此完全把他甩在一边，有事总是直接与局长打交道。维维安心里对此十分不满。

有一次，维维安竟然急不可待地问菲尔比：“你说我现在该对考吉尔怎么办？我真是有点受不了那个家伙！”

菲尔比一听心里很是高兴，但是他却不能用过多的话去回答维维安，他委婉地暗示维维安，可以找那些接近权力中心的人去反映。

菲尔比觉得最合适的人应该是局长的首席参谋官。当年菲尔比刚加入秘密情报局时，那位参谋官还在海军科工作，为海军部处理涉及海外方面的情报。被局长任命为首席参谋官后，他的办公室就设在局长

办公室的对面。首席参谋官头脑清醒，具有在官场混乱的局面中保持有条不紊的非凡能力。他是菲尔比所遇到的最有勇气、最具责任心的男子汉之一。他经常带病工作，在他的办公桌面前总是放着一排稀奇古怪的药瓶子。

所以，当维维安再次同菲尔比谈到考吉尔时，菲尔比就说他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过他认为维维安最好是去问问首席参谋官。

菲尔比不知道维维安是怎样同首席参谋官见面的。不过当他再次见到维维安时，事情进展得似乎很顺利。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同菲尔比平时接触并不多的首席参谋官竟然打电话给菲尔比说，让菲尔比在有空的时候去见见他。

菲尔比觉得这倒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就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拜见首席参谋官。首席参谋官很热情地接待了菲尔比。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讨论秘密情报局的现状和它的未来、谈了应该改进的程度以及为了适应即将来临的和平环境，应该需要加以调整的地方。反正谈话的内容很广泛，菲尔比也是畅所欲言。他知道首席参谋官在考察自己，于是他就尽可能地作出一

种通情达理、襟怀坦荡的样子。不过在这次谈话中，自始至终，他们谁也没有提到考吉尔的名字。

这次谈话，让菲尔比有一种预感，那就是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近了。他觉得应该再找一些突破口进一步扩大这种战果。

正好在这个时候，幸运之神降临到菲尔比的头上来了。第五科的科长考吉尔偏偏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差点让英国秘密情报局长卷入一场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的完全没有必要的争吵之中。显而易见，这种争吵将会直接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

有一次，维维安在召见菲尔比的时候，几乎是以颤抖的声音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并且让他看了由考吉尔为情报局局长起草的一封两页长的信。那封信措辞激烈，猛烈攻击胡佛为了华盛顿的利益而牺牲英国情报局的做法。

当然，从菲尔比的观点来看，考吉尔在信中说的大多数是事实，但是这种“事实”是不能写在公文里的，更不能写在两个情报机构负责人之间的通信中。信件的后面是外交部官员的简明批语：“我认为第五科起草的信函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寄出去的话，将会

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成为被取笑的对象。”外交部官员要求维维安重写一封，所以维维安就把菲尔比叫来了，要把这份差事交给菲尔比去办。

菲尔比知道这又是一个机会，于是他就认真地写了半页纸，客气地提出了一些很小的问题，然后和维维安一起把信件交给了外交部官员。那位外交部的官员看了之后，没有做任何修改，就把菲尔比写的稿子交给了局长的秘书。

第二天，维维安几乎是以一种兴奋的口吻告诉菲尔比说，他跟外交部官员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这时菲尔比知道大局已定，那个维维安是下定了决心要整垮那个傲慢的考吉尔。

就在这时，另一件事让考吉尔雪上加霜。考吉尔一直认为，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要与他争夺对德国无线电情报通讯的控制权，为此他与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两位高级官员发生了争吵，双方的手下心腹还从中推波助澜，展开了对攻。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府密码研究所的官员首先作了暂时的退让，但考吉尔却不识时务地寸步不让。于是这件事让政府密码研究所的人对他更是恨之入骨。

几天后，维维安召见了菲尔比，并让他看了自己写给局长的报告。从那天起，菲尔比就感到这场严峻的考验将要结束了。

局长召见他的时刻终于到来。时任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是孟席斯。对菲尔比来说，访问局长办公室这个神秘的场所早已不是第一次了，让他感到欣慰的是，那两位秘书小姐今天对他却是特别的和蔼可亲。“绿灯”一亮，菲尔比就走进了孟席斯的办公室。当听到孟席斯破天荒地叫他“金”时，他马上知道已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孟席斯等他坐下后，竟然把维维安的报告拿给他看。出于礼貌，菲尔比假装看了看这份已经看过了的报告，然后恭恭敬敬地还给了局长。这时，孟席斯告诉菲尔比，说他已决定采纳维维安的建议，立即由菲尔比接替居里，并问菲尔比还有什么想法。于是菲尔比就装作一本正经地说：“局长先生，据我所知，让我担任这个职务是由于考吉尔同那些反对他的人搞得不太融洽的缘故。我希望将来能够避免类似的纠纷。但是谁又能预测得到呢？如果我能肯定那些将与我天天打交道的军情五处的人对我的任命没有异议的话，那

我在工作上就会愉快得多，这样还可以增强我的信心。此外，如果能得到军情五处的正式同意，局里将来便可以免受他们的非难。”

菲尔比还未说完，孟席斯就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并且露出了明显的赞赏的神情。孟席斯马上很有信心地要菲尔比彻底消除顾虑，并说他会很快给军情五处处长写封信。此时菲尔比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他知道应该是知趣地告辞的时候了，于是就站起来对孟席斯说：“感谢局长的信任。还要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见我。我想应该告辞了。”

孟席斯也站了起来，随后便热情地打发菲尔比离开了办公室，并且把他送到了门口。

几天以后，军情五处处长给了孟席斯极为友好的答复，菲尔比大功告成，几天以后，他就走马上任，接替了第九科科长居里的位置，开始全面主持第九科的工作了。

莫斯科已经把伏尔科夫解决掉了

为了使第九科的地位合法化，上任后，菲尔比向局长孟席斯建议，必须由自己起草一份工作章程，由

局长来签发。菲尔比起草的章程明确提出，授权新任科长菲尔比在局长的领导下，负责搜集和解释来自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各地所有关于苏联和共产党人的间谍与颠覆活动的情报，同时还规定自己要同军情五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相互交换有关方面的情报。

几天以后，这份别有用心的工作章程就以正式公文的形式，由局长孟席斯签发后颁发到各个处室，从而为菲尔比公开地搜集情报亮起了一路绿灯。至此，菲尔比终于达到他的目的。考吉尔已经自行辞职离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像考吉尔那样的人来阻拦他的行动了。

在菲尔比的指导和建议下，不到一年的时间，第五科和第九科便合并为第九科，菲尔比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九科的领导人。从1940年开始，菲尔比就一步一步地接近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核心了。

在科里的干部和房子配备齐全之后，菲尔比就开始做真正的情报工作。在菲尔比任职期间，没有一项针对苏联情报机关的预谋行动产生过效果，而这对菲尔比来说并非好事。就他的工作而言，一方面要保护苏联人的利益，一方面还得在英国人面前进行很好的

掩饰，如果没有作为或者成就太少，那么对他的潜伏是极为不利的。幸运的是当时经常会有苏联情报机关的人员叛逃过来，而这些人正是由菲尔比亲自审核，这就可以让菲尔比利用这些叛逃人员来做文章。

然而，不久后发生的“伏尔科夫事件”差点断送了菲尔比的远大前程。

1945年8月的一天早晨，菲尔比像平时一样上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还没有坐稳，局长就把他叫了去，递过一沓文件给他看。文件的第一页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简函，要求部里注意所附材料并给予指示。

那些附件是英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内传阅过的一些记录稿，里面提到有一位名叫康斯坦丁·伏尔科夫的人曾向英国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佩奇先生提出，要求允许他和他妻子到英国政治避难。这个伏尔科夫当时是苏联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实际上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伏尔科夫答应详细揭露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情况，并详细提供苏联在国外工作的间谍网和情报员的材料。他特别声称，他知道在英国工作的三个苏联情报人员的真实姓名：两

个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另一个是英国伦敦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伏尔科夫在提出了自己的“货单”之后，还强烈要求不能用电报向伦敦报告他的事情，因为苏联人已破译了英国的各种密码。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按照伏尔科夫的要求，用邮袋把那些材料安全而缓慢地寄回了伦敦。在伏尔科夫同佩奇接洽后的一个星期内，只有一些重要人物才能看到这份材料。

毫无疑问，菲尔比也是“重要人物”之一。当他看到这份材料时大吃一惊。为了使思维能冷静下来，菲尔比当时故意目不转睛地盯着文件。他本来想对局长孟席斯说，要当心这是伏尔科夫在挑拨离间，但是他马上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知道那种提法此时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处，在日后说不定还会危及自己。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胆地正视现实。

于是在沉默了几分钟后，菲尔比对局长孟席斯说：“我们遇到了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希望有点时间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根据情况提出适当的行动措施。”

局长孟席斯同意了他的意见。他要求菲尔比第二天一早就向他报告，同时还严格限制只许由菲尔比自

己保管这些材料。

菲尔比把材料带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的秘书，除非是局长亲自召见，否则不允许任何人打搅他。他很想独自待一会儿。

当时让菲尔比相当有把握的是，到这时为止，秘密情报局还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的事。可能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伏尔科夫用含糊的词句编造他的“货单”，有意不提供可直接调查的线索。这一点使菲尔比信心倍增。

一系列问题需要菲尔比立即作出决定。那就是一旦外交部作出决定，所有的行动都会交给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去做。菲尔比不可能用缓慢的邮袋来指导他们每天甚至每小时的行动。事态一旦控制不住，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菲尔比越想越觉得自己完全有必要亲自到伊斯坦布尔去安排下一步的行动。这个行动本身其实很简单——只是去见见那个伏尔科夫，让他和他的妻子住到英国人为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准备的一个秘密去处，然后不管能不能得到土耳其人的许可，都要把伏尔科夫偷偷带到埃及的英国占领区去。

第二天早上一到办公室，菲尔比就向局长孟席斯报告说，他们的档案里虽然有好几个叫伏尔科夫的人，但没有一个与伊斯坦布尔的那个人的情况相似。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可能是很重要。在谈到利用邮袋联系太耽误时间时，菲尔比故意有些犹豫不决地说：“应该把案情向某个人详细交代清楚，派他到现场去处理这个案子，而不是像这样用邮袋联系。”

“我自己也正是这样想的。”局长孟席斯回答说。

菲尔比一听，马上产生了希望，认为局长会派自己到伊斯坦布尔去接管这个案子。但是，孟席斯的一番话，很快就让他的希望破灭了。

孟席斯说，昨天晚上在俱乐部里，他碰到了军情五处驻开罗负责远东地区保安情报事务的道格拉斯·罗伯茨准将。罗伯茨说他回国的假期就要满了。局长对这个人的印象很好，他打算要求军情五处直接把罗伯茨派到伊斯坦布尔去负责伏尔科夫的案子。

对局长的这项提议，菲尔比无法反对。虽然他对罗伯茨的能力评价并不高，但他有一切名义上的资格来担任这项工作。据他所知，罗伯茨是一个有资历的军官，他的准将制服无疑会使伏尔科夫敬畏；罗伯茨

了解这个地区的情况，并同土耳其的秘密机构合作过；尤其是罗伯茨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这又是一个不可否认的有利条件。

在失望之余，菲尔比还同局长全面研究了这个案子的其他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行动计划还要得到外交部同意的问题。当他告别时，局长孟席斯要他当天下午等着他，因为上午他还要去找局里外交部的那位官员和罗伯茨将军，听听他们的意见。

在午休期间，菲尔比一直在为昨晚局长同罗伯茨相遇的事而抱怨自己的运气不好。现在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静观事态的发展了。下午一回到办公室，就听说孟席斯正等着召见他。孟席斯一副一筹莫展的样子，一见面就说，虽然罗伯茨无疑像别人一样勇敢，但他似乎有克服不了的毛病，就是怕坐飞机，他已经安排好下周从利物浦乘客轮回去，甚至连局长和外交部的官员都没办法使他改变计划。于是，菲尔比与局长孟席斯的谈话又回到了原点，只好又接着昨天上午谈过的情况谈起。

菲尔比直截了当地对孟席斯说：“鉴于准将的困难，我只好建议由我替代他去。因为我要向我的副手

交代重要的工作并不需要多长的时间，只要把必要的出入境手续办妥就可以动身。”

局长孟席斯欣然同意了他的意见。接着，他们一起到外交部要了一封给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的介绍信，要他提供一切方便，帮助完成任务。

从等待伊斯坦布尔签发证件到登上经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共拖延了整整3天时间，在此期间，菲尔比除了准备一些备用密码外，更多的精力是用来考虑他未来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

外交部已答应由英国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佩奇帮助菲尔比同伏尔科夫重新建立联系，并安排见面。同伏尔科夫见面时，将由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作陪同和翻译。这位使馆秘书曾在莫斯科工作过多年，俄语水平是绝对没问题的。对菲尔比来说，关键的问题是由于使馆秘书在场，如果伏尔科夫真的滔滔不绝地讲出在英国政府机构中苏联情报人员的姓名时，使馆秘书将会大吃一惊。菲尔比要做的事是设法使使馆秘书不要泄露谈话内容。但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

菲尔比决定首先要做的是稳住使馆秘书，让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力同伏尔科夫详谈他的情报；如果在伏

尔科夫安全到达英国领土之前过早地揭发那肯定是危险的，而他到伊斯坦布尔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切办法阻止伏尔科夫谈这方面的情况，把他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然后再由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来审问他。如果伏尔科夫真的会透露出什么惊人的情报来，菲尔比就暗示伏尔科夫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奸细，并警告秘书如果在还没能对情报真实性作出评价之前，就把它散布出去是极为不幸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由于遇上了雷暴雨，飞机不能正常飞行，菲尔比第三天才到达伊斯坦布尔；又由于英国外交部和秘密情报局互相拆台，又过了三天，菲尔比才开始讨论伏尔科夫的事情。

那天晚上，菲尔比同英国秘密情报局驻伊斯坦布尔情报站负责人麦克雷详细地讨论了进行这次行动的计划。他们交换了偷偷带走伏尔科夫的好几个方案，但最后还是没有确定下来。看来很清楚，在同伏尔科夫谈话之前，很难决定哪个方案最好，主要还得看他自己的情况和具体条件。菲尔比决定，第一步就是要同伏尔科夫取得联系。

显然，他们最理想的联系媒介是总领事馆的佩奇，因为伏尔科夫最先是由他联系的。于是第二天一清早，麦克雷就把佩奇请到他的办公室，由菲尔比详细地向他作了必要的说明，希望他当天下午某个时候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替菲尔比约见伏尔科夫。菲尔比之所以选择下午，是因为他还要留些时间给使馆秘书作一番“说明”。接着，他们研究了好几个可以见面的地方，但最后选定的是一个最省事最安全的地方——佩奇的办公室。因为佩奇同伏尔科夫有日常的领事事务来往，

但是，当佩奇拿起话筒给苏联总领事馆打电话，说是要找伏尔科夫时，回话的是一个男人模模糊糊的声音。

菲尔比虽搞不清他断断续续地说了些什么，但他从佩奇那迷惑的面部表情知道准是出了什么事。佩奇挂断电话，向菲尔比摇了摇头。

“他不能来吗？”菲尔比问。

“真怪，真是想不到的怪事。”佩奇回答说，“我找的是伏尔科夫，来接电话的人说他就是伏尔科夫。但他哪里是伏尔科夫呀！我对他的声音很熟悉，我已经

同他谈过几十次话了。”

佩奇又试挂了一次，但这次接线员说他不在。佩奇气愤地说：“一分钟前他还在呢！”

他们面面相觑，三人谁也说不出话来。最后还是菲尔比开了口：“可能是苏联总领事馆出了什么事，最好明天我们再试着碰一下运气。”

菲尔比开始强烈地感觉到，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重大事情。

第二天上午，菲尔比、麦克雷和佩奇再次见面，由佩奇给苏联总领事馆挂电话。他先是听到电话机里一个妇女微弱的声音，随即便是一声很尖锐的咔哒声，佩奇呆呆地望着手里没有声响的话筒说：“你是怎么搞的，我要的是伏尔科夫。”

“伏尔科夫在莫斯科。”接线女郎说，接着便是一阵混乱和“砰”的一声，电话挂断了。佩奇仍不甘心，决心非把此事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他亲自去找苏联人。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从英国领事馆回来了，样子显得迷惑、气愤和沮丧。

“真糟糕，”他向菲尔比汇报说，“在那个疯人院里我什么也没打听到。居然没有人听说过伏尔科夫！”

听到这个情况，只有菲尔比清楚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菲尔比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莫斯科已经把伏尔科夫解决掉了。

原来，菲尔比得知事情的第一时间就与他苏联方面的联系人克罗托夫会面了，当天克罗托夫就致电莫斯科报告了这件事情。五天后，伏尔科夫被强行送回了莫斯科，之后伏尔科夫就消失了。

让菲尔比担心了好几个星期的“伏尔科夫事件”，就这样彻底了结了。在回国途中，菲尔比草拟了一份给局长孟席斯的报告，把这次任务的失败归咎于那“该死的邮袋联系”。孟席斯并没有说什么，此时他彻底信任了这个为克格勃服务的第九科科长。从此，菲尔比就成了秘密情报局长孟席斯最得宠的心腹之一。

“金，鸟儿飞掉了”

一年后，由于孟席斯的提名，菲尔比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前往伊斯坦布尔，其实是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土耳其情报站站长。在伊斯坦布尔待了两年之后，他又接到了伦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国去任职，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在美国的最高负

责人，具体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子”。

这项命令对菲尔比充满极大的诱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细地了解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但是，临行前反间谍方面的情况介绍和指示使他深感不安。这是由一个难以对付的反间谍老手跟他谈的，其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的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事件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两次泄密。

1949年，菲尔比被英国政府派往华盛顿，任秘密情报局驻美代表，成为英美情报交流系统的首脑人物。这个职位有大使和情报官的双重职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工作，这说明菲尔比已经受到了特别的信任，成了秘密情报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菲尔比到美国后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往来密切，工作很有起色，甚至连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等人也都曾给予他高度评价。与此同时，大批情报被菲尔比源源不断地送往苏联。

随着美英情报机构在苏联屡屡遭受重大损失，英

国人终于开始怀疑菲尔比的身份。

也就是在美国期间，菲尔比才知道，联邦调查局开始对泄密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他们的调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馆的一些非外交人员的职工身上，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发现牵涉到任何一个外交官，更别说职位相当高的外交官了。

菲尔比把泄密事件与有关的外交部人员名单一排列，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泄密者了。他发现与此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最后一人是麦克莱恩。麦克莱恩同菲尔比是在30年代结识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现在他已经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麦克莱恩和菲尔比一样是克格勃潜伏在英国的剑桥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毫无疑问，泄密者就是他。

与此同时，有关泄密者的几十份报告仍陆陆续续地给菲尔比送来，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涉及使馆官员的调查就要到来。

正当华盛顿围绕英国大使馆泄密案调查日趋紧张时，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这使菲尔比大为吃惊。伯吉斯是他剑桥时的好友，从那时，他们两人的事业就缠在一起了。菲尔比把伯吉

斯作为可以信任的对象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则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作为回报。两人曾在秘密情报局一起共过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谁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调查，就会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菲尔比认为，伯吉斯来得很不是时候。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就后悔不该到美国来。他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外交官的工作。他的暴躁的脾气和愣头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馆的工作遭到损失，结果让他介于辞职和半辞职的状态。总之，他急于想回伦敦去。

这倒给菲尔比一个很好的启示——他可以把伯吉斯回伦敦和营救麦克莱恩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伯吉斯来说，被强行送回去而不引起怀疑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三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亚州接连三次超速开车，州长对有人如此滥用外交特权提出强烈抗议。没过几天，伯吉斯就被遗憾地告知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了。伯吉斯和菲尔比心想事成。于是菲尔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营救麦克莱恩的每个步骤。

他要伯吉斯到伦敦后先要和苏联联系人接头，汇

报全部情况，然后带着一张写有约会时间和地点的纸条去麦克莱恩的办公室找他，并把实际情况全部告诉他。他们也就菲尔比的处境问题进行了讨论。菲尔比说：“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在调查麦克莱恩和你的活动时势必要怀疑我。看来此事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动地帮助解决英国大使馆泄密案件的办法来转移对我的怀疑。”

在这之前，菲尔比一直按兵不动，联邦调查局和军情五处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到了自己出面的时候了。菲尔比给局里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他们不必对大使馆的佣人进行浪费时间的调查。他认为应该从苏联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供词着手，把他所提供的资料与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间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对一下。维维安很快给予回信，他对菲尔比说，他们也一直是这样考虑的，但是档案里并没有任相关记载。

随后，菲尔比还找到了一个可以直接给伯吉斯去信的借口——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交通官员两次问他，伯吉斯放在停车场的那辆林肯牌汽车怎么办？于是菲尔比就用紧急的语气给伯吉斯写信，暗示伯吉

斯：“如果不立即办就太晚了，不然他们将把你的汽车送到废物堆去。”

接着，军情五处在把克里维茨基的供词跟大使馆泄密问题的材料核对后，给菲尔比送来了一份大概有6个人的名单，并说调查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名单上就有麦克莱恩，但由于他们对一个代号的迷惑和错误理解而把另一个人列为重点嫌疑，结果把麦克莱恩的名字放在最后。菲尔比希望伯吉斯的行动早点结束，麦克莱恩的危险越来越近了。

1951年5月25日，英国外交部授权军情五处下周审讯麦克莱恩。就是在当天，伯吉斯租了一辆轿车，前往麦克莱恩的家中。两人刚离开家，军情五处的人立刻跟了上来。麦克莱恩与伯吉斯来到火车站，上了火车并成功地甩掉了那些跟踪他们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通知菲尔比。

第二天清晨，军情五处驻美国代表佩特森给菲尔比打来电话，说刚接到伦敦打来的一份很长的特急电报，如果没有人帮忙，他就得用一整天时间才能译出密码，因为他刚给秘书放了一周的假。他问菲尔比能否把秘书借给他。听到这情况，菲尔比心都快跳出来

了。难道是麦克莱恩被捕了吗？伯吉斯出什么事了？菲尔比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后坐下来镇静了一下，他恨不得马上闯进佩特森的办公室，把事情弄明白。但他认为还应该是若无其事地按常规处理要好些。

菲尔比径直走进佩特森的办公室。佩特森脸色阴沉，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金，鸟儿飞掉了。”

菲尔比彻底放心了，但仍表现出吃惊的样子：“什么鸟儿？是麦克莱恩吗？”

“是的，”佩特森回答说，“但是更糟糕的是……伯吉斯这家伙也跟他一块儿走了。”

这一下，菲尔比的震惊就绝不是装出来的了。他知道不仅是麦克莱恩，连伯吉斯也成功逃走了。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出走使菲尔比面临重大抉择。他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成为头号怀疑的对象。在最初研究麦克莱恩的逃跑问题时，他的苏联同事就考虑到他可能陷入危险的境地，精心地为他策划了一个逃跑计划，很明显，伯吉斯的逃跑使情况变得更紧急了。

于是，菲尔比决定先拆掉房里所有的秘密设备，再了解联邦调查局的态度以后再作出决定。他的指导

思想是：“除非我蒙混过关的机会十分有限，否则我一定要闯过这一关。”

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估计一下蒙混过关的机会会有多大。菲尔比认为，他现在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他已经在英国情报部门里干了11年，其中7年担任高级职务，跟军情五处合作了8年，跟美国情报机关紧密配合了将近2年，断断续续的联系保持了8年，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他认为他对敌人的了解程度已到了足以预见他们一般将会采取的行动。他了解法律和惯例对他们工作的种种限制。另外，在伦敦肯定有许多身居高位的人非常希望看到他清白无辜，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打算就此罢休。哈维向局长史密斯呈递了一份报告，指出菲尔比与伯吉斯交往甚密，并且知道菲尔比还办理过伏尔科夫的案件，因此他推断菲尔比也是一名苏联间谍。之后，中情局长史密斯就致信给英国秘密情报局，说他对菲尔比不信任。军情五处根据哈维的报告对菲尔比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问题远远比想象中严重。

1951年，英国外交部把菲尔比从美国召回伦敦秘

密审问，最先审讯菲尔比的是军情五处的怀特，他要求菲尔比交代他与伯吉斯的关系，菲尔比很轻松就把这个问题推托过去了。在审讯进行到僵持阶段的时候，审讯菲尔比的人换成了国王的法律顾问密尔摩。密尔摩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审讯官，菲尔比早就知道他的厉害，于是就装出极力配合他的样子，但是并不给他一丝机会抓到有利的证据。经过一番较量，密尔摩对他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审讯他的是威廉·斯卡顿。这个人更是老奸巨猾，他曾经步步为营，节节进逼，骗取了为苏联服务的科学家间谍劳斯·福克斯的相关情报，并破获了原子间谍网。在审讯菲尔比的过程中，这位审讯官为他设了好几个圈套，但是聪明的菲尔比就是不上当。最后，菲尔比是苏联间谍的论断只得被暂时搁置起来，不过他以后不能再在秘密情报局干了。

挺过了审讯的菲尔比在离开秘密情报局后过上了平静的生活。可是三年之后的1954年4月，一位苏联特工叛逃英国，供出了麦克莱恩与伯吉斯都在莫斯科，他们的叛逃是由当时在华盛顿的一位“第三人”策划的。消息一出，英国上下大吃一惊，菲尔比再次受到

了秘密情报局的审讯。

不知为何，在审讯过程中，秘密情报局故意放过了菲尔比。而国会上下也因菲尔比一案闹得不可开交，外交大臣和艾登都为菲尔比开脱。外交大臣麦克米伦在下院声明，菲尔比在政府任命期间自觉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经帮助过伯吉斯与麦克莱恩。

菲尔比的胜利，引起了大洋彼岸的不满，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对此很是不解，但是他们也是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菲尔比确实是一位苏联间谍。

1956年9月，菲尔比被英国外交部开除以后来到黎巴嫩，以《经济学家》周刊和《观察报》特聘撰稿人的身份在贝鲁特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活动，只是外人都不知道罢了。

逃到莫斯科后获得“红旗勋章”

菲尔比就这样工作了5年，直到1962年，苏联间谍、波兰总参情报部副部长戈列涅斯基叛逃美国，再次供出了菲尔比为苏联间谍的秘密。消息从美国辗转

到英国后，英国秘密情报局才最终确定了菲尔比的苏联间谍身份。可是当他们要实施逮捕计划时，菲尔比却在贝鲁特神秘地失踪了。

1963年7月，菲尔比出现在了莫斯科，苏联政府宣布批准菲尔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难的要求。他的叛逃轰动了整个世界，更让美英情报机构丢尽了面子。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有名的“剑桥间谍网”成员伯吉斯和麦克莱恩逃亡苏联后，却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到了苏联后，他们无所事事，最后都沦落成了酒鬼。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克格勃不允许他们见面。最后伯吉斯把自己的藏书、衣物和2000英镑留给了自己的好友，就一命呜呼了。

1968年，菲尔比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我的秘密战争》，书中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对英美情报机构进行了挖苦与讽刺。此书曾畅销多国，风行一时，菲尔比一下子名声大振，拥有无数的崇拜者。据说还有一位叫罗伯特·汉森的人就是因为看了这本书走上了间谍之路。可见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

1977年是苏联革命胜利60周年，菲尔比意外地被邀请到克格勃总部发表演说。这是他逃到莫斯科14年

后第一次公开发表演说。面对济济一堂的同行，菲尔比大声说：“今天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我们不但要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我们还要庆祝苏联足协成立50周年……”结果礼堂里爆发出哄堂大笑。这番话听起来是菲尔比的一种幽默，其实是他趁机发泄内心的不满。因为下面他接着说，他到莫斯科这个伟大的城市已经14年了，今天才有幸第一次拜见诸位。从他的这些话里，不难听出他在苏联的遭遇是很不快乐的。

事实上，菲尔比当年在苏联的确是过着一种暗无天日的日子。克格勃不但不信任他，反而处处提防他，总认为他是“双重间谍”。所以不要说重用他，甚至连他的行动自由都要受到限制，即使是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旅行，也处处有人跟踪和监视。

1988年5月11日，76岁的菲尔比离开了人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在临死之前，他并没有要求将他的遗体运回英国安葬。在逝世前的两个月，他在接受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希望能某个合适的时间去英国访问，但是他绝不会留在英国。“我从20岁开始就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

生，几十年来我的信念一直没有变，莫斯科才是我真正的家。”

菲尔比死后，苏联政府还是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后来苏联作家布洛维克还为菲尔比写了一本书。在菲尔比逝世三年前的1985年6月，布洛维克获准第一次采访了菲尔比。在后来的三年中，他根据谈话录音整理出了500多页的手稿。当时布洛维克是想通过菲尔比这个传奇式的人物来让自己出名。但是直到菲尔比去世后，他的书还没有写出来。1988年菲尔比去世后，他再一次向克格勃总部提出要求，希望能查看一下菲尔比的档案。得到批准后，布洛维克走进了卢比扬卡的档案馆，找到了菲尔比的档案。在那长长的档案箱外面有一行字迹：档案号5581。第一卷。绝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红旗勋章



菲尔比的墓碑

布洛维克相信，他是第一个接触菲尔比档案的局外人。通过查阅档案，布洛维克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

密——原来那个包括大名鼎鼎的菲尔比在内的、对英国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危害的“剑桥五杰”，生前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克格勃的信任！尽管在生前，菲尔比和他的同伙们为克格勃提供了那么多价值无法估量的重要情报，而且一直是对苏联忠心耿耿，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

但不管怎样，在20世纪的世界间谍史上，哈罗德·金·菲尔比无疑是一颗最为耀眼的间谍之星，也是英国情报机构不能言说的伤，不堪回首的噩梦。

第十四章 改变信仰，“间谍王子”投靠苏联

英国特工乔治·布莱克享有“间谍王子”之称，自从在朝鲜被捕后他就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一直在为苏联人服务。冷战期间他除了向克格勃提供“黄金行动”的重要情报，还把42名西方间谍出卖给了苏联，结果被英国当局判处42年有期徒刑。不料他绝处逢生，逃往苏联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半个世纪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还为他庆祝85岁的生日并给他授勋，平静的晚年让他似乎明白了许多……

朝鲜之行让他成了克格勃的间谍

双重间谍达斯科·波波夫功成身退，成了大英帝国的英雄；而另一位曾是英国情报机构的双重间谍却让英国人恨之入骨——此人就是在世界间谍界享有“间谍王子”之称的双重间谍乔治·布莱克。

乔治·布莱克1944年成为英国军情六处特工之后，不久就投靠了前苏联，其双重间谍身份直至1961年方才暴露。事隔半个世纪之后的2007年11月12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还为乔治·布莱克举行了授勋表彰的仪式，以庆祝这名双重间谍85岁的生日。

2007年11月12日晚，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总部灯火通明，一场特别的庆祝活动在这里举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前总理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向布莱克颁发了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并宣读俄罗斯最高领导层发来的贺电。在隆重的表彰大会上，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发言人谢尔盖·伊万诺夫说：“布莱克提供的信息总是迅速、准确，极其重要。布莱克所提供情报的重要性再怎么高估也不过分。”

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在那些日子里接连表彰了好几位前苏联时代的著名间谍。11月2日，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还高调表彰了当年成功窃取原子弹秘密的科

瓦利。这位在2006年去世的间谍获得了俄罗斯国家勋章，因为他的间谍行动帮助前苏联加快了原子弹的研发。

对于俄罗斯如此大张旗鼓地表彰前苏联时期间谍的做法，西方媒体认为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在五个月前的2007年6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向1985年叛逃英国的前克格勃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举行了授勋仪式，所以这可能是俄罗斯对英国的回应。第二个原因，就是英国与俄罗斯之间关系在那些年因接二连三的“间谍案”持续紧张。尤其是俄前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中毒案发生后，英方要求引渡嫌疑人、前特工安德烈·卢戈沃伊，遭到俄方拒绝，于是英国就在2007年7月宣布驱逐4名俄外交官。

此外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原因，那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是克格勃的老特工，一直为自己的经历感到骄傲。他接连表彰间谍的做法显然是想弘扬爱国主义，而这对于即将于当年12月2日开始的俄罗斯杜马大选非常有利。

总之，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高调表彰布莱克，总是有道理的。因为布莱克的间谍生涯的确充满着传奇

色彩。他当年曾令英国情报机构损失惨重，后又成功越狱逃亡前苏联。尽管对外情报局依然没有透露他的行踪，但布莱克却说自己一直过着“充实”、“幸福”的生活。

有一篇文章竟然是这样诗化地描写着布莱克的晚年生活——

莫斯科郊外的早上，和煦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在一座别墅前的草坪中，两位老人坐在椅子上悠闲地交谈着，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他们的妻子则在一旁烤着牛肉……倘若此情此景让远在英国的秘密情报局得知，定然羞愧难当，气急败坏。因为，这两位老人都是秘密情报局的叛逃者，克格勃的间谍明星。其中一位是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间谍”的金·菲尔比，另一位与菲尔比一样，也是苏联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的获得者，继菲尔比之后创造世界谍报史又一个奇迹的乔治·布莱克。

乔治·布莱克原姓贝哈，1922年11月11日生于荷兰鹿特丹。父亲艾略特·威廉·贝哈是出生于埃及的犹太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艾略特参加了皇家海军，并且因为作战勇敢而被授予大英帝国的勋章。

布莱克的父亲在46岁的时候因病去世后，13岁的布莱克来到埃及的叔叔家生活。他的叔叔就是后来成为埃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亨利·库里尔。在开罗，布莱克与他的叔叔朝夕相处了三年，年轻的布莱克受其叔叔影响，接受了早期共产主义教育。但是，布莱克性格内向，与周边的人格格不入。虽然他的学习成绩优异，并且很有学习语言的天赋，但是他总是表现得很怪异，善于伪装，喜欢打扮成各种各样的形象，不仅有英国海军上将，还有修道士，甚至著名的阿拉伯间谍劳伦斯。

1939年，布莱克回到荷兰上中学。德国人的入侵打破了他的少年梦，这时的布莱克显得成熟多了。一位英国朋友劝说他回到英国，可是德国人的狂轰滥炸阻断了布莱克回家的路。1940年，德国入侵荷兰，盖世太保逮捕了布莱克，把他关进了德国的集中营。虽

然集中营由党卫军严加看守，但年轻的布莱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后还是设法逃了出来，并顺利地逃到了叔父的家。不久，布莱克参加当地的荷兰地下抵抗运动，充当抵抗运动的信使，执行了几次传递情报的危险任务。战后，布莱克因此还获得了荷兰女王授予的四级拿骚十字勋章。就在这个组织被德国人渗透打击的时候，为了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布莱克再次接受朋友的邀请回到了英国。

布莱克回到英国后加入了英国皇家海军，成为一名普通水兵，他被安排到一艘扫雷艇工作。这时，他的上司无意中发现他会说英语、荷兰语、法语和德语等好几种语言，就把他介绍到一个军官委员会去培训。由于他的培训成绩出色，被晋升为英国皇家海军后备队的中尉，并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



潜伏在英国军情六处的乔治·布莱克

布莱克曾被派到朴茨茅斯接受潜艇训练，但是他对潜艇一点也不感兴趣，在一次训练时竟然晕过去

了。他的上司最后又把他调到海军情报局工作，这样他终于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

布莱克到海军情报局不久，就调到了特别行动执行局的荷兰处工作。这对布莱克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个部门的前任因为在“北极行动”中的耻辱而被革职，这让布莱克有了更多的表现机会。后来，他又来到盟军远征军司令部做德文翻译，翻译德国人的文件，有时还帮忙审讯德国俘虏。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布莱克被调到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工作。二战结束后，他因为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而被授予海军上尉的军衔，在汉堡的军舰上出任情报官。在这个职务上，布莱克忘我地工作，整日地忙碌于报告与备忘录中。大家对他的努力有目共睹，但是他看不起那些同事。在布莱克的眼里，那些人的水平简直太差了，是一些非专业的情报人员，无法与自己相提并论。不过，上司还是对布莱克非常赏识。

就是在汉堡，一个转机摆在了布莱克的面前。秘密情报局的肯尼恩·科恩在一次检查的时候，发现布莱克正在看一本俄语语法书，当他得知布莱克正在自学

俄语的时候，不禁对他欣赏有加，这么一个具有上进心的人肯定会大有前途的。

此时秘密情报局的工作重心早就转向了苏联，布莱克不仅勤奋，而且还对俄语感兴趣，是非常难得的，科恩果断地认定这是一个理想的情报人员。他告诉布莱克，现在外交部正在招募外交人员。布莱克早就在军舰上待够了，因此毅然申请了复员。1947年，由于特别情报处官员肯尼恩·科恩的推荐，外交部决定录用布莱克，并派他进入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学习俄语。他刻苦的精神给授课老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8年布莱克在唐宁学院毕业之时已经精通俄语。外交部将他分配到外事局九处一科，暂时任代理领事。其实，外界人根本不知道，布莱克进入的“九处一科”是从属于外交部的秘密情报部，而且秘密情报局还多次让他去执行任务，外交部的晋升名单上自然是没有他的名字。几个月后，布莱克接到通知，要他到南朝鲜首都汉城任职。谁也预料不到，就是这一次远东之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布莱克到了南朝鲜，担任英国驻南朝鲜领事馆的代理领事。这次工作与他在汉堡时截然不同。他精力

充沛，认真严肃，与同事关系非常融洽，在饱览朝鲜风光的同时，还广泛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地席卷南朝鲜。当朝鲜人民军攻进汉城后，各国的外交使团纷纷外逃，可是英国公使馆的人员还没有来得及撤退就被捉住了，布莱克和英国领事馆里所有的人立即成了阶下囚，并被送到平壤拘留营里，后来又都被送往鸭绿江边一个叫满埔的地方。

在拘留营里布莱克表现得非常好，他不仅照顾自己的难友，还极力地做其他事情，无疑是拘留营里最勤劳的人。

据布莱克晚年回忆录叙述，在朝鲜，他目睹了李承晚政权的昏庸无能，亲历了美国飞机对朝鲜村庄的野蛮轰炸，内心深受触动。在朝鲜拘留营里，苏联和朝鲜开始对布莱克等人进行“洗脑”，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苏联国家全部政治教育部还专门派来了意识形态专家格列戈里·库兹米奇亲自出马，试图策反这些“战俘”。库兹米奇用流利的英语与布莱克私下交流，一开始他们之间唇枪舌剑，布莱克表现出一种对社会主义抵制情绪。

但是就在一年半之后，布莱克发现自己的抵抗是徒劳的，他最后向库兹米奇坦白说，自己已经接受并且信仰共产主义了。布莱克还告诉库兹米奇，他愿意为克格勃效力。有意思的是，后来库兹米奇叛逃到了美国，投靠中央情报局，而布莱克却一直在为克格勃效力。

当时布莱克提出为苏联工作的三个条件：第一，他只提供与反对共产主义国家有关的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第二，他不接受酬金；第三，不必提前释放他。总之，从那时起，布莱克就是克格勃的间谍了。

1951年11月的一天，布莱克在拘留营消失后又被带回来，据说他在逃跑时被抓了回来。两年后，布莱克接到通知说，他们将被释放。于是在1953年3月，布莱克和英国公使、领事等人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安排下，经北京、莫斯科、西柏林，回到了英国。当他到达伦敦时，他满脸的胡须，长长的头发，若不是仔细辨认还真是认不出来。在那里他们受到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的热烈欢迎。

这位被民众当做英雄一样接待的人，回国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秘密情报局的调查。秘密情报局让

他写出一份有关自己经历的详细报告。没有人怀疑他的朝鲜之行，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是秘密情报局的人，只知道他是外交部的人。外交部长亲自写了一封慰问信，让他好好休息。

英国当局判处他42年徒刑

朝鲜之行无疑给布莱克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因此一段长时间的休养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的身体恢复之后，他向外交部打报告要求尽快工作，于是秘密情报局把他分配到军情六处驻伦敦克伦威尔大街分部工作。他的任务就是专门从事窃听和检查外部邮寄包裹。

秘密情报局的负责人认为，布莱克是难得的人才，他做这样的工作有些大材小用，应该把他安排到最需要他的柏林去。这对布莱克来说真是天赐良机。所以他后来在柏林任职的四年时间，成了他为克格勃效力的最重要时期。在那四年时间里，布莱克向克格勃报告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柏林创建间谍网的情况，其中包括在共产主义国家中招募的近400名间谍人员名单，使英国秘密情报局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全部瓦解。

许多即将要叛逃西方的苏联官员被克格勃秘密处决了。据称，由于布莱克的叛变，最终导致42名英国间谍死于他手。这也是后来英国司法当局超出常规，判处布莱克42年徒刑的主要原因。

1955年4月，布莱克到了西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秘密情报局工作站，在那里担任技术行动部副主任。当时他的特殊使命就是研究驻德苏联军队的情况，并且负责在苏联军官中物色叛徒。就在布莱克与苏联人联系时，却被他的上司发现了。不过他的上司认为，布莱克与苏联人联系，并且向他们传布一些假的情报，这是秘密情报局特许的，不用大惊小怪。秘密情报局还打算让布莱克扮演双重间谍的角色，让他更好地为大英帝国服务。于是布莱克就利用这个机会，向苏联提供了更多的真情报。

布莱克来到柏林后，欠下的第一条人命就是当时东德国家安全局的局长罗伯特·比亚维克中将。1953年，罗伯特·比亚维克与秘密情报局联系，要求叛逃西柏林以政治避难。当时东西方阵营冷战已经拉开战幕，双方正处于敌对状态之下，英国秘密情报局对于比亚维克的这种要求当然是求之不得，何况这还是一

条大鱼，于是就接受了比亚维克的要求。

1953年，比亚维克终于叛逃到了西柏林，改名换姓之后，被秘密安置在西柏林的一个安全住处。秘密情报局当然知道，苏联的谍报组织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克格勃对待叛徒从不会心慈手软，因此就对比亚维克增加了防护措施，一开始，在他的公寓周围设立了流动岗哨，给公寓安装了加厚的防盗门和保险锁，并且还有与英国安全官员联系的报警器。为了不暴露身份，比亚维克自己也从不出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转眼，比亚维克叛逃西方已经有三年了，他以为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苏联人不可能总是盯着自己不放。于是在1956年2月的一天，比亚维克一时高兴，在没有安全人员陪同的情况下私自出门散步去了。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小巷子口，就从暗处闪出两个人来扑向他，将他拖进一辆早已等候在那儿的小汽车。事后尽管英国政府多次向苏联提出交涉，但苏联当局就是一口否认，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比亚维克的下落。英国人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此，比亚维克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这次活动的幕后黑手就是布

莱克。

原来布莱克与比亚维克的住处相隔不远，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监视比亚维克的一举一动，但是三年来却一直没有机会下手。那天，当布莱克发现比亚维克走出来之后，他立刻打电话向克格勃汇报，于是比亚维克就被克格勃人员劫持了。布莱克手上有了第一条人命。

后来又有一个重要人物被布莱克出卖了，他就是被美国人认为最有情报价值的格鲁乌彼得·波波夫。

波波夫出生于俄国的一个农民家庭，但是对苏联剥夺农民进行工业化的做法十分不满，决定叛逃美国。1953年，波波夫在维也纳暗中投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且很快就成为战后为西方效劳的最有成效的间谍。波波夫每月都会同中情局的特工会面，向他们提供各种情报。在维也纳工作的两年期间，波波夫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将近400个苏联间谍的名单。除此之外，还有苏联战略武器的研制情况，这些情报的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1955年，波波夫从维也纳调到东柏林后，暂时与中情局失去了联系，波波夫只好通过英国军事使团把

信件转交给自己的联系人。按工作流程，这些信件应该首先交给秘密情报局设在当地的情报站，然后由情报站与中情局联系。这些信件传到柏林情报站的布莱克手中后，布莱克虽然如期把信交给了中央情报局，但是在转交之前他已经阅读了信件的全部内容，并且向克格勃进行了汇报。就这样，波波夫很快被召回莫斯科。波波夫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了，仍然继续与中央情报局联系，可是这一切都在克格勃的监视之下。

1959年10月的一天，当波波夫在莫斯科一辆公共汽车上向美国驻莫斯科使馆的一名中情局间谍传递情报时，被当场抓获。苏联人是不能够容许自己的人叛国投敌的。所以波波夫的下场十分悲惨，在众多克格勃同事的面前，他被活生生地扔进烈火熊熊的炉子里烧死了。布莱克又为克格勃立了一大功。

在柏林工作期间，布莱克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向克格勃出卖了“柏林隧道”的秘密，这不仅给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还让他们丢尽了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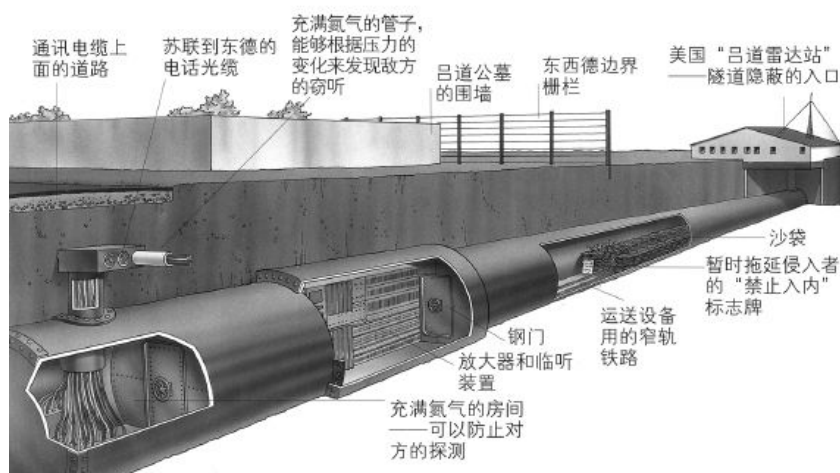
1953年前后，世界冷战格局已经形成，当年二战

战场上的盟友如今已经刀兵相见，苏联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要敌人。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柏林成功地实施“白银行动”之后，又在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合谋，制定了一个代号为“黄金行动”的计划。该计划主要是由美国中情局实施，具体内容就是从西柏林挖一条长450米的隧道通到东柏林，并在东柏林至莫斯科的三条地下电缆上，采用英国工程师设计的搭线方法实施窃听。该线路除了窃听苏联与东德之间的军政电话外，还可以窃听东柏林到波茨坦的苏联军事司令部以及苏联驻德防区和华沙之间的电话。整个隧道从美军占领区的地下开挖，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派工兵进行施工。挖掘隧道与安装窃听设备历时一年，一共耗费了大约2500万美元。

“柏林隧道”竣工后，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指望这条“柏林隧道”能成为一个超级的情报来源，获取苏联大量的军事情报，在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前得到一些预警时间。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这种美好的愿望纯属自欺欺人。他们虽然耗费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但是到头来窃听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些他们所希望听到的情

报却一无所获。就连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他们在“柏林隧道”里都没有听到一点征兆。这种反常的现象，让西方情报机构实在大为不解。

原来早在隧道还未动工之前，布莱克就已经把这项绝密计划泄露给了克格勃。苏联人来了一个将计就计，把所有的机密情报都改在其他线路上传送；同时，把从“柏林隧道”经过的几条电缆作为迷惑对方的道具，传送的都是一些假情报或者是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情报，让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在这里守株待兔，到头来却一无所获。直至布莱克1961年被捕后，他们才发现了这个秘密，知道上了大当。



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共同策划实施了“柏林隧道”计划

1956年4月22日，苏联通信工程兵在维修电缆时，一个通信兵突然掉进了隧道，这条“柏林隧道”被暴露出来。苏联当即召开记者会，指责美国人入侵苏联管辖区，并让众多记者参观这条通向美占区的隧道，使英国和美国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但是此时，美国和英国的新闻媒体却仍在大肆宣传，说这条隧道三年来的窃听行动，是冷战中最大的成功。

“如果像‘柏林隧道’这样现今广为人知的大规模情报行动取得成功，美国和英国就可以沉重打击苏联，”前克格勃官员伊万诺夫说，“也就是说，由于布莱克，苏联得以避免非常严重的军事和政治损失。”

布莱克在柏林工作了四年后，于1959年调回伦敦秘密情报局总部工作。但是他待在伦敦的时间并不长。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后，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个国家对埃及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侵略战争，妄图夺回运河，不料遭到失败。英国认为必须派一个掌握多国语言的人到中东去，这样才可以在诸如约旦、科威特和其他波斯湾阿拉伯语国家中保持应有的影响。他们想起了“语言天才”布莱克，就把他派到黎巴嫩学

习阿拉伯语。

布莱克到达黎巴嫩后还不到一个月，他那双重间谍身份就差一点暴露——原来在柏林工作期间，布莱克结识了一位双重间谍埃特纳。这个埃特纳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天赋，他好吃懒做，喜欢奢侈舒服的生活，但是当时的条件根本就满足不了他的奢望。二战期间，他曾经加入希特勒的纳粹组织，后来认清德国的反动面目后就改过自新了。1950年，他与秘密情报局联系上，几年后逃到西德，又与西德的情报局联系密切，揭露了几个为苏联工作的美国人。不过因为他太不知道检点，没有人理睬他。1956年，他再次为秘密情报局服务，但是他经常因为挥霍而入不敷出，又不得不向苏联人出卖情报。这个唯利是图的家伙，只要谁愿意出钱，他就把情报卖给谁。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在与情报人员接头的时候，竟然还偷偷地把对方拍摄下来，录下他们的谈话内容，然后再卖出去。布莱克的上司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家伙，因此就让布莱克与之接近，不过不让布莱克向他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埃特纳后来发现，布莱克竟然是一位双重间谍，于是他打算把这个消息存起来，说不定哪一天能

卖个好价钱。

1959年，就在布莱克到达中东后的一个月，埃特纳因为家庭问题而暴露了。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逮捕了埃特纳，指控他向苏联提供情报。埃特纳在狱中承认了他的双重间谍身份，并供认他是在一个名叫“范弗里斯”的英国人煽动下才为苏联人搜集情报的，而“范弗里斯”正是布莱克当时的化名。联邦德国得到这一消息后，马上向秘密情报局通报了有关情况，不料英国人对此却不予以理睬，因为当年布莱克同埃特纳接触是经过秘密情报局批准的。所以，英国秘密情报局认定埃特纳是一条疯狂的落水狗，逮着谁咬谁，这样才让布莱克侥幸地逃过了这一关。

但是不久以后，布莱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当时有一个代号为“狙击手”的间谍，他的真实姓名叫迈克尔·戈列涅斯基，公开身份是波兰总参谋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副部长，但实际上他却是美国中情局的一名间谍。此人行踪十分诡秘，在1961年叛逃之前，连中情局都不知道他的国籍和真正身份，只知道他与克格勃有密切联系。

“狙击手”提供的一份情报说，克格勃已经搞到一

份秘密情报局文件，上面列有英国在波兰的谍报人员名单。“狙击手”又透露说，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还隐藏着一个极为活跃的克格勃间谍，代号为“钻石”。其实这个“钻石”就是布莱克当时的代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将这个情况通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但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查遍了伦敦总部和波兰间谍站的所有特工，结果是一无所获。这一次清查不仅没有找到“钻石”，反而暴露了“狙击手”的存在。

“钻石”向克格勃报告，称波兰情报部组织内有一个为西方工作的间谍，代号“狙击手”，但是不知道其具体身份。这时“狙击手”与“钻石”都知道对方的存在，都清醒地意识到对方能将自己置于死地，因此都急切地要求自己的主子清除叛徒。

克格勃的动作比军情六处的动作要快得多，只可惜他们找错了人。由于戈列涅斯基是波兰情报部内负责反间谍事务的直接领导，且一直得到克格勃的器重，因此克格勃把挖出“猪”（“猪”是克格勃对叛徒的称呼）的任务交给他负责，大吃一惊的戈列涅斯基马上仓皇逃往美国。

军情六处的专家也随后赶往美国，去调查那份名

单的情况。得知军情六处还没有找出“钻石”后，戈列涅斯基吓坏了，他生怕来审问他的人就是“钻石”，说不定还是奉了克格勃的命令来干掉他，于是就痛斥军情六处的无能。不过最终他还是与秘密情报局合作，告诉他们克格勃不是从秘密情报局总部和波兰获得的名单，而是从一个柏林情报站的情报人员那里得到的。

秘密情报局惊呆了，原来那个间谍就在他们内部！他们找到秘密情报局柏林情报站的名单，查对以后，发现布莱克最有嫌疑。因为从1960年以后，“钻石”提供的机密文件突然中断了，而那时布莱克恰好被派往贝鲁特学习阿拉伯语。直到这时，军情六处才如梦初醒，他们相信那个代号“钻石”的间谍就是乔治·布莱克。

秘密情报局知道，布莱克一旦感觉自己被怀疑了，那他随时都有可能向苏联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到时候想要抓他就更困难了。于是秘密情报局马上发了一个电报，让布莱克回伦敦参加紧急会议，将布莱克从贝鲁特骗回伦敦。

布莱克的行动非常迅速，第二天就回到了伦敦。

但是他一到伦敦就被带到局长办公室。时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的怀特与其他几位官员正好都在局长办公室，布莱克一走进门，就宣布他违反了《保密法》，要对他进行审查。布莱克一听，顿时脸色发白。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他一下子惊呆了。

不过他毕竟是受过特工专业训练的人，就在别人一口咬定他是苏联间谍的时候，布莱克坚决否认，整整一个上午没有结果，布莱克被那些审查他的人折磨得垂头丧气。吃完午饭回来之后，布莱克还是垂头丧气，他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次抵抗下去了，就干脆承认了自己叛国的罪行，并且在笔录上签了字。怀特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签字后，布莱克被带到伦敦警察局关押起来。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布莱克犯了什么罪行，只是在推测，就连伦敦的那些报纸也是含糊其辞。一些议员向时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询问，哈罗德·麦克米伦也只说两天以后回答他们。

1961年5月3日，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开庭审理这一案件。那一天，布莱克身穿一套灰色西装，打着领

带，满脸的络腮胡子还是像以前一样。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了法庭，似乎还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他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就在首席法官帕克进入法官席之后，英国王室的法律顾问布勒先生、秘密情报局局长怀特以及安全局局长罗格·霍里斯爵士也到了。布莱克被带到被告席上的时候，检察总长开始宣读布莱克的经历和犯罪经过，面对铁的事实，布莱克已经无话可说了，只有低头认罪。

伦敦中央刑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乔治·布莱克42年徒刑，这是英国自废除死刑以来最严厉的判决，相当于判处了他的终身监禁。所以当宣判一结束，法庭里立刻响起了一阵惊叹声。

从此，布莱克开始了他漫长的牢狱生涯。起初他被关押在伦敦北郊的沃姆伍德·斯克拉布监狱，并被列为“特殊监护”的犯人，这是对有可能越狱的犯人采取的特别措施。斯克拉布监狱是英国关押过许多间谍的地方。整个监狱里面建了四大排牢房，里面的设施非常齐备，有车间、教堂和运动健身的场所。监狱的周围耸立着高20英尺的围墙，若是想逃出去，真是比登

天还难。

越狱成功

布莱克刚进入牢房的时候，就受到了“特殊监护”的“照顾”，这是对那些特殊人物的一种待遇。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布莱克表现得非常安静，他循规蹈矩，没有任何反常的举动。当时英国安全局的局长罗杰·霍利斯还要求把这个特殊人物转移到别的监狱，但是监狱长并没有接受，还是把他留在原处。然而四个月以后，霍里斯爵士通知监狱负责人，对布莱克的调查已经结束，要求解除对布莱克的“特殊监护”。于是，监狱长就把布莱克安排到第四排牢房的一间普通单人牢房中。监狱长发现布莱克会阿拉伯语，就让他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在监狱里教授阿拉伯语。

当时布莱克对自己的判决不服，提出了上诉，但是经过辩护律师们一番慷慨陈词之后，仍然没有得到改判。因为那些法官们早就对这种叛国行径深恶痛绝了。法庭认为这是为了维护祖国的利益。

布莱克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彻底地绝望。他一边在过着似乎无穷无尽的囚禁日子，一边在等待着

越狱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就是布莱克在教授阿拉伯语的时候，结识了四个狱友，这为他后来的越狱逃跑起了关键的作用。第一个就是朗斯戴尔，他也是因为戈列涅斯基的告密而落入英国安全局后，被判处25年监禁。布莱克得知，朗斯戴尔正在等待苏联政府的营救，他很是得意，相信不久就会自由了。

第二个是间谍米歇尔·兰德，这是一名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小伙子，以前在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任职，后来误入苏联谍报组织的圈套，被判处8年监禁。

第三个叫肯尼思·戴库西，是一个金融巨头，也是英国的情报专家，他因为犯有欺骗以及诬陷罪而被判刑。

布莱克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如果要想越狱，并不能完全指望这三个人的帮忙，他们也许不会帮助自己。自己能够指望的，应该是那第四个叫肖恩·伯克的狱友。

肖恩·伯克是个爱尔兰天主教徒。他不是搞情报工作的，他犯的是刑事案件。肖恩·伯克年轻机智，在后来布莱克越狱过程中果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1965年的夏天，布莱克找到伯克说需要他帮忙办一件事情。当伯克问他是什么事情的时候，布莱克就公开对他说，他想越狱，需要伯克的帮助。伯克一听，果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就一直在商讨怎样才能逃出这座监狱。当时他们还预算了一下，要达到这个目标大约需要700英镑的费用。布莱克想到伯克即将假释，就同伯克商量，让他出去后去找自己的母亲，让母亲为他提供经费。布莱克把一张孩子的照片撕成两半，托人将一半给了他母亲，一半给了伯克，这样二人见面时，就可以认证了。

1966年，伯克假释后，就开始为布莱克策划越狱行动。他来往于监狱与外部世界，布莱克也就通过伯克与外界交流，但在经费问题上，伯克还是一筹莫展，因为布莱克的母亲最终也没有筹到700英镑，伯克就决定自己想办法来帮助布莱克。

伯克找自己的朋友雷诺帮忙。雷诺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一直对英国政府心怀不满，当他听说布莱克的情况之后，愿意帮伯克这个忙。这时，布莱克也在积极为自己的越狱作准备。他初步谋划好了越

狱的方法和路线，并且根据每一个看守的位置和距离，计算好了绳子从墙外抛过来的时间和他爬上墙头逃走需要的时间。他把这一切都计算得天衣无缝，只等伯克和他联系。

为了能同布莱克保持联系，伯克在监狱外边租了一间房子，这样同布莱克的联系就方便多了。但是周围的高楼大厦太多了，信号都被挡住了，布莱克一时也联系不到伯克就着急了，对着步话机拼命大喊，还是没有回应，倒是把狱卒引来了。不过那个粗心的狱卒却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正当布莱克快要绝望的时候，伯克再次与布莱克取得了联系。

10月18日，伯克再次与布莱克联系，两人详细商量了四天后的计划。因为伯克打听到了一个消息，10月22日晚上监狱放电影，大多数人都会去看电影，这真是个越狱的好机会。

10月22日晚上，电影还没有开始放映，伯克就在监狱外面等着。当他们刚要行动时，伯克发现刚好有一辆巡逻的警车开了过来，他立刻通知里面的布莱克停止了行动；紧接着又是一辆小卧车通过，伯克又叫布莱克停止行动。等到那辆该死的小卧车一开过去，

伯克孤注一掷地抛出了绳索，布莱克接住绳索后爬上了墙头，然后跳了下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伯克把布莱克抱起来就往车子里塞，开着车子一溜烟地跑了。

那天晚上，整个伦敦因为布莱克越狱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跑来跑去的警察和宪兵，但是布莱克与伯克就藏匿在那间租来的小屋子里，安然无恙地商量着下一步出逃的计划。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布莱克决定去东德，并且让伯克用一个假名字去办护照。但是伯克试了几次，护照一直办不下来。正当布莱克焦虑不安的时候，伯克又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伯克说他有一个关系不一般的朋友叫迈克尔，是一家钢铁公司的老板。伯克向他说明了布莱克的身份后，迈克尔马上就答应护送布莱克出境。第二天，布莱克躲在迈克尔那辆坐卧两用汽车的床下，一路上由迈克尔夫妇应付着检查出了伦敦城，然后经过多佛尔渡口，到达了比利时，又经西德前往东德，一切都非常顺利。到了东德边防哨卡，布莱克才站出来向哨兵说明自己的身份，立刻受到驻东德的克格勃官员的热烈欢迎，并用飞机把他送到了莫斯科。

在莫斯科，布莱克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苏联当局热情地接待了他，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红旗奖章。这是苏联给予一个外国间谍的最高荣誉，这让布莱克感到既兴奋又激动。

从此以后，布莱克就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莫斯科。他先是在莫斯科担任苏联情报部门的教员，负责为克格勃培训特工，后来在苏联的一家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上班，克格勃还授予了他上校军衔。几年以后，布莱克打破了沉默，撰写了两本回忆录，回忆自己的间谍生涯，向世界读者展示了其不平凡的一生，其中一本书的标题就是《我的间谍生涯》。

布莱克在英国人的眼里则是个地地道道的叛国者。他提供的情报让几十名英国特工暴露了身份，令英国情报机构损失惨重。后来美联社曾报道说，被布莱克“出卖”的英国间谍可能多达数百名。

布莱克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在自己的自传里有过解释。他说1950年他成为朝鲜军队的俘虏后，当时所看到的一切使他决心放弃效忠英国，主动选择为苏联效力。布莱克说，当看见美军轰炸“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朝鲜小村庄”时，“没有人会为站在西方世界

一边而感到太骄傲”，“我最后得出结论，对抗共产主义是错误的”。

一直到了晚年，布莱克依然相信自己当初作出的选择是正确的。有一次，布莱克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我本可以离开情报工作，本可以加入英国共产党，本可以在街角出售《工人日报》（前英共机关报）。许多人说，那可能是更光荣的事业。但我觉得，如果我抛开顾虑，我能够为这份事业做得更多，做出更大贡献。”

然而，布莱克的好朋友伯克的命运却远没有布莱克那样好。他后来也到了莫斯科，准备投靠布莱克，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布莱克既没有热情地接待他，也不愿意诚心地帮助他，好像把伯克当年对自己的帮助完全忘掉了。

伯克觉得布莱克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从此再也不对他报任何希望了。后来他找到了自己的朋友凯文，离开了莫斯科到了爱尔兰，可是在那里他再次被捕。面对审判，伯克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地说，他之所以愿意帮助一个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不顾一切的人，是因为他同情布莱克。当时英国政府提出了引渡

伯克的要求，但却被爱尔兰最高法院给拒绝了，只是判处了伯克缓刑。

1970年，伯克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了《乔治·布莱克的出逃》一书，大赚了一笔。但是，由于他的放纵与挥霍，不久后又身无分文。

布莱克在英国曾有过一个不错的家庭，并且有三个子女，逃亡苏联后又在莫斯科重新组建了家庭。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布莱克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时间。当时俄罗斯政府中一些人曾主张将他驱逐出境，但几个月后终于放弃这一想法。让布莱克没有想到的是，过了半个世纪以后，到了2007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还会为他85岁的生日举行盛大的庆祝会，并再次为他颁发勋章。在那次盛大的庆祝会上，俄罗斯情报官员伊万诺夫再一次为布莱克唱赞歌，他说，布莱克至今依然忠于社会主义理想，相信社会公正。

布莱克晚年的生活非常平静。他经常说：“能活到现在这把年纪，身体健康，过着很有趣、很充实的幸福生活，我感到非常幸运。”

当年英国间谍菲尔比的出逃让英国秘密情报局颜面尽失，而布莱克又在秘密情报局的伤口上撒了一把

盐，彻底摧毁了英国情报系统的声誉。可以说，英国秘密情报局真是厄运连连啊！

第十五章 追查“鼯鼠”，情报局进入多事之秋

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谍报机构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查“鼯鼠”行动，试图追查出隐藏在内部的苏联间谍。在破获朗斯戴尔的案件之后，军情五局顺藤摸瓜，居然将目标盯上了自己的局长霍利斯。尽管霍利斯始终没有承认，但这种怀疑却一直未能解除，最后只好草草收场。虽然事隔二十多年后真相大白，但“鼯鼠”却成了英国情报机关永远的痛。

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

20世纪50年代，英国情报机构进入了多事之秋。

苏联派遣大批特工潜入英国，有的甚至打入了英国情报机构的要害部门。

1958年的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给英国同行透露了一条信息：有一个重要的苏联间谍打入了英国情报机构，另外还有一个苏联间谍在英国海军部门工作。那个打入英国海军部门的苏联间谍1952年曾在华沙工作过，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H”。

得到这个消息后，英国情报机构感到事态严重。英国安全局立刻着手调查，他们找来了一本海军情报局的花名册，从里面找到了许多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H”的人，然后，逐一进行甄别，最后将目标锁定了一个名叫哈里·霍顿的人。

安全局为什么认为哈里·霍顿就是他们要找的人呢？因为霍顿的档案资料显示，1952年，他曾在英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过。在驻波兰大使馆任职期间，霍顿见波兰药品急缺，就利用自己外交官的身份走私青霉素，因此大发横财，在华沙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行为极不检点。波兰军事情报局察觉后，将其逮捕，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差一点酿成了一桩外交事端。

对于这样一名有损国家声誉的外交官，英国驻波

兰大使馆当然不能容忍，只得将其打发回国。然而，当时英国驻波兰大使馆并不知道霍顿被波兰军事情报局抓获后，居然被波兰军事情报局收买，成了一名波兰间谍。后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声名狼藉的霍顿并没有马上离开波兰，而是混入了英国驻华沙大使馆的海军武官处，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才回到了英国。霍顿的这些经历都与美国中情报局提供的信息相吻合。

然而，霍顿回国后，并没有经过必要的审查，又被安排在波特兰岛的英国海军基地水下武器中心工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波特兰岛北部的人造深水良港曾经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军事基地。二战结束以后，英国皇家海军和“北约”的部队一直在此屯兵训练，直到20世纪90年代。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居然一直在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真是不可思议。要不是美国中情局的提醒，哈里·霍顿的间谍身份还一直不为英国情报机构所怀疑。哈里·霍顿出身低微，根本就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职位也不高，所以一直没有引起英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由于出身和教育的原因，霍顿尽管是一名间谍，但却没有一个间谍的起码素质。他在波特兰英国海军基地工作期间，还是同当年在华沙做外交官时一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还同在基地工作的一个女孩子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开始喜新厌旧，嫌弃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的家庭生活搞得一团糟。

霍顿的妻子为了报复，开始注意丈夫的言行举止，偷偷掌握了霍顿许多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有一天，霍顿的妻子就向他摊牌了，要他马上结束同那个女孩子的关系，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否则就要去基地告发他。但是，霍顿并不是一个害怕威胁的人，当时又正同自己的小情人打得火热，就根本不理睬妻子的那一套，依然我行我素，结果，他的妻子真的跑到波特兰海军基地安全官那里去告他了，说霍顿为了一个在基地工作的姑娘而抛弃了她，并且还经常带着那个情人到伦敦去和一个外国人见面。不料，基地的安全官员对于霍顿妻子的告发并不以为然，认为霍顿的妻子只是为了家庭纠纷来告状，很可能是诬告，没有对霍顿进行必要的调查和监视。

直到安全局来进行调查，他们才觉得霍顿的问题

并不是那么简单，开始对霍顿的行动进行监视。经过一番调查，英国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发现，霍顿的确是经常带着他的女友到伦敦去玩，并且每一次到了伦敦，都要同一个叫“朗斯戴尔”的加拿大人见面。于是，那个叫朗斯戴尔的加拿大人也进入了安全局的视野。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安全局调查人员确认，那个叫“朗斯戴尔”的加拿大人真名叫莫洛迪，是克格勃驻波兰情报站站长。莫洛迪1922年出生于莫斯科，7岁时就到美国生活。而真正的朗斯戴尔则是出生于加拿大，1932年去了苏联。苏联人搞到朗斯戴尔的护照后，就来了一个“掉包计”，让莫洛迪顶替那个“朗斯戴尔”来到了英国，开始间谍活动。

莫洛迪来到英国后，用克格勃提供的资金，在伦敦办了一家专门出租乐器、玩具和商用自动装置的连锁店，自己当起了老板，为间谍活动进行掩护。当时，莫洛迪在伦敦除了让哈里·霍顿为他提供情报以外，罗森伯格夫妇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罗森伯格夫妇其实也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克格勃间谍，他们的真实姓名是莫里斯·科恩和洛娜·科

恩。当年都是美国“原子弹间谍案”的参与者。事发后，由当时在美国的克格勃驻北美情报站的站长阿贝尔上校及时把他们转移出来，给他们办了新西兰护照后又帮他们移居到了英国，在斯特兰德开了一家小书店作掩护。

到了英国后，科恩夫妇还加入了英国古书业工会和全国书业工会，成了这两家组织的正式会员。他们伪装得非常成功，与街坊邻居的关系十分融洽，在业界的声誉很好。尤其是莫里斯·科恩的妻子洛娜·科恩在当地竟然还获得了一个“天下第一好人”的美誉。她经常在自己的家中给当地的孩子们举办茶点会，免费给他们提供一些饼干、面包和儿童书籍，成了当地的慈善人物。而莫里斯·科恩本人的图书业务也开展得很不错，经常给外地的读者邮寄各种书籍。但是当时并没有人知道，他正是通过这种邮寄方式，把那些图书重新装订，在里面夹带机密情报，从而把大量的情报寄到苏联克格勃总部。

1958年8月27日，莫洛迪来到大波特兰街米兰银行，寄存了一个手提箱和一只牛皮纸包。他刚离开，英国安全局局长罗杰·霍利斯就亲自带着人来到了米兰

银行，同银行行长交涉之后，取出了莫洛迪刚刚寄存的那些箱子和纸包。他们打开箱子和纸包，发现了一架间谍用的“米诺克斯”牌的照相机，一台专门用于拍摄文件的“普拉克捷娜”牌的微型照相机和一本《英文打字教程》。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这个“朗斯戴尔”是不需要专门学习打字的。英国安全局资深特工彼得·赖特凭经验觉得这本书一定有问题。让罗杰·霍利斯和彼得·赖特最感兴趣的，还是藏在木碗里的七只打火机。经过用随身携带的仪器检查，发现这些打火机底部都是空的。他们用胶皮吸杯和镊子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检查，原来是两套“一次一译”的微型密码本，其中的一套正在使用。这种密码每次使用一页，用完后就销毁，再也无据可查了。

英国安全局获得了这些东西之后，真是欣喜若狂。有了这些密码，他们就可以完整地监听莫洛迪他们的密码电报，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赖特等人把这些东西拍照和复制后重新装订好放回原处，并派人在米兰银行和莫洛迪的住处进行秘密监视，静静地等待他回来。



莫洛迪发展了多名间谍，为克格勃获取了大量英国军事情报

两个月以后，莫洛迪回来了，又住进了原来租住的公寓里。从表面上看，他的生活同以前一样，照样做生意、约会女人。但是，安全局的调查人员并没有

放松对他的监视。他们同伦敦当地的社区进行联系，化装成普通居民直接住到了莫洛迪的隔壁，并装上窃听器。经过两个多月的窃听，他们终于查明了莫洛迪的行踪。

安全局调查人员通过窃听，得知1961年1月7日又是莫洛迪和霍顿接头的日子，于是就作好了周密的安排，准备在他们接头的时候将他们一网打尽。

1961年1月6日的晚上，莫洛迪像往常一样，在一家经常光顾的夜总会玩了个痛快，直到深夜又带了一个姑娘回到了自己的公寓，到凌晨才把她打发走了。这时莫洛迪打开电台，同克格勃总部进行联系。当然，他隔壁的那些“邻居”们这时也开始了紧张的工作。通过窃听得知，克格勃总部命令莫洛迪当天务必同霍顿接上头，取回那只重要的“手提包”。

1月7日的清晨尽管十分寒冷，但是霍顿还是与自己的女友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沿着滑铁卢大街一路往前走，就像一对忙着赶路的情人一样。霍顿的女友拎着一只手提包，还不时地朝后面看上一两眼。他们俩的一举一动，已经在安全局调查人员的掌控之中。这时安全局的调查人员已经会同伦敦警方，在他们周围

布下了天罗地网。不一会儿，莫洛迪就从后面跟上来了，来到了霍顿和他的女友身边。就在莫洛迪从霍顿的女友手中接过那只手提包的一刹那，伦敦警察局的侦探乔治·史密斯突然从一边冒了出来，堵在他们的面前，亮出了自己的警官证，然后对他们说：“我是伦敦警察局的，你们被捕了。”

紧接着，安全局的三名特工围了上来，将他们三人塞进了早就停在路边的汽车，把他们带到了警察局。

在警察局里，狡猾的莫洛迪百般抵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可是他的同伙霍顿则是竹筒里倒豆子，把一切都交代了，而霍顿的那位不明真相的小情人，吓得在一边哭了起来。根据霍顿的交代，乔治·史密斯和几名特工马上驱车来到了克兰利花园路45号，将罗森伯格夫妇抓获了。

一开始，罗森伯格还想抵赖，说自己是一名守法的书商，是一位慈善家。乔治·史密斯问他：“罗森伯格先生，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到你们这里来的那位先生是谁？”

罗森伯格夫妇一听什么都明白了，他们脸色骤

变，意识到自己的事情败露了。

在逮捕罗森伯格夫妇时，安全局再三强调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要把这次行动张扬出去。可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大胜利，伦敦警察局的侦探史密斯却欣喜若狂，很快就把这件事给传出去了。安全局知道后，大为光火，因为事情并不像史密斯等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次行动尽管破获了一个大的间谍网，抓获了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莫洛迪——莫洛迪是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抓获的最重要的苏联间谍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后来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抓捕的阿贝尔上校——但是，负责指挥这次行动的彼得·赖特却高兴不起来。

原来赖特发现，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莫洛迪在落网之前，苏联克格勃总部就已经知道莫洛迪暴露了，但是并没有将他撤回去，反而把他送到英国来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人为了保护英国安全局内部那个泄露机密的内奸！因为那个内奸比莫洛迪更“值钱”，所以他们只好“丢卒保车”。

那么，这个内奸到底是谁呢？赖特百思不得其解。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安全局反间谍处处长琼斯进行

了汇报。很快，赖特的这种猜测又被传到安全局局长霍利斯和副局长米切尔的耳朵里。但是，安全局的这些高层领导们听到了这种猜测后，却非常不高兴。他们认为，如果真如赖特所猜测的那样，安全局的几十名情报官员，岂不都成了怀疑的对象？

于是，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但是，随着一些新的苏联叛逃者陆续来到英国，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也开始浮出水面——彼得·赖特的猜疑并非空穴来风，在英国情报机构内部的确有“鼯鼠”存在。

局长成了“疑似鼯鼠”

鼯鼠原本是一种体态很小、长约10余厘米的哺乳动物，但其破坏能力却不可低估，所以在西方一些国家中，就把那些破坏力极强、吃里爬外的间谍比喻为“鼯鼠”。而当年在英国的情报机构中，“鼯鼠”却成了“苏联间谍”的专用代名词。

就在莫洛迪间谍案破获不久，苏联谍报人员戈利钦叛逃到了英国。戈利钦来到英国后，言之凿凿地声称，克格勃特工已经完全渗透了英国的情报机关，无

论是英国秘密情报局还是英国安全局的任何文件，他们随时都能搞到，就像探囊取物那么简单。

戈利钦的话顿时让英国人乱了方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英国不就成了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堡！早就怀疑在英国情报机构存在内奸的彼得·赖特听到这些话之后，更坚定了自己当时的猜测，于是他开始暗中调查安全局的情报官。

可想而知，这种调查的难度是巨大的。尽管有那些苏联的叛逃者为赖特的调查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要在尘封已久的档案中寻找蛛丝马迹，还要得到相关同僚的密切配合，仅仅靠赖特一个人是无法办到的。于是，赖特找到了秘密情报局局长怀特，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他的支持；接着，赖特又找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安全局局长霍利斯，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赖特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最后霍利斯终于同意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近30年来苏联克格勃间谍对英国情报机构的渗透情况，并由赖特担任这个调查委员会主席。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查“鼯鼠”行动就这样展开了。

这场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也只能是在秘密中进

行。许多调查工作，除了调查委员会中的几个人知情外，对外一律保密。调查委员会首先从英国安全局的内部调查档案与资料入手，希望能从中发现蛛丝马迹，找到那些“鼯鼠”的线索；其次，他们还要在那些叛逃到西方的苏联间谍身上下工夫。

经过一番努力，调查委员会从秘密情报局几份有关的资料中发现，1945年叛逃到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的译员古曾科曾经说过，苏联在西方有一个“原子能间谍网”，其中有一个代号为“埃利”的间谍。那个“原子能间谍网”当时已经破获了，但是那个代号为“埃利”的间谍却下落不明。赖特想，那个“埃利”也许现在还在英国，甚至就在安全局工作。如果是这样，这个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埃利”就是一个最危险的人物。

为了找出“埃利”，赖特不厌其烦地询问每一个叛逃到英国的苏联间谍，也不止一次地找过那个古曾科，但是都一无所获。赖特并没有灰心，通过细致的询问后，选择了一个新侦破方向，把目标对准了安全局专门保管档案的F处，因为只有那里的工作人员可以查阅到最机密的文件档案。但是经过一番调查之后，他并没有发现F处的那些工作人员与苏联人有什么勾

结。

这时，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赖特的脑海中闪过——保管档案的人没有问题，那么，有权调阅档案的人呢？就这样，赖特最后竟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自己的顶头上司——时任安全局局长霍利斯。

赖特此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痛苦、矛盾又害怕。如果安全局局长真的是苏联间谍，那么，英国就真的是无任何秘密可言了。

但是，赖特不愿意就此罢手。他想，既然已经抓到了“鼯鼠”的尾巴，就要将他揪出来。通过调查，赖特进一步发现，当年处理古曾科的官员就是现任局长霍利斯，是他亲自去审讯古曾科的。正是在这次审讯结束之后，人们才从霍利斯口中知道了有关“原子能间谍网”以及藏在军情五局内部的“埃利”的秘密。当时，担任安全局D处的处长利德尔对“埃利”非常感兴趣，他对“埃利”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推测，准备一查到底，但是都被霍利斯压下了。赖特有些费解，霍利斯为什么那么做呢？

不久，政府通信部破译的苏联间谍的电报又为赖特提供了重要的线索。1945年9月，古曾科叛逃后，通

信总部曾经截获了一份内务部发给伦敦情报站站长克罗托夫的电报，电报上说加拿大的苏联情报机构遇到了麻烦。不过电报说得非常委婉，语气平和，但是，克罗托夫收到电报后马上就将自己的联络次数降到最低了。

赖特查阅了菲尔比的档案。哈罗德·金·菲尔比，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要员，也是克格勃最成功的一名间谍，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1963年，他由于身份暴露出逃苏联。

通过调查，赖特发现，就在1945年9月18日，菲尔比收到了一封来自加拿大的电报，就是有关“埃利”的内容。第二天，伦敦还给莫斯科发过一封加急电报，这与菲尔比发的电报电波频率一致，因此可以断定是菲尔比发的。赖特查阅了莫斯科的回电，上面写着就菲尔比关于他们在加拿大事务的材料与加拿大情报局商量一下，并且确认了菲尔比的消息是准确的。

苏联间谍总部对菲尔比竟然不放心，这说明了什么？那就是说，苏联克格勃在一直监视着加拿大的间谍机构，并且确实有一个“埃利”存在。

赖特又调来沃尔科夫的档案。这位苏联驻土耳其

领事馆的官员曾经主动与英国联系，为英国情报机构提供线索。他曾经说过英国外交部内部有两名间谍，情报部门有五名间谍，其中一名领导着反情报部门。那名领导，人们一致认为是菲尔比，可是赖特却推断是霍利斯！

赖特联系起了以前霍利斯更多的疑点。1953年，英国海军情报局准备策反苏联驻日大使馆的拉斯特沃罗夫。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拉斯特沃罗夫终于心动，但是他却要求去澳大利亚而不是英国，他说秘密情报局是一个被苏联渗透的地方，若是到那里，会自身难保，海军情报局同意了他的要求。没想到，一场大风雪使飞机的行程发生了改变，临时飞往新加坡，而不是澳大利亚。拉斯特沃罗夫惊恐万状，跳下飞机，跑进了美国大使馆。他解释说，自己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要叛逃，当他到莫斯科后，就有两个伪装成秘密情报局的人找他，他的朋友被枪决了。

赖特翻阅拉斯特沃罗夫的档案，发现负责此案的还是霍利斯。

赖特来到牛津大学，查阅霍利斯的档案。霍利斯曾经是牛津大学的学生，但没有拿到学位。那么霍利

斯又曾经与谁混在一块呢？赖特发现，其中有左翼分子克劳德·科伯恩，这是一个同共产国际交往密切的家伙。那么，霍利斯会不会受到他的影响呢？

1965年6月17日，赖特接到霍利斯的电话，说是要见他。赖特刚走进门就发现，霍利斯正满脸笑容地在门口等着他。二人刚刚寒暄了几句，霍利斯突然脸色一变，厉声质问赖特，为什么怀疑他是内奸？

赖特不知所措，最后决定实话实说。他详细地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从朗斯戴尔到古曾科，还有其中的疑问，也都说了出来。

经过一阵唇枪舌剑之后，霍利斯与赖特不欢而散。霍利斯几天后就退休了，但是，调查委员会并没有放过他，他们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有一份指控名单，上面赫然写着霍利斯的名字。

一年以后，军情五局专门为霍利斯的事情召开了一次会议，霍利斯的继任者琼斯公开表态，拒绝继续进行挖掘“鼯鼠”的行动，理由就是万一造出一些冤假错案，秘密情报局将损失惨重。

1969年，霍利斯又被召回安全局接受审讯，这位倔强的老头坚决不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四年后，霍

利斯带着尚未洗清的罪名死去了。

1976年，赖特也从军情五局退休了，调查“鼯鼠”的行动接近了尾声。在移居澳大利亚后，赖特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抓间谍者》一书于10年后面世，书中的霍利斯俨然是一位苏联间谍的形象。

当时，有一位名叫查普曼·平彻的记者也加入了指控霍利斯的行列。在赖特的帮助下，他先后出版了《他们的行动是背叛》、《机密度太高，时间太长》和《叛国者》等著作，在这些书中，霍利斯都被查普曼·平彻说成是苏联间谍。结果又闹得满城风雨，英国朝野上下一时沸沸扬扬。

那么，霍利斯究竟是不是苏联间谍？是不是英国情报机构中隐藏最大而且是最深的“鼯鼠”？这个问题直到1985年终于有了答案。



郁郁而终的罗杰·霍利斯

1985年9月，一名重量级的克格勃间谍——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叛逃到了英国。在接受军情五局的审讯时，英方要求戈尔季耶夫

斯基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霍利斯是否是苏联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回答是否定的。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回答，终于使霍利斯的身份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克格勃情报站长叛逃到英国

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的逃亡，完全是由于信仰的原因。

1938年，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生于苏联，父亲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在苏联情报机构任职。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小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家。但是，当他顺利进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之后，却加入了克格勃。毕业后，他先后在莫斯科、丹麦工作过。

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布拉格之春”粉碎了很多人的社会主义梦想，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信仰也开始动摇。他不能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粗暴地干涉别的国家，但他又不能否认眼前那铁的事实。他的思想不知不觉发生了变化。

五年后，正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了著名间谍菲尔比的传记，他对这个人物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他托人找到菲尔比本人，求证书中的东西。可是菲尔比读完那本传记后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千万别相信那些书上的东西。知情人人都知道，菲尔比因为信仰社会主义逃到苏联之后，却受到了冷遇。菲尔比的现身说法，成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逃亡西方的精神启蒙。

1974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决定为英国人工作，他与英国秘密情报局取得联系后，主动向秘密情报局提供了有关克格勃在北欧国家活动的情况。他的举动让英国情报机构喜出望外。由于追查“鼯鼠”一事，英国情报机构已经被搞得声名狼藉，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投靠，让他们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

1982年，戈尔季耶夫斯基来到伦敦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工作。这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其实就是克格勃驻伦敦情报站站长，这为他的“双重间谍”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利用外交官的身份和英国情报机构多方接触。为了掩人耳目，他还定期编写有关英国政治问题的情报资料，向莫斯科的克格勃总部汇报，同时为自己捞取更多的信任。在此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向英国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份情

报，将那个一直同自己秘密联系的英国情报官迈克尔·贝塔尼出卖了，帮助英国安全局挖出了一个隐藏在内部的大“鼯鼠”。

1985年5月17日，戈尔季耶夫斯基被一份密电召回了莫斯科。他把妻小留在了伦敦，在伦敦布鲁克林机场上了前往苏联的航班。一路上，戈尔季耶夫斯基忐忑不安，觉得此去凶多吉少。

果然，一到莫斯科，一名边防检查员就仔细地查看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护照，检查完了就立刻打了一个电话，不知对什么人说：“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回来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一看就知道出事了。边防检查员在向什么人报告，说自己回来了呢？更让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安的是，他从机场出来的时候，总部没有派车来接他。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戈尔季耶夫斯基就到克格勃第一总局报到了，要求会见副局长格鲁申科，但被婉言拒绝了，叫他慢慢等待。

等待是漫长的。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原先的那些同事们明显地疏远了，很少同他主动接触。直到十

多天后，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接到了副局长格鲁申科的电话，让他第二天去参加一个会议。第二天中午，格鲁申科亲自驾车来接他，他们没有去参加什么会议，而是去了一家餐馆，格鲁申科要和他共进午餐。

吃饭的时候，格鲁申科建议喝杯伏特加，戈尔季耶夫斯基爽快地答应了。两个人边喝边聊，先是一些漫无边际的话题，从伦敦的点点滴滴到家常琐事。这时，戈尔季耶夫斯基觉察到自己的大脑有些迟钝，甚至麻木了。戈尔季耶夫斯基极力想控制住自己的嘴巴，但是大脑明显地不受自己支配。这时，旁边忽然出现了两名军官，开始陪他说话，谈一些有关戈尔季耶夫斯基叛变的事情。戈尔季耶夫斯基用仅存的一点意识说出了“我没有背叛”，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醒来时，戈尔季耶夫斯基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四周密封的屋子里。早饭后，昨天的那两个军官用一辆黑色的轿车将他送回了家。

戈尔季耶夫斯基知道，凡是叛国者都是要受到严惩的，在卢比扬卡监狱的滋味可不好受。因此，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计划下一步怎么做。

第二天，戈尔季耶夫斯基拨通了格鲁申科的电

话，格鲁申科告诉他要老实交代，好好反省。并且告诉他，他在伦敦的任命已经被取消了，他的家人也将很快回到莫斯科。最后格鲁申科还对他说，可能会在八月份以后给他重新安排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计算了一下，距离八月份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做好充分的准备。

于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起床，在公园旁边的小树林里跑上几圈。每一个路口都有监视他的人，那些人为了完成任务，有的还要陪着他跑完全程。吃完早餐，他就到莫斯科图书馆翻阅当天的报纸，或者去郊外度假，或者去亲戚家。这种有规律的生活，使那些监视者感到无聊，渐渐放松了警惕。

这时，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妻女已经从伦敦回来了。一切准备就绪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开始了他的潜逃行动。

那一天，他陪着妻女到商场去购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在走出商场的时候他轻轻吻别了妻子。告别妻子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来到郊外的一个火车站，然后爬上了一辆火车。两天后，在一个叫泽列诺戈尔斯克的小镇，他与等候在那里的英国

人会合，然后坐上英国人的汽车，顺利地通过了苏芬边境的检查站。

1985年9月12日，戈尔季耶夫斯基出现在伦敦。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已经在那里等待，这些人都是英国外交部邀请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伦敦新闻秘书克里斯多夫进行了简单的开场白后，接着宣布苏联驻英国大使馆的政务参赞戈尔季耶夫斯基申请到英国政治避难。这个声明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

英国秘密情报局非常高兴。这个曾经接触过苏联核心机密的间谍真是雪中送炭，多年未曾解答的问题或许会在他那里找到答案。

英国情报机构一直怀疑安全局局长霍利斯是潜藏在内部的最大“鼯鼠”，但一直没有足够的证据。这次，他们终于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口中找到答案了。还有那个“剑桥间谍网”中的第五个人一直都没有下落，这一次同样从戈尔季耶夫斯基的交代中得到了答案——“第五人”就是约翰·凯恩克劳斯。此人在二战期间供职于政府通信总部，虽然属于情报部门，但一直没有受到怀疑。

此时，英国情报机构的人终于明白，原来那场追

查内部“鼯鼠”的活动竟是一场闹剧。这场“闹剧”，让本来就是多事之秋的英国情报部门雪上加霜，大伤元气，人人自危；同时，也让他们的对手克格勃看够了笑话。

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英国情报部门里没有“鼯鼠”存在。半个世纪以来，那些真正的“鼯鼠”一个又一个地浮出水面就是不争的事实。

看来“鼯鼠”之忧，仍是英国情报机关永远的痛。

第十六章 谋杀未遂，利比亚放弃核计划

1995年军情六处斥资10万英镑收买中东刺客，要在1996年的阅兵式上刺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结果目标有误谋杀未遂，外长矢口否认，但在野党还是要求严查；惊悉利比亚启动核计划后，军情六处又派特工飞往利比亚会见卡扎菲之子并全程参与谈判，最终让利比亚放弃核计划。

雅虎网站爆出惊天机密

英国当地时间2000年9月20日晚上9时50分，伦敦市中心接近沃克斯霍尔桥附近发生一起爆炸案件。爆炸地点位于英国军情六处的总部附近，军情六处总部

大楼也遭到轻微损毁，所幸没有人员在这起事故中受伤。

爆炸发生后，警察、反恐怖特种警察以及消防队员都赶到现场。据英国警方的消息称，大楼疑遭导弹袭击，导弹至少造成一次爆炸。警方目前还不清楚导弹从何处发射，更没有人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这一次军情六处总部大楼尽管是有惊无险，但是，另一起“爆炸事件”却把军情六处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转载了一批来自美国雅虎网站的机密文档，公开披露了英国军情六处曾在1996年参与刺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行动，不过行动最终失败。

这份机密文件名叫《英国观察之最》，它详细披露了军情六处当年与中东某集团（一家匿名的暗杀组织）的阴谋者之间的接触细节，指出他们曾合谋炸毁卡扎菲乘坐的汽车。这份报告说，军情六处不仅参与了这次谋杀行动，还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将刺杀行动的时间和地点详细地报告了英国政府，并专门拨出10万英镑，秘密向该集团提供了至少250件英制武器和吉普车以及其他一些军用装备。

1996年初，在一次阅兵仪式中，卡扎菲的车队被炸，他的几名近身保镖被炸死，然而，卡扎菲本人却九死一生逃脱。据报道，英国媒体早已察觉军情六处曾参与暗杀行动，但鉴于当局的态度，一直没有泄露内情。

此文一出，立刻引起一片哗然。军情六处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2001年3月30日，英国《卫报》又对此事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报道。英国军情五处前情报官戴维·谢勒不仅披露了这次暗杀事件的内幕，而且还说出当年曾经参与谋杀的两位特工的名字。

《卫报》的这一次加温，让这起未遂的暗杀事件更是沸沸扬扬。

那么，作为英国军情局的一位前情报官，戴维·谢勒为什么要将这件事抖出来呢？他又怎么会知道军情六处的机密呢？

1998年，戴维·谢勒曾因向媒体透露英国军情五处的活动情报而遭逮捕，后于2000年2月27日被英政府告上法庭。

谢勒的律师透露，英国政府企图通过法律行动让

这位不听话的前特工闭嘴，没想到此举反而激怒了谢勒。谢勒将英政府特工姓名曝光，这种史无前例的大胆举动显然是为了逼英政府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与此同时，谢勒还呼吁对英国前外交部长罗宾·库克1997年遇刺一事重新进行调查。

1999年11月24日，谢勒将暗杀卡扎菲行动的细节寄给英国内务大臣斯特劳。

谢勒声称，1995年夏天，军情六处一位代号为PT16 / B的高级官员曾与他商谈卡扎菲暗杀行动。当时，谢勒在军情五处利比亚组工作。据那位官员说，前不久，一位利比亚高级情报人员到英国驻突尼斯大使馆，要求英方资助伊斯兰游击队暗杀卡扎菲的军事政变行动，作为交换，他们在政变成功后会交出洛克比空难的嫌疑犯。1997年秋天，谢勒参加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几次高级会议，官员们在会上公开讨论这一暗杀行动。

1998年初，谢勒看到摩洛哥和埃及情报人员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利比亚北部发生了一起暗杀卡扎菲的行动，但由于暗杀者看错了车辆，行动失败。谢勒说，PT16 / B后来承认，这次行动是他策划的。PT16

/ B现在任职于英国驻南欧大使馆。

谢勒已经将卡扎菲暗杀行动的具体负责人和付钱给伊斯兰游击队的英方人员的姓名交给了英国媒体。此外，他还准备公布那位代号为PT16 / B情报官的姓名。谢勒表示，他还打算公布1994年英国驻利比亚大使馆被炸的内幕。

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利比亚政府立即作出反应。利比亚外交部发言人在电视讲话中表示，利比亚政府将严肃对待这一事件，“《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证据确凿，我们将要求英国政府协助调查”。利比亚外交部发言人在电视讲话中表示，鉴于目前的情况，英国外交部对此事件的否认只能是欲盖弥彰。而且，英国政府显然也知道其中的内幕，而不是对此事一无所知。

《星期日泰晤士报》透露说，这一消息来源于美国的一个因特网网站，但是应英国政府的要求，报纸决定不公布这一网站的地址。报纸还说，英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已经证实，这一消息准确可靠。

而英国政府则对此坚决否认，并发表声明说，英国外交部的声明绝无虚假之处，一篇在因特网上公布

的消息，其真实性难以让人相信。英国政府表示，利比亚政府仅凭这样一份报道就对英国情报机关提出指控有失公允。在英国政府干预下，英国媒体不准对这一极具轰动效应的话题展开报道，后来还是美国的《纽约时报》跟进，其中内情才逐渐公布于世。

刺杀计划曝光后，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赶紧出来辟谣，向外界正式否认英国情报机构与刺杀卡扎菲行动有关。库克说，有关英国情报机构参与这一刺杀行动的说法有如“神话”，谢勒的指控纯属“凭空想象”；英国情报机关对此类事件“毫无兴趣，从不参与，没有任何先例”。不过英国参议院情报安全委员会对谢勒的指控非常重视，并下令进行调查。

尽管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态度极为强硬，坚称此事“纯属捏造”，军情六处对阴谋颠覆活动毫无兴趣，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还特别强调：“秘密情报局从未提及暗杀计划的动议，对此我深感满意，我上任以来也从未发现秘密情报局在过去十年间有策划这种越轨行动的意向。”但是雅虎推出的一份报告却显示，罗宾·库克所言与事实大相径庭，刺杀行动确有其事。这份冠名为《利比亚：酝酿多时的1996年

初刺杀卡扎菲计划》的报告属英国情报部门绝密资料，档案号为“CX95 / 53452”，报告列出了军情六处与四年前密谋向卡扎菲的车队发动炸弹袭击的一批恐怖分子的来往情况，至此，一桩历史公案最终大白于天下。

1995年11月，一名恐怖分子与英国政府的情报部门取得联系，将“推翻卡扎菲上校的计划”和盘托出，希望获得英方的支持。因事件过于敏感，雅虎网站管理员将这份报告中揭示代号为“Tunworth”的恐怖组织中有关人员真实身份的有关内容尽数删去。报告称，这些武装分子计划在利比亚内阁（总人民委员会）在1996年2月14日召开大会时发动政变，为营造气氛，他们先分头在的黎波里、米功拉塔角与班加西等地制造骚乱以达到热身目的。

代号为“Tunworth”的恐怖组织告诉军情六处特工，刺客计划设法弄到与卡扎菲卫队保安车辆类似的汽车，装上假车牌，借机混入卡扎菲车队，实施刺杀行动。“我们行动组的军事人员已在附近的沙漠地区受训，准备赶在卡扎菲回到苏尔特之前，对他及总人民委员会成员下手。”

报告引述的Tunworth的原话称，刺杀行动共有一名军官及20名男子参与。行刺者与伊斯兰恐怖分子联系密切，他们自称是曾替阿富汗及利比亚学生军效力的利比亚老兵。这批恐怖分子早在1995年就策划过谋杀行动，但该计划被利比亚安全警察挫败。报告详细列出了恐怖分子的预定袭击目标以及政变支持者的名单，据悉，政变行动将以在利比亚电视及广播电台出现的加密信号为号。这份签发日期为1995年12月的绝密军事报告仅呈交外交部资深官员约翰·柯勒斯爵士以及英国政府GCHQ监听站、英国安全局及国防部高级官员，了解报告内容的人相当有限。



卡扎菲

在伦敦出版的阿拉伯文报章《Al - Hayat》证实，利比亚境内确曾发生过刺杀事件。报道称，多名刺客

曾于1996年2月袭击卡扎菲的车队，卡扎菲本人侥幸逃过死劫，但他手下有多名保镖遇难，刺客也尽数被卫队击毙。卡扎菲本人在会见西方媒体记者时多次提及，自己手中握有英国方面幕后参与谋杀行动的证据，将会在适当时机对外公布。

雅虎网站此时公布这份绝密报告给英国政府出了道难题。令英国人尴尬的是，1995年英国刚刚与卡扎菲修好，英方正准备迎接利比亚大使重返英国。因此，报告内容一曝光，英国反对党不依不饶，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影子外交大臣弗朗西斯·莫德已要求英国议会立即对此展开调查：究竟罗宾·库克本人知不知道真相？他根本不知情还是对事实真相隐而不报？

绝密报告将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逼向了险境。罗宾·库克上任以来一直夸口要推行所谓“讲伦理的外交政策”，但上周已有几名保守党及工党议员联名炮轰罗宾·库克，对其外交政策提出了批评。目前舆论关注的焦点是罗宾·库克本人是否了解军情五处的作为。如果罗宾·库克本人不知情，他将担失察之责，显示英国情报机构很可能已处于失控状态。但如罗宾·库克隐而不报，则其作为政客的操守又会成为反对党集中火力攻

击的把柄。

一家网站居然可以在网上公开绝密报告，英国情报部门的保密功夫实在欠佳。军情六处内部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证实，这份外泄的报告绝对属实，他们至今对报告何以登上互联网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这已不是英国情报部门第一次摆乌龙了，当年美国安全杂志《经理人情报评论》曾在其网站公布了一百多名军情六处官员的名单，结果直接导致军情六处高官理查德·汤姆林森引咎辞职。

关于谢勒和这起未遂的暗杀事件，还有多个“版本”问世。

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埃及《最后一点钟》周刊第3414期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题为《英国策划并实施暗杀卡扎菲的阴谋》，摘要如下：

36岁的戴维·沙耶勒尔（即戴维·谢勒）在英国情报局工作了6年后辞职。他在情报局的所见所闻使他触目惊心。他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抨击英国情报局的文章。当他在文章中提到有50万英国人被情报局立了档案和情报局窃听威尔逊等一些英国首相的谈话等情况后，

国内人民对情报局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情报局也因沙耶勒尔泄露情报局的内部机密处于尴尬境地，于是开始追捕沙耶勒尔。戴维·沙耶勒尔为了躲避追捕被迫隐藏起来，后来又秘密逃到法国躲避。当英国情报局发现他的踪影后，要求法国警方逮捕他，然后引渡到英国。

戴维·沙耶勒尔在法国监狱被关押了整整4个月，直到法国法院决定或释放他，或把他遣返回英国，让英国人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对他进行审判。戴维·沙耶勒尔不愿回英国受审。他对法国法官说：“他们认为我有罪要逮捕我，但实际上我讲的都是事实，我只是批评了英国情报局。”鉴于这种情况，法国的法官决定释放戴维·沙耶勒尔，并且对他说：“你出狱吧，你已经自由了。”法国法官认为沙耶勒尔是一名政治难民，拒绝将他遣返英国，并认为法国政府应该给他避难权。这是1998年11月发生的事。从此之后，沙耶勒尔也认为自己是一名流亡者。

英国的报刊还说，沙耶勒尔辞去情报局的工作后，是他第一个透露关于英国暗杀卡扎菲的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秘密情报局成立五十周年

之际，伦敦出版了一部关于英国情报局的书。此书共880页。书的作者是一位大学教授。目的是为了纪念英国秘密情报局成立五十周年。此书说英国曾策划过暗杀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阴谋，曾两次挫败暗杀南非总统曼德拉的企图。此书还提到过去的英国情报局人员时常泄露情报局的秘密。例如他们曾透露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英国情报局曾窃听埃及驻伦敦大使馆的秘密。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英国情报局策划暗杀活动并不是第一次。

后来秘密情报局的彼得·赖特又出版了一本《反间谍者》，再一次把军情六处的内幕公布于世。当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得到消息后，曾极力反对出版《反间谍者》一书，并且对书的作者赖特提出了起诉。赖特后来到澳大利亚避难，并在那里出版了这本书。此书出版之前，英国的法律界人士对撒切尔夫人说：“你要失败了，书马上就要出版。”

撒切尔夫人回答说：“我还要起诉，重要的是要让情报局的人员知道泄露情报局的秘密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泄露机密的人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后来，伦敦也允许这本书发行了。但是英国就是

不允许出版沙耶勒尔的书，并想尽一切办法阻止英国的报刊发表有关沙耶勒尔的任何文章。

后来，还有一部关于英国情报局的新书出版。书的作者叫安东尼·胡勒尔。他是英国作家。他在这本名为《21个计划》的书中提到英国秘密情报局1996年曾帮助以色列搞核计划，向以色列提供从西非生产的铀。以色列当时的国防部长达扬曾亲自到西非落实这笔交易。英国的帮助还表现在伦敦对以色列的核计划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英国秘密情报局与沙耶勒尔谈判，企图引诱他回英国。秘密情报局对沙耶勒尔说：“我们将赦免你，并公布有关决定。”沙耶勒尔问：“你们的条件是什么？”情报局的答复是：“要你停止发表谈话，停止写书，把你了解的秘密都告诉我们。”

沙耶勒尔没有上当。后来他逃亡到了法国，但最后还是被引渡回了英国。

那么，英国政府和英国秘密情报局为什么要参与策划暗杀利比亚元首卡扎菲呢？

这还要先从卡扎菲同英美两国的恩恩怨怨说起。

“洛克比空难”发生以后

1969年卡扎菲政变上台伊始，就立即下令关闭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两国关系骤然降温。进入80年代后，两国不断发生小的冲突，到1985年底，两起爆炸事件引起的一系列冲突，终于使美国决心要好好“教训”一下卡扎菲。

第一起爆炸事件发生在1985年12月27日的意大利罗马的达·芬奇机场。机场上的乘客并不很多，正当一些旅客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前办理登机手续时，突然枪声大作。几个歹徒一边用冲锋枪扫射，一边向人群中投掷手榴弹，候机大厅中顿时血肉横飞，惨叫声震耳，很多人尚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一头倒在血泊之中。

几乎在同一时刻，奥地利维也纳的施威夏特机场的以色列航空公司柜台前，也发生了完全相同的血案。在这两起恐怖事件中，有19人丧生，120多人受伤，死者中有一位儿童和一名妇女。

经过意、奥两国警方的联合调查，弄清了恐怖事件的真相。在罗马机场生还的恐怖分子承认，在利比

亚的支持下，他们有300人在黎巴嫩接受了“自杀性突袭”训练。

消息传到美国，白宫立即发表一份报告，指责恐怖分子以利比亚为活动基地，“得到利比亚提供的武器和经费”，正在欧洲扩大活动范围。里根怒斥卡扎菲是个“连杀害11岁小孩也叫好的人”。美国和以色列立即声称要采取报复行动。于是一个庞大的计划慢慢地形成了。

1986年4月14日傍晚，一个由F-111战斗轰炸机、EF-111电子干扰机、护卫机、攻击机、战斗机、雷达预警飞机、加油机等100余架飞机组成的美国空军编队，从英国的空军基地和停在地中海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全速冲向利比亚。

地中海时间4月14日夜，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阿齐齐耶兵营的一座巨大的帐篷里灯火通明，利比亚政治工作会议正在这里举行。会议直至午夜才散，精力充沛、面无倦色的卡扎菲从帐篷中走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半个小时前，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人员已把他要就寝的地方密报了美国，而这一情况又被迅速通知了前来谋杀他的美军机群。

然而，卡扎菲上校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也许是因为最近一段美、利紧张的冲突使他不得不有所警觉。直觉告诉卡扎菲不能回到他经常下榻的帐篷和他的家，他必须要另选一个住宿地点。于是，他走进了阿齐齐耶兵营中央的一个贝都印式帐篷，在它的周围，还布置着许多外形一模一样的帐篷。

仅一念之间，也许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暗杀阴谋就此落空了。

15日凌晨2点，正在酣睡中的卡扎菲突然被连续三声巨大的爆炸声震醒，炸弹爆炸时产生的强大气浪将他的帐篷像卷纸片一样卷走。

这是一次血腥的暴行。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整个城市都在回响着喷气机发出的尖叫声，漆黑的天空闪烁着激烈的爆炸产生的火花，火光把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照得通红。在十余分钟内，美军33架轰炸机倾泻了大量的炸弹，有的炸弹重200多公斤，有的近1000公斤。美军在这次轰炸中还使用了集束炸弹，这种在空中爆炸的炸弹可以向不同的方向发射出几十枚子炸弹，杀伤力非常强。

轰炸持续几小时，整个利比亚无声无息，而大洋

那边的白宫却兴奋异常，都认为卡扎菲必死无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东顾问泰查高兴地大喊大叫：“嗨，今天的午饭我请客！”话音刚落，中央情报局送来了的黎波里的间谍发回的第一份情报，上面冷酷无情地写着：“利比亚领导人还活着！”

这次行动曾专门指派一架F-111飞机轰炸卡扎菲的住宅，并对它投下4枚1000公斤的炸弹。卡扎菲居住的那幢淡蓝色的二层小楼正面被毁，他办公的四层圆顶楼也是弹痕累累，卡扎菲的夫人当即被炸昏，其养女被炸死，两个小儿子受重伤。不过卡扎菲却毫发未损。

据一位精通袭击作战的空军军官分析，卡扎菲之所以免遭暗杀，只是因为美国飞机不巧发生了偶然事故。袭击卡扎菲的9架F-111轰炸机中，有4架在发起攻击前机载激光导向系统突然发生了故障，至少少投了16枚炸弹。美军为确保杀死卡扎菲而使用的高技术设备，反而救了卡扎菲的命。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美国对利比亚进行轰炸，完全是在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支持下进行的。在这次轰炸行动中，美军动用了驻扎在英国的美军基

地的空军部队。撒切尔政府允许美军使用美在英的军事基地对利比亚进行空袭，正是英美国际战略合作的一种体现。

不过美国人的这次空中袭击不仅没有置卡扎菲于死地，反而激起了利比亚人的仇恨，于是利比亚的报复开始了。两年后，一场空前的空难，再次让美国和利比亚两国之间的仇恨加剧。

1988年12月21日，一群兴高采烈的美国人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103航班，准备回家过圣诞节。22点25分，这架波音747客机正在从法兰克福到纽约的航线上飞行着，飞机在31000英尺的高空突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随之呼啸着冲向大地，擦过一条公路后又滑进了苏格兰小镇洛克比城。

飞机撞在地上溅出300英尺高的火星，留下一个50英尺深、30码长的大坑。机上259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另外，洛克比小镇上的居民也赔上了11条生命，总计270人遇难，这就是世界航空史上著名的“洛克比空难”。

“洛克比空难”发生后，美英两国成立了联合调查组，由英国秘密情报局、苏格兰机场和美国中央情报

局及联邦调查局负责这次空难的调查。

1991年11月14日，经过近三年时间的调查取证，美英两国终于宣布了洛克比空难的调查结果。技术人员经分析认为，空难是由装在飞机内部的一种塑胶炸弹所致。而这起骇人听闻的空难则是由两名利比亚情报人员制造的。他们是前利比亚航空公司驻马耳他办事处主任阿里·穆罕默德·迈格拉希，还有他的同事拉明·哈里发·弗希迈。他们将藏有炸弹的行李从马耳他送上了103航班。



洛克比空难现场

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制造飞机坠毁这样的大屠杀恐怖活动如果没有政府最高层

人士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因此美国政府把矛头直指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菲。随后，美英两国通过意大利驻利比亚大使馆向利比亚递交了起诉书和通缉令。

利比亚对此采取了强硬立场，拒绝交出所谓的嫌疑犯。

1992年3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748号决议，要求利比亚在4月15日前交出嫌疑犯，否则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从15日起中断与利比亚的空中联系，实行武器禁运，直到利比亚交出嫌疑犯为止。但是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并不把制裁放在心上。他发表谈话说：“我将对任何实施安理会制裁措施的国家采取报复行动。”

1992年4月15日，制裁正式生效。这一天，所有从利比亚出发的航班都遭到拦截，被迫返航。法国、瑞典、日本、德国等国驱逐了利比亚的外交官。

1995年3月23日，美国悬赏400万美金，捉拿嫌疑犯。

1995年12月，英国下令驱逐利比亚驻伦敦的高级外交官，以报复利比亚驱逐英国外交官的行为。

6年多的制裁给利比亚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但

利比亚一直坚持在第三国审理疑犯。1998年2月，国际法庭作出裁决，认为有必要听取利比亚的申诉。英美也同意在荷兰审理该案。1998年7月，英国和美国达成一致，涉嫌制造泛美航空公司空难的两名利比亚人可在海牙受审。

1999年4月，利比亚终于交出了两名嫌疑犯。他们在荷兰海牙接受了依照苏格兰法律进行的审判。

欧盟暂时中止对利比亚的制裁，但美国依然坚持对利比亚的制裁。华盛顿拒绝全部取消联合国对的黎波里的制裁，除非利比亚在洛克比一案的审判中与联合国充分合作。

12月21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说，如果两名涉嫌制造1988年“洛克比空难”的利比亚人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他将谋求道歉和赔偿。卡扎菲还说，世界各地对美国的憎恨以及美国制订的政策是造成恐怖分子把目标对准美国公民的原因。卡扎菲在“洛克比空难”11周年之际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采访时说：“美国非常清楚，由于它自己制订的敌对政策才导致它在世界上处处遭到憎恨。”

2000年5月3日，审判正式开始。审判地点设在距

阿姆斯特丹约50公里的前美国军事基地宰斯特军营，3名苏格兰籍法官负责审理此案。2001年1月，三名法官一致裁定迈格拉希犯有谋杀罪，弗希迈则无罪释放。迈格拉希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将在格拉斯哥一座监狱中服刑。随后迈格拉希提出了上诉。2002年3月，法庭驳回了迈格拉希的上诉并维持原判。

2003年3月，利比亚与美英两国终于达成了政治协议，同意承担空难的民事责任。利比亚同意向每位受害人赔偿1000万美元，赔偿总额达27亿美元。同年8月，利比亚在给联合国的信中表示承担“洛克比空难”的责任；9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解除对利比亚制裁的决议；11月，苏格兰法官判决迈格拉希犯有制造“洛克比空难”的罪行，他最少要在狱中服刑27年后才能申请假释；12月，利比亚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武器计划，并向国际武器核查员开放领土。一场僵持了15年之久的国际纠纷终于有了结果。

2004年3月，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访问利比亚，他是自丘吉尔于二战中访利比亚后，第一个到访利比亚的英国首相。

“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时代》周刊刊登的一

则报道说，卡扎菲当时非常担心成为美国报复的目标。由于担心美国会再次袭击利比亚，卡扎菲开始“给他知道联系方式的每一个阿拉伯领导人打电话”，呼吁举行一次阿拉伯国家峰会。“卡扎菲担心的是，除了通过讲话，他与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直接的沟通”。美国使馆的官员被告知：“卡扎菲在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通电话时已经歇斯底里，仿佛只有这位国王的亲自出面干预才会防止美国的行动。”

本·拉登过去的庇护人、苏丹总统巴希尔也恳求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证明他没有参与“9·11”事件，并举行一次阿拉伯国家峰会。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试图表示声援美国和对美国友好的其他阿拉伯政权。“苏丹和利比亚领导人在与埃及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通话时显得非常害怕。”苏丹大使给埃及外交部打电话时“声音颤抖”，苏丹总统巴希尔给穆巴拉克的电报“与其说是详细的讨论，不如说是紧急的求助……看来苏丹领导人好像认为自己很有可能成为目标”。

文章说，“卡扎菲可能更加害怕，尽管埃及作出了更加焦虑的反应”。时任埃及外长的艾哈迈德·马希尔于2001年9月17日前往的黎波里，与利比亚领导人举行

了会谈。

看来，英美与卡扎菲之间的不信任和仇恨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

因此，关于英国军情六处参与谋杀卡扎菲的阴谋也并非完全不可信。当然英国政府一直不肯承认，英国外交大臣库克的解释是，2003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首先宣布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后又交出几百名的恐怖分子名单。从2003年3月起，利比亚就开始了与美英长达9个月的秘密谈判。布莱尔首相的利比亚之行，终于让两国关系重归于好。鉴于两国的关系一直朝好的方向发展，所以当年的谋杀计划根本不成立。

当然这只是库克的解释，事实上，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利比亚从来就没有真正友好过。除了视卡扎菲为眼中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同样备受西方世界的关注，他就是当年作为利比亚一方的首席谈判代表，肩负重任的利比亚对外安全局局长穆萨·库萨。二十多年以前，穆萨·库萨曾被英国驱逐出境。

卡扎菲平稳执政数十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高官多为其亲戚、亲信。穆萨·库萨就是卡扎菲的一个

近亲，一直深受信任。多年来，库萨担任过诸多要职，特别是在搜集西方国家的情报方面。

库萨是利比亚的激进派，与西方对抗多年。20世纪70年代，他担任利比亚驻英国大使期间，对流亡英国的利比亚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严密监控，甚至公开威胁。库萨的行为巩固了卡扎菲的统治，却引起英政府的不满。1980年，英国指责库萨是“包庇谋杀利比亚两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凶手”，并将其驱逐出境。

回国后，库萨依然是卡扎菲的红人，他曾是卡扎菲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革命”的主要执行者。1994年，库萨被委以对外安全局局长的重任，成为利比亚情报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长期以来，西方情报界一直视库萨为“恐怖大亨”，指责他是多起“恐怖事件”的幕后策划者：1986年4月，西柏林一家舞厅门前发生爆炸，两名美军士兵丧生。美国指责库萨及其情报机构与这一事件有关。后来美军对利比亚进行空中打击时曾考虑将利比亚情报机构列为目标之一。

“洛克比空难”后利比亚一名特工被判有罪，但许多人认为裁决不够公正，他们说，利比亚情报机构的

高层领导应被送上法庭，当时库萨正是利比亚情报机构的“二把手”。

1989年9月，法国UTA航空公司一架飞机在尼日尔上空爆炸。法国人怒不可遏，负责调查的官员声称：“库萨应该接受审讯！”

在西方世界眼中，利比亚多年来一直支持恐怖主义，作为卡扎菲的亲信和利比亚情报机构领导人的库萨，绝对脱不了干系。

然而近年来，随着利比亚外交政策的调整，库萨的角色也随之转变。他更多地以“合作者”的姿态出现在西方面前。

就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库萨与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廉·伯恩斯举行密谈，除了向美方提供与“基地”组织联系密切的“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的情况外，他还表示，“卡扎菲也曾受到恐怖分子暗杀威胁，因此恐怖主义是利美两国共同的敌人”。

此后，库萨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局提供了恐怖组织在非洲和欧洲的据点情报。2003年初，正当西方国家因“菲律宾人质危机”焦头烂额时，又是库萨出面向美国提供了阿布沙耶夫武装的情报，对解救

人质起到了关键作用。

军情六处代表会见卡扎菲之子赛义夫

2003年，利比亚被英美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流氓国家”，备受制裁与孤立，直到同年12月，利比亚正式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计划后，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才得以缓解。2007年，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戈登·科雷拉出版了一本新书《购买核弹》，讲述了他通过采访了解到的事实真相。

原来在2003年3月中旬，伊拉克战争正如箭在弦上。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者是一名巴勒斯坦的“中间人”，他要为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向英国政府传递一个信号，愿意将该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计划放到谈判桌上；同时，卡扎菲之子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要求与英国政府会面。

对英国政府而言，从长年对峙的对手处获得“求和”的信号无疑是重大消息。英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由军情六处派出两名官员，在伦敦高级住宅区一家酒店内与卡扎菲之子赛义夫进行初步接触。

赛义夫一直有卡扎菲接班人之说。他事后回忆

说，那是他此生第一次与英国情报机关正面接触，“在此前很长时间内，我一直把这些人看做魔鬼、敌人”。即便已经决定坐到他们面前，他仍不确定最终是否会被出卖，更无法确定英美是否正在盘算上演一出利比亚版的“巴格达剧变”。

赛义夫告诉英国人，卡扎菲希望与英美合作打造中东改革新计划。一名英国官员随即追问，利比亚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事怎么办？赛义夫回答说，卡扎菲已经准备处理这一问题。

听到这一答复，两名军情六处官员打电话给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顾问戴维·曼宁，征求应对意见。十分钟后，曼宁回电表态，英国政府对利比亚表露的意愿持怀疑态度，但兴趣不浅。言下之意是可以继续谈。军情六处的两名官员随后告诉赛义夫说，他带来的消息的确令人振奋，但还是有必要由他的父亲亲口证实。于是三天后，一架飞机载着两名军情六处的官员飞往利比亚。

如果是倒退十年，要由卡扎菲当面证实的要求简直是天方夜谭。在过去十多年中，卡扎菲在英美等国的眼中一直是支持恐怖主义、蓄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的独裁者形象。

1984年，利比亚驻英国大使馆门前发生反对卡扎菲的示威游行。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英国女警察伊冯娜·弗莱彻被从使馆内射出的子弹击中身亡。英国怀疑利比亚与枪击事件有关，随即与之断绝外交关系，双方由此开始了十多年的交恶。

其实这种关系的转暖，除了两国政府态度的转变之外，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也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人就是有巴基斯坦“核弹之父”之称科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

在争取与美英进行谈判的同时，仍心存疑虑的卡扎菲同时选择了把另一半赌注押在卡迪尔·汗身上。当时利比亚准备全盘购进卡迪尔·汗的核武器制造技术，这样只需照搬而不用再另行研发，不过代价也预计高达1.4亿美元。当英美情报机构把视线锁定在卡迪尔·汗的网络上时，利比亚的计划也逐渐浮出水面。时至2003年前后，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伊拉克。美英当时选择动武的理由正是怀疑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研制计划。

眼看着伊拉克和伊朗等国家先后因此成为目标，

卡扎菲政府也开始了新的思考，不知道斥巨资引进的核武器制造技术，究竟是安全保障还是更大风险？用利比亚驻英国大使穆罕默德·祖艾的话说：“我们当时意识到，获得这些武器可能比没有武器面临更大危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曾在英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赛义夫坐到了英国情报人员面前，并促成了两名军情六处官员走进其父位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巨大帐篷。

第一次会面，卡扎菲向来访者传递了简单干脆的信号：没错，利比亚准备放弃核武器制造。对于两名英国情报官员而言，有了这番表态已经够了。当时军情六处的一位官员随即询问：“谁来具体负责谈判？”卡扎菲毫不含糊地回答说：“穆萨·库萨。”

军情六处的那两名情报官很快就见到穆萨·库萨。一见面，英国情报官员就开门见山地表态说，双方合作的前提是利比亚必须把“底”全交出来，因为英国对利比亚核计划的了解也许比利比亚估计的还要多。不过暂时还不是公开手中所掌握情况的时候，以便检验利比亚的“真诚度”。

穆萨·库萨当然知道，英国的这些“了解”主要是来

自于英美情报机构对卡迪尔·汗秘密网络的调查，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表态，只是应付而已，主要是谈了利比亚政府的诚意。

军情六处的情报官从利比亚返回英国后，立即向英国首相府以及外交部门汇报了初次接触的成果。首相府的意见是，对方所言可信但不可尽信，应该谨慎进行下一步的谈判。

2003年4月，一名曾见过卡扎菲的英国高级情报官员赶到华盛顿，与之同行的还有时任军情六处的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到美国后，他们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一同去了白宫，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布什对此事的回复是，美国赞成继续与利比亚接触——但由英国牵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谈判中，在英方和美方看来，利比亚一直在刺探对手究竟掌握多少情况，不肯和盘托出，只承认一些并非至关重要的核计划内容。一直到了当年的9月，谈判仍无实质进展，利比亚也开始担心，并要求对方派出“更有分量”的非情报机构官员。于是一名已经退休的英国重要人物受命出山，带着布莱尔一封亲笔信和英美情报人员一起会见卡扎

菲。布莱尔在信中保证，只要利比亚足够“配合”，就能重新回归国际社会。

在会见时，那名要员直接问卡扎菲：利比亚是否准备彻底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计划以及全部相关内容？

卡扎菲的回答是肯定的。

尽管如此，利比亚仍拒绝英美彻查其核设施，担心事情败露可能招致国际社会谴责，因此谈判陷入僵局。

就在关键时刻，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在调查卡迪尔·汗时获悉，利比亚核计划所需的重要原料部分已经被发往利比亚。当他们赶到码头时，运送关键证据的货船已经起航。经过近乎疯狂的紧急寻找，这艘货船最终在通过苏伊士运河时被锁定。英美情报机构必须尽快作出决定：查还是不查？

如果通过搜查掌握关键证据，不但可以迫使一向维护卡迪尔·汗的巴基斯坦政府澄清立场，还可以在对利比亚的谈判中掌握主动权。不过，如果搜查行动不慎曝光，是否会重伤利比亚颜面，导致本就微妙的谈判崩溃？英美情报机构最终决定，采取秘密搜查。为

此，英方特意争取到德国和意大利情报机构的支持，但严格遵照布什和布莱尔的要求，闭口不谈与利比亚的秘密谈判。

德国情报人员在德国汉堡找到了这艘货船的所属者，并通过他们向货船船长发去指令——改变路线，而且“什么都别问”。

2003年10月4日凌晨，这艘货船驶入意大利南部塔兰托湾。等候在岸边的调查人员有两个小时搜查时间，他们需要从船上两百个集装箱中找到被怀疑装有“证据”的五个集装箱，并检查其中内容。

军情六处的情报人员在这次秘密检查中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避免打草惊蛇，他们在没收了相关的货物后，就立即放行，允许货船继续向既定目的地进发。

在拿到证据的数小时后，英国军情六处一名高级官员立即同穆萨·库萨取得了联系，要求紧急会面。一见面，这位情报官员就质问穆萨·库萨说：“为什么在承诺取消核计划的同时还在继续购置核原料？”

不出所料，利比亚人果然大为震惊。

此次敲山震虎立即有了效果。两个星期后，军情

六处和中情局的情报官员获准进入利比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计划的心脏地带。事实上，直至进入核查环节前，知情者的圈子仍被控制在相当小的范围内。一些参与谈判的英方人士称，这是他们参与过的最为秘密的外交行动。美国一方也不例外，就连时任副国务卿、现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约翰·博尔顿起初也不知情。

2003年10月19日，中情局一架飞机在约定的时间飞往利比亚。飞机上除了参与谈判的英美情报人员之外，还有核武器、导弹及生化武器专家。抵达利比亚后，核查小组立即被介绍给利比亚的那些负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计划的官员。当时利比亚的那些官员显得相当紧张，他们在导弹、生化武器方面比较配合，但仍拒绝承认利比亚存在核弹研制计划。经过十天的工作，核查小组离开利比亚，几乎无功而返。不过，英美政府高层似乎并没有太过失望。现任英国国务卿、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当时说，如果换成她，也不会在第一次核查时就亮出所有内幕。

为了加快核查步伐，军情六处和中情局负责谈判

的高官邀请穆萨·库萨于当年11月秘密访问英国，穆萨·库萨如期而至。在此次会晤中，英美谈判代表出示了关于利比亚发展核武器的有力证据，包括一名利比亚参与核计划的官员与卡迪尔·汗谈话内容的录音。面对证据，利比亚人同意再进行一次核查。

2003年12月1日，英美核查小组重返利比亚。这一次，利比亚一方态度明显转变，终于带着核查人员深入利比亚境内，让他们见到了多处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设施。利比亚官员还出示了从卡迪尔·汗处购置的大量原材料，但至于是否销毁仍未最后松口。

12月11日是核查小组此行的最后一天。下午3时左右，利比亚官员终于承认他们核计划的最终目标为制造核武器。第二天一早，在核查小组登机前，利比亚官员最终交出了一捆资料，其中包括六七个信封，信封中是利比亚从卡迪尔·汗处购得核武器研制方案的最有力证据。

在此后四天内，英美谈判代表进行紧急磋商，讨论与利比亚谈判的最终定案。就在这时，全球各大媒体都在争相报道一则惊天新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于12月13日在其家乡提克里特被美军抓获，这不能不

让利比亚的谈判代表为之一震。

尽管有了萨达姆的前车之鉴，但是在接下来的12月26日的谈判却还是无果而终，彼此仍然严重缺乏信任感。原本预计一小时就可完成的谈判，却从上午11时一直谈到了傍晚6时。利比亚一方由谁来宣布？英美随后如何表态？几乎每个环节、每个字眼都争执不下。一名与会者事后形容说：“这是一场‘如果不是所有事情都达成一致就什么都达不成一致’的谈判。”

无奈之下，谈判代表只好建议布莱尔和卡扎菲进行电话会谈。12月18日两国元首进行了首次通话，才得出最终定案——利比亚于19日21时通过国家电视台正式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计划的消息。

可是到了既定的时间，利比亚国家电视台仍在按照原计划播放一场足球比赛。英国官员火速致电英国驻利比亚大使，要求查证。

直到当晚21时30分，足球比赛结束后，利比亚对外联络与国际合作秘书（即外交部长）沙勒加姆才出现在电视画面中，宣布“弃核”的消息。随后卡扎菲也通过利比亚通讯社发表声明证实，利比亚正式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制计划，接受国际社会武器核

查。不到半个小时后，布莱尔赶在英国晚间新闻节目结束之前，向卡扎菲通电话对他的决定表示欢迎。

几天后，一名信使从利比亚赶到伦敦，给英国首相布莱尔，还有那些当时参与谈判的军情六处官员捎来了利比亚的特产——椰枣，还有卡扎菲本人对顺利解决这一事件表示满意的口信。

2004年2月，有巴基斯坦“核弹之父”之称的阿卜杜勒·卡迪尔·汗发表了一纸声明，公开承认向伊朗和利比亚等国非法转让核机密。这则消息再次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不过，英国军情六处的情报官员从会见卡扎菲之子赛义夫开始，到利比亚最后正式宣布放弃核计划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还是得到了广泛的赞许。

第十七章 秘密窃听，牵动王室万缕千丝

秘密监听，敢把窃听器装到首相官邸甚至是内阁办公室和首相书房，逼得首相打开水龙头或者是躲到厕所里才敢说话；皇家公主的派对裸照引发了一场惊天的银行抢劫案，戴安娜王妃的“巴黎车祸案”十年之后再起波澜……英国情报机关的耳朵无处不在。

窃听器装到首相官邸

秘密窃听应该是世界各国所有情报机关常用的手段之一，英国情报机构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英国情报机构居然敢在首相官邸安装窃听装置，监听多位

内阁成员；而窃听的结果不仅与国家机密有关，而且还能听出英国王室的私情与丑闻，这实在是让平民百姓眼界大开。

2010年4月18日，英国《每日邮报》公开报道了军情五处（即英国安全局）当年曾经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安装电子窃听装置的往事，被秘密监听的对象至少有5任首相及其内阁成员。

已经解密了的军情五处的绝密档案也显示，从1963年至1977年，军情五处的确是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办公室、等候室和首相书房三处高度敏感区域安装过窃听器。在前后将近15年的时间内，英国所有内阁会议、高级官员办公室和包括外国领导人在内的全部首相访客可能全部在监听的范围之内。

1963年7月，军情五处是应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要求，安装窃听器，监听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麦克米伦离任后，这些窃听器一度遭拆除。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继任首相数月后，又要求恢复窃听器，并且把监听范围扩大至首相书房，直到詹姆斯·卡拉汉就任首相的第二年，才下令拆除所有的窃听器。这时已经到了1977年了。在这将近15年的时间内，军

情五处那些负责监听的特工们可以说是饱享了一番耳福。

因为通过窃听，军情五处的特工不仅能在第一时间内，对英国的军国大事能够第一个了解，那些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也没能逃过他们的耳朵。

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安德鲁说，当年两度担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威尔逊一直怀疑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等情报机构因为想赶他下台而在监听他。威尔逊在任内，曾雇私人安保企业在办公室搜寻过窃听器，不过却没有发现。他禁止监听首相电话，“如不先打开全部水龙头、朝天花板上想象中的窃听器打手势，威尔逊似乎很少在厕所内说话”。可以想象这样的首相生活是多么让人胆战心惊啊！

事实上，英国情报机构的窃听工作一直就没有间断过。

2003年4月30日出版的英国《泰晤士报》惊曝特大新闻。英国首相布莱尔最信任的北爱事务大臣莫·麦拉姆和北爱“新芬党”教育部长马丁·麦吉尼斯的密谈居然也会遭窃听！事实情况是：自1997年夏天起，军情五处的特工就开始了对麦吉尼斯的监视监听行动。军

情五处的特工忠实地记录了布莱尔政府要员与麦吉尼斯之间的“亲昵通话”：在北爱共和军与英国政府和平谈判最关键的时刻，布莱尔首相最信任的北爱事务女大臣麦拉姆频频与北爱方面的首席谈判官麦吉尼斯通话，甚至连她如何跟布莱尔吵架，从而避免自己被免职这样绝密内幕的事也告诉对方。

军情五处窃听唐宁街10号与麦吉尼斯之间通话的惊人内幕被媒体曝光后，不亚于在英国政坛引爆了一枚原子弹。“新芬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英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声称结束对“北爱共和军”成员的监视和秘密行动，但暗地里却继续对“新芬党”和“北爱共和军”成员不信任。

英国情报机关的窃听不仅让首相们感到不安，同时也让英国王室那些有身份的皇室成员感觉很不方便。

在英国王室总有那么几个“不听话”的成员，比如玛嘉烈公主就是其中之一。这位20世纪英国王室第一个离婚的公主，是现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妹妹，因乔治六世的溺爱而叛逆无比。玛嘉烈公主吸烟酗酒，几乎无所不为，后来又一直沉溺男色，热衷于狂欢的

派对舞会。当年她在派对舞会上不仅狂歌劲舞，而且还喜欢一丝不挂地拍裸照。她有一张很风情的裸照本来藏于一家银行的保险箱里，结果却引发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银行盗窃案，最后让军情五处也难脱干系。

事情发生在1971年9月11日晚上11点左右。当时家住在伦敦温坡街的无线电爱好者罗伯特·罗兰整晚都在摆弄自己的无线电设备。他将频道调到27.15波段，想同在澳洲的朋友联系。出乎意料的是，那个澳洲的朋友没有联系上，倒是让他意外地听到了一段断断续续的奇怪的对话，这段对话听起来就像是银行劫匪和门外的望风人在交谈——

“外面冷得不行，你们拿到钱一定多给我分点。”

“别老念着钱，看好外面的环境，有没有警察？”

这段没头没尾的对话听起来实在有点叫人毛骨悚然，罗伯特·罗兰录下了这段无意中偷听来的对话，并且立即给伦敦警务处总部报了警。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一位资深警官回复罗伯特，吩咐他查寻对话来源。当时是周末的晚上，当通信工程师从睡梦中赶到现场时，那段用对讲机联系的对话已经结束了。

警方只有加大排查力度，他们几乎查遍了伦敦中心附近的750家大大小小的银行，最后把位于罗伯特家附近的150家银行确定为重点怀疑对象。第二天是星期天，警察来到贝克街转角处的一家名为劳埃德的银行，这也是他们重点怀疑的对象之一。从外部看去，这家银行没有任何被破坏过的迹象——15英寸厚的保险库门完好无损，门窗栅栏也没有被破坏。直到银行职员将库门打开，才发现这是英国历史上损失最严重的一起银行劫案。

通过实地侦察，警察发现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盗窃。犯罪团伙精心准备，租下离银行不远的一间皮衣店，并且在每天晚上从那家皮衣店向银行的方向挖地道。通往银行金库的地道“竣工”后，他们就用热喷枪割破了金库的金属库门。事后，警察在皮衣店内发现了重达8吨的混凝土，以及268个空空如也的保险箱。

在这起案件中，银行的损失估计总共在50万英镑以上，由于大部分受害者没有列出自己保险箱中的物品清单，所以银行后来无法进行赔偿。从第二天起，英国媒体接连一周轰炸式地报道此次案件。然而就在这时，一件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英国政府

居然发布了一个“通告”，说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劝导英国媒体对这起事件降温，不要炒得太热了。

政府的这种举动让老百姓无法理解。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是，那些劫匪在他们偷出的那一大堆保险箱里，发现了一张玛嘉烈公主的裸体艳照。

当年英国电视4台曾播出的一部纪录片《流氓和公主》，就是描述玛嘉烈的风流人生，因为当时她曾与伦敦声名狼藉的流氓有私情。这部纪录片的作者诺埃尔·博萨姆说：“玛嘉烈喜欢在马斯蒂克岛举行聚会，喜欢人们脱掉衣服，据说她曾给裸体的舞者拍照。”

由于这个原因，这起英国历史上盗窃数额最大的银行劫案，至今仍有超过100名保险箱主人否认自己遗失任何财物，这让整个案件更加扑朔迷离。

为何有100多名失主不去报案，甚至事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呢？事后英国许多著名的导演和编剧都给了一个相同的答案，他们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英国军情五处设计安排的。”

至于军情五处到底是怎样“设计安排”这件事情的，他们却是缄口不谈，讳莫如深。也许不是出于道

德，而是出于恐惧。

军情六处只是想通过车祸让戴安娜王妃流产

1997年8月31日，英国王妃戴安娜和她的情人多迪死于巴黎的一场车祸。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一直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军情六处也被卷入其中。事隔十年之后，还有人旧事重提，信誓旦旦地声称这起车祸就是军情六处一手制造的。



戴安娜王妃和她的两个儿子

安妮·麦肯是英国军情五处的美女特工，剑桥大学毕业后，从1991年到1997年一直都在为军情五处工作，是曾因违反英国《保密法》泄露机密信息而被判

坐牢的前军情五处特工戴维·谢勒的同事和女友。

安妮撰写的《间谍·谎言·告密者》一书，披露了当年她在军情五处工作时获知的大量内幕，关于英国王妃戴安娜死于巴黎车祸之事也是其中的内容之一。据悉，这本书的出版获得了军情五处的审核和许可。

她在书中言之凿凿地证实了英国情报机构涉嫌戴妃之死的说法。她应该是对这起事故提出“阴谋论”的第一人。

安妮在书中写道：“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当戴维和我刚刚听到戴安娜王妃和多迪死于巴黎车祸的消息时，我们都认为这是因为狗仔队摄影师在公路上高速追赶而导致的意外事故。尽管戴安娜和她的前情人詹姆斯·休伊特几年前就声称，他们一直受到军情五处的监控，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戴妃车祸死亡后的首要问题是：当时谁在追踪戴安娜？我的前搭档戴维·谢勒进行了自己的调查。”

戴维的调查结果显示，军情六处的确与戴妃之死有许多不明不白的联系，然而军情六处的本意并不想谋杀掉戴安娜，只是想将她撞成重伤，或造成流产。

安妮在书中引用了戴维·谢勒的调查结果：“通过调

查得到的证据，军情六处涉嫌安排让戴安娜和多迪发生一起事故，就像他们以前也曾试图用同样的方法暗杀利比亚领导卡扎菲一样。因为戴安娜当时要么准备跟多迪结婚，要么已经怀上了身孕。但军情六处计划制造一起车祸并不是想杀死戴安娜，只是想借这场车祸确保戴安娜能够离开多迪·法耶德，回到英国来治疗；此外，军情六处可能还希望通过这场车祸造成戴妃腹中的胎儿流产。”

安妮称，军情六处的本意并不想谋杀掉戴安娜，因为戴安娜死亡的事实会对王室造成不利的影响，同情戴妃的人会认为她是英国王室的牺牲者和受害者。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军情六处的“巴黎车祸”计划出了差错，一下子夺走了戴妃的性命。

戴维·谢勒的调查和安妮所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英国官方的确认。由前伦敦大都会警察局长约翰·史蒂文斯爵士率领的“帕吉特行动”小组在对戴妃之死进行调查时发现，戴妃出车祸的当晚，有两名军情六处特工曾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出现。

另外，当车祸发生时，有目击者称曾看到现场出现过一辆神秘的白色菲亚特汽车，车主可能是故意挤

撞戴妃乘坐的奔驰车。多迪的父亲、穆罕默德·法耶德的调查小组后来追踪到了这辆白色菲亚特汽车的下落，得知汽车的主人名叫詹姆斯·安丹森，是一名狗仔队记者。令人震惊的是，此人竟然跟军情六处有关系！

1998年8月，前军情六处特工理查德·汤姆林森在一份宣誓证词中，披露了安丹森和军情六处的秘密联系。不过在6个月后，安丹森就死于非命。

理查德·汤姆林森在那份证词中还披露，他还看到过一份军情六处的文件，上面显示巴黎里茨旅馆的一名安全经理亨利·保罗也是军情六处的特工，而当年戴妃到巴黎后，就是下榻在巴黎里茨旅馆的。

从以上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军情六处在戴安娜的车祸中，的确是扮演了一种让人怀疑的角色。

另外，有美国消息灵通人士也曾透露，戴安娜在出车祸之前，一直就处在情报部门的监控之中。在戴安娜去世时，不要说英国情报机关，就连美国国家安全局都已经掌握了与她近期情况有关的长达1053页的资料。安全局宣称，这些记录已被列入保密资料，如被公开，则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但大众很

难接受这一解释。这些“保密”文件据说也包括戴安娜与男友多迪·法耶德之间的电话记录。当年法国警方对两人遇害的那次车祸进行调查时，就曾经得到过这些文件中的一小部分。

还有一些关于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的窃听材料不那么容易解释。几个最富争议的皇室成员的电话录音在当时也相继出现在报纸上——戴安娜和她的马术教练詹姆斯吉·伯的对话、查尔斯王子和他的情妇卡米拉的电话录音——这些录音带都是在1989年制成的。同时出现在报纸上的还有约克公爵夫人萨拉和她丈夫安德鲁王子、菲利浦亲王和他一个亲戚之间的电话录音。

这些谈话据说是由一些业余爱好者利用廉价设备截取的。谈话录音被公开后，记者们认为这些录音带的专业水准显示它们更可能是情报机构的杰作。

2007年11月4日，《广州日报》刊登了关于多迪的父亲的一篇文章《我是不听话的奴隶》。在这篇文章中，多迪的父亲艾尔·法耶德认为车祸是英国情报部门搞的鬼。

法耶德说过，戴安娜曾通过一个不知名的密友，

将其临终“遗言”告诉他。

法耶德说，在车祸发生几周之前，戴安娜曾根据自己收集到的威胁对他说，将会遭遇某种不测。他声称，多迪与戴安娜出事车辆上的司机并未醉酒，他的血液样本受到污染或者被人调包。

法耶德曾经宣称，多迪和戴安娜是被英国情报机构干掉的，带头策划这起谋杀案的是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为首的一小撮英国王室成员。英国军情六处的秘密特工制造了那起假车祸。因为，曾有英国小报报道说，菲利普亲王毫不隐瞒自己对以前的儿媳与多迪的关系的厌恶，他曾讥讽多迪是一个“会说甜言蜜语的床上跳蚤”。

法耶德的这些说法都缺乏可靠的证据，但却经常成为媒体的焦点。而且，他的种种说法从来都不乏支持者。

在车祸发生后几天之内，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报纸上就开始出现各种离奇诡异的报道，称戴安娜是被谋杀的，目的是确保她不会嫁给一个穆斯林。包括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在内的一些政治领导人都曾谈及此事。

即使在英国，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四分之一以上

的英国民众认为这起车祸并非意外事故，而是一桩谋杀案。

在法耶德认定车祸为蓄意谋杀的10点理由中他提到，车祸发生时为戴安娜和多迪开车的司机亨利·保罗是为英国军情六处和法国情报机构工作的特工。保罗在车祸发生当晚曾与上述情报机构人员见面，并获得他们提供的现金。

英国《独立报》曾报道说，车祸发生时，保罗身上携带1200英镑（约合2400美元）现钞，随后调查人员在保罗的多处银行账户中发现总计17万英镑的存款，而他在酒店工作的月薪只有1500英镑。面对质疑，保罗的母亲坚持说巨额资金源于酒店客人给的小费。这种能付得起30多万美元“小费”的主应该是谁呢？

保罗母亲的这种说法无疑是在把自己的儿子给出卖了，让人很快就会联想到付“小费”的人，只有那些财大气粗的机关和团体。

关于戴妃死因的调查看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真相会浮出水面。不过到那时候，军情六处可能也已经没有隐瞒真相的必要

了。

塞浦路斯的监听站可以听到北京飞机降落的声音

英国情报部门的窃听，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2004年2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谈英美是怎样窃听世界的。文章援引情报专家詹姆斯·班福德的话说，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每小时截获数百万个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班福德说，美国窃听机构国家安全局和英国窃听机构政府通信总部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的间谍机构，事实上，它们可以窃听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谈话”。两家机构联合行动的代号为“梯队”。

当年，班福德有机会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并且能接触这两家机构的官员，他后来出版了《秘密机构》一书，披露这两家机构是如何窃听世界的。他在谈到关于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安南遭窃听的传言时说：“我敢肯定他们的确这样做了。”他还说：“他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窃听。他们会找出安南的电话在纽约交换局所走的线

路，然后搭线窃听。如果安南使用的是加密电话，他们就会去他的办公室。”

虽然人们往往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这两个情报机构了解得更多，但提供情报最多的实际上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预算和工作人员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中情局。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近年来，国家安全局和政府通信总部对敌人、欧洲盟友和中立国都进行了窃听。国家安全局一份泄露的备忘录显示，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他们把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时立场摇摆不定的6个国家作为窃听目标，其中至少有两个国家确信它们遭到了窃听。

班福德说，美国有窃听联合国的传统。美国1945年在旧金山主持召开关于成立联合国的谈判时，就对所有代表团，特别是法国代表团进行了窃听。虽然法国代表团有一个复杂的密码机，但美国的电码译员可以破译法国的密码。美国之所以希望联合国将总部设在美国，原因之一就是这样可以方便国家安全局窃听。他说，通常美国负责窃听联合国，英国负责窃听西欧。他还说，它们是同一个机构。监听站一度遍及

欧洲，不过班福德说，在欧洲的大部分窃听活动已经由英国政府通信总部负责。

他们窃听的大量内容是通过设在全球各地的监听站获得的。据说，英国设在塞浦路斯的一处监听站可以听到飞机在北京降落的声音。不过一些老办法也很有效。乔装打扮成清洁工、复印工的特工将窃听装置安放到被监听者的办公室或家里。这些装置往往被放在灯具或插座的后面。

英国情报机关发展到今天，各种监听的手段又有了更大的进步。据2001年3月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随着网络的发展，英国情报部门已建立了一个网络虚拟监测中心，用来监视英国发出和接收的所有电子邮件。英国国内事务部人士表示，这是因为恐怖分子和国际犯罪分子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

报道说，这个虚拟监测中心位于英国反间谍部门军情五处的伦敦总部内，投资额为4000万美元。警方和军情五处要搜查电子邮件和网上信息传递将需要获得国内事务部的许可，但也可以申请更大权力。

据《今日美国》报道，“基地”组织也正试图利用

互联网招募尽可能多的西方人，以便更容易打入西方国内目标。英国国内事务部人士对此表示，正是因为“基地”组织越来越多地使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英国情报部门才决定投资4000万美元建立这个虚拟监测中心，以便通过由英国发出和接收的所有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信息，寻找有关恐怖活动的蛛丝马迹。

与此相配合，英国军情五处目前还成立了一个计算机专家小组，专门监控恐怖组织网站。据英国《太阳报》援引英国网络反恐专家的话说：情报部门之所以选择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虽然“基地”组织拥有相当数量的计算机专家，手段高超且善于掩藏行踪，但其成员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这些错误就是反恐情报侦察的突破口。虚拟监测中心计划通过“基地”组织公开或秘密的电子邮件，来侦察恐怖分子潜伏在哪里、亲“基地”组织的机构设在哪里等等。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情报官员表示，英国情报部门的网络虚拟监测中心除了全面监视进出英国的电子邮件外，还经常出入互联网聊天室去寻找可疑人员，而这是效法美国互联网反恐情报战的结果。

据美国最新曝光的文件显示，美国在监测互联网

以搜集反恐情报方面动手要比英国早得多。“9·11”后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执行了一项网络情报战计划，力求通过监看互联网聊天室发现潜伏的恐怖分子。据称，这一“借助高科技手段反恐”的计划无需人工介入就可以部署在任一聊天室的背景当中，能“默默监听”那些网络聊天室，“把通讯内容全部记录下来”。其每天记录的数据为几百万条，处理的电子邮件有上千封。

尽管英国情报部门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开展网络反恐情报战，但有时它也会被“基地”成员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所迷惑。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网络虚拟监测中心的那些情报人员就有过多次上当受骗的经历。这些“网友”告知他们将要有一个恐怖袭击，于是英国有关安全部门如临大敌，并被迅速动员起来，然而，最后结果表明，袭击情报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科技时代的到来让英国情报机构也同其他各国情报机构一样，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

第十八章 谍海沉浮，特工命运天上人间

戴维·谢勒生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成为特工后也很“另类”，愤然辞职后偕同女友亡命法国巴黎，只因他泄漏了不该泄漏的内幕；三年后引渡回国，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同居14年的女友也离他而去。汤姆林森和另一名不知姓名的特工都是毕业于剑桥大学，不料成为特工后却双双被开除了，一个出狱后再度被封杀，一个流亡西班牙后不知所终。同在谍海沉浮，英国军情局的特工命运却是天上人间……

戴维·谢勒男扮女装成性感女郎

追查“鼯鼠”行动，的确让英国情报局查出了许多双重间谍，并且有的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有许多并不是“鼯鼠”的特工，结果到头来也没有落得好下场，有的甚至还要受到牢狱之灾。戴维·谢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戴维·谢勒生来就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他当年在邓迪大学读书时，就是有名的捣乱分子。特别是他1987年担任校刊编辑后，更是表现得非常另类，与众不同。那时他经常喜欢搞些怪名堂，说些极端的话。大学毕业后，他到《星期天邮报》当见习记者，6个月期满后，报社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没有录用他。不久，他就成了安全局人员。

他在军情五处6年的时间中调换了好几次工作，先是从C处（对政府和内部人员进行审查的部门）调到F2处（反颠覆部门），后又从F2处调到G处（负责反恐怖事务）。但是不管到哪个处，他一直都少有提升的机会。当时他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一头黑发，身材肥胖，同事对他的评价是聪明、自信但又自大。戴维·谢勒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在公共场合吹牛，志大才疏，时常发表一些高论，声称要改革秘密保安局。

但有时机会来了往往又竞争不过同事，最后只好自动退出。

谢勒到军情五处后没有多久，就以5000英镑的价格，向《星期天邮报》出卖了安全局的内幕消息。当上特工后，仍背着组织继续与报界友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谢勒对外界说：“我知道讲出这些有被起诉的危险，但我若不说出来，这些事情就总在折磨着我，令我良心不安。”

1997年8月，谢勒提交了辞职报告，然后离开了军情五处。据他自己讲，他在军情五处工作期间，目睹这个情报机构的管理不善、效率低下和官僚作风，因而深感失望。他还说，在1996年军情六处策划的谋杀卡扎菲的阴谋出现失误造成无辜平民死亡后，自己就想离开军情五处，他说自己“不想成为这个机构的一部分”，不想牵涉其中并成为“一名需人宽恕的杀手”。

当时和谢勒一同辞职的，还有一位女士，就是长期与他同居的女友安妮·麦肯。麦肯女士当时29岁，剑桥大学毕业，也是秘密保安局人员。麦肯工作表现极好，是细致谨慎的典型，上级非常器重她，大家一致公认她在秘密保安局“前途无量”。然而，她却和谢勒

在同一天递交了辞呈。麦肯面临的审查是，是否曾拿出机密档案，擅自给自己的男友看。

谢勒和女友一同辞职之后，有人就指责安全局，为什么在征募时不把好关。有人批评安全局只顾了公开征募，忽视了质量。另有不少人从保密制度的角度质问安全局：“为什么让职位那么低的人员接触到现任高级政要的机密档案？”

其实，早在此之前，议会情报安全委员会主席、前保守党国防大臣汤姆·金就已经好几次约见英国几家情报机构要员，提醒他们注意内部安全，严格管理机密材料。近年来英国情报安全部门不断出现“变节分子”，没少泄露机密。1984年，安全局人员麦克尔·贝坦内企图向苏联克格勃出卖机密，1985年，卡西·梅西特向外界透露了安全局详细的反间谍、反颠覆机密。1987年彼得·赖特出版的《反间谍者》一书，更是把安全局的家底儿抖搂一番。

由于1989年《保密法》出台后，人权自由派团体向欧洲联盟人权法庭递交了抗议报告，所以大多数泄密者都没有被起诉。每次轰动性的泄密小闹剧过后，英国情报界总要对自己内部管理、人员录用等问题审

视一番，这次当然也不例外。

戴维·谢勒虽然离开了安全局，但同样给英国情报机关惹出了不少麻烦。辞职后不久，他就向《星期日邮报》记者尼克·费尔丁出售了28份政府秘密文件，得到了4万英镑的好处费。

1997年8月下旬，英国媒体纷纷报道了一条令情报机构和内阁要员们十分尴尬的消息，说是“现任几位政府要员曾是安全局侦查和窃听的对象”。此话一出，真是石破天惊。

经过调查，原来这都是戴维·谢勒向媒体披露的。戴维·谢勒曾对媒体说，从70年代到80年代，安全局对现任政府高级官员的某些工党人物进行过电话窃听，并将他们的材料一直保存到1992年。被窃听的高级官员有：现任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社会安全大臣哈里特·哈曼女士等。

彼得·曼德尔森1977年担任英国工会大会负责人，也是共青团员和大不列颠共产党党员。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组织的“青年节”，去过古巴等国家。安全局从他还是个大大学生时就进行电话窃听，目

的是想弄清他是一个卧底间谍还是一个只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当然窃听者从中得到了不少曼德尔森的其他趣闻。

至于《卫报》副主编兼记者维多利亚·布里顿女士，是因为她的银行账户上多了25万英镑而被怀疑，因为那些钱是从利比亚汇来的。英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规定，银行若认为哪笔款项可疑应向警方报告。安全局接到报告后，怀疑她在为利比亚恐怖分子洗黑钱，从1993年起对她进行侦察。除了电话窃听外，布里顿走到哪里，特工就跟到哪里，原本打算在她的家里安装秘密摄像器材，但因太容易被布里顿的家人发现，所以没干成。

不过时隔不久，特工们发现了布里顿得到那笔钱的正当理由。戴维·谢勒几乎是有点幸灾乐祸地说：“为了侦察布里顿女士这一‘典型的洗黑钱行为’，MI5花了75万英镑。”

世人皆知，英国安全局局长期以来对左翼人士进行着广泛的侦查，其中包括工会组织者、人权和自由派团体成员以及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青年学生。不过在戴维·谢勒看来，安全局这样做，实在是有点神经过

敏，甚至是侵犯人权，纯属是无事找事。

这些事经媒体一报道，马上传得沸沸扬扬，让情报部门十分紧张。于是在1997年8月24日，英国国会举行听证会，讨论泄露机密者谢勒的行为是否违反了《保密法》。

5天后，也就是8月30日，政府从最高法院领到了上方宝剑，立刻制止戴维·谢勒通过公开出版物背叛国家安全事业，让某些个人受到伤害的行为。英国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表示，他不想阻止法庭辩论，谢勒的行为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很大危害”。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制止泄密行为是必要的。他还说，自己曾多次劝告有关报纸不要刊载谢勒泄露国家秘密的文章，但没有效果，所以只好借助法令来解决。

听证会以后，一时满城风雨，英国民众也议论纷纷，都来质问“究竟存了多少份公民的黑材料”？

8月29日，《泰晤士报》透露，安全局局长史蒂芬·兰德男爵迫于公众压力，准备近期公开本局所掌握的公民私人秘密档案的数字。当时外界估计至少有100万份公民私人秘密档案。也就是说，几乎每100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被侦查。但是后来公布的实际数字却比

这种估计要少得多。

实际上，在一年前，安全局已经根据议会安全委员会的指示，开始销毁不需留的档案，兰德局长想选择一个适当的日子公布数字，以安慰议会和公众，安全局已经销毁了很多旧材料，同时严格控制接触旧档案的人员。

英国情报安全机构对此的反应是：对上寻求保护，政府决定用法令强行制止就是证明；对泄密者按照各种法规立刻进行审查，以便找出证据对其起诉；对内反省保密制度和录用制度。

由于惹出了这样的麻烦，谢勒知道自己在英国已经没有立足之地，同女友安妮·麦肯一起于1997年8月23日逃往法国，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初到法国，谢勒和安妮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全，成天如惊弓之鸟，到处躲藏。9月，为试探政府的态度，谢勒让安妮回国，结果安妮一抵达伦敦的机场就被逮捕，被讯问了6个半小时才获释，过了一段时间才返回巴黎。在这种情况下，谢勒不敢轻举妄动，在巴黎过起了隐居生活。好在所需费用由《星期日邮报》承担。

过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谢勒希望政府取消对他的指控和通缉，但政府方面不为所动。于是谢勒决定披露更多的情况让政府难堪。

1998年7月，谢勒指责军情五处在1994年未能阻止针对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的恐怖主义攻击，并揭露军情六处官员在1996年策划了暗杀卡扎菲的阴谋。谢勒的做法让英国政府十分恼怒，于是向法国提出了引渡要求。

1998年8月，谢勒在法国被捕，并在没有任何指控的情况下在法国监狱里呆了三个半月。11月，法国宣布，英国的引渡要求因含有“政治动机”而被驳回，谢勒恢复了自由。谢勒当时表示，他不会再有新的揭露英国情报部门的举动，他要求取消针对自己的指控，但谢勒的努力没有结果。

1999年8月，谢勒威胁要泄露更多的有关军情五处的秘密，这一次，他要尝试通过互联网。谢勒声称，情报信息已储存在他的计算机上，只需按下一个键，就可以把消息发出去。

2000年2月，英国政府下发正式文件，认为谢勒的所作所为违反了法律，应予追究。于是双方的新一轮

较量开始。

谢勒披露，军情五处的档案表明著名的摇滚乐队“披头士”成员约翰·列农曾资助过爱尔兰共和军。3月，谢勒将一卷有关暗杀卡扎菲的文件交给了伦敦警察厅。接下来政府将一名同谢勒联系的女大学生朱利·安·戴维斯抓了起来，罪名是违反了《保密法》。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异国，谢勒思乡情绪愈来愈强烈。这位米德尔斯堡足球队的忠实球迷，一直为流亡三年未能去现场看一场米队的比赛而遗憾不已。米队球迷协会主席西蒙·博尔顿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说，谢勒在流亡期间一直与协会保持联系，而且还给他们写过几篇文章。

2000年8月21日上午，34岁的戴维·谢勒在法国港口城市加来向三年来一直陪伴着自己的女友安妮·麦肯依依惜别，在家人的陪同下登上了驶向英国多佛尔港的客轮，决心回国以自己的勇气和行动来证明自己揭露情报部门内部情况的行动是正确的。

上午11时，客轮终于抵达丹佛。在记者和摄影师的簇拥下，谢勒刚刚通过移民检查处，即被特警队逮捕，带往伦敦接受讯问。

谢勒接受讯问后，当天即获得保释，从而证实了他回国前所声称的在保释问题上已同政府达成特殊交易的说法。在离开加来前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谢勒说：“我做了我所做的事，是因为我热爱我的国家。我不是叛徒。”

2009年7月18日，英国《每日邮报》、《每日电讯报》等多家报纸公开报道了一条让人关注的新闻——“英一代名谍精神崩溃男扮女装成性感女郎”。报道说，43岁的英国军情五处前特工戴维·谢勒是轰动一时的“间谍名人”，如今竟彻底精神崩溃，成为一名男扮女装的“异装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不仅自诩为“救世主”，更扬言人类将在2012年迎来世界末日。许多知道底细的人以及谢勒当年在军情五处的那些同事都说，是政府和情报局把戴维·谢勒逼疯了。

与谢勒相恋14年的女友安妮也于2009年和他分手。安妮指责说，将谢勒逼疯的“罪魁祸首”就是英国政府和情报机关。

汤姆林森在网上公布名单报复军情六处

戴维·谢勒的故事让我们窥见英国特工命运之一

斑。但戴维·谢勒的遭遇并不是第一个，也并不是最后一个——另一位英国特工的命运应该是戴维·谢勒命运的翻版。

出生于新西兰的理查德·汤姆林森，1991年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后被军情六处录用。汤姆林森在剑桥获得了航空学博士学位，还曾在英国空军精锐特种部队中服役。对于这样的人才，军情六处当然不会给他坐冷板凳。他上任后便立即被派到莫斯科、波黑和中东等地执行“特殊重要任务”。

然而，本来前途无量的汤姆林森却突然在1995年被军情六处开除。他还被禁止向法庭提出上诉。此后，汤姆林森开始著书立传，准备向世人讲述他的间谍生涯。但是，由于他向出版商提供“秘密情报”的行为违反了英国的《保密法》，他被判处6个月监禁。

他在向美国的《时代》周刊透露说，英国秘密情报局曾计划暗杀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他说，英国秘密情报局打算通过制造一次类似于1997年英国王妃戴安娜车祸那样的事件来达到目的。更绝的是，他还告诉调查戴安娜车祸的巴黎法官，“英国特工与戴安娜的死有关”。1999年5月，汤姆林森更是一不做二不

休，在因特网上公布了100多人的英国海外间谍名单。

1999年5月，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游览时，无意间进入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杂志《行政情报评论》的网站，发现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由一个个排列整齐的人名组成，每个人名的后面标出了派驻海外的地点和详细时间，共116个人。名单末尾的注释更让人吃惊，原来，这是一份英国军情六处海外秘密情报人员的名单。这份绝密名单竟然在国际互联网上公布出来，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真会怀疑这是天方夜谭。

5月13日，军情六处知道了事情，立刻慌了手脚。一方面，他们通过英国政府紧急给美国政府发照会，要求立刻关闭公布该名单的站点；另一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此名单不真实，暗地里却通知所有名单中涉及的海外特工注意防范，以免发生危险。此外，军情六处的保安部门也对此事展开了秘密调查。

不久，公布该名单的美国杂志《行政情报评论》关闭了自己的站点。与此同时，英国新闻媒介也被劝阻不要透露名单及该网址中的其他有关内容。但是，该名单和有关内容很快又在别的网址上出现。

这份名单的真伪，在英国媒体的紧追不舍下，逐

渐得到证实。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这份名单中所泄漏的情报员平均年龄约47岁左右，身份特征非常类似，几乎全是英国剑桥或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能操多国语言，与王室关系良好，有四分之一的人曾获得过国家颁发的各种荣誉勋章。

迫于强大的压力，军情六处发言人不得不承认，这份名单上的116人当中有很多并非是军情六处的特工，而是普通的外交人员，但他没有否认其中仍然包括了几十名军情六处的特工。该发言人还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要采取紧急措施，保护这些特工的人身安全，特别是派驻巴尔干地区特工的人身安全，因为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在那里对南联盟进行狂轰滥炸。军情六处和英国政府对在互联网上公布名单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

对这次泄密事件严重程度的评估正在进行中，因为军情六处尽管有2000多名工作人员，但真正的海外秘密特工不过350人，这次一下子就泄露了几十个，对军情六处的打击可想而知。可以想见，军情六处不会轻易放过泄密者。在追查泄密者时，军情六处的保安部门首先将目光盯在了被辞退的前特工汤姆林森身

上。

汤姆林森毕业于剑桥大学航空工程系，曾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1991年进入军情六处，后来被派往莫斯科和波斯尼亚从事间谍活动。不知什么原因，1995年底该局高层突然决定辞退他。汤姆林森要求向工业仲裁法庭提出申诉，为无理被解雇寻求公道，但当时的国防大臣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理由，拒绝交付仲裁。

汤姆林森离职后前往西班牙，愤愤不平的他曾写信给当时的局长斯佩丁，威胁将不惜采取与敌对国家情报机构联系，包括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等手段，公开军情六处的内幕。鉴于他掌握的机密情报关系到英国驻外情报人员的安全，军情六处不得不委曲求全，私下派人与其协商，答应给予金钱资助，条件是他交出所有资料，并保证不发表文章。此后，汤姆林森返回伦敦。

但军情六处不久便发现汤姆林森并未信守诺言，一方面他继续匿名向《泰晤士报》投稿，另一方面还积极与澳大利亚的一个出版商联系，准备出版回忆录。

军情六处见状，作出了将其秘密逮捕的决定，并依据《保密法》对其提出指控。同时，军情六处向高等法院提出申请，禁止《泰晤士报》继续刊登有关文章，后经法院审理，汤姆林森被判处12个月监禁。

2002年8月，出狱后的汤姆林森与前英国军情五处的特工谢勒取得了联系，两人商定将他们在情报部门中工作的经历如实地写成一本书，由于英国政府已要求买断所有谢勒和汤姆林森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版的有关情报机构的书籍的版权，所以两个人决定首先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他们的文章。一直严密监控着谢勒和汤姆林森的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看到局面如果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失控，就将有关情况通知了法国警方，法国警方遂将两人逮捕。但不久便将汤姆林森释放。

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汤姆林森在瑞士洛桑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个人网站也被关闭。他所到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和法国都拒绝他入境。

汤姆林森得知军情六处将其作为怀疑对象时，立刻站出来声明自己与此事毫无干系，但也表示自己不会返回英国洗脱嫌疑。他说：“我绝不会为了一些我没有干过的事返英。若军情六处肯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我很乐意回去，但我绝不重回贝马什监狱。”汤姆林森还指责军情六处企图利用该名单来给他抹黑。他说，当局显然认为“怪罪于他要比保护名单上的特工更重要”。当记者向他指出他曾公开威胁要在互联网上公布特工名单时，汤姆林森表示，那是因为自己受到迫害才有此表示，但“那只是虚张声势，我没有胆量付诸行动”。

特工“T”逃亡西班牙不知所终

下面要介绍的这名特工当年供职于军情六处，他的遭遇同戴维·谢勒和汤姆林森一样，让人有殊途同归之感。根据英国《保密法》明确之规定，凡是被解聘情报人员与任何记者的联系内容都必须向管理部门报告。这名特工是军情六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而军情六处又是“英国最机密的一个情报机构”，因此这位特工的真实姓名一直没有透露，媒体就称他为“T”。

西方的一些情报机构向来喜欢到名牌大学征募特工，英国也不例外。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学校。但是，当读剑桥大学三年级的T被问到“是否想做刺激些的情报工作”时，他的回答是否定

的，因为当时他“更希望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

T以剑桥大学工程学院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后，得到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在美完成了另一个学位。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在南美洲的一家规模较大的民航公司做职员，但因该公司走私毒品，他也受了牵连。作为嫌疑犯他被警察扣留，但没多久就被放出来，因为他满足了当地警察局的一个条件“帮助我们打一场橄榄球赛”。

回到英国后，他找到一份普通工作，每逢周末作为消遣，他都去英国特种部队反恐怖团参加训练。这是一个能让他展示特长的机会。与所有参训者相比，T的体育技巧、耐力、顽强的竞争精神得到全方位的体现。不仅如此，他还积极参加撒哈拉沙漠汽车越野赛和海上快艇比赛，并在滑冰业余组的竞赛中夺取冠军。

雄心勃勃的T在得意洋洋之余觉得自己该为国家做些什么，怀着这样的心情，他来到了军情六处的招聘办公室，很快就成为一名学员。训练课对T来讲一点也不吃力，据说他照常上夜总会，有时会对人吹牛说“我会制作麻醉剂，我喝一杯威士忌也不会醉”等等。他也

经常对别人说“非常喜欢这一工作，因为情报职业的稳定性和高退休金同它存在的危险性一样具有吸引力”。

最优秀学员T在训练结束后，立刻被派往“一线”执行任务。T的第一个行动是秘密潜入莫斯科，侦察俄导弹军事秘密。在1991—1995年的四年中，他先后到过欧洲不少国家，并且在中东和战火纷飞的波斯尼亚执行过极敏感的行动，包括征募当地的情报人员。

然而没过多久，T这颗闪烁的新星突然熄灭了，他莫名其妙地被开除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原来，T在这段时间遇到两件不幸的事，给他造成了精神创伤，使他一蹶不振。

第一件事是他曾经有一位很要好的女友，她一直希望早日同他结婚生子。但T还想在工作上大干一番，不愿早结婚。不久他的女友被医院诊断得了癌症。T恰在这时接到前往波斯尼亚执行任务的命令，考虑再三，选择了工作，抛开了女友。等他半年后完成任务回来时，他听到的消息是“她已经死了”。

另一件事发生在波斯尼亚。他在执行任务时，亲眼目睹走在自己身边的一位妇女被炮弹击中，他曾想为她做些什么，如包扎抢救，但一点用也没有，她当

场就死了。这两件事深深地刺激了T，所以当他回到泰晤士河西岸军情六处的总部后，心情非常沮丧。但是他又不想把自己的不幸和想法告诉上级。总部大楼上有一露天酒吧，他经常独自一个坐在那里喝闷酒。同事见他老是这副借酒消愁的样子，认为他内心矛盾，软弱无能，甚至有什么事情在瞒着组织。

然而，T的上级虽然也发现了他的情绪有些不对头，但并没有什么反应，而是照样分配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打入中东一个私售军火组织，找到并去破坏他们的化学工厂。可是，就在T即将完成任务准备返回时，他接到一个通知“你的可靠性评审鉴定有疑问”，人事部门指责他经常“自我放纵，容易出错”。

接到这样的通知后，一开始T还以为是人事官员无事生非，也就没有往心里去。但是，当他1995年初返回总部大楼上班时，却发现情况真的变了，他居然被军情六处拒之门外。他一连三天把自己的通行卡插入大门的电子检身器都无济于事。后来一个警卫走出来对他说：“你的这张通行证已经作废了。”

T就这样被开除了，他简直不能相信，他认为自己每项工作都完成得很不错，而且“随时准备为保卫自己

的国家而献身”。后来，他似乎终于找到了自己被炒鱿鱼的原因——他曾对他的朋友说过，“这一切都是在我向上级指出军情六处的一些情报手段‘不道德’后发生的”。

T绝望地回到伦敦城南的家中，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他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按照惯例，军情六处对解聘人员，包括违反法律的特工都帮助找到其他工作，但唯独对T不这样，更不用说有“丝毫补偿”。

当时他还天真地一再申诉，但得到的仍是含混不清的回答：“你一直在单独行动，没人可以证明，所以无法评价，没有任何具体问题可说。”

T是军情六处中第一位要求职业仲裁法庭（1994年成立）仲裁的官员。然而，仲裁法庭没有站在他的一边，而且没有说明任何原因。T认为，这唯一的一次职业仲裁法庭的听证“非常荒谬”，使他和律师都无法为自己辩护。据说这是因为主管军情六处的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坎德已事先通知这个仲裁机构，“不要插手此事”，里夫坎德同时还警告媒体“报道T的事情，就是泄露国家机密”。

在投诉无路的情况下，T不得不隐姓埋名远走他乡，但英国警方的追捕也开始了。为了防止情报部门杀人灭口，他处处谨慎小心。他只是对他要好的一位朋友说：“我是一个出色的特工，他们解雇了我，我要用受训时学到的本领好好地对付他们。”

当时情报部门向他所有朋友打听他的去向，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原来他已经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西班牙。

西班牙海岸的德尔索尔小镇一片凄凉，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这位瘦高个子的英国人驾着一辆轻骑摩托驶进了这个几乎被人们遗弃的小镇。他的旅行包里有台全功能电脑和一双老名牌冰鞋。

在一所破旧的农舍里，T落了脚。日复一日，T都在重复着相同的生活，从镇上小杂货店买份英文报纸，在潮湿的酒吧凝望大海，几个表情忧郁的老人从他身边经过彼此不打招呼。偶尔他也玩玩台球，看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他在通往农舍的小路上偶尔徘徊一会儿都会提心吊胆，总是疑心那些追踪的人已在那里等候自己了。

然而，更多的时间他还是坐在电脑前，一幕幕地

追忆在军情六处工作时，他的顶头上司是如何耍自己的，使自己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有时他也会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该如何去报复。

1996年春天，T终于鼓起勇气，通过电话把自己的遭遇向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反映了。尽管报社也认为，他的遭遇完全可以写成一篇吸引读者眼球的报道，但是《星期天泰晤士报》最终却没有勇气公开此事。

秋去冬来，T还是那样一直待在那个荒凉的小镇，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才能够保住自己的性命。这时他已经变得囊中羞涩，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于是他给报社打电话的次数更多了，他希望得到经济赔偿。因为，为了维持生计，他已经抵押借款8000英镑。后来经报社再次向上级请示才被允许报道T的故事，但“不许把全部实情曝光”。

1996年9月14日，T通过移动电话，警告军情六处的官员，他已经把自己当特工时所干的一切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的间谍生涯》。里面不仅有英国秘密情报活动内容，而且有所有他认识的秘密特工的真实姓名。T说，他已将此书稿存在“另一个世界的两

部电脑里”，这两部机器如果哪个星期没有定时得到T（若被捕或暗害）的秘密指令，就会把书稿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自动发表出去。T说：“我要求重新开庭，公正审理。如果得不到重新开庭的机会，这本书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新闻媒介。如英国新闻协会、路透社或者是《观察家报》等等。”

半个月后，T再次告诉英国《观察家报》：“这本书披露了我从事的秘密工作的极为详细的情况，包括所有官员的真实姓名。这些问题极为敏感，绝对是一枚炸弹。”“我无非是想上法庭，我已经写信给我原来的上司，如果有公正的裁决，我将不出版此书；否则，网上的所有用户就会知道英国的秘密。”

T还在电话里告诉军情六处的那些官员，已有别国情报机构的人找到他，要求他们为他们干，不过自己暂时还没有最后决定——T的这些话当然有恐吓的意思，但是军情六处的官员听了之后却信以为真，并且在猜测是俄罗斯或者是以色列的特工在活动。他们非常紧张，担心T会投靠敌国，马上向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

英国政府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显得十分紧张。因

为他们既怕T的书出版后会公开那些不能告人的内幕，又担心某一个敌对国的情报组织派人来“搭救”他。尽管T是个小人物，但他毕竟曾是军情六处的一名特工，掌握许多重要的机密，这些东西对英国以外的那些情报机构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而这将会威胁到英国国家的利益甚至是安全。

为此，有关当局命令军情六处马上采取以下措施：一、主动与T建立“热线电话”先稳住他；二、命令为T出书的代理商马克·卢卡斯交回书稿，中止合同；三、派人秘密前往西班牙将T逮捕回国；四、赶紧疏通英国最高法院，得到最高法院的上方宝剑——阻止T谈工作秘密，对“已经非常烦琐”的《保密法》做进一步的充实。秘密情报局发言人说：“任何泄密都将对其他特工造成威胁，情报部门将继续做不开庭的努力。”

1996年11月17日，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这样报道：“秘密情报局已经成功地解决了一名前情报官员出书泄密的问题……政府一直非常担心秘密情报局的那名‘无赖’侦探将出版《我的间谍生涯》一书和把书稿存入国际电脑网络，以及背叛祖国的行为发生。政府唯恐1987年《反间谍者》的旧事重演。”

《星期天泰晤士报》还在报道中说，“秘密情报局局长大卫·斯佩丁证实：为了追捕他，早就成立了专门行动队，而且可以肯定地说，T已与一个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工取得了联系。据说已经有人在西班牙见过他”。

不知《星期天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是真是假，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那个叫“T”的英国特工的消息，包括他的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

这就是英国情报机构某些特工人员的命运——尽管他们并不是“鼯鼠”。

第十九章 “师生”联手，虐囚丑闻惹火烧身

当年英国人在美国纽约成立了英国“安全协调局”，拉开了英美两国情报机构合作的序幕。威廉·史蒂芬森创建的“X训练营”曾培养了5名中情局局长，成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开山始祖”和当然的老师；师生联手，在世界情报界呼风唤雨，从二战到冷战一路走来，不料伊拉克战争却让英国情报机构惹火烧身——“虐囚”丑闻官司未了，又惊闻“基地”组织派出“王子杀手”对付女王的三个儿子……

“X训练营”培训了5名中情局局长

英国情报机构当年不仅帮助美国人创建了中央情报局，而且一直同美国情报机构合作到今天，但是他们也给自己惹下了不少的麻烦。

威廉·史蒂芬森是英国谍报界的首脑，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创建者。他是西方情报界一位传奇的人物。

史蒂芬森原是加拿大一位巨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他加入了加拿大陆军，后来成了一名杰出的飞行员，并被调到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由于作战英勇，战友们送他一个绰号“无畏”。

1936年4月，史蒂芬森得到消息说，希特勒正在疯狂扩张军力，并对外隐瞒了8亿英镑的军费开支。他觉得这严重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将对欧洲乃至国际安全构成威胁，于是就把这些情报报告给了当时英国反对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得到了丘吉尔的高度重视。丘吉尔后来以此为炮弹，在议会里炮轰时任英国首相阿瑟·尼维尔·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史蒂芬森一直从事无线电和破译密码工作，参加谍报活动，曾多次赴北欧执行任务。1940年4月，已经出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任命

史蒂芬森为自己的全权特使，到纽约同罗斯福总统商讨两国情报工作的合作计划，从此英美两国的情报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丘吉尔命令史蒂芬森在美国秘密建立了“英国安全协调局”，由他出任局长，代号“勇士”，并将总部设在纽约，负责整个南、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情报活动。

整个二战期间，史蒂芬森领导的英国安全协调局一直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进行全程合作，直到1945年底二战结束后，威廉·史蒂芬森才撤离纽约。当年英国安全协调局曾成功地探明了挪威的“重水”工厂，毁灭了德国人的原子弹美梦，还破获了德国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计划，让许多犹太人获得逃亡的机会。

二战结束后，史蒂芬森重回商界，曾任加拿大政府的工业发展顾问，后来在丘吉尔的多次邀请下重出江湖。虽然为英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史蒂芬森却不拿英国政府一分钱的报酬。他雇用了数百人，大多数开支都是自己掏腰包。

威廉·史蒂芬森一直被认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开山始祖”。他当时的正式身份是“英国护照控制官员”，

私下里却是丘吉尔安排在罗斯福身边的私人代表，他很快赢得了罗斯福的信任。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给史蒂芬森提供了一台发报机，以便他同伦敦进行直接联系。当史蒂芬森需要在美国邮政系统截获某类信件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从邮局给他偷来；联邦调查局还把从德国间谍手中夺来的文件转给英国，而不让军方的情报机关知道，因为当时美国军方的情报机关一直反对同英国人合作。联邦调查局很快就发现，他的英国同行非常善于偷拆别人信件，于是就派特工人员向英国人学习这方面的技术。当时史蒂芬森也把他们搜集到的大部分情报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双方合作一年后，英国人给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多达10万件。

由于战争的需要，罗斯福决定建立美国战略情报局，任命自己的好友威廉·约瑟夫·多诺万担任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和史蒂芬森的关系很好，彼此信任，史蒂芬森认为多诺万正是英国人所需要的那种对情报工作很内行的人，从此就帮助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开展工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组建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战略情报局后来发展成了现在的美国中央情

报局。

史蒂芬森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在加拿大成立了“X训练营”，这是北美地区第一所培训战时秘密情报人员的学校。多诺万选派了一大批青年特工到“X训练营”接受专门的特工训练。英国情报机构因此成了美国情报机构的“老师”。从1941至1945年，约有2000名英、美、加等国的特工在此接受过培训，其中有5名学员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后来中央情报局几乎在全世界搞秘密活动，只有三个国家例外，英国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那些刚刚接触秘密情报行当的美国青年对这一行还显得很陌生，但都充满着热情，一个个都认真好学。英国人在国内外开设了六处大型秘密训练基地，给他们传授基本的谍报经验，包括暗杀、格斗、擒拿、爆破、审讯、伪装、野外生存、侦察与反侦察等等，从而为美国情报机构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从1966年开始出任美国中情局第六任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当年就是“X训练营”的学员。

赫尔姆斯对他最初在训练营里接受的教育一直记忆犹新。在那里，他们被告知，不许用真姓名，要设

法了解同学的真实出身。英国著名突击队的训练官费尔巴恩上校教他们在生死关头如何自救，费尔巴恩甚至还教他们如何对付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他说，第一步是威胁她，要毁她的容；如果这一招不能奏效，就揪住她的下嘴唇，狠狠打她的耳光！

年轻的赫尔姆斯和他的同伴一样，被这种与大学里迥异的讲课方式和内容惊得目瞪口呆。很多技术或者说是手段并不令人愉快，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冷酷无情的，但上校说，用绅士的方法置人死地，这是自卫的态度。后来，当这些美国徒弟告别老师毕业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当初的毛头小子了，在很多方面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X训练营”毕业后，他们都活跃在欧洲、非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敌后战场，为盟军取得二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史蒂芬森后来也一直被认为是“007”的原型之一。詹姆斯·邦德这个形象诞生后，“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对谁是“007”原型的猜测一直不置可否，他唯一一次的表态是在1962年10月。当时他在《泰晤士报》上撰文称：“詹姆斯·邦德是一位真实间谍的传奇版本，那个人也许就是威廉·史蒂芬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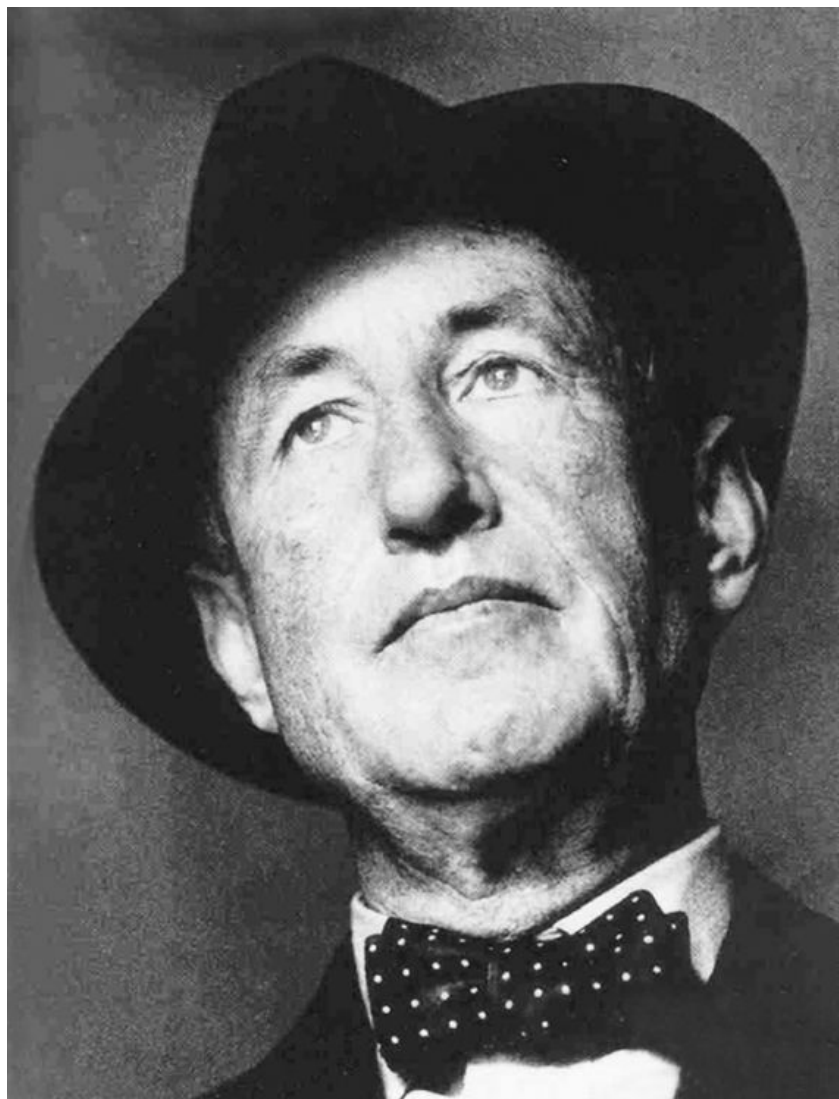
有“007之父”之称的伊恩·弗莱明还说过，是“我创造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这句话看似有点狂妄，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二战期间，弗莱明曾任英国海军情报部长官约翰·戈弗雷的私人助理，戈弗雷以作风强硬著名，后来成了“007”的老板“M”的原型。弗莱明工作的一大内容就是负责英美情报部门联络，当时他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将军的关系非常密切，总是亲切地称他为“疯狂的比尔”。

战略情报局刚刚成立时，多诺万的许多工作计划都是弗莱明帮他策划的。后来在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推出的系列展览《非你勿视》版面中，可以看到弗莱明当年为多诺万撰写的计划文稿有72页之多，其中有一段是描述一个完美特工应具备的条件——“年龄在40岁到50岁，经过特工训练，拥有出色的观察、分析、评价能力，完美判断力，能随时保持头脑清醒，对情报事业的献身精神，广博的生活经历”。这种条件和后来“007”影片中詹姆斯·邦德的形象是一致的。

弗莱明对美国情报机构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当年他甚至参与了史蒂芬森在加拿大创建“X

训练营”的计划，并担任过教学工作。史蒂芬森曾经说弗莱明在训练课堂表现十分出色。他的那些特工训练标准后来也成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训练计划。1947年中央情报局正式成立时，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邦德标准”。所以弗莱明后来才会毫不掩饰他的得意之情，向许多朋友吹嘘说，是“我创造了中央情报局”。



弗莱明

当时多诺万对弗莱明非常感激。为了表示感谢，他把一把38毫米口径的科尔特式左轮手枪赠送给了弗莱明，并在上面刻写“为了您特殊的服务”。中情局成立5年之后，弗莱明开始创作“007”系列小说，其中那

个永远和“詹姆斯·邦德”站在一起的忠诚的中情局特工“费利克斯·莱特”的原型，就是威廉·约瑟夫·多诺万。这也是弗莱明对多诺万的回赠。

几十年来，英美两家情报机构一直精诚合作，创造了许多成功的范例。

“师生”联手半个世纪

二战初期，英美情报界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作为老大哥兼老师的英国情报机构，在很多实战中指导着自己的“小弟”与学生。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驻地甚至是完全在一起。诺曼底登陆时，这对师徒更是联手演出了一连串的好戏，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不过他们在合作过程中也出现过矛盾。英国人就一度担心随着美国人情报能力的增长，最终会压倒英国；而美国人则不甘心一直处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两方经常为活动方式、权限划分等吵起来。多诺万就曾经愤愤不平地说过：“英国人太专横，拿了我们的飞机和钱，还处处卡我们！”

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一位上校则更为不满，他

说：“我们同德国人打仗的时间最长，遭受的苦难最多，我们教会了他们如何在外面生存和活动，可这些可恶的美国佬却跳出来，指手画脚。”

英国国家档案馆2007年9月4日解密了军情五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部分文件。文件显示，二战期间，英国间谍曾一度苦于无法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消息，又担心德国纳粹通过美国情报机关渗透到英国情报机关，于是到1941年美国正式宣战前，军情五处官员曾经争论是否应该加强与美国情报机关的合作。他们担心，随着美国国会通过《租界法案》，美国将把大批军用物资运往英国支持盟军，此时，德国间谍或许会混入美国外交官、军队人员、记者和商人中来到英国。

当时，军情五处一位名叫拉姆斯博顿的官员写道：“共有三万美国人要来英国，有上百人已经来到了英国。此时此刻，我们无法控制这些人。缺乏控制意味着对安全的巨大威胁。我们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应该派专门代表和英国安全部门合作。”这名官员甚至还认为，“美国人做事太不慎重，常常无法抵抗记者的狂轰滥炸。”

1942年，军情五处情报官员访问美国时，加拿大一名官员就对军情五处高级官员盖伊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觉得你太精明，不信任他们。你让他们做调查，却不向他们提供有关案件的全部信息。”而英国方面也十分不信任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没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情报。但是在经过这种短暂的磨合之后，两国情报关系逐渐得到改善，两国情报机构同意“互通有无”，并提出“没有事先协商就不采取行动”。

不过，新解密的军情五处文件显示，对于给美国提供所有情报信息，英国方面似乎多半是出于无奈。美联社认为，其实英美两国情报部门的这种合作关系并非一帆风顺。一份1943年的报告解释了军情五处和联邦调查局的微妙关系。报告认为，问题出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美国情报部门内部“一些令人遗憾的人”和“喜怒无常的特质”。

两国情报部门间的沟通并非十分通畅。1943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寄给军情五处负责人戴维·彼得里一封信。这封信显然没有考虑到英国国家机密的问题，因为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英国伦敦，英国安全局彼得里收”。而英国政府部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

承认英国安全局这一机构的存在。

这封信在伦敦辗转流离许多地方，才最终到达彼得里手中。戴维·彼得里收到这封信时，发现上面还贴着一张小纸条，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这封信已经被送到过伦敦许多地方，后来看到这封信从美国联邦调查局寄出，且收信地址奇特，有人把它送到了‘军情五处’”。

“珍珠港事件”之后，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多诺万加大了情报协调局的活动范围和力度。他甚至从老朋友史蒂芬森手中接过英国间谍原来干的工作，定期到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秘密搜查，偷拍亲轴心国的佛朗哥政府的密码本和重要文件，以协助英国攻克德国“哑谜”密码机。但是这一秘密举动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大为光火，因为这该是他管的事。胡佛一气之下，在情报协调局的密探再潜入使馆时，出动车辆，打开明亮的信号灯，并且高放警报信号，最后把惊慌失措的密探给逮回去了。多诺万气得和胡佛一直吵到罗斯福面前。为改善当时的混乱局面，罗斯福差点儿解散了情报协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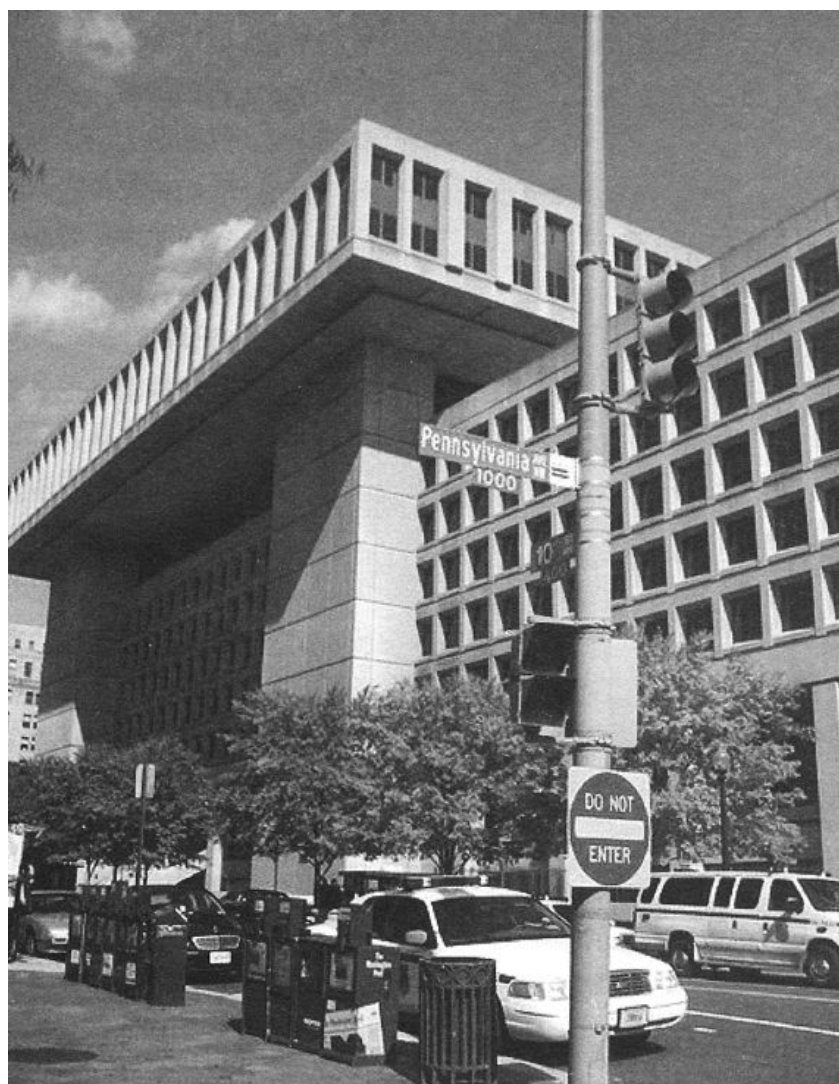
冷战后，英美两国情报机构的合作才趋于正常，

因为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苏联。他们要合作共同对抗苏联的威胁，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同时在对付那些发展中的国家时，也同样要保持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

1951年，伊朗执行石油国有化，将英伊石油公司收归国家。英国强烈反对伊朗的行动，美国积极支持英国，最后两家情报机构合谋，在伊朗进行了一系列的颠覆活动。当种种手段没有压服伊朗摩萨台政府时，英美两国就在伊朗阴谋策划军事政变，由英国情报机构提出推翻摩萨台政权的计划，美国中央情报局主谋实施。双方还达成一致意见，选定与美英两国紧密勾结的扎希迪将军作为代理人。1953年8月19日，摩萨台在政变中被推翻，扎希迪上台就任首相，随之伊朗的石油资源被交给由美英法荷等国石油公司组成的一个国际石油财团支配。

1956年爆发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国勾结以色列唱“红脸”，指使以色列发动侵埃战争，然后英法借机出兵干涉，妄图重新控制苏伊士运河，搞垮纳赛尔。唱“白脸”的是美国，而并不是像一些学者认为，苏伊士运河事件时的英美矛盾是英美战后最激烈的一

次冲突。英美两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合作关系，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分歧只是短暂的一支插曲而已。



以埃德加·胡佛名字命名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总部大厦
英美情报机构的合作虽然给双方都带来过许多好处，但是也给英国情报机构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尤其

是那场由美国人发起的伊拉克战争，几乎把英国政府和英国情报机构拖入了泥潭。

伊拉克战争和虐囚丑闻

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爆发后，英美两国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特别是石油利益，都在海湾地区维持着军事存在。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打响后，在欧洲众多的国家中，英国最为积极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并且派兵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多国部队。伊拉克战败后，在处理伊拉克问题上，英国亦积极与美国配合。

在伊拉克问题上，英国一直是美国的积极支持者。自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于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一直是美国的铁杆盟友。据有关数据表明，在整个伊拉克战争期间，战时驻伊英军数量仅次于美军，人数最多时达4.6万人。

在战争后期，为了更有力地打击萨达姆政权，英美情报机构共同联手，一直忙于调查萨达姆的新夫人和他的家人的下落。当时，英美情报机构获得了一份

不同寻常的秘密报告，就是关于“阿克萨的呼声”军事演习的报告，另外还有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的数十张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出，在长达5小时的军事演习中，萨达姆单手挥舞着沉重的步枪朝天鸣放了142枪，来向他的军队致意。美英情报专家长时间研究了萨达姆的照片，觉得他显得很有生气，健康，满面笑容，就像年轻人一样。要知道当时他已经是63岁了。

当时，那些情报专家还喜欢用“新郎”这个词来形容萨达姆，因为他们得到的一份报告说，大约就在一个月以前，63岁的伊拉克总统竟然同一位27岁的伊拉克姑娘结婚了。

原来在此之前，萨达姆视察了伊拉克国家一些重要机构。在萨达姆视察巴格达战略研究中心时，同那里的高级职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就是在那次视察中，萨达姆一眼看中了一位靓丽的姑娘，她不但年轻漂亮，而且活泼健谈、知识渊博，分析问题也很深刻。讨论会结束后，萨达姆便让他的秘书阿卜杜勒·哈穆德传达他的命令，把这位姑娘调到总统府研究中心，以便更好地向这位在美英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姑娘“请教”。

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伊拉克打破空中封锁出现进展，巴勒斯坦人举行“阿克萨起义”，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伊拉克政权每天都面对新情况、新变化。萨达姆每天都要会见那位负责情报分析的姑娘，观察事态发展，跟踪新闻报道及其他情报来源。经过八个多月的业务交往后，伊拉克总统同这位姑娘结婚了，并且按照当地的风俗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和婚礼。据可靠消息证实，萨达姆的新妻子已被接进总统府邸。在此前，萨达姆已经要求他的二房妻子，即阿里的母亲在此期间回到老家奥加去住，那里为她建了一所新的宫殿。

父亲再一次“新婚”数日后，萨达姆的儿子乌代认为这是劝说父亲同意母亲和妹妹搬回巴格达的好机会，于是便邀请库赛和他一起去见父亲，并当面提出这个问题。结果库赛却拒绝陪乌代一起去见父亲讨论这个问题，乌代只好独自去见萨达姆，向他致以新婚的祝贺，并希望父亲在适当的时候允许母亲和妹妹返回巴格达。

萨达姆听了乌代的谈话后，只是随便地问了一句话：“还有别的事吗？”便朝另一间房间走去，把乌代

一个人留在了办公室。第二天，萨达姆召见了另一个儿子库赛，以家庭协商的方式提出了那个问题。库赛很得体地回答说：“我认为你是我的统帅，我服从并执行你的任何命令和意见，决不讨价还价。你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做好了，我们执行。”

于是萨达姆就允许第一夫人与女儿返回巴格达，以此作为他新婚的礼物。

美英情报人员当时认为，如果找到了萨达姆那位新婚妻子，就能找到萨达姆的下落。可是直到美军于2003年4月9日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也没有找到萨达姆的影子，当时包括萨达姆父子在内的伊拉克前高级官员，好像突然集体人间“蒸发”了一样。4月11日，美军发布“扑克牌通缉令”，通缉55名伊拉克前政府高官；同时，驻伊美军还悬赏2500万美元抓捕萨达姆。直到2003年12月14日，萨达姆才在他的家乡提克里特被捕。



美军占领伊拉克

伊拉克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萨达姆政权虽然彻底被颠覆了，但美英联军还一直驻扎在伊拉克，结果是劳民伤财。直到2008年，英国政府和伊拉克签署了一纸协议，同意驻守在伊拉克的4100名英军士兵结束他们的使命，撤回本土。从2009年3月31日起，英国正式从伊拉克撤军，从而逐步结束在伊进行了六年的军事行动。

英国军队虽然退出了伊拉克战争，但一次又一次的“虐囚”丑闻又将英国情报机关卷入是非的漩涡之

中，尤其是英国军情六处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中心。尽管英国官方一再否认英国情报机构与虐囚有关，但是时任英国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还是下令要求彻查此事。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当时有一名叫宾亚姆·穆罕默德的男子称，美国中央情报局视他为恐怖嫌疑人。2002年到2009年，他先后在巴基斯坦、摩洛哥、阿富汗和古巴关塔那摩监狱关押。为了能从他口中得到有关恐怖分子图谋不利于英国的情报，一名军情五处官员曾审讯他。之后，中情局人员接手审讯，多次动用酷刑。

英国媒体在2009年8月1日披露的证据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曾通过“幽灵航班”在海外虐囚，作为美国情报机构的盟友，英国军情五处的情报人员不仅对此心知肚明，甚至还一直暗中协助中情局进行虐囚。

英国高等法院7月31日收到一份档案文件，这份文件详细记载了前恐怖嫌犯宾亚姆·穆罕默德的最新供述。穆罕默德称，2002年至2003年，他一直在摩洛哥和阿富汗两国活动，后来被美国中情局的特工秘密逮捕。关押期间，穆罕默德受到了看守人员的残酷虐

待，但他发现虐待他的不仅仅是美国的看守和特工，还有英国军情五处的官员。

两位高级法官说，他们无法披露穆罕默德接受酷刑的数据，因为政府高官曾警告法庭，称美国方面曾威胁说，如果英国将这些数据公开出来，美国就要停止与英国分享有关恐怖主义的情报。两位法官在判决中说，该证据以及军情五处所知的证据，都必须继续保密，因为根据英国外交大臣的说法，美国人的威胁意味着“英国公众被置于险境”。

2008年，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宾亚姆·穆罕默德通过律师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诉讼，控告英国情报人员参与策划了对其进行的虐待。在英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书草案中曾有七段文字描述了穆罕默德遭受虐待的细节，这些细节也曾被记录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42份文件中。

伦敦听证会上曝光的信息表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也向米利班德发出了停止情报共享的“威胁”，其中包括国务卿希拉里本人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

宾亚姆指控军情五处后，英国政府担心本国情报

部门所获部分情报靠中情局用非法审讯手段得来而引发更多指控。在军情六处调查所有涉及中情局为英国提供情报的事件后，斯卡利特决定写信向总检察长斯科特兰报告可疑事件，由此引出这起调查。

此后又有3名嫌犯向媒体讲述了他们不幸的遭遇，更让英国军情六处难逃虐囚的罪名。

其实，关于英美情报机构虐囚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早在2006年1月4日，英国《卫报》就报道了英国军情六处涉嫌在希腊参与审讯28名巴基斯坦裔恐怖嫌犯一事。1月3日，这28名嫌犯中的3人首度向媒体公开披露了他们在被捕期间遭受审讯人员毒打和精神摧残的事实。尽管英国政府此前一直否认英国情报官员曾参与了对这些人的审讯，但还是有一名嫌犯言之凿凿地说，一个操着英国口音的人当时就在审讯现场。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2005年7月7日，伦敦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连环爆炸案，英国情报机构在对此案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追踪到一个可疑的电话号码。经核实，英国情报机构确认这个电话号码是希腊境内的一个手机号。随后，英国方面与希腊政府取得联系，要求后者对这一电话号码及其所有者展开调查。希腊

警方和反恐官员随即在希腊首都雅典附近地区逮捕了28名可能与此案有牵连的巴基斯坦裔人士。

35岁的穆罕默德·穆尼尔就是这28名被捕嫌犯中的一个，也是首度向公众披露自己不幸遭遇的3名嫌犯中的一人。《卫报》当天援引穆尼尔的话说，一天晚上，大约10名希腊特工突然闯入他的家中，然后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这些不速之客接着就对他大打出手。穆尼尔说：“他们把我的手绑起来，让我面对墙壁站着，然后就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被打倒，头磕到桌子上，嘴唇被划破了，鲜血流了出来。”

穆尼尔的上述遭遇日前得到他的邻居、同是被捕嫌犯的阿兹哈尔·迈赫默德的证实。迈赫默德告诉记者，他看到穆尼尔那天戴着手铐被希腊特工带走，当时他的嘴唇上还淌着血。

穆尼尔说，他前后被关押了6天时间。在受审的过程中，审讯人员要他交出自己的手机。当穆尼尔说他没有手机时，审讯者顿时暴跳如雷地指责他在撒谎。穆尼尔说，他在受审期间又遭到另外两顿毒打，但他一直否认自己知道有关伦敦爆炸案的事情以及对这一恐怖袭击事件的制造者给予过任何帮助。6天后，穆尼

尔被释放。有人警告他说，不要把被关押期间发生的事情说出去。穆尼尔说：“他们威胁说，如果我说出去的话，他们会撕裂我的喉咙。我当时非常恐惧，我甚至都不敢对我的父亲讲出实情。”

2009年3月9日，英国广播公司又一次报道了宾亚姆·穆罕默德遭到虐待和拷打之事。

现年30岁的宾亚姆·穆罕默德出生在埃塞俄比亚。曾和阿富汗塔利班并肩作战，2002年在巴基斯坦被捕。美国当局怀疑他可能成为一名炸弹攻击者。于是穆罕默德被关押了近7年，其中4年是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他告诉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说，2002年11月他在摩洛哥遭受酷刑折磨，军情五处的情报人员逼迫他承认参与过恐怖活动。

穆罕默德还对《星期日电讯报》记者说，他还在阿富汗喀布尔的一座监狱中被连续关押在黑暗中长达数周之久。牢房中的高音喇叭每天24小时以震耳欲聋的音量不停播放。他曾连续8天被吊在铁链上，既不能站又不能坐。他无法睡觉，根本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晚。

英国政府正在对宾亚姆·穆罕默德所说的情况展开

调查。2008年美国撤销了对他的所有指控，他于2009年2月获释。

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说：“我们憎恶刑讯，决不会下达有关刑讯的指令，也不会宽容这种做法。”该发言人还说，穆罕默德对军情五处的指控已被递交给总检察长，目前正等待总检察长的反应。

2009年9月11日，来自英国伦敦警察局的报道也证实了此事。报道说英国警方根据总检察长要求，将正式对军情六处涉嫌参与“虐囚”事件展开调查。一名伦敦警察局发言人说：“我们证实，军情六处向英格兰与威尔士总检察长帕特里夏·斯科特兰报告一起事件后，斯科特兰要求警方调查此事。”

英国人权组织“自由”的负责人沙米·查克拉巴蒂表示欢迎警方就虐囚问题展开调查，同时呼吁对所有针对英国执法机构的虐囚指控展开独立司法调查。

另外在2009年7月，英国议会还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可能在巴基斯坦、古巴关塔那摩、乌兹别克斯坦和埃及参与虐囚。威廉·黑格因此致信首相戈登·布朗和米利班德质询此事。

时任军情六处首脑约翰·斯卡利特在2009年8月也

破天荒接受采访。这名即将卸任的军情六处掌门人否认下属对恐怖嫌疑人实施酷刑，也不承认他们参与其他国家相关机构的虐囚活动。

但是反对党自由民主党议员爱德华·戴维却敦促政府披露更多调查细节。他说“需要了解何种因素促使军情六处突然‘良心发现’，从否认与虐囚有关转为主动报告涉嫌虐囚事件”。

同时，英国外交部也就军情六处受调查一事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严刑审讯行为，希望警方展开全面调查。鉴于数名曾受拘押者指控英国情报部门协助他国机构对他们施虐，米利班德说：“英国政府坚决谴责虐囚行为，绝不容忍这种事。我们也未曾请他国代表我们做这种事。”

2009年是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成立100周年的日子，没有想到却受到了虐囚丑闻困扰，这给英国情报机关即将到来的喜庆气氛蒙上了阴影。

军情六处与塔利班不干不净

除了虐囚问题受到困扰之外，媒体又曝出英国情报机构，特别是军情六处和“基地”组织以及本·拉登还

有着不干不净的关系。

早在2007年12月26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披露说，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特工曾与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举行过数次会谈。这家报纸援引一名情报人员的话说：“据我们了解，军情六处的特工遇到塔利班武装人员时，已经直接寻求和塔利班举行和平谈判。英国政府还为塔利班提供‘指导’。”

当年这些会谈是在阿富汗南部的村庄进行的，前后总共有五六次。会谈场所外面有英军部队提供安全保卫，并有阿富汗官员到场。

英国媒体以前也曾传出过英国特工与塔利班密谈的消息，但是《每日电讯报》却予以否认。该报说，英国政府似乎本已准备承认密谈，但是“首相布朗还是忍住了”。

2007年12月12日，布朗在国会下院接受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提问时否认了媒体传闻。布朗在下院强调，他的目标在于“通过消灭塔利班领导层，消除混乱”。“我明确说明，我们不会与这些人举行任何谈判”。

英国政府曾经表示，英国支持阿富汗政府与塔利

班及支持它的部族武装谈判。一些英国高级官员说，只有阿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尝试与塔利班成员谈判，以换取对方向政府投诚。

12月25日，阿富汗宣布两名外国人为“不受欢迎的人”，但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这两人对国家安全“有害”，并没有公布两人姓名、身份和国籍。实际上，这两人一个来自英国，另一个来自爱尔兰。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阿富汗官员在10月26日说，这两个人非法会见塔利班成员，还提供资金，但不清楚他们是否支持叛乱活动。他还说，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以个人身份还是代表官方前来参加会谈的，但是这两个人的近五十名阿富汗籍同事已经受拘留调查。

就在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刚刚否认寻求与塔利班谈判，宣称英国不会与塔利班会面之后，“基地”组织二号人物扎瓦赫里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又于8月4日在半岛电视台播放的一盘录像带中露脸了。

这位本·拉登的左膀右臂对英国和美国发出了恐怖威胁。对英国，他扬言要给英国人带来更大的破坏；对美国，他威胁要“取成千上万名美国人的性命”。扎瓦赫里的“露脸”让英美等国的情报机构惊恐不已，据

称扎瓦赫里“露脸”或“出声”之后，接下来就会发生恐怖袭击。

炭疽炸弹和英国王子

2010年3月4日，英国《星期日人物报》惊爆秘闻：“基地”恐怖组织正在密谋，准备利用炭疽炸弹，在伦敦“7·7”爆炸案周年纪念日当天，将英国女王的三个儿子查尔斯王子、安德鲁王子和爱德华王子，还有查尔斯夫人卡米拉统统炸死。内幕人士称，恐怖分子的意图是要在“7·7”这个特殊的日子，对英国造成最大的伤害和冲击。

据说，这一秘闻是由警方高层内幕人士披露的。袭击计划由“基地”组织一名“大人物”在数月前制定，他们的计划是，由恐怖分子伪装成王室仆人，悄悄混入三名王子的住处，并在书房和餐厅等王子必经之处，安放混有炭疽病毒的炸弹。

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军情五处立即闻风而动，调兵遣将，除了对皇宫加强安保措施外，还对各车站码头和地铁进行明察暗访，对通往王室的通道路口实行二十四小时严密监控。

因此，当“基地”派出的杀手到达英国时，立即被逮捕。据透露，这名“王子杀手”是在英国出生的中东裔男子，他随身携带一只手提箱，里面装满了制造炸药和炭疽炸弹的各种设备。

随即，警方对该男子位于英国北部的家进行了搜查。在其个人电脑中，特工找到了三名王子的私人住址，以及他们住宅的详细地形图，其中包括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目前居住的豪宅海格罗夫庄园。随后，警方查收了该男子的电脑设备，并根据线索追捕其他和“暗杀王子计划”有牵连的恐怖嫌疑人。

警方相信，该男子可能跟“基地”组织一个核心恐怖网络有密切联系。内幕人士称：“我们认为，这是迄今英国反恐战斗中最重要逮捕行动之一，一起威胁王室成员生命的阴谋被成功挫败。恐怖分子试图让英国屈膝，但他们不会得逞的，我们将和恐怖主义斗争到底。”

伦敦警方目前仍在努力寻找策划暗杀王子行动的“基地”领导人，以及向杀手提供资金、食宿和炸弹制作技巧的恐怖网络。

2010年8月1日，伦敦警方对两名男子进行讯问。

这二人被怀疑与英国军情六处总部及伦敦一处邮局发现的包裹炸弹有关。在此前的7月8日，英国军情六处位于伦敦的总部曾收到了一枚包裹炸弹。第二天，警方又在伦敦一家邮局信件分拣室发现另一枚炸弹。

伦敦警方发言人对外宣称，这两名嫌疑人在北威尔土地域被抓获，后转移至伦敦，警方已经对他们进行了公开讯问。不过警方发言人没有透露这两名嫌疑人身份。

由于英美两国情报机构多年来一直是步调一致，共同行动，从而也让自己树敌太多，招致这样的报复并不奇怪。

第二十章 英美同谋，共同窃听世界风声

“英美协定”共同打造覆盖全球的曼威斯山窃听网，世界上至少有三个站点在窃取进出中国的国际通信卫星信息；军情五处将中国列为“英国头号情报威胁”国，香港成了“间谍之都”；英美联手打造“Q博士”，前中情局长出任英国奎奈蒂斯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顾问名单上还有英国前首相梅杰和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等人。

“英美协定”共同打造曼威斯山窃听网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英美在情报方面的合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实现在全世界范

围内进行窃听和监控，资源共享成了他们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

二战结束不久，英美两国情报机构签订条约，共同联手建立一个庞大的全球监听网，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并不排除对战时盟国和自己的国民进行监控。

1940年7月8日，正当希特勒占领整个欧洲大陆时，丘吉尔就派出英国大使鲁西安爵士来到白宫，向美国提出合作，决定用英国当时最先进的雷达系统和无线电监听技术，同美国人交换英国急需的情报。因为当时美国在这方面还远远落后于英国。

两天后，鲁西安爵士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再次正式提出：如果您能批准此项交换，我方建议，为避免使情报落入我们的敌人手中，请贵国立即向我国派遣三名军官和科学家。如果美国政府在得到英国设备和仪器的所有细节后，能够与我们的技术专家分享他们急需的秘密情报，我国政府将不胜感激。

双方同意了这项交易，并开始了有限的合作。1943年5月17日，两国正式签署了一份关于通讯情报合作的“英美协定”。从一开始，协定就允许两国可以

交换技术专家以及两国监听到的所有敏感信息，还统一规定了搜集和发布情报的方式，参与情报搜集工作的所有人员都必须遵守严格的安全规定。由于英国能够调动一些英联邦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这一合作又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1944年3月13日，这些国家解码机构的代表和英美两国代表一起，在弗吉尼亚的阿灵顿举行了一次绝密会议，确定了今后合作的构想。

在“英美协定”中，美国被称为第一方，而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被称为第二方。两国的情报人员根据各国的地理位置以及监听能力，划分了彼此的势力范围。美国政府当时主要是提供硬件。因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消耗之后，在那段艰苦时期，英国自然没有能力顾及这方面。当时监听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澳大利亚负责中国南部和印度——中国地区，而且在“越战”时期，它的监控范围进一步扩大。新西兰负责西太平洋，加拿大负责苏联的北极地区，而英国则主要负责苏联的乌拉尔山以西地区以及非洲和欧洲。而美国的监控能力——即使是在早期，也可以覆盖中国北部、

亚洲、苏联的亚洲部分和拉丁美洲。

后来，美国相继在西德、日本和韩国建立了军事基地，而监控活动也随之扩大到了这些地区。另外，它还利用潜艇在海底建立起了监控网，对海底电缆进行窃听，并利用U-2等飞机进行空中监听。1962年，卫星发射上天后，开始向曼威斯山传送信号。因为当时全世界的监控中心就建在离伦敦约150英里处的曼威斯山上。

从此，战时英美条约所确立的绝密原则和后来“英美协定”的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而且约束了参与此项活动的所有人员，任何人和政府都不得承认该条约的存在。一直到1999年3月，在澳大利亚政府写给澳洲电视台记者鲍勃·考尔萨德的一封信中，才第一次承认了在“英美协定”条约规定的框架下，该国的通讯情报部门在与别国的情报部门合作。由此可见“英美协定”条约在当时的保密程度。

而在其他地方，对于与英美有关的一切信息都受到了严格控制。这也包括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网站上的内容。这个网站的创办者，是一个名为“第13美国野外情报站”的组织。该组织成员是一些曾在美国安全局

工作过的老兵，1958年至1966年间在曼威斯山服役过。尽管美国军方已在1966年将曼威斯山的控制权从国家安全局手里转交给了非军方人士，但早期发生在那里的事仍被视为高度机密。

当年那些工作人员到达曼威斯山时，它还只是一片泥泞中荒凉的建筑基地，后来那里的一切都是他们亲手建起来的。

这个建立在英国国土上、但却由美国国家安全局控制的曼威斯山的防范措施一直在不断加强。基地占地面积现在已经扩大到560英亩，其中包括两个占地5英亩的工作大楼，另外还有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高耸入云的天线和卫星接受器。

开始时，这里的主要工作是监听通过英国的国际电话和短波通讯，但这些工作完全靠人工进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曼威斯山安装了自己的第一台大型IBM计算机，它可以自动窃取未被译成密码的电报信息。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英国国家安全局很快就开始搜集美国三大电报公司的所有电报和电传。

除此之外，它还可以读取出入英国商业电报系统的所有信息。收到这些信息后，国家安全局的计算机

就会对其进行分析。这样，国家安全局就可以在整个英国的电报、电传系统中，查找是否有人提到了简·方达或卡扎菲将军。在当时，这样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从1962年起，美国发射了更多的与情报工作有关的卫星，而曼威斯山也成了最主要的监听站。美国发射低空卫星的主要目的，就是截取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防空力量、核武器试验以及预警雷达系统发出的信号。1965年4月6日，当第一颗国际电讯卫星被发射上天，建立美国和欧洲之间第一个卫星电视和电话传输系统时，英美条约成员国的监听者们又获得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进出英国的国际电话都是通过设在赫里福德郡和康沃尔郡的两个工作站，经由卫星传输出去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向英国政府通讯指挥部施加压力，要在离康沃尔工作站不到50英里的地方设置两个卫星信号接收器，他们坚持说，安装这样的接收器对英美条约的组织结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美国国家安全局要求其他英美条约成员国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必须经受更严格的

安全检查。还发布了一个被称为“效忠誓言”的文件——所有英国的工作人员都必须签名表示服从。誓言是这样的：“我完全理解，英国政府与其他合作政府所截取的关于外国势力的信息以及根据这些信息产生的情报，都在《官方机密法令1911》第二部分规定的范围内。”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将曼威斯山卫星截取的有关苏联的情报出售给其他国家的两个间谍却是美国人。他们是为曼威斯山生产设备的一个美国公司的职员。

除商业卫星监测外，美国在1970年开始了间谍卫星搜集情报的工作。在以后的7年间，美国相继发射了5颗卫星，截取苏联和中国的导弹信息。它们还可以截取通过甚高频、超高频和微波频传送的信号。到1974年，它们已可以很容易地监听从欧洲发往远东的微波无线电信号和长途电话。有人说，它们可以捕捉在莫斯科的苏联将军和他与雅尔塔的情妇之间的对话。1977年7月12日，《新闻周刊》报道说，他们得到了关于苏联人进行军事演习的移动电话通信，而且还听到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通过汽车电话告诉他的国防部长，在与美国人开始新一轮武器限制谈判前，要将

新武器装进旧盒子里。

1985年，美国国家安全局进一步扩大了曼威斯山的任务范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政府提供了一部分资金，英国电讯和英国国防部也贡献了一部分情报。曼威斯山的监听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传递各国、各大洲之间电话和传真信息的国际通信卫星的增加，也要求监听站进行相应的发展和升级。国际通信卫星主要传递民间通信，但同时也传递各国外交和政府通信，这当然会使英美条约成员国很感兴趣。

在英格兰的康沃尔，有两根天线是专门用来接收印度洋和大西洋上空的国际通信卫星发回的信号的。另一个卫星信号监听站设在美国华盛顿州的亚基马，用来接收太平洋上空国际通信卫星传递的信号。在加勒比海、加拿大、澳大利亚西部、新西兰和美洲，还设有其他一些截取卫星通信的监听站。到20世纪末，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具有了监听世界大部分重要移动通信的能力。英美条约的其他四个成员国也可以分享这些成果——否则，他们可能早已退出了。

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通讯指挥部组成的专家

组夜以继日地工作，试图解决如何分析所获信息的问题。这就是今天的“艾克龙”——一个关键字搜索系统。它的工作原理同互联网搜索引擎相同，可以查找出既定的人名、地名，而且大大扩展了现有监控技术的领域。

“艾克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英国通讯指挥部、加拿大通讯安全局、澳大利亚防御信号理事会和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之间的合作产物，它彻底改变了分析、评估截取资料的方式。

随着战后英美条约成员国之间监听合作关系的建立，该系统被用于非军事目的已是不可避免。在这些国家中，共建有7个“艾克龙”工作站，可以对通信卫星、地面通信以及无线通信进行监控。被截取的信息大量涌入这些工作站，并根据各自的“字典”对上百万的通信信息进行分析。

“艾克龙”可以发现电传、传真、电子邮件和互联网文件——几乎所有现代通信手段的任何匹配。对电话交谈的监控也有多种形式，例如，多年前加拿大当局就安装了一个语音识别系统，专门监听外交电话。语音识别现在仍是各国花大力气研究的领域，而且很

快就将成为情报工作中又一个被普遍使用的工具。

“艾克龙”所提供的是存储了已知人物声音的数据库，里面的信息可能与间谍或有组织犯罪毫无关系。情报站可以将截取的声音与数据库中的声音进行对比，以发现是否有匹配现象。

“艾克龙”系统几乎可以让英美情报部门窃听全世界的风声。根据“英美协定”建立的这个覆盖全球的电子监测网，世界上至少有三个站点被用来窃取进出中国的国际通信卫星信息。它们分别位于澳大利亚西部的杰拉尔德顿镇附近、新西兰南岛的怀霍派镇附近、美国华盛顿州中部的陆军雅基马射击场内。

香港几乎成了“间谍之都”

近年来，英国政坛内部关于中国的发展对未来的影响产生争议，“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等论调有抬头之势。

由于英国国会控制着政府情报机构的预算，因而对情报机构的工作方向存在着很大的影响力。英国国会建议政府加大对中国在非洲和中亚地区活动的监控，不排除军情六处大量招募懂汉语的谍报人员中的

部分人员前往这两个地区。于是，作为全球最负盛名的自由港之一，繁华的香港成了情报机构在远东地区角力的战场，成为它们搜集我国情报的便利场所。有人说，香港几乎成了“间谍之都”。

首先，香港对外来事物接纳程度很高，这为各种势力在港开展情报活动提供了便利的社会空间，西方一些国家趁机在此安插谍报力量或者扶植代理人，使香港成为“东方谍都”，与欧洲的里斯本、非洲的卡萨布兰卡齐名。另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与香港有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协议，使得各类人员到港极为便利。

其次，香港地理位置特殊。通过陆路的罗湖口岸、皇岗口岸以及水路的深圳蛇口等口岸，使每日往来于香港和内地的各种人员数以十万计，这其中不乏情报人员。香港回归前，许多外国情报机构为向内地渗透，与香港走私集团合作，偷渡情报人员入境或接送情报人员离开内地。

第三，发达的商业环境为众多的情报机构开展秘密行动提供了商业外衣。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工商和科技局最新的统计数字，海外公司驻香港地区总部数量

高达1200多家，地区办事处超过2800家。其中，以内地业务为主的占80%以上。许多海外情报机构还在香港本地注册公司开展活动。

由于条件便利，香港常被当做搜集信息和情报的平台甚至桥头堡。其中，以英美两国活动最多、范围最广。据悉，各方活动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渠道。

1. 领馆及代表机构。这是各方进行公开情报搜集工作的主要途径之一。目前，驻港外国代表机构有56个总领事馆，55个名誉领事馆及5个官方认可代表机构。这些机构都有搜集香港以及中国内地情报的任务。其中，英美总领事馆规模最大，实力最强。

2. 研究机构。许多海外情报机构打着学术招牌在香港搜集情报。香港某研究中心曾是美国中情局负责搜集我国各类政治、经济情报的中心。该机构利用微缩影印、计算机下载等方式，搜集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主要省市每日的主要新闻报章以及我国2000多个县的县志。如果需要查阅我国为庆祝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而发行的号外，几秒钟之内，该研究中心便能将资料调出。国外汉学界以前曾流传一个说法：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如果没在该研究中心待过，其

研究成果的权威性和可信性都将受到质疑。在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下，美国才放弃了对该研究中心的操控。

3. 公司商号。英国政府在统治香港期间曾在香港警察内部设立了警务处“政治部”。这个鲜为人知的情报机构成立于1950年，隶属于英国军情五处，主要工作是搜集社会主义国家情报。

2005年6月15日，香港《东方日报》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打算作为新行政长官官邸及办公室的礼宾府，日前在翻修整建时发现，里面遍布窃听器，包括客厅、卧室以至浴室都“不干净”。不少人在猜测谁是幕后黑手的同时感慨：间谍在香港仍十分活跃。

礼宾府在英国统治时期是总督府，位于中环半山，1851年开始兴建，1855年竣工。28位英国港督中，有25位曾把它作为官邸和办公室。

此次礼宾府被装了窃听器的消息曝光后，特区政府发言人拒绝直接评论，只是强调礼宾府约8年没有行政长官入住及办公，近日港府正进行翻新和维修，在保安、通讯、电力及通风设备等方面加以更新。

据香港媒体报道，1997年香港回归后，保安局曾

彻底检查及清除礼宾府的所有窃听器，这次发现的窃听器材，应是1997年后安装的。有分析人士称，回归后礼宾府进行过的每一次装修，都可能成为情报人员放置窃听器的机会。

香港知名私人侦探张大伟（前香港警察）透露，这些窃听器是传统的有源窃听器，普遍加装在礼宾府的内墙中，既易于掩饰，又可方便取得电源，供窃听器长期使用。根据他的估算，这些窃听器的接收范围应在300米以上。

共同打造“Q博士”

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在另一个领域的合作，就是共同打造“Q博士”。

在“007”系列影片中有一个“Q博士”群，他们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军情六处那些专门为特工研制各种奇思妙想的装备的技术人员。在“007”系列电影中，邦德在白发苍苍、言谈诙谐的“Q博士”的实验室内，永远能够找到他所需要的间谍武器。在《末日危机》中，“007”戴着一副具有夜视和透视功能的眼镜，能先敌一步发现敌人，从而占尽先机；在《择日而亡》

中，“007”凭借一款能遥控汽车的手机，每每在危险时刻得以化险为夷。所以在军事专家的眼里，“007”如果离开“Q博士”为他提供的充满奇思妙想的先进装备，他的本领可能会大打折扣了。

据英国媒体报道，“007”系列影片中“Q博士”的原型，就是英国奎奈蒂斯公司下辖的国防科技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奎奈蒂斯公司是世界最大国防研究机构之一，研发领域涉及航天、国防、电子和信息技术等。

奎奈蒂斯公司的国防科技实验室拥有3000余名科学家，他们堪称现实生活中的“Q博士”。他们精心打造的间谍设备，有的集成了多种世界领先科技，有的把脑筋打在了动物身上，还有的看似平平常常其实暗藏机关。

世界首架太阳能无人驾驶间谍飞机就是奎奈蒂斯公司设计的，预计两年内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据称，这架可从1.8万米高空拍摄照片的飞机，能在空中停留3个月，向地面传输的照片可分辨约一个巴掌大小的目标。

奎奈蒂斯公司的“Q博士”们还研究了“遥控间谍鼠”，通过将采用纳米科技制造的电极植入老鼠的大脑

中，控制它们的行动。这些“间谍鼠”如果装备上小型摄像机和化学探测器，可以在守卫严密的危险地方成为间谍们的尖兵。

“Q博士”们尤其喜欢把间谍工具做成人们司空见惯的物品，像藏有无线电发射器、麦克风和电池的间谍鞋跟，隐藏在纽扣中的指南针和貌似骆驼粪便的伪装诡雷，形似移动电话、钢笔、烟盒、戒指、螺丝刀、腰带扣、首饰坠链、手电筒的微型间谍武器，可谓应有尽有。

为了研制出更神奇的武器装备，英国政府曾以6位数的高薪招募“Q博士”。曾有一则招聘广告明码标出，申请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负责人这一职位者，必须具有资深理科或工科背景，以及高级管理层经验。一经入选，这位“Q博士”就将成为指挥3000余名科学家的国防科技实验室最高决策者，享受政府提供的6位数薪水。

电影里，邦德经常使用手表式手榴弹或者隐形跑车之类的新奇设备，而现实生活中的“Q博士”，则带领手下研发出了外表酷似岩石的通讯工具、可抵御火箭筒攻击的轻型电子装甲等。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公园内曾发现一个代号为“死亡信箱”的岩石状通讯工具。使用它的特工可以用一个外形类似手机的无线电信号收发器，与之交换信息。据称该通讯工具正是由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研制的，被俄罗斯情报部门称为“一个科技奇迹”。

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的克格勃博物馆里，收藏着许多苏俄情报部门在与西方的间谍战中获得的战利品，其中有一位俄罗斯“内鬼”向英国情报机构发送情报的CD机，外表乍看起来像一块砖块；有1960年克格勃从击落的美国间谍飞机驾驶员加里·鲍尔斯身上搜出来的钢笔枪、毒针；有安放在靠近苏联空军基地树上的伪装成树枝的间谍装置；有安放在苏联位于莫扎斯克的火箭测试场附近、企图截取信号和数据并发送到美国的卫星上去、像甜瓜一样大的金属圆球等等。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些五花八门的间谍设备不少都是美国情报机构从“Q博士”手中订购的。被缴获的“邦德武器”似乎在说明，再高明的间谍工具也并不能让“007”战无不胜。

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研发出的产品中，也有部分后来转为一般用途，如液晶显示器、碳纤维、红外传

感器和微波雷达等。

英国军情六处有这样一群“Q博士”，而在美国中情局也有一群“Q博士”。能装入钢笔或手表的微型照相机、伪装快艇、入水即化的纸，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发明，听上去就像是《金手指》或《糊涂侦探》中的故事情节，但确实是美国中情局特工所使用的工具。

2004年，奎奈蒂斯公司迎来了“业内大腕”——美国中情局前局长特尼特的正式加盟。这意味着英美两国情报合作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特尼特从1997年到2004年担任美中情局局长，经历了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两任政府，是美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中情局局长。据英国媒体报道，特尼特将担任奎奈蒂斯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特尼特说：“我尤其感兴趣的是，这家企业的技术有能力满足美英军事和情报人员面临的诸多挑战。”英国舆论则表示，特尼特的正式加盟显示美英两国要在联手打造“Q博士”方面向前迈进一大步。

据悉，奎奈蒂斯公司的顾问名单上还有英国前首相梅杰、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等人。美英两国在保持情报机构的合作方面一直有着“良好传统”，美国对英国

的人力情报十分感兴趣，而英国则急需美国的卫星侦察情报，为此两国定期举行情报会议交流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奎奈蒂斯公司研制的许多间谍设备并不是只为英国情报机构使用的，其中有不少是受美国军方及情报机构委托研制的，而且，奎奈蒂斯公司实际上称得上是美英两国合资经营的。

奎奈蒂斯公司已经在2006年2月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英国国防部拥有该企业56%的股权，另有30.5%的股权由英国政府2003年出售给美国投资公司凯雷集团。该公司上述股份分配被认为是美英情报合作的新模式。

2003年7月12日，美国国会决定授予英国首相布莱尔一枚金质勋章，准备在7月17日布莱尔访美时，由总统布什亲自颁发，为感谢布莱尔在“9·11”事件后对美国反恐战争以及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国会参、众两院先后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这项决议，并计划在他访美时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在最初筹划时，布莱尔这次美国之行被视为一次“真正的历史性访问”，布莱尔将被鲜花、美酒和赞誉之词所包围。访美期间的一个高潮就是，布莱尔将成为继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之

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英国人。

自从独立战争以来，美国国会一直通过颁发金质勋章，对为美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个人或组织表示感谢。1776年，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约有300人获奖。

但是7月14日，布莱尔却表示要求美国取消对他的授勋仪式。当时布莱尔正被内政外交搞得焦头烂额。英国国内信任危机重重，甚至威胁到他的首相宝座。加上美国中情局的攻击，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显现反目危机。所以唐宁街10号的发言人不得不宣布，取消在美国接受布什颁发勋章的计划。该发言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授勋事宜在美国国内还没有完成程序。不过，这时有些媒体却说，布莱尔可能永远都无法接受这枚勋章了。

美国报纸也对布莱尔冷嘲热讽。当时《纽约时报》就发表文章说：“即使英国抛弃了你，美国还要你！”该文称“布莱尔对美国来说仍然有些利用价值”。

当时，英美两国情报机构间的“口水战”也为布莱尔访美蒙上了一层阴影。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说，布什在国情咨文中使用的不实情报来自英国，而

且当时按中情局的标准衡量，该情报是不合格的，只是出于对英国的信任才未将其放弃。

当时美英攻打伊拉克，本想干掉萨达姆，可没想到当时却不见萨达姆的踪迹，而布莱尔却面临着下台的危险。英国一些议员当时也已向布莱尔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在秋天之前，还找不到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就请让出首相一职。当时还有许多议员和大臣纷纷秘密与财政大臣布朗会面，英国媒体认为，布朗有可能接替布莱尔的首相职位。

在这种状况下，布莱尔要求美国取消对他的授勋仪式应该是明智的。

第二十一章 英俄谍战，魔高道高未有穷期

英俄谍战源远流长，早有“柏林隧道”让“黄金计划”成为笑柄，后有“剑桥五杰”大煞风景；冷战结束，谍战未有穷期，俄罗斯安全部长称4年抓了300多名西方间谍并不是夸大其词；时至2010年美苏间谍大交换，又让英国情报机构凑上了一份热闹——英国的“儿媳妇”回不了英国，美女间谍不知何去何从……

关于英俄谍战的“口水战”

英国同前苏联之间的谍报战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直到今天，英国情报机构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情报战

仍然是愈演愈烈。

2007年10月14日，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愤怒指责美英两国对俄进行间谍渗透，称4年之中一共抓获了300多名西方间谍。“间谍头头说西方想肢解俄罗斯”、“美英间谍被控在俄搞分裂”——10月11日，西方媒体纷纷打出上述醒目的标题，报道罗列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10月10日给西方间谍机构扣的一大堆帽子：对俄罗斯搞间谍活动，干涉俄罗斯内政，并正试图削弱和分裂俄罗斯。虽然美英官方暂时还没来得及“回骂”，但此前美英也一直指责俄罗斯的间谍活动达到了冷战时的水平。俄罗斯这一次抖出一长串数据，看样子要和美英间谍机构“老账新账一起算”。

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尼古拉·帕特鲁舍夫10日对俄《论据与事实》周报宣布：“自2003年起，外国情报部门有270多名间谍和70多名情报人员的身份曝光，其中包括35名俄罗斯公民。俄仅在今年就制止了外国14名职业间谍和33名情报人员的活动。”他说，还有6名俄罗斯人欲向外国特工机关转交国家机密情报被侦破。

帕特鲁舍夫称，目前对俄罗斯间谍活动最活跃的

是美国和英国。他还说，外国对俄罗斯的间谍活动过去一直规模很大，现在仍没有减少，某些大国的情报开支年增长率达到了15%~20%。他们主要搜集俄罗斯局势、国家领导人的行动等情报，他们对俄军队的战备和改组最感兴趣，特别是核导弹部队的编成、国防工业的发展、先进武器的研制，以及北高加索、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局势、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及交通运输等。

帕特鲁舍夫还特别点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名，并称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对波兰、格鲁吉亚、波罗的海三国及其他国家情报部门具有很大影响力。许多外国间谍都是利用在俄的非政府组织从事情报搜集活动，而且他们的行动已经影响到了俄政局。他举例称，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前南联盟及其他国家的“颜色革命”中，外国间谍就是用这些组织作掩护，并为他们提供资金。目前在俄的一些组织还向北高加索地区的匪帮提供资金援助。

帕特鲁舍夫说，行贿勒索是潜伏在俄的西方间谍一直从事的工作，而眼下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破坏12月即将举行的俄罗斯议会选举。他说，如今英国的间

谍机构几乎把“007”电影中的做法搬到了俄罗斯。英国的情报特工配备了极为先进的通信工具，比如将对讲系统装载到手提电脑的电池里，让俄方难以破解和跟踪。

帕特鲁舍夫还特别提到了不久前破获的“扎尔科间谍案”。

2007年6月底，俄前税务警察少校维亚切斯拉夫·扎尔科到安全局自首，主动供认自己被英国军情六处招募当间谍的细节以及自己接触的4名英国间谍的姓名、绰号、接头暗号。扎尔科供认，自己是通过俄流亡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和已故叛逃间谍利特维年科被英国军情六处招募的。

1998年，他与别列佐夫斯基首次接触，此后开始为别列佐夫斯基提供“磋商服务”。利特维年科建议他为英国人做事，当时他只负责搜集有关俄社会局势的材料和来自互联网的公开信息，并作出分析报告，每月能拿到2000欧元现金报酬。后来，英国军情六处要求他招募俄联邦安全局反间谍局特工，他感到害怕，于是自首。

帕特鲁舍夫说，这些不能不说明英国特工无处不

在。不过他也强调，俄罗斯情报机构对英国的了解程度也是英国人难以想象的，否则就不会有英国外交人员不断被驱逐出俄罗斯了。“我们了解他们的强项和弱点。”

帕特鲁舍夫的讲话自然引起了美英等国的注意。英美此前也一直指责俄搞间谍活动。有英媒体曾称，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内约有30多名已被证实身份的情报人员，其目标包括军事硬件、科学技术及英国政府的政治情报等。

美英媒体在报道帕特鲁舍夫此次讲话时，几乎都强调了此人与普京的关系，并再次强调他掌管的俄联邦安全局的前身就是苏联间谍情报机构克格勃。他们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当年曾在克格勃任职16年，并在1998年出任联邦安全局局长。他们希望这种说法对普京能起到“点穴”的作用。

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说，帕特鲁舍夫的话反映出，在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跌入“春寒期”时，俄英关系近几年大幅下滑，俄罗斯特工案又使双方关系进一步紧张。克里姆林宫对俄国内的外来影响力感到担

忧，特别是在西方指责俄罗斯民主进程倒退之时更是如此。这种担心可能促使政府收紧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

帕特鲁舍夫表示，固守冷战思维的政治家在一些西方国家仍然具有影响力。他们认为前苏联解体主要是由于间谍机构的影响造成的，前苏联解体为他们赢得了声望，如今他们正在策划瓦解俄罗斯。他们认为，间谍机构是执行这一计划的利器。

曾担任驻阿塞拜疆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朱尔斯诺夫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毫无疑问就是一些受到英美情报机构资助的非政府组织策动参与的，而如今美国正在力劝俄罗斯将导弹防御体系迁移到阿塞拜疆，西方情报机构的力量也一定会流向这个国家，进一步监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英俄谍战源远流长

当年“英美协定”成员国对应该监听谁的电话、传真一直胸有成竹，而移动电话的出现又为这种监控增加了新的机会。

其中最好的一个例子莫过于1996年4月21日那枚

击中车臣叛军领导人杜达耶夫的导弹。当时他正站在一个村子旁边的田地上使用卫星电话。俄国一家新闻机构报道说，导弹是根据电话的无线电信号击中目标的。但俄国驻扎车臣的军队领导人却否认俄国炮兵或空军参与了该地区的行动。

塔斯社声称，在过去3个月中，这已是俄军第5次锁定杜达耶夫将军的电话信号，但前几次在导弹击中目标前他就结束了谈话。

过去人们经常能看见杜达耶夫出现在电视上，通过移动电话指挥军队并接受采访。在他被炸成碎片前不久，他还在电话中和叶利钦的部下讨论和平谈判问题。这次袭击最让人费解的地方，就是俄军为何不愿承认自己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难道是因为提供杜达耶夫电话位置的不是他们，而是美国人通过曼威斯山提供的？

在一个月后召开的关于信息战争的会议上，世界一流的通讯卫星和计算机安全专家就此事展开了讨论，并且得出结论：从政治和技术上讲，很可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帮助俄国人从肉体上消灭了杜达耶夫。人们还记得，首先通过窃听无线电通信、确定玻利维

亚革命领导人位置的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当时叶利钦的地位岌岌可危，而贯穿车臣的输油管道也必须得到保护，这些足以促使美国国家安全局向俄军提供杜达耶夫的位置。车臣叛军对这一点也不是不知道，这也是他们后来将所有进入车臣的非本国人都视为可疑分子的原因之一。被派往该地区的西方救援人员和通讯人员都面临着被绑架和谋杀的危险。美国情报部门非常惧怕杜达耶夫之死可能引起的反应，因此竭力想压制对这件事的报道，因为“我们还有人在那里”。这些人很快就被召回国，但曼威斯山、英国通讯指挥部和德国的情报站仍对整个车臣地区进行监控。

回顾英国的情报史，可以说自二战开始到后来冷战时代，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有许许多多间谍同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发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还发生了多起“双重间谍”的故事。其中炒得最热闹的有两件事，第一件就是被英国当局判了42年徒刑的“间谍王子”乔治·布莱克和他的“柏林隧道”事件；第二件是金·菲尔比和他的所谓“剑桥间谍网”。

乔治·布莱克的故事前文已有介绍，不再赘述。

至于“剑桥间谍网”，那可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故事。由于牵涉的人员太多，还有多种“版本”流传于世。这里就选择一种最流行的介绍一下。

对国际情报组织有所了解的人，恐怕无人不识金·菲尔比的大名。菲尔比作为苏联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卧底英国情报部门时间长达20余年，又是英国派驻美国CIA（中央情报局）的高级联络官，负责协调英美两国情报系统的反苏联间谍行动，其位置之关键，潜伏时间之长，对英美间谍网络破坏力之大，堪称冷战之最。

菲尔比并非孤军奋战在英美情报系统内部，他有一个闻名于世的核心团队——“剑桥五杰”。其中成员都是剑桥大学毕业，后来成为苏联克格勃打入英美情报圈的中坚力量。

在他们当中最早暴露身份的是麦克莱恩。麦克莱恩曾在英国军情五处（反间谍）和六处（对外情报）担任重要职务，后来转到英国驻美国大使馆负责情报工作。大量有关原子弹的研发以及丘吉尔与罗斯福、杜鲁门总统之间的政策制定、进展等关键信息，源源不断地通过麦克莱恩之手传给苏联克格勃。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麦克莱恩最早向苏联透露了“马歇尔计划”的真正企图。

正是麦克莱恩的准确情报使苏联方面从一开始就看透了“马歇尔计划”的底牌，因此不仅拒绝加入该计划，同时还强力阻止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并且加速从德国撤除各种重工业装备。

1951年5月25日38岁生日那天，已经被英国情报部门怀疑的麦克莱恩与“剑桥五杰”中的伯吉斯一起叛逃到苏联，被授予苏联克格勃上校军衔。

伯吉斯在英国外交办公室工作期间与安东尼·布兰特爵士一起将大量盟军战略计划和外交政策转给了克格勃。伯吉斯后来也被派到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并与菲尔比住在一处。他叛逃苏联之后，因大量酗酒死亡。

“剑桥五杰”中第四位暴露的是安东尼·布兰特爵士。他曾在英国军情五处从事反间谍工作，将大量德国军事情报泄露给苏联。战争结束前，他被英国王室秘密委派前往德国寻找英国温莎公爵与希特勒之间的密信，还有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与她的德国亲戚之间的通信。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祖母。

1956年安东尼被英国王室晋封为爵士，后来担任剑桥大学艺术史教授。他的苏联间谍身份暴露后，其爵士封号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撤销，随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宣布布朗特爵士是苏联间谍。英国舆论哗然。1983年，安东尼·布兰特死于伦敦的家中。

“剑桥五杰”中第五个人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国际著名的情报学家罗兰德·培瑞以大量的事实推断，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可能是那个神秘的“第五个人”。

维克多在英国国防科技实验室波登当的关键研究部门工作。波登当实验室所进行的实验主要是生化武器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将会被应用于细菌战武器的制造。波登当实验室的工作是整个战争过程中最绝密的项目之一。维克多来到波登当实验室4个月内，苏联克格勃就收到了大量实验数据，苏联生化武器研究的步伐紧紧跟了上来。

在二战初期，维克多就发现了原子弹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价值。当时他强烈建议丘吉尔加强对原子弹方面的研究，于是丘吉尔将当时英国科研的优先顺序定为：首先发展雷达，以解德国空袭预警的燃眉之急，其次就是原子弹的研制。

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维克多是整个项目的重要参与者。

1941年10月，维克多进入了核心委员会监控原子弹研发的所有步骤，又广泛施展他在英国的影响力帮助威廉·阿克斯爵士争取政府的各项研究资助。可以说，维克多是英美情报系统中对原子弹最熟悉、知识最渊博、对情况最了解的专家。

维克多不仅对研究细节了如指掌，而且对英美两国原子弹整体项目的进展和涵盖的环节有着全面系统的掌握，这使他处在整个原子弹研究领域中有非常有利的位置上。维克多此时手中掌握的“情报资产”，已经足以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1933年，英国核物理学家鲁道夫·皮尔斯认为兴建反应堆来制造原子弹的燃料是可行的。紧接着，皮尔斯和伯明翰大学的马克·奥里芬爵士共同验证了其技术的可行性，提出一整套设计方案。这个方案被维克多掌握，并很快将它们转到了苏联的手中。

后来苏联物理学家们反映，维克多的情报帮助他们大大缩短了研究时间。苏联多年之后承认1949年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只是美国人设计的一个翻版，这

种设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帮助苏联的核物理学家理解了原子能反应堆的最基本原理。当时在整个英国和美国，甚至包括丘吉尔在内的政府高层和诸位首席科学家们，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像维克多一样对原子弹的方方面面知道得这么全面和细致。

和维克多一样，一个叫福克斯的科学家也在不断把绝密的分子式、方程式和炸弹模型，秘密交给苏联情报员，把美国的原子机密毫无保留地透露给了冷战对手，帮助苏联节省了许多年的研制时间和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不过，就在福克斯等人把情报传递给苏联的同时，美国军队的情报机构也在实施一项代号为“维诺纳”的绝密计划，通过这个计划，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情报人员破译了苏联的一封函电，里面提到了苏联一名最重要的原子间谍成员。经证实，福克斯就是那个替苏联搜集情报的人。

1950年1月，福克斯被捕了。福克斯对自己的间谍行为供认不讳。

在这位科学家看来，这不是对国家是否忠贞的问

题，而是对世界和平是否负责的原则问题。他坚持认为，原子技术正因为具有可怕的威力，才更应该属于全人类，而不是美国和英国的专利。否则，原子弹一旦研制成功，就会沦为超级大国的杀人武器，美英就会以此为要挟称霸并控制全世界。

1952年4月，福克斯被判14年监禁。服刑9年后，福克斯被释放，随后便加入了民主德国国籍。在德国，他继续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直到离开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

福克斯的被捕以及“维诺纳”计划提供的情报，让美国政府开始注意一个代号叫“卡里伯尔”的人。

“卡里伯尔”其实是大卫·格林·格拉斯。20世纪40年代，他是驻扎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名军官，他能很容易借工作之便搞到原子试验室和研究项目的有关机密。经不住姐夫罗森伯格的再三劝说，他终于走上了窃取情报的道路，成为苏联原子间谍网的成员之一。

罗森伯格夫妇是邻居们眼中一对和善可亲的夫妇，有两个可爱的儿子。罗森伯格借生日聚会和野餐的机会，轻描淡写地把美国的原子机密泄露给了苏联人。

罗森伯格夫妇提供给苏联的机密，其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简直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不仅搞到了航空技术、电子技术和引爆技术，并且从曼哈顿工程中为苏联提供了引爆透镜技术。就是利用了这项技术，苏联准确地击落了U-2飞机。

罗森伯格夫妇于1951年夏天被捕，并被控犯有间谍罪。这一消息立刻在全国引发了一场争论，善良的人们高举标语牌自发地走上街头，用游行的方式抗议政府冤枉无辜。标语牌上有的写着“不要让两个孩子沦为孤儿”，有的写着“罗森伯格夫妇重获自由”，他们不相信，这对性情温和、彬彬有礼的夫妇会是什么苏联间谍。

罗森伯格夫妇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以间谍罪处死的平民，这一间谍案曾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引起巨大影响



朱利斯·罗森博格



埃塞尔·罗森博格

对于公众的质疑，美国政府感到左右为难。学者诺曼·波尔马认为这源于两个因素：“第一，公众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是间谍，他们也是在为我们的盟国从事间谍活动，因为苏联在二战中是我们的盟友。第二，他们的被捕是因为‘维诺纳’计划，而这项计划是美国情报机构的秘密行动。美国不希望俄国人知道，更不想让本国公众知道被捕的人正在秘密窃取苏联的情报。因此，许多情况无法公开，进而也就导致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都觉得罗森伯格夫妇是无辜的。”

罗森伯格夫妇被捕后，始终保持沉默，坚决否认自己是间谍集团的成员，而且拒绝供出同伙，拒绝与

政府之间一切形式的合作。

1951年3月，罗森伯格夫妇被判有罪，并被双双送上了电椅。这个判决结果震动了全世界，因为罗森伯格夫妇是仅有的两个在和平时期因间谍罪被处死的美国人。

直到1995年，美国政府才将“维诺纳”计划公之于众。这时候，人们才彻底了解了罗森伯格夫妇所从事的间谍活动。这对夫妇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苏联的原子弹研制计划，如果没有他们，苏联的核计划根本无从谈起。因此，他们毫无疑问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间谍之一。

一直以来，英国军情六处俄裔间谍维克多·波戈莫雷斯都被视作“英国最优秀的间谍”之一，然而俄罗斯对外情报局2007年4月2日首次对外披露称，他竟是一名曾经长期将英国情报窃取后提供给苏联的双料间谍。波戈莫雷斯身份的曝光，令英国情报机构再度颜面尽失。

维克多·波戈莫雷斯出生于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1920年，流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维克多邂逅英国军

情六处的头目哈洛德·吉本森上校，从此被招募为间谍。按照后者的指示，维克多开始在欧洲各地广招俄罗斯裔移民，以便构筑一个可以打入苏联内部的间谍网。

20世纪30年代初，早已移居伦敦的维克多自鸣得意地将一位俄罗斯裔同胞鲍利斯·拉哥发展为下线。让维克多蒙在鼓里的是，鲍利斯此时的真实身份竟是一名被派往海外的克格勃间谍。

原来，苏联情报机构早就制订了一项周密的反间谍行动——“塔兰泰拉行动”，此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维克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源源不断地向其英国主子吉本森上校提供了大量关于苏联的虚假情报。

由于这些情报大大虚夸了苏联当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得二战初期一度摇摆不定的丘吉尔政府最终决定联合斯大林政府，共同抗击德国纳粹。

据悉，维克多在流亡伦敦期间长年过着奢华生活。克格勃在摸清这些情况后，不惜重金投其所好，并频频发出信号，引诱他重返莫斯科定居。

1934年，维克多由于种种原因被剥夺了英国国籍，他因此中断了为军情六处效力，并且逐步放弃了

继续对抗祖国的念头。

1944年，维克多开始为苏联效力，并且从克格勃那里获得一个“布利特”的代号。

随着冷战拉开序幕，维克多将大量有关英国的重要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最高领导层。让军情六处头目吉本森浑然不知的是，苏联对于他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直到他于1960年去世。而出卖吉本森的不是别人，正是由他一手栽培的“忠实部下”——维克多·波戈莫雷斯。

在为克格勃效力了15年之后，维克多突然携妻子从人间蒸发。据信，他后来逃亡到了巴黎，过着隐居生活，直到去世。

英、美、俄三方谍战演“小品”

2010年是英、美、俄三方谍战热闹非凡的一年

7月，美国和俄罗斯完成了冷战后最大规模的落网特工交换。这次特工风波发生时正值美俄致力于重启双边关系的关键时刻，最终以交换间谍方式画上句号。不过其中一位俄罗斯“美女特工”安娜·查普曼的身

世和美貌，却引起了美国、英国和俄罗斯三方的关注。

安娜·查普曼原名安娜·库先科，2002年，安娜在莫斯科与英国人亚历克斯·查普曼相识并结婚，从而取得英国国籍，后跟随丈夫移居英国伦敦。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4年，两人2006年离婚。安娜离婚后搬到美国纽约，开了一家网上房地产中介公司。

29岁的维亚切斯拉夫·谢尔科夫是安娜的初恋情人，与当时年仅15岁的安娜有一年的恋情，二人分手后仍保持着联系。

安娜离婚后曾给谢尔科夫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她在邮件中说：“我们同居一年，结婚后搬到伦敦。后来我把他甩了，一个人拿着护照继续住在伦敦。”英国军情五处后来调查这个前克格勃高官的女儿是不是为了英国护照才与亚历克斯结婚的，以及她获得护照的真实意图。

谢尔科夫也承认，有一次他问安娜为什么不继续住在伦敦，安娜反问道：“我为什么要一直待在那儿？我现在已经是英国公民了。”

谢尔科夫和安娜曾就读于伏尔加格勒市的同一所

高中。2010年6月29日，谢尔科夫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他的初恋情人和另外9名嫌疑人因间谍罪被美国政府逮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谢尔科夫回忆说，安娜从小聪明伶俐，成绩优异，且乐于助人，虽然有时行踪神秘，但身边并不缺乏朋友。他不相信安娜是媒体渲染的那种邦德女郎式的超级间谍。

据谢尔科夫所知，安娜出生于乌克兰，在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市长大。她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官，常驻肯尼亚和津巴布韦。安娜从小跟着祖父母长大，对政治一点也不感兴趣，她仅喜欢经济和英语。高中期间，安娜门门功课成绩优秀，后来考上莫斯科人民友谊大学经济学系，最终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此外，安娜的妈妈伊琳娜·库谢诺夫也出面坚称女儿是清白的，还说自己和丈夫想给女儿雇一个好律师，但负担不起高额的律师费。

美国法院7月8日在判决中将查普曼和另外9名为俄罗斯工作的特工驱赶出境。查普曼一行9日乘俄罗斯政府飞机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方面许诺，将为她在俄罗斯提供免费住房；终生提供每月2000美元生活费（约合人民币1.35万元）；如果她的孩子去俄罗斯，将发

放签证。

安娜被捕前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个人资产价值200万美元。她的律师罗伯特·鲍姆在法庭外说，这次事件可能毁了安娜的事业，而且她必须回莫斯科。这令她不快。安娜已经把英国当成自己的家。“她想在英国和俄罗斯生活。她在英国生活了差不多7年，认为那里是自己的家，希望能够回去。”

不过，英国政府并不欢迎这位“儿媳”，打算剥夺她的英国国籍。英国内政部正展开调查，希望证实安娜仅仅是为取得英国国籍而结婚。内政大臣特雷莎·梅认为，一个英国人如果拥有双重国籍，而剥夺其英国国籍又符合公共利益，她毫无疑问会那样做。

工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艾伦·约翰逊呼吁政府“迅速行动，收回查普曼的护照”，假如她进入英国，“立刻驱赶出境”。

就在这时，英国一家媒体又火上浇油，爆出一条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的桃色新闻——报道说，疑为俄罗斯间谍的28岁女子查普曼被指用“美人计”搭上多名权贵，最新传出的主角是英国上议院一名议员，媒体没有公开其名字，仅透露该议员是一名御用大律

师。

消息传出后，英国律政界纷纷揣测主角是谁。御用大律师莱斯特说：“我很想知道是谁，不论是谁，都很幸运，因她的确是一名惹火尤物。”

此前媒体报道称，查普曼从2002年起曾定居英国5年，并曾在对冲基金公司任职。英国军情五处正调查查普曼的友人及其合作伙伴，了解她有否招揽他们作为“第二梯队”间谍。

当局又调查她与在俄罗斯驻伦敦大使馆工作的特工的关系。据报道，使馆内有35名特工，当中一半为外交人员。军情五处前主管斯特拉透露，俄罗斯间谍在英国的活动目前仍然非常活跃。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白宫官员6月9日爆料，美国情报部门10年前已盯上10名俄罗斯“间谍”，今年6月动手抓人前已有与俄方交换间谍的“如意算盘”。

这名官员称，美方多年秘密监视这几人。今年早些时候，美方获悉10人中有人打算今年夏天离开美国，于是决定采取行动。

情报部门和司法部6月初决定动手抓人，6月11日

向总统奥巴马通报详细行动方案。就在这时，美方着手酝酿与俄方交换人员。

13天后，即6月24日，奥巴马与来访的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白宫谈笑风生，随后在汉堡店共进午餐。向美联社记者介绍情况的白宫官员说，奥巴马当时没有向梅德韦杰夫提起特工案。

6月27日，美方在多个地点实施抓捕，缉拿10名俄罗斯特工。

此后不久，美方向俄方摊牌，提议用10名特工交换俄方逮捕的4名曾向美方提供情报的间谍。

美国责成中情局局长利昂·帕内塔与俄罗斯情报部门谈判。谈判过程中，美方向俄方提供希望对方释放的间谍名单。白宫官员说，俄方最终交换的4名间谍与美国拟定的名单“一致”。两国商定，完成交换后，双方不得采取任何报复行动。

美国副总统约瑟夫·拜登9日说，美国用10名俄罗斯“特工”换回4人，实际“没吃亏”。拜登当晚参加美国全国播送公司夜间谈话节目《今夜秀》。主持人质疑当天的交换行动说：“这从人数上看好像不公平。”

拜登回应：“我们换回的4个人很不错。至于换出

的10人，他们来美国已经有段时间，但没得到什么。”

作为交换，4名在俄罗斯为西方工作的特工获释。他们9日在奥地利维也纳机场搭乘美国政府包机前往美国。美联社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这架飞机在英国牛津郡布里兹·诺顿空军基地短暂停留，留下两名特工。

英国《卫报》报道，至少一名特工将留在英国。这名特工是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前俄军上校，2006年被判入狱13年，罪名是充当英国间谍。俄罗斯检察机关指控他从英国秘密情报局收取大约10万美元。

按《金融时报》说法，另一人是军控专家伊戈尔·苏佳金，他的罪名包括向一家英国公司泄露机密。报道说，两人将与秘密情报局官员见面，“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将留在英国，并得到保护和良好待遇，开始新生活。中心情报局还将给他们新身份，提供住房和资金，帮助他们适应新生活。

本来是一场美国和俄罗斯交换间谍的“对口相声”，结果英国人也凑了一把热闹，成了一台“三人小品”，又让这个世界多了许多话题。

由此看来，英国情报机构在世界情报界永远是一

个不甘寂寞的角色。

第二十二章 走出神秘，英国特工公开招聘

“007”走出神秘，走进电台现身说法，为公开招聘做广告，女性特工成了热门货，官方网站更是推波助澜；为了反恐不仅招聘拆除“乳房炸弹”的“拆弹部队”，还要招聘生了孩子的“妈妈特工”，并保证不要卖弄色情；不过华裔青年却说，只有脑子进了水的人才去应聘。

招募特工的途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情报机构一直是在极度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政府部门的名单上甚至没有

它的名字。如果不是《007》问世和“詹姆斯·邦德”先生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英国情报机构可能仍然会不为多数人所知。所以关于他们的招聘和培训也就成了一个神秘的话题。

二战时期，军情六处的特工招聘大多是根据战争的需要，招募各种各样的人成为间谍。由于战争的原因，其招聘的方式并没有现在这么规范。

军情六处的招募通常有三条主要途径。其中之一就是大学。就像有些大企业那样专门派人到大学去招募情报人员，或者是通过大学里的职业介绍服务部门来进行指派或者介绍。另外在一些大学里还有许多与情报界有关系的学者、教授和专家，这些人也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情报机构里工作过，所以他们也会介绍一些自己的学生加入情报机构。

第二条途径就是从军人中招间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里斯·奥德费尔德爵士一开始是在军队里从事情报工作，1946年经他的上级动员加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1973年8月，莫里斯·奥德费尔德爵士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他的经历就是一个“从军人到间谍”的最典型的例子。

当然，和平年代可能会有新的机会和办法。像北爱尔兰那样的内乱局面，同样可以让局部的军事行动为招募职业情报人员提供良好的条件。正如当年越南战争曾是美国情报机构考验和招募情报人员的极好地点一样，如今的北爱尔兰也成了英国军情六处最好的招募地点。

在北爱尔兰的首府贝尔法斯特，经常发生天主教徒被耶稣教徒杀戮，或是耶稣教徒被天主教徒残害的事情。背叛和欺诈之风盛行，怀疑已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不过也有例外——1972年6月，一对年轻男女搬进了安特里姆大街一套有两间卧室的公寓，却没有引起邻居的任何猜疑。

他们是一对漂亮的组合。男的面目白皙而英俊，说着一口北爱尔兰土话；女的面目微黑，姿色迷人，比男的年长几岁。当那些“救世军”在大街上做礼拜时，她也前去参加。他们与邻居相处得十分融洽，邻居们知道男的叫鲍伯·琼斯，女的叫珍妮·琼斯。他们是姐弟俩，开了一家干洗店，很是忙碌。他们在学院广场东边的书店楼上有一间小办公室，还有一辆绿色的小型送货卡车，车厢两边印着洗衣店的字样。

1972年10月2日早上，鲍伯·琼斯驾驶着洗衣店的卡车，绕过住宅区向前开去。当卡车开进旁边的公园路时，一辆蓝色的福特牌轿车尾随而至。轿车后座上坐着两个人，他们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来的一个暗杀小组。

上午11点15分，他们追上了鲍伯·琼斯的卡车，然后跳下蓝色福特牌轿车，手持冲锋枪，一个奔向洗衣店的卡车，一个站在轿车旁准备进行火力掩护。鲍伯·琼斯还没来得及从手枪套中抽出勃朗宁自动手枪，共和军的暗杀人员已将一阵弹雨扫向卡车。鲍伯·琼斯顿时血流如注，当即倒在方向盘上死去。他的姐姐珍妮·琼斯亲眼目睹了这场惨案。她尖叫着，几乎吓疯了，而那两个持枪的暴徒却镇定自若地回到轿车上，扬长而去。

几分钟后，一支英国巡逻队赶到，他们把卡车开走，并护送珍妮·琼斯离开了这个地区。当天晚上，珍妮·琼斯秘密地离开了北爱尔兰，坐飞机回到了英国。

原来，“珍妮·琼斯”的真名叫萨拉·珍妮·沃克，是皇家陆军妇女队的上等兵。“鲍伯·琼斯”真名叫泰德·斯图亚特，是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一名20岁的北爱尔兰

人。他们是自愿假扮姐弟，从军人变为间谍，利用洗衣店的业务巧妙地进行情报活动。

来到北爱尔兰后，他们对收到洗衣店里来的衣服首先进行刑侦技术检查，查看衣服的主人是否摆弄过炸弹或是开过枪。通过这种秘密的检查，他们曾协助当局抓捕了好几个爱尔兰共和军分子。

1973年12月，在一次秘密举行的授奖仪式上，萨拉·珍妮·沃克接受了伊丽莎白女王授予她的勋章。她换用了假名，被任命了新的职务，因为她的名字已经在爱尔兰共和军的暗杀名单上，并且是名列前茅。

假如在若干年以后的某个时候，一旦需要像萨拉·珍妮·沃克那样的人从事情报工作，她的名字和档案就会从电子计算机的储存器中输出，英国秘密情报局或保安局就会给她一个职位。萨拉·珍妮·沃克在北爱尔兰工作过的部队是一支秘密的军事侦察队，这样的军事侦察队就是英国情报机构最好的招募来源。

第三条途径就是从那些曾给情报机关送过情报，或者是有联系的人中间招募情报官员。

当然，军情六处招募间谍远不止上述的三种途径。军情六处对联络员格雷维尔·温的招募，可以说是

由于意外事件引起的。格雷维尔·温曾在苏联的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1964年和一名苏联间谍交换后才回到了英国。

在成为军情六处的情报人员之前，格雷维尔·温原是诺丁汉一家工厂的学徒工。1938年的一天夜里下班后，他返回工厂，因为他有一件工具丢在车间里。当他来到车间里后，却发现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一个人正在对着一个闪着灯光的铁盒子说德语。格雷维尔·温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电台。第二天，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厂董事会中的一名陆军上校，这名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和情报机构有过联系。

几个星期后，这位陆军上校突然要和格雷维尔·温进行一次单独谈话。在这次谈话之后，格雷维尔·温就开始在军队中搞情报工作。战争结束后，他继续工作，这次，他进了苏联的监狱。

被军情六处招募的间谍经过训练后，并不被急于使用，而是大部分时间待在总部的办公室里，只是偶尔有机会短期外出。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安全，因为一个派出时间长的人，被对方搞掉的危险就更大。

利用“007”的影响力招募

要想成为军情六处的特工，申请者必须是英国公民，年满21岁，起薪为5.2万美元。申请者要忍受长达数月的甄别过程，并要接受军情六处对他们的个人、家庭、经济、宗教和是否服用过毒品等情况逐一询问。军情六处负责招聘的一位主管说，年薪并非军情六处吸引人的地方，而是这个机构工作的重要性。

二战以后，军情六处虽然少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但还是十分重视对特工新手的招募，因此还保持着一定的活力。他们利用“007”这块金字招牌来做文章。因为自从第一部“007”的小说问世之后，英国特工的形象就开始走进人们的心中。第一部“007”电影于1962年10月4日公映后，“007”电影系列更是风靡全球，至今40年仍然长盛不衰。

英俊帅气的脸庞，潇洒灵动的身手，诙谐幽默的谈吐，机智果敢的谋略，再加上相伴左右的如花似玉的“邦德女郎”……在“007”系列影片风靡全球之后，一个魅力十足的“詹姆斯·邦德”的形象深深植入无数人的记忆之中，自然也使一些青年人多了一份向往和诱

惑。凡是熟悉“007”的人都知道，“詹姆斯·邦德”的原型就是英国军情六处的成员——“加入我们，你肯定将得到一个刺激的、有回报的生涯，像邦德那样为国家效力”。这就是军情六处多年来在网站上的广告词。

从前，“007”总是给人以神秘兮兮的印象，如今却不断撩开神秘面纱，走到公众面前，诉说其真实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为军情六处的招聘活动做宣传。据英国媒体报道，为了吸引更多的英国青年加入特工行列，英国秘密情报局特地邀请英国广播公司（BBC）为他们做了系列节目，由军情六处的年轻特工现身说法，在BBC连续播出一周，向广大听众和应聘者介绍他们非同寻常的特工生活。为防止身份外泄，这些出现在节目中的年轻特工不但使用假名，连他们的声音在播出前也经过了特殊处理，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机器人在讲话。

2007年11月26日，BBC第一电台第一次播出了这档录音节目。军情六处招聘负责人“马克”（当然也是假名）首次接受媒体访问。他在节目中表示，此次活动是为了纠正人们对特工的认识偏差，以便在反恐任务越来越重的今天能够招募到更多的优秀人才。他说

军情六处过去招募都是在校园中悄悄进行，如今为了适应从不同族群中征选人才的需要，才首度决定公开招募。“马克”还表示，真实的特工和“007”系列电影中的“詹姆斯·邦德”其实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因为“邦德”的形象是综合特工的生活而塑造出来的，有很多虚构的成分，这往往会让人们对特工的认识存在偏差，同时对招聘工作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在最新的“007”系列影片《皇家赌场》上映前一天，军情六处的一男一女两名特工正做客BBC电台，接受采访。他们向听众们讲述现实生活中“007”的真实工作情况。当被问到军情六处的特工是否像邦德一样持有“杀人执照”时，男特工予以否定。他说：“在执行公务时，特工都要按照英国法律行事。军情六处的工作受到政府和法律部门的监督，没有丝毫个人行事的空间。”

那位男特工还透露，特工工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危险，反而很有意义。对此，那位女特工也表示：“特工工作有许多冒险经历，很刺激，也很风光。”

BBC第一电台的这次采访和录音工作，是在秘密

情报局总部大楼完成的。媒体记者被允许进入情报局“腹地”采访和录音，这在英国情报史上还是第一次。神秘的英国情报机构终于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

从2007年开始，军情六处除了请BBC为他们做专题节目之外，还一改以往的神秘作风，开设了自己的网站，并多次在《泰晤士报》、《经济学家》、《卫报》等媒体上刊登招聘广告，足见其对人才的渴求。军情六处甚至欢迎残疾人申请应聘。

近年来招募少数民族人员加入情报机构，也成了军情六处的一项主要任务。为适应反恐形势的需要，军情六处在招募过程中开始青睐少数族裔和女性。英国执法部门宣称，在孟加拉国、阿富汗、索马里等国，一些新的威胁已显露苗头，情报部门需要招募掌握相应语言的少数族裔职员来应对危机。他们允许自己的特工通过不同的形式招聘更多不同的少数族裔，并且公开鼓励少数族裔报名。这是因为军情六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恐怖主义，所以军情六处特别希望能招募到那些能够说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阿富汗的达里语和普什图语的英国人。

事实上在此前的6年里，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里面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青年；与此同时，这方面的经费预算也翻了一番。

2009年9月30日英国秘密情报局在网站上公开了一张多项选择题试卷。那些有志成为特务电影《铁金刚》主角的人，必须在不看答案的情况下完成，如顺利通过，他们便适合在军情六处工作。

多项选择题试卷是军情六处招募计划的一部分，虽然这份测试卷不会有助人们成功应征，但却可以吸引人们对特工工作的兴趣，同时还能进一步拉近军情六处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让该局的形象看起来不那么神秘莫测，而是更平易近人。

据悉，秘密情报局那一次招募的工作人员包括从行动指挥官到仓库副管理员，从语言专家到技术专家等职位的人才。虽然该局已经逐渐在向公众显露自己神秘面纱下的“真容”，但从他们的招募广告中还是可以看到让人浮想联翩的细节，比如行动指挥官的职位要求申请人详细写出种族、性取向、身体残疾等细节，仓库管理员的招募广告中对工作地点避而不谈。

此外军情六处还提醒应征者不能与父母、亲密伴

侣或配偶以外的其他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申请意愿，谈论招工一事。

英国情报机构公开招募时，虽然只是笼统地表示希望应征者精通外语，尤其是阿拉伯语、波斯语、汉语或西班牙语，但有情报专家分析认为，其优先招募的目标仍是“汉语间谍”。

2007年12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分别发表题为“壳牌石油和罗尔斯·罗伊斯受到中国间谍威胁”和“英安全部门警告银行提防中国黑客”的报道。报道称，壳牌石油公司和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计算机系统受到来自中国黑客的攻击。此外，英国《泰晤士报》12月1日发表文章称，英国军情五处处长乔纳森·埃文斯日前给各大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行的300名行政总裁及安全负责人发送密函，警告他们“小心中国国家机构支持的黑客间谍窃取商业情报”。此后，该报3日在报道中又宣称“中国军队支持的黑客袭击了英国飞机引擎制造商劳斯莱斯公司的网络”，英荷壳牌石油驻美国休斯敦的分公司也发现了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间谍网络”。



反间谍人员经常使用的显影粉

2008年1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秦刚表示，中国政府一贯反对和严格禁止任何网络入侵和破坏信息系统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并对英国媒体炒作所谓“中国网络间谍”的报道表示强烈不满。秦刚严正指出：“英有关媒体无视事实，炒作所谓中国实施网络间谍谣言，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为BBC第一电台以介绍流行音乐为主，而BBC亚洲广播网则是面向在英国的亚裔人群，因此，军情五处7天的“间谍宣传”节目播出后，立刻在年轻人中间引

起了热烈讨论。但BBC随后进行的调查显示，大多在英华人根本无意加入间谍队伍，有的甚至留言称，“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会加入英国情报局”。

那么，究竟哪些人适合当间谍呢？据分析有以下几种：

一、军人。军事行动为招募情报人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移民，并在其国籍所在地要害部门工作过，比如：军营，国营企业。

三、大学生，尤其以新闻系最佳。学生毕业以后一般都能进入新闻部门或外交领域从事记者工作，而记者便于收集情报。

四、特殊才能拥有者。比如：盗窃高手，当然，是没有重大案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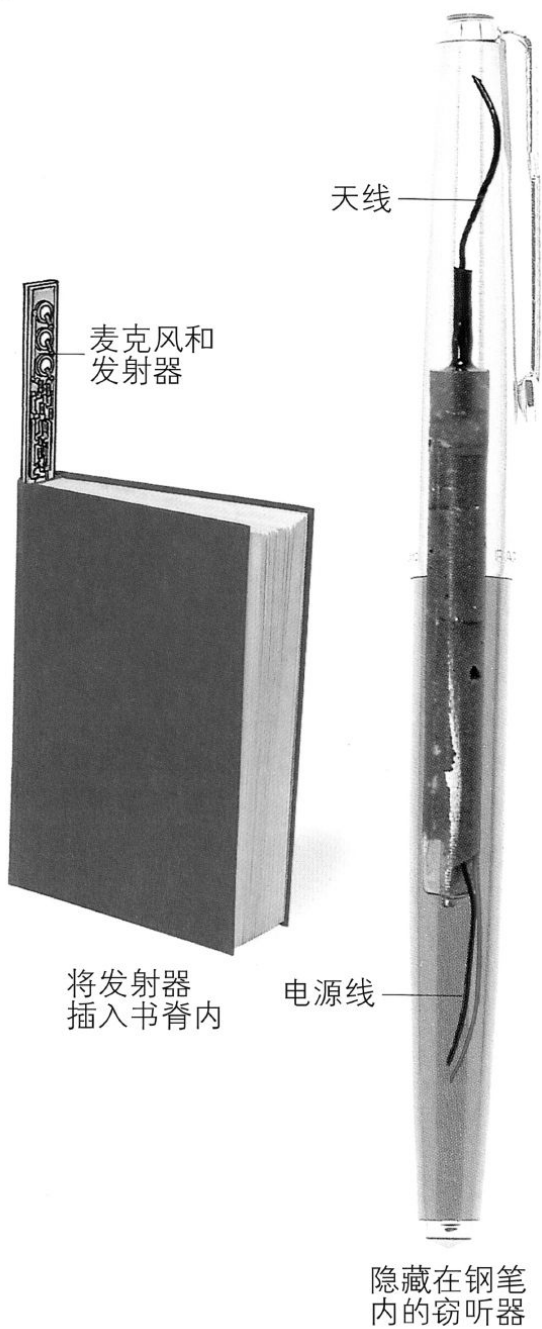
五、军警世家或高干子弟。这些人一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曾在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工作，比如，国家安全部门、军事机关等等。

由此看来，想成为一名军情六处真正的特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招募特殊的“拆弹部队”

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各路精英都以能为情报机构服务为荣，英国情报机构也一向给人以严肃阳刚的印象。然而近年来，英国情报机构越来越难招到精英人才，尤其是一些优秀的男性都被有前景的行业以高薪挖走了。如今随着出色男特工越来越少，英国情报机构不得不放下排斥女性的架子，军情六处就开始把目光瞄向女青年，开始寻求优秀的女性。不过，吸引女性到军情六处当间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能把更多的出色女性揽进情报机构，军情六处不仅标榜重视女特工的家庭生活，更保证她们入行后不必色诱情报目标。因为在传统的“007”电影中，男特工英俊潇洒，女特工年轻漂亮。潇洒漂亮的男女特工就成了克敌制胜的最厉害兵器。在官方网站的招聘栏上，英国军情六处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如今的军情六处就像大家庭，女特工们肯定无须出卖色相，挖甜蜜陷阱。”



隐藏在书脊内的发射器

不过，对于军情六处拍胸脯保证新特工无需出卖色相，不用施“美人计”换情报的说法，国际情报观察家们却表示怀疑。因为尽管现实中间谍行动远不是“007”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用靓妹帅哥来引诱敌人，但“美人计”却是国际情报组织与间谍机构最常施用的手段。因为出卖情报或者说陷入间谍圈套的人不是贪图金钱，就是醉心美色，因此情报工作离开了“美人计”，还真有玩不转的时候。为此，这些情报观察家们认为，军情六处说不搞“美人计”恐怕也只是一个说法，为的是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做特工。

军情六处每年通过公开招聘程序招收250至350名新人，40%是女性，11%来自少数族裔。他们的职位包括语言专家、间谍、技术员、保安、司机和前台接待员。

为了能招到更多更优秀的女性间谍，军情六处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鼓励已经当了妈妈的女性申请，并保证说绝不会让她们在今后充当色情间谍，比如说可以当“业余间谍”，可以边带孩子边搞情报，还可以带薪休产假。如果她们参加军情六处时还是单身女郎的话，那么她们将来结婚成家，怀孕生产都无须担心会

被炒鱿鱼。

军情六处颇为煽情地说：“我们是一个超级重视传统家庭价值观念的单位。任何加入军情六处时间超过一年的女性，她都能休半年的带薪长假。除极个别的情况外，她们的老公和孩子能随她们派驻各地。”

除军情六处外，军情五处也把招聘活动瞄准了女性。为了能招到优秀的女性，军情五处还新招迭出，甚至在伦敦公共汽车和地铁里大打广告。

军情五处招募人才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因为他们的人手相对日益增加的恐怖分子来说太少了。

军情五处的负责人乔纳森·埃文斯说，英国的恐怖组织正在想方设法让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参与恐怖活动，其中一些孩子年仅15岁。英国境内参与恐怖活动的嫌疑人可能多达4000人。

一些恐怖组织正在给年轻人灌输激进思想，将他们教导成极端分子，派他们去执行恐怖袭击任务。

近年来，英国当局正在监视两万多人，并在对两百多起案子跟进侦破。许多被当局怀疑为恐怖组织潜伏点的地方，都与巴基斯坦的极端主义网络有关联，因为在英国境内居住的巴基斯坦裔穆斯林约有180万

人。除了巴基斯坦，“基地”组织还在策划从索马里、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国向英国发动恐怖袭击。

英国军情六处日前获悉，“基地”恐怖组织正图谋以“乳房炸弹”发动恐怖袭击。为了防患于未然，军情六处正在其网站上发布广告，试图招募大量秘密特工组建一支特殊的“拆弹部队”。

报道称，这一令人震惊的“乳房炸弹”秘闻是军情六处最近在监控巴基斯坦和也门等聊天网站时意外发现的。参与的女性自杀式袭击者或许会先接受外科手术，把藏在胶囊内的烈性炸药植入她们的乳房内，使之成为两枚威力强劲的“乳房炸弹”！

可怕的是，无论从外形还是手感上来看，这种“乳房炸弹”都与普通隆胸所用的硅胶假体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据业内人士介绍，PETN是制造这种炸药的主要材料，只要一包8盎司（约227克）的PETN，即可轻松炸穿近13厘米的钢板装甲，对于民航客机而言，足以让机身豁开一个致命的大洞，导致机毁人亡。

最让人忧心的是，由于这种“乳房炸弹”极其隐蔽，即便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机场安检扫描仪都对其束手无策。一旦混过机场安检成功登机后，恐怖分子

即可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上用针筒将一种名为
TATP（三聚过氧丙酮）的粉末注入乳房并将“乳房炸
弹”引爆。



军情五处负责人乔纳森·埃文斯

据悉，为了将这些胸前藏有“乳房炸弹”的女恐怖分子从人群中甄别出来，英国军情六处决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旨在打击“乳房炸弹”的反恐行动。目前，军情六处正在其网站上发布广告，招募一批“美男特工”，秘密组建一支特殊的“拆弹部队”，一些特工将被秘密派往中东“基地”组织所控制的地区，渗透到恐怖组织内部，找出那些已经在胸前埋藏了“乳房炸弹”的女恐怖分子，并设法拆除或者引爆“乳房炸弹”。

军情六处在广告中称，即将招募的这些特工男女均可，但条件是他们必须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能够顺利地与那些女性恐怖分子建立密切关系，并通过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来实现任务目标。这意味着，被招募的男性特工或许像“007”电影中的情节那样，施展“美男计”来诱惑那些在胸前装有“乳房炸弹”的女恐怖分子，设法拆除或者引爆“乳房炸弹”。目前，军情六处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专门负责调查“乳房炸弹”的威胁。

英国上议院的波拉·乌丁说：“邦德的形象到应该发生变化的时候了，我们需要的形象不再是总端着马提尼酒杯的男人。”军情六处那名负责招募新人的工作人

员说：“邦德激发了人们对情报工作的兴趣，但我们实际工作中需要的并不是像邦德那样寻求刺激的人。”

“我们在执行任务时少不了打斗和冒险。能否承受这份惊险刺激的工作，取决于特工的个人素质和承受能力。对我来说，特工工作的魅力在于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你可能刚刚还在沙漠的一间帐篷里，但一转眼你就可能是在与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进行交谈。”一名女特工在节目中现身说法。

世界上除了“007”，还有一个同样厉害的英国特工曾经征服过世界，他就是被称为“憨豆特工”英国人约翰尼。环球公司可能要拍摄《憨豆特工》的续集。

2003年的《憨豆特工》讲述了英国皇室的珠宝被盗，情报局随即派出了最顶尖的特工——“天字第一号”去追查珠宝案，然而，案件未查出半点头绪，“天字第一号”就被人谋杀了。在“天字第一号”的葬礼上，英国情报局的顶级特工遭到了炸弹袭击，全部牺牲了。不久，情报局收到消息，这伙坏蛋准备打英国皇冠的主意。但是情报局的顶级特工都牺牲了，无奈之下，只好派出菜鸟特工约翰尼·英格利（绰号“特务憨豆”）。在影片中“憨豆”搞笑的身手和超低的智商大大

地讽刺了“自家兄弟”詹姆斯·邦德一把。

教官是旧中国的上海警察

关于英国特工的训练，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随着二战时期英国特工训练大纲解密，英国特工的真正面目也开始浮出水面。

英国人一向以绅士形象自居。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有许多英国人坚持说，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绅士战争，因为皇家军队从来没有像法西斯那样残酷虐待战俘和被占领区的人民。然而，随着一套已经解密的特工培训教材的出版，这种说法恐怕就要被人们忘记了。

这套曾经被视为最高机密的英国特别行动处（SOE）训练教材，于2001年7月份被解密，由英国公共档案馆于当年8月15日出版。它披露了二战时英国训练特工时如何用“卑鄙手段”进行暗杀活动和“处置”俘虏。

书中透露，那些被招募进“特别行动处”的特工，必须学习一系列破坏以及暗杀技能，其中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特工们必须学会在不幸被德国盖世太保逮

捕以及审讯的情况下求生甚至自杀的本领。

当年，位于加拿大安大略湖北部的一个小镇上的“X训练营”，就曾经把这套特工训练大纲用作教材。

当时，负责教授这些本领的是训练营的暗杀专家威廉·费贝恩少校。此人在二战前曾供职于中国旧上海的警察局，对东方的军事艺术颇有研究，对常规武器的非常规使用是他的专长。据说，以前特种兵所用的双刃匕首就是他和另外一个人发明的。除了传授基本的谍报技术外，费贝恩少校还给那些学员传授包括暗杀、格斗、擒拿、爆破、审讯、伪装、野外生存、侦察与反侦察等各种手段。

在训练徒手格斗方面，费贝恩有自己独特的训练方法。他告诉学员，不要拘泥于拳击的规则。有时候，规则规定不许击打的部位，正是格斗的最佳目标，因为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里需要防守。“你们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快地把对手解决掉。”费贝恩说。

在“搜查俘虏”这一课，学员们被告知，要尽可能先干掉俘虏。如果不方便，也务必要让他面贴地、手朝前躺下，用枪托、枪柄甚至靴子“修理”他们。费贝恩说，尽管这听起来有点儿残忍，但是，与其让他们

生不如死，还不如趁早把他们解决了。

在手枪训练上，坚持“两发子弹”原则。第一枪也许已经是致命的，但最好还是补上第二枪，因为这样才能确保对方不再醒来。

一旦被捕或者遭到审讯，特工们最严峻的考验也就来了。训练大纲告诉特工，在仅仅遭到讯问的时候，千万不要紧张。因为盖世太保并不是以情报准确而是以残忍恐怖而臭名昭著的，他们总是装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但是也仅仅是假装，否则就不需要讯问而直接逮捕了。

然而，由于人们还并不知道盖世太保到底有多残忍，教材建议在非常时刻，被捕的特工还是自杀为好。否则，一旦被逼供出机密，将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因此而被牵连。因此，特工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都随身携带一枚剧毒药片。特别行动处的教官们十分清楚，即便是最勇敢、最无私的人，在面对盖世太保的残忍时，都难免会有万一招供的可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创建现代情报机关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情报机关是随着它的海外扩

张和侵略而不断发展，跃居世界谍报活动的王冠地位。但是在战后，它的情报活动，尤其是对国外的情报工作日趋沉落。当然，在密码的破译方面，英国今天还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二战时，由于孟席斯与丘吉尔的特殊关系让军情六处风光不小，但战后的军情六处却失去了宠爱，风光不再。“007”那种出神入化的特工形象只能出现在银幕上。

所以，英国情报机构的招聘和训练，也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芒。

尾 声：著书立说，情报机构立碑树传

2009年10月，是英国情报机构成立整整100周年的日子。为了隆重庆祝一下自己的百年大典，也为了检阅这一百年来的历程，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都想到了同一个点子，那就是分别出版一本关于自己的书籍。

其实早在2002年，军情五处就在英国各大报纸和杂志上刊登一则广告，招聘历史学家为自己编写“百年史”。广告词公开称：“兹招聘可靠的历史学家一名，兼职，不求体格健壮，但求明辨是非”。希望推出一套系统、全面、客观地记录军情五处一百年历程的书，并希望这本传记能成为一本权威著作，可以作为将来历史学家进行研究和学生学习的重要材料来源。

广告还声明，这名被录用的历史学家将会用6年时

间来完成这项“宏伟工程”。届时，他将在位于伦敦中部的军情五处总部内工作，每周工作两三天，年薪大约是3万到4万英镑。

工作期间，这名历史学家享有充分的特权，可以随意调用军情五处全部的秘密档案。据估计，这些档案总数达50万份，其中包括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情五处所从事的反间谍活动，以及后来针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情报活动。他还可以根据需要，接触任何一名现任或是退休离职的特工人员。自然，他可以依照自己的见解，在书中“自由地”评述军情五处的是非功过。但是，这本书最终的编辑权完全属于军情五处。

招聘工作负责人斯蒂芬·兰德已经致信几位著名历史学家，邀请他们参与竞聘。据透露，其中包括剑桥大学的现代史教授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和诺丁汉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奥尔德里奇。安德鲁曾参与撰写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历史，当时就接触到了军情五处及相关单位，翻阅了专门从事海外情报搜集工作的军情六处的部分秘密文件。而奥尔德里奇则出版过一本关于冷战时期情报活动的书。

军情五处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据2009年10月6日有关报道说，首部披露英军情五处百年秘史的书籍已于10月5日正式出版，书名为《保卫王国：间谍和政客》，作者是克里斯托弗·安德鲁。

全书共6大部分，厚达1032页。值得一提的是，书名中“保卫王国”一词源于军情五处的警言。《保卫王国：间谍和政客》从军情五处的百年发展着眼，讲述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以及眼下反恐战争期间的对内情报秘史，披露了大量先前不为外界所知的历史细节，回顾了军情五处自1909年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从军情五处的视角，折射出近百年来英国历史的曲折起伏。

为完成这部史书，作者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教授前后翻阅了大约40万份机密文件，采访了大量军情五处的退休官员，他本人甚至因此加入军情五处。

安德鲁说，“军情五处是历史上第一个授权历史学家接触机密档案的情报机构”，如此一来，英国的情报史就不会留下空白，也不会被扭曲。

由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授权、由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历史学教授基思·杰弗里撰写的新书

《军情六处》也于2010年9月21日问世，法新社9月22日转引了书中不少真实“007”的真实生活。

杰弗里获得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授权，得以翻阅自1909年至1949年秘密情报局全部机密档案。于是，秘密情报局早年的模样在新书中一览无遗。

现实中秘密情报局特工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自由，但他们没有影片中邦德那般挥金如土的潇洒；相反，现实中特工常常捉襟见肘。现实与影片的另一个反差是，邦德总是能够在险象环生的情形中脱身，而现实中的许多特工却在行动中失去性命。

事实上，秘密情报局在创建之初不仅不神秘，而且有那么一些寒酸和落寞。

已故创始人兼第一任局长曼斯菲尔德·卡明在他的存档日记里这样描述秘密情报局新生阶段的情形：“每天走进办公室，待一整天，看不见一个人影，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不过，杰弗里在书中描述的众多特工形象，还是与“007”系列小说和影片中的“邦德”极为相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秘密情报局特工彼得·塔泽拉被空投至纳粹控制的荷兰一处海岸，他涉水登岸，

脱掉特制的橡胶外套，露出一套绅士晚礼服，进入一座海滨赌场，窃取情报。在进入赌场前，他的一名同伴特地在他身上喷洒几滴“轩尼诗”XO，以强化他所扮演的酒客形象。

杰弗里在书中写道，所谓英国特工都持有当局颁发的“杀人执照”一说只是一个传说，但秘密情报局确实有其他置人死地的行为。例如，在战后，当大批犹太难民航海偷渡至当时由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时，英国秘密情报局曾实施“困窘行动”，炸沉5艘正在航行中的犹太难民船。

书之竹帛，传之后世——是总结，是反思，还是对未来辉煌不再的聊以自慰？

真正的历史，并不是写在纸上的——尤其是那种有“绅士”之称的国土上的男人们（现在当然也包括女人们），也许更应该明白个中奥秘。

因为这样的书毕竟不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拜伦的《唐璜》或者是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极较量: 英国情报组织绝密行动 / 詹非非, 詹幼
鹏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317-2637-1

I. ①无… II. ①詹… ②詹… III. ①纪实文学—中
国—当代 ②情报机构—史料—英国 IV. ① I25
② D756.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6578 号

无极较量——英国情报组织绝密行动

作 者 / 詹非非 詹幼鹏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封面设计 /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23.5
字 数 / 270 千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5.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37-1

窃声风云——美国中央情报局 绝密行动

前 言

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有三个，分别是：国家安全局（NSA）、联邦调查局（FBI）和中央情报局（CIA）。

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是负责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安全事务有关的情报机构。它是一个神秘而又公开的情报机构，也是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中情局于1947年9月18日正式成立，至今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它的前身是二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情报局。

随着二战的结束，冷战格局的形成，中央情报局从此登上美国政治舞台。根据1947年7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之规定，中情局开始搜集情报，直接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总统汇报，并协调政府各部门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任

务。中情局从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60多年的岁月里，把世界搞得永无宁日。

当年，随着全球冷战格局的确定和激化，情报工作开始显示其重要性，于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8年6月签署了一份代号为NSC-10/2的文件，明确规定中情局可以在国外从事各种秘密行动，作为美国政府公开外交活动的补充。其“秘密行动”的方式包括策反宣传、心理战、破坏、反破坏、颠覆、暗杀、准军事行动、策动和援助叛乱等等，几乎囊括了除发动大规模正式战争以外的所有方式。

中情局是当今美国政府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它最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美国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直接或间接利用其情报的有500多个政府部门。凭借分布世界各地的三分之一的职员，它及时向行政当局提供最新情报，使美国能够在各种事务上先发制人，占尽优势。同时，它还经常奉行总统的直接命令从事一些隐蔽活动，为美国外交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极大便利。

不受法律限制的特权和广泛的情报网络使中情局神通广大，由此它也成了美国政府中透明度最差

的一个机构。它的人员和预算从不对外公开，只有总统和国务卿等极少数人了解它的行动情况。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它在行动中采取的一些非法手段和违法行径一般也不会被追究。这些特殊待遇让美国国会、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都和它有过摩擦，其中斗得最激烈的无疑是联邦调查局。作为分管国外和国内情报工作的两大机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向来看对方都不顺眼，在各种场合明争暗斗，互相扯皮掣肘的事情时有发生。埃德加·胡佛任联邦调查局局长期间，曾一度禁止手下与中央情报局接触。另外，中央情报局守口如瓶、秘而不宣的作风也不可避免地让人猜疑，怀疑世界上很多阴谋诡计都跟它有关。

中情局的局徽造型独特、醒目。在蓝色镶金边的圆形底盘中心，是一面银色的盾牌，盾牌中心是一个有16个红色尖角的罗盘图形，盾牌上面是一颗美国秃鹰的头，外圈写着“美利坚合众国中央情报局”的字样。银盾象征中央情报局是保护美国安全的一道强有力的屏障；16个尖角象征中情局的势力渗透到世界各地，各种情报资料从四处向中心汇集；

秃鹰的头则象征机警、灵敏和冷酷——这正是中情局的风格。

在中央情报局60多年的历史，充满了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其中不乏石破天惊之举——1948年，在意大利策划资助基督教民主党击败共产党，从而执政意大利；1949年，盗窃苏联米格-15型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图和飞行记录；1953年，实施“阿贾克斯行动”颠覆伊朗左翼摩萨台政府；1954年，颠覆危地马拉政府；窃取并公布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引起东欧各国的骚乱；参与组织和煽动在印尼、越南、老挝等国的秘密军事行动；在非洲策划组织50多起政变；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精准提供情报；策划“杰尼弗行动”，打捞苏联核潜艇；以准确的情报保证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的全胜；在冷战期间与苏联克格勃频频斗法，又与以色列摩萨德几度联手，策划暗杀多位外国领导人……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震惊世界的“惊人之举”，中情局的触角才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无所顾忌地伸展，才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公开的情报组织”。不过，中

情局却也为这样的自信或者说是狂妄付出了代价。多少次行动失手，计划失败；多少次违法行径曝光，成为众矢之的，让那些风光无限的局长们因此而焦头烂额、辞职下课，其中最惨的当属“伊朗门”事件，由于情报判断失误，接着谈判未遂，只好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换取人质获释；曾经背着国会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内幕被曝光更是闹得满城风雨，弄得相关要员全部被迫辞职，甚至有人因为难辞其咎而自杀，局长为此脑瘤发作，不久便黯然谢世。

“9·11”事件后，中情局更是遭遇到近年来最大的怀疑与挫折，成为举国上下指责的焦点。“斩首行动”虽然把当年的同盟者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却成了子虚乌有的谎言；从伊拉克运回美国的除了一千多具阵亡将士的尸体，还有“虐囚门”更让美国丢人现眼；当年为对付苏联入侵阿富汗，曾煞费苦心地培养了大批的“自由战士”，后来一个个都成了“恐怖分子”，阿富汗战争也成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至今也难以收场……

随着奥巴马的上台，中情局又走马换将。第十

九任局长莱昂·帕内塔已经70多岁了，且从未涉及过情报工作——但在他亲自指挥下，中情局成功击毙拉登，令人刮目相看。

中央情报局究竟是美国自由梦想的威胁，还是国家安全的卫士？在情报工作不可或缺的秘密性与公众的民主权利之间该做何种选择？这似乎是美国人从未停止思考和争论的话题。

第一章 独立战争，华盛顿首创“诺尔顿”

乔治·华盛顿亲手创造的情报机构“诺尔顿”开创了美国情报史之先河，他用于情报收集的经费大约占有所有军费开支的30%；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间谍内森·黑尔虽然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的雕像却永久地伫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罗斯福经历了美国情报史上最混乱的时代，情报协调局的成立让他扭转乾坤。

“诺尔顿”开创美国情报史

美国人的情报事业并不是从中央情报局开始的，在中情局成立之前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路程。

有人说乔治·华盛顿不仅是美国的开国元首，而且还是美国当之无愧的“情报之父”——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时代，他就亲手创造了情报机构“诺尔顿”，从此开创了美国情报史之先河。

1775年4月，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乔治·华盛顿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在当此重任之前，华盛顿曾干过情报工作，所以他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于是上任后他很快就着手创建了一套美国人自己的情报体系。

1776年，华盛顿组建了一支专门用于执行侦察和突击任务的部队——“诺尔顿”突击队。这是美国最早的军事情报部队，也是美国最早的特种部队。所以，今天美国陆军的突击队、特种部队和“三角洲”部队都将当年的这支“诺尔顿”突击队视为他们的前身。

当年在英国军团的猛烈攻击下，华盛顿的大陆军团被迫退出长岛地区。为了解英军的军事力量和部署情况，“诺尔顿”派出突击队员内森·黑尔去英国占领区打探情况。内森·黑尔是“诺尔顿”突击队一名年轻的上尉，毕业于耶鲁大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内森·黑尔应该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间谍。

黑尔强壮、勇敢，充满着爱国热忱，但是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经过任何专门的间谍培训。因此一潜入敌后，他就被英军一个经验丰富的反间谍人员罗伯特·罗杰斯给盯上了。罗伯特·罗杰斯是英军的一位少校，当时他假扮成是大陆军团的间谍，结果欺骗了黑尔。黑尔不但相信眼前的人是“自己人”，而且还毫无戒备地将自己此行的任务和目的和盘托出。

就这样，黑尔被捕了，随即被判绞刑。英军为了恐吓大陆军，将黑尔的尸体悬挂在绞刑架上长达三天之久。黑尔在临刑前，留下了一句至今仍广为传诵的名言：“唯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祖国。”

这句名言如今被刻在与真人同样大小的黑尔雕像上，永久地伫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总部，以纪念他的爱国热情。

黑尔牺牲后，华盛顿吸取了他的教训，加大了对情报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接着，他又委派康涅狄格北美第二轻骑兵团的本杰明·塔尔梅奇少校负责组建了一支海军谍报机构，其中的“考尔帕”谍报小组是当时众多的谍报体系中最优秀的间谍小组之一，它有20

多名成员，领导人就是本杰明·塔尔梅奇少校。他是华盛顿最为得力的谍报干将之一。

华盛顿从军费中拨出了一大笔钱用于情报活动。有官方记录表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华盛顿光在费城为开展谍报工作就花销了6170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用于情报搜集的经费大约占有所有军费开支的30%。在当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华盛顿的这一做法不可能不引起争议和不解，但他以坚定的决心、巨大的魄力和崇高的个人威望将这项事业坚持了下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重金花费是有丰厚回报的。

华盛顿认为，要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海军，就必须建立起正规的海军谍报机构。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塔尔梅奇少校迅速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间谍组织，派遣多名军官潜入北美各重要地区，谨慎地建立起情报网络，逐步扩大规模，同时还招募、培训了很多能单独行动的优秀间谍人员。

不久，华盛顿的苦心经营渐见成效，他手下的一群得力干将在英军的各个驻地内外都安插了大量的间谍。在英国人控制的一些重要城镇里，他的间谍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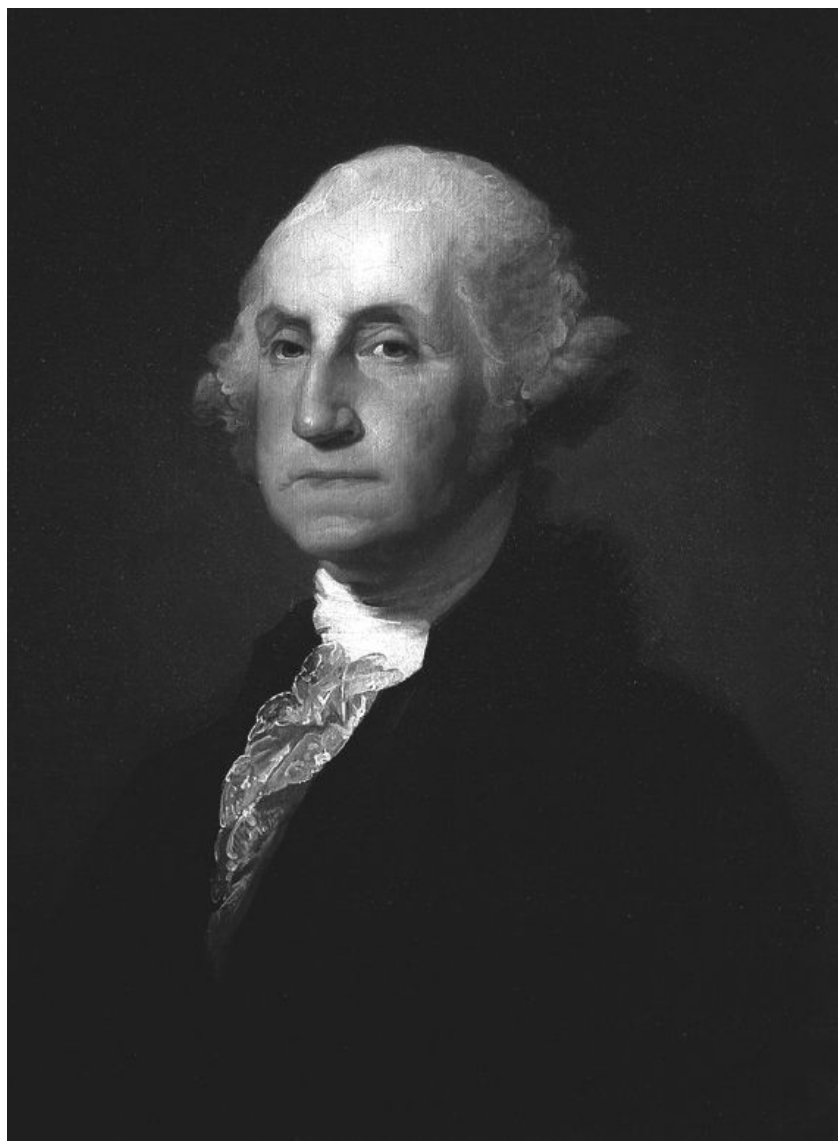
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从贵夫人到平民甚至是乞丐，几乎是无处不在。

在费城，有一位端庄娴雅的贵夫人定期举行各种沙龙和宴会，衣香鬓影，名流云集，很多英军高级指挥官都是她的座上宾。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位热情、美丽的女主人竟然是华盛顿手下的一位情报高手。这样的间谍网一经建立，其作用可想而知，所以华盛顿每天都能接到有关各地英军调动情况的汇报。在关键时刻，那些神通广大的间谍们甚至还能搞到敌军指挥官的作战计划。

1780年7月的一天，在哈得逊河畔的秘密据点里，塔尔梅奇少校收到一位代号叫“夫人”的谍报员的紧急报告，报告说英军主将亨利·克林顿爵士计划派一支军队走海路，攻击纽约罗德岛的法国军队。这支由罗香波将军率领的法国部队是前来支援美国人的独立革命的，历经两个月的海上航行，刚刚上岸进行休整。狡猾的英国人打算在法国人立足未稳之前就把他们都消灭。

华盛顿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将计就计，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一名当地农场主咋咋呼呼地跑到英军哨

所，说在附近的路上发现了一些文件，上面透露了可怕的革命者的进攻计划；同时，华盛顿又派出一支大陆军的队伍，假装大摇大摆地向纽约推进。多疑的英军主将克林顿信以为真，立即下令部队从海上撤回增援纽约。这份宝贵的情报挽救了由罗香波将军指挥的这支法国军队，正是这支军队，在1781年10月9日约克敦围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迫使英军主将康华利投降。



乔治·华盛顿

“亲英奸商”霍尼曼

华盛顿的手下还有一类特殊的间谍，他们经常是单独行动，执行秘密任务，不与其他人发生联系，知道其身份和活动的只有很少的一些人，有的甚至是由华盛顿一个人直接领导。这类间谍一般都有特殊的社会身份和职业做掩护，神通广大，往往能提供很多有价值的情报。人们广为传诵的“华盛顿圣诞夜渡河袭击敌营”的传奇，就是在这样一个出色的间谍帮助下实现的。

这个间谍名叫约翰·霍尼曼。

约翰·霍尼曼战前是一个做纺织品生意的商人，因为同情独立战争而愿意为华盛顿效力。1776年，他奉华盛顿的命令，去新泽西的新不伦纽克搜集情报。在那里，他成为一名专做牛肉生意的商人。他装成很有钱的样子，而且宣称自己忠于英国。有一次因为这个原因，他差点儿被那些“叛变的暴徒”抓捕。于是霍尼曼很快就成了当地知名的“亲英派”商人，他的生意做得很顺当，并且与特伦顿地区的英国驻军和黑森雇佣军（系英国从普鲁士征召的雇佣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的慷慨、友好和“对大不列颠的忠诚”，使他能够有条件和一些英军高级指挥官攀上交情。

1776年12月22日，华盛顿司令下令逮捕“亲英奸商”霍尼曼。

然而没过几天，霍尼曼就奇迹般地从大陆军的军营里“死里逃生”，逃回了新不伦纽克。此时，华盛顿已知道，特伦顿地区的英军已被派往纽约，只留下黑森雇佣军驻守。指挥官鲁尔上校狂妄自大，他的部队也嗜酒成性，疏于防备，没有修筑任何防御工事。逃回去的霍尼曼就向鲁尔上校报告说，大陆军都待在冬季的兵营里，没有任何行动的迹象。那些士兵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更加放心地昼夜狂欢。结果就在圣诞节的夜晚，华盛顿指挥军队悄悄渡过特拉华河。正陶醉在圣诞节欢乐中的黑森雇佣兵们被打得措手不及，只好束手就擒。

特伦顿之役规模不大，但这个胜利是在战争初期大陆军屡遭挫败，士气最为低落的关键时刻取得的，因而意义重大。显然，那个“亲英奸商”霍尼曼在其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此，谍报工作在华盛顿的眼里就显得更加意义非常了。

值得一提的是，华盛顿手下还有一位代号为“355”的女间谍。这个女人善于伪装，行踪诡秘，机

智大胆，颇得华盛顿的赏识，甚至被称为“完美的间谍”。作为一名间谍，她的成绩的确堪称出色。她曾揭开了美军叛变将领本尼狄克特·阿诺德的真面目，后者企图以2万英镑的价格将西点要塞出卖给英军；同时，她还单枪匹马擒获了英军情报首脑约翰·安德烈少校，使得英军的情报网几乎陷于瘫痪。美国人能够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她功不可没。由于她是受华盛顿亲自指挥，所以那个“355”的真实名姓至今仍然没有人知道。但是在后人的心目中，她是一位拯救美国的英雄，也是美国后来优秀女间谍崇拜的偶像。

反间谍高手

华盛顿时代除了有一批优秀的间谍之外，还有一批反间谍的高手。后来成为美国联邦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的约翰·杰伊就是其中之一。

1776年夏，纽约地区的托利党人（亲英的保皇派）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破坏纽约城的防御设施和军事建筑，迎接英国占领军的到来。在英国总督和纽约市长的大力支持和资助下，他们有恃无恐、气焰嚣张，甚至设法策反了华盛顿的卫兵。幸运的是，这个

阴谋很及时地被察觉到。在杰伊的主持下，革命党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调查这一阴谋。杰伊四处布满眼线，从嫌疑最大的人着手，绝不轻易打草惊蛇，一个个顺藤摸瓜，最终将阴谋分子一网打尽，华盛顿的卫兵托马斯·希克伊因涉案被处决。那位英国总督一直逃到纽约港的英舰上，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杰伊辖下的“纽约调查委员会”专管反情报事务，搜捕英国间谍、亲英派托利党人、阴谋和破坏分子。这是一件让人头疼的差事。在战争初期，支持独立的北美人士并不是很多，英军的节节胜利使一些本来同情和中立的人也对革命失去了信心，英国人乘机以土地和金钱为诱饵，招募了大量的亲英分子刺探情报，其中有不少是颇有影响的社会名流和富商。同时，由于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和缺乏管理，起义军最初的反间谍活动也是一片混乱，该抓的不抓，不该抓的乱抓，还有人乘机公报私仇。

正是杰伊改变了这种现状。他不断使人们明白反间谍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对下属的组织和管理，同时还培养了相当数量的精干的反情报特工。一个叫科劳斯比的特工就是杰伊手下最为成功的反情报人员之

一。他的故事至今还在哈得逊河流域流传。很多人相信，著名作家詹姆斯·F. 库伯的小说《间谍》主人公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科劳斯比原来是个鞋匠。战争爆发后，他采用多个化名，混进了不同的托利党组织，搜集他们的活动情报并及时向杰伊汇报。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以不同的身份出现，他使用的化名之多，有时连杰伊都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科劳斯比最大的本事就是，总能在自己参加的组织被围捕时设法逃脱，除了杰伊等少数高级反间谍官员，不明真相的革命者完全可能将他误作托利党人逮捕和击毙。更麻烦的是，哈得逊河地区如此狭小，居民住得密集，几次大难不死的科劳斯比到处窜来窜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很多人对他的面容都熟悉。这让他不得不减少用化名的次数，并且为其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躲避革命党人的追捕”。

1777年10月，他去哈得逊河北岸的马尔伯罗执行任务，装成一个被革命党人追捕和迫害的亲英派人士，在一个小酒馆里“不经意”地透露自己在纽约城等地搞破坏的经历，并“惊喜”地结交在这里“偶然”结识的托利党“朋友”。这个酒馆本来就是亲英分子经常聚会

的地方，这位极端“崇拜和忠诚”的“史密斯”先生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顺利地混入了一支由英国人指挥的、由当地托利党人组成的武装部队。

有一天，科劳斯比得知，部队将在第二天晚上突袭革命军，便以“史密斯”的名义巧妙地把这个情报发给了杰伊。革命军的一支突击队早早埋伏好，把前来进攻的托利党人打得无还手之力。科劳斯比本来准备偷偷躲进一堆干草垛，事后再爬出来，假装又一次“死里逃生”。但突击队员用明晃晃的刺刀对着他，他不得不举起双手以示投降。执行任务的突击队长并不知道科劳斯比的真实身份，科劳斯比也绝不能告诉他。于是他与所有的“同党”一起，都被押回了杰伊的住处。这一下科劳斯比就满怀希望了。可是杰伊恰好在这个时候外出了，他的战友在外面拿着枪商量如何处置他们这些“敌人”。

万幸的是，杰伊的女仆认出了科劳斯比。聪明又好心的女仆想法让那些看守科劳斯比的卫兵去喝白兰地，于是巧妙地放走了科劳斯比。这次可是惊心动魄的冒险。“史密斯”先生死里逃生的消息传遍了托利党分子社团，“勇敢而机智”的他很快又加入了新的托利

党组织，同时收获的还有信任和钦佩。

与杰伊同时堪称华盛顿左膀右臂的是一位世界级著名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位发明避雷针的北美绅士，除了是世界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还是华盛顿手下最有影响的间谍——只不过他的威力主要发挥在外交和社会活动场合。

伪造了一张完整的波士顿报纸

1776年，富兰克林成为北美革命者驻巴黎的半正式外交公使，他的主要任务是设法与法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英国。富兰克林学识渊博、多才多艺、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诙谐幽默，处处表现得诚实无私、谦虚友好，颇得法国人的好感。他所表现出来的北美人的形象与法国人心中傲慢浅薄的英国人形成鲜明反差。法国政要和巴黎民众都很喜欢他，对他所代表的北美革命也充满同情和支持。这种良好的公众形象和不错的私人交情，为富兰克林的间谍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制造宣传和舆论攻势是富兰克林的拿手好戏。他不断地制造假消息，揭露英国政界和军队的种种黑

幕，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散播出去。而他本人的正直品格使得这些消息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结果让英国的形象在法国甚至在整个欧洲越来越糟糕。

1777年的一天，在北美殖民地作战的普鲁士雇佣军内部，忽然莫名其妙地流传出一封信，据说是普鲁士王储写给他在英军服役的雇佣军将领的，这封信很快也流传到欧洲大陆。王储在信中说，他怀疑英国人为了减少补偿金，故意瞒报雇佣军阵亡人数，他还建议雇佣军指挥官不要救治伤员，因为伤员都是“残废”，毫无用处，而英国人付给阵亡者的钱比伤员多得多。这封信件在雇佣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愤怒，一时逃兵数量激增。欧洲各界对英国将那些士兵生命当做商品出卖的做法抗议如潮，英国外交部和军部一时疲于应付。



富兰克林画像

自然，这封信的作者正是富兰克林。

1782年，富兰克林又精心炮制了另一杰作。

这次，他伪造了一份整版的波士顿报纸。在这份报纸上，分类广告、地方新闻和花边逸事样样齐全。其中有则新闻报道称，英国派驻加拿大的皇家总督正在向其印第安盟友悬赏收买北美殖民地人的头皮。报道强调说，许多印第安人卖给总督的头皮实际上都是妇女和儿童的。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在英国国内和欧洲各地激起轩然大波，抗议浪潮不断，反对派辉格

党人强烈要求政府澄清事实，并尽快结束战争。英国政府这次真是被弄得焦头烂额，窝火得很。

有趣的是，富兰克林甚至曾经一度当上“海盗”的头子。当年在北美独立战争中，有相当数量的革命者驾驶着武装船只，在海上四处拦截英国的商船，富兰克林就负责在欧洲各国港口协调这些私掠船活动。他有序地安排出击计划，还组织一批专门的港口工人，负责对这些私掠船提供补给、维修和销赃。法国政府对这些“海盗”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还同意购买从英国人那里抢来的“赃物”。销赃得来的资金则被富兰克林用来购买军火和军舰。富兰克林的“海盗”活动给英国带来不少麻烦。由于商船经常受到袭击，英国海外贸易利润也跟着急剧下降。英国公众怨声载道。罪魁祸首是谁，英国政府心里有数，他们多次愤怒地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但终因没有证据，加上法国政府的偏袒而作罢。

1799年，乔治·华盛顿在他种满葡萄藤和无花果树的庄园里平静地与世长辞。作为美国的开国元勋，他对美国情报事业的创立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和影响，美国情报界也一直将他视为祖师爷。中央情报

局特意将兰利总部联络会议中心的一间会议室，专门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国父”和这位伟大的“间谍之父”。

黑奴间谍詹姆斯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1787年美国宪法因为南北妥协而承认了奴隶制的合法性，但是一个黑奴间谍却因为他的机智与忠诚而成为美国间谍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就是当时的黑奴詹姆斯。

1781年夏，北美独立战争的焦点集中到了弗吉尼亚。英军将领康华利（就是后来向华盛顿交出佩剑投降的那个将军）率领7000英军驻扎在约克敦。美军在法国人拉法夷特的指挥下与之对峙。当时，英军主力集中在纽约，该部与康华利的联系主要依靠水路。华盛顿判断，只有打掉约克敦的康华利，战争才会以胜利告终。要想战胜康华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切断两地英军的联系。这个任务将由法军增援舰队完成。此时此刻，美军急需在康华利身边安插一个可靠的眼线，密切监视英军的一举一动。

一个名叫詹姆斯的黑奴听说这个消息后，主动向

他的主人毛遂自荐，要求承担这个任务。詹姆斯忠诚可靠、聪明异常，随机应变和即兴表演更是他的特长。于是，拉法夷特决定招募他为美军间谍。

不久，詹姆斯以“老实肯干”的劳工身份顺利打入英军营地，赢得英军赏识的詹姆斯被指定负责搜罗食物。这个任务也方便了他来往于两军营地之间。由于其“出色表现”，詹姆斯很快引起了康华利的注意并取得了他的信任。康华利决定招募詹姆斯充当英军间谍。于是詹姆斯就经常奉命潜入美军营地“刺探情报”。当然，他真正的工作是将在康华利身边刺探到的内幕情报通报给拉法夷特。拉法夷特在给华盛顿的信中多次赞扬了这个“聪明的家伙”。

另一方面，詹姆斯也向他的另一个英国“主人”康华利提供了不少“有用的信息”，在这些所谓情报的误导下，康华利决定就地按兵不动。结果在1781年8月30日，法军增援舰队及时赶到，9月5日至9日，猝不及防的英军舰队被击败。约克敦守军被彻底包围。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华盛顿预言的战争胜利。

1781年10月19日，按照当时的风俗，胜方指挥官拉法夷特前往英军营地作礼节性拜访。康华利也作了

回访。令后者深感吃惊的是，在美军营地前来迎接他的人中，竟然包括他最信任的那名黑奴詹姆斯。

1782年11月30日，交战双方签订《巴黎和约》，美国独立，但詹姆斯本人却仍然是个黑奴。1784年，拉法夷特重访美国时找到了这个间谍朋友。在他的活动下，詹姆斯于1787年元旦正式成为自由民。为表示感激，詹姆斯改姓拉法夷特。詹姆斯于1830年8月9日在他的农场去世。为表彰詹姆斯的功绩，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瓦伦丁博物馆至今仍然陈列着他的画像。

多诺万的情报协调局

美国的谍报工作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在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的一百多年里，美国的间谍组织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其情报工作的效率也不高，根本不能提供长远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即使是常规的战术情报处理也反应迟钝。原因就是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周围都是一些小国家。拉丁美洲的那些小国家无法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当时的美国政府就认为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花工夫，从而导致了情报工作的忽视。

这时，美国就回归到了“孤立主义”时代。主要的安全目标收缩为两个：一是捍卫本土和附属殖民地的安全，二是不允许别的势力插手西半球事务。部队大幅度裁减，情报机构更是首当其冲。所有违法的特工业务被下令取消，还关闭了专门从事密码破译的“黑室”——这个“黑室”在当年曾破译过好几十个国家的45000多个密码信号，手段高超无比。

从此，美国的情报机构一直处于混乱状态。联邦调查局专门负责国内的情报工作，国家情报活动则由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等部门分管。各个机构各自为政，负责的领域界限不分，有的大量重复，有的根本没有人去研究，情报搜集和分析不成体系，人员素质普遍低下。不仅不能提交高质量的情报，机构之间还经常为经费分拨不公或一些越俎代庖的事而争吵内讧。

美国谍报工作的这种混乱现状，让许多国外特工有机可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量的德国和日本间谍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到美国疯狂地进行间谍活动，大肆收集情报。美国政府很多机密都缺乏必要的保密和控制手段，那些间谍要搞到它们简直是易如反

掌。有一次，一个德国间谍要搞一份美国某个海岸炮兵部队与近海舰队联络的通信密码，他就找到一个从这个炮兵部队里退伍不久的士兵，结果只花了30美元就买到手。更有甚者，连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秘密通信电文，德国人也能大擦大擦地搞到手。

当时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美国人对情报工作的忽视。有一家意大利媒体披露日本已经建成了两艘超级战舰，而美国政府竟然对此一无所知。后来海军部的一个军官奉命去调查，要求日方给予答复，但是日本有关部门却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他们说“对意大利的报道不作任何评论”。美国政府听说后，竟然就不再进行调查。这几件事简直让美国情报界丢尽了脸面。一名高级海军将领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国家完全缺乏一个像样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

直到1932年，美国传奇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变。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第32任总统。他在1932年上台之后，又于1936、1940和1944年的大选中，连续三次当选，直到1945年4月去世，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蝉联四届的总统。罗斯福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形势大

动荡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9年9月爆发，到1945年9月正式结束，罗斯福经历了整个二战的全过程。

罗斯福上台后，对美国情报机构的现状非常不满意。他除了要经常不停地协调各情报机构之间的纷争之外，还在构想建立一个真正的情报机构。1938年末，为加强反情报工作，罗斯福给美国联邦调查局专门拨款30万美元，这让其他情报机构很不服气。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乘机拟出一项规划，要求与陆军和海军情报部不定期交换情报，但是这两家情报机构就是不买他的账。同时，国务院、财政部等其他非军事情报机构也不愿意削弱自己的情报职能，觉得联邦调查局太过嚣张。结果美国情报界一时吵得不可开交。老奸巨猾的胡佛找了个机会，把这一堆烂摊子又推回给了白宫。

罗斯福总统觉得事情有些棘手。因为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处于一触即发之势，希特勒已经占领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德、意、日三国都已开始动手，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而国内的这些情报部门不但交不出他想要的东西，竟然还为争夺控制权吵个没

完。因此，1939年，罗斯福总统发布了一道秘密指示，将全部谍报工作、反谍报工作和对敌破坏工作统统交给联邦调查局和陆、海军情报部。同时，他还授权联邦调查局在拉丁美洲针对轴心国间谍开展反情报和安全工作。

随着德国军队闪电般的进攻，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一路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后又与英国隔海对峙。罗斯福心急如焚，他开始着手支持被围困的英国。可是情报机构长期效率低下，国务院又思想僵化，爱和他唱对台戏，他对这些固定的情报渠道实在不放心，于是开始重用私人情报网。他决定跳开政府的规定，直接挑选和使用一些对他极为忠实和可靠的人，要这些人直接对他本人负责。这些人中间有外交官、军方人士、记者、作家、社会名流，还有一些是他的私人朋友。后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山始祖的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就是其中之一。

在美国情报史上，威廉·约瑟夫·多诺万的确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多诺万是罗斯福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学，两个人骨子里都是强硬派，看问题总要发表意

见，经常因为意见不合发生争吵。在外人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闹别扭，其实两个人私下里关系很不错。多诺万强壮、勇敢、意志坚决，一上战场就极其兴奋活跃。一战时期，他曾随陆军上将潘兴出征墨西哥。那时部队天天长途行军，士兵们怨声载道，而永远精力充沛的多诺万上尉就冲他们吼道：“看我，我都没有倒下去，也没有喘气，你们为什么就吃不消！”有人在队伍后面悄声地说：“我们可不像你，野蛮的比尔。”

从此，这个外号就慢慢传开去。不料，多诺万知道后反而很高兴，公然以“野蛮的比尔”自居。到战争结束时，“野蛮的比尔”已晋升为上校，成为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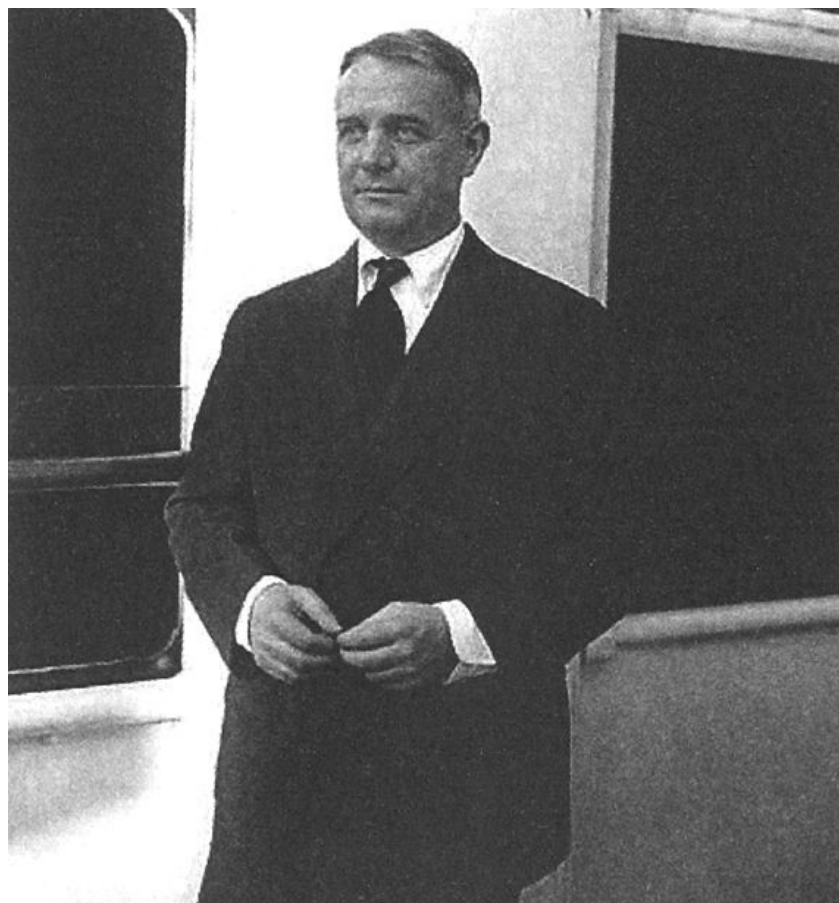
多诺万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佬，他的性格极其豪爽，社交广泛、精力充沛、才华出众、富有进取精神，是一个集浪漫主义、机智头脑和敏锐思维于一身的情报天才。他对政治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忠实于朋友，善于建立并培养密切的人际关系。退役后的多诺万曾想走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是他的运气不好，连续几次竞选州长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多诺万与好几届总统的私交都不错，在政府和国会中都有

着良好的人脉。

1924年，多诺万由加尔文·柯立芝总统任命，担任美国司法部长助理，后又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他与美国第31届总统赫伯特·胡佛也是好朋友，曾担任过胡佛的政治顾问和讲稿撰写人，并在胡佛参加总统竞选时做过其竞选班子总管。后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此时是他的下属。好友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后，多诺万以为自己会被任命为司法部部长，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如意，只好拍拍屁股走人。后来，白宫又曾邀请他担任海军部副部长，他觉得没劲，便不客气地拒绝了，在华尔街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

多诺万在华尔街开办律师事务所时，轻而易举地使很多下属都对他忠心耿耿。律师事务所的生意一直蒸蒸日上，他很快发了大财。到193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时，多诺万已经是百万富翁了。由于他同罗斯福是同班同学，尽管多次强烈反对罗斯福推行的新政，但这并不影响他和罗斯福的私交。他们俩都是在纽约州出生并长大，都是一样的生性乐观，精力充沛，相信勇气能够创造奇迹；而且又都崇尚美国

的民主和自由，并希望把这一信念传播到全世界。



“美国中央情报局之父”威廉·多诺万

于是从1936年开始，多诺万就把律师事务所交给合伙人管理，开始为自己的老同学罗斯福工作。当时他跑到欧洲各个战场上去巡视，目睹了德国在欧洲气势汹汹的进攻。他分析了轴心国的活动态势和走向，并考察了英、法等国的抵抗运动。后来他又多次赴欧

洲考察，足迹遍历欧洲大陆，实际上是担负着罗斯福赋予的情报搜集任务。多诺万先后访问了英国、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埃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等国。

1940年7月，多诺万接到邀请，来到罗斯福的椭圆形办公室谈谈他对国家形势和英国的看法。他的听众有四个人：总统、国务卿、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多诺万情绪高昂，滔滔不绝，再三强调美国要做好战争准备，并及时给予英国必要的援助，以对抗德国纳粹的进攻。另外，他还极力主张美国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对外情报机构”。这和罗斯福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此时，华盛顿刚刚收到了两份内容完全相反的情报：驻英大使肯尼迪悲观地认为英国抵抗不了多久就会投降，而使馆其他人员则坚持认为英国的抵抗运动一定能坚持下去。为切实了解英国的实际情况，密谈结束后，罗斯福就委派多诺万去英国，考察其士气和抗击纳粹的实力，同时还了解它的情报工作和反谍经验。

1940年12月，多诺万来到英国，受到最为隆重的欢迎。丘吉尔首相和乔治六世国王接见了。丘吉尔反复向他强调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希望能与美国保持

情报合作，并建议由美国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情报机构。战事日益吃紧的英国一直拼命谋求美国参战，并与美方就交换秘密情报开展了初步合作。英方希望保持这种情报合作的稳定性，也希望情报上的合作能促使美国进一步看清事态，及早参战，因此一直竭力想说服罗斯福，由美国建立一个协调性的统一情报机构。所以英国人把多诺万的来访看成是一次重要的机会。

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孟席斯亲自陪同多诺万全程访问，并向他保证，他能见到他想见的任何人，能了解他想要了解的任何情况；同时，如果美国决定建立统一的情报机构，英国情报机构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在孟席斯的陪同下，多诺万看到了英国为抵抗纳粹而做好的各项准备，看到了英国人最新发明的秘密武器，还了解到英国情报工作的经验、训练方法和一些基本战术。

在考察过程中，多诺万了解并认识到了现代情报工作的发展，深刻地感受到了情报工作对一个国家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在全面战争的环境中建立强大的情报体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初步形成了他在美国

建立现代情报体系的基本思路。

多诺万从英国回来后写了一大堆分析报告，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美国要尽早做好全面的战争准备。他乐观的报告坚定了罗斯福放弃中立、援助英国的决心。同时，多诺万再次向总统提议，仿效英国的方法，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国外情报工作，搜集敌情，并为总统提供分析意见。他指出，美国面临着危险的国际形势，非常需要战略情报，即关于各国能力和意图的基本情报。他建议罗斯福马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情报机构。

罗斯福对多诺万的这一提议有点动心，但是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一致反对，他们担心多诺万的机构会侵越自己的权限，都拒绝与这个“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人共事。但是多诺万却不管这些，他依然不屈不挠地找罗斯福总统。多诺万还选了一大批青年特工去英国接受专门的训练。因为他同英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斯蒂芬森的关系非同一般。

威廉·斯蒂芬森有“小比尔”之称，当时曾在加拿大和英国开设了6处大型秘密训练基地“X训练营”，专门培训特工人员。他不但为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培养了

2000多名杰出的特工人员，还为美国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培养了5名局长。

刚接触秘密情报行动的美国青年对这一行还显得很陌生，但都充满热情，认真好学，这和英国情报界的那帮老油子形成鲜明对比。斯蒂芬森借着与白宫的特殊交情，也在不断地为多诺万说话，希望总统能接受他的建议。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开战。形势的严峻程度大大超出了罗斯福的预料，也超出了美国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的预料。这时罗斯福才批准了多诺万的建议，成立了情报协调局，开展战时的情报协调工作。多诺万从此也开始了他心仪已久的谍报事业。

1941年7月，多诺万从预算局要来45万美元的拨款，在白宫附近几间破旧的大楼里开始工作，从事敌对国家的战略情报研究，搜集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供总统决策参考。此外，多诺万还运用灵活的社交手腕，招徕了一大帮精英分子。这里面有知名学者、著名诗人、银行家、电影导演、剧作家等等，他们全都是显赫人物，个个精明强干，神通广

大。几个月以后，情报协调局的工作人员由最初的几十人猛增到600多人，在华盛顿和纽约的许多地方都设有办事处。但是多诺万还是不满意，他要把情报协调局的规模再扩大一倍。于是多诺万完全不管有关的行政规定，大肆招揽各种身份的人才，不管是鸡鸣狗盗之徒还是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行。他要通过正规的训练，把这些“有潜力的人”训练成一流的谍报人员。多诺万开设了许多秘密的培训机构，聘请了许多英国的情报专家担任教师，教给情报协调局特别行动处的谍报人员各种隐蔽行动技能，包括制图、暗杀、爆破和格斗等等。

当时他把情报协调局的工作分成公开和隐蔽两个部分。公开活动主要是由学者们对情报进行专门的分析和研究，隐蔽工作主要是指在敌后从事破坏和颠覆活动。情报协调局由5个专业机构组成，其中包括秘密情报处，从事谍报工作；特别行动处，从事破坏与颠覆活动；反情报处，从事防谍工作；心战行动处，制造和传播黑色宣传；作训处，训练打入敌占区的游击分队。另外，还有财务管理、通信联系、人员招聘等后勤部门。

此外，情报协调局下面还有一个秘密的重要部门，它就是研究开发处，主要是由一些发明家和科学家组成，负责开发各种情报工具，伪造各类身份证件，研制专供特工使用的特别武器。他们发明了许多暗杀时使用的无声手枪和精巧的爆炸装置。当时他们研制了一种叫做“凯西·琼斯”的精巧装置，专门用来破坏铁路。它用磁铁吸在火车头和电眼的下部，等到火车进入隧道后才发生爆炸，这样造成的损失就更大。

情报协调局的发展很快，工作也很有成效，多诺万源源不断地为罗斯福总统提供各种各样的情报，总统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但是，在多诺万的设计中，情报协调局的功能还不完全是这些，它完全可以覆盖美国的整个谍报事业，统一全国的情报渠道。但是罗斯福多疑的性格，使他不相信任何一家机构或某个人提供的情报。所以当时在美国至少有十多条情报渠道在运转，在向他提供情报。同时美国的陆、海军情报部和联邦调查局都担心情报协调局的过分扩大会危及到自己的利益，因此对它十分排斥，拒绝提供一些秘密情报。在很多的时候，它们是在给多诺万帮倒忙，处处给他掣肘。

所以，美国情报协调局的成立，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改变美国情报部门以前的那种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而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一场历史性的悲剧发生。

“珍珠港事件”催生了美国战略情报局

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多诺万正在波洛运动场看一场足球比赛，比赛眼看到了关键的时刻，赛场外的高音大喇叭突然响了起来：“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威廉·多诺万上校，请给华盛顿19号话务员打电话！”

华盛顿的“19号话务员”是白宫的一条紧急电话线路。多诺万一听，立刻就知道是出大事了。电话接通后，总统的秘书告诉他，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美军珍珠港基地遭到毁灭性打击，总统要他立即赶回华盛顿。

12月7日深夜，多诺万被叫进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只见罗斯福阴沉着脸坐在那里，房间里的气氛很是尴尬。突然，罗斯福狠狠地敲起了桌子，开始大发雷霆：“他们像猎人打野鸭一样在打我们的军舰！打鸭子！你知道吗，比尔？”

罗斯福挥舞着手臂，激动而愤怒。

直到这时，也就是多诺万赶到总统办公室后，他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海军的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然袭击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基地，使其驻扎在基地的8艘战列舰中有4艘被击沉，1艘搁浅，其余都受重创；6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被击伤；188架飞机被击毁，并且造成了数千官兵伤亡。

“这帮浑蛋！”多诺万听到事件的真相后，愤怒地骂了出来。他早就向陆、海军情报部索要过有关日本军事动向的材料，那帮浑蛋就是不给提供。虽然情报协调局的职责之一就是“协调各情报机构”，但是在很多的时候，多诺万根本就拿不到最及时、最核心的秘密情报；而陆、海军情报部自己向总统呈交的则是些基本的原始材料，不是整体的分析成果，这让美国的情报系统永远都存在一种先天的缺陷。情报协调局、联邦调查局和陆、海军情报部三大情报机构乱成一团，都忙着自已搜集情报，却没有人在意多诺万所索要的情报。

“珍珠港事件”在整个美国社会引起巨大的震惊。

为什么没有任何警报？那么多情报机构都在干什么？谁应该为这一国家的悲剧负责任？一连串的质疑和指责铺天盖地。

多诺万也有理由发火。因为在他看来，珍珠港的悲剧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种种资料表明，从1941年初开始，美国的军方情报机构曾通过不同的渠道多次获得关于日军可能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但是，这些情报要么因为某种原因被搁置起来，要么被认为不重要而被忽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位情报官埃德温·莱顿在此之前就发现了日军的航母动向异常，多次警告在远东和珍珠港可能会发生战斗。但是他却因此被作战部的那些高官视为是庸人自扰，是一个“酷爱散布星期六危机”的家伙。与此同时，当时中国国民党的谍报人员通过破译日本人的电报，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并且及时通报给了美国的情报机构，但是同样没有引起重视。



无论如何，就像一位军方高官所说：“情报部门对‘珍珠港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陆军和海军情报部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被骂得抬不起头来。

在愤怒和耻辱感中，任何荒唐滑稽的方案都可能出笼——

头脑同样发热的多诺万当时就怂恿总统派遣剩余的太平洋舰队的一半兵力和一万多名突击队员——美国其实没有这样的突击队员——去攻打日本北海道。还有人建议美国轰炸日本火山，把日本埋在岩浆和灰烬中。情报协调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情报，说日本人极端害怕蝙蝠，就提出向日本空投蝙蝠，以扰乱人心。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罗斯福总统居然认真考虑并采纳了这个计划——美军不辞劳苦地捕获了数万只

大蝙蝠，在它们身上绑上一种特殊微型炸弹，以便让它们在降落后引起爆炸和火灾，造成更大的恐慌。后来美军出动了多架轰炸机把这些蝙蝠空投到日本境内，结果大部分蝙蝠还没落地就在高空冻死或摔死，没死的也是奄奄一息——而日本人根本就不怕这个！

总之，这样荒诞的怪事，竟然发生在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也算得上是千古奇谈了。

“珍珠港事件”之后，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多诺万加大了情报协调局的活动范围和力度。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像他的老朋友斯蒂芬森，也就是那个著名的英国间谍头目一样，定期派人到西班牙驻华盛顿大使馆进行秘密搜查，偷拍轴心国的佛朗哥政府的密码本和重要文件，以协助英国破获德国的“哑谜”密码机。但是多诺万的这一秘密举动却令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大为光火，因为这是他应该管的事。胡佛一气之下，在情报协调局的密探再次潜入西班牙大使馆时，出动车辆，打开明亮的信号灯，并且高放警报信号，最后把惊慌失措的密探给逮回去了。胡佛的做法让多诺万气得浑身发抖，他和胡佛一直吵到罗斯福面前。但是总统出于自己的考虑，并没有训斥胡佛，反而是下令把

这项任务转交给联邦调查局去执行。

为了改善美国当时情报部门的混乱局面，到了1942年初，罗斯福曾一度想解散情报协调局，将其各个机构分配到其他情报部门中去。多诺万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又气又急。为了阻止总统的这一想法，多诺万费尽心机，找到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简称JCS）进行游说——因为这是美国最高的军事领导机构——他要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坚信，美国必须要有一个秘密机构专门从事对敌情报工作，而这个秘密机构就是他多诺万的情报协调局。

珍珠港的一声爆炸，终于催生了美国的现代谍报机构。1942年6月1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多诺万的联合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将美国当时所有的谍报机构进行整合，把十几个各自为政的情报单位集中到一起，组建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谍报机构——美国战略情报局，由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出任局长。

由情报协调局到战略情报局，美国人的情报事业终于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与情报协调局不同的是，战略情报局的任务并不是整合已有的情报，而主要是

从事战争时期国外情报的搜集分析和敌后战略情报研究、心理作战、准军事行动等特殊活动，隶属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

战略情报局就是后来中央情报局的雏形。但是，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的成立，美国的谍报机构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

第二章 冷战初开，中情组改成中情局

战略情报局顶峰时期的工作人员达到了2.5万人，美国特工遍布欧洲、北非和亚洲等战略重点区域，但是派到德国去的21个小组几乎全军覆灭；罗斯福的逝世终于让战略情报局寿终正寝。冷战开局，美国充当“世界警察”，中央情报局从此开始进入美国政治舞台。

帕克上校的报告宣判了战略情报局的死刑

多诺万出任战略情报局局长后，马上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只向总统汇报工作；二、由总统指令政府所有部门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三、虽然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但其经费由总统的秘密经费开支。

这些条件都得到了满足后，多诺万立即积极开展工作，招兵买马，迅速扩大战略情报局的队伍，使战略情报局在顶峰时期的工作人员达到了2.5万人，并陆续在世界各地建立情报网点。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和战略情报局卓有成效的工作，战略情报局在军方的地位也明显提高，赢得了军方的尊重和支持，为战略情报局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多诺万除了被称为“野蛮的比尔”之外，他还有一个绰号是“疯子比尔”。他是一位英勇的沙场老将，曾因一战期间在法国的英勇表现而被国会授予荣誉勋章。但是他对政治却一窍不通，以致信赖他的陆军和海军将领屈指可数。多诺万想通过网罗华尔街的经纪人、常春藤盟校的书呆子、雇佣兵、特技人员、窃贼和骗子来成立谍报机构，扩大战略情报局的队伍的想法让那些军队的将领大惊失色。

战略情报局当时已培养了一批情报分析人员，但多诺万以及他那位得力助手艾伦·杜勒斯依靠英国情报机构传授的手段，派出特工深入敌后，冒着枪林弹雨爆破桥梁，联合法国及巴尔干地区的反抗组织，共同对付德国纳粹的进攻。

到了二战结束的前一年，多诺万手下的特工早就遍布欧洲、北非和亚洲等战略重点区域。这时他就想速战速决，直接派遣特工深入德国，进行破坏活动。不幸的是，派遣到德国的特工到最后几乎全部牺牲了。他派出去的21个双人小组几乎全军覆灭，只有一个小组到后来才有下落。

尽管如此，多诺万总体来说并没有辜负罗斯福总统对他的信任。他以过人的才能、智慧和精力迅速地让战略情报局这一庞大的机构高效率地运转起来。他选拔的各种各样的人才，为美国情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批人中，有4人后来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他们是：艾伦·杜勒斯，在瑞士指挥对付德国的情报网；理查德·赫尔姆斯，协助多诺万领导反纳粹的秘密活动；威廉·科尔比，作为杰德堡突击队员空降到挪威和被占领的法国执行破坏任务；威廉·凯西，建立了潜入德国的谍报小组。他的战略情报局还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骨干力量，占据了中央情报局内的大多数高级职位，比较著名的有：威斯纳、安格尔顿、克莱因等。此外，多诺万还重用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如破译密码的专家威廉夫妇等。

在多诺万的领导下，战略情报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帮助美国赢得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略情报局作为战争时期组建的情报机构在名义上已经不能继续存在；同时，由于开支庞大和其他部门的反对，战略情报局也很难继续开展活动。

多诺万也觉得随着二战的结束，战略情报局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于是，他在1944年11月18日致函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成立一个统一的、独立于军方的中央情报部门来承担美国和平时期的情报工作。

其实早在1943年，多诺万就已经应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将之邀请，着手规划美国和平时期的情报工作。艾森豪威尔将军很想知道，多诺万是如何将战略情报局变成美国军事机构中的一环。但是，多诺万并不希望在战后的和平时期把自己的情报工作同美国军方混在一起。他在信中告诉罗斯福，他可以在了解“外国的能力、意图和活动”的同时，展开“海外颠覆活动”以对付敌国。他认为战略情报局的编制一直没有超过1.3万人，比陆军一个师还要少。多诺万希望在战后能成立一支拥有独立人员的

情报队伍，成立一支擅长“反共”、保卫美国免受攻击、向白宫提供机密情报的队伍。他敦促总统“立即开工造船”，并表明他有意当这艘船的“船长”。

多诺万的得力助手戴维·布鲁斯曾经说过，多诺万有无穷的想象力，点子是他的囊中之物。他激动起来会像一匹赛马一样呼呼喷气。他的指令，一看就知道即使不是荒诞不经，起码也异乎寻常，如果哪位下属拒绝完成他交代的任务，那就惨了。布鲁斯说：“我曾在他的指导下花了好几个星期辛苦测试，看看利用从西方洞穴捉来的蝙蝠摧毁东京的可行性。在蝙蝠背上绑上燃烧弹空投——这就是战略情报局的精神。”

针对多诺万提出来的建议，罗斯福总统好像也在考虑，但是他却对多诺万的动机有所怀疑，他曾说过：“要不是多诺万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共和党人，总统很可能是由多诺万来当。”不知这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1945年初，罗斯福还曾命令白宫首席军事助理查德·帕克上校，针对战略情报局的战时活动展开秘密调查。

帕克上校刚一着手调查，这条消息便从白宫泄漏出去了，立即成为纽约、芝加哥和华盛顿各大报纸的

头条新闻。它们齐声警告，多诺万想要成立“美国的盖世太保”。罗斯福一见到这些评论，就知道多诺万很可能会立即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于是就马上告诉多诺万不要将自己的计划轻易向外界泄漏，以免遭到外界的攻击。1945年3月6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召开会议，正式将多诺万的这一计划束之高阁。因为“参联会主席”希望新的谍报机关能够服务于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而并非白宫。他们想要成立的是一个以将校军官和文职人员为主的情报交流中心，负责过滤由驻外武官、外交官和谍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并将它们提供给四星上将级的指挥官作参考。由此，持续三代人的美国情报机关控制权争夺战逐渐拉开序幕。

1945年春，二战结束前夕，美国人要了解的对象已经不是日本而是苏联了，但是美国人对苏联在欧洲大陆的动向几乎浑然不知，而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更是少得可怜。因此，多诺万以他的远见和对情报工作的独特理解，建议罗斯福成立一个总揽全局的情报机构。但是，多诺万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罗斯福总统收到自己的信后，还没有来得及作出考虑和决定时，就在1945年4月12日那一天逝世了。

罗斯福的突然去世，让多诺万大失所望，顿觉前途黯淡无光。在罗斯福去世的第二天早晨，多诺万带着一种颓废的心情，和战略情报局官员威廉·凯西一起，来到他们经常光顾的巴黎丽兹饭店楼下吃了一顿沉闷的早餐。坐在他对面的凯西当时还是多诺万的一个下属，后来成了中央情报局局长。

这时，凯西觉得他的上司多诺万情绪有点不对，就对他说：“您觉得总统的去世，对您的建议会有影响吗？”

多诺万看了凯西一眼，然后低下头说：“岂止是有影响，简单是要完蛋了。不信你等着瞧吧！”

多诺万的判断相当准确——就在同一天，帕克上校就向新总统杜鲁门提交了一份极其机密的调查报告。这份关于当年战略情报局的报告，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完全解密。这份报告就像是一把由美国军方打造、再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精心打磨的政治谋杀凶器。胡佛当时根本看不起多诺万，而自己又怀有掌控全球情报机关的野心，所以对多诺万极尽诋毁之能事。帕克上校的这份报告，不仅摧毁了多诺万为保护战略情报局那些特工们所创造的神话，而且

还在新总统杜鲁门的心中，播下了对秘密情报工作深刻而持久的不信任的种子，从而使战略情报局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帕克上校在这份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战略情报局“对美国人民、商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了严重伤害”。

在报告中，帕克丝毫未提战略情报局有助于赢得战争的重大例证，只是无情地列出战略情报局失败的事实。干部训练“粗糙且散漫无组织”；英国情报指挥官认为可以把美国间谍“玩弄于股掌之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利用战略情报局得偿所愿；德国间谍已渗透到战略情报局在欧洲和北非各地的活动；日本驻里斯本大使馆发现战略情报局官员打算窃取日方密码册，于是变更密码，造成1943年夏天美国“重大军事情报完全中断”。有位“线人”向帕克表示：“战略情报局这一愚蠢行为让美国人在太平洋地区付出生命的代价，具体人数不得而知。”1944年6月罗马失陷之后，战略情报局提供错误的情报，导致数千名法军在厄尔巴岛遭到纳粹大军围困。帕克写道：“战略情报局的失误以及错误估计敌人军力，导致大约1100名法军丧生。”

报告还对多诺万进行人身攻击，说他掉落在布加勒斯特鸡尾酒会上的公文包，被一位罗马尼亚舞者拾起，转到盖世太保手中。他对高级官员的任命和升迁不是看绩效，而是根据此人在华尔街和“社会名人录”的人脉；他派特遣队到利比里亚之类的偏远工作站之后，就把他们抛诸脑后；他将突击队误派到中立国家瑞典；在法国，他派卫兵保护已经夺取的一处德军弹药库，后来却把他们炸得尸骨无存。

帕克上校承认，多诺万的手下确实执行过几次很成功的破坏任务，也营救了一些遭袭击的美军飞行员。帕克说战略情报局在办公室研究和分析的部门“表现不凡”，所以他的结论是：战后，分析人员可以安插到国务院，其他的必须走人。“让几乎不可救药的战略情报局人员在战后秘密情报机关里滥竽充数，岂不让人匪夷所思。”他提醒道。

帕克上校的这份报告，基本上对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宣判了死刑。但是，多诺万还要作最后的争取。罗斯福去世后一个月国殇期内，华盛顿上下争权夺利忙得不可开交。5月14日，多诺万找到了新上台的总统杜鲁门，在总统办公室里，他向杜鲁门提出了一项新

的建议——利用“挖克里姆林宫墙脚来遏制共产主义”。但是杜鲁门只是礼节性地接见了多诺万，听了不到十五分钟，就以自己有更重要的事急着处理为由，草草地打发他走了。

尽管如此，那一年的整个夏天，多诺万还是在华盛顿四处奔走，在国会和新闻界展开反击。8月25日，多诺万再一次告诉总统杜鲁门，必须在“知与无知”之间作出选择。他再一次提醒杜鲁门，“美国现在还没有一个统筹全局的情报系统，这种状况的弱点和风险已是人所共知”。

多诺万向来以倨傲不屑的态度对待杜鲁门，这一次，他原本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番苦口婆心，能说动总统成立中央情报局，可惜他没有摸准这位新总统的脉。他哪里知道，这时的杜鲁门已经认定了多诺万的计划具有“盖世太保”的特征，不但不支持他成立中央情报局的建议，反而决定解散他的战略情报局，并且撤销多诺万的职务。1945年9月12日，也就是美国在日本空投了原子弹后的6个星期左右，杜鲁门作出了解除多诺万职务的决定，并且下令战略情报局在10天内解散，把情报搜集工作并入陆军情报系统，情报分析

部门并入国务院研究司。多诺万从此失去了继续领导美国情报工作的机会。尽管后来在中央情报局总部的门厅里仍然高悬着他的照片，许多人也认为他是“中央情报局之父”，但是，毕竟后来中央情报局的成立和组建他都没有参与，也从未出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就这样，二战时期为美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战略情报局，从此寿终正寝了。

杜鲁门终于同意成立中央情报组

当时在华盛顿，关于美国情报机关何去何从的争论愈演愈烈。“参联会”明确希望能成立一个由参联会主席控制的情报机关。海军和陆军也主张拥有自己独立的情报机关。胡佛则希望由联邦调查局来执行全球谍报任务。国务院也想支配全局，就连邮政部长也想插一脚——随着战略情报局的解散，这些部门都开始抢地盘来了。

这种混乱的现状，让曾是多诺万得力副手的约翰·马格鲁德将军很是痛心。约翰·马格鲁德将军是一位很有见地的儒将。他坚信美国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机构，要想在战后获得世界的新霸权地位就只能是靠

碰运气，只得仰英国鼻息。他主张，美国的情报工作应该由一个新成立的秘密机关来主管，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不宜贸然插手这些任务。

但是在华盛顿当时几乎已经没有人理睬他的观点了。战略情报局解散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自谋职业去了，在三个月内就走掉了近一万名工作人员。到1945年年底时，原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剩下的还不到两千人。连当时驻伦敦、巴黎、罗马、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和斯德哥尔摩工作站的人员也几乎全走光了。“珍珠港事件”四周年那天，艾伦·杜勒斯认定杜鲁门总统已经搅乱了美国情报机构，就回到了纽约，在他的兄长约翰·杜勒斯和人合伙的“沙利文与克伦威尔法律事务所”上班。这些人都认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去日无多了。

那些没有离开的情报分析员被分派到了国务院和其他一些研究局，结果也受到难民一样的待遇。后来组建中情局情报处的舍曼·肯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不认为这一生有过比那更悲惨、更苦恼的时期。”

当时二战已经结束，冷战格局正在酝酿之中。

在1945年夏天德国纳粹投降的日子里，美国战略

情报局曾派遣了一支人马进驻千疮百孔的柏林，监视正在向欧洲大陆挺进的苏联红军的一举一动。当时派驻德国主管的艾伦·杜勒斯一到柏林后，就在废墟中找到一处配备比较齐全的大楼用做办公室，马上开展工作。他手下的爱将理查德·赫尔姆斯设法监视苏联人。半个世纪后成为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表示：“各位别忘了，最初我们一无所知。对手想干什么？他们的意图、他们的能力，我们所知道的等于零，或接近于零。只要能找到一本电话簿或一张飞机场地图，就很抢手了。我们对很多国家还都懵懂无知。”

赫尔姆斯这一次是随艾伦·杜勒斯重返柏林。他23岁时，曾以美国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采访了希特勒，由此而一炮走红。他这次来到柏林后不久，就听到了杜鲁门准备解散战略情报局的消息。

杜鲁门解散战略情报局的命令传到柏林的那天晚上，驻柏林情报站的那些人简直怒不可遏。他们在艾伦·杜勒斯的带领下，来到柏林的那家征用来的酿酒厂里，一边肆无忌惮地喝着正宗的德国啤酒，一边愤怒地发泄着对这道命令的牢骚。艾伦·杜勒斯没有想到，

多诺万所构想的美国情报机构没有了，只有少数人员可以留驻海外。让赫尔姆斯也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任务就此戛然而止。那天晚上，他们恨不得把这家酒厂一把火烧了。

但是几天后，华盛顿的总部却传来了一份电报，电报声称要他们“坚守岗位”。这又让艾伦·杜勒斯和赫尔姆斯等人不知所措，不知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份电报来自约翰·马格鲁德将军之手。

1945年9月26日，就在杜鲁门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的六天后，美国国防部作战部部长亨利·斯廷森辞职了。此人一直坚决反对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部门。他以为总统这一次下令解散战略情报局，就是为了要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机构。于是他愤然辞职。

亨利·斯廷森辞职之后，约翰·马格鲁德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他就走进了五角大楼，与亨利·斯廷森的助理约翰·麦克洛伊共商大计，准备劝说总统成立新的情报机构。约翰·马格鲁德无论是对多诺万本人还是对战略情报局都是有感情的。他和约翰·麦克洛伊是多年的好朋友，也知道这位部长助理在华盛顿的能量，在五角

大楼更是一呼百应。他决定趁机游说约翰·麦克洛伊，和他共同联手，迫使杜鲁门总统接受多诺万的建议。

当约翰·麦克洛伊听完约翰·马格鲁德的一番长篇大论之后，觉得他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于是两人就联合起来，联系了国防部的其他一些人，共同抵制杜鲁门撤销战略情报局的命令。

两个“约翰”的这一招果然奏效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杜鲁门总统果然作出了让步，采取妥协的办法，将撤销后的战略情报局改名为战略情报处。“维持战略情报局，必须继续进行活动。”这一纸命令又让成立中情局的希望起死回生。

这时，约翰·麦克洛伊又请主管空战事务的老朋友罗伯特·洛维特（日后出任国防部长）出任战略情报处处长助理，并且成立一个秘密委员会，规划美国情报业务走向；同时还告知杜鲁门总统，对情报工作要“有所作为”。



杜鲁门

在“战略情报处”的新招牌下，马格鲁德向驻海外的各情报站下达了命令，命令原战略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继续工作。就在这时，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了德国，正在同美国抢占地盘。马格鲁德立即向东

德派出特工人员，企图阻止苏联红军接管东德。他们在德国收买警察和政界人士，以便在东德建立情报网络。但是，战略情报处尽管付出了很大努力，最终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人不仅顺利地接管了东德，并且在欧洲大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不过东德的失手，并没有影响战略情报处的积极性。艾伦·杜勒斯和赫尔姆斯开始着手整顿那些涉足柏林黑市的军官。当时柏林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在那里任何东西和人都可以被当做买卖的商品。那时，如果你在美军福利社用12美元买下20箱骆驼牌香烟，那么你转手就可以换一部1939年出厂的奔驰汽车。

这些美国特工人员除了整顿市场秩序之外，还在搜罗那些知名的德国科学家和间谍，希望他们能为美国服务，以避免他们的技术为苏联人所用。不过，由于忙于摸清苏联人的动向，这项工作很快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这些美国特工当时能做的不过是追查调往柏林的苏军动向。苏联节节进逼，华盛顿却一再退让，还得设法化解驻柏林美军的反抗，这让赫尔姆斯相当愤怒。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人马着手吸收德国警察与政治

人物，以便在东德建立起情报网。11月，战略情报处派驻柏林的另一位军官彼得·希契尔说：“我们眼睁睁看着俄罗斯人全面接管东德。”

“参联会”和极强势的海军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这时才开始担心苏联会像以前的纳粹一样，先动手拿下整个欧洲，接着再向地中海东部、波斯湾、北非和朝鲜推进。如果行动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不可收拾的东西方对抗局面的形成，甚至会引发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全球性战争。面对新的战争的威胁，美国情报界的头目分裂成对立的两派。

一派认为，应该通过谍报活动，有耐心地慢慢搜集机密情报，通过谍报活动了解新的世界局势，赫尔姆斯等人即属此类。另一派则倾向于搞秘密战争，也就是通过秘密行动把战场引到敌方，以此来改变世界格局，当时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弗兰克·威斯纳属于这一类。

威斯纳原是密西西比的一位地主富绅的风流公子，也是一位身着军装的帅气律师。1944年9月，威斯纳奉命飞到罗马尼亚首府布加勒斯特，出任战略情报局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新站长。当时苏联红军和美军

代表团已经控制了布加勒斯特，威斯纳立下了军令状，负责监视苏联红军的行动。他和年轻的金·迈克尔共同策划营救遭袭击的盟军飞行员，又向布加勒斯特啤酒大王征用了一幢有32个房间的宅邸。在闪闪发光的水晶灯下，美苏两国的军官互敬香槟，打成一片。威斯纳是第一位与苏联人把酒言欢的战略情报局官员。当时他曾很自豪地向华盛顿总部汇报说，他已和苏联情报机关建立良好关系。

殊不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威斯纳这种所谓的“良好关系”就不复存在了。苏联人早就在他的战略情报局内部署了人员，而且很快就渗透到威斯纳的罗马尼亚盟友和特工圈子里。苏联人很快就夺得了布加勒斯特的控制权，他们将数万名有德国血统的罗马尼亚人赶上火车，运送到远东集中营或让其自生自灭。威斯纳眼睁睁地看着27节车厢满载着这些罗马尼亚人浩浩荡荡驶出布加勒斯特车站，向遥远莫测的西伯利亚方向驶去。这段记忆让他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威斯纳心慌意乱地回到战略情报局驻德国情报站，向赫尔姆斯倾诉了自己内心的感受。当年年底，他们两人一起飞回华盛顿。在18个小时的航程中，他

们促膝相谈，而谈得最多的是，不知道这次回国之后，美国政府是否还会容忍他们的情报组织的存在。

面对来自欧洲的“红色恐怖”，美国人感到了新的威胁。这时，杜鲁门也清醒地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1946年1月9日，白宫匆匆召开会议，杜鲁门那位脾气暴躁的军事参谋长、海军上将威廉·莱希对总统直言不讳：“我们的情报处理方式丢人现眼。”

杜鲁门也意识到自己已经造成了混乱，决定拨乱反正，于是召来海军情报局副局长西德尼·威廉·索尔斯少将，告诉他准备成立新的情报机构。1946年1月22日，杜鲁门决定成立一个和平时期的统一情报体系，一个以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总统军事顾问为中心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全面负责计划、发展和协调全美国的对外情报活动，并且在国家情报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一个中央情报组，作为情报行动的执行机构，管理原战略情报局的海外情报活动。

索尔斯是密苏里州出身的民主党人，靠着人寿保险和美国第一家连锁自助超市“小猪扭扭”发家致富的。此人虽在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成立的战后委员会任职，专门研究未来情报走向，但没什么远大目光，

一心只想尽快回到圣路易超市去赚钱。而令索尔斯感到惶恐不安的是，他发觉杜鲁门打算让他当第一任中央情报组的组长。果然在1月23日，索尔斯被任命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威廉·莱希将军在1946年1月24日的公务日志上，记录了授职时的情景：在白宫午餐会上，只有少数参谋人员出席了这次授衔典礼。杜鲁门总统授予索尔斯少将和我黑斗篷、黑帽和木剑。紧接着，总统任命索尔斯为中央情报组组长。

索尔斯得到这个新的任命之后，感到有点惊慌失措。当时的中央情报组大约有2000名情报官及幕僚人员，掌管约40万人的档案与卷宗，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到底应该做些什么。索尔斯宣誓就职后，有人问他想做什么，他只是苦笑着说：“我想回家。”

索尔斯虽然身负重任，却没有获得对等的授权。白宫没有给他指示，不知道杜鲁门总统想要什么，也许总统自己也不知道。杜鲁门只是说过，他要每日情报摘要，免得每天早上一起床，就要看2英尺高的一大堆电文。在中央情报组创始成员看来，他们的工作中

也许只有那些不知所云的“情报摘要”，才是杜鲁门总统看得上眼的东西。

关于中央情报组所肩负的任务，马格鲁德将军认为白宫已默认中央情报组可以从事秘密活动。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份来自白宫的书面文件提到这件事，美国政府里面几乎没人承认这个新团体的合法地位。五角大楼与国务院更是拒绝跟索尔斯及其手下打交道。但索尔斯还是在他很短的任期内留下一份重要的备忘录，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美国情报部门“急需在最短时间内搜集最高质量的苏联情报”。

当时美国对克里姆林宫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唯一的认识途径就是来自新任驻莫斯科大使、日后出任中情局局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以及被美国人称为“俄罗斯通”的乔治·凯南。

史密斯出身于印第安纳州，父亲开零售店，他从二等兵升到将军，既没有在西点军校镀金，也没有大学学历。二战期间，他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北非和欧洲的每一场战役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他不苟言笑，堪称是艾森豪威尔手下的一名杀手，战友和同事对他又敬又畏。他事必躬亲，极尽辛劳。

有一次，他出席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晚宴，宴会快结束时因出血性溃疡而昏倒。输过血后，他费尽口舌让英国医生同意他出院返回指挥官营帐。二战时他和苏联军官同甘共苦，也多次在阿尔及尔盟军总部共商对付纳粹的联合作战计划。在法国雷姆斯山区那间被当做美军前进总部的破旧红瓦校舍里，他鄙夷地望着德军司令官，接受纳粹投降，结束欧战。1945年5月8日“欧战胜利日”这天，他在雷姆斯山区和艾伦·杜勒斯、赫尔姆斯有过一次短短几分钟的会面。当时艾伦·杜勒斯患上风湿病，但还是拄着拐杖赶来见艾森豪威尔，希望能争取他的同意在柏林设置一个具有无上权力的美国情报中心。可惜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没时间接见杜勒斯，让他失去了一个控制柏林的好机会。

1946年3月，史密斯飞抵莫斯科，准备接受大使馆代办凯南的指示。凯南已在苏联待了好多年，也花了许多时间试图解读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这时苏联已经付出了两千多万人的惨痛代价，占领了大半个欧洲。苏联红军已经从纳粹铁蹄下解放了东欧的许多国家，克里姆林宫的阴影正逐渐笼罩在苏联境外的一亿多人的头上。凯南已预见苏联势必会以武力掌控占领区，

他提醒白宫要有摊牌的准备。

史密斯抵达莫斯科的前几天，凯南就向华盛顿发出了一封电报。这是一封非同寻常的电报，它不仅是美国外交史上最著名的一份电报，也应该是世界电报史上最长的电报之一。整个电报全文长达8000多字，详细地描述了苏联的“偏执”。凯南在电文中深刻地指出：苏联人对理性逻辑没有反应，对“武力逻辑”却极为敏感，这让美国人不得不防。

凯南由此声名鹊起，很快就变成了美国政府最出色的克里姆林宫专家，被人称为“俄罗斯通”。也正是由于这封电报，提前改变了美苏两个大国当年在二战战场上结下的生死之交的盟友关系，从而成为冷战的对手。多年以后，凯南还在回忆时说道：“我们因战时的经验而习惯前方有个大敌。这个敌人必定位于中心，而且一定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联和斯大林，1946年4月一个凄冷的夜晚，史密斯开着插有美国国旗的豪华轿车来到壁垒森严的克里姆林宫。一到大门口，就有好几位苏联情报官查验了他的身份。车子一路经过古老的教堂和宫墙内塔楼底下的残破巨钟。穿着黑色长筒皮靴和

红条裤子的士兵敬礼后引导他向深宫走去。史密斯只身前往，在卫兵的带领下走过长廊，穿越几道缀着深绿色皮革的巍峨大门，最后才进入宽广空旷的会议厅，终于见到了斯大林元帅。

一见面，史密斯就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苏联想要干什么？到底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听到这样的提问后，似乎显得有些不大高兴。他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张废纸上胡乱地画着，出现在那张纸上的是一些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规则的线条和圆圈。后来，他还是对史密斯说，苏联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野心，并且谴责丘吉尔不久前在美国密苏里州演讲时提出“铁幕”已降临欧洲大陆的警告。斯大林说，“俄罗斯对自己的敌人很了解”。

史密斯又问：“难道你真的认为美国和英国可能结成联盟，共同来遏制苏联吗？”

对这个问题斯大林几乎连想都没有想，马上回答说：“没错。”

史密斯又接着问斯大林：“俄罗斯打算走多远？”

斯大林两眼直盯着史密斯说：“我们没有打算走多

远。”

史密斯的这次拜访除了自讨没趣之外，并没有问到什么名堂。当时美国也很清楚苏联的野心，不过就是搞不到这方面的证据。于是在1946年6月10日他们撤销了西德尼·威廉·索尔斯的中央情报组的组长一职，换上了霍伊特·范登堡将军。

中央情报局成立

中央情报组的第二任组长范登堡将军是个英俊潇洒的空军军官，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的空战战术就是由他主导的。如今他要管理的中央情报组位于波托马克河边的小山上。指挥部就设在E街2430号战略情报局原来的总部，旁边有一家废弃的煤气厂、一家角楼式的酿酒厂和一座溜冰场。

范登堡将军一上任，就发现中央情报组缺少三项基本资源：经费、权力和人员。

范登堡决意要让美国回到拥有情报业务的轨道上来，他改变了他前任的策略，把中央情报组的主要力量用来搜集有关苏联的情报，并且设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处”（OSO），又私底下向几位议员“诈取”了1500万

美元，用于执行海外的谍报与颠覆任务。他要知道苏联驻东欧及中欧部队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动向、能力和意图，并命令赫尔姆斯尽快提交报告。

当时赫尔姆斯手下有228名海外特工，专门负责德国、奥地利、瑞士、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情报业务。当时欧洲各地的一大批政治流亡者、前情报官、前特务和各式各样的经纪人，各自兜售按客户需要而杜撰的情报。高明的骗子拼凑出来的谎言，被当成苏联及其卫星国家的相关情报。

赫尔姆斯后来认定，中央情报档案里有关苏联和东欧的情报，起码有一半纯属谎言。柏林和维也纳工作站已经成了假情报制造工厂。他手下的官员或分析师无法从虚妄之中分辨出事实真相。

范登堡从上任第一天起，就被海外传回来的惊人报告吓坏了。这些情报让他真假难辨，但他还是往上呈送。有些情报是这样写的——

快报：苏联某军官醉后高谈阔论，苏联将发动无预警攻击。

快报：驻巴尔干的苏军指挥官自夸，不日

将攻陷伊斯坦布尔。

快报：斯大林准备入侵土耳其，包围黑海，拿下地中海和中东……

范登堡将军收到这些情报之后，又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呈送到杜鲁门总统办公室。总统和他的那些高级幕僚对这样的东西并没有十分看重，他们当时所考虑的是如何遏止苏联继续向欧洲大陆挺进。有人向杜鲁门总统建议，遏止苏联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切断苏联红军在罗马尼亚的油田补给线。杜鲁门总统同意了 this 建议，于是就命令中央情报组派人去执行这个任务。

霍伊特·范登堡将军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决定开始改变中央情报组以前的行动方案，将中央情报组变成一个作战机关。范登堡将军亲自出马，去找新上任的作战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和时任国务卿的詹姆斯·伯恩斯，让他们悄悄地给中央情报组下拨1000万美元的秘密经费，支持“全球情报人员”工作。

范登堡将军如愿以偿拿到了这笔钱以后，立即命令驻巴尔干半岛的情报人员帮助罗马尼亚的国家农民党组建一支反抗的军队，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阻止

和干扰苏联红军；同时又在维也纳苏联红军的占领区建立了一个情报站，由威斯纳担任这个情报站的站长。

结果这个情报站很快就被苏联情报机构和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给破获了。在严刑拷打下，那些情报站的工作人员供出了中央情报组在罗马尼亚的全部计划。苏联人立即出动，将那支刚刚由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建立的反抗武装粉碎了。中央情报组驻罗马尼亚情报站的工作人员纷纷逃回美国。情报站的站长威斯纳跑回美国后，向范登堡将军报告了失败的全部过程。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央情报组无力与苏联人抗衡。苏联军队和情报机构已经完全控制了巴尔干地区。英国人的军队和情报机构已经完全撤离了，给苏联人留下了一大片发展的空间，让斯大林有机可乘。事实上那里现在已经是苏联人的天下。

这位情报站长来自第一线的分析引起了范登堡将军的重视，他马上将这一情况上报总统。由于英国人对巴尔干地区的放弃，加上后来英国人又停止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这样就逼得希腊每年都需要拿出2.5亿美元来用于“反共”事业的开

支。但是希腊人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而希腊随时就有落入苏联人的势力范围的危险。一旦希腊成了苏联人的势力范围，那么，整个西方世界就会一览无余地暴露在苏联人的面前，这种现实和后果是美国人所不愿看到的。

杜鲁门自从上台之后，由于对“红色恐怖”遏止不力，已经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声望和支持率明显下降。面对这样的局面，杜鲁门决定来点行动，提高一下自己的声望。几天后，他在国会举行了一次骇人听闻的演讲，夸大其词地对参众两院的议员发出警告说，美国现在所面临的“红色恐怖”并不亚于当年的战争。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只有在海外加大“反共”的力度才能拯救未来，否则全世界都将面临着一场新的浩劫。他还列举了许多来自中央情报组提供的各种情报，告诉这些议员们，希腊“正在遭受数千名武装分子的威胁”，整个西方世界即将落入苏联人之手，美国只有花上数亿美元才能稳住当前的局势；否则，这种混乱不仅仅不会到此为止，而且马上就要波及整个中东地区。这种现状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杜鲁门最后说：“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应该是支持自

由的人民，反抗企图征服他们的任何外来武装势力和政治压力。”——杜鲁门的这番讲话，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为“杜鲁门主义”——美国就是从那时开始扮演一种“世界警察”的角色。他们的观点就是，美国的敌人进攻任何国家，就等于是进攻美国。

杜鲁门的这番演讲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不久以后，随着大量的美元和武器装备进入希腊，中央情报组的大批特工也涌入希腊各地，希腊很快就成了美国海外最具规模的情报据点之一。这种情报活动最主要内容就是从事反共活动，扩大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和势力范围。

为了满足美国不断向外侵略和扩张的需要，美国国会于1947年7月通过了一项《国家安全法》。根据这项法律，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9月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来代替一年前成立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并且决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名下，建立中央情报局来接管中央情报组的业务、档案和人员。于是，1947年9月18日，世界上最公开的情报机构——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在这种微妙的政治环境中诞生了，海军少将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被委任为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第三章 铁幕重重，组织严密叹为观止

中情局公开亮出自己的招牌，被司法局长认为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傻的事情”，结果这块牌子经常被人偷走；中情局备受恩宠，杜鲁门总统每天接见的第一个人总是中情局局长；中情局也在公开招聘，但拒绝“007”式的人物.....

“中央情报局——右转弯；非经许可，车辆不得入内”

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它的办公地点设在华盛顿地区林肯纪念碑附近。直到1961年后，中央情报局的总部才搬迁到华盛顿特区与弗吉尼亚州交界处的波多马克河边的兰利。整个总部占地约200多亩。中情局是

一个公开的情报机构，它不像有些国家的情报机构那样，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中情局一直显得理直气壮，大大方方。

1961年，从兰利的中情局总部大楼刚刚建成时开始，中情局就在乔治·华盛顿大马路的路口上，一直竖着一块高高的牌子，上面标着“C·I·A”的字样。后来一位司法部长看见了，大为恼火，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傻的事情，哪有情报机构在公路边竖个那么大的牌子来宣传自己的？”于是立即下令予以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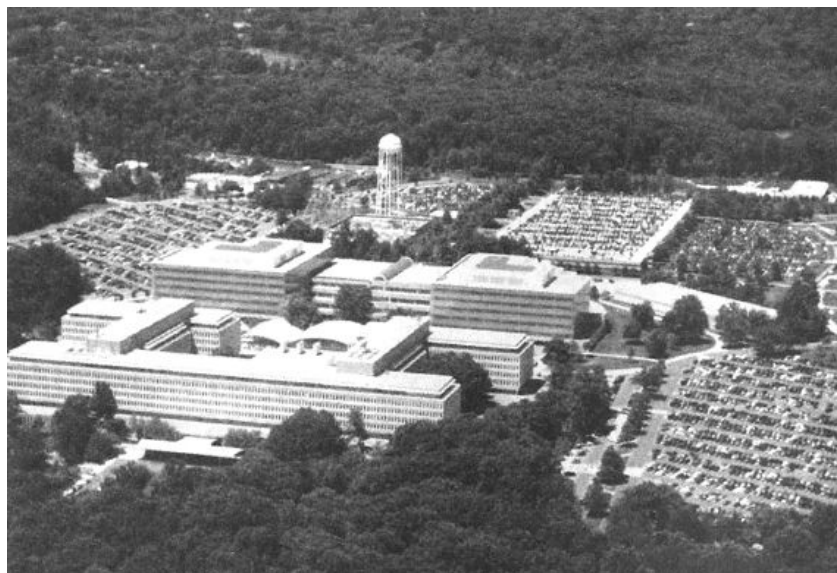
其实，这样的命令意义也并不大，占地200多亩的兰利总部的是太显眼了，来往的飞机驾驶员都把它看做华盛顿国家机场的定位点。住在这里的居民都知道，联邦公路局旁边那栋白色的大楼就是中央情报局。1973年，施莱辛格当上局长后，觉得没有地面指示牌很奇怪，也很不方便。请示白宫之后，中情局又在原来的地方重新竖立了一块牌子，并且在上面写着“中央情报局——右转弯；非经许可，车辆不得入内”。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块标牌经常被人偷走。

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中情局兰利总部大院的保卫措施虽然很严密，但是在总部大楼旁边却有一家居民一直与中情局做邻居。原来，建兰利总部的这片土地是中情局从联邦公路管理局手中要来的，而联邦公路管理局在收购这片土地时，却有一片13公顷的土地没能够买到手。那片13公顷的土地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它的主人叫玛格丽特·斯卡特古德，一个上了年纪而性格又特别固执的老太太。

联邦政府曾多次想说服她卖掉这片地业，但斯卡特古德老太太就是坚决不肯，并且通过地方法庭，设法弄到了一纸合法手续。根据法庭的这一规定，玛格丽特·斯卡特古德有权不受任何干扰地居住在这里，直到她去世为止。这样，斯卡特古德的房子就像一只尖头的靴子一样，那尖尖的靴子头就一直楔进了中情局的大院。这样不仅大煞风景，而且不利于保密。有些人找不到去她家的公路，就只好一直闯到中央情报局的大门口。

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



这个斯卡特古德老太太每年有10万到12.5万美元的年收入，不用支付抵押贷款，生活简单富裕。她还是一位贵格会教徒和和平主义者，反对战争和屠杀，热心帮助民权组织，并为它们提供了大量捐款，同时她还不断地给国会议员写信，要求削减军费和情报开支。所以她才从心底里就不喜欢自己的这个邻居。

斯卡特古德女士年事渐高，1973年唯一陪伴她的朋友去世了，从此她就独自一人生活。由于她的房子的一部分嵌在兰利大楼的大院里，所以中央情报局的警卫人员在安全巡逻时，总要捎带把她的家也一并巡逻一遍，当然这是无偿服务。所以她的家比美国其他地方任何居民住宅都要安全。当年凯西任局长时，她

还被邀请到局长餐厅吃过饭。不过老太太一点也没客气，在饭桌上直接把中情局在全球范围内搞颠覆、发动别国内战的做法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这位可敬的女士和中情局做了25年的邻居，一直相安无事。1986年她因中风去世后，中情局才把她的产业圈进自己的栅栏里面。

兰利大楼的名气如此大，几乎让全华盛顿的居民都知道中情局在哪里。曾经有一个反对中情局的民间组织，派人守在兰利大楼的入口附近，偷偷地用相机拍下了很多进出汽车的牌照号码，并且据此查出部分中情局雇员的名单，登在报纸上。这让中央情报局很窝火，因为有些雇员的身份是严格保密的，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他在为中情局效力。更可怕的是，有证据表明，苏联人也采取过类似的手段，派遣特工化装成华盛顿的居民，公开地来此搜集情报。后来，经过中情局和主管机动车辆注册的部门反复交涉，他们才答应修改部分条例，对根据车辆牌照号码查询车主姓名的做法增加了一些限制。



美国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大楼入口

兰利大楼那时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门禁森严。如果你要闯进去，说不定在哪一个角落，就会有全副武装的警卫、警犬和闭路电视摄像机在严密地注视着你。1977年的一天，有三个喝醉了酒的海军军官想攀越兰利大楼的栅栏，以显示自己的男子汉气概。结果他们刚刚触到栅栏，警铃就响了，一个倒霉的家伙在大院里被抓住，另外两个在爬上汽车的前一刻被逮住了。他们被押回海军基地，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

不过近年来，兰利总部逐渐开放了，接待一些来

自社会各阶层的小型团体参观，但参观范围非常有限，只是让他们参观一下冷战展览会，另外就是行动中心等极少的非机密的部分。其余的地方还是不能向外公开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主要任务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国家情报工作提出建议，协调各情报机关的情报搜集和分析工作，并承担同国家安全有关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随时指派的其他任务。后来，中央情报局又获得授权从事国外政治、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这样一来，中央情报局的权限就越来越大了。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的规定，中央情报局主要承担下列任务：

1. 就有关国家安全情报活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咨询意见。
2. 协调政府各个部门的有关国家安全情报活动，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
3. 对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进行分析和鉴定，并分发情报。
4. 搜集、编写和分发国外情报、反间谍情报和毒

品走私及恐怖活动等情报。

5. 在国外从事情报、反间谍活动，并协调其他机构的反间谍活动。

6. 完成总统批准的各种特殊任务等。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央情报局逐渐将工作重点转向搜集经济情报和其他国际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反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扩散和防止毒品走私等问题。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明确指示，中央情报局在国际新形势下主要有三大使命：

一是努力掌握介入武器扩散和恐怖活动的国家的情况，其中最突出、最主要的国家是朝鲜和伊朗。

二是严密注视那些一旦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发生不利的变化可能会使美国感到不安的国家的情况，比如俄罗斯和中国。

三是尽一切努力协助美国政府确保美国企业能在国外生意场中进行公平交易。查清那些为了从美国手中夺走经济合同而进行的一切收买或行贿活动，以保障美国企业在生意场上的竞争中赢得胜利。

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反对恐怖主义、打击恐怖分子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首要任务。也许

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反对恐怖主义都将会是中央情报局的一项重要任务。

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保密是首要的神圣职责。当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中央情报局总部时，马上就会有专业人士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接触情报的人必须服从的第一条纪律就是保密，即不得把他们的工作情况告诉任何人（包括妻子和丈夫在内）。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还必须形成这样一种特定的观念：为了国家利益，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被一般人认为是不光明正大的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只有局长一个人知道由世界各地搜集来的零星材料整理而成的综合情报。

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活动有“公开合法”和“秘密非法”两种途径。公开合法途径是指利用政府、军队和民间驻外机构，以外交官、国防部代表、民间驻外人员等身份为掩护，秘密派遣谍报人员，也有的谍报特工伪装成学生、商人、记者、专家等混入侦察对象国，所有这些谍报人员都是以公开合法的身份作为掩护，在当地开展秘密谍报活动；秘密非法途径是指采取非法手段进入侦察对象国从事谍报活动，主要的方式

有：以移民的方式，申请合法入境，长期居留；利用偷渡、空投等手段秘密潜入；招降被抓获的外国间谍，经过训练后再派遣其回国充当自己的耳目。

中央情报局的庞大情报网络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为美国决策当局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抢占先机、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行动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为推行美国的对外政策、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清除了障碍，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和某些国家的历史进程。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央情报局的许多情报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其成就和功绩是巨大的。

当然，在巨大的光环下面，阴影也是非常突出的。中央情报局在其间谍活动中，大量采用贿赂、讹诈等不光彩手段，为达到目的，甚至从不考虑其行动的合法性和道义的合理性；在美国政府的控制下严重干涉别国内政，比如1953年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1960年暗杀非洲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和“水门事件”等，都是采取不光彩的手段。

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消息封锁十分严格，虽然有助于保密，但也助长了内部机构之间抢功的不良风气；此外，中央情报局内部的官僚作风十分严重，尤其是那些主持情报评估判断的人，他们身上具有典型的官僚主义机构的四平八稳的作风，只要他们的判断刊印出来，整个组织都将其当做行为准则，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永远也得不到晋升的机会。

也许，对中央情报局的总体评价是一个太大的题目，而且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公认的：中央情报局是迄今为止最为庞大、最有影响力的间谍组织，它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央情报局为了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维持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大搞渗透、颠覆、破坏、和平演变等间谍活动，深得美国统治集团的青睐。

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机构

中情局是美国情报系统的总协调机关，也是美国从事情报分析、秘密人员情报搜集和隐蔽行动的重要

机构。中情局的每一任局长都是由美国总统亲自任命的，这些局长同时还常常要担任总统和国会的高级情报顾问，常被称为总统的“耳朵”。中情局成立后，杜鲁门总统每天接见的第一个人总是中情局局长。



美国中央情报局徽章

中情局的在编人员常年保持在16500余人。不过据有关人士推测，其实际人数可能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最多的时候甚至突破了5万人。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组织机构非常庞大而且复杂，主要有局长办公系统、秘密行动司、行政管理司、情报司、科学技术司等，分别管理有关业务。

中央情报局局长也是中央情报主任，他负责管理整个美国情报界的活动。中央情报局分为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分由一名副局长领导，还有六个直接归局长和副局长领导的办公室，如总审计办公室、总监办公室、平等就业机会办公室、人事主任办公室、政策与计划主任办公室等。

情报策划与协调小组是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一个专门协调情报工作的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为情报工作规划今后的新路线，探索在冷战结束后的形势下情报工作需采取的应急措施；在密切注意俄罗斯情报动向的同时，搜集日本、欧洲等各国竞争对手的经济战略、市场目标及研究开发项目等方面的情报，把握世界经济动态；负责搜集违法武器交易、器材机械出口、国际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情报；确保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能够得到不断的调整，以便更加适合美国对外战略和国内政策的需要。

秘密行动司是中央情报局最大的一个部门，它一

般把情报工作和特殊行动混在一起，其成员分别从事普通间谍活动和特殊隐蔽行动。秘密行动司一方面作为最大的对外情报部门，以驻外使领馆为基地进行情报搜集工作，另一方面还是中央情报局隐蔽活动的主要执行机关。在国外从事策反、颠覆、和平演变，甚至绑架、暗杀等特殊隐蔽行动。

秘密行动司下设十五个处或组，分别是六个地区处、一个国内行动处、一个特别行动处、三个参谋组、三个服务处和一个管理服务部。

六个地区处：

远东处、欧洲处（西欧处）、西半球处（拉美和加拿大处）、近东处、东欧处和非洲处。这些地区处大致相当于国务院的各地区司。地区处主要负责对这些地区的国家进行谍报、情报、准军事活动的领导，这种领导主要通过设立在这些地区的驻外分站来进行，而这些驻外站或分站通常设在这个派驻国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里，有的则设在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内。

国内行动处：

实际上也是一个地区处，主要是在国内进行隐蔽

行动。

特别行动处：

是一个类似于地区处和参谋组的混合体，主要负责为国外的准军事行动提供人力、物力和雇佣军以及执行任务时所需要的专门技术。

三个参谋组：

包括外国情报参谋组、反间谍参谋组和隐蔽行动参谋组。这三个组负责监督各自专业方面的作战方针，并尽可能为各地区处、驻外站和分站提供帮助。

三个服务处：

包括专勤特项处、行动服务处和技术服务处。专勤特项处主要负责秘密行动司的行政计划和预算，并将隐蔽行动的必要性写成报告上送审批；行动服务处主要负责为间谍、特务的伪装和掩护作出安排；技术服务处主要负责制造各种间谍情报器具，如伪装品、微型相机、录音机、密写器材等。

管理服务部：

管理服务部包括：行政管理司、情报司、科学技术司。

行政管理司：

主要负责管理中央情报局技术设备，负责为中央情报局招募谍报后备人才，并负责这些人员的训练和培养；也负责全局的通讯密码的编制与破译，同时还从事一些反间谍侦查工作，如该司经常对一些外国策反人员进行精神状态分析和测谎试验等。

情报司：

它是中央情报局的主干机构，主要负责对外情报的搜集，尤其是对这些情报的鉴定、评估、分类，以及进一步的、详尽的分析与研究。编写《情报动态报告》，供总统和总统周围的核心人物参阅。

情报司下设的分支机构主要有：政治情报研究处、战略情报研究处、动态情报研究处、图像情报研究处、地理制图研究处等。

科学技术司：

科学技术司是中央情报局最小的一个司，其主要职责是进行基础研制工作、侦察卫星操纵及对尖端技术领域的情报进行分析研究，负责中央情报局的电子信号情报处理，把一些尖端技术应用于情报工作的研究活动。该司有工作人员1300余人，大多是一些高水平的电子和空间技术领域专家。科学技术司下设六个

业务室、一个国家级的图片判读中心和一个完善的图片资料库。

中央情报局除上述庞大而复杂的总部之外，还在美国20多座城市设有分局，进行着广泛的情报活动，它还在13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情报站，派有情报人员，大部分以外交官的身份作掩护。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几个系统之间、分局和分局之间，彼此都互不通气，更不得泄露自己的活动秘密。譬如，情报司虽然可通过秘密行动司得到情报，但这情报是谁、通过什么方式和途径得到的，却完全属于秘密；行政管理司按照秘密行动司的要求提供一切秘密行动的设备、物品，但不能过问其内容和目的。中央情报局就是在其内部，也被保密的帷幕遮盖得严严实实的。

中央情报局除了本部之外，还设有几个属于它的独立机构，如：

美国技术转让估价中心：美国中央情报局为稽查泄露工业技术情报的公司和个人而设立的专门机构，负责研究和通报这方面的情报和存在的问题。

美国全国间谍情报任务分配中心：由美国第13任

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于1992年设立。通过该中心，建立起全国协调一致的情报任务分配机制，即把情报任务分配给那些获取情报可能性最大、承担风险最小、所用经费最少的间谍区完成。

特别行动小分队：这也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重要部门。他们采用最新技术，运用各种变幻莫测的手法，在各国首都、军事基地等要害部门进行电子侦察工作，用一般人意想不到的方法获取重要情报。

情报解密工作处：该处是20世纪90年代初，盖茨上台后，为推动中央情报局“公开化”进程而成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历史性情报问题，比如公开U-2飞机秘密档案等等。

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就存在诸多重大的先天缺陷。它的功能原本是要整合各部各局的情报，可是一开始就遭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反对，因为中情局不归它们管辖，它们也不看好中情局；另外，中情局的隐秘性也常常和美国民主的开放性相抵触。

但是在美国民众眼中，中央情报局却一直被看成是“白种男子的精英组织”。它对谍报人员的招聘工作虽然有自己一套严格的程序和考核制度，但是到了后

来也就变得不拘一格了，由原来的秘密招聘变为公开招聘，甚至不惜重金花钱做招聘广告。

公开招聘

1986年6月，中央情报局在美国设了11个招募中心。经考试合格后，有1000人受雇用，其中有200～300人被培养成为间谍。

1996年圣诞节期间，在闻名遐迩的英国《经济学人》周刊上，刊登了中情局一份引人注目的招聘广告。该广告以《最终的海外生涯》为题，非常直接地为美国招聘优秀的间谍人才。广告中提出了几项具体条件：

1. 有学士学位并且成绩优秀；
2. 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3. 操作清晰准确；
4. 对国际问题感兴趣；
5. 35岁以下；
6. 应聘者及其配偶都是美国公民。

《经济学人》是面向全世界发行的知名杂志，发行量达60多万份，仅在美国就有23万份。当时，这则

广告理所当然地在世界各地引起轰动，但是作为这则广告的发布人——美国中央情报局却安之若素，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中情局为了搜罗人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多家报纸上公开刊登自己的银盾局徽，做大型广告。只不过是这次投入的手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总共耗资2000英镑。

1998年秋，美国中央情报局大张旗鼓地进行1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征召间谍和分析人员的工作，并在美国许多地方的宾馆酒店接待应征者。

公开发布广告招聘间谍，这是中情局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它的无奈之举。因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有关中情局的丑闻就不断地冒出来。冷战结束以后，随着当年一些材料的解密，更多的内幕这时都真相大白于天下。比如1994年“鼯鼠”埃姆斯间谍案的曝光，就让在俄罗斯工作的众多中情局特工暴露了身份，并且有几十人被处决。这一间谍案极大地破坏了中情局的形象，从而使其声誉大跌。在这种情况下，中情局只好公开招募情报人员，一方面是为了增加中情局工作的公开性，提升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想网罗大量的优秀人才。这些广告

把行动处描绘成一个由二十几岁、漂漂亮亮的年轻人组成的五彩缤纷的联合体。

中央情报局一向重视对优秀人才的引进，特别是在那些有特工潜质的大学生身上，很是舍得花大力气。中情局那些负责网罗人才的官员，几乎每年都要访问各州的名牌大学两次，从中物色适合自己的人才。中情局情报工作的神秘性、挑战性、冒险特点和“007”式的英雄主义色彩，也使它对年轻的大学生充满了吸引力。于是每年都有大批的高才生应聘中央情报局，其中不乏来自像哈佛、耶鲁这样世界著名大学的学生。中央情报局曾与美国66所最好的大学和学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另外，国会当年给美国13个情报机构追加了15亿美元的预算，其中2亿至3亿美元是分给中央情报局的。

实际上，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并非都是“007”式的人物。在一线的特工只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情报分析人员。这些情报分析人员都是专家式的人物，精通对象国的语言，跟踪对象国的政策变化和局势动向，根据一线特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对可能影响美国利益的情况作出分析、判断和预测，供美政府高层决策之

用。像中情局的“中国处”就网罗了一批“中国通”，对中国对内、对外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的 research。他们不仅仅自己从事分析工作，而且与美政府的各种智库、大学的东亚问题研究机构进行密切合作，或者利用学术关系展开中国问题的探讨，或者拉拢部分学者成为搜集有关中国信息、为中情局服务的“眼线”。冷战以后，尤其是近年来，中情局为了扩大对华的侦察力量，大量征召熟谙汉语的人士，将其培养成未来的中国和亚太事务专家。

近年来，中央情报局看中的招募对象不是传统的美国人，而是来自拉丁美洲、亚洲特别是中东地区国家的移民或这些移民的后代，尤其是少数族裔和妇女。中情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中情局一直都在招募移民，以便能够进入外国的社会基层获取情报。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美国更多地把国外的恐怖分子、毒贩、军火走私犯等视为国家安全的敌人，中情局就更需要精通敌人所在国家语言的特工。那些有能力潜入恐怖组织内部的志愿者将被优先录取。

中情局曾在2003年公开招募华裔特工。他们在华裔比较集中的东、西海岸10家中文报纸杂志同时刊登

大幅招聘广告，诚聘双语（英、汉）情报人员和资料分析员。中央情报局还在其官方网页上，长期刊登招聘中国问题专家的启事，日薪高达175美元。其中开列的聘用条件包括：必须是美国公民，具有亚洲专题研究生学历，其研究课题是有关中国军事、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的，而且在校平均学分（GPA）不低于3.2（满分为4）；具有外语（汉语）的听、读、讲、写能力。应征者须对中国情报分析有浓厚兴趣，拥有在外国、尤其是在华语地区生活和从事有关工作的经验；非常了解地区性问题。

2009年9月，中央情报局还在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上刊登了一则大幅广告，招聘华裔女特工。在广告旁边还附上了一张华裔女特工的巨幅照片，相当形象化。

如果你拨打美国特工处特工招聘专用电话，或者是打开特工处招募网站，就会发现你首先得满足以下条件：你是美国公民，最好还得是土生土长的；21岁以上37岁以下，嫩了老了都不成；知名学院或者大学的本科学位，在犯罪调查或者其他执法机构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

当然了，如果你有奇才异能的话，那么学历要求可降低；视力要求一级棒；健康出色的体格；必须通过财政部特工处的特别考试；必须接受祖宗三代审查，接受是否吸毒检验、医疗检查和心理测试。如果全都能通过，又完成了特工处训练学校的严格训练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持证上岗了。不过，特工处训练学校的内容迄今仍属绝密。

曾任特工处处长的斯坦福走过的路，可以给那些想当特工的人提供参考。斯坦福是1999年3月4日被提升为特工处处长的。他在加入特工处之前曾于1969年至1971年在美国陆军服役，到越南打过仗。1971年，他被选拔为克里夫兰特工处特工，后来在工作中表现出色获得过多枚不宜公开的勋章，而且他还拥有经济学学士学位。

如果真的当上特工处的特工，那么享受的待遇会怎样呢？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按西方标准，人员的收入属于中等。受过高等教育并至少掌握一门外语的新手现在每月只能挣2000美元，而如果他在私营企业至少可以每月拿3000美元。从加入特工那天起，根据此人的教育程度和素质情况，每年除了跟同级官员领一

样的薪水外，额外还有相当于年薪25%的奖金；特工和其直系亲属享受联邦政府保健福利计划；每年可以带薪休假13至26天；每年可以休至少13天的病假；法定节假日带薪休假；丰厚的退休薪金；如果是现役军人或者警卫队的话，那么加入特工之日起可以选择转为后备役或者提前退役。

中情局的招聘是全方位的。它除了招聘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外，也录用社会各个领域的人才。中情局还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招聘宗教人士。所有的应聘者在录用之前须经过严格的筛选、测谎和检查，被录用后还要接受为期3年的专门训练。

不过，中情局对高级职位的招聘却有特殊的规定。历任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都毕业于名牌大学，唯一的例外是沃尔特·B. 史密斯不是大学毕业生。他从1950年到1953年曾出任中情局的第二任局长。在中央情报局建立初期，它的高级官员多是常春藤联合会所属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另外，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倾向于在熟人中招募间谍，这似乎成了美国政界的传统。所以中情局早期的骨干中有不少出身显赫的，或是社会知名人士。

中央情报局的提升晋级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工作成绩，不论资排辈，这种自由的机制很有激励作用。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黑人、拉美裔或亚裔美国人担任过任何部门的最高主管。因此在人们心中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概念，认为美国中情局是一个“白种男子的精英组织”。

在中情局，女性职员担任高级职务的机会也不多，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1995年，约翰·多伊奇担任中情局局长后，就首次任命一位女性担任中情局部长级的高级官员。

中央情报局所有的雇员必须遵守保密和沉默的规定，不得对任何人——包括配偶——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除此之外，他们也与华盛顿其他政府办公室的人员一样，按照固定的时间上下班。在麦克莱恩附近的饭店和酒吧里，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们经常结伴而行。尽管他们把上班时挂在脖子上的工作证随意地塞进衬衫的口袋里，但还是很容易让人把他们辨认出来。后来，他们可以公开向人们承认自己的工作单位，但也就只能到此为止。如果是在以前，被问到职业，他们只能含混地回答，“在政府里工作”。即便如

此，那些询问的人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以上的那些“自由”并不包括那些秘密特工，尤其是在中情局行动处工作的人。在行动处工作的都是谍报人员、反间谍人员、秘密操作员和保密员，他们的身份是必须绝对保密的。

“魔鬼训练”

中情局工作人员和特工的培训过程也是一种复杂的工程，对于此历来有过各种各样的传闻，对中情局的间谍训练工作进行的所谓揭秘，都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中情局的训练工作实在是太复杂了。

对那些招聘来的人员，第一步往往就是对初步确定名单的人员进行“姓名核查”。姓名核查的目的，就是要看这些人有什么不适合做间谍的背景和材料。第二步就是对通过姓名核查的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安全检查，包括家庭情况、本人经历。在这两步工作完成后，合格者将会接受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考验。被考验者在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考验，以能够充分考察出其智力、表现力和思想品质的真实情况。合格者首先将会接受“观察力测验”考察，主考者会根据

方案或专家的出题，让应试者自己去完成。

“意志力测验”则是将应试者从家里突然逮捕并且送到地下室的黑房里，置于强烈耀眼的反光灯下，或者与死囚犯关在一起，从黑暗中传来严厉的审问声、恐吓声。应试者最后要通过的是测谎器的测试，测查其心理素质情况。

以上合格者，首先进行9个月到1年的初步训练。开始3个月，新学员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听课，加强伪装和语言训练，特别是对派驻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风俗习惯等都要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3个月后，到弗吉尼亚州的皮里营“农场”（即美国间谍学校，对内称三军实验训练基地）去训练。

一般来说，未来间谍们都要学习徒手格斗。他们不是像拳击家那样接受系统的训练，而只是学习如何用脚跟、手掌、指头去击中对方要害部位的“散手”，这其中包括中国功夫、柔道、擒拿术等精华的东西。全面训练的重点放在隐蔽行动和保密上。他们学习干“袋子活”（偷偷摸摸地进入私宅或公司办公室）和窃听。

“农场”内，建有控制塔的模拟的国境线供学员们

进行非法偷越国境的练习，还训练他们如何盯梢、监视、摆脱敌人跟踪、建立安全接头点，及时转移，学会化装，学会接头暗号、代号、密码电报的接发方法，秘密集会，纵火爆破，绘制地图，还要研究敌人方面的反情报机构的行动方法和组织机构，以及保密教育……

在经过一年的正规训练后，中央情报局对学员的能力、智力进行测验和性格稳定性筛选后，分到中央情报局下属各个部门，在训练办公室的控制和指导下工作三年左右，然后正式派往世界各地，执行秘密任务。

据有关传媒披露，2002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新成立了一所大学，美国的特工们要在这里速成至少一门外语，学习怎样给总统写报告，研究如何应对一场全球性的危机。遭受“9·11”重创之后，一向自认为是世界顶级情报机构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能力遭到了质疑，中情局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合并了以前的11所学校，建立新的中央情报局大学，对特工人员进行强化训练。

这所中情局大学的主教学楼有深色的砖墙，浅色

的玻璃窗，是一幢看上去朴素无华的建筑物。学员出入都必须经过安检。教材封皮都标示着“机密”字样。电话分成绿色（保密）和黑色（普通）两种。至于这所教学楼的地址，人们只知道它位于弗吉尼亚州北部的商业区，周围全是办公楼。具体是哪一栋也是一个秘密。中情局大学教学楼本身并没有悬挂任何让人联想到中央情报局的招牌。它的停车场甚至对外开放，只不过停车场入口处有一位保安负责检查证件。

中情局大学的主教学楼紧挨着一片绿草茵茵的山坡。路透社记者偶然听到几位中情局官员半开玩笑地提到那儿可以建造一个体育馆，还给体育馆也起了一个代号“好斗的鼯鼠”。

中情局大学的宗旨也很简单：更好地协调中情局各机构对特工的培训工作，提高谍报工作的效率。中情局大学校长弗兰斯·巴克斯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央情报局新聘的雇员数以千计，在今后几年里，他们都将到这里来受训。”“我们正在为未来整整一代人提供强化训练。‘9·11’之后，中情局大学的一大训练内容就是加强和拓展安全防范意识，计算机安全、人身安全、信息安全……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是如

此。”

实际上，对中情局地下谍报人员以及被派往海外搜集外国情报的特工来说，中情局大学的主教学楼还是显得过于引人注目了一点。他们主要的受训地点可不在那里，而在弗吉尼亚州另外一处隐秘的角落——“农场”。

在“农场”，学员的学习成绩和平时的表现对其日后谍报生涯有着直接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中情局大学“业务董事会”的秘密培训项目中，如果学员暴露出的弱点很多，他不仅没有资格参加下一步培训，甚至有可能遭到中情局淘汰。

中情局大学还开设经贸课程，讲授欧盟、东亚、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趋势、国际银行业务、世界石油市场、中央银行职能以及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方式。

在美国准备空袭阿富汗塔利班前夕，中情局因缺乏懂得阿富汗当地部落语言的人才而受到尖锐批评。痛定思痛，目前，中情局正在大力强化对雇员的语言训练。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汉语、日语和德语都被列为“核心语言课程”。少数特工还要求通晓某

些小语种语言。这种情况下，他们一般只能在校外受训。

路透社记者最关注阿富汗人常用语言的课程设置情况，但中情局大学并没有开设普什图语、达里语（现代波斯语的一种，主要为中亚塔吉克人使用）、乌兹别克语或者乌尔都语（通行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现为巴基斯坦官方语言之一，部分阿富汗人也讲乌尔都语）课程。中情局大学高级行政官员玛丽·奥沙利文说：“我们一概不设这些科目。一来我们不缺讲这些语言的人，二来也几乎不可能聘到能够闯过我们严格的安检关，具有我们所需要的信任度的教员。”

中情局大学的安全条例规定，语言教员必须来自美国本土，有执教经历，还需经过中情局的背景检查。不过，校长巴克斯说，如果中情局高层不能确定对懂得这些特殊语言的人才才有长期需求的话，他们就没法找到合乎中情局安全规定的教员。要知道，“达里语不是一夜工夫就能通晓的，需要很多年的学习”。

中情局大学的绝大多数学员都是将来要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工，因而中情局无法利用商贸语言学校，甚至也不能利用国务院的语言培训项目。一名曾在中情

局大学学习法语的特工说：“外交官是不会和我们需要接触的那些人交谈的。你和一名恐怖分子交谈所需要的词汇也不会被外交官用在他们的场合。”至于商贸语言课程也同样缺乏情报人员所需要的词汇。“有几个生意人会讨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足以置人死地的导弹降落距离呢？”

在中情局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是为期4天的“为总统写报告”的课程，因为每位总统对中情局呈交的报告都各有一些特殊要求。另外一门课程的代号是“CIA201”，为期3周，其宗旨在于培养学员的团队精神。因为中情局大学的学员来自中情局各个部门，有搞技术的、搞财务的、搞分析的，也有专搞秘密工作的，专业背景差异很大。

“CIA201”课程首先让学员进行“鼯鼠”练习：每位学员都要被同学用绳子吊到离地面10~20米的高度，除了信任拉绳的同伴不会撒手让他摔死，别无求生之道。

轮流当完“鼯鼠”之后，是集体走平衡木练习，学员不仅要保持自己的平衡，也不能让同伴掉下去。同组学员都在平衡木上站住了脚，才能算是成功。据这

门课程的教员说，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因为每一个小组中，不可避免地总是有学员表现出只考虑自己的倾向。

最后是紧急应对危机小组练习。学员们首先观看一部假想某个“无赖国家”入侵美国盟国的录像片。在该片模拟的恐怖袭击行动中，入侵者使用了导弹、坦克和化学武器。接着，教员分发给他们关于该片涉及的两个国家的情报手册，情报手册中的内容是完全真实的，然后要求学员提出对冲突后果的构想。这时，学员还会受到一连串的干扰，比如电话铃响个不停，教员敲门要求得到最新情报等等。学员们还需准备一份局势报告，并向即将赶赴白宫参加会议的中情局官员作简要汇报。教员告诫学员们说：“局势极不明朗，只能在不完整的情报基础上，尽力作出结论。”

2003年，一家美国媒体又披露了一则新闻，文章称，为了应付变化不定的世界新局势，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在搞新花样，于2003年5月中旬开办了一所“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校”。这是一所旨在培养新型间谍的秘密学校。校名取自于中情局一位分析专家的名字谢尔曼·肯特，据说，此人在中情局里极受推崇，还当过

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1953年他就建议创办一家分析人员学校，时过近半个世纪，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所学校设在中情局总部内一所极为隐秘的建筑之内，也有人说它就在中央情报局的办公大楼的二楼。学校的规模很小。第一批学员只有25人，14名男生和11名女生。这些学员并非等闲之辈，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拥有硕士、博士等学位，有一半曾在国外居住或工作过。

学校区域防卫森严，警卫随处可见，安全锁、警报器俯拾皆是。校舍用特殊材料建成，外表上看起来与临近的建筑似乎没什么两样，但实际上有了这种特殊材料，任何人都休想窃听到建筑内的行动。出入这里的学生无一例外地佩戴一种蓝色胸牌，这是他们的通行证，表明他们可以使用标有“绝密”字样的电脑。学生们的垃圾每天都要切碎后烧毁，整个学校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

不过，这所学校并不是培养人们想象中那些能开飞车、动枪动刀、飞檐走壁的特工，而是重点培养能坐得住冷板凳、会动脑的分析专家。学生们学习如何筛选情报、分析卫星照片、检查窃听文件、浏览国务

院报告以及从新闻报道中搜寻蛛丝马迹。据美国《洛杉矶时报》透露，由于预算减少、丑闻迭出、失误不断以及新技术的涌现，作为美国头号情报机关的中情局，近两年来正在悄悄地重新评估它的作用。据中情局中老资格的分析专家说，尽管偷图纸、安窃听器等都是很不错的情报手段，但只有从大量的信息中作出迅速而深刻的分析，才能将敌手的真实意图告诉总统。这所新学校就是中情局改变其惯用手段的最新体现。授课的老师经常组织学生对过去发生的政变、暗杀和入侵等事件进行激烈的讨论。那些教师经常警告学生说，“这里没有退学的规定”——意思是说你们必须对这些内容感兴趣，而且必须获得好的成绩。

近年来，情报分析人员在中情局的分量正在不断加重，他们对美国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情局负责撰写世界上最昂贵、最独家的报纸——《总统每日简报》，每天从美国利益的角度出发，向总统及其高级顾问提供对当日世界大事的看法。据说，历届美国总统对中情局各有好恶。前总统布什曾经是中情局的第九任局长，所以对《总统每日简报》十分偏爱。他执政期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阅览简报。而尼克

松却截然不同，他对这些简报嗤之以鼻。1973年中东战争期间，由于中情局未能预测到战争的爆发，尼克松把“这些玩马戏的小丑”们臭骂了一顿。

据称，肯特学校的课程分门别类，应有尽有，既有分析课，又有实战课。案例分析切合重大的国际事件，诸如1998年5月印尼苏哈托总统倒台事件、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事件等。实战训练则是在属于超级机密的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五角大楼的太平洋指挥中心以及夏威夷的珍珠港进行。学校要求学生既要是某一行业的专家，又要成为中情局的“忠实走狗”。

自“9·11事件”以来，中情局抓住美国人爱国情绪高涨之机，同美国的一些高等教育机构恢复了合作。目前，中情局正一面大幅增加对间谍技术研究的资助，一面从美国大学中招募“最好的”学生。而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也一改近年来对中情局不爱搭理的冷漠态度，开始为中情局的某些关键部门定向培养起专门人才来。那些愿报效祖国的美国年轻人曾梦寐以求想成为其中的一员，美国的许多科学家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该局资助的一些项目的研究。

2002年的一天，中情局科学家兼资深特工菲利普来到拥有1万多名学生的新泽西罗切斯特理工学院，对该校四年级的大学毕业生进行了一系列反恐培训。他给学生们传授了涉及6个学科的知识和实用技巧，例如，如何根据骨骼结构来识别伪装的恐怖分子、如何扭曲光线以便让特工人员躲在阴影里不被发现等。这名科学家还“现身说法”地表演了一番。面对观众，他说了声“隐身”，就变得无影无踪了。这一切令学生们兴趣盎然。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对情报机构的拨款数量骤然增加，其中布什“钦点”给中情局用于抓捕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其他头目的预算就高达10亿美元。这令一度如饥似渴的中情局得到了充裕的资金，该局下属各部门也因此而手头宽绰多了。菲利普所在的中情局情报技术中心获得的年度预算也成倍增加。在此情况下，菲利普就可以把一些搁置已久的计划重新拾起，只是该中心在人手方面还存在问题，因此，他希望能从一些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中物色到符合要求的高技术人才。

目前，中情局和教育机构之间出现了“一个愿打一

个愿挨”的有趣现象。例如，有两所州立大学在2002年任命了同中情局有关系的人员担任校长，其中德州农工大学任命中情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为该校校长，亚利桑纳州州立大学任命中情局负责资助发展间谍技术的创业资本公司副董事长迈克尔·克罗为该校校长。又如，美国教育界大约有30多名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响应政府号召到情报界兼职，填补了由于部分专家被调往反恐战争第一线而留下的空白。

在2002年10月1日更新的中情局网站上，有52个项目招募新人，其中包括电脑专家、精通多种文化的心理学家、环境安全工程师以及录像带制作专家。

中情局的招聘活动得到了美国社会的热烈响应。一年多来，中情局共收到了超过10万份求职申请。但是，由于该局的不少职位具有特殊性，至今仍无人能够应聘。因此，中情局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一些大学，让他们进行“定向培养”。这些职位主要集中在高科技和情报分析方面。例如，能够编制语言自动翻译软件的计算机人员、电脑和网络安全人员，研制能够准确探测生物和化学品的感应设备的人员等。当然，这些人员与执行特殊任务的外勤人员并不一样，因为

他们不必出生入死和外国间谍斗智斗勇。所以，梦想做“007”式间谍的大学生还是趁早别干这行。

除了有专门的教育机构或者是和教育机构联手培养特工之外，中情局特工培训的途径还有很多。据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编写的那套培训特工如何使用魔法和骗术的手册，已经上市出售了。

1953年，魔术师约翰·穆赫兰道为中情局编制了一本特工手册，中情局付给他3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稿费。

手册当中包括如何使用骗术：比如以特有的方式系鞋带向其他间谍发信号，表示“我有情报”、“跟我来”、“我还带了个人来”；又比如如何把药片藏在火柴盒中，然后借点烟引开对方注意力，把药片投入饮料中，以及如何人不知鬼不觉地将小东西装进口袋中等。

这是中情局当年针对苏联展开的心理控制试验项目的一部分。1970年，中情局曾下令将手册全部销毁，但其中一本幸存了下来。

现在，这些内容已经被解密，手册得以重新出

版，起名为《中情局诡计骗术手册》。书中收录的材料是由间谍史学家基斯·梅尔顿和前中情局技术负责人鲍勃·华莱士共同发现的。

中情局副局长约翰·麦克劳林为本书撰写了前言。但特别强调，就他所知，给饮料下药的手段“实际上从来没有人使用过”。

据有关资料显示和一些退役特工的回忆，中情局的那些特工在第一阶段只是接受一些基础技巧训练，比如驾驶、轻武器使用、密码无线电通信、语言社交礼仪培训、化学爆破、心理学等课程。不过在参加训练之前，必要的审核还是不可少的，诸如此类的测谎、药物催眠等，一样都不能少。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基础训练之后，那些合格的特工就被根据不同的专业进入不同的训练营地。一旦进入中情局的训练营，就是“地狱式训练的开始”。其中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就是接受行动处特工的训练。

平时，行动处的那些特工看上去很绅士，实际上他们更像魔鬼，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们拥有美国“海豹突击队”一般的杀人技能。因为他们所接受的

就是这样的训练。美国海豹突击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堪称王牌中的王牌，而且在各国特种部队中，它的作战成功率几乎可以说是最高的。而中情局对这些特工的训练，往往就是采用这样的训练方式。

其中最艰难的就是被称为“地狱周”的强化训练计划。在强化训练过程中，所有学员在6天中只可得到4个小时的睡眠。一周下来后，关节扭伤，骨头摔折，甚至患上肺炎者也大有人在，而且当队员们在水中整整游了一夜而疲惫至极并准备上岸时，教官又告诉他，只要承认无法继续接受训练或者是不适合干这种工作，马上就会有热咖啡送到你的面前，并且可以洗一个热水澡后再美美睡上一大觉。这个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那些意志不坚定者往往会由此被淘汰出局。

在整个训练过程中，他们要同时开展空降、格斗、捕俘和爆破等高强度的训练。他们的格斗教官往往是李小龙式的截拳道大师和咏春拳高手。他们的训练科目也是以截拳道为主的，同时辅以当今世界武坛上极为凶悍的“格雷西”柔术，这无疑是一种最佳的结合。

除了体力和体质上的训练之外，中情局还要对一

些特工进行“洗脑”，在思想意识上对他们进行训练。

有一份“三步走”的资料，即是中情局当年对那些谍报人员“洗脑”的教育材料。1999年6月份，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强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份报告，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这个“三步走”的策略不仅仅是停留在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层面上，在美国这十年来的对华外交实践中，已经得到了体现。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这个“三步走”看来还要“走”下去。

第四章 美苏争锋，两大阵营暗战烽烟不断

冷战初开，柏林、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三大都会成了“谍都”，一时谍影重重，但单靠解读《真理报》无法了解斯大林是死是活；仿效“白银行动”最后成了笑柄，U-2高空侦察机的飞行员被苏联人带上被告席；虽然窃取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让东欧政坛发生了一次“地震”，但耗费3.5亿美元的“杰尼弗行动”打捞计划却不了了之……

效仿“白银行动”

二战刚刚结束，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冷战就悄悄拉开了帷幕。当年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两位盟友，这时

已经成了世界两大阵营的老大。这种格局的形成，为中情局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当时罗斯福总统刚刚去世，新上台的杜鲁门总统解散了战略情报局，只是成立了一个过渡性的机构——中央情报组，其主要的任务就是解读苏联的局势。当时美国人对苏联在欧洲的意图并不了解，也没有了解苏联的渠道，除了收买一些临时性的特工之外，据说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靠读报纸。据中情局当年的一名资深情报分析家弗里兹·W. 埃马斯后来说，当年那些所谓绝密的情报，都是从苏联的公开报刊上得来的二手货。

有一次，他指着一份题为《苏军未来战争思考》的绝密档案说：“中情局当年的专家对苏军未来30年的作战模式与意图都进行了有模有样的分析。然而，我们现在才知道，这些报告与分析完全是在公开资料的基础上发挥出来的。他们完全是靠记者或者学者提供的资料，比如说苏联领导人开会的时候进入会场的秩序，《真理报》上苏联领导人的排名，以及苏军公开报道的大演习等。”

埃马斯并没有夸大其词。不要说在二战刚刚结束

的年代，就是到了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央情报局已经成立了好几年，这种现状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当时有一份关于斯大林之死的情报是这样写的：我们无法确定斯大林是否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他是否死于谋杀，或者他就是如公开的报告所说的那样死去的……

这样的话，简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自从1946年冷战开始后，欧洲大地上不断上演着“北约”与“华约”两大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谍报战。冷战初期，欧洲著名的“中欧心脏”柏林、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三大都会一直是谍影重重，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情报人员都在这里各显身手，进行着全方位的较量，从而使这三座城市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欧洲谍都”。

据西方情报机构的一份资料显示，冷战时期，活跃在维也纳的各国间谍人数最多时竟达2万人，维也纳因此成为冷战时欧洲最大的间谍之都。美丽的维也纳，成了美英特工的窃听天堂。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的特工们，就在这里联袂上演了一出成功的“白银行动”。

1949年，由英国军情六处牵头组织了一次代号为“白银”的秘密行动，成功窃听了苏联人的电话，获得了许多重要的情报。军情六处先是在维也纳的郊区买了一栋房子开了一个花店，借装修花店的名义大兴土木，暗地里却动用工程兵组成的施工队重新整修了公路地面，大面积地铺设了结实的钢筋混凝土，并且从房子下面挖了60多米长的地道，一直延伸到苏军的通讯电缆下面，安装好窃听器材，接通了苏军司令部的电缆，用录音机将苏联人的通话录下来。这样，他们坐在地下室里就可以监听到维也纳苏军司令部与莫斯科所有的通话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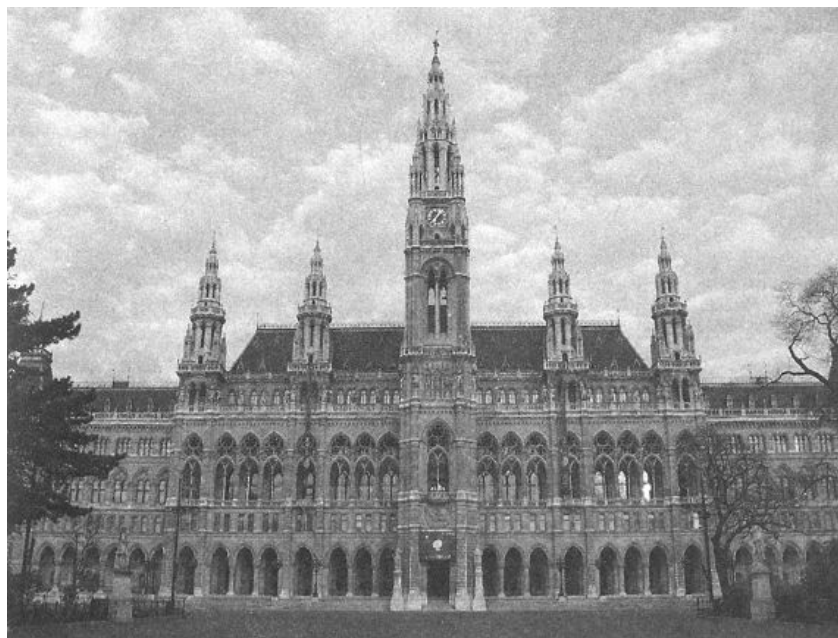
然而令英国情报人员哭笑不得的是，他们的心思并不在花店上，可是本为作掩护的花店的生意却特别的好，每天上门买花的人络绎不绝，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情报工作。原本以为经受了二战失败的维也纳人没有经济能力购买作为奢侈品的鲜花，何况花店只进一些名贵的、罕见的花类，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英国情报人员选择的那些珍贵的鲜花，才吸引了大量的顾客。英国人十分苦恼，不卖花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如果卖花的话，秘密的地下挖掘

和窃听行动就容易暴露。最后，英国人实在无可奈何，便找到一个理由停止销售那种名贵却畅销的鲜花。这个理由竟然是：鲜花的产地遭受罕见的虫灾，暂时没有货源。

当时英国人的确从中得到了大量的情报，并且花钱请了一位漂亮的女大学生来为他们传递情报。那位大学生的任务就是将情报带到一个固定的公园里，那里会有一个英国军官在等待着她。可是由于这个女大学生长得太漂亮，有一次在公园里同那个英国军官接头，那个军官化装成了一个脏兮兮的乞丐，结果让一个警察误认为是乞丐在调戏美人，就把那个“乞丐”带到了警察局。后来还是通过秘密情报局向奥地利政府施加压力，才把那个军官放了出来。

在英国人的启发下，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开始了行动。1951年，中情局驻维也纳情报站获得了一份维也纳苏军司令部的地下电缆网络图。他们立即从华盛顿总部请来了电讯专家卡尔·纳尔森，对维也纳地下设施图和其他市政建设的资料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从这张电缆网络图纸中找到了一条维也纳苏军司令部通往莫斯科的通信线路。于是他们就同英国特工联手，

利用这张网络图扩展“白银行动”，在维也纳建立多条窃听专线，大大提高了窃听的效率。



维也纳市政厅

通用“白银行动”，中情局不仅全面了解了奥地利苏军占领区的军事布防情况，同时还了解了苏联当局其他各方面的信息和外交政策。例如，1948年由于南斯拉夫和苏联一向关系不和，加上铁托不甘受制于苏联，两国关系破裂，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苏联领导的共产党情报局，使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都为如何制定对南斯拉夫的新政策而举棋不定。多数外交家认为，铁托是共产党，他与斯大林分道扬镳是想迷

惑西方国家。但是，后来中情局也是通过从维也纳情报站窃听到的信息，证实了铁托与斯大林分裂的真相。他们知道苏联当时并不打算向巴尔干半岛扩张，也并不想马上逼迫南斯拉夫就范。这一情报的获得，让美国人很快就决定了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当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于是美国政府就放心地从欧洲抽调了大量的兵力，投入到朝鲜战场。

“白银行动”的成功让中情局第一次尝到了甜头，也获得了经验，于是他们马上决定在柏林如法炮制。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去，当年不可一世的德国被分裂成了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首都柏林也被一分为二，柏林和维也纳一样，也成了冷战时期的另一种战场。各国的谍报人员云集柏林，一场“暗战”又风生水起。苏联和美国的间谍部门就在柏林摆开了战场。

当时，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此人足智多谋，是一位间谍老手，他认为柏林是东、西方的结合点，是从事间谍活动的最理想地点，他以一种谍报人员的敏锐看到了一种新的战机。于是决定把柏林当成维也纳，再来一次窃听行动。希伦科

特认为，优质的情报比黄金还有价值，所以他就把将要开展的窃听行动命名为“黄金行动”。

1954年，杜勒斯收到由潜伏在东德的3名间谍传来的情报：在东柏林近郊的格林尼克村有一条地下电缆，可以容纳432条电话线路，其接头离西柏林近郊的鲁多夫村很近。于是，杜勒斯就命令美国特工也在地下开凿一条长约1476英尺、直径为78英寸的隧道直通东柏林地下，拦截在卡尔斯霍斯特的苏联空军司令部与柏林连接的陆上通讯线。他们选择在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钻孔打洞。因为该地区大部分是低矮的棚屋和板房，是来自民主德国的难民用旧材料和破砖瓦搭建而成的，在这里钻孔打洞，完全可以避人耳目。



美国中央情报局首任局长罗斯科·亨利·希伦科特

但是，要想找到这条直径只有2英寸的电缆线很不容易。为了能找到精确的挖掘点，中情局派出特工人员假装在东、西柏林交界处打棒球，故意将棒球远远地打到东德管辖的区域。然而他们的这种伎俩却被友好的东德卫兵破坏了，他们见球过来，便把球抛回西

区。无奈之下，中情局又只好让两名特工伪装成美国大兵，驱车前往东柏林执行任务。他们在预定地点停车假装换车胎，冒险将两个小型无线电发射装置放在选定位置上，这才确定了隧道挖掘的精确位置。

另外，在窃听技术方面，美国人也遇到了难题。当时苏军对西方间谍已相当警觉，将领级的官员通电话必须按规定加密干扰声音。不过，中情局通信专家经长期研究发现，声音受干扰的一瞬间，原声仍留在电话线上，如能运用特殊技术截收原声，就可清晰听到通话内容。中情局决定继续同英国秘密情报局合作。中央情报局自己做的工作首先是选择场地，使隧道的位置正好处在苏联人的电缆线下面；然后录下所有收集到的电讯信号，最后把所有电讯材料送到华盛顿处理。英国同行的任务是建造通讯管道，在苏联的电缆线上搭线，将有用的信号输送到隧道顶端的窃听室录音；帮助在现场再建立一个处理录音材料的工作室。为了确保隧道的挖掘工作万无一失，分工后双方分别做了试验和研究。

“黄金行动”一切准备就绪后，窃听隧道于1954年8月正式开始挖掘。可想而知，这个工程将是多么的复

杂和艰难。它要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位置很危险。这条隧道要从西柏林南郊的阿尔特格里尼克开始，穿过勃兰登堡，再延伸到东柏林阿尔特—格林尼克区的公墓，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地下。由于苏军和东德边防军日夜在地面巡逻，要挖的隧道正好处在苏联和民主德国巡逻队的脚下，一不小心就会被发现；挖掘时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声响，也必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挖隧道会带来大量的泥土和沙石，如果敌人发现凭空多出这么多的土石必然会起疑心；在挖掘时和挖掘后，隧道里都需要大量的空气，否则隧道里会使人窒息，因此需要有相当数量的排风扇；还有，电子仪器工作时热量不能传到地面……

面临着这么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杜勒斯认为只有一个人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他就是比尔·哈维。比尔·哈维是中情局的高级特工，又与苏联间谍打了多年交道，所以隧道的施工就由他负责全面指挥，具体的挖掘工作由美国工兵承担。

谁知挖掘工作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困难。先是遇到了地下水，接着又在另一处碰上了奇臭无比的化粪池排放区，美国工兵只好头戴防毒面具，身穿防水服

工作。

为了解决多出来的泥土等问题，比尔·哈维想出了声东击西的一招。为了迷惑苏联人，他命令工兵部队先在两德交界处修建一个地下大仓库，而这个大仓库就是为了吞掉挖隧道所产生的几千吨泥土。从表面上看，从这个大仓库里进进出出的是装有电子仪器和泥土的车辆，会被人误认为这里将要建造一个无线电雷达拦截站。而当时建立无线电拦截站是十分平常的事情，苏联并不会对其产生疑虑。他们挖掘出来的土先放进雷达站的地下室，然后装进一只只大木箱，木箱外面再贴上各种标签，趁黑夜用卡车偷运出去。当时苏联间谍也曾对此产生过怀疑，但当他们得知是建仓库和雷达站时，也就不再在这方面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经过半年的挖掘，隧道最终于1955年2月竣工，其中有一段直通索恩法尔德公路下面，竟然接通了苏军总部的通信电缆！这条地下隧道长2500米，直径2米，隧道的四壁全用厚铁板镶接而成，铁板表面贴有隔音材料。隧道里装有空调设备来调节温度和湿度，用水泵来排除渗出的地下水。隧道的主体工程是窃听室，

窃听室里设有交换台和432个扩音器。这些扩音器又都和东柏林的那条地下电缆中的电话线路对应。此外，还有一套精密的窃听和录音装置。窃听线路用厚厚的铅皮包着，穿过一层木头隔板、一条陡直的甬道和两重结实的铁门，最后接到东柏林的电缆接头上。这样就能听到“铁幕”那边电话的声音了。这些电话的声音经过扩音器扩大音量后，输送到隧道上面的雷达站。在雷达站里设有432台磁带录音机，它们能把窃听到的所有电话声音都录下来。

为了解决潮湿空气影响电子设备正常工作的问题，比尔·哈维将隧道与其毗邻的窃听室进行隔绝，使窃听室成了近乎封闭的独立小屋，并在窃听室外面15码处，安装了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坚固大门，门上用德语和俄语写着：“军事重地，禁止入内！”安装这扇门是有道理的，中央情报局估计到这条秘密隧道迟早会暴露，一旦被发现，有人沿着隧道查到门前时，便无法继续向前，窃听室的人就可以利用这点时间进行必要的准备。

这就是间谍史上著名的“柏林隧道”。隧道修成后，中情局就可以极其方便而又准确地窃听到东柏林

和莫斯科之间往来的电话了。利用这个布满窃听器的隧道，中情局每天可以录制800盘录音磁带，打印至少4000米长的文传打字带。每个星期，中情局把这些材料送回华盛顿处理，经过翻译后，供分析人员研究。大约50名精通俄语和德语的人员挤在一间只有25平方米的密室里从事翻译工作，而为了防止克格勃窃听，这栋房子周围用铁板裹得严严实实，而且没留窗户。人们给这个房间起个绰号叫“袜厂”。

1954年8月，柏林隧道开凿后不久，监听设备就开始试验截听苏军电话了。第一个重要信息于当年底被截获，是苏联军方传达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要求驻东德苏军保持良好纪律，不可破坏和谐气氛，配合政府同西德改善关系。分析人员根据这份情报做出判断：柏林战争状态有望结束。果然，1955年1月，苏联宣布与西德结束战争状态，9月13日双方正式建交。

在正式运作一年多的时间里，经由这条线缆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每天都有大量的磁带和情报分析源源不断地送往华盛顿，而那些重要情报则由此流向中情局，中情局的良苦用心似乎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们凭借这条隧道掌握到苏联夸大在东德的驻军实力，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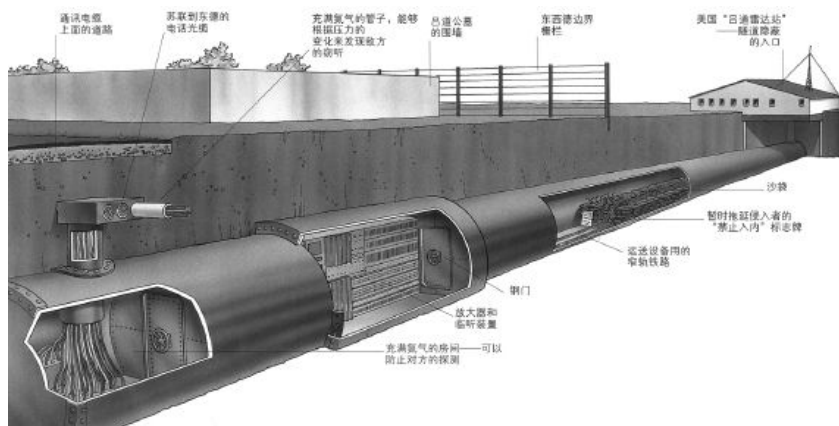
本不可能突然向西柏林发动进攻。同时，他们还获知，苏军在东德修筑了特殊的武器库，分析专家推测，苏联人可能会在东德部署原子弹。从秘密隧道传来的大量重要情报令中情局大喜过望。

然而好景不长，中情局很快就发现他们再也听不到有价值的情报了。就连后来苏联出兵匈牙利那样重大的事件，竟然没有从隧道里获得一点消息。于是美国人开始产生了怀疑——难道苏联人已经发现了隧道的秘密？后来的事实证明，克格勃并不是吃干饭的。

原来，早在隧道还未动工之前，有一个间谍就已经把这项绝密计划的相关文件泄露给克格勃了。他就是世界情报史上有“间谍王子”之称的乔治·布莱克。

乔治·布莱克原姓贝哈，于1922年11月11日生于荷兰鹿特丹。父亲是英籍土耳其人，母亲是荷兰贵族后裔。乔治·布莱克在还是孩子的时候便失去了父亲，同他的叔叔，后来成为埃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亨利·库里尔朝夕相处了几年，受到了早期共产主义教育。在英国，他开始了情报工作，从事密电码的截收和破译，后来被外交部录用。朝鲜战争期间，乔治·布莱克成为朝鲜人民军的阶下囚，并秘密被克格勃招募。

1954年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共同策划实施了柏林隧道计划，以提供苏联向西方进行行动的最前沿情报。然而克格勃轻易地让这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回到英国后，乔治·布莱克继续为英国秘密情报局工作。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克格勃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而且将英国秘密情报局隐藏在苏联内部的特工名单交给了苏联人，让英国情报局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有42名英国间谍因此失去了生命。这一回又是他把柏林隧道的真相报告给了克格勃，向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开了一个大玩笑，让他们毫无颜面。

1956年4月22日，在东柏林郊外的索恩法尔德公路上，一小队苏联通信兵正在对地下通信电缆做例行的检查维修。一名年轻的士兵“突然发现”了一条包着厚铅皮的电线。于是他们顺着这条线路一直向一条陡直的甬道走去，很快就发现甬道前面是一条水平的隧

道，在不远处，一扇钢筋混凝土的大门堵住了去路，门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军事重地，严禁入内”。

在得到上级的指示后，大门被炸开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进去，眼前的一切让他们目瞪口呆：这是一间独立的钢制小屋，里面摆满了各种精密的电子窃听仪器，不同颜色的指示灯还在闪烁。屋内空无一人，电炉上已经煮沸的咖啡还在滋滋地响着，暗示主人刚刚离去。在小屋后面，是一条宽敞齐整的隧道，向远处延伸……

苏联通信兵发现了隧道中的窃听室后，立即向上级报告。莫斯科方面这才发表声明，原来他们早就知道美国人在搞地下活动，他们并没有马上揭穿中情局的阴谋，而是来了个“将计就计”，把机密情报改在其他线路上传送，同时又利用这几条电缆向西方传送假情报，愚弄美国。他们要等到时机成熟才一举粉碎美方的地下阴谋。

苏联随即召开记者会，指责美国人入侵苏联管辖区，并让众多记者参观这条通向美占区的隧道。东柏林的报纸、广播都发表了头条新闻，苏联政府用最严厉的措辞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开凿隧道“从事间

谍”活动的人员，并说美国中情局长杜勒斯的妹妹、美国国务院德国问题专家埃兰娜·兰辛·杜勒斯女士曾两次到这个地下隧道“检查工作”。东欧一些国家的报纸也相继发表评论，指责这种窃听行为严重损害了东德的主权。

不久以后，苏联政府把这条地下隧道作为游览项目向公众开放，并安排向导向游客讲解中情局是如何在这里搞窃听的。据说，在不到两个月的开放时间里，就有大约4万人参观了这个地下隧道。

中情局吃了个哑巴亏，“黄金行动”最终变成了“废料行动”。美国当局除了通过舆论界表示对这个地下隧道“一无所知”外，对苏联的抗议指责和抨击均保持沉默。

直至1961年布莱克的间谍案曝光后，中情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是被苏联人给耍了。

U-2飞机的飞行员被带上被告席

“黄金行动”的失败让中情局很没有面子。中情局当时在一份报告中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集团严格的安全措施确实使传统的搜集情报的方式失去了作用：秘密

特工用隐蔽手段传递情报，要求进出目标区域的旅游者睁大眼睛观察并报告他们的收获，用电话线路或其他的方式进行监听，偷取邮件等方式现在都失效了。的确，情报工作的所有手段对付苏联似乎都没用了，而且还找不出其他的替代方式”。

不过，中情局最后还是找到了一种“替代方式”，那就是派飞机从高空去拍摄苏联的军事设置和装备部署。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空军就开始以波音RB-47侦察机闯入苏联领空进行高空侦察。当时绰号为“高空间谍”的RB-47侦察机称得上是电子侦察机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500多千米，飞行高度大约为1.2万米。为了便于监听，美国人还对飞机进行了改装。瘦长的铝制机舱外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补丁”、“肿块”、吊舱和其他一些附属物，每一个附属物中都藏有一根与众不同的特制天线，整架飞机上加起来总共有400根。有时在飞机的右边还悬挂着一个吊舱，里面藏着更多的天线和接收机。当年一位曾在RB-47侦察机上服役的美国老兵说，“我们通常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溜进我们驻扎的机场，飞机藏在机场的尽头，或者藏在一座孤零零的机库里。”有些小分队的

指挥官甚至不允许机组人员集体出入公共场所。为了避免让人猜想到他们是在执行间谍任务，机组人员有时在进入飞机保养区时，还要在自己的飞行服外套上民用工作服。

当时，美国对苏联发动了一次代号为“本垒打工程”的间谍行动。刚刚上台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全副武装的美军RB-47侦察机入侵苏联。只不过这些由轰炸机改装成的侦察机上装载的是监听设备和照相机而不是核武器。

那次代号为“本垒打工程”的行动是从格陵兰岛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发动的。这个基地设在离北极圈690英里的一个名叫图勒的爱斯基摩村庄旁。在昏暗寒冷的极地，空勤机械师冒着零下35度的严寒检修了近50架轰炸机和加油机。这些飞机将执行冷战史上最为秘密的大规模入侵任务。当时为这些飞机和机组人员搭建的临时建筑，从外表看上去和铁路的冷藏车一样。

那次任务是要深入俄罗斯的整个北部陆地，也就是说，要穿越从阿拉斯加附近的白令海峡直到摩尔曼斯克和卡拉半岛之间长达3500英里的白雪皑皑的永久冻土地带。当时人们对苏联的北极地区几乎一无所

知，然而，由于飞越北极是苏联轰炸机和导弹到达美国大陆的最短路线，因此它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次战争的战场。反过来说，它也最有可能会成为美国入侵苏联的捷径。因此，任何一名观察到美军轰炸机的苏联雷达操作员，都不可能认为美国飞机的任务是侦察而不是打仗。尽管此举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艾森豪威尔总统仍批准了这一计划。

10架RB-47侦察机在格陵兰岛的一座名叫北星湾的基地整装待发。起飞前10分钟，机长看到绿色信号灯又闪烁了3秒钟，提示他可以滑入起飞跑道。他将飞机缓缓地转向起飞位置，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旦进入飞行状态，机组就必须让无线电处于绝对静默状态，以免让苏联电子侦听设备得到任何信息。即使起飞前同地面控制中心联络也只能用短暂的灯火信号进行。

上午10点整，飞行员松开制动闸，飞机震颤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以每小时近200英里的速度在结了冰的跑道上疾驶，身后留下一串灰色的烟雾。当水泥跑道快到尽头时，飞行员将操纵杆稳稳地拉向怀中，飞机以优雅的姿态飞上了蓝天，按计划前往预定的俄罗

斯极地进行侦察。在此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每天大约都有8~10架侦察机起飞，在北极上空加油后继续向南飞越苏联边界，然后飞往预定地域。

这是冷战史上一次最为大胆的入侵行动——10架武装RB-47侦察机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列穿过北极深入苏联空军基地，就像进行一次核轰炸飞行一样。它们先是进入西伯利亚的阿姆巴契克，然后调头向东往白令海峡的阿纳德尔湾飞去，一路上不断搜集苏联空军基地和导弹发射基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大约在两个小时后，这些间谍飞机才准时返航，降落在阿拉斯加的埃尔森空军基地。降落后几分钟，那些录像和录音带就被特别班机送往美国华盛顿总部进行分析。录音带显示，没有发现苏军的雷达信号，这说明当时苏联人对美国轰炸机飞越北极的行动茫然无知。苏联的俄罗斯北部边疆是一望无际的冻土带，确实不易受到雷达监视。但是没人敢想象，如果苏联的雷达当时要是发现了这批入侵的轰炸机，并且认为是美国人要发动突然袭击，真不知道这次行动该怎样收场，因为只要几秒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发起反击，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在实施“本垒打工程”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美军侦察机总共飞越苏联领空执行侦听和照相任务达156次之多，却没有损失一架飞机，也没有由此引发战争，尽管莫斯科觉察到了美军飞机的空中入侵行动。不过在这次大规模入侵后的第8天，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收到了一份抗议照会，指责他们的入侵行为。但是在公开场合，苏联人却一直缄默不语，而美国人也依然我行我素。

就在美国的RB-47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的同时，另外一些电磁侦察机也在进行危险的“猎狐行动”。为了探明敌方的空防系统，它们冒着遭受苏联人反击的危险匆匆穿越敏感的边界地区。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迫使苏军的导弹连和边防部队开动秘密跟踪设备，从而使美国信号人员捕获宝贵的电子信号。经过分析处理之后的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作战计划人员确定哪里是敌方的薄弱环节，以及用何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反击敌方的雷达和火力控制系统。

当时中情局为什么要冒着飞机被击落的危险，派出大量的侦察机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的空中侦察呢？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途径获得所需要

的情报。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时，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刚上任一个星期。中情局的那些情报官就不得不感叹道：“对于克里姆林宫的思维方式，我们没有可靠的内线消息。”

而刚刚上台的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此也很不满意，他指责中情局的那些情报官说：“我们对苏联的长期计划和意图的评估，都是根据不充分的证据所做的揣测。自从1946年以来，所谓的专家都在放言高论斯大林一死会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国家该如何应对。现在他死了，各位不妨翻翻政府档案，找找看我们订了什么计划。我们没有计划，甚至不知道他的死会有什么影响。”

正是这种证据不足的揣测，让斯大林之死强化了美国对苏联的猜疑。当时对中情局而言，问题不在于斯大林的继任者是谁，而是担心苏联会不会抢先发动战争。不过事后证明，中情局当时对苏联的诸多猜想，不过是杞人忧天。因为斯大林在生前从来就没有称霸世界的大计划，也没有支配世界的手段。斯大林死后，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曾回忆说，斯大林一想到可能与美国发生全球战争便浑身“发抖”和“战栗”。赫鲁

晓夫说：“他怕战争。斯大林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他不会做什么可能挑起与美国大战的事。”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但从苏联当时的策略来看，其根本的弱点之一，就是日常生活的每一层面都附属于国家安全之下。斯大林和他的后继者对保护国家疆界都有着一种病态般的执著。先是拿破仑从巴黎长驱直入，接着又是希特勒从柏林攻来，所以斯大林认为唯一有效的战后外交政策，就是把东欧变成巨大的人肉盾牌。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让苏联元气大伤。正如美国人所讽刺的那样，“斯大林把全部精力用来暗算国内政敌的时候，苏联人民正在大排长龙似的队伍等着买一袋马铃薯”。

正是由于苏联的这种沉默，才让艾森豪威尔自1953年上台之后，使美国享有了八年的和平与繁荣。不过，艾森豪威尔也一直担心可能发生核战争。中情局又一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让他放心。1953年6月5日，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竟在一次国安会上明确表示，中情局无法“通过有效的情报渠道提供任何苏联突击的预警”。

几个月后，中情局提出大胆猜测，认为苏联在

1969年之前没有能力对美国发射洲际导弹。事实证明，这个估计与后来的事实整整相差了12年。因为在1949年8月，苏联就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试验。1953年8月，苏联又进行了氢弹试验。苏联成功试爆的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不是核弹，但也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可是中情局当时却毫不知情。直到6个星期之后，艾伦·杜勒斯才向总统报告了苏联试爆的情况。当时艾森豪威尔犹豫不决，他考虑是不是应该抢先对莫斯科发动全面核武器攻击。不过当时美国根本就不知道，莫斯科究竟是有1枚核武器，还是有1000枚核武器，所以他们无法作出准确的决策。

“本垒打工程”结束两年之后，中情局又派出3架RB-47侦察机从英格兰起飞，朝苏联北部的科拉半岛飞去。不过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幸运。在离戒备森严的港口城市摩尔曼斯克大约100英里的地方，2架侦察机按计划调头返航。第3架径直继续飞向海岸线。就在飞行员打开照相机和侦听设备还没有几分钟，苏联的米格战斗机群就呼啸着冲上了蓝天，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炮声。一架米格-17战斗机在上方开火了。炮弹从机翼上穿过，打坏了飞机内部通讯系统，在油箱上穿了

个洞。当飞机逃入芬兰的领空时，机上的油料快漏光了，剩下的那个油箱总算救了机组人员的命。在后来的几年内，被苏联人击落的美军RB-47侦察机超过了40架，牺牲的飞行人员也在200名以上。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的防空政策有非常重大的转变，防空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实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人就偷偷地提高了自己的防空能力，只是美国人当时还没有觉察到而已。早在1952年8月，苏联的战机就闯入了日本北海道的领空，击落过美国空军的RB-47侦察机。美国人意识到，在苏联领空进行高空侦察和拍照变得愈来愈危险了，因此，美国空军开始寻求一种飞行高度为2万米以上的亚音速高空侦察机，想利用高空飞行来逃避苏联的米格-17战机的拦截。因为美国人知道，苏联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米格-17的飞行高度为1.3万米。

1953年7月，美国空军要求将B-57堪培拉式轰炸机改良成一种超高空侦察机，几经周折，最后在1954年11月23日，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批准中情局负责CL-282型飞机的生产，并要空军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12月22日，中情局与洛竭公司签订了一份意向

书，要求洛竭公司制造20架CL-282机体和1架双座型及其他零件，由空军提供发动机。

由于CL-282设计作侦察之用，因此官方名称代号并没有使用B（轰炸机）或F（战斗机）之类的系列，但它属高度机密，所以又不能使用侦察机的代号。为了隐藏其真实用途，美国空军于1955年7月才选择了U这个代号。从此CL-282就被确定为“U-2”。“U”在美国空军的飞机用途分类中代表“杂务”的意思。

高空侦察机U-2型飞机就这样问世了。U-2的侦察能力在当时也的确是一流的。U-2上装备的高分辨率摄影组合系统能在4小时内，在1.5万米高空拍下宽200千米、长4300千米范围内地面景物的清晰图像，并冲印出4000张照片用于情报分析；在9000米的高度拍下的照片，经过放大后可以看清地上人阅读的报纸的大标题！曾经有传言说，克格勃后来偷出了一张U-2拍摄的照片，连莫斯科广场停车场上的小车牌照都看得清清楚楚！在高精度的光学侦察卫星问世之前，U-2是最强的战略侦察武器。很多技术即便是放在现在，技术含量也依然很高，而在那个时代，U-2是不折不扣的偷窥利器。

1955年8月4日，U-2侦察机试验首飞，打破了由英国人保持的22707米升限的世界纪录。1956年5月首批4架U-2侦察机开始服役，1956年7月2日开始执行侦察任务。截至2005年共有29架单座和5架双座U-2在役。直到2006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才宣布U-2机队将陆续退役。



号称“侦察之王”的U-2飞机是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王牌间谍机

195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U-2飞机首次飞越苏联领空；7月5日对莫斯科进行侦察。从1956年7月开始，中情局多次派遣U-2型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肆无忌惮地对苏联进行侦察。虽然屡次遭到苏联米格-17等战斗机的迎击，但当时能对U-2型高空侦察机产生真正威胁的战斗机并不存在。在整个50年代，

漫长的苏联边境上空一直回响着美军侦察机的嗡嗡声。

然而，就在U-2飞机春风得意之时，它的厄运也悄悄地来临了。由于苏联米格-19战斗机的问世，让U-2飞机在后来的飞行过程中，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的这种U-2飞机当时一共制造了86架，但是在1957年美国空军开始使用U-2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就损失了9架。截至2001年，就有40架U-2严重损坏或全毁，曾在苏联、古巴和中国上空多次被击落。后来的一些U-2飞机大都是从损毁的飞机中取得零件重新制造的。

1960年5月1日，中情局的一架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领空侦察时，被苏联的S-75地对空导弹击落了，飞行员加里·鲍尔斯逃生后成了苏联的俘虏。据说，这架飞机之所以被击落，是因为这架飞机被苏联的特工做了手脚，在它的飞行高度未达到2.5万米时，而仪表却显示达到了2.5万米，结果才被苏联的米格-19战斗机击落。

这是U-2在苏联首次被击落，并且被公布于世。这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莫斯科此时正处在节日的欢

乐之中。当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报告说，一架U-2飞机已从阿富汗越过边界，正朝俄罗斯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方向飞来时，赫鲁晓夫就对着话筒咆哮说：“不管用什么办法也要把它打下来！只要我们的防空部队能够紧紧盯住它，我相信我们就能把它打下来。提抗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讨厌这些不速之客，也讨厌总是屈从于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

5月5日，赫鲁晓夫站在克里姆林宫大礼堂的讲台上大声宣布：“我必须向你们报告美国在过去几周内针对苏联采取的某些侵略行动。”他的声音不断升高，最后变成了喊叫。“美国派遣飞机越过边界，侵入了苏联领空。就此前发生的数次入侵行动，我们向美国提出了抗议，并提请联合国安理会注意。但是，美国总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否认侵略事实，即使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它仍在抵赖。但是五天以前，也就是在那个伟大的5月1日，一架美国飞机越过我国边境并深入我国腹地，但是这架飞机被我们击落了……”

挤得满满当当的大礼堂顿时一片欢呼。人们一边鼓掌，一边粗野地跺脚、吹口哨，甚至把手中的的帽

子抛向空中。

赫鲁晓夫朝下面挥了挥手，接着说：“想象一下，如果一架苏联飞机出现在纽约、芝加哥或者底特律上空，那会发生什么事？美国将做出何种反应？那将意味着战争爆发！”

赫鲁晓夫指着西方，再次向空中挥舞着拳头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谁派遣这架飞机越过了苏联边界？是美国的总司令？众所周知，美国的总司令就是美国总统。或者是五角大楼的好战分子在总统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实施了这次入侵行动？如果美国军人可以擅自采取这种行动，这个世界就危险了。”

礼堂里再次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U-2飞机被击中后在莫斯科以东的乌拉尔山区坠毁，苏联人对其残骸进行研究。

两天之后的5月7日，星期六，赫鲁晓夫又抖了一个“包袱”。他站在主席台上，俯瞰着出席最高苏维埃会议的代表们，满面笑容地说道：“同志们，我必须让你们知道一个秘密。两天前我做报告时，我故意没有说出我们已找到了飞机的残骸，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抓住了飞行员——他不仅活着，而且还在提抗议！”

礼堂中发出哄堂大笑，欢呼声震耳欲聋。

苏联人把U-2飞机的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带到了被告席上，对其进行公开审判。法庭工作人员用俄语向他宣读法庭规则时，他显得茫然不知所措。他长了一张柔和的娃娃脸。每当听不懂提问时，眉毛会习惯性地拧成个疙瘩，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很招人喜欢。通过翻译，鲍尔斯老实地回答了审判员的提问，供认了他任务的性质和派遣他的单位。最后他以间谍罪被起诉，由苏联法庭判处了10年有期徒刑。

那次对鲍尔斯的公开审判让美国人太丢面子了。许多美国人认为，站在苏联法庭被告席上的并不是鲍尔斯，而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或者是中情局长艾伦·杜勒斯。

刚好当时在大西洋彼岸，克格勃一位名叫文贝尔的上校在美国亚特兰大市的联邦监狱里服刑。艾贝尔的父亲是彼得堡一家工厂的工人，德国后裔。他热忱地投身于布尔什维克事业，几次见过列宁。1947年，艾贝尔（真名叫菲舍尔）奉克格勃之命，来到美国潜伏下来，从事间谍活动，1956年被美国人逮捕，被判30年徒刑。1962年2月10日，经双方同意，美国人以艾贝尔和苏联人进行交换，才把鲍尔斯换了回来。

尽管如此，U-2飞机事件还是成了美国政治风景中的一大败笔。于是在美国1961年的大选中，艾森豪威尔终于结束了他8年的总统生涯，在一片舆论声中下台了。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下台，艾伦·杜勒斯也从中情局局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艾伦·杜勒斯是中情局历史上任期时间最长的局长，他从1953年上任，到1961年下台，在中情局整整干了8年。上任时，杜勒斯已经56岁，头发灰白，戴着眼镜，叼着烟斗，颇有学者派头，给人一种斯斯文文的感觉。实际上他精力充沛、老谋深算、极有心计。美国人都戏称他为中央情报局的“狐狸局长”。

杜勒斯对中央情报局的贡献在于，他顶住了麦卡

锡对中央情报局的攻击，使得中央情报局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代了国务院的作用，成为推行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提高了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的威望。上台伊始，杜勒斯就广泛地结交全美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商和广播公司，拉拢参、众议员，讨好报纸专栏作家，全力打造中情局的公众形象。但是到了关键时刻，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力气。

杜勒斯当年曾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全美顶尖周刊的老板保持密切联系。他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更改突发的新闻，就可以把不满意的海外特派员调离岗位，或者是让《时代》杂志柏林分社主任与《新闻周刊》驻东京人员为其所用。当年，多诺万管辖的战时宣传机关“战争新闻处”的那些退伍军人，后来都在主管美国大部分的新闻媒体，成了中情局在新闻媒体的“线人”。到了杜勒斯时代，听从中情局电话调遣的人包括亨利·卢斯和他旗下的《时代》、《生活》、《财富》等周刊，以及《大观》、《星期六评论》和《读者文摘》等人气杂志的主编，此外，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最有权力的主管等。杜勒斯所建立的公关与宣传机器，包含50多家新

闻机构，10多家出版公司，还有阿克塞尔·斯普林格（西德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大亨）之流亲口保证的全力支持。

杜勒斯当时希望外界把他当做专业谍报机关的高明大师，新闻界也尽职尽责地塑造这种形象；不过，要知道，中情局档案说的可是全然不同的故事。

当年美国除了派遣U-2飞机在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之外，还对古巴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多次侦察。1958年3月，U-2飞机第一次入侵我国领空，开始对我国侦察，结果在1962年9月9日第一次被我国在江西南昌上空击落，飞行员被俘，送医院后死亡。有资料显示，U-2飞机在我国一共被击落了5架。



第3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

在U-2飞机入侵的同时，中情局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对苏联的情报进行窃取的机会。几乎就在与“黄金行动”曝光的同时，中情局成功地窃取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给世界制造了一

片混乱，也让苏联人在全世界丢尽了脸面。

“美国之音”每隔一小时广播一次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3月，美国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收到一份由打入苏联内部的高级特工发来的密电。该密电称，“苏联内部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个情报让杜勒斯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知道这时离斯大林去世已经整整三年了，他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刚刚主持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尽管中情局早就分析出苏联内部将发生变化，可是没有预料到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原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国外共产党代表不能参加的“秘密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是谈斯大林违背列宁的“遗嘱”，违背马列主义，在卫国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做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和苏联人民所不知的事件内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控斯大林为“暴君”，说他在一系列大清洗中，处决或逼死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上千名十月革命时的老布尔什维克，屠杀了包括“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在内的数百名红军高级将领，杀害了十几万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数百万人被流放，上千万人遭株连……斯大林简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我这个报告不想全面评述斯大林的生平事迹……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对我们党的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上变成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我们必须坚决彻底地揭露个人崇拜，无论在思想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

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预示着，苏联社会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上，整个国际形势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随后，赫鲁晓夫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斯大林的遗体被迁出红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更改了名称。一个曾经被苏联人民引以为荣的显赫人物，顷刻间坠入了十八层地狱。

由于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特别安排的一次会议上作的，报告的复印件没有散发，只有克格勃保存了几份报告，那是用来听取苏联党内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意见时用的。对于这样的一个秘密报

告，尽管还不知道其内容，但是中情局长杜勒斯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份影响深远的报告。他向总统汇报后，艾森豪威尔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就向杜勒斯下了一道指示：“马上命令你的手下想尽一切办法把赫鲁晓夫的报告搞到手。苏联很有可能发生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

如何才能够搞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杜勒斯把他得手的手下一个个地排查了一遍，最后选择了情报处长罗伯特·艾默里和计划处长威斯纳两个人去执行这项任务。

带着秘密使命，艾默里于1956年3月从华盛顿飞抵南斯拉夫。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外交特使。艾默里很快从贝尔格莱德打听到，赫鲁晓夫之所以要对斯大林进行极端批判，就是因为赫鲁晓夫儿子的死跟斯大林有关。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曾是一名飞行员，在一次战斗中失踪了，成了德国人的俘虏。最终他向德国人妥协，成了敌人手里的一名人质。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把列昂尼德清除”。派到德国执行任务的“锄奸队”将列昂尼德押回了莫斯科。

莫斯科军事法庭判处了列昂尼德死刑。赫鲁晓夫曾多次请求斯大林对他儿子从宽处理，但他的儿子最终还是被枪决了。

艾默里来到贝尔格莱德后，直接拜访了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爱德华·卡德尔。他花了近两个小时和这个外交部长套近乎。在像是扯闲篇的漫谈中，艾默里轻描淡写地向卡德尔提出了谈话的主题。他说：“据可靠消息，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曾作过一个报告，谈到了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这个报告，你们的代表团也拿到一份复印件，对吗？”



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卡德尔点了点头，证实了艾默里的问话。

艾默里又说：“苏联是大国，美国总统对这件事很关心。他让我转告你方，美国想看看苏联的报告，你

看行吗？美国方面将对此事严加保密！”

尽管艾默里抬出了美国总统，但卡德尔显然意识到了艾默里的用心，于是就装作有点无奈地说：“这件事，需要铁托同志批准。”

艾默里很清楚卡德尔是找退路。第二天，艾默里又去了外交部。一见到卡德尔，他竟不顾外交礼节直接问道：“怎么样？”

卡德尔没有回答，却递给艾默里一杯威士忌酒，然后说：“朋友，铁托同志说了，我们要尊重友国。”

艾默里明白了，南斯拉夫不相信苏联，可更不愿巴结美国。艾默里想到过南斯拉夫人的拒绝，但没有想到他们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与此同时，威斯纳也正在千方百计把这份报告搞到手，最终他如愿以偿了。

据后来的档案记载，苏共二十大结束后，苏共领导人便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复印件分别赠送给了前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保加利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契尔年科夫、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和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另外，法共中央总书记

多列士、意共中央总书记陶里亚蒂、奥共中央主席科普勒尼希、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伊巴露丽等人也拿到了报告的摘要。3月初，铁托也得到了报告的完整文本。此后，对“秘密报告”的报道以及对部分内容的转述和摘要已陆续出现在某些政党或国家的报刊上。

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的1956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病逝，他的同志在帮他整理遗物时发现了“秘密报告”的文本，就有一个人把它复制了。“复制件”很快就出现在华沙的黑市上，其中有一份被一位美国人以300美元的价格买走了。这个人就是威斯纳。他立即把这个报告传到了中情局总部。

原来威斯纳当时一听到贝鲁特在莫斯科病逝的消息，就敏锐地感觉到这可能会帮助他得到秘密报告。因为为了争夺贝鲁特继任第一书记这个诱人的职位，波兰内部不同派系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威斯纳就抓住这个机会，用金钱收买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复印了一份赫鲁晓夫的报告。

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得到这份报告后，立即派人将这份报告秘密送到莫斯科。经过美国驻苏联大使查尔斯·波伦的鉴定，确认了这是赫鲁晓夫的报告。不

过，这份复印件却有35处删节，有关苏联今后对外政策方面的内容全部被删去了。原来苏共当时发给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报告都是节略本。

威斯纳立刻召集特工们商量对策，要求特工们再窃取一份报告的全本。这时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对威斯纳说，这件事靠我们的力量恐怕难以办到，只有借助摩萨德的帮助，才能尽快搞到报告的全本。

摩萨德是以色列的情报机关，很受西方各国关注，同中情局有着较好的合作关系。摩萨德果然神通广大，两周后就搞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本。据说是一位华沙市委书记将秘密报告交给了一位担任记者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就是被称为“世纪间谍”的摩萨德特工威克多·格雷耶夫斯基。1994年2月的一个下午，他接受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谈到了当年获得这份报告的经过。

摩萨德得到这份报告后，以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中情局。威斯纳拿到这份报告便立即和詹姆斯·安格尔顿一起把报告送交给机要室负责人雷·克莱因，请他进行鉴定。一周后，克莱因异常兴奋地在一次由威斯

纳主持的秘密会议上宣布：“这是一份真正的报告。我们拥有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也将成功地获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称做是他本人“情报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

后来中情局就让美国全球广播电台“美国之音”，隔一小时广播一次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整个世界震惊了。世界各地开始了对苏共“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西方国家开始大量批判斯大林，批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尤其是在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许多国家内部普遍出现政治危机，东欧国家有几万人退出共产党。这一切，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苦心经营的结果。

尽管如此，中情局对苏联的情报行动并没有就此罢休。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扳倒了这个“老大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才会乱了阵脚，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决不放过，于是就有了中情局后来的“杰尼弗行动”。

“杰尼弗行动”花费3.5亿美元

1968年2月25日凌晨7时，苏联太平洋舰队的547号核潜艇离开了远东某军港驶向太平洋。3月12日核潜

艇突然和指挥部失去联系。1968年3月，美国夏威夷海军监听站记录到一个异乎寻常的奇怪信号。美国海军随即悄悄地派出一艘现代化测量船“米扎尔”号开赴潜艇失事海域，经过两个月的勘查后，终于找到了失事的潜艇，原来这就是神秘失踪的苏联547号核潜艇。

在得到中央情报局和尼克松总统的批准后，美军一边封锁消息，一边开始着手打捞。世界海洋打捞史上一项最离奇、开支最大的秘密行动开始了。这就是中情局实施的代号为“杰尼弗行动”的打捞计划。

当时中情局选中了拥有大量地产的亿万富翁霍华德·休斯承担打捞潜艇的工作。双方于1969年签订了打捞合同，在休斯的船只寻找海底矿物的时候，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打捞苏联潜艇。整个“杰尼弗行动”的打捞计划总共将花费3.5亿美元。

1974年6月，休斯总部的大量文件被盗，包括“杰尼弗行动”的秘密文件和休斯关于打捞苏联潜艇的亲笔记录一起不翼而飞。尽管联邦调查局想方设法找回文件，秘密还是被公开了。

1975年2月，《洛杉矶时报》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情报机关捞起一艘苏联潜艇》报道了事情经过。中

情局见潜艇打捞事件已经暴露，便干脆对“杰尼弗行动”计划做了详尽的介绍，并宣布找到了70名船员的尸体，安葬仪式用俄、英文进行，整个过程还被拍成了电影。由于苏联政府的反应不强烈，美国方面还决定进一步打捞，新的行动代号为“斗牛士”计划，但这一计划至今尚未实施。

那么，苏联547号核潜艇为什么会沉没于深海底？经过情报部门分析，这艘核潜艇可能遭到过水下撞击。出事后，苏联海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紧急救援和大规模的搜索活动，都没有找到目标，却意外地被美国海军发现了。找到苏联核潜艇后，美国海军高层并没有立即告知苏联，而是就是否要打捞苏联潜艇多次进行磋商。因为如果打捞成功，美国海军将成为珍贵军事情报的拥有者：潜艇残骸、核弹头导弹、武器装备、船上的俄军密码本等等。

美国海军在得出秘密打捞的结论后，便向中情局求援，他们知道，绝不能让国会和新闻界得到一丝风声，否则计划将流产。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之后，决定有必要与总统沟通一下，在他的劝说下，尼克松总统同意进行打捞行动。在得

到了政府和中情局的同意后，美国海军立即行动起来，跃跃欲试，但冷静而世故的中情局专家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制定了详尽的行动方案，以免走漏任何风声。为完成打捞，休斯建造了一艘大型的海上作业船，并将该船命名为“格洛玛”号。在建造“格洛玛”号作业船的两年时间里，中情局为了转移公众视线，利用各种渠道，积极散布休斯将用这艘船去开发海底矿物的消息，掩盖该船的真正用途。

1972年，“格洛玛”号作业船下水进行深海作业。为了掩人耳目，中情局让“格洛玛”号首先进行了海底矿物勘察工作。1974年6月20日，“格洛玛”再度出海，开始了打捞潜艇的“杰尼弗行动”。7月中旬，潜艇开始上吊。然而，当潜艇被吊升至一半高度时却断成两截，其中一部分沉入海底。这一部分正好是潜艇的尾部，包括导弹舱和密码舱在内。而占艇身长三分之一的另一部分被吊出了海面，安装在驳船上面，随后驳船浮出海面，“格洛玛”号返航。

本来“杰尼弗行动”就此结束，但是由于装有导弹舱和密码舱的潜艇尾部没有被打捞出来，而这部分正是中情局最想得到的部分，因此为了获取苏联潜艇的

全部密码、指挥示意图等不可多得的情报，中情局认为应该继续进行打捞行动。与此同时，美国高层中的一些人认为这种冒险行动有可能使美苏关系恶化，反对继续进行打捞。就在两派意见争执不下的时候，这一秘密行动的内情被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获悉并予以曝光。在“杰尼弗行动”被公开后，苏联政府一直希望获得547号遇难潜艇的消息。

1990年1月，苏联方面要求美国提供打捞潜艇的详细材料，包括发现的遇难人数、海葬地点等。据分析，当时苏方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是计划自己动手打捞剩下的潜艇残骸。但是，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苏联的打捞计划最终也不了了之。

“杰尼弗行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对苏联挑起的一场间谍战，表面上看是美国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但实际上美国人尽管花费了3.5亿美元的代价，却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第五章“肃鼠行动”，安格尔顿成了“瘟神”

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进入“冷战”时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间谍战也愈演愈烈，一个个惊心动魄的间谍案层出不穷。继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之后，神秘的斯尼帕又拉开了“肃鼠行动”的序幕。从此，冷酷的安格尔顿也由中情局的“保护神”而变成了中情局的“瘟神”，他亲手制造的一起起冤假错案几乎断送了中情局，最后他不得被“请”出了中情局，“肃鼠行动”也由此画上了句号。

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

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在内部发起了一个“肃鼠行

动”，来查找潜伏在中情局的“鼯鼠”。这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就是詹姆斯·安格尔顿。他在1954年至1974年担任中情局反间谍处处长期间，曾经疯狂地追杀他所认定的“潜伏间谍”。在长达10年的“肃鼠运动”中，安格尔顿以他特有的敏感、歇斯底里和莫名其妙的臆想，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真可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捕谍狂”。大名鼎鼎的美国中情局在世界情报组织龙头老大的地位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其内部的不平静更使其雪上加霜。

安格尔顿生于1917年，母亲是墨西哥人，父亲是镇压墨西哥革命的美国军官。1945年杜鲁门总统解散战略情报局以后，安格尔顿是战略情报局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安格尔顿在中情局内是个传奇式人物，神秘色彩浓厚。他是个瘦高个儿，瘦得像一具干尸，身穿黑色的丧服。他性格内向，喜欢对提问题的人反问。他还曾赢得种植兰花的桂冠，而兰花是每7年才开一次花，可见此人具有超常的耐心。有一次，一位官员应召去他的办公室，发现他蜷缩在一间密室里，窗户上蒙着漆黑的窗帘，没有一丝光亮。“安格尔顿本人正在刺眼的灯光下阅读文件……我觉得我仿佛去了一

个不能对任何人讲的地方……这种感觉整整一天后才消除。”

自从二战结束以后，中情局一直把目标对准了苏联。双方在人力和物力上互相斗智斗勇，高招迭出。

20世纪50年代，美国情报部门揭开了苏联撒在西方的间谍大网，一举破获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联邦法院当庭宣布判处罗森堡夫妇死刑。时任大法官的考夫曼说：“我认为你们的罪行比谋杀还要严重。在杀人案中，一个犯人杀掉的只是他手下的受害者。你们的行为使俄国人比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的预言提前好几年制成了原子弹。依我的观点，共产党人因此才侵略朝鲜，造成了5万多人的伤亡。由于你们的背叛，你们使历史的进程转向不利于我国的方向。每天在我们周围都有你们的叛国活动带来的影响——因为全国的百姓都在忙着为防止原子弹袭击做准备。”

罗森堡夫妇开始了漫长而绝望的等待之旅。在这期间，夫妻俩交换了大量的信件，以相互激励。这些信件也是罗森堡夫妇获得同情的主要源泉。“我多么不愿意离开你那多情的拥抱，我多么悲伤啊！”埃塞尔在信中深情地写道，“在走向牢房时，我又是多么无奈，

步履维艰。牢房在那里静静地、无情地、倨傲地等候着我，它对我的离去无动于衷，又似乎知道我终将回来而暗自得意。”朱利叶斯也用满腔深情回应：“埃塞尔，你在信中深情地表达了我们受到的最大挫折，我们彼此间的了解和深沉的爱。孤独的监狱笼罩着我们，阴森的死神威逼着我们，但这绝不能中断我们与那动荡的外部世界的牢固联系。我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你、我最亲爱的人也在这个地狱里受折磨。只有你那坚定不移的意志使我经受住磨练……”

哀婉动人的信件打动了千千万万的普通美国民众，美国一家“左倾”的杂志《国民前卫》发表了记者威廉·鲁本写的调查报告，该报告在连载7周后，美国的舆论明显发生了转变，有些人不再认为被告有罪了，要求复审罗森堡一案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成立了“确保公正审理罗森堡案件全国委员会”，鲁本担任该委员会的代理主席。然而，1952年2月25日上午10点，纽约美国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罗森堡案件的上诉请求，他们的深挚情感没有打动美国的司法和行政当局。



罗森堡夫妇是美国二战后唯一以间谍罪处死的平民，这一间谍案曾在美国甚至全世界引起巨大影响。

与此同时，不断有知名人物加入重审罗森堡案的请愿行列，这里面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是“曼哈顿计划”原负责人哈罗德·尤里博士，另一位就是爱因斯坦。欧洲报界也开始关注此案，一些意大利左翼刊物甚至对教皇十二世没有出来讲话而表示遗憾。

总统艾森豪威尔驳回了所有的请愿书。1952年6月19日上午8点06分，朱利叶斯·罗森堡被执行电刑，几分钟后，轮到埃塞尔·罗森堡坐上电椅。这个女人淡定地从一群犹太教教士面前走过，带着类似蒙娜丽莎的微笑。

在罗森堡夫妇死后许多年里，他们的案件成了杂志、报纸、书籍、戏剧和电视报道的主题。在许多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考夫曼法官和美国联邦调查局都受到了抨击。

直到1989年10月柏林墙倒塌之后，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终于结束。两年后，苏联解体，俄罗斯公开了原子弹间谍案的档案：朱利叶斯·罗森堡确实是苏联间谍，他的妻子则对此事一无所知。当原子弹间谍案刚被揭开之时，大批的苏联间谍纷纷潜逃，而可怜的朱利叶斯则因为在间谍网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竟然没有人通知他逃跑，从而成了苏联情报机构的牺牲品。至此，原子弹间谍案总算真相大白了。

神秘的斯尼帕拉开了“肃鼠行动”的序幕

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之后，面对“共产主义世界”接踵而来的叛逃者，中情局却似乎看花了眼睛，结果昏招迭出。最后竟搬石头砸到了自己脚上，不仅没能揪出潜伏在内部的苏联“鼯鼠”，反而元气大伤、贻笑大方。

中情局这一次持续数年之久的“肃鼠行动”，是由

一个叫斯尼帕的人引起的。

1960年3月18日下午2时，美国驻瑞士大使亨利·泰勒收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他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收信人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

泰勒随即打电话给中情局驻伯尔尼的情报站长，这位站长赶过来一起拆开了信封。这封信很短，是用打字机打的，信上说：“我愿意就共产党西方的间谍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如需要，请在《法兰克福日报》的人物专栏上登一则收到信件的启事，斯尼帕。”

那么，这个陌生而又神秘的斯尼帕到底是谁呢？这是不是共产党设置的圈套呢？中情局费尽心机，想确定斯尼帕的身份。最后，他们坚信：从信的内容看，所用句子全是波兰句法，打字机和墨水也是东欧产品，斯尼帕有“铁幕”国家的背景，当无疑问。

根据对方的要求，中情局在《法兰克福日报》的相应版面登了一则小启事：“斯尼帕信收到，欢迎继续联系。”此后，斯尼帕的信件就源源而至。

通过这一方式，中情局又给了斯尼帕两个联系信箱号码，在西柏林的一家公共浴池设立了一个秘密投递点。还给了他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电话号码，

由此与之开始了固定的通信联系。

1960年圣诞节前，斯尼帕终于使用了中情局给他的应急电话号码，因为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已经盯上了他。圣诞节那天，斯尼帕现出了原形。他带着他娇艳的情妇出现在美国驻西柏林的军事代表团，这位真名叫米哈伊尔·戈列涅夫斯基的波兰间谍使美国人获得了意外的惊喜——原来他既是波兰军事情报部副部长，也是克格勃埋藏在波兰军情部门里的坐探，真是一条大鱼。

戈列涅夫斯基对叛逃早有准备，他似乎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暴露，因此在叛逃前几个月，就把几百份事先拍下来的文件藏在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路过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叛逃日期选得也很理想，就在圣诞节。波兰情报部起码要有几天时间才发现他的失踪，再过几天才能采取行动。

中情局得到了戈列涅夫斯基藏在树洞里的文件，他们发现，这是用米诺克斯相机拍摄的文件胶卷，总数超过300张，其中包括波兰在西方国家活动的间谍名单及波军情部的组织编制表，中情局的官员大喜过望，称戈列涅夫斯基是“美国有史以来所拥有的最佳叛

逃者”。

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戈列涅夫斯基的叛逃让一大批苏联间谍在西方落网，他们之中有组织波特兰间谍网的戈登·朗斯代尔，有打入英国秘密情报局揭露“柏林隧道”计划的乔治·布莱克，混入西德联邦情报局、被高层视为宝贝的对苏情报处处长海因策·菲尔弗也因此下水。

不过，让中情局更为震惊的是，戈列涅夫斯基认为，中情局内有克格勃的奸细，他实际上是因为奸细的出卖才暴露的。他举例说，中情局准备在瑞士招募一名波兰情报军官，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行动，中情局内也没几个人知道，但克格勃早就得知了这一行动的具体细节。这些话使中情局官员面面相觑，他们不得不相信戈列涅夫斯基的话，确认自己内部有克格勃的“奸细”。

然而，就在中情局还没有来得及证实戈列涅夫斯基所提供的情报时，又有一个克格勃的情报人员主动送上门来了。

1961年12月22日中午，中情局驻赫尔辛基站站长弗兰克·弗里伯格听到急促的门铃声。他小心而谨慎地

打开门，一位身材又矮又胖的陌生人站在他面前。当弗里伯格正要掏出手枪时，只听到这位不速之客却不慌不忙地对弗里伯格说：“先生你不要开枪，我是和你们合作的，我名叫阿纳托利·克利莫夫，是克格勃的一名少校。”

弗里伯格开始不信，就对他说：“先生，难道你真的是阿纳托利·克利莫夫吗？”

对方一听，不得不承认他的真名是阿纳托利·戈利钦。

弗里伯格一听到戈利钦这个名字，就觉得十分耳熟。原来早在1954年克格勃军官彼得·德里亚宾叛逃美国后，曾列出了一张名单，说这些人最容易被中情局招募过来。阿纳托利·戈利钦就赫然排在这份名单上，而且是名单上的第二个。当时德里亚宾曾专门提起过，说戈利钦的妻子作风放荡，即使中情局不能在这一点上使戈利钦就范，他本人也并非无懈可击。他好炫耀自己的学识，在同事中很不得人心。没想到几年之后，这个戈利钦自动送上门来了。

戈利钦与中情局联系上后，没等他们发问就滔滔不绝地抖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这让中情局专案官员欣

喜若狂。不过，戈利钦也给中情局乃至整个西方带来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信息。他说，长期以来，苏联集团针对西方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欺骗，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很多重大事件都是苏联精心谋划的阴谋，如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与阿尔巴尼亚的争论、1956年出兵匈牙利……戈利钦向他的专案官员大喝一声：“你们对‘共产主义集团’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

但对美国而言，更现实的问题是，戈利钦确证了戈列涅夫斯基所谓中情局内存在苏联“鼯鼠”的神话，这惊动了中情局反情报处的老牌特工詹姆斯·安格尔顿。

在中情局内部，詹姆斯·安格尔顿并非等闲之辈。二战结束后，杜鲁门总统解散战略情报局，安格尔顿是战略情报局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并由此进入中情局反间谍处。他在揭露罗森堡原子弹间谍案和菲尔比间谍案时都有很大的贡献，从而声名显赫，成为中情局内部权倾一时的人物。他掌管着大量经费，可以不受约束地在全世界开展他的反间谍活动；他可以不敲门就径直走进杜勒斯局长的办公室面陈工作，副局长

赫尔姆斯对他也很放手，他成为中情局的第一“守护神”。

这一次，戈利钦又被带到了安格尔顿的面前，他早就听说过安格尔顿的鼎鼎大名，就毫无保留地对他说，苏联在过去几十年中向西方发动了庞大的情报攻势，克格勃的“鼯鼠”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就是控制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如果这一计划得逞，那么这些机构将被苏联接管，最起码会陷入瘫痪境地。

戈利钦的这番话让安格尔顿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戈利钦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据他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在这些年里，起码有数百名潜在的不忠诚分子混进了中情局。就像中情局在注视戈利钦一样，克格勃一定早已把目光集中在这些不可靠的家伙身上。这些人就是一颗颗的定时炸弹，至于何时会爆炸就不得而知了。身为中情局的反情报官员，安格尔顿顿感责任重大。

于是，安格尔顿决定发起一场“肃鼠行动”，把深藏在中情局内部的那些“鼯鼠”一个个都挖出来。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前程和捉拿“鼯鼠”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戈利钦身上。从此，戈利钦成了安格尔顿的座上

宾，对他的警告安格尔顿几乎是言听计从，并开始怀疑每一个同事都是克格勃的间谍，或者是被其所收买的叛变者。结果中情局的许多工作人员被怀疑、被监视，许多人最后甚至由于这种原因而被“请”出了中情局，丢掉了饭碗。

在戈利钦的建议下，中情局长达数年的“肃鼠行动”开始了，安格尔顿首先把枪口对准了中情局内的“苏联科”科长戴维·墨菲。因为墨菲祖籍波兰，又来自“铁幕”国家，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并且娶了一个白俄女子做老婆，他身上的“苏联元素”太多了。更使安格尔顿怀疑的是，朝鲜战争期间，墨菲去前线供职，他下属的妻子同乔治·布莱克私通，墨菲因此认识了同在朝鲜战场的布莱克。后者因充当苏联间谍，被英国法庭判了42年徒刑。后来，墨菲加入中情局，曾任慕尼黑站站长，又曾经亲手处理轰动一时的苏联间谍渗透进中情局柏林站的“萨沙案”。安格尔顿认为，上述种种迹象已表明，墨菲就是一名苏联间谍。于是戴维·墨菲很快就被免去了“苏联科”科长一职，被派往巴黎担任一个小小的情报站站长，而且时刻处于被监视之中。

墨菲调离之后，他的副手皮特·巴格利见势不妙，也主动请求调出“苏联科”，到布鲁塞尔情报站任职去了。接替墨菲的罗尔夫·金斯利是安格尔顿的亲信，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上司的“肃鼠行动”计划，认为“鼯鼠”肯定存在，必须把他查出来。于是金斯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对“苏联科”大动手术。有“鼯鼠”嫌疑的人被一一调离，他们的岗位则由远在千里以外、绝对不可能是“鼯鼠”的人来填补。安格尔顿的“肃鼠行动”虽然是拿“苏联科”开刀，但让整个中情局一时人心惶惶。安格尔顿的这种做法是否能保证当时中情局对苏最重要的情报部门不被渗透不得而知，但一下子把许多对反间谍事务毫无经验的亲信调到核心部门，结果让中情局的正常工作马上失效。而安格尔顿此时无论是在客观还是主观上都是沾沾自喜，把此当做自己的又一大功绩。

仿佛是为了证明戈利钦的预言似的，不久之后，又有多名苏联叛逃者接踵而至，这一进展让安格尔顿更是对戈利钦唯命是从。

1962年6月，又有一个不速之客送上门来了。他叫尤里·诺森科，是克格勃派驻苏联裁军谈判代表团的安

全官员。他找到中情局，说他在一次酒会上狂饮滥饮，以至于动用了克格勃的经费。他愿以900瑞士法郎的价钱出卖情报，以填补这些亏空。此后两年，诺森科一直同中情局保持联系，提供了大量的有用或没有用的情报，直到1964年2月叛逃。

不过，诺森科却给中情局再次带来了震荡，因为他所供述的一切都与戈利钦所提供的情报相对立。戈利钦曾警告中情局内部已混入了苏联“鼯鼠”，而诺森科则坚持认为，克格勃根本没有渗透中情局，他是通过常规侦听等渠道发现情报信息的。为此，安格尔顿又找出戈利钦对质，后者反咬一口，认为克格勃会派出假叛逃者来诋毁他，干扰中情局对苏联“鼯鼠”的调查。这时，安格尔顿和中情局的工作重心已经是围着戈利钦而展开的，因此，他们认为诺森科充当了一个“假叛逃者”的角色。

1964年4月4日，中情局对诺森科进行了测谎检查。检查之前，有例行的“颤震”，即实施恐吓战术。一个测试官员对他大喊大叫，骂他是“骗子”，紧接着，几个卫兵破门而入，命令他站在墙角，全身脱得精光，然后开始检查。结果，测谎器测到了一些剧烈

的反应。这证明，要么是诺森科心虚，要么就是他在撒谎。

既然诺森科未通过测谎检查，对他就不必客气了。中情局将诺森科关进了一间小屋，强迫他坦白交代。诺森科后来回忆起那段生活，仍是心有余悸：“条件很差，很艰苦。我每周只能洗一次淋浴，刮一次胡子。连牙刷和牙膏都不给我；伙食差极了，根本吃不饱，肚子总是咕咕叫。我要说话连个人都找不到，看不到书报，没有烟抽，甚至连新鲜空气都呼吸不到。到了冬天，冷得要命。我要求给我条毛毯，过了很久他们才给。我日夜处于电视摄像机的监视之下。为了打发日子，有好几次我试着做棋子玩。可是，我刚刚做好，立即就有卫兵开门走进牢房，把它们没收了。”

诺森科是投奔“自由世界”而来的。在苏联，他是克格勃这个社会特权阶层中的一员，过的是人上人的生活，哪想到了这里“享受”的竟是非人待遇。经过229天的对诺森科的敌意审讯后，中情局对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沉不住气了。1966年8月，中情局二把手理查德·赫尔姆斯命令反情报科和苏联科必须在60天内给诺森科定案。结果，相关部门起草了一份长达900

页的报告，详细论述了诺森科供述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断言他是个骗子。

这份报告并没有为诺森科一案画上句号，它在安格尔顿那里没有获得通过，他不能接受报告中认为诺森科压根儿就不是克格勃人员的看法。诺森科成了中情局高层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1967年11月，诺森科被转移到华盛顿附近的一所安全屋内再次被提审。第二年8月，他又接受了一次测谎检查，这次没有“颤震”，没有如狼似虎的卫兵，诺森科顺利地通过了。相关审讯人员拟就了第二份关于诺森科的案情报告，最后认为诺森科没有撒谎，他就是克格勃军官。

这些背着自己进行的行动让安格尔顿十分恼火，而让他始料不及的还有，那份“终审”报告将一个完整的中情局分裂成两半：支持诺森科派和反对诺森科派。前者以另一位副局长鲁弗斯·泰勒为代表，他坚持认为诺森科是个真诚的叛逃者，“既然我们相信了戈利钦，就应该相信诺森科”。而以安格尔顿为代表的反诺森科派则认为他多处撒谎，很明显有隐瞒的行为。双方吵吵嚷嚷，互不相让。最后还是由赫尔姆斯拍板：

恢复诺森科的自由。



“肃鼠行动”的策划者安格尔顿

1969年3月，诺森科终于获得了中情局的信任，被聘为反情报顾问。在投奔“自由世界”5年之后，他终于如愿以偿。

安格尔顿成了中情局的“瘟神”

从1961年戈列涅夫斯基叛逃提出苏联“鼯鼠”问题，到1969年诺森科获释，中情局经过8年时间的追捕，只看到一些苏联“鼯鼠”的影子，连一只真正的“鼯鼠”也没有抓到。这还不算，原本风平浪静的中情局，

在这8年中却风波陡起，形成内乱，最终四分五裂。庞大的“苏联科”更是在这次动荡中彻底瘫痪，一蹶不振。

叛逃者带去的冲击性信息已经使整个西方情报机构受到影响，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在捉拿苏联间谍方面鲜有建树与此有很大关系。在此期间，中情局的很多官员几乎个个都担心安格尔顿会把他狐疑的目光投注到自己身上，在深受这场间谍恐怖之害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气撒到这场恐惧的始作俑者戈利钦身上。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戈利钦是克格勃派遣过来的。德里亚宾确实说过戈利钦是一个可能的招募对象，但不知何故，这份名单竟落入克格勃之手。克格勃将计就计，把戈利钦作为诱饵送往美国。但这个计划必须有一个辅助条件，戈利钦才能顺利完成任务，他才能把中情局搅得天翻地覆。

是谁最信任戈利钦？是安格尔顿。“苏联科”的一位科长指责安格尔顿说：“如果要我在中情局里找出一个苏联间谍的话，我就说是安格尔顿。”更有甚者，安格尔顿的下属、反情报科的克莱尔·佩蒂用“谁获利了”的方法，分析了中情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所有大

事。他认为中情局确实被克格勃渗透，然后进行推演：戈利钦、诺森科都是克格勃的派遣间谍，其目的是在西方情报机构内部引起混乱，掩护真正的大“鼯鼠”。这只大“鼯鼠”不是别人，正是组织缉拿“鼯鼠”的安格尔顿！

安格尔顿这个毕生以捉拿苏联“鼯鼠”为己任的超级侦探，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在反间谍领域，他孜孜以求，恪尽职守。为了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几乎放弃了一切爱好。他没有朋友，对谁都一副审视的眼光。连他结婚30多年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而真的以为他在邮局工作！

1974年12月底，詹姆斯·安格尔顿的名字出现在中情局的退休名单上。新任局长威廉·科尔比不容这里的混乱局面再继续下去，他只能拿安格尔顿开刀。公布退休名单那天，中情局的官员大多为之震惊，唯有安格尔顿镇定自若。他叼着一支过滤嘴香烟，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向他的同事发出警告。然后，他就消失在下班的人群中。

这场在中情局历史上以安格尔顿名字命名的“肃鼠行动”就这样结束了，到头来安格尔顿倒成了中情局

的“瘟神”。

安格尔顿是“怀疑一切”的代表人物，其观点常常令人感到怪异。例如，他认为斯大林与铁托之间的裂痕是一种假象，中苏分裂是麻痹西方的诡计……科尔比与安格尔顿为此长期争论不休，这是他们之间矛盾的渊源之一。中情局局长们对安格尔顿都很垂青，对他那套玄虚神秘的迷宫理论也很感兴趣。

1960年，克格勃高级官员戈利钦投奔中情局之后，安格尔顿对他信任有加，并多次组织西方各国情报专家赴美向戈利钦索取各种情报。当时收获很大的是英、法、西德等国，他们根据戈利钦的指证及其提供的明确线索挖出了几十个隐藏很深的苏联“鼯鼠”。到了1963年，戈利钦提供的线索日益朦胧，搜索范围越来越宽，根据他“该打扫门槛了”的建议，安格尔顿于1965年开始在美国和西方情报界展开了一场“肃鼠行动”，意在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清查苏联间谍。在这一秘密行动中涉嫌的特工人员达数十名，冤枉了不少人，甚至牵连到一些西方盟国情报机关，与他抓到的真货相比，实在是过大于功。许多人评价他“徒有虚名，自作聪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说他

是“中情局里的麦卡锡”。科尔比坚决将他赶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怀疑一切”，使中情局背了一屁股冤、假、错案，弄得局内外怨声载道，人人自危。然而，支持安格尔顿的人说，正是由于他的敏锐，才创造了中情局历史上反渗透成绩最好的时期，任何情报机构都没有达到这一水平——他是中情局的老警卫。

但是，有许多忠诚的中情局特工被安格尔顿视为“苏联间谍”，从而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最典型的有以下几人：

保罗·加布勒

保罗·加布勒1918年生于美国的纽瓦克市，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波兰移民。二战时期，加布勒作为一名海军飞行员在太平洋战场参加过35次俯冲轰炸任务，获得过11枚勋章和奖章。20世纪50年代初转入中情局，1952年在西德情报站工作；1956年任中情局驻瑞典斯德哥尔摩情报站副站长；1959年—1960年间到中情局兰利总部工作，任苏联处国外情报科科长；1961年，他以美国驻苏使馆海军武官助理的掩护身份，出任中情局驻莫斯科情报站第一任站长。

从苏联归来后，加布勒本来应该仕途亨通，然而

他却在GS—16的工资级别上搁浅，并连续14年未得到提升，原因是他已经成了安格尔顿领导的美国情报界内“肃鼠行动”的怀疑对象，1966年5月，加布勒突然被赶出中央情报局行动部，调到皮里营的训练学校出任教官。这一工作调动的真正含义，在中情局人员内部是心照不宣的，但加布勒却一直蒙在鼓里。不久，这名曾经在中情局极有前途的“情报才子”又面临两种选择：或是去几乎没有战略意义的加勒比海一个小岛——特利尼达情报站工作，或是退休。上司的态度十分严厉：想好后，马上出发或即刻“开路”——退休滚蛋。已经55岁而且有一个极需钱上大学读书的女儿的加布勒，出于无奈，接受了新的任命。

1970年初的一个夜晚，从西半球来加勒比访问的一位密友告诉加布勒，“他们认为你可能是苏联间谍”。加布勒这时才明白自己连遭厄运的奥秘。在以后的18个月中，因毫无根据地被怀疑而产生的烦躁和不安，使加布勒什么也不想干，实际上，中情局总部也没有交给他任何必须完成的工作，而且他的位置不久就由另一名官员所替代。令加布勒气愤和不解的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上级对自己的怀疑；为什么没有

对他进行任何形式的审讯；为什么既不停止自己的工作，又不让他干任何具体事情。其实，加布勒所不知的是，对于安格尔顿等人搞的“肃鼠行动”有许多人持反对意见。局长科尔比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有关加布勒的问题档案中明确写上了自己的否定意见，强调指出“加布勒是忠诚的”。

1973年，在科尔比的干预下，加布勒被任命为驻斯德哥尔摩情报站站长，三年后，他任职期满回到华盛顿，准备提前退休。不知何故，他的退休申请被返回。直到1977年加布勒在情报界效力满25年退休时，他的工资标准仍停留在GS—16的级别上。此时，安格尔顿和热衷于“肃鼠行动”的其他一些人陆续离开了中情局，反间谍处也换上了新的领导人，卡特的心腹特纳出任中情局局长。加布勒认为昭雪的时机已到，他毫不迟疑地给特纳局长写信，要求重新审查自己的“间谍嫌疑”问题。就在正式退休的前3天，加布勒接到局长的答复。特纳肯定地指出，加布勒是被“臆想出来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而遭指控”的受害者。这位新局长向加布勒表示“诚挚的歉意”，并许诺将尽他个人所能，帮助加布勒获得由于14年来工资一直停留在GS—

16级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全部补偿。加布勒作为中情局的正式成员的最后三天，是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度过的。他向国会讲述了自己14年来的遭遇以及“肃鼠行动”对美国情报工作造成的损失。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最后以个别案例的形式，决定给加布勒一大笔钱，以补偿他14年来的损失。退休后，加布勒一直在亚利桑纳州搞房地产投资生意。

瓦西亚·哥米尔金

哥米尔金的祖籍是白俄罗斯，1926年出生在中国的新疆。其父是沙皇派驻新疆的特使，十月革命后，他与白俄军队一起回到俄罗斯，后又来到中国，并成为经营石油、黄金和皮货的国际商人。1932年，新疆各宗教派别间爆发混战时，只有6岁的哥米尔金和他的母亲、姐妹和兄弟企图越过沙漠戈壁逃离那里，但被土匪扣为人质。直到两年后，其父用重金将他们赎回，才结束了囚徒般的生活。1934年，哥米尔金的父亲被苏联红军逮捕后处决。

哥米尔金经过百般努力后，终于来到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二战中，他参加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区充当俄语翻译。1951年，加入中情局后，他流利

的俄语和中国普通话引起了上司的注意，于是他被分配到苏联处工作。1956年，哥米尔金以使馆政治事务专员的掩护身份到日本东京从事秘密情报活动，并成为第一位被允许直接与苏联外交官接触、与克格勃官员同桌对饮的中情局秘密行动官员。此前，这类行为在美国情报界是绝对禁止的。在日本，哥米尔金抓住机会，及时给克格勃在东京的一位“居民”设下了“爱情陷阱”。他的手段是先租一套公寓，在街头雇一名妓女，然后安排这位克格勃的高级官员每周到那里“销魂”一次。不知内情的克格勃特工真的与妓女“相爱”了，并开始每天都来幽会这位拿中情局工薪的“情人”。哥米尔金对他们接触的全部细节都进行了监视。这对“情人”一直“相爱”了三年，在此期间，哥米尔金则通过那位妓女获得了大量价值颇高的“枕边情报”。

1962年，哥米尔金被派往巴格达，担任那里的情报站副站长。1966年，他亲自招募了一名克格勃女官员。她是以设在巴格达的苏伊文化交流中心负责人为掩护身份的另一名克格勃高级官员的妻子。哥米尔金冒着个人风险，将这名女特工和她的两个孩子偷运出伊拉克，最后送达美国本土，使她成为美国情报界了

解克格勃内幕的又一窗口。

除策反苏联间谍外，哥米尔金在伊拉克还获取到数百份苏联军事技术手册，其中之一讲述了苏联新式战斗机上安装的最先进弹射器的一种高科技，这是中情局很长时间就想得到的；另一本则讲述了苏联解冻设备的技术细节，此技术的获得，使五角大楼节省了数千万美元的研究费用。克格勃也曾企图招募哥米尔金，但他都巧妙地摆脱掉了。

在伊拉克期间，哥米尔金的成果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中情局兰利总部的最新情报简报上，总部也经常向他发去“肯定英雄业绩”的表扬电文。当他回到华盛顿时，人们普遍将他视为英雄。当时的苏联处处长戴维·墨菲长时间地握住他的手，对他在巴格达期间“十分出色的行动”，表示衷心地祝贺。根据哥米尔金的业绩，他本应得到提升，并被授予勋章。中情局官员对勋章的渴望，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虽然它仅仅是一种象征，标志着一个人工作出色、事业成功。但若没有这枚勋章，则暗含着许多内容，人们会因此得出十分荒唐的结论。职务的提升也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标志。然而，中情局的这位英雄奉命回到总部后，既没有得

到勋章，也没有被晋升，在原职上竟然一直待了12年。

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和苏联叛逃者戈利钦指控他为苏联间谍的唯一根据是，他的祖籍是苏联，而且他多次与克格勃官员打交道。当“间谍嫌疑”的印章盖在哥米尔金的档案上后，他的情报生涯也就完结了，不得不从中情局全职特工的位置上退下来。但是，退下来的第二天，中情局竟以“自由契约特工”的方式，让哥米尔金重新加入该局，使其得以继续为美国的情报事业效力，直至正式退休。由此也可以看出，哥米尔金在中情局苏联处的重要作用。

奈莱德·迪克·科维克

科维克于1926年12月1日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一座小城希宾。父亲是不识几个大字的塞尔维亚矿工；母亲也是塞尔维亚人，却受过一流的教育，她对小科维克进行家庭教育，将自己掌握的历史和语言知识传授给儿子。科维克的父母在一战结束后移居美国。

1944年，正值二战最关键的时期，18岁的科维克高中毕业。他参加了美国海军，不久被派往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无线电专业。但他不愿在战时将时间浪费在

读书上，要求到前线参加战斗，所以科维克被空投到南斯拉夫，后又调到冲绳岛，成为三级无线电发报员。复员后，科维克再次进入威斯康星州大学学习。这次，他攻读的是俄罗斯与国际关系学。在这里，他的导师发现了他的才华，并将他推荐给中情局。他的语言才能令中情局的招募人员大为吃惊。

1950年10月，科维克成为中情局苏联处的正式雇员。在短期速成训练中，科维克学习了侦察、反情报、固定情报交接点的使用、接头信号的传递、密写技术等基本间谍活动技巧。随后，他便开始独立进行工作了。1953年，他奉命来到欧洲，负责间谍的招募、训练，并以各种方式向东欧和苏联派遣特工的工作（例如使用潜艇、橡皮船、商船、气球飞渡和空投等）。

1954年，科维克调回华盛顿，成为中情局苏联处主管叛逃者事务的D科副科长。1955~1958年，他又调入苏联处的SR—9部门，参加了旨在招募友好国家人士为中情局效力的“第三国籍人士”计划。他不仅亲自征招外国公民充当中情局的间谍，还训练他们如何进行秘密特工活动。在此期间，他每年平均到欧洲执行

招募和训练任务多达8次以上。例如，1956年1月，他被空投到挪威，训练了挪威外交官英格堡·利格伦。利格伦来到莫斯科充当了中情局在那里的秘密间谍后，科维克又完成了数次相同的任务。1958年1月，他飞到巴黎，帮助那里的中情局情报站站长成功地招募了一名苏联人，而后控制这名间谍为美国效力达数年之久。科维克的成功，受到包括安格尔顿在内的中情局高层的赞赏。1958年6月科维克结婚时，安格尔顿还专门送去鲜花表示祝贺。科维克在中情局的事业十分成功，同事们都认为他的前途远大。

然而，自1965年8月开始，他却成了“肃鼠行动”的受害者。对他的间谍嫌疑，直到1980年才彻底撤销。在此期间，他的家庭和办公室的电话被窃听；外出时，总有“神秘的人物”跟踪；他的工资标准停留在GS—14级别上长达15年之久。1966年5月，他被要求暂时离开苏联处，到中情局设在珍珠营的一个训练基地担任教官，教授年轻的中情局雇员招募和控制苏联间谍、非法入境者和叛逃者的技巧。1970年，极为赏识科维克秘密行动才能的中情局行动部许多处室的领导要求科维克到他们的部门工作，但一直未获批准。同

年，他被召回华盛顿，担任中情局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联络人。这样的安排旨在使科维克不能离开市区，便于监视。

自1974年起，科维克先后写信给几任局长，希望重新审查自己的“间谍嫌疑”问题，并要求得到经济上的赔偿。尽管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秘密小组委员会在1978年6月19日就倾听了科维克的陈述，但直到1981年春，这位最优秀的秘密特工才得到彻底平反：他获得了勋章，还得到了高达6位数的经济补偿金。

科维克退休后，他和夫人生活在南卡罗莱纳州自己的家里。尽管旧日老友不时前来，但他除打打高尔夫球外，不再谈论过去的一切，也不过问其他事情。

英格堡·利格伦

英格堡·利格伦是挪威情报局一位出类拔萃的女间谍。20世纪50年代曾以“第三国籍人士”的身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利格伦生于1915年，虽然容貌平平，但天资聪颖，勤奋努力。中学毕业时，利格伦的各科成绩均为全班第一。

二战爆发后，在德国占领挪威的最初几个月里，利格伦为挪威抵抗组织做情报工作，后来逃亡到瑞

士。战后她加入了挪威情报局。利格伦在大学学习时，就表现出超人的语言天赋，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俄语和波兰语的考试。参加情报局后，很快成为挪威情报局长最信赖的秘书兼翻译。她曾经被派往西德，指导那里的挪威军队的秘密行动，并曾在挪威北部边界地区与苏联人合作，完成过特殊使命。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奥斯陆和华盛顿的情报合作关系，北约各国得以接收到苏联科拉湾海军基地的无线电通讯。在挪威北部边境地区，美国设有一些极为灵敏的电子设施，中情局、国家安全局和英国通讯指挥部共同管理着那里的一些监听站，挪威和美国还共同管理着位于挪威北部专门为U-2型侦察机提供加油和着陆服务的地面设施。此外，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也逐渐加强。

不久，中情局苏联处向挪威提出需要一名“低级间谍”到莫斯科帮助工作，利格伦被选中了。她聪慧，能讲俄语，并热衷于中情局赋予自己的间谍“中间人”的特殊使命。

1956年1月8日，中情局精通数国语言的秘密行动官员理查德·科维克奉命抵达奥斯陆，开始对利格伦进

行特殊的技能训练。两人合作得十分默契。不久，利格伦到挪威驻莫斯科大使馆担任大使的秘书，她的真正任务是以“第三国籍人士”的身份，秘密为中情局工作，她在中情局档案中的代号为“椴木—3”。

来到莫斯科不久，利格伦就成了克格勃的招募对象，但苏联人并不知道，她已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工。苏联情报机关先派出了一名叫赫尔加·格雷琴科娃的莫斯科大学21岁的女学生与利格伦接触，目的在于摸清她是否独身、是否有同性恋倾向和是否感到孤独等情况。

1957年春，利格伦买了一部轿车，但在第一次驾驶考试中却没有通过（克格勃有意做的手脚），这时潇洒大方、彬彬有礼的费利普夫来到利格伦面前，主动提出要当她的驾驶训练指导员。这位奶油小生实际上是克格勃派来的“乌鸦”。利格伦对克格勃的招募活动有清醒的认识，并及时将情况汇报给使馆的安全官员。挪威情报官员和科维克都十分信赖利格伦，他们断定，平淡无华的外表和对工作全身心的投入，必然使利格伦终身不嫁，她肯定能抵御住任何男性的诱惑。

利格伦果然不负上司和中情局的信赖，在与克格勃招募人员巧妙周旋的同时，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智，多次完成中情局交付的情报传递任务，她还经常将挪威克朗和美元兑换成卢布，秘密放入“死投点”，然后通知美国间谍前去提取；她经常以密写方式不断将自己的活动报告给伊温格局长和科维克，使他们一直了解苏联境内情报活动的进展情况。她的工作危险性极大，然而她却从不索取任何报酬，她要求得到的仅仅是“为自己信仰的政治制度效力后所产生的满足感”。利格伦的工作十分出色，在两三年里，她几乎成了中情局在苏联间谍活动的中枢人物，而且一直没有被克格勃察觉。

1959年8月，利格伦回到奥斯陆，从事其他工作。这本来应该是她与中情局关系的结束，没想到，5年后，中情局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却捕风捉影地指控她是暗藏在挪威情报机构内部的克格勃间谍。利格伦因此受到审查。

1965年9月14日早晨，利格伦在上班途中被挪威情报与安全局警察逮捕。尽管利格伦一再声明自己的清白，还是于9月18日被关进布兰德特瓦德女子监狱，

并不准保释。

“利格伦间谍案”轰动了整个挪威，在这个小国里成了头号新闻。

1965年12月10日，挪威情报与国内安全局局长布里恩正式向法院建议以“间谍罪”对利格伦判刑，然而证据明显不足。12月14日，经过对安格尔顿和戈利钦提供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查，法官拒绝继续审理此案，同时宣布她无罪释放。经过3个月的审查和狱中煎熬，利格伦终于走出监狱，但她随即失业了。

1966年1月28日，挪威议会成立了三人小组，对“利格伦间谍案”进行重新审查，再次确认了她的清白。

1968年，议会以73票对63票通过了对利格伦误遭逮捕的补偿议案，她因此得到了3万克朗的补偿金。

“利格伦事件”的发生，极大地破坏了美、挪情报机构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为了与昔日的伙伴恢复相互信任与合作，1975年，接替安格尔顿的反间谍处处长乔治·克拉里奇做出了“慷慨”的决定：付给利格伦25万美元的补偿费，这相当于她自被捕之日到当时近10年的工资总额。克拉里奇还言明，如果她想多要，经

中情局局长批准后，仍可得到满足。为此，中情局派出特使到奥斯陆，当面向挪威情报部门和利格伦本人道歉。此时个性更加孤僻的利格伦拒绝会见这位特使，只是通过挪威情报机构表示感谢中情局的慷慨，但拒绝接受任何钱财。

利格伦终生未嫁，退休后，她住进挪威南部的一所老人院，1990年病逝。

奥列格·潘可夫斯基

奥列格·潘可夫斯基1919年生于高加索，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其岳父是苏军上将。潘可夫斯基在苏联军事院校前后度过了10年学习生涯。在卫国战争期间，多次立功，曾获得5枚勋章和8枚奖章。

潘可夫斯基是苏军总参情报局（格鲁乌）上校情报官，对外身份是苏联国家科学委员会外事局副局长。20世纪50年代，潘可夫斯基在土耳其的安卡拉工作期间，多次寻找中情局、英国秘密情报局（主管情报搜集及分析）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并主动向他们提供苏联在中东的计划，但中情局多次将他拒之门外。中情局的秘密档案显示，潘可夫斯基的背景、他在二战中的经历、他与将军女儿的婚姻以及他在仕途

上的步步高升都与一个叛变者的“正常形象”大相径庭，反间谍处的安格尔顿坚持认为潘可夫斯基是克格勃的阴谋，因此，所有北约驻安卡拉的使馆都接到警告，拒绝这个上校的“顽固纠缠”。

20世纪60年代初，潘可夫斯基在莫斯科继续将成包的机密材料主动送给西方外交官，屡屡被拒绝。后来在一次招待会上，潘可夫斯基将一卷文件塞到一个加拿大外交官的手里，然后就离开了。这份文件经伦敦秘密情报局的专家鉴定是真的，由此断定，中情局对潘可夫斯基的判断有误，并指示驻莫斯科情报站站长与其保持联系。

1961年3月10日，潘可夫斯基告诉英国商人雷维尔·温（当时他率领英国商业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说，他将率领一个苏联代表团赴英回访。他交给温一些文件以及一封写给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的信。4月20日，潘可夫斯基在伦敦一家饭店与英美情报机构的官员会面，介绍苏联情况（在与潘可夫斯基会面时中情局配备了3个翻译官和18个安全保障人员）。在这次会议上，英国情报机构将潘可夫斯基移交给中情局。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报使中情局震惊，他们几乎

不相信自己会如此走运。从1961年4月到1962年秋天的16个月期间，潘可夫斯基提供了5000多份高度机密的情报资料。在中情局历史上，潘可夫斯基是“最重要、贡献最大、情报价值最高”的间谍。

潘可夫斯基在情报中详细报告了苏联导弹计划的技术数据，特别是有关洲际导弹的制导系统。它表明，苏联导弹的现状落后于它的发展计划，优势在美国一方。然而，这个消息并没有立即报告给肯尼迪总统。原因是中情局的一些高级官员尚未被说服，主要是安格尔顿本人仍然坚持认为潘可夫斯基是冒牌货，他的态度在当时是左右中情局的；另外有些人担心这个消息会加强五角大楼“鹰派”的地位，有可能使他们先发制人打击苏联的主张占主导地位。

转眼到了当年7月，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部署导弹，准备工作正紧张地进行。赫鲁晓夫的决策遭到一些苏联领导人（特别是军方）的强烈反对，以致赫鲁晓夫不得不解除两名将军的职务，才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一事，随即持以强硬态度，逼苏联立即撤出。就在古巴导弹危机进入高潮的时刻，10月22日，苏联逮捕了潘可夫斯基。

这不但使中情局和肯尼迪完全认定潘可夫斯基消息的可靠性，同时也给肯尼迪壮了胆。因此，当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信说“只有那些想毁灭自己的疯子和自杀的人才想摧毁你们的国家”时，肯尼迪立刻提出了交换条件：你撤走导弹，我不碰古巴。赫鲁晓夫点头同意，于是危机结束。

1963年5月11日，苏联最高法院公审潘可夫斯基，并判处他死刑。潘可夫斯基死后，中情局借私人名义为他出版了《潘可夫斯基遗墨》。据说该书是一本日记集，是潘可夫斯基生前写的，一直藏在他在莫斯科公寓的一个书桌抽屉里，后来被中情局的间谍找到，偷偷带出苏联。在这本书里，潘可夫斯基被吹成了“面对死刑判决，表情坚毅，没有丝毫的惊慌和畏惧”，是“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想型间谍”。英国王室还煞有介事地授封潘可夫斯基爵位。

然而，过了不久，事实就揭穿了这套把戏：《潘可夫斯基遗墨》原来是由前《生活》杂志撰稿人吉布和苏联叛逃者德里亚宾在中情局的授意下，根据英国秘密情报局询问潘可夫斯基时的录音写成的。

潘可夫斯基是苏联特权阶层的成员，而且家庭生

活美满，个人仕途远大，可以说凡是他想拥有的都有了。他既不需求金钱，又不贪恋酒色，而且在他工作过程中，曾经十多次出国，却没有投奔西方，甚至在接到中情局的报警后，他还是临危不惧，拒绝逃到美国。这是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人对潘可夫斯基反叛的动机莫衷一是。

按照中情局的说法，由于“宗教信仰的问题”，他“在后期发现共产主义是个骗局”，从而使潘可夫斯基成为反抗苏维埃制度的异教徒。但谁都能看出，这种说法纯属反共宣传的需要，并没有真正揭示潘可夫斯基叛逃的真正原因。像他这种情况在世界间谍史上是一个很罕见的案例。

莱斯利·詹姆斯·班奈特

1993年7月初，加拿大政府的代表专程来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省的格莱内尔格，在一套朴素的住房里会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向他保证渥太华很快会寄给他一张15万加元的支票，并解释说这是政府对他20年来蒙受冤屈的补偿。这位老人就是加拿大反间谍部门前负责人莱斯利·詹姆斯·班奈特。21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被抛弃、被怀疑的阴影之中。现在，总算有了结

果，尽管补偿金数额不大而且来得太迟，但它却证明了自己的清白，标志着长期冷战恐怖史的结束。班奈特看着政府代表，倾听着他们的安慰之词，泪水随着几十年的甜酸苦辣夺眶而出……

班奈特1920年出生在英国的南威尔士南部一个穷苦的矿工家庭，二次大战期间曾在信号情报部门工作。战争结束后，他被派到澳大利亚，在那里结了婚。1954年，班奈特举家移民到加拿大，并参加了皇家骑警队，由于工作出色，很快被任命为骑警队安全处处长。安全处是一个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的单位，主管侦察、确认和逮捕在加拿大境内活动的苏联及其他国家间谍的工作。

班奈特的荣升似乎预示着他的未来前途无限，然而，他的结局却相当凄惨。尽管班奈特发誓要忠于加拿大，愿意为自己的“第二个祖国”捐躯，上任后也确实为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做了许多工作，但事与愿违，由他亲自部署并指挥的几次捕谍行动相继程度不同地失败了。

更糟糕的是，一些同行视他为一个“外国人和外来者”，对他轻易得到了这么重要的职务而心怀不满，加

之班奈特经常穿一身苏格兰呢制服，肘部还缝上个装饰性的大补丁，与身着鲜红警服、神采奕奕的骑警相比，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他在皇家骑警队中很少得到人们的好感和同情。当有风吹草动时，他自然最容易成为被怀疑的对象。班奈特的职务相当于他的美国同行——安格尔顿在中情局里的位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毁掉班奈特前程并拆散其家庭的正是安格尔顿。

班奈特的几次反间谍行动失败后，安格尔顿对其产生了怀疑，安格尔顿将手下人秘密获得的班奈特个人档案及其有关的全部材料送到戈利钦面前。戈利钦看过后说：“对，我认为这个人就是苏联间谍，而且是个关键人物。”后来，班奈特根据加、美情报合作协议亲自写给中情局的一份报告，更使安格尔顿加深了对他的怀疑。班奈特在报告中说，自己曾问充当西德情报机关与中情局联络员的一名西德特工因茨·赫尔在南美旅行时是否碰到过克格勃间谍，这名特工人员显得十分恐惧。中情局因此对他实施了全面监视。

数月后，赫尔到南美杰克逊洞穴游览区度假时，碰巧与两名克格勃间谍同行。安格尔顿手下的主要“捕

猎者”佩蒂经调查分析认为，克格勃此举旨在陷害赫尔，“让我们相信赫尔不是好人”。安格尔顿因此断定：班奈特肯定是克格勃整个阴谋中的一个“环节”，“要不是班奈特事先暗示，我们绝不会知道赫尔的南美之行”。于是，赫尔事件触发了班奈特一案。

熟知此案的中情局官员回忆说：“安格尔顿指示说，一定要抓紧，把此案查清楚。”随后，安格尔顿利用各种迂回手段，例如与加拿大情报界高级官员聚餐，在饭桌上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使他们相信美国对班奈特间谍嫌疑的指控。经过安格尔顿的“不懈努力”，加拿大警方终于决定正式对班奈特进行调查。

1970年，皇家骑警队最高层经研究后，制定了旨在查清班奈特间谍活动的“铁夹行动”计划，开始对班奈特展开全面、细致的调查。从此，班奈特受到昼夜连续不断的监视：电话遭到窃听，卧室被秘密安装了窃听器，家里和办公室内还被安装了隐蔽式摄像机。调查人员一直想弄清楚班奈特是如何与苏联人联系的。他们曾数次从班奈特的家中跟踪他到一个树林，并且每次都发现班奈特从车厢里搬出一只笼子。调查人员几次想走近去看看他究竟从笼子中放出去的是什

么，但怕打草惊蛇，未敢向前。由于树林枝叶茂密，空中监视也是不可能的。侦查人员只能隐藏在远处监视，等他把事情办完再进行跟踪。尽管不能确定班奈特究竟在干什么，但美国人的怀疑却深深印在了加拿大反间谍人员的脑海里，因此他们主观地推断：班奈特是在“放信鸽”，与克格勃进行联系，或是在传递情报。实际情况是，班奈特将毁坏自己花园的黑松鼠抓住后，不忍心打死它们，便来到树林中放生。

1972年，仍没有获得班奈特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的皇家骑警队决定“逼蛇出洞”，开始与班奈特正面接触，连续对他进行了数天的严厉审讯。审讯人员提出的问题多种多样，为了显示对班奈特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他们甚至描述班奈特与妻子间的性生活细节。至此，班奈特才知道自己的卧室早已被窃听、窃照。随后，班奈特被赶出办公室，并被告知他在反间谍部门的工作结束了。

被开除后，班奈特在日记中写道：“一生的事业完蛋了，连妻子都遭到他们的诬陷，他们究竟想对我怎么样呢？上帝呀，救救我吧！”3个月后，妻子忍受不了突然而且原因不明的灾难，与班奈特离了婚，独自

带着他们的一对女儿去了澳大利亚。所幸的是，班奈特虽被撤职，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一直不足，因此未被关进监狱。后来，班奈特考虑到，既然在加拿大无法洗清自己的“间谍嫌疑”，干脆移居澳大利亚，离自己的女儿也近一些。

定居澳大利亚后，班奈特一直住在格莱内尔格，靠微薄的政府津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仍然独身生活，去洗衣店洗衣服，买菜做饭都由自己动手。他一直极力保持着尊严，并不断鼓励自己不能被冤屈摧垮。班奈特多次上书加拿大有关当局，要求为自己正名。

对于班奈特是苏联间谍的指控，早就有人提出异议。1977年，加拿大总检察长在议会上指出，有证据证明班奈特确实是一个“忠实的加拿大公民”，然而他的话并没有洗刷掉班奈特的间谍嫌疑。

20世纪90年代，新闻媒体旧案重提。1993年3月30日，加拿大的一家电视台在其节目中提供新证据说，皇家骑警队中确曾有过一名接收苏联数万美元报酬的克格勃“鼯鼠”，他叫吉勒斯·布鲁纳特，而非班奈特。布鲁纳特也是骑警队成员，其父曾是安全局的第

一任局长。布鲁纳特的生活穷奢极欲，经常到墨西哥旅游。1984年，49岁的布鲁纳特去世。

电视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总检察长道戈·路易斯就在众议院宣布：“我向班奈特和众议院保证，加拿大政府确信班奈特从来都不是克格勃的‘鼯鼠’。”此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详细审查了保存下来的原始档案材料，决定为班奈特“平反”。

终于洗清冤屈的班奈特通过加拿大电视台说，他对终于洗清了自己的间谍嫌疑感到十分高兴。他说：“问题终于解决了，加拿大人民终于承认了我，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再也不必为洗刷自己而奔走呼号了。”

经安格尔顿“甄别”后，被怀疑为苏联间谍的人有不少，结果后来证明绝大多数都是错案。在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后跑到美国的鲁申科，也曾被安格尔顿定为假叛逃，由此蹲了三年多监狱。甚至连中情局局长科尔比也被安格尔顿怀疑是克格勃打入中情局的头号“鼯鼠”。这一下算是摸着老虎屁股了，科尔比清理门户，将安格尔顿赶出了中情局。后来任中情局局长的特纳对安格尔顿那一套做法也是深恶痛绝，他认为

安格尔顿之所以能够无法无天，就是因为“各守一摊”的体制所致。

当然，间谍活动的危害是巨大的，弥补间谍造成的损失需要多年的艰苦努力和数十亿美元的代价。

有时，间谍造成的损失是不能用金钱来计算的。如休斯飞机公司高级工程师贝尔仅仅为得到11万美元的报酬，竟将F-15主力战斗机俯瞰射控雷达、拖式反战车导弹、凤凰空对空导弹及隐秘式雷达等机密设计图出卖给伪装成商人的波兰情报人员马林·兹查斯基，这些资料后来被送给莫斯科的克格勃。此案使美国数亿美元的研究成果顿时化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对国家安全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据专家的初步研究表明，美国情报机构驻外特工网络以及在世界主要地区的电子窃听系统都曾遭到间谍的严重破坏。在国内公众的呼吁下，美国国会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了包括对间谍恢复死刑、对接触保密资料的400万政府雇员进行测谎器检验等一系列法规。

安格尔顿离去后，中情局反情报人员从300名减少到80名。安格尔顿建造的情报中心资料库按地理位置被分成了若干部分。据说获取出入证易如反掌。在美

国情报机构接二连三地发生间谍案之后，专家们建议扩大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反情报职能，改善协调工作，以弥补国会抨击情报机构后所带来的经费压缩、人员裁减问题。

然而，训练一支反间谍队伍至少要花费4年时间。专家们认为，迅速加强保密的最好办法是减少秘密文件数量和接触秘密文件的人数，同时严格政府安全检查制度和增加检查次数。但是据1988年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分析，在安全方面仍有不少漏洞，例如，五角大楼每5年需要接受一次安全检查的人员多达10万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则认为，目前秘密材料太多，能接触秘密的人太多，间谍太多……而消除间谍威胁的努力则太少。

第六章 “鼯鼠”现形，美苏谍战何时了

安格尔顿8年的“肃鼠行动”虽然令自己身败名裂，但是中情局的“鼯鼠”并非都是子虚乌有。1994年，中央情报局里的一个特大“鼯鼠”阿尔德里奇·埃姆斯现出了原形后，2001年又一大“鼯鼠”罗伯特·汉森落网；直到2010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还进行了一场间谍“交易”。“鼯鼠”层出不穷，美苏谍战未有穷期。

特大“鼯鼠”埃姆斯现出了原形

安格尔顿8年的“肃鼠行动”虽然令自己身败名裂，但是中情局的“鼯鼠”并非都是子虚乌有。1994年，中央情报局里的一个特大“鼯鼠”终于现出了原形，他就是中央情报局苏联集团分部主任阿尔德里奇·埃姆斯。

1994年2月21日清晨，闹钟唤醒了沉睡中的埃姆斯，他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10点半，埃姆斯离开家门，准备去兰利总部上班。打开崭新的“美洲豹”轿车的车门，他准备启动汽车。突然，车门口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随即，一张卡片递了进来，一个冰冷的声音在埃姆斯耳边响起：“阿尔德里奇·埃姆斯先生，我是联邦调查局的莱斯利·怀泽，因涉嫌间谍案，你被捕了。”

怀泽的话音刚落，埃姆斯就瘫在了车里，口中喃喃自语：“完了，这一天终于来了。”

对埃姆斯来说，那一天确实同以往的日子不同。从那一天起，他作为美国冷战时代甚至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间谍，永远失去了自由。由于出卖了大量的国家机密，并造成了十余名美国间谍送命，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关在宾夕法尼亚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里，身穿40087-083号囚衣。

埃姆斯在1962年就参加了中央情报局，正赶上情报局扩充实力的好时光，很多与埃姆斯一起加入中央情报局的年轻人都得到了提拔，交上了好运。埃姆斯一加入中央情报局就进入了核心部门，成为一名外勤

官员，同其他担任情报分析任务的同事相比，他算是幸运的。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

他的工资不高，再加上没有得到提升，因此工作并不顺心。最糟糕的是，他不敢告诉人家他是一名情报人员，他总是对人说，他是外交官，在国务院工作。这种黑暗世界里的日子真不好过，为此，他的妻子安妮一直跟他闹。

转机发生在1981年，那一年，他从安卡拉调到了墨西哥城。地方变了，似乎运气也变了。正是在墨西哥城的社交场合，他邂逅了玛丽娅·罗萨里奥·卡萨斯。风姿绰约的玛丽娅，吸引了正闹离婚的埃姆斯。

但是，玛丽娅的背景远非埃姆斯所知道的那样单纯。玛丽娅早在1981年就被克格勃招募，负责搜集中美洲方面的情报。1983年4月至12月间，她又成为克格勃驻墨西哥情报站的线人。当埃姆斯陷入情海不能自拔之时，玛丽娅提出了结婚的先决条件：加入克格勃。

埃姆斯没有向他的上级报告此事。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官员对此也没有足够的重视。在他们看来，生活在秘密世界里的人大多孤独，而打扮成外交官的驻外

特工生活尤其苦闷，他们不仅要过一种双重生活，而且还要遭到那些真正的外交官的歧视。因此，像埃姆斯那样借酒浇愁，玩玩女人，在中央情报局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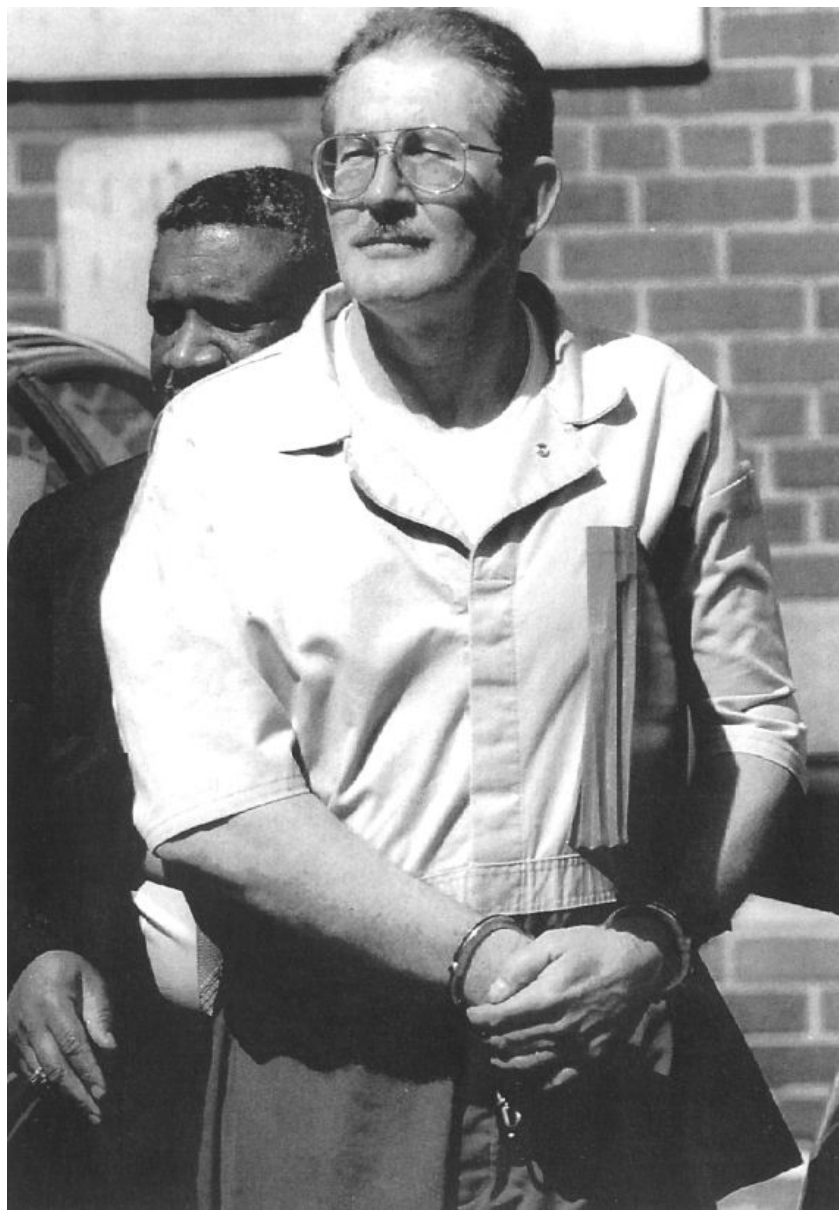
也许是玛丽娅给他带来的好运，埃姆斯很快被调回美国，担任中央情报局苏联分部的负责人。这在中央情报局是一个中层职位，但不容小视。美国长期以苏联、东欧为敌手，对付苏联、东欧国家情报机构的渗透是中央情报局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因此，这个职位也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熟悉埃姆斯的人都说，埃姆斯这次算是出头了。

但是在埃姆斯自己看来，他今年已经42岁，这个年龄才混上一个中层职位，实在算不得什么，在中央情报局，这意味着他的事业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中央情报局的局级领导一般都是从局外调入，很少有本局职员直接提升的。

埃姆斯的工作就是要在各式各样的苏联人中，寻找可能被中央情报局招募的“猎物”。这些潜在的目标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酗酒，婚姻失败，事业无成，寻花问柳。

埃姆斯在寻找，他的对手也在寻找。这一次，克格勃看中的不是别人，正是埃姆斯！在他们看来，埃姆斯具备一个变节者的所有条件。这是一个立即可以利用的人物，可以从他身上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

随后是长达6个月的劝降工作。埃姆斯被捕后在监狱里回忆道：“我需要钱。那时候我的生活非常动荡。我刚从墨西哥回国，正在闹离婚，并准备与玛丽娅结婚。我欠了很多债。我认为我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其实还没到那个地步，但我那时候已无法理智地考虑问题了。我甚至考虑过抢银行，我脑袋里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但是，我选择了我认为最容易实现的一种，那就是为苏联人工作。你知道我是干这一行的。那时候克格勃的工作很不景气，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同我的状况差不多。我想，如果我同他们联系，他们是会同意帮助我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我得到了钱，渡过了难关，而他们则得到了情报，得以从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



阿尔德里奇·埃姆斯是克格勃在冷战时期发展的最大的“鼯鼠”。

他给美国情报组织造成的损失之惨重无法计量。

“当我从克格勃拿到第一笔5万美元的报酬时，我

是挺兴奋的。5万美元！这已经相当于我一年的薪水。我无法不动心。当然，有些时候，我心里也是有些内疚的。毕竟，我在中央情报局干了这么多年。但我无法抵御金钱的诱惑。大约有10名美国间谍因我而丧命。我想罢手不干，也不可能了。克格勃哪会轻易放过我呢？

“克格勃不愧是谍报活动的行家里手，他们给我规定的联络手法，即便我这个反情报专家，也不得不表示叹服。我与苏联人接头的地点，有时在国内，但更多的时候则在墨西哥城、波哥大，甚至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好在我有特殊身份，飞来飞去还很自由。我很少同我的接头人会面。我们之间一般用秘密信箱联系。这个方法已经沿用几十年了，虽说比较麻烦，但使用起来有一种安全感。每次接头前，苏联人在我们原先约定的地方做一个记号，表示要我在特定的时间去接头。而我则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用白粉笔画一个白道，表示我知道了。如果要改变计划，我们之间另外约定了一些联络方法。要不是这种方法，我想，我维持不了9年时间。”

被埃姆斯出卖的第一批间谍就是克格勃中校马尔

季诺夫和莫特林。1980年11月，马尔季诺夫和妻子来到华盛顿，公开身份是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实际上是克格勃派往美国搜集科技情报的官员。1982年，马尔季诺夫被中央情报局一名特工盯上了。这个特工受过工程方面的训练，经常出席华盛顿地区的各种技术性会议，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设法与他单独取得联系，并最终将他发展成为间谍。他们为他在美国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存了数目可观的钱，以便将来在他叛逃到美国之后可以使用。

联邦调查局想通过马尔季诺夫了解那些被派到华盛顿的克格勃官员，看哪些人可以被收买过来，而中央情报局则对克格勃在美国的目标、他们的运作方法等情报感兴趣。马尔季诺夫不负众望，向美国情报机构提供了很多文件的复印件。情报局的一位官员说：“这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年轻军官，前途无量，说不定哪一天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

收买马尔季诺夫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重要突破，不久以后，他们又成功收买了苏联大使馆的另一名克格勃军官谢尔盖·莫特林少校。他是1980年夏天被派到华盛顿的，同马尔季诺夫一样，公开身份也是大使馆

的三等秘书。

作为苏联分部负责反间谍事务的埃姆斯自然知道这两个间谍的所有情况。由于现在埃姆斯为克格勃效劳，这两个间谍就对他构成了严重威胁。他一定要将他们除掉。6月13日，在与克格勃联系人丘瓦辛接头时，他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告诉了对方。得知这两个叛徒出卖了国家机密，克格勃的头头脑脑们恨得直咬牙，但为了保护埃姆斯，他们一直隐忍不发。

1984年底，莫特林在华盛顿大使馆的任期结束，奉召回国。临行前，他保证继续向美国提供情报。1986年初，他在与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接头时被逮捕，不久被枪决。

1986年11月，当尤尔琴科从华盛顿返回苏联的时候，马尔季诺夫也受命陪同尤尔琴科回国，当时马尔季诺夫的妻子娜塔莉娅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因为她的丈夫通常并不执行这一类的任务。10天之后，娜塔莉娅接到丈夫的一封信，说他在搬运行李时膝盖上旧伤复发，住进了医院，希望她带着孩子回国照料。娜塔莉娅立即动身回国。可是，飞机刚一着陆，克格勃官员就把两个孩子送到她母亲那里，而把她抓到监狱审

讯。克格勃官员告诉她，马尔季诺夫犯的是叛国罪。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克格勃曾经多次对她进行审讯，并允许她探望丈夫4次，最后一次还带去了两个孩子，那时马尔季诺夫已获知被判死刑。他于1987年5月29日被枪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调查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招募了两名苏联大使馆人员，但这两人不久就被调回莫斯科，随即被处死。联邦调查局认为，一定是内部出了问题。

联邦调查局“行动基地”与中央情报局合作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调查美国情报界内部的奸细，代号为“天光”。此外，联邦调查局自己还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负责调查中央情报局的安全问题，其行动代号为“演员”。

“天光”和“演员”小组同时行动。他们首先阅读近期有关档案资料，了解那些失败的谍报活动的内情，随即根据知情者的范围，各自拟出了一份嫌疑者名单。然后，行动小组根据各人的自然情况对嫌疑者进行排队。这些自然情况包括：是否酗酒，是否有吸毒行为，婚姻是否美满，有没有擅离职守的记录，是否有

不明收入来源，等等。根据这些标准被列入嫌疑者名单的大约有200人之多。行动小组对每个嫌疑者进行调查，到1992年秋，名单上的名字减少到40多个，网一点点收拢了。

令行动小组惊异的是，在“天光”和“演员”小组的名单上，阿尔德里奇·埃姆斯赫然在列，而且，调查发现，他的不检点行为很多，因此，在名单上，他的名次逐步前移。他酗酒，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曾经离过婚，这说明婚姻问题上有不美满的记录；在一次例行的测谎检查中，检测人员发现，测谎器上的波纹异常。

不过，最让人不放心的是，埃姆斯有大量不明收入。他的年薪不过7万美元，从1985年4月至1993年8月，其总收入不过34万美元，但同期他的支出竟达到130万美元。1989年，他在华盛顿郊外阿灵顿市买下一处住宅，一次付清了54万美元房款。更让人吃惊的是，埃姆斯为装修房子和购买家具一下子又花去了10万美元。此外，他花了近2万美元为其妻买了一辆“本田”牌轿车，不久又买了一辆价值2.5万美元的“美洲豹”牌轿车。在过去的8年中，他还买了16万美元的股

票，为妻子支付了几万美元的学费。此外，他还通过信用卡支付各种费用45.5万美元，付电话费近3万美元。

中央情报局反情报中心的雷蒙德看着这些调查记录，惊呼：“他怎么买得起这种豪华住宅？他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买这些汽车？几乎可以肯定，这家伙有问题。”

调查小组确认，不管美国情报界内部还有多少“鼯鼠”，埃姆斯肯定是其中之一。下面要做的工作就是搜集证据。

1993年5月12日，联邦调查局开始对埃姆斯进行刑事调查。此次调查的代号是“夜行人”，负责人是莱斯利·怀泽。怀泽是个老资格的反情报官员，以前侦破过很多类似的案件，但是，当他从布赖恩特手中接过那沉甸甸的案卷时，他已经意识到，这个案件将使他以前破获的所有案件黯然失色。以反间谍处处长的身份给外国情报机构充当“鼯鼠”，这在美国还没有发现，在英国也仅有一个金·菲尔比。

怀泽迅速组成一个行动小组。一切就绪后，6月3日，怀泽下令，监视埃姆斯的一切行动。此后，埃姆

斯住宅的周围布满了垃圾清运工、草坪修理工、送货杂工等。6月11日，怀泽手下的特工开始窃听埃姆斯。埃姆斯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怀泽的监视之下。

6月23日，经司法部门批准，怀泽对埃姆斯的住宅进行了秘密搜查，从而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联邦调查局人员从埃姆斯家中搜到了144份机密文件，其中大多数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有关，有些还涉及美国的军事机密，而这些机密同他当时从事的缉毒工作毫不相干。联邦调查局还从埃姆斯家中的垃圾桶中找到了一盒废弃的色带，经过技术处理后，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除了在阿拉斯加要得到一笔现金外，我还希望你们以更安全的方式给我汇一大笔钱。”后来的调查证实，埃姆斯从阿拉斯加回来后，在当地的银行以玛丽娅的名义存了一笔钱，数目是8.67万美元。此外，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从垃圾桶中还找到两份文件，其中一份写道：“我的妻子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并且很支持我。”另一份文件则披露了中央情报局的人事、取得机密情报的渠道以及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的一些秘密行动。

搜查完毕后，联邦调查局在埃姆斯的计算机上加

装了电子侦测器，在其房间加装了监视装置，在过道上安装了微型摄像机。此外，怀泽复制了埃姆斯住宅和汽车的钥匙。7月20日，趁埃姆斯到胡佛大厦办事的机会，怀泽又在埃姆斯的汽车里安装了一个电子信标发射器。

9月15日深夜，4名特工从埃姆斯的家门口换走了垃圾箱。他们从中发现了一张撕碎了的小纸条，上面的字迹依稀可辨：“我想10月份在波哥大会面。”

10月8日，埃姆斯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保罗去迈阿密度周末，10月9日，天刚蒙蒙亮，怀泽的人员出现在埃姆斯家中，而怀泽自己则在“行动基地”一个小指挥室里遥控指挥。下午5点，搜查人员满载而归。电脑专家汤姆·默里从埃姆斯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东西，如联络点和情报放置点的详细指示，关于会面的记录等等。此外，联邦调查局人员还发现了大量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这些都是埃姆斯无权过目的。

10月，埃姆斯告诉他的上司，他要在本月去波哥大看望他的岳母，但是，机场的航班登记表却显示，他没有去波哥大，而是去了加拉加斯，而且，当时他的岳母也不在波哥大，而是在美国。怀泽知道，埃姆

斯是到加拉加斯与他的主子会面去了。

埃姆斯在加拉加斯期间，并没有逃过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怀泽从电话录音里听出，埃姆斯似乎已经隐隐约约地知道，他已被怀疑。他觉得时机差不多了，一有机会就应收网，否则，埃姆斯有可能跑掉。

联邦调查局加紧了对埃姆斯的监视。埃姆斯的波哥大之行一直拖到11月才成行。11月1日，埃姆斯来到波哥大，等待他的不仅有他的克格勃老板卡列特金，还有怀泽所带领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他们将埃姆斯与卡列特金可能会面的场所都监视起来，不料还是扑了个空。11月2日，埃姆斯和卡列特金完成会面，怀泽未能将埃姆斯当场拿获，不禁感到几分沮丧。

从波哥大回国以后，埃姆斯夫妇完全沉寂了。没有人知道卡列特金在波哥大同他讲了什么，但是，埃姆斯知道他已被怀疑是确凿无疑的了，因为他不再有任何可疑的举动。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埃姆斯，连埃姆斯的邻居对周围出现的各种闲杂人员都感到可疑，作为反情报专家的埃姆斯不可能不知道此事。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发现，埃姆斯住宅的周围不断

出现乔装打扮的俄罗斯情报人员。他们很可能已经知道埃姆斯暴露，杀掉埃姆斯灭口也不是不可能的。此外，根据原先的日程安排，埃姆斯可能于近期出国公干，谁也没办法保证他会按时回国，搞得不好，煮熟的鸭子就会飞了。于是，联邦调查局决定：逮捕埃姆斯。

埃姆斯曝光后，美国朝野舆论大哗。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怀疑中央情报局内部有苏联间谍，但一直无法将其挖出。埃姆斯曝光后，人们心目中的怀疑终于成了现实。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埃姆斯间谍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间谍案。国务卿克里斯托夫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皮克林于1994年2月22日分别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白宫认为，这次间谍案是对两国“伙伴”关系的一次严重破坏。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则利用埃姆斯一案大做文章，攻击政府过于信任叶利钦。中央情报局立即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俄罗斯主动召回与埃姆斯一案有关的驻美外交官，并把其在美情报人员削减到美国在俄罗斯的同等水平。2月25日，美国政府宣布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参赞亚历山大·李森科为

不受欢迎的人，限他在7天内离境。

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反应则要平和得多。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呼吁俄美双方的情报机构将埃姆斯一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要把政治领袖卷入这一纠纷。叶利钦总统的发言人科斯季科夫指责美国对间谍案反应过分。2月27日，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接受全美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埃姆斯间谍案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美国大可不必为此而震惊，因为俄罗斯和美国尚未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更没有达成彼此停止秘密情报活动的协议。俄罗斯的塔斯社还强调说基于个别利益的考虑，情报事务仍有必要存在，美国军方领导人也曾多次表示，他们并没有计划结束美国对俄情报工作，既然如此，俄国为什么不能在美国从事情报活动呢？在从事情报活动方面，俄罗斯与美国拥有同等的权利。

基于美国政府驱逐了李森科，俄罗斯也采取了对等措施，于3月1日和3日宣布捕获了1名英国间谍和2名美国间谍，并宣布，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中央情报局莫斯科情报站代表詹姆斯·莫里斯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在7天内离开俄罗斯，还指控美国驻俄

大使馆二秘凯利·汉密尔顿与间谍案有关，以此来平衡国际舆论对埃姆斯间谍案的关注。

埃姆斯身为中央情报局对俄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俄罗斯能将此人招募，很明显是这场间谍战的赢家。但是，此案并没有到此结束。据香港《东方日报》消息，埃姆斯虽然出卖了美国大量的国家机密，但美国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挨打。因为中央情报局早就觉察内部出了奸细，且较早地将埃姆斯列为怀疑对象，及时调动了他的工作，将他调任为缉毒中心黑海地区科的负责人，因而减少了一定损失。

更重要的是，在确认埃姆斯是俄罗斯间谍后，美国立即成立了一个反情报小组，专门编造假情报，经埃姆斯之手提供给俄罗斯，这些情报真真假假，极难辨认。

4月28日，美国联邦法院对埃姆斯进行公开审讯。莱斯利·怀泽在其长达30多页的公诉书上，列举了埃姆斯的罪状，说在过去的9年里，埃姆斯因出卖情报而获得250万美元的酬金，是莫斯科所雇用的外国间谍中最富有的一个。最后，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和偷税漏税罪判处埃姆斯无期徒刑，并罚款25万美元。比起他从克

格勃收取的巨额酬金来，25万美元不过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埃姆斯注定是要坐穿牢底，无法享受了。

又一大“鼯鼠”罗伯特·汉森落网

2001年，美国历史上又一大“鼯鼠”罗伯特·汉森落网。

2001年2月18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几十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扮成游人，分散在华盛顿市郊的法克斯通公园的各个角落。他们一边在烤炉上烤着牛排，一边密切注视着这座木桥上的动静，并把这一切用摄像机摄下。

这时，一个身着黑色上衣的男子走过木桥，他停下脚步，弯腰系鞋带儿。“游人们”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漫不经心地走到这一男子面前。在走到其家门前时，突然，“游人们”猛扑上去，将这一男子按倒在地。

2月20日，美联邦调查局局长弗利宣布，联邦调查局2月18日逮捕了俄罗斯间谍、该局资深特工罗伯特·汉森。

汉森1944年4月18日出生在芝加哥。大学期间，

他所学专业是会计学。在就读伊利诺州专科学校时，汉森学习了俄语。70年代初他被芝加哥警察局录用，在对内侦察处工作。1976年，汉森被调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后来他专门负责对俄罗斯驻纽约外交官的跟踪。正是在此期间，汉森投向了克格勃的怀抱。

1985年，汉森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寄出了一个包裹和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相信，贵国的专家一定会对这些文件作出恰当的评价。专家们一定会认为应该付给我10万美金。”

从1985年开始，汉森一共向苏联人提供了27封信件和22个邮包约6000页的绝密情报。这其中包括美国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电子侦察技术等绝密件。最为重要的是，汉森于1985年10月1日和1989年3月20日向克格勃透露了3名被美国招募了的克格勃特工名单，导致2人被枪决，1人入狱。



罗伯特·汉森 在联邦调查局从事反间谍工作期间自愿成为克格勃的一名“鼯鼠”，向克格勃出售了大量机密文件。

汉森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了27年，他隐藏得十分巧妙，甚至多次通过了美联邦调查局测谎局负责人亲自对其实施的测谎检查。汉森长期负责反间谍工

作，他有条件接触绝密文件。4年前，汉森被调到美国国务院工作，负责侦破外国间谍的专项任务。据说，前不久揭出的俄安全部门特工在靠近奥尔布莱特办公室安装窃听装置一案就与汉森有关。

汉森在克格勃总部的代号为“拉蒙”，或简称“P”。汉森从未和任何苏联人发生过联系，而一直通过“秘密信箱”向其转交情报，并领取报酬。

汉森坚信，即使是莫斯科泄露了天机，他也不会被揭露，因为他的名字无人知晓。

其实，正是莫斯科克格勃内部出了叛徒，才导致“P”特工的败露。美联邦调查局从去年下半年就已发现内部有“鼯鼠”，后来通过隐藏在莫斯科克格勃内部的“自己人”提供的情报把汉森揪出。

据统计，15年来，汉森总共从苏联和俄罗斯情报机构拿到约140万美元的报酬，其中包括现金和钻石。

据报道，汉森为苏联和俄罗斯服务，还不完全出于经济考虑。他在写给莫斯科总部的信里说：“我从14岁时起就选择了这条道路。”

与埃姆斯相比，汉森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就像一个典型的美国中层人士，住房是中层人士都能买得起

的那种，开的小车也是普通型的“福特”车。

汉森被捕后，邻居们震惊不已。他们说，汉森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个星期天他都偕全家去教堂祈祷。汉森的妻子贝尔纳杰达在当地中学教宗教史。6个孩子都非常爱自己的父亲，最大的去年考上了大学。

同行们则称汉森是一位资深专家，但很像恐怖片中的心理阴暗的坏人。平时，汉森常穿深色西装，同行们就叫他“死亡医生”或“殡葬馆馆长”。汉森经常辱骂美国是一个“个头大，易发怒和危险的痴呆儿”。

由于汉森一案已造成严重后果，美国总统布什亲自下令成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牵头的专门调查委员会。3月5日，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审理汉森一案。汉森拒不认罪，情绪沮丧，与法庭尖锐对立。

根据美国法律，汉森可能被处以极刑。但也不排除像埃姆斯一样，被判终生监禁的可能。

2010年美俄双方的间谍交易

美、苏（俄）之间的这种间谍战就一直没有结束过。到了2010年，美国和俄罗斯双方还在进行一场间

谍交易。

2010年7月，美国将驱逐10名俄罗斯间谍。作为交换，莫斯科将释放4名被控为西方从事间谍活动的人。

早些时候，这10名俄间谍在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出庭时承认了对他们的间谍控罪。这是首次所有10人被逮捕后一起在公众前露面。第11名俄罗斯间谍嫌疑人在塞浦路斯被逮捕后，在取保获释后失踪。

被莫斯科释放的人之一是核科学家苏佳金。苏佳金于7月6日从原来服刑的俄北方一所监狱转至莫斯科附近的监狱，并于次日和亲属会面，当时俄情报机构官员和美国外交官也在场。据悉，苏佳金可能被送至维也纳，与其中一名被美国逮捕的俄罗斯间谍实行交换，然后飞往英国。

伊戈尔·苏佳金曾担任俄科学院美加研究所对外政策研究部军事技术和军事经济政策室主任，他被控向一家英国公司提供有关俄核潜艇与导弹的情报而被捕。俄联邦安全局称，这家英国公司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设在欧洲的“马甲”。苏佳金于2004年4月被俄法院以叛国罪判处15年长期监禁。就在4个月前，俄法院还曾

拒绝了他的假释请求。

有关人士指出，采取“一对一交换”方式处理本次间谍风波是美国和俄罗斯手中能打出的“好牌”。

在媒体纷纷对这场交易进行渲染、描述时，有好事者还对双方在多年的间谍战中互相使用的间谍工具进行了详细的披露：

毒尖伞

1978年，当时流亡到英国的保加利亚政治异议分子乔吉-马尔科夫在伦敦市一公交车站身中蓖麻毒素遭人暗杀。这一暗杀事件的幕后主谋正是克格勃。当时马尔科夫在等公交车时感到大腿后半部一阵刺痛，他发现是后面的人拿着一把伞“不小心”戳到了他的大腿，马尔科夫当时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发高烧，3天之后就宣告死亡，尸检结果显示他是被人注射蓖麻毒而中毒身亡的。

暗藏在墙内的相机

这种相机是于20世纪80年代由捷克人制造出来的，后来被东德国家安全局广泛使用。这种相机可以秘密安装在旅馆房间的风口进行秘密拍摄。

腕表状照相机

这种经过精巧设计的微型相机是大约在1949年的时候由德国人制造出来的，它可以让一名特工人员进行间谍工作时假装看表上的时间而秘密进行图像拍摄。它所使用的是的一颗可循环使用并且只能拍摄6张照片的微型胶卷。

文字阅读装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秘密记录信息，间谍通常都会使用不同波长的紫外线来进行文字记录，然后他们的同伴利用这种隐形文字阅读装备读出记录的秘密信息。进行情报搜集工作的特工人员通常都拥有一支装有特殊墨水的笔，这种笔写出来的文字只有在特定波长紫外线的照射下才会发出荧光，否则的话所写的文字将是肉眼所看不见的。

唇膏手枪

克格勃的特工人员，尤其是女特工通常随身都会携带一种做成唇膏形状的手枪，这种手枪的长短仅有4.55厘米长，并且只有一发子弹，这种手枪还有一个外号叫“死亡之吻”。这种武器最初是在西柏林地区发现的，由于其形状特殊而且利于隐藏，特工人员通常都将这种唇膏手枪作为进行暗杀活动的应手武器。

用煤伪装的装备或煤形炸弹

美国特工人员为了进行破坏活动曾经使用过“煤矿炸弹”，他们把炸弹做成煤的形状，在里面填充爆炸物，然后把它们秘密放在煤桶里，放在商店附近或者铁路上对敌人实施爆炸行动。

树桩形窃听设备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使用过一种做成树桩形状的窃听设备，这种窃听设备所使用的能源是太阳能。美国中央情报局把这种窃听设备安放在苏联的一个军事基地附近，搜集了很多有价值的秘密情报。

为了窃取对方的机密，美苏（俄）可以说是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但是，无论是在冷战的四十多年里，还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岁月，他们之间的谍战却是胜负未分，没有赢家。

第七章 美元开道，中情局阴影笼罩世界

为了阻止意大利的“红色分子”在大选中夺权，中情局开始了“烧钱”运动，最后用1000万美元把意大利共产党“烧”到了台下；但是在“匈牙利事件”中却开了一张“空头支票”——面对苏联坦克在布达佩斯连续四天的屠杀，中情局唯一能做到的就只是在“自由欧洲电台”摇唇鼓舌；艾森豪威尔可以自豪地说“在我的任内，卢蒙巴终于死了”，但是非洲“雄狮”卡扎菲却躲过了第8次谋杀，18年后在自己的帐篷里接见布莱尔。

“马歇尔计划”就是“烧钱”

中情局成立之初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直言不讳地说：“我对这个机构有极强烈的不祥预感。我提醒总统，一旦设立中情局，他本人和国安会，甚至其他任何人都无从知悉它在做什么，亦无法控制它。”

所以，当时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国务院，不但对中情局都不看好，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排斥它。

1947年9月26日，中情局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总统杜鲁门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中情局法律顾问劳伦斯·休斯敦曾提醒中情局局长希伦科特说，反对“秘密行动”的呼吁会与日俱增。中情局如果没有国会的同意，就无法获得法律授权以执行任务。因此，希伦科特就将中情局的海外任务控制在只搞情报搜集，不搞其他的违规动作，但是他失败了。

1947年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向中情局发出了第一道最高机密令，要中情局立即执行一种秘密心理战，“以期应对苏联及苏联所策动的活动”。要求中情局马上着手打击意大利共产党，以防这些“红色分子”在1948年4月意大利的大选中夺权。

中情局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开始行动。他们在给

白宫的报告中危言耸听地说，意大利可能变成极权的警察国家，一旦共产党赢得选举，必然会占领“这个西方文明最古老的所在地，尤其是全球虔诚的天主教徒都会密切关注梵蒂冈的安危。一旦遭到无神论政府包围的梵蒂冈处于共产党的枪口之下，这种可怕的情形简直叫人不忍想象”。

当年的意大利共产党，是一个成立于1921年的老资格的党派。它是由意大利社会党的左翼组成的。1922年意大利的国家法西斯党上台后，在意大利所有的政党中只有共产党坚持反法西斯立场，结果在1926年10月被墨索里尼政权取缔，总书记葛兰西被捕入狱。1934年，意大利共产党与社会党在意大利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1943年墨索里尼政府垮台，纳粹德国侵占意大利，意大利共产党率先组织民族解放委员会，派遣“意大利旅”开展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其威望空前提高。1944年4月参加联合政府，党的领导人陶里亚蒂先后任副总理等职（后在1947年被排挤出政府）。从此以后，意大利共产党长期居于反对党地位。所以当时美国认为，“来一场枪战也好过让共产党合法夺取政权，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则是仿效共产党搞颠覆”。

不过，美国国会当时并没有同意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情局下达这样的一项任务。理由是他们认为这种打击“红色分子”的行动是不合法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对付国际共产主义的行动需要很多经费。要用美元开道，到意大利去收买那些社会名流和各党派的政客，让他们和中情局合作起来，共同去操纵意大利的选举，最后，才能把共产党赶出议会。中情局的官员们当时把这种秘密行动叫做“烧钱”。

根据中情局当时驻罗马工作站站长詹姆斯·安格尔顿的预算，这次行动所需要的经费是1000万美元。安格尔顿从战略情报局时代就一直待在罗马，他告诉总部，自己对意大利特勤机关渗透极深，已到了实质上由他主事的地步。他可以利用特勤机关的成员把经费分散出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1000万美元的经费从哪儿来呢？

国防部长福里斯特尔与好友艾伦·杜勒斯虽然已经请求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商人、银行家与政治人物中的好朋友捐助，但经费还是不够。于是，福里斯特尔就

跑去找老朋友约翰·斯奈德。此人时任财政部长，也是杜鲁门最亲密的战友之一。福里斯特尔说服斯奈德挪用外汇平准基金。该基金成立于美国大萧条时期，原来的作用是通过短期通货交易，稳定海外美元币值，二战期间则变成从轴心国家掳获战利品的收藏所。于是，约翰·斯奈德就从该基金2亿美元的欧洲重建经费中，挪出了数百万美元转到一些有钱的美国公民（其中不乏意大利裔）的银行户头，再由他们以募捐的形式转入中情局设立的各个外围组织。捐款人可在所得税申报单上的“慈善捐款”旁标注特别密码。就这样，几百万美元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转交给了意大利的政治人物，还有梵蒂冈教廷的政治组织“天主教行动会”。当装满美元的公文包在罗马四星级的哈斯勒饭店转手时，中情局的行动处长马克·怀亚特说：“我们也很想以更老练的手法进行。用黑色公文包来影响政治选举，毕竟不是很体面的事情。”

中情局罗马站为此付出了1000万美元。从表面上看，当时的1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亿美元，可在当时的战后经济复苏时期，这简直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意大利行动”是中情局头25年历史中投资最大、为时最久、收获最丰厚的一次秘密行动。1947年11月行动开始之初，安格尔顿站长从罗马返回美国，在中情局由加洛韦负责的特别行动处内设立了一个“苏联科”，启用他在意大利建立起来的特工网，网罗了一批在二战中犯有战争罪的恶棍。这些人都是想通过这种机会来“豁免”自己的罪行。

在那些日子里，安格尔顿一直在思考即将来临的意大利大选。他拟定了一个“直接给钱”的计划。到了3月份大选前夕，中情局终于获得了分配选票的权力，同时支持小党与“基民党”候选人，从而完全操纵了1948年的意大利大选。

当年中情局的意大利行动到底花了多少钱，没有正式的统计和记录，但事后凭那些当事人估计，大约在1000万到3000万美元之间。中情局的行动处长马克·怀亚特曾经说：“黑色手提包里除了装有厚厚的现钞之外，还有满满的友谊和信赖，加上一点软硬兼施……。”

1948年的意大利行动中有一则传闻，说当时在处理巴勒莫码头工人事件时，3名中情局的特工竟然请出了当地的黑手党出面，才把那件事给摆平了，最后，

成功地让装有武器的美国货船逃过共产党领导的码头工人的搜查。不过，当时中情局总部倒是对他们的做法很不满意。他们说，美国的武器流入了意大利，而美国船只运回来的只是粮食。

意大利这次行动的成功，让中情局看到了金钱的魅力。于是，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中情局就在世界各地一直沿用这种以金钱收买选票和政治人物的手段，并且屡试不爽，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获得了成功。

1948年3月5日，捷克危机爆发，柏林的美国占领区司令卢修斯·克莱将军发给五角大楼一份让人心惊胆战的电报，说直觉告诉他“苏联随时会发动攻击”。五角大楼把电报泄露出去，华盛顿顿时一片惊恐。尽管中情局柏林基地的人员发电报再三向总统保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可能发动攻势，但是没人能听得进去。次日，杜鲁门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提出警告说，苏联及其发言人扬言要制造剧变。他呼吁国会立即通过一项在后来被称为“马歇尔计划”的重大计划。

“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国向欧洲提供数十亿美元，作为战后重建的经费，并建立对抗苏联的

政治与经济屏障。美国将协助19个国家（16个在欧洲，3个在亚洲）按照美国的蓝图重建文明。凯南和福里斯特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发起人，艾伦·杜勒斯则是该计划的法律顾问。

自从通过了这顶“马歇尔计划”之后，中情局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因为这项计划中有一项“秘密追加条款”，中情局可以从中挪用数百万美元的经费。这对中情局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啊！

那项“秘密追加条款”的程序非常简单。国会批准“马歇尔计划”之后，将在5年内拨出约137亿美元的经费，接受该计划援助的国家必须以本国流通货币配备等额的基金。中情局可以通过“马歇尔计划”的各个海外办事处，使用这笔基金的5%，其数额总计约6.85亿美元。

秘密经费是秘密行动的核心，中情局这时终于有了源源不绝且无从追查的现金支持了。

从此，中情局就从“马歇尔计划”中支出大笔的经费，支援它的所谓的“外围阵线网络”，也就是表面上是由名流领衔的各种公开的委员会或咨询会，其实就是各种间谍机构。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在全欧各地都有外围组织，如出版社、报社、学生团体和工会。现在中情局也建立了自己的外围团体。这些组织吸收外国特工，尤其是东欧各国的移民和俄罗斯难民。这批外国人在中情局领导下，可以在欧洲自由国家成立各种地下政治团体，建立它们的情报网络。

1948年4月，意大利共产党在国内大选中失败，未能进入政府。不过在大选前几个星期，意大利共产党却取得了一场大胜利。他们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展开一连串逮捕与处决行动。中情局驻布拉格工作站站长查尔斯·凯特克设法将大约30名捷克人送出边界，转往慕尼黑。这些人都是他手下的特工及其家属，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捷克的情报头子。凯特克找来一辆小客车，把他塞在散热器和格子窗之间，安排偷运出境。

作为意大利头号在野党的共产党，其政治地位始终使华盛顿深感不安。中央情报局认为，仅仅依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去支持加斯贝利政府是不够的。凯南在马歇尔和艾奇逊的支持下，建议中情局成立一个从事“秘密行动”的组织。国家安全委员

会很快批准了这一要求，并于6月18日颁发了一道指令，授权中情局有权进行“秘密行动”和“准军事行动”，并将在1947年成立的“特别行动处”改名为“政策协调署”，在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划归中央情报局局长直辖）。

政策协调署由中情局的精干人员组成，国务院任命弗兰克·威斯纳为政策协调署主任。弗兰克·威斯纳原为华尔街律师，在战略情报局负责欧洲的行动，是该局秘密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战后继续留在军事情报部门，同德国陆军情报组织保持联络，后者被原封不动地保留用来秘密监视苏联人。后来他加入国务院，继续经营那里属于他个人的情报小组，在战后吸收了一大批法西斯分子为其工作。

政策协调处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宣传战、经济战、破坏活动和准军事行动，包括支援东欧的地下抵抗组织对付苏联的威胁”。威斯纳果然不负众望，在短短的4年里，他领导的政策协调署就在国外建立了47个秘密情报站，在编人员2812人，合同人员3142人，年预算为8400万美元，成为中央情报局干得最红火的地方。

威斯纳上任伊始，就把对意大利的秘密行动作为工作的重点。先后在意大利情报站工作的有麦科恩、科尔比、兰斯代尔、安格尔顿、沃尔特斯等一大批后来在中情局显赫一时的人物。他们与美国大使和罗马教廷一道协调工作，扶植意大利国内的非共产党组织和团体，破坏意大利共产党的声望，成功阻止了意大利共产党在大选中获胜，亲美政党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以大比分赢得了1948年的大选。

中情局在意大利得手之后，它在东欧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匈牙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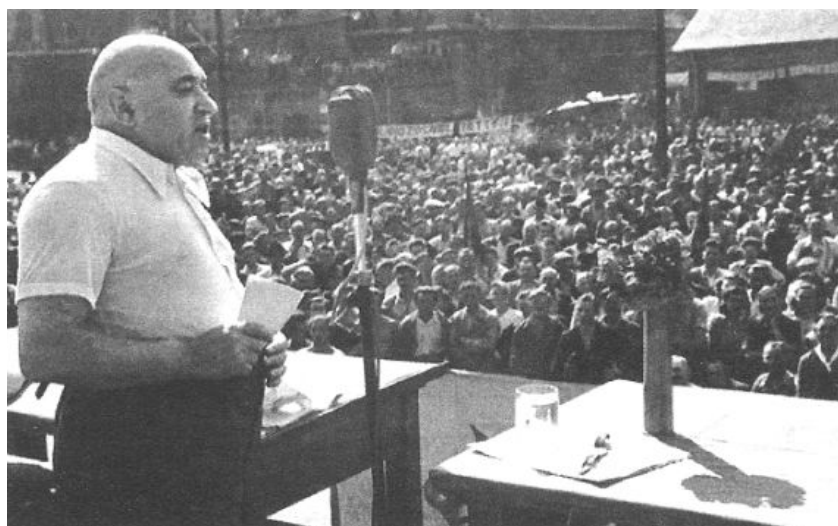
“匈牙利事件”中的难堪表现

当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被公开之后，立刻在东欧国家引起了一阵混乱，同时，还导致了匈牙利的工人发动武装起义，苏联不得不出兵镇压。于是，中情局与苏联的斗争又在匈牙利展开了。

1945年4月4日，苏联解放了匈牙利，那只不过是形式上的解放。在二战时期，一些像德国法西斯一样残酷的匈牙利人成立了“箭十字”组织，他们在迫害犹

太人的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苏联占领匈牙利之后，“箭十字”组织中的一些成员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领导下的秘密警察——匈牙利国家保安队。这个组织是匈牙利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

1949年4月，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匈牙利共产党利用国家保安队清理了政府，成立了由共产党控制的“大众阵线”。三个月以后，以极端共产主义者拉科西为首的持强硬路线者效仿苏联对内部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从而牢牢地控制了匈牙利政府。



制造恐怖的拉科西

这个极端共产主义者拉科西天生一副残忍的样子——匈牙利人大都长得个头高大，可这个拉科西身高却只有160厘米，而且身矮体胖，脑袋还是个“不毛之

地”，于是，斯大林就在背后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屁股头”。

但是，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屁股头”拉科西却对斯大林崇拜得五体投地，始终认为斯大林那一套独裁专制兼恐怖镇压的做法，就是治国法宝。他在国内仿效斯大林大搞个人迷信，推行“造神”运动。他要求匈牙利人对他本人必须顶礼膜拜，“伟大”二字只能用于颂扬和描写他拉科西。在他的领导下，匈牙利的国家保安队成为一支镇压人民群众的血腥势力。匈牙利当时全国人口只有几百万，而国家保安队却有正式成员10万人，还有数以万计的便衣人员。匈牙利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秘密警察国家，其恐怖状态可想而知。

但是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整个共产党阵营的执政风格改变，拉科西在匈牙利的地位也开始发生动摇。不久，他的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就被寻求开放改革和民主自由的纳吉抢了过去。但是在1955年，拉科西就动用军事力量解除了纳吉党内外的一切职务。这时，他又开始重复斯大林当年的那一套，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开杀戒，进一步镇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想以此扼杀匈牙利人民长期以来对他的不满和反抗。他公开提

出：“谁不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

但是，斯大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历史已经在告诉世人，依靠血腥和暴力进行统治绝对不是正确的做法。即使是苏联的共产党，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1956年7月18日召开的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当拉科西唾沫横飞地把自己的设想向政治局委员们简单介绍后，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就神情严肃地向其他人员说，经过商议，“拉科西同志必须下台”。

拉科西猖狂得太久了，对这样的提议根本不在乎。他冷笑着走出会议室，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打电话。他本以为赫鲁晓夫也和斯大林一样会积极支持他。可让他想不到的是，一直就对拉科西在国内实行高压政策很不满意的赫鲁晓夫在电话那边把他臭骂了一顿，拉科西这才灰心失望，宣布辞职。苏联方面提议由格罗接替拉科西担任匈牙利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卡达尔任书记；同时还为被拉科西清除出党的纳吉恢复了党籍。

与此同时，波兰执政者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公开抨击斯大林主义的恶果，许诺要在波兰

实行进一步的改革，他的讲话受到情绪激昂的波兰民众的支持。波兰的斯大林路线支持者强烈反对，并向苏联请示，是否需要派遣军队来遏制他们认为迫在眉睫的波兰人暴动。赫鲁晓夫亲自出马到波兰，严厉斥责哥穆尔卡的新政策，并且调动驻在波兰的苏军，给哥穆尔卡施加压力。但是苏联知道，真的对波兰的改革实行军事镇压，只能激起波兰人民更强烈的反抗，局势肯定会一发不可收拾。赫鲁晓夫是个聪明人，所以他最终取消了对波兰的武力干涉，同意将驻波苏军从华沙调回波兰的基地。这是一个好消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已经对某些国家的共产党失去了控制。

格罗执政后，虽然对匈牙利的民众镇压稍有缓和，但只要国家保安队还没有解散，群众对共产党的印象肯定就不会好起来。当波兰顶住了苏联压力的消息传到匈牙利后，匈牙利的知识分子阶层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反对苏联对本国的占领，要求纳吉上台执政，并将赋闲在家的拉科西活捉。格罗此时表现出了他强硬的一面，命令国家保安队用机枪扫

射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同时命令政府出动军队和武装警察，力图恢复社会秩序。一些匈牙利的军队官兵此时转头向群众靠拢，他们把一些武器送给愤怒的群众。

中情局得到了匈牙利发生民变的消息，局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说：“赫鲁晓夫的日子到头了。”——但是他的预测却整整差了7年。因为7年以后赫鲁晓夫才下台。

杜勒斯与副局长威斯纳决定要好好利用匈牙利的这次民变。可是中情局这时才发现一个问题，他们在匈牙利并没有工作站，总部的秘密行动处也没有匈牙利工作组，甚至在中情局没有一个人懂匈牙利语。几年前，中情局曾在匈牙利建立过秘密情报网，但是那些情报人员一进入匈牙利，就被国家保安队逮捕了。威斯纳曾把在朝鲜战争时期四处埋武器的方法在匈牙利使用，可现在他完全记不得武器埋在哪里了。于是杜勒斯只好命令匈牙利的“红袜—红帽”小组行动起来，参加到反对者中去，组织匈牙利的工人和学生们一起举行反对苏联占领军的示威，要求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匈牙利的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苏联人发现格罗的那一套执政方式和拉科西一样，就立即将他废掉了，应广大群众要求，让纳吉出任匈牙利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会议主席。但是匈牙利的民变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他们再次聚集起来，希望纳吉可以效仿波兰摆脱苏联的控制。

苏联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愤怒，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在匈牙利政府大楼里强迫纳吉在一份请求苏联出兵的声明上签字。当时纳吉几乎是一路小跑地想甩掉这个特务头子，但最终还是在一名国家保安队军官的手枪威逼之下签了字。

第二天黎明，苏联2.5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2500辆坦克，开进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双方进行了一场激战，苏联伤亡很大。在这大兵压境之时，纳吉在国家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他认为苏联军队应该撤走，旧有的国家安全部队应该解散，“乘人民力量而起的新政府”应为民主自治而战。他同时组织了临时政府，废除一党专政，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宣告匈牙利为中立国家，并向联合国与美国求助。

中情局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采取行动。威斯纳

很快找到中情局的外围情报组织“自由欧洲电台”。当天晚上，中情局通过“自由欧洲电台”开始鼓动匈牙利人民破坏铁路、拆除电话线、武装农民、炸掉坦克车，疾呼：“不自由，毋宁死。”

在“自由欧洲电台”和“红袜—红帽”小组的推波助澜下，匈牙利人似乎看到了希望。10月31日，匈牙利正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让苏联人更加愤怒，在匈牙利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此时，威斯纳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和眼前发生的事情，预见到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会取得成功，就立即找到局长杜勒斯，告诉他：“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苏联一定会有效地控制住匈牙利的局势，如果我们现在不帮助匈牙利人的话，我们将失去最佳的机会。”

但是杜勒斯却犹豫不决。威斯纳多次催促杜勒斯局长采取行动。他说，我们可以利用“红袜—红帽”小组的地下人员，动用中央情报局秘密军事力量，支持匈牙利取得胜利。



“匈牙利事件”前宁静的布达佩斯



“匈牙利事件”中充满血腥气息的布达佩斯

当年窃取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失利的情报处长艾默

里想通过匈牙利事件和威斯纳再较量一下。他看准了苏联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中的不利因素，大胆提出了新的设想。他认为，苏联核武器力量薄弱，目前又遭到匈牙利军方和老百姓的联合抵抗，苏联与匈牙利东部连接的铁路线和公路线十分脆弱，只要对苏联山区要隘处进行核力量打击，那么苏联通向匈牙利的运输线将会陷入瘫痪状态，苏联就不会向匈牙利提供支援。艾默里也找到局长杜勒斯，并十分自信地对他说：“苏联绝对不会为此和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冲突。”

这一次，威斯纳十分同意艾默里的设想，并且也提出要采取常规的秘密军事行动。于是在艾默里和威斯纳两人共同的催促下，杜勒斯向白宫报告，但最后很遗憾地告诉二人说：“你们的建议和设想无法付诸行动。你们知道吗？现在是大选的关键时候，白宫不会拿这件事冒险。”

于是，当苏联坦克在布达佩斯连续四天残暴屠杀数万人，并将数千人扔到西伯利亚囚犯营中的时候，中情局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在“自由欧洲电台”摇唇鼓舌——“美国协助自由斗士，派兵向政府施压的力

量，将大到不可抵挡”。这明显是在告诉匈牙利人，美国会出兵帮助他们。

但是，匈牙利人并不知道，这可是美国人的一张空头支票——

1956年11月1日。布达佩斯电台反复播放着紧急呼救的信号：“救急！救急！救急！求助！求助！求助！”其中还伴随着阵阵爆炸声和枪炮的轰鸣。“美国军队在哪里？求助！求助！”

11月4日，一大批匈牙利难民跑到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央求美国设法解救。中情局工作站站长皮尔·席尔瓦事后回忆说，匈牙利人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伸出援手？难道不知道匈牙利人指望你们相助吗？”

皮尔·席尔瓦当时却无法回答。倘若这些人现在要钱，他肯定能拿出来，因为中情局只有拿钱的本事。

中情局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就是它答应了它不能给予的东西，唤起了不能实现的希望，鼓动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暴动。局长杜勒斯曾说过，假如共产党威胁要接管一个国家，他不会“等待邀请后再前去援助”。可是，真正到事情发生了，他却无所作为。

中央情报局计划处策划的“红袜—红帽”秘密行动已准备就绪，只等上面一声令下。然而，匈牙利事件发展之快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正当华盛顿有关方面为美国是否要卷入这一事件争论不休的时候，匈牙利的暴动已经被苏联人镇压下去了。

11月4日，匈牙利成立了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

就在前一天，苏联严厉地谴责了“自由欧洲电台”煽动匈牙利国内反革命暴动的“无耻行径”。最后，“红袜—红帽”行动也被美国中止了。在这一次冷战的对抗中，因为双方势力的失衡而暂告结束。

但是，中情局与苏联人在东欧国家的暗战并没有结束。

1968年，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展开一项代号为“孔雀鱼”的计划，窃听莫斯科的电话线路。当年9月，苏联入侵捷克前夕，“华沙公约”主席从莫斯科机场打电话给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中情局虽然窃听到了这一次通话，但是却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一位叫费雪的情报官事后说，“他们也不傻，满口暗语，什么‘月亮红了’等等，让我们根本猜不透，他们

到底是入侵开始还是取消行动。”

这就是当年中情局在欧洲同苏联较量的一个缩影。最主要的办法就是美元开道，金钱收买。不过中情局当年在其他地方的行动却没有这么“文明”——暗杀外国政治领导人成了中情局最主要的手段。

“在我的任内，卢蒙巴终于死了”

从1953年艾伦·杜勒斯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开始，中央情报局就特别热衷于使用残酷而卑劣的暗杀手段。他们认为，“死亡对中央情报局并不是陌生的事，问题在于，某一特定人物的死亡能否促进美国目的的实现？答案是，在某种情况下是能促其实现的”。

已经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情局先后实施过的暗杀行动至少在50起以上，其中大多数是针对外国领导人的，比如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伊拉克的阿卜杜尔·卡塞姆、多米尼加领导人特鲁希略、越南南方傀儡政权头子吴庭艳、智利的雷内·施奈德等人都是中情局“死亡名单”上的人。他们都曾遭遇过中情局一次或多次暗杀。有的在劫难逃，死于非命；有的则大难不

死，侥幸逃生。

第一个成为美国中情局阴谋暗杀的牺牲品的，就是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刚果共和国内阁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

刚果一直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比利时政府任命的总督一直是这片土地上的最高统治者，成千上万的刚果人民就是他的奴隶。直到1960年，古老的非洲大地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饱受奴役之苦的非洲人民纷纷脱离殖民者的统治，独立自主，做起自己土地的主人。这一年就是当代世界史上有名的“非洲年”。

1958年10月，卢蒙巴创建了刚果第一个全国性政党——刚果民族运动党，并担任该党的主席，同年当选为全非人民大会常设委员会委员。1959年，卢蒙巴成为刚果民族运动的领导人。在1960年刚果第一次议会选举中，刚果民族运动党大获全胜，在下议院的137席中取得了40席，成为刚果当时最大的政党，卢蒙巴被任命为刚果政府的第一任总理。

1960年6月30日，刚果民主共和国成立。由比利时人任命的刚果总统卡萨武布和总理卢蒙巴也顺应历

史潮流，宣布刚果独立。然而，这种“独立”完全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幌子，刚果的军事、政治和财政大权依然掌握在比利时人的手中。于是，一场真正的民族独立运动在刚果大地上风起云涌。

1960年7月6日，刚果军队发生哗变，要求独立自主的士兵逮捕了比利时人。哗变中，许多罪大恶极的殖民统治者被义愤的群众处决，一些欧洲移民和亲比利时政府的官员被看管起来了。

刚果士兵的哗变，让比利时政府非常愤怒。他们决定镇压这次叛乱，捉拿元凶，改组政府。7月8日，比利时政府向刚果不宣而战，悍然调派伞兵部队空降刚果首都，对独立政府进行武力镇压。

刚果政府迫于人民的要求向比利时宣战。但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比利时军队很快就占领了刚果首都，形势对刚果政府非常不利。当时刚果总统卡萨武布和内阁总理卢蒙巴紧急协商，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出秘密请求，请求美国出兵干预，支援刚果。

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美国如果单方面派兵插手刚果事件，势必引起苏联人出面干涉，只有派遣联合国军队才可能防止苏联人的直接卷入。于是艾森豪威

尔提议让卡萨武布和卢蒙巴马上向联合国呼吁，请求联合国对刚果进行道义上的支持和军事上的援助，由中立国派出部队。

1960年7月14日，在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向刚果派遣联合国军队的决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着手组织联合国部队，决定由非洲的加纳、几内亚、摩洛哥、突尼斯、埃塞俄比亚等国部队组成联合国先遣部队，立即开赴刚果。7月17日，大约有3500名多国部队的士兵到达刚果。哈马舍尔德是站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场上的。他在对联合国军司令官的训令中指出：“你们的任务是使这个国家恢复秩序和平静。”

但是，联合国军进入刚果后，并没有像卢蒙巴所希望的那样，取代比利时军队，而是缴了刚果军队的械，在城市和兵营中，高高地升起联合国军的旗帜，降下刚果的国旗。这就让比利时军迅速扩大战果，控制的城镇和地区越来越多。比利时政府同时还在刚果大搞分裂行动，支持和怂恿刚果的冲伯集团在刚果南部最富庶的加丹加省宣布独立，成立加丹加共和国。

卢蒙巴忍无可忍，他向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夫尔·本

奇发出最后通牒：一、联合国军在24小时内将比利时军队赶出刚果；二、重申对苏联出兵的请求；三、由于联合国军行动迟缓，不管是谁，只要能帮助刚果政府收回加丹加省，把比利时人赶走，他就接受对方的支持。

卢蒙巴的这一声明立刻让华盛顿方面意识到，卢蒙巴有“左”翼倾向，他发表的这一声明正是他公开寻求苏联人帮助的信号。于是就有人担心，卢蒙巴可能会把刚果变成第二个古巴。中央情报局对卢蒙巴更是非常仇视，认为他是引起新独立的刚果局势不安的主要因素。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非常尖锐地指出：“在刚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卡斯特罗式的、甚至比卡斯特罗更坏的人。”杜勒斯介绍了卢蒙巴的情况后，得出结论：“我们可以认定，卢蒙巴被共产党收买了。”杜勒斯的这句话确实表明了华盛顿官方的态度。但是，卢蒙巴却一直蒙在鼓里，一点也不知情。

7月底，卢蒙巴飞往美国，同联合国和美国国务院官员磋商。然而卢蒙巴这一次美国之行，却给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道格拉斯·狄龙留下了极不好的印象。“他

从不把你放在眼里，”狄龙在向白宫报告时说，“他两眼朝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讲法语，而且讲得非常流利。他的话与我们要讨论的那些特定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给人的感觉是他受激情的支配，我只能用‘救世主般的’一词来描绘这种激情……他简直是个没有理性的人。”

美国国务院曾经希望能同卢蒙巴合作，但是在他与狄龙会见后，美国人的希望很快破灭了，狄龙断定“他是一个无法与之打交道的人”。

卢蒙巴在美国受到了冷遇，便转向了苏联。刚好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这时已经在向比利时挥舞拳头，警告它不要再企图对刚果实行殖民控制。苏联领导人对卢蒙巴提出的援助军用飞机和武器弹药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于是卢蒙巴和赫鲁晓夫马上要求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从刚果撤出。

面对刚果的这种变化，1960年8月18日，狄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就刚果局势的发展作了报告，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出席了会议。狄龙在大会上说：“撤走联合国军队将是一场灾难，对此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予以阻止。”他警告说，如果联合国军被赶出

来，那么苏联人就会进去。当时的会议记录写道：“副国务卿狄龙说，卢蒙巴的所作所为是在为苏联的目的服务。杜勒斯先生指出卢蒙巴已为苏联收买。”这两个人的话，基本上就为卢蒙巴的命运画上了句号。

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不会听任联合国军从刚果被赶出来，即便苏联人利用这种行动作为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

最早直接提出把暗杀作为解决办法的人，是中情局驻刚果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情报站的站长劳伦斯·德夫林。

8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央情报局对卢蒙巴采取政治行动的方案。

8月26日，杜勒斯向劳伦斯·德夫林发了一份密电，电文如下：

上峰的观点很明确，如果卢蒙巴继续占据高位，结局将使刚果变得更加混乱，并为共产党接管刚果铺平道路。这将使联合国的威望和自由世界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我们认为，干掉他是我们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是我们目

前秘密行动中优先考虑的情况，你有权自行作出决定，我们没有时间再拖延了。

杜勒斯还亲自在电报上签名，这是中央情报局总部向外发出指示时极少出现的情况，可见电文的重要性。

9月5日，刚果总统卡萨武布解除了卢蒙巴的总理职务，据说是因为3个星期以前，在苏联人的鼓动下，卢蒙巴断然宣布与联合国断绝关系。卢蒙巴对联合国秘书长说，刚果已失去对他个人的信任，并斥责联合国秘书长和比利时人串通一气。与此同时，卢蒙巴邀请苏联人直接插手刚果的事务。不久，刚果的军队开始逮捕在刚果的联合国官员。但卡萨武布与卢蒙巴之间的冲突很快被另一起突发事件掩盖了。

9月14日，在中央情报局和比利时情报机关的双重策动下，刚果陆军参谋长蒙博托发动了军事政变，接管了政府权力。但卢蒙巴倚仗国会和忠于他的部队的支持，仍积极参与刚果的事务。

鉴于上述情况，9月21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等人举行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艾森豪威尔在会上授

权杜勒斯全权处理卢蒙巴的事情。

杜勒斯表示，最好的办法是让刚果人审判刚果人的“罪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亲自下手，以免事情败露。

中央情报局为制造混乱，又假造了几封卢蒙巴与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的通信，连同原来的几封信和其他重要文件，交刚果报纸发表。其中一封信中说：政府计划驱逐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严厉镇压，建立恐怖统治。这些信的发表，使支持卢蒙巴的人开始仇恨并反对他，想杀掉卢蒙巴的人越来越多。

整个9月，中央情报局的毒品专家、技术服务室的戈特利布忙得不亦乐乎，因为他的上司要他作好暗杀卢蒙巴的准备工作。9月下旬，戈特利布确定了一种生物毒品，将这种毒品注入人体，会使人得一种非洲人容易得的致命性疾病。他把毒品带到利奥波德维尔亲自交给劳伦斯·德夫林，要他用这些东西来干掉卢蒙巴。

10月7日，中央情报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向华盛顿总部发了一份电报：“戈特利布已经留下了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将设法继续完成该行动。”

10月15日，中央情报局总部发出了回电：“或许可以派突击小组进行劫持（卢蒙巴），从河岸向悬崖上的那幢房子袭击……征求你们的意见。”

10月17日，利奥波德维尔站回电：“无法向目标附近靠近，建议总部尽快送来配有望远镜瞄准器和消音器的机枪……”

尽管中情局做了缜密的布置，卢蒙巴还是没有死于中情局的特工之手。直到1960年11月27日止，卢蒙巴还一直处于联合国军队的保护之下，中情局特工在卢蒙巴出入的路上设下了路障，来配合蒙博托对卢蒙巴实施的抓捕。果然在三天以后，卢蒙巴被蒙博托的军队抓获。几天以后，卢蒙巴逃走了。但是最后还是落入蒙博托的士兵之手。

1961年1月13日，在刚果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担心卢蒙巴会从蒙博托的军队手中再次溜掉，就从利奥波德维尔向中央情报局总部发出这样一份电报：“卢蒙巴可能会利用他的打手和舆论宣传，利用目前联合政府中出现的一系列的失败情绪，来确保国会对自己的支持……在当前，拒绝采取极端行动将导致美国在刚果政策的失败。”

于是，卢蒙巴的生命日程就进入了倒计时——

1961年1月17日，一架DC-4型飞机秘密将卢蒙巴等人送往伊丽莎白维尔机场。次日，冲伯集团的人来到加丹加关押卢蒙巴的别墅，残忍地将卢蒙巴杀害了。

1月1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即将下台，中央情报局驻利奥波德维尔站站长劳伦斯·德夫林满怀欣喜地向总部报告了卢蒙巴的死讯。

艾森豪威尔对他的继任者肯尼迪说：“在我的任内，卢蒙巴终于死了。”

消息传出去之后，全世界对这一卑鄙的谋杀行为感到愤怒。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进行最严厉的谴责，认为哈马舍尔德应对卢蒙巴之死负直接的责任，并宣布苏联将断绝与哈马舍尔德的关系，不再承认他是联合国秘书长。苏联政府将向刚果人民及其合法政府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和摩洛哥国王都对哈马舍尔德进行了指责，认为对卢蒙巴的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同年9月18日，哈马舍尔德在飞往刚果解决问题

时，飞机神秘地失事，他也在这次意外事故中丧命。

在非洲的国家领导人中，卢蒙巴是第一个死于中情局之手的，但不是最后一个。地处北非的利比亚共和国的领袖卡扎菲一直是中情局的眼中钉，一心想置他于死地。

对卡扎菲的第8次谋杀计划出台了

1942年，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在利比亚南部出生。卡扎菲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备受父母的呵护。卡扎菲青年时代深受埃及革命领导人纳赛尔的影响，信奉阿拉伯主义，拥有复兴阿拉伯民族的雄心壮志。他仇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西方支持者，对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贪图石油利益、缺少反对西方勇气而无所作为深恶痛绝。

1961年中学毕业后，卡扎菲在班加西大学攻读历史。1963年，进入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1965年毕业，被授予少尉军衔。

第二年，他在英国桑赫斯特军事学院受训，回国后任信号兵团上尉代理副官。1969年，卡扎菲秘密成立了“自由军官组织”。同年9月1日，以卡扎菲为首

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9月5日，哈桑王储发表声明，放弃对王位的一切权力，支持新政权。革命未发一枪、未流一滴血而取得成功。

卡扎菲出身游牧民族，尊崇部族社会的自然公平，反对奢侈豪华。他本人生活十分简单，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喜欢住帐篷而不喜欢住豪华宅邸，喜欢骑骆驼而不喜欢坐高级轿车。卡扎菲的妻子和儿女一直住在的黎波里的军营里，他自己却在帐篷里办公和会见外宾。1989年，他到南斯拉夫出席不结盟首脑会议，就是住在自己带去的帐篷里。

无论任何场合，卡扎菲总是身着同一颜色的服装，有时是白衣、白裤、白鞋、白头巾、白手套，外披一件镶着金边的白色斗篷；有时是黄色咔叽布军服，戴同样颜色的头巾出场。

别看中情局把卡扎菲看成眼中钉，其实美国与卡扎菲曾是“老朋友”。美国当年对利比亚产生极大的兴趣，因为那里有丰富的能源储备。利比亚是北非重要的石油生产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石油探明储量为450亿到500亿桶，天然气探明储量达12890

亿立方米。但是利比亚一直是英国人的势力范围，美国要想进入这个地区并得到那些宝贵的石油便遇到了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卡扎菲出现在美国中情局的视野中。

当年，卡扎菲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想要发动政变，推翻当时英国人扶持下的政权。中情局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便向白宫报告说，如果美国此时向卡扎菲表示友好并提供帮助，那么他很有可能将英国人的势力赶出利比亚，那么以后的利比亚将会是美国的一个有着大量石油的小兄弟。白宫批准了这一计划。就这样，中情局和卡扎菲秘密进行了亲密接触。

卡扎菲是聪明的人。他不仅得到了中情局大量的物资支援，而且利用中情局获得了大量的情报。根据中情局的情报，卡扎菲成功地逮捕了正在出席宴会的国王警察部队的高级将领，顺利占领了电台和其他要害部门。最后，他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政变取得了成功。中情局十分满意，他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地看到，不久后一个亲美的利比亚政府将要向他们曾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

但是，中情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卡扎菲刚刚上台没多久，就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让中情局和美国伤透了心。卡扎菲上台的第二年，就断然宣布收回美国在利比亚的惠勒斯空军基地，使美国失去了与苏联在地中海地区角逐的前哨阵地。再过两年后，卡扎菲又迫使美军撤出利比亚。卡扎菲在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的同时，又积极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中情局自然恼羞成怒，把这个“忘恩负义”的卡扎菲看成是自己的敌人。从此，卡扎菲和美国就结下了仇恨，而且越结越深。

1970年6月，当卡扎菲宣布收回美国的惠勒斯空军基地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就秘密和利比亚反对派勾结在一起，一连6次派遣刺客暗杀卡扎菲。虽然每次都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于当年9月1日利比亚建国一周年的庆典上，准备第7次暗杀卡扎菲。

这次中情局选择的杀手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叫莎菲娥。中情局命令莎菲娥在利比亚国庆的庆典上找机会干掉卡扎菲。在此之前，莎菲娥根据中情局的指示潜入利比亚，并在那里建立一个秘密的行动小组。莎菲娥在利比亚国庆阅兵的那天乔装成一个负责现场急救的护士。庆典开始后，卡扎菲正在检阅台阅兵。

莎菲娥找准机会突然冲上检阅台，挤到卡扎菲的身边，这时她离卡扎菲已经很近了，近得足够使卡扎菲无法躲开她的子弹。可是，她在那一霎竟然犹豫了。原来在利比亚执行任务的这段时间，她每天都在关注和研究卡扎菲。渐渐地，她无法阻止自己，爱上了这个利比亚的英雄。当她如此接近心中爱慕的人时，当英俊健壮的卡扎菲就站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却无法下手。这时卡扎菲的警卫冲上来抓住了她。

阅兵仪式结束后，卡扎菲亲自提审莎菲娥。当这个美丽而倔强的女人出现在卡扎菲的面前时，卡扎菲竟对莎菲娥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发现自己无法把眼睛从这个女人身上移开。

审问开始了。

“你为什么要暗杀我？”

“我是中情局的特工，我的任务就是杀你。”

卡扎菲又问道：“那你为什么没有下手？”话出口后，卡扎菲直视着莎菲娥的眼睛，目光严肃但又似乎有着什么异样的东西。

“因为……因为……因为我爱上了你，就这么简单！”莎菲娥起先还有些不知如何回答，但后来她决定

实话实说。

卡扎菲没有再说什么。

当中情局得知莎菲娥的行动失败并被捕后，他们估计莎菲娥生存的可能性不大，卡扎菲一定会处死她来警告中情局。但是一星期后传来的消息让中情局大吃一惊，刺杀卡扎菲的女刺客莎菲娥和这位国家元首正式结为夫妻。中情局辛辛苦苦计划的行动又一次失败了，而且这次失败得如此丢人。不仅自己派出的刺客成了卡扎菲的妻子，而且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都在随后被卡扎菲一网打尽。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中情局前7次的暗杀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中情局并没有就此放弃，要置卡扎菲于死地的愿望反而更加迫切。于是对卡扎菲的第8次谋杀计划出台了。

这时的中情局已经是凯西的中情局，他是美国新总统里根任命的。凯西找到里根时，里根就向他表示，为了能够成功地干掉卡扎菲，总统将会支持中情局的任何行动。凯西于是策划了世界上最大的一起谋杀事件。

1986年4月15日凌晨2点，多架美国战机飞临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城上空。一刻钟后，美国飞机扔下了

500磅激光制导的炸弹和2000磅重型炸弹，然后扬长而去。顷刻，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和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许多建筑被炸塌，100多名无辜的居民遭到严重伤亡，其中还有外国人。但是令凯西十分恼火的是卡扎菲本人再次幸免于难，只是头部被轻轻擦伤；他的妻子莎菲娥被砸伤，3岁和4岁的儿子都受了重伤，经医院抢救，总算脱险。



卡扎菲和他的女保镖

对于中情局一次又一次的谋杀，卡扎菲能够死里逃生，可谓是奇迹。但是卡扎菲并不是任人宰割的，他要让中情局知道卡扎菲不是好惹的。

就在凯西策划的空袭后没多久，卡扎菲到埃塞俄比亚出访。在一次谈话中他公开表示，“我要对付里根，就像他对付我那样”。

这一消息被中情局在埃塞俄比亚政府里的内线得知，并迅速地通报给了凯西。在随后的秘密窃听中，中情局还发现卡扎菲的目标不仅包括总统里根，还包括中情局的官员。这让中情局上下一片恐慌。凯西和中情局都认为，卡扎菲是个“疯子”，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于是每个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在那段时间都诚惶诚恐，甚至有些人专门为自己配备了保安。事后证明，卡扎菲并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可是这的确使中情局大捏了一把汗。

自从卡扎菲取得利比亚的最高领导权以来，尽管西方世界对他和他的国家进行了形形色色的孤立、威胁、制裁，乃至进行暗杀和轰炸，卡扎菲却一直安然无恙地继续着他的统治。他像是一棵国际政坛的另类“常青树”，几十年来一直顽强地生长在北非的大沙漠里。

值得玩味的是，不知从何时开始，被阿拉伯同胞们誉为“非洲雄狮”的卡扎菲，竟然开始主动地向西方

世界摇起了“橄榄枝”；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对利比亚的立场也在开始改变。

2004年3月底，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做出了一项令西方世界咋舌的事来。他不顾国内外反对派的强烈批评和抗议，毅然对利比亚进行了一次正式的访问。卡扎菲热情地把会谈地点定在了自己位于沙漠中的贝督因帐篷里。此后，卡扎菲在许多场合的言论，比如批评萨达姆独裁政治的言论、后来又指责朝鲜私自发展核武器等等，都越来越让西方列强感觉到，这个当年最难缠的卡扎菲也开始和西方世界拉近了距离。

不过自从2011年2月15日利比亚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以来，利比亚又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美国政府的态度可谓是“先抑后扬”。在起初的10天里，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刻意低调的“冷处理”，只是由国务院发表声明呼吁停止使用武力镇压抗议，并因此遭到一些人权组织和利比亚反政府人士的批评。面对这些指责和不满，包括国务卿希拉里在内的一些美国政府官员一再重申：“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在利比亚的侨民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布什总统前中东事务高级顾问艾布拉姆斯表示，奥巴马政府在应对利比亚政局动荡的初期受到诸多因素的牵制。一方面，美国在利比亚约有5000多名具有双重国籍的侨民和约1000名美国公民以及外交人员，当务之急是设法保护他们的安全以及尽快安排他们撤离，因此，奥巴马政府不仅要避免刺激利比亚政府，而且还急需得到他们的帮助。另一方面，美国对利比亚的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两国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直到2003年卡扎菲通过放弃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才换来美国将利比亚从“支恐名单”中清除，而直到2008年两国才正式建交。而且美国与利比亚军方几乎没有联系，美国每年给予利比亚的经济援助不足100万美元，且主要用于利比亚的裁军项目。因此，奥巴马政府在对利比亚政策上采取“缓兵之计”也是迫于现实的“聪明外交”。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非洲项目副主任理查德·唐尼所言，在撤侨工作基本结束之后，奥巴马政府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对卡扎菲政府采取多项严厉制裁了。

随着撤侨行动接近尾声，美国政府对利比亚局势的声调陡然升高。奥巴马在2011年2月25日签署了一

道行政命令，下令冻结卡扎菲本人、4个子女，以及包括利比亚中央银行和主权基金在内的政府机构的资产。美国财政部28日宣布，美国政府已经单方面冻结了至少300亿美元的利比亚政府资产。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大卫·科恩表示，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冻结资产金额最大的一次制裁行动，财政部仍在考虑是否扩大受制裁人员的范围。

希拉里25日也签署命令，关闭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撤出所有外交官，并且禁止利比亚政府官员前往美国。希拉里表示，她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取消利比亚政府高级官员和其他须对违反人权行为负责的人士以及这些人的直系亲属的赴美签证，而且新的签证申请将被拒绝。

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也已经做好了出兵利比亚的准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夫·拉潘28日在华盛顿表示，五角大楼已经针对北非地区反政府暴力冲突的不同情况制定了多个应对预案并调整了兵力部署，随时可以按照命令采取行动。美军在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长期驻有重兵。此外，为应对因接连不断的反政府冲突引发的北非地区紧张局势，美国“企业”号和“卡尔·文

森”号两大航母战斗群均已开赴阿拉伯海，执行战备任务。

2011年2月2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首次公开表示卡扎菲已经丧失了“执政合法性”，“现在该是他离开的时候了”。国务卿希拉里28日在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时也敦促卡扎菲必须“毫不拖延地”立即下台。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紧锣密鼓地实施了一系列制裁措施。

3月17日，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3月19日，法国战机向利比亚军事目标开火，多国军事干预正式开始。

看来这个“非洲雄狮”长达四十年的统治正在遭到空前的威胁。

第八章 秘密行动，拉美后院永无宁日

拉美作为美国的“后院”，每一场军事政变几乎都与美国有关，前后共有十多个国家的政权遭到颠覆，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到1962年8月，中情局已经在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多个国家进行过“秘密行动”。“幸福计划”和“死亡名单”颠覆危地马拉，在智利得逞的“三点式”计划更是中情局的“杰作”。

“幸福计划”和“死亡名单”

在拉美的历史上，似乎每一场军事政变美国都无法逃脱干系。

拉丁美洲历来被美国视为自家的“后院”，一直作

为美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这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受美国保护的。从1950年开始，美国各界人士就提醒白宫要重视拉丁美洲的地位。

当年曾以一份八千多字的长电报而出名的乔治·凯南，就曾在自己的电报中把遏制苏联的思想延伸到了拉丁美洲，他在给白宫的报告中说：“如果拉丁美洲落到了我们的敌人的手中，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乔治·凯南在向白宫的建议中反复强调共产党的可怕性，如果美国的身边出现了共产党的国家，那么会慢慢地将美国包围。

艾森豪威尔被说服了，决定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独裁统治者提供大量的帮助，换来他们对美国的臣服并且反对共产党的渗透。这项任务的执行者，自然是中情局。中情局负责向当地的统治者提供支持，帮助训练警察部队，临时指派顾问人员交换情报和信息等。

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在战后欧洲的扩张成为美国警惕的焦点，但对苏联在拉美的渗透并没有掉以轻心。中情局特别关注的是，一旦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亲苏联的拉丁美洲共产党和莫斯科是否有可能联合起来，发起破坏

活动和举行市民暴动。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支持右翼军事专政统治。

当年在拉美受到美国保护和支持的，有尼加拉瓜的安纳斯塔西奥·索摩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拉斐尔·特鲁希略、秘鲁的曼努埃尔·欧德里亚、委内瑞拉的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内斯等等……而这种保护和支持到了后来，又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被合理化了。

但是长期以来，美国与拉美国家形成的这种特殊的保护关系，却引起了拉美各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中情局注意到，拉美的共产党有挖掘现有反美情绪的能力。中情局还警告说，在一些国家，共产党会激起人们的“自由民主情绪，反对独裁统治者，使得这些国家与亲美国的独裁政府间的关系日趋紧张”。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中情局曾多次在拉美地区进行定点清理，在多个国家进行带有“准军事行动”性质的颠覆活动，前后共有十多个国家的政权遭到颠覆，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这其中最早受到冲击的就是危地马拉。

当时美国在危地马拉有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联合果品公司”，这个果品公司与当年英国在伊朗的“英国—

伊朗石油公司”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在为自己国家攫取最大的利益。美国这家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拥有18.8万公顷土地，控制着危地马拉的海运、电讯、外贸，以及重要的海港和铁路运输，是危地马拉最大的经济实体。它在美国政府中有不少权势很大的朋友，其中就包括杜勒斯兄弟这种炙手可热的人物。

1931年，联合果品公司与当时的乌比克独裁政府达成一项为期99年的协议，免除了联合果品公司的一切税收和义务，甚至它的主要商品香蕉的出口税也微不足道，同时，联合果品公司还取得了无限制利润汇款以及对通讯网络和运输网的垄断等特权。当时为联合果品公司谈判这笔交易的律师就是约翰·杜勒斯。

1951年3月，经过民主选举的阿本斯（上届政府的国防部长）接替阿雷瓦洛，担任了危地马拉共和国总统。阿本斯是一名军官，他将国内政治权力掌握在军人手里，全国22个省长全部是军人。阿本斯继续推行前任总统提出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他的政府得到了国内共产党和劳工团体的支持。

从1952年起，阿本斯实行了较为激进的“土改”，征用和没收了联合果品公司和大地主的土地共计55.4

万公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空闲土地）。阿本斯政府提出付给60万美元的土地征用费，以可流通的长期土地债券来偿付。60万美元的数字并非凭空捏造，它是联合果品公司为这些土地免税而自行申报的价值。

联合果品公司则坚持25倍于政府的赔偿费。美国务卿杜勒斯多次敦促阿本斯政府赔偿联合果品公司的经济损失，但阿本斯不予理睬，并拒绝将此事提交在海牙的国际法庭裁决。为此，美国国务院在第一届美洲国家会议上指责危地马拉的“强盗行为”。在这之前，中情局悄悄草拟了推翻阿本斯政府的方案。

1952年，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中情局代号为“幸运”的秘密行动。这次行动准备在尼加拉瓜亲美的索摩萨家族的帮助下，使用美国果品公司的船只把武器弹药送给在尼加拉瓜流亡的危地马拉人和尼加拉瓜雇佣军，借用国外的武装力量来推翻阿本斯政府。美国的这一计划得到了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家族和委内瑞拉的希门内斯政府的积极支持。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命令计划处西半球科科长具体负责此事。不久，副国务卿戴维·布鲁斯得悉此事，他认为这个秘密行动的计划不妥，违背了国际法，他说服了国务卿去

做杜鲁门的工作，让他取消这个方案。就这样，“幸运”方案被搁置下来。

20世纪50年代初，在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过程中，中央情报局还提出了一个对危地马拉官员进行暗杀的设想。

1952年1月，中央情报局行动处官员制定了一个“幸福计划”，并且提出了一个“死亡名单”，如果推翻阿本斯的计划成功，名单中所列的所谓“共产分子”将被清除掉。总部要求对名单进行核实，并建议做一些修改，同时还要求对另外一个16人名单进行审核，中央情报局认为这16人或者是共产主义分子，或者是其同情者，一旦反阿本斯的政变成功，这些人应予以监禁。6个月后，中央情报局特工向总部提交了一份由危地马拉流亡者领导人阿马斯拟定的名单，按照名单，要处决的人有58名，要监禁或流放的有74位。

“幸福计划”在1952年10月中止后，中央情报局仍继续得到关于危地马拉反对派暗杀计划的报告。1952年11月，危地马拉反对派的一位领导人在与中情局的特工谈话时，透露阿马斯有一个以暗杀危地马拉所有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为使命的特别行动组，特别行动组

把所有暗杀对象的住址、办公室都制成了蓝图。

虽然后来的行动计划中未特别强调暗杀，但是中央情报局行动处的负责人还是在1954年1月5日准备了一份要“消灭”的人员名单。当时中情局正准备在洪都拉斯训练危地马拉流亡分子，要求将这份名单在1月10日前交到负责训练的教官手中。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危地马拉问题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艾森豪威尔认定，阿本斯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共产行为”。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约翰·E. 普里京向国内报告说：“据我看，这个人的思想像一个共产党，谈吐也像共产党，即使他实际上不是共产党人，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出现以前，他也可以充充数了。”

当时任国务卿的杜勒斯与他任中情局局长的弟弟艾伦·杜勒斯商量之后，决定像1953年颠覆伊朗摩萨台政府一样，在危地马拉再来一个“阿贾克斯”行动，同时选中当时中情局近东科科长金·罗斯福来执行。因为当年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就是金·罗斯福去操作的，并且取得了成功。所以他们认为，金·罗斯福负责此事更有成功的把握。但是，金·罗斯福对在危地马拉搞“秘密行动”并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已经转向了阿拉伯地

区，于是就找了个借口推辞了这次行动。杜勒斯兄弟又只好找到西半球科科长 J. C. 金上校，要他负责此事。

金上校上任后，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郊外的奥帕洛卡建立了“幸运”行动的指挥部，大约有100名特工人员参加；后来，金上校还组建了一支200人的叛军队伍实施暴动。然而，这支杂牌军在与危地马拉政府军的一次短兵相接中全军覆没。为此，金上校被免去职务，改由计划处长威斯纳担任指挥。

威斯纳分析了金上校失败的教训后，决定采用舆论宣传、破坏行动和派遣突击队员进行骚扰等综合方法来推翻阿本斯政府。威斯纳把这次行动称为“胜利行动”。他派自己的副手特雷西·巴恩斯协调各方面工作，并调中情局朝鲜站站长艾伯特·哈尼上校担任“前方指挥”。哈尼上校是个反情报专家，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在指挥准军事行动和突击行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金上校对于自己被解职一事一直闷闷不乐，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于是他千方百计向威斯纳、巴恩斯、哈尼等人诉说，他的方案是最佳方案，只有同美

国联合果品公司合作，取得危地马拉军队的支持，才能推翻阿本斯政府。金上校语气尖锐地对哈尼说：“如果你们认为避开联合果品公司也会成功的话，那简直是白痴的想法。”他还要求威斯纳对危地马拉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这样，军队就会主动站出来，推翻现政府。

威斯纳把金的这番话转告给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杜勒斯听后也觉得金讲的在理，可以作为参考，便去找国务卿商量。经过一番密谋，杜勒斯兄弟俩定下了最后的行动方案。

次日，杜勒斯在家中举行鸡尾酒会，款待一些主要的下属。会上，他宣布了自己和国务卿定下的行动方案。这时，房间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热烈。杜勒斯也兴奋地问哈尼：“上校，你认为能取得成功吗？”

“是的，局长，有你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哈尼信心十足地回答。

杜勒斯高兴地咧着嘴笑了。他拍了拍哈尼的肩膀说：“好好干吧，小伙子，你的前面已经是绿灯了。”

这时，被冷落在一旁的金上校，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

威斯纳的“胜利行动”让中央情报局花费了大约2000万美元，组织了一支游击武装和一支空军力量，并物色了危地马拉前军人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来充当推翻阿本斯政府的先锋。

中情局还设立了秘密广播电台“解放之声”，在1954年5月1日正式开始播音。因为那一天是国际劳动节，他们想那一天肯定会有更多的听众在收听他们的广播。“解放之声”播音员宣称他们是在危地马拉国内播音（其实是在国外），他们假装遭到了政府的袭击，宣称第二天再从另一个新地方重新播音，从而证明阿本斯的无能。“解放之声”电台煞有介事的宣传欺骗了不少外国新闻媒介，甚至连《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的记者都把它作为消息来源加以引用。

在中央情报局制定的破坏计划中，还有一项是建立一支恐怖小组，袭击当地的“共产主义分子”及其财产。1954年3月，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士就“成功行动”计划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暗杀15到20名危地马拉高级领导人的问题。3月底，一些情报官员又受命制定新的“打击名单”，暗杀和清除对象的标准是：一、与共产主义思想和政策确实有牵连的政府高

级官员和其他政府组织的官员；二、“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分子；三、在政府和军队担任要职的少数领导人（将这些人清除是“成功行动”计划成功的必要条件）。

中央情报局挑选了一些杀手，对他们进行相关的训练，但由于种种原因，暗杀危地马拉领导人的秘密行动在后来并没有得到执行。

1954年5月13日，中情局接到一份重要的情报，说有一艘瑞典的“阿尔夫”号货船载有武器弹药，已经停泊在危地马拉东岸的巴里奥港。这一情况让华盛顿大为震惊，艾森豪威尔取消了原来对“胜利行动”的最后几点限制，决定放手让中情局行动。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海军立即派出多艘军舰封锁了危地马拉，中情局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也参加了对危地马拉的空袭。

6月19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危地马拉发生起义 陆海空大入侵开始 起义遍及主要城市》。文章对实际情况进行了夸大报道，立刻引起了一片恐慌。事实的真相是：由阿马斯率领的一支150人组成的“突击队”于6月18日越过了洪都拉斯边界，深

入到危地马拉境内6英里，在布莱克克赖斯的教堂安营扎寨，等待阿本斯政权的垮台。

当时，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京以及一些中情局特工人员则在首都策划军队发动政变。中情局的战略建立在恐吓的基础上。那些在奥帕洛卡受训的特工人员对危地马拉的电台通讯进行了干扰，“解放之声”电台又在大肆煽动，所以危地马拉市的居民很少有人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有关政府军惨败和起义部队好几个精锐师马上到达的谣言四处传播。实际上，在整个叛乱期间，危地马拉军队一直安然待在军营里。

为了阻止中情局的电台“解放之声”播音，阿本斯在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实行了灯火管制，切断家庭用电。这一行动更加剧了紧张气氛。在这种形势下，中情局雇佣的飞机在危地马拉上空低飞盘旋，经常扔下几颗炸弹或集束手榴弹。人们将这种扰乱政府和市民心理的轰炸称为“黑色倾泻剂”。

“解放之声”大肆宣扬有关苏联飞行员驾机叛逃到西方的报道，更增加了恐怖气氛，结果一名危地马拉飞行员也逃跑了。中情局的特工人员得到这一消息之

后，马上找到了那位飞行员，试图让他公开呼吁其他的飞行员也效法他的行动，但是被拒绝了。于是，中情局特工将他灌醉，然后再说服他作一次“假想性”的呼吁，结果那位飞行员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就范了。他的讲话被秘密录制下来，经过剪接后由“解放之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阿本斯担心其他飞行员也要驾机叛逃，干脆停止了所有飞机的起飞。中情局的威吓手法迫使阿本斯放弃了危地马拉的空军，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军事力量更加孤立，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



被推翻的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

虽然阿本斯没有了空军，但他的高射炮部队仍能发挥一些阻击作用。6月22日，艾伦·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汇报说，阿马斯用来发动“入侵”的3架轰炸机现在只剩1架了。密切注视着危地马拉事态发展的艾森豪威

尔当天下午便召集杜勒斯兄弟和负责美洲事务的国务卿助理亨利·霍兰来白宫商量对策。艾森豪威尔问杜勒斯：“你估计阿马斯如果没有飞机，成功的可能性会有多大？”

“几乎是零。”杜勒斯脱口而出。

“如果我们支援他飞机呢？”

“这便增加了20%成功的可能。”杜勒斯回答。

在白宫会议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杜勒斯说：“艾伦，你的20%这一数字太有说服力了。如果你刚才回答我说有90%的可能性，或许我更难下这个决心。”

就这样，白宫决定向阿马斯支援飞机，还责成中情局特工戴维·菲利普斯加强“解放之声”秘密电台的宣传攻势，以便从心理上加速瓦解阿本斯政府军的斗志。于是，叛乱分子又恢复了轰炸。在内外夹击下，几天后，阿本斯政府土崩瓦解。

6月25日，阿本斯跑到墨西哥大使馆避难，两天后他宣布下台。阿马斯腰挎左轮手枪、得意洋洋地进入危地马拉城，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了军人独裁政权——也正是这个阿马斯，不到半年以后，就在中情局

策划的一次暗杀行动中死于非命。

“胜利行动”成功的消息传到华盛顿，那些心情焦灼而又期盼成功的人们欢呼雀跃。国务卿杜勒斯更是眉飞色舞，连声叫好。他兴奋地对手下人员说：“诸位，我们明天上午要到白宫去向总统汇报‘胜利行动’的情况，今天我们先预演一下吧！”

那天晚上，天气异常炎热。几名中情局的高级官员围坐在杜勒斯家后花园的一张石桌旁，一边喝着冰镇汽水，一边听着布雷登讲述着“胜利”的经过。还没等他讲完，杜勒斯忍不住叫了起来：“我还从没有听到过这样啰哩啰唆的废话。”说完，他转身对负责“自由之声”电台的菲利普斯说：“大家都说你的笔头功夫不错，你为布雷登重新写一份讲稿吧。”

翌日清晨，杜勒斯带着几名中情局人员来到白宫东侧的影院内，过了一会儿，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司法部长以及白宫班子的二十几名高级官员陆续走进影院。影院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随着前面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镜头，布雷登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讲稿是菲利普斯连夜赶写出来的）。不一会儿，一扇门开了，只见一个人疾步走进半明半

暗的影院，随即门又轻轻地关上了。新进来的那个人没有坐下来，而是站在菲利普斯的旁边，看着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些镜头，心急地问布雷登：“那个人是谁？这个决定是谁做出的？”

菲利普斯和其他中情局的官员对这个多嘴多舌的人很反感。当幻灯片放完，室内恢复了明亮，那人才慢悠悠地走到一旁。这时，菲利普斯定睛一看，才认出这位一个劲儿问话的人是大名鼎鼎的副总统尼克松，此人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出足了风头，是个有名的反共强硬派。

艾森豪威尔首先提问：“卡斯蒂略损失了多少人？”

“只有一个人，是个传令兵。”赫克托回答。

艾森豪威尔摇了摇头，脱口说了一句：“不可思议！”

接着，尼克松又提了好几个问题，他的提问简明扼要，但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无疑，他对危地马拉的政治局势了如指掌，这给中情局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才对他的反感一下子都消失了。艾森豪威尔转身又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奇微将军：“苏联人有反

应吗？”

李奇微回答说：“他们好像还没有什么动静。海军方面正监视着一艘停泊在危地马拉附近水域的苏联潜艇，这艘潜艇有可能是来帮助阿本斯撤离的一些支持者，也有可能是为抵抗者运送武器。”

艾森豪威尔在离开影院前与在场的各位握手告别，他握着布雷登的手说：“太好了，你汇报得很出色。”

艾森豪威尔最后走到杜勒斯面前，握着他的手说：“艾伦，谢谢！谢谢你的中央情报局的同仁们，你们在我们居住的西半球拔掉了苏联人的一个滩头堡垒。”

快要走到门口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海军部长重申了一句：“密切监视那艘苏联潜艇，如果它胆敢靠近危地马拉海岸，就把那狗娘养的打沉！”

至此，中情局颠覆危地马拉的“胜利行动”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次行动和以往的行动相比，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不完全是依靠美元的力量，而是开始用武力解决问题。中情局的“准军事行动”从此初露锋芒。

颠覆巴西、海地和圭亚那

1964年颠覆巴西的古拉特政权，是中情局在拉美的又一个“杰作”。

1961年8月，仅当了9个月的巴西总统夸德罗斯辞职。同年9月7日，原副总统古拉特就任总统。

按照美国人的评价，新总统古拉特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他与共产党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了摆脱美国在巴西的影响，古拉特上台之后，在巴西推崇民族主义，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改革措施：限制外资；国家对石油及石油产品实行国家垄断，并将美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反对将古巴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继续保持同古巴的外交关系；同苏联复交，并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发展贸易关系。另外，古拉特领导的巴西工党还和巴西共产党过从甚密。

对古拉特的这些做法，美国一直耿耿于怀，唯恐这个南美大国成为第二个古巴。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决定要除掉这个不听话的古拉特。

古拉特看出了美国对他的顾忌，一再向华盛顿保证他无意将巴西带上共产主义道路，也不会和古巴及

苏联结盟。然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几乎把苏美两国推到核大战的边缘，这给美国很大的震撼，华盛顿的官员们都对古拉特的保证疑虑重重，开始对古拉特政府采取敌视态度。

1962年7月30日，肯尼迪总统在他的办公室与驻巴西大使林肯·戈登进行了一番长谈，决定把巴西总统古拉特的问题交给中情局去办。这次谈话后不久，中情局就奉命行动，使出的第一招还是“烧钱”。中情局扔出了800万美元给巴西的极右分子和极右军人，让他们对付古拉特。

“烧钱”计划开始后，中情局的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巴西政治圈。中情局当时对巴西“烧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美国全国劳联”下属的“美国自由劳工发展协会”，另一个是新成立的巴西工商界与民间领袖组织“社会调查研究协会”。中情局主要是通过这两家机构，把大笔的钱投放到巴西的军界和政界，用来颠覆古拉特政权。

早在1960年，以奥林皮奥·莫朗将军为首的那些对政府不满的军人就与中央情报局在巴西的情报站联络过。中央情报局向他们提供了金钱、武器和情报，支

持他们阻止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左派人士古拉特上台。两年以后，投放的成本终于开始见到效果了。

1964年3月的巴西军事政变就是由莫朗首先起事的。一些反对古拉特的极右军人逮捕了海员工会主席。3月25日，大约1400名支持古拉特的海员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占领了海员工会大楼，要求对方释放海员工会主席。这些人遭到军方的逮捕，并拒绝执行海军部长的命令。5天后，古拉特总统在里约热内卢发表谴责右翼军人集团的演说，认为他们背后有着卑鄙的势力在支持他们，所以才如此猖狂。第二天深夜，里约热内卢枪声四起，驻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部分驻军首先发动叛乱，并得到驻圣保罗州第二军和伯南布哥州第四军的响应。参与起事的里约热内卢卫戍部队很快就击溃了古拉特的少数部队，控制了里约热内卢。

1964年4月1日，古拉特逃亡，在乌拉圭过起了流亡生活。

美国当时驻巴西大使高顿手下的武官瓦特斯是巴西布朗库将军的密友。古拉特流亡后，布朗库将军成为巴西总统，他在巴军事独裁长达21年；而瓦特斯后来则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副局长，里根时期改

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新成立的巴西政府立即对本国共产党进行残酷打击，在外交上实行与美国“自动结盟”的方针，断绝了同古巴的外交关系，积极参与对古巴的制裁，同时还派军队参与了美国对多米尼加的武装干涉。巴西从此成了美国的一个盟友。



被美国中情局颠覆政权后流亡海外的古拉特
巴西政变的成功，让中情局更加迷信了金钱的魅

力。很多人都认为，中情局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其实并不尽然——中情局在海地的问题上就一度束手无策。

海地是个加勒比岛国，与美国近在咫尺。1804年1月1日，海地宣告独立，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

1844年，岛东部的人民发动起义，宣布脱离海地，建立了多米尼加。此后，伊斯帕尼奥拉岛便分裂为海地和多米尼加两个国家。

在1843年到1915年的72年间，海地先后换了22个总统。其中只有两个总统和平离职，5个死于任内（其中1个被毒死），其余15个都是被暴乱推翻；而这15人中，又有2人被暗杀，2人逃亡国外。

1914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趁海地内乱，派海军陆战队在太子港登陆，将海地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劫往纽约。1915年，美军全面占领海地，海地政府彻底沦为傀儡政府。直到1934年，美军才全部撤出海地。

1957年，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在美国中情局的参与下高票当选总统，他为了加强对民众的精神控制，不

断宣扬黑人至上主义，煽动种族仇恨。1964年，海地特务组织屠杀了数百名起义者，并将起义者的尸体空运到太子港，陈放在正对飞机场出口处的显著位置上示众，不许收尸，任其腐烂。据估计，在杜瓦利埃统治时期，被杀害的海地人多达3万到6万人。杜瓦利埃家族的统治被称为加勒比地区“最腐败、最血腥的现代王朝”。

1962年8月9日，当时的中情局副局长赫尔姆斯赶到白宫，讨论推翻海地政权的可行性。几年来，白宫发现杜瓦利埃除了把中情局支援给他的钱中饱私囊和在本国实行独裁统治外，一无是处。讨论的结果是，肯尼迪总统授权中情局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大量武器运到海地，并把它们交给试图推翻杜瓦利埃政府的异见人士。

但很长时间过去了，海地没有任何动静。肯尼迪叫来赫尔姆斯问原因。

赫尔姆斯直言不讳地说道：“恕我多说一句，总统先生，这计划好像不太行得通。”

肯尼迪让他说明原因。赫尔姆斯告诉他，杜瓦利埃刚当上总统后就建立了一支由5000人组成的总统卫

队，卫队成员装束奇特、刺眼，他们戴墨镜，系红领带，身佩枪支，在海地的大城小镇横行霸道，残酷镇压和迫害对独裁统治不满的人。海地人对他们是敢怒不敢言，称他们为“通顿马库特”（克里奥尔土语，意为“吃人魔王”）。

到了1962年，海地的正规军队编制才5000人，杜瓦利埃卫队人数却已经达到8000人，想要在海地搞政变，必须要通过他们这一关。而当时在海地根本找不到第二种力量可以控制他们。

赫尔姆斯认为在海地政变成功的希望渺茫，希望肯尼迪总统最好能取消政变计划。肯尼迪最终同意了赫尔姆斯的意见，放弃了这次行动。

1971年，老杜瓦利埃病死，其儿子让-克洛德·杜瓦利埃接任总统。小杜瓦利埃执政时敛财6亿多美元，海地沦为西半球最穷国家。除了贪污外国的经济援助、贷款，小杜瓦利埃还贩毒、搞欺诈性的彩票、向国外医学院倒卖供解剖用的尸体，并从海地人身上抽取血浆以供出口。

1986年，杜瓦利埃家族的统治被推翻，小杜瓦利埃携带1亿多美元的现金，乘坐美国安排的军机出逃，

辗转到法国避难。

多年的政治动荡让海地经济每况愈下。海地至今没有重工业，只有熬糖、磨面、纺织、水泥等技术含量很低的轻工业。海地完全没有油气资源，燃料依赖进口。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海地54%的人口每日生活水平在1美元以下。2008年，该国穷人吃泥土、盐以及菜油混合制成的“土饼”的新闻，曾被各国媒体广泛报道。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2005年海地人均预期寿命仅53岁。



苦难生活中的海地儿童

另外，海地至今仍背负着沉重的外债。2008年，海地的外债高达18.17亿美元，而当年的财政收入仅

9.675亿美元。2003年，海地用来还外债的费用，是医疗、教育和其他公共事业的1.5倍。

美国中情局的插手并没有改善海地人民的生活，而只是雪上加霜。

在当年让赫尔姆斯印象最深刻的事，应该是中情局推翻英属圭亚那的总理切迪·贾根的那场政变。

贾根是个接受过美国教育的牙科医生，他的老婆叫珍妮特·罗森堡，是芝加哥出身的马克思主义者。1953年贾根当选为英属圭亚那总理后不久，英国首相丘吉尔取消了《殖民地宪法》，下令解散英属圭亚那政府，并将贾根夫妇拘捕下狱，直到英国恢复宪法后才将他们夫妇二人释放。

切迪·贾根博士于1961年再次当选为英属圭亚那总理。贾根政府制定了扶植民族工业、限制外国资本、进行土地改革等经济发展计划，并要求在1962年5月前实现独立。当年10月，贾根访问美国时，试图取得肯尼迪政府的支持，让圭亚那脱离英国的控制。但肯尼迪总统认为他是个共产党，就把自己的担心公开告诉他听，并对贾根说：“我觉得你会投入苏联的怀

抱。”

贾根一听，马上信誓旦旦地说：“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请不必担心。圭亚那不会有苏联基地。”

在贾根访问美国后不久，肯尼迪就让中情局动手制订推翻贾根的计划。中情局拿出了200万美元，由一个叫霍华德·麦克凯布的中情局特工，以国际劳工秘书处驻圭亚那教育办事处创立者的身份进行活动。麦克凯布让“美国自由工人发展协会”出面，在圭亚那收买了一大批反对派，给贾根政府制造麻烦。

圭亚那首都的形势很快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经常有工人罢工，学生和市民也经常上街举行示威游行。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更加可怕了——在圭亚那首都竟然出现了几家前所未闻的电台。这些电台疯狂地进行造谣和煽动，号召公务员也举行罢工，圭亚那的形势急转直下，贾根政权立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领导这次罢工运动的是圭亚那的工会组织。他们接受了“美国自由工人发展协会”的金钱和建议之后才开始这样做的，而“美国自由工人发展协会”的钱就是中情局给的。在那些工会组织的煽动下，圭亚那的形势开始失控了，从开始的罢工到后来的暴动直到最后

的大规模暴乱，最后甚至还发生了种族冲突。在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骚乱和种族冲突后，贾根政府终于倒台了。

贾根政权垮台后，肯尼迪总统向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解释了他这样做的“理由”，他说：“拉丁美洲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英属圭亚那如果出现共产政府，就会对美国军队打击古巴形成不可抗拒的压力。”

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当然只有肯尼迪自己清楚。总之，中情局当年的“烧钱”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心想事成，达到了他们预期的目的。

中情局在智利得逞的“三点式”计划

在肯尼迪当政时，中情局曾有过一个庞大的计划——要把智利树立为拉丁美洲资本主义“民主”的样板，“让智利与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形成鲜明的对照”，宣传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遏制古巴“红色瘟疫”在拉丁美洲蔓延。

1964年，智利社会党左翼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参加全国总统大选。恨之入骨的中情局急红了眼，先后斥资400万美元支持基督教民主党的爱德华多·弗雷竞

选总统。中情局利用传单、报刊、广告等宣传媒介美化弗雷，攻击和丑化阿连德及其社会党，宣称如果让阿连德执政，智利将会蜕变为充满恐怖和血腥的、独裁专制的警察国家。最后竞选的结果，弗雷得票最多，当上了智利总统。据统计，弗雷竞选总统的费用有一半来自中情局的腰包。

华盛顿对这次竞选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认为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成效显著”。白宫对弗雷寄予很大希望，认为他能够把智利引向“健康、民主的道路”。弗雷上台后，确实采取了一些土地改革、财富重新分配、推行教育和社会福利改革的措施，但智利国内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还相当严重。

1970年，智利新一轮总统大选来临。阿连德再次积极参加总统竞选。他指责弗雷“半心半意”地推行社会改革，主张要加快速度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智利国家。

从1969年12月起，白宫就开始策划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计划。1970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里负责审核中情局秘密行动的总统特别小组批准中情局在智利进行反阿连德的宣传活动。同年6月，从智利传来消

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阿连德很可能会在大选中获胜。这时，总统特别小组开始考虑是否让中情局在智利采取更有效的行动来阻止阿连德。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表了态：“我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国家由于其本国人民不负责任而落到共产党的手里。”

在6月27日召开的会议上，特别小组进一步决定，中情局向智利增派力量，借此影响那里的选举，同时还授权中情局在9月4日大选前，设法在智利的某一选区进行一次民意测验。中情局照办了。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右翼党派的总统候选人乔奇·亚历山德里占压倒多数优势，阿连德位居第二，而美国中意的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汤米的选票仅仅排在第三位。对于这个结果，白宫和中情局认为还不错。

在智利大选的前夕，一些在智利有巨额投资的美国大公司也忧心忡忡，一旦阿连德当选总统，他会把一些在智利的外国大公司收归国有，这将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因此他们积极出钱资助亚历山德里和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汤米参加竞选。在这些美国公司中最主要的要算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和安纳康达铜业公司

了。

中情局的第4任局长麦科恩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之一。1970年5月，麦科恩私下约见了时任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他向赫尔姆斯提出中情局和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共同协作来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愿意向中情局提供100万美元，作为反阿连德的秘密行动经费。在此之前，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已交给国务院50万美元，用于反对阿连德当选总统。

9月4日，智利全国大选开场了。出人意料的是，阿连德竟然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消息传到华盛顿，各方面都感到非常震惊。尼克松暴跳如雷。9月15日，尼克松总统把赫尔姆斯召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连同尚未接替罗杰斯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和司法部长约翰·N. 米切尔一起开了个碰头会。

会上，尼克松大发雷霆，激动万分，赫尔姆斯回忆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尼克松发过这样大的火。”尼克松认为，阿连德的胜利意味着卡斯特罗的反美革命已蔓延到了智利，并将在那里传遍整个拉丁美洲。尼克松总统给赫尔姆斯下达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命令——

破坏阿连德就职，“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也要拯救智利！花上1000万美元，不够的话再加些！”为了区别中情局在智利进行的其他活动，这个计划被称为“轨道2号”，此前破坏阿连德当选总统的行动和计划被称为“轨道1号”。

由于阿连德只获得了简单多数，所以根据智利宪法，他还必须经智利国会投票通过才能就职。中情局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授权，准备使用一切手段阻止阿连德通过这次表决。这些手段包括寻求智利军界的帮助。然而，阿连德就任总统已成大势所趋，绝非尼克松的好恶所能决定。因此赫尔姆斯苦笑着对尼克松说：“你交给了我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第6任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与尼克松在一起
赫尔姆斯经过一番冥思苦想，选择了几名得力干

将来执行这项任务。他任命戴维·菲利普斯担任刚成立的智利特遣队队长。当计划部西半球处副处长吉姆·弗兰纳里向菲利普斯转达此事时，菲利普斯也感到困惑不解：“我简直难以相信怎么会看中了我？”

“我们要派出的是最优秀的人物。”弗兰纳里向他解释说。

“只有唯一的方法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即军事政变。”菲利普斯最后提出了建议。

“是的，这是唯一的办法。”弗兰纳里同意菲利普斯的看法。

中情局在智利的第二方案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在中情局内部只有局长赫尔姆斯、计划部部长卡拉默辛斯、计划部西半球处正副处长布罗和弗兰纳里、特遣队队长菲利普斯以及中情局在智利的12名人员中的4人知道第二方案。具体执行这个方案的菲利普斯内心十分矛盾，他经常问自己：“中央情报局是否必须响应总统专横的命令，在一个有民主传统的拉美国家策划军事政变？”与此同时，他担心中情局在智利一时还找不到可信赖的合作伙伴来取代阿连德。

菲利普斯的这一担忧终于在10月24日智利国会的选举中得到了证实。尽管中情局花费了25万美元，智利国会仍选举阿连德就任总统，他如期宣誓就职。面对这种局势，中情局全力以赴实施第二方案。但第二方案中直接涉及到的策划军事政变，时机尚未成熟。

最令中情局伤脑筋的是，几乎没有一个智利头面人物愿意出面唱主角。全面负责第二方案的卡拉默辛斯向尼克松汇报时说：“智利的军方人士乱糟糟的，他们不愿干什么事情。要是连他们也不想干，这场政变要取得成功就变得更渺茫了。”

1970年10月，中情局形成了一个后来在智利得逞的“三点式”计划：

1. 鉴于智利陆军总司令施奈德将军和总统弗雷两人都不愿意采取非法行动阻挠阿连德就任总统，中情局必须加紧搜集情报，物色有军事政变意向的智利官员；
2. 通过舆论宣传，散布谣言和采取恐怖行动，在智利形成一个适合军事政变的社会气候；
3. 对那些有政变意向的智利官员讲明，虽然美国不能直接派兵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

他们发动军事政变。

在圣地亚哥的美国大使馆武官保罗·怀默特上校与智利的一些军界人士关系密切，因此中情局请怀默特上校帮助执行“三点式”计划。国防情报局也向中情局提供了一些军界人士的名单，一旦发生政变，这些人可能会有用处。在这些人中，有退休的陆军将领罗伯特·维沃克斯和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卡米洛·瓦伦朱拉将军。

中情局知道，智利武装部队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支持政变，尤其是施奈德将军，他在军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曾公开而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的信念，即“军队绝不采取任何反对宪法程序的举动”。中情局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维沃克斯身上，他是唯一愿意和阿连德捣蛋的老家伙。但是他的一些举动引起了施奈德将军的注意，他坚决抵制了维沃克斯等人的政变计划。为此中情局作出决定，踢开施奈德这块绊脚石。

赫尔姆斯不赞成暗杀施奈德将军，除非有美国总统的亲笔手谕。他怕日后吃不了，兜着走。赫尔姆斯说：“自我就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那天起，我就决定，在我任职期间，坚持不搞那种玩意儿，并且对我的下

属也讲明了这一点。”

由于赫尔姆斯的这一明确禁令，10月13日，赫克谢尔从圣地亚哥向中情局总部发来急电说：“为了加快军事政变的步伐，维沃克斯打算在48小时之内绑架施奈德将军和他的副手普拉茨。”并请求总部指示。

10月15日，中情局出面给维沃克斯发去一份电报，告诫他不要采取鲁莽的行动，电文是这样的：“已审查了你的计划，根据你提供的情报和我们从其他方面获得的信息，我们的看法是，你的政变计划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取得成功，一旦失败，只能削弱你的实力，请务必保留你的力量，你和你的朋友们准备干一番事业的愿望总有一天会实现的。让我们继续保持联系，你会继续得到我们的支持。”

在智利，维沃克斯将军已决定孤注一掷。他对中情局的官员说，他要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10月22日绑架施奈德，因为10月24日是国会确认总统的日子，11月5日就要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

10月17日晚上，美国驻智利大使馆武官怀默特上校会晤了一名智利陆军军官和一名智利海军军官。嗣后，他把这两名军官提出需要催泪瓦斯手榴弹、冲锋

枪和子弹的请求转告给中情局。中情局怀疑对方会用这些武器来绑架施奈德，但又觉得这两名军官不像是维沃克斯那一伙人，也就放下心来。

几乎就在这同时，圣地亚哥卫戍区司令瓦伦朱拉将军也提出了要绑架施奈德将军。实际上，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都知道对方有发动政变的计划，但他们不愿意携起手来一块儿干，因为两人都想在政变成功以后独坐军政府的第一把交椅。

然而，瓦伦朱拉在10月19日绑架施奈德的计划失败了。

那天施奈德将军没有像以往那样乘坐陆军司令部的汽车去吃晚餐，而是改乘私人汽车外出了，而且那天他的警卫人员寸步不离，这使前去执行绑架任务的人无法接近施奈德。当时，中情局仍在规劝维沃克斯和瓦伦朱拉别草率行事。中情局认为这两个人谁都成不了大事，没有大用处，弄不好却容易捅出娄子，给自己带来麻烦，不好收拾，但他们不予理会。这样，中情局先后与他们断绝了联系。

维沃克斯按照自己原定的计划，于10月22日采取了行动。早晨刚过8点，施奈德乘坐的汽车风驰电掣般

地朝陆军司令部驶去，半路上突然遭到歹徒的拦截，汽车被迫停了下来，施奈德见状不好，急忙拔出手枪自卫，这时，歹徒先发制人，开枪射击，子弹打穿了施奈德的胸膛，他跌倒在血泊中。

3天以后，施奈德在医院里奄奄一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维护宪法！”

智利警方在歹徒身上查获了使用过的武器。后来，维沃克斯被抓了起来，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外加5年流放。瓦伦朱拉因有策划政变的企图，也被军事法庭判处3年流放。

中情局得知了施奈德的死讯后焦灼不安。菲利普斯预感到，中情局会被认为参与了这次暗杀活动，因为就在维沃克斯采取非常行动的前一夜，中情局把3支轻型冲锋枪交给了这些对施奈德有成见的军官。

但后来得知，这些武器在那次绑架中并没有用上，中情局的人员这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那天维沃克斯派人绑架施奈德，并没有准备要暗杀他，所以前去执行任务的人随身只带了手枪，没带其他武器。当施奈德首先拔出手枪想进行自卫时，维沃克斯的人才开枪射击，没想到子弹射中了施奈德的要害

处，导致他身亡。

在施奈德去世后的第二天，圣地亚哥有数十万人自发地为他送葬，悼念这位为捍卫民主而牺牲的将军。人们义愤填膺，强烈谴责阴谋集团的罪恶行径。当时任中情局副局长的科尔比哀叹道：“这次尝试的失败，为阿连德平息了军内的不满。”

10月23日，赫尔姆斯再次检查了第二方案（“轨道2号”）在智利的执行情况。他认为，中情局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只有依靠智利人自己去搞了。在此之前，赫尔姆斯已向尼克松作了汇报，说中情局能办到的事情都办了，至今智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想进一步发动政变。

1970年12月，麦科恩对约翰·布鲁斯说：“赫尔姆斯没有采取戏剧性的行动来有效地阻止阿连德当选总统，对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感到很失望。”当时，在华盛顿出现了这样一种说法：“赫尔姆斯在关键时刻溜之大吉，尼克松和基辛格责备中央情报局贻误了阻挠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时机。”

此后，中央情报局想方设法支持反对派，希望他们能够东山再起，在1976年大选时获胜，使阿连德和

卡斯特罗的希望破灭。中央情报局集中力量通过第三国帮助中间党派，支持自由和反对观点的报刊和电台，援助学生和工联组织。中央情报局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73年初在智利国会选举中，反阿连德的候选人在国会的两次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二的多数，从而能够弹劾阿连德。

从1971年下半年起，中情局与智利军方加紧联系。中情局驻圣地亚哥情报站搜集了大量对今后政变有极高价值的情报，例如：被现政府逮捕的智利人名单、政变时需要特殊保护的对象的名单以及政变时必须占领的重要设施等等。

中情局加紧制造骚乱，煽动和支持一些右翼工会领导的工人罢工。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卡车司机长达一年的罢工，这次罢工造成了智利经济的严重失调，使人民的不满达到了危险点。

尽管国内政局动荡，但是在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卡洛斯·普拉茨的领导下，军队一直严守中立，并且在1973年6月27日还粉碎了一次政变企图。然而过了两个月，中、高级军官的家属们聚集到普拉茨家门外举行示威，军队的不满情绪已经公开化。普拉茨被迫辞

职，由皮诺切特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

1973年9月11日，智利右翼军人集团在独立纪念日游行的掩护下发动政变，挥兵进攻拉莫内达总统府，空军的飞机也参加了轰炸。阿连德拒不投降，孤身奋战，坚持抵抗，最后牺牲在总统官邸的办公室里。牺牲时，他的双手仍紧握着卡斯特罗赠送给他的冲锋枪。

几艘美国海军军舰就在智利海岸沿线参加一年一度的海军演习。在政变发生的当天，一架美国电子侦察机盘旋在安第斯山脉上空。根据来源不同的消息报告说，飞机是在为政变策划者之间进行联络，并为中情局监视政变的进展情况。

在后来美国国会的调查中，国务卿基辛格被迫承认了中情局插手了智利政局。

据中情局官员自己说，他们是通过在智利的内线和澳大利亚秘密情报机关提供的情报，方知政变的阴谋，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积极鼓动和支持了政变军人的行动，只是没有直接出面而已。不过，据官方统计的数字，从1970年11月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至1973年9月阿连德饮弹身亡，在这不到3年的时间里，

中情局在密谋反对阿连德的颠覆行动中总共花费了800万美元。

阿连德死后，智利成立了以陆军总司令皮诺切特·乌加特为首的军人独裁政府。美国立即予以承认，并给予大量援助。黑暗统治在智利整整维持了15年。

阿连德政权的颠覆，应该是中情局在拉美又一个成功的案例。

到1962年8月时，中情局已经在越南、老挝、泰国、伊朗、巴基斯坦、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11个国家进行了秘密行动。

在中央情报局六十多年的发展史上，暗杀外国领导人的活动早已是它惯用的手段和公开的秘密。曾任中情局副局长的比希尔在2008年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冷战者的思考》一书，书中记录了当年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策划如何暗杀他国政治领袖的情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那些暗杀行动的曝光，美国政府发现自己的形象已经和黑手党差不多了，于是在1981年出台了一个总统行政命令，命令中情局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暗杀行动。

但是到了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以后，中情局又恢复了其本来面目，继续在境外进行暗杀活动。不过中情局对自己的暗杀活动并不避讳，有时甚至公开承认说，一旦美国认为其外交政策目标不能通过正常外交途径实现时，美国就会考虑在某国发动军事政变或者是对该国政治领导人下手。

自从中情局成立以来，有多位外国领导人成为其暗杀的对象。那些被列入暗杀对象的人，在中情局的档案上是找不到名字的，而是以字母编号代替。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就是其中之一。

多年来，卡斯特罗一直是中情局暗杀的对象。据近年来解密的资料统计，中情局曾经对卡斯特罗实施过638次暗杀行动，应该是稳居世界各国领导人之首。不过令他们遗憾的是暗杀行动没有一次成功。卡斯特罗如今已经八十多岁，依然健康地活着。所以他经常幽默地说：“今天我还活着，这完全是由于中情局的过错。”

中情局为什么要对卡斯特罗下此毒手，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呢？这完全是古巴的社会性质和卡斯特罗本人的战斗风格所决定的。

第九章 颠覆古巴，卡斯特罗历尽劫难

古巴革命让美国感到了极大的威胁，中情局花费1300万美元网罗亡命之徒组成了一支“古巴旅”；肯尼迪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第40号计划”，“猪湾登陆”行动大兵压境，但是72个小时的激战却让“古巴旅”114人暴尸海滩，1189人成了俘虏，古巴电视台现场直播俘虏受审场面；美国成立“推土机换取自由委员会”，要用推土机换回战俘；卡斯特罗躲过了638次谋杀，“古巴导弹危机”最终得到了化解。

组成了一支500多人的“古巴旅”

古巴同美国隔海相望，是近在咫尺的邻居，古巴

与美国佛罗里达州之间最短的直线距离才90海里。但是由于社会性质的不同，让古巴这样一个弹丸小国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成了美国政府的眼中钉，因为它的独立让美国人看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

古巴曾经是西班牙和英国人的殖民地。1898年美国出兵占领了古巴，两年后成立了古巴共和国，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03年2月，美国和古巴签订了所谓的“互惠条约”，美军强行租占古巴的关塔那摩等多处海军基地，遭到了古巴人民的反抗。1906年美国又出兵镇压古巴人民起义，并且对古巴实行多年的军事占领，干涉古巴内政，扶植巴蒂斯塔通过政变建立起来的军人政权，在古巴实行军事独裁。

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青年起义者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失败后建立了“七二六运动”组织，然后从1956年12月开始，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打游击，进行武装斗争。

经过六年的武装斗争，卡斯特罗终于在1959年1月1日，率领起义军占领了古巴首都哈瓦那，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并于1月2日，宣布成立革命政府，卡斯特罗出任总理，向全世界宣布“古巴实行社会主义

革命”，自己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后来他又将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自己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从1976年开始连任国务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和革命武装部队总司令。

几十年来，他领导古巴人民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美国的大门口树起了一面革命的旗帜，给美国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美国人一直想颠覆卡斯特罗的新政权。美国政府担心，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有意与美国较量，古巴这个共产党国家就是苏联进攻美国最好的滩头堡。

1959年古巴新政权刚刚建立，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就明确指示中情局秘密行动处，要他们考虑彻底除掉卡斯特罗。艾森豪威尔对中情局秘密行动处的负责人比斯尔说，只有干掉他才能加速古巴现政府的垮台。

比斯尔是在1959年1月1日接替威斯纳，负责中情局秘密行动处的。也就是在同一天，卡斯特罗在古巴宣布他的革命政府为古巴唯一合法政府。比斯尔接到任务后，就一头扎进中情局总部的档案室，把卡斯特罗的资料仔细地研究了一番后，竟然语出惊人地告诉

人们一个乐观的结论：“卡斯特罗的政权几个月内就会垮台。”

比斯尔的理由是，卡斯特罗虽然自称是共产党，但是在此之前他与共产党的联系并不多，中情局完全可以利用当年的“烧钱策略”将他收买，没有必要干掉他，最好是让他成为古巴的第二个傀儡政权。比斯尔的高见，很快就得到了中情局其他情报官的认可。

可是，就在中情局讨论是否应该收买卡斯特罗和如何收买卡斯特罗的时候，美国人在古巴的庄园和财产却在一夜之间被卡斯特罗的政府全部没收了，美国人在古巴的投资企业也被古巴政府收为国有。卡斯特罗政府的这一行动，让美国人一下子傻了眼。他以自己的行动在明显地告诉美国政府，他不可能成为美国政府收买的对象。

比斯尔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只有老实地拿出暗杀这一招。1960年1月8日，比斯尔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所有的成员都是六年前曾经成功颠覆危地马拉政府的人。

在经过多日的运筹后，比斯尔向中情局提供了一份秘密行动计划。这次计划包括三个步骤——首先，

比斯尔认为应该以流亡在外的反对卡斯特罗的古巴势力为基础组建一个反对政权，然后由中情局帮助这个政权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向卡斯特罗的新政权发动攻击；第二步就是在中情局的帮助下建立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具体负责针对卡斯特罗政府的情报和其他秘密行动；第三步，建立一支武装力量，将卡斯特罗最终消灭。

艾森豪威尔批准了比斯尔的这项行动计划，并且要求比斯尔尽快找一个流亡的古巴团体，训练他们，最终让他们按照中情局的要求，成为一个反抗卡斯特罗的政治团体。事实上，这样的流亡团体很容易找到。在卡斯特罗掌握古巴政权之后，很多以前在古巴从事赌场、走私、毒品之类的黑社会分子都纷纷跑到了美国。中情局断定这些亡命之徒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地盘，肯定会同卡斯特罗的新政权冒险一搏。

比斯尔开始行动了。在金钱与承诺的双重诱惑下，一大批反对卡斯特罗的亡命之徒就像潮水一样涌入迈阿密。这些人人都希望美国人帮助他们赶走卡斯特罗，让他们重新回到故土，再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中情局将这些人收买以后，将他们送到巴拿马运

河区，在弗吉尼亚州一座名叫“珠营”的军事基地进行训练。此时比斯尔信心百倍。他对总统汇报说，中情局完全可以靠这些人去完成颠覆古巴的大业，摧毁卡斯特罗的现行政权，甚至谋杀卡斯特罗本人，美国军方完全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

但是没过多久，比斯尔的雄心就被打压下去了。原来被派回古巴的那些狂热分子太不争气了。一回古巴境内，还没有开始行动，就被古巴政府的安保部门和军队给发现了，最后把他们都送进了大牢。

这时，比斯尔才认识到要摧毁卡斯特罗的政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考虑必须提高行动的规模，重新找一块秘密的训练基地，扩大训练的人数，培养出更多反卡斯特罗的精英分子。

但是这一切都需要钱。不过，中情局向来是把钱不当一回事的。尽管当时中情局的财政预算比较紧张，但总统艾森豪威尔还是慷慨地大笔一挥，将纳税人的1300万美元交给了比斯尔。比斯尔欣喜若狂，马上招兵买马，网罗那些愿为美国卖命的亡命之徒，组成了一支500多人的“古巴旅”，然后把他们送到一个新的训练基地进行严格的训练。这个新的训练基地位于

危地马拉的加勒比海沿岸的一片海滩，那里的地形地貌都与古巴的海岸相似，有利于训练这些人将来在古巴的海岸登陆。同时，那里偏僻、荒凉而又隐蔽，人迹罕至，不容易被人发现，据比斯尔给中情局总部的报告说，“在新的训练基地，训练水平和强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这时，除了抓紧对“古巴旅”的训练之外，比斯尔还请总统下令，由美国海岸自卫队出动U-2侦察机到古巴上空进行侦察。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比斯尔制订了一个进攻古巴的行动方案上交到中情局总部，只等批准后就开始实施。

这是一个陆海空相结合的立体作战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先由美国的海军发动攻势，将古巴海岸的防御工事摧毁，为“古巴旅”顺利登陆扫清障碍；“古巴旅”的特工们登陆后在原地建造滩头工事，运用他们在受训时学到的知识坚守阵地，等待进攻的命令；然后，再由美国空军出动B-26大型轰炸机，对古巴首府哈瓦那进行空中打击，与此同时，那些坚守阵地的特工们在飞机的配合下进入哈瓦那。当然，计划的另一个环节就是要控制古巴电台，对卡斯特罗的军队进行宣传，

使他们丧失斗志，最终弃甲投降。

比斯尔对自己的这个作战方案信心十足。他说，由他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那支“古巴旅”绝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部队，“古巴旅”的500多名战士可以无坚不摧。当时“古巴旅”的那些亡命之徒还称自己为“2506”战士，因为这个旅有自己独特的旅徽，图案是“2506”，上面压着一个十字架，军旗和士兵用的都是这种徽记。凡是参加这个旅的战士每月都会从中央情报局那里得到薪水，每人175美元。

“猪湾登陆”计划开始实施

1960年9月28日，入侵古巴的方案开始实施。中情局派出一架DC-4型飞机从危地马拉起飞，满载大量重武器飞往古巴，准备空投给已经潜入古巴的流亡分子，可是却遭到了古巴的高射炮部队的拦截。在密集的炮火中，DC-4型飞机上的特工慌慌张张地进行空投。不料这一次空投的误差竟达7英里，将空运来的武器装备全部空投到古巴军队的防空区。

经过一番清理后，古巴军人将这批空投的武器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这些武器包括：小型迫击炮1

门，零散榴弹炮5门，手榴弹6箱，30毫米机枪3挺，30毫米机枪子弹14箱，白朗宁机枪3挺，加仑步枪7箱（共28支），汤普生机枪3箱（共9挺），胶质爆破物6箱，全套用于破坏的设备1箱，美式伪装式降落伞6个……古巴人不仅捡了个大便宜，还活捉了一名去接军火的“古巴旅”特工。

这架一只引擎被打坏了的飞机扔下武器后，沿着海岸线勉强飞行了一段时间，最后被迫降落在牙买加。中情局自从1954年在危地马拉策动政变成功后，就在那里建立了军事基地。后来他们多次从那里派飞机骚扰古巴领空或者是进行空投，前后达三十次之多，但成功率还不到十分之一。

中情局此时才发现，自己对古巴的军队和防空力量几乎一无所知。中情局的一份关于古巴秘密行动的报告指出：“鉴于卡斯特罗已完全控制古巴，我们的原始构想现在已经无法达成，之前认为可能出现的内部动荡已不存在，古巴的防御态势也不容我们进行当初规划的攻击。”

1961年，民主党的约翰·肯尼迪在大选中获胜，取代了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后，对中情局当

年的那个冒险计划并没有多大的兴趣和足够的信心。所以，当比斯尔又拿着一份新的方案去见肯尼迪时，他只是匆匆地看了一眼，就否决了中情局的计划。然后指示他在三天之内拿出一个最让他满意的登陆计划。

比斯尔新的方案出笼了。他在这个方案中选择了—一个叫猪湾的海滩，作为进攻古巴的登陆地点。他信心十足地指着地图对总统说，猪湾三面都是广阔的海滩，而且不远处有一个机场。这些条件正好符合了肯尼迪的要求。比斯尔向肯尼迪总统保证说，即使“古巴旅”在上岸后遇到卡斯特罗的部队阻击，还可向山区挺进。那里有一片沼泽地完全可以作为游击基地。

可是，比斯尔并不知道，他当时使用的这份古巴地图，是一份绘制于1895年的古巴地图。沧海桑田，几十年过去了，猪湾那一带的海岸不但地形发生了变化，就连地貌也改变了。此时这里遍地都是茂密的红树林，盘根错节，到处都是泥泞沼泽，那些武装分子即使登陆了，也根本无法穿越这片红树林，到达比斯尔所谓的游击基地。

但是肯尼迪却相信了中情局的这份作战计划，并

确认它能成功，于是就批准了这份“猪湾登陆”计划，即中央情报局的“第40号计划”。

为了给这次行动制造舆论，1961年4月3日，美国国务院还向古巴政府发表了一份白皮书，要古巴断绝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美国人在这份白皮书中说，据中情局的多份报告称，古巴曾多次从某个共产党国家购买武器。如果古巴一意孤行，美国相信“古巴人民”（那批流亡的古巴人）将同“本半球的其他共和国一道进行斗争来赢得自由”，美国将坚决给予古巴“未来民主政权以全面和积极的支持”。

这份白皮书就是美国在公开向古巴发出干涉的信号，并且为后来的“猪湾登陆”找出合法的理论依据。但是，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对此并没有予以理睬。他并不需要美国人来教他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怎样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1961年4月10日，中情局蓄谋已久的“猪湾登陆”计划开始实施。中情局秘密行动处处长比斯尔命令那支他认为训练有素的“古巴旅”，从危地马拉训练基地出发，赶到尼加拉瓜贝萨斯港，在那里整顿装备后再经海路乘坐登陆艇向古巴的海岸猪湾进发。当“古巴

旅”的武装分子向送别的人群挥手告别的时候，有人居然大声地喊出“我会把卡斯特罗的胡子拔下带回来”的豪言壮语。

4月15日，猪湾登陆战打响了。由1511人组成的“古巴旅”在美国空军的掩护下向猪湾进发。与此同时，8架涂着古巴飞机标志的美军B-26轰炸机和5架P-51野马式战斗机也掠过佛罗里达海峡，飞临古巴上空，轰炸了古巴3座空军机场，摧毁了古巴战斗机5架，毁坏了10多架。中情局当时十分自信地估计，古巴空军一半的战斗力已经被摧毁了。

4月17日晚上，中情局的“蛙人”出现在萨帕塔沼泽地的吉隆海滩。这些“蛙人”的任务是为“古巴旅”标明登陆点。这些“蛙人”主要是美国中情局自己的特工，而不是“古巴旅”的武装分子。但是中情局的这些“蛙人”刚一上岸，就被防守在海岸的古巴民兵发现了。他们一面在滩头阻击，一面给司令部发出报警电报。最终，中情局的这些“蛙人”还是完成了任务，强行登陆成功，并且在海岸建立了滩头阵地。

天亮以后，中情局的C-54和C-46运输机分别从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机场起飞，并将“古巴旅”的伞兵营

空投在吉隆海滩上。这些伞兵按照训练的要求迅速强占了那些“蛙人”事先标明的作战阵地。这时“古巴旅”其他武装人员也随着5辆坦克向纵深处前进。由于他们及时得到了B-26轰炸机和P-51野马式战斗机的空中支援和掩护，一路上进展相当顺利。

就在这时，卡斯特罗命令古巴空军部队突袭猪湾。中情局显然低估了古巴的空军力量。因为在此之前，古巴已经从苏联秘密地引进了T-33喷气式飞机和“海上怒涛”式飞机。这些飞机的作战性能远远超过了中情局派出来的那些老式飞机，结果那些B-26轰炸机成了古巴空军的靶子。在短暂的对决中，中情局的8架B-26就被打下5架，P-51野马式战斗机也不得不逃之夭夭。比斯尔“猪湾登陆”计划中的空军行动彻底宣告失败。

没有了空军的支持，想把卡斯特的胡子拿回去的“古巴旅”战士立即陷入绝境。这时卡斯特罗亲自上阵指挥战斗。他坐镇在猪湾附近一座由制糖厂改成的临时指挥部中，对他的亲密战友切·格瓦拉说：“现在我们真的在战斗了，胜利属于我们！”他下令古巴的军队赶赴猪湾，击沉所有船只，并不时地鼓舞部下：“给我

英勇地顶住，同志们！非常好！”5分钟后，他又对另一名军事领导人说：“你们必须击沉所有船只，冲他们开火！我们要用迫击炮让他们从地球上消失！”不久，他又与坚守在东海岸指挥战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通了电话，赞扬古巴的战斗机：“干得太漂亮了，太精彩了！”

当一架架飞机冒着浓烟在自由落体运动作用下坠落的时候，比斯尔心如刀绞。中情局的官员们希望美国空军再来一轮轰炸，但是身在前线的比斯尔知道此时败局已定。他说道：“没有用的，派出再多的空军也只能是增加我们的伤亡，我们低估了卡斯特罗。”

还有人立即想到那些已经登陆的“古巴旅”，不由得为他们担心。“那么我们已经登陆的‘古巴旅’怎么办？如果我们不能马上援救他们，他们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早在4月16日下午6点，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就从纽约打电报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提醒他不要“重蹈U-2的覆辙”。

晚上9点30分，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打电话给杜勒斯的副手卡贝尔将军说，中情局不得对

古巴发动空中袭击，除非“他们能从（猪湾）滩头机场执行任务”。

晚上10点15分，卡贝尔和比斯尔急忙奔向国会大厦七楼国务卿的办公室。腊斯克告诉他们，中情局的飞机可以为了保护滩头堡而介入战事，但不是去攻击古巴机场、港口或电台。

4月17日早上4点30分，卡贝尔从家里打电话给腊斯克，请求总统授权增派空中力量，结果卡贝尔的请求被驳回。

4个小时之后，一架古巴的“海上怒涛”轰炸机突袭猪湾。由美国训练出来的飞行员恩里克·卡列拉斯上尉是卡斯特罗空军的王牌。他锁定中情局从新奥尔良租用的旧货轮“埃斯康迪多河”号，在它东南角后方有一艘由二战登陆艇改装的“布拉加”号，船上有位叫格雷斯顿·林奇的中情局准军事行动军官，此时正用机关枪对古巴战机开火。卡列拉斯上尉马上发射了一枚火箭，击中“埃斯康迪多河”号前甲板船栏下方6英尺处，又命中了几十桶55加仑装的汽油。大火点燃了前甲板存放的3000加仑飞机燃油以及145吨的弹药，在一阵爆炸声中顿时火光冲天，船员们纷纷弃船逃命。货轮

爆炸后的火球喷出的蘑菇云，冲上猪湾上空有半英里高。在16英里外，中情局突击指挥官罗伯逊站在古巴人死伤遍地的海滩上，还以为卡斯特罗投下原子弹了呢。

此时，肯尼迪总统不得不请海军司令阿利·伯克上将出马拯救中情局。伯克在4月18日说道：“没人知道该怎么办，就连中情局执行这次行动和全权负责行动的人，也手足无措，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直不甚了了，只被告知部分真相而已。”

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和中情局的古巴人鏖战了两天两夜，到了4月18日晚上，“古巴旅”的指挥官佩佩·桑·罗曼在海滩上被卡斯特罗的军队打得六神无主，他只有用无线电告诉中情局的军事指挥官林奇：“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形势有多么严峻无望？你们到底是支持还是收手？”他几乎是哭泣着说，“请不要抛弃我们。我们的坦克和火箭炮弹快用完了，天一亮就会受到坦克攻击。我不撤退，必要时我们会战到最后一刻。”

天亮了，中情局没有再派出援军。绝望之中的罗曼对着无线电大吼：“我们弹药已尽，正在沙滩上苦战。速派援军。我们撑不住了。”凌晨时刻，他们被古

巴的军队逼进海里。在齐腰深的海水里，“古巴旅”的战士们在绝望地大叫：“我们撑不住了，快派援军！”

其实中情局空中行动的主管在当天中午就发电报告诉比斯尔：“以空中行动支持滩头堡完全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目前已损失5名古巴飞行员、6名副驾驶，2名美国飞行员和一名副驾驶。”总计共有4名中情局从危地马拉请来的飞行员在此役中身亡。中情局多年来一直隐瞒他们的死因，不让他们的遗孀和家属知道他们牺牲的真相。

空中行动主管在电报里说：“我们仍然有信心，静候您的指示。”但是比斯尔已经无法作出任何指示。比斯尔捂着耳朵不想听到“古巴旅”的任何消息。4月19日午后2点左右，罗曼大骂中情局，然后愤怒地将无线电打烂放弃抵抗。

经过72个小时的激战，“古巴旅”共计有1189人被活捉，114人被打死。古巴电视台把这些俘虏受审的场面进行现场直播，让中情局丢尽了面子。

中情局的军事指挥官格雷斯顿·林奇后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活了37年，第一次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惭愧。”

成立“推土机换取自由委员会”

“猪湾登陆”计划失败后，肯尼迪总统对中情局大失所望。他对中情局的那些情报官大声训斥道：“你们不是告诉我，只要7个小时就能摧毁卡斯特罗的抵抗力吗？我看没用上7个小时，我们的力量就已经被卡斯特罗吞没了！”

同一天，罗伯特·肯尼迪给当总统的二哥约翰·肯尼迪写了一张具有预言性的短笺。他在上面说：“摊牌的时候已经到了，因为在这一两年内形势必大幅恶化。我们若不想俄罗斯在古巴设置导弹基地，最好现在就决定我们该以什么行动来阻止它。”

肯尼迪总统对两位助理说，艾伦·杜勒斯曾在总统办公室向他当面保证，“猪湾行动”必定会成功。入侵古巴时，杜勒斯正在波多黎各演讲。他公开离开华盛顿原是欺瞒计划的一环，现在看来倒像是个弃舰而逃的舰长。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回忆说，杜勒斯返回华盛顿时，用颤巍巍的双手掩住脸，宛如行尸走肉。

1961年4月22日，肯尼迪总统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彻底检查“猪湾行动”失败的原因。

调查委员会很快就向总统表明了态度，他们认为需要以新的方式，来管理中情局的秘密行动。

中情局督察长柯克帕特里克就“猪湾行动”写下检讨报告。他的结论是，杜勒斯和比斯尔没有正确且真实地告知前后两任总统与政府。柯克帕特里克说，倘若中情局还想继续运转，就得改善组织与管理。

肯尼迪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坦承自己的责任，并引述了一句意大利谚语以自况心境——“胜利有一百个儿子，失败却是一个孤儿。”其意是说当你获胜时，大家争先恐后向你道贺，好像有一百个儿子；当你挫败时，没有人理你。在当时肯尼迪很想废掉中情局，不过冷静下来后，他想到了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跟他提到的美国的两大武器：核武器与秘密行动。于是他把中情局给保留下来了，只是毫不留情地把杜勒斯撤掉了，这样才让他感到舒坦一些。

1961年9月，杜勒斯从中情局局长位置上退休时，工人仍在对富丽堂皇的中情局新总部进行最后的装修。这是杜勒斯争取了多年的结果。新总部建在首都七英里外的波多马克河西岸的维吉尼亚州的林地里。在下台之前，杜勒斯还是踌躇满志，特地选了《新约·

约翰福音》第8章第32节的经文刻在新总部的中央大厅的墙壁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会让你们得到自由。”

杜勒斯的圆形浮雕像同样高挂在中央大厅，并且配有拉丁文的铭文。铭文就是一句话——“要找他的墓碑，请放眼四望。”

“猪湾行动”的策划者比斯尔比他的上司杜勒斯在中情局多待了半年。后来他在秘密证词中坦承，他在秘密工作上所谓的专长其实是虚有其表，因为中情局并不是“可以找到专业能力的地方”。不过比斯尔在离职时，总统为他戴上了“国家安全勋章”。

总统在授勋时说：“比斯尔先生崇高的目标、无穷的精力和坚定不移的奉献精神，堪为情报机关表率。他留下了永恒的遗产。”

——不过这“遗产”的一部分即是破碎的信心。因为在后来的19年中，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完全信赖中情局。

撤销了杜勒斯的职务之后，肯尼迪总统原本是要任命他的弟弟罗伯特当中情局局长。倒是罗伯特觉得经过“猪湾行动”之后，最好是找一位能为总统提供政

治保护的人。考虑了几个月之后，兄弟俩才选中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元老政治家约翰·亚历克斯·麦科恩。于是，快六十岁的麦科恩成了中央情报局的第4任局长。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猪湾事件”的第二天，就写信给肯尼迪，认为这场发生在古巴的“小规模战争”，将会在全世界引起连锁反应。他呼吁肯尼迪立即停止对古巴的侵略，并声称苏联准备向古巴提供反侵略所需的一切帮助。

肯尼迪最终冷静下来。他刚上任不久，绝对不能因为这次小小的军事行动而引发一场美苏大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中情局无法进一步采取行动。

面对外界的指责，中情局不得不发起一场救赎“古巴旅”战俘的活动。1961年5月17日，卡斯特罗宣布，愿以这批战俘换取美国500台推土机。美国人一听，便马上成立了一个“推土机换取自由委员会”。但是这笔交易最终没有做成，美国人只愿意用相当于500台推土机的2800万美元赎回这批战俘。1962年4月18日，所有的战俘全部被判刑，卡斯特罗将赎金抬高到6200万美元。同年圣诞节，经过艰难的谈判，最后美国人给了古巴价值5300万美元的医药和食品，才赎回了1000

多名俘虏。

谋杀行动达638次之多

新上任的中情局局长麦科恩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加州共和党人、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和激昂的“反共”人士。赫尔姆斯曾经是这样形容他——“白发、红颜、步伐轻快，穿着笔挺的黑西装，戴着无框眼镜，态度冷漠并且自信满满。”

麦科恩就职前就试着了解中情局业务全貌。他曾在他的前任杜勒斯和比斯尔陪同下走访过欧洲，接着又前往马尼拉北部山区度假胜地，出席远东地区工作站站长会议，并且认真研究过有关的材料。

不过，当时杜勒斯和比斯尔还是保留了一些细节，暂时搁置的暗杀卡斯特罗计划，杜勒斯和比斯尔也没告诉麦科恩。

1961年11月，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兄弟暗中成立秘密行动的“特别小组”，它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废掉卡斯特罗。

11月20日夜里，麦科恩就任局长前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总统传唤他到白宫。第二天他来到白宫，发

现肯尼迪兄弟由准将埃德·兰斯代尔作陪。此人的专长是反游击战。他从朝鲜战争前就在中情局和五角大楼服务，曾被威斯纳派驻马尼拉和西贡，协助过两地的亲美领袖掌权。

兰斯代尔的新职是“特别小组”行动组长。总统解释说，兰斯代尔奉司法部长的指示，一直在研究可行的古巴行动。总统希望在两个星期内能提交一份立即行动的计划，司法部长则非常关注古巴问题以及立即行动的必要性。

中情局的这次惨痛失败让肯尼迪十分难堪，因为“猪湾事件”发生时，他才上台两个月。中情局的失败不但让卡斯特罗的威望大增，还让苏联人对肯尼迪起了鄙视之心，这才有了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的“猪湾登陆”计划惨遭失败后，对卡斯特罗更是恨之入骨，中情局更是欲除卡斯特罗而后快。于是，他们暗中加快了暗杀卡斯特罗的步伐。

罗伯特·肯尼迪这么告诉麦科恩：推翻卡斯特罗“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之务，花再多的时间、金钱、努力或人力都不足惜”。然而，新局长却提醒他，中情局能依靠的真正情报并不多。“目前在古巴境内的27或28名特

工，其中只有12位还有联系，而且这些联系都是断断续续的。”4个星期之前，7名特工潜入猪湾后即遭逮捕。

在罗伯特·肯尼迪的命令下，兰斯代尔替中情局拟了一份应办事项清单：吸收和部署天主教堂及古巴地下组织以对抗卡斯特罗，从内部分裂卡斯特罗政权，破坏其经济，颠覆秘密警察，以生化战摧毁其农作物，用飞机喷洒白磷烧毁古巴的甘蔗园和烟叶……总而言之，在1962年11月下届国会选举前改变古巴政局。

赫尔姆斯立即着手成立一个直接向兰斯代尔和罗伯特·肯尼迪负责的独立任务小组。他从世界各地招揽人手，成立一个当时中情局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情报行动组织。这个组织一共动员了迈阿密附近的中情局官员600人，另外还有约5000名招聘人员，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第三大海军舰队，其中包括潜艇、巡逻艇、海防快艇和海上飞机，并以关塔那摩湾为基地。赫尔姆斯说，五角大楼和白宫也提出了一些“白痴计划”，比如炸掉一艘停泊在关塔那摩港的美国船只，佯称是恐怖分子攻击美国航道，从而将入侵古巴的借口合理

化。

赫尔姆斯选中了建造“柏林隧道”的哈维来领导“猫鼬”小组，哈维则以美国海盗威廉·沃克之名，称该计划为“W任务小组”——因为美国海盗沃克曾于19世纪50年代率领私人军队进入中美洲，并自立为尼加拉瓜皇帝——不了解哈维的人，都觉得这代号选得很奇怪。

哈维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他是以中情局的“詹姆斯·邦德”之名被介绍给肯尼迪兄弟的。这样的介绍让酷爱读伊恩·弗莱明间谍小说的肯尼迪总统颇感困惑，因为邦德和哈维除了都爱喝马提尼酒这一点外，可说全无相同之处。总是揣着一把手枪的哈维体形肥胖，眼睛凸出，午餐会上喝双份酒，一路咒骂着回家。罗伯特·肯尼迪要“迅速行动，快速回报”，可是哈维怎么看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1962年2月，哈维成立了一个代号为“步枪”的执行动组，聘请了一位住在卢森堡、但没有国籍的外国特工为中情局的秘密行动小组工作，打算利用他干掉卡斯特罗。秘密行动处主管业务的赫尔姆斯批准了他的“步枪”计划，但他认为最好不要告诉局长麦科恩。他意识到局长麦科恩一定会从宗教、法律和政治方面

提出强烈反对。

有人曾问过赫尔姆斯，肯尼迪总统真的想要卡斯特罗的命吗？他淡淡地说：“书面上当然什么证据也没有，但我绝对肯定他确实有这个意思。”不过赫尔姆斯认为，和平时期搞政治暗杀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好办法。他说一旦涉及杀害外国领袖，那么问题来了，下一个被杀的是谁？你杀了别人的领袖，他们为什么不能杀你的领袖？

1962年4月，哈维在纽约会见了芝加哥黑社会头目，请一位叫约翰·罗塞里的黑手党成员去刺杀卡斯特罗。中情局与他们讨价还价后，终于达成了这笔交易，只要能在1962年5月以前干掉卡斯特罗，中情局将给他们15万美元。据后来披露，那个黑社会头目当时只领取了11万美元的报酬，1962年4月派约翰·罗塞里潜入古巴，要中情局等待他们的好消息。

哈维从中情局医务处处长爱德华·冈恩医生那儿挑了一包毒药，打算让罗塞里投进卡斯特罗的茶或咖啡里。当时哈维还亲自驱车到迈阿密，把毒药和一大笔钱交给了罗塞里。但是，这名黑手党成员在收了大笔钱后突然人间蒸发了。中情局在寻人上向来不在行，

所以此事就不了了之。

局长麦科恩也认为中情局多灾多难，而且士气荡然无存。赫尔姆斯则认为，要想鼓起中情局士气，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展对古巴的谍报业务。于是他把一些优秀的谍报人员从已瘫痪的苏联分部和东欧分部调到古巴。

到了1962年夏天，已有45名情报人员潜入了古巴搜集情报，其实有些是到佛罗里达参加中情局举办的“十日速成班”的，速成班一结束他们就搭快艇在夜色掩护下回到了古巴。当时中情局耗资5000万美元的“猫鼬”行动，唯一的成就是在古巴内部建立了这个小小的谍报网。



一直与中情局斗智斗勇的卡斯特罗

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一再呼吁出动突击队暗中炸掉古巴的发电厂、工厂和糖厂，但都只是说说而已。中情局还是决定以暗杀的手段来对付古巴和卡斯特罗本人。

使用毒药是中情局暗杀卡斯特的惯用手段。“猪湾登陆”失败两个月后，中情局向特工部门领导人开出了一系列“可行性”方案，这些方案相当具有“科学探索精神”：他们曾经试制过各种各样的剧毒药丸，试图加进卡斯特罗吸的香烟、喝的咖啡和汤里；还试图使用海蜇毒汁加工过的毒针、带有致命细菌的手帕等，通

过收买卡斯特罗身边的人下手；中情局医务处还用肉毒杆菌毒素对一盒卡斯特罗喜欢抽的雪茄烟作了处理，其毒效十分强烈，只要卡斯特罗将其中的一支塞到嘴上，他就会立即残废。这盒雪茄交给一名特工人员，他宣称能将烟弄进古巴，并交到卡斯特罗手中，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卡斯特罗也因为有人多次想在他的雪茄中放毒，最终把烟给戒了。

中情局还想通过诋毁卡斯特罗的形象，让他在古巴人民中失去号召力。其中的一种方案，就是在卡斯特罗的播音室里喷洒一种类似迷幻药的化学物，用破坏他讲演的方法来损害他超凡的号召力。由于这种化学药物不可靠，所以这种设想被放弃了。

另外一个方案就是由中情局技术处准备了一些铊盐。当卡斯特罗把他的靴子放到房门外让别人擦拭时，就可以将铊盐撒在他的鞋上。这种铊盐有很强的脱毛力，如果卡斯特罗沾上了它，就可以使他的胡须掉光，从而毁掉他那具有非凡气质的男子汉的形象。

不过这种方案也只是一种空谈。

卡斯特罗终身未婚，中情局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弱点，于是将“美人计”作为一项选择。对一个正常的男

人而言，美人计应该是最稳妥、有着更高成功率的暗杀计谋，中情局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样的尝试。

当时中情局寻找到一位美丽的古巴少女，进行了一年半的强化训练，1965年，这名少女化名为“巴蒂”，同15名杀手一起偷偷潜入古巴，准备暗杀卡斯特罗。巴蒂打入古巴文艺界，并很快崭露头角。此人引起了卡斯特罗的注意，但与卡斯特罗见面时，这名女子被卡斯特罗的魅力所打动，迟迟没有下手。1966年1月1日古巴国庆前夕，巴蒂通过关系弄到了卡斯特罗参加国庆活动的具体安排，并与同伙商量在卡斯特罗同广场上的青年人握手交谈时，从四面八方用无声手枪将卡斯特罗击毙。但是，就在那天，卡斯特罗突然取消了与古巴青年近距离接触的计划。

此时发生了一件事，让中情局的“美人计”计划彻底破产。中情局为了打击古巴的经济支柱旅游业，策动间谍分子在哈瓦那的旅馆、酒店制造了一系列恐怖爆炸事件。在其中一次爆炸事件中，巴蒂的弟弟和妹妹被炸死。

巴蒂知道这是中情局所为，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她向古巴安全部门自首。按照巴蒂提供的情

况，古巴安全部门一举逮捕了这伙特工，很快又破获了另一个间谍网。美国中情局仰天长叹：“几年心血毁于一旦。”

但是，叹息不是战斗，中情局永远都不服输，还在继续寻找这样的女性充当杀手。

许多被中情局选中的女性杀手的命运都很悲惨。最惨的莫过于卡斯特罗过去的恋人玛丽塔。玛丽塔一家是移居美国的德国人。她的父亲是“柏林”号大型游船的船长，玛丽塔喜欢和她的父亲在大海上旅行。1959年的一天，玛丽塔父亲的游船在哈瓦那停留，随船旅行的玛丽塔因此邂逅了卡斯特罗。这一天卡斯特罗乘坐的游船刚好抛锚，恰巧“柏林”号正停在附近，于是卡斯特罗便登上了玛丽塔的“柏林”号。

“柏林”号的船长，也就是玛丽塔的父亲设宴招待了卡斯特罗。这样玛丽塔就获得了同卡斯特罗坐在一起的机会。一顿饭之后，玛丽塔已经深深爱上了卡斯特罗，而卡斯特罗也对同桌的这位漂亮女孩产生了好感。两人就这样坠入了情网。在离别时，卡斯特罗向她要了电话号码。在回去后，卡斯特罗一直没有忘记玛丽塔，于是他给她打了电话并邀请她来哈瓦那。玛

丽塔也时常想念着卡斯特罗，于是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很快，玛丽塔便被卡斯特罗安排的人员用专机接到了哈瓦那。玛丽塔在那里同卡斯特罗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此后，玛丽塔就经常去同卡斯特罗见面，并且有了他们的孩子，不过是一个早产儿。他们当时还打算结婚。

可是，就在玛丽塔回到美国后不久，中情局的人就找到她，给她看了一张死婴的照片，告诉她卡斯特罗已经杀死了她的儿子。震惊之中的玛丽塔随后被中情局进行了一系列的“洗脑”和培训，使她成了中情局的一名女特工。随后，中情局让玛丽塔带着对卡斯特的仇恨回到古巴，让她去执行暗杀卡斯特的计划。然而一见到卡斯特罗，玛丽塔心中所有的恨都离她而去，对卡斯特的爱立刻重新在心中汹涌。

谁知卡斯特罗见到昔日的情人玛丽塔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回来杀我的吧？如果你认为我应该被杀，那你就下手吧！”

玛丽塔没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这次暗杀行动当然没有成功。后来中情局狠狠地处罚了玛丽塔。若干年后，风烛残年的玛丽塔带着一身伤病，独自住在纽

约一所破旧不堪的房子中。

中情局还采取威逼和利诱手段从迈阿密等地搜罗了一大批古巴流亡人员，从中挑选杀手，最后，中情局竟然找到了卡斯特罗的保健医生米勒。米勒医生被选中后，就成了中情局的特工，不久后他奉命刺杀卡斯特罗。当时卡斯特罗正患眼疾。中情局专门研制了一种对付卡斯特罗的毒药。

作为卡斯特罗的医务人员，米勒下手的机会太多了。可是此人却被卡斯特罗的精神所打动，有很多次机会都没有去实施。最后在中情局的催促下，米勒终于狠下心来。可是就在施放毒药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毒药瓶打翻在地，强烈的毒性竟腐蚀了水泥地板。米勒被吓了个半死，最终，他向卡斯特罗自首。卡斯特罗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只是把他调到一家普通的医院继续当他的医生。

中情局开始对暗杀计划作出了调整。他们觉得应该从卡斯特罗的个人爱好和生活习惯上下手。于是他们开始对卡斯特罗的生活习惯进行情报搜集。卡斯特罗喜欢游泳，而且喜欢潜到水里。中情局就想出了一个阴谋，打算把刚刚研制出的一种真菌涂在一件潜水

服上，送给卡斯特罗。被这种真菌感染后皮肤会慢慢烂掉，最后引发多种疾病而导致死亡。但是该由谁去完成这项工作呢？

当时，美国正与古巴交涉“猪湾事件”中被古巴人俘虏的“古巴旅”成员。中情局把美国著名律师詹姆斯·多诺万派到了古巴去洽谈此事，然后把那件涂有真菌的潜水服作为礼物送给卡斯特罗，但中情局并没有告诉这位律师礼物里藏的秘密。这名律师见到一件这样陈旧的潜水服，觉得实在是拿不出手，就自作主张，自己掏腰包买了一套贵重的潜水服送给了卡斯特罗。结果中情局的计划再一次泡汤了。

针对卡斯特罗喜欢游泳的特点，中情局又想在海水中做文章。有一次，中情局买了大批加勒比海软体动物，打算从中找出一个够大的贝壳，装入足量的炸药，在壳身漆上鲜丽颜色放入水中，以便在卡斯特罗潜水时吸引他的注意。但是这一计划后来并没有实施。因为按照常识，在加勒比海这样的浅水区，既长不出这么大的软体动物，也不可能长得如此漂亮。

事实上，中情局有些暗杀卡斯特的计划很“直白”，手法更像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古巴黑帮。他们曾

计划过很多次就在大街上对卡斯特罗的车队进行疯狂扫射，还有的准备带着炸药冲向演讲的卡斯特罗。可惜的是，这些没有想象力的计划要么未执行，要么就是被古巴人提前发现了。

当年中情局为了消灭卡斯特罗，据说还打起了美国大作家海明威的主意。这个想法是在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玛丽·海明威去古巴后形成的。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自杀后，他的第四任妻子玛丽·海明威决定去一次古巴，因为海明威在古巴首都哈瓦那郊区有一家农场，玛丽·海明威要去那里整理海明威的遗物。中情局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人力物力，对玛丽·海明威的古巴之行进行跟踪监视。由于他们之前已经获知卡斯特罗是海明威忠实的读者，因此，估计卡斯特罗会很关注玛丽的到来。

果然，卡斯特罗为了表示关心特地送了玛丽·海明威一大篮水果，尤其让中情局惊讶的是，卡斯特罗还专程来到农场拜访。在同玛丽·海明威的见面中，卡斯特罗显示了对她的完全信任，没有带足够的安保人员。于是中情局认为这个女人将是暗杀卡斯特罗的一大法宝。随后中情局找到了玛丽，并开始策划利用海

明威的农场来刺杀卡斯特罗。

但是，中情局最终却放弃了这项计划，至于是什么原因，已经没有人知道了。

1971年，卡斯特罗出访智利又给了中情局下手的机会。中情局首先想到的是卡斯特罗乘坐的汽车。于是，两个中情局的特工在卡斯特罗出访的前一天晚上悄悄潜进卡斯特罗车队的车库。他们将事先准备好的炸弹安放在几辆汽车上后逃走。可是，当卡斯特罗的车队启动后直到访问结束，炸弹都没有爆炸。

原来卡斯特罗的保安人员通过内部得到消息，知道了中情局将要对卡斯特罗的汽车下手，于是对车的安全检查十分谨慎。特工们安装的炸弹早在第二天一清早就被排除了。

中情局还安排了两个化装成记者的特工，计划在卡斯特罗演讲时假扮成录像师而对他下毒手。然而，一个小小的意外使得行动没有开始就被迫结束。原来是一个特工突然肚子疼痛难忍，另一个又无法单独完成任务，于是计划只得取消。

后来卡斯特罗出访委内瑞拉，也险些遭到中情局的毒手。在出访前，卡斯特罗已经预料到中情局不会

放过这次机会，在出访前就命令手下同委内瑞拉方面联系，以保证他的安全。在卡斯特罗的保安人员和委内瑞拉人员的共同检查中，发现了大量的秘密武器被安置在会议室附近，而且在海岸发现了一艘小艇，并在小艇上抓到了四个人。在后来的审问中，四个人都承认是受中情局收买的一个反古巴集团组织成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暗杀卡斯特罗。

直到肯尼迪总统被谋杀以后，中情局才终止了对卡斯特罗的暗杀行动。1964年秋季，还有一个黑手党头目向中情局提出，只要给他一支狙击手用的高速步枪，他就可以帮他们消灭卡斯特罗。不过，中情局的特工这时却明确地告诉对方，中央情报局已不再插手谋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了，因为新总统约翰逊已经下了命令，不准中央情报局搞暗杀行动。

卡斯特罗一次又一次地逃脱了中情局的暗害，其中有的是因为中情局的失误，有的是因为卡斯特罗的机警，有的是因为运气。总之，卡斯特罗仍然活着，而且仍然是古巴的领导人。在中情局的眼里，卡斯特罗几乎成了一个永远都搞不死的神人。据古巴安全部门后来揭露说，自从古巴革命到卡斯特罗卸任，美国

中情局组织、指使或支持恐怖分子对卡斯特罗实施的谋杀行动竟然多达638次之多。卡斯特罗曾风趣地说道：“今天我还活着，但过错不在我，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

为了出中情局的丑，古巴人专门在首府哈瓦那建了一个博物馆，通过一系列道具、实物和文字、照片，向世人展出中情局是怎样妄图暗杀古巴领导人的，其中有很大部分都是中情局的失败记录。卡斯特罗本人说，他在各国领导人中是遭受暗杀威胁次数最多的一个，可以拿“冠军”。

“古巴导弹危机”

就在中情局热衷于暗杀卡斯特罗的时候，一个无意之中的发现让美国政府一下子慌作一团——1962年8月29日，中情局的一架U-2高空侦察机飞过古巴上空。当中情局把所拍的胶片连夜冲洗后，竟然在中情局内部轰动了。原来他们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了苏联最先进的武器“SA-2”地对空导弹。他们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了白宫。

肯尼迪已经被中情局折腾得够戗。“猪湾登陆”失

败后，肯尼迪又面临着“柏林危机”和东南亚的老挝政变。1962年6月，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高峰会议时狭路相逢，肯尼迪在会上的表现很是让人失望，他在赫鲁晓夫眼里简直还是个小孩子。也许赫鲁晓夫就是想找个机会，考验一下这位美国总统的应变能力，于是就把导弹运到美国的大门口古巴岛来了。

1962年5月，苏联第一批武器开始运往古巴，这些武器包括防御性与攻击性核弹、传统导弹、一批伊尔轰炸机，还有大批苏联军人。赫鲁晓夫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一是要保护古巴，以防美国入侵；二是苏联当时还从来没有在海外（包括东欧）部署过核弹，而美国则在苏联周边到处设有核弹基地或派核潜艇巡弋，因此苏联也希望能改变一下战略布局，在美国“后院”拉丁美洲放上两颗导弹试试。

当中情局把那些拍摄到的照片放到肯尼迪总统面前的时候，肯尼迪觉得这个赫鲁晓夫的确是胆大包天。照片清晰地显示出，苏联已经在古巴建立了24座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台和16座中远程弹道导弹发射台。肯尼迪总统问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古巴有多少苏联军

队？”

麦科恩说：“1万人。”

实际上，当时已经有4.2万苏军进驻古巴。

肯尼迪再问：“古巴有多少核弹？发射核弹的导弹有多先进？它要多久才能发射？”

麦科恩又说：“只知道30余枚（实际上有162枚）。不过我们不知道有多先进，也不知道他们的核弹头在哪儿。”

肯尼迪没有再问。肯尼迪把他的弟弟、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叫来。两人经过一番长谈之后，罗伯特说，应该由中情局去解决这件事。叫他们命令秘密行动处的负责人比斯尔马上派遣一批特工到古巴沿海，把苏联的船只炸碎。

肯尼迪立即否决了这一愚蠢的计划。最后他拿出了五种方案由中情局选择：一、侵略古巴；二、轰炸古巴；三、封锁古巴；四、要求联合国调解；五、不闻不问，任其发展。中情局选择的是“轰炸古巴”。但是肯尼迪认为应该以跟苏联谈判的方式，来代替中情局愚蠢的武力计划。

1962年10月22日晚上，肯尼迪告诉美国人民，苏

联在古巴部署攻击性核弹，美国绝不容忍这种挑衅。他下令封锁古巴，海军船舰对所有开往古巴的轮船实施“隔离检查”。肯尼迪的广播震撼全美，也震动了苏联。

10月24日，一批苏联船队驶近封锁线准备在古巴继续卸“货”，但发现美国封锁古巴的舰艇后，有的掉头回转，有的停在原地不动，没有任何要和美国的舰艇动武的迹象。消息传到白宫，国务卿腊斯克兴奋地对国家安全顾问说：“两个家伙比赛瞪眼珠子，结果那个家伙（赫鲁晓夫）先眨眼。”最后双方还是通过谈判的形式进行了妥协。

10月28日，苏联人宣布从古巴撤出攻击性武器，其中包括核弹、轰炸机和驻军；不过，他们也要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并且必须要将安装在土耳其的美国导弹撤除，因为那些导弹是针对苏联的。后来据赫鲁晓夫说，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曾强烈要求苏联对美发射核弹，但是当他仔细冷静下来后，发现核战一旦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就毅然决定撤出核弹。两年后，赫鲁晓夫被克格勃联合一批反对派给轰下了台，其“罪名”之一是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方法不当。

当年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还有一个人的介入，差一点在美苏之间引发了一场核战争。这个人就是苏联军事情报间谍奥莱格·潘科夫斯基。

潘科夫斯基当时在苏联混得不怎么如意，就开始与中情局取得联系，充当了美国间谍。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他和中情局的上司秘密约定了一个紧急情况下发送的“特殊信号”。如果是他预先得知苏联将向美国发射核导弹，那么他就在“倒数计秒”阶段通过无线电向中情局的上司发出这个“特殊信号”；中情局一旦收到这个事先约好的“特殊信号”，马上就会知道苏联将向美国发起核袭击，那么美国将会“先发制人”，在第一时间将部署在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所有的核导弹同时射向苏联，摧毁莫斯科和其他城市。

不料就在这时，奥莱格·潘科夫斯基被苏联克格勃抓获了。当时他以为自己很快就要被克格勃秘密处死，就产生了和苏联同归于尽的恶念，把向中情局发送“特殊信号”的方法告诉给了克格勃特工，但却隐瞒了这一“特殊信号”的真实含义，而是谎称这只是一种普通的联络方法。潘科夫斯基当时是企图借克格勃官员之手，将他来不及发送的“特殊信号”传递出去，从

而引发一场美苏之间的核战争。

可是让他没有料到的是，当抓获他的这一组克格勃特工将这一“紧急信号”试探着发送出去之后，另一组克格勃特工就迅速查到了信号的接收方。原来接收这个“紧急信号”的人，就是潜伏在莫斯科的中情局的一名联络官。克格勃特工马上顺藤摸瓜，将那个中情局的联络官逮捕了。

当时那名中情局联络官收到了由克格勃特工发出的“紧急信号”后，他还以为是潘科夫斯基发出去的，顿时大惊失色。因为这个信号的出现，将会把美国和苏联同时推入核战争的深渊，也将会给全世界带来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这名联络官还是犹豫了一下，没有在第一时间内，马上向美国总部发出“苏联核袭倒计时”的警告。

就在他犹豫的这一瞬间，冲进来的克格勃特工迅速将他逮捕了——如果这名中情局联络官及时向美国总部发出那个虚假的“核袭警报”，那么不仅古巴导弹危机可能是另一个结局，整个世界也将会是另一番景象。

这场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最终是皆大欢喜——从

1962年10月16日肯尼迪获悉古巴驻有苏联战略核弹，到10月28日古巴导弹危机落幕，前后总共经历了惊心动魄的13天的时间。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十三日》，详细地叙述了这场危机的始末。

古巴，这个美国的近邻，从此一直是中情局咬牙切齿的对象，也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因为他们对古巴实施的每项任务都以失败而告终。而在这场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中情局也一直没有拿出什么“高见”——要么是无法拿出主意，要么出的就是馊主意，结果就像“猪湾登陆”事件一样，再一次让肯尼迪总统大失所望。所以，直到肯尼迪被谋杀之前，中情局都没有得到他的信任。这也是后来肯尼迪被谋杀后，中情局被认为是谋杀总统的凶手的原因之一。

第十章 英雄末路，切·格瓦拉丛林殒命

才华横溢、充满叛逆精神的切·格瓦拉是卡斯特罗最得力的助手，古巴新政权的三号人物，曾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接见；他辞去了在古巴的一切党政职务到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却成了中情局追捕的对象，最后惨遭杀害；他牺牲后成了一种精神的象征，被称为“红色罗宾汉”，逝世四十年后，其遗物被高价拍卖，格瓦拉的头像几乎与《蒙娜丽莎》齐名。

出生在阿根廷的“红色罗宾汉”

20世纪60年代前期，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公开断言，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会在整个拉丁

美洲传播开来。当年，卡斯特罗秘密走访了拉美一些国家和非洲刚果（金）的地下游击队组织，选择“突破口”，策动“古巴式的革命”。

面对卡斯特的这种行为，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的赫尔姆斯任命菲茨杰拉德为中情局的“拉美处”处长，以加强中情局对卡斯特的遏制。这一计划包括通过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努力将古巴排除在美洲国家组织之外，利用国际开发总署的经济发展联盟制裁古巴，训练和装备一些拉美国家的反暴动部队（即特种部队），加强中情局在整个南美洲的情报活动，对拉美国家的反共政权给予政治的和准军事上的支持等。

中情局在拉美地区频频出击，扼杀革命势力，颠覆一些主权国家，卡斯特的战友切·格瓦拉就在此时遭到了美国中情局特工和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围剿，年仅39岁就牺牲了。

切·格瓦拉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阿根廷的医师、作家、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1934年，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的一个贵族家庭。他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欢西班牙文学巨

著《堂·吉诃德》。当兄弟姐妹都嘲笑堂·吉诃德的荒唐滑稽时，他却坚持认为堂·吉诃德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他以堂·吉诃德自比，梦想着做挑战风车和雄狮的英雄。由于出生在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层家庭，又受到身为阿根廷共产党员的姨父母的影响，格瓦拉从小就对政治特别感兴趣。

格瓦拉出生不久就患上了哮喘病，但是他从不安分，率性和冒险的家族传统在他身上得到最充分的发扬。他喜欢骑着没有马鞍的马在田野里狂奔，虽然经常咳嗽得喘不过气来。格瓦拉十分热爱体育运动，最感兴趣的是橄榄球运动。他自命为“勇士”，在球场上经常横冲直撞，头破血流也不在乎，只是在激烈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停下来，捂着郁闷的胸口，向守在球场边的父亲求救：“爸爸，快给我打一针吧。”哮喘使他一生饱受折磨，在后来的游击生涯中要遭受比常人更大的痛苦，也使他的性格中养成了一种忧郁的特质，很早就开始思考关于生和死的问题。

1948年，格瓦拉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医学院学习，并于1953年3月顺利完成了学业。大学时代，格瓦拉才华横溢，热情、叛逆，身材挺拔，面容

俊朗，很快就与当地的名门闺秀奇奇娜相恋了。

1951年，格瓦拉在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建议下，休学一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过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最后到达委内瑞拉。一路走去，他看到了穷人的苦难，眼界被现实的残酷大大开阔，他开始思考这个世界的不公。他们带着同情给沿途的麻风病人看病，也接受这些人最无私的帮助。

这次拉美之行，让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定型。他开始感觉到拉美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拉美之行使格瓦拉的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已下定决心和人民共患难……我将用我的全部热血，去实现无产者全力追求的未来。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离家8个月后，格瓦拉于1952年9月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

大学毕业后，格瓦拉告别母亲，同时还舍弃了他和奇奇娜美丽的恋情，告别了一生中最爱的姑娘，踏上了他人生的征途。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一个战士出发了！”——他高喊着跳上鸣笛的火车。

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吸引了格瓦拉。

格瓦拉到达危地马拉时是1953年12月24日。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

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马拉军人组成的雇佣军，阿本斯的政权很快被推翻，阿马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被杀害。格瓦拉在危地马拉亲眼目睹了美国中央情报

局在那里发动的政变，从此，更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目前拉美种种困难的唯一途径。

格瓦拉成了阿本斯的支持者。当阿本斯逃亡后，格瓦拉跟随他一起在墨西哥寻求政治避难。在那里，他见到了劳尔·卡斯特罗，后来，劳尔又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格瓦拉很快就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职业革命家。他在总结危地马拉的教训时说，拉丁美洲的一切改革不论怎样合理，只要“侵犯”了美国的利益，都将遭到美国的镇压。他认为，阿本斯垮台的原因是他未能武装农民。格瓦拉在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我看到了哈科博·阿本斯的垮台》中概括了革命组织的策略。他论证说，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必须建立一支忠于政府而不是独立于政府的军队，他们必须摒弃温情主义，因为面对美国的敌对势力，温情主义是自取灭亡。7年后，当中情局在古巴企图故伎重施时，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兄弟毫不客气地挫败了他们的阴谋。

当时卡斯特罗兄弟正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进行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了

卡斯特罗领导的军事组织。在战斗中，格瓦拉的超人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的冷酷无情得到了卡斯特罗的赏识，他很快成了卡斯特罗最得力、最信赖的助手。

古巴新政府成立后，格瓦拉被授予“古巴公民”的身份，同时还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清除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后来有资料表明格瓦拉当时处死了156名战犯，但也有人认为处死的人数可能在600人以上。

1959年10月，并不懂经济学的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国家银行总裁，开始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闻名于西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



深受人民爱戴的格瓦拉（左）

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到了周末，格瓦拉

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到哈瓦那的工厂或者是到郊区的甘蔗园劳动。有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金）等8个非洲国家和中国。在中国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就辞去了自己的职务。1965年4月1日，格瓦拉乘飞机离开了古巴；4月23日，格瓦拉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

一些资料指出，在离开古巴之前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格瓦拉说服了卡斯特罗支持自己的这次行动。到了刚果以后，他得到了当时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协助。

从此，格瓦拉开始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的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

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此时格瓦拉已经37岁了，而且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经验（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战斗经验大都来自古巴革命。格瓦拉十分推崇中国的毛泽东和越南的武元甲等人关于游击战方面的军事理论。

在此期间，格瓦拉的行踪已经进入了中情局的视野。中情局的特工和刚果政府军一道，开始全程监控格瓦拉领导的部队的对外联络，以便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截断其补给线。

格瓦拉当时希望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的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但事后格瓦拉发现，由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最后，导致了那次起义的失败。

他在非洲丛林中吃尽了苦头。在度过了七个月的艰难日子之后，身体虚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幸存的古巴战友离开了刚果，来到了拉美的另一个国家玻利维亚。

假护照被跟踪追击的中情局特工识破

1966年11月初，切·格瓦拉乔装成乌拉圭商人，来到玻利维亚的尼阿卡瓦苏地区。当时格瓦拉并不知道，自己的假护照已经被跟踪追击的中情局特工识破了。中情局为了不打草惊蛇，并没有马上对格瓦拉采取行动。

来到玻利维亚后，格瓦拉带领游击队员在事先买下的农场里安营扎寨，进行训练，同时在附近山里挖掘岩洞，储藏各种给养。后来，当地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者把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和他的战友按照古巴革命的方式，改编了当地的游击队，成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即“玻利维亚全国解放军”，同玻利维亚政府的正规军作战。

玻利维亚总统勒内·巴利恩托斯得到这个消息后，扬言要杀死格瓦拉，并下令玻利维亚的政府军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

格瓦拉认为，只要能打败玻利维亚那支装备极差的政府军队就大功告成了，却没有想到美国中情局会介入。

当美国政府得知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息，马上派出了中情局的特工人员进入玻利维

亚，援助玻利维亚政府围剿格瓦拉的革命武装。

当时，美国还从陆军的特种部队中派出了一部分人，到玻利维亚的军队中担任军事顾问，帮助训练玻利维亚的军队，并且训练了一支应付密林作战的特殊别动队。

当时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游击队的处境相当艰难，他既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也得不到玻利维亚共产党的协助。因为中情局的特工进入玻利维亚后，抓捕了一大批认为同格瓦拉的游击队有关系的农民和工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追问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的下落；同时，格瓦拉的游击队里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报机又坏了，那台用来对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进行解码的录音机也在一次渡河中丢失了，这样就让他无法同哈瓦那取得联系，他完全地被隔离了，到了孤立无援的地步，格瓦拉的处境十分危险。

1967年2月1日，格瓦拉率领27名游击队员（包括15名古巴人和12名玻利维亚人）向尼阿卡瓦苏和格兰德河以北地区长途进军，侦察当地的敌情，同当地农民取得联系，选择地点发展势力；同时，格瓦拉还准备与玻利维亚的城市游击队取得联系，在此之前他曾

进行过多次联系，但是直到格瓦拉被捕时也没有获得成功。

格瓦拉率领他的游击队员在格兰德河以北的地区坚持游击斗争，发动当地的农民起来革命。不幸的是，有一个叫奥诺拉多·罗哈斯的农民出卖了他们，他向当地政府报告了格瓦拉游击队的行踪。政府军和中情局的特工立即跟踪围剿，在转移时许多游击队员牺牲了。更糟糕的是，格拉瓦带领游击队于3月下旬返回尼阿卡瓦苏营地时，一些先遣队的人员居然违背游击战的原则，来到玻利维亚石油公司的雇员巴尔加斯的家里，并且随身带着枪支，谎称自己是墨西哥地质工作者。这些人一离开，巴尔加斯就沿路跟踪他们，并向当局告发了，使他们的行踪又暴露在政府军和中情局特工的监视之中。

格瓦拉带着队伍回到营地后，发现有两个人开小差逃跑了。其中有一个就是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奸细。前不久，格瓦拉招募了八名新队员，这两个人都是那次招募来的，没想到竟然招来了一名奸细。

在以后的几天里，玻利维亚当局极精确地测定了游击队的营地位置，围剿的军队有目的地步步进逼，

侦察飞机整天在他们所在的地区上空盘旋。山下通往城镇的道路被封锁了，食物供应也被切断了。为了粉碎政府军的包围，格瓦拉率领游击队在尼阿卡瓦苏的峡谷中伏击了一支前来搜索的政府军，打死了7人，俘虏7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少校和一个上尉。然而，在政府军重兵压境、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格瓦拉只好率领游击队撤离农场营地，朝东北方向转移到古铁雷斯村，4月10日在伊里皮蒂附近同政府军打了一次漂亮的遭遇战。在这次战斗中，他们打死了政府军10人，俘虏了30人。这一仗使玻利维亚政府大大震惊，随即宣布在东南地区实行戒严，并禁止玻利维亚共产党和左派组织的一切活动。

这时，中情局的特工也趁机出动，紧紧地盯住了格瓦拉的行踪。

其实早在半年之前，中情局就在秘密调查格瓦拉的行踪。到了1967年3月，中情局已经正式确认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活动范围，并且呈报了白宫。当时，约翰逊总统亲自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就此事进行研究。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逊将军和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玻特将军为代表的军方主张立即组建特种

部队司令部，出动美军进入玻利维亚，以期一举消灭游击队。上任不满一年的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却认为，目前格瓦拉的势力并不大，不需动用美国正规军，中情局完全可以对付格瓦拉游击队，以秘密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

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正在日益高涨，如果再向玻利维亚出兵，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势必波及到越南战争的进行。于是，约翰逊总统决定由中情局统筹指挥对格瓦拉的秘密行动；同时，他还决定，驻巴拿马运河区的美军南方司令部的军事情报机构及其特种机动部队归中情局辖制，一切行动听从赫尔姆斯的调遣。

得到总统的授权之后，中情局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由美军南方司令部情报机构负责人、空军准将威廉·斯克尔担任组长，他的副手就是特种部队的雷蒙德·韦伯中校，具体行动由中情局老资格反游击战专家、绰号“老头子”的拉尔夫·谢尔顿少校直接指挥。中情局随即派出了16名特工人员和游击战专家，并从韦伯中校的特种部队战斗团中选拔了50名“绿色贝雷帽”作为骨干，乘飞机抵达玻利维亚，与中情局驻拉

巴斯情报站的特工会合。

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武官爱德华·福克斯上校的真实身份，就是中情局驻拉巴斯情报站站长。正是他在1964年的军事政变中，把玻利维亚空军司令巴里恩托斯中将扶上了总统的宝座；还有现任玻利维亚陆军司令的奥万多将军也是福克斯上校扶植起来的。因此，当时玻利维亚的军权几乎完全在中情局的控制之中。

“老头子”谢尔顿带领全班人马飞抵玻利维亚后，立即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郊区的一座兵营中驻扎下来，然后在这里训练了120名玻利维亚特种部队人员，以此作为围剿游击队的骨干力量，并且对玻利维亚军官兵进行反游击战的强化训练，直接指挥他们作战。

1967年4月12日，中情局在圣克鲁斯以北荒废的拉埃斯佩兰萨糖厂建立反游击战训练中心，着手组建和训练玻利维亚突击营。他们主要是从驻卡米里的第4师抽调了大批兵员，后来又从驻圣克鲁斯的第8师选拔了部分人马，还抽调了一些空军和伞兵，前后共计2000多人，由20多名受中情局指挥的“绿色贝雷帽”和少数古巴流亡者充当管理者和军事教官，对他们进行

分期轮训，每期训练约600名官兵。训练结束后，中情局把格瓦拉及其游击队员的照片和画像分发给每一个突击队的官兵，同时还为玻利维亚的突击营配备了侦察机、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开始对格瓦拉的游击队进行围剿。当时中情局反游击战的专家们制定了一个“外松内紧”的方案，将包围圈逐步缩小。

4月中旬，中情局的包围圈已经开始形成。格瓦拉为了突出重围，就将游击队分成两部分。他自己率领一支由50多人组成的队伍作为先行部队，在前面开道探路；由古巴人华金率领的伤病员和20人的队伍作为后卫队紧随其后，争取机会冲出中情局的包围。但是直到全军覆没，这两支队伍也没有重聚。

随着开小差者越来越多，游击队的处境越来越险恶。8月上旬，政府军找到三个岩洞，缴获了游击队储存在里面的全部医药、食品、武器和电台。更严重的是，和城市游击队进行联络的照片和文件被缴获了，其中还有一张洛约拉·古斯曼的照片。洛约拉·古斯曼当时是城市游击队的司令。政府军获得这一条重要的线索后，立即跟踪追击，把洛约拉·古斯曼逮捕了。玻利维亚政府军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把城市游击队及其

支持者一网打尽了。这时，格瓦拉的游击队完全被孤立隔绝了，尽管他们东拼西杀，屡屡重创敌人，但包围圈已越来越小了。

8月30日，华金率领的后卫部队来到奥诺拉多的农场。他们被伪装成农民的士兵发现了。奥诺拉多告诉赶到农场的政府军，游击队要他带路，在附近渡过格兰德河。政府军一听到这个消息，随即在河边设下了埋伏。傍晚5点，正当华金一行十来人肩负背包在河中泅渡时，岸上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射击。他们当时正在没胸口的河水中，根本没有还击的机会。结果不到几分钟，华金的这支部队就全军覆灭了。后来他们的尸体被运到巴列格兰德，作为军方的胜利公开展出。华金队伍覆没后的第二天，格瓦拉才率领他的队伍赶到这里。但是，一切都过去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格瓦拉就带着他的队伍在这一带活动，他们没有根据地，也没有群众的支持，更没有外界的援助，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意志同强大的政府军和中情局指挥的特种部队进行周旋。9月26日，他们在伊格拉斯地区遭到政府军的袭击，伤亡惨重。此时，由中情局训练的600名玻利维亚突击队员遍布于

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对游击队进行追捕。他们抓获了两名前游击队员，从他们的口供中得知格瓦拉残部急于突围。这时，他们完全可以肯定，格瓦拉就在他们的重重包围之中，逃脱的机会非常渺茫。

格瓦拉率领他的队伍在崇山峻岭中坚持了最后的十天。10月7日深夜，格瓦拉率队在尤罗峡谷谷底悄悄行进。他们正要从这里突围出去，结果被一个农民发现了。这支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扛着步枪和背包的队伍，就是格瓦拉的游击队。于是，这个并不了解格瓦拉的游击队战斗和存在的意义的农民，立即让他的儿子向附近的驻军报告了。驻军司令普拉多上尉马上组织人马封锁了尤罗峡谷出口，抢占出口处的高地，设好埋伏，并且将此事报告了中情局的军事顾问。

在得到玻利维亚军方的情报后，中情局的军事顾问们亲自赶到尤罗峡谷口现场指挥。

“不要开枪，我是切·格瓦拉”

1967年10月8日的早上，格瓦拉的这支17个人的游击队躲藏在树木繁茂的尤罗峡谷。他们在空旷的高处看见追捕自己的军队正在移动，知道自己已被四面

包围了。此时摆在格瓦拉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撤回峡谷深处，要么就地隐蔽，坚持到天黑或许能脱离重围。格瓦拉选择了后者。

下午1点多钟的时候，战斗打响了，数百倍于游击队的玻利维亚政府军向他们发起进攻。格瓦拉知道，事已至此，就地隐蔽已经不可能，只有撤离，而唯一可能逃出的路线就在通往格兰德河的峡谷。于是格瓦拉选定了6名游击队员担任火力掩护，自己率领其他的人迅速滑下峡谷直扑格兰德河边。但是他们不知道包围圈已经合拢，而且他们恰恰冲进守候在峡谷出口处的敌人伏击圈，倒是那些志愿担任火力掩护危险任务的6名游击队员逃了出来。

格瓦拉一行已经陷入层层包围之中。此时，中情局的军事顾问们正在现场督战，指挥玻利维亚政府军的进攻；另一伙中情局官员则乘坐着直升机，并带着两架战斗机在战场上空盘旋，向地面报告格瓦拉的行踪，随时准备支援政府军的进攻。

格瓦拉的队伍很快就被分割开来。不久，格瓦拉的手枪被打坏了，他的小腿又中了一枪，鲜血直流。他的战友威利一手提枪，一手拖着格瓦拉拼命向山上

爬。刚爬到山腰时，埋伏在林木中的政府军就大声高喊着：“放下武器，举起手来！”

格瓦拉和威利都没有开枪，在沉默片刻后，格瓦拉大声说：“不要开枪，我是切·格瓦拉。对你们来说，活着的我比死去的我更值钱。”

威利对围上来的士兵们大声说：“这是格瓦拉司令，你们要尊重他！”

也许是出于“尊重”，威利被全身捆绑在担架上，由士兵抬着，格瓦拉则被两名士兵搀着，踉踉跄跄地走下山去。

在普拉多上尉的亲自监督下，格瓦拉和他的战友被拉上了直升机，押解到附近村庄拉伊格拉的一所学校，他们被分别关押在两间教室里。当天晚上普拉多上尉曾经想审讯格瓦拉，但格瓦拉拒绝回答问题。最不知趣的是前线突击营指挥官塞尔尼奇上校，他简直乐昏了头，一路上坐在汽车里喝得酩酊大醉。他首先来到隔壁房间，把身材弱小的威利毒打了一顿，然后摇摇晃晃地来到格瓦拉面前。格瓦拉突然猛扑上来，一记重重的耳光，将他打倒在地。塞尔尼奇恼羞成怒，爬起来疯狂地殴打格瓦拉。

格瓦拉虽然被抓获了，但是却让玻利维亚当局遇到了一个难题——因为在玻利维亚的刑法中已经取消了死刑，而且在整个玻利维亚，当时无法找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来关押这样的要犯，于是只好把格瓦拉暂时关押在这所小学的教室里，等待美国中情局来决定他的命运。

抓捕格瓦拉的报告传到了中情局总部后，菲力克斯·罗德里格斯跳了起来。一切终于要结束了。从中央情报局的兰利总部来到玻利维亚南部的山峡，所有长时间的周密的策划与部署，都是为了找到他——那个被人们称做“红色罗宾汉”的格瓦拉。

第二天，一架直升机停在格兰德河附近的一片旷野上，中情局顾问菲力克斯·罗德里格斯和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军区司令官约圭恩·詹蒂诺上校跳下飞机，急匆匆地向拉伊格拉村走去。他们被带到了那所破旧的小学校，见到了格瓦拉。看守的士兵向他们报告说，从昨天格瓦拉被押到这里后，已经有好几位长官来过这里了。

1967年10月9日上午，在南美刺目的阳光下，两个全副武装的政府军士兵把格瓦拉从教室里押了出

来，让他在一堵破旧的墙边站好。格瓦拉身材高大，双肩很疲惫地垂下去，穿一件已经褪了色的绿色旧衣衫，上面还有点点暗红色的痕迹。他的头发乱蓬蓬的像一堆乱草，脸庞瘦削，胡须浓密，脸色苍白发黄，眼窝深深地陷了进去。

罗德里格斯第一眼就确认了是格瓦拉，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红色罗宾汉”，那个“共产主义的堂·吉珂德”。他叫随行人员给格瓦拉拍了照片，并把他身上所有的文件都没收了，然后把他带回了教室。奥万多将军等几名军界头目在塞尔尼奇、塞诺特等人的陪同下走进教室，对格瓦拉进行了审讯。

中情局特工冈萨雷斯问格瓦拉：“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奥万多敦促冈萨雷斯：“再问他，还想些什么？”

格瓦拉厉声说道：“我在想，你们将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被我们的人枪毙！对你们，统统要枪毙！”

奥万多第一个从教室里退出来，其他军官和中情局的特工们也纷纷跟着来到另一间屋子里。奥万多下令，在他离去后，立即处决格瓦拉及其战友。于是一

份对格瓦拉立即执行死刑的命令，很快就由玻利维亚总统巴利恩托斯将军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奥万多将军共同签署完成了。

然而，由谁来对格瓦拉执行死刑却成了一个問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些士兵们都不敢执行这个命令。最后他们不得不通过抽签的方式来确定究竟由谁来动手。他们找来一把麦秸秆，由塞尔尼奇上校把这些麦秸秆掐成一段段的，集中放在他的手里，谁抽到了那根最长的麦秸秆，就由谁动手。最后中签的是马里奥·德兰少尉，因为他抽到了一截最长的麦秸秆。

马里奥·德兰少尉看着手中的那截麦秸秆，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他无论如何都不敢向格瓦拉开枪。这时，塞尔尼奇上校只好把中情局的特别赏金——厚厚的一叠美元交给马里奥·德兰。然而，马里奥把美元揣进口袋后，却仍然拉不开枪栓。于是，按照中情局顾问们的建议，他们又赏给马里奥少尉几大杯上等白兰地酒。

在酒精的作用下，马里奥才同一伙人到了隔壁的教室，向格瓦拉的战友威利开了枪，把他给枪毙了。隔壁的枪声响过后，一个军官就对格瓦拉说：“伙计，

一会儿就轮到你了，还有什么话需要留下吗？”

格瓦拉看了他一眼，似乎还笑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说：“我知道你们将要枪毙我，我本来就不应该让你们抓活的。请转告菲德尔，这次失败并非意味着革命的终结，革命将会在其他地方取得胜利。请转告阿莱达（格瓦拉夫人），重新结婚，好好生活，让孩子们读书学习。最后，请告诉你们的士兵把枪瞄准一点。”

醉醺醺的马里奥·德兰少尉在人们的簇拥下走进教室，对格瓦拉执行死刑来了。他奉命不得向格瓦拉的脑袋开枪，他端起半自动步枪，不敢看格瓦拉的脸，几乎是闭着眼睛对着格瓦拉的胸部以下一连射出了9发子弹，格瓦拉的腹部几乎完全被打烂了。由于没有伤及头部和心脏，格瓦拉在极端痛苦中喘息和呻吟了很长时间。最后，另一名烂醉如泥的军官用手枪向格瓦拉的左肋补射一枪，格瓦拉才终于死去。整个行刑过程由7名中情局特工和“绿色贝雷帽”在现场监督执行。

尽管格瓦拉的游击队曾经抓获过近百名敌军官兵，但从未处决过任何一名俘虏（经过教育后都释放了）。可是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当局却极其凶残地杀害每一名游击队战士。

当天下午，塞诺特上校回到巴列格兰德，向新闻界宣布了格瓦拉死亡的消息。当晚5点，直升机把格瓦拉的尸体从拉伊格拉运来，放在巴列格兰德医院洗衣房的水泥洗衣台上，在这里指挥调度的是中情局特工爱德华多·冈萨雷斯。

根据中情局特别行动部的指令，刽子手们锯下格瓦拉的头颅和双手，装入容器中，用防腐液浸泡保存。然后把格瓦拉的尸首用直升机转运到一个秘密地方，拒绝透露他的遗骸是否已被埋葬或火化。当时他们还给格瓦拉拍了照片。

玻利维亚当局在1967年10月11日正式宣布了格瓦拉在10月9日被杀。10月15日，卡斯特罗宣告古巴全国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大大地加速了当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思想对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

不久，中情局将格瓦拉的头颅和日记原件取走了。

格瓦拉牺牲后，中情局通过传播媒介，编造了所谓塔尼亚与格瓦拉的浪漫史，并且对格瓦拉的牺牲编造了一个曲折的故事。他们宣称塔尼亚是苏联克格勃

特工，她奉命参加游击队，成了格瓦拉形影不离的情妇。后来由于格瓦拉同苏联的分歧日深，克格勃指令她向玻利维亚当局出卖了格瓦拉游击队，塔尼亚本人则秘密返回苏联。

其实这完全是中情局惯用的宣传伎俩。真实的情况是，那个出生在阿根廷的德国共产党人塔尼亚投身古巴革命后，奉命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以历史学家和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不久在上层社会中站稳了脚跟。但塔尼亚是个热血青年，她不甘在安逸中生活，向往参加战斗，于是她在1967年3月中旬来到格瓦拉的游击队营地。对此，格瓦拉曾经责备她不该放弃秘密工作岗位。此时，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正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可能，因此格瓦拉就作出了一个决定，一旦情况允许，塔尼亚和另一名法国记者德布雷必须离开游击队。然而，陷入重围的游击队最终未能将他俩送出去。

塔尼亚来到游击队不久，因患重病而留在华金支队，并在格兰德河的那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了。塔尼亚身中数弹，遗体被冲到河滩西面三公里处。当时玻利维亚当局还在巴列格兰德公开展出了这些游击队员的

遗体，后来将他们合埋在一处，但是塔尼亚作为游击队唯一的女性，她的尸体被埋葬在另一处。华金支队当年从4月份开始，就与格瓦拉支队分头行动。两支部队分别以后就失去了联络，双方根本不知道彼此的音讯。也是从那个时间开始，塔尼亚再也没有见到格瓦拉。

当时有一名法国记者德布雷曾一直同格瓦拉的游击队患难与共，被俘后经法国总统戴高乐出面斡旋，才得以回到祖国。后来德布雷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有力地驳斥了中情局对格瓦拉的无耻诽谤，就连那4名从游击队中开小差逃跑了的玻利维亚人也不得不承认：“格瓦拉品格高尚，绝没有这类风流勾当。”

永远的格瓦拉

自称为“世界革命者”的格瓦拉影响遍及全球，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西欧，一些青年把他视为具有浪漫色彩的侠客式人物罗宾汉，他成了造反者和理想主义的象征。

1968年在法国巴黎爆发的学生运动中，格瓦拉成

了法国学生的偶像。他们高举着格瓦拉的巨幅画像，高唱《马赛曲》，在巴黎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三十多年以来，许多左翼激进组织和游击队一直把格瓦拉奉为楷模，试图以暴力和恐怖手段“争取独立自由，讨还公正平等”。然而，当年的格瓦拉绝不是滥杀无辜的恐怖主义者，更不是劫持人质的绑匪。

作为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格瓦拉不仅在古巴，而且在全世界受到许许多多人的崇拜。

1970年，玻利维亚前内政部长阿格达斯出于对格瓦拉的崇拜，冒着极大的危险，将格瓦拉的日记复制照片及其双手和面模先后送到哈瓦那，交给古巴政府，他自己也举家移居古巴。

古巴政府将格瓦拉的日记作为革命教材大量印刷，免费分发给人们，将格瓦拉的双手妥善保存在一个玻璃容器中，在每年的10月8日移放在民族英雄马蒂的纪念碑下，供人们瞻仰。

三十多年过去了，不论是在世界的东方或者是西方，格瓦拉的名字一直是那样的响亮，那样的激动人心，他那英俊的形象和潇洒的气质一直栩栩如生——历史在告诉人们：格瓦拉不死！

关于格瓦拉的故事永远是个传奇——直到40年后的2007年，中情局前特工菲利克斯·罗德里格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向世人披露当年格瓦拉受害的内幕。罗德里格斯说，格瓦拉被枪决后，尸体被摆放在一块破木板上向人展示。

在中情局前特工罗德里格斯眼中，这位著名的拉美游击战士与传说中的英雄形象相去甚远，“这个男人看上去更像个乞丐，他身上的衣服几乎全被丛林撕破了”。当39岁的格瓦拉一瘸一拐地走到他面前时，“他连双靴子都没有，鞋子上仅仅挂着几块破皮。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看，我为他感到难过”。罗德里格斯说。

美国当时曾极力反对玻利维亚立即处死格瓦拉，而是希望把他运到巴拿马做进一步审讯，但是，这一要求最后遭到了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否决。

罗德里格斯对采访他的记者神秘地说：“我们当时和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约定好了代号，其中，500代表切·格瓦拉，600代表死亡，700代表活着。就在我准备对他进行审讯时，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一位负责人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500—600’。这一暗语表

示，格瓦拉必须被立即处死。由于电话中有噪音，我又让他再重复了一遍，这才确信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意思是要立即杀死格瓦拉。”

接到那个电话后，罗德里格斯随即走进格瓦拉被关押的房间，站在他面前对他说：“非常对不起，格瓦拉，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了，但这是玻利维亚最高军事当局的命令。”格瓦拉立即明白了这话意味着什么，于是他就对罗德里格斯说：“这样更好，我早就应该在战斗中死去。”

罗德里格斯说，有人宣称当时曾剪下格瓦拉的一些头发，并准备以700万美元的高价进行拍卖，他目前尚不能肯定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因为他当时已经离开了现场。

当时玻利维亚政府担心卡斯特罗会不承认格瓦拉已死，但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否认。罗德里格斯说：“恰恰相反，他建造了一个切·格瓦拉的传奇。”



一代人的精神偶像格瓦拉

在纪念切·格瓦拉遇害40周年的日子里，81岁的卡斯特罗还在报纸上撰文纪念当年的这位战友。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带着尊敬和感激之情，在这位40年

前倒下的独一无二的战士面前，低下我的头。”

切·格瓦拉的形象如今在世界广为流传，他的照片已经被印在明信片、打火机、文化衫上，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他的形象似乎无处不在。但是，曾经为这名革命先驱拍摄照片的两名古巴摄影师却说，格瓦拉生前其实不喜欢被拍照。诺瓦尔在古巴一个纪念格瓦拉摄影展上说，他们通常搞突然袭击才能拍到格瓦拉。有一次要给格瓦拉拍照，可是格瓦拉却厉声喊道：“好了，够了，别再拍我了，我不是关键人物。”

格瓦拉有一张头戴贝雷帽的照片，成了他一个标准的形象。照片上他一脸浓密的胡须和一头卷曲的长发，将一双眼睛映衬得格外有神，深邃的目光凝视着远方。这张头像照片流传最广，是古巴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在1960年抓拍的。原照片没有被报社采用，科尔达把剪裁过的照片一直挂在自己的摄影室内，当做一种艺术作品来欣赏。1967年，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为出版格瓦拉传记寻找一张封面照片，就看中了这张照片，于是科尔达就免费送给他两张照片。没有想到六个月以后，格瓦拉就在玻利维亚丛林被捕遇害了。费尔特里内利当时发行了大量印有格瓦拉头

像的海报，用的就是这张照片，从而大力推广了格瓦拉的形象，扩大了他在全球的影响。

后来，爱尔兰艺术家吉姆·菲茨帕特里克根据阿尔贝托·科尔达抓拍的这张照片，画了一幅格瓦拉的肖像画，很快就风靡全球。画面上的切·格瓦拉头戴贝雷帽，披散卷发，神色坚定，深邃的双眼凝视远方。这幅红白黑三色画像如今是流行的“格瓦拉文化”的标志之一，以其为主题的海报、T恤衫等也随处可见。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这幅家喻户晓的画像里，竟然有一个隐藏了近40年的秘密。在切·格瓦拉逝世4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吉姆·菲茨帕特里克向英国《苏格兰人报》透露，他在画中切·格瓦拉的肩膀处隐藏有他的姓氏首字母“F”，作为个性化标记。这位爱尔兰艺术家说：“我希望这幅画广为流传，也希望在里面留一点自己的痕迹。”

如今，格瓦拉的遗体同其他6个一同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同志的遗体一道，被安放在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广场特别的陵墓之中。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难30周年），古巴国务委员会发出通知，确定当月11日至17日为国丧日，并确定将格瓦拉的遗骨以国葬的

规格安葬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市。

当年，古巴政府为格瓦拉举行了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安葬仪式。1997年10月10日古共“五大”闭幕后，悼念活动相继展开。14日，格瓦拉遗骨移送圣克拉拉市。圣市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灵车经过之处撒满鲜花，场面十分感人。17日上午9时，安葬仪式开始。格瓦拉的遗骨被安放在格瓦拉广场中，同时被安葬的还有6名游击队员的遗骨。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颂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

葬礼结束时，卡斯特罗亲自点燃了格瓦拉灵前的长明灯。

如今，每年依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圣克拉拉瞻仰格瓦拉的陵墓。2004年大约就有20万人参观了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万是外国人。这里还有一座纪念馆，里面陈列了格瓦拉当年写给卡斯特的道别信的原稿。格瓦拉在信中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许格瓦拉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

格瓦拉的支持者认为，格瓦拉被证明是继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第十一章 祸及亚洲，东亚中东倒戈相向

中情局在日本的“烧钱”行动一共持续了15年之久，每月数额高达数百万元；万隆会议让苏加诺一夜之间成了第三世界的一面旗帜，中情局异想天开弄一部色情片张冠李戴，让《良辰美景》中的“苏加诺”和一个个女人努力做爱；苏伊士运河危机谍影重重，后患无穷。

“杜鲁门主义”成就了岸信介政府

杜鲁门时代推出遏制苏联独霸全球的“遏制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元开路的。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咨文，要求国会授权援助土耳其和希腊。到1948年6月底，美国共向土耳其和希腊提

供了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对抗苏联的“扩张”。杜鲁门声称：“这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这就是典型的“杜鲁门主义”。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四点行动方针”，其中的第四点就是针对亚非拉国家的，被称为“四点计划”。其内容表面上是要向不发达地区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以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实际上是企图将亚洲和非洲广大的“中间地带”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寻找新的市场，防止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当时这些所谓的“中间地带”，最典型的就是指地处亚洲的日本。

不过在战后最初几年里，中情局并没有注意到亚洲问题，也很少注意日本问题，当时他们主要是注意欧洲和苏联。后来由于苏联的势力发生了膨胀，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又把美国人打败之后，中情局才突然发现亚洲出了问题。如果再去那里“烧钱”，艾森豪威尔对中国的那个“C”形战略包围圈就无法形成了。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瞄向了日本。中情局认为，日本当时正是“有奶便是娘”的关键时刻，如果让它倒进

了苏联的怀抱，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让它和美国走到一起来了，就等于是美国人在亚洲做了一个“眼”，那么称霸世界的这盘棋就走活了。所以中情局和五角大楼先是花费了近1300万美元，帮助儿玉誉义夫的日本黑社会组织走私战略物资钨，资助战后日本保守派政客的兴起，并以各种方式资助安排前战犯岸信介出任首相。

当年在日本，这个儿玉誉义夫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二战期间，儿玉誉义夫在日本不仅是一名身份显赫的黑社会头目，而且还是日本自民党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儿玉誉义夫成了“黑龙会”老大头山满的得力助手，后因涉嫌一桩政治谋杀案而锒铛入狱。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时任日本陆军大将的土肥原贤二把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让他专门来对付中国人。土肥原贤二当时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是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也是建立伪“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儿玉誉义夫出狱后，土肥原贤二就让他到中国负责搜刮奇珍异宝，他本人从中获得了多达13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由于在搜刮中国珍宝方面的功劳，儿玉誉义夫很快被提升为日本海军少将。

美军占领日本后，为了维护右翼政权的统治，麦克阿瑟曾建立数个秘密基金会，而这些秘密基金会的主要经费来源便是儿玉誉义夫。尽管他因在二战中参与暗杀、绑架、贩毒、勒索而被指控为战争罪犯，并在巢鸭监狱中关了两年，但在1948年，这个罪恶多端的黑社会头子却奇迹般地获释。这是因为儿玉誉义夫答应为美国情报部门提供一亿美元的活动经费，来换取自己的自由，免受任何有关战争犯罪的起诉。儿玉誉义夫果然在东京审判时逍遥法外。出狱后他自立门户，成了日本最有名的黑社会组织“关东会”的老大。不仅如此，作为日本最强硬的反共分子，儿玉誉义夫后来还摇身一变，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

儿玉誉义夫虽然是中情局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得到中情局信任。原因是后来他走私美国人需要的制造导弹的战略金属钨金给中情局，竟然从中赚了一大笔钱。中情局很恼火，觉得儿玉誉义夫只认钱不认人，连中情局的钱也敢赚。于是中情局最后放弃了他。

放弃了儿玉誉义夫之后，中情局又盯上了另外一

个人，他就是在日本大名鼎鼎的岸信介。

岸信介在日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他原姓佐藤，后成为岸姓养子。其亲弟佐藤荣作曾为日本首相。后来其外孙安倍晋三又是日本第90代首相。他自己在二战期间是日本的内阁重臣。1941年东条英机上台后，岸信介在日本内阁任商工大臣。当年日本曾对美国下达“宣战诏书”，岸信介是“宣战诏书”的签署人之一，曾在东条英机的对美“宣战诏书”上“副署”。在中国期间，岸信介生活放荡，每晚饮酒嫖妓，性情古怪，喜怒无常，且刚愎自用，让人难以捉摸，故又被人称为“满洲之妖”。

日本投降后，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判了无期徒刑，在东京巢鸭监狱关了三年。1948年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决时，他却被美国人释放。出狱以后，他主动联系中情局，感谢他们的再生之恩，并当即表态说，他的策略是破坏执政的“自由党”，在他的领导下组成新“自由民主党”。中情局觉得他是一个可造就的人才，就决定在他身上花点本钱。1955年8月，中情局告诉他，只要他的“自由民主党”能帮美国“反共”，他就会得到美国人的大力支持。

岸信介当然知道“大力支持”是什么意思。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后经济复苏时期，正需要大量的金钱作支撑。于是他当时就向中情局发誓，一旦他能成为日本领导人，会配合美国的需要来变更外交政策，同时还可以保留驻日美军的军事基地，并且允许美军将核武器引入日本。于是中情局就开始在岸信介身上大把大把地“烧钱”。

中情局通过可信任的美国商人当中间人，把大量的美元交给岸信介，来支撑他的政治活动。1957年2月，岸信介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日本首相。

任首相期间，岸信介修改了吉田茂执政时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加速日本的扩军步伐；与美国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改变了鸠山一郎、石桥两届内阁重视对华关系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敌视中国的活动。

岸信介上台四个月后就跑到美国，在与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他希望中情局可以把资金援助固定来源，不要总是偷偷摸摸地给钱。也就是说，应将钱定期打到他的账户上。他甚至警告中情局说：“万一日本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亚洲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不

效尤于后。”

中情局当然明白这样的道理，所以就找了很多美国大公司，定期给岸信介提供美元援助。

中情局给日本人的“烧钱”行动一共持续了15年之久，每月的数额高达数百万元。当然，中情局在收买岸信介这个首相的同时，还收买其他人，贺屋兴就是其中一个。

二战期间，贺屋兴曾担任日本内阁财政大臣，二战结束后也被判处了无期徒刑，1955年被保释出狱，成了岸信介最亲信的顾问。1958年中情局找到了他，从此，他就成了中情局在日本的最大特工。后来，中情局又用钱把他推到了后来的佐藤荣作首相的高参位置上。

当年，贺屋兴曾受到过中情局局长杜勒斯的亲自接见。在结束会见后，中情局的备忘录中曾这样写道：“人人都同意，在反颠覆工作中，中情局和日本合作最为理想，而这也是关系中情局重大利益的课题之一。”

20世纪50年代末，中情局驻东京情报站站长霍勒斯·费尔曼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占领期间管理过

日本，占领结束后，我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来管理。麦克阿瑟将军有他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方式。”

霍勒斯·费尔曼的话有两层意思：第一，美国人永远都在管理日本，无论占领期间还是占领结束后；第二，中情局管理日本有自己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就是“烧钱”。日本战后体制可以说是中情局通过金钱一手创造的，而且是一个最为成功的例子。

通过美元搞定日本以后，美国在东南亚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印度尼西亚。

色情片《良辰美景》中的“苏加诺”

二战以前，印度尼西亚一直是荷兰人的殖民地，到1949年底才赢得自由和独立。当时，美国是印尼的新领袖苏加诺总统的支持者，积极支持他所领导的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运动。1953年，尼克松副总统访问了印尼，他回国后曾在国会上说，苏加诺“极受人民爱戴，绝对不是共产党，而且他无疑是美国手上的一张王牌”。

可是，才过了两年，苏加诺的行为就让美国人无法忍受了。

1955年，亚非国家首脑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第一次把西方国家的首脑排除在外。这是一次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印尼总统苏加诺一夜之间变成了第三世界的一面旗帜。然而，在华盛顿的眼里，苏加诺无疑属于站错队的人。当时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局长卡明甚至向白宫各个部门发出一连串的备忘录，提醒白宫要对苏加诺进行特别的“关注”。

然而，就在此前后，苏加诺还做了三件使中情局非常不安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苏加诺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尽管当时苏加诺也访问了美国，而且对美国政府的模式大加赞扬，但是回国后，他并没有以此作为他治理印度尼西亚的模式；

第二件事是印尼从东欧国家购买了武器。苏加诺本来是想跟美国做这笔生意的，可是中情局在仔细分析后认为这笔生意不能做，结果就没有做成；

第三件事是苏加诺上台后，他将荷兰人的大量私有财产收归国有。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情局在印尼的

情报显示，印尼可能有200亿桶尚未开发的海底石油资源，而苏加诺又不愿意与美国人友好往来，所以，中情局自然而然地就把苏加诺列为他们关注的头等目标了。于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情局就迫不及待地想把“危地马拉政变”的形式再次演绎一番，试图推翻苏加诺政权。

当时中情局之所以对印尼如此“关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印尼共产党在印尼独立以后，不但由地下党变成了公开的政党，而且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印尼共产党对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内则致力于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大力发展党的组织。1955年在苏加诺的建议下，印度尼西亚将在当年的9月29日举行独立后的首次国会大选。

中情局局长杜勒斯要求“在事态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采取措施”。中情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立即给了苏加诺的竞争对手——穆斯林派的玛斯友美党100万美元，希望该党能在大选中胜出。可惜的是，玛斯友美党却在这次大选中败北，中情局一无所获。更让中情局担忧的是，印尼共产党在那次大选中居然平

地崛起，大获全胜，获得了四分之一的选票，一跃成为印尼四大政党之一。为此，苏加诺提出，共产党员应占内阁成员的四分之一。

苏加诺后来又实行“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大思潮合作”的“纳沙贡”，这足以让中情局相信，只要苏加诺继续治理印尼，那么印尼这个远东地区除中国以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将会成为苏联集团的一分子。

中情局对印尼的“秘密行动”是在1957年8月1日开始的。当时的负责人就是中情局新上任的远东部长厄尔默。中情局一下子给他拨了700万美元，让他在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和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的军事基地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成立指挥站。这个指挥站里有很多中情局的高手，负责联络苏门答腊岛上的反抗苏加诺的军官，还包括苏拉威西岛上若干企图争夺权力的指挥官，同时又在太平洋的许多地方开辟了便于执行轰炸和运输任务的飞机跑道。当然，这只是硬件准备。

厄尔默还有一个“软计划”，那就是利用舆论工具来败坏苏加诺的声誉。苏加诺当时已经58岁了，但精力充沛，虽然已经有了四位夫人，可还是经常传出一些绯闻。于是，中情局就决定利用这些绯闻做一做文

章，达到彻底破坏苏加诺形象的目的。

中情局准备弄一部色情影片，用张冠李戴的方法搞臭苏加诺。中情局很快就得到了一部现成的A片，内容是一名墨西哥男子与一位妓女的故事。但负责此事的特工反复看了很多遍后，却觉得不满意，因为他认为那部A片里的男女主角的表演实在太疯狂了，这样的影片即使上映了，也不会有几个人相信里面那个疯狂的男子就是苏加诺。

一计不成，又生二计。经过几天的商量，中情局决定亲自动手拍摄一部影片。中情局动用了洛杉矶警察局的力量，在茫茫人海中找了一个与苏加诺相似的黑皮肤、秃脑袋的男人。为了让观众以为这就是苏加诺，他们又制作了一具苏加诺的假面具，让那个男子在拍片时一直戴在脸上。这部精心策划的A片终于拍摄完工了，它的片名就叫《良辰美景》，影片中全是“苏加诺”和一个又一个的女人努力做爱的镜头。

但是，中情局的这番努力完全是枉费心机，因为根据伊斯兰教义，每一个穆斯林男子都可以有四个妻子。所以这部关于“苏加诺”和几个女人做爱的A片根本不能算是他“越轨”的证据，自然也败坏不了他的名

声。

厄尔默见折腾了半天丝毫没有效果，就只好开始对印尼实施他的“秘密行动”。

厄尔默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集中了一大批印尼人、菲律宾人、中国台湾人、美国人和其他“幸运战士”，还有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在1958年1月8日从苏比克湾运到了苏门答腊岛，与当地反对苏加诺的军队会合。中情局又派出B-26型轰炸机执行轰炸和袭扰任务，以支援叛军。

2月10日，中情局又“烧”了一大笔钱给苏门答腊岛的叛军，让他们成立了新电台，通过电台威胁苏加诺，他们将在五天之内成立新政府，但是苏加诺没有回音。据印尼政府说，苏加诺正在访问日本。而中情局的情报则说，这位印尼的领导人正在日本澡堂内纵情声色。五天后，叛军真的宣告成立了新政府。

据中情局情报说，苏加诺立即飞回印尼，命令仍然效忠于他的军队对叛军进行军事打击。叛军立即被打败了。

4月底，中情局派出了特工艾伦·波普驾驶一架B-26轰炸机去支援已经陷入困境的叛军。艾伦·波普娴熟地

轰炸着目标，第一次行动就炸死了700多个印尼人。但他已不能挽救败局。就在他轰炸不久后，苏加诺的军队就把苏门答腊的叛军主力给剿灭了。5名中情局官员急忙开着吉普车逃命。他们一路穿越丛林，在油料快要耗尽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偷了点吃的东西，好不容易才用无线电和中情局联系上了。

5月15日，中情局再次派出B-26轰炸机进行轰炸，印尼人又被炸死炸伤无数，但是三天后，当艾伦·波普再次在天空上向下扔炸弹的时候，他的飞机却被印尼军用高射炮打了下来。艾伦·波普只好跳伞逃命，结果被印尼军人捉住了。

他身上的证件证明了他的美国中情局人员身份，于是苏加诺对美国进行强烈的谴责，并向国际社会寻求道义上的支持，这让美国政府很狼狈。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只好向行动小组下达命令，“我们必须尽快脱身”。

5月19日，杜勒斯分别发出快电通知中情局工作人员立即撤退，不要再给当地的叛军一分钱，并且关闭所有的军火供应线，销毁一切证据，撤回国内。中情局对印尼的第一次“秘密行动”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没有了中情局的支持，1958年6月底，印尼叛军的军事政变被苏加诺彻底粉碎了。

这一年的12月16日，艾森豪威尔的情报顾问委员会提出，应该马上改组中情局。因为从印尼问题上可以看出，中情局搞这样的“秘密行动”根本不在行，只会是赔了美元又丢人。同时，他们还认为，中情局“没有能力就自身的情报信息与业务作客观的评估”，他们只知道用钱去打水漂。

艾森豪威尔当时并不是没有这个想法。在他连任以后，他就一直想改变中情局的管理方式。但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艾伦·杜勒斯，也想不到还有谁可以接手中情局。近几年来，杜勒斯已经对秘密行动情有独钟，早已不把心思放在向总统提供情报这个核心任务上了。当艾森豪威尔把情报顾问委员会的想法告诉了杜勒斯后，杜勒斯自然极力地阻止总统这样做。他把印尼这一次秘密行动的失败归咎到威斯纳的身上。因为当时一直是威斯纳在负责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最后，杜勒斯请艾森豪威尔放心，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悲剧发生，因为他正在为秘密行动处物色新的负责人。

中情局又向印尼伸出黑手

1959年1月1日，比斯尔接替了威斯纳，成为中情局秘密行动处新的负责人。1965年，中情局又向印尼伸出了黑手。

自从苏加诺执政以后，军队在印尼已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1957年，在印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纳苏蒂安将军的敦促下，苏加诺颁布了《军管法》，宣布全国处于军法管制之下。《军管法》赋予了军队极大的权力，使军队有权采取它们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可以制定与公共秩序和国内安全有关的法令和规定，如果这些法令和规定与原有法律相矛盾，则以《军管法》为依据。当时纳苏蒂安公开宣称：“我和苏加诺就是内阁。”他下令将企业置于军队的直接掌管之下，委派了4000名中上层军官担任被接管企业的经理或监督者。军人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与此同时，印尼国内还建立了“战时掌权者当局”。它上至中央，下到村社，与文官体制并行。军人集团借此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国家各级行政部门。到

了1958年，印尼全国约百分之八十的行政事务都由军人掌管。

当时掌握陆军大权的纳苏蒂安公开表示，“印尼在世界两大阵营中，站在美国一边”。然而，印尼总统苏加诺所倡导的却是“纳沙贡”思想，即“民族主义者、宗教集团和共产党人组成的人民联合阵线的思想”。虽然在60年代初，军队和各派政治团体都表示拥护，但实际上它已被架空。于是在印尼国内存在两大阵线，一个是共产党和左翼民族主义者，包括一些左派军官组成的阵线；另一个是以陆军为首的武装部队及其他右翼人士组成的阵线。而这时，以纳苏蒂安为首的右翼陆军将领阵线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加诺在国际上风云一时。当时他曾作为东道主，召开了著名的亚非国家首脑参加的万隆会议；先后热情接待了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来访；为了西伊里安领土之争不惜与马来西亚、英国及荷兰顶牛；同时他周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既接受苏联的援助，又收纳美国的贷款。

然而，就在苏加诺为了西伊里安岛的归属问题，摆开了与马来西亚对抗的架势时，印尼共产党主席艾

地向苏加诺提出两项改革军队体制的建议，一是在陆军内部推行政治委员制度，二是建立一支与海、陆、空、警四支队伍并列的第五种武装力量——工农民兵武装队伍。苏加诺接受了艾地的建议，开始推行改革措施，但是却遭到包括陆军参谋长雅尼在内的一批陆军将领的反对。苏加诺十分生气，打算改组陆军上层领导。陆军上层将领们得知此事后，就一边阳奉阴违，一边在准备策划秘密行动。

当时，美英等西方国家对苏加诺总统与印尼共产党的密切关系深感不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直言不讳地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策略与在柏林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采取的策略相类似，他们正逐渐地、分阶段地取得更大的权力。如果苏加诺仍在台上，印尼的国内局势和对外关系会变得更糟。”

当时，腊斯克要求澳大利亚方面作出努力，阻止印尼共产党向东南亚其他地区扩展，找出一个“解决印尼问题的方案”。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也利用对印尼提供军事援助的机会，加紧在印尼陆军中物色和收买反共将领。

由于苏加诺明确要求贯彻“纳沙贡”思想，这就不

能不与反共亲美的右翼陆军军官发生矛盾。苏加诺为了削弱陆军这支政治力量的基础，5月初，下令把刚刚建立起来的国防学院置于文官控制之下。几天后，他又提出一项几乎要把陆军这支反共政治力量摧毁的建议：在部队成立“纳沙贡”顾问委员会，印尼共产党将同其他政党一道派代表参加。顾问委员会成员充当从最高军事顾问到军分区各级军事指挥官的顾问。

苏加诺指示下达后，陆军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表面上贯彻苏加诺的要求，暗地里想方设法抵制苏加诺“对陆军的摧残”。

1965年3月，英国驻印尼大使安德鲁·吉尔克里斯特爵士给英国外交部写了一封信，报告了他与美国驻印尼大使，还有印尼军方领导人商定的颠覆印尼政府的计划。

当时任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和印尼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苏班德里约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命人去核实。随即他被告知，该信件的字体和格式同8个月前火烧英国使馆时拿到的其他文件一样。于是，苏班德里约就对这个信件真实性深信不疑，并于1965年5月26日将信件交给了苏加诺。与此同时，苏班德里约还从印

尼情报机构参谋长苏达尔托准将那里获悉，陆军内部成立了一个“将领委员会”，他们反对苏加诺的现行政策，准备发动政变。政变的具体日期为10月5日。因为那天是印尼“武装部队日”，陆军可以此为借口，把大批部队调入雅加达来参加游行。

苏加诺读过这些报告后，认为报告内容是可信的。尔后，苏加诺对信件和“将领委员会”问题采取公开处理的方式。5月下旬，他召集各军总司令、国防安全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部长雅尼讨论这些文件。雅尼否认了信中的说法，他告诉苏加诺，陆军将领中，只有巴尔曼和苏根德罗与英国和美国保持密切联系，但他们是奉命执行任务。对“将领委员会”的问题，雅尼避而不答，他反过来指责印尼共产党有夺权企图。最后，雅尼将军宽慰苏加诺总统说，他将回去调查，然后向苏加诺汇报。

两天后，苏加诺又在各军区司令参加的会议上，提出了信件问题。几星期后，他授权苏班德里约选择能引起国际注目的时机，宣布这一消息，并作为美英阴谋反对印尼的证据。苏班德里约原计划在阿尔及尔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宣布此事，由于这次会议推迟举

行，于是，他改在开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此事。

就在政变传闻迭起之际，苏加诺于8月3日突然晕倒，卧病在床，这使印尼本来已经紧张的局势更加紧张起来。军界领导人都在密切注意苏加诺病情的发展，并积极准备，应付苏加诺死后的不测事件。苏加诺本人也为病情焦虑，急电召回正在苏联和中国访问的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两人进行了促膝长谈。两天后，印尼共产党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谈到苏加诺健康不佳，一旦逝世，陆军的“将领委员会”势必凭借武力接管政权。同时会议也分析到，以纳苏蒂安和雅尼为首的陆军将领与空军军官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会议决定：“开展一场运动来挫败‘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不过，政治局会议并没有具体讨论印尼共产党将要采取何种军事行动。

印尼共产党一直信奉“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因此自己并没有掌握可以开展军事行动的力量。艾地曾暗中建立了一个叫做“秘密局”的特别机构，由夏姆具体指挥，夏姆仅对艾地本人负责。艾地建立“秘密局”的初衷是，万一印尼需要动用武装力量时，将由“秘密

局”承担这方面的任务。“秘密局”的工作也有一定成效，他们不但掌握了一部分陆军中的连、营级军官，而且还将空军司令达尼将军和西婆罗洲陆军战略后备指挥部的苏巴尔佐将军等人争取了过来。

不久，艾地和苏班德里约又获得一条消息，“将领委员会”于9月21日在军事法律学院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在10月5日前发动军事政变，组成新内阁，由纳苏蒂安将军任总理，雅尼将军任第一副总理。在此紧急情况下，艾地命令夏姆立刻设计出一个对付“将领委员会”的行动方案。嗣后，艾地将此事通知了苏加诺。苏加诺听后，心情显得很沉重，但是他却没有发表意见。

1965年9月30日深夜，十几辆载着全副武装士兵的客车和汽车从哈利姆空军基地附近的一个叫鳄鱼洞的偏僻山村出发，在陆军中校翁东为首的一批年轻军官带领下，向雅加达陆军高级将领住宅区急驰而去。车停后，他们分别用一个排的兵力去捉拿巴尔曼、苏托约、哈尔约诺、苏普拉多和班查伊丹将军，对国防安全部长纳苏蒂安和陆军部长雅尼则派了一个连的特种部队士兵去突袭。但是，总部设在雅加达的战略后

备司令部的司令苏哈托却没有被列入要抓捕的名单。

官兵们迅速向以上预定目标扑去，其中有3个排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睡意蒙眬的将军们还没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被反绑双手，蒙上眼睛推上了卡车。哈尔约诺发现有人闯入他的住宅时，便掏出手枪拒捕，被当场击毙。班查伊丹也因拒捕被枪杀。

当士兵冲入雅尼的住宅时，雅尼知道情况不妙，他立即奔出房间，锁上玻璃门，一个怒气冲冲的士兵用自动步枪从背后向他扫射，雅尼应声倒地。他被拖上卡车时已奄奄一息了。

纳苏蒂安算是最幸运了。当士兵们刚要跨入他的私宅大门时，纳苏蒂安的夫人被响声惊醒，她猜到有麻烦了。她迅速锁上通往卧室的边门，推醒自己的丈夫，帮助他翻过与伊拉克大使馆官邸相连接的围墙逃走了。纳苏蒂安的副官比雷登中尉的身材和外表酷似纳苏蒂安，于是他穿上将军服被当做纳苏蒂安蒙上眼睛反绑起来。不到半个小时，士兵们就将三具将领的尸体、三名活捉的将领和那个假纳苏蒂安押回了鳄鱼洞，接着这4人被全部处死，7具尸体被扔入一口废井中——这就是让印尼人震惊的“9·30事件”。

10月1日清晨，印度尼西亚广播电台在“早间新闻”节目中宣读了翁东中校的公告。公告说：“‘将领委员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暗中进行颠覆印尼政府的活动。他们企图在苏加诺总统因病逝世后夺取政权，但是阴谋破产了。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又策划在今年10月5日前发动政变。我们领导的这场‘9·30运动’是陆军内部的运动，是针对那些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苏加诺总统心怀叵测的陆军‘将领委员会’的。”

当天中午12点，印尼“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接管国家一切权力，并发表了第一号法令。翁东任“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巴尔佐、空军上校赫鲁、海军上校苏纳尔迪和高级警官安瓦斯任副主席。其余40名委员包括空军司令达尼、空军上校拉蒂夫和少校苏约诺。从组成人员来看，“革命委员会”完全是一个经过精心安排的统一战线组织，它包括印尼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陆、海、空、警四大军种的代表以及政府官员。其中许多成员对该机构毫不了解，事先也没有得到通知，也没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在广播中听到自己的名字，感到十分惊愕。“9·30事件”只经历了几小时，其后雅加达一如常态，人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

营业。

“9·30事件”领导人翁东是苏加诺的总统卫队营营长，他具有激进思想，当时被认为是陆军中一位前途无量的军官。1947年苏哈托结婚时，他是婚礼上的宾客；1962年苏哈托任解放西伊里安战区司令时，他是其手下的一名军官，在战斗中他战功显赫，随即晋升为少校，并任营长。

10月2日，印尼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赞扬“9·30运动”是爱国和革命的行动（后来，这成为陆军镇压共产党的证据之一）。

印尼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司令兼马来西亚曼达拉警戒战区司令部副司令苏哈托将军是从广播中听到“9·30事件”的。他在得知纳苏蒂安死里逃生，苏加诺不愿与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走而返回总统府后，发表声明，指责翁东的行动是“反革命”行动，并声明由他掌握陆军领导权，在当天出动坦克和装甲部队，还调集了伞兵突击队镇压“9·30运动”。

10月1日黄昏，苏哈托的军队占领了整个雅加达市区，控制了局势。当天下午，空军司令达尼将军发表声明支持“9·30运动”，表示坚决保卫苏加诺总统，反对

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颠覆活动。

10月2日，苏哈托命令伞兵部队、坦克和装甲部队包围了哈利姆空军基地。面对这一形势，苏加诺在茂物行宫召开武装部队司令会议，任命普拉诺托将军为陆军“代理司令”，委任苏哈托负责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全，并呼吁避免进一步流血。这一来，空军部队就渐渐瓦解了。

10月4日，“纳苏蒂安—苏哈托”军人集团声称，“9·30运动”是印尼共产党一手策划的，于是指使军队和暴徒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大屠杀。按照流传的一般说法，约有50万印尼共产党人和群众遇难。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也于同年遇难。政变领导人翁东身着便装，乘坐公共汽车准备外逃时，被两名士兵认出，遂遭逮捕，于次年3月被处决。到1967年3月，印尼共产党政治局5名常委中的4位、政治局10名正式委员中的6位都被杀害。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讯社在1966年10月11日报道说，关于在这次清洗中，死亡50万人的传闻是错误的，实际数字是16万人左右。司法部门调查估计是12万人，而来自各地区和乡村的估计数字约20万人。。

1966年3月11日，苏加诺在军队的威逼下，被迫签署命令，承认苏哈托的权威。同一天，军队接管印尼中央情报局总部，并宣布解散印尼共产党，“纳沙贡”到此寿终正寝。苏班德里约被捕后，先是判处死刑，由于他“认罪态度较好”，而改判20年徒刑。

1968年3月，苏哈托废黜苏加诺，担任印尼总统。在一幅新闻照片上苏加诺垂头丧气地站在话筒前宣读声明，站在一旁身着军服的苏哈托面带嘲笑冷冷地斜视着他。



苏哈托

在印尼和西方国家中，关于推翻苏加诺政权的一般性解释是，印尼共产党在苏加诺支持下，准备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这一计划后来被印尼右翼军方领导

人的部队镇压了。

然而，当今有不少东、西方历史学家以确凿的事实证明，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了印尼的军事政变。最明显的是，印尼政变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挑动和唆使下，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和无辜华侨。尽管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至今仍回避印尼“9·30事件”，但对于这一指控始终不敢否认。

中情局官员拉尔夫·麦吉曾经参与过中情局1965年在印尼的秘密活动。他声称，中情局制造了导致印尼大屠杀的气氛，手段高超，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以至中情局打算把这套经验介绍到整个第三世界中去。

麦吉在一部被中央情报局删除部分内容后才允许公开发表的回忆录《弥天大谎》中写道：

1965年，一批年轻的印尼军官企图推翻得到美国支持的军人统治集团，并且谋杀了7名高级将领中的6人。中央情报局便利用这个机会来推翻苏加诺，消灭共产党。由于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字被删除）行动，估计死亡人数达50万至100多万。最初，印尼军队把印尼共产党抛在

一边，因为共产党没有参与政变的阴谋（8句话被删除）。结果，印尼军方领导人（7个字被删除）发动了一场血腥的镇压运动。在激发起公众对印尼共产党的怨恨时，宣传报道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遇难将军的碎尸照片出现在报刊和电视上，还附带种种耸人听闻的荒谬传说，讲照片上的印尼将军被印尼女共产党挖下眼珠，阉割了。蓄意编造故事是为了激起对共产党的公愤，为大屠杀做准备。中央情报局特别自豪所取得的成功（1个字被删除），还推荐这一事件作为未来秘密行动的样板（半句话被删除）。

8年以后，发生在智利的右翼军人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政变，正是按照中情局取名为“雅加达方案”的蓝本秘密进行的。

在“9·30事件”中，中情局驻雅加达情报站站长休·托瓦是一个关键人物，他负责建立中央情报局与印度尼西亚军方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回报，印尼军方向美国提供了有关苏联装备的各方面情报及样品。

美驻印尼大使亨利·洛奇也是个重要人物。他曾在韩国、越南任职，李承晚、吴庭艳的垮台都与他有关。现在苏加诺也垮了。难怪舆论界称他为“颠覆专家”。

据1996年英国《观察家报》报道，当时披露的秘密文件表明，英国在印尼“9·30事件”中支持军人集团屠杀了50万印尼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秘密文件披露了英国在“政治支持”、“隐蔽行动”和“提供武器”三个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文件表明，由于英国是美国的盟友，而英国在婆罗洲问题上支持马来西亚，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向印尼军人集团提供武器时，事先取得了英国的同意。美国的秘密文件表明，11月初，印尼的一些将军要求美国提供装备，中情局将贴上“药品”标签的军用物资秘密运往印尼。

从上述事实中不难看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机关当年在印尼“9·30事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西方盟国澳大利亚的谍报机关也是“功不可没”，积极配合。

“地下大使”飞往沙特阿拉伯

1956年10月23日，在普通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平常的日子，可是在离巴黎不远的赛夫勒，一个秘密的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会议的参与者是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经过秘密的商定后，制定了一项行动方案：由以色列进攻埃及的西奈半岛，然后英法两国以“保护运河”为借口，重新夺取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是一条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的国际航道。运河北起地中海沿岸的塞得港，南到红海之滨的陶菲克港，全长172.5公里，河面宽180到200米，可通行6.5万吨的巨轮。运河的通航大大缩短了从欧洲到印度洋和太平洋西岸各国的航程。与这条航道相比，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各国的印度洋之间的航程可缩短5500到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各国到印度洋缩短了8000到10000公里，对于黑海沿岸各国来说，则缩短了12000公里。

英、法和以色列之所以要对苏伊士运河打主意，正是看中了它巨大的经济价值和战略地位。运河是中

东石油的大动脉，欧美石油需求量的80%必须经过苏伊士运河这条便捷的航道来运输。仅在1955年一年之内，大小油船共运载了6700万吨的石油经苏伊士运河运往欧洲各国。因此，运河的主权国埃及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张王牌。

对于这样重要的苏伊士运河，美国当然不会放任别人来瓜分，而介入埃及来争夺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重任便自然地落在了中情局的肩上。英美两国在对待埃及的问题上一向存在分歧。历史上，埃及是英国的殖民地，苏伊士运河就是在那个时期开挖通航的。作为老牌的大英帝国，虽然已经衰败，但它一心要维护其在埃及的殖民利益。美国是后来居上者，国力雄厚，财大气粗，不希望英国在中东和埃及吃独食。总的说来，美国不支持英、法等国继续保持其殖民统治，但是作为自己的西方盟国，美国时时注意协调自己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以符合对苏冷战的全局。

实际上，中情局早在1952年就奉命采取了行动。中情局内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工作，把夺取苏伊士运河的关键放在了正在领导埃及革命的纳赛尔身上。当时中情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纳赛尔的革命得到了埃

及人民的支持，并将最后取得胜利。“革命成功后的埃及将是对美国友好的埃及”，到那时苏伊士运河将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的。因此，中情局决定全力支持纳赛尔取得成功。

英国并不喜欢纳赛尔，他们千方百计想把他赶下台，恢复法鲁克王朝在埃及的统治。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在没有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帮助的情况下，英国也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尤其要保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1953年，英国情报机关招募了纳赛尔的空军情报部门头目穆罕默德·卡利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先后付给卡利尔总共15万英镑。但是英国没有料到卡利尔对埃及政府忠心耿耿，他向纳赛尔告了密。后来，纳赛尔揭穿了英国要在埃及复辟法鲁克王朝的阴谋。

英国曾向美国提出共同策划秘密行动，在埃及再来一个宫廷政变，推翻纳赛尔，另换傀儡上台。而美国方面却持谨慎态度。他们对英国人说：“从原则上说，我们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不相信，在目前的条件下，赶走纳赛尔会取得成功，况且我们还没有找到愿意担此重任、而且又有把握取得成功的宫廷

政变组织者。你们可能会找到敢冒此风险的埃及人，但你们衡量过他的能力吗？”

中情局拒绝了与英国情报机关的合作。当时杜勒斯兄弟所考虑的不仅是美国在中东的商业利益，而且还有政治影响。在他们看来，政治因素更重要。他们的目的是想把中东的民族主义者拉到反苏反共的阵营中来。当然，英美两国在中东地区还有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布赖米绿洲的归属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例。

鉴于由美国财团组成的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拥有巨额投资，而且沙特阿拉伯人十分倾向于美国人，沙特国王和费萨尔王储向美国提出以石油为代价，请美国人帮助沙特阿拉伯获得对布赖米绿洲的主权。布赖米绿洲一直由被英国控制下的阿曼和阿布扎比占有，沙特阿拉伯对此垂涎三尺，想把它弄到手。

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承担了这项任务。1954年，他委派曾在伊朗的“阿贾克斯”行动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金·罗斯福作为他的“地下大使”飞往沙特阿拉伯。金·罗斯福与沙特国王商量后，准备在布赖米绿洲先搞一次公民选举，以作为日后夺取绿洲的借口。为了避免在选

举中节外生枝，金·罗斯福送给当地酋长一辆带有空调设备的高级轿车，想以此来讨好对方，但是没有成功。

经过深思熟虑，中情局决定重金贿赂对方。于是，金·罗斯福又向这位酋长建议，只要对方肯把布赖米绿洲割让给沙特阿拉伯，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开放，不让英国控制的伊拉克石油公司在那里钻井抽油，他愿意支付给对方价值9000万美元的黄金，这批黄金将由中央情报局、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共同支付。老奸巨猾的酋长哪肯轻信金·罗斯福的许诺，他要金·罗斯福写下书面材料作为凭证，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于是，酋长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英国人。

英国人一听恼羞成怒，就将此事向日内瓦的国际法庭提出起诉。中情局为了掩盖事情真相，便设法贿赂日内瓦国际法庭的仲裁人，但是这番运作徒劳无功。最后英国人赢了这场官司，布赖米绿洲仍归阿曼和阿布扎比所有。

随后，中情局派金·罗斯福秘密和纳赛尔联系。正如中情局所料，纳赛尔自知现在的实力想要成功是十

分困难的，因此，他对中情局的示好表示出了热情。双方一拍即合。一见面，纳赛尔就向金·罗斯福表示，目前，革命者在武器和装备上遇到了问题。金·罗斯福当即表示，中情局会说服白宫尽快向纳赛尔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

在中情局的大力支持下，1952年7月23日，年轻的埃及军官纳赛尔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英国卵翼下的法鲁克国王的统治。1953年6月18日，纳赛尔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了埃及共和国。中情局特地训练了特工，保护埃及新任总统纳赛尔的安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任职后，首次国外旅行就拜访了纳赛尔。

1955年12月，英美两国出于各自的目的，正式向纳赛尔提出建造阿斯旺水坝。英国希望借此机会诱使纳赛尔采取亲西方的政策，以确保其油船在苏伊士运河上畅通无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想借此机会拉拢纳赛尔和新兴的民族主义者，两人都把这当做加强世界反苏力量的一项长远计划。

1956年4月，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成立了一个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联盟，而艾森豪威尔鉴于

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则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以色列。当年5月，纳赛尔断绝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样纳赛尔就得罪了华盛顿的反共政客们，于是7月19日杜勒斯公开宣布，美国取消援助埃及修建水坝的贷款计划，这使纳赛尔在国内的威望受到严重打击，他被美国的要挟激怒了。

金·罗斯福找到了纳赛尔，希望他能够保证美国所付出的努力会得到回报。可是精明的纳赛尔却对金·罗斯福说：“你是我的老朋友了，同时也是埃及人民的好朋友。埃及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可是，目前我们依然面临着威胁。伊拉克和土耳其正在企图侵犯我们，而且在我们的国土上——苏伊士运河区还有大量的英国军队。这是十分危险的。”

金·罗斯福对纳赛尔说：“我将回去告知中情局高层，保证埃及人民会得到满意的答复。”因为金·罗斯福知道，这个时候只能按照纳赛尔的意志行事，否则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以前的一切努力将化为泡影。

可以想象，当罗斯福将纳赛尔的额外要求报告给中情局的时候受到了多大的压力。他们痛骂纳赛尔的

无耻和贪心。但最后中情局还是无奈地接受了。通过一系列的谈判和威胁，中情局帮助埃及和伊拉克、土耳其签订了防御条约，并让英军撤出了运河地区，但保留军事机场使用权。

正当中情局满心欢喜地等待自己应得的回报时，上台后的纳赛尔却要求向美国购买武器，但不能按照美国规定的用现金交易。美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纳赛尔找到了中情局，说：“如果你们破坏我们原本的情谊，拒绝给我们援助，我们很可能会向你们的敌人苏联寻求帮助。”随后，埃及就用棉花换取了捷克的苏联武器，这让中情局顿时感到不安。

1956年7月，纳赛尔宣布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将原先由英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7月26日下午，纳赛尔在埃及亚历山大广场向25万群众发表重要演说，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他说：“为了开挖苏伊士运河，我们有12万儿女在强迫劳役中丧失了生命。为了建设苏伊士运河，我们曾经付出了800万英镑。苏伊士运河变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使历任部长和历届内阁都感到耻辱。”

中情局此时还没有放弃自己的希望，决定进行最

后一次努力。可是当中情局把“美国可以帮助埃及共同管理苏伊士运河”的意愿告知纳赛尔时，得到的回答仅仅是“谢谢你们的好意”。

这下不仅是中情局大为不安，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异常震怒。他大发雷霆：“我们能帮助他上台，我们也同样能够赶他下台。那时候纳赛尔就会知道欺骗美国的代价。”

英法两国决定利用目前美国人对纳赛尔的敌意和不满，趁机收回自己在埃及的殖民利益。他们在私下里曾向杜勒斯透露过这种打算，但没有把详细计划告诉他。其实杜勒斯通过自己的情报，已经知道了这个计划，估计以色列将进攻埃及。因为在10月25日，美国驻以色列使馆的武官向华盛顿陆军部发来一份电报，电文是这样的：“刚才想到应该把此情况告诉你们。我的汽车司机——一个独腿断臂、瞎了一只眼的后备役军人，也被应征入伍了。”

10月26日上午，情报处长艾默里看到了这份从军方转来的电报，立刻发现其中大有文章。以色列的战备动员竟达到了如此的程度，显然不仅仅是出于防御的目的，而是为了进攻别人：约旦军队对以色列有威

胁，但绝没有大到迫使以色列连残疾人都应征入伍的地步；既然约旦不足为惧，那么，以色列进攻的对象只能是埃及。于是他放下电报，立刻来到局长杜勒斯的办公室对杜勒斯说：“以色列已经作了战争总动员……”

当天晚上，国务院和中情局的有关人员对艾默里作出的推断进行讨论。反间谍处处长安格尔顿被认为是同以色列的情报机关摩萨德关系最密切的人，大家请他发表一下看法。安格尔顿说：“艾默里的预测似乎有点骇人听闻，我不相信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昨晚，我一直同在华盛顿的以色列朋友待在一起，他们一点也没有透露过此事，我推测这是以色列人在搞战备演习，并非是想对别国发动进攻，我不相信以色列会去打埃及。”

星期六上午，国务卿杜勒斯在办公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艾默里把自己的推断又陈述了一遍。杜勒斯想起英法两国曾向他透露过要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意图，他把英法的意图和艾默里对以色列的推断联系起来，还是倾向于艾默里，认为他的推断有可能是正确的。当天晚上，杜勒斯准备到达拉斯发表演讲，

原想提及一下此事，但犹豫再三，他最终还是在讲话稿上划去了有关的两句话。后来他回忆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外界人误认为以色列把进攻埃及的事情已预先通知了我们美国”。

10月29日，华盛顿已经正式得到了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的情况报告。国务卿杜勒斯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十分钦佩艾默里的敏锐反应和正确推断。然而艾森豪威尔对于杜勒斯事先没有向他报告此事很不满。

1956年10月29日下午5时许，以色列果然向埃及发起了突然袭击。第二次中东战争就这样打响了。由沙龙上校指挥的以军第202伞兵旅在法国空军的支援下，利用埃军在西奈中部地区兵力稀少、防御单薄的弱点，首先在米特拉山口空降了500余人和部分武器装备。同时，该旅的主力3000人与米特拉山口的伞兵会合，向米特拉山口突进。埃及被打得措手不及。到了11月6日，以色列已经占领了西奈半岛的大部分地区，英法联军也几乎控制了整个的苏伊士运河区。

这一天，恰好是美国总统的投票选举日。3天前，国务卿杜勒斯因患癌症，需要立即住院做外科切除手术，此时正是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内最困难的

时候。艾森豪威尔知道，如果他公开反对英、法两国的军事行动，将会使他显得无能，影响他的形象。而更使他和白宫班子闹心的是，西方此时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而英、法、以三国偏偏在这一非常时刻到中东折腾，这不仅使西方阵营面临分裂的危险，同时也使美国分散精力，让苏联人有机可乘好在匈牙利下手。

事实果真如此。赫鲁晓夫也正是瞅准了西方国家之间正在勾心斗角，美国的艾森豪威尔本人又忙于大选，于是他就安下心来，在匈牙利放手大干一场。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提出建议，由苏美双方联合调停苏伊士运河危机，他警告英、法两国必须迅速撤军，否则，苏联将以武力支持埃及。

艾森豪威尔当时十分清楚，赫鲁晓夫想借此机会在中东扩大势力范围，同时，将世界舆论的视线从匈牙利事件中转移出去。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最后美国只得同苏联一起，在联合国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英法两国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还通知英国，如果在周六前不撤兵，美国立即中断经济援助贷款。美国对法、以两国也施加了压力。

12月22日，鉴于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英、法两国被迫从埃及撤军，苏伊士运河重新回到纳赛尔政府的手中，在此之前，暂时由联合国军看管。苏伊士运河危机得到了解决。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真正的赢家是苏联。当时苏联只不过是卖了一个“口头人情”给埃及，并没有出动一兵一卒支援埃及，可是这就让埃及政府感激涕零了。出于对苏联的感激和信任，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政府从此与苏联的交往日益密切起来，从而削弱了美国在中东和埃及的影响力。

在埃及，中情局没有捞到好处。

在叙利亚同样如此。

1949年，中情局用大把的金钱扶植了一个亲美的军人施舍克里为叙利亚领导人。但是此人在中情局的口碑相当差，有人认为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流氓。一个流氓统治国家只会越搞越糟，于是在支撑了4年之后，叙利亚施舍克里政府就被复兴党与共产党给推翻了，这让美国人做了一单赔生意。

到了1955年3月，中情局认为，叙利亚军事政变时

机已成熟。

1956年4月，中情局把50万叙币转交给了叙利亚政变的领导人。没有想到，由于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中东的气氛为之一变，让叙利亚也投靠了苏联，于是中情局就不得不取消了这次行动。

到了1957年夏天，中情局又把支持叙利亚政变的事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中情局的想法是，通过一些手段让“叙利亚变成以阴谋、破坏与暴力对付邻国的主使者”。当时中情局的计划是准备在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等邻国制造“全国性的阴谋和各式暴力活动”，然后把责任推给叙利亚。中情局先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穆斯林兄弟会”里扶植多个准军事的派系，制造不安假象扰乱叙利亚政府，然后又在叙利亚边境制造一些冲突，给亲美的伊拉克和约旦制造攻击叙利亚的借口。

当时叙利亚政府的情报也很不错，其头目阿巴杜·哈密德·塞拉吉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特工。叙利亚特务机关在他的领导下始终保护着政府的稳定，关注周边事态的变化。中情局一直在注视着塞拉吉的动向，希望自己的秘密行动不要被这个人识破。

当时中情局驻大马士革情报站的站长叫斯通。他以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的身份为掩护，花了几百万美元结交了一些叙利亚的军官。可是那个塞拉吉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识破了斯通的阴谋。于是塞拉吉决定用“钓鱼”的方式和那个斯通再玩一把。他派了一名军官去见斯通，说是愿意为他服务，获得了斯通的信任，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大把的钞票。然后那个军官就在电视上现身说法，宣称美国人在用金钱收买自己，意欲推翻叙利亚的合法政府。于是塞拉吉就以保卫美国大使馆为借口，顺理成章地逮捕了斯通。

斯通被捕后，立即招认了自己是中情局的人，并且还交代了中情局派给他的任务。叙利亚政府非常恼火，立即通电向全世界大造舆论，说美国人想要在叙利亚搞政变，同时还宣布斯通是叙利亚“不受欢迎的人”，限令他在八小时之内立即离开叙利亚。

这是美国外交官第一次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大丢面子。美国人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也驱逐了叙利亚驻美大使，同时还谴责叙利亚“无中生有”。但是斯通的供词却成了中情局意欲颠覆叙利亚的证据，引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不满。叙利亚趁机 and 埃及结盟，组

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为中东地区反美情绪最高涨的地区。很快，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阿尔及利亚等地就爆发了反美暴动，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让中情局在中东地区下不了台。

叙利亚秘密行动失败后，中情局又把目光瞄上了伊拉克。此时伊拉克的执政者还是亲美分子赛义德，中情局驻巴格达情报站又是故伎重演，希望能用美元来维持和稳固这种局面。但是就在1958年7月14日这天，一批陆军军官推翻了亲美的赛义德政权。新上任的凯西姆将军立即对旧政府进行整顿，他发现在那几年里，伊拉克已经被美国用金钱收买了。于是凯西姆立即找到苏联做伊拉克的靠山，允许苏联对伊拉克全面介入，立即派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代表团进入伊拉克。

一见伊拉克“反水”了，中情局大为紧张，认为伊拉克此时已经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区。于是中情局的一部分官员就认为，应该立即对伊拉克采取行动，派特工暗杀凯西姆。中情局总部同意了这个暗杀计划，不过最后却没有实施，原因是伊拉克内部风云变幻，伊拉克复兴党正在伊拉克境内开始反对凯西姆的运

动。中情局一见心花怒放，马上采取借刀杀人的手段，用大把大把的金钱支持复兴党人，最终颠覆了凯西姆政权。

但是让中情局始料不及的是，复兴党虽然上台了，但是自己用大把大把的银子扶植起来的却是一个未来的“白眼狼”——他就是伊拉克未来的总统萨达姆·侯赛因。

伊拉克的问题让中情局给自己留下了一个甩不掉的后遗症。

第十二章 染指朝鲜，蓝鸟工程祸及萧墙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情局已派出大量特工进入朝鲜，大战初开，中情局以日本横须贺为基地从事情报活动，向苏联的西伯利亚、蒙古共和国、中国东北和库页岛大量空投间谍，实施“风信子”计划，从而获悉有3个师的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组织“反共游击队”进行破坏和暗杀，并招募印第安特工暗杀金日成；中情局研发的“蓝鸟工程”和“洋蓍工程”不仅祸及同行，而且同当年日本关东军的“731”部队没有区别。

中情局获悉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

1945年8月，二战刚刚结束，美、苏军队就分别进

入朝鲜南部和北部接受日军投降，并以北纬38度线作为美国与苏联军事占领区的临时分界线。朝鲜由此开始分裂为南北两部分。“三八线”对于美国来说，其真实含义就是要阻止苏联借对日作战的机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

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把欧洲确定为战略重点，西欧成为遏制苏联的最前沿。“欧洲第一”是美国的传统国策，是它全球战略的基石。在亚洲，美国注重中东、日本和菲律宾；台湾地区和南朝鲜都被划在美国的太平洋防线之外。1949年5月和6月，美军分别从中国和南朝鲜全部撤出，标志着美国在亚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缩力量和防线为特征的战略调整。

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谈到朝鲜半岛时说，如果南朝鲜人遭到了进攻，一是要依靠南朝鲜人自己起来抵抗，二是要依靠联合国的集体行动。这清楚地表明，美国在二战时期所设想的由美苏合作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已经转变成依靠“联合国行动”来保卫南朝鲜抵御苏联的进攻。这项政策针对的目标及其为达到目的而设计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美国必定要干涉朝鲜战争，以及它干涉朝鲜战争的方

式和规模。

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在朝鲜已进行了至少两年的“秘密行动”。中情局派出了大量的特工人员进入朝鲜。有资料显示，在高峰期，这些行动涉及2000名武装特工渗入朝鲜共产党占领区。

中情局负责秘密行动的官员们认为，“战争不可能在亚洲爆发，只能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发生在欧洲，而且任何战争必将涉及到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全面对抗；目前威胁美国远东利益的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颠覆活动”。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华盛顿很普遍。直到1950年6月，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陆军部还一致认为，尽管南朝鲜只有11万民团、警察和少量的正规军，而北朝鲜拥有180架军用飞机，近200辆T-34型坦克和15万正规军，在武器装备和军队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这种进攻看来并非迫在眉睫”。

然而，就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了。朝鲜人民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于6月27日晚攻陷了汉城。

6月26日晚，杜鲁门总统接到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的报告说，南韩军队已无力防守汉城，溃在旦

夕；美国随属人员正在撤离朝鲜。

当晚，杜鲁门通过电传向麦克阿瑟下达指示，授权他使用远东海空军部队支援南韩，攻击三八线以南的任何目标。6月27日，美国空军战斗机从日本基地起飞，击落7架朝鲜攻击机。同一天白宫宣布，美国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防止海峡两岸动武，实际上是将中国的领土台湾省置于美国的“军事保护”下。因为美国人担心，此时中国会趁机出兵收复台湾。此前，杜鲁门政府曾一度公开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持中立态度，无意干涉，但到此时却自食其言。

6月27日夜，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称，“建议联合国成员国为韩国提供足以击退武装进攻的援助，以恢复国际和平和该地区的安全”。这项决议为美国先斩后奏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合法”依据。可是，当时的苏联却没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放弃使用对这一决议的否决权，结果使美国得以利用联合国军的名义出兵朝鲜。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从日本派遣两个师赴朝参战，对朝鲜北部实行海上封锁。接着美国又以联合国

的名义，纠集了英国、法国、加拿大、土耳其、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希腊、泰国、新西兰、菲律宾、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南非等15个国家出兵参战；美英等国的航空母舰和数百艘战舰封锁了朝鲜半岛海面，对朝鲜人民军轰炸炮击，实施敌后遮断，并利用舰炮支援沿海的美韩军队作战。

美国驻日本的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被授予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头衔，坐镇东京遥控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是朝鲜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

到了8月，美韩军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朝鲜人民军。但是，沃克将军仍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防线处处吃紧，纷纷告急，手头的机动兵力早已告罄。为了扭转被动局面，美军计划在朝鲜人民军进攻路线的侧后方仁川实施登陆。为了实施这一登陆计划，中情局又派遣特工多次潜入仁川地区侦察地形，了解驻军部署情况、火力配置以及仁川港的水文资料（因那里的潮汐落差相当大）。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2.5万名美军在仁川登陆（登陆人数后来达到5万）。28日，登陆美军攻占

汉城，致使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后方给养和北撤路线均被切断，13万人民军陷于合围之中。经过浴血奋战，几千名朝鲜人民军官兵冲破截堵，突围后撤回三八线以北。

1950年10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说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捎话给美国政府。周恩来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

10月5日，中情局得到了准确情报，获悉有3个师的中国军队进入了北朝鲜，并且向白宫报告说：“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有可能公开介入朝鲜战争。”但是中情局的这一预测并没有引起白宫方面的注意。中情局事后分析说，“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不堪一击”、“中国远非美国的对手”。

就在美、英和南朝鲜军队从西路越过三八线后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39军、40军和42军于10月19日从我国吉林方向进入朝鲜，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紧接着，志愿军后续部队也立即跟进。但是，

中情局和美军情报机构这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实力并不知底细，他们根据对志愿军战俘的调查，只是估计“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只有3到5万人”。中情局甚至将几名战俘空运到汉城，使用测谎器审讯，后来得出“中国军队可能有9万人”的结论，但对于这一结论连他们自己都感到“惊人、难以置信”。同时，中情局也为“中国东北地区集结了几十万军队”而感到不安。

11月8日，中情局奉命提交了一份题为《国家情报预测——中国干预北朝鲜的程度和目的以及中国的能力和意图》的报告，认为中国目前的干预“是一种目标有限的过渡性军事行动”，如能击退“联合国军”，它将追求更大的优势，否则就把美军拖在朝鲜；如果中国本土受到攻击，它将全力以赴地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但这份基调谨慎的报告对中国干预的目标、规模和能力等一些决策中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

11月9日，白宫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最后决定在未判明中国出兵意图之前，继续坚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北朝鲜的原定计划，授意麦克阿瑟将军“在军事方面可以相机行事”，并批准他轰炸鸭绿江上所有在

朝鲜一侧的桥梁。



朝韩边界的“三八线”

麦克阿瑟当时的胃口更大，妄图一口吃掉在朝鲜北部的中朝军队。

1951年，中情局在一份关于朝鲜战争的分析报告中倒是颇有见地地说：中国军队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在战场兵力对比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中国军队刚刚打败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一往无前的牺牲精神，这支军队吃苦耐劳，擅长夜战和山地作战，其战斗力相当强大；中国军队的弱点是，战术比较单调和死板，后勤供给和运输能力差，

特别是在美国空军的轰炸下，中国军队所得到的物资补给充其量不到其最低需求的30%；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陆战中缺少火炮和弹药，在火炮、坦克等方面的火力远远不及美军。

中情局在报告中还特别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很差，只有30年代日本和德国制造的，还有苏联在二战中淘汰下来的破烂货，不仅质量差，而且数量不足。同时，从各方面得到的情报表明，苏联对中国军队的支持“并不是很大方的”，“远非尽心尽力”；苏联并非真的希望中国打赢，至少是不希望马上打赢，因为“苏联不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苏联所愿意看到的结果是：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两败俱伤”。

不过从朝鲜战争爆发之日起，美国首先担心的就是苏联是否出兵，同时，它又怀疑苏联是通过朝鲜战争声东击西，意在欧洲动手。此时的苏联为了巩固在东欧的既得利益，在欧洲驻扎了20个精锐师团，这百万苏军对美国 and 西欧各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可以说，美国对于苏联的种种忧虑贯穿于整个朝鲜战争的始终。

中情局后来又在8月10日的一份总结报告中指

出：“整个苏联阵营的趋势是，战争的准备在继续。此外，还有迹象表明，战争计划的某部分正在急迫地加速实施。”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正从消费品生产转为军工生产，苏联的米格-15战斗机已在匈牙利出现，东方国家集团粉碎了国内反对派。因此，中情局相信，到1952年，苏联将完成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

中情局的这一观点与白宫的“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是相吻合的，同时也反映了二战以后，美国开始感觉到来自苏联军事实力的威胁。

麦克阿瑟对“准军事行动”感兴趣

中情局特工进入南朝鲜的时间是在战争爆发以后。当时中情局的特别行动部以日本的横须贺为基地从事情报活动，而政策协调署是以东京的情报站作为办公地点。由于协调情报署当时受到中情局和国务院的双重领导，因此它与特别行动部作为两个部门在分头工作。

麦克阿瑟当时只对“准军事行动”感兴趣。因此他规定，中情局在他的辖区内应当主要从事秘密战争方面的工作，而且指挥权和控制权都要掌握在他的亲信

威洛比少将的手里。威洛比作为远东地区美军情报部主任，负责秘密行动和有关情报方面的工作。实际上，中情局在朝鲜战争中，是作为麦克阿瑟属下的一个部门进行工作的，因此，中情局与军方在指挥权限问题上的矛盾相当尖锐和复杂。1952年夏，中情局将政策协调署并入特别行动部之后，中情局在朝鲜的秘密机构才逐步摆脱了军方的羁绊。

中情局当时在朝鲜半岛投入了大量的特工力量，其中政策协调署人员占百分之七十。政策协调署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主要使命“是在朝鲜、中国大陆和东欧实施隐蔽行动，优先的是准军事行动”。其中包括战场侦察、捕俘、破坏敌方交通线和军工设施，引导轰炸和炮击、空投特务；在南朝鲜则是配合军方围剿朝鲜人民军的游击队等等。总之，搞的还是二战时期的老一套。

在朝鲜半岛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中情局实施了一项秘密的“风信子”计划。在这一行动中，有成千上万的朝鲜难民被送往北朝鲜防线后方，并让他们想方设法跑回来。这样，就能够提供有关敌军调动的情报。那些从北朝鲜返回的难民都受到详细盘问，要他们说

出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中情局得出的结论是：“孩子们提供的情报最为可靠。”由此可见，“风信子”计划所得到的情报质量如何了。

中情局搜集朝鲜战场军事情报的重要来源是审讯俘虏，分析战场缴获的敌军文件，派遣特工人员进行侦察等等。然而，中情局所搜集的情报很少有像样的东西，他们的报告经常是前后矛盾，因此，让美国军方对此甚至不屑一顾。总的说来，美国情报工作在朝鲜战争中的记录很糟糕，中情局的活动主要在军事方面。中情局当时驻朝鲜战时情报站站长是艾伯特·哈尼，此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指挥准军事行动和突击行动”。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正在轰炸朝鲜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举行。这时，在中情局驻东亚情报站的特务头子汉斯·托夫特的直接指挥下，政策协调署对朝鲜北部和中国大陆开展了“声东击西”的秘密行动。其中包括在敌占区搜集情报、为被击落的飞机机组人员建立营救网络以及向朝鲜北部派遣1200人的游击队。

在这次“声东击西”行动中，至少有6名间谍潜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海军基地，密切监视苏联可能参与战争的任何迹象。托夫特还派人切断了黄海海底电缆。这条电缆是当时中国驻东北部队，用来与

北京进行联络的唯一通信线路。海底电缆被切断了以后，中国军队被迫使用无线电联络，这种联络方式受到了美国陆军安全局的监听，不利于保密。

托夫特在当时还有一种最猖獗的行动，就是充当海盗。在一次代号为“斯托尔”的秘密行动中，托夫特和他的手下在公海上抢劫了一船志愿军急需的药品和设备。这些药品包括3个野战医院的设备，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租用挪威货船运送给中国志愿军伤病员的。起初，托夫特试图在货船驶入香港补充给养时进行破坏，但该船没在香港停靠。于是托夫特匆忙与台湾联系，出动不挂国旗的武装船只在台湾岛附近拦截了这艘货船。政策协调署的官员躲在甲板下面观察和指挥，由台湾国民党特务出头露面将货物搬走，然后让空船继续按照原来的航线行进，货船上的人还以为遭到了中国海盗的抢劫。由于这一行动的成功，中情局特地奖赏给托夫特100万美元。

当时中情局在朝鲜从事秘密军事行动的特工人员约有800人左右。朝鲜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人后来在菲律宾、越南、老挝、中东以及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充当教官，从事反游击战训练工作。

朝鲜战争结束了半个世纪后，随着当年许多文档的解密，当年中情局特工在朝鲜的所作所为都公开了，其中还有一桩当年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内幕。

这桩内幕的叙述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朝语翻译詹姆斯·金。他在朝鲜战争结束了五十多年以后，终于打破了半个世纪的缄默，首次向世人披露了美国间谍和特种部队在朝鲜秘密战场上的所作所为，第一次曝光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朝鲜战争期间从事的一些肮脏勾当。

1955年5月的一天，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兰利总部，詹姆斯·金的顶头上司把他召到大楼深处一个秘密办公室里，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说：“今天下午立即飞赴朝鲜半岛，不准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任务是彻底清理绝密的‘6006计划’。就这样吧，我们立即派车送你到机场。专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不容他考虑，也不容他问任何问题，一架专机把詹姆斯·金和另外几名高级情报官送到了汉城。在汉城一幢神秘的大楼里，他们终于明白了此行的目的，就

是查证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派往朝鲜和东北亚地区所有间谍活动的情况。

詹姆斯·金到了目的地后就开始工作。摆在他和他的同事们面前的是厚厚一大摞中央情报局的绝密档案。这是被派到朝鲜北方、中国东北和海参崴地区活动的所有间谍的详细资料，其中有照片、名字、年龄、家庭住址、任务和执行任务的日期。多数的档案封面上都打着一个大大的触目惊心的叉叉。凡是打了叉的档案说明这些间谍要么已经失去了联络，要么身份已经暴露，被朝鲜人民军逮捕了。更惊心的是有些打了叉的档案里附着尸体的照片，表明那是被朝鲜人民军审讯后处决的。

1955年6月3日，有人通知詹姆斯·金马上到会议室参加一个特别绝密的情报碰头会。当詹姆斯跨进房间时，他惊讶地看到了1950年他读大学时接受“学生自愿军”训练时的一位教官。

詹姆斯知道，那位教官当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老牌间谍，他现在的身份代号是“X司令”。于是詹姆斯怀疑，这个教官当年在训练他们的时候用的到底是不是真名。因为推断起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美国中

情局的高级间谍了。

根据中情局“6006计划”，中情局立即向朝鲜北部、东北亚地区派间谍，组织“反共游击队”，侦察军事目标，进行破坏活动，推翻共产党的政权。这个“X司令”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到了朝鲜，他在朝鲜咸丰道附近组织了一支力量颇为可观的“反共游击队”。据詹姆斯后来了解，这支游击队是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人留在朝鲜境内唯一的一支“常驻”武装力量。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在朝鲜境内组织了多支所谓的“游击队”，最后只有“X司令”指挥的这支游击队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以后。这支游击队中约有50名中情局亲自训练的游击战专家、爆破特工和暗杀队员，另有人数不详的外国人员。“X司令”领导的游击队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咸丰道海边的一些小岛上。

这个“X司令”在詹姆斯和他的同事们抵达韩国前6个月时，悄悄地离开了咸丰道的游击基地，翻山越岭昼夜兼程好几个星期，总算安全地溜过了“三八线”，然而却被南朝鲜士兵逮了个正着，并且把他交给了警察。警察根本不相信他是“游击司令”、美国中情局的

高级间谍，认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胡说八道，其结果当然是一顿暴打。还算他走运，一名潜伏在南朝鲜警方内部的美国中情局“线人”向其上司报告了这一情况。中情局这才派人把他从警察的行刑室里救了出去。

“X司令”见了中情局的官员就跟见了亲人一样。他向中情局的官员哭诉着说，自从签订了停战协议后，他和他的手下就再也没有接到过一次指示，所以他希望中情局或者美国军方要么派人救出他手下的那些游击专家，要么就恢复空投，否则他就只能解散那支间谍游击队。

然而，让“X司令”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此时中情局驻南朝鲜的头头已经不是当年派他潜入的那一位了。新头头听了“X司令”声泪俱下的哭诉后冷冷地问了一句：“你有文件证明你那支游击队的存在吗？”

“X司令”愤怒了。他大声说：“难道你还要我带着游击队的名单或者是到朝鲜人民军那里开证明来证实我那支部队的存在？”

他情绪激动地回忆了当年中情局派他前往朝鲜时的种种许诺，讲述了他的手下如何一个一个地被朝鲜

人民军安全部门发现后处决，又讲了美国人如何不遵守当年的诺言。

“X司令”的话激怒了那个头头，两个人相互敌视起来，谈话也变得越来越不好听，弄得做现场翻译的詹姆斯也不得不提高了声音。作为一名情报部门的高级翻译，詹姆斯不但要把双方的话翻译出来，还得翻译出他们的语调。那位中情局的官员终于受够了这一切，他最后竟然对“X司令”怒吼着：“滚蛋吧！我已经没有什么好讨论了！”

“X司令”听了这话后非常震惊。他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中情局再也不需要他和他的游击队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美国中情局像破抹布一样抛弃了。

“X司令”木木地站了起来，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向门外走去。他神情木然地看着詹姆斯，嘴里嘟囔着：“我被这些骗子欺骗了。我会找这些狗娘养的算账的。”

詹姆斯说，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X司令”。

1951年，眼看在朝鲜后方活动的游击队所起作用甚微，美国中情局心急火燎地推出了“6006计划”中的

另一项绝密行动。这项行动的代号是“空投射击”——就是把一支支由美国特种部队队员和南朝鲜特工(多是从难民或者战俘中选训的)混编成的间谍小组空投到朝鲜战场的大后方,具体的任务是暗杀共产党干部,破坏公路铁路桥梁、通信线路和弹药库等。

对于这种行动,就连美国中情局内部也颇有争议。许多中情局情报专家认为,与其把这种行动冠以“游击队”之名,不如说他们是阴谋破坏者更坦白点。他们认为这些间谍小组的阴谋活动多半是不会成功的。但中情局上层那些狂热的官员根本听不进情报专家的话,继续强行实施这一计划,并且让美国海军和空军配合这些间谍的空投行动。

后来的实际情况证实了那些情报专家的判断——大多数的美韩特务小组刚刚空降到地面,就被埋伏在附近的朝鲜人民军逮个正着(中情局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朝鲜人民军的情报会那么准,因为绝大多数的特务小组都被发觉了)。这些特务小组被逮捕后,是美国人的就被当场处决,剩下的那些朝鲜难民或者南朝鲜人则被带走审讯。

当时最倒霉的要数那些负责空降特务小组的美国

海空军的间谍飞机。由于是秘密行动，所以出动的多是自卫能力较差的运输机，并且没有战机护航，所以在特务小组被逮的同时，飞机往往没飞多远就被地面炮火击中。有一段时间，美国海空军飞行部队一听到要执行“秘密空投任务”，就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当时，除了向朝鲜北方空投间谍和特务外，美国中情局还不断地向苏联的西伯利亚、蒙古共和国、中国东北和库页岛空投间谍。当然，这些派出的特务大多数是有去无回。詹姆斯当时在整理这些间谍档案时，看到的全是大黑叉——被处决或者是失踪，这让他有点触目惊心。

除此之外，“6006计划”还借用渔船、快艇和军舰进行海上间谍活动。装扮成朝鲜渔船的间谍船都配备无线电台，潜入朝鲜搜集情报后就向军舰发报或者把情报投在指定地点。有时候，那些冒充成渔民的间谍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潜入朝鲜或者从朝鲜回来。

当时这些间谍还在执行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暗杀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金日成。

在日本人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几乎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学校、政府办公楼、商业区都修

建了所谓的“靖国神社”。这种“神社”大小如同电话亭，其墙壁是水泥浇筑成的，大门足以防重磅炸弹，里头摆着日本天皇的“训示”和日本那些大和民族的“民族英雄”。美国人来到朝鲜之后，一下子就相中了这个玩意，把它们改成一个绝密的收发间谍通讯的电报室。

汉城每天收发来自朝鲜北部潜伏间谍或者东京美国情报总部的加密电报。这个密室里还保存着成功打入朝鲜人民军或者政府内部的间谍档案。房间非常保密，只有两三个美国人可以进出。朝鲜人民军的通讯由另一个情报单位接收、破译、翻译。当时他们也有自己的无线电室，在那里负责监视朝鲜的电台。

就是在这个充满绝密的情报大楼里，詹姆斯偶然了解到了中情局曾经实施过的最绝密也是最奇怪的一次未遂行动——负责秘密行动的中情局官员汉斯·托夫特上校建议派出一名顶尖级杀手刺杀朝鲜最高领袖金日成！更令人震惊的是，中情局居然认可了这一阴谋，允许托夫特上校实施行动。

托夫特上校在东京物色到了一名美籍印第安职业杀手。此人长相极“鲜族化”，有狂热的冒险精神，愿意为“消灭共产党”出力。同时此人很有能耐，枪法出

奇的准，擅长爆破，而且有过从军的经历。托夫特对此人非常满意，尽管他说需要一大笔钱。托夫特马上把他上报到中情局，中情局也十分振奋，指示托夫特可以招募此人，并且立即准备刺杀行动。

然而，当托夫特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在东京某个街头等了整整一天，那名印第安职业杀手连影子也没见着。托夫特当时就在想，那个人要么是放弃了，要么就是朝鲜人抢先一步逮捕了他。若干年后，托夫特偶然查到这名印第安人的档案时发现，这个人竟然在东京永远地失踪了！

从此，中情局再也没有重提暗杀金日成的馊主意。

1950年10月7日，沃尔特·B. 史密斯接管中情局，成为第二任局长。他就任局长不到一周，就将政策协调署完全纳入中情局的管辖之下。将政策协调署与行动部合并为计划部（后改名为行动部），任命威斯纳为部长，赫尔姆斯任副部长。由中情局的非官方顾问艾伦·杜勒斯负责合并政策协调处和特别行动处的工作。不久，杜勒斯被任命为中情局副局长。

1952年夏末，中情局除了计划部、情报部这两大

业务部门外，史密斯还建立了行政部，加强了预算、人事、安全和后勤工作。至此，中情局大体上完成了组织机构的建设工作。

尽管史密斯任职时间不长，但他为中情局建立了延续20年之久的基本结构和规模。10年前多诺万建立统一情报机构的设想在他手上终于变成了现实。

从1947年到1953年间，中情局的正式人员扩大了8倍，扩充的主要部分是秘密行动部门。1948年，中情局只有302名工作人员，7个海外工作站，年预算470万美元。到1952年，它有2812名人员，3143名合同人员，47个海外工作站，年预算达到8400万美元，并且很快就增至2亿美元。此时，在该局的工作人员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员从事秘密行动，他们的活动经费约占该局预算的四分之三，而且中情局的高层职务也大都由这些“秘密行动”专业出身的官员把持。由于局长史密斯、杜勒斯的努力，中情局从1950年的5000人迅速扩充到1955年的1.5万人，另有数千名合同雇员以及外国间谍。

“蓝鸟工程”和“洋蓍工程”

当年在朝鲜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还让人们对中情局另外的一种“职能”产生了兴趣。

当年，经常有一些被俘的美军官兵在苏联的电台广播中作反战宣传讲话，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卷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中情局的上层人物对此既恼火又疑惑。联想到以前发生的种种类似现象，中情局的那些官员们认为，这些美国军人的反常举动，极可能是苏联人利用某种特殊的药物控制了俘虏们的思维，瓦解了他们的意志，致使他们完全听命于苏联人的摆布。然而，苏联人到底是用何种方法来控制俘虏的呢？这对中情局来说是个不解之谜，而且意义重大。为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写了一份分析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自从1937年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公审大会以后，俄国人举行公审的司法程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被告在法庭上常常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举动和招供。大多数被告的行为举止如此相似，说明他们受到了同一种人为力量的操纵。最为突出和难以令人置信的例子是，匈牙利的明曾蒂红衣主教在匈牙利人民法庭上的认罪态

度。这类人会认罪是令人费解的，除非认罪者的脑神经里有什么东西在作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的肉体折磨不可能使一个人的思维发生根本变化，最多只是使人暂时屈服，可是，这种屈服绝不会是心甘情愿的。而且，肉体折磨毕竟多少会在受害者身上留下痕迹，更先进的技术可能被应用了。它包括：一、神经外科学：对大脑的前叶进行外科分离手术；二、休克法：应用电流或药物；三、精神分析法：麻醉分析与综合分析法，催眠分析与合成法；四、采用上述的综合方法。

在后来的二三十年里，中情局的反间谍处以各种名义，围绕着如何控制人的行为这一课题，展开了“科学研究”工作。“蓝鸟工程”便是其中最早开展的一个秘密研究项目。

1953年4月，史密斯被任命为副国务卿，杜勒斯升任中情局局长。计划处副处长里查德·赫尔姆斯向杜勒斯提出是否可以应用生物、化学药品进行试验来控制人的行动。赫尔姆斯给杜勒斯写了一份备忘录，其中

提到：

应研究和发展秘密应用生物、化学药品的能力。这方面工作包括人为产生支持目前和未来秘密行动的各种生理条件，这不但是为了挖掘我们自身的进攻能力，而且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彻底了解敌人是如何在这方面开展工作的。敌人在使用生物、化学药物方面比我们还要有恃无恐，开展研究工作可使我们免于受到他们的侵害。

不久，一个用生物、化学药物在美国人身上做“科学试验”的秘密研究工作开始了。肯塔基州莱克星顿地区毒品处理中心的哈里斯·伊斯贝尔博士负责把中情局提供给他各种药物注射在他照料的几名“瘾君子”身上，以观察这些药物能否产生控制人行为的效应。

伊斯贝尔博士的试验证明，药物不能长时间地控制受试者的行为。鉴于第一批受试者都是根深蒂固的“瘾君子”，于是就决定第二批受试者是身体健康的正常人。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5月，战略情报局在华盛顿就使用过印度大麻进行药物试验。同年，在纽约的“贝利蒙特—普拉扎”的旅馆也进行了试验。一些美军官兵在这里被当做“实验用的家兔”，通过香烟和糖果使他们不知不觉地服用毒剂。在军事医院的临床观察中发现，一些病人麻醉后失去知觉时，便开始说胡话。此外，他们对犯人和受审者也使用了这类药品。第一例实用性试验就是在黑社会集团查尔斯·卢西亚诺家族的成员德尔·格雷西身上进行的。当时战略情报局是想利用卢西亚诺家族帮助美籍意大利人向西西里扩张，以防备纽约的码头和船厂遭到敌方的破坏。战略情报局人员当时在与德尔·格雷西接触和交谈时，也给他吸了不少掺杂有大麻的香烟，于是他就边吸烟边向战略情报局的人员讲述和谈论黑社会活动的情况。渐渐地，药物对神经产生了作用，狡猾的德尔·格雷西也变得语无伦次起来。

1953年4月23日，杜勒斯正式批准“蓝鸟工程”、“洋蓐工程”以及伊斯贝尔博士领导的试验项目，均由中情局技术服务室主任西德尼·戈特利布统一协调。除了上述项目以外，戈特利布还接管了1947年已

由美国海军方面着手研究的另一项目“饶舌工程”。“饶舌工程”是研究诱发人讲真话的一种特殊药物，主要运用于审讯和侦查性谈话中，使对方按照中情局的希望“唱起来”。

中情局技术服务室与陆军化学部队特种行动师合作研究的代号为“MKNAOMI”的工程也由戈特利布兼管。“MKNAOMI”工程是研究具有高效能杀伤力的生物化学武器的，供中情局人员在从事暗杀和其他特殊行动时应用。“MKNAOMI”工程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1970年才终止，那是因为1969年8月25日，尼克松总统下令禁止使用任何能杀生致残的化学武器，并销毁现存的生物武器。

其实“蓝鸟工程”早在希伦科特任中情局局长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由中情局安全室主任谢菲尔德·爱德华兹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该工程的目的是想成立一个由心理学家、测谎专家、施行催眠术的专家和其他技术人员组成的审讯组，借用药物的帮助，看在对犯人进行审讯时，能否取得更好的效果。一种被称为“吐露真情”的药物（即戊硫巴比妥纳）首先在“蓝鸟工程”中使用，后来便应用于实际审讯中。朝鲜战争爆发后的

一个月，中情局就曾派遣过一个这样的审讯组飞抵东京，审讯了4名被怀疑是双重间谍的人员，结果审讯过程令人十分满意。

自从史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后，“蓝鸟工程”便由副局长艾伦·杜勒斯领导。这项工程与中情局里的其他研究项目相互配合，旨在生产一种特殊的“机器人”。技术服务室研究的“洋蓍工程”便是其中的一个。

“洋蓍工程”被官方美其名曰“开拓科学的方法和知识，用于改变中情局人员的态度、信仰、思维程序和行为方式，从而提高人的素质”。这需要应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最新技术，包括使用催眠术和药物，发挥辅助作用。中情局和英国情报机关在这一时期曾多次派遣反霍查政权的游击队员潜入阿尔巴尼亚，但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中央情报局上层人物十分焦虑和担忧，他们怀疑自己内部可能混入了敌方的间谍（直到后来菲尔比间谍集团被侦破才真相大白）。于是中情局上层人物就想用测谎器对所属人员进行测试。“蓝鸟工程”和“洋蓍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快了研究工作的步伐。

“洋蓍工程”由戈特利布的助手埃德瓦尔德斯负责

实施。研究的结果是发明了许多用于“洗脑”的制剂。换句话说，这种制剂能使人意志消沉，使那些知情太多的人，包括中情局人员在内“洗刷掉记忆力”。在这些秘密项目中，除对受试者服用“洗脑”制剂外，有时使用电休克、X光照射、超声波、精神疗法等方法，甚至还会运用脑神经外科手术。

1978年，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海军上将在向参议院提交的报告中说，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中情局药物试验的机构，共有44所大学和学院，15个科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12家医院和门诊部，以及3个感化院。为实施这一计划共投资2500万美元。

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从事这类勾当的并非中情局一家。在美国拿活人搞试验的还有陆、海军的情报机构，司法部，甚至还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和社会保险部。20多年来，仅陆军情报机构就对6940名军人和900名公民进行了医药和化学制剂的试验。

从事这类研究试验的经常性机构包括：纽约的蒙特—西奈医院、亚特兰大州的联邦监狱、博登汤感化院、加拿大的艾伦神经病研究所等。在华盛顿、纽约和旧金山，中情局则利用旅馆或专门的秘密地点进行

试验。在纽约区，试验者利用妓女把病人勾引到格林威治—维利季的81号秘密住宅里，悄悄给他们喝下含有这类试剂的饮料，然后对试验对象进行暗中监视，观察药物的反应效果。有时，他们甚至把美军官兵、中情局人员、囚犯、酒鬼、癌症患者等当做试验对象。

鉴于“蓝鸟工程”和“洋蓐工程”使用了极其敏感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材料，因此整个工程进展情况严格限制在中情局少数参与试验的工作人员范围内。为避人耳目，试验工作限定在联邦德国、远东以及巴拿马运河区美国海军设施内进行。一些有特殊原因需要离开欧洲的中情局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被怀疑是双重间谍的中情局人员都安排居住在试验区里。不久中情局计划处传出消息说，经过试验之后，几名有双重间谍嫌疑的人员被确证了罪行，然后都被处决了。

此外，中情局从1953年到1967年间，还秘密进行人体核辐射试验（许多资料后来于1973年国会调查之前被局长赫尔姆斯下令销毁了）。戈特利布当时把各项工程的进展情况直接向中情局计划处处长威斯纳和副处长赫尔姆斯汇报。中情局反间谍处下属的安全室

对戈特利布提供的研究成果十分感兴趣，他们打算在一些中情局新雇员身上做试验，以保证新进人员的质量。

1953年11月18日，在阿巴拉契亚山下湖畔的一栋小木屋里，戈特利布与另外两名中情局人员正同7名从事代号为“MFULTRA”工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讨论工程进展情况。这种形式的讨论会每年要举行两次，那天讨论的主题是要试验一种代号为“LSD”的药物。

一位曾经参与“LSD”药物试验的中情局人员后来回忆说：“50年代初期，中央情报局多次得到报告，谈到苏联正加紧试验一种‘LSD’的药物，苏联人想在世界各地采购制造该药物的化学原料。于是，美国便加快了研究工作的步伐。中央情报局通过小乔赛亚·梅西基金会和格斯奇特基金会向参与‘LSD’研究工作的医生和研究人員提供专项课题资助，整个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那些埋头学问的研究人员并不知道自己在为中央情报局工作。”

那一天，当讨论会快进入尾声时，戈特利布把剂量很少的“LSD”放入一瓶柑香酒里。在场的10人中，除一名心脏病患者和另一名绝对戒酒者外，其余8个人都

各自品尝了放有“LSD”的柑香酒。他们要亲自体验药物在人体中将会产生何种反应。

就在他们喝了柑香酒后的几星期里，来自迪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生物中心的医生弗兰克·奥尔森情绪变得十分低落，心境压抑。其家属反映说，奥尔森举止行为古怪，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戈特利布意识到这是“LSD”药物产生了严重的毒副作用，于是，他将奥尔森送到纽约，请精神病医生会诊。经过一段时间的病情检查，医生决定送奥尔森去一家疗养院进行综合治疗，在动身离开纽约的前一夜，奥尔森和陪伴他的中情局人员罗伯特·拉什布罗克一起住在纽约的斯塔特勒饭店。凌晨3点20分，奥尔森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砸碎了客房的玻璃窗，纵身从10层的高楼上跳了下去，当即身亡。拉什布罗克被玻璃破碎的声音惊醒，但他却没有立即冲上去阻拦奥尔森的自杀行为。戈特利布将奥尔森坠楼自杀的消息报告了上任不久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杜勒斯责成督察长莱曼·柯克帕特里克负责调查并写出书面报告。

在如何对待奥尔森自杀事件上，中情局内部意见有分歧。中情局前官员厄曼认为，当时在场的科学家

们是在喝了酒后的20分钟，才知道柑香酒中放进了“LSD”药物。还有人说，事先曾有一名中情局官员提出，采取这样的试验方法不妥当。但军方代表认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试验。那些人喝了酒以后，表现出异常的“欣快感”。那天夜里只有奥尔森一个人抱怨自己怎么也睡不着。

柯克帕特里克经过调查后，采用了极婉转的语言作出结论：是“LSD”药物效应的试验导致奥尔森的自杀身亡。后来的调查报告写道：

尽管戈特利布对那些用药物在身上做试验的人员十分熟悉，可是，他并不知道他们过去的疾病史。戈特利布并不知道在过去的5年里，奥尔森曾经有过要自杀的念头。奥尔森的自杀极可能与服用药物有关。可以说“LSD”是奥尔森自我结束生命的触发剂。技术服务室进行这种无法控制的试验形式，可能会严重损害中央情报局的名誉；而在其他部门的雇员身上做试验，一旦事情被揭发出来，将会破坏中央情报局与兄弟部门之间的关系。技术服务室主任判

断能力如此之差，应受到指责。我们应告诫技术服务室主任，在应用药物做试验时，必须严格监督和控制，并且定期向计划处处长报告药物使用情况和使用的结果。

最初，奥尔森的遗孀艾丽斯只是被告知她的丈夫死于一种不能公布于世的疾病，后来才告诉她实情，奥尔森是跳楼自杀身亡的。中情局对他的自杀按照公务死亡处理，“对其家属给予了适当照顾”。但艾丽斯对此始终迷惑不解。直到1975年，在丘奇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之后，她和她的亲属才真正得知事情的真相，这更使她悲痛欲绝。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赔偿艾丽斯75万美元的损失费，福特总统以个人名义向奥尔森家属表示歉意。

其实，奥尔森只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牺牲品。还有一些人在酒吧间与特工人员偶然相遇，被引诱到中情局的“安全之家”，在那里，特工人员让他们服用各种试验药品，以便观察他们的行为变化，其中也不乏有中毒死亡事件，只是没有披露而已。

二战时期，日本关东军的“731”部队就是日本法西斯

斯在日本领土以外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也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我国东北后阴谋发动细菌战争，屠杀中国人民的主要罪证之一；后来在入侵伊拉克时，中情局称伊拉克也有类似的威胁，但是直到萨达姆被送上了绞刑架也没有发现。

但是，中情局当年主持的“蓝鸟工程”和“洋蓍工程”，却是载入了史册的铁证——这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业绩，而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

第十三章 打压伊朗，恩怨情仇半个世纪

中情局实施“阿贾克斯”行动颠覆了伊朗政府，首相摩萨台以“叛国罪”被判处20年徒刑；伊朗再次发生政变，美国武装营救人质的“蓝光”行动失败后让美国乃至全世界沸反盈天；中情局全程参与“伊朗—尼加拉瓜”计划以武器换人质，53名美国人质被扣留了444天；2010年联合国实行自2006年以来对伊朗的第四轮制裁，中情局局长说：“伊朗完成铀浓缩将需要一年时间。”

英国秘密情报局最早提出“阿贾克斯”行动

半个世纪以来，伊朗一直是美国人关注的焦点，

也一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活动的舞台。从当年的“阿贾克斯”行动，到后来的解救人质，再到尼克松时代的“伊朗门”和今天的浓缩铀问题，美国与伊朗可谓是恩怨情仇，源远流长。

由于地缘关系，伊朗在20世纪50年代就成了美、英、苏三国之间争夺的焦点。当时，苏联坚持推行向波斯湾扩张的政策；美国又在极力遏制苏联，以维护自己和西方的利益；而英国则企图保持大英帝国在世界的地位，它不希望美国、更不希望苏联进入伦敦的地盘，因此，伊朗问题就变得十分微妙。1951年，伊朗新任首相摩萨台宣布伊朗要实行石油国有化，这就使美、英、苏之间的矛盾更趋明朗化。

伊朗是个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当年英国和沙俄为争夺伊朗曾进行过长时间的激烈角逐。1921年2月，伊朗近卫军团头子礼萨·汗·巴列维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于1925年正式夺取王位，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伊朗既憎恨英国又害怕苏联，于是使德国纳粹势力趁机渗入，英国和苏联联合起来于1941年8月入侵伊朗，摧毁了礼萨·汗·巴列维王朝，另立他那位性格柔顺、眼神迷离的

21岁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为王。

英苏占领伊朗期间，美军利用伊朗机场及公路运送总值约180亿美元的军援给斯大林。1943年1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但这三大盟国却将饥饿又贫困的国家伊朗置诸脑后。尽管伊朗的石油储量高居世界第二，但当时这里的石油工人每天仅挣50美分。于是当时身为伊朗外交大臣的摩萨台就呼吁国会，重新协商英伊石油公司特许权事宜。因为该公司在伊朗掌控着全球最大的石油蕴藏量，它设在阿巴丹外海的炼油厂也是全世界最具规模的大企业，英国人的石油收益是伊朗人的两倍，现在伊朗要求五五分账。英国人当然拒绝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两次大战折腾得精疲力竭的英国开始放弃它的“世界责任”，但是绝不放弃它在伊朗的利益。这时，苏联也对伊朗垂涎三尺，拒绝遵守德黑兰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关于在大战结束六个月内从伊朗撤走各自军队的承诺。虽然美、英军队已在1945年底全部撤离了伊朗，但苏军仍然坚持占领伊朗北部地区，同时，还支持伊朗国内的叛乱作为对伊朗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后来，在迫使伊朗同意

共同拥有对一些重要油田的开采权之后，莫斯科才答应于1946年3月底撤军。

1951年4月，穆罕默德·摩萨台被任命为伊朗首相；10月，他宣布石油国有化。作为伊朗著名的反英派人物穆罕默德·摩萨台公开声称，英国已经从伊朗的石油生产中获取了足够的利润，远远超出了在伊朗开发自然资源所应得的份额，为此，应将石油国有化。但是美国人为了确保西方在伊朗的石油利益和政治利益，却坚决反对伊朗实行石油国有化，认准了在伊朗这个新市场上，美国可以扩展自己的商业利益。而英国人当时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也只好请求美国给予支持，确保自己在伊朗的利益不受损失。于是，1952年10月丘吉尔再次当选为英国首相后，就与在当年10月同时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联起手来，酝酿一场代号为“阿贾克斯”的秘密行动，以推翻伊朗摩萨台政府。

“阿贾克斯”行动的最初建议是英国秘密情报局提出来的。英国要求美国帮助的动机是想早日收回英国——伊朗石油公司的利益。而美国人的打算就比英国人更多了。他们不但考虑到西方的石油利益，还要考虑

到美国将取代英国接管伊朗的可能性。

1953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前几天，中情局局长沃尔特·史密斯把中情局近东科科长金·罗斯福召到中情局总部，问道：“我们的工作到底几时进行？”因为在此之前的1952年11月初，金·罗斯福曾前往德黑兰帮助英国情报局的朋友收拾烂摊子。当时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已经获悉英国有意推翻他，于是就将英国驻伊大使馆人员连同英国特工全部驱逐，而罗斯福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并收买原为英国工作、将来又很乐于为美国中情局效劳的那些伊朗特工。

1953年2月18日，英国秘密情报局新任首长约翰·辛克莱爵士飞抵华盛顿，拜会接替沃尔特·史密斯的刚刚上任的中情局新任局长艾伦·杜勒斯，并提议让金·罗斯福任“阿贾克斯”计划的现场指挥官。金·罗斯福是名门之后，他的祖父就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他自己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历史学家、战略情报局时期的中东问题专家。中央情报局成立后，他又成了从事秘密行动的一名干将。此人长相英俊潇洒，而且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这次由他具体负责“阿贾克斯”行动

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这两年来，他以政治宣传和“准军事行动”化解了苏联入侵伊朗的工作；同时，中情局也已经为“阿贾克斯”计划储备了充裕的经费和枪械。

罗斯福接受了这一重任后，马上开始加速贿赂和颠覆活动。中情局的官员和伊朗特工开始租用伊朗本土的政治写手、神职人员和刺客杀手，并收买街头混混和“毛拉”（即熟知《古兰经》与各种圣律的教士，有权对法令做出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解释。这也是伊斯兰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前者可以拆散伊朗人民党的群众大会，后者则在清真寺里非议摩萨台政府。中情局虽不像英国在伊朗已有几十年的经验，所吸收的伊朗特工人数也并不多，但它每年至少可以给伊朗支付100万美元经费，这对全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的伊朗而言，可是一种巨大的诱惑。

中情局从英国情报机关所掌控的“收买影响力”网络获得线索。这个网络由控制伊朗船运、银行和房地产业的亲英派拉什迪家族三兄弟经营。他们可以影响伊朗国会议员，左右市集里最大的商家和不为人知的德黑兰国会议员。他们贿赂参议员、高级军官、编

辑、出版商、打手甚至是摩萨台内阁成员。他们用装满美元的饼干盒来买情报，甚至连巴列维国王的侍卫长也接受了他们的这种“饼干盒”。与此同时，金·罗斯福还在伊朗物色了一个可以取代摩萨台的人选，这个人就是扎赫迪将军。

1941年，扎赫迪曾被英国人怀疑是亲纳粹分子而遭绑架。二战期间，他一直被关押在巴勒斯坦。不过英国人却对这个扎赫迪将军没有好感。有一天，在华盛顿协助“阿贾克斯”行动的英国高级外交官帕特里克·迪安在国务院听取金·罗斯福汇报情况，当他听说被选中的人是扎赫迪时，他顿时傻了眼，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国务卿杜勒斯和副国务卿史密斯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莫名其妙地看着金·罗斯福和面前的这位英国客人。最后国务卿拖长声音问英国人：“你认为此人怎么样？”

帕特里克犹豫了一下，然后清了清嗓子说：“我想我们应征求一下伦敦的意见。”稍停片刻，他又补充一句：“如果你们和伊朗人都认为非要扎赫迪不可的话，那我们也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帕特里克用探询的目光看着金·罗斯福。

“你说的有道理，”金·罗斯福解释着，“扎赫迪并不是我们看中的，这一点我们可以向你保证。是巴列维国王非要扎赫迪做自己的首相不可，不过，根据我们在伊朗的情报机关的调查结果，扎赫迪将军并没有反英的倾向。”

1953年3月4日，艾伦·杜勒斯带着一份简报走进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简报的标题就是《苏联接管（伊朗）之后果》。简报说，伊朗已经面临着“革命一触即发的形势”，万一共产党出头，中东多米诺骨牌必会一一倒下，自由世界60%的石油势必落入苏联手手中……同时，杜勒斯还警告那些国安会的官员们说，这惨重的损失势必会“严重耗损我们的战争储备”，届时美国不得不实施石油和天然气配给计划。

1953年3月18日，艾伦·杜勒斯批准了罗斯福的行动计划，命令他们展开初步行动。4月4日，中情局总部拨出100万美元给德黑兰工作站。

不过，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幕僚对推翻伊朗政府仍心存疑虑。几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一篇题为《和平机遇》的演讲，表示了他对推翻伊朗政府的担心。中情局德黑兰情报站站长罗杰·高义朗非常赞同总

统的主张。然而，艾伦·杜勒斯却马上把他召回华盛顿，解除了他的站长职务。

到了1953年5月，“阿贾克斯”计划还没获得艾森豪威尔总统最后的批准，而政变却已蓄势待发。扎赫迪用中情局资助的7.5万美元经费成立了军事事务机关，遴选发动政变的校官。中情局也动用15万美元进行宣传活动，以传单海报来左右伊朗舆论与大众立场，宣称：“摩萨台偏袒人民党和苏联……摩萨台是伊斯兰的敌人……摩萨台蓄意摧毁军方士气……摩萨台蓄意造成国家经济崩溃……摩萨台已经被权力腐化了。”

1953年6月15日，罗斯福去了伦敦，把政变计划拿给英国情报机关的军师们过目。双方在挂着“闭门谢客”牌子的总部会议厅开会讨论，英国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6月25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国务院办公厅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防部长休斯·威尔逊、美国驻伊朗大使亨德森、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中情局近东科科长金·罗斯福等。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艾伦·杜勒斯把金·罗斯福制订的推翻摩萨台的方案作了介绍，并详细说明在采取行动时，应怎样与英国情报机关配

合，其中包括动用在伊朗的英国特工人员以及使用在塞浦路斯的英国通讯设备。与会者肯定了中情局的行动方案。

特地从德黑兰飞回华盛顿的美国驻伊朗大使亨德森在这次会议上是个关键人物，因为他对伊朗的局势有着权威性的了解。他认为，摩萨台领导下的伊朗正悄悄地滑向苏联一边，这对西方是个沉重打击，而且形成了对美国安全的实际威胁。亨德森慷慨激昂道：“各位都知道，我并不喜欢秘密行动那玩意儿，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着险恶的局势，我们遇上了一个想和苏联人结盟的疯子。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放手行动了，愿上帝赐给我们胜利。”

国务卿接过话茬儿：“你说得太对了，让我们齐心协力地干吧！”

就这样，中情局的方案得到了国务院的全力支持。在随后两个星期里，中情局建立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指挥链，一个负责联系扎赫迪的军事事务机关，另一个则控制政治战和宣传活动。两者都直接对威斯纳负责。罗斯福假道叙利亚、伊拉克，进入伊朗与拉什迪兄弟会合。中情局静候总统的许可。艾森豪威尔终

于在7月11日批准了“阿贾克斯”计划。

1953年7月7日，中情局监听到伊朗人民党的广播。这家秘密电台警告伊朗人，美国政府连同各类“间谍和叛国者”，包括扎赫迪在内，正在携手“清除摩萨台政府”。除了人民党，摩萨台也有自己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来源，知道自己所要面对的是什么。

这时中情局突然发现，要政变居然没有军队。扎赫迪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中情局没有伊朗军事形势图，没有陆军名册。金·罗斯福向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之父麦克卢尔准将求助。麦克卢尔在二战时担任艾森豪威尔的首席情报官，朝鲜战争期间负责陆军心战部，监督军方与中情局联合运作是他的专长。不过，他虽曾与杜勒斯、威斯纳并肩工作，却不信任这两个人。

麦克卢尔专门向伊朗军官提供军事支持、训练和咨询，配合中情局的神经战，切断美军和亲摩萨台司令官之间的联系。罗斯福完全靠麦克卢尔来了解伊朗军方，以及军方高级官员的政治忠诚度。中情局还吸收一位曾担任伊朗与美军顾问团联络官的上校纳西里，请他协助政变事宜。这位纳西里上校秘密取得了大约40位同僚的支持。

现在就只差巴列维国王了。意志薄弱的巴列维国王是否会支持政变，没有谁能回答。美国驻德黑兰大使亨德森认为国王没那种骨气支持政变。罗斯福则认为，少了国王，政变很难成功。中情局想办法说服巴列维国王，最后他们想到了巴列维国王流亡法国的双胞胎妹妹雅希蕾芙公主。

罗斯福马上命令中情局官员斯蒂芬·米德上校飞到巴黎，寻找雅希蕾芙公主。中情局的计划是要她结束流亡，回到伊朗来劝说她的哥哥巴列维支持扎赫迪将军。谁知雅希蕾芙公主行踪不明，让米德上校扑了个空。后来还是英国情报人员追到法国，在里维埃拉找到雅希蕾芙公主。米德上校和英国情报人员又差不多花了10天工夫，才把她哄上了一架商务客机飞回德黑兰。当时英国情报机关向这位公主提供了大笔现钞、貂皮大衣，而米德上校则另外承诺万一政变失败，美国会负担皇室财务。

回到伊朗后，雅希蕾芙公主同巴列维国王进行了一番面对面的激烈讨论，这位性格刚强的公主以为她的哥哥已经转变了态度支持政变，于是便在7月30日离开了德黑兰。但是她当时并不知道，巴列维国王并没

有最后下定决心支持推翻摩萨台的行动。

8月1日，中情局又找史瓦茨科夫将军来为巴列维打气。巴列维唯恐宫中已遭窃听，便把将军带到大宴会厅里，拉过一张小茶几摆在正中央，悄声说他很难配合政变。他没有信心相信军方一定会支持他。

美国人必须直接出手了。

1953年8月1日深夜，在德黑兰的一座花园别墅里，一个美国男子悄悄溜出大门，钻进一辆轿车。这个美国人龟缩在后排车座底下，用一条毛毯将自己裹起来。轿车向皇宫驶去。轿车停在皇宫里的车道上，年轻的伊朗国王巴列维坐进了轿车，关上车门。这时，这个美国人才拉下毛毯坐了起来，巴列维对他笑了笑说：“你好，罗斯福先生。”

金·罗斯福解释说，他是用化名非法进入伊朗的。他是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私人代表来到这里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即将通过他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中的一句话亲自证实这一点。演说在24小时内发表。丘吉尔首相已经布置了，在明天晚上，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报时的用语中将作一特殊改变。到时候播音员说‘现在’（停顿）‘正值午夜’，而不用‘现在是午

夜’的说法。”

取得巴列维国王的信任后，金·罗斯福向他说明，华盛顿和伦敦迫切希望帮助他推翻现任首相，确保他的王位。被摩萨台逼得一度准备宣布退位离开祖国的巴列维喜出望外，双方商定，第二天午夜继续会商。

就这样，中央情报局在伊朗的重大秘密行动开始了。金·罗斯福在德黑兰一座被称为“安全屋”的地下室里，建立了他的秘密指挥部。

8月初的一天，金·罗斯福派伊朗上校纳西里飞往里海夏宫，设法让躲在那里的巴列维国王回到德黑兰来，签署命令，罢免首相摩萨台的职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罗斯福在皇宫进进出出，一面施以无情压力，一面警告巴列维国王，若不听从情报局的话，伊朗可能变成“共产国家”，或是“第二个朝鲜”，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国王和王室都是逃不了死刑的。巴列维大为惊恐，赶忙逃到里海边的皇家别墅。

罗斯福为之震怒。他越俎代庖拟了一道皇家命令，解除了摩萨台职务，并任命扎赫迪为首相。

8月12日，纳西里上校追到里海边的皇宫，找到了巴列维要他签字。第二天晚上，他便带着国王已经签

署了的“罢免令”回到了德黑兰。罗斯福又马上指挥皇家卫队的上校将这份文件交给了枪口下的摩萨台，并警告他，如果他不从命，立即逮捕。

与此同时，罗斯福的伊朗特工已经布置在德黑兰街头，德黑兰所有的报纸和媒体则大肆宣称摩萨台是犹太人，应该立即下台。中情局收买的那些街头混混则乔装成人民党人，毁坏了一座清真寺。伊朗首都德黑兰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摩萨台并没有马上下台，而是立即展开反击，以参众议员被中情局收买、投票无效为由，关闭了国会。他认为依据伊朗法律，只有国会可罢黜他，国王无权罢黜首相。于是他仍然以首相的身份，命令里亚西将军出动军队控制了德黑兰。摩萨台在国家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接管政权；同时派出军警搜捕支持国王的著名人士，并在全城实行戒严和宵禁。

伊朗政变终于爆发了。中情局和英国人本来是准备在政变发起日那一天，由扎赫迪的军事事务机关率领阴谋政变者，占领伊朗军方参谋总部、德黑兰电台、摩萨台寓所、中央银行、警察总局以及电话电报总局，然后逮捕摩萨台及其内阁成员，再收买国会议

员，确保国会以多数选票将扎赫迪选为伊朗新的首相，但是眼前的形势却大大地出乎他们的意料。

金·罗斯福一见情况发生了变化，就立即将扎赫迪藏到美国大使馆附近一座地下室里。这时，巴列维国王一家也仓皇逃离了德黑兰。伊朗人民党及其支持者们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国王”、“绞死美国人”。一些暴徒趁机疯狂抢劫一切可以抢到的东西。



雍容华贵的巴列维王宫

美国驻德黑兰大使亨德森作为“阿贾克斯”行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当时正在美国度假，他立即返回德黑兰，对摩萨台首相进行威胁说，如果不制止抢劫和破坏，不恢复秩序，美国公民将撤出德黑兰。

亨德森后来回忆说：“摩萨台当着我的面拿起电话要到了警察局长，命令他立即派警察恢复街头秩序，驱散正在捣乱破坏的人群。”

摩萨台并不知道，他的这一命令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他的命令下达后，那些由美国人训练出来的警察和士兵用枪托、警棍和催泪弹疯狂驱赶骚乱的人群。摩萨台亲手解除了对自己的支持，让警察把那些支持自己的人都打回去了。罗斯福一见，立即加速行动。8月14日，他急电中情局总部，请求再拨500万美元支持扎赫迪。摩萨台紧急动员首都卫戍部队，以坦克和重兵来守护他的官邸。指挥政变的扎赫迪将军躲在中情局的安全屋里，由罗斯福手下一位叫洛奇·斯通的新手保护着他。中情局匆匆召集的那些伊军校官随之作鸟兽散去。

打手制造群众事件

1953年8月16日早晨5点45分，德黑兰电台广播宣布政变已失败。下一步该怎么走，中情局总部毫无头绪。只有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很乐观地相信一切顺利，在一周前离开华盛顿到欧洲度长假去了，已经无

从联络。威斯纳苦思冥想也没有办法。于是金·罗斯福就自行决定，他要让全世界认定这次失败的伊朗政变是由首相摩萨台发动的。不过，这样的事情只有由国王巴列维来说才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这位国王已经在一片混乱之中逃出国了。

几个小时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伯顿·贝利得知巴列维国王已抵达巴格达寻求帮助。罗斯福得到消息后，马上电传了一份讲稿大纲给贝利，要他交给巴列维国王，让他照这个大纲发表一份声明，就说他是因为伊朗左翼暴动才逃离伊朗。巴列维国王果然听从了美国人的命令，在伊拉克电台发表广播声明后，立刻安排他的飞机驾驶员执行飞往流亡君主之都罗马的计划。

8月16日晚上，金·罗斯福派手下把5万美元交给德黑兰工作站的伊朗特工，要他们找一群人伪装成共产党打手制造群众事件。第二天早上，好几百名拿了钱的滋事者涌上街头，抢劫、纵火、捣毁政府的徽标。

8月17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亨德森从贝鲁特飞回伊朗，罗斯福等人前往机场迎接。当天晚上，亨德森、罗斯福和麦克卢尔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内举行了

长达4个小时的会议，最后策划出了一个制造无政府状态的新计划。由麦克卢尔把伊朗的军官都派到外地各处要塞，争取士兵哗变支持政变。中情局的伊朗特工再次招募更多的街头混混，并派特使去劝说什叶派最高领袖宣布发动圣战。

威斯纳已陷入绝望。他读着当时中情局最优秀分析员的报告：“德黑兰军事政变落败以及巴列维国王出走巴格达，显示摩萨台继续掌控大局，同时也预示，他会以更激烈的行动扫除所有的反对者。”8月17日深夜，他拍电报到德黑兰说，鉴于罗斯福与亨德森并没有强烈的反面建议，此次反摩萨台政变应就此打住。

大约凌晨两点，威斯纳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中情局总部主管伊朗事务的约翰·沃勒。威斯纳说，巴列维已飞到罗马，住进了华盖饭店。

8月19日黎明，中情局雇用的暴民群集德黑兰准备暴动。一辆辆巴士和卡车满载从南部来的部族人士，他们的族长也都收了中情局的钱。他们高呼反摩萨台口号，向大街小巷前进，很多人陆续加入，不久就变成大规模的勤王反摩示威。他们揪住政府高层官员，烧了四家报社，占据某亲摩政党的总部。人群中有一

位宗教领袖，一位是最高领袖阿亚图拉·艾哈迈德·卡夏尼，陪在他身旁的那位热诚的拥护者，则是后来的伊朗领袖，时年51岁的阿亚图拉·霍梅尼。

金·罗斯福向他的伊朗特工人员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他拿出从中情局带来的钱，大量地招兵买马，扩充自己在伊朗的力量。首先雇佣了齐尔卡那的一批“巨人”。这些人都是举重力士，接受过古代伊朗的训练方式，肩膀宽阔，肌肉发达。200多个齐尔卡那巨人当天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展现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场面。他们一面高呼“国王万岁”，一面像托钵僧那样疯狂地跳着、扭着。路边的一些打手向市民分发着10里亚尔钞票，人们蜂拥而上，“国王万岁”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德黑兰的大街小巷沸沸扬扬流传着各种各样败坏摩萨台形象的谣言。街头出现了支持巴列维国王，反对摩萨台的示威游行，就连军队也出面表示要效忠国王，要求摩萨台下台。摩萨台的支持者和人民党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迫在眉睫的政变；中央情报局和英国情报机关雇佣的暴徒对摩萨台的支持者大打出手，同时还为反摩萨台的军队提供武器装备，一时间街头巷

尾枪声不断。

形势又来了个逆转，罗斯福立即命令他的伊朗特工去攻击伊朗电报局、宣传部、警察和陆军总部。到了中午，中情局特工占领德黑兰电台。罗斯福前往斯通保卫的安全屋找到了扎赫迪将军，要他准备自立为相。哪知这位扎赫迪将军却吓瘫了，保卫他的斯通只得帮他穿上了军装。

1953年8月20日，“阿贾克斯”行动终于取得成功。8月22日迎回了巴列维国王，摩萨台政府被推翻。摩萨台被逮捕，以“叛国罪”被捕入狱，判处了20年徒刑。摩萨台的坚定支持者、警察总长被惨遭杀害。

在中情局的扶植下，扎赫迪出任伊朗新首相，罗斯福马上将100万美元的现钞交给新首相扎赫迪。新首相开始整肃反对人士，数千名政治犯锒铛入狱。9月5日，美国政府又宣布给伊朗提供4500万美元的补助金，以支持巴列维国王。

摩萨台1956年获释，此后又遭软禁十多年，于1967年3月5日逝世。

中情局在这次行动中，只出动了8名特工人员在幕后进行操纵指挥，原先准备300万美元的经费，结果只

花了100万美元。

后来出任主管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朗特里大使回忆道：“中情局在制造局势方面的表现相当杰出，在适当的环境和氛围下，可以作出改变。”

中情局明星分析员雷·克莱因事后也回忆说：“伊朗政变的漫谈，有如野火般在华盛顿传开。艾伦·杜勒斯满身荣光。”

巴列维回国重登王位，颁布为时3年的戒严令，强化对国家的统治，又新设立了被称为“萨瓦克”的情报机关，请驻伊朗的中情局和美国军事代表团帮他巩固政权。中情局正需要萨瓦克充当反苏的耳目，巴列维则需要秘密警察来维护他的权力。于是伊朗终于沦为特务政治之中，由中情局训练和装备的萨瓦克强化巴列维的统治达20余年之久。

6年后，艾森豪威尔访问了伊朗。街道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每人得到10里亚尔的钞票做辛苦费），从机场到皇宫近10公里的路上全都铺上了波斯地毯。

“阿贾克斯”行动是中情局的一次巨大成功，金·罗斯福满面春风地从伊朗凯旋回归华盛顿。他在白宫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了“阿贾克斯”行动的前后经过，

杜勒斯兄弟俩、白宫办公室主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防部长等都在场。听完汇报后，国务卿杜勒斯显得比谁都兴奋，他得意洋洋地问金·罗斯福：“你对这次行动成功的看法如何？”罗斯福略微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对伊朗的情况研究以后，我们确信，首先是伊朗的军方，其次是伊朗的大众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不需要动用海军陆战队，也可以推翻一个政府，达到预期目的。否则的话，我们无法单靠秘密行动来解决问题，只能依靠武力了。”

听完金·罗斯福的发言，国务卿杜勒斯脸上的表情顿时起了变化。很明显，他不同意金·罗斯福的看法，而艾伦·杜勒斯则点头表示同意。

离开白宫以后，金·罗斯福意识到，伊朗的成功蕴涵着一种新的危险，它将使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多地运用中情局秘密行动的能力。而在金·罗斯福看来，这是对中情局秘密活动性质和使用问题的错误理解。

金·罗斯福回到华盛顿后不久，国务卿杜勒斯又把他召去，要他再负责一次重大的秘密行动，但遭到金·罗斯福的断然拒绝。

伊朗再次发生政变

1978年8月，国王巴列维更换内阁，宣布对首都德黑兰等12个大城市实行军管。并出动大批军警镇压反对者，在德黑兰打死示威群众数万人，酿成流血事件，由此激起全国更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和罢工，造成石油工业停产，交通中断，军方中立，国内动乱不已，政局失控。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被迫出国前往埃及“长期度假”，委任沙普尔·巴赫蒂亚尔组织内阁。即将回国的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对国王采取来去自由的态度。巴列维国王临行前说：“我希望政府痛改前非，并成功地为将来奠定基础。”当两名国王的士兵跪下吻他的鞋时，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巴列维国王从此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永远地离开了德黑兰，再也没有回来，直到1980年7月27日客死在埃及。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结束了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由巴黎回到德黑兰，宣布成立伊斯兰临时革命政府。2月11日，霍梅尼任命马赫迪·巴扎尔甘为总理，正式接管政权。4月1日，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

霍梅尼对美国支持前国王巴列维的行为十分仇恨。尽管卡特政府对革命后的伊朗在政策上有所改变，但对美国一直持有戒心的伊朗人，对巴列维国王复位这一历史教训仍然记忆犹新。10月22日，美国政府准许巴列维赴美治病，更激起了伊朗人对美国的不满。霍梅尼宣布：“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伊朗人民必将予以回击。”霍梅尼的话把本已激荡的仇美情绪一下子推向高潮。



1979年伊朗掀起反美浪潮

1979年11月4日，德黑兰4000多名学生在霍梅尼的支持下，占领了美国大使馆，将美国国旗撕下来，

挂上了写着“真主伟大”字样的白旗，在馆内外进行演说煽动，气势咄咄逼人，最后将66名美国外交官扣押起来，作为要求美国交出巴列维的人质。第二天，伊朗最高领袖要求美国引渡巴列维国王，要求英国引渡正流亡在那里的前首相，并说：“美国大使馆是间谍的根据地，许多阴谋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不过在使馆被占领时，有6名美国人成功逃脱，躲在加拿大和瑞典大使馆。当时，当潮水般的伊朗学生高举霍梅尼的画像冲进大使馆时，领事馆的官员约瑟夫·斯塔福德和妻子凯思琳、签证官罗伯特·安德斯和里杰克夫妇趁乱从领事办公楼后门溜出去。当时正好下着大雨，街上人不多，他们避开了好几拨示威的人群，跑入安德斯的公寓，悄悄与使馆人员取得联络，让美国人知道他们已经逃脱。

后来，安德斯终于打通了朋友约翰·舍尔顿的电话，在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工作的舍尔顿同意帮忙。5个人分别住在舍尔顿家里和加驻伊大使肯·泰勒的官邸。多日之后，另一名逃出来的使馆工作人员亨利·李·沙茨也偷偷躲在一位瑞典外交官家中。

人质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朝野哗然。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当天通过新闻媒介向伊朗当局传递信息，称美国“谋求同伊朗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期望伊朗高级官员会见美国特使”。但不管美国政府说多少好话、软话，霍梅尼就是不为所动，他甚至下令关闭国门，禁止美国特使入境。卡特无可奈何，只好将特使召回。他宣布取消预定11月9日对加拿大进行的国事访问，以便集中精力处理人质危机。布热津斯基的欧洲之行也被无限期推迟，政府的一些重要会议不是延期就是被取消。一切活动都冻结了。

美国政府见好话不起作用，只好采取强硬措施，以孤立和制裁伊朗相威胁。11月10日，美国决定中止向伊朗提供武器和运送军事装备零件，冻结伊朗在美国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所有官方资财。11月12日，美国又停止了同伊朗的石油贸易，禁止在华盛顿的伊朗学生举行示威，并宣布对在伊朗的伊朗学生进行特别移民审查，凡是不符合手续的一律驱逐出境。另外，美国还通过联合国和中间人进行活动，号召西方盟友对伊朗进行制裁，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人质问题。

然而美国的这些措施，不仅没有使伊朗屈服，反而更加激起伊朗人对美国的敌对情绪。针对美国政府

的制裁措施，伊朗革命委员会于11月13日决定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禁止在全国各地放映美国影片，禁止美国飞机、船只进入伊朗领空和领海。11月14日，伊朗政府还宣布，将取出存在美国银行的约120亿美元的存款。至此，美伊双方陷入僵局。

为缓和僵局，伊朗政府首先做出姿态。11月17日，霍梅尼下令释放美国使馆的13名妇女和黑人，这样被扣人质就剩下了53人。12月4日，霍梅尼同意美基督教传教士探望美国人质，显示出某种道义上的情感。

对此，美国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姿态性的表示。12月15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已离开美国到巴拿马居住去了。12月17日美财政部宣布，允许在纽约和旧金山的伊朗银行从国内调款，供伊朗学生使用，并开放了伊朗驻美国使馆的四个银行账户头。12月19日，美国政府决定，暂不要求联合国对伊朗采取国际制裁行动。总统卡特还表示，美国对它同伊朗之间存在的误会感到遗憾，希望同伊朗就两国关系问题开展高层对话。

在美伊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由联合国秘书长出面

组织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就伊朗对美国 and 巴列维国王的指控、人质问题等进行调查。但是，委员会的各种努力均未能取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于是秘密营救行动就成了美国卡特政府的救命稻草。但是自从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来，中情局在伊朗的情报网已遭到破坏。中情局在伊朗本来就只有3个特工，又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里被连窝端了。中情局最后决定先营救躲在加拿大和瑞典使馆的6个人，由托尼·门德斯负责营救工作。

门德斯曾在中情局伪装部门担任“身份转换师”14年之久。这个部门在美国情报界可是赫赫有名。该部门曾想用“炸弹雪茄”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但没有成功。门德斯的使命是利用“身份转换”，使相关人员摆脱困境。门德斯的身份“易容术”技艺高超，曾多次帮助美国情报人员成功逃离。

这一次，门德斯的营救方案也是让这6个美国人带上假身份证，大摇大摆走进麦赫拉巴德机场，然后登上飞机离开德黑兰。鉴于美加两国语言和文化都相类似，这种伪装还是很容易做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拿大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敌人，几乎所

有的国家都喜欢加拿大人，于是，门德斯就开始为那6个美国人准备各种加拿大的证件，让他们乔装成加拿大人混上飞机。不过在此之前，中情局需要有人潜入伊朗，将假身份证交到6名美国人手中，然后领着他们安全通过伊朗安全机构的层层盘查。中情局明白，这个人非门德斯莫属。

但是当时加拿大人则有不同意见。1979年12月，在北约的一次会议上，加拿大方面建议应尽快让6名美国人离开加拿大使馆，前往靠近土耳其的伊朗边境，以防夜长梦多。他们说，必要的话可以让他们骑自行车离开。这种建议真是让美国人哭笑不得。

中情局建议让这6名美国人假扮成加拿大的退休教师，但是这一建议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反对，因为伊朗的英语语言学校当时都已经关闭了，哪里还有什么加拿大来的教师？这时，加拿大政府又建议把他们扮作考察农作物的营养学家。门德斯一听就马上问他们：“你们在每年的一月份去过德黑兰吗？遍地白雪皑皑，哪来的农作物？”

正当中情局束手无策的时候，门德斯却突发奇想，决定自己扮成爱尔兰制片人凯文·科斯塔·霍金斯，

为拍摄一部好莱坞大片，率摄制组前往伊朗进行实地考察，而那6个美国人就可以扮成演员或剧组工作人员。

白宫和中情局批准了门德斯的营救计划。为掩人耳目，门德斯带上一万美元飞往洛杉矶，他要去向获得过奥斯卡奖的资深化妆师兼好友约翰·钱伯斯求助。约翰·钱伯斯很乐意帮忙，还为门德斯引见了一位从事特技的同行鲍勃·希德尔。门德斯、钱伯斯和希德尔三个人会面后，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就创建了一家子虚乌有的好莱坞电影公司，并且办齐了一家电影公司应该具备的所有的正式文件。接下来，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如制作名片，熟悉6名被困美国人的身份等。

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他们眼下最需要的就是一部电影。刚好钱伯斯手中有一部科幻片《光之王》的剧本，他还是该片的美术制景师和形象设计人，他家中还留有影片的剧本和插图。于是他就想到伊朗的地理风貌恰好可以为电影提供剧本所要求的许多背景，诸如崇山峻岭、蜿蜒崎岖的山路，德黑兰某处著名的地下集市恰好与影片的某一拍摄地吻合。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以电影公司的名义成立了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在洛杉矶繁华的商业区租下了几间大门店，并花钱装修一新，电话机、打字机、沙发、办公用品等设备一应俱全，店门上赫然挂着“六工作室”的牌子。就在门德斯返回华盛顿的前夜，“六工作室”还煞有介事地举行了一场小型的宴会。不久，《光之王》新片广告也在多家报纸上刊登出来了，称影片主要拍摄部分将在3月底完成。

没有想到新片广告登出去之后，马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断有好莱坞记者致电询问相关细节，一些报纸也对新影片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曾经在好莱坞摸爬滚打近25年的希德尔对“六工作室”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角色也感到吃惊。

作为一位身怀绝技的造假专家，门德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所有可能派上用场的东西全部准备就绪了，如人员的健康卡、驾照、在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住宾馆的收据等。还有关键的6本加拿大护照被门德斯称为“真正的假货”。加拿大法律禁止此类造假行为。不过加拿大议会为此还是召开了二战以来首次紧急秘密会议，决定破例签发6本假护照。

收到中情局局长的指令后，门德斯于1980年1月25日潜入伊朗。他带着假护照和假身份证经由正当渠道，正大光明地从欧洲转机抵达伊朗，然后住进了德黑兰的喜来登饭店，并预定了瑞士航空下星期一飞往苏黎士的机位，衣食住行就像一位真正的好莱坞电影导演一样，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当天晚上，他就悄悄地走出饭店，搭出租车去加拿大使馆，会见了那6位美国同胞。

那天晚上，被困在德黑兰的6名美国人正与丹麦和新西兰驻德黑兰的大使共进晚餐。就在这时，一位神秘嘉宾出现在大家面前，这个人就是门德斯。门德斯低声地宣布：“我们已为你们逃离这里做好了充分准备。”随后他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并将假名片和护照发给他们。科拉·里杰克的新身份是作家特里萨·哈里斯，马克·里杰克成为通讯调度员，凯思琳·斯塔福德是布景师，约瑟夫·斯塔福德成了制片人助理，安德斯当上了导演。马克·里杰克注意到，为了同爱尔兰电影制片人的身份相符，门德斯当时还穿上了英式的衣服。

“六工作室”总部那边也在紧张地忙碌着。希德尔和妻子安迪守卫在办公室，他们有三条电话线路，其

中有一个电话号码没对外公布，只针对中情局内部。一旦该线路电话铃响起就意味着要么门德斯和其他相关人员陷入麻烦，要么他们已安全返回国内。

1980年1月28日凌晨4时，门德斯一行动身前往麦赫拉巴德机场。在车里，科拉再次检查了自己的口袋，确保身上没有任何显示真实姓名的东西。她同其他人开始排练他们的新角色。唯一的例外是约瑟夫·斯塔福德，他不但对潜逃出境的计划没什么热情，更糟糕的是，他看上去紧张不安。快到机场了，门德斯先打探了一番，全副武装的伊朗革命卫队就站在他们身后，海关也有伊朗革命委员会的人员，不过他们只注意着那些试图走私地毯或金子的伊朗人。

看到这种情况，门德斯马上向“拍摄组”人员发出警报解除的信号。6名美国人战战兢兢地进入机场。经过瑞士航空公司的登记处和机场海关时，一切都很顺利，大家轻轻地松了口气。接着，门德斯走近检查处，出示护照盖章，其他人则在旁边装作若无其事地闲聊。移民局官员拿着其他几个人的护照突然不见了，大家吓出一身冷汗。不过，这位心不在焉的官员没过一会儿，就端着茶杯慢腾腾地走了回来，并示意

他们去候机室。

等待的过程令大家惶惶不安，几个人都耷拉着脑袋。约瑟夫·斯塔福德拿起一份当地报纸。此时，他突然想起加拿大拍摄组的人是不会读波斯文报纸的，而且，他还在叫着其他人的真名，弄得大家神经高度紧张。

真是好事多磨，机械故障竟然导致这一个航班晚点。就在他们焦急地等待之时，却发现伊朗革命卫队的那些人开始将目光转向外国乘客。此时，门德斯竟然又没了踪影，这让所有的人一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就在大家惴惴不安的时候，门德斯终于回来了，大家就像见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原来他去向机场的工作人员打探航班延误的原因。不一会儿，众人听到机场广播宣布：“乘坐瑞士航空公司363次班机的乘客，请准备马上登机。”

当门德斯一行人穿过停机坪登上飞机时，他们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了。飞机腾空而起的那一刻，门德斯意识到，他完成任务了。几小时后，“六工作室”的第三条电话线第一次响起。安迪紧张地拿起话筒，电话另一端说：“结束了，他们混过去了。”

门德斯这次行动几乎完美。几小时后，6名被困在德黑兰的美国外交官员终于安全抵达瑞士。

“蓝光”行动弄得沸反盈天

剩下人质的解救并没有这么顺利。

1980年4月1日，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在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只要美国公开宣布停止对伊朗的一切敌对行动，伊朗政府将从学生手中接管人质，直到伊朗新议会就人质问题作出决定为止。卡特认为伊朗总统的讲话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人质问题似乎出现了某种转机。



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

可是到了4月7日早上，霍梅尼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布霍梅尼本人反对将人质交给伊朗政府监护。这天下午，卡特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同伊朗断交，停止同伊朗的贸易关系，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清理美国已经冻结的伊朗资产并准备用于救济被扣人质的家属等等。卡特强调，如果这些行动还不能使人质获释的话，美国就要考虑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4月11日，卡特召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分析了伊朗局势和人质问题，决定武装营救人质，行动代号为“蓝光”行动。

4月23日，美国“尼米兹”号航空母舰驶进了阿拉伯海域，“蓝光”突击队已在“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集结待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琼斯将军走进了五角大楼的指挥室，有关人员均已各就各位。停泊在阿拉伯海上的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全速驶离苏联的电子监听船。8架RH-53直升机载着90名“蓝光”突击队员，离开“尼米兹”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升空后绕“尼米兹”号飞了一圈，然后向北飞行。在此之前不久，美国6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装载着90名空中支援部队和

大量的汽油及各种军事装备，事先未同这些国家打招呼，就从埃及向东飞行，越过沙特阿拉伯，降落在阿曼的马西拉岛加油后，接着径向伊朗境内的预定目标飞去，并先于直升机抵达塔巴斯。

当地时间晚上8点，8架RH-53直升机进入伊朗领空。90分钟以后，一架直升机出现故障，不久又有一架飞机遇到了沙漠风暴，辨不清方位，只好返回“尼米兹”号。其他6架直升飞机飞到了目的地。“蓝光”队员下了飞机，早先抵达的6架“大力神”运输机给直升机加油。其中有一架直升机在加油时发现液压系统失灵而螺旋桨无法转动，这时能继续执行任务的直升机就只有5架了。原来计划规定要完成任务最低限度需要6架，现在只有5架，怎么办？行动队长贝克威思上校主张压缩营救行动的规模，减少突击队和支援部队的人数，用5架飞机去继续执行任务。但是其他军官不同意，强调突击队没有进行过用5架飞机执行任务的演习，现在贸然去干，风险太大。这时，贝克威思上校感到责任重大，赞成取消这次行动，他通过卫星电话同华盛顿联系，卡特最后不得不下令同意计划取消，立即撤退。

正当“蓝光”突击队准备撤退时，一架“大力神”在黑暗中滑行时撞上了一架直升机，两架飞机顿时爆炸起火，8人当即身亡，4人严重烧伤。火越烧越旺，两架飞机上的弹药箱开始冒烟。如果弹药爆炸，剩下的5架运输机也可能“报销”，那么所有的“蓝光”队员和支援人员全都甭想回去了。贝克威思立即命令抬上4名伤员，所有的人全部上“大力神”运输机，8具尸体留下了，4架完好的直升机扔下不要了。5架美国C-130运输机开足马力全速撤出了伊朗。

就这样，准备了4个多月的营救计划，执行不到4个小时就全部告吹。“蓝光”在伊朗的荒漠中熄灭了。

美国武装营救人质活动失败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巨澜，整个美国乃至全世界被“蓝光”行动弄得沸反盈天。1980年4月26日电视台的头条新闻就是“蓝光”失败的消息。各家电视台争相报道事件的真相、事态的发展和世界各地的反应。从早至晚，全是与“蓝光”有关的内容。这一天，白宫在10个小时内收到了3210个电话和1739封电报。国会议员们激昂慷慨，争相表态。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丘奇和扎布洛基指责卡特事先未同国会磋商，违反了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

法》。民主党众议员罗斯强烈要求卡特退出1980年的大选，并“在任内安分守己，不得再轻举妄动”。只有共和党参议院领袖贝克、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以及乔治·布什和尼克松、基辛格等一些有影响的政界人士表示完全支持卡特的行动，并强调“美国公众现在应表现出团结”。国务卿万斯早在营救行动之前因不同意这一行动而提出了辞呈。他认为，派少量军队深入到距本土约6000英里的一个有着3000万人口的狂热国家中去，是不可行的。即使袭击侥幸成功，一些人质也将会遭到伤害；如果他们获救，其他美国人也肯定会被抓起来，许多伊朗人也会遭杀害。

美国的武装营救行动让伊朗政府十分反感，4月25日，霍梅尼发表讲话警告说，如果卡特再次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所有进攻者和人质都将被打死。他命令所有军队、革命卫队和其他安全部队都进入戒备状态。伊朗外长同日对法国和美国记者发表谈话，称美国的行动“是对伊朗进行的战争行动”，“如果美国再次采取类似行动，伊朗将让它的石油流到波斯湾，并放上一把火”。4月26日，扣留人质的伊朗学生发表声明说：“为了使卡特得不到入侵的借口，为了使美国的军

事行动毫无结果，决定把人质分散到全国各个城市里继续扣押。”伊朗军方也表示，将对雷达系统进行调整改进，并宣布部队已处于戒备状态，以防美国再次入侵。

1980年7月27日巴列维国王逝世，9月，两伊战争爆发，伊朗政府越来越希望能够尽快解决人质问题。1981年1月19日，经过阿尔及利亚的大力调解，美国和伊朗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伊朗释放全部人质，美国归还被冻结的大约8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1月20日，53名美国人质在卡特中止总统职务前30分钟获得了自由，并且全部交给美方。至此，他们已经被扣留了444天。

人质们被送到位于西德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前总统卡特以现总统里根特使的身份在那里接待了他们。在进行了身体健康检查和事件汇报后，他们飞回华盛顿并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国际关系史上一场空前的人质危机，在经历了444个日日夜夜之后终于宣告结束。

2005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德黑兰市前市长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为伊朗总统。然而就在这

时，美国政府和当年的一些人质就放出言论，指认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参与当年的人质劫持行动。尽管伊朗政府对此予以坚决否认，但美国政府与这位强硬的伊朗总统内贾德从此就结下了“梁子”。

伊朗人质问题之后，中情局老牌中东情报分析员波拉克写道，挟持人质是针对中情局1953年在伊朗搞政变的“报复行为”。这起陈年往事所波及的不仅仅是卡特时代，而且是一直纠缠着卡特之后的四任美国总统，造成数百名美国人在中东送命，美国同伊朗中断外交关系达6年之久。

没有想到6年以后，一起“伊朗门”事件，让美国 and 伊朗这一对“老朋友”又走到一起了。

“伊朗门”事件

从1984年开始，西方国家驻黎巴嫩的一些外交人员、记者和教师等连连遭绑架，这些被绑架的人当中有7名美国公民。美国为了使人质获释，曾想通过叙利亚同绑架人质的“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接触，因为该组织的活动范围由叙利亚控制。但“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却提出要美国帮助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法国和科

威特等地的黎巴嫩战俘为条件，否则不但不释放美国人质，还要将人质逐个处决。几天之后，他们果然处决了巴克利。这使美国政府对叙利亚失去了信心。

后来美国发现，真正能够控制该组织的是伊朗的“伊斯兰解放运动”，于是，美国政府便派中间人暗地试探霍梅尼政府的反应。伊朗政府反应消极，因为在霍梅尼的眼中，美国仍然是“犯罪的西方”，是“魔鬼撒旦”。

1985年6月14日，黎巴嫩“真主党”的同伙又在从雅典前往罗马的途中，劫持了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第847号班机。恐怖分子从人质中认出了美国海军潜水员罗伯特·斯特塞姆，就把他给枪杀了，将他的尸体丢在停机坪上。几天以后，环球航空公司第847号班机上活着的人质从大马士革回到了美国，这件事使美国人想到，这实际上是伊朗在背后操纵的结果。因此，美国政府就想再次通过伊朗对黎巴嫩施加影响，促使被扣押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恢复自由。

通过中间人进行试探，伊朗暗示，期望得到前国王巴列维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战斗机的零部件，以便恢复使用这些早已被搁置的飞机。

美国同伊朗中断关系六年了，白宫感到无从下手。以色列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戴维·金奇就建议，美国政府可以利用在伊朗长期活动的军火商考柏·宁格蒂来做这件事。里根总统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及其助手与伊朗代表进行了极为隐秘的会谈，然后由以色列人担保，以一飞机军用物资交换一名人质的原则，分别于1985年9月、1986年7月和11月换回了三名美国人质。

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顺利呢？原来在1985年7月底，霍梅尼召见伊朗几个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他说：“为了伊朗的国家利益，如果华盛顿表示愿意改变它的政策，同美国接触也是可以的嘛。”

霍梅尼的这次谈话很快传到了美国驻贝鲁特外交官那里。他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就马上报告了里根总统。里根总统立即与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国防部长温伯格以及国务卿舒尔茨进行磋商。大家认为，同伊朗接触不仅可以给人质获释带来希望，而且还可以打开与伊朗建立关系的大门。由于此举关系重大，将直接影响美国人质的安全和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利益，因此就由麦克法兰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去同伊朗人沟通。

1985年9月3日，麦克法兰在伦敦会见了充当媒介人的以色列外交部办公厅主任戴维·金奇。金奇是一位外交老手，他替伊朗担保，一旦美国交付了一架飞机的军火，24小时就会有一名美国人质获释。不久，由以色列人驾驶的一架飞机，载着反坦克导弹、飞机零部件和弹药飞抵德黑兰。此后，美国人质陆续获释。

到1986年11月2日，已经有3名美国人质获释。据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赖特透露，截至当时，伊朗为购买武器向美国支付了1200万美元。但据美国司法部长透露，伊朗支付购买武器的金额约达3000万美元。

然而，就在1986年11月2日，黎巴嫩《船桅》周刊披露了麦克法兰秘密访伊和运送武器事件。11月4日，伊朗议长拉夫桑贾尼也公开了麦克法兰访问伊朗的秘闻。以武器换人质的秘密交易，涉及到美国对恐怖活动和两伊战争的态度。美国过去绝不向恐怖分子屈服，也不同他们谈判，更不要说卖武器给他们。因此，以武器换人质的事件一经曝光，美国国内一片哗然，里根政府的声望急剧下降。这就是当年的“伊朗门”事件。

国会马上成立了“总统特别调查委员会”进行调

查，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委员会也举行了多次联合听证会，里根总统的态度不得不由公开否认走向承认是“一个错误”，撤回了对与事件有牵连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盖茨的任命。

1990年6月，已经辞职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也被定有罪。

据后来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整个“伊朗门”事件中，中情局一直是积极参与者。前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就直接参与了“伊朗—尼加拉瓜”计划。他不仅提供情报人员，还称赞尼加拉瓜行动是“最重要的秘密行动”——因为伊朗一直在为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提供军火。

“伊朗门”丑闻虽然成为里根任内最不光彩的一页，但它却又一次拉近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从而重新打开了两国外交的大门。

2005年6月，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并于2009年连任以后，美伊关系又进一步恶化。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核问题通过了包含制裁内容的第1929号决议，对伊朗实行自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制裁。

部分西方分析人士称，伊朗多次开展导弹试射，似乎要展示其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实力。截至目前，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以色列尚未排除武力打击伊朗核计划的可能。

美伊交恶，恩怨难了——中情局“功不可没”。

第十四章 兵犯越南，玩火自焚终无赢家

法国人即将失去越南，中情局立即从菲律宾秘密派遣一支行动小组进入越南执行破坏任务；中情局长对越南傀儡政权的评价是：“吴庭艳的确是个‘畜生’，但他是我们的畜生。”破坏“胡志明小道”，成立“人民行动队”暗杀越共和北越游击队员——中情局在越战中战功赫赫，然而总统尼克松却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

中情局说“美国不应放弃越南”

20世纪中情局在亚洲的“最佳业绩”，就是在越南战争中的表现。

美国人的越战从1961年开始到1975年正式结束，长达14年之久，是当年美国在印度支那最长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当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次时间最长的对抗。这场战争在美国前后经历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五位总统。

二战前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中曾一度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进入河内市，在越南北方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北越”）。法国则扶持保大皇帝在南方的西贡市立国，于是北越和法国进行了长达9年的法越战争。从这时起，中央情报局就介入了这场战争。

1950年，美国开始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到1954年为止，美国已经承担了这场战争78%的费用。美国把越南战场视为遏制共产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3年4月，艾森豪威尔就批准了一项决议：“立即租借给法国6架巨型运输机在印度支那使用，并由民航飞行员驾驶。”为了保密，他让艾伦·杜勒斯主政的中情局处理此事。

由于美国人的大力支持，这场法国人和越南人的战争变得异常残酷。直到1954年5月7日，越南人民军

经过55个昼夜的浴血战斗，才夺取了奠边府，迫使奠边府的法军投降，整个印度支那战局因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日内瓦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法国国家元首孟戴斯·弗朗斯就建议把法国的军事力量限制在北纬17度线以南。法国人的这种让步，让苏联和中国代表团很是惊喜，但他们还是向法国人讨价还价，达到最后把法国人赶出越南的目的。

中情局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向国会提出报告。中情局在报告中说：美国的军事援助对法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越南是西方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势力的前沿，“基于这些原因，美国不应放弃越南”。

当时艾森豪威尔反对通过谈判来解决印度支那战争。他担心越南会落入共产党的手里，东南亚随之会发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敦促美国出兵干涉，并且要求作出估计，一旦美国在越南使用原子弹，将会引起什么后果。国务卿杜勒斯、副总统尼克松、国防部长威尔逊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陆军参谋长马修·李奇微将军除外）等白宫全体成员，都赞成动用核武器。美国空军参谋长特文宁

说：“如果当初在奠边府使用战术原子弹，就能清除那里的共产党，高奏《马赛曲》了。”

但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他说：“我不愿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第二次对亚洲人使用原子弹，这将可能使美国在亚洲和整个第三世界被置于屠夫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我痛恨原子弹那个可怕的东西。”

中情局支持了艾森豪威尔的观点。1954年6月15日，中情局在一份情况估计报告中指出：“中国人将不惜任何代价，采取他们认为必要的军事行动来防止越盟的灭亡。美国在印度支那使用核武器只能加速中国作出是否参与越南战争的决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提出建议，美国应取代法国在越南收拾残局，扶植新的南越傀儡政权。

1954年7月20日，由法国、英国、苏联、中国、柬埔寨、老挝、南越和北越共同签署了《日内瓦停火协议》（即《日内瓦协议》），一致同意在越南举行全国性的公民投票选举。但是美国代表没有在这份协议上签字。不过美国副国务卿、中情局前局长史密斯在代表美国发言时说，虽然他的政府没有在协议上签

字，但美国不会使用武力来破坏协定。在法国撤离印度支那的过程中，美国将逐步填补这里的“真空”。根据日内瓦会议的决定，老挝和柬埔寨独立，越南沿北纬17度线分为两部分。北部是由胡志明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南部是由保大国王统治的越南王国。

在法国人还没有完全撤离时，美国就已经派出人员进入越南。在日内瓦会谈期间，兰斯代尔上校就作为中情局的第一批人员，以军事顾问团成员的身份来到西贡。中情局长杜勒斯给他的指示是，悄悄进入越南，尽可能不去激怒法国人，要疏远他们。他当时给兰斯代尔的任务是，建立和扩大军事顾问团，以便“开展反对敌人的准军事活动，展开心理战”。

兰斯代尔来到越南后，向法国提出建立中情局驻越办事处，但遭到了拒绝，中情局驻越人员只好仍混迹于军事顾问团里。美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起初是中情局与军方的混合机构，实际是由中情局把持，中情局特工以军方人员的身份在越南活动。随着美国在越南扩大军事介入，该机构成为美国军方驻越指挥中心，中情局才建立了驻越情报站。

兰斯代尔在菲律宾秘密训练一支行动小组，由南

越军队官兵和10多名中情局特工组成，然后由美国海军船只送入越南北方。他们穿上老百姓的服装进入越南北方，前往河内散布谣言、制造混乱，执行破坏任务。当时这支行动小组的任务一是摧毁河内最大的一家印刷厂，不过后来被越盟的部队挫败了。二是进行所谓的“黑色心理战罢工”，以越盟的名义散发传单，宣布放假三天，并且公布虚假的所谓“货币改革纲要”。他们的这一行动取得了成功。第二天，越盟的货币贬值50%，河内的大多数人走上街头欢庆“假日”。三是在越盟接管政权的前一天夜里，潜入河内的汽车燃料库，将汽油弄脏，以便使汽车发动机逐渐毁坏。

这支行动小组的破坏活动前后持续了7个月，结果大部分人被抓获，成了河内谴责美国人的铁证。

《日内瓦停火协议》签署后不到一个月，中情局在一份报告中说：“如果按原定计划于1956年7月举行全国性的大选，胡志明如果不对越南的政治前景持偏见态度的话，那么他还有可能会在选举中获胜。”

连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承认：“我同熟悉印度支那事务的人交谈，他们无不认为80%的人会投共产党胡志明的票，选他为领袖。”

于是，美国政府就在南越政府中寻找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当年9月，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与兰斯代尔一致看中了南越的吴庭艳，认为他是抵制共产党势力的一张王牌。于是中情局就立即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应该尽快向吴庭艳表态，才有可能使他在南越取得成功。”

艾森豪威尔总统接受了中情局的这一建议，于1954年10月23日亲笔写信给吴庭艳，明确表示了美国对他的支持。

吴庭艳出生于越南阮朝的首都顺化，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创建了一个秘密的政党。1944年夏天，法国人宣布吴庭艳为颠覆分子，准备逮捕他，于是他逃到西贡。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越盟开始与法国人时常冲突。吴庭艳试图前往顺化，但是在途中被越盟逮捕，流放到边境地区的一个山村。6个月后，他被带到河内见胡志明，但是他拒绝加入越盟。1950年，越盟缺席判处他死刑，而法国人也拒绝保护他。胡志明的特务试图在他前去拜访他的二哥时将他杀死。于是吴庭艳在1950年离开越南流亡美国。1951年，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接见了，后来

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回到了越南。

1954年，吴庭艳到达西贡，受到中情局驻西贡军事顾问团团长兰斯代尔上校的欢迎。很快美国政府就授意保大皇帝任命吴庭艳为总理。

这时，南越的“美国化”已经开始了。美元取代了法郎，英语逐渐成为该国第二种语言。吴庭艳除了任总理外，还在寻求取代保大的国家首脑以及部队总司令的职位。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吴庭艳终于于1955年10月通过政变，当上了“越南共和国”（南越）总统，成了南越反共集团的头领。越南南方进入了“吴庭艳时代”。

吴庭艳是一位真正的独裁者。吴庭艳集团对南越进行了令人发指的残暴统治，激起当地民众的强烈愤慨。1960年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各派政治力量要求以武力推翻吴庭艳政权，统一南北两方。



艾森豪威尔接见吴庭艳

196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继承了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吴庭艳，绝对不能让越南北方统一全国。因为从1959年开始，北越就决定武装统一越南，并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武装颠覆。

1961年5月，为了支持吴庭艳政府，肯尼迪派遣了一支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100名美国特种部队官兵进入南越，开启了美军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的先河。历时14年之久的“美越之战”由此拉开序幕。

1961年底，第二批400名美军士兵作为教官到达西贡。在不到一年左右的时间，美军在越南南方的数

量就增加到了1.2万人。

在美军的支持下，吴庭艳的南越军队以西贡市（今胡志明市）为中心，对周围各省进行军事扫荡，围剿越南人民武装，同时加紧建立所谓的“战略村”，隔断南越人民武装和共产党与民众间的联系。他们强行驱赶农民离开自己耕种的稻田和村庄，把他们集中到“战略村”里。凡是不愿离开的，就向他们的稻田里撒化学毒剂，让他们的庄稼无法生长。他们在这些“战略村”周围设置多道屏障，到处是尖桩地带、壕沟、土墙、地雷带等，出入口由哨兵把守，并且在“战略村”里进行大清洗。

当时村子里的首领以每天一人的速度失踪。他们残缺的尸体在地下、河岸和洞穴里被找到，脖子上缠着一个标有“人民的敌人”的标签。到了1959年底，“政治犯罪”的频率达到每天10起，到1969年末，已上升到平均每天25起。1960年至1961年间，至少有1.8万名越共人员被处死，1.4万人被捕入狱等待审判，通常最终被判处死刑。到吴庭艳下台时，约有5万人被处死，7.5万人被关押。

肯尼迪政府开始对吴庭艳集团的做法不大放心，

就暗中指示有关人员调查吴庭艳集团的执政情况。实际上，吴庭艳当时在越南很不得人心，几乎遭到了所有社会阶层的反对。他一无军队，二无警察，三无政府，不过他得到了兰斯代尔上校的支持，以及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战争宝库中的金钱、人力、武器、训练、宣传和政治方面的帮助。

为了扶植吴庭艳政府，兰斯代尔在北越活动的各路人马煽动北越天主教徒以及被法国人抛弃的信奉天主教的军队逃往南方。中情局驻西贡的军事顾问团向越南天主教徒许诺，如果他们愿意移民，就会得到土地、房屋和贷款。中情局组织散发了伪称是越盟的传单，对越南民众进行恐吓。

中情局各组散布“中共军队强奸越南姑娘、对村庄进行烧杀抢掠”的谣言，还散发各种传单，散布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河内和北方各城市必将毁灭干净等言论。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内，中情局为被它诱惑的北越人免费提供交通，由中情局安排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和美国海军的军舰，将100多万北越人连恐吓带诱惑赶到越南南方。

在这场大欺骗行动中，美国海军军医汤姆·杜利中

尉是个“显赫”的人物。他在越南海防市组织了3500名天主教徒集会，要求到南方去。他利用医生这个人道身份作伪装，在美国的报刊上写文章，捏造越盟开肠破肚残杀了1000名孕妇，用竹棍敲打赤身裸体的神父的睾丸，用筷子插进儿童的耳朵不让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等等耸人听闻的谎言，欺骗美国国内舆论。直到1979年调查他的罗马天主教圣徒身份时，他作为中情局特工的真相才被揭露出来。

虽然天主教在以佛教为主的越南南方人数极少，但他们却成为吴庭艳政权的社会支柱。通过欺骗行动搞到的100万人口增强了吴庭艳的实力。

在古巴“猪湾事件”后，肯尼迪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特种战争”和“特种部队”。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原有的特种部队名存实亡。肯尼迪决心重新组建，亲自给予指导。由于西方没有关于游击战的理论著作，他开始研读毛泽东和格瓦拉在游击战方面的著作，并把这两种书指定为有关军事人员的必读书。在泰勒的帮助下，他扭转了美国军事领导人的抗拒情绪，在北卡罗来纳州建立和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装备与人员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了五六

倍。不久，海、空军也跟了上来，海军发展两栖部队和水下破坏队伍，并仿效越南渔船建起了一支船队，在越战中专门骚扰越共的海上供应线。在空军中建立了支援丛林战争的运输机队以及称做“森林杰姆”的突击队。海军陆战队员增加了1.5万人，全部接受游击战训练。国防院校的课程中增加了游击战与“反暴乱”行动的科目。

特种部队是肯尼迪的得意之作。他对其装备细节都亲自过问：下令都戴“贝雷帽”；以轻便胶鞋代替笨重军靴以适应丛林泥泞土地，后来又指示给胶鞋底打上铁钉以应付南越武装设置的蒺藜；还指示为身材矮小的南越士兵专门设计了更轻便的战地收音机以及火力相同而枪身较短的步枪等等。这支队伍不但要执行军事任务，而且要执行文职任务。他们要能在丛林、乡村以及敌后生活。据说肯尼迪经常引用毛泽东关于战士与老百姓应是“鱼水关系”的话。他知道游击战争的力量在于群众的支持，因此，他的计划不是依靠大量投入美军作战，而是以少而精的特种部队，和越南人民建立“鱼水关系”来打败越共。但在这一点上，作为侵略越军的美军注定了这一尝试必然彻底失败。

由于吴庭艳拒绝在南越实施政治和经济的改革，使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吴庭艳政权，西贡的局势日益恶化。中情局情报人员从西贡发回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吴庭艳在南越实行独裁专制政策，使南越的知识分子阶层和社会中坚力量与现政权离心离德；吴庭艳把国家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里，把一些在政治上有影响的伙伴推到了对立面。1961年再次来到越南的兰斯代尔也发出了警告：吴庭艳和他的负责南越秘密警察的兄弟吴庭儒联合镇压反对力量，在南越内部产生了不安定的情绪，政局相当动荡。

兰斯代尔对吴庭艳逐渐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扶不起来的政府。但肯尼迪没有理会中情局来自南越的情报分析，而是派出总统军事代表、后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泰勒将军和白宫班子成员罗斯托去东南亚，对急剧恶化的南越局势作出正确估价。

泰勒和罗斯托都是持强硬路线的鹰派代表，二人在西贡及周围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后，11月份向肯尼迪作了汇报，要求首批向南越派出8000名美军人员，以后再增加到20万人；还要求向南越派出大规模的美国顾问团，并对吴庭艳政府进行改组。泰勒认为，越

南并非不适合打仗，但不派军队便不能完成美国挽救南越反共政权的计划（此前，吴庭艳政府已要求美国派出战斗部队去越南）。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也坚决要求派遣美军去南越参战。

泰勒和罗斯托的报告提出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顾问和其他白宫的“新边疆”人物均表示赞同，只有副国务卿鲍尔和主持老挝谈判的哈里曼等少数人提出谋求政治解决的主张，反对出兵东南亚。

另一些行政官员对泰勒调查团的建议是有取有舍的。他们赞成扩大军援，但反对派遣战斗部队。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国务卿腊斯克。他告诫说，美国不应把新的威望赌注押在一匹看来要输掉的赛马上。不过，他们都赞成军方提出的其他军事干涉措施。

11月5日，肯尼迪决定实施泰勒调查团除派遣战斗部队以外的建议。这个决定事实上确立了美国后来近三年的越南政策：用美国战斗支援部队和数量急剧增加的军事顾问，直接协助西贡政权作战，争取打败乃至消灭解放武装。

不过，兰斯代尔少将还是支持建立“战略村”、实施政治经济改革的计划。他和中情局的官员们认为，

与越共争夺的关键在农村，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科尔比支持这一观点，并搞了一些“试验点”，肯尼迪死后，“战略村”名存实亡，中情局所从事的军事活动也逐渐转交给美军司令部。

1961年12月，肯尼迪准备派出军事代表团去西贡，同时命令国防部准备派遣美军去南越。不久，大量的陆军车辆、直升机和B-26型轰炸机在南越集结，大批的美国特种部队踏上了南越的土地。在泰勒和罗斯托提出报告后的15个月的时间里，美国陆军部队在南越大动干戈，美国空军也出动飞机轰炸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阵地。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在越南的急剧增加，原先的军事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南越军事援助司令部。

中情局尽管对白宫在越南采取的政策存有种种疑虑，但他们仍然死心塌地为美国政府效力，妄图赢得这场战争。在南越各地的中情局秘密特工人员千方百计地施展各种手法笼络当地人，从他们那里了解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民解”）的活动情况，直接为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提供情报，以配合美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

1963年初，吴氏兄弟公开表示美国应减少驻越人员，结果引起了美方的强烈不满。美、吴之间的矛盾导致吴庭儒在1963年春同北越和“民解”秘密接触，试探“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他认为只要对美国人下逐客令，北越就很可能尊重自己兄弟二人在南越的统治地位。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获悉了吴庭儒的这一举动后，马上报告了白宫。

不过吴庭艳又一相情愿地认为，美国派遣军事人员来南越参战，是对他个人及其政权表示支持，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地镇压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对佛教徒也横加摧残。他派兵进攻和占领了许多佛教寺院，逮捕了上百名佛教僧侣，使已经混乱的南越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

1963年5月，在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87年纪念日那天，吴庭艳派兵干涉古都顺化佛教徒的佛事活动。吴庭艳的士兵在顺化市开枪打死9名虔诚的佛教徒。为抗议吴庭艳政府的野蛮行径，6月11日，佛教界德高望重的广德和尚在繁华的西贡街头将汽油浇在自己的身上，盘膝而坐，点火自焚。一些僧侣团团围住他，以自焚身亡表示对吴庭艳迫害佛教徒的抗议。由于佛教

协会提前通知记者到场，这一事件在全世界，包括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震动。后来，又有一些和尚相继效仿，相继发生了七起僧尼焚身自杀事件。

8月21日，吴庭儒命令他的特种部队在半夜偷袭佛教徒的寺庙，他们使用了机关枪和催泪弹。

当时南越负责对外宣传的是吴庭艳的弟媳陈丽春。由于吴庭艳一生没有结婚，于是陈丽春就成了南越的“第一夫人”，外号“龙夫人”。陈丽春虽然年轻漂亮，却以狠毒残忍著称。当西方记者问及僧尼自焚事件时，“龙夫人”竟然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和尚烤肉”，是“烧烤表演”。“让他们烧死，我高兴得鼓掌”。

“龙夫人”此语一出，极大地震惊了美国政府。肯尼迪亲自写信训斥吴庭艳，警告他不要乱来。得意忘形的吴庭艳非但不听，而且派“龙夫人”到美国巡回演讲，大骂肯尼迪不够意思。肯尼迪猛然醒悟，必须在南越“换马”，否则后患无穷。于是他下令中情局，着手“解决”吴庭艳。

1963年的夏季，在华盛顿召开的几次反暴乱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对如何处理吴庭艳及其声名狼藉的亲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中情局局长约翰·亚

历克斯·麦科恩力保吴庭艳。他争辩说，吴庭艳的确是个畜生，但“他是我们的畜生”。

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不同意推翻吴庭艳，他曾公开称吴庭艳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是我们在那里的独生子”。

但是，自从8月21日吴庭儒派兵袭击了寺庙后，吴氏兄弟的命运也就决定了——8月24日下午，由哈里曼、远东事务助理罗杰·希尔斯曼和总统顾问的助手迈克尔·福雷斯特尔3人共同起草了一份电报，准备发给新任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电报中授权洛奇转告一些南越高级将领，如果他们能推翻吴庭艳政权，美国将承认他们组建的新政府。电报还要求这些军事将领们迅速把吴庭儒夫妇赶下台，否则，美国不可能继续在军事和经济上支持南越政府。

电报稿拟定了之后，却找不到人签字。这一天刚好是星期六，大多数官员都离开了华盛顿。起草电报的这三个人四处寻找各方面的头头签字同意。肯尼迪最后批准了，但条件是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也必须同意。国务卿腊斯克同意了，但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邦迪都不在，是由他们的副手签字的。中情局方面是由赫尔姆斯签名的。电报就这样发出去了。

可是，当这些头面人物在周一回到华盛顿并得知电报的内容后，都非常恼怒。随之而来的是激烈的辩论会和混乱的状况，总统肯尼迪惊呼：“我的上帝啊，我的政府已经四分五裂了！”

在这期间，白宫的态度摇摆不定。批准搞政变的电报先是收回，继而又恢复生效，让西贡那些准备搞政变的将军们不知所措。于是，肯尼迪派了一个使团去西贡调查那里的实况，但他们却带回了两种意见：海军陆战队的克鲁拉克将军断言那里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而国务院的约瑟夫·门登霍尔则报告说那里的政权正在崩溃。肯尼迪哭丧着脸说：“天哪！你们去的是同一个国家吗？”

就在华盛顿争论激烈的时候，南越总统特别军事顾问杨文明将军找到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约翰·理查森，向他汇报了准备暗杀吴庭艳兄弟的计划。理查森马上把杨文明的计划报告给洛奇大使和中情局总部。

9月5日，中情局局长麦科恩得悉杨文明的暗杀计

划后，认为中情局不应参与暗杀行动。尽管麦科恩不赞成政变，但还是执行了白宫的指令，“向西贡的南越军方首领们表明了美国支持政变的态度”；后来中情局驻西贡站还对那些政变的南越军官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美国驻南越大使洛奇是肯尼迪的亲信，他的意见很有分量。当时他向白宫报告说，吴庭艳是阻碍美国赢得战争胜利的绊脚石，他催促华盛顿尽快支持反吴庭艳的将军们。肯尼迪最终按照这个口径批准支持政变。

1963年11月1日中午，西贡爆发内乱，南越政变开始了。卢西恩·科宁带着美元赶到了政变司令部对那些将军们说，这些钱是用来抚恤在政变中丧命的弟兄们的。这时，头戴红巾的政变部队在西贡一路杀过去。次日凌晨，18辆坦克冲进总统府。吴庭艳两兄弟和他们手下为数不多的卫兵在总统府一直死守到黎明。吴庭艳见大势已去，就亲自打电话给政变的将军们，同意投降。直到这时，科宁才离开政变司令部，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大约10点钟，科宁又来到政变司令部，他这次来

是奉肯尼迪之命，探听将军们准备如何发落吴庭艳。将军们告诉科宁，吴氏兄弟已经从总统府通过地道逃到郊外的堤岸市。吴庭艳逃生后，随即派密使与政变头目谈判。政变军队称，只要吴庭艳交出政权，就可到美国养老。吴庭艳兄弟信以为真，从藏身的天主教堂出来，被政变士兵捕获后，在装甲车里被乱枪打死了。两具尸首遍身弹痕和刀伤，痛恨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后来，赫尔姆斯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一个人在政变中被杀，我可说不清这到底算不算是暗杀。对于吴庭艳之死，我们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出于非常简单的政治原因，吴庭艳死在他自己同胞的手中，要是不发生这次死人事件，而是采用其他方法让南越政权变更的话，那就更理想了。”

吴庭艳一死，西贡的政局变得更加动荡不定，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六次军事政变和政权改组，形成了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一个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

中情局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播撒碘化银

1963年下半年，越南战场军事形势恶化，肯尼迪政府考虑加大攻击北越的力度，但是面临着1964年的大选，他又不敢公开攻击北越，于是只好利用中情局加强秘密战。没有想到，几天以后，肯尼迪就在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了。这时离吴氏兄弟二人的死才20天时间。

11月24日，白宫的新主人约翰逊召开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把肯尼迪将越南引向战争冒险行动的全班人马都召集在一起，其中包括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美国驻越南大使洛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中情局局长麦科恩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继续在越南打下去。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争论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会议结束后，由约翰逊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向报界宣布：约翰逊总统将沿袭前总统肯尼迪的政策，把越南战争打下去。

白宫的新主人既然下了命令，中情局就闻风而动。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中情局前中东问题情报分析专家罗伯特·W. 科默设想了一个代号为“长生鸟”的计划：训练越南人从事各种秘密行动，中情局则

集中精力对搜集到的情报进行分析。科默提出，中情局和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联合进行情报协调和开拓。为此，中情局特地派出得力干将科尔比去西贡，负责“长生鸟”计划的日常工作。

1964年1月，约翰逊正式批准了这项计划，即“34-A行动计划”，自2月1日起实施，主要内容为：派U-2型侦察机和地面特务搜集北越情报；用空投和海上进入的突袭队破坏北越沿海地区重要的交通线；派遣南越鱼雷快艇，在中情局和“绿色贝雷帽”的陪同下，袭击人民军海、空防设施。

中情局开始向越南北方空投特务，总共空投了八次，多数小组保持着地空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此外，秘密战还有两项内容：一是伙同万象政权对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和老挝战斗部队进行轰炸。美国在老挝组织了一支由几十架美制T-28型战斗轰炸机组成的空中力量。这些飞机全都涂有老挝王国空军的徽号，其中多数属于中情局，由美国驻老挝大使控制下的美国和泰国飞行员驾驶。轰炸从1964年春开始，由一支代号为“美国佬小组”的美国海空军侦察机中队为其确定目标。二是派出无线电监测船只，搜集和窃听越南

沿东京湾一带的各种通讯。

美国的秘密战，遭到越共更频繁、更猛烈的反击，波来古、新山一等空军基地遭到毁灭性炮击，美军军官宿舍挨炸。

1965年3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美国驻西贡使馆外引爆了汽车炸弹，许多人受重伤，其中包括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站长。约翰逊政府随之开始对北越实施大规模空袭，并向越南大量增兵，20多万美军作战部队正式参战。

此时，中情局在西贡的情报官员已达400人，成为中情局在海外最大的情报站。在头顿有一个搞清乡扫荡的绥靖工作训练中心；在岷港有从事34-A秘密行动的船舶基地；另外还有一支由中情局训练和武装的苗族军队。

在中情局内部，有许多人对越南的前途悲观失望，不愿去那里工作，但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去挽回已经不可挽回的局面。1964年，在计划部任远东处处长的威廉·科尔比（1973年后，他升任中情局局长）为在越南工作的中情局人员制定了轮换制度。他想在中情局局内实行官员轮流去越南服务的制度，理由是“把这

个危险而困难的任务更公平地分配给其他地区处，让大家共同来分担在越南的重任”。科尔比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局长麦科恩。麦科恩冷冰冰地抢白道：“科尔比先生，总统认为越南是我们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要求我们派遣出类拔萃的人去那里工作。你必须派我们质量最高、最好的人去，并把他们留在那里。我可不愿再听到别人说，让不称职的人到那里去分担责任等诸如此类的话。”

1963年11月，中情局提出运用人工降雨的手段来对付“胡志明小道”，在“胡志明小道”上空播撒碘化银制造暴雨，引发洪水，阻断交通。但在具体行动中却与美国空军合作得很不顺利。中情局指责空军干活儿粗糙，质量不高且不彻底，空军却认为中情局是鸡蛋里挑骨头，充满受中情局摆布的怨气牢骚。在整个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胡志明小道”上先后动用飞机2600多架次，投放催化弹7400多枚，耗资2100多万美元，参加人员达1400多名。

1965年，中情局驻西贡情报站成立了“人民行动队”，训练南越反攻骨干力量。受训后的南越人被派往农村，与越南南方的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对抗。在“人民

行动队”成立后的5个月里，“人民行动队”的小分队共打死了150名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人员，俘虏了200多名，而他们自己只有6人死亡，20人受伤。中情局为此趾高气扬，在华盛顿也觉得风光多了。然而，“人民行动队”很快被美国驻越南军援司令部看中了。泰勒将军对中情局训练南越人的计划很感兴趣，1966年11月，驻越军援司令部终于把“人民行动队”接管过去。为此，中情局一直耿耿于怀。

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们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的这场战争悲观失望，这不仅使中情局与驻越军援司令部之间矛盾丛生，而且与空军、白宫以及美国政府中的其他机构的关系也很紧张，此时的中情局简直成了孤家寡人。

中情局驻西贡站站长理查森原先与吴庭艳兄弟俩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他强烈反对美国同意南越的将军们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吴庭艳政权。这件事使洛奇大使十分恼火，他经过一番幕后工作之后，终于迫使中情局将理查森召回美国。1964年，皮尔·德西尔瓦接任西贡站站长。



在柬越边境“胡志明小道”的越共游击队单车补给队

此时，中情局局长麦科恩认为，在越南战争中遇到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他不希望新任站长德西尔瓦与洛奇之间再发生类似不愉快的事情。

在肯尼迪任总统时，他每天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中情局送来的情报简报。约翰逊当总统后，与肯尼迪大相径庭，他只是在工作之余，才浏览一下中情局送来的简报。最后，他索性减少参加国家安全委

员会决策会议的人数，在每周一次的工作午餐上，也不邀请麦科恩参加。

总统的冷遇让麦科恩心里很不是滋味。麦科恩是企业家出身，腰缠万贯，他还有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他认为既然自己和总统的关系不融洽，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中情局担任这徒有虚名的局长，于是麦科恩辞去了局长的职务。

1965年4月，约翰逊任命已退休的海军中将威廉·雷伯恩出任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为副局长。

雷伯恩对国际事务孤陋寡闻，对情报业务更是一窍不通，加上他的态度又蛮横粗暴，引起了中情局很多人的不满，有人甚至嘲弄他，有关雷伯恩愚蠢的笑话很快在局内流传开来，后来竟然上了报纸，这使赫尔姆斯很难堪，白宫也知道了这些事情。所以，每当总统顾问邦迪打电话通知雷伯恩去白宫参加会议时，总要加上一句话：“总统要局长带赫尔姆斯先生一起参加会议。”雷伯恩对此很不舒服，因而，对赫尔姆斯很是嫉妒。

就在约翰逊任命雷伯恩为局长之前，特地将赫尔姆斯召去，坦率地对赫尔姆斯说：“我让雷伯恩去中央

情报局只是暂时的安排，我让你参加所有的会议，当你能接过这副担子时，就任命你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结果，雷伯恩在中情局局长的位置上只待了14个月，就下台了。中情局总部的人员说，雷伯恩在局长任内留下的唯一有影响的一件事，就是禁止了中情局自助餐厅卖白面包，因为他吃惯了海军常吃的那种黑面包。美国情报界认为他是历任局长中最无能、最无作为一个的。

1966年6月18日，约翰逊正式任命赫尔姆斯担任中情局局长，他是在中情局历史上第一个由普通特工人员逐级升任到局长的人。

赫尔姆斯于1913年3月30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的圣戴维斯城，早年随父亲到欧洲，曾在瑞士和德国求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赫尔姆斯到美国海军预备队服役，后来调入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不久他以海军少校军衔到欧洲战区活动。1943年，赫尔姆斯前往柏林，在艾伦·杜勒斯的手下从事秘密活动。1946年，他以海军上校的军衔退役后，转入美国陆军部战略情报部门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中情局成立后，赫尔姆斯在负责进行秘密活动的计划处工作，先后在该处

任副处长、处长，后来又升为中情局副局长。赫尔姆斯从事情报工作20多年，享有“第一流的职业秘密活动家”的美称。

赫尔姆斯上任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中情局的士气，重现中情局昔日的神威。在前任局长雷伯恩掌舵的日子里，中情局与美国空军部和国防情报局争夺用技术手段来搜集情报的权力时，吃了败仗，元气大伤。

赫尔姆斯清楚地看到，越南战争越打越激烈，美国公众和中情局人员对这场战争的前途越来越沮丧。中情局向白宫和政府其他部门提出的建议和忠告一度被冷落，这就更增加了中情局人员的失望心理。为此，赫尔姆斯不得不运用“中央情报局必须依靠总统支持”这一理论来控制部下。

首先，中情局扩大了训练南越特种部队的活动。这些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捣毁越共的“下层建筑”，即越共军队的政工部门。从1965年开始，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情报站都忙着训练人员去组建设在西贡的所谓“特援局”。到1968年底，在南越西贡的情报站拥有近1000名中情局的谍报官员，另外还有3000人是“订了

合同的”。中情局的影响遍及越南的每个省、市、村、寨，而且深入到了老挝和柬埔寨。

1965年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要中情局对美国出动飞机轰炸北越的海防发表看法，中情局直言相告：“一般人总以为，螺丝拧得再紧一点，可能会削弱敌人抵抗的决心，迫使对方乖乖地坐下来谈判，但是，我们并不相信轰炸海防会有这样的效果。”

1966年，中情局的情报分析专家进一步断言：轰炸北越仅仅产生了一种边际效应，中情局并不期待这次空袭会产生大的结果。赫尔姆斯曾私下对一名同事说：“我们确确实实不该卷入这场战争，我们不必同那些只图背上有一袋大米就心满意足的人去打仗。”此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对待轰炸北越的问题上的观点与中情局不谋而合了。

中情局和“凤凰计划”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政府开始对这场战争的结局产生了怀疑。对方到底有多少兵力，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因为当时中情局和军方得出来的结论有很大的差距。中情局派一个叫萨姆·亚当斯的人对双方

的兵力情况进行分析，希望给白宫提供一个能靠得住的数据。萨姆·亚当斯是哈佛大学毕业，在中情局从事非洲问题的分析工作。

1967年，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估计，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包括正规军、游击自卫队、服务队和政治干部在内，总人数是27万。亚当斯从1966年缴获的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的文件中发现，敌军士兵中开小差的现象十分严重，亚当斯得出结论：敌军士兵每年开小差的人数是5万至10万。如果把这一数字同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统计出来的敌军死伤、俘虏等15万人的数字相加，那么目前敌方的兵力已所剩无几了，最多不超过7万人。果真如此，打垮敌人便成了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严峻的战场态势使亚当斯对此事将信将疑，他决定作进一步的调查。

亚当斯从调查中发现，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统计的只是身穿军服、头戴小红星软木遮阳帽的正规部队，其余武装力量都没有计算在内。实际上近年来的敌方人员变化很大，除正规军外，还有33万人的游击队。

1968年1月29日深夜，北越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的军队发动了规模巨大的新春攻势。他们向6个大城市以及所有省会城市的美国和南越政府军基地发起全面进攻，顿时使美军在战场上陷入了十分被动的防御地位。当时越共在南方战场上投入了近70万的兵力。这次“新春攻势”持续了两个多月，给美军以空前的重创。

1968年2月4日，也就是越共发动“新春攻势”的第6天，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召见了乔治·卡弗。麦克纳马拉说，他复查了所有来自越南的有关敌方军事行动的报告，发现敌人兵力的总数要比中央情报局和军方一致同意的数字多一倍。麦克纳马拉要求乔治·卡弗重新估计一下。

这时，中情局的一些情报分析专家准备把统计出来的确切数字公布于众。他们意识到，如果再对军方妥协的话，中情局的名声将会一落千丈。赫尔姆斯也认为中情局应抢先一步，争取主动。此时中情局内部却刮起了一股风，要把亚当斯开除出中情局。亚当斯感到彻底绝望了，他主动提出辞职。

1968年2月，美国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向白宫请求增派20.6万名美国士兵到越南，赫尔姆斯向特别小组的

成员介绍了中央情报局关于越南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分析报告，赫尔姆斯最后作出的结论是：“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在今后的10个月，整个越南形势最多只能保持敌我双方相持的态势。”3月底，约翰逊向高级顾问小组征求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高级小组的成员接受了中情局的观点，断定美国不应再继续卷入越南战争，应该撤军。

4月1日，约翰逊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他并不谋求担任下届总统，他要在本届总统剩下的任期不多的时间里，致力于寻找一条结束越南战争的道路。

为了挽救战场上的颓势，从1968年7月开始，西贡政权和中情局开始实施一项以逮捕、绑架和杀害民解基层干部为内容的“凤凰计划”。

1967年底，威廉·科尔比在中情局当了近5年的远东科科长后，被借调给国际开发总署驻越南的“民事行动和革命发展支援处”，来到了西贡。

科尔比回到西贡后制定了“凤凰计划”，极力主张同南越政府合作振兴农村政府，利用人们对美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渴望，把农民武装起来，把隐藏在农民中的越共秘密工作人员清除出去。

“凤凰计划”的正式名称是《隋报协调利用计划》，是美驻越军援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的联合行动计划，南越政权的情报机构也被纳入了这项行动计划。科尔比协助阮文绍起草发布总统指令，在南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各级“凤凰计划”委员会，由所有情报机构向各委员会派出代表，要求各级委员会订出指标，规定要逮捕多少越共分子，要劝说多少越共分子向政府投诚，或消灭多少越共基层组织。

此时，美国陷入了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国内分裂和动乱。从意志的较量而言，美国事实上已经输定了。面对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约翰逊总统处境十分狼狈。他不得不承认，从南越撤军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到了1968年，驻越美军已经达到52.5万人。美国已经陷入了越战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10月31日，约翰逊不得不宣布全面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

1969年，尼克松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他上台之后，和基辛格一起把中情局的工作重点摆在秘密扩大东南亚战争上。他们命令中情局以72.5万美元贿赂阮文绍总统，操纵西贡媒体以及泰国选举，并加强在北

越、柬埔寨和老挝三地的秘密突袭行动。

1970年2月，尼克松急令中情局赶紧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经过一年规划之后，终于在3月17日展开，美军B-52轰炸机以10.8823万吨的炸弹，轰炸6个疑似共产党训练营的地点。

就在赫尔姆斯忙着为驻柬埔寨新工作站动土奠基时，柬埔寨已发生政变，右翼总理朗诺掌权。政变时间正是秘密轰炸开始那一天，中情局和美国政府为之震动。

“那些混蛋到底在兰利做什么？”尼克松大发雷霆，“叫中情局那些笨蛋动起来。”他要赫尔姆斯运交数千支AK-47自动步枪给朗诺，印制100万份传单，散播美国即将入侵的消息。接着，又命中情局交1000万美元给柬埔寨新领导人，并强调“把钱交给朗诺”。

尼克松曾吩咐中情局，统计通过施亚努港流入敌手的武器弹药到底有多少。尼克松建议，中情局若能收买柬埔寨右翼军头，或许可以切断军火流动。赫尔姆斯提出异议：这些军头个个都靠军火交易进账数百万美元，中情局没有经费可以收买或租用他们的忠心。总统听不进这种辩解，1970年7月18日，尼克松

在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上对中情局的表现百般挑剔。尼克松说：“美国每年花60亿美元在情报业务上，应该要有比现在更好的成绩。”情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描述尼克松越说火越大。

在1971年的国会听证会上，科尔比曾就“凤凰计划”报告说，在执行该计划的1968年至1971年，大约有1.7万人自愿投诚，2.8万人被捕，2万多人被击毙。尽管科尔比狡辩说这2万人是被击毙而不是遭暗杀的，但臭名昭著的“凤凰计划”最终成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犯罪行的代名词。“凤凰计划”被称为“暗杀计划”，科尔比后来不得不接受国会对他亲自策划的这一计划的反复调查和诘问。

1971年春天，科尔比开始考虑回到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欢迎他归来，让他担任审计长，职位仅次于局长和副局长。尽管是第三把手，科尔比却并不满意，他本希望得到负责计划也就是秘密行动的副局长职务。

尼克松撤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

1972年12月初，尼克松免去敢于对他说“不”的中

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的职务，任命詹姆士·罗德尼·施莱辛格任局长。但是施莱辛格从1973年2月2日上任，到当年7月2日就下台了，在当了5个月的局长之后，就被威廉·科尔比取而代之。

施莱辛格的任期只有5个月，但他满足了科尔比想当负责计划的副局长的愿望。科尔比知恩图报，积极支持并落实施莱辛格搞的人事大清洗。在他的配合下，中央情报局共裁退1400余人，这些人中相当大部分是科尔比所负责的计划处的。他亲自逐个打电话通知被迫提前离开的人，尽量使他们名誉完好地离开。

1973年4月，科尔比唯一的女儿凯瑟琳因病去世。同年5月，在施莱辛格任局长3个月后，尼克松提拔他担任国防部长，提名科尔比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3年8月参议院才批准了这一提名。在长达4个月的等待正式任命期间，科尔比怀着复杂和忐忑的心情，发布了一项内部命令，规范中情局的行为准则，命令说：“中央情报局将不进行暗杀，也不诱使、帮助或怂恿其他可能去暗杀的人，只在国外收集涉及国内事务的活动情报.....要把重点明确地放在外国的有关机构和个人上，只能顺便搞好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命令还

禁止拆看美国的邮件和在“不知情”者身上试验药物，以及中央情报局应与政府其他部门保持怎样的关系，以保证置身于不正当活动之外等各种具体指示。有人说，也许是科尔比受到女儿去世和天主教信仰的影响，良心发现，以忏悔的心情规范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

1973年9月4日科尔比宣誓就任局长。他是中情局第二位“自产”的局长。

不过，科尔比的结局也并不比他的前任幸运。

科尔比在任期间，中情局深陷“水门事件”旋涡，他自然成了各界穷追猛打的对象。特别是在他任期结束前，福特总统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审查中情局的非法间谍活动。科尔比意识到，总统要将责任转嫁给中情局，因此，在调查过程中不是装糊涂，便是有意抵赖。

但科尔比知道得太多了，他最终没能逃脱厄运。1975年底，福特做出了后来被称为“万圣节大屠杀”的一系列高官罢免决定，科尔比是第一个“牺牲品”，取代他的是老布什。1976年，心灰意冷的科尔比向国会揭露了中情局的众多隐私，包括涉嫌毒品走私案和试

图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等。他还透露说，国家安全局的任务就是“监听美国或国外的通讯联络”，美国公民不可避免处于其监视之下。

他于1976年从政府的情报机关退下来之后，一些特工人员开始在华盛顿窃窃议论，猜测他是为苏联服务的双重特工人员。

在科尔比的法文版回忆录《正直的人：我在中央情报局的经历》未经中央情报局许可出版之后，中央情报局也向法庭控告科尔比。这本书提到中央情报局的一次秘密行动，即利用一艘打捞船试图打捞在太平洋沉没的苏联核潜艇并取得部分成功（即1974年的“杰尼弗行动”）。中央情报局说，这一段话本应删掉。为了在法庭外私了，科尔比付了一万美元。

科尔比对美国情报界的诸多肮脏内幕了如指掌，惧怕和憎恨他的人比比皆是。1996年4月29日，科尔比在外出划独木舟时突然失踪，几天后，他的尸体在其住所附近的一块沼泽中浮了上来。警方最后断定他是意外溺水身亡，但这一结论令人难以信服。几年来，关于他的死因一直流传着两种说法。有人说，科尔比因为掌握了克林顿夫妇前律师温斯·福斯特自杀

的“真相”，而遭到克林顿政府的“清除”；还有人怀疑他是“水门事件”中向媒体告密的“深喉”，并因此遭到谋杀。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于1976年1月30日接替了科尔比，成为中情局又一任新局长。

越南战争进行到1974年仍然是血腥的一年。北越控制了南方的大部分乡村。1975年1月，北越从复活节攻势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发起了最后的决定性攻势。短短几个月内，南越政府军土崩瓦解，各大城市相继陷落。

1975年4月29日，美军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撤退行动。美军的最后一架直升机是从西贡的一家旅馆楼顶上离去的。随着这架直升机的撤退，标志着美国和越南之间这场长达14年之久的战争正式结束。

就在这一天，北越军队攻陷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和南越总统府，南越政权覆灭（4月30日即为今天越南南方解放日）。同年，柬埔寨和老挝的共产党也先后夺取了政权，越南战争以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告终，成立南越南共和国。

1976年1月2日越南全境统一，定国名为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西贡被更名为胡志明市。

从1961年到1975年，历时14年之久的美国和越南战争总算结束了。在越战中，北越正规军和游击队共有110万人死亡，60万人受伤，33万人失踪。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死亡5.8万人，受伤30.4万人，2000多人失踪。南越政府军死亡13万人，受伤50万人。

越南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包括法越战争在内的30年战争造成了500万平民的死亡。到1975年越战结束时，战争给越南留下了一片满目疮痍的土地和88万孤儿，100万寡妇，20万残疾人，20万妓女。长期的战争以及与西方世界的隔绝导致越南经济崩溃，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后期，超过150万越南难民乘小船逃离越南。

越战让美国耗费了至少2500亿美元。尽管军事上美国并未失败，但它却是美国冷战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越南战争结束了美国二战后25年的经济繁荣。美国从1969年12月爆发经济危机，到1982年12月经济才得到复苏。

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尽管结束越战的原因有很多，但那个名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的美国人所起的作

用绝不能被忽略，正是他将有关越战真相的内幕透露给了《纽约时报》，才引发了《纽约时报》对簿美国国防部一案，从而促使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因此，他被称为“越战终结者”。

当年作为高级军事分析员，丹尼尔·艾尔斯伯格有机会接触大量美国国防部的机密文件，在整理这些机密文件的过程中，他被一系列的越战真相深深地震撼了，这些文件准确无误地告诉他，前约翰逊政府的一些高官如何为了一己私利和政绩，一步步地误导美国民众支持战争，导致100多万名越南人和36万名美军官兵伤亡的事实。更令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不解的是，文件还披露了继任的尼克松政府又是怎样地继续欺骗美国民众、隐瞒战争真相的。

1971年6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当这些文件开始在《纽约时报》头版上与读者见面后，立即在全美掀起了轩然大波。反战浪潮遍及美利坚大地的各个角落，要求政府撤军、惩办战争贩子的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尼克松政府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整蒙了。缓过神之后，尼克松指示联邦调查局抓捕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命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解除与兰德公司的合

同。艾尔斯伯格在1971年6月下旬被捕。

紧接着，整治艾尔斯伯格的大报复行动也拉开了序幕。

尼克松说：“让我们将这个狗杂种投进监狱。不要担心对他的审判……我们要用新闻媒体审判他，用媒体将他整死……明白吗？”

最后，尼克松政府以窃取军事秘密等12项重罪起诉艾尔斯伯格。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115年的牢狱之灾。为达此目的，尼克松还用封官许愿买通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1973年，主审过该案的一名法官就曾当上过联邦调查局局长，而这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尼克松不久因“水门事件”下台了。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法官宣布对艾尔斯伯格无罪开释。

至此，艾尔斯伯格重见天日，成了美国人民心中的反战英雄。他被许多美国人称为“越战终结者”。

获得自由后，艾尔斯伯格生活十分窘迫，甚至连一份像样工作都很难找到，只能通过演讲和写书养家糊口，因为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私营企业，都不愿雇用一个人敢于说真话和“大胆揭露老板隐私”的人。此

后，他还因多次抗议美军的对外军事行动而被逮捕。

2002年，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出版了《秘密：越南和五角大楼文件回忆录》一书，在书中披露了当年越战的许多内幕和自己的遭遇。

第十五章 大兵压境，巴拿马司令成囚犯

巴拿马运河给巴拿马人民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灾难。当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要收回运河主权时，却引起了美国人的愤怒。尽管他曾是中情局的“线人”，年薪高达十万美元；尽管被中情局长吹捧为“中美洲的反共堡垒”，曾先后亲手废黜了5位巴拿马总统，成为巴拿马的“铁腕将军”，但最后还是逃不脱中情局的暗算，成了美国人的阶下囚，被判处145年徒刑并终生不得保释。

都是巴拿马运河惹的祸

美国入侵巴拿马的战斗打响了——

1989年12月20日凌晨1时，美F-117隐形轰炸机从内华达州托诺帕基地起飞侵入巴拿马领空，轰炸里奥阿托巴军高炮阵地。与此同时，美海军“海豹”小队一部袭击巴拿马国防军司令诺列加的私人机场，炸毁其座机；另一部袭击诺列加的专用船只和卫兵，并炸沉他的专用船，切断诺列加从空中和海上转移的退路。随后，美军兵分五路向巴拿马各军事要地发动进攻。“红色特遣队”以空降和地面攻击占领巴拿马城附近托里霍斯国际机场，控制帕科拉河大桥；“尖刀特遣队”在炮火、坦克和直升机的掩护下，攻占并烧毁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太平洋特遣队”乘20架C-141运输机分两批机降托里霍斯机场，支援“红色特遣队”扼守帕科拉河大桥，以阻止驻西马隆堡基地的巴军驰援巴拿马城；“永远忠实特遣队”则抢占巴拿马运河上的泛美公路大桥，守卫运河区内的霍华德空军基地；“大西洋特遣队”攻打巴拿马第二大城市科隆市，占领麦登大坝、供电中心和水电站等重要运河设施。

战斗打响后，部分巴军进行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美军突袭得逞，仅8个小时就击溃了巴军有组织的抵抗，15个小时就摧毁了巴拿马主要的军事设施，控

制巴军大部分兵营。巴拿马国防军司令、政府首脑诺列加指挥巴军及准军事部队“2000营”奋起抵抗，战斗十分激烈。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90年1月3日被迫向美军投降，一场代号为“正义事业”的侵巴战争基本结束。

美国人为什么要对一个主权国如此大动干戈？对巴拿马国家首脑、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如此大打出手呢？

这还得从巴拿马和诺列加本人同美国政府的恩恩怨怨说起。

位于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巴拿马夹在浩瀚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连接中美洲和南美洲大陆。它东连哥伦比亚，南濒太平洋，西接哥斯达黎加，北临加勒比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巴拿马面积75517平方公里，人口约311.6万（2007年估计）。狭长的国土就像拉丁美洲中的一个精致的领结，连接在两个大陆板块之间。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领结”，那么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大洋之间也就畅通无阻了。所以，人们便开凿了一条举世闻名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全长81.3公里，是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重要航道，使两大洋

沿岸航程缩短1万多公里，在战略上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

当年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区的夸里海茨设有美军南方司令部，并在巴拿马驻军多达1.3万，另外还设有14个军事基地。其中最主要的军事基地有4个：一是卡莱塔岛基地，设在该基地的电子通信中心，是全世界唯一可以用300千赫低频覆盖两大洋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信中心，这个通信中心不仅能与两大洋的核潜艇和常规潜艇保持通信联络，而且还可以保障潜艇与潜艇之间的通信联络；同时设在该基地的世界电子监听站既能搜集情报、破译密码，又能发送假情报和实施干扰。二是霍华德空军基地，它是美设在拉美的一个最大空军基地，各类战略飞机均能在此起降，从该基地可控制西半球的一切空中行动。三是克莱顿堡军事基地，这是南方司令部陆军总部所在地，是美国在巴拿马驻军最多的地方。四是谢尔曼堡基地，是美国最重要的丛林作战训练中心，同时也是美国宇航员的训练基地。

总之，美军设在巴拿马的南方司令部和其他的军事基地，是美国在西半球的重要军事和情报中心，控

制着中美和加勒比海，并同驻南美各使馆和军事机构保持直接联系。其职能是制定美对西半球的军事战略，指挥和控制该地区的军事行动。因此，该司令部对美国推行全球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可以利用巴拿马的反对派，扶植一个亲美政权，以执行美国政府在该地区的政策。

常言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让美国人对巴拿马这片国土产生“惦记”的根源就是那条巴拿马运河，它就像埃及的那条苏伊士运河一样。巴拿马运河是巴拿马人用成千上万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土上开凿出来的一条运河，但是最后获利的却是美国人。

在上个世纪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和巴拿马的主要矛盾是巴拿马运河问题。从1903年美国政府与巴拿马第一次签订了一项不平等的条约之后，美国每年都要从运河通行税中掠走一亿多美元。由于巴拿马人民的坚决斗争，美国政府被迫于1936年把该运河租金增加到每年43万美元，1955年又增加到193万美元。1956年埃及政府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行动大大鼓舞了巴拿马人民将巴拿马运河收归国有的信心。1958年5月至1964年1月，巴拿马人民多次举行争取运河区

主权的抗议示威。1964年4月，美巴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同意为达成一项“公正与平等的协定”进行谈判。



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人民经过10多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使美巴两国政府首脑于1977年9月7日在华盛顿签署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废除1903年的条约，取消美国永久占领运河区的特权，到1999年12月31日以后，巴拿马运河及运河区将完全由巴拿马政府控制。

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口头上虽同意2000年把巴拿马运河交还巴方，但实际上根本不想交。由于巴拿马是一个小国，又在美国人的眼皮底下，所以一直摆

脱不了美国人的控制，只好忍气吞声。

诺列加进入巴拿马政坛之后，下决心改变这种现状。

1983年8月，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就任巴拿马国民警卫队（同年9月改称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后，在巴拿马运河问题上，他表现出了一种强势的姿态，决心改变巴拿马人这种受人欺辱的局面。他一上台就坚持民族主义立场，主张收回巴拿马运河及运河区主权，坚决要求履行新的运河条约，为收复运河主权同美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与美国的利益产生了冲突。美国政府决定开始对他下手了。

美国总统里根曾指责诺列加政权偏离民主轨道，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并公开支持反对派揭露诺列加的非法行为，企图在巴拿马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倒诺”运动。

不料，诺列加根本不理美国人的那一套，1985年他小试牛刀，将巴拿马总统巴尔雷塔赶下了台。原因就是这位总统违背了诺列加总司令的意志，也违背了巴拿马人民的利益，背着他和巴拿马人民同美国政府勾结，出卖了巴拿马运河主权。这样一来，诺列加就

成了里根政府的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于是一连串针对诺列加的行动就出笼了。

巴尔雷塔总统并不是被诺列加废黜的第一位巴拿马总统。从1983年出任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到1989年成为美国人的阶下囚为止，在这短短的6年时间内，诺列加先后亲手废黜了5位巴拿马总统。他自己尽管没有登上总统的宝座，但他却成了巴拿马总统的“总统”。他依靠手中的枪杆子，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军事政变，把那些“亲美”总统一个个赶下台。

巴尔雷塔总统的下台，让美国人见识了诺列加的真功夫，于是，美国政府就动用中情局来给诺列加制造麻烦。1986年4月，美国报刊援引中情局披露的材料，集中抨击诺列加，一次就给他定了“走私贩毒、实行独裁、扼杀人权、贩卖武器、充当间谍”等五大罪状。美国国会还专门通过拨款修正案，授权中央情报局对此进行调查落实。中情局得到这份权力后积极行动，一方面通过中情局驻巴拿马情报站搜集诺列加的“罪证”，一方面敦促美国政府早日出兵干预诺列加政权。

1987年，美国国务院、参议院相继发表声明或通

过决议，要求巴拿马恢复宪法，军队非政治化，甚至要求诺列加下台。但是，诺列加依然在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的位子上坐得稳稳的。

1987年6月26日，美国参议院以84票对2票通过一项关于巴拿马局势的议案，要求巴拿马政府撤销诺列加国防军司令职务，要求巴拿马军人“还政于民”，“结束侵犯人权的行为”，结果，引起了巴拿马城1.5万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干涉巴拿马内政。

为了迫使巴拿马军方早日交权，美国政府于1987年7月1日宣布关闭美国驻巴领事处，并开始对巴拿马实行经济制裁。没想到，新上台的巴拿马总统德尔瓦列又是一个不争气的家伙，他为了保住自己总统的宝座，甘心情愿地做美国政府的“干儿子”，在巴拿马做起了“儿皇帝”，继续出卖巴拿马人民的利益和主权。德尔瓦列的卖国行径当然是诺列加所不容的。

1988年2月，里根政府策动德尔瓦列倒戈，宣布撤销诺列加国防军司令的职务。不料诺列加先下手为强，迅速采取行动，以武力给巴拿马议会施加压力，迫使议会改组内阁，停止德尔瓦列的总统职务，并任命教育部长帕尔马为代总统。

早在德尔瓦列上台之初，诺列加就看出了他和他的前任一样，为了保全总统的位子，不惜出卖巴拿马人民的利益。在1987年的夏秋之交，德尔瓦列总统曾多次风尘仆仆地奔波于巴拿马城和美国的白宫与五角大楼之间，希望依靠美国人的力量，将诺列加这位强权人物扳倒。德尔瓦列总统同美国总统里根多次协商，总想找出一套逼诺列加“自动退休”的计划。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得像个真正的总统，而不会像他的那些前任总统那样，一个个都成了这位总司令的傀儡。

1988年1月6日，德尔瓦列总统以检查身体为由来到美国，走进熟悉的白宫，同美国人继续洽谈这笔“生意”。美国人的许诺让德尔瓦列总统的胆子壮了起来，回国后，他立即采取行动，2月25日，在电视台面对巴拿马人庄严地宣布：“罢免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的一切职务！”

诺列加此时正在家中看电视，听到这句话后，诺列加连电视机都来不及关，就急忙提着枪冲出了家门。

这是一个下雨的夜晚。诺列加冲出家门后，冒雨驱车驶过还很平静的大街，径直来到国防司令部大

楼，直奔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巴拿马国防军的指挥中心。

当德尔瓦列总统还在电视台慷慨陈词时，诺列加拨动了那部红色的专线电话，向巴拿马国防军各部口授一道命令：“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动用一兵一卒！”向部队下达命令之后，他又拿起那部白色的电话机上的话筒，将巴拿马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召集到了总统办公室。

当德尔瓦列总统从电视台回到总统办公室时，他脸上的兴奋和喜悦顿时消失了，因为他看到站在门口杀气腾腾地迎接自己的诺列加和所有的国会议员。此时，他的双脚开始颤抖，他真不想跨过总统办公室的大门。最后他还是强作镇静，很勉强地走了进来。

一个决定巴拿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临时紧急会议，就这样仓促召开了。

“为什么要违背宪法罢免国防军总司令？”

“罢免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将军为什么不召开国会讨论，不通过我们？”

所有的议员众口一词，向德尔瓦列总统提出一连串的质问。只有诺列加一个人默默坐在德尔瓦列的对

面，一只手紧握枪柄，两只冒火的眼睛在注视着对方。

德尔瓦列总统一时被质问得满头大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只是一边不停地用袖子揩着脑门上的汗珠，一边不时地用眼睛瞟一下子诺列加紧握枪柄的手。他真担心诺列加会突然拔出枪来，他知道他那支手枪中已经填满了子弹。

在议员们一阵阵的质问声中，德尔瓦列突然想起了20天前的2月4日，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迈阿密法院的执法官曾宣读过一份起诉书。这位法官在起诉书中列举了大量的证据，指控诺列加，不仅是麦德林贩毒集团的支持者，是该集团一号头目埃斯科瓦尔的密友，而且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多次亲自参与毒品走私活动。这份起诉书说，根据上述罪证和有关法律，被告曼努埃尔·诺列加应判处有期徒刑145年，并处以罚款114万美元……

想到这份起诉书，这位巴拿马总统便心中有数了。他突然理直气壮地站起来，义正辞严地说：“我之所以要作出罢免诺列加将军的决定，是因为他多次参与麦德林贩毒集团的毒品走私，极大地败坏了我

国……”

“胡说！”诺列加这时突然拔出手枪拍案而起，把手枪重重地往桌上一摔，大声说：“这完全是美国人的诬蔑和造谣，是为了把我赶下台而找的借口。是他们一贯的手法。而你作为巴拿马的总统，德尔瓦列先生，难道还不明白吗？”

德尔瓦列无法回答诺列加的问题，他只是在考虑自己的命运。因为他知道在座的议员，大部分是诺列加的亲信，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害怕他手中的枪。诺列加的私人卫队已经奉命包围了总统府；他的嫡系部队“2000营”已将坦克和装甲车开进了城里，全城已经戒严。

总统府的这次紧急会议尽管剑拔弩张，但一切都按照诺列加的意图进行。许多聪明的议员都明白，德尔瓦列总统将会从今晚开始，永远地离开这个总统府，这里又要换上一位新的总统了。于是，大家便异口同声地指责德尔瓦列的卖国行为，通过了罢黜他的决议。在诺列加的暗示和授意下，一致“选举”了教育部长帕尔马为巴拿马“代总统”。

总统府外面的雨停了，巴拿马的又一次改朝换代

也结束了。这时，已经是2月26日的凌晨6点。诺列加将军和新当选的代总统帕尔马以及其他几位内阁成员，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来到了电视台。

清晨6时30分，在同一座电视台，用同一个话筒，诺列加庄严地宣布了罢免德尔瓦列总统的决定——一场互相罢黜的闹剧，前后相隔才10个小时，这不能不让所有听到这一消息的人震惊。

从电视台回来之后，诺列加立即派出军警包围德尔瓦列的私人住宅，并封锁了所有的通道，然后进行搜索。

面对灭顶之灾，德尔瓦列在一位仆人的指导下，换上清洁工的衣服，掀开住宅后门边的下水道的盖子钻了进去。这位忠心耿耿的仆人带着这位昨天还是总统的人，慌慌张张地沿着黑暗而肮脏的下水道朝前走去。最后，他们终于带着一身的脏水和臭气，逃进了美军驻巴拿马部队的南方司令部。

推翻诺列加的政变闹剧

诺列加独揽大权之后，公开向美国提出收回巴拿马运河主权的要求。对于这一要求，美国人当然不好

明目张胆地予以拒绝，只好双管齐下，一方面采取拖延的缓兵之计，在背后大肆攻击诺列加本人，把他同麦德林集团的交往拿出来大做文章，争取把他赶下台，另外找一个听话的人当总统；另一方面就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巴拿马实行惯用的“经济制裁”。所以，政变后的1988年是巴拿马灾难深重的一年。

德尔瓦列被废黜后，美国政府公开宣布继续承认德尔瓦列为巴拿马“合法总统”，拒不承认帕尔马代总统，并对巴拿马进一步实行经济制裁，冻结巴拿马在美国的一切财产，禁止在巴拿马的所有美国公民和组织，包括美国在巴拿马的子公司向巴拿马政府付款。继1987年停止2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和6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之后，美国政府又于1988年3月2日正式开始，先冻结了巴拿马政府在纽约银行的5000万美元的外汇存款，随后，又扣押了3月份应付的560万美元的运河使用费。与此同时，美国法院又进行裁决，冻结了巴拿马政府从纽约市共和国银行转到国内去的1000万美元的现金……

巴拿马国内银行纷纷停业，政府无法按时发放公职人员工资和军队薪饷，一些工厂相继倒闭，失业人

数大增，供应困难，食品奇缺，巴拿马政府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巴拿马仅有的600家工业企业也有300家被迫停产关门，同时关门的还有100家建筑公司。大批商店破产，全国失业率高达25%至30%，每天依靠教会救济过日子的穷人已增加到7万人。

巴拿马，一个当时仅有200万人口的小国，面对这种超负荷的经济危机，已经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大街上整天是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和饥民在游行示威。许多学校也停课了，学生们也走上街头，整个国家处于动荡之中。这时，饥饿的巴拿马人想到的再也不是运河的主权和国家的尊严，而是要解决吃饭的问题，于是，一些人便开始迁怒于诺列加，鼓动和策划他下台，以缓解美国人的经济封锁。

4月的一天，以巴拿马国家警察部队总司令马西亚斯为首的一批军官，冲进国防司令部，要求诺列加辞职下台。

但是，诺列加并没有为马西亚斯的阴谋所吓倒。他一得到消息，立即派遣他的嫡系部队“2000营”和大批的国防军迅速挫败了兵变。事后，他又改组了陆军参谋部和全国各军区，实行“换马”和调防，稳住了军

权，也稳住了国家的政局。与此同时，诺列加还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对所有国营企业实行军管，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派出大批的军警在街头巡逻和布防，把一切都控制在军队的掌握之中。

稳定了局势之后，诺列加又通过政府领导的工会组织做失业者的工作，及时动用国家储备，用现金支票从国外购进大批食品。他命令部队把这些食品装进一个个食品袋，向饥饿的群众分发这种“尊严食品袋”以鼓励巴拿马人共赴国难，共渡难关。同时，还由政府组织了许多“大众市场”安抚人心。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又牢牢地掌握了军权，因此，诺列加政府并没有毁于一旦。

美国政府见经济封锁并没有迫使诺列加下台，又对巴拿马进行军事威胁。1988年4月2日，美国借口美在巴公民的利益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宣布调派1300名官兵、26架武装直升机和一批重要军用物资前往巴拿马。4月8日，美又向巴拿马增派800名海军陆战队员。4月14日，4万多美军在加勒比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到4月中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美国政府竟三次向巴拿马运河地区增兵，总数达到了2760人。

再加上美军南方司令部常驻巴拿马5万人的军队，和穿越巴拿马运河的两艘“冲绳岛”大型攻击舰，美军进驻巴拿马的总兵力已同巴拿马本国的兵员总数相差无几，而在武器装备方面更是几倍、十几倍于巴拿马军队。

此外，美国政府还利用巴拿马国防军前参谋长迪亚斯与诺列加的矛盾，挑拨巴拿马人民同政府和军队的关系，支持反对派开展各种反对诺列加的活动。

然而，在如此严峻的大兵压境之时，诺列加没有屈服。在巴拿马国家电视台里，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位“铁腕将军”的誓言：“我们决不会在美国人面前低声下气，我们也决不会在殖民主义这庞然大物面前投降！”

“巴拿马运河属于巴拿马人民，最后的胜利也一定属于巴拿马人民！”

诺列加以一种不可动摇的勇气和人格的力量，终于稳住了巴拿马的局势，让这个多灾多难的弱小国家，艰难地度过了1988年的危机。

1989年1月，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布什走进了白宫。

布什执政后，对诺列加政权采取更加强硬的干涉政策，执行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继续拖欠运河租金，明目张胆地要求诺列加辞职，以便进一步控制巴拿马，保障它在巴拿马运河和运河区的经济、军事利益。

1989年5月7日，巴拿马举行大选。美国公开干预巴拿马大选，布什批准向巴拿马反对派提供1000万美元的援助，试图通过支持反对派竞选获胜，击败诺列加。公民投票后，诺列加支持的官方候选人民族解放联盟候选人杜克和美国支持的公民反对派民主联盟候选人恩达拉得票不相上下，都宣布自己获胜，政局出现混乱。5月9日，布什总统公开指责诺列加在选举中舞弊，要求诺列加“尊重大选结果”。5月10日，巴拿马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大选无效。5月11日，布什公开呼吁巴拿马人民和军队推翻诺列加，并召回美驻巴大使，下令向巴拿马的军事基地增兵2000名。

1989年10月30日，南方司令部动用直升机、战斗机，在巴首都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企图以武力威胁，迫使诺列加下台。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不期而至——1989年

10月2日，星期一，凌晨2点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美国国防部长切尼惊醒了。切尼敏捷地抓起听筒，里面马上传来上任才一天的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的声音。鲍威尔向切尼报告说，据刚刚获悉的可靠情报称，巴拿马国防军“乌拉卡营”营长菲瓦塞·希罗尔迪决定在10月2日上午10时发动政变，推翻诺列加。希罗尔迪要求允许他的妻子和家人暂时躲进驻巴拿马的美军基地，并且请求美国出兵封锁美洲大桥和阿马多公路，以保证他的政变成功。

听到这个消息，切尼脸上顿时露出极度的兴奋。他当即表示同意希罗尔迪的妻子和家人到美军基地避险。至于封锁美洲大桥和阿马多公路的事，切尼却犹豫了一下，他只对鲍威尔说：“待我立即请示总统之后再给你回话！”

10月2日上午8时内阁紧急会议召开。国防部长切尼通报了情报之后，所有的与会者一致表示：“届时见机行事，封锁道路！”9时整会议结束，同时向有关部队下达了上述命令。仅14分钟以后，驻巴拿马美军就完全占领了各交通要道，随时配合希罗尔迪率领“乌拉卡营”的兵变。

这时，切尼和鲍威尔等一批军事首脑正聚集在五角大楼的指挥中心，紧盯着墙上的大屏幕，密切注视巴拿马的动向。

巴拿马的政变终于在10月3日早晨8时发生了！亲自驱车来到国防军司令部大楼上班的诺列加将军刚一下车，就被希罗尔迪指挥的“乌拉卡营”的士兵扣押了，他被关进了一间作为临时监狱的秘密地下室。紧接着，“乌拉卡营”控制了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

此时，带着政变成功的兴奋和紧张，政变的总指挥希罗尔迪迫不及待地来到国家电视台，站在历任总统和诺列加将军多次站过的地方，向巴拿马人宣布，原国防军总司令诺列加将军已被扣押，国防部已被控制。这是一次纯粹的军事行动，不涉及任何政治交易。而且特别说明的是，美国人没有参与这次政变。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强行让诺列加将军交出大权，自行隐退，恢复军人的威信、人民的尊严和1968年的革命方针，结束由他主宰多年的军人政治……

希罗尔迪的宣言传遍了巴拿马，也传到了美国军方司令部。有意思的是，希罗尔迪的妻子和家人并没有躲进美军基地。也许是由于紧张、疏忽或者是太顺

利了，一直到将诺列加扣押以后，希罗尔迪都没有把政变的消息通报美国政府。结果严阵以待的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瑟曼中将在这次政变中，完完全全地作了一次“壁上观”，没有帮上一点忙，就连诺列加被捕的消息都不知道。

然而，希罗尔迪在电视台的讲话还没有完，诺列加的命令就通过看押他的士兵传到了国防部的亲信和他们的嫡系部队“2000营”营长的手中。于是，一个营救诺列加的方案很快出笼了。

仅仅在4个小时以后，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部上空就冒起了一个个巨大的烟柱，爆炸声接连不断。“2000营”的士兵和其他营救部队高喊着“与将军同生死”的口号，向司令部大楼发起了猛攻，并向希罗尔迪等政变分子发出最后通牒：“立即释放诺列加，否则后果自负！”

面对营救部队猛烈的进攻，希罗尔迪乱了方寸，不得不向美国人求援。当天中午12时18分，两名政变部队的中校军官驱车来到美军克莱顿基地，紧急请求会见他们。

克莱顿基地指挥官西斯内罗斯上校立即向南方司

令部请示，南方司令部司令瑟曼将军同意会见他们。但他明确告诉西斯内罗斯少校，美军愿意帮助希罗尔迪的政变，不过，他们一定要把扣押的诺列加将军交给美方审判。

但是，政变部队的这两名中校当场拒绝了这个要求。

布什总统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会见国防部长切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商量对策。鲍威尔将军马上说：“巴拿马现在是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派出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和伞兵部队进军巴拿马城，以调停的名义找到诺列加，然后迅速将他弄到美国来。我想，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的士兵完全能办得到。”

布什总统听完鲍威尔的建议后，正要征询切尼的意见时，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响了。原来是国务院接到美国驻巴拿马使馆的电话，声称政变部队准备把诺列加引渡到美国。

布什放下电话，正要对这两位军事首脑说什么，那部白色的电话又响起来了。

布什总统听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据美国中

央情报局得到的情报说，今天上午，诺列加将军根本没有去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上班，而是从家里直接去了外地视察，政变部队扣押的根本不是诺列加本人，而是他的一位替身……

“简直是胡闹！”布什总统还没有等对方说完，就摔下了电话，狠狠地骂了一句。

布什总统和他面前的几位高级幕僚也都被搞糊涂了。他们只好下令中情局立即查明诺列加的下落，再决定出兵和引渡事宜。

原来这个情报正是营救部队使出的一条缓兵之计。他们知道，如果不搞清楚诺列加的下落，那位中情局局长出身的美国总统布什是不会轻易下令出兵的。只要他一下令调查，营救部队就赢得了时间和主动权，完全可以抢在美国人之前救出诺列加将军。

布什果然中计。

就在美国人犹豫不决和进行调查时，政变部队终于挡不住营救部队的进攻。激战不到两个小时，政变部队的总指挥希罗尔迪就宣布投降，释放了诺列加将军。

被扣押了6个小时的诺列加将军又回到了国防军总

司令部，恢复了他的霸气。当天晚上他又在电视台露面了，带着神采奕奕的笑容发表了强硬的演讲。他说：“虽说美国人插手和支持了这场政变，但政变对我来说，就像抛掉一顶帽子一样轻松和随便……”

一场政变的闹剧只上演了6个小时，就过早地谢幕了。这场闹剧虽然给了美国人一个机会，但是他们却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反而给诺列加留下了一个笑柄。但是美国人绝不会就此罢休，如果不除掉诺列加，根据1977年同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将军签订的新条约，1999年12月31日以后，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就一定会完全属于巴拿马人民的。

于是，美国政府便以诺列加参与贩毒为借口，公开入侵巴拿马，活捉诺列加。

中情局局长曾经吹捧诺列加是“中美洲的反共堡垒”

多年来，毒品贸易使美国的确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受害国之一，每年的经济损失近1000亿美元。新上台的总统布什决心来一个大的行动。于是，诺列加参与贩毒的指控又被旧事重提，中情局关于诺列加的贩毒

情报又源源不断地被送到布什的办公桌上。

中央情报局驻巴拿马情报站的情报称，有确凿证据表明，巴拿马首脑人物诺列加将军是南美贩毒集团的支持者，他向麦德林贩毒集团及其他贩毒团伙提供机场、海关、码头和军队，赚取“可卡因美元”。据估计，诺列加每年接受贩毒集团的“买路钱”达1500万美元之多，而他自己的大量个人资产，也大多为贩毒所得……

还有一些情报说，诺列加是哥伦比亚麦德林贩毒集团头目埃斯科瓦尔的密友，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就合作走私毒品。诺列加为麦德林贩毒集团及埃斯科瓦尔提供大量的方便，贩毒头目经常出入巴拿马城及哥、巴边境，但诺列加从未向美国司法机关及世界缉毒组织报告过。

当然，这些情报的真实性有多少，只有中情局的那些情报官们知道。据纽约警方向国务院呈交的报告说，巴拿马寄往美国的外交邮件中藏有大量的可卡因，但因对方享有外交豁免权，警方只有开绿灯。

其实在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内部，对诺列加的关注由来已久。



诺列加

杰西·赫尔姆斯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参议员。早在1977年，这位来自南方的保守的共和党人就指控诺列加从事国际贩毒，侵吞钱财，把美国情报提供给外国政府。但是，由于赫尔姆斯当时正在企图阻止卡特总统在1999年底把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交给巴拿

马政府，于是他的上述指控被国会中的民主党人认为是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因而不予以理睬。赫尔姆斯最终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中遭到失败，国会还是于1978年4月投票批准了卡特的建议。

1985年12月，这位参议员再一次敦促参议院调查诺列加的贩毒活动。这一次参议院之所以感兴趣，完全是由于巴拿马政治活动家胡戈·斯帕达弗拉的弟弟来访促成的。胡戈·斯帕达弗拉的弟弟名叫温斯顿·斯帕达弗拉。他在与哥斯达黎加交界的巴拿马境内发现他的哥哥被人杀害了，头被砍了下来，尸体被切成多块，令人惨不忍睹。斯帕达弗拉就告诉赫尔姆斯，说他的哥哥是被诺列加手下的人暗杀的，因为他已经掌握了许多罪证，完全可以对诺列加进行起诉，并证明诺列加参与了侵吞钱财和日益扩大的贩毒活动。看到胡戈·斯帕达弗拉血淋淋尸体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赫尔姆斯答应要使谋杀者受到惩处。

在同斯帕达弗拉会见以后，赫尔姆斯宣布，以他为主席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事务小组，将就诺列加与毒品走私犯的联系问题举行听证会。赫尔姆斯的这一承诺应该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美国同巴拿马

这个独裁者关系的正式破裂。

听证会在1986年4月举行，首先出席作证的是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一位个子瘦瘦的官员。艾布拉姆斯能说善辩，咄咄逼人地为诺列加辩护，说他是这一地区反对苏联影响的美国盟友。艾布拉姆斯说：“巴拿马人民不想要一个像尼加拉瓜那样为外国统治的、反民主的国家，这种国家只能在这一地区制造武装冲突。”他指出，诺列加是美国的盟友，美国要保卫它在中美洲的政策，像他这样可以依靠的盟友为数很少。

不过艾布拉姆斯的这些话丝毫不能打动赫尔姆斯。他深信诺列加并非艾布拉姆斯所描写的那种领导人，赫尔姆斯调查此案的主要助手德博拉·迪莫斯说：“杰西完全是因为斯帕达弗拉谋杀事件动了感情。这件事使他实在忍无可忍了。”

几星期后，赫尔姆斯的听证会在一片抱怨声中结束了，因为他的小组委员会提不出可以告发诺列加的确凿罪证。

尽管遭到一些挫折，赫尔姆斯的听证会还是对诺列加提出了许多问题，因而引起了一位名叫西摩·赫什

的作家兼记者的注意。此人对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曾进行过研究，并将他的研究结果在1986年6月12日的《纽约时报》头版上发表。赫什的报道题名为《巴拿马独裁者据说参与毒品、军火和非法钱财交易》。这篇报道证实了赫尔姆斯提出的许多疑点。第二天，《华盛顿邮报》也发表了一篇引用中央情报局研究报告的报道。这份研究报告表明，诺列加参与了大规模的非法毒品和军火买卖，并且还和古巴的情报机构进行合作。

虽然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就已开始调查诺列加的犯罪活动，但只有那一次发现的材料才最令人不安。中央情报局的材料主要是根据国家安全局从通讯中秘密截获的情报。这些情报使国务院官员得出结论：诺列加进行威胁的策略，加上政治上的腐败，使他的老搭档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能在巴拿马选举中获胜。

到了1986年6月，尽管证明诺列加腐败的材料越来越多，但他同里根政府的联系仍然很密切。当时，他还对华盛顿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访问。在私下活动中，又安排了一些颇为隆重的活动，其中包括在国家

安全委员会诺斯和白宫官员的陪同下，乘坐游艇在波多马克河上观光游览，以及访问中央情报局总部并和局长凯西会见，因为中情局局长凯西在公开场合曾大肆吹嘘诺列加是“中美洲的反共堡垒”。诺列加这次访问已是他和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第三次会见了。

不过这次会见的环境和气氛都不如上两次。凯西还对诺列加一再重复自己的观点，即诺列加的独裁行为使美国很难继续支持他，尽管他一再发誓与共产主义不共戴天。他们的谈话在一小时后结束。根据凯西的几位亲信说，这位中情局局长已经认识到，诺列加的问题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但是，中情局并没有与这位巴拿马的独裁者疏远，因为中央情报局需要利用巴拿马人来搜集有关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的情报。在这一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凯西还是听取了中情局反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德韦·克拉里奇的意见——巴拿马的这位独裁者尽管坏，但美国还缺不了他。

当时要求彻底调查指控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骗取钱财和出卖情报的呼声在国会中越来越高。除了赫尔姆斯进行的调查以外，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约翰·克里发起的一项调查也涉及诺列加，虽然他主

要是想弄清中央情报局所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是否卷入了毒品贩卖活动。

1986年7月15日，联合小组委员会又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上，即诺列加在国际贩毒组织“卡特尔”中的作用。克里召开了第二次听证会，他把会议交给赫尔姆斯实际主持。赫尔姆斯审问一个名叫豪尔赫·莫拉莱斯的已被判刑的贩毒犯，赫尔姆斯说：“我希望你尽可能简单地告诉这个委员会，在巴拿马诈骗钱财的事究竟涉及面有多广，你们如何进行这种活动。在巴拿马诈骗钱财的活动中，有无任何政府官员牵连进去？”

贩毒犯莫拉莱斯回答说：“我把钱搁在手提箱里，坐上一架飞机，一架私人飞机，然后飞往巴拿马，我就去会见那些为巴拿马政府工作的人，他们负责疏通海关和移民局的人，还有当权派和机场的人。”

从这一耸人听闻的证词可以清楚地看出，诺列加卷入了贩毒的诈骗钱财活动，尽管证人拒绝对诺列加指名道姓。但这一供词对克里和赫尔姆斯来说已经够了。到9月为止，他们搜集的有关这个巴拿马独裁者的材料已经足够建立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其中有一厚

叠材料是关于诺列加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的。

其实，早在1959年，中央情报局驻秘鲁利马的情报站站长就招募了诺列加作为他们的“线人”，并给他报酬。不过在1962年诺列加回到巴拿马以前，给他的报酬是很少的。到1976年以前，中央情报局一直在给诺列加发薪金。那时他已成为巴拿马军队里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给他的年薪也高达十万美元。

从1976年3月起，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布什获悉美国国防情报局已开始对诺列加进行一项代号为“广州歌”的调查。美国国防情报局出示证据表明诺列加用钱向驻巴拿马的3名美军军士收买了一些机密情报，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官员给这几名美军取了一个代号，称他们为“高歌军士”。诺列加把这些情报交给托里霍斯，以便在和美国进行关于运河地位的谈判时，作为迫使美国让步的材料。美国国防情报局还担心，同样的一些机密材料，包括有关古巴的高度机密文件，都直接给卡斯特罗送去了。布什认识到，美国国防情报局揭露出的这一具有爆炸性事件，弄不好可能会影响到福特总统的白宫宝座。当时福特受到他的共和党对手、前州长罗纳德里根的攻击，后者说他一心一意想放弃

运河。

布什决定中央情报局不对那3名军士采取行动，因为如果对他们起诉和审判，可能会暴露中央情报局进行的秘密活动，其中包括招募巴拿马的高级官员作为美国间谍。布什还相信，如果公开进行审讯，会在美国和巴拿马关系很脆弱的时刻，暴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战略。他的结论是，应该由美国军方，而不是由中央情报局来惩罚这几名军士。

布什拒绝对这3名军士采取行动还有其他重要理由。布什完全懂得，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发现，意味着他们已挖出一项大的情报秘密，它涉及一名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外国高级官员。如果把这一情况公开，将使中央情报局的形象更坏，说明它要么太无能，要么太天真，以致无法开展在国外的情报工作。

另一方面，布什也要考虑诺列加巨大的情报价值，他被认为是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最好的情报来源之一。他是一个可靠的反共分子，曾多次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这一地区有用的政治情报。诺列加招募了一些巴拿马军官为美国人工作。如果突然断绝诺列加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将意味着美国与巴拿马整个情报

网的关系也将断绝，而这一点是美国所不愿做的。再说，诺列加是巴拿马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他能成为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职位最高的间谍。他长期以来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他已造成的一点损害。

中央情报局也为布什的行为辩护。他们说，诺列加提供的情报一贯可靠，他还为美国开了一个后门，使它有一条与古巴通话的重要渠道。这条渠道已在好几件事上证明是有价值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由于诺列加的帮忙，一位曾经单独乘小艇闯入一个古巴渔村的中情局特工得以被释放。整个70年代，诺列加一直和卡斯特罗保持通话联系。他把古巴政府内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美国人，同样也把美国国内发生的事情告诉卡斯特罗。

可是，在布什离开兰利中情局总部之后，接任他的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不顾内部有些人的反对，立即断绝了中情局同诺列加的所有关系。

然而，到了1981年，威廉·凯西又批准重新把诺列加列入中央情报局的薪俸单里，据说年薪为18万美元。他相信，诺列加在巴拿马的显赫地位，可能再一次对中央情报局有用。

诺列加与美国的谈判破裂后，拒绝辞去巴拿马国防军统帅的职务，以作为美国联邦法院对他参与贩毒活动免于起诉的条件。此时事情已经明摆着，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解决诺列加的问题。6月，里根总统批准对诺列加采取“准军事行动”。

此时，中情局也在考虑，是否有可能像捉拿南美大毒枭玛塔一样，也对诺列加实施一次类似的行动。因为，如果逮捕了诺列加，就可以表明美国向毒品宣战的决心。

中情局的设想是由巴拿马反对派把诺列加抓起来，押上一架飞往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飞机，然后把他转移到另一架短程飞机上，最后飞往美国。中情局关于逮捕诺列加的这个行动计划准备在1988年5月中旬开始付诸实施。但是到了8月底，情报委员会却投票否决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

9月间，巴拿马城的情报站站长告诉他在兰利的上司，为巴拿马反对派配置一部广播发射机将给情报局在中美洲的行动计划带来危险。于是，中央情报局又撤销了广播宣传计划。一位巴拿马反对派人士说：“这真是开玩笑，我们有一个很小的广播发射机，我们刚

刚广播了半小时，诺列加的电台就对它进行干扰。我们感到很失望。”

1988年5月，追查诺列加问题的提问越来越频繁了。当时，前国家安全助理诺曼·贝利告诉《华盛顿邮报》说，从1981到1983年间，在白宫内部印发的国家情报总结报告中，有若干份报告的主题就是谈诺列加与贩毒活动的联系的。布什曾宣称，他第一次知道诺列加与贩毒活动有联系，是在1988年2月对诺列加提出起诉的时候。贝利的揭发说明，布什在撒谎。当布什被问到担任情报局局长期间，是否知道诺列加的这些活动时，布什勃然大怒地回答说：“就毒品问题而言，我绝对不知道。”

诺列加逃进了梵蒂冈大使馆

乔治·布什作为第9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是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于1975年11月提名的。他于次年1月30日正式宣誓就职。在情报局待了一年还差10天以后，他又离开了，因此人们都称他为“中央情报局过渡性的局长”。布什之所以被任命为情报局局长，是因为当时的总统急于想恢复人们对美国政府机构的信心，使国会

恢复对中央情报局的信任，同时也想借此多少增加他重新当选总统的机会，而这种可能性似乎已变得越来越小了。

关于诺列加贩毒的证据传闻越来越多：

1984年2月10日，诺列加以巴拿马军事首脑的身份访问美国时，趁机将100万磅大麻偷运送到美国，警方虽然当场发现，但并未没收；

1985年4月1日，哥伦比亚麦德林贩毒集团一架贩运可卡因的飞机抵达巴拿马国际机场，将2000公斤可卡因装入巴拿马空军C - 130大力神运输机，进入美国后，这两吨可卡因去向不明；

1987年10月8日，美军驻巴拿马运河第12特别空降师M旅103团发现一座可卡因仓库，但其中的毒品却被巴拿马警方强行运走，指挥抢运毒品的巴拿马军事指挥人员，手里拿着诺列加亲自签署的命令……

根据上面的情报和“罪证”，美国政府决定以贩卖毒品罪再次向诺列加提出指控，并决定将这位巴拿马元首逮捕到美国受审。

美国政府的这种决定可谓是一箭双雕：一是为了缉毒，二是为了将诺列加赶下台，然后永久地占有巴

拿马运河的主权。因为到目前为止，巴拿马还没有第二个像诺列加一样的硬汉敢于同美国人公开宣战。

然而，巴拿马虽然是一个地少人稀的小国家，但它毕竟是一个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在联合国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美国人将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脑像抓一个毒贩一样抓到美国来，关进美国的监狱，这恐怕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非议。尤其是据某国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表明，当时能与美国抗衡的另一位世界“霸主”苏联正在向巴拿马运河区渗透。苏联的最大情报机关克格勃正派员在巴拿马搜集情报，并准备秘密约见诺列加，打算在巴拿马城建立情报站。

这个情报的确让布什踌躇了一番。如果苏联染指巴拿马，而自己又要一意孤行，那么，说不定又会造成一次全球性的战争危机。

为了遏制苏联的行动，又能事出有因地逮捕诺列加，美国政府开展了外交攻势，布什总统先后与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法国总统德斯坦、德国总理科尔、意大利总理佩尔蒂尼、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澳大利亚总理基廷等盟友和国家首脑进行了对话，其中还包括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说

明了美国政府准备逮捕诺列加的理由，并希望能得到各国的理解和支持，来一个全球性的扫毒大行动。

美国白宫的热线电话马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反应，许多国家首脑都给布什一个明确的答复：支持美国政府的扫毒行动，并预祝成功。就连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面对美国政府这种正大光明的理由，也无法表示反对，尽管他知道美国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国际社会的态度让布什总统心中踏实了许多，逮捕诺列加，并不会引起世界时局的动荡。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有一个合适的借口，美国的海陆空三军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包围巴拿马的国防军司令部，公开捉拿“铁腕将军”诺列加。

但是，这样的“借口”迟迟没有来临。诺列加从1988年之后，一直致力于巴拿马的治国大事，就像一位真正的总统一样，想方设法使巴拿马早日走出困境。尽管中情局的特工们挖空心思，却并没有发现诺列加与哥伦比亚麦德林贩毒集团有什么新的来往。

于是，1989年10月30日，美国驻巴拿马南方司令部就动用直升机、战斗机，在巴拿马首都附近举行军

事演习，企图以武力威胁，迫使诺列加下台。但是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1989年12月，美、巴在提名运河管理委员会主任问题上再生争端，关系急剧恶化。15日，巴拿马全国民众代表大会任命诺列加为政府首脑。16日，一名美军军官在与巴拿马士兵冲突中丧生，美国随即以此为借口入侵巴拿马。

当时入侵巴拿马的美军共2.6万人，其中原驻巴美军1.3万人、派遣部队1.3万人，分编成5个特遣队。出动坦克、装甲车、直升机和轰炸机，在最新式隐形战斗机的配合下，悍然对巴拿马发动规模空前的直接军事入侵。

1989年12月16日凌晨。几架美国最先进的F-117隐形战斗轰炸机，奉命从美国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悄悄地飞临正在酣睡中的里奥哈托镇。位于巴拿马首都南部的里奥哈托镇，突然被一连串的爆炸声惊醒了，一时火光冲天。F-117隐形轰炸机在这里投下一颗颗重达900磅的巨型炸弹，从此，拉开了美军入侵巴拿马的战幕。

轰炸了里奥哈托镇之后，美军又将战火推向巴拿

马城，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入侵立刻席卷了整个巴拿马。在一批批重型炸弹落在巴拿马国防军的营房、机场、坦克集结地和弹药库之后，几架巨型的C - 130“大力神”运输机又接踵而至，夜空中美军第13空降师、第6机械化营和第87步兵师所属的第5营等几千名士兵从天而降，迅速占领了正在燃烧的巴拿马城交通要道、政府办公楼和广播电台。与此同时，美军驻巴拿马运河区的部队也倾巢出动，越过运河边界，占领了巴拿马各重要城镇，一路向巴拿马首都扑来。

这次入侵的主要目标就是活捉诺列加，美军101特种部队奉命首先直扑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获得的准确情报，19日晚诺列加就住在司令部大楼。种种迹象表明，他绝不会在这么短的几小时内，又是在深夜突然离开办公室。

但是，当美军冲进了大楼，冲进了诺列加的卧室时，仅仅找到了诺列加的一只公文包和被褥里一个浑身发抖的赤身裸体的北欧女郎，一支印有诺列加名字的古巴雪茄还在燃烧。

“诺列加在哪里？”一位美军军官用枪指着这位北欧女郎喝道。

但是这位女郎无论如何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她只能告诉这位军官，那支雪茄是她点的，诺列加当晚根本就没来这里过夜。美军从一个大文件柜里拉出了一位吓得浑身发抖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也是一丝不挂，但他根本不是诺列加。美军终于相信了这位女人的话，也没有时间去理会这对男女的私情。他们要找的是诺列加。

那么，诺列加到底在哪里呢？冲进大楼的美军几乎将大楼翻了个底朝天，仍然一无所获。

原来，这位总司令的确不是等闲之辈。早在48小时之前，他就判断出美军会入侵巴拿马。从19日开始，每隔10分钟，就有一架美军巨型运输机降落在运河区美军基地。诺列加根据这一反常的迹象判定，美军入侵的时间就在20日深夜。于是，12月19日诺列加就下达了一道密令：除了留小部兵力守卫重要的军事目标外，所有的正规军都换上便衣，潜出巴拿马城，在里奥哈托镇不远的地方集结待命。战争果然按照诺列加的判断爆发了。但是巴拿马军队却没有遭到重大的损失。

入侵的美军在欢呼自己的胜利，白宫发言人菲斯

沃特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美军在巴拿马的军事行动已经取得空前的胜利，贩毒分子诺列加即将被押往美国受审。

但是就在这时，美军驻巴拿马的南方司令部大楼却传来一阵轰轰的爆炸声。紧接着，几百名巴拿马武装部队人员冲进了大楼，将美军在巴拿马的这个老巢给一锅端了。原来正在美国人得意忘形之时，诺列加率领潜出城外的部队进行了反击。

在美军南方司令部被炸毁的同时，巴拿马的军队趁美军立足未稳之时在科隆市和巴拿马城周围全面发动猛烈进攻，让入侵的美军损失惨重。美军遭到这突然的袭击，一时措手不及，只好向五角大楼发出紧急求援的信号。切尼和鲍威尔等人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连总统布什本人也被诺列加这突然的行动给镇住了。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军队无论如何也输不起，否则，将会在国际社会永远抬不起头来。于是，五角大楼在取得布什同意之后，又迅速发出新的命令：

火速向巴拿马空运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

抓住诺列加，赏美金100万元。

面对美军新的行动，诺列加用他的秘密电台号召

巴拿马人团结起来，继续同美国人斗争，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诺列加的讲话，激起了巴拿马人强烈的反美情绪，许多美军驻地都遭到了袭击。但是，那100万美元的重赏，却让诺列加成了一块诱人的肥肉，引得美军官兵和巴拿马许多反对诺列加的人，都像猎狗追逐猎物一样，对他进行追踪。一发现他的行踪就穷追不舍，告密的电话、纸条一个又一个地传到美军南方司令部和情报部门那里。

诺列加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随时都有落入美军和反对者手中的可能。经历了几次惊险的追捕之后，诺列加最后不得不抛弃电台，离开保护他的“2000营”，一个人单枪匹马，开着一辆军用吉普与美军周旋。

于是，“诺列加失踪”的情报接连不断地传到了白宫和五角大楼。但是没过多久，诺列加又出现在科隆市或其他城市，又利用当地的电台发表一次演说，然后又神秘地“失踪”了。

这样的游击战让美国人大伤脑筋，如果再抓不到诺列加，实在是太没面子了。眼看1989年的圣诞节快

到了，布什早已下令，一定要在圣诞节前结束巴拿马事件。于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追捕行动在圣诞节前展开。

诺列加这时也已筋疲力尽、疲惫不堪了，想尽快找到一条逃生之路。

12月24日，诺列加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与自己平时往来密切的梵蒂冈大使馆至今仍没有成为美军滋扰和搜查的目标。这个消息给了他强烈的求生勇气和信念，他决定躲进梵蒂冈使馆。

通过简单的联络，罗马天主教的发言人表示同意接受诺列加的要求，为他的避难提供方便。

12月24日中午，诺列加悄悄地驱车来到梵蒂冈驻巴拿马大使馆。逃亡了几天几夜的诺列加，终于得到了片刻的休息。

但是，诺列加逃进梵蒂冈大使馆的消息，在20分钟以后就传到了白宫。布什总统亲自致电梵蒂冈教皇保罗一世，向他施加压力，请他下令交出诺列加，并派出总统特使黑格将军匆匆飞往教廷，同教皇面谈，商谈逮捕诺列加的事宜。与此同时，美军驻巴拿马南方司令部及入侵巴拿马的各部立即派兵将梵蒂冈驻巴

拿马大使馆围得水泄不通，甚至连下水道出口处都派上了岗哨。顿时，诺列加成了瓮中之鳖，插翅难逃。

教皇特使何塞·塞瓦斯蒂安·拉沃亚奉教皇之命，飞往巴拿马城，对诺列加宣示“主动劝喻”。人们尚不知道诺列加是否在天主面前忏悔过什么，但消息灵通的记者们注意到，威严的罗马教廷只用“休息”一词，而非用“避难”一词来解释诺列加的行为。

在拉沃亚向诺列加宣示主的“教谕”的同时，美军除在使馆外炫耀武力之外，还开展了强大的心理攻势。他们别出心裁地在使馆门前架起十多只高音喇叭，大肆播放杰克逊的摇滚舞曲《无处可逃》。高分贝的乐曲就像飓风一样，摇撼着大使馆的门窗，也震撼着诺列加的心灵。

诺列加这时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在大使馆的那间小屋里走来走去。他透过窗户，看到大使馆墙外，坦克、装甲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像铁桶一样，将大使馆团团围住。空中则盘旋着一架架武装直升机。这一切，让诺列加这位铁腕人物意识到：如今真的是无处可逃了。他没有想到，那位天才摇滚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这首舞曲，竟是自己而作。

小小的梵蒂冈大使馆哪里挡得住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他们终于向诺列加发出了最后通牒。贩毒的罪名又是那样无懈可击，何况高明的布什总统又早已在国际社会做好了“铺垫”。诺列加知道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就是主，也无法拯救自己。

于是，他作好了“下地狱”的准备。

10天后的1990年1月3日，梵蒂冈国务秘书处高级官员贝洛克神情严肃地来到诺列加在使馆避难的房间里，转交了梵蒂冈的最后决定：诺列加将军必须在明日中午之前，离开梵蒂冈大使馆。离开使馆后也只有两条路可供诺列加选择：第一，向大使馆外的美军投降，由他们把他带回美国以国际贩毒罪受审；第二，使馆请巴拿马新政府派人把他抓走，等待他的将是被处死的可怕结果。

已是山穷水尽的诺列加权衡再三，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走第一条路。

1月3日晚8时30分，紧闭了10天的梵蒂冈使馆的大门打开了。一身戎装的诺列加将军出现在门口。他神色严峻，仍然保持一位巴拿马将军平日的威容。

高音喇叭声停止了，一切喧闹都变得鸦雀无声。

无数的美军官兵和远处的巴拿马城的居民，都在静静地注视着站在大门口的诺列加，似乎被他的出现震惊了。就在这时，几名美军特种兵走上前去，“咔嚓”一声给他戴上了一副特制的不锈钢手铐。

一个时代结束了，诺列加的眼光掠过这些士兵和人们的头顶，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城市和人民，然后在四名美军士兵的架持下，向一架直升机走去。

此时，无数的照相机和摄像机在闪着光，摄下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群外传来巴拿马人的哭声……

直升机发动了，轰鸣的马达声震动着巴拿马城的所有巴拿马人的心，甚至全世界也为之一震。直升机升上了夜空，在漆黑的夜色中，坐在舷窗边的诺列加将军看到了一条白色的河道和一片片温馨的灯光。他知道那是举世闻名的巴拿马运河。他留恋的目光凝神了片刻，然后闭上了眼睛仰头靠在靠背上。

他的眼里似乎有泪在流……

此时，美国总统布什听到这一消息后，高兴地长松了一口气说：“这下可解决了我的心头之患。我们胜利了。”

诺列加被判处145年监禁并且终生不得保释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立即对诺列加进行了终审判决，判处诺列加145年监禁，并且终生不得保释。整个审判过程进行了电视直播。在美国的法庭上，诺列加依然身穿巴拿马国防军的将军服，以一种军人的尊严高傲地站在被告席上，随后，诺列加被押往迈阿密有“恶魔鬼”之称的美国马里恩监狱。

马里恩监狱是美国所有的监狱中管制最残酷的一座监狱，监狱长哈曼是一位以虐待犯人为乐事的“虐待狂”。但是，哈曼这一次却表现得异常的人道和正常，非常欢迎这位大名鼎鼎的罪犯的到来。

原来，他希望诺列加写一部《我的故事》的自传体小说，他的一位出版商朋友告诉他，这部《我的故事》至少可以卖到100万美元，同时还可以让他的马里恩监狱从此名扬世界。

就是在监狱，诺列加也无法逃脱美国人的算计。

诺列加最终被判处了40年有期徒刑，后来减为30年。由于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再次获得减至17年，于2007年9月9日刑满释放。

诺列加出狱后，由于涉嫌在法国银行洗钱，又于2010年4月26日被引渡至法国受审。法国指控诺列加曾经通过法国银行账户进行洗钱活动，在诺列加还在美国服刑时，曾于1999年7月缺席判处诺列加10年徒刑。同年，巴拿马法院则以谋杀、盗用公款和腐败3项罪名缺席判处诺列加60年有期徒刑，其中每项罪名各获刑20年。

诺列加从美国被引渡至法国后，对1999年审判结果提出异议，称其个人财产来自继承遗产、妻子财产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支付的钱款，与贩毒无关。

根据法国法律，任何被缺席判决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若对裁决有异议，均可要求初审法院重新审理。因此，2010年6月28日至30日，巴黎法院对诺列加涉嫌在法洗钱案进行了复审，最后以洗钱罪判处诺列加7年有期徒刑，并没收其在法国账户下总计230万欧元财产。

诺列加的律师团认为，诺列加在美受审时的身份是战俘，根据《日内瓦公约》，他出狱后应首先被遣返巴拿马。但美国联邦法官驳回诺列加律师团的说法，认为诺列加的战俘身份并不妨碍他被引渡至法国

服刑。

时任巴拿马外长的巴雷拉表态说，巴拿马政府尊重美国政府的决定，但不会放弃将诺列加引渡回国的努力。2010年5月28日，巴拿马政府引渡诺列加的申请获本国司法部门批准。

诺列加，一个拉美的强势人物，最终还是没有逃出美国政府和中情局的手心。

第十六章 斩首行动，伊拉克总统被判绞刑

尽管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在学生时代就和中情局有来往，但在“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布什还是将伊拉克列入“邪恶轴心国”，“斩首行动”终于将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当初中情局言之凿凿地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两种生化武器，结果直到战争结束连个影子也没有找到；中情局成了美国政府的“替罪羊”，前后共有5位局长在伊拉克问题上像走马灯一样轮番撤职或“辞职”，“特工门”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被美国人处以绞刑

“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向恐怖主义宣战，并将伊拉克等多个国家列入“邪恶轴心国”。

2002年伊拉克危机爆发，联合国通过了1441号决议，派遣联合国武器检查团重返伊拉克，检查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一直到伊拉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联合国武器检查团都没有在伊拉克境内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决定向伊拉克用兵。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2002年3月19日称，伊拉克与“基地”恐怖组织有联系，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反美情绪。

乔治·特尼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说：“他们的联系也许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但他们反美及反对沙特皇室的共同利益可能会促使他们在战术上进行合作。”

同一天出版的《纽约人》周刊也撰文称，伊拉克的情报机构多年来一直和“基地”组织保持紧密联系，并称这两个组织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联合指挥一个恐怖组织。

2003年3月18日，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一触即发。当天，美国总统布什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联合国检查团立即撤离伊拉克。

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拉克隐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公然单方面决定对伊拉克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这一天，以美国和英国为主的联合部队正式宣布对伊拉克开战。在军事行动之前，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萨达姆和他的儿子在48小时内，离开他们的国家伊拉克。

参战的联合作战部队是由12万人的美军部队、4.5万人的英军部队、2000多人的澳大利亚军队和200人的波兰军队组成的，除此之外，还有大约5万人的伊拉克反叛军。他们是通过驻扎在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正式对伊发动军事打击的，并得到了海湾地区大量的空基和海基航空兵的支援。

3月20日（伊拉克时间），美英联军向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斩首行动”和“震慑行动”的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美国第3步兵师从科威特西北方向的沙漠向伊拉

克首都巴格达挺进，伴随他们作战的还有美国第101空中突击师和第82空降师的若干部队。在伊拉克的东南部方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和英国远征军则发动了钳形攻势，以打开伊拉克的海运通道。战争进行了两周后，美军又在伊拉克北部山区投入了173空降旅以及特种部队，并和当地的库尔德武装力量结成同盟。美国本来还准备在伊拉克北方投入第4步兵师，但由于土耳其议会的反对而未能实施。

经过两个星期的激战，英军首先控制了伊拉克南部的石油重镇、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紧接着在伊拉克全境都出现了断水和停电。

美国总统布什在战争打响后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开始，强调战争将“速战速决”。在这一阶段，美英联军先后向巴格达、巴士拉、纳杰夫、摩苏尔、基尔库克、乌姆盖斯尔等十余座城市和港口投掷了各类精确制导炸弹2000多枚，其中战斧巡航导弹500枚。与此同时，萨达姆也向全国发表讲话，号召伊拉克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击败美英联军。

战争爆发大约三个星期之后，美军顺利进入巴格

达市区，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顽强抵抗。伊拉克政府的大部分官员突然消失，去向不明，大批伊拉克军队向美军投降。此后，巴格达和巴士拉等伊拉克城市纷纷陷入无政府状态。巴格达市内发生频繁的抢掠事件，城市秩序陷入混乱之中；巴格达博物馆遭到洗劫，上万件珍贵文物失踪，各地的大量古遗迹在战争中遭到破坏。据战后有关资料统计，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造成了伊拉克60多万平民的伤亡，几百万伊拉克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2003年4月9日美军占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后，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伊拉克政府大部分高级官员突然集体人间蒸发了。

4月11日，美军发布“扑克牌通缉令”，55名伊拉克前政府高官榜上有名。在美军和伊拉克各政治派别的合力围捕下，萨达姆的两个儿子乌代和库赛于7月22日被美军打死。“扑克牌通缉令”上的大部分伊拉克前政府高官也先后被捕、自首或被打死，但是萨达姆本人却一直下落不明，驻伊美军悬赏2500万美元抓捕萨达姆。



美军占领伊拉克

2003年12月14日，萨达姆终于在他的老家提克里特被捕，然后被关进了美国人设置的监狱。经过多次审讯后，2006年12月30日，伊拉克当地时间上午6点左右（北京时间上午11点左右），萨达姆被美国人处以绞刑。与萨达姆一道被绞死的还包括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巴尔赞·易卜拉欣以及伊拉克前革命法庭庭长阿瓦德·哈密德·班达尔。

这场伊拉克战争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关注。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到底应该由谁来为这场战争负

责？谁是伊拉克战争的罪魁祸首？

于是在一片质问声中，中情局又被推到了前台。

战后，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国务院、新闻媒体等各方力量都站出来，纷纷指责中情局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在情报工作上的巨大失误，误导了美国国会、美国总统和美国人民。让美国人胆战心惊的“9·11”事件还没有了结，倒霉的中央情报局又一次成为各界指责的焦点。

同时，在各国同行面前，“失信”的鲍威尔也首当其冲，遭到各方面的指责和非难。于是他也只有很不客气地说，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中央情报局称伊拉克拥有“移动生物武器试验室”的说法是错误的，是在“有意误导”。

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局曾派遣多名情报官员专程赴科威特多哈兵营，向美军驻科高级指挥官通报最新的情报判断，声称攻占伊拉克南部领土的美军士兵将会受到当地百姓的热情欢迎。一位中情局的特工甚至还特地建议，让入侵伊拉克的美军士兵随身带上几百面美国的小国旗，每攻克一片战略要地，就向当地伊拉克的老百姓分发这些美国国旗，让伊拉

克人充分表达他们对美国“解放者”的感激之情；同时他还建议派出记者随军跟拍这一场景，制作成宣传节目，在电视上滚动播放，这样，可以在阿拉伯世界起到良好的心理宣传作用。幸好这一建议被驻伊盟军地面部队司令官立即否定了，并且严令禁止美国士兵在伊拉克领土上随便挥舞美国国旗；否则，伊拉克人不知要愤怒成什么样子。事后美军一位参谋人员说：“中情局说美军会在纳西里耶城镇受到欢迎，而实际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那里遇到了整场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抵抗！”

美国一些知名的新闻媒体都在报纸上指责中情局在伊拉克队伍庞大，工作却鲜有成效。报道称，当时中情局向伊拉克紧急调派的密探是计划调派人数的四倍，伊拉克已经成了他们在全世界最大的活动地点；但是，他们却无法成功地打入伊拉克抵抗力量内部，甚至在调查外国恐怖分子的身份方面，也同样是毫无进展。

战前在同萨达姆的较量中，中情局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用尽了各种手段，但是却没有获得真正的情报。尽管最终把萨达姆送上了绞刑架，中情局却

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非议。

“海湾战争”结束后中情局局长被迫辞职

其实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当年就是美国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

早在1960年，萨达姆在埃及开罗大学读书时，就开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当时美国人担心伊拉克政府与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就向伊拉克的复兴党及其他反政府势力提供援助。在后来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又大力支持伊拉克，中情局为其提供卫星所拍摄到的战场资料和军事情报，美国政府还批准高科技出口执照，使伊拉克得以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政府和中情局的投入自然也得到了一点回报。但是自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从1989年上台后，羽毛丰满的萨达姆就开始向美国发出挑衅。

1990年8月，伊拉克发动了入侵科威特的战争。这场战争被称做是“海湾战争”。就是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仅将刚刚步出冷战阴影的世界拖入了一场超现代化的战争，而且也使得牛气十足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陷于尴尬之中。

1990年夏天，战争阴云笼罩着波斯湾上空。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凭借卫星侦察手段，准确详尽地掌握了伊拉克兵力调动的情况，并多次向白宫发出伊拉克可能侵略科威特的警告。但是，中央情报局并没有从伊拉克高级决策会议上弄到有说服力的证据，当时在萨达姆的核心集团内部，也没有提供情报的人。

1990年8月1日晚9时，布什正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伏案批阅文件，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以略带紧张的声音向他报告说，伊拉克军队10万人越过了伊科边境，正在向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急速推进。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一下子让布什惊呆了。他没有想到伊拉克这么快就真的动手了。因为在近几个月来，伊拉克曾发动了一场对以色列的大规模宣传战。萨达姆指责以色列侵吞了阿拉伯领土，指责犹太复国主义者旨在消灭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并威胁说：“如果以色列胆敢对伊拉克发动进攻，伊拉克就使用二元化学武器烧焦以色列的一半。”

萨达姆的话虽然不能完全相信，但是也不得不防。尽管他所说的“化学武器”没有核武器那么厉害，

可是也是相当吓人的。早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就意识到化学武器是对以色列军事优势的一种平衡，并且是制止以色列使用核武器的威慑手段，因而就加快了发展化学武器的步伐。

据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显示，到1990年，伊拉克已掌握了两种化学武器：一种是以“芥子气”为主的糜烂性毒剂的东西。它用芥末和大蒜再加入生物剧毒经过化学提炼精制而成，遇到一定程度的热量之后就会汽化，变成微颗粒状弥漫在空气中，人的外表皮肤极易吸收。一旦皮肤吸收后，即导致大面积溃烂，进而引起血液中毒，导致死亡。

另一种化学武器叫做“神经毒气”，是一种根据化学和生物原理制成的化合物，只需要一滴浓缩的神经剂，经由皮肤吸收即可致命。这两种化学毒剂都可以用飞机投掷的航空炸弹、大炮的炮弹或特殊地雷释放出来。当这些炸弹爆炸时，其散发的热量可以使那些化学物质汽化并迅速扩散。

当时美国政府对萨达姆的恫吓马上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就提出，要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但是，当时布什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助

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还有他的副手罗伯特·盖茨都认为，伊拉克没有资金去挑起一场重大的区域性冲突，更不用说打仗了。美国应该保持同伊拉克的正常关系，从而保证海湾地区的稳定。

正当白宫决定对伊拉克采取缓和政策时，中情局却得到了许多关于萨达姆的战争机器在高速运转的情报。1990年3月中旬，美国的海关情报员在伦敦截获了伊拉克套购的高速电子电容器——美国制造的原子弹起爆装置；3月底，侦察卫星在伊拉克发现了可以向特拉维夫、大马士革和利雅得发射导弹的发射架；4月中旬，英国当局扣押了伊拉克的一批钢管，这些钢管可以用来制造超级大炮……这些情报足以表明，伊拉克加快了它获得尖端危险的新的军事技术的步伐。

根据这些情报，中情局于5月初向白宫发出了伊拉克可能对科威特开战的第一次警告。然而，白宫政要们却认为：“这些情报不足为信，因为萨达姆曾恫吓过以色列，而不是科威特。”

然而，让这些美国政要们没有想到的是，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恫吓很快就来了。1990年7月17日，萨达姆在庆祝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执政22周年的集会上，严

厉指责海湾国家不负责任的石油政策。他说：“超定额地生产石油使油价下跌，好让美国用廉价石油补充它的库存。这是美国策划的、由海湾统治者执行的阴谋，是用涂了毒药的匕首从背后刺杀伊拉克。”

这位伊拉克强人还警告说：“如果邪恶继续存在，大声疾呼抗议并不是最终采取的手段，而应该采取某些有效的措施使事情恢复正常状态。伊拉克人决不会忘记一句老话，即砍断脖子要比砍掉生存手段好些。”为了表示他的决心，号称“巴比伦雄狮”的萨达姆还说：“愿全能的真主证明，我们已向他们发出了警告。”但是，萨达姆没有指出他警告的是谁。

就在萨达姆发表恐吓讲话的同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白宫报告：“美国的侦察卫星拍摄到了3万多伊拉克士兵向科威特边界运动的照片……”

这是中央情报局关于伊拉克可能发动侵略的最重要的警告之一。

1990年7月18日，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在给阿拉伯联盟的一封信中，指责科威特在实施一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共同合作压低世界石油价格。他不仅批评科威特10年来不断向世界市场大量倾

销石油，而且指责科威特从10年前就偷偷开采两国接壤地区的鲁迈阿油田，偷采的石油价值达24亿美元。同时，阿齐兹还出人意料地谴责科威特在两伊战争的第一年，将军事设施修到了伊拉克领土上，并说这是一种“对伊拉克进行军事侵略的行为”。信中提供了伊拉克计算出的因石油产量过剩、油价下跌造成的损失，即阿拉伯国家共损失5000亿美元，伊拉克就占了890亿美元。

7月25日，萨达姆在召见美国女大使艾普里尔·格拉斯皮时，非常明确地谴责美国正在进行一场经济战争。他还说：“海湾国家压低石油价格的政策，正在损害着伊拉克的生存。”

由于这次会见是提前一个小时通知的，使得这位美国女大使来不及请示国务院应该如何应对，她只好字斟句酌地说：“总统先生，我谨告诉您，布什总统不仅希望同伊拉克有着更好、更广泛的关系，他还希望伊拉克对中东的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

女大使再次向萨达姆保证：美国将不会参与任何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纠纷。然而，就在萨达姆会见美国大使后，局势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在一步步恶

化。

7月27日，中央情报局又向白宫传送了一些卫星拍摄的照片。照片显示：伊拉克方面在伊科边界集结的人员和装备越来越多。

7月28日上午，中央情报局局长韦伯斯特带着行动部主任、中央情报局的首席近东专家斯托尔茨、主管警告信息的国家情报官查利·艾伦和两位卫星图像分析专家来到白宫，向总统作一次关键性的汇报。汇报开始后，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个个表情严肃。韦伯斯特拿出装在信封里的照片，递给布什总统。从这些照片上可以看出，大批的运输卡车正在向科威特边境移动，向部署在科威特北部边界的伊军提供弹药、燃料和饮用水。

韦伯斯特说，这些照片意味着伊拉克将很快行动，几乎可以肯定就在最近几天，而且它的进攻绝不仅是一次边界“袭击”。这位情报专家还强调说：“如果仅仅是一次恫吓行动，这么大规模的后勤是不必要的。进攻迫在眉睫！”

听完韦伯斯特的陈述后，布什总统表示，他仍然不相信一次入侵已经迫近。

情报局的警告完全是根据通过技术手段搜集到的信息作出的，但是布什通过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等人的“私人渠道”获取的信息表明，萨达姆不会使用武力。韦伯斯特不得不重申：“总统先生，如果说情报局过去不能绝对肯定萨达姆的军队会入侵科威特，那么，它现在几乎没有任何怀疑了。”

这些话并没有引起布什的特别重视。因为他自己当年就是从中情局局长的位子上走进白宫的，他相信自己像中情局的专家们一样，能够对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要韦伯斯特拿出更多的证据，可是韦伯斯特却无能为力，这次晋见只好不了了之。

韦伯斯特回到兰利的中情局总部后，心烦意乱。布什总统蔑视情报局专家们的意见，显然高估了他自己的情报才能。可眼下，生气归生气，事情不能不干。于是他就命令手下人密切监视萨达姆的动向。

7月30日，中央情报局已经能够提供伊拉克集结在科威特附近的兵力部署情况，其中就包括伊拉克最精锐的部队——“共和国卫队”在内的10万大军、300辆坦克和300门重型火炮。但是华盛顿依然保持沉默。

1990年8月1日星期三上午，韦伯斯特在白宫亲手

交给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一包情报情况简介和最新的卫星照片。他警告说，中央情报局确信，入侵将会在最近24小时内的某个时间爆发。当布什看到那些照片——沿着伊拉克的南部边界排列着大量的军队——他仍然认为萨达姆是在吓唬人，不相信萨达姆会把他的军队开进科威特。

然而就在这天晚上8点半（波斯湾时间8月2日凌晨2时），10万伊拉克大军越过科威特边界，像洪水一样汹涌地向前推进。伊拉克空军强大的机群和猛烈的地面炮火，轰炸了科威特城的港口和军用机场，市内到处腾起熊熊大火，来不及起飞的科威特飞机被摧毁。十几架科威特空军战斗机仓促中起飞迎敌，海军的一艘小炮艇试图从海上攻击占领了港口的伊拉克军队。当然，这一举动只能是徒劳的。瞬间，整个科威特的指挥系统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攻势彻底毁灭。仅有2万人的科威特军队，犹如散兵游勇，在强大的10万伊拉克虎狼大兵面前，就像被斩瓜切菜一样，被打得稀巴烂。在海湾大道两侧，在埃米尔宫廷，在各港口和石油总站，在舒韦赫地区，激烈的交战并没有能遏止伊拉克士兵的推进。9个小时后，伊拉克军队完全占领了

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

美国总统布什接到了韦伯斯特的这一令人沮丧的消息后，颇带倦意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他没有想到萨达姆·侯赛因会走得这么远，会行动得这么快。他深深地感觉到一场对美国总统艰苦而又严峻的考验已经来临。一场危机，已经在自己的身边展开。

萨达姆的这一手，不仅让美国总统尴尬万分，而且令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十分被动，有苦难言。原来在海湾风云突变之前，美国已加强了对伊拉克的情报工作。其中有6名中情局的情报人员正在科威特与伊拉克的边境地带监视伊拉克的兵力调动情况。当伊拉克坦克突然开进科威特境内时，这几个美国间谍便陷入了困境。他们没有外交护照，不可能从美国使馆得到帮助，在无奈和一片混乱之中，他们和数百名其他外国人一道，逃往巴格达。

在巴格达，这6名美国间谍惶恐不安。为了躲避伊拉克情报部门的检查，他们数易居所，惶惶如丧家之犬，处境十分艰难。

8月下旬，中情局的代表前往波兰首都华沙，会见了这个苏联集团重要成员国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要

求波兰帮助这几名美国人逃出伊拉克。

美国之所以找波兰人帮忙，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波兰有数千名工人在伊拉克从事建筑工作。因此，波兰人在伊拉克的活动余地较大，也不太引人注目。波兰内政部长考兹罗斯基同意参与这一冒险性很大的行动。考兹罗斯基指定他的一名最优秀的部下负责此事。此人点子极多，善于解决复杂、困难的问题。

当时，美国的6名间谍人员已经躲入巴格达郊区波兰人的一个建筑营地。经美国和波兰两国情报部门的多次协商，波兰方面提出了一个计划，决定派几个情报官员潜入伊拉克，在巴格达主持救援，相机行事，避免过多的外交官僚程序。几天后，几名波兰情报官来到了伊拉克。他们会见了美国间谍。这些美国间谍们状态很不好，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了。前往营救的波兰情报官员找到了一个波兰技术员，就是他曾带着13辆大轿车在伊拉克和约旦的边界，在混乱之中拉开了铁丝网，把四百多名越南人、菲律宾人、美国人、德国人和波兰人运到约旦境内。

但是，这一次情况不同，偷运的是美国人，情况更加困难，而且危险更大了。因为这些美国间谍虽然

持波兰护照，但不会说波兰话。这在戒备森严的伊拉克危险性更大，一旦露出破绽，问题就大了。不过这个波兰人还是决定斗胆一试，开车带着美国人上路了。在一处检查站，他们被设卡的伊拉克大兵挡住了去路。波兰技术员向一名伊拉克军官递去一摞护照，这名军官略看了几眼，突然用纯正的波兰话说：“真是荣幸，我见到了最好的朋友。”

波兰技术员见此情景，马上从车上跳下来，按斯拉夫传统与伊拉克军官响亮地亲吻三次，随后，又是熊式拥抱。就在拥抱中，机敏的波兰技术员轻轻把伊拉克军官推离汽车，他们开始用波兰话谈天说地，波兰技术员对伊拉克军官的波兰语大大恭维了一番。突然，波兰技术员似乎想起了护照，他不经意地说：“你该查一查护照。”

伊拉克军官谈兴正浓，说：“没问题，你们是朋友，可以过去。”

于是，波兰人与美国人虚惊一场，化险为夷。在伊拉克北部山区的一段公路上，一个波兰情报官员拿出四瓶威士忌递给6个美国人，并且命令道：“喝下去！”

6个美国间谍已经有一天没吃东西了，但他们还是遵照波兰情报官的命令把酒默默喝下，脸上露出苦笑。喝酒的目的，是使他们更像醉醺醺的东欧人。但这一准备似乎没派上用场，在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终于越过了伊拉克和土耳其的边境。后来，波兰情报部门还偷运了15个被扣为人质的英国人，另外，波兰情报部门还向美国提供了巴格达的地图和分布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设施的详情。

波兰人的这种友好的合作，终于让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政府改变了对波兰的某些政策。事后，布什总统曾写信给波兰方面，说美国打算推动其他国家的政府减免波兰的一半债务，约165亿美元。1991年4月21日，所谓的债权国“巴黎俱乐部”正式签署了上述协议。

可是，对于倒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危机才刚刚开始。

就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几个小时后，1990年8月2日上午8时，布什总统按预定时间在白宫召开紧急会议。当时出席会议的有：副总统丹·奎尔、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司法部

长理查德·索恩伯格、国防部长理查德·切尼、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和几天后就将出任驻沙特阿拉伯美军最高指挥官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

此外，到场的还有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及其助手理查德·海斯和罗伯特·吉米特。总之，布什政府的所有关键人物都聚集到了这里，研究他们就职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采访白宫的记者被允许进入会场几分钟。当记者们大声喊叫向布什提问题时，布什说：“我们不讨论干预问题。”随即，与会者关起门来，举行了近一个小时极其秘密的会议。

会议首先由中情局局长韦伯斯特谈了有关科威特形势的最新消息。中情局局长报告说，伊拉克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科威特。伊拉克的装甲部队处在距科威特和沙特边界10英里之内，大批伊拉克军队正朝南进发，萨达姆很可能要趁势入侵沙特阿拉伯。

然后，与会者开始讨论在外交和经济上对伊拉克要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由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伊拉克的入侵

行为，要求它立即无条件地全部从科威特撤军；同时由布什总统亲自签署命令，冻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美国的全部资产；派国务卿贝克立即飞赴莫斯科，会晤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布什授权贝克向苏方提出“强烈暗示”：如果苏联配合美国制裁伊拉克，苏联将轻而易举地从美国那里得到它梦寐以求的经济好处；指示美国驻联大代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伊拉克进行制裁的措施；指定总统的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各种可供选择的应急方案。

会后，布什登上“空军一号”飞机，飞往阿斯彭。在那里他将会见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盟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他们将就海湾局势进行磋商。

撒切尔夫人会见布什后，直截了当地问道：“乔治，你打算对伊拉克人做些什么？”而布什的回答却是：“我不知道。”

撒切尔夫人认为这是最糟糕的回答。她对布什的犹豫不决感到震惊，她生气地说：“总统先生，我们将支持你们。但是，你们必须干点什么。你们必须，你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个人。”

撒切尔夫人言词如此激烈，让布什吃了一惊。然后这个“铁女人”还伸出右手抓住布什的胳膊大声说：“如果是罗纳德·里根，他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做。我们必须，我们必须干点什么。”

撒切尔夫人的话使布什突然变得坚强起来。他用力地点点头，回答道：“是的，我们是得干点什么！”

8月4日上午，布什在卡托克廷群山环抱中的美国总统避暑胜地戴维营再次召开会议，这是他第二次与他的高级助手在这里聚首，研究应对伊拉克的对策。经过一整天的讨论，一项代号为“沙漠盾牌”的行动计划正式产生。所谓“沙漠盾牌”行动计划，就是根据“90-1002作战计划”集结、部署军队，防止伊拉克军队入侵沙特阿拉伯，并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

为了协调统一指挥，成立了“沙漠盾牌”行动作战指挥中心，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出任总指挥，由具有丰富的沙漠地区作战经验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担任中东地区美军总司令。

8月7日，布什来到兰利中情局总部。当他走进门

时，总部的那些官员和工作人员都站在中央大厅里迎接他，满满地挤了一屋子，约有一千多人。布什伸出手去和很多人握了手，然后他在讲话中承认了中情局在伊拉克问题上所做的工作。中情局很多官员几乎要流下激动的泪水。很多年了，没有一位总统对他们有这样的评价，布什果然是自己人啊！

8月8日上午6点，副总统切尼回到了华盛顿。他是去和沙特人谈判的，希望沙特能让美国的军队假道沙特，进入伊拉克。沙特同意了美国人的要求。3个小时后，布什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美国将出兵海湾。布什说，伊拉克已经用闪电方式攻占科威特，“绥靖不起作用。30年代就是如此”。

布什发表讲话后，五角大楼加紧运筹，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在海湾地区大规模集结军队。兵力集结之多，速度之快，是美军侵越战争之后所没有过的。在此期间，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谴责中情局工作不力，使美国面对伊拉克的侵略未能作出及时反应。

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出身的布什总统，尽了最大努力为中央情报局辩护。他向美国的公众解释说：“我们有很好的情报，我们的关于伊拉克情报促使我关心

波斯湾的局势已有好长时间了。”

尽管如此，布什还是在寻找新人来取代韦伯斯特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位置。并非布什不喜欢韦伯斯特，只是和韦伯斯特这位中情局局长相处，布什从来没有感到完全地自由自在。这时布什对罗伯特·盖茨有了很大的兴趣。

盖茨作为总统主要的外交政策行政官员和情报专家的作用正在增长。他后来成了处理有关伊拉克危机的“八人小组”成员之一，其他七个人是布什、奎尔、贝克、鲍威尔、切尼、苏努努、斯考克罗夫特等。在后来紧张的日子里，这个小组经常开会以便作出决策，而作为中情局局长的韦伯斯特却很少出席这样的会议。

在以后的日子里，中情局在积极地工作，为布什及他的白宫班子以及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提供详细的情报。在此期间，中央情报局一直在劝说某位苏联高级官员，让他把苏联与伊拉克签订的“军事转让协议”送给美国国防部看，最终劝说成功了。

中情局的特工当时还访问了成百上千个曾经在伊拉克境内工作过的工程师、科学家、建筑师、承包商

和企业家。其中，从德国公司得到的信息最多，包括伊拉克主要设施的蓝图。在埃及，中情局的特工们追踪到了他们最重要的业务联系人之一。此人向中情局提供了伊拉克国防部的设计图纸。这位重要人物告诉美国人，他们要做的关键事情就是在巴格达国防部的四楼引爆一颗炸弹，那里的房间里装有指挥部的计算机。

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小时内，伊拉克国防部成了美国攻击机的第一批轰炸目标之一。为了准备对付伊拉克的防御，中央情报局特工们也被派往法国，向这个伊拉克武器的第二个重要供应国了解关于伊拉克武器、精密度和部署的准确信息。法国人十分慷慨地向美国人提供了有关“幻影”F - 1战斗机、飞鱼导弹雷达系统和法国制造的攻击型直升机的详细信息。

1991年1月17日凌晨，美国正式宣布对伊拉克进行空中轰炸，这就是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共持续了7周。美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4国战机出现在巴格达上空，对伊拉克的战略目标和军事设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袭。中央情报局的任务是评估多国部队空袭的效果，从伊拉克军队、平民的士气到

被摧毁的军车的实际数目，但最重要的是评估部队运输车辆及坦克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情报局错误估计了伊拉克隐藏和发射机动飞毛腿导弹的能力，低估了伊拉克安装在卡车上面的粗糙但却致命的导弹发射器的威力。

2月13日，中情局指出了个轰炸目标。该目标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郊区，据中情局的情报称，这是一处军事掩体。当两架F-117A隐身战斗机各投下一枚重磅炸弹，准确地击中目标后，美国空军才知道，这只是一座民间防空避难所，数百名儿童和妇女被炸死。这一攻击目标的情报，只是来自于中情局对伊拉克那些流亡者和一些外国工程师的访问。那些情报提供者说，他们曾被伊拉克政府雇用去改建那座掩蔽部，以便充作军用。

这场灾难性的失误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强烈抗议。

美国号称全世界最先进的空中打击力量，居然会把一个不是军事目标的防空避难所当成目标，实在说不过去。群情愤怒之下，即使白宫出面解释，还是有人不肯原谅中情局。从此以后，中情局被取消了再做战争损害评估的权力。等于说，海湾战争还没有结

束，中情局在这场战争中的使命便已经结束了。

几年后，在海湾战争中曾担任五角大楼顾问的国防情报局前局长佩罗特斯对英国广播电视记者汤姆·曼戈尔德这样披露道：那次轰炸，是一次基于美国过时信息的很糟的错误判断。他不安地、激动地进一步证实：“那是陈旧的情报。我们本来是绝对不该轰炸它的。”同时，这位情报专家很鄙视中情局在海湾战争中的表现，“哦，见鬼！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过一次好战争。威廉·韦伯斯特在那里是绝对的毫无办法。”

韦伯斯特受到攻讦，他发现，他已不能指望从那些过去曾保护过他的人那里得到支持了。海湾战争刚一结束，韦伯斯特就从中情局局长的位子上走开了。

幸好不管中情局的情报工作如何失误，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是很强大的。多国部队历时一个月的空袭已摧毁了伊军近50%的军事力量。1991年2月24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开始了代号为“沙漠军刀”的地面作战。经过100个小时的空地一体的进攻战，打败了伊拉克军队，从而使历时42天的海湾战争宣告结束。萨达姆同意赔款。

中央情报局成了布什政府的“替罪羊”

中情局当初认定的萨达姆有化学武器的情报再次被美国政府认可，他们要求联合国派出调查小组对伊拉克进行调查。萨达姆遵照联合国的指示，销毁了大量杀伤性武器，但仍然保留武器生产设施，并谎称已经销毁，中情局知道他在撒谎。即使他没有撒谎，中情局也认为萨达姆不是什么好东西，定要除之而后快。

让萨达姆进地狱始终是中情局的梦想，虽然这一梦想很难实现，可中情局热情极大。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中情局就在伊拉克四处鼓动民变，并且鼓动伊拉克人民站起来推翻萨达姆的统治。萨达姆虽然刚受到美国的打击，却并没有意志消沉，他立即拿起血腥的政权武器进行镇压。一个多月的时间，萨达姆就杀掉了反对派1000多人，数千人开始逃出伊拉克。

中情局并不灰心，开始利用这些逃亡人员和伊拉克境内潜在的反萨达姆的势力对萨达姆进行颠覆活动。

1992年，中情局帮助建立了伊拉克反政府组织“国

会大会”，不久后，这个组织就因活动能力不足而被中情局抛弃。后来中情局又资助了一个“民族和谐”的组织，为了让这个组织能达到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的，中情局前后花费了1亿美元，但还是在1996年9月被萨达姆连窝端了。“民族和谐”组织的灭亡使中情局颠覆萨达姆政权的计划彻底破产。

1993年4月14日，刚卸任不久的布什总统到科威特庆祝海湾战争的胜利。在此之前，安检人员突然抓获了17名意图谋杀布什的男子。在审讯过程中，有人熬不住，承认了他们是受伊拉克情报部门指使，想把200磅的炸药安放在布什的车底下，准备把布什轰上西天。中情局最终得出的报告说，萨达姆想要谋杀老布什。

此时比尔·克林顿总统刚刚上台不久，他对这样的事件很是愤慨。6月26日凌晨，克林顿命令军队发射了23枚战斧导弹，把伊拉克情报机关所在地炸得稀巴烂，当时有一枚导弹击中了附近的一幢公寓，使得7名平民死亡。可是时任中情局局长的伍尔西对克林顿的这种行为很是愤怒，他说：“萨达姆意图暗杀老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却在巴格达午夜时分对空屋发射了数

十枚导弹，这种报复行动对洗衣妇和更夫倒是十分有效，要报复萨达姆却不尽然。”

伍尔西的这番抱怨一方面代表了几年来中情局对萨达姆的仇恨，认为克林顿对萨达姆的报复行动太过于仁慈；另一方面，伍尔西本人所代表的中情局也面临着特别尴尬的处境。他的前任盖茨局长虽然想把中情局拉出绝地，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伍尔西主掌中情局后，中情局的很多情报已经不被白宫重视，很多中情局工作人员已经卷铺盖走人了，而招收的一批新人的想法却始终得不到白宫的支持。中情局的财政在被政府慢慢地剥夺。事实上，在这个时候谁都不能把多年遗留下弊端的中情局拉到正轨上来。伍尔西之后的继任者约翰·马克·多伊奇也摇着头告诉国会，他们也无法解决萨达姆的问题，因为中情局本身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克林顿总统一听此言大为恼火，就将他免职，换上了乔治·约翰·特尼特接任中情局局长。特尼特刚上任不久，就有一名情报官发表文章说，美国搜集与分析情报的能力已经瓦解。美国情报圈的领导人多年来一直坚称他们设法把中情局拉回正轨，其实这只是个幻

想。

但是特尼特领导下的中情局始终没有把目光从萨达姆身上移开。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特尼特就在2002年9月17日的参议院秘密听证会上提出严厉警告：“伊拉克为基地组织提供和制造炸弹、生化、放射与核武等各式训练。”当年10月份，中情局又称通过侦察卫星、外国情报机关、伊拉克特工投诚者和志愿者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巴格达拥有生化武器，萨达姆背弃了当初答应的不会再制造杀伤性武器的誓言，又重新开始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该报告最后说：“万一巴格达从海外取得足够的裂变材料，那么它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制造一枚核武器。”中情局觉得这样的报告似乎还不足以说明萨达姆的危险，最终又补充说，“萨达姆很可能会在美国境内发动生化攻击。”

事实上，从美国和萨达姆交恶开始，中情局就没有得到过可靠的萨达姆有生化武器的情报。1995年，萨达姆的女婿卡迈勒将军向美国投诚时，联合国调查小组始终都在伊拉克进行生化武器调查，调查小组中也有中情局的情报人员。卡迈勒告诉中情局，萨达姆的确已经销毁了生化武器，而那名混在调查小组中的

中情局官员也没有找到萨达姆有生化武器的证据。

随着联合国调查小组的调查，很多人都确认，萨达姆的确没有生化武器，即使从前有，现在肯定也销毁了。因为任何人，包括萨达姆都知道，一旦被搜查出这类武器，不用美国动手，联合国就会对伊拉克进行制裁，经济制裁是萨达姆最不愿看到的。

2003年初，小布什在国情咨文中说，中情局的情报分析是正确的，萨达姆拥有的生化武器可杀死数百万人，同时他还复述了中情局几日前给他的情报：萨达姆从非洲取得大量的制造核武器的铀。2003年2月5日，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鲍威尔跑到联合国，在他背后站着的是中情局局长特尼特。当时鲍威尔非常肯定地说：“我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确实的消息来源佐证。我告诉各位的不是主张，而是根据确切情报得出的事实和结论。萨达姆拥有生化武器是毋庸置疑的事情，而且他有能力以造成大量死亡与破坏的方式散布这些致命毒物与疾病。”特尼特当时在他身后露出笑容，姿态极高。因为这是中情局的功劳。

同年3月2日，美国已经开始准备对萨达姆进行打击。特尼特跑到白宫告诉总统说，据可靠情报，萨达

姆如今藏在巴格达南方一个叫多拉农场的地方。于是“斩首行动”立即展开。美国军队把钻地导弹和战斧导弹如洒水一样地洒到多拉农场，结果什么都没有炸到，萨达姆活得很好。

4月7日，中情局又有可靠情报：萨达姆和他的几个儿子在巴格达曼苏区的一个饭店隔壁的屋子里开会。美国空军把4枚重一吨的炸弹扔到了那个屋子。18人死亡，其中就是没有萨达姆和他的儿子！

中情局的情报错误还不止这些。就在美国开始用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时，中情局居然没有任何情报来证实萨达姆的儿子乌代领导的非正规军所持有的攻击型步枪和火箭推进式榴弹所造成的威胁，结果使美国陆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从美国向伊拉克攻击的第一天起，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就错误百出。他们预测说，一旦美军从科威特边界展开攻势，沿途将会有数千名伊拉克士兵和指挥官投降，结果，美国大兵几乎是一路杀到了巴格达，都没有人投降。中情局见局势大好，就预见说，伊拉克军队会大批投降，但直到美国大兵进入巴格达，也没有接收几个俘虏。中情局再次预测说，萨达姆在伊拉

克的统治已经失去人心，美国“仁义之师”一进入伊拉克，就会受到贵宾般的接待，结果，接待美国大兵的却是炸弹和子弹。

战争结束后，中情局大批官员进入巴格达，组建了“伊拉克调查团”，目的就是要找到萨达姆的生化武器。为此，中情局列出了946个萨达姆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疑地点，在军队的协助下开始搜查。不久后，中情局却得出一个很神奇的结论：搜索了全伊，一无所获。

2003年12月13日，中情局接到线报说，萨达姆藏身于距家乡提克里特约15公里的达瓦尔镇附近。当天晚上，美军立即实施了“红色黎明行动”。20时10分，美军终于找到了萨达姆藏身的洞穴，将他逮捕。萨达姆被美军从地窖里弄出来时说：“不要开枪！不要杀我！我是伊拉克总统。我的名字是萨达姆·侯赛因，我是伊拉克共和国总统，我想进行谈判。”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最后找到萨达姆的那个绝密的情报小组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78年成立的，由6名声称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和巫师组成。在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云杉林深处有两幢编号为T3561和

T2562D的神秘小木屋。这两幢二战时期的老房子虽然破旧不堪，斑驳的外表也并不惹人注意，然而，这两幢破木屋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却被列为米德堡最绝密的禁区，任何人都不得随意接近，这里就是中情局的巫师情报小组的办公地点。

这个奇异的“巫师情报小组”先后被冠以“护栏火焰”、“中心通道”、“太阳裸奔者”和“星夜守门人”等稀奇古怪的代号。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成立以来，美国先后有25个部门交给了巫师情报小组182项绝密任务，每项任务平均由巫师作法81个小时。最让人吃惊的是，巫师们的头号主顾竟是号称具有当今世界最先进侦察技术的美国国防情报局；其二号主顾则是中情局本身。此外，美国海关总署、美国禁毒署、联邦调查局，甚至连负责总统出访安全事务及日程安排的美国特别勤务局都向巫师们求助过。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小木屋里又热闹了起来，一些持有绝密通行证的神秘人员来去匆匆。他们都是来向这里的巫师情报小组求助的。

12月16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拉姆斯菲尔德宣称，中

央情报局将“领衔”主审萨达姆。他说，这次大家非常轻松地做出了让中情局负责审讯萨达姆的决定。“做出这个决定，只花了3分钟时间。”“此前2分钟，大家都在喝咖啡。”拉姆斯菲尔德有点幽默地说。

但是，中情局审讯萨达姆的困难却很多。一位中情局官员说：“尽管萨达姆很邪恶，但他毕竟曾经是一国之君。虐待他将有损我们的长远利益。”

中情局使用的方法是根据萨达姆的心理活动规律，从中找到突破口。中情局审讯人员每次对萨达姆的审问都是从“无关紧要”的细节开始，比如哪天在哪里见了谁，家庭成员都有谁等。如果萨达姆开口回答这些问题了，审讯人员就会慢慢地往事先设计好的方向上引，看他的反应，发现其恐惧、激动和回避的规律及原因。中情局信奉“身体决定思想”，即身体疲劳后头脑就会投降。

但是，多日之后，中情局发现萨达姆的确是个人物。他对中情局的审讯专家采取了彻底的不合作态度，避免与审问者的一切交流，什么话也不说。在审问中，萨达姆对任何问题总是一言不发，不是两眼盯着天花板，就是低头看着地面。有时候，审讯人员会

故意问一些“不友好”和刺激性的问题，希望激起萨达姆内心的反感和仇恨，可是萨达姆就如同一个死人一样，毫不为之所动。实在被审问人员逼急了，萨达姆就反复念叨“萨达姆，我是伊拉克总统……”

在极端的情况下，萨达姆还会选择用脑袋去撞墙，审问人员只好先让他安静下来，中断审讯。

直到萨达姆在2004年7月份被送到伊拉克特别法庭，中情局也没有问出他们最想要的问题——伊拉克到底有没有生化武器！

2004年6月3日，阳光明媚的上午，在绿草如茵的白宫玫瑰园，小布什总统正在和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举行记者招待会。像往常一样，回答完问题，他微笑着向台下稍稍颌首，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离去，按照行程，他将乘坐“空军一号”飞机前往欧洲。

闪光灯追着总统的背影，直到他向直升机走去。参加招待会的各家媒体开始收拾家伙准备离开，几个很有毅力的家伙在追着白宫办公厅的官员问问题。

突然，小布什出人意料地再次出现在草坪上，他要宣布一个重要消息。

“我昨晚同乔治（即中情局局长乔治·约翰·特尼特）

在白宫见了面。我和他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聊天。他对我说他因为私人原因而将辞职。我告诉他，我对他的离开表示遗憾。在为美国人民谋利益的工作中，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我接受了他的辞呈。”

镁光灯闪得更厉害了，记者席上有一阵小小的嘈杂。

“我衷心祝福乔治和他的家人，并将很高兴地继续与他合作，直到他正式离开中情局。谢谢！”

正当记者们争先恐后地要发问时，小布什却转身离开了，没有回答任何提问。工作人员拦住了要追上去的那些记者。

白宫这一戏剧性的场面，还有中情局局长特尼特辞职的消息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遍了美国，并且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激起巨大的反响。世界各大报刊、电视和网络纷纷转播这一消息，并且都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

中央情报局和特尼特是白宫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替罪羊吗？

事后，华盛顿一位知名的政界人士说：“历史将会给中情局和特尼特一个公正的说明。也许，只有时间

才能说明真相。”

从第十二任局长威廉·H·韦伯斯特开始，到第十三任罗伯特·米歇尔·盖茨、第十四任詹姆斯·伍尔西、第十五任约翰·马克·多伊奇，直到第十六任乔治·约翰·特尼特，前后共有5位中情局局长在伊拉克问题上像走马灯一样轮番撤职或“辞职”。这时的中情局，真正成了美国政府的“替罪羊”。

除了中情局局长这个“替罪羊”之外，2003年的“特工门”事件也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关注。2003年7月，前外交官约瑟夫·威尔逊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指责布什政府为获得公众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故意使用虚假情报。不久后，约瑟夫·威尔逊的妻子普莱姆的特工身份遭媒体曝光。罗夫、利比涉嫌泄密。切尼和布什也因受到牵连而饱受批评。利比还因在此案中作伪证和妨碍司法，被联邦法官判处30个月监禁以及罚款和刑满后查看两年。

在案件调查阶段，美国白宫前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恩曾多次公开为罗夫和利比辩护。他当时对媒体表示，他与两人就此事交谈过。“他们是好人，他们是白宫队伍中的重要人员，因此，我同他们交谈并回来告

诉你们，他们没有参与其中”。

“特工门”事件从调查、审理经历了4年之久。布什承认白宫有人泄密，但他拒绝对这一事件展开更多调查。随着布什免去利比的30个月监禁，“特工门”事件似乎也就此了结了。

2007年，有消息说，美国前白宫发言人斯科特·麦克莱恩的新书《布什白宫内发生的事与华盛顿失误之处》将于第2008年4月出版，在这本书里，麦克莱恩将爆料说，美国总统布什在“特工门”事件中“误导”他说了不实之词，副总统迪克·切尼也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这里有个问题。我没有说实话，”麦克莱恩在新书中写到，“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而让我这样做的是政府中5个高层官员：罗夫、利比、副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和总统本人。”

麦克莱恩表示，他当初向公众证明罗夫和利比的“清白”，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并没有在伊找到如开战理由所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需要他的帮助来重拾总统信誉。麦克莱恩在书中对“特工门”事件的解说与他当初的口吻大相径庭。

“正当你想着白宫的信誉不能再差了时，另一只靴

子就又掉下来了，”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说，“如果布什政府都不将真相告诉它的官方发言人，美国人民又怎么能期待得知真相呢？”

伊拉克战争的真相，看来想知道也难。

第十七章 养虎成患，本·拉登在劫难逃

本·拉登曾被美国人称为“反苏英雄”或“抗苏斗士”，1998年，本·拉登以“世界伊斯兰前线”的名义发布“圣战宣言”，称美国已经向上帝和他的使者们宣战，因此呼吁将谋杀生活在地球任何地方的任何美国人；中情局成立了“拉登处”，开始对其追捕，10年过去了，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中情局终于如愿以偿。

成立“拉登处”

2001年9月11日，在本·拉登及其领导的“基地”组织的精心策划下，19名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美国民航飞

机，先后撞击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和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其中一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消息传来，不仅美国震惊，也震撼了全世界。这就是“9·11”事件。

“9·11”是人类文明史上黑暗的时刻。在全世界刚刚跨入21世纪的时刻，人类就经历了这一场人间悲剧，从此以后，国际社会恐怖主义甚嚣尘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又不得不面对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就是世界头号恐怖人物本·拉登。

2002年12月12日，负责调查“9·11”恐怖袭击中安全疏漏的美国国会联合委员会完成了调查报告。这个参众两院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建议美国加强努力，打击恐怖组织和它们的资金来源，防止再次发生恐怖袭击。

报告指责美国情报和执法官员在防止“9·11”袭击中出现一系列失误，建议对有关官员做出处理。联合委员会中的共和党要员、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谢尔比认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应该下台。谢尔比说：“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任期中犯下的巨大失误比历任的其他任何一届局长都多。”

报告还对美国如何防止再次在本土发生恐怖袭击作出了建议，呼吁加强努力，打击恐怖分子的训练营地。委员会即将离任的主席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格拉姆。格拉姆说：“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新一代的恐怖分子在哪里接受训练？我们知道答案：主要是在叙利亚和叙利亚控制下的黎巴嫩地区和伊朗。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没有袭击他们的总部和训练营地是一个疏忽，正如我们在90年代没有在阿富汗打击基地组织一样。”

10年来，本·拉登同美国政府及其追随者们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同中情局的特工和那些情报官们斗智斗勇，考验着他们“反恐”的能力。

那么，本·拉登到底是何许人也？

本·拉登1957年3月10日出生于沙特吉达的富裕之家。他是沙特阿拉伯一名建筑界大亨的18个儿子之一，在52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十七。本·拉登在阿布杜尔·阿齐兹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并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他当过工程师，后靠石油及建筑业聚敛了大笔财富，在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国家拥有多家公司，个人财产估计达数十亿美元。

本·拉登身高6英尺，瘦弱，但非常敏捷，擅长马术、长跑、登山和足球运动，还喜欢看有关空手道题材的电影。李小龙是他非常喜欢的演员。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到叙利亚与土耳其交界处的山地去爬山骑马。他曾经在家族企业中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这份工作并未能令这个年轻的穆斯林理想主义者感到愉快。在听过巴基斯坦的阿布杜拉·阿扎姆的激情布道的录音带以后，他大受启发，开始对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阿富汗从1979年到1989年之间那场为期10年的武装冲突，给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团结核心和训练场所。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阿富汗的民族抵抗运动兴起。当时，世界各地许多年轻的穆斯林都以志愿者的身份云集阿富汗，参加被认为是抵抗侵略者的“圣战”。本·拉登就是其中之一。

1980年，23岁的本·拉登加入了数以千计阿拉伯青年的行列，前往阿富汗。在这场反苏“圣战”中，他参与了兴建军火库、医院和修筑道路的工作，也参加过战斗。后来，他领导一批士兵，亲身参与了许多军事行动，包括一次围攻贾拉拉巴德的著名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缴获了一支先进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自

此之后，他到哪儿都带着它。

在阿富汗的经历为拉登提供了联系全球各地的伊斯兰激进人士的机会，结识了许多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马来西亚甚至美国的伊斯兰激进人士。当年的那场阿富汗战争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和全球争霸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本·拉登不仅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甚至还被美国人称为“反苏英雄”或“抗苏斗士”。

本·拉登后来的许多阴谋诡计和暴力手法就是从美国中央情报局那里学来的。美国给了这些“抗苏斗士”们大量的援助，其中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导弹等尖端武器。当时中央情报局每年要拨出5亿美元军费来武装和训练贫穷且手无寸铁的游击队员。美国高科技武器中的不少尖端产品也陆续进入了本·拉登的兵器库。

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秘密支持阿富汗抵抗组织反对苏联的侵略，从而使阿富汗“圣战”在1988年就取得了胜利。当时莫斯科宣布，他们的军队将在以后的9个月内撤出阿富汗。在苏联人开始撤退时，那些“圣战”的领袖们就开始盘算下一步该干些

什么。

本·拉登认为，为阿富汗“圣战”而成功创建的组织不应当被解散，于是就和他的朋友阿扎姆建立了他们自己称之为“基地”的组织，作为未来“圣战”的可能的总部。本·拉登俨然已经成了“基地”组织的领导人。这个组织包括一个情报执行部门，一个军事委员会，一个财政委员会，一个政治委员会，一个主管新闻事务和宣传工作的委员会。还有一个由本·拉登圈子内的人组成的咨询委员会。本·拉登对“基地”领导方式的设计显示出他日益增长的自信和野心。他很快便公开表示，要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准备“圣战”，实现他无可挑战的控制权。



被美国视为头号恐怖分子的拉登

1989年苏联撤军后，本·拉登带着他的“兄弟们”重返沙特。在本·拉登的圈子中，有一位最重要的埃及人名叫艾曼·艾尔·扎瓦西里，是一名外科医生。扎瓦西里当时领导着一支强有力的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他

的许多追随者在新组织中成为重要成员，而他与本·拉登的亲密关系使许多人以为他是“基地”组织的二号领导人。不过后来，他们的组织合并，他的确成了本·拉登的副手。

1990年8月，当伊拉克部队入侵科威特时，由于在阿富汗的经历，本·拉登已经赢得了声誉和尊重，他向沙特阿拉伯国王建议，由他召集“圣战士”们进行一场“圣战”，收复科威特。然而沙特国王法赫德却拒绝了本·拉登所提供的军事援助，转而向美国求援，沙特阿拉伯加入了美国领导的盟军，允许美国军队驻扎在沙特阿拉伯，对此，本·拉登和许多伊斯兰教士予以公开谴责。沙特反对派领导人阿勒法基表示，本·拉登无法接受50万美国士兵踏上沙特的神圣土地这一事实。沙特阿拉伯政府并不在意这些谴责，开始驱逐这些教士，并且没收了本·拉登的护照。后来在一位皇室家族成员的帮助下，本·拉登以参加1991年4月巴基斯坦的一次伊斯兰集会为借口，逃出了沙特阿拉伯。到1994年4月，沙特阿拉伯政府冻结了本·拉登的资产，取消了他的沙特国籍和公民身份。至此，本·拉登已经没有一个他可以称之为祖国的国家。

1991年，本·拉登来到苏丹，继续支持其他穆斯林战士。他在苏丹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恐怖实业组织，吸纳了大量的公司，赚了很多的钱。本·拉登决定利用他的建筑公司建造一条从喀土穆到苏丹红海岸港口的高速公路，同时为“基地”组织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让他们获得许多先进的武器和技术装备。

1996年，苏丹政府要求本·拉登离境。当时阿富汗刚好在极端伊斯兰组织塔利班的控制之下，于是阿富汗成了本·拉登最后的一个避难所。到了阿富汗后，本·拉登的地下势力开始扩张，其“基地”组织成员发展到5000多人，分布在大约25个国家。

1998年2月，40岁的本·拉登以“世界伊斯兰前线”的名义，从阿富汗总部向伦敦的一家阿拉伯报纸发布了所谓的“圣战宣言”。“圣战宣言”称，美国已经向上帝和他的使者们宣战，因此，呼吁将谋杀生活在地球任何地方的任何美国人，“作为任何国家的每一位穆斯林的个人责任，只要他能够这么做”。

他对1983年导致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丧生的贝鲁特自杀性爆炸事件、1992年亚丁的爆炸事件，特别是1993年索马里的武装冲突大加赞赏，因为在那

以后，美军“带着沮丧、羞辱、挫败和死亡离开了那里”。

不过，公开表示要对所有的美国人不加选择地进行杀戮，1998年的“圣战宣言”还是第一次。

由于本·拉登频频向美国发出威胁，于是在1997年得到白宫的批准后，中情局决定实施抓捕本·拉登的计划，要活捉本·拉登。

2004年2月22日《华盛顿邮报》在一篇题为《幽灵战争：1997—1999年间的中情局和奥萨马·本·拉登》的报道中披露说，美国中情局曾在1997年制定了一个绑架本·拉登的完美计划，但是却因为决策者的犹豫最终胎死腹中。

追捕本·拉登的行动最早要追溯到一个名叫卡西的巴基斯坦恐怖分子。

1993年，克林顿上台还不到一个星期，在兰利中情局总部入口处的交通信号灯下，中情局60岁的情报官史塔尔正在车里等着绿灯，在他的后面还有很多车辆，里面坐的都是中情局工作人员。突然，史塔尔从倒车镜中看到一名青年下了车，这个青年一下车就开始用步枪扫射。最先被他扫射到的是中情局秘密行动

通信官达林，接着是中情局医生班内特，然后是史塔尔，最后是中情局工程师摩根。扫射完毕后，那个青年又回到第一个目标达林身上，一枪轰掉了他的脑袋，然后扬长而去。整个过程只有30秒。这就是震动中情局的“中情局大门枪杀事件”。作案者就是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卡西。

此次事件发生后，克林顿总统居然没有按照惯例来对中情局表示慰问，这使得中情局愤怒不已。

一个月以后，纽约世贸中心的地下停车场又发生了一起爆炸案，造成6人死亡。这一次虽然没有中情局官员受伤，但中情局已经开始向恐怖主义开战，把反恐怖主义变成最优先考虑的课题。

1993年，卡西在中情局总部的入口处作案后逃之夭夭，美国立即对他发出了通缉令。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中情局虽然知道卡西就在阿富汗境内，却无法捉到他。因为当时中情局在阿富汗没有任何人手。在随后几年的时间里，追捕卡西的行动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中情局反恐中心得到的情报表明，卡西一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的边境地区流窜活动，而且在阿富汗南部地区的可能性最大。为了尽快捉住卡西，

巴基斯坦情报站精心挑选了在20世纪80年代抗苏战争中和中情局有过合作关系的30多名阿富汗部族武装人员，从事追捕工作。

1997年5月，一个巴鲁什人走进卡拉奇的美国领事馆，提供了有关卡西的情报，3个星期后，由中情局官员、巴基斯坦情报官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在巴基斯坦的一家宾馆中逮捕了卡西，并将他押回美国受审。2002年11月14日，卡西被处决。

当时，这个对付恐怖主义的特别小组针对的不仅仅是卡西，还有其他恐怖主义分子。不过将卡西捉住后，当它们要面临解散的时候，却有一个人引起了中情局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本·拉登。

中情局于1996年1月成立了一个由12人组成的反恐小组，全力对付本·拉登在苏丹的工作站。这个“本·拉登问题小组”还有一个通俗的名称就是“拉登处”，负责追踪本·拉登的行踪。

他们发现本·拉登正躲在苏丹，大力资助北非的恐怖组织，于是就向苏丹政府施压，迫使他们驱逐本·拉登。于是这名“恐怖大亨”就在当年5月来到了阿富汗。

当时本·拉登经常在阿富汗南部城市坎大哈一带活

动，于是特别行动小组就制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绑架计划。他们在阿富汗南部找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洞穴，打算在抓到本·拉登之后将他藏在这个洞里，等到30天之后再由美军特种部队派飞机将其秘密接走。

特别行动小组负责人称，他们考虑到本·拉登失踪以后，其随从和其他恐怖分子一定会加紧搜寻，如果美军立刻派遣飞机进入阿富汗，会引起恐怖分子怀疑，从而带来麻烦。他们认为本·拉登失踪一个月以后，恐怖分子的神经就会懈怠下来，那时候再把他由秘密地洞运走更加安全。为此，他们还在这个洞穴中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水。

1998年春天，特别行动小组经过长时间的追踪观察后将目标锁定在一个距离坎大哈机场仅5公里之遥的农庄。这个名叫塔尔纳克庄园的农庄占地约100公顷，四周有3米高的围墙，里面有80余间房屋。这里也是本·拉登的据点之一，有好几个晚上，他都在这里和自己的妻子过夜。

当时本·拉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所以随身仅带了几名保镖，而且还肆无忌惮地使用卫星电话，这就非常容易暴露他的行踪。特别行动小组对农庄周

围的地形进行了详细勘察，中央情报局则借助卫星定位系统绘制出了农庄的具体地图。一切准备工作都进行得十分顺利。

根据特别行动小组制定的计划，大约30名身手敏捷的武装人员将参加此次绑架行动。他们计划分成两个行动小组。其中一个行动小组将在凌晨2时左右穿越沙漠地区秘密向农庄逼近。为此，他们事先已经设计好了一条能够避开雷区的捷径。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们将匍匐前进，通过排水沟潜入农庄。

另一个行动小组则乘坐两辆“巡洋舰”吉普车慢慢行驶到农庄的正门，使用无声手枪干掉入口处的两名警卫。与此同时，第一个行动小组对本·拉登和他妻子睡觉的房间发动突袭，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那个大胡子、瘦长的沙特人，给他戴上手铐。然后，行动小组将把本·拉登带到农庄的正门，塞进等候在那里的“巡洋舰”汽车，迅速驶往50公里外藏身的山洞。

特别行动小组和中央情报局官员对这个计划进行了反复修改，最后将其递交给中情局高层，等白宫拍板之后立即实施。

白宫反恐协调员理查德·克拉克来到中情局总部，

和中情局负责反恐事务的官员奥康奈尔讨论了这项计划，包括费用和风险。

当时，奥康奈尔认为此次行动最大的风险是可能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因为据卫星拍照和地面侦察来看，在塔尔纳克庄园生活着数十名妇女和儿童，如果抓捕行动出现失误，就很可能殃及无辜。

一旦出现意外，这样的“屠杀”行动曝光后，将使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一落千丈。

1998年6月，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在和几名官员和助手商量之后，最终做出了一个遗憾的决定：行动取消。

就在这项秘密行动被取消之后两个月，1998年8月7日，“基地”组织的自杀袭击者同时对美国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自杀式袭击，共造成224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

在中情局总部大楼，当情报官员和分析家从电视上看到惨不忍睹的画面时感到无比的痛心和愤怒。一名中情局官员后来回忆说，当时负责追踪本·拉登的一名情报官员就直接冲着特尼特发泄心中的不满。“你要对这些死者负责，”这名愤怒的官员对特尼特大声嚷

道，“那时你完全有机会抓到他，但是你却没有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采取行动。”

显然，这名官员所指的就是放弃对塔尔纳克庄园的突袭行动。这番公开的指责让特尼特显得十分尴尬。在美国朝野施加的巨大压力之下，特尼特终于决定要对本·拉登采取行动，但那时本·拉登已经离开了塔尔纳克庄园。

从此以后，特别行动小组再也没有找到对本·拉登下手的良机。因为自从美国在1998年8月20日向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营地发射导弹之后，本·拉登就变得行踪不定，而且关掉了移动电话，增加了保镖人数。1999年，特别行动小组曾经计划对本·拉登在喀布尔的一处住所采取行动，但是当他们靠近住所时遭到了枪击，导致一人受伤。追捕行动也就无疾而终。

几年后，一位退休的“拉登处”特工朔伊尔这样说道：“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干掉他（本·拉登），尤其是在1998年到1999年之间。这样的机会至少有8到10次。中情局向‘上面’报告了所掌握的情况，并提出抓住他或从空中对他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行性报告，但没有一次得到批准。决策者担心，美国一旦采取行动，将

会被指控为搞暗杀。这样做一是代价太大，二是会得罪欧洲人，三是会引起穆斯林的愤怒。这些机会都出现在克林顿时代。”

正如朔伊尔所说，“9·11”之前，中情局有太多的机会使本·拉登无法活生生地看到“9·11”惨案。朔伊尔回忆说：“1998年12月，我们得到情报，本·拉登某晚在阿富汗坎大哈城的一所房子里过夜。我们非常准确地掌握了这个地点，并再次提出用导弹或飞机从空中干掉他。但这一方案又被否定了，原因是那座房子的隔壁是清真寺。决策者担心会炸毁那座清真寺，从而引起伊斯兰世界的愤怒。”朔伊尔说，“如果那时干掉了本·拉登，就不至于（在“9·11”事件中）丧失3000条美国人的生命。”

不过到了1999年3月，又有一次机会摆到了中情局面前。“拉登处”得到情报，本·拉登正在阿富汗南部沙漠中的一个狩猎营里和某中东国家的几名王子一起享乐。“拉登处”提议用导弹把整个营地夷为平地，但是遭到了拒绝。白宫最担心的是，导弹会同时伤及那些王子，由此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会使美国在穆斯林国家陷入更大的危机。

1999年10月的一天，美国中情局反恐中心的一个特工小组飞到了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这个特工小组代号“JAWBREAKER-5”，组长是中情局反恐中心本·拉登行动小组的负责人里克。他是一个在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摸爬滚打许多年的老特工。特工小组来到塔什干的一个秘密机场，在那里登上一架苏制的米-17运输直升机，旋即向白雪皑皑的阿富汗北部山区飞去。特工小组此行的任务是拉拢阿富汗北方联盟最高军事指挥官马苏德，一起来干掉本·拉登。里克直言不讳地对马苏德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本·拉登，让我们携起手来吧！”

中情局的“JAWBREAKER-5”情报小组在阿富汗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中情局反恐中心接到情报说，本·拉登将秘密造访贾拉拉巴德东部山区内的“德鲁塔训练营”。中情局反恐中心的本·拉登小组立即将此情报交给马苏德，告诉本·拉登已经来了。马苏德立即纠集起数只毛驴，驮上苏制火箭，然后派出一个突击小组潜伏到“德鲁塔训练营”附近的一座山上。当小组上路后，马苏德向中情局兰利总部汇报了他的计划：用火箭弹来消灭本·拉登。

没想到这立即引起了中情局法律专家的警觉，因为白宫的法律部门可没批准中情局可以跟马苏德搞这样的纯军事行动。实际上，现在等于是中情局给情报让马苏德行动，所以最后的板子是要打到中情局头上的。为此，反恐中心赶紧发出一封电报：立即取消这次行动！

2001年9月9日早晨，马苏德接受两名阿拉伯记者的采访。结果隐藏在摄像机内的炸弹发生爆炸，马苏德当场死去。数小时后，马苏德的情报助手打电话给中情局，几乎无法解释马苏德的情况。中情局官员问：“马苏德呢？”马苏德的助手回答说：“他在冰箱里了！”显然，他不会用英语表述“停尸房”。2001年9月10日早晨，全世界都知道马苏德死了。

从1999年末直到2001年8月，中情局几乎每隔一个月就会向白宫提出一次本·拉登要攻击美国的警告。“狼来了”两年后，已经没有人相信中情局的警告了。

到了小布什时代，中情局对本·拉登似乎已经没有了从前的敏锐感觉了。2000年10月12日，美国“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的亚丁港遭到一艘满载炸药的小型

橡皮艇的自杀式攻击，中情局黯然神伤。也就是从那时起，本·拉登变得异常谨慎，行动十分诡秘，甚至有时候一天要换三个地方。“拉登处”通过各种手段搜集情报，都无法得知本·拉登到底在哪里。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和他的手下终于对美国下手了，袭击了美国华盛顿和纽约，制造了惊动全球的“9·11”惨案。

而从“9·11”之后，本·拉登更成了神奇的影子，他完全进入地下秘密活动状态，想发现他已非常困难了。另外，美国发动的对萨达姆的战争实际上帮了本·拉登“美国是伊斯兰的敌人”的宣传，“伊拉克战争，使一些穆斯林更相信本·拉登，认为美国确实是一个殖民主义大国”。这一切对美国都不利，而本·拉登在“9·11”后更是给中情局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中情局能不能把他抓捕归案，最后送上审判席？

“9·11”事件爆发后的9月17日，小布什向特尼特和中情局发出最高机密指令，命令中情局追踪、逮捕、拘禁并讯问全球各地的嫌疑分子，而且没有定下任何限制。中情局官员以及被他们聘用的人可以利用刑讯等手段对他们所怀疑的人进行审讯。于是有近1000名

嫌疑犯被中情局扔进了阿富汗、泰国、波兰的秘密监狱，以及美国设在古巴的监狱。另外还有几百名嫌疑人则交给了埃及、巴基斯坦、约旦和叙利亚的情报机关审问，中情局在一旁协助。

中情局还派遣了数十名特工，深入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的部族地区。中情局一直都认为，本·拉登就藏在这个地区。这也难怪，巴阿边界长达2400公里，这是“基地”组织在地球上最集中的地方，中情局的报告指出，这里缺乏任何防守，毗邻阿富汗的两个巴基斯坦省——俾路支省和西北边疆省，一个是荒凉辽阔、酷热难耐；一个是山高路险、要塞当关。世界上最大的部族普什图族就居住在这两个省，他们的个性是好客、报复和荣誉，更大的特点就是对“基地”人慷慨热情。

2001年11月，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建立中情局机构的特工格雷·贝斯特恩获得情报：本·拉登和约1000名追随者藏匿在托拉波拉地区的黄山中，他立即通知了军队，美国人第一次采取了针对本·拉登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格雷·贝斯特恩和他的战友们在阿富汗向导的指点

下，用了两天时间才攀过10多公里的崇山峻岭，发现了本·拉登的营地。营地里驻扎了六七百人，卡车、岗哨、机枪一应俱全。格雷·贝斯特恩叫人支起了激光定位仪锁定目标。美国佛罗里达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开始行动。3天后，B-1B和B-2轰炸机、F-14战斗机轰炸了“基地”组织的营地。但本·拉登并没有被炸死，而是与一批人逃进了山林更深处。

贝斯特恩后来说：“我们找到了一部基地组织成员的步话机，并请来了中情局最权威的阿拉伯人，他研究本·拉登的声音有5年之久，因此，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本·拉登的声音。通过步话机，我们一直能听到他在祈祷、说话，呼吁他的部队坚持战斗。”

贝斯特恩觉得应该乘胜追击，所以，他成了追捕本·拉登12人小组的成员，这12人和一些空中力量牵制住“基地”分子，协同阿富汗兵力一起形成三面夹击之势。贝斯特恩后来说，当时很多次他都觉得本·拉登唾手可得。通过步话机，他们听到本·拉登已弹尽粮绝，希望得到当地阿富汗人的供给。“我们给他们送去了食物，并在其中附带了全球定位系统。确定了本·拉登藏匿的确切地点。我们投掷了82枚炸弹，一枚重达1.5万

磅、大如汽车的炸弹，把他们炸了个稀巴烂。”可就在12月15日，他又听到了本·拉登的声音出现在广播中。

那一天，贝斯特恩黯然地离开了阿富汗，回到美国。

2004年1月份，中情局再次得到可靠情报，美国和巴基斯坦展开了“铁砧行动”，双方动用了7万部队，到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的部族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把“基地”要员驱赶到守候在阿富汗边境的美军的怀抱之中，但是依然一无所获。

2004年1月刚上任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理查德·迈尔斯说，美国正在采取极大的努力搜捕本·拉登。他说，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已经锁定了一些本·拉登可能藏身的区域。

本·拉登终于被击毙

2009年9月13日，“基地”组织在一家伊斯兰网站又公布了本·拉登的讲话录音《给美国人民的声明》——几乎美国每换一回总统，本·拉登就要发表一次这样的讲话录音——本·拉登在讲话中称，奥巴马没有能力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本·拉登指出，奥巴马

就任总统后依然留用了布什政府的许多军事领导人，例如国防部长盖茨，人们因此知道，奥巴马没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出根本的改变，没有能力像他许诺的那样结束战争。本·拉登还对美国和以色列保持亲密关系发出警告。他说：“20多年来，我们已经说过多次，我们与你们的分歧在于你们支持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你们迟迟不能理解这些原因，并为此付出代价。”他再次警告：“如果你们结束战争，那就好；否则，我们将从一切可能的方向继续进行这场消耗战。”

从2001年9月到2010年9月，整整9年的时间过去了，本·拉登除了偶尔在录像中露面外，在中情局眼中依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9年以来，中情局一直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联手搜捕本·拉登，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雇用当地情报员搜集线索，可这种联手行动的效果一直不理想。中情局中的许多人对三军情报局并不信任，认为该局同瓦济里斯坦地区的普什图人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而在中情局眼中，普什图人是本·拉登的朋友。中情局陆续派出大量特工到巴基斯坦，可惜没有任何成绩。很多特工都觉得追捕本·拉登的工作已经渐渐失去意义。

在很多人印象中，中情局的侦察飞机可以从高空拍摄到最清晰的图片，而卫星甚至可以发现山坡上的小羊。本·拉登那样一个大活人不可能每天都躲在暗处，为什么发现不了他呢？中情局本身道出了问题所在：美国缺乏情报人员。

那位曾经险些把本·拉登捉住的特工贝斯特恩说：“我们需要情报人员才能渗透到他们的组织里，可是我们的情报人员远远不够。”

克林顿任职期间，中情局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裁员行动。贝斯特恩认为：“大量裁员必将导致情报人员的流失。我们不可能突然雇佣到一流的人才。建立一个有效的情报机构至少需要7年时间。”

让人并不感到惊讶的是，“9·11”事件发生时，中情局在阿富汗竟然没有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擅长阿拉伯语言的情报人员屈指可数。那位被捉住的卡西在一次受中情局讯问时，问他如何能捉住本·拉登，他的回答是：“关键是扩展信息来源，你必须得在大量信息中去伪存真，找到最有用的信息，而且情报最容易过时，所以必须快速反应。”这正是中情局最致命的弱点所在。

多年以来，本·拉登的下落始终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中情局无法得到可靠情报，所以只能道听途说。以色列情报组织认为，本·拉登在伊朗或阿富汗北部，中情局点头；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坚持认为，本·拉登仍在阿富汗，中情局点头；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则坚持，他已经逃往巴基斯坦，中情局还是点头。阿富汗一个军阀戏谑中情局说：“美国抓不到本·拉登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太多的传言，可怜美国人如无头苍蝇，不知道相信谁好。他们以为用钱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中情局除了在巴基斯坦和本·拉登出没的地方放置并不能得到情报的特工外，最常用的就是使用信号监听，也就是对无线电信号进行截获和破译，除此之外，中情局还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基地”组织活动频繁的地区部署了“捕食者”遥控侦察机和“死神”无人攻击机。“死神”无人攻击机上安装有“死光”的尖端武器，它采用了尖端的化学和生物技术，应用了当今最先进的纳米技术、遥感技术等，可在几百英里之外“听”清本·拉登的声音，“闻”到本·拉登的气味，并发起导弹攻击。可是，本·拉登用土办法静默了一切可以导致被监

听的装置。即使必须传递信息时，他也是用身边的人去送信。

从2001年“9·11”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本·拉登一直逍遥法外。然而，本·拉登的生命却在2011年的春夏之交终结了。这位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隐居”了将近10年的“基地”组织大头目最终没有逃过美军的追杀。2011年5月1日，这位藏身巴基斯坦北部城市的“恐怖大亨”被美军特种部队击毙，其遗体身份得到确认后，迅速被葬入大海。

本次行动开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下达了“只要死拉登”的命令。

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说，首次了解到本·拉登踪迹的线索是在2010年8月，直到2011年4月下旬，关于本·拉登下落的情报才得到了确认，得知拉登的确是藏在距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约64公里处的阿伯塔巴德市的一幢房子里。拉登生前藏身的这幢两层房子从外表看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栋“豪宅”建于2005年，价值约100万美元，里面设施一应俱全，并且有逃生的地道，但没有电话和互联网服务，只有为数不多几个保镖和服务人员，此外还有本·拉登的妻子和家

人。美国官员最终确定，这里就是本·拉登的“家”。

此前，西方媒体曾多次宣称，拉登为了躲避美军，一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的崇山峻岭中“穴居”，并多次披露其“早已因健康原因丧生”。不过，事实证明，拉登还是采取了“大隐隐于市”的做法，在距离巴基斯坦军事学院不远的居民区内藏身数年。

5月1日凌晨，大约24名美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官兵在得到奥巴马总统下达的“击毙拉登”命令后，乘坐4架“黑鹰”直升机突袭本·拉登的藏身之地。直升机从巴基斯坦境内起飞前往距离伊斯兰堡60英里的小镇阿伯塔巴德，于当地时间凌晨1点10分飞临阿伯塔巴德小镇上空，锁定目标后立即用重型武器向本·拉登的这所豪宅发起突然袭击。本·拉登被击中头部，当场身亡，终结了他传奇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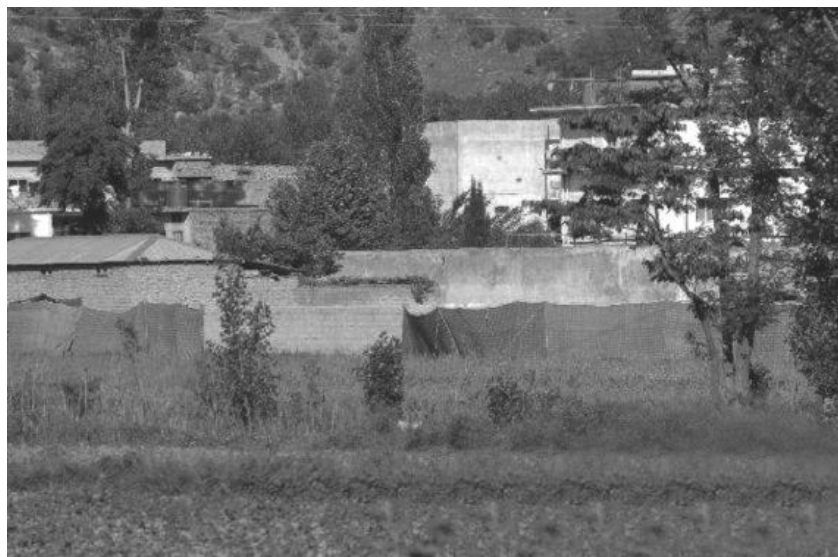
袭击发生地的居民说，在袭击发生时，整个地区都受到了大规模爆炸的震动，现场传来直升机的轰鸣，枪声和爆炸声不断。整个袭击过程持续时间不长，大约40分钟就结束了。整个过程中没有官兵伤亡，但有一架直升机发生故障而下坠，最后被机组人

员和突击队炸毁了，机组人员乘坐另一架直升机离开了这栋建筑。

中央情报局是本次击毙拉登行动的最大功臣，其特工是最终确定拉登藏身地，并向美军提供具体方位的直接操作者。

中央情报局在审问被捕“基地”组织成员过程中，发现了一名最受拉登信任的通讯员，并确定了此人的活动范围，最终找到了位于阿伯塔巴德市内的一座神秘建筑。从外观上看，该建筑的大小约为该区其他房屋8倍，并配有铁丝网护栏和高墙等罕见设施。

中央情报局长帕内塔亲自指挥了本次秘密行动，由“海豹突击队”具体执行。



美国公布的拉登最后藏身之处

在这次袭击中，除了本·拉登丧生外，还有三名成年男子被打死，其中一人是拉登的儿子，另外两人是本·拉登的警卫人员（一说是他的信使）。此外，还有一名女子是本·拉登的妻子，在交战时因被拉登保镖当做人体盾牌而丧生。此外，还有两名在现场的女子也受了伤。

本·拉登的遗体当场经过确认后，即被送往一艘美军军舰，通过了DNA鉴定后，根据穆斯林“快速下葬”的传统，美国动用航空母舰为拉登进行海葬，他的葬身之地位于北阿拉伯海域。在进行海葬前，美方按照伊斯兰传统步骤对拉登的尸体进行了处理，包括对

他的尸体进行清洗、用白布包裹等。他们透露，选择海葬是因为一直难以找到愿意接受这位恐怖分子头目遗体的国家。而按照伊斯兰教风俗与传统，拉登的尸体必须在24小时之内被埋葬。

美军之所以为本·拉登举行海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担心日后本·拉登的墓地会成为“恐怖分子朝圣地”。此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忘记提醒说，击毙本·拉登并不意味着恐怖组织被消灭，“基地”组织很可能要进行猖狂报复，尤其要警惕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分支对交通工具和重要目标下手。

当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前任总统小布什通报了这个让人振奋的消息，并发表了电视讲话。奥巴马在讲话中说，“我们早就怀疑本·拉登藏身于巴基斯坦的一栋建筑中，随着我们手中相关信息的增多，我多次与我的国防安全团队会面讨论此事。上周有了足够的情报来采取行动。”

在乔治·布什总统在任时期，美国方面将过多的精力集中在阿富汗境内，而忽略了塔利班的根据地——巴基斯坦部落地区。而奥巴马在竞选初期即强调对巴基斯坦境内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目标进行打击。奥

巴马上任后，美军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活动开始变得频繁。

“9·11”事件之后，本·拉登“潜伏”的10年，是包括中情局在内的美国各个情报部门和全世界苦心搜寻的10年，但是却一次次地与他失之交臂。在这漫长的10年里，本·拉登“死”了无数次，但那些扑朔迷离的传闻一次次被证伪。那个瘦高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恐怖头目依然不断出现在视频、音频中，对美国发出种种威胁。现在，这场“一个国家与一个个体”的对抗终于以本·拉登被击毙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虐囚门”和“十大酷刑”

2009年8月，美国司法部长霍德尔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对中央情报局涉嫌虐待恐怖嫌犯的指证。在此之前，美联社刊发了一些最近解密的中央情报局档案报告，其中一份解密文档记录了“9·11”之后中情局人员审讯恐怖嫌疑人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的内容。据说，当时中情局人员威胁穆罕默德说，如果类似“9·11”的恐怖袭击再发生，他们将杀死被扣押者的孩子。还有一位恐怖嫌疑人被中情局人员警告说，会强

奸他的母亲。

《华盛顿邮报》2007年2月28日报道，曾在美国中情局阿富汗秘密监狱被关押两年之久的马尔万-贾布尔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他在秘密监狱的生活情况。

美国反恐官员指控30岁的贾布尔曾帮助“基地”组织分子，把他关进了秘密监狱，于2006年6月30日释放。贾布尔接受采访时说，他那天被脱光了衣服，坐在一张椅子上，中情局官员对他进行了录像。他随后被戴上脚镣，蒙上眼罩，戴上耳机。中情局官员给他打了一针，这使他意识模糊。他被平放在一辆面包车的后面，面包车将他送至一个简易机场，他和另外一名犯人被送上飞机。

贾布尔对自己能获释感到意外。中情局是在最高法院驳回布什政府有关《日内瓦公约》不适用于像贾布尔这样的恐怖疑犯的立场数小时后释放他的。

布什在2006年9月份承认，中情局秘密监狱关押了14名恐怖主义嫌疑犯，这些嫌犯已被转运至关塔那摩监狱。布什称：“中情局秘密监狱现在已不再关押恐怖分子，被关押的恐怖分子没有情报价值，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被遣返回其祖国接受审判或关押。”

但贾布尔的经历与美国政府有关中情局秘密监狱的描述并不一致，例如秘密监狱关押的犯人人数和这些犯人构成威胁的严重程度。尽管14名恐怖疑犯已被运往关塔那摩美军监狱，但美国政府并未公布其他数十名恐怖疑犯的身份和他们目前的下落，还没有承认像贾布尔这样曾被认为是极度危险和有情报价值的犯人已获得释放。美国政府的反恐官员称，贾布尔是“一名顽固的恐怖分子，他试图伤害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无辜人士”。美国情报和反恐官员已证实了贾布尔被捕的消息，称他曾被关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但他们拒绝谈论有关秘密监狱或者犯人待遇的情况。

贾布尔称，他是2004年5月被中情局秘密监狱关押的，他当时被一辆汽车运至伊斯兰堡一处偏僻的别墅内。美国情报官员称，这所别墅内设有监狱设施，由中情局和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联合管理。当贾布尔抵达这所别墅时，他看到了20多名其他犯人，其中包括一名在巴基斯坦被逮捕的埃及酋长16岁的儿子。这所别墅也曾被用于关押自“9·11”后在巴基斯坦被逮捕的其他数十名“基地”组织嫌疑犯。贾布尔在这所别墅里待了五周，他被锁在墙角，每天只能睡数个小时。美国审

讯人员每天都对他进行数个小时的审讯，晚上，他还遭到了巴基斯坦看守的毒打。2004年6月16日，他被打了一针后，被蒙上眼罩空运至阿富汗的一所秘密监狱关押。贾布尔说，秘密监狱由穿便装的美国人管理，一些穿黑色制服、戴手套的蒙面男子负责安保工作。他不知道秘密监狱的具体地点。他在秘密监狱被关押的头三个月里经常裸体，他的牢房里只有两个毛毯和一个马桶，牢房没有窗户。牢房里的灯24小时都亮着，房间里还装着两个监视摄像头和一个麦克风。

贾布尔称，美国人每天都对他进行审讯，他在两年的时间内共遭到45名审讯人员的审讯。审讯人员向他出示了数百张通缉犯和已被抓获犯人的照片。美国审讯人员告诉他，他将再也不能看到他的三个孩子了。他曾遭到身体折磨的威胁，但他并没有遭到殴打。审讯人员曾向他展示了一个被称做“狗箱”的木制箱子。审讯人员称，如果他不合作将会被关在那个箱子里。被怀疑策划了“9·11”恐怖阴谋的卡利德就是在被关进那个木箱子后，才开始与审讯人员合作的。不过他从未被关入那个箱子，但他一直是被锁在墙角处，至少有20多次保持令人难受的姿势达数小时。

美国人在6周后给他发了一条裤子，他后来又得到了一件T恤、鞋子、一本《古兰经》、一个床垫。监狱的条件后来逐步得到改善：安装了空调，还建了一个有阿拉伯语、乌尔都语和英语书籍的图书馆。那些表现良好的犯人晚上还可以观看诸如《泰坦尼克号》这样的好莱坞大片。监狱的副监狱长教会了贾布尔如何下象棋，并给了他纸和笔。贾布尔回忆说：“监狱长是一个名叫查利的男子。他对我说：‘马尔万，我们需要情报，如果你合作，那会很好。’我告诉他我没有隐藏什么，我不是一个危险人物。他告诉我，他们不想使用暴力，但是如有必要他们将使用暴力。我告诉他，我不会向他说谎。”贾布尔2004年12月18日被转送至另一个更大的秘密监狱。他在那里只见到了一位阿尔及利亚籍的犯人。

2007年9月24日，《国际先驱导报》发文称，据看中情局有“十大酷刑”用来对付在押囚犯，这应该是“人权史”上的一段耻辱记录。文章说，中情局的工作人员在审问囚犯的过程中，常常会把囚犯头高脚低地绑在一个木板上，脸用玻璃纸盖上，然后开始泼水。此时，由于玻璃纸遮住了口鼻，囚犯很快就感到

窒息而被迫招供。一般囚犯在这种酷刑下平均只能熬过14秒，便纷纷求饶。但据说，“基地”组织成员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曾让审讯人员大吃一惊，因为他足足坚持了2分半钟。

这段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字描述的这种“水封闭”的酷刑，就是“十大酷刑”之一，被中情局称为“最有奇效”的审讯方式。

据美国媒体追踪了解，中情局等美国情报机构使用的刑讯逼供方法还远不止一个“水封闭”那么简单，他们有多项“酷刑”可供选择，这其中包括：

“立正抓”，用力抓住囚犯的衣衫，来回摇晃。

“立正打耳光”，打囚犯耳光，让他感到疼痛和害怕。

“打肚皮”，使用手掌击打囚犯的肚皮。据说，一些中情局探员还受到警匪片启发，学会了用电话簿垫着疑犯肚皮，再用重物猛击的招数，因为这样不会在皮肤表面留下痕迹。

“长时间站立”，囚犯戴着手铐脚镣，被强迫站立40多个小时，这个方法看似简单，却因为对犯人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折磨而被视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冷囚室”，囚犯被强迫浑身赤裸地站在温度约为10摄氏度的囚室中，并被不停地泼冷水。

此外，中情局还有用沸水煮四肢的酷刑，这一招被披露在阿富汗审问塔利班疑犯时被广泛使用。

另外，还有失眠惩罚，即用强光刺激，让犯人长时间无法入睡。专家介绍，人不喝水可以存活72小时以上，但很少人能熬过72小时不睡觉。

与失眠惩罚类似，中情局还准备了强噪音干扰的方法刺激疑犯听力神经，导致其精神紊乱而最终招供。

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中情局还经常在审讯中使用药物逼供的方式。据了解，一些治疗精神科疾病的药物使用在正常人身上会使人情绪极端低落，或者产生各种恐怖的幻觉，在这种精神折磨下，很少有人能“药死也不说”。

中情局等情报机构的刑讯逼供手段主要针对一些他们所怀疑的恐怖分子，尤其是比较高层的“基地”组织成员。美国广播公司就透露，中情局在国外设立的秘密监狱中关押的十几名高级“基地”组织成员都尝过上述酷刑的滋味。

这些严酷的审讯手段早就在情报机构和审讯人员中引发争议，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情报靠不住，甚至中情局总监海尔格森在去年撰写的一份内部报告中也指出，中情局特工使用的这些审讯手段违反了有关禁止以残忍、有辱人格方式对待囚犯的《日内瓦公约》。但由于美国政府内部一些高层人士的袒护，这些以暴制暴的审讯手段还是屡禁不止。

比如2005年，美参议院就通过了禁止“折磨或使用不人道手段”对待囚犯的议案。可是，在美国政府一些高层官员的游说下，国会议员还是把中情局在国外的反恐行动排除在这一禁令之外，直到2007年，美国总统布什才签署了禁令。

总统奥巴马虽然刚上任时曾去过中情局并表示慰问这群“功臣”，可也有人指出，奥巴马实际上并不喜欢中情局，“虐囚门”曝光后，更让他有了理由与前任小布什政府划清界限。不过，奥巴马还是很担心，从“9·11”以来，已经是人困马乏和资源消耗巨大的中情局，在接受调查后会进一步在士气方面遭受重创。中情局也预感到，他们会被奥巴马政府抛弃，认为奥巴马政府没有尽力保护这个肩负反恐重担的国家安全机

构。

中情局当年曾被卡特清洗过，后又被克林顿洗劫过——这一次，他们是否能渡过难关呢？谁也不知道！

2010年3月25日，“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放的一盘录音带中说，如果制造“9·11”事件的哈立德·穆罕默德被处决，“基地”组织将处死它关押的所有美国人。

本·拉登说：“美国已表示出处决哈立德·穆罕默德及其同伴的意愿。美国做出此决定的那一天，就是囚禁在我们手里的所有美国人被处决的日子。”

美国国防部此前宣布，准备起诉哈立德等6名关塔那摩监狱在押者，并寻求判处他们死刑。哈立德被美国认定为“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哈立德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在科威特长大。2003年3月，在巴基斯坦和美国发起的一次联合行动中，哈立德在巴基斯坦城市拉瓦尔品第的一所住宅内被捕。在审讯中，哈立德供认，自己不仅是“9·11”袭击事件的主谋，还策划了1993年袭击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等28起恐怖袭击和未遂恐怖袭击事件，协助策划另外3

起。

2010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09年度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强调“基地”组织对美国造成威胁。美国国务院在报告中称，“基地”组织依然非常活跃地参与对美国和西方目标进行袭击的行动策划。

报告说，巴基斯坦境内的“基地”组织分支对美国造成了最大威胁，虽然这一组织最近遭到挫折，但它适应性强、恢复迅速，依然通过代理组织不断扩展其影响力。

报告还说，也门以及索马里的“基地”组织分支最近越发活跃，并吸引了越来越多激进美国人成为其成员，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担忧。

另外，和2009年一样，美国国务院还在这份报告中，将古巴、伊朗、苏丹和叙利亚列入了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本·拉登虽然已死，但他的“基地”组织却是美国政府和中情局永远的痛。

第十八章 反恐无期，阿富汗战乱何时了

“9·11”事件后，美国认定阿富汗成了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就对阿富汗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每年耗费大约100亿美元，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场战争；中情局在阿富汗扮演的角色也不仅仅是搜集情报，近来更多地介入军事行动，包括搜集有关“高价值”目标的情报、策划谋杀和无人机轰炸，被戏称为“影子战争”，黑水公司也因此大发其财……

每年耗费100亿美元的战争

当代世界史上发生过两次阿富汗战争。

第一次阿富汗战争是指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长达10年的那场战争。那一次对阿富汗的武装入侵，被认为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失败。

第二次阿富汗战争是指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认定阿富汗成了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于是就对阿富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拉开了这场旷日持久、每年要耗费100亿美元的战争的序幕。

2001年10月7日，为了对“9·11”事件进行报复，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起了对阿富汗本·拉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爆发标志着反恐战争的开始。美国官方声称这场战争的目的是逮捕本·拉登等“基地”组织成员，并惩罚塔利班对恐怖分子的支援。当时参与阿富汗作战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北约”国家，另外还有哈萨克斯坦、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并在战后派遣军队驻扎阿富汗，其中驻阿韩军在2007年发生韩国人质被绑架事件后撤离了阿富汗。

“9·11”之后，美国向全球恐怖主义宣战，对外发动两场战争，对内加强监控拘捕。2001年10月7日，

美、英两国部署了近8万人兵力，先后动用5个航母编队及500多架战机，对阿富汗实施军事打击。虽然两个月后，美军就在阿富汗“反塔利班联盟”武装的协助下推翻了塔利班政权，但是直到今天，这场战争依然在继续。

更让全世界不愿看到的是，自从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不但没有达到“反恐”的目的，反而使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尤其是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以后，“反恐”形势更加恶化。

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以后，逐步对美国反恐政策进行调整，其“新政”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反恐重点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然而，就在奥巴马考虑是否继续对阿增兵之际，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却接连发生血腥暴力袭击。2009年10月28日，塔利班武装袭击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联合国人员居住地，造成至少6名联合国工作人员死亡；同一天，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城市白沙瓦发生爆炸，造成100多人死亡，200人受伤；此前三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还发生了一起连环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导致至少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这三起袭击事件表明，

上述三国安全局势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表明美国总统奥巴马“转移战场”的战略目标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美国反恐新政面临严峻考验。

2010年6月7日，美国迎来其军事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因为到这一天，阿富汗战争已经历时整整104个月，超过越南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没有人知道这场曾经被奥巴马许诺马上结束的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到底还有多少美国军人要被送去阿富汗，甚至连这场战争的原因也开始模糊。而且就在这一天，驻阿富汗美军遭遇了“血色星期一”，共有7名官兵遇袭身亡，使阿战中丧生的美军人数上升至1021人。

2010年6月7日，美国广播公司一项民调显示，一种失败的情绪笼罩美国民众——53%的美国人认为阿富汗战争不值得再打，而2001年开战时美国有94%的人支持这场战争。

2010年9月11日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9周年的日子。在9年时间内，美国在布什政府的主导下，先后打着反恐的名义铺开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然而，美国反恐工作进展并不大，甚至影响了

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立即着手对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进行修正，制定了反恐新战略。但分析人士称，奥巴马政府的反恐之路恐怕也不会一帆风顺。

在这一次阿富汗战争中，到处都能见到中情局的影子。中情局的特工和情报官始终与军队相随。

中情局成了美国政府的“红人”

据2002年4月1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被迫开始了自成立之日起最大规模、最快速度的改组。战争一爆发，中情局就成了美国政府眼中的“红人”，白宫不遗余力地助其发展壮大，恨不得让它渗透进敌人的每个细胞。“9·11”让中情局的特工们又重新回到了政治前台。

就在恐怖袭击发生的第二天，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一份保密令，授权中情局消灭“基地”组织高层领导人。中情局局长特尼特先生随即将他的部下召集到总部大楼的隔音会议室内，心情沉重地说：“我们没能阻止这场可怕的袭击，对我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找到这个可恶的敌人——一个禽兽不如的家伙。”

然而，中情局此时的资源状况却根本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冷战过后，中情局对美国国家事务的参与程度就一直在下降，政府预算也大幅度削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情局行动处的特工人数缩水25%，很多长期潜伏在海外的特工都被召回本土；负责招募间谍的官员也不像从前那样活动频繁，只偶尔才出国转转，每年中情局新招募的情报人员不过几十人。在欧洲，中情局已经停止招募为他们提供伊斯兰极端组织信息的阿拉伯间谍。巴基斯坦原是中情局最大的海外基地之一，但潜伏在那里的多数情报人员也因为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而回到了本国。因此，当“9·11”恐怖袭击发生时，中情局剩下的雇员不是快到退休年龄的“老头子”，就是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新手。

鉴于上述情况，2001年9月17日，中情局情报处负责人詹姆斯·帕维特通过总部的电视闭路系统宣布了改组方案，开始了中情局自1947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改组。

首先，中情局成立了一个7人“反恐特别行动小组”，总指挥由实战经验丰富的前特工科弗·布莱克担

纲。中情局从该局其他部门紧急抽调了数百名雇员加入这支反恐队伍。一些久负盛名的退伍特工也受到特别的邀请重新归队。此外，中情局还从退伍军官中招募了许多优秀人才，组成一支准军事行动小组，凡是去过阿富汗、掌握相关语言的军官都被揽到了旗下。随后，中情局对这些新招募的人进行了突击培训，课程包括后勤、通讯等多项内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明白这次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9月底，第一支经过培训的中情局反恐特别行动小组出发了。他们驱车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在北方联盟的后方班吉沙山谷扎营。不久，许多经验丰富的退伍特工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迅速组建起多支情报小组潜入阿富汗内部和周边国家，每个小组的负责人通晓普什图语或是达里语（阿富汗的两种主要语言），小组中至少有一人懂得武器使用和后勤。

在第一阶段，总共有约100名特工在美国特种部队之前进入阿富汗，为美军提供情报、寻找安全的驻扎营地。同时，他们还负责侦察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位置，用武器和礼物向当地军阀示好。一开始，美国情报人员的出现令阿富汗北方联盟深感不安，他们无

法确定美国人这次究竟出于何种目的，于是美国特工安慰他们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消灭‘基地’组织，帮助你们击败塔利班。”

北方联盟内部的矛盾是令特工们最为头疼的问题。为了让这些军阀团结起来对塔利班作战，中情局必须在他们中间扶植起一个领袖。20世纪90年代末，中情局曾经大力栽培马苏德，每年向他资助5万美元，但为了掩人耳目，这些钱都是通过英国人转给北方联盟的。可是就在“9·11”袭击发生的三天前，马苏德突然遇刺身亡，中情局不得不重新培养另一位军阀法希姆。

当美军特种部队于10月中旬乘直升机抵达阿富汗时，中情局在短短半个月已经同当地军阀建立起关系，并为特种兵准备好了安全的营地和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此时的中情局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囊中羞涩的角色了，它的每个小分队都拥有大量资金，用以收买军阀和开展其他活动。最开始，中情局付给那些可以召集到士兵的军阀的酬金是5000美元，后来这个数目变成了10万。一位中情局官员透露：“我们同每一个可以联

系到的军阀接触，后来随着酬金上涨，他们开始主动联系我们。”几个星期的时间内，中情局就召集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反塔利班部队，为美军冲锋陷阵。

为了求得阿富汗边远地区部族长老及地方军阀配合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美国中央情报局驻阿富汗特工人员竟然用“助性”蓝色小药片——伟哥——贿赂提供情报的地方首领。

在一次交易中，一名中情局驻阿富汗特工察觉到一位60岁、有4个年轻妻子的军阀的苦衷，便从兜里掏出了4粒蓝色小药片（即“伟哥”，又称“万艾可”）递给了这个军阀，“试一试这些，你会爱上它们的。”4天之后，当这名特工重返阿富汗时，该军阀春光满面地出来迎接，并提供了诸如塔利班供应线和最新行动等非常重要的信息，随后又索要了更多的药片。

中央情报局特工给阿富汗“线人”的回报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为其家人提供医疗服务、赠送儿童玩具和学习用具，甚至办理旅行签证等。

从反恐行动开始，中情局共派出了几百名特工，花费高达数百万美元，而这些特工为推翻塔利班也是不遗余力。据说，带领第一支特别行动小组进入阿富

汗的老特工11月回到美国的家中时，体重整整轻了20磅。在阿富汗战场上阵亡的第一个美国人也是中情局的特工。在这些“007”的帮助下，美国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了军事行动的胜利。

中情局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得益于“9·11”后的这次突击改组，让情报人员的工作效率大幅提高。有人形容，他们在短短几个月内所取得的成果甚至比几年来的总和还要多。

但是在追踪“基地”组织的行动中，中情局的工作却进展得很不顺利。由于“基地”组织纪律性极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特工也很难渗透进去。自开展反恐行动以来，中情局在追踪“基地”分子的工作方面只有两个较大的收获：一是其无人驾驶飞机追踪到了本·拉登头号助手阿提夫的下落，帮助美军除掉了一个心头大患；再就是挖出了三号人物祖巴耶达赫的下落并将其抓获。而对于美国头号敌人本·拉登和塔利班前最高领导人奥马尔，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进入阿富汗以后，中情局反恐突击队特工的日子并不好过。生存一直受到严重的威胁，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2009年12月30日，阿富汗霍斯特省查普曼军营遭自杀式炸弹袭击，8人死亡。这一营地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办公场所，死亡者中有7名中情局人员，包括中情局查普曼军营负责人。塔利班武装12月31日宣布对这起袭击负责，中情局发誓为遇难特工复仇。

查普曼军营原是一处军事基地，后转为中情局办公场所，防御工事坚固。袭击者可能是作为“线人”受邀进入军营提供情报，因此进入时未受到严格审查。当时中情局的一名资深情报搜集官员自喀布尔正要赶来和这名“线人”会面。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介绍，中情局经常将当地“线人”带入军营并听取汇报，再派他们去搜集情报。

2009年12月31日，塔利班武装发言人穆贾希德声称：“我们的人制造了这起袭击。”一名自杀袭击者身穿军服和自杀背心进入查普曼军营健身房后，引爆炸弹。一些中情局雇员当时正在健身房内开会。

事件发生后，中情局总部降半旗向遇难特工致哀。当7名中情局人员的尸体运抵美国多佛空军基地后，在那里举行了小型的追悼会，2009年刚刚上任的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等官员以及死亡人员的亲属、

朋友出席。莱昂·帕内塔的悼词充满了感情：“牺牲的同伴远离家园，承担保卫祖国免遭恐怖袭击的重任，我们应向他们表达真挚的感谢。我们会继续战斗。”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当天致函中情局，称赞遇难特工“为美国公民安危作出巨大牺牲”，不顾生命危险保卫国家安全。奥巴马同时也承认，中情局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以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查普曼军营这次遭袭重挫了中情局海外行动，伤亡程度堪比1983年黎巴嫩袭击。美联社报道，这也是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中情局遭遇最严重损失的一次，先前只知道有4名中情局特工死于阿富汗战争。

这次袭击查普曼军营的人名叫胡马姆·哈利勒·阿布-穆拉勒·巴拉维，来自约旦，是一名医生。据说在一年以前，巴拉维曾遭到约旦情报机构逮捕，后经规劝成为约旦情报机构人员，以外国“圣战者”身份潜入“基地”组织内部，为美国和约旦反恐机构提供情报，后“投奔”塔利班，成为双面特工。巴拉维以汇报有关扎瓦赫里行踪的紧急信息为由，进入查普曼军营。汇报开始后不久，他就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约旦情报总局官员阿里·本·扎伊德也在爆炸袭击中

死亡。扎伊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的亲戚。他的尸体在两天后被运回约旦，由约旦王室接收。一名自称哈吉·雅各布的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人员说，扎伊德帮助中情局招募潜入“基地”组织的间谍，巴拉维便是其中之一。

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说，由于自杀袭击者是约旦方面提供给美国的“线人”，约旦情报机构为此感到很难堪。扎伊德在中情局办公场所丧生，约旦与美国在反恐方面的密切合作被公之于众。这令约旦政府深感尴尬。

查普曼军营遇袭的细节虽然很少对外公布，但它却为世人揭开了阿富汗战争最隐秘的那一部分的面纱，让情报机构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暴露出来了。于是发生在阿富汗的这种战争形态，被美国媒体称为“影子战争”。

据有关报道称，奥巴马上台以后，中情局在阿富汗的人员接近七百人，特工和情报分析人员占三分之一，其余为后勤人员。中情局驻阿富汗情报站已经成为其历史上最大的情报站之一，可以和过去在越南和伊拉克巅峰时期的规模相比。中情局驻阿富汗情报站

本部设于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内，而大部分人员分散在阿富汗各地的秘密基地和军事据点。

中情局的“影子战争”和“黑水公司”

中情局间谍在阿富汗扮演的角色也不仅仅是搜集情报，近来更多地介入军事行动，包括搜集有关“高价值”目标的情报、策划刺杀和无人机轰炸等。

为了有效地搜集情报来打击塔利班，中情局在当地发展“线人”。这些“线人”常常前往塔利班势力猖獗的阿富汗东南部，或者是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区搜集情报，再回到中情局基地汇报情况。而这次遇袭事件表明，“线人”也可能靠不住，老牌间谍机构也难免遭到双料间谍的暗算。

然而，中情局的那些专家们却常常“怪招”迭出，充当美军的“师爷”。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同时也遭到了不少非议。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专家曾提出利用阿富汗妇女为阿富汗战争“做宣传”，以博取欧洲国家民众的支持。阿富汗妇女可以通过表达对未来的期盼和对塔利班获胜的恐惧情绪，博得欧洲民众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

持。按照他的说法，阿富汗妇女是传递这种信号的“理想信使”。

他认为，积极展开舆论造势，让阿富汗妇女向欧洲国家妇女“倾诉”，有助于平息欧洲民众反对阿富汗战争的情绪。

中情局专家和美国国务院舆情分析师警告，欧洲民众对阿富汗战争的支持率岌岌可危。“北约”成员国荷兰不久前宣布，按原定日期从阿富汗撤军，并不再向那里派兵。分析师担心荷兰这一“带头”举动，将在“北约”内部产生连锁反应。

这名中情局的专家还在报告中建议采取“公关策略”，利用法国等国民众对阿富汗平民及难民境况的担忧，鼓动欧洲民众支持这场战争。

中情局在持续多年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的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也留下了许多让美国人非议的话柄，其中之一就是，中情局一直雇佣私人保安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与追击“基地”恐怖分子。

美国中情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追击“基地”恐怖分子时，雇佣了多名美“海豹”突击队和特种部队的退役士兵负责提供安全保护。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

务期间，这些受雇的私人保安经常会直接参战，利用手中的先进武器直接打击恐怖分子。这些受雇佣的前特种部队士兵大多隶属于著名的黑水公司，他们使用的武器是锯短了枪管的M4自动步枪，而且还加装了性能先进的消声器。

中情局早在2004年就曾雇佣黑水公司人员参与一项秘密计划，协助其猎杀“基地”组织高级领导人。该计划开始于2001年，在2009年新上任的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将其取消时才被曝光。

美国黑水保安公司是一家私人的军事、安全顾问公司，是美国著名的雇佣兵和保安公司。黑水公司总裁埃里克·普林斯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黑豹”特种兵出身，其公司保镖大部分也来自美国军方和警方的特种部队。有知情者称，黑水公司的老板埃里克·普林斯其实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特工行动人员，他在中情局的总部留有档案记载。

黑水公司创立于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它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主要军事任务承包商，负责建立与训练伊拉克新陆军、警察。自从美军入侵伊拉克以来，黑水公司在伊的业务不断扩大，

并且获得美国国务院的合约，为美外交人员提供安全保护服务。不过，该公司老板普林斯曾一度面临一系列指控，包括谋杀、走私武器、蓄意屠杀伊拉克平民的罪名。就在该公司被曝出是“虐囚门事件”的幕后操控者后，其业务与营运方式成为了舆论指责的焦点。

普林斯曾受到他的两名前雇员的指证，包括谋杀、走私武器、蓄意屠杀伊拉克平民的罪名，更使得这家公司名声在外。黑水公司目前在世界多个战乱国家和地区执行各种非军事任务。

黑水公司2004年与中情局秘密签署协议，协助中情局在伊拉克追捕并杀死“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或高级成员。中情局为此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但却没有成功抓捕或者杀死任何恐怖嫌疑犯。

2001年至2009年，普林斯的政府合同总金额达到15亿美元，他甚至还在北卡罗莱那州组建了一个私人黑鹰直升机队，占地约7000英亩。但事实上，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一些证人相继出面揭发黑水公司雇员曾在系列事件中滥杀平民，从而把黑水公司推到风口浪尖。伊拉克内政部后来宣布吊销黑水公司在伊拉克的营业执照，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迫于国会以及舆论

的压力也先后表示对黑水公司展开调查。在媒体随后铺天盖地的报道中，黑水公司雇员俨然成了唯利是图的雇佣军。

埃里克·普林斯在国会作证时曾极力为黑水公司进行辩护，称该公司的行动是恰当的，把“黑水”形容为两伊边境问题的替罪羊。他说，他属下的人员面对美军士兵相同的危险，该公司迄今已经有30名保安人员死亡，而他们保护的美国人没有一个受到伤害。对于他领导的安全人员是否在一起枪击事件中犯下谋杀罪，他说已经把涉案人员革职和罚款，应该由美国司法部判决这些前雇员是否有罪。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普林斯竭力把黑水公司雇员从事的工作描述为“高尚的事业”。他说，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里矗立着4位军官的塑像：他们当年帮助整顿了原本只是乌合之众的大陆军，在独立战争中打败了英国。这些将军是黑水公司的偶像，普林斯显然想把公司的行为与他们相比，他的黑水公司雇用士兵保护驻伊拉克的美国官员。

美国有媒体指责普林斯正在组建一支不受美国政府控制、只听命于他本人的私人军队。普林斯反驳了

这种说法。他认为黑水公司在伊拉克的千余名雇员不是杀人狂，他还指责律师和国会议员无中生有。不过，他自身的经历表明，他在无休止地追求力量和权势。美国国防系统的一份时事通讯曾援引他的话：“所有人都携带枪支，就像耶利米重建犹太会堂一样，一手持剑，一手拿着瓦刀。”这句话解释了他的士兵服务精良的原因：在危险环境中，这些士兵比国际救援组织乃至美国军队更善战、更高效。

有最新报道称，2010年6月25日，黑水公司又与美国中情局签订一份合同。根据该合同约定，黑水公司将继续在阿富汗为中情局服务，中情局支付其报酬的金额高达1亿美元。

“搞笑”的事件和“18支秘密部队”

在阿富汗战争中，中情局除了制造一些话题之外，还在制造一些十分搞笑的事件。

为了对付驻阿富汗美军，塔利班武装竟然将一些猴子训练成杀手，教它们使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布伦式轻机枪甚至迫击炮，向穿有美军服装的士兵发起袭击。日前，这些会开枪、会打炮的“猴子士兵”被

武装分子牵出来向西方游客展览，塔利班武装希望利用它们博取动物保护组织的同情，从而给美英盟军施加压力，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撤兵。

塔利班武装分子此前一直对猴子士兵的存在严格保密，最近，塔利班头目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主动向前往巴阿边境地区的游客们展示这些猴子士兵，显然希望将它们当成一种“宣传道具”。一名塔利班内幕人士透露说：“如果爱护动物的西方人得知这些猴子可能在战争中受伤，他们可能就会向政府施压，从而迫使西方军队撤离阿富汗。”

美军高级消息人士证实了这些“猴子士兵”的存在，军事专家们将这些武装猴子称做“猴恐怖分子”。一名美军消息人士说：“我们最可怕的梦魇就是这些受过武装训练的猿猴们——黑猩猩、大猩猩，猩猩们都有可能受到塔利班分子的武装训练，这将使我们在阿富汗的战争变得和好莱坞科幻电影《人猿星球》有点相似！”

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训练猴子当杀手”的主意最早是由美国中情局发明出来的。“越战”时期，一些美军士兵注意到丛林里的猴子喜欢从地上捡起枪

支和其他军事设备进行把弄，中情局的动物心理学家听说此事后，立即发起了秘密的“香蕉行动”，训练一些猴子在越战中充当“雇佣军”。

中情局专家们利用花生、香蕉等诱惑，训练猴子正确使用枪支，还教它们如何在丛林中分辨敌方士兵并朝对方射击。美国情报局中的苏联间谍将中情局训练“猴子军队”的秘密偷偷汇报给了莫斯科的高层。几个月后，苏联军事情报组织GRU也开始培训起自己的“猴子军队”。苏联解体后，“猴子士兵”的训练师失了业，于是他们将“训练猴子当杀手”的秘诀卖给了各种各样的军事组织，包括塔利班。

看来“训练猴子当杀手”这一招的“专利权”，还应该还是中情局的。

早在2002年6月3日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一位政府官员就在华盛顿公开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成立另一个“准军事化”的小分队，专门对付境外的恐怖分子。

他还说，该小分队正从中央情报局现有的准军事部队成员中吸纳骨干精英，作为单独的一支力量；此前的准军事部队是中央情报局在海外行动的“特别行动

纵队”的一部分，在阿富汗遇难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翰·尼斯潘就是该部队的一员。只有得到美国总统的秘密授权，这支小分队才可以行动，当然也要把此事通告给国会的一些高级官员。

由于这位官员诚实的爆料，人们又重新想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18支秘密部队”，这“18支秘密部队”包括：

1. 乌克兰游击队

从1945年到1952年，中情局训练并且支持的乌克兰游击队。这支部队最初是由德国人组织起来、在二战中对抗苏联用的。七年的时间里，这支游击队游荡在喀尔巴阡山脉，制造一些零星的攻击。1952年，他们被一支大规模的苏联军队给击溃了。

2. 缅甸中国旅

新中国成立之后，原国民党残部退却到缅甸北部。1950年，中情局利用这些士兵组成1.2万人的部队，向红色中国发起攻击。然而，这些国民党军残部最终发现垄断当地的鸦片生意更有利可图，便“解甲归田”了。

3. 危地马拉叛军

在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宣布共产党合法并剥夺了美国水果公司在当地的种植园后，中情局决定推翻这个政权。危地马拉叛军在洪都拉斯接受训练，并得到了中情局提供的运输机和战斗机空中支持。这支军队1954年入侵危地马拉，很快推翻了政权。

4. 苏门答腊叛军

为了在1958年颠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的政权，中情局向苏门答腊岛派遣准军事专家和无线电报务员来组织反叛。在中情局的空中支援下，叛军开始行动，但是很快被击败。

5. 康巴骑兵

1950年中国解放西藏之后，中情局开始招募康巴骑兵，这些凶悍的武士支持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59年逃往印度。这些康巴骑兵在赫尔营接受现代战争训练，后来被中情局空运回西藏，数量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4万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人被中情局抛弃。

6. 猪湾入侵分队

1960年，中情局着手招募1500名生活在迈阿密古巴难民，准备对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发起突然袭

击。在危地马拉训练之后，这支小股部队在B-26轰炸机的空中支持下，于1961年4月17日在猪湾登陆，后来几乎全军覆没。

7. 老挝苗族部队

1962年，中情局特工招募生活在老挝山地的苗族部落人，用以对抗信奉共产主义的老挝人民党。他们在中情局的扶植下人数发展到3万人。在1975年，仅剩下1万人左右逃亡泰国。

8. 依族雇佣军

这是一群生活在越南的中国山地民族，在越战期间，被中情局招募起来组成雇佣兵。这支残忍凶悍的部队从越南招募人员，追踪胡志明的踪迹。这支部队让中情局花费高昂，据说因为不提供啤酒和女人，他们就拒绝开战。

9. 秘鲁军团

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不能镇压其东部亚马逊省的游击队武装，秘鲁请求美国的帮助。作为回应，中情局首先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加强营地，然后雇用当地的秘鲁人，接受从美国陆军借来的“绿色贝雷帽”的训练。在击溃游击队之后，这个武装的精英部分

被解散，因为政府怕他们变成新的威胁。

10. 刚果雇佣兵

1964年刚果内战期间，中情局在刚果建立了一支军队以支持亲西方的领导人。中情局引入欧洲雇佣兵和从古巴流亡而来的飞行员组成空中力量，主要驾驶运输机和B-26轰炸机。

11. 柬埔寨政变军团

15年以来，中情局尝试了很多办法来颠覆柬埔寨左倾的王子诺罗敦·西哈努克，包括数次暗杀，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在1970年3月，一次中情局支持的政变终于得以成功。这支称为KKK的反西哈努克的武装占领金边，控制了政府。

12. 库尔德叛军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情局进入东伊拉克，组织并支持当地的库尔德人，对抗当时亲苏联的伊拉克政府，帮助伊朗国王顺利地解决与伊拉克的边境争端。在伊朗和伊拉克达成协议之后，中情局不再给予库尔德人以支持，这股部队被伊拉克军队消灭了。

13. 安哥拉雇佣军

1975年7月，中情局用超过3000万美元购买武装

和雇用法国及南非雇佣兵，帮助反对派对抗安哥拉执政者。最后，中情局的这次行动变成了一次无果的军事冒险。

14. “阿富汗圣战”小分队

从1979年卡特总统开始，一直到里根总统任职，美国一直都在偷偷地支持抗击苏联的阿富汗武装。这场行动实现了其初始的目标，但为本·拉登提供了容身的天堂。

15. 萨尔瓦多杀人小队

早在1964年，中情局就帮助萨尔瓦多成立两个准军事情报网络，后来发展成为萨尔瓦多杀人小队。在从1980年持续到1992年的萨尔瓦多内战期间，杀人小分队至少需要为4万件命案负责。即便在1984年里根总统公开指责杀人小分队之后，中情局仍然向其提供支持。

16. 尼加拉瓜叛军

1981年11月23日，里根总统签署了一份绝密国家安全指示，授权中情局招募人员支持叛军，反对尼加拉瓜政府。为了支持叛军，中情局在没有得到国会情报委员会赞成的情况下，策划实施了很多阴谋破坏活

动。

17. 海地政变小分队

1988年，中情局尝试插手干预海地的大选，当时选举获胜的是阿里斯地德。3年之后，阿里斯地德在一场流血政变中被推翻，当时有4000人被杀害。参与这次政变的许多领导人，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接受中情局的钱。中情局还创建了海地国家情报机构。

18. 委内瑞拉政变小分队

2002年4月11日，委内瑞拉陆军领导人试图推翻国家民选的左翼总统查韦斯。这次政变两天就失败了，因为无数的人走上街头反对这一事件。美国总统小布什是西方所谓“民主”国家里面唯一没有谴责这次政变的领导人。据情报专家分析，中情局显然参与了这次政变。

从这18支秘密部队的成立和它们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到中情局多年来从事海外“准军事行动”一条清晰的轨迹。如果要这样排序的话，那么，这一次在阿富汗战争中屡建奇功的中情局“特别行动小组”，应该要算是它的第19支秘密部队吧！

阿富汗战争，何时是个尽头……

第十九章 走马换将，奥巴马看好帕内塔

奥巴马上台后中情局走马换将，第19任局长不仅七十多岁，而且又是一个“外行”局长，于是“口水”不断；中情局间谍米兰缺席受审，开美国反恐人员境外获刑之先河；在非洲开辟新的反恐战线，吉布提正成为在索马里、也门、非洲之角展开打击“基地”组织秘密行动的中心；新局长对伊朗“铀浓缩”问题又有了新的定论；“文化冷战”叫人怵目惊心。

中情局成了美国的“文化部”

在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中情局除了从事“秘

密行动”和“准军事行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文化冷战”。

美国纽约新闻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英国作家弗朗西斯·施特罗·桑德斯撰写的《中情局与文化冷战》一书。在书中，作者以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向世人披露，二战以后为了服务于美国争霸世界的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不惜工本，投入巨资，把神圣的文化传媒领域辟为冷战战场的一翼，将高雅艺术殿堂变成思想渗透的工具。

20世纪50年代初，曾在二战中为艾森豪威尔效力的心理战专家杰克逊担任总统心理战特别顾问。1951年4月，心理战委员会成立，中情局也成立了负责心理战的“国际组织处”。杰克逊为美国制定的心理战计划目标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时能够不战而胜”。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所谓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其目标是借用知识分子、学者、舆论制造者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瓦解那些为共产主义和其他敌视美国 and 西方世界的信念提供思想基础的学说和思维模式”。

中情局开展文化冷战的主要资金来自马歇尔计划

的秘密资金。根据马歇尔计划，为了使美国援助西欧的资金能大力发挥作用，每个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都应将一笔与援助资金数目相等的资金存入中央银行，作为对应资金。根据协议，对应资金由美国和受援国共同使用，其中95%为受援国合法财产，而5%的部分则要作为美国政府文化冷战的秘密经费（约2亿美元），归中情局使用。

1950年6月26日，中情局筹组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大会”）在柏林的泰坦尼亚宫成立。之后，“大会”移师巴黎，并在英国、意大利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中情局的诸多官员直接参与其中的工作，并进行监督。这些机构网罗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数学家及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大会”在中情局的授意下，将中间分子列为争取对象，并重点做“非共产党左派”的工作，使他们逐渐转化为美国开展文化冷战依靠的基本力量。“大会”创办了机关刊物《证据》，许多知名人士在此刊或属于“大会”的其他刊物（如《邂逅》、《月刊》、《证言》等）上发表文章。

中情局插手各种活动，宣扬美国文化、自由和价

值观。1951年4月，中情局批准了在欧洲举办艺术节的计划，并在纽约以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之名开了一个“艺术节账户”，为中情局和国务院暗中提供经费，还紧急成立了法菲尔德基金会，作为其外围组织，为艺术节提供经费。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情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它通过秘密资助外国出版社或图书销售商，在海外出版或发行书籍。其方针是：出版图书不应与美国政府有任何公开联系，以免受到指责；对于立场“敏感”的作品尤其要注意；出版图书是行动需要，不要顾及商业利益等。

中情局特工常常以制片人或经纪人的身份为掩护在电影公司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在派拉蒙公司工作的中情局特工卡尔顿·艾尔索普就定期为中情局和心理战委员会撰写“电影报告”，对好莱坞的政治气候作出评估，并竭力使制片人接受中情局设计的“好莱坞模式”。

这时的中情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1956年中情局将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偷取

出来，发表于《纽约时报》，导致95%的美国共产党员退党，90%的欧洲共产党人退党。这些共产党人把苏联看做是工人的天堂，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曾是他们信仰的支柱。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变成恶魔，他们难以承受，结果让中情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中情局少有的成就。对此，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情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中情局，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情报机构啊！

莱昂·帕内塔当上中情局局长

2009年1月9日，当选美国总统后的奥巴马在组建他的情报班子时，提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丹尼斯·布莱尔为新任国家情报总监人选，并提名白宫办公厅前主任莱昂·帕内塔为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人选。

奥巴马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布莱尔和帕内塔为人正直，经验丰富，并将能够帮助国家有效地防范各种威胁，足以胜任这两个要职。

奥巴马原来是打算让前中情局副局长、中东问题

专家约翰·布雷南出任中情局局长的。在奥巴马竞选期间，布雷南曾担任过他的情报顾问。但是，因为布雷南曾在中情局任内涉嫌参与设计关押和拷打“9·11”事件嫌犯计划而备受奥巴马的自由派支持者的批评，因此，奥巴马选择了帕内塔。

莱昂·帕内塔出生于1938年6月，1976年至1992年任国会众议员。1994年至1996年曾任克林顿政府白宫办公厅主任。从政多年来，帕内塔的正直在美国政坛是出名的，他身上也充满了无畏的闯劲。

帕内塔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他父母到美国时一无所有，没受过正规教育，也不懂手艺，连英语也说不好。两人先是在一家餐馆打工，后来开了自己的餐馆。小帕内塔五六岁时，已经开始在餐馆洗碗涮盘子了。艰苦的生活不但没有磨灭帕内塔的乐观天性，反而更培养了他的责任感。高中时他就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后来考上了法学院，毕业后当了一年律师，又加入了美军。三年后退伍时，他已是陆军中尉。

还在当兵时，帕内塔就想向政界发展，并显示出了自己的闯劲。有一次，他趁着放假来到华盛顿，想

谋个职位。但他谁也不认识，只记得在报上见到过“卡利法诺”这个名字。卡利法诺是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助理，也是意大利人后裔。帕内塔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不认识你，但我很为你感到骄傲。我也是意大利人。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进入政府？”没想到，卡利法诺居然给他回了一封信，并表示愿意见他一面。

在卡利法诺的指点下，帕内塔开始投出简历，最后当上了加州参议员托马斯·基克尔的法律助理。基克尔看中的是帕内塔的军人身份和律师背景，但他告诫帕内塔：“你很快会面对各种诱惑。有人会请你吃饭，送你礼物，试图通过你来影响我。但我们是为了加州和全国公民的利益来到这里的。每天早晨你要看着镜子，提醒自己要去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这番话，让帕内塔在政坛上一直走得很正。

3年后，尼克松政府的卫生部长范奇请帕内塔当助理。不久，尼克松任命帕内塔为民权办公室主任。从此，帕内塔确定了人生志向：维护民权，伸张公平正义。帕内塔原是共和党人，但不满共和党对民权的态度，在1971年宣布加入民主党。而他对民权的积极维

护，也是他后来能当上中情局局长的一大因素。



第19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

1976年，帕内塔当选加州联邦众议员，连任9届。克林顿上台后，他被任命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1994年当上了白宫办公厅主任。帕内塔是个工作

狂，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为克林顿效劳4年后，帕内塔离开了白宫，回到老家加州，成立了帕内塔公共政策研究所。

一年后，克林顿和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私情曝光，而莱温斯基正是帕内塔的实习生。因为这件事，帕内塔对克林顿非常失望。帕内塔结婚多年，非常忠于妻子。在华盛顿工作期间，他每个周末都要飞回加州的家中。

帕内塔的白宫岁月，收获了一段珍贵的友谊，也为他当中情局局长埋下了伏笔。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伊曼纽尔当年曾担任克林顿的高级顾问。有一次，第一夫人希拉里怀疑伊曼纽尔泄密，打算炒他的鱿鱼，但帕内塔坚定支持伊曼纽尔，帮他保住了职位。11年后，刚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打电话给帕内塔，询问谁能当白宫办公厅主任，帕内塔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伊曼纽尔。后来，伊曼纽尔投桃报李，就向奥巴马建议由帕内塔出任中情局局长。他说：“莱昂有很好的判断力和理解力。他是一个出色的管理者，也受到两党的信任。”

然而，帕内塔得到奥巴马的提名后，却引起了一

场风波。美国舆论界普遍认为，奥巴马提名一个没有从事过情报工作的帕内塔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可能是准备改革中情局的管理和运作方式，以及改善因虐囚事件而受到影响的中央情报局的声誉。而美国情报界却对帕内塔的任命产生了不少的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帕内塔与情报业务毫无渊源，也未和情报系统有任何关联，而且帕内塔还曾在报纸和《华盛顿月刊》撰文批评中情局对穆斯林嫌犯施用酷刑的不道德手法。

不过，在美国现代史上，中情局局长也经常是由非情报系统出身的人担任。如1961年，中情局筹划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失败后，当时的肯尼迪总统就任命了毫无情报经验的约翰·麦科恩出任中情局局长，以取代老情报出身的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尼克松任总统时代，与情报界没有渊源的老布什也曾当过中情局局长；后来，克林顿任总统时，也曾任命过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乔治·约翰·特尼特出任中情局局长。

2009年2月13日，美国参议院对奥巴马提名的中情局局长人选莱昂·帕内塔的任命进行了表决。虽然参议员们认为帕内塔缺乏情报界的经验，但是表决却异常轻易地通过了。从此，时年71岁的意大利裔民主党

人莱昂·帕内塔就成了美国中情局的第十九任局长。

多年以来，中情局始终把“秘密行动”当做重中之重。所以，当年他们既没有预料到苏联解体，也没有预料到印尼核试爆。他们没有侦测到的事情多如牛毛，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情报工作当做本行。莱昂·帕内塔被奥巴马总统提名宣誓就职后，和他的前辈一样，都认为中情局的敌人在海外。可实际上，中情局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艾森豪威尔曾对中情局的领导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要求：“（中情局）是任何政府都没存在过的最奇怪之运作形态，它也许需要奇才异士来管理。”可是，至今为止，已经当过中情局局长的21个人——其中包括美国战略情报局长威廉·约瑟夫·多诺万、中央情报组第一任组长西德尼·威廉·索尔斯和第二任组长霍伊特·范登堡——没有一个符合艾森豪威尔所设定的标准。至于这第22个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是否符合艾森豪威尔所设定的标准，暂时还没有答案。

自从宣誓就职走进中情局兰利总部的局长办公室后，帕内塔就感觉到这个中情局局长的位子并不好坐。除了来自美国右翼势力的频繁指责外，就是左派

人士也会不时给他施加压力。不过，在白宫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帕内塔已经清楚了这一点，他知道这就是中情局多年的传统。

2009年奥巴马上台不久，就来到中情局总部视察并发表讲话，鼓舞中情局员工的士气。他对该部门的员工表示，对美国公众，尤其是情报部门来说，如今是向前看的时候了。奥巴马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可能犯了一些错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教训，引以为鉴。不过，我们能够勇于承认这些过错，然后继续迈步向前。这一点，让我作为美国总统，从内心感到骄傲；这一点，也应该让中央情报局的各位员工，从内心感到骄傲。”

就在帕内塔上任几个月后的11月4日，意大利米兰一家法院竟然对一起美国中情局特工参与的绑架案进行了缺席审判。米兰法院的法官当庭宣判，判处23名美国中情局特工5至8年不等的刑期。这是美国启动“非常规引渡”计划后，美国反恐人员第一次在国外被判刑。

这起案件可以说是由来已久。2003年2月的一天，美国中情局多名特工联合意大利军方情报人员，在米

兰街头绑架了正前往当地清真寺祈祷的埃及裔伊斯兰传教士哈桑·穆斯塔法·奥萨马·纳斯尔（又名阿布·奥马尔），他被怀疑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恐怖组织征召人马。奥马尔被绑架后，中情局的特工先是把他送到意大利和德国境内的美军基地，然后送往埃及，让他在那里遭受了酷刑。2007年，在没有任何逮捕罪名的情况下，奥马尔最终获释。

由于奥马尔在被绑架前已经有难民资格，所以米兰检方就向法院提出起诉，要求审判多名涉嫌非法绑架奥马尔的中情局和意大利情报人员。2005年12月，米兰司法机构曾对22名美国中情局特工发出欧盟逮捕令；2007年2月，米兰司法机构决定对涉案的美国人 and 意大利人进行审判。11月4日，米兰一家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缺席宣判，判处美国中情局驻米兰站前负责人罗伯特·赛尔登·拉迪8年监禁，其他涉嫌的22名中情局特工均被判5年监禁；另有2名意大利情报人员也被判处3年监禁。法庭还裁定被告向奥马尔和他的妻子分别支付145万美元和75万美元的赔偿金。

不过在宣判时，这些美国被告们因美方拒绝引渡他们赴意大利受审而没有到庭。他们既没有遭到逮

捕，也都没有出庭接受审判。事后，意大利政府也没有向美国提出引渡要求，意大利司法当局只是将这23名缺席的美国籍被告视为在逃罪犯。米兰负责这起案件的检察官斯帕塔罗说，正在考虑向意大利政府申请国际逮捕令。如果申请被批准，被指控的美国特工只要一离开美国本土，就面临遭到逮捕的危险。

这起绑架事件是发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前任小布什任内的“故事”。这是美国中情局特工秘密逮捕、遣送恐怖嫌疑人至第三国审讯时，第一次受到其他国家的司法审判；也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启动“非常规引渡”后，首例美国反恐人员由此而获刑。

当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小布什曾批准了一个“非常规引渡”条例，允许中情局绕过美国司法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绑架恐怖分子嫌犯并送往第三国审问，以方便实施酷刑逼他们招供。

尽管这次判决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是这无疑会让美国政府，特别是中情局感到非常尴尬，对中情局的新任局长帕内塔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中情局的“反恐”日子已经不是那么一路顺风了。

本·拉登和伊朗“铀浓缩”

不过上任一年以后，帕内塔还是在反恐中做出了一点点样子——

英国《泰晤士报》2010年6月22日报道，美国已在非洲国土面积最小、最不知名的国家之一开辟了新的反恐战线，位于吉布提的法国前外籍兵团营地提莱蒙尼尔军营正成为美国在索马里、也门、非洲之角展开打击“基地”组织秘密行动的中心，中情局人员转入直接作战，在那里追踪邻近国家的恐怖分子，并对他们实施无人机导弹攻击行动。

提莱蒙尼尔军营位于机场附近，人们可以在机场看到C-130运输机、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美国陆军人员。美国在提莱蒙尼尔军营策划实施了最具现代化的秘密战争，军营里的许多建筑物其实只是大型的集装箱。900名美国军人于2002年抵达，在提莱蒙尼尔军营设有分站的中情局在那里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用无人机的“地狱火”导弹击毙了“科尔号”军舰遇袭案疑犯卡埃德-哈里提。中情局使用“捕食者”无人机还击毙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阿希-阿亚罗，他被认为是“基

地”组织索马里分支头目。

目前驻提莱蒙尼尔军营的美国军人已有3000人，其中有一半属于非洲之角联合作战特遣部队，它的任务是与地区国家进行公开合作，以加强它们应对国内恐怖势力的能力。

针对“基地”组织的秘密战争由中情局的准军事部队人员和军方的特种部队实施。布什总统启动了这种由中情局和国防部联手进行反恐战争的模式，奥巴马政府则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扩大了秘密战争。

美国打击行动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安瓦尔·奥拉基，他是首位被中情局列入打击目标的美国公民。据说，他隐藏在也门，与“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一些劫机者和美国圣诞节未遂炸机案疑犯阿卜杜勒-穆塔拉布、胡德堡陆军基地枪击案疑犯哈桑有联系。

中情局和特种作战部队小组的联合行动已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战果，其中最突出是去年9月对索马里南部的一次直升机空降袭击行动，“基地”组织头号疑犯、肯尼亚人萨利赫·纳布汉和另外三名疑犯被直升机所发射的导弹击中身亡。纳布汉被认为参与袭击了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以及其他恐怖袭击活动。

为了配合奥巴马总统新的打击目标，2010年6月27日，中情局局长帕内塔又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中说：“目前伊朗正在就是否制造核弹进行争论，但他们显然正在发展自己的核能力。我们认为他们现在拥有足够制造两件（核）武器的低浓缩铀。”帕内塔还说：“他们必须将铀完全浓缩才能制造出核武器。我们估计，如果他们决定制造核武器，完成铀浓缩将需要一年时间。为了能够使用核武器，还需要一年时间研制武器运载系统。”

联合国安理会在6月9日曾就伊朗核问题通过了包含制裁内容的第1929号决议，决定对伊朗实行自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制裁。此后，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力度。美国政府在6月16日宣布对伊朗邮政银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实体及个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船运公司相关实体实施制裁。此外，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在当月24日通过对伊朗实施单方面制裁的议案。

与此同时，帕内塔还对阿富汗塔利班叛乱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等问题进行了特别的“关注”。

2011年5月1日，帕内塔亲自指挥了袭击拉登的秘

密军事行动，并成功地将拉登和他的一名妻子、一个儿子击毙。

这次成功的绝密行动使帕内塔和中情局风光无限。帕内塔自然也是前途无量。据悉，奥巴马此前即已任命他为下任国防部长，而驻阿富汗美军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将成为第二十任中情局局长。

附 录

- 第斯程·亨利·希伦科特 (1947—
1950)
- 策尔特B. 史密斯 (1950—1953)
- 策伦俄尔士·杜勒斯 (1953—
1961)
- 第翺伍历克斯·麦科恩 (1961—
1965)
- 第威廉·弗朗西斯·雷伯恩 (1965—
1966)
- 龔查德·赫尔姆斯 (1966—
1973.2)
- 蕭姆伍·罗德尼·施莱辛格 (1973.2—
1973.7)
- 威廉悌尔比 (1973.9—1976)
- 第治懋伯特·沃克·布什 (1976—
1977)
- 斯坦斯菲尔德·特纳 (1977—
1981)
- 威廉·约瑟夫·凯西 (1981—1987)

任

威廉·H. 韦伯斯特 (1987—1991)

任

第伯特·米歇尔·盖茨 (1991—

1993)

詹姆斯·伍尔西 (1993—1995)

任

约翰·马克·多伊奇 (1995—1997)

任

乔治·约翰·特尼特 (1997—2004)

任

罗伯特·戈斯 (2004—2006)

任

迈克尔·V. 海登 (2006—2009)

任

莱昂·帕内塔 (2009—2011)

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窃听风云：美国中央情报局绝密行动 / 詹静芳，詹幼鹏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17-2635-7

I. ①窃… II. ①詹… ②詹…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②情报机构—史料—美国 IV. ① I25
② D771.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6401 号

窃听风云——美国中央情报局绝密行动

作者 / 詹静芳 詹幼鹏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封面设计 /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25.75
字 数 / 290 千
版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5.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35-7

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
密行动

前 言

2010年1月20日，“哈马斯”高官马哈茂德·马巴胡赫在迪拜一家五星级的布斯坦罗塔娜酒店被暗杀，其过程之精彩堪比“007”电影，一夜之间全球为之震惊。

迪拜暗杀事件被称为“暗杀门”，已经被多国媒体锁定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所为，有消息说是摩萨德的11名特工利用伪造的外国护照潜入迪拜，制造了这一起事件。事后多家媒体又披露了摩萨德暗杀马巴胡赫的内幕，情节堪比悬疑电影。有报道称，这次暗杀行动是由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亲自批准的。

尽管以色列有关方面极力否认，称此事与摩萨德无关，但随后迪拜警方公布了该酒店录像，清晰地再现了当时的场面，从而让迪拜“暗杀门”成为摩萨德历史上第一次被监控录像记录下来的暗杀行

动，并被认为是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败笔。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摩萨德这个神秘的情报组织再次浮出水面，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成为舆论的焦点。

摩萨德是以色列的国家情报机构，全球“谍海四强”之一。从1951年成立至今，在近60年的情报活动中，摩萨德一直是得心应手，战绩斐然——

1956年，摩萨德成功地窃取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的全文，并送交美国中央情报局。

1961年，派员远赴阿根廷，把隐匿了15年之久的二战战犯、对屠杀600万犹太人负有直接责任的纳粹党卫军大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秘密绑架到以色列，使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62年，派遣特工潜入埃及，为以色列搜集到了有关新式导弹、火箭和飞机制造等方面的情报；同年，又派特工潜伏在叙利亚，不仅窃取了大量的军事情报，而且还让这位特工差一点当上了叙利亚的国防部长。

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根据摩萨德提供的情报，派飞机成功地袭击了埃及的战斗机群，又截听了埃及总统和约旦国王的电话，并将通话内

容向新闻界发布，从而使埃及陷入被动。

1968年，摩萨德制定了代号为“高铅酸盐行动”的绝密计划，秘密地从欧洲运出了560桶总共200多吨的优质铀矿石，使以色列的核武器研究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1988年4月15日，摩萨德特工潜入阿拉法特的得力助手杰哈德的宅邸，用冲锋枪向杰哈德扫射，使其中弹70多处身亡，并搜走了杰哈德书房中的全部有价值的文件。

.....

诸如此类的“杰作”，让摩萨德在中东以至全球都成了一个十分神秘，但又足以令所有国家，尤其是以色列的中东敌对国感到胆战心惊的谍报部门，其活动能力和影响力足以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英国秘密情报局相媲美，从而赢得世界一流情报机构的声誉，和上述三家情报机构一道被称为世界“谍海四强”。

本书将系统地揭示摩萨德近60年的历程，了解一下这个情报机构和它的国家，以及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与之有关的故事。

第一章 犹太人艰难复国 摩萨德横空出世

历经磨难的犹太民族终于建立了自己的以色列国，成为联合国第59个成员国；然而建国后不到24小时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却让6000人为自己刚刚建立的国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了在阿拉伯人的包围之中立于不败之地，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横空出世，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这里没有停止过战争

巴勒斯坦是一方让人肃然起敬的“三教”圣地，也是古往今来的一块战祸频仍之地。它位于亚洲西北部，濒临地中海和红海的亚喀巴湾，是联结北非和西

亚的纽带，战略位置十分显要。从古至今，神秘的宗教氛围和旷日持久的战祸带来的复仇情结，让这里高大的橄榄树并没有成为一种和平的象征。

如今犹太民族建立的以色列国就在这片土地上。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国。

以色列可以说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根据1947年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规定，以色列国的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如今其国土面积约2.1万平方公里，全国人口约625.9万（据2000年统计，包括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犹太居民），几乎与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总数相等，其中犹太人占76.7%，阿拉伯人、德鲁兹人及其他民族占23.3%——不过犹太人却遍布世界各地，其中美国有580万，法国60万，俄罗斯60万，乌克兰44.6万，加拿大36万，英国30万，阿根廷25万，南非11.4万，澳大利亚10万，巴西10万。就是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国，这样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如何能在中东地区阿拉伯世界的包围之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实在是一个永久的话题。

1949年5月11日，以色列取得联合国的席位，成

为第59个会员国。

然而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从《圣经》时代开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

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其居民称迦南人，原是阿拉伯半岛闪族的一支。约公元前11世纪，爱琴海沿岸的腓力斯丁人移居迦南。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首次称该地区为“巴勒斯坦”，即希腊语“腓力斯丁人的土地”之意，一直沿用至今。

犹太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早在公元前13世纪末，从埃及迁居到巴勒斯坦后，曾先后建立了希伯来王国和以色列王国。公元前923年，这个王国被分裂成南北两部分，在北部的称为以色列王国，在南部的称为犹太王国。犹太王国的人称为犹太人，后来所有的希伯来人都叫犹太人。公元前722年，新巴比伦王国消灭了南部的犹太王国，国王及大批居民被掳掠到巴比伦。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20世纪初，这片土地就一直处于异族的侵略、占领和争夺之中，先后被波斯、希腊、罗马、土耳其等外族轮番占领。

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征服了巴比伦，允许当年被巴比伦掳去的部分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并在耶路撒冷附近恢复一个附属小国，重新定居下来。这些人就是现代犹太人的祖先。

公元前143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终于摆脱了希腊马其顿王朝的统治，建立了马卡比王朝，取得了80年的独立。但是好景不长，从公元前63年开始，犹太人的灾难又降临了。这时，穷凶极恶的罗马帝国又大举入侵巴勒斯坦地区，先后三次大规模地镇压犹太人的反抗运动，屠杀犹太人多达100万之众。然而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公元132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终于遭受了他们有史以来的灭顶之灾。

公元132年，犹太人的一次大规模起义遭到镇压后，大部分犹太人被野蛮地屠杀了，侥幸存活下来的则被全部驱逐出巴勒斯坦地区。罗马帝国将犹太人驱逐出这一地区后，将地名改为“叙利亚-巴勒斯坦”，企图抹灭犹太人千年来与这片土地相连的痕迹。这一次，他们的国家被彻底地荡平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小部分犹太人一直留在巴勒斯坦，他们从以色列的南部迁徙到了北部。公元638年，穆斯林从拜占庭帝国夺取了该地区的控制权，后来几个穆斯林国家又相继统治过这个地区，其中包括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花刺子模和蒙古。在1260年至1516年间由马木鲁克统治，接着在1517年又成为奥斯曼帝国一个省份。犹太人从此彻底地失去了自己最后的家园，开始在世界各地流浪。他们先是逃亡到英、法、意、德等西欧

国家，后来又大批地流向俄国、东欧和北美等地。

不过，犹太人被驱逐之后，巴勒斯坦地区的日子也并不太平。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发动了史上最大的“阿拉伯运动”，确立了“泛阿拉伯主义”。到公元637年，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大量的阿拉伯人不断地迁徙过来，和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他们成了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居民，这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现代阿拉伯人的祖先。

到了公元1099年，欧洲封建王朝的十字军以“收复圣地”的名义，又一次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十字军东征”，千军万马长驱直入，十字军的铁蹄再次践踏着这片浸透着犹太民族鲜血的土地。十字军侵占了耶路撒冷后，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建立了所谓的“神圣之家”——耶路撒冷国，把大批的犹太人驱逐出境，让他们再一次背井离乡。流落到西欧的犹太人在1492年又被全部逐出西班牙。1648年，大约30万流落在波兰的犹太人惨死在顿河流域的哥萨克屠刀之下。公元1187年，巴勒斯坦地区各族居民又一次揭竿而起，团结一致，终于击败了入侵多年的十字军，才使“耶路撒冷国”最后解体，巴勒斯坦地区获得部分解放，部分流落他乡的居民又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但是他们的灾难并没有由此结束。从1517年到1917年，也就是从16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巴勒斯坦地区又被奥斯曼帝国整整吞并了400年之久。残留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已经所剩无几，到1880年，其人数还不到2万人；到1918年，也只有不到6万人。

到了中世纪末期，由于西欧各国商业资本得到空前的发展，散居在那里的犹太人在同当地人的竞争当中，遭到了当地政府和商人的迫害，使散居在西欧各国的犹太人不得不开始二次逃亡，被迫大批流亡到东欧和美洲的一些国家。可是到了19世纪末期，东欧国家也开始出现“排犹”运动，特别是沙皇统治的俄国，多次发生有组织地杀戮犹太人的恶性事件。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窘迫之中，许许多多流亡海外的犹太人一直试图返回自己的家园。在漫长的岁月里，犹太人曾经有过多次的“回归潮”，从数百人到上千人不等。第一次大规模的回归浪潮始于1881年，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为了逃避迫害，开始回流到巴勒斯坦。他们回来之后开荒种地，或者是从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人手中购买土地，从此定居下来。而随着犹太居民的增多，他们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19世纪末，欧洲犹太资产阶级为了寻找一条有效的生存之道，打出“犹太民族主义”的旗号，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们声称“犹太人受歧视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的祖国”，竭力在犹太人中间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号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1896年，维也纳的犹太籍记者和剧作家西奥多·赫茨尔出版了一本《犹太国》的小册子，提出建立一个由犹太人自治的国家的主张；他发起了“锡安主义运动”（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号召全世界犹太人回归故土，恢复本民族的生活方式。

1897年，在赫茨尔的主持下，欧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的巴塞尔召集了全世界犹太人代表，召开了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大会决议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或国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机构相继成立，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大会通过的复国纲领宣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就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家。”

“锡安主义运动”推动了第二次犹太人的回归浪潮，从1904年到1914年的10年间，大约有4万名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定居。

就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到巴勒斯坦去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在工业革命以后膨胀起来的大英帝国主义也野心勃勃，想去控制巴勒斯坦地区。于是二者一拍即合，英国很快就成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大本营。

1915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为了打败德国、瓦解奥斯曼帝国称霸中东，曾拉拢阿拉伯人，向他们许诺“承认和支持阿拉伯人的独立”，“把土耳其人从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去”，但是到了1916年春天，英国却背着阿拉伯人同法国签订了瓜分中东的秘密协定。当阿拉伯人识破了英国的阴谋之后，英国就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的心理，竭力扶植犹太复国运动，制造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以达到统治巴勒斯坦的目的。1917年，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后，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就给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副主席、犹太籍的财阀华尔特·罗里柴尔德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宣称“女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这封信后来被称为《贝尔福宣言》。1920年，国际联盟委托英国管辖巴勒斯坦。1922年，英国将托管地划分为两部分：东部（现约旦）为阿拉伯人居住地，西部为犹太居民区。

1922年，国际联盟通过了英国政府对巴勒斯坦

的“委任统治训令”，决定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人的民族之家”。从此以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开始大批地移居巴勒斯坦。他们拖儿带女，千里迢迢，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在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之前，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居民仅有5万人，到了1939年已经猛增到44.5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掀起了第三次和第四次回归浪潮。在1929年爆发的一场巴勒斯坦暴动中，阿拉伯人杀死了133名犹太人。接着在1936年到1939年又有数场暴动发生。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回归的犹太人大肆掠夺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土地，又把许多阿拉伯人赶出自己居住了多年的家园，从而在阿、犹两个民族之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针对这种现状，英国在1939年又颁布了一份白皮书，限制犹太人的移民数量，并且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这份白皮书被许多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视为是对犹太人的背叛，并且认为那违背了《贝尔福宣言》。但是阿拉伯人也并没有由此而平静下来，他们的希望是从此完全停止犹太人的移民。

就在英国人积极支持犹太人复国的同时，美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在推波助澜。从1943年至1945年之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和宣言，赞成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无限制的移民和建立犹太人的国家。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4年的竞选活动中，也一再表示要协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

美国人的这种抉择，除了同英国人之间存在着在中东利益的竞争之外，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的“虐犹”事件有关。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欧等地的犹太人再一次遭受了空前的劫难。从1933年开始，纳粹在德国执政后，推行了新的“虐犹”运动，从而掀起了第五次犹太人回归浪潮。

纳粹德国在1939年9月吞并波兰之后，就将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集中在波兰的“强制性犹太人居住区”内。随着法国、波罗的海周边国家和南斯拉夫等国被纳粹德国占领，更多的犹太人处在纳粹德国的控制范围内。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成功以后，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也跟随德军进入苏联，对当时居住在苏联的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1941年12月，纳粹德国在波兰设立了6个杀人的集中营，其中包括奥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对犹太人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整个二战期间，大约有600万欧裔犹太人被纳粹德国虐杀。

到了1940年，回到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已占当地居民总数的30%。后来在欧洲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大

屠杀后，进一步推动了犹太人回归。从1944年至1948年之间，已经有20多万的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辗转来到巴勒斯坦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有了60万犹太居民。这些犹太人已经别无选择，他们认识到，只有巴勒斯坦才是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地方。

二战结束后，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期间，接替罗斯福的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英国首相同他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杜鲁门在这份备忘录中说：“强烈要求取消这些不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限制。他们受到了纳粹的残酷迫害，他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园，而巴勒斯坦又是他们许多人要求生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波茨坦会议后的8月31日，杜鲁门致函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说：“美国人民坚决相信，移民到巴勒斯坦去的大门不应该关闭。”受到二战中的犹太人惨遭大屠杀的影响，犹太人复国的理念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支持，于是联合国便相应地成立了“巴勒斯坦专门委员会”，开始真正关注犹太人复国问题。在多方的斡旋和协调下，1947年11月29日的联合国大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

此次联大表决，以美、苏等国33票赞成、阿拉伯等国13票反对、英国等1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

《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明文规定：巴勒斯坦在1948年结束英国委托统治后，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面积为1.1万平方公里，包括北部的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地区和加沙地区；犹太国面积为1.4万平方公里；耶路撒冷及其郊区（计158平方公里）实行国际化，由联合国管理。这个决议的实质其实就是使分裂巴勒斯坦“合法化”和公开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阿、犹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3还要多，而划分的土地面积却只占到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而且还被分割成几个大小互不相连的若干碎块，大部分是处在丘陵和土壤贫瘠的地区；犹太人当时只有60万，还不到巴勒斯坦当时总人口的1/2，而“犹太国”的总面积却占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并且大部分是肥沃的沿海地带。这种公开的不公平，为后来连续不断地发生“巴以之争”留下了深深的隐患。

1948年5月14日，在英国的托管期结束前一天的子夜零点，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两位曾领导犹太人建国的领袖人物正式当选为以色列国的领袖——戴

维·本-古里安当选首任总理，哈伊姆·魏兹曼为首任总统。

成为联合国第59个会员国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的消息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及时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11分钟后，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查理·罗斯就向记者宣布：美国承认以色列国，并率先发去了贺电表示祝贺，承认其合法性，其速度之快就连以色列人也感到惊讶。据说美国当时发给以色列的贺电，竟然是在还不知道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就预先拟好了的，电文上写的国名竟然是“犹太国”，当得知这个国家取名为“以色列”时，杜鲁门总统马上亲笔将电文上的“犹太国”抹去，改为“以色列”。

三天以后的5月17日，苏联也通电宣布承认以色列。

可是，美国的承认和祝贺并不等于一切就万事大吉——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后不到24个小时，就遭到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和黎巴嫩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五个阿拉伯国家一致行动，大兵压境，他们企图用武力将这个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国扼杀

在襁褓之中。这场战争在当代中东历史上被称为“第一次中东战争”。虽然刚刚成立的以色列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是却有6000人为自己刚刚成立的国家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然而，第一次中东战争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的四次中东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再加上无休无止的零星冲突和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使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家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为了能在中东这个阿拉伯人的大家庭中争得一席之地，以色列人不得不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生存方式，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点就是实行真正的“全民皆兵”。以色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的国家。

美国是世界上犹太居民最多的国家，同以色列又有着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在以色列到处都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子，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色列国内公有制经济的成分却占了整个国民经济的50%左右。全国总工会在国家事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以色列国真正的掌权人是总理而不是总统。同时，以色列还有一种独特的组织——“基布兹”，它非常类似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以色列的“基布兹”里，财产公有，民主平等，所有的成员各

尽所能，各取所需。



以色列独立战争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没有哪个民族在自己的国家灭亡了两千多年之后能重新复国，然而犹太民族却做到了；没有哪种语言能在消亡了两千多年之后重获新生，但是希伯来语却复活了；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有“共产主义式”的集体农庄，可是在以色列却的确存在着许多“基布兹”；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现代科技能同以色列相比，在全世界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近1/4是犹太

人，更不要说像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马克思、卡夫卡、毕加索和斯宾诺莎这样的旷世名人都是出自犹太民族.....

1949年5月11日，年轻的以色列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成为联合国第59个会员国，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为了在中东地区获得生存的权利，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能在阿拉伯人的包围之中立于不败之地，在以色列建国后不久，一个神秘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就横空出世，从而再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摩萨德在“愚人节”成立

以色列的国家情报机构“摩萨德”全称为“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

它并不是犹太人创建的第一个情报机构，犹太人现代情报机构的创建可谓由来已久。

早在20世纪初期，犹太复国运动迅速发展，大量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巴勒斯坦，希望在这里重新建立犹太人的国家。在同奥斯曼帝国和当地的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中，犹太人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秘密军事机构和情报组织。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第一个间

谍网是在1907年被发现的，这个情报网当时是为英国谍报机构服务的，因为英国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同时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十年后的1917年，在巴勒斯坦地区又发现了另一个犹太人的间谍网。这个间谍网是由富裕的犹太商人哈龙·艾哈龙逊和他漂亮的女儿莎拉建立起来的，其使命同样是帮助英国搜集德国和土耳其军队的情报。这个间谍网当时最大的功绩就是窃取到了德国军队生产芥子毒气的秘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犹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抗敌人的袭击和骚扰，成立了“哈加纳”和“沙伊”等多个地下武装组织和情报机构。不过这些组织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只是分工不同。“哈加纳”重点在进行武装斗争，而“沙伊”是专门搜集情报的部门，就是今天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的前身。

“沙伊”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取有关巴勒斯坦人进攻犹太人的各种情报和及时发现邻国恐怖组织的破坏活动。到了1936年，“沙伊”的间谍网已经覆盖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可以向“哈加纳”提供各个方面的活动情报。而摩萨德最初也正是作为“哈加纳”组织的一个分支于1937年成立的，它的任务就是通过非法途径向巴勒斯坦地区偷运犹太移民、购买武器和搜集情

报，以应付同巴勒斯坦人发生的冲突。

1937年摩萨德成立之初，其总部设在法国的巴黎。1940年巴黎被纳粹德国占领后，摩萨德成员大部分都转入了地下活动。当时德国法西斯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使犹太人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摩萨德在法国的活动也得到了法国谍报机关所提供的广泛支持。为了实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的目的，他们以近似疯狂的行动，大量地向巴勒斯坦地区输送人员和武器。

到了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期间，这支摩萨德的队伍已经发展到接近400人，其中大部分是立志为犹太复国运动自愿加入的志愿者。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建立以后，它的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就指出：“我们需要出色的情报工作来帮助我们求得生存。我们的国家是地球上最小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必须建立全世界最优秀的情报机关。”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以色列国家领导者就着力于情报工作，积极组建现代情报机关，使其为新建立的以色列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服务。首先，他们对“沙伊”和其他建国前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组织进行改组，在“沙伊”的基础上成立了一系列的秘密情报系统，并且构想组建一个更为有力的情报中心。不久以

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和他的下属们的这种构想就付诸实施了。

在以色列建国前夕，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真正的态度还不是十分的了解，正是依靠摩萨德的特工们出色的工作，才摸清了阿拉伯人的底细，并奠定了以色列的立国基础，从而让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国能在巴勒斯坦地区不断发展壮大。

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前夕，以色列当局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立国之途竟然是那样的艰难曲折。他们以为有美国等大国的支持，阿拉伯人是不敢轻易对他们动武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及时地预见会爆发战争。当时他们还派了犹太人的著名领导人梅厄夫人化装成阿拉伯妇女潜入约旦首都安曼，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试探约旦人对犹太人建立国家的态度。不料这个约旦国王却欺骗梅厄说，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绝对不会对犹太人宣战，如果犹太人宣布建国的话。

梅厄夫人当时相信了阿卜杜拉的保证，认为不会发生战争。更可怕的是，以色列高层的其他领导人也同样轻信了梅厄夫人的判断，都一致认为以色列宣布建国后，不会招来阿拉伯人的武装干涉，因而没有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应对阿拉伯人的武装入侵方面。

当时摩萨德尽管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以色列的

谍报人员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认为以色列只要建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让以色列上层集团能丢掉幻想，立足于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他们在战争开始前就做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当时，正好有一名以色列的谍报人员，从约旦最高军事机关弄到了一份详细的对以作战方案，证明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份详细的对以作战方案，以色列的上层领导人如梦初醒，立刻意识到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于是就在着手建国的同时积极备战。

果然在1948年5月14日，当犹太人的政治领袖戴维·本-古里安宣告以色列国正式成立后不到24小时，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等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军队便联合起来，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以色列发起了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不宣而战。但是，由于以色列在此之前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加上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保住了这个新生的犹太人的国家，为以色列国的成立举行了一次胜利的奠基仪式。

由于以色列特工人员的突出贡献，在以色列经过了建国初期情报工作的短暂混乱之后，1951年，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把维护国家安全、整合国家间谍情报工作的任务交给即将诞生

的摩萨德。以色列成立之初，情报界之间的分工非常模糊，职责往往相互重叠。当时有“阿穆恩”、“辛贝特”、“外交部政治处”、“阿利亚-B”等多个情报机构，它们的分工大致是：阿穆恩负责军事领域情报，辛贝特负责国内安全事务情报，外交部政治处负责海外的谍报搜集并与外国安全机关建立关系，阿利亚-B负责有关移民的一切事务。这种政出多门的建制，势必互相掣肘，还会影响到办事效率。同时以色列在建国之初，又面临着来自阿拉伯国家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关系以色列的生存。可以想象，此时的以色列迫切需要阿拉伯世界的军事情报。尤其是1950年朝鲜战争升级、美苏关系滑坡，以色列担心阿拉伯国家借紧张的国际局势，向他们发动新的进攻的心理在政坛占了主导地位，因此对军事情报的需要更是与日俱增。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当时作为海外谍报刺探机构的外交部政治处对此贡献相当有限，他们的工作重点放在了了解诸如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计划、经济建设工程之类的事情上，这些信息对当时的局势来说显然助益有限。不但如此，那些海外间谍在欧洲肆意挥霍，生活十分奢侈，这就更引起了其他情报人士的愤怒。作为阿穆恩的负责人，吉布利首先向政治处发起挑战，接着，辛贝特局长哈雷尔也成了吉布利的盟

友，他们在向海外派驻了各自的谍报人员后，很快就在各个方面形成了竞争，导致情报工作日趋混乱。

总理本-吉里安对此十分恼火，下令对情报机构进行整治。起初，整顿工作在他的好友罗文·希洛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切还算顺利。但是那些原属政治处的谍报人员却对此大为不满，在一个名叫本-纳坦的高级特工的领导下，他们拒绝服从这一由最高领导人执行的改组，提出了集体辞呈，并焚烧了手中所有的秘密档案。这一反叛行为遭到了总部的鄙视，罗文·希洛在总理的支持下把反叛者抛到一边，全力改组，终于，“情报与特别任务局”宣布正式成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从此以后，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权力得到了重新分配，摩萨德全力搜集海外谍报，并直接向总理负责，而由情报所引发的特别行动以及周边国家军事情报则由阿穆恩负责。

1951年4月1日——也就是在西方世界愚人节的这一天，以色列正式成立了负责情报搜集、特别整治行动和反恐怖行动的统一机构——以色列“情报与特别任务局”，摩萨德从此横空出世，在以色列的国家机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摩萨德成立伊始，就得到了以色列上层的格外重视和关注。总理本-古里安亲自任命他的好友、被誉为

以色列情报专家的罗文·希洛为摩萨德的第一任局长。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模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模式创建的情报机构摩萨德，不久就成了以色列最大、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情报机关，统辖着以色列全国的军事情报局、国内安全局、外交部调查局、警察情报局等情报机关，归总理直接领导，其地位在以色列内阁中甚至比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政府中的地位还要高。

以色列著名的城市特拉维夫是一座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在她的南端有一座陈旧的棕褐色小楼，门口挂着一块普普通通的牌子，牌子上面写的是一家大投资公司驻特拉维夫种子分公司。从外表看上去，这座小楼其貌不扬，不引人注目，同周围的其他建筑物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大名鼎鼎的摩萨德总部就设在这里面。在摩萨德总部，常驻的工作人员大约保持在2000人左右，下面分设有九个处。这九个处分别是：

一、协调、计划行动处。该处的任务是负责策划、决定行动方案和有关的协调事务，具体的行动任务也大多由该处来执行。

二、情报搜集处。负责通过各种渠道搜集秘密情报。

三、政治行动与联络处。该处的主要任务是同外国情报机关进行协调，建立合作关系。

四、人力、财务、安全事务处。

五、训练、组织事务处。

六、调查处。

七、战术行动处。

八、技术事务处。

九、派遣、装备处。

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从以上严密的分工和组织结构不难看出，摩萨德成立之初，就体现了犹太人的办事特色和作风，是一个高效率运转的情报机构。当时摩萨德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搜集政治、经济、军事和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的情报；此外，摩萨德还有200多名精悍的突击队员，专门从事绑架、暗杀、破坏和营救等特别行动。

根据消息灵通的西方情报界人士估计，摩萨德有一支大约2500～3000人的专职或兼职的特工队伍活跃在世界各地。那些人员在当地的公开身份大多是外交官、新闻记者、技术专家、巨富商贾、馆店服务员、酒吧跑堂、私人秘书或者是司机，但是这些人都经过严格的特别训练。他们在情报搜集、窃听、爆破袭击和谋杀行动等方面往往都身怀绝技，具有极强的间谍工作能力。

摩萨德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它在成立之初即与许多国家建立了情报合作关系，以求得资源共享。多年来，摩萨德已经同美、英、法、德等多国的情报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巴黎和新加坡几乎是以色列的情报部门在欧、亚两洲的活动中心，它的情报网遍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摩萨德是直接对以色列总理负责，有特殊的法律加以保护，因此它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相当保密，外界披露甚少，就连历任头目的姓名也被列为以色列最高的国家机密。这些人员通常要在退休多年后，才能公开其真正的身份；同时，摩萨德还要求它的每一名成员都要具结保证，日后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其在摩萨德的经历。即使是在退休以后，也要在指定的居住地生活10到15年以上，有的甚至终生都不能与外界接触。

因为承担着艰巨而重大的任务，所以摩萨德在以色列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它的历届首脑都是由以色列总理直接任命，无须经过议会批准，这些人大都是总理的心腹，并且只对总理一个人负责。摩萨德的首脑每周一次例行向总理汇报工作，是以色列内阁中唯一有权不经通报就可以直接晋见总理的“特殊阁员”。

摩萨德的活动经费完全由内阁负责，它根本不需

要因为钱的问题而去同国家的财政部门打交道。所以摩萨德在金钱的花费方面，是十分的慷慨和大方。

从成立的那一天起，摩萨德几乎就是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情报搜集，其水平之高，技术之先进，在全球几乎难有与其比肩者。早在摩萨德成立之初，那些特工们就根据犹太物理学家奈蔓的建议，将从国外搞到的数量庞大的情报输入并储存在电脑中。摩萨德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电子计算机的情报机构。他们就是凭借这种先进的情报优势，总能领先一步获取和运用这些情报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时，摩萨德就是利用这种先进的技术，截获了大量的高级机密，从而让以色列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所以，摩萨德的情报工作几乎是无孔不入，它的触角就像章鱼一样，几乎可以渗透到它所需要到达的每一个领域。

如今，美国白宫的保密性能堪称壁垒森严，世界第一，但是对摩萨德的那些电脑黑客们来说，钻进去也同样是小菜一碟。摩萨德内部有一支精悍的“飞箭”特工队，其攻击的目标就是世界各国的机要部门。他们曾放言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使领馆是他们的“飞箭”不曾光顾过的，就连白宫也不在话下。当年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的电话，甚至连总统克林顿的电

子邮件，他们都能获取。据说，当年摩萨德居然掌握了克林顿总统与他的小情人莱温斯基之间长达30多个小时情意绵绵的电话录音，并曾试图以此要挟。

以色列方面对此事矢口否认。他们说，摩萨德早就有了规定，不准摩萨德的任何成员在美国从事非法谍报行动。但是从摩萨德所一贯奉行的只要为了国家利益没有什么不能干的最高准则来看，很难说这个规定到底能起多大作用，而且，谁又能完全说清楚“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哪里呢？更何况早在198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曾挖出了打入美国海军情报部门的犹太间谍波拉德。有一名从摩萨德退役多年的特工事后也曾透露，摩萨德首次对美国总统下手的时间是在1974年，其目的是想了解美国当时向沙特出售预警飞机的情况。

“冷战”时期，摩萨德从事间谍活动主要有两个政治目标：第一，打击以色列的敌人，侦察、获取对方的秘密；在国家之间实施离间，制造国家内部的混乱和分裂；第二，打破世界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孤立，对阿拉伯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渗透。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摩萨德在世界各地进行了五花八门的间谍活动，不择手段地开展工作。其工作重点就是在黎巴嫩遏制、破坏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与此同

时，摩萨德为了加强同某些外国情报机关的联系，还主动充当一些国际势力的代理人，在非洲、亚洲甚至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大量谍报、暗杀和破坏活动。



摩萨德徽标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崛起和壮大，摩萨德开始把打击的主要矛头直接对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策划了多起对阿拉法特等“巴解”领

导人的暗杀计划。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时，以色列当局也对其谍报机构进行了一些调整，这时摩萨德的具体任务有以下六项：搜集阿拉伯等国家的军事情报；为自身的利益而搜集美国等盟国的情报；搜集发达国家的科技情报；监视国际反犹太复国运动的活动；搜集其他利益地区的情报；执行反恐怖主义活动的任务。

近年来，全球网络技术广泛使用，更给电脑高手云集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世界上许多“资深”黑客几乎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渗透到世界上每一个需要到达的角落，就连美国也难幸免。

当年，美国最大的电讯集团NORTEL和其属下的TELRAD公司通过中标获得一个价值3300万美元的合同，为以色列空军更新电子通讯系统，以色列方面的一些技术人员可以由此进入这两家公司的元件生产领域。殊不知，TELRAD公司正是开发白宫通讯系统的承包商。这时，摩萨德特工就借助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打入这家公司的生产领域，他们在专为白宫通讯系统提供的电子元件中，巧妙地植入了难以发现的间谍

芯片。这样一来，当该系统投入使用后，美国总统对国家机要部门所作的任何指示都被完全复制了，然后通过摩萨德设在华盛顿的一个计算中心，将美国的这些高级国家机密源源不断地传输到摩萨德在特拉维夫的总部。这时对摩萨德来说，美国的高级国家机密已经不再是机密了。

据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的摩萨德总部内，有一幅由计算机控制的壁式地图，长达一百多英尺，以色列的敌人在全世界每个角落的活动都能在这块地图上显示出来。只要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异常，这块地图上的指示灯就会自动闪烁报警，这样，摩萨德就可以依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所以，摩萨德的情报检索和分析，实在是让一些国家防不胜防。

由于摩萨德多年来出色的间谍活动，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局、前苏联克格勃一起，被公认为全球“谍海四强”。

不过，摩萨德初创时，并不是那样一帆风顺。它的第一任局长罗文·希洛虽然有“情报先生”之称，但是在他执掌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国的情报工作时却出师不利，险些丢掉了以色列特工弗兰克的身家性命，同时让以色列派驻伊拉克的情报网全军覆没。

第二章 摩萨德出师不利 巴格达损兵折将

摩萨德成立之初出师不利，第一任局长虽然号称“情报先生”却对情报工作并不内行，尽管曾在“哈加纳”中成绩卓著，但最后还是让自己一手创建的巴格达情报站损兵折将毁于一旦，让刚刚成立的摩萨德一时人心惶惶；一场意外的车祸让他不得不辞去局长一职，只有再去干总理战略顾问的老本行。

令人匪夷所思的巴格达之行

摩萨德于1951年4月1日成立时，有“情报先生”之称的罗文·希洛被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亲自任命为该机构的第一任局长。在此之前，罗文·希洛已经成为以色列谍报工作的领袖人物。

罗文·希洛原名罗文·扎斯兰斯基，1909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信仰东正教的犹太居民区。当时的巴勒斯坦还处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学生时代的罗文·希洛学习认真，智力超群。他平时言语不多，但常常显示出一种男人特有的幽默感。他在戏剧方面很有天赋，这为他后来情报工作中所需要的表演才能奠定了基础。上高中的时候，罗文·希洛就已经改变了犹太教有关饮食的教规，放弃了家中其他成员崇尚的宗教生活方式，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思维方式。

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地下组织“哈加纳”后，他化名为罗文·希洛。此名出自于希伯来语中“夏利亚”一词，意为“间谍”。他作为本-古里安的高级特使，曾多次执行过各种秘密任务，并且完成得相当出色，从而使他的这个新化名声誉日隆，从此取代了原名。由于在“哈加纳”中的突出表现，希洛的谍报才能赢得了本-古里安和其他指挥官的高度重视。

1931年8月，22岁的罗文·希洛第一次被派往国外执行秘密任务。当时“哈加纳”派遣他潜入伊拉克，要他在那里建立一个秘密情报站。罗文·希洛接受任务后，扮成一名教师，他在伊拉克一边教书，一边以兼职记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间谍活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他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伊拉克建立起了一个

秘密情报网，为以色列的复国运动收集了大量的情报。在伊拉克工作期间，罗文·希洛利用自己教师的身份，对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有过深入的了解，有密切的交往，对那些生活在山区的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有了深刻的了解，并从中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经验。以色列建国后，在为以色列的情报事业设计未来构想时，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反复强调，与中东地区那些非阿拉伯的少数民族建立秘密联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人并不都是犹太人的敌人。犹太人可以在阿拉伯世界的外围获得更好的朋友。

这就是罗文·希洛在以色列情报工作中著名的“外围哲学”，他的这一观点后来成了以色列情报界一项不变的原则。

在伊拉克生活了三年之后，希洛于1934年奉命撤回到耶路撒冷。这时“哈加纳”又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协助肖尔·阿维格（迈耶罗夫）组建一个专门情报机构，以保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长期利益。当时，希洛的公开身份是本-古里安的犹太办事处与巴勒斯坦英国总督之间的联络官。在这种身份的掩护下，希洛与阿维格密切合作，很快建立起了“沙伊”这一重要情报机构，从而成了“沙伊”的创始人之一，也因此奠定了他在以色列情报界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文·希洛在敌后的“犹太通讯社”从事一种特殊的工作。他充分利用纳粹德国是英国人和犹太人的共同敌人的这一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英国军队中建立了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犹太旅”，把它变成了一支犹太人自己的武装。以色列建国后，这个“犹太旅”成了以色列武装部队的基础。



沙龙（左一）和本-古里安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因为他们的许多同胞都在这场战争中死于非命，而他们也仅仅是从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中救出了数量很少的同胞，但是对于罗文·希洛和他的同事来说，这次战争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实践情报工作的大好时机。当时，罗文·希洛曾派出貌似雅利安人

的犹太特工打入纳粹德国的占领区，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派出貌似阿拉伯人并会讲希伯来语的间谍打入叙利亚……在这些间谍活动中，“沙伊”的特工们尽管付出了一些代价，但学会了渗透、侦察和伪装等重要技巧。

与此同时，罗文·希洛还在战争期间广泛结交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朋友，建立了自己非常重要的人脉资源。在后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争夺巴勒斯坦控制权的斗争中，希洛的这些朋友为犹太人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当时，希洛还不失时机地与驻耶路撒冷和开罗的英国军事情报官建立起了牢固的关系，并揭开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美国情报部门交往的序幕。他经常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们共进晚餐，在觥筹交错中交流思想和感情。正是当年同美国特工的这种交往，为他们后来的合作埋下了伏笔。1947年，当美国战略情报局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核心之后，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在战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最终发展成为美、以两国情报界间的密切合作关系。

罗文·希洛在二战期间的表现，不仅反映出他的情报智慧，同时也证明了他是一位能够从长远和战略性角度看待现代情报工作的杰出人物。

然而，就在以色列建国以后，当罗文·希洛已经是

以色列情报界的最高领导，并且即将出任摩萨德局长之时，他的一些弱点和短处也暴露出来了。

在摩萨德即将正式成立的前夕，1951年初的一天，罗文·希洛把一名拥有美国国籍的“哈加纳”成员雅科夫·弗兰克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知他将被派往伊拉克，去巴格达接替原情报站站长本-波拉特的工作，担任新的站长。

雅科夫·弗兰克生于1921年，成年后在巴勒斯坦加入了“哈加纳”，成为其中最富有热情与活力的一员。当时他同其他犹太人一样，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先生活过的圣地——巴勒斯坦，并希望能够为以色列国的建立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由于弗兰克过分的活跃，他的行为引起了当时驻巴勒斯坦的英国人的不满。就在他即将有麻烦的时候，组织上把他派遣到美国去了，让他到纽约去负责那里的移民事务——实际上就是让他到犹太人的另一个组织“阿利亚—B”的纽约分部去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兰克加入了美国国籍，并参加了美国军队，跟随部队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人战斗。1944年10月，弗兰克在菲律宾的一次战役中负了重伤。就在他的伤还没有痊愈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后，他回到了

以色列，并继续享受五角大楼每月发放的退休金。战后他退出了军队，并开始尝试经商。由于他为人精明能干，又见过世面，经商有道，没过多久，他就成了特拉维夫市一家弹簧厂的一名经理。

正当弗兰克准备全力以赴从事商业活动，在生意场中施展自己的才华的时候，被即将成为摩萨德首任局长的罗文·希洛看上了。那一天希洛派人来找他的时候，弗兰克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人谈一笔生意。这时，两名神秘的男子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并告诉他：“罗文·希洛想跟你见面谈谈。”

对于弗兰克来说，罗文·希洛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可以说罗文·希洛是自己仰慕已久的传奇间谍，因此，听说罗文·希洛想见他，弗兰克毫不犹豫地送走了自己生意上的伙伴，同意了这次约见。

这是一次秘密的见面。弗兰克和那两位男子来到了“柯雅”——位于特拉维夫商业区东面的一条独立的小街，走进了当时以色列的国防部大院，然后又跟着他们走进一栋没有任何标记的大楼，终于来到了罗文·希洛的私人办公室。

一见面，罗文·希洛就严肃地对弗兰克说：“我知道你以前是一名很不错的军人，现在是一名很有成就的商人。但是从现在起，你将再次成为一名军人。你这

次的任务不是去战场进行战斗，而是从事谍报工作。尽管战场的战斗已经暂时结束了，但另一场战斗却没有结束。我现在决定派你去伊拉克。我们那位驻巴格达情报站站长的任期行将结束，我们想让你去接管那里的情报站。我想你一定不会推辞的。”

罗文·希洛几乎没有让弗兰克有喘气的机会，也没有给他半点思考的余地，就把自己的决定一口气交代完了。弗兰克当时也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不过他还是要求罗文·希洛能把自己此行的任务和目的交代得更具体更详细一些，并且明确一下自己所拥有的权力，但是这位上司却没有这份耐心。罗文·希洛当时似乎有点不耐烦，只是含糊其辞地对他说：“你将负责那里的犹太移民和情报搜集工作。”

弗兰克当然知道，当时的犹太移民工作是由“阿利亚-B”负责的，而情报搜集则是由对外情报机构“沙伊”负责，这两种工作应该是由两个不同的部门负责。弗兰克对罗文·希洛把这两种工作混为一谈的做法感到在点不理解，但是最后罗文·希洛还是耐着性子对他说：“不要担心，一切都在协调之中。”

同罗文·希洛谈话之后，弗兰克又应邀与当时的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进行了一次交谈。这位外交部长对弗兰克此行表示十分关注，他强调了弗兰克巴格达行

动的重要性，并且向他明确地保证：“以色列国是你的坚强后盾。”

——然而，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了，一切政治性的承诺都是虚妄的不实之词。

同罗文·希洛和摩西·夏里特两人谈话之后，弗兰克踌躇满志地做好了去巴格达的准备。几天之后，他化名为“伊拉克·斯坦”，带着为他准备好的以色列护照，由特拉维夫飞往德黑兰，开始了他的巴格达之行。

根据事先的安排，他将在德黑兰拿到护照后再转道去伊拉克，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巴格达潜伏下来，为以色列开展工作。弗兰克当时已经知道，过不了几天，以色列最大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就要正式成立了，给他分配这项任务的罗文·希洛也很快就要成为摩萨德的首任局长。自己的这次巴格达之行，可以说是摩萨德的首次国外行动。他要把这次行动干得既出色又漂亮。想到这些，弗兰克的心情格外兴奋。

来到德黑兰之后，弗兰克受到了“阿利亚-B”德黑兰分站站长蔡恩·科恩的接待。当时弗兰克很希望能从蔡恩·科恩那里知道自己具体的服务对象。但是他再一次失望了。因为蔡恩也只是坦率地对他说：“我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好像觉得特拉维夫正在忙于其他什么事情。”

蔡恩的话让弗兰克兴奋的心情受到了打击。不过，他知道根据罗文·希洛的安排，自己到达德黑兰之后，将会有特工来帮助他进入巴格达，但是现在看来，即便是蔡恩好像也没有时间和心思来顾及自己了。这样，弗兰克就不得不在德黑兰待了下来。他无所事事地一待就是两个多月，一事无成。最后，蔡恩给他弄了一张假护照，准备让他抵达目的地。

但是，不知是蔡恩出于粗心，还是根本就不具有谍报工作的常识，他为弗兰克办理的这张假护照上的所有内容，与弗兰克本人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根本就不具备掩护身份的作用。最明显的错误有以下几个方面：弗兰克的面部特征本来很像欧洲人而不像阿拉伯人，但这张假护照上却明明白白地写着他是一位阿拉伯人；弗兰克的英语非常好，当然也能说阿拉伯语，但是带有明显的巴勒斯坦口音，把他装扮成加拿大商人显然更加合适，但是假护照却说 he 是一位来自巴林的地毯商人。面对这样一张漏洞百出的护照，弗兰克不由得对自己未来的前景和工作充满了悲观与失望。他没有想到作为一名以色列职业特工的蔡恩，而且还是一名驻国外的站长，居然会干出这样的蠢事。这难道是一位职业谍报工作人员应该犯的错误吗？

当弗兰克拿到这张假护照时，他开始考虑是否返

回以色列，放弃罗文·希洛派遣自己前往巴格达执行的任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弗兰克出于内心对以色列国家的热爱，还是决定继续前往巴格达。弗兰克烧毁了身上所有能证明他与以色列有关的证件、物品，告别了蔡恩，只身前往巴格达。

要从伊朗进入伊拉克，弗兰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顺利地通过两伊之间的边境线。因为边境线上有许多边防检查站，检查非常严格。如果使用手中这张假护照显然把握不大，一不小心就会露出马脚。但是弗兰克当年在纽约干过一段时间偷渡犹太移民的工作，这使得他对付边境检查站有了一定的经验。于是，他就在去边防站的途中寻找机会。很快，弗兰克就结识了一位自称也是去巴格达的商人。根据以往的经验，弗兰克觉得这个人并不像一个真正的商人，倒很有可能就是在边境线这一带做偷渡生意的“蛇头”。通过进一步的交谈，对方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证明了弗兰克的判断没有错。弗兰克按照对方的要求给了他一大笔钱，请他帮助自己顺利地进入伊拉克。这个往来于两伊之间的“商人”果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原来他一直是在边境线上干着这种偷渡的勾当，和边防检查站互相勾结，所以对这种事情很是有办法。收下了弗兰克的钱之后，“商人”就把弗兰克藏在

自己的货物中，轻而易举地把他偷渡到了伊拉克，并把他安全送到了巴格达。

弗兰克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巴格达时，已经是1951年的4月下旬。这时摩萨德已经正式成立了，罗文·希洛也已经走马上任，当上了摩萨德的首任局长。不过，这时的罗文·希洛似乎已经把弗兰克给忘掉了。当初罗文·希洛把弗兰克派遣到巴格达来的时候，他同弗兰克约定好了，他将会以总部的名义，从特拉维夫给潜伏在巴格达的以色列情报站站长本-波拉特发一份密电，通报弗兰克即将到巴格达赴任，接替他情报站长的工作，并命令本-波拉特把情报站的工作向弗兰克进行移交后，及时返回以色列接受新的安排。

可是，当弗兰克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抵达巴格达之后，本-波拉特却把他当成了一个不信任的陌生人，没有对他的到来表示热情的欢迎，更不要说向弗兰克办理移交手续。

到了巴格达后，弗兰克按照动身时的约定，找到了那个作为联络站的犹太人的家庭，并且对上了约定的接头暗号。但是这个犹太人根本就不信任他，甚至还怀疑弗兰克是一个为伊拉克工作的密探。

当时，本-波拉特就住在这个犹太人的家里，弗兰克此行的任务就是来接管由本-波拉特领导的这个情报

站。可是，当弗兰克同本-波拉特见面之后，本-波拉特不但对此事一无所知，而且对弗兰克的出现充满了怀疑和敌意。他明确地对弗兰克表示，自己的秘密工作非常重要，现在的情报站在他领导下，一切事情都开展得很正常而且顺利，所以，不论是他手下的特工还是了解这些工作的当地犹太社会的领导人，都不会同意这一权力的交接与变更的。他甚至还威胁弗兰克说，如果你不想让自己难堪或者是不想有生命之虞，你还是趁早离开巴格达为妙，“不要让我本人和我的手下再见到你”。

弗兰克内心产生出一种极度的愤怒。就他现在的处境来说，稍微理智一点考虑，就是选择时机立即返回以色列。因为他的这些同事已经拒绝给他提供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如果是他自己寻找一家旅馆或者饭店，就必须进行身份登记，并且得向伊拉克警方出示自己的假护照，这样做无异于自投罗网。他得不到任何权力，也收不到任何来自国内的指令，他在巴格达简直就是无事可做了。但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情绪再一次支配了弗兰克。他决定要坚持到底，继续留在巴格达，尽力去完成希洛交给他的任务。除非是他的生命确实面临危险，他才会考虑撤离。

弗兰克就是这样心情郁闷地走上了大街，冒险住

进了巴格达的塞米斯大饭店。所幸的是这家饭店由于生意萧条，并没有严格地履行入住登记手续，才让他暂时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国度和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找到了一张床，而没有像流浪汉一样露宿街头。但是，一种职业的敏感让弗兰克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在巴格达待下去了。两天以后，每当自己走出塞米斯大饭店，无论走到哪儿，总会有人在后面跟着。他明白自己已经被伊拉克的安全人员给盯上了。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弗兰克就只有立即钻进一辆出租车，来回倒几次车，经过几个回合，才可以甩掉后面的尾巴。弗兰克不得不再一次找到本-波拉特，并要求他给予帮助让自己离开伊拉克。但是本-波拉特却认为这是伊拉克安全部门对自己的一次试探，因此再次把弗兰克拒之门外。

面临生命危险的弗兰克此时反而镇静下来。他那偷渡犹太人的经验再次发挥了作用。于是他来到巴格达一家旅行社故伎重演，收买了一名见钱眼开的年轻雇员，这位雇员按照弗兰克的要求，很顺利地给他办理好了飞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机票，同时解决了他的出境签证。弗兰克知道，他必须经过一番周转才能返回以色列，而周转地如果选择欧洲国家，将受到伊拉克秘密警察极为严密的监视，所以他就选择了阿拉

伯国家——黎巴嫩。到了贝鲁特，弗兰克再次转机飞到了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弗兰克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比较安全了，因为土耳其当时已经是以色列的邦交之国。于是他找到以色列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要求他们为自己提供签证。

但是令弗兰克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以色列的领事馆也遇到了麻烦。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巴林地毯商”的身份产生了怀疑，拒绝签发证件。弗兰克实在忍无可忍了。因为这是是目前唯一能证明其身份的书面材料，如果得不到签证，他不但不能安全地回到国内，而且还不知道又将要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此时，弗兰克终于被这次行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彻底激怒了，他对以色列领事馆的那些工作人员大为光火，并且直言不讳地威胁他们说，自己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个重要人物，如果不能让自己按时安全地回国，他们将要承担法律上的责任。领事馆的头目在将信将疑的情况下，给这位化名的同胞办理了进入以色列的签证。这时弗兰克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怀着最后的一点希望回到了他阔别了近三个月的特拉维夫。

这时罗文·希洛已经不再在原来的地方办公了。当弗兰克找到罗文·希洛新的办公室时，这位局长只是派

了他的秘书来明确地告诉弗兰克：“局长不愿见你。”

“局长不愿见你”——这句话深深地伤了弗兰克的心。当初不就是罗文·希洛派人把他叫到这里来的吗？而后来一切的遭遇几乎是把弗兰克莫名其妙地玩弄了一通，可是到了现在居然不愿再同他见面了。弗兰克觉得这位新上任的局长先生变了，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后来在弗兰克近似固执的坚持下，罗文·希洛才让他的秘书转告弗兰克，答应给他五分钟的时间，让弗兰克谈一谈这一次奇妙的旅行。弗兰克当然没有接受这个“五分钟”的邀请，便不辞而别地离开了局长先生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弹簧厂去了，因为那里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弗兰克知道，罗文·希洛之所以不想再见到自己，并不是真的把自己给忘记了，而是这位新上任的局长先生不敢正视自己的无能和因为自己的无能所犯下的错误。

因此，在时隔50多年以后，每当弗兰克和朋友偶尔回忆起自己那次倒霉的巴格达旅行时依然怨气冲天，耿耿于怀。他一直认为那些人纯粹是一群半瓶子醋的业余情报官，其组织工作几乎是混乱不堪。

情报站长在公开场合说希伯来语

弗兰克的抱怨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当年在摩萨德成立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确是分工不明确，互不协作，政出多门，局面非常混乱。如果说，弗兰克不愉快的巴格达之行完全是由于上级的组织不力与不重视造成的，那么摩萨德的地方谍报网络当时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事实证明，处于刚刚起步之中的摩萨德的地方谍报网络，在当时同样是一团乱麻。由于管理不善，以色列驻巴格达的间谍网很快遭到了厄运。就在弗兰克离开巴格达后不久，以色列的情报网就遭到了破坏，包括站长本-波拉特在内的以色列驻巴格达的情报人员，几乎是被伊拉克警方一网打尽。这次失败除了情报机构组织上的原因之外，本-波拉特自身的素质低下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以色列的文化之都特拉维夫



本-波拉特出身于伊拉克的一个犹太家庭，后来随家迁往巴勒斯坦，并加入了以色列军队，参加了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1949年秋天，鉴于本-波拉特在战斗中的表现和他以前在伊拉克的经历，以色列情报机构就派遣他到伊拉克组建一个情报站，主要是帮助当地的犹太人非法越境，偷渡到以色列。

回到了巴格达以后，为了掩饰自己在以色列的经历，本-波拉特经常变换身份，轮流使用两个不同的身份和两个不同的假名。尽管本-波拉特使用的那两个假名字是两位已经离开伊拉克的犹太人的，但是，当年在伊拉克的那些邻居和朋友，还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个曾经在巴格达生活过十多年的人。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本-波拉特后来在以色列的一些经历，他们只是以为他出去旅行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

本-波拉特这种同时使用两个假身份的问题，还仅仅是众多问题中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以色列当时情报部门的混乱局面。当时由于情报界各部门之间相互猜忌，使得各分站对于自己的职责认识含混不清。从情报工作的常识来看，为了安全起见，各谍报网之间应当坚持“分工负责”的原则，或者是说“各行其是”。各网络之间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配合工作，但绝不应该一起工作。但本-波拉特在负责偷运犹太移民

时，还一手掌管着另一个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的谍报网。而这个谍报网的工作方式正是当时最普遍的工作方式：负责搜集国外的军事和政治情报，然后汇总到负责人那里，由负责人通过无线电收发报同总部联络。很明显，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还十分危险。一旦其中一个受到破坏，另一个也就危在旦夕了。随后的事实证明了确实如此。

集两个情报网于一身的本-波拉特成了一个大忙人。他经常同手下的特工见面，向他们安排任务，同他们交换信息。除此而外，他还同手下的人一同过犹太人的传统节日，一同购物，一点也不考虑到秘密工作的原则。最后发展到得意忘形的地步，甚至在公共场合公开用希伯来语高谈阔论；开车的时候又肆无忌惮地唱那些让他们引为自豪的以色列歌曲。本-波拉特犯下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原则性错误，而这种错误对任何一个职业间谍来说，都是不可原谅、不可饶恕的。

于是没过多久，伊拉克安全部的情报人员就把本-波拉特给盯上了。他们很关注这个大大咧咧、会说两门语言的“伊拉克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们发觉这个人竟然在不同的场合变换着使用两份不同的证件，随后，他们又根据本-波拉特的行踪推断出他是某些中心的人员，于是决定对他采取行动。在一个夜幕

即将来临的黄昏，伊拉克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本-波拉特以及同他有密切往来的一些人员，然后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审讯。这是以色列驻巴格达间谍网被击破的开始。这时弗兰克已经逃回以色列一个多月了。

作为一个参加过战争的以色列军人，本-波拉特具有坚强的意志。面对残酷的审讯他始终一口咬定自己就是伊拉克人，之所以使用两份不同的证件，完全是出于做买卖的考虑。本-波拉特这一态度让伊拉克警方无计可施，当时又找不到新的证据，就只好把他给放了。

但是没过几天，伊拉克警方第二次逮捕了本-波拉特，审讯关押了一两天以后又把他放了。伊拉克警察就这样反复地逮捕，然后又反复地释放，其目的纯粹是想借此消磨他的意志。波拉特也明白警方的用意。当他最后一次被逮捕又再次被释放后，本-波拉特决定离开巴格达。然而，当本-波拉特在移民局一名以色列特工的掩护下，非常狼狈逃回了以色列后不久，那位帮助他离开巴格达的特工却被逮捕了，还逮捕了本-波拉特的一位副手。他的那名副手在伊拉克警方的审讯下终于抵赖不住了。因为他当时在伊拉克的对外身份也是波斯商人，但是他根本就不会说波斯语，于是在连续的酷刑拷问之下，他终于把所有的底细都抖搂了

出来。警方根据他的招供顺藤摸瓜，很快就把整个间谍网弄得支离破碎。最后逮捕的以色列间谍大约有100多人，同时还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爆破器材和通讯设备，彻底摧毁了以色列在巴格达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情报网。

在这一次被逮捕的人中，有20多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两人被绞死，有一人被判终身监禁，还有四人被指控对美国大使馆新闻中心和一座犹太教堂进行过袭击。消息传到以色列国内，情报界上下顿时一片哗然。此次事件对以色列那些此时还身在国外的情报人员，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对刚刚成立的摩萨德来说实在是当头一棒。因为驻外国分站的间谍网被破获，不仅使那些谍报人员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还使情报的来源被截断，使得以色列以后在国外的谍报工作就步履维艰了。更重要的是，刚刚立国不久的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也因此大受其损。

作为摩萨德的主要负责人，罗文·希洛自然是难辞其咎。当时摩萨德内部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切都只能说明罗文·希洛先生对情报业务还是经验不足。后来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实又进一步证明，罗文·希洛的确是属于那种只能充当高级顾问的角色。他的战略眼光独树一帜，在进行宏观战略规划时显得极富机智和极有

条理，并在此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他在担任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高级顾问期间，更显示了他这方面的才干。然而，在他出任摩萨德局长之后，对于具体的情报业务，却显得并不是十分在行。

不久发生的一次车祸，让罗文·希洛头部受伤，身体状况一直不佳，精力也受到了影响，于是他不得不于1952年9月20日辞去了摩萨德局长职务，担任总理的国际和地区战略顾问。

在以色列情报界，罗文·希洛虽然有“情报先生”的美誉，但是他在摩萨德短暂的任期内并没有做出什么惊人之举。不过，他毕竟还是摩萨德的创始人之一。罗文·希洛为摩萨德制定了指导该机构今后数十年工作的基本原则，确立了摩萨德与外国安全机构，尤其是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建立起工作关系的基础，还为摩萨德建立了一个经济情报处，专门负责侦查阿拉伯国家为了阻止他国与以色列发展贸易往来所进行的活动。此外，罗文·希洛还极力强调，以色列必须与全世界的犹太人建立起亲密的和相互信任的关系，从而使以色列的海外情报活动得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广泛支持，并因此取得了令各情报大国自叹弗如的惊人成绩。这一切，都应该是这位首任局长的功劳。

罗文·希洛辞职之后，另一位在以色列情报界有着

举足轻重地位的重量级人物接替了他，成为摩萨德的第二任局长。此人就是被誉为以色列“情报之父”的伊塞·哈雷尔。

第三章 哈雷尔走马上任 摩萨德基业初成

被誉为以色列“情报之父”的哈雷尔走马上任入主摩萨德，新局长不仅是个工作狂而且是个“反间谍”高手，多次让克格勃特工现出原形，甚至连总理最信任的密友也不放过；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成功实施“迷雾计划”，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给“忽悠”了，摩萨德从此名声大振。

哈雷尔当上了“辛贝特”首任局长

1952年9月，以色列国内安全局局长伊塞·哈雷尔继罗文·希洛之后成为摩萨德第二任局长。

伊塞·哈雷尔原名伊塞·哈尔彭，1912年出生于俄国

维切布斯克镇的一个正统犹太家庭，父亲是个富有的小工厂主。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他的父亲也破了产，于是举家移居到拉脱维亚。在那里，反犹太势力极为嚣张，犹太人被迫组成自己的社团进行抵抗。年仅15岁的小哈雷尔开始接受犹太教育，并且加入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他还为自己在黑市上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尽管哈雷尔从那时起就学会了希伯来语，但在很多年以后，他说话时仍旧保留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

哈雷尔十分渴望有一天能回到祖先居住过的地方，回到充满宗教色彩的巴基斯坦地区。17岁那年，他生平第一次伪造了一些证件，证明自己已年满18岁了，具备了移民到巴勒斯坦的法定年龄。1930年1月，哈雷尔带上他的小手枪和一些子弹，随同父母踏上了移民巴勒斯坦的旅程。



以色列“情报之父”伊塞·哈雷尔

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巴勒斯坦港口后，一位犹太移民局的官员来到船上提醒大家：“英国托管当局将要检查你们是否带有武器。如果带了请立刻扔到海里去。否则，一旦查出来，你们所有的人都将禁止下

船登岸。”

听到这话后，船上带枪的人都赶快把枪支扔掉了。哈雷尔却不甘心，他趁人不注意掏空了随身带的一块大面包，把自己的手枪和子弹藏在了里面，然后又将面包藏在手提箱里面的一堆脏衣服下面。海关人员检查到他的时候，一见那酸臭熏人的脏衣服，连碰都没碰就赶紧让他走了。

来到巴勒斯坦后，年轻的哈雷尔和家人来到了特拉维夫郊区的赫兹利亚集体农庄，当上了一名修理水渠的工人。白天，他拼命地干农活；晚上，他就到犹太人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接受训练。在集体农庄里，哈雷尔结识了一位名叫瑞夫卡的犹太姑娘。哈雷尔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平时只爱干活，不善社交，而瑞夫卡却既漂亮又风趣，而且爱好跳舞和社交。在乡亲们看来，这对性格截然不同的年轻人并不般配，然而，他们最终却成为了一对和美的夫妻。

1936年，哈雷尔和家人承包了农庄的一片柑橘园。凭借着他和家人的埋头苦干，哈雷尔终于有了第一笔可观的收入。由于要销售柑橘，他经常要同邻村的阿拉伯人打交道，因而很快就学会了他们的语言。于是他就利用这种机会趁机打听阿拉伯人的一些情况。后来他就经常向“哈加纳”的秘密情报组织“沙伊”介

绍一些有关阿拉伯人村庄的情况，例如村长的品行、发生的纠纷以及对犹太人不满意的议论等等。哈雷尔的上级立刻注意到了他的这种才能，就委任他当上了“沙伊”在当地的情报小组的组长。

1939年，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希伯来名字“哈雷尔”，并且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负责刺探英国托管当局的情报。一次，他抓住一个搞黑市交易的英国军官，不由分说地扇了对方一个耳光。为了避免被抓，他不得不从此潜入地下，继续为“沙伊”从事秘密情报活动。

1942年，哈雷尔正式加入“沙伊”，专门刺探阿拉伯和英国的情报，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特工生涯。哈雷尔首先被选中到“沙伊”犹太处任秘书。该处当时只有三个人，除了哈雷尔，还有一个处长，一个女秘书。哈雷尔的新上司戴维·沙尔蒂尔（后来担任过以色列驻荷兰大使）很快就发现了这个年轻人在情报分析方面的非凡才能。他先让哈雷尔负责国内安全方面的工作，后来又让他当上了特拉维夫地区“沙伊”组织的领导人。正是在这一时期，哈雷尔结识了包括伊塞-加加利和本-古里安等人在内的“哈加纳”重要领导人。前者1968年出任以色列武装部长，后者则成为以色列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

哈雷尔本人谈不上有什么惊人的本领，他不像“沙伊”组织中大多数同行那样有教养，也从未读过有关地下活动的教材。但在两年后，哈雷尔当上犹太处处长时，他已经积累了许多秘密情报工作的经验和知识。他摸索出来了一条适用于各种秘密行动的原则，这就是“分级单线联系”原则。1946年6月29日，为了从军事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冒险分子，英国托管当局对在特拉维夫的“哈加纳”领导人，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搜捕。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安息日”。哈雷尔正是凭着“分级单线联系”原则，使“哈加纳”领导人得以逃脱被捕的厄运。哈雷尔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本-古里安的青睞。

1948年5月初，也就是以色列国即将宣布成立之前，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那一天，向犹太人发起全面的进攻。当时，以色列的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约旦不会参加这场战争，甚至还会制止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行动。

但是哈雷尔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约旦同样会加入这场战争。对于这样一个关系到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力部署、乃至新生的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作为“哈加纳”的一名负责人，哈雷尔必须作出正

确的判断。为了让自己的判断准确，哈雷尔派了一名年轻的特工，混在即将逃离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中，来到了约旦的首都阿曼。这位特工也是个阿拉伯人，当时正在热恋着一位犹太姑娘，爱屋及乌，这位年轻的特工对犹太人也有了很深的感情。同时，他的一个表哥当时正在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政府中担任要职，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打听到重要的情报。

果然在5月12日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夜，这位特工终于从阿曼穿过胡达尔前线阵地，带回了约旦的装甲部队已整装待发即将参战的消息，同时也带来了阿拉伯联合军团就要发动进攻的重要情报。哈雷尔立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本-古里安。本-古里安连夜调派了部队，终于在约、以边界筑起了一道防线。

1948年5月14日，英国托管当局从耶路撒冷的市政府大厦上降下了“米”字旗，与此同时，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也在特拉维夫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以色列国正式成立。然而就在第二天的夜里，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和约旦的联合军团就跨越边界，向新生的以色列国大举进攻。以色列凭借着准确的情报早有准备，最终打赢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哈雷尔因此也得到了本-古里安总理的特别赏识，被破格晋升为中校。这在以色列创建之初的军队中，已经是属于第

二高的军衔了。

1948年“沙伊”被解散时，36岁的哈雷尔被本-古里安总理任命为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首任局长，从此他正式担负起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摩萨德总部只有12个人

1952年9月，罗文·希洛辞去摩萨德局长的职务，并向总理本-古里安提交了一份接任他的人选名单，名单上有莱文斯基、吉布利和哈雷尔等人。本-古里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哈雷尔。

在以色列建国初的几年里，为了能在阿拉伯人的夹缝中生存下去，除了进行必要的武装斗争以外，还要进行秘密的情报战，因此所有的情报活动对以色列来说都是刻不容缓的。

摩萨德虽然正式成立了，但摩萨德的第一任局长罗文·希洛的情报工作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正是伊塞·哈雷尔以前的情报工作和坚强而正直的人格让本-古里安认定了哈雷尔正是那种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的合适人选。于是，哈雷尔就受命于危难之中，被本-古里安总理亲自任命为摩萨德的第二任局长，成为继罗文·希洛之后以色列情报界的最高领导人。

哈雷尔在出任摩萨德局长之前，就已经是负责国内安全的情报机关“辛贝特”的局长；入主摩萨德之后，哈雷尔同时被总理授予“梅穆内”一职（即“辛贝特”和摩萨德的“总管”），他成了以色列最重要的权势人物。

哈雷尔刚接任摩萨德局长时，摩萨德的规模还很小，其总部的工作人员连局长和秘书在内，也不过12个人。此外，摩萨德的办公条件极其简陋，经费也严重不足，就连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无着落。哈雷尔到任之后，立刻向本-古里安申请追加经费。当天下午，本-古里安总理就批准哈雷尔呈上来的报告，使摩萨德的办公经费一下子就增加了10倍。

总理的这种支持和信任，让哈雷尔大为感动。他马上对摩萨德以往的工作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哈雷尔认为，作为一名摩萨德的特工，必备的条件第一是素质，就是那种能为以色列国家忘我工作的献身精神，其次才是各种谍报技能。为了建立这种精神，哈雷尔以身作则，为下属们作出了榜样。当时他每天几乎要连续工作18个小时以上，被手下人誉为“工作狂”。哈雷尔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极大地激励了摩萨德所有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执行一些危险任务时，尽管既无报酬，也无奖励，却总是能够奋不顾身，勇往直

前，从而使摩萨德的面貌焕然一新。

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的任职期间，并不满足于仅仅只是在国内，或者是仅在阿拉伯人的世界从事一些情报搜集工作，而是把摩萨德的工作放在全世界的大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考虑，他要充分利用犹太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这一优势，把摩萨德的触角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在他的任期内，摩萨德特工的海外行动也极为活跃。那些远离本土的谍报人员经常是单枪匹马地各自为战。尽管他们的薪金远远比不上欧美各主要情报机构的间谍，但其忠诚及献身精神，却是其他国家的情报人员无法与之匹敌的。几年以后，摩萨德已经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特工队伍，那些驻海外情报站的摩萨德特工，几乎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业内高手。同时，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国外执行任务时，除了军事情报局派驻各国的武官外，其他人员均由摩萨德统一指挥，这样就进一步为摩萨德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哈雷尔还善于发现人才。在他领导的部门里，凡是敏锐果断者都会迅速得到提升。1955年，哈雷尔曾经多次游说本-古里安，把建国前臭名昭著的地下组织“斯特恩”集团中最能干的成员招入摩萨德。而在此之前，本-古里安是极不喜欢他们的。这些人当中

就包括“斯特恩”集团的头目伊拉克·耶泽尼茨基。这个伊拉克·耶泽尼茨基后来改名为伊拉克·沙米尔，进入了摩萨德工作，并于1986年10月当选为以色列总理，直到1992年7月退位。如果当年不是哈雷尔的发现，他的命运也许是另一种结果。

哈雷尔在发现人才的同时，也懂得爱护部下，爱护人才。各国特工部门的传统观念大都是认为，一个被捕的间谍就是一个失败的间谍，但是哈雷尔却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如果他手下的人不幸被捕，他总是要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哪怕付出很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强心剂，让摩萨德的特工们感到身后总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支持自己，因此在执行各种任务时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不过，哈雷尔也同样要求他的特工必须绝对忠诚，任何背叛行为都将会受到严惩。

哈雷尔的“反间谍”战

在哈雷尔的领导下，摩萨德这架以色列的情报机器飞速地运转起来，而且初见成效，很快就干出了几件令国际情报界同行目瞪口呆的绝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反间谍”战。

以色列是一个新生的移民国家，建国初期的50万犹太人，全都是从世界各国以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迅速地涌入以色列的，这无疑为一些外国情报机构向以色列派遣自己的间谍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因此，反间谍就成了“辛贝特”的重要工作之一。

沃尔夫·戈尔茨坦出生在瑞士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母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意识，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就曾参加过列宁领导的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崇拜英雄的沃尔夫在少年时代就迷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吸收了他，并让他在莫斯科接受了全面的谍报训练。训练的出发点便是潜入以色列政府内部。

沃尔夫于1948年战争期间来到以色列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让外交部吸收了他。他被安排在当时规模很小又急需人员的经济处工作，沃尔夫·戈尔茨坦将其姓名改成了“齐夫·阿弗尼”。

齐夫·阿弗尼最初只是以色列政府的一名普通职员，但他被派往国外后却得到了一些重要职务。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以色列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任经济参赞。当时，以色列正在就向在大屠杀中遇难的以色列犹太人赔偿损失问题，与西德官员进行着秘密谈判。阿弗尼便利用工作之便，定期向克格勃报告谈判的所

有细节。

之后，阿弗尼被调到贝尔格莱德工作。最初，他的工作是处理以色列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商业往来业务，但后来由于人手紧缺，他也被允许进入大使馆绝密的通信密码室。阿弗尼学会了操作密码机收发以色列外交部与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间所有电报。

阿弗尼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他不仅经常自愿加班工作，还主动为有事的或生病的同事替班。这位苏联间谍很快获得了以色列外交部的密码。

哈雷尔一直在注意着以色列外交官的名单，并最终找到了怀疑阿弗尼及其工作热情的理由。一些以色列间谍的身份被暴露，而阿弗尼在贝尔格莱德的异常表现似乎与此有关。

1954年 4月，哈雷尔编造了一个理由，将阿弗尼召回特拉维夫。不知道大难临头的阿弗尼飞往以色列之后，即被辛贝特逮捕。在审讯中，阿弗尼垮了下来，他交代了一切。辛贝特鉴于他的合作态度极好，因此在其服刑期间，将他安排在关有其他叛徒嫌疑分子的牢房里，当上了辛贝特的密探。

就在将沃尔夫（阿弗尼）这位苏联间谍从外交部挖出的同时，哈雷尔又抓住了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这名阿拉伯间谍。

哈根是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美国记者，她与很多阿拉伯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相处得很好。她喜欢这些阿拉伯人，并且成了叙利亚外交官加拉布·艾尔-基利的未婚妻。在爱情的召唤下，哈根同意为基利在以色列搜集情报。1956年，她作为一名记者来到以色列，不久便开始向叙利亚情报机关提供情报了。

辛贝特发现哈根对以色列边境地区特别感兴趣后，开始对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监视，并很快掌握了她进行间谍活动的证据。哈雷尔手下的特工将哈根当场逮捕。她受到了秘密审讯，其在新闻界的同行们未被允许到庭。玛丽·弗朗西斯·哈根被判以间谍罪，在一所以色列监狱中监禁了8个月。获释后，天真的哈根急不可待地回到了纽约，但令她吃惊的是，“未婚夫”加拉布·艾尔-基利已不愿再见她了。她被阿拉伯情报机构利用并且最终成了牺牲品。

虽然苏联的间谍不时被抓获，但苏联人不仅具有突出的谍报天赋，还有静候时机的耐心，将支离破碎的细节合并起来从而解开难题的完美技术，以及将感情与工作彻底分离的能力。这对以色列情报部门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考验。

伊塞·哈雷尔自小生活在俄国，直到1930年他18岁时，才随父母移居巴勒斯坦。家世背景使哈雷尔对于

苏联人的思维方式和办事原则相当熟悉，这为他的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

苏联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大约有60名成员，其中一半是克格勃或军事情报局格鲁乌的间谍。他们在以色列征召密探，以便组建起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庞大间谍网。从意识形态上讲，当地的共产党人较容易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但由于他们已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怀疑对象和重点监视目标，于是苏联人将目光转向了以色列政府机构中的非共产党人员及其亲属。

1955年夏天，一名驻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以色列高级外交官的妻子回国探亲，在特拉维夫，她与一位苏联外交官相遇并坠入情网。当时，辛贝特对苏联外交官实行严密监视，因此很快便发现了这一情况。辛贝特把这位夫人请到了总部，让她与其情人断绝一切来往。

为保护她的丈夫即那位以色列驻东欧的外交官免受讹诈，外交部在不作解释的情况下将他召到奥地利。当这位丈夫来到指定旅馆时吃惊地发现，以色列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正在为他预定的房间里。哈雷尔开门见山地向这位戴绿帽子的丈夫说明了一切：他的妻子正在与一位苏联人私通，所以他将被调离东欧。外交官当即就被通奸事件和工作调动惊呆了。从那以

后，以色列外交官在被派往东欧之前，都会被告诫不要卷入风流韵事，而外交部也不再派单身汉或未婚妇女前往东欧工作。作为防范措施，各大使馆也都驻有辛贝特的特工，其职责之一就是提防和监视那些潜在的敲诈者。不过，辛贝特也很清楚，人的情欲是很难控制的，一旦它被激发起来，任何防范措施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1959年 2月，驻东欧某一国家首都的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就收到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先生：

不久以前，我得到了一些敏感的照片，这些照片可以证明您与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假如我利用这些照片对您或在这些照片中与您有牵连的女士进行敲诈，那对您和达格玛·诺沃特娜小姐都将是不愉快的。我对此事进行了考虑，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只要您在近期来维也纳与我的助手见面(他绝对可信)，我便可以将这件事遮掩起来。不过，您必须在 2月底之前抵达维也纳，并建议您住进萨切尔旅馆。我要求您在

收到这封信14天之内给予答复。

凡是接到这类敲诈信的人所面临的，都是要在个人声誉和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值得庆幸的是，这位以色列外交官勇敢地承担了这一丑闻的风险，将此敲诈企图报告了以色列外交部。随后，他被调离了东欧。

利用色相勾引目标，再使用隐藏的照相机或摄影机拍摄下追踪目标做爱的镜头，然后进行敲诈是克格勃惯用的手法。在以色列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与一名克格勃女间谍厮混，苏联间谍拍摄下了他们做爱的镜头。但当他们向苏加诺出示这些照片并试图威胁他时，这位外国总统却根本不在乎。他若无其事地指着这些照片说，这张照片我要6张，那张要12张。

针对克格勃屡屡使用色情敲诈方式获取情报的手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曾提醒“每张床的下面都藏有红色分子”。而哈雷尔则想向他的美国伙伴证明：在以色列人的卧室里，连粉红色也必须清除。

1960年1月16日夜间，两位男子出现在海法郊外霍雷布大街的一栋别墅前，其中一位是辛贝特特工，另一位是警察总部调查局特勤处警官。两名男子敲开

了捷克斯洛伐克籍教授库尔特·西塔的家门，并以间谍罪将他逮捕。

西塔于1910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一个非犹太德国人家庭。在布拉格学习期间，西塔被认为是一位数学和物理学天才。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盖世太保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结识了一批捷共著名人士。战后，这些共产党员中的一部分人加入捷克情报机构后，也将他们的朋友西塔吸收为间谍。

西塔曾在英国学习核物理，后又在纽约的锡拉丘兹大学讲授这门课程。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他是共产党间谍后，对他进行了审讯，并让他充当双重间谍。西塔于1953年离开美国前往布鲁塞尔，两年后，他又应邀前往“以色列麻省理工大学”的海法技术学院讲学，并接受了该校物理系主任一职。

作为一名非犹太人的外国人，西塔在以色列的非凡成就为捷克斯洛伐克及苏联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55年至1960年，一位捷克斯洛伐克驻特拉维夫大使馆的“外交官”经常与这位教授见面，并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的材料。

西塔教授的被捕不仅震惊了他在技术学院的同事及学生，也震惊了以色列政界领导人，他们几乎都不

敢相信这是真的。然而，法庭审讯所列举出的事实却不容置疑。西塔的主要目标是伯格曼教授所领导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而他则是在以色列纳哈尔·索雷克核试验反应堆投入工作两天之前被捕的。

哈雷尔领导的辛贝特花了近5 年时间才侦破了这一间谍案。西塔在5 年中究竟向东欧集团提供了多少以色列的核机密，无人可以说清。于是，辛贝特在庆祝胜利之际，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修复他们业已受到损害的形象。其官员声称，西塔只是在谍海中戏水的一条小鱼，他向共产党国家提供的只是一些与核项目无关的次要情报。而哈雷尔则指责美国联邦调查局没有将他们掌握的西塔的所有情况告诉以色列。

总理的朋友果然是间谍

伊塞·哈雷尔对于追捕间谍的工作格外着迷，他如同一名痴迷的猎手，每捕获到一只新猎物都会兴奋不已。而现在，他又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本-古里安总理身边的著名人物——伊斯雷尔·比尔教授。

伊斯雷尔·比尔于1912年出生在维也纳，早年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据他自己讲，1938年纳粹进驻奥地利之前，他曾走上大街与法西斯战斗。比尔说，他曾

在奥地利一所军校学习，后来志愿加入了“国际纵队”，在西班牙与佛朗哥的军队作战。

1938年，比尔移居巴勒斯坦。凭借他自己介绍的战斗经历，他加入了哈加纳。比尔的社会主义观点、他所接受的自由主义教育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帮助他结识了正在打仗的犹太领导人。比尔因在1948年的独立战争中的贡献而被授予了中校军衔。

以色列建国后，比尔一直是以色列武装部队参谋长亚埃尔·亚丁的副手，经常同军事情报部门的行政当局打交道。20世纪50年代初期，比尔差点获得了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比尔曾是激进的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在该党的安全机构担任过重要职务。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退出了统一工人党，转而加入了更为温和的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从那时起，他便与肖尔·阿维格、西蒙·佩雷斯等国防机构主要领导人，甚至本-古里安总理交上了朋友。

1955年，本-古里安将其私人日记交给比尔，让他代表官方编写一部以色列独立战争史。这份特殊的工作是一个绝妙的观察哨位，它使比尔有机会接触到涉及以色列国防的最敏感、最机密的材料。有关方面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特意在国防部

大楼里为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比尔还经常参加许多重要的秘密军事会议，军队的秘密计划、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方案和文件，无不经过他的手，甚至就在他离开军队后也是如此，那些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机密的情报，也都要交他过目。而对于他所想知道的一切，以色列将军们几乎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



手表式照相机。镜头采用潜望式设计，间谍们可以通过假装看时间来执行任务，偷拍一些情报资料。

从那以后，比尔渐渐地成为了本-古里安的密友，几乎每次举行军事检阅时，他总是站在总理身边，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1960年，比尔转入政界，不过仍被授予了预备役上校的军衔。比尔虽然退出了军界，但却继续以其军事方面的专长，在以色列举办过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问题的演讲会。从那以后，人们便改称他为比尔教授。

比尔教授还经常应邀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讲授战争学，而他对于未来战争的军事战略所作的精彩分析，赢得了不少外国政治家和军队领导人的信任与敬佩。在当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比尔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法国国防部的官员们曾赞叹说：“比尔教授在战术分析方面，称得上是眼界开阔、见地甚高。”

然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这位比尔教授所受到的宠信及所掌握的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有关方面却已经对其忠诚产生了怀疑。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将军对于比尔退出军队后仍能随便出入国防部大楼感到惊讶和不满，这位将军干脆以比尔已不在军队服役为理由，要求他不要再穿军官服装，并取消了他出入国防部的所有证件。

1956年，英国、法国、以色列拟向苏伊士运河派驻联合部队。为协调整个行动，三国政府首脑和军队领导人决定在法国塞夫勒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临行

前，本-古里安总理和达扬将军召集所有随行官员举行了一次准备会议，让达扬感到吃惊的是，比尔并不一同飞往巴黎，但却出席了临行之前的这次秘密会议。摩西·达扬当时就曾半开玩笑地指着这位军事史学家问道：“这位间谍在这儿干什么？”

而作为负责以色列安全的情报界总管，哈雷尔早在1953年就对这位来历不明的伊斯雷尔·比尔产生了怀疑。当时，比尔私下与联邦德国情报界总管、联邦情报局局长莱恩哈德·格伦将军建立了联系。他的这一举动触动了哈雷尔那根警觉的神经。

格伦及其情报机构在北约联盟的欧洲防务中拥有特殊地位。格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纳粹军事情报机构工作，负责监管在苏联的间谍，如今他正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合作，以唤醒沉睡在苏联的间谍。苏联人无疑很想知道联邦情报局所构成的威胁，因此派人弄清格伦的行动便成了当务之急。比尔教授似乎正是苏联人所需的合适人选。

首先，比尔有条件掌握某些机密情报，他与北约各国的军界、情报界的许多官员都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其次，比尔教授到西欧讲学时经常“顺道”去东德、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哈雷尔的怀疑，并因此对他发出过多次警告。

哈雷尔怀疑，比尔从一开始就是共产党国家安插在以色列的间谍，他多次向本-古里安表示过自己的怀疑。然而，本-古里安却认为证据不足而不肯放弃对比尔的信任，本-古里安甚至怀疑哈雷尔和达扬是在嫉妒比尔的亲信地位。

尽管本-古里安不相信比尔会是间谍，但哈雷尔凭借着他那灵敏的嗅觉，坚信自己的怀疑是不会错的。虽然眼下还缺少过硬的证据，但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哈雷尔还是决定再警告比尔一次。

哈雷尔再次把比尔教授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不等教授坐稳，便开门见山地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

“你为什么要到东柏林去？”

“你为什么还要到波兰去旅行？”

“难道我没有警告过，你要注意同共产党的关系吗？”

然而这位被人昵称为“皮帕克”的又高又瘦的秃顶教授，却根本不买情报界总管兼摩萨德局长的账，他以其惯有的傲慢神态，迎视着哈雷尔那双冰冷的蓝眼睛。随后，他轻蔑地用手指弹了一下烟灰，漫不经心地对哈雷尔说道：“有话就请直说，别再兜圈子了。恕我直言，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



“独眼将军”摩西·达扬（中）和拉宾（右）等在一起
哈雷尔用拳头猛敲着桌子，大声说道：“比尔，我

最后一次警告你，我禁止你再去东欧！”

这位处处受人尊重的比尔教授，何曾受到过这种严厉的呵斥，在他看来，就连本-古里安也没有权力这样对他讲话。教授猛地站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喊道：“我要告诉总理，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接着，他“砰”的一声摔上了办公室的门，扬长而去。

比尔摔门离去后，哈雷尔一动不动地静坐了有好几分钟。比尔最后甩出的那句话已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他所指的是什么党呢？

不错，比尔是本-古里安领导的执政党——以色列工党的成员，但是摩萨德首脑不属于任何党派，他负责国家的安全，只对国家首脑负责，而不对党派负责，哪怕是执政党。

哈雷尔也清楚地知道，比尔早年曾是左翼组织以色列统一工人党党员，并以坚定的亲共产主义分子而著称。朝鲜战争期间，他就在报纸上发表过不少反美文章，表现出明显的亲共立场。比尔后因与统一工人党内的“温和分子”发生意见分歧而退出该党。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比尔退出统一工人党后，不是加入更为

激进的政治团体，反而加入了比统一工人党更为“温和”的以色列工党。

在加入执政的以色列工党后不久，比尔就向本-古里安说出了“祝本-古里安永远健康”、“您是以色列的救星，您是以色列的希望”、“您想干什么，您就可以干什么”等一系列令人肉麻的吹捧话语，其人品可想而知。因此，就连比尔当年在统一工人党中的几位莫逆之交也曾向哈雷尔发出过警告：“要当心皮帕克。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家，一棵随风倒的墙头草。”

哈雷尔耳边再次响起了比尔的那句话：“我要在全党面前告发你！”

满腔的愤怒使得教授的声音都走了调儿，变得刺耳不堪。通常总是冷静持重的比尔教授，这一次显然被激怒了。愤怒中脱口而出的话语往往是本能的反应，而本能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

哈雷尔突然意识到：只有一个被苏联训练过的坚定的共产党人，只有一个被训练得无条件地相信“党”的最高权威的人，才能作出如此反应。

“敲山震虎”的攻心手段，取得了出人预料的结果。哈雷尔感到必须马上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他来到本-古里安家中，向总理报告了他所掌握的有关比尔的材料：

“比尔搜集了许多一般来说与他毫不相干的情报，他常利用到欧洲旅行的机会去共产党国家，比尔还与苏联驻以色列的外交官们交往频繁……

“比尔在特拉维夫的夜总会里花销甚大，远远超出了他的正常收入。就在不久前，他在慕尼黑的一家饭馆里吃饭，200 美元的账单都没有使他皱一下眉头。而他在为幽会的女人购买昂贵的时装时，更是花钱如流水……

“他与妻子丽卡克的关系很不好，因此总在耶胡达大街的‘阿托姆’酒吧间里整宿整宿地借酒消愁……比尔还经常和一些可疑的女人厮混，而且总是狂饮。我认为，此人正被某种强烈的紧张情绪所折磨，而这种紧张情绪多见于那些过着双重生活的间谍。”

最后，哈雷尔提醒总理：“比尔对您也并不如您想象的那般忠诚和老实。就在不久前的一场风流丑闻中，他被那个女人的丈夫狠狠地揍了几个耳光，牙齿被打掉了好几颗，但他却对您当面撒谎，说是在一次小小的车祸中撞坏的，而您也相信了他……从现在起，您一定要提防点儿比尔。”

但是，哈雷尔最终也没有能说服本-古里安，他对哈雷尔说道：“怀疑每一个人是你的职业，至于我，则对比尔教授完全信任。”

就在哈雷尔这次谈话之后，本-古里安又把自己的另外几本私人日记借给了比尔教授。这些日记不仅记录了他本人最隐秘、最能说明个人意向的想法，甚至还包括不少连内阁都不知道的国家机密。

事到如今，若是换别人也许早就罢手了，但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哈雷尔却不会这样。尽管他与本-古里安私交甚好并且对其绝对忠诚，但当他意识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正在受到威胁时，便不惜冒得罪总理的风险也要一追到底。

从那以后，比尔教授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辛贝特特工更加严密的监视。哈雷尔还命令摩萨德调研部，对比尔的个人历史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是对于那些尽人皆知的“事实”，也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放过。

事实再次证实了哈雷尔直觉的正确。1961年3月，摩萨德得出结论：伊斯雷尔·比尔教授不仅是一个冒牌犹太人，而且是一名克格勃安插在以色列多年的老牌间谍。

尽管哈雷尔对比尔怀疑已久，但当比尔真被揭发出来后，他反而感到十分棘手了。比尔一直是本-古里安总理的密友和影子，这几乎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他的逮捕及真实身份的公布，无异于是在向反对党提

供一枚重磅的政治炸弹，搞不好甚至还可能导致现政府的垮台。

此外，比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各国也都有着极高的威望，当人们得知教授是一名苏联间谍时，以色列的名誉也将受到影响。到那时全世界都会惊呼：“莫斯科所掌握的有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所有情报，原来都是来自特拉维夫。”

然而，顾虑归顾虑，当以色列国家安全真正受到威胁时，任何顾虑都将被哈雷尔置于脑后。1961年3月31日，哈雷尔下令逮捕比尔。

那天，辛贝特特工与警察抓住比尔的时候，比尔正将一些文件交给克格勃间谍维克托·索科洛夫（他以苏联外交官的身份潜伏在特拉维夫）。这些文件包括本-古里安总理日记的摘录和一份有关一家以色列国防企业情况的报告。

在法庭上，比尔承认自己的经历是编造的。他从未像他夸口的那样获得过历史博士学位，也从未到过西班牙。后来，他在狱中又推翻了他法庭上的招供，并宣称他原来介绍的经历是真实的。至此，有关其确切身份的问题就更成了一个谜。

尽管不知道比尔的真实姓名和背景，以色列法官还是发现了其不可辩驳的罪证，特拉维夫法院以间谍

罪判处他15年徒刑。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比尔1966年于狱中去世之前，他始终坚持说自己不是间谍，而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他只想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结盟的而非亲西方的国家。

哈雷尔“忽悠”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反间谍战”取得一系列胜利的同时，在1956年下半年，为了保守以色列军队参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机密，哈雷尔领导下的摩萨德还成功地实施了一项项的“迷雾计划”，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都给“忽悠”了。

苏伊士运河是埃及境内著名的国际通航运河，它扼守着亚、欧、非三大洲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运河自1869年开通后，就被英、法垄断资本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所控制。1956年初，埃及政府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将运河收归国有。而既得利益的英、法两国自然不肯答应，就决定通过武力来制止当时埃及的纳赛尔政府的正当要求。

英、法两国为使战争开始后让美国人也能够站到自己一边，将埃及的宿敌以色列拉入了这次军事行动。而以色列当时希望从法国获得核反应堆及武器供

给，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法国政府自当年4月起，就开始武装以色列，把自己的运输船队和大批运输机源源不断地开往以色列，并在黑夜抵达海港和机场卸下大量坦克、大炮、战斗机和弹药。

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以三国蓄谋已久的战争已迫在眉睫。此时，美国人根据种种迹象和传闻，已经觉察到了以色列参加这次战争的意图。美国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命令有“中央情报局的‘瘟神’”之称的安格尔顿与哈雷尔联系，以探听虚实。

哈雷尔为了严守战争机密，决定对美国也加以蒙蔽，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将本-古里安总理不久前在陆军高级军官学校发表的讲话稿，传送给了杜勒斯。该讲话稿的中心意图是要教训一下约旦，并不是战争。与此同时，摩萨德又故意通过其他渠道向外界透露：鉴于巴勒斯坦游击队从约旦不断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以色列计划对约旦实施一次小规模报复行动。



以军通过苏伊士运河后“独眼将军”达扬和头部受伤的沙龙（左一）都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结果埃及被蒙蔽了，美国人的疑虑也消除了。

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伞兵和三路地面部队突然越过埃以边界，随后穿过西奈半岛，逼向苏伊士运河，向埃及发起突然袭击。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了，埃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直到战争爆发当天的中午，摩萨德才向美国中央情报局电告了实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直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当时杜勒斯就气得大发雷霆，当着助手的面怒吼：

“他们把我们骗了！”

苏伊士运河战争结束之后，哈雷尔又全力以赴，领导摩萨德投入到追捕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的行动中。他发誓要亲手将这个对600万犹太冤魂负有主要责

任的纳粹头目捉拿归案。

第四章 万里奔袭阿根廷 捉拿纳粹艾希曼

600万犹太同胞惨遭屠杀，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罪不可恕，战后销声匿迹，隐姓埋名阿根廷15年后露出马脚；摩萨德闻讯派出特工前往阿根廷，经过缜密侦查终于锁定目标；由12人组成的特遣行动小组万里奔袭来到阿根廷，摩萨德局长亲自出马现场指挥，艾希曼束手就擒。

热带美女爱上了纳粹头目的儿子

自以色列建国后，为了给二战期间的犹太死难者复仇，以色列情报组织一直在世界各地不遗余力地追捕前纳粹战犯。经过多年的努力，这项工作终于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尤其是1961年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

曼的追捕堪称是最精彩的一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共屠杀了600万犹太人。而大屠杀的执行者之一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他对犹太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阿道夫·艾希曼于1906年3月19日在德国出生，8岁时随父母迁居到奥地利。成年后艾希曼一直碌碌无为，曾当过吸尘器的推销员。1932年，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后开始发迹，终于成为党卫军的一员。1934年，他被任命为纳粹达豪集中营的头目，不久就加入了盖世太保司令部的犹太人事务部。

从1934年出任党卫军“犹太科”科长起，艾希曼就成了纳粹德国解决“犹太问题”的专家。1936年，他又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部的头目，积极主张对犹太民族实行所谓“彻底解决”方案。

为了掌握对付犹太人的手段，艾希曼曾不遗余力地向众位纳粹头目“学习”，甚至还去巴勒斯坦搜集情报。1938年，艾希曼被派往奥地利，其后又被派到捷克斯洛伐克，专门负责对付犹太人。不久，他又被调到东欧的纳粹占领区。1942年他又去了波兰。此时，他已经拥有了直接驱逐犹太人、屠杀犹太人的大权。在匈牙利，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动物曾下令驱逐和屠杀65万犹太人。此外，他也是屠杀200万犹太人的奥

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就是这个刽子手发明了用煤气毒死犹太人的所谓高效率屠杀的手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这个狡猾的刽子手并没有像其他纳粹高级官员一样被同盟国军队逮捕，也没有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到审判，而是利用纳粹德国战败前夕的混乱，多次改变身份，乔装打扮，巧妙地逃脱了一次又一次追捕。艾希曼先是乔装成伐木工，在德国吕内堡海德的一个偏僻村庄隐匿了四年，然后出逃到意大利热那亚。直到1950年6月，他才像许多漏网的纳粹分子一样，来到了南美的阿根廷。

在二战中备受凌辱的犹太人，当然不会忘记艾希曼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这一事实。多年来，以色列所有的情报机构一直在为寻找这个恶魔不懈地努力。直到1957年，摩萨德终于发现了艾希曼的蛛丝马迹。

摩萨德获得艾希曼藏匿在阿根廷的消息实属偶然

1957年的秋天，居住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的阿利沃斯区的罗泽·赫尔曼，同一位叫尼克的小伙子相爱了。罗泽·赫尔曼是一位漂亮迷人的热带美女。她身材窈窕多姿，有着一头深栗色的秀发和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在她的身边永远有一群痴情的追求者，然而她却对尼克情有独钟。

那位叫尼克的年轻人大约二十来岁，同样是长得一表人才，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显得是那样与众不同。不过罗泽·赫尔曼当时对尼克的身世并不清楚，只知道他出生在德国。为了打动姑娘的芳心，在一次又一次的约会时，尼克竟主动在罗泽·赫尔曼面前炫耀，说自己的父亲曾经在德国军队里当过大官，在西欧各国的许多地区任过职，当年曾经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青年时的阿道夫·艾希曼



有一次，他们无意之中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谈到了第三帝国中那些犹太人的命运。当时尼克就非常傲慢地说，德国人当时应该把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斩

尽杀绝，而不应该半途而废。因为像犹太人那样的劣等民族，永远是这个世界上的累赘。

尼克的这番话让美丽而又善良的罗泽·赫尔曼大吃一惊，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钟爱的这个年轻人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她自己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就是犹太人的血。既然尼克如此瞧不起犹太人，那自己还有什么必要再同他交往下去呢？当然，她并没有同尼克进行辩论，只是心事重重地和尼克告别了，这一次充满浪漫色彩的约会最终不欢而散了。

罗泽·赫尔曼回到家里，还是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细心的母亲似乎看出了女儿的心事，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罗泽·赫尔曼终于和自己的父母第一次谈起了自己的男朋友，提起了那个奇怪的尼克。

她对父母说，虽然那个尼克一直在拼命向自己献殷勤，但是他从来不邀请自己上他家去玩，去见见他的父母和家人，甚至连他家里的地址也不告诉自己。每次罗泽·赫尔曼给他写信，都是寄到他的一个朋友那里，然后由他的朋友转交给他。所以罗泽·赫尔曼就觉得这个尼克很是奇怪。特别是他今天的那番话，更让罗泽·赫尔曼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年轻的尼克为什么对犹太人有这样可怕的偏见呢？

罗泽·赫尔曼的父亲洛塔尔·赫尔曼恰好就是当年奥

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幸存者，在集中营里，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德国的那些刽子手屠杀自己的同胞。看到他们把一群群脱光了衣服的犹太人像赶牲口一样地赶进毒气室，还看到他们用大铲车把成堆的犹太人的尸体推进焚尸炉，然后化成一缕缕的青烟。集中营的那段经历就像一场噩梦一样，让他终生难忘。现在听说女儿的男朋友竟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他也觉得不可思议。又听说那个叫尼克的年轻人出生在德国，罗泽·赫尔曼的父亲想，如果这个年轻人要是出生在二战时期，肯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一个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所以他就叫女儿多提防点，这样的人不能深交，更不能做自己的女婿。

有一天，罗泽·赫尔曼的父亲让自己的老伴给他读报，当这个老洛塔尔·赫尔曼听到报纸上说，现任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的弗里茨·鲍威尔博士，正在寻找漏网的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时，赫尔曼一下子愣住了。平时他也曾听到传闻，说那个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好像也到了阿根廷，正隐藏在这里。于是他不由得心里一动，马上联想到女儿的那位奇怪的男朋友。他怀疑那个叫尼克的年轻人，是不是跟阿道夫·艾希曼有关。于是，赫尔曼马上就让女儿带着自己，按照以前给尼克写信的地址，找到了尼克的朋友家。然后从尼

克的朋友那里，知道了尼克家就住在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于是他们马上驱车前往，找到了那里，发现上面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罗泽·赫尔曼和她的父亲一打听，知道房子的主人名叫弗朗齐斯库·史密特。这时老赫尔曼心里一动，他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回到家里，他立即让妻子给那位德国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写了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

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同样也是个受过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那些至今还逍遥法外的纳粹头目，成效甚微。那些狡猾的纳粹头目好像一个个人间蒸发了一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让他很是沮丧。虽然他以前也曾多次收到这样的检举信，但是等到一调查，却又成了子虚乌有的无头案。但是弗里茨·鲍威尔博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的心愿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现在当他收到了这样一封很有价值的信时，他的心情又一次激动起来。但是，他没有马上把这封信交给德国当局。由于他对德国当局的失望，他将这条有价值的新线索秘密地报告给了以色列。结果这条消息很快就转到了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的手中。

那是195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时间已经不早了，

窗外随风摇曳的树枝间闪烁着路灯的余光。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仍然没有回家，他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但是他的内心却很不平静。那是一间简易的办公室，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一切显得那样的朴实无华，就像他的性格一样。

办公桌上的灯光下摆着一封信，下班前刚刚收到的。这是他的老朋友伊特寄来的。伊特在这封信里说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伊特说，德国法兰克福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威尔博士以犹太人的名义向他保证，纳粹德国党卫军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现正藏匿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郊。

在此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经常会收到有关发现恐怖分子藏匿的消息，而后来的调查证明多半是不可靠的。因此，对于伊特信上所说的这个消息，哈雷尔同样无法肯定其真实性。此外，由于摩萨德当前的财力和人力有限，不能马上开展调查，何况这一次说的还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远在南美洲，千里迢迢，如果情报来源不可靠，劳师千里兴师动众，摩萨德损失的不仅仅是人力和财力，还会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非议。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情报十分准确的情况下才能动手。不过，一种职业特工的本能让哈雷尔预感到也许这个新情报的背后大有文章，

何况这条消息所涉及到的并不是别人，而是阿道夫·艾希曼，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

哈雷尔想了想，终于站了起来，离开自己的办公室走进隔壁的机要室，打开保险柜调来了艾希曼的案卷，然后回到办公桌前开始潜心研究起来。对于阿道夫·艾希曼这样一位纳粹德国的元凶，哈雷尔当然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他又认真地审读了有关这位党卫军冲锋队头子的生平及其暴行的一切细节。哈雷尔曾经不止一次审读过关于艾希曼和其他纳粹分子的案卷，每一次审读都让他热血沸腾，国仇家恨时时在心中涌动，好像那600万惨遭杀害的犹太人的冤魂都在他的面前飘荡，让他看到了那一双双黑洞洞的眼睛和那一具具还没有被送进焚尸炉的骷髅一样的尸体。在这个初冬的夜晚，当哈雷尔再一次翻阅这些案卷时，那种幻觉又一次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于是他慢慢地合上那厚厚的案卷，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先派出一个调查小组远赴阿根廷，首先找到那个提供线索的洛塔尔·赫尔曼，核实一下这条消息的准确性，然后再作进一步的调查取证。一旦掌握了真凭实据，哈雷尔就将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亲自出马，把这个藏匿了15年之久的阿道夫·艾希曼捉拿归案，给所有的犹太人一个交代。

他拟订了一个行动方案，连夜向总理汇报。

女特工的生日礼物

第二天，哈雷尔就派出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前往阿根廷着手调查。这个特别行动小组中的一名女特工和两名男特工，都是摩萨德战术行动处里最精干的突击队员。

特别行动小组赶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立即找到提供线索的赫尔曼，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对名叫“达古特”和“克莱门特”的两个人进行秘密调查。但是由于摩萨德的特工人员对阿根廷这一带的情况相对来说比较陌生，所以调查工作进行得很艰难。他们在附近租下了一幢房子住了下来，对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进出的人员进行严密监视，并且进行拍照分析研究。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在去阿根廷之前，哈雷尔就从艾希曼的档案和有关的资料中，找出了艾希曼当年的各种各样的照片，让他们熟悉。包括他当年的身高体重、生活习惯和走路的姿势等等，都让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们了然于心。通过一段时间的监视，终于有许多关于“4261号”的情报和进出人员的照片送到哈雷尔的办公桌上。

但是这些情报和照片都让哈雷尔无法确定这幢房子的主人就是艾希曼，也无法确定那些进出的人员都同他有关。

为了能尽快找到艾希曼的下落，哈雷尔双管齐下，立即又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前往欧洲各国，对艾希曼以前工作过的地方，还有他的家庭和亲属进行秘密调查。如果发现这些人与艾希曼或他的德国妻子维拉有通信往来，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艾希曼当前下落的线索。这项监视性的调查工作量也很大，被调查和监视的对象包括艾希曼82岁的老父亲和艾希曼的四个兄弟。

要完成这项任务确实困难重重，因为哈雷尔对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作了严格的规定，不能让艾希曼本人和他的亲属有任何觉察。如果他们一旦感觉到有人在他身边布下了天罗地网，或者是给他通风报信，那么，这个狡猾的艾希曼又会逃之夭夭，再次藏匿起来。特别是不能让他那些德国的亲属朋友察觉到以色列方面的意图，否则就会一无所获。

被派往阿根廷的以色列特工人员开始分头秘密调查和监视，很快，一份又一份的秘密调查报告源源不断地汇集到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

以色列特工们利用各种巧妙的手法伪装身份，在

各处关系人员的掩护和帮助下，想方设法与在欧洲的艾希曼的亲属、密友和邻居接触。然而，这些人都忌讳提起有关艾希曼和他的妻子、儿子们的情况。所有人几乎都是采取同一顽固态度，对任何与纳粹德国及艾希曼有关的事，都守口如瓶，拒绝回答有关艾希曼的任何问题。至于想从德国官方途径得到有关艾希曼一家的线索，也好像没有多大的希望。因为德国当时在欧洲各国的领事馆，无论如何都不愿意透露艾希曼的妻子维拉的护照是用什么名字颁发的。

那么，仅仅知道艾希曼藏在南美洲，但到底藏在南美洲的哪个国家，行动小组还不能最后确定。尽管那个提供线索的赫尔曼非常有把握地说，那个“4261号”房东弗朗齐斯库·史密特“百分之百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调查证实，发现此人根本就同纳粹毫不相干。一些居民证实，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一直居住在这条大街上，整条大街上的居民连“艾希曼”这个名字都从没听说过。不过，就在摩萨德行动小组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后不久，他们很快就发现，“4261号”的两个房客达古特和克莱门特如今也都已“搬家”，而且“去向不明”，门上的那两块牌子也摘下来了。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这

种情况立即引起了行动小组的注意。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这种所谓的“搬家”完全是一种障眼法，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这幢房子。机智的特工们综合分析了从欧洲调查到的新材料和证据，进一步确定了艾希曼的确就隐藏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时他们还得到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由于艾希曼不愿与他家人长期分离，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要隔一些日子就会设法与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们生活在一起。看来现在只有在他的家人身上找到突破口，看他什么时候会和家人在一起。

不过要找到这个“突破口”谈何容易啊！

他们想利用那个美丽的少女罗泽·赫尔曼做诱饵，利用尼克的那个朋友的地址继续给他写信，约他出来谈情说爱，然后从中套出他父亲的行踪。但是现在这条路也行不通了。这时不要说尼克，就是连他的那个朋友也突然失踪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尼克和他的朋友同样不会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

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特别行动小组的那位美丽的女特工迪娜·罗思突然想出了一条妙计。因为根据摩萨德特工人员掌握的材料知道，这一年的3月3日是阿道夫·艾希曼的另一个儿子的生日，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找到艾希曼的那个儿子，借口给他赠送礼物，应该不

会引起别人注意。一旦找到了艾希曼的那个儿子，再通过他儿子的关系顺藤摸瓜寻找艾希曼的下落就不难了。经过商量，特别行动小组都认为这倒是个办法，可以让迪娜·罗思试一试。

于是迪娜·罗思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高级旅馆租下了房间，然后在商店买了一个高档打火机，用一个很精致的礼品盒装好，并且在礼品盒里面附上了一张不署名的生日贺卡，迪娜·罗思在生日贺卡写上：“真诚地祝愿亲爱的朋友生日愉快！”然后又在外面的包装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了：“阿利沃斯区查尔布科大街4261号克莱门特先生收”。

迪娜·罗思准备好这个精致的小礼物之后，就在这家旅馆里物色了一个机灵的小听差，请他当一回信使。迪娜·罗思把这个礼品盒亲手交给了那个小听差，并对他说：“请把这个小礼品盒按照上面的地址送给一位有修养的绅士，但千万别让他知道是谁送的，也绝不能让旁人得知此事。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事成之后，我会付给你一笔可观的酬金。”

此时迪娜·罗思又假装是一个十分痴情、又不甘愿单相思的高贵女子，小声地对小听差说：“这不过是一件意外的生日礼物，我想让他喜出望外。”同时还一再叮嘱这位小信使：假如收件人已经搬家，你一定要设

法打听到他的新住址。这样，即使礼品送不到，也同样会付给可观的酬金。

聪敏伶俐的小听差对这趟差事十分感兴趣。他耐心而仔细地听完了迪娜·罗思教给他的找人的方法，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神秘而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里，扮演着一个传送情感的重要的小角色。而这样的角色自己以前也曾扮演过，因为在这个阳光充足而又充满浪漫情怀的南美大都市里，这样的故事是经常发生的。

小听差找了个机会溜出了那家高级旅馆，然后就毫不费劲地找到了查尔布科大街上的4261号，门上那块“克莱门特宅”的牌子已不翼而飞。他使劲地喊了几声，也没有人回应。小听差就推开院子的小门，径直走进屋子。房子里的门窗都开启着，他看见油漆工正在里面忙碌着。一打听才知道克莱门特全家都已搬走了。4261号住宅已经换了主人。房子的新主人只是听说原来住在这里的人搬到圣费尔南多区去了，但不知道他的确切住址。遵照迪娜·罗思事先的吩咐，小听差不厌其烦地向周围的邻居挨家挨户打听，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克莱门特一家搬到哪里去了。最后，他好不容易从一个干瘪的德国老太婆嘴里了解到，前不久她还看到了搬走的那户人家的一个儿子，在离查尔布科

大街不远处的一个小工厂干活。小听差一听真是喜出望外，他谢了谢那个德国老太婆，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很顺利地找到了那家小工厂。

那个德国老太婆嘴巴里所谓的小工厂实际上是个大作坊，外表看上去很是简陋。那个小听差小心地推门进去，只见几名技工正忙得不亦乐乎。这时，他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大约二十岁左右的金发小伙子，正弯着腰在走廊里干活，他有着一副典型的德国人长相。小听差马上走过去对那个小伙子说：“先生，我有一样东西要交给这个人，他的姓名和住址就写在上面。我知道你一定能帮我这个忙，并且一定不会拒绝。”

小听差边说边将手中的礼品盒递给对方，又接着说：“我按这个地址找到他的家，那里的人说他一家早已搬走了。后来街上的一位老太婆告诉我说，搬走的那个人家的一个儿子就在这里的工厂干活。先生，你认识此人吗？”

金发小伙子端详着礼品盒上写的字，又把它翻来覆去看了看，然后带着一种疑惑的口气问道：“谁打发你送来的？”

“我也不太清楚，这是我的一个朋友转交给我的。他说在他干活的那家旅馆住着一位漂亮而又高贵的女子，就是她请我的朋友帮忙转交的。可是我那位朋友

刚好有事不能离开，碰到我之后，就转交给了我，让我帮他送一下。”

小听差按照迪娜·罗思教他的话，回答得头头是道。

“我还是想知道这是谁送的礼物！”金发小伙子执拗地重复着说。

小听差猜想这个小伙子或许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或许知道自己要找的人在什么地方，就说：“先生，我的任务只是帮人把东西交到收件人的手上，那个漂亮而又高贵的女子的名字也许就写在里面呢！我又不能随便拆开别人的礼品，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这是起码的做人的道德，所以我也无法告诉你她叫什么名字。我想那个收件人打开以后，一切就都明白了。”小听差一本正经地说着。

金发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小听差，没有吭声。

这时那个机灵的小听差已经知道这个小伙子就是真正的收件人。但是他还是故意地说：“先生，也许您认识这个人，那么就请您告诉我这个人的地址，我自己去找他，让我亲手交到他的手中吧！我想这个礼物对那个人来说，也许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意义。”小听差恳切地探询道。

“你就把东西交给我吧。”小伙子一边说，一边就从小听差的手中接过了那个礼品盒，然后看了他一眼接着说，“放心吧，我会帮你完好无损地送到。”说着顺手就把这个礼品盒放到了自己的工具包里。

小听差一见，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就非常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先生！我应该怎样感谢您啊！”

小伙子似乎笑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个漂亮的手势说：“不用谢了。如果你碰到什么麻烦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这儿找到我。”

“那好！请原谅我打扰您了。再见！”

小听差很有礼貌地向那个金发小伙子告别了，然后就走了出去，并且记下了这家工厂的门牌号码。他急匆匆回到了旅馆，向迪娜·罗思详细地报告了他完成这趟差事的经过。他不知道自己自作主张，贸然把那个礼品盒交给了那个陌生的金发小伙子对不对，心里忐忑不安地担心自己的赏钱会不会落空。

哪知迪娜·罗思非常仔细地倾听着小听差叙述的每一个细节，并没有责怪他的冒失，末了还慷慨地给了小听差加倍的酬金。小听差这才高高兴兴地走了。他哪里知道，自己今天的的确确是帮了这个女子一个大忙。因为迪娜·罗思这时完全可以断定，接受礼物的那个人正是失踪多时的“克莱门特”的儿子，也正是自己

和特别行动小组多方寻找的人。

通过那个小听差的描述，迪娜·罗思马上断定，那个金发小伙子肯定就是那个美丽的少女罗泽·赫尔曼的意中人尼克。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那么尼克的父亲“克莱门特”就一定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知道了克莱门特儿子的确切工作场所，便可以通过他找到克莱门特，然后就可以证实他到底是不是潜逃了多年的阿道夫·艾希曼。

拍下了艾希曼的照片

当天晚上，一份秘密报告通过密码电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传到了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见到这份报告后，简直是乐不可支。他中断了其他工作，立即组织增援力量赶赴阿根廷，帮忙寻找那个克莱门特。这时他心中已经有了一种预感，那个化名为克莱门特的人，一定就是艾希曼。

当天，哈雷尔就刻不容缓地制定了逮捕艾希曼的行动计划，等到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的假设一经证实，就马上付诸实施。他随即对潜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下达指令——立即落实克莱门特的身份。

特别行动小组接到哈雷尔的指令后，就请罗泽·赫尔曼小姐出马，先确定那个金发小伙子的身份。那一天，特别行动小组把罗泽·赫尔曼小姐请到一辆小轿车上，把车子开到那家工厂附近，然后在旁边的一个公交车站旁边静静地等待，等待那个金发小伙子下班后从工厂里走出来。没过多久，那个金发小伙子走出了工厂的大门，来到公交车站准备坐车回家。这时，坐在后座的罗泽·赫尔曼一眼就认出来，这就是失踪多时的尼克。她马上对坐在旁边的迪娜·罗思说：“没错，就是他。尼克！”

迪娜·罗思点了点头，用力握紧了罗泽·赫尔曼的手。因为迪娜·罗思发现，罗泽·赫尔曼的手在剧烈地颤抖。然后她把罗泽·赫尔曼紧紧地抱在怀里，用一只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此时，车上的人都在偷偷地注视着向公交车站走来的尼克。迪娜·罗思发现，这个尼克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帅气逼人，怪不得美丽迷人的罗泽·赫尔曼会钟情于他。这时她不禁回过头看了一眼，发现罗泽·赫尔曼虽然多日没有见到尼克，但是，此时她的眼睛里不再有那种少女的温柔，而是一种仇恨的目光。因为她现在已经猜到了，尼克从前多次在自己面前炫耀的那个“德国军官”的父亲，原来就是屠杀600万犹太同胞的最主要的凶手。



公文包式复制照相机

尼克上了公交车，特别行动小组的小轿车悄悄尾随其后，很顺利地找到了尼克刚刚搬到圣费尔南多区不久的新家。尼克下车后，漫不经心地走进了靠近树林边的那幢平房，甚至还吹着欢快的口哨。他一点也没有觉察到，后面不远处的那辆小轿车和他有关。

尼克现在住的这幢房子很旧，简陋而颜色暗淡，孤零零地坐落在公路边的一片树林旁边，没有左邻右舍，要想在这里隐姓埋名躲避起来，倒真是一个理想的地方。第二天，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的特工人员就开始对这幢房子进行监视，他们带上一部配有望远镜

头的莱卡照相机和一部公文包式的照相机，租借来一辆汽车，驱车驶到离那幢平房约50米远的地方。一名特工下了车，他打开车盖，弯身像是在检查汽车发动机是否发生故障。另一名留在车上的特工用莱卡照相机对房子拍了一张照，把房子的整个布局拍摄了下来。看上去，住在里面的人十分寒酸，并不像骄横跋扈、高傲自大、奢侈腐化的艾希曼的住处。负责监视平房的特工人员心里有些怀疑是不是弄错了地方。再说，小平房邻近地区十分荒凉，除附近另外有一幢小屋和一个小亭子外，在方圆数百米的范围内看不到别的房屋，这也为监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他们接连监视了几天，房屋的男主人一直都一直没有露过面。后来他们又经过多方打听，才得知，原来这幢房子的男主人正在阿根廷的图库曼省休假，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特别行动小组马上将这些情况向哈雷尔作了汇报。哈雷尔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拍摄到一张克莱门特的照片，确定他是否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为了得到这张照片，哈雷尔决定自己亲自到阿根廷去一趟。几天以后，哈雷尔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对监视住宅的特工作了必要的技术上指导，然后让他们耐心等待。他对部下断言：这个克莱门特如果真是阿道

夫·艾希曼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在3月21日回家来。因为根据艾希曼的有关材料记载，1960年3月21日将是艾希曼和他妻子的银婚纪念日。由于他的家庭观念非常重，所以哈雷尔相信，这一天他肯定会回来的。

果然在3月21日那天中午的11时45分，一辆公共汽车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加里保迪大街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缓步朝着克莱门特家的方向走去。只见这个男人穿着一条笔挺的咖啡色裤子，灰色的风衣，里面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此人年纪约五十多岁，已经谢顶了，但是剩下的几缕淡黄色的头发却梳理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他戴着一副眼镜，手持一束鲜花，迈着一种训练有素的步伐向这幢房子走去。通过对这个人的年龄特征、衣着打扮、走路的姿势和气质风度来分析，隐藏在暗处的特工人员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于是他们立即把他拍摄下来。

哈雷尔想要的证据终于到手了。他立即返回以色列，先派人把照片送到实验室，与艾希曼的旧照片进行比较；同时，把现在的照片送给以前见过艾希曼本人的人进行辨认。但是辨认的过程不太顺利，因为艾希曼的旧照片质量很差，而亲眼目睹过艾希曼的人又不多。不过，无论是通过实验室的科学鉴定还是让见

过艾希曼的人辨认，结果都确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藏匿了多年的阿道夫·艾希曼！

这样的结果让哈雷尔非常高兴，他再次向总理本-古里安进行了汇报。他对总理说，逮捕艾希曼是摩萨德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艰巨的任务。他想再次前往阿根廷，亲自指挥这次捕获行动。

本-古里安总理当即表态：“我完全同意你的安排。你就亲自去一趟吧，一定要把他弄到以色列来。活的更好，死的也行！”

“你的党卫军证号码是多少”

捉拿艾希曼的行动已经确定，关于捉到了艾希曼将其运送回以色列收审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已经得到法学家的肯定回答，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他运送到以色列来，还有运送工具。以色列离阿根廷有1.8万公里，就是飞机也要花二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而且越境抓捕艾希曼这样重大的事必须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准，这种事弄不好就会影响两国关系，酿成政治事件。因此这件事情必须秘密进行，绝对不能惊动阿根廷官方。哈雷尔最初考虑是派专机运送，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告诉他，以色列航空公司暂时还

没有开辟直接飞往南美区域的航线。如果真的需要这样做，可以以开辟航线作首次试航为理由加开一班航机。航空公司董事长这个想法倒是可以考虑。不过，哈雷尔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还是不妥。因为时下正是旅游高峰时期，新开辟一条航线进行试航人多眼杂，不免引人猜疑。

于是哈雷尔又想到了海运。但是他又觉得速度太慢，而且沿途要停靠几个外国港口，同样会惹人注意，比空运更为危险。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在哈雷尔为运送的事大伤脑筋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报纸上的一条新闻。那条新闻说，1960年5月25日是阿根廷国庆50周年纪念日，举国上下正在操办国庆5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已经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了参加5月25日庆祝活动的邀请。哈雷尔当即从外交部方面获悉，政府方面对这次派人员前往南美参加国际活动十分重视，准备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赴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立即向外交部建议，应派一架专机运送以色列代表团去阿根廷参加庆祝活动，这样不但可以提高以色列的国际威望，而且对定居在南美洲的那些犹太人也是一种鼓舞——当然他并没有透露自己真实的想法，是想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搭一次“顺风

车”——后来他又和总理本-古里安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在本-古里安的协调下，以色列外交部果然采纳了哈雷尔的这个建议，让这架专机返航时顺道将阿道夫·艾希曼带回以色列。专机返航时间在5月11日，抓捕时间定于5月10日。

哈雷尔又找来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当面向他们直接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也预料到将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不然，这个大权在握的摩萨德局长不会对自己这么客气。他答应愿为哈雷尔和他手下人员提供航空公司可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就在离开哈雷尔的办公室的时候，那位董事长还回过头来问哈雷尔：“是和艾希曼有关吧？”

哈雷尔摊了摊手，什么也没说，只是笑了笑。

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引起阿道夫·艾希曼的警觉再次逃脱，哈雷尔最后决定，须在5月10日前将艾希曼抓捕到手，然后搭乘以色列代表团的专机回国。

哈雷尔马上组织了一个特遣队执行绑架任务。特遣队由11名摩萨德特工组成，全是经过哈雷尔精心挑选的精干人员，他们都有在阿拉伯国家或世界其他地方出生入死的经历。在挑选这些队员时，哈雷尔还附加了一个特别的入选条件，那就是特遣队的这些队员

必须是当年纳粹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或者是他们有亲属死于纳粹之手。这样为了抓住阿道夫·艾希曼这样的刽子手，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甘愿牺牲，以命相搏。

11名特遣队员手执不同的护照先飞往欧洲各地，然后从不同的方向飞往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哈雷尔给他们规定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合的时间和地点，自己则率领3名特遣队的成员手持完全能以假乱真的护照，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圣费尔南多区的小旅馆里住下来。在规定的时间内，特遣队的其他成员也准时进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按事先的规定在圣费尔南多区其他的小旅馆里分散居住下来了。有的一个人住在一家旅馆，有的两三个人住一家旅馆，好像互不相识一样。

现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在这些日子里，化名为克莱门特的艾希曼处在摩萨德特遣队的全天候的监视之下。特遣队的队员们已经完全掌握了艾希曼的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天都在晚上19时40分左右，准时地乘坐203路公共汽车，在加里保迪大街的那个公交车站下车，然后步行几分钟回家。一直从事谍报秘密工作的艾希曼当然懂得隐身之道，潜伏到阿根廷后，他不但改名换姓，而且经常变换地址，日夜提

防犹太人的追杀。所以他最近的这一次搬家，完全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既定内容，并不是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此时的艾希曼完全不知道以色列的摩萨德特遣队已经悄悄地撒下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大网，他现在已经是在网中之鱼了。

然而，就在特遣队实施抓捕的日子临近的时候，一个意外出现了——阿根廷政府的礼宾部门突然通知以色列观光代表团，由于组织方面的原因，请以色列代表团把抵达时间延迟至5月19日之后。据称，唯有这样，才能保证对以色列官员“隆重而体面”的接待。这个通知对哈雷尔他们来说，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麻烦。抓捕绑架行动如果延长，夜长梦多，艾希曼说不定就会乘乱溜走。但是，抓到了艾希曼之后，距以色列代表团专机的到来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怎样才能把艾希曼在阿根廷的首都藏上一周，而又不让阿根廷警察发现蛛丝马迹呢？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哈雷尔当机立断，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另外租了两处公寓，预备用作隐匿艾希曼的场所。其中一间是一所乡村别墅式的建筑，距艾希曼现在的住宅约有30分钟的车程，代号为“宫殿”；另外一间则在城市中心。哈雷尔故意让一对摩萨德特工夫妇搬去居住，甚至还特意购买了几件

时髦的新式家具，装成是在这里长住过日子的样子。因为抓到艾希曼之后，他们还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上一个星期，等待以色列的班机，这个“宫殿”就是艾希曼的囚禁室。一旦艾希曼的失踪引起了阿根廷当局的注意，他们就可以把艾希曼秘密地关押在这里，以便及时转移。哈雷尔的指导思想是狡兔三窟，万一阿根廷警方发现艾希曼失踪后，来一个全城大搜捕，他们就可以及时转移，这两处藏身之所就是他们的避风港。

行动在即，哈雷尔在代号“宫殿”的寓所里召集了一次会议，命令这次行动由摩萨德最优秀的特工彼得·马尔金具体负责实施，并要求那些直接参与绑架行动的特工人员务必小心谨慎，使绑架行动出色完成。万一失手被阿根廷警方逮住了，就要一口咬定自己是出于对纳粹罪犯的刻骨仇恨而自行采取行动，从未受任何人或任何组织指使。哈雷尔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如若发现艾希曼逃脱，企图寻找阿根廷警方保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当机立断把他击毙。在这次会议上，哈雷尔还让所有的行动人员把艾希曼的照片拿出来，再熟悉了一遍；然后又与行动小组的特工们最后一次讨论了绑架艾希曼的行动计划，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命令所有的人一定要做到万无

一失。深思熟虑之后，哈雷尔决定把行动时间推后一天，定为5月11日，并新买了一辆八成新的“别克”牌轿车作为应急车。



抓捕艾希曼的特工马尔金

1960年5月11日19时25分，执行任务的特工们准备就绪后，分乘两辆汽车驶向目的地。这时离艾希曼平时回家的时间就只有十来分钟了。由彼得·马尔金带

领的第一辆车子，停在离203号公路口大约10米远的加里保迪大街上，他和另一名特工一起走下车来，假装汽车出现了故障，打开引擎盖，摆弄发动机，好像在排除机器故障，等待艾希曼走过来。彼得·马尔金向后走了40步，测量预计和艾希曼相遇地点的距离。然后，他又回到车子的左侧，也弯下腰去像是在研究发动机，两眼却高度警觉地注视着远方。车上的另外两名特工人员则坐在车里，头贴着车窗，窥视外面的动静。第二辆车子则停在202号公路上，车头正对着这个路口。一名特工也在那里一本正经地装作排除汽车故障，而坐在车上的特工人员则睁大眼睛，盯着公共汽车站的方向。他们的任务就是等到艾希曼一出现，就立刻将汽车前面的两只远照灯调到最大的亮度，使他在雪亮的灯柱里眼花缭乱，不走得很近很近，就无法发现前面的第一辆汽车，以便第一辆车子上的人接近他。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公共汽车已经过去了两趟，可艾希曼却迟迟不见人影。彼得·马尔金手上的夜光表指针已经指向了20点5分。是不是艾希曼发生了意外，还是他嗅到什么味道逃走了？第二辆车子上的行动负责人埃勒达德有点焦躁不安，他在用袖珍无线电对讲机请示哈雷尔，得到的答复是：5分钟内如果不

见“猎物”，即全队撤回。但是，埃勒达德等人怎么也不甘心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去。

就在这时，又开来了一班公交车，一名乘客在街边的公交车站下了车，慢慢地走下站台。

“就是他！”一个摩萨德特工悄悄对身边的埃勒达德耳语道。这时埃勒达德也同时发现，在朦胧的夜色中，艾希曼正向他们走来。

“开灯！”随着埃勒达德一声低沉的命令，两束强烈的汽车灯光直射到艾希曼脸上，把他照得眼花缭乱。

随着第二辆车子的灯光一亮，第一辆汽车上的特工人员也完全做好了准备。彼得·马尔金假装散步，快步地向艾希曼走去。这时竟然刮起了大风，远方电闪雷鸣，眼看一场大雨就要来临。只见艾希曼习惯地缩在大衣内，衣领翻起，双手插在口袋里，顶着大风稳步朝彼得·马尔金迎面走来。但是由于灯光太刺眼了，他根本没有发现前面的来人。这时两人之间的距离还相距不到15米，彼得·马尔金已经听到对方的脚步声。艾希曼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但他双脚落地仍然很有力气，而且有规律，这都是当年正统的军事操练的结果。

猎物就在面前，而且近在咫尺，彼得·马尔金不由

得心激动起来。他加快了脚步朝对方走去。就在离对方只有5米远的时候，彼得·马尔金用简单的西班牙语低声喝道：“不许动！”

艾希曼一怔，镇静地收住了脚步。他的目光透过黑框眼镜，认真地打量着迎面而来的彼得·马尔金。面对这样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艾希曼似乎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他突然惊慌失措，双脚向后退了一步，转过身来，准备向旁边的树林子逃遁。

但是还没有等艾希曼完全反应过来，身手敏捷的彼得·马尔金已经迅速冲了过来，伸出一条有力的臂膀，从后面将他一把抱住，然后用另一只手准确地锁住了艾希曼的喉骨，将他制服了。就在这时，第一辆车上的特工飞快地赶过来增援。几个人把艾希曼抬了起来，转瞬间就把他塞进了车的后座。待在车上的特工此时已经发动了汽车引擎，迅速向夜色中冲去。整个行动从开始到结束还不到一分钟。

第二辆汽车上的特工看见第一辆汽车亮起了车灯向前开去，也立即尾随其后。然后第二辆车子又加快速度，超过第一辆汽车，为它在前面开道。两辆车子按照预定的路线，向“宫殿”前进。

此时，车中的艾希曼已经被五花大绑，手锁脚镣。他的头部一直被一名摩萨德的特工粗壮的大腿紧

紧夹住。车内没有任何人讲话，他听到唯一的一句话是用德语说的：“别动，否则立刻干掉你！”

大约20分钟后，汽车驶入“宫殿”的院子，摩萨德特工人员关好房门，第一次仔细地看从车上拖下的这个大名鼎鼎的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头目。艾希曼这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一副疲惫不堪而又绝望的样子。让摩萨德特工感到意外的是，艾希曼此时却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合作态度。在他们面前，这个神经紧张、语言悲怆的老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年身着党卫军军服、令无数犹太人恐怖万分的纳粹头目的威风。他们很难想象，面前这个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到令人肉麻地步的人，竟会是那些差点儿征服了全球的纳粹党党魁之一。

艾希曼被拖到房间中央，东倒西歪的。他的身上还穿着大衣，眼睛已经被护目镜盖着，看不见抓他的人。一个特工走上前去，脱去他的衣服，给他套上根据他身材买来的睡衣。然后两名特工挟持着他，把他放倒在那张铁床上，他的一条腿被用铁镣锁在床架上。

“你叫什么名字？”一名特工用德语厉声地问。

“里卡多·克莱门特。”对方这样回答，声音很低，显然很虚弱。

负责审讯的特工又问了他的衣着的各种尺寸，回答与档案记载的完全吻合。

“脱掉他的衣服看一下！”那位负责审讯的特工改用英语喝道。

彼得·马尔金等人迅速把艾希曼的衣服脱光，举起了他的左臂。在应该有个标示血型的刺花地方，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小小的疤痕。疤痕已经不太清晰，但还是可以辨别出来与档案里记载的图形一模一样。这种刺花就是当年纳粹党卫军组织的血腥符号。这时哈雷尔和他的手下终于放心了，眼前的这个家伙就是真正的阿道夫·艾希曼。

“你的党卫军证上的号码是多少！”审讯的特工单刀直入。

艾希曼此时已经完全明白眼前发生的事了。他知道，再也没有必要隐瞒事实的真相，一切都是徒劳的。于是他毫不迟疑地答道：“45526 和 45326。”

“你的社会党党员证的号码是多少？”特工人员继续问道。

“889895。”对方的声音像是重症病人发出的痛苦呻吟。

实际上，单凭这个回答和那些尺寸上的号码，就可以证实眼前这个化名克莱门特的人就是罪恶滔天的

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因为没有人能这么熟悉艾希曼在纳粹党内的编号。尽管如此，摩萨德特工还是想从对方口中证实所掌握的情况。

“你什么时候来阿根廷的？”

“1950年。”

“很好！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你的真实名字是什么？”

艾希曼这时全身颤抖起来。沉默了好一阵子，他才结结巴巴地说：“阿道夫·艾希曼。”

说完，他全身一阵痉挛，差一点昏过去。

阿道夫·艾希曼终于被哈雷尔和他的手下成功地捕获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他从阿根廷成功地运送到以色列去接受审判。哈雷尔把看守艾希曼的任务交给几名训练有素的特遣队成员，他自己带着其他的特工人员，去对运送一事进行安排。

哈雷尔知道，这个运送的任务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那么，不仅达不到他们此行来阿根廷的目的，说不定连他和他们国家的声誉都将会受到影响。

第五章 哈雷尔功成身退 马尔金史上留名

艾希曼终于被推上了被告席，他的罪行被记录成3000多页的卷宗，站在特制的防弹玻璃罩里接受犹太人正义的审判，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亲手擒拿艾希曼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功成名就，从此被称为“摩萨德历史上最出色的特工”。

艾希曼成了“脑震荡病人”

1960年 5 月19日，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团的成员们下了飞机后，就住进了阿根廷为他们早就安排好的国宾馆去了，准备参加25日的隆重庆典。这时，艾希曼已在哈雷尔为他专门准备的“宫殿”里平平安安地被关

押了8天。

现在，哈雷尔并不担心艾希曼的失踪会引起阿根廷警方大规模的搜寻。因为他早就分析过了，艾希曼突然失踪后，他的家人也不敢声张，更不敢去报警。因为他们是以假的姓名身份隐居阿根廷的，是非法的，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被警方查出来后，招来地方当局的惩罚，所以他们即使是要去寻找，也只能是到一些靠得住的老朋友或熟人家里去询问。而此时艾希曼的那些纳粹党朋友也不敢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这些人现在首先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如果他们猜到艾希曼已经被捕获了，肯定会想到自己的前程，恐怕早就溜之大吉了。

事实证明哈雷尔的推测完全正确。在这8天的时间内，外界没有任何有关艾希曼的传闻，也没有任何不相干的人光顾这间“宫殿”。

因此，哈雷尔就利用这8天的时间，做好了解运艾希曼的一切工作。他打算让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们都穿上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制服，同时给艾希曼也套上一件，让他也冒充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雇员。然后全部人马乘坐机组人员的专车直抵机场。只要一上了他们自己国家的专机，那就算大功告成了。

哈雷尔早就得知，以色列代表团的成员在参加阿

根廷的国庆庆典后，都不会坐专机从原路返回以色列，他们将从阿根廷去美国访问，可能还会去其他的地方。所以这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专机就成了他们押运艾希曼的专机了，这一切都给押送艾希曼回以色列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哈雷尔一再强调，在对飞机进行全面技术检查和机组人员休整时间，有关机组人员必须毫不松懈地对飞机实行保护性监视。

为了防止艾希曼在机场通过最后一道检查口时狗急跳墙，向阿根廷执勤人员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哈雷尔早就有了周密的考虑。5天前，他就在随队军医的建议下，让一名摩萨德特工住进了当地的一家医院，病因是他在一次“车祸”中得了“脑震荡”。这位“病人”住院后，必须表现出他的智力状况每天都在缓慢地好转。这样，他就可以得到一份由阿根廷医院签署的医疗证明，和一份允许他返回他的祖国以色列“继续治疗”的许可证。

经过5天的准备，这一切都如期完成了。那个“病人”刚一出院，所有的出院文件和疾病证明都交到了那位精于伪造证件的摩萨德特工手里。两个小时之后，阿根廷那家医院开具的所有文件和证明书上，都被换上了艾希曼的照片和姓名。现在，即使阿根廷警方拦住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专车挨个检查证件，

特遣行动小组的特工也能对“机组成员”艾希曼神志不清的神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且能递上一张真正的医院诊断证明。

当时哈雷尔还想了一招。出发前几天，他让一些队员天天晚上光顾附近的一家小酒店，并且在那家酒店每一次都装成喝得酩酊大醉的样子，然后深更半夜地扶醉而归，在大街上又唱又闹招摇过市，让其中的一个人装成醉得人事不省的样子，由其他的几个人抬着回旅馆，并且故意在那些巡逻的阿根廷警察面前经过。

开始一两次那些巡逻的警察还在干涉，公事公办地检查他们的证件，后来看到那几个人天天都是如此，那些警察也就见怪不怪了，几乎连问都不问一下，甚至还觉得这些人有点可笑。

哈雷尔当时为什么要想到这一招呢？原来他做好了两手准备，担心万一艾希曼到时候不配合装不成“病人”，他就准备把他灌醉，然后把他像抬一个酒鬼一样抬上飞机。不过后来这一招还是没有用上。从到机场一直到后来通过安检直到上飞机，那个艾希曼一直都“配合”默契，并没有露出破绽。

1960年5月20日20时，在那幢秘密的乡间别墅中，摩萨德特工做好了把艾希曼带出阿根廷的最后准

备工作。他们给艾希曼套上了“埃勒·粤勒”航空公司的制服，特遣队的医生将一针特制的麻醉剂注入他的肌肉中。10秒钟以后，艾希曼就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只能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行走。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成了一个典型的脑震荡患者。

到达机场后，哈雷尔便让同事把机场候机室餐厅角落的一张饭桌全部占满了，以防止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他知道这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一直都得小心谨慎。摩萨德特遣队的队员都在候机大厅等待检查，他们的周围是几百名正在进餐的机场工作人员、各国旅客和阿根廷的边防警察。通过机场护照检查的时候竟然出人意料地顺利，边检人员甚至对这位“脑震荡患者”表示了友善的同情。最后，这些使用假护照的以色列特工以及艾希曼全部通过了海关和护照检查。哈雷尔不由得轻轻地出了一口气。然后他们就全部顺利地登上了停机坪上那架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

刚一上飞机，两名摩萨德特工便把艾希曼塞进位于飞机前部的头等舱室。在艾希曼的周围，坐满了“机组其他成员”，他们一个个佯装呼呼大睡。这时，哈雷尔还吩咐飞机驾驶员减弱了舱内的灯光。在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的面部都变得模糊了。为了对付阿根廷

方面对飞机可能的“例行检查”，哈雷尔不愿冒任何风险。此时的哈雷尔失去了以往一贯的沉着与冷静，急切地盼望飞机的起飞。据哈雷尔事后回忆，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挨的时刻。

5月21日零点，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塔台向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布列塔尼亚”号专机发出了“起飞”的命令。

在飞机上，机长经哈雷尔的同意，向机组人员宣布了此次飞行的特殊意义。有几位机械师和机组人员得知抓获了屠杀犹太人的凶手艾希曼之后，竟激动得抱头痛哭起来。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亲属和家人就是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死去的。

经过漫长的空中航行，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的这架“布列塔尼亚”号专机终于顺利降落在以色列的利达机场。

被告席上的防弹玻璃罩

哈雷尔在机场上把一切安排妥当，让随机的摩萨德特工人员看管已经苏醒过来的艾希曼，他自己则立即驱车前往总理官邸。他知道本-古里安总理正在办公室等他。

“我终于把阿道夫·艾希曼带回来了。他踏上以色列的国土已经有两个小时了。要是您批准，我就把他立即移交给以色列警察局。”

哈雷尔十分兴奋地向本-古里安总理汇报。

本-古里安总理虽然也很激动，但他却沉思着，没有马上表态。过了一会儿，他才简单地问了一句：“你能完全肯定他的身份吗？”

“绝对肯定。”哈雷尔回答得果断而又干脆。

“那么由法官签发逮捕令。我同意把这名纳粹罪犯移交给稽查总监，然后由我们国家的司法部门去审判他的罪行吧！”本-古里安总理下了命令。

5月23日，本-古里安召开以色列内阁部长会议，把摩萨德在阿根廷捕获艾希曼的情况通报给了部长们。当天下午4时，本-古里安在议会大厅正式宣布这条消息。

由于工作关系，作为以色列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很少在公开场合露脸，但是这一次他却在本-古里安总理向议长提出要在议会上发言的前5分钟，悄悄地步入议会大厅，在内阁成员席后面的非内阁成员席上坐了下来。此时议会大厅里鸦雀无声。摩萨德最高首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一双蓝眼睛直视前方。

本-古里安总理用充满激情的声音庄严宣布：“尊敬

的议长和议员先生们，我必须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不久前，以色列特工部门在南美洲某个地方找到并且抓获了罪恶累累的纳粹罪犯阿道夫·艾希曼。现在，艾希曼已被拘押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不久，一个由犹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对艾希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审判……”

本-古里安总理的话犹如雷鸣闪电一般，很快从以色列议会大厅传遍了全国，甚至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整个以色列沸腾了，全世界的犹太人在欢呼。本-古里安自己也激动万分。这个从14岁开始就投身犹太复国运动、被人称为有着“钢铁般意志”的犹太政治领袖，这一次竟克制不住自己，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了。

这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把目光移向了哈雷尔。此时的哈雷尔与直接参与这次捕获行动的特工人员当然同样是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然而，他们内心却涌动着复杂的感情。多少个难以成眠的日日夜夜，还有那在阿根廷茫茫人海中的无数次大海捞针一样的搜捕……

但是此时此刻，哈雷尔却一句话也不想说。

艾希曼被秘密地押解到以色列之后不久，阿根廷就向联合国正式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指责以色列绑架

了它的一名公民。以色列当即致歉，但艾希曼仍然被拘押在以色列。后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了决议，认为艾希曼“因其被指控的罪行而应该受到正义的审判”。阿根廷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

1961年4月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接受审判，被以“反人道罪”等15条罪名起诉。这次审判引起国际注目。由于有不少的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为了防止在旁听席上的听众过于激动而会当场刺杀艾希曼，在法庭审判时，法警们不得不特地制作了一个上面敞开的防弹玻璃罩，这个玻璃罩很大，足可以容纳艾希曼和两名卫兵。艾希曼就站在那个特制的玻璃罩里接受审判。艾希曼面对其犯罪的控诉，都以“一切都是依命令行事”来回答。到后来，在审判的法庭上，面对那血渍斑斑的如山铁证，这个当年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头目艾希曼竟然良心发现，带着一种忏悔的口吻说：“我早应该把子弹射进我自己的脑袋。”

在无次数的审判中，旁听席上的听众由于忍受不了触目惊心的事实，竟有人不止一次地晕倒在法庭上。600万惨死在纳粹党卫军之手的犹太人的冤魂，终于又一次听到了正义的声音。

1961年12月，以色列最高法院最终判定阿道夫·艾

希曼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大批犹太人的直接责任者，以“反犹罪”、“反人道罪”和“参加犯罪组织罪”等罪名判处阿道夫·艾希曼有罪，并判处死刑。以色列法庭为他做了3000多页的案情记录，完全符合史实，他可谓死有余辜。

1962年5月31日，阿道夫·艾希曼被处以绞刑。艾希曼在临刑前对押解他的一个以色列官员说：“我对你们的工作表示佩服。以我本人在警察和特工部门的经验，你们这次抓捕办得很在行。”

——这位以色列官员叫艾坦，若干年以后，他当上了拉卡姆的局长。

6月1日早晨，太阳还没露出地平线，濒临地中海的以色列海法港外的海面波光粼粼，碧波万顷。一艘以色列海军小艇风驰电掣般地冲向大海。当小艇驶出以色列领海时，一名戴白手套的以色列海军军官把一个铁皮罐抛入茫茫大海。旋即，小艇转头返航。被扔入大海的铁罐里装着艾希曼的骨灰，以色列人要把骨灰抛在远离海岸的波涛中，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的头号敌人的骨灰玷污犹太人神圣的故乡。一场曾缠绕了千千万万犹太人的噩梦结束了。

对情报机关来说，追捕阿道夫·艾希曼实际上是谍报史上典型的秘密情报活动之一：特工在千里迢迢的

海外活动，使用伪造证件旅行，凭自己的智谋行事，最终抓获了寻求的目标。此类行动通常都会有失算和不走运的情况，而每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使整个行动付诸东流。所以，在制订方案、部署行动以及一系列的步骤和细节中，“追捕艾希曼”这一行动都具有值得研究的、十分迷人的纯间谍技巧性问题。

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下场震惊了全世界。摩萨德由此引起了国际情报界的刮目相看。哈雷尔以其高效率的谍报工作，为以色列情报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些成就不仅仅让世界认识到了摩萨德的神通和能量，而且也为他本人赢得了“情报天才”的美誉。几乎所有国家情报部门的首脑都对哈雷尔及其特工才能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敬意，摩萨德也被国际情报界公认为“胆子最大、雄心勃勃和十分内行的情报机构之一”。

亲手将艾希曼成功擒获的摩萨德特工彼得·马尔金也由此名声大振，被人称为是“摩萨德历史上最出色的特工”。他的这一壮举书写了他特工生涯中最漂亮的一笔。

马尔金是出生在英国的犹太人。1930年，他随家人搬到波兰与亲戚一起生活。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前，他和母亲及时逃离了波兰，来到现在的巴勒斯坦

地区生活。马尔金的姐姐和其他亲戚因为签证的原因没能离开波兰，最终不幸死于纳粹大屠杀。得知这一噩耗的马尔金发誓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雪恨。

马尔金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犹太人地下组织。1950年，他加入摩萨德成为一名特工。马尔金在摩萨德一共服役了27年，于1976年正式引退。在公开的业绩里，除了亲手擒获纳粹头目艾希曼以外，他还曾抓获一名混入以色列高层的外国特工，并阻止了一些纳粹核科学家在二战后参与埃及武器发展计划的企图。鉴于他出色的表现，马尔金曾两次获得以色列最高荣誉——“以色列总理奖章”。

马尔金在服役期间，为了掩人耳目，经常更名改姓、乔装打扮，因此获得了“伪装大师”的称号。他曾装扮过艺术家、码头装卸工、飞行员和商人，而他的国籍也一会儿是法国，一会儿又变成了德国或者美国。马尔金曾经说过：“我大约使用过30多种不同的伪装方式。有时候连我的母亲、妻子和朋友也被我弄得晕头转向。”

1976年，马尔金离开摩萨德后，开始钻研绘画和写作，并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他曾在巴黎、伦敦、东京等地举办过画展，还曾卖出过300多幅油画和素描。马尔金最有名的作品是他在阿根廷执行任务期

间，用油画棒和水彩笔画在一本《南美导游手册》上的画，画面上描绘了马尔金的一些亲属，以及阿根廷庆祝独立150周年的场景。

除了绘画以外，马尔金还酷爱写作。1980年，关于马尔金的一部纪实小说在整个欧洲流传开来，人们这才知道原来他就是亲手逮捕艾希曼的人。马尔金最著名的一本书是他在1985年出版的回忆录，书名为《艾希曼在我手中》，此书还被拍成了电影。

后来，这位传奇的特工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77岁。在他身后，留下了许多耐人回味的故事。

马尔金应该是哈雷尔任职期间，摩萨德特工中最传奇的人物之一。

哈雷尔呈交了一封辞职信

抓获阿道夫·艾希曼之后，身为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似乎已经走上了事业的顶端。在此前后，他还干过许多让人吃惊的事。

1956年，他领导的摩萨德特工，曾经成功地从东欧驻苏外交官手中，窃取了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的全文，并由哈雷尔亲自前往美国交给中央情报局处理。

20世纪60年代初，一批德国导弹专家进驻埃及。埃及总统纳赛尔希望德国人能帮助他的国家发展能够用于未来埃、以战争的地对地导弹。哈雷尔确信，德国又一次加入了旨在灭绝犹太人的重大行动。为此，他展开了“达摩克利斯行动”。

以色列特工人员向那些德国科学家及他们的家人寄发内设陷阱的邮件，类似的恐吓活动遍及了整个欧洲。这一次，哈雷尔重新使用了曾于1956年成功使用过的方法。当时，按照“阿穆恩”局长哈卡比的命令，邮包炸弹被寄到了那些负责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派遣恐怖分子的埃及情报官的手中。在以色列情报机关针对恐怖主义进行的第一轮暗杀中，两位埃及高级情报官遇害。

在那些针对德国科学家的行动中，有几人受伤，更多的人则遭到了恫吓。但是，哈雷尔觉得他与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因为这位总理不断地提醒他，不要惹怒了联邦德国政府。本-古里安实际上是在说：“别碰那些德国人。”

为了迫使那些德国科学家撤出埃及，哈雷尔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哈雷尔得知马德里的纳粹军官奥托·斯科曾尼与一些驻开罗的德国科学家是朋友，于是派了一个特工小组冒充北约组织情报机构的代表去同斯科

曾尼见面，劝说斯科曾尼为了西方的利益敦促他的朋友撤出埃及。这在摩萨德内部人员中引起了不安。因为斯科曾尼同阿道夫·艾希曼一样曾经服务于纳粹。哈雷尔宣称斯科曾尼只是一名德国老兵，而不是一名战犯。

不但如此，哈雷尔还策反了一位在埃及为纳赛尔工作的导弹科学家，这就是奥托·乔克利克博士。乔克利克博士是奥地利人，他是一名弹道学专家，更是一位冒险家。

哈雷尔劝乔克利克为他服务，这样他便可以在从埃及挣得的大笔工资的基础上再从以色列人手中挣得一大笔收入。这位奥地利人成了摩萨德的密探。离开开罗以后，他飞抵以色列，对埃及秘密导弹工程的情况作了全面介绍。乔克利克警告说，埃及正朝着这样一个危险的目标疾步迈进：发展专家们所说的“最基本”的打击力量。他们的计划是研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这些大规模破坏武器可以装在德国设计的导弹上。这位奥地利人的话与哈雷尔的担心完全吻合。

在职业情报官当中，哈雷尔独立处理问题的习惯可谓有口皆碑。正是由于这一习惯，他没有把乔克利克来以色列的情况告诉国防和安全机关领导层中的任

何人。但是，国防部副部长西蒙·佩雷斯却有他自己封闭的情报界内线，从那里，他获悉哈雷尔的计划 and 这位科学家的情况，于是坚持要见乔克利克，以便国防部要员向他询问情况。

哈雷尔拒绝了。他坚持以色列情报界的传统：各机构一般不交换秘密情报的提供者。共同分享的是情报，而不是提供情报的人。知道他们的人越少，他们就越安全。

佩雷斯在本-古里安面前大发牢骚，并威胁要辞职。“老人家”以总理的身份命令哈雷尔允许国防部接触乔克利克。作为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将审问的任务交给了绝密机构拉卡姆的负责人宾亚明·布卢姆伯格。由于布卢姆伯格的人员中有些就是科学家，所以他们有资格判断哈雷尔的观点——埃及即将拥有威胁以色列生存的基本打击力量正确与否。这一点自然激起了哈雷尔对布卢姆伯格和佩雷斯前所未有的憎恨。

布卢姆伯格的分析人员否定了乔克利克提供的有关所谓埃及导弹工程威胁情报的真实性，他们的结论是，这位奥地利人的科学家身份值得怀疑。

然而，哈雷尔仍然确信纳赛尔正在策划想要毁灭以色列的行动，他仍然相信乔克利克。哈雷尔派了一位名叫约瑟夫·本-盖尔的以色列人与乔克利克一起前往

瑞士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他们的任务是恫吓海迪·戈尔卡——一位为埃及导弹工程工作的德国科学家的女儿。他们对海迪·戈尔卡说，如果她父亲不立即离开开罗，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海迪·戈尔卡向瑞士警方报了案。1963年3月15日，瑞士警察在巴塞尔一家旅馆附近逮捕了这两位摩萨德间谍，并对他们进行公开审判，这使以色列非常难堪。他们最后被判处短期监禁。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一个大错误。

尽管如此，哈雷尔还是认为有必要采取公开行动，证实德国人和埃及人并未停止合作，在瑞士审判期间也有必要进行一些解释工作，让全世界，起码让以色列人民相信这一点：纳粹后裔还在以埃及作为基地进行导弹研究，并以此威胁他们刚刚建立的国家的命运。

于是，哈雷尔开始寻找记者作为摩萨德间谍前往欧洲对那里的媒体进行宣传工作。有3位以色列高级记者在他的鼓动下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搜集更多的有关那些德国科学家的情况。

让以色列记者充当间谍，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二个大错误。这些“半摩萨德”记者不停地发表有关导弹威胁的文章，这在以色列公众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慌。本-古里安非常恼火，他指责哈雷尔私自向报界透露消

息，损害了以色列与联邦德国之间正在发展的外交关系。那时，由于戴高乐对以色列逐渐冷淡的态度，以色列极度需要把联邦德国视为可以代替法国的新盟友。

可是，作为情报机构的首脑，哈雷尔并不关心外交上的考虑或联邦德国对于本-古里安新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而是坚持实施他的行动计划。这是哈雷尔犯下的第三个大错误，从此他和总理本-古里安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了。本-古里安要求哈雷尔停止其私自组织的讨伐行动，哈雷尔则予以拒绝。他想从本-古里安的工党其他成员那里获得支持，并试图把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和财政部长列维·艾希科尔拉到自己一边。

除此以外，本-古里安与哈雷尔之间在其他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前面讲到的哈雷尔反间谍的事件就是一例。哈雷尔热衷于捉蛀虫，但是捉到总理的头上了。由于比尔是总理的密友，当比尔被确定为间谍而被抓捕的时候，本-古里安十分不快，因为这极大地扫了自己作为总理的面子。

本-古里安也开始为哈雷尔拥有的过高权威而担心。哈雷尔运用总理给予的权力发展了摩萨德的也是他自己的威望，他起码坚信这样一点：作为梅穆内，他是不可替代的。这让本-古里安受到了权力上的挑

战。

就这样，以哈雷尔攻击那些德国科学家为导火线，两位老朋友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巨大裂缝，洪水冲入了这一裂缝，摧毁了他们之间曾经非常牢固的相互信任的关系。

1963年3月25日，乔克利克和本-盖尔在瑞士被捕9天之后，哈雷尔呈交了一封辞职信。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应该休息了。然而，促使他下台的原因却纯粹是由于自己过分热爱本职工作，对于犹太人的利益过分专注让他办事有些过了头。

伊塞·哈雷尔在摩萨德局长位置上达11年之久，是摩萨德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局长。哈雷尔以其对摩萨德乃至整个情报界的杰出贡献，最终获得了“摩萨德教父”的美名。他是以色列摩萨德真正的奠基人。

第六章 走马上任阿米特 外交策反两成功

阿米特成为第三任局长后，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的“131部队”并入摩萨德成立的行动处，使摩萨德的行动如虎添翼；巧施“美人计”，成功策反伊拉克王牌飞行员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架先进的苏制“米格-21”战斗机；23年后再次成功策反叙利亚空军少校，又一架“米格-23”战斗机飞到了以色列。

阿米特把“131部队”并入摩萨德

哈雷尔功成身退之后，摩萨德走马换将，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梅厄·阿米特将军成了摩萨德的第三任局长。

阿米特原名梅厄·斯芦茨基，1926年出生于巴勒斯

坦太巴列地区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同巴勒斯坦地区许多的犹太家庭一样，阿米特的家人也是千里迢迢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的。

阿米特早年曾在加加利地区的阿洛尼姆集体农庄工作，后加入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当年曾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刺探情报。1944年，阿米特成为哈加纳的一名连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以色列自1948年建国以来，与周围阿拉伯各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就从未停息过。上个世纪50年代，阿米特曾先后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步兵部队和坦克部队中任职。这位年仅20岁出头的年轻军官生性好战，且勇猛过人。他从来不愿意待在后方，总是要求到前线去带兵打仗；而在前线的每次战斗中，他又总是身先士卒。只要是进攻战斗，阿米特就会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来”，便不顾一切地第一个冲上去，表现了一种军人的阳刚之气。

当时以色列的军队士气极高，像阿米特这样的勇敢军官也为数不少。后来为了激励士气，“跟我来”便被确立为以色列军队基层分队的战斗信条，阿米特也就成了“跟我来”原则的创始人之一。

从此，年轻的军官阿米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

且很快就成了当时的以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将军的好友。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开始前，他被达扬选做随从参谋。不久，阿米特就出任西奈战场南部军区司令。1958年，他因在进行跳伞训练时受伤而到美国休养。作为一名年轻的以色列军官，阿米特并不满足于匹夫之勇，他利用在美国休养的时间潜心攻读，终于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他还同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1960年，阿米特回国后被任命为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穆恩”的军情处长；1962年又接替哈伊姆·赫尔佐格将军，成为阿穆恩第六任局长。

在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期间，阿米特曾设法缓解军事情报局与摩萨德之间的争斗。他上任伊始就公开提出：“在保卫犹太人的工作中，各情报组织不应该互相敌视，而应该密切合作。”然而，他却与时任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在对情报工作的看法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思维方式也格格不入。结果闹得两大情报机构间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更加升级。

阿米特刚出任摩萨德局长时，仍兼任军事情报局局长一职，这为他解决这两个情报机构的矛盾、协调两个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问题提供了方便。在此期间，阿米特把阿穆恩负责海外行动的“131部队”并入摩

萨德，并与摩萨德内部的两个比较小的行动机构合并为“行动处”，从而使摩萨德海外行动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和提升。

阿米特出任摩萨德局长后，对摩萨德以前的一些工作方法进行了改革。他认为必须以对原始的情报材料的系统性分析，代替对人的直觉的依靠。他虽然把军事情报局采用的计算机先进技术引进了摩萨德，但同时还是特别强调人的重要性。他说，谍报工作是“一种智力斗争，技术运用及其他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同时他又指出，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的因素，情报界更是如此”。

阿米特的这些理论和后来的实践，对摩萨德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任职期间，他把摩萨德的海外任务扩大到更大的领域，从而使摩萨德的“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几乎变成了以色列的秘密外交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胜过以色列的外交部。当时，同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外交联络时，往往不是由以色列的外交官员出马，而是由摩萨德驻该国的特工出面。这一现象当时被人们称为以色列的“准外交”活动。当年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提出的“外围战略”构想，在阿米特任期内得到了实现，

以色列同非洲的摩洛哥、肯尼亚、扎伊尔、利比里亚和加纳都与摩萨德建立起了良好的情报合作关系。摩萨德的特工常常以以色列农业、工业和商业专家、顾问的身份打入到非洲的十几个国家，进行情报渗透和交流。后来，摩萨德又抓住各种机会，与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起了友好合作关系，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摩萨德的海外活动空间。直到今天，东南亚的某些国家仍然是以色列摩萨德特工的活动基地。

但是，就在阿米特要将他的这一“准外交”活动继续引向深入时，不想却招致了一场麻烦。

1966年，一位与埃及高层官员相识的外国犹太商人给阿米特捎来一个重要的口信，说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副手哈金·阿玛尔陆军元帅愿意在开罗同他举行秘密谈判。听到这个消息，阿米特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是，当他向总理列维·艾希科尔提出这件事时，却遭到了再度出山的伊塞·哈雷尔的否决。哈雷尔立即向犹豫不决的艾希科尔总理解释说，开罗会谈的建议极有可能是埃及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他提醒艾希科尔总理说，如果阿米特在开罗被捕或者是受审，他就可能在对方的威逼下供出以色列的重要机密。于是，艾希科尔总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次和谈的机会。

几十年后，阿米特仍然为此感到万分的遗憾，认为如果他当初秘密飞往开罗，1967年6月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许就能避免。当时，以色列同埃及和叙利亚边境的局势极为紧张，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之际。这时，阿米特既然被迫放弃了和谈尝试，那只好将摩萨德的“准外交”活动转向战争了。

“准外交”和“六日战争”

1967年5月下旬，埃、叙联军大兵压境，阿以战争迫在眉睫。但是当以色列军队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后，埃、叙联军却按兵不动。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以色列作为一个小国家，无论是从哪方面都是久耗不起的。为了打破这种被动的局面，他们准备主动发起进攻，以早日结束这种僵局。但是投鼠忌器，以色列又担心自己的主动进攻会招致苏联的干涉，于是阿米特便秘密前往美国寻求支持和谅解。得到了美国的无言的承诺后，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主动开战，结果仅用了6天时间便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这就是现代中东史上有名的“六日战争”或者叫“六五战争”。当时战争打响后，时任摩萨德局长的阿米特还致信给约旦国王侯赛因，企图离间约旦与埃及的关系。

当然，“六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有赖于摩萨德成功的“准外交”活动，还有赖于它所提供的有关埃及空军的精确情报。

当时摩萨德特工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向以色列军方建议，对埃及进行空袭的最佳时间应该是早晨7时45分。因为那个时候对方的飞行员正在吃早餐，空防警戒松懈，而值班人员正在进行交接班，地勤人员正把飞机拖向跑道，一切都正处于无序状态之中。于是，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群就带着炸弹和情报部门提供的目标清单，于1967年6月5日7时45分准时飞抵埃及11个机场及雷达站的上空，在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奠定了整个战争胜利的基础——埃及空军的飞机和地勤设施，还有那些雷达防空设施，很快就被以军飞机轰炸殆尽。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约旦军队也受到了类似的致命打击。

当时以色列可供使用的作战飞机共有196架，另外还有12架战机也已经编队在空中集结待命。在特拉维夫时间7时45分，以色列的第一批幻影式战机和神秘式战机就飞抵轰炸目标上空。为了绕过设在苏伊士运河的埃及雷达监视网，还故意绕了一个大圈子，取道西奈半岛居民区和军事区之间的沙漠荒地和山区峡谷，飞到地中海上空，然后以超低空的高度分别从亚历山

大西部飞到开罗机场，从塞得港北部飞到苏伊士运河区机场。这时，埃及机场上一架架米格式战机和索科尔式战机都毫无隐蔽地暴露无遗，甚至连机衣都取下了；同时他们也没有任何对付空袭的防御，机翼挨着机翼，一行行的战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等待来自空中的轰炸。

当以色列的第一批战机在轰炸和扫射目标的同时，以军的第二批战机已经在航途中，而第三批又开始起飞了。就这样，从早晨7时45分开始，到10时35分结束轰炸，以色列共出动战机17批次，以每批次不到10分钟的间隔起飞，对开罗、苏伊士运河附近和西奈地区的十多个最重要的埃及机场以及萨姆-2型导弹基地进行狂轰滥炸，投下了大量的重磅炸弹，几乎将其全部摧毁了。埃及的空军被认为是对以色列最大的威胁，这时所谓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解决了埃及的空军之后，以色列又对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的空军下手了。到6月6日傍晚为止，以色列歼灭阿拉伯国家的飞机416架，其中有393架是在地面被摧毁的。而以色列自己则仅仅损失了26架战机和21名驾驶员。这种悬殊的反差实在是令人震惊。

仅仅经过6天的较量，第三次中东战争就结束了。

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三个国家共阵亡官兵2万多人，受伤和被俘6万多人，而以色列仅阵亡809人。通过这次战争，以色列侵占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城的约旦管辖区、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达6.5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它战前面积的4倍。“六日战争”中最大的受益者除了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独眼将军”摩西·达扬之外，摩萨德局长阿米特也由此声誉大振。

美女特工找到了“猎物”

阿米特在摩萨德局长任职期间，正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初露端倪之时，为了有力地打击这种新出现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阿米特为摩萨德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行动方针。后来，当阿米特退休的时候，许多西方情报机构的首脑还纷纷致信给他，高度赞扬阿米特，认为他成功地遏制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并为全世界的“反恐”树立了典范。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以色列士兵



“米格-21”战斗机

摩萨德在阿米特的主政下，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成绩。其中最精彩的一页就是在1963年，摩萨德特工

利用“美人计”，一举成功地策反了伊拉克王牌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使以色列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架先进的苏制“米格-21”战斗机——也是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战斗机。摩萨德的这次成功简直就是给以色列注射了一支兴奋剂，让举国上下为之一震。

在196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庆20周年庆典的阅兵式上，当一架架法国制造的幻影式战机从观礼台上隆隆飞过，最后消失在天际时，一架涂有以色列国旗和以色列军用飞机标记的飞机又出现在空中。这架飞机的出现，立刻引起了在场观众的疑惑，同时也立即在世界同行中引起了一阵轰动——因为这架飞机并不是以色列空军装备的幻影式战机，而是一架苏制“米格-21”战斗机！

“米格-21”战机是苏联研制并生产的，它是米高扬设计局的杰作，在当时是全世界速度最快、设备最先进的攻击型的喷气式战斗机之一。1955年第一架“米格-21”诞生时，它以优良的战术性能、轻巧、灵活、爬升快、跨音速和超音速、操纵性能好、火力强等多种优势，被“北约”取了个绰号“鱼窝”。当时即使是在苏联，也只有那些最优秀的空军中队才拥有这种飞机，就连“华沙条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空军部队，都没有装备这种战机。在20世纪60年代，“米格-21”成了苏军

的主力战斗机，最多时装备了2500架以上。

当年，苏联为了在中东地区施加其影响，曾在1961年以“绝对保密”为条件，向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提供了几架“米格-21”战机的样机。至于西方国家和以色列，对“米格-21”战机则几乎是一无所知。当年苏联把“米格-21”战机派往国外时，采取了极为严密的安全保密措施。他们规定，这些样机必须是在苏联顾问和克格勃特工的监督之下，才能训练阿拉伯飞行员；而那些接受苏联训练的飞行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另外，有关飞机的安全、空勤和地勤人员的训练以及飞机维修等工作，也全部都由苏联人负责，阿拉伯人不能轻易插手。总之一句话，从“米格-21”战机来到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第一天起，就被严格控制在苏联派出的顾问、飞行员和特工的眼皮底下，不曾离开他们的视线半步。

然而，就是在如此严密的措施下，这架先进的“米格-21”战机还是在以色列的国庆阅兵式上空出现了。当那架先进的“米格-21”战机从观礼台的上空骄傲地呼啸而过时，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不由得在一片欢呼声中，把手中的帽子和鲜花抛向空中，有的人甚至在人群中相互拥抱起来。

可是，就在这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却有一个

人，默然无言地注视着天空，就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那架熟悉的“米格-21”战机飞向天际，最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个人就是伊拉克人穆尼尔·雷迪法。

穆尼尔·雷迪法曾是伊拉克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两年前，就是他驾驶着这架“米格-21”战机飞出了伊拉克，悄悄地降落在以色列的一个秘密机场。

穆尼尔·雷迪法当年是伊拉克最有经验的老飞行员之一，而且还是伊拉克的一名空军少校，时任伊拉克空军大队长。他生活在伊拉克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一家人都信奉基督教，父母及家人都是天主教“马龙派”虔诚的教徒。但是在伊拉克，那些非穆斯林信仰者是受歧视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居住在伊拉克的犹太人曾遭到大批的屠杀。他的父母虽未受到迫害，但对伊拉克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憎恨感，甚至产生了远离伊拉克的愿望。不过他们的儿子穆尼尔·雷迪法却没有这种想法，因为他是在阿拉伯学校接受教育的，后来从军后又受到了重用，驾驶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让他有了一种做人的尊严和优越感。

那么，穆尼尔·雷迪法为什么会驾着“米格-21”战斗机离开自己的国家伊拉克，而投奔到以色列呢？

根据摩萨德秘密档案材料的记载，当年促使穆尼

尔·雷迪法离开伊拉克的原因有二：一是穆尼尔·雷迪法的飞行大队曾参加过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村民的轰炸及扫射，他对政府的这一做法感到极为不满，同时也为自己参与这一屠杀事件感到内疚和沮丧。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据说是因为他对苏联派来的顾问和专家在训练伊拉克飞行员时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专横颇为反感。

然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摩萨德官方档案不便记载的原因——那就是这个穆尼尔·雷迪法少校当时不幸中了摩萨德精心策划的“美人计”，被摩萨德的特工成功策反过来了。

据现有的资料显示，当年策反伊拉克空军少校雷迪法叛逃的计划，的确是摩萨德的一个重点行动，时任摩萨德局长的梅厄·阿米特当时还亲自把这次行动命名为“首饰行动”。

摩萨德的这次“首饰行动”，并不是局长阿米特一时的心血来潮。尽管关于“首饰行动”出笼的背景有多种说法，但其中最值得取信的一种，也许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一种说法是：1965年1月的一天，以色列空军司令埃泽·魏茨曼来找阿米特将军。他对阿米特将军说：“我需要一架货真价实的‘米格-21’战机，你能办得到吗？”

阿米特将军沉思了片刻，说：“好吧，让我们来试试看。”

当时魏茨曼领导下的以色列空军，是一支精干且很有战斗力的队伍，被称为“以色列的长臂”。其主力飞机是法国的“幻影III”战斗机。以色列空军当时也正是凭借着这种先进战斗机，在周围的几个阿拉伯国家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不过，后来周边的一些阿拉伯国家有了这种先进的苏制“米格-21”战机，这位空军司令感到有了一种威胁，所以才对摩萨德局长提出这种难以实现的要求。

但是，由于以色列国家的特殊性，使它的情报部门从来没有拒绝过军队的任何要求。尽管空军方面提出的这个要求相当棘手，但阿米特却没有犹豫，他必须考虑并尽可能地予以满足。于是，他立刻指令摩萨德行动计划处的沙龙处长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其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劫持一架“米格-21”战斗机。

当时为了实施这个“首饰行动”，特别行动小组曾设计了三种方案：空中拦截“米格-21”，并迫使它在以色列降落；派一名摩萨德特工以飞行员的身份打入某一阿拉伯国家空军，并设法驾机飞回以色列；收买一名阿拉伯飞行员驾机叛逃到以色列。对这三种方案进行比较后，他们认为最后一种方案难度很大，因为阿

拉伯飞行员都享受着最好的待遇，金钱的诱惑不大容易打动他们，但是与前两种相比，该方案却具有简洁快速的特点，因此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择。至于选择哪个国家下手，最后该小组组长断定，还是在伊拉克动手相对容易一些。

此时，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掌握了大量有关各阿拉伯国家空军的情报，摩萨德情报搜集处的电脑中存储着敌方飞行员的详细资料。该处一名工作人员曾自豪地说过：“我认识数百名阿拉伯飞行员，不仅知道其飞行训练状况，就连他们每个人的爱好及私生活，我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在对伊拉克空军中符合条件的飞行员进行严格的侦查、摸底和筛选后，摩萨德最终选中了伊拉克空军大队长穆尼尔·雷迪法少校。不久，摩萨德就派遣了几名经过精心挑选的特工，利用他们手中那种能以假乱真的假护照，以不同的身份和化名来到西欧各国，然后又由那些国家先后来到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去对付他们共同的“猎物”穆尼尔·雷迪法。

到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后，这些身份不同的特工又以各种“偶然巧遇”的方式，设法与雷迪法及其家人相识。当时在这些特工当中，有一位出生在纽约的犹太女郎，不仅年轻貌美，而且还有好莱坞女明星的气质风度，她的化名为“莫妮卡”。关于她真实的身份和

姓名，至今仍然是一个秘密。据说当年雷迪法被成功策反之后，恼羞成怒的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极力想搞清这位“莫妮卡”的真实身份，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这位“莫妮卡”当时持有美国护照，是这次“首饰行动”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正是这位犹太女郎的出色表演，才使得此次行动完美无缺。

当年在一次有伊拉克军政要人参加的招待会上，莫妮卡巧妙地结识了年轻英俊的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这位飞行员一见到莫妮卡，立刻就被她那迷人的容貌和非凡的气质所倾倒，对莫妮卡可谓是一见钟情。雷迪法与莫妮卡频频约会，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

在多次的谈话中，莫妮卡很快就发现，这个雷迪法确实非常同情库尔德少数民族，一谈到当时屠杀库尔德地区那些山民的话题，雷迪法的表情就非常痛苦，连声音也变得颤抖起来，脸上总是显出一种难以控制的激动。莫妮卡知道雷迪法虽然是阿拉伯人，却不是穆斯林，他和他的家人都信仰基督教，并且忠诚于基督教义。他的信仰和他在伊拉克所遭到的歧视，使他很容易同情那些同样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或事，尤其是对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的问题，雷迪法一直认为伊拉克当局的做法实在是不妥。既然库尔德人已

经属于伊拉克国，那么政府就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应当享受与阿拉伯人同等的待遇。但是一直以来，库尔德人却始终都是国内受歧视和欺压的对象。所以，雷迪法就毫不掩饰地说，库尔德人的叛乱完全是由政府一手造成的。国家出现这种局面，政府应该从自身寻找原因，进行深刻的反省，从而改变原来的民族政策，并且做一些必要的让步，通过谈判得以和平解决。可政府不但不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什么错误，反而还大动干戈，屠杀那些善良的库尔德人。这样的结果只会加剧库尔德民族的反抗情绪，让现有的动乱和不安长期延续下去。这种局面对维护国家的安定团结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

对雷迪法这种出于正义和人道主义的批评和愤怒，莫妮卡也是从内心真诚地表示赞同。于是她也趁机谈起了美国的黑人问题，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对于美国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强烈不满。思想上的一致让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使得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不过对于莫妮卡来说，当时她尽管是负有特殊使命，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接近雷迪法的，但是她与雷迪法之间的那种情感和共鸣，多少还是有一点真诚的成分。

在后来的谈话中，莫妮卡又巧妙地将话题转到阿

拉伯世界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上。让莫妮卡没有想到的是，雷迪法也向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雷迪法说：“也许是由于自己的出身和信仰基督教的关系，我生来就喜欢同情弱者。以色列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人口也不过几百万，但是为了生存，却不得不顽强地对抗着周围几亿的阿拉伯人。这对他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性的灾难。”

雷迪法的坦诚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见识，让莫妮卡不得不从内心对他产生一种由衷的敬佩之情。当时，她竟然有点儿怀疑自己的动机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对这样一位年轻而又正直的伊拉克军官下手，是不是显得自己有点不光彩甚至是卑鄙。但是，一种摩萨德的使命感，又让她觉得自己现在正是趁热打铁的好机会。现在自己应该充分利用对方对自己的好感，取得对自己充分的信任。于是莫妮卡见机行事，首先是表达了对雷迪法的好感，称赞他是一个心地极其善良的好人，也十分理解他深藏于内心深处但又无法与人言表的那种痛苦，然后，她便顺水推舟地建议他，应该想个办法摆脱这种痛苦的处境，趁自己现在还年轻，早一点改变一下当前的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方式。

没有想到莫妮卡的这个看似善意的建议，倒真的

打动了雷迪法的心。但是雷迪法最后还是很犹豫地打断了莫妮卡的话，对她说，自己现在毕竟是一名伊拉克的现役军人，军人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管自己有什么想法，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他都不能违抗军令。

从雷迪法的话中，莫妮卡注意到他有所动摇了。于是就以一种年轻女性的天真口吻对雷迪法说：“如果你现在就退出军队，不就可以再也不用执行屠杀库尔德人的命令了吗？”

莫妮卡的话刚一说完，就觉得有点后怕，几乎连她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她想，这样说是不是太露骨、太直白了一点。她担心会被雷迪法看出破绽。

但是，事情并没有莫妮卡想象的那么严重。雷迪法并没有从她的话里听出什么弦外之音，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雷迪法沉默了一会儿，还是很坚决地拒绝了莫妮卡这种看似友好的建议。他对这个讨人喜欢的女孩子说，如果自己现在要求退役，一是担心上面不会批准，而且还会引起对自己的某种怀疑；再说，他现在还不想马上就放弃，因为他很喜欢这种飞行生活。

这样的谈话虽然进行过多次，但雷迪法还是难改初衷，达不到莫妮卡所期待的目的。后来莫妮卡想

到，总是这样的“务虚”，也的确是难以奏效。自己不过是他的一个一般的朋友，萍水相逢，雷迪法凭什么听自己的。要想让他就范，莫妮卡觉得有必要给点甜头让雷迪法尝尝。虽然他们认识已经有半个月了，也有亲昵之举，但还从来还没有上过床。虽然雷迪法也曾有过这方面的企图和要求，但莫妮卡每次都以“我完全是为了你的荣誉”而拒绝了。

莫妮卡知道，男女之间的这种风流韵事，在西方国家也许算不上什么，但是在穆斯林的国土上却十分看重。她也实在不愿意为这种事情让雷迪法的声誉受到玷污。不过莫妮卡意识到，再不使出女人的最后一道“杀手锏”，就很难再同雷迪法继续纠缠下去了。于是在一次约会时，莫妮卡就对雷迪法说：“你能不能陪我去欧洲旅行一次？我知道你们飞行员是可以请到假的。”

其实，雷迪法早就让面前这个迷人的女人把胃口给吊足了，这时听到莫妮卡发出了这样的邀请，他立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两人稍作准备后，就一起飞到了法国的浪漫之都巴黎，在一家豪华的高档饭店里住了下来。当饭店的服务生帮他们搬来行李，打开房门之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滚在一起了……

雷迪法终于如愿以偿，从此就与莫妮卡双宿双

栖，难舍难分了。

条件是加付100万美元的酬金和家人的安全

一天晚上，莫妮卡又躺在雷迪法的怀里对他说，她一直在考虑帮雷迪法逃出苦海的办法。因为她现在一刻也离不开他。

雷迪法又深情地吻了吻她，说：“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呢？”

莫妮卡趁机抱着雷迪法说：“我在特拉维夫有一些有趣的朋友，他们或许能够帮助你。你看怎样？”

雷迪法一听“特拉维夫”，似乎就有些紧张。

莫妮卡又吻了他一下，笑着向他保证：“你不要紧张。我们完全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到那里去，飞机票都不用我们掏钱，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我们到那里住些日子，如果你觉得不适应，我们还可以远走高飞嘛。”

雷迪法终于同意试试看。他觉得只要不走漏风声，能够免费到特拉维夫转一圈何乐而不为呢？何况还能讨得莫妮卡的欢心。

一见雷迪法就范了，莫妮卡高兴得就像一个真正的情人一样，抱着雷迪法没完没了地吻了起来——她

觉得哪怕是做戏，也要把戏做足，不能让上了钩的雷迪法再脱钩了。要知道她为了雷迪法的这个承诺，可是花了大本钱啊！

于是几天后，雷迪法和莫妮卡拿着摩萨德巴黎分站提供的假护照，登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飞往特拉维夫的班机。一到以色列，雷迪法就受到了贵宾级的接待。这对他来说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真让他有点受宠若惊又有点意外。尽管莫妮卡一再对他说，这都是自己那些朋友的安排，但雷迪法心里还是有几分不明白。第二天，他们便被安排前往内盖夫的某个空军基地参观。在那里，莫妮卡向雷迪法引见了早已等候在此的摩萨德和阿穆恩的官员。至此，雷迪法终于知道了这位美丽的“美国女郎”的真实身份——摩萨德的女间谍。但是事已至此，雷迪法已经再也没有退路了，何况他内心也实在不想失去这个能让自己快乐的女人。

在后来的几天里，以色列的官员与雷迪法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谈。他们坦率地对雷迪法说，只要他能够驾驶一架“米格-21”战斗机飞到以色列来，他就将会得到100万美元的赏金，他的家人也能得到应有的保护，并且能与其团聚。

就在雷迪法犹豫不决时，以色列的一位高级官员

又对他说，你能为以色列搞到这种飞机，对整个西方盟国反对苏联的斗争将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就不仅仅是一架“米格-21”战机的问题了。也许是这位官员的一番话触动了雷迪法的某根神经，让他感觉到自己将要做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以色列，也是为了反对苏联人。于是他答应了。不过雷迪法却提出加付100万美元的酬金。有人认为这代价太大了些。但摩萨德局长阿米特的态度既坚决又明确，最终由以色列内阁批准了这次“首饰行动”。

为了表明他们许诺的权威性，摩萨德官员又安排雷迪法与新任以色列的空军司令迪凯·霍德将军见了面。同以色列空军司令会谈后，雷迪法对以色列更加佩服。当以色列空军司令亲自与雷迪法研究叛逃计划的一切细节时，竟能随口说出巴格达那些机场的跑道、控制塔、作战指挥室及生活区的详细位置，就像是在说自己国家的机场一样。他们不仅知道雷迪法那个中队所有飞行员及苏联教官的名字，而且对整个机场的情况也了如指掌。

在摩萨德官员的参与下，他们很快制订出一整套行动方案。雷迪法首先要想法找出一个理由，为自己的飞机挂上两个装满油的副油箱，这是远程航行并使飞机完整无损地飞抵以色列的先决条件。因为行动时

他不可能直飞以色列，而只能按照霍德将军为其划定的一条曲折迂回、长达900公里的航线飞行，以避免伊拉克和约旦空军的雷达监视。至于具体行动时间虽然不好事先确定，但为了使以色列飞行员做到心中有数，不致将叛逃的飞机当成敌机击落，还是拟定了几个日期，供雷迪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最后选定。整个计划谋划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几天之后，雷迪法又与其心爱的女友莫妮卡取道巴黎回到了巴格达。

莫妮卡重返伊拉克是为了协助和监视雷迪法的行动。这对她来说，实在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任务。一旦雷迪法回国后变卦了，或者他本身就是伊拉克情报部门设下的诱饵，那么莫妮卡就无异于自投罗网。以色列军方的传统观念是不让女军人投入战斗，但阿米特认为，必要时女特工比男特工更为适合，特别是在单独执行任务时更是如此。摩萨德一向不主张、也几乎从不使用“性讹诈”或者是“性陷阱”等手段，因此世界各情报机构对以色列女特工的防范也要松得多。阿米特与其前任一样，也不强迫他的女特工以色相作为武器，除非她们自己愿意。

雷迪法回巴格达以后，摩萨德立即着手做下列一些工作：首先要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把提供给雷迪

法的现款存进一家瑞士银行；其次就是要将雷迪法所有的家人安全撤出伊拉克。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因为不仅要安全地把他们转移出来，还要保证不能走漏风声，不能让其他的朋友和邻居知道他们就要到外国去居住，并且再也不回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摩萨德决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转移雷迪法的妻子和孩子，第二步再转移他的父母和岳父岳母等人。

回到巴格达不久，雷迪法的儿子就患了“重病”，巴格达一家医院的“医生”开具了证明，认为伊拉克无法医治这种病，雷迪法的儿子只有送往英国伦敦医疗。于是，雷迪法的妻子便带着另一孩子陪“患病”的儿子前往伦敦治病。母子3人先到了伊朗，伊拉克官员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迹象，就让他们从德黑兰登机飞往伦敦。他们到达伦敦的当天就被秘密安排登上了飞往特拉维夫的飞机。

妻子和孩子转移出去后，雷迪法在自己的父母面前公开了自己未来的行程，将要把他们安排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希望之乡”以色列去居住。他又安排了莫妮卡和自己的父母见面，并把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以及这位迷人的女郎作了简单介绍。

不过在同父母交谈时，雷迪法还是隐瞒了自己受到了美女和金钱引诱这一情节。他的父母对儿子带来

的这位神秘女郎并没有表示反感，同时还不能不为她的美貌感到惊讶。雷迪法公开告诉父母，说他要驾驶米格机投奔以色列，他们的儿媳及两个孙子已经由摩萨德特工作了周密的安排，此时已经安全地到了以色列，现在该解决他们老人秘密离开的问题了。雷迪法的父母除了惊讶之外，并没过多地犹豫就同意了儿子的安排。

于是，摩萨德就着手开始实施转移雷迪法的父母和他的岳父岳母的计划。在此之前，阿米特早已经派了一个特工小组去了伊拉克北部，和他们所支持的库尔德叛军领导人商量好了人员转移问题。他们先把穆尼尔·雷迪法的家人送到伊拉克北部的山区去避暑，然后从避暑的别墅偷偷地送过伊拉克的边防线，再用直升机把他们送到伊朗境内的阿瓦士，那里将有摩萨德的另一个特工小组接应。在伊拉克炎热的夏季，经常有有钱人到北方库尔德斯坦山区的丘陵地带避暑，所以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几天后一个晴朗的日子，穆尼尔·雷迪法的父母以及岳父母在莫妮卡的陪同下，打点起简单的行李去北方库尔德斯坦山区。临行前，雷迪法的父母告诉他们的邻居说，莫妮卡是他们在瑞士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很久没有见面了，这次是来看他们的，正好可以

帶她去北方体会一下少数民族的风情。他们一行数人顺利地到达山区后，立刻就有两辆大轿车迅速把他们送到伊拉克防线以南不远的山区。前来迎接他们的一支库尔德游击小组让他们骑上骡子，整整走了一个通宵，才把他们送到直升机来接他们的地点，坐上直升机后很快就到达了伊朗境内的阿瓦士。30分钟后，摩萨德特工把穆尼尔·雷迪法的家人送到了安全地点。整个行动可谓是安排得天衣无缝。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雷迪法终于开始最后的行动了

“米格-21”降落在以色列空军基地

1966年8月15日早晨，天气晴朗，雷迪法镇定自若地走向自己的飞机。他命令机械师把他的副油箱也加满油，说是今天要去执行一项远程巡逻任务。以前为了防止苏制最先进的飞机外逃，派到伊拉克的苏联军事顾问们曾三令五申，必须将燃料限定在执行任务的最低数量之内。其实苏联人这种不信任态度早已引起了伊拉克机械师和飞行员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在执行中也并不是特别认真。此时那些苏联人正聚在一起吃早餐，也没心思管其他的事。机械师们执行了

雷迪法的命令。

一切就绪后，当机械师向雷迪法打出了“OK”手势后，雷迪法从容不迫地驾驶着他的“米格-21”起飞了。飞机先是向巴格达方向飞去，但是一飞出机场雷达控制的范围，马上就转向南飞去，飞行一段时间后又转向西行。这时，雷迪法的整个飞行路线，都是准确地按照霍德将军详细布置的航线行进的，并且将飞行高度降到了尽可能低的程度，以避免沿途雷达的监视。

整个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当雷迪法驾驶着“米格-21”战斗机飞临约旦河上空时，伊拉克空军对此仍毫无所知。而此时早已严阵以待的以色列空军，很快就从雷达上发现一架单机正沿着预定的航线和高度飞来。当这架飞机逐渐飞临边境上空时，以色列的飞机立即出动了。一个中队的“幻影”式战斗机腾空而起，前去护航。

雷迪法发现逼近的“幻影”飞机后，他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来，自己驾机投奔以色列的计划总算是大功告成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以色列空军的反应会如此之快。他按照事先约定的暗号，做出一连串晃动机翼的动作。“幻影”战斗机中队确认后随即掉转头来，掩护着这架来自敌国的苏制“米格-21”战机，越过死海，向以色列南部内盖夫的一个空军基地飞去。

雷迪法的叛逃行动就此大功告成。以色列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事情发生后几小时，美、英、法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纷纷向以色列暗示，希望能看一看这种他们从来没有近距离见过的飞机。因为这是当时西方国家中拥有的唯一一架“米格-21”战机。当然，得知这一消息后的苏联政府简直是怒不可遏。他们的安全部门尽管有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最后还是出现了如此丢脸的事故，这将直接危及到苏联的国家安全。于是，苏联政府立即严厉地警告以色列人保证不能泄密，并要求立即收回这架战斗机。

聪明的以色列人当然也不想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他们告诉苏联人说，这架飞机出现在以色列，他们也感到很震惊。这很可能是驾驶员在飞行途中迷失了方向。为了平息苏联人的愤怒，也为了自己能独占这份所谓从天而降的礼物，以色列向苏联保证，他们决不会让其他西方国家“染指”。于是，西方国家一切旨在研究“米格-21”的要求都被严词拒绝，就连美国也不例外。虽然这又引起了西方盟国的激烈抨击，但是以色列人根本就不在意。

后来，苏联的那些顾问和伊拉克军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想弄明白这起叛逃事件的来龙去脉。他们坚信这绝不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军人的一时冲动，一定是

一次组织严密、准备充分的间谍活动。因为，事情发生前的几周内，穆尼尔·雷迪法所有的家庭成员都以各种理由先后移居国外，就连他的银行存款也全部提走了。但是，最后就连克格勃特工也竟然未能查出任何破绽。

令愤怒的苏联人不能理解的是，在正常情况下，以色列怎么能让一架外国飞机贸然闯入自己的领空而不予以击落呢？最后苏联人的怀疑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了以摩萨德为主的以色列情报机构的身上。尽管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直到若干年以后，莫斯科也只能是对摩萨德这次漂亮的“首饰行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不能尽悉其详。

1968年5月以色列国庆典礼的那一天，当这架经过改头换面的“米格-21”出现在观礼的上空时，那个在人群中的伊拉克人穆尼尔·雷迪法比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清楚，此时在空中操纵这架飞机的就是自己的好友丹尼·夏皮纳。正是在他的亲自教导下，那个年轻的以色列飞行员丹尼·夏皮纳不仅能熟练地驾驶“米格-21”战机，掌握了苏联教官的那一套训练方法，而且还全面了解了“米格-21”战机的所有功能，甚至包括它的缺陷。

不过令摩萨德遗憾的是，第三任局长梅厄·阿米特

将军虽然完美地导演了这起“首饰行动”，但是此时正面临着离开摩萨德局长位置的危机。

无独有偶的是，在1966年以色列成功获得第一架“米格-21”战机的23年之后，以色列于1989年再次成功地策反了叙利亚的一位飞行员，让他把一架“米格-23”战斗机送给了以色列。

以色列电台的新闻震惊世界

1989年10月12日，以色列电台播放了一则简单的新闻，内容大致如下：

昨天中午，叙利亚空军少校穆罕默德·阿迪勒驾驶一架苏制“米格-23”战斗机投奔以色列，目前，阿迪勒和他的飞机已得到以色列有关方面的妥善安排。

这则新闻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震动，叙利亚方面更是惊慌失措。他们希望通过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向以色列沙米尔内阁政府施加压力，接回飞机和飞行员。但是叙利亚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三天以后，阿迪勒本人在以色列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他公开宣称，出于种种个人的原因，他决定离开叙利亚、投奔以色列的想法由来已久。

面对各方面的舆论和压力，以色列始终保持沉

默，于是就引起了更多的猜疑。有人认为，叙利亚飞行员驾机投奔以色列，不仅使以色列增加了一架新式的苏制战斗机，而且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敌人叙利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有人认为，一架叙利亚飞机在几分钟内能闯入以色列领空而未被其雷达预警系统所发现，这件事本身就不可思议，难道以色列领空的防御力量竟是如此之薄弱？

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拉宾将军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于是欧洲一些新闻媒体开始忍不住了，纷纷猜测说，叙利亚空军少校穆罕默德·阿迪勒这一次驾机投奔以色列，与伊拉克飞行员穆尼尔·雷迪法的做法如出一辙。阿迪勒少校不过是在摩萨德美丽迷人的女间谍的诱惑下，再一次坠入情网中的又一条大鱼。

事实证明，这些西方媒体的猜测并不是没有道理。

自从1979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华盛顿签署了实现中东和平的“戴维营协议”以后，埃、以双方结束了持续30年的战争状况。埃及把它的军队主力从埃、以前线转到利比亚边界上。这样，以色列便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它的东线，于是野心勃勃的叙利亚便成了有同样野心的以色列的头号敌人，摩萨德立刻对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在叙利亚建立了

大大小小的情报网，大量地罗织人才，招募特工。有一位名叫德丽丝的美丽动人的酒吧女招待，应招成了摩萨德在叙利亚的间谍。

这位德丽丝小姐是黎巴嫩人，虽然生得眉清目秀，楚楚动人，但她的命运却很不幸。很小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另结新欢后就抛弃了她。德丽丝不得不同家境贫寒的外祖母相依为命。16岁那年，外祖母也病故了，德丽丝无钱交纳学费，失学了。为了生活，德丽丝经人介绍来到贝鲁特的一家酒吧当了一名女招待。由于德丽丝的美丽，这家原来不很景气的酒吧一下子生意兴隆起来了，德丽丝也在贝鲁特声名大噪。不久，通过在黎巴嫩从事秘密活动的摩萨德特工莱尔赛的引荐，德丽丝成了摩萨德在叙利亚情报网的特工。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不久，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访问莫斯科，签订了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合同。这是苏联为了使叙利亚在军事上能够与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起来，共同缔结的一个对付以色列的东部阵线。当时苏联承诺向叙利亚提供包括“米格-23”战斗机在内的一系列先进武器，并且还同意叙利亚延缓12年偿还军购所欠下的债务。1980年10月8日，阿萨德总统再度访问莫斯科，他又与勃列日

涅夫签署了两国间为期20年的友好合作条约。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中，惨败的叙利亚空军又要求苏联为它提供更先进的“米格-31”型战斗机，用来对付以色列空军的“F-15”和“F-16”战斗轰炸机。

以色列为了证实叙利亚是否已经得到了比“米格-23”型更先进的苏制飞机，就进一步加强了对叙利亚的军事情报活动，指派德丽丝由贝鲁特来到大马士革，仍然以酒吧女招待的身份作掩护，接近叙利亚的空军飞行员，截获这方面的情报。

当时叙利亚空军少校飞行员穆罕默德·阿迪勒虽然快30岁了，仍是孤身一人，生活很是寂寞。再加上他脾气急躁，经常同自己的上司闹别扭，因此，每当他遇上不称心如意的事情时，就跑到德丽丝当招待的那个酒吧借酒消愁。

有一天，阿迪勒少校又来这家酒吧消磨时光，发现这位新来的女招待长得美丽动人，于是就和她套近乎，很快就和这位风姿绰约的女招待打得火热。当德丽丝知道这个经常来这里喝酒的单身汉是叙利亚的一位空军少校时，就主动地和他亲近。不久，阿迪勒就神魂颠倒地坠入了爱河，开始同这个漂亮的女招待在附近的旅馆里频频幽会。

一天晚上，阿迪勒由于和同伴争吵，又被他的上

司训斥了一顿，于是就窝着一肚子的火气来到酒吧，找德丽丝寻找安慰来了。那天晚上阿迪勒没回营地，而是在德丽丝的住处度过了一个销魂的夜晚。从那以后，阿迪勒就感到再也离不开这位对自己体贴入微的美丽姑娘了。即使后来知道了德丽丝的真实身份，他也不以为意。反正他在叙利亚军中受人排挤，只要能和心爱的人永远在一起，他决定铤而走险。与此同时，原本只是怀着一种完成任务的使命，奉命同阿迪勒逢场作戏的德丽丝，现在也真正地爱上了阿迪勒。于是她就向阿迪勒道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当前的任务、目的，希望阿迪勒能帮她完成这次任务，驾驶一架最新式的米格战斗机飞往以色列。

阿迪勒鉴于自己当时在军队中的处境，还有对德丽丝的那种真正的爱慕之情，考虑再三，下定了决心，同意了德丽丝的请求。于是他要求与德丽丝的上司进行一次面谈，提出自己的条件。其实阿迪勒当时提出的条件也很简单，一是允许他娶德丽丝为妻子，二是向他支付100万美元的酬金。

德丽丝一见阿迪勒答应了自己的要求，马上就向自己的上司作了汇报。摩萨德方面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阿迪勒的两个条件，并且为他设计了一份周密的驾机叛逃计划，规定了联络的暗号。于是阿迪勒就开始了

驾机叛逃的准备。

1989年10月11日中午时分，两架叙利亚空军的苏制“米格-23”战斗机在大马士革市郊区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后，正朝戈兰高地作正常的飞行训练。然而就在接近以色列边境的时候，飞在后面的一架战机突然偏离了预定航向，竟然掉转机头往西朝以色列边境方向飞去。转瞬间，那架飞机就以极快的速度进入以色列领空，从叙利亚的监测雷达荧光屏上消失了，然后徐徐地降落在以色列境内的某空军基地——叙利亚空军少校飞行员穆罕默德·阿迪勒驾驶着苏制“米格-23”战机，再一次投入了以色列的怀抱。

成功地策反两名敌对国家的王牌飞行员，摩萨德不能不让全球的同行刮目相看了。雷迪法和阿迪勒可以说是两代飞行员，但他们却殊途同归，走上了一条同样的道路。尽管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摩萨德的策反能力却不能不令世人惊叹。至于雷迪法和阿迪勒这两个飞行员后来的去向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他们在叛逃后都加入了以色列空军，也有的说他们拿到了以色列给予他们的酬金之后，就选择了一个宁静的小城隐姓埋名，过着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悠闲日子。

然而，作为一直为了自己祖国的安危而出生入死

的那些摩萨德特工们，却没有权利获得那种悠闲和宁静。只要还在服役期间，他们就要冒着生命危险永无休止地工作下去。

第七章 叙利亚绞杀科恩 摩萨德痛失爱将

享有“犹太第一谍”美誉的摩萨德特工科恩以富商的身份由阿根廷潜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成了叙利亚复兴党主席的座上宾，差点当上叙利亚国防部长；身份败露后为拯救其生命竟惊动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还有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等多国政要甚至罗马天主教皇，最后还是在绞刑架下结束了他41岁的生命。

天生的间谍

1965年5月19日凌晨3时30分，一名摩萨德特工

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送上了绞刑架，结束了他41岁的生命。他就是被全球谍报界同行誉为以色列“间谍王子”，享有“犹太第一谍”之美誉的摩萨德历史上最优秀的特工之一——伊利·科恩。

1924年，伊利·科恩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并在那儿一直生活到32岁，然后才移居以色列。他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个虔诚信奉犹太教的孩子，曾想在当地犹太居民区当一名传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很自尊的犹太人，在城里有一间自己的铺子，专做领带生意。生意虽不大，但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科恩在青年时代，就像当时居住在埃及的许多犹太青年一样，很快就卷入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活动。他加入了由塞纓尔·阿扎尔领导的一个非法的犹太人地下组织。科恩第一次去以色列，就是那个地下组织派去的，目的是去学无线电通讯技术，以便在即将采取的“苏珊娜行动”中进行联络。

“苏珊娜行动”失败后，科恩被埃及保安机关抓去盘问，但由于他能言善辩，最终使埃及人相信，尽管他认识阿扎尔，却与“苏珊娜行动”没有任何联系。埃及人不得不把他放了。当时，他还在埃及的一个秘密的犹太移民组织里工作，但是由于“苏珊娜行动”败露，以色列情报机构已不能再让他在埃及从事间谍工

作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以色列情报机构正在实施一条新的规定，不允许招募当地的犹太人在他的居住国充当间谍。

1956年，科恩辗转来到了以色列。最初在以色列国防部当译员，负责翻译阿拉伯文版报纸上的那些材料，供国防部的官员们参考。这种工作虽然轻松而又安全，但是科恩却没有太大的热情，没过多久，他就有点厌烦这种波澜不惊的翻译工作了。还没有干到3年科恩就离开了国防部，到以色列总工会下面的一家工业公司当了一名会计。然而，这两项工作都不是科恩的选择。科恩渴望一种具有挑战性、刺激性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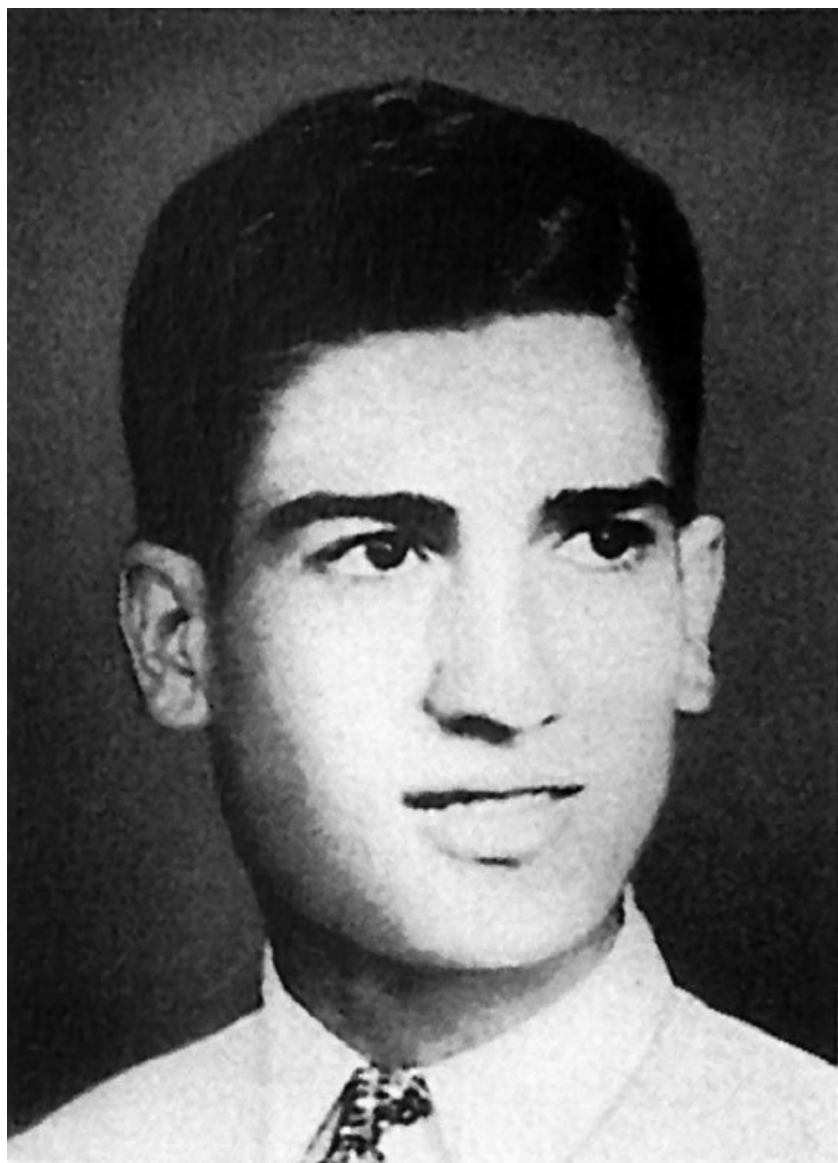
科恩的情况被摩萨德一位代号为“苦行僧”的情报官员注意到了。他调阅了科恩的档案后，与他进行了一番长谈，最后决定介绍科恩加入摩萨德。因为在那位摩萨德特工看来，科恩简直生来就是一个当间谍的材料。他曾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却一直生活在以色列的敌对国家，熟悉那里的生活习俗和风土人情；青年时代他就从事过秘密情报活动，受过这方面的基本训练，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活动，有实际活动的经验；科恩有杰出的语言天赋，阿拉伯语和法语说得与母语希伯来语一样流利，同时还能说叙利亚方言，完全是一个外派特工的最佳人选。

完全可以考虑把他派遣到像叙利亚这样非常难以渗透的阿拉伯国家去工作，何况他还有过在叙利亚生活的经历。在这样的阿拉伯国家，他完全可以站稳脚跟。

后来，“苦行僧”还对科恩的智商进行了测试。测试表明，科恩智商极高，记忆力超群。“苦行僧”得出的结论是：作为一名间谍，科恩的潜力巨大，“他充分具备了一个秘密特工人员所必需的一切品质”。

在“苦行僧”的极力推荐和介绍下，科恩成了摩萨德的一名职业特工。加盟摩萨德后，科恩又接受了最为严格的谍报课程训练。从反跟踪到无线电发报，从窃听到密写墨水，从摄影拍照到显影技术，更不要说射击、格斗和徒手攀爬那些技能。除此之外，科恩还把《古兰经》背得滚瓜烂熟，并且学会了穆斯林的一切行为举止。

就这样，经过两年的严格训练后，科恩已经成了摩萨德一名非常出色的专业特工人员。无论从哪方面，科恩都已经完全能够胜任这一角色。摩萨德于是准备把科恩派往叙利亚从事情报活动。



伊利·科恩

不过当时的的问题是，科恩到了叙利亚后，是否能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摩萨德非常清楚，叙利亚同埃及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不一样，它是一个一贯对外国

人、特别是对非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都充满疑虑的国家。叙利亚人长期以来总是被告诫要同外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现在摩萨德要把一个非叙利亚籍的科恩派到叙利亚去，而且还要得到叙利亚人的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他的身份，让他以一个叙利亚人的身份到那里去。

要让一个人改变国籍，乔装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居民，这对摩萨德来说并不是困难的事，而困难的是要使这种伪装能够长期有效，而不是暂时地瞒过周围的人。虽然伊利·科恩的祖辈是叙利亚的犹太人，有许多先天的有利因素，但还必须经过一番细致而耐心的改变，要让他既不能暴露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又不能暴露那段曾在埃及生活的经历。为了能以假乱真，做到万无一失，摩萨德这方面的专家经过一番努力，为科恩精心准备了一份全新的履历表，为他编造了一套与其经历尽可能相近而毫无漏洞的身份证明，而且还让即将前去叙利亚的科恩在特定的环境中，模拟叙利亚的生活严格地训练了一番。经过几个月的折腾，那些专家们一致认为再也没有任何漏洞，已经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了，才决定给科恩放行。

神秘的阿拉伯富商

一切准备就绪，科恩为他的叙利亚之行做最后的准备。当时他化名为卡马尔·阿明·塔贝斯。他的简历大致如下：1930年生于贝鲁特，父母是叙利亚人。1933年他随家人一同移居亚历山大，1947年又迁入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成人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办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并由此而富裕起来.....

科恩这份全新的简历，编造得天衣无缝。因为当时有成千上万个阿拉伯人的家庭，就是在这种贫困、战乱和“革命”中经历着颠沛流离。当时仅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就有近50万阿拉伯人生活在那里，其中叙利亚人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这个名叫“卡马尔·阿明·塔贝斯”的叙利亚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说自己曾经就是生活在这些人中间，而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如果说，他的叙利亚口音还不很纯正会引起别人疑心的话，这也并不难解释，因为他基本上是在埃及和拉丁美洲长大的；如果说他看上去对埃及的了解比对叙利亚的了解还多的话，那是因为他过去曾在埃及待过的缘故。总之，凡是有可能引起叙利亚人怀疑和不信任的地方，摩萨德的专家们都为科恩设计好了

退路。

1960年年底，科恩第一次用卡马尔·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根据摩萨德有关方面的指示，他首先要在拉丁美洲建立起他所需要的关系，同侨居在那里的叙利亚侨民接触，并尽可能找到与他现在的身份相符的叙利亚人做朋友。这样，在他日后前往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就会获得他所需要的支持，并能获得别人的信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些日子，科恩所做的一切，比国内那些摩萨德官员和专家所预想的还要出色。依靠摩萨德慷慨提供的大笔资金，科恩的进出口贸易生意很快就兴旺发达起来，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出了大名，很快就成了侨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叙利亚侨民中的佼佼者。从此，科恩就能够十分潇洒自如地往来于叙利亚上层侨民之间。那些人不仅对他友好，而且把他看成是叙利亚人的骄傲。科恩几乎没有花更大的气力，就确立了他在那些叙利亚人当中的地位，并且影响着一些阿拉伯人。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日子，科恩不仅设法结识了阿拉伯企业界的许多人士，更重要的是认识了叙利亚当时驻阿根廷使馆的武官阿明·哈菲兹将军。当时谁也不会预料到这个哈菲兹日后会成为叙利亚的总统，更不会料到后来科恩的死刑判决书将是由他来亲

笔签署。

第一步的成功给了科恩很大的信心。于是他就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为去大马士革作进一步准备——因为那里才是他最后的目的地。他一边不断地在叙利亚侨民当中积累他的人脉资源，牢固地确立自己的地位；一边又在有意无意地放出风去，说自己现在要了却的一个夙愿，就是要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叙利亚去，那可是自己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科恩的这种思乡之情和爱国之心，在那些叙利亚侨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为他日后的叙利亚之行做好了舆论准备。

科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了一年的时间，其实是准备了一年的时间。当一切条件都成熟后，科恩终于在1962年1月，带着差不多一口袋的私人介绍信和推荐信，登上了从热那亚开往贝鲁特的“阿斯托里亚”号客轮，开始了他的叙利亚之行。



BMkII型收发报机，发射距离800公里

科恩买的是头等舱，使他在旅途中不但舒服、体面，而且又同许多同行的阿拉伯巨商富贾成了朋友。在叙利亚有影响的商人沙伊特·阿尔德就是其中之一。科恩下船后，沙伊特·阿尔德亲自开着车子，把这位摩萨德的特工送过了黎巴嫩—叙利亚边界，最后到达了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

来到大马士革以后，科恩充分利用那些阿拉伯知名商人為自己开具的各种介绍信，为自己在大马士革顺利跻身叙利亚上流社会并结交军、政各界头面人物

铺平了道路，使他在大马士革如鱼得水，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在科恩的这些新朋友当中，有一个叫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年轻富商，是他后来在叙利亚顺利地从事间谍活动的一个最重要人物。



AMkII型收发报机，发射距离800公里

公司对面就是总参谋部大楼

科恩一到大马士革，很快就注册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在卡曼尔·阿尔赫申的帮助下，他在大马士革市中心的阿布鲁马纳区找到了一套很豪华的公寓，作

为他公司的办公室和他的寓所。几天后，这里就挂起了一块写着“进出口贸易公司——塔贝斯”字样的招牌。

阿布鲁马纳区不仅是大马士革最繁华的“富人区”，同时也是大马士革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地区。当年叙利亚的许多经销处、银行和工业公司的总部及一些国家的大使馆都设在这里。在科恩所居住的公寓正对面，就是叙利亚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是那些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出入的地方。这种地方对从事间谍活动的科恩来说，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由于他当时的身份和在朋友中的地位，直到被逮捕之前，他住在这里一直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一切安排就绪之后，科恩架起了无线电发报机，以“88”（即“平安到达，一切顺利”）为信号，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发出了第一份密码电报，报告自己已经在大马士革安全落脚了。他把发报机巧妙地隐藏在看上去像是做饭用的混频炉里，把天线固定在电视机和收音机天线林立的房顶之上，然后拉进屋内，就像接在他的自动剃须刀上的一根长长的电线。

科恩在叙利亚正式从事间谍活动，是从监视他寓所对面的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大楼开始的。在最初的日子里，科恩总是躲在寓所的窗帘后面，不间断

地监视着对面总参谋部的大门，悄悄地注视着从那幢大楼里进进出出的人们。他们乘坐的车辆、穿戴的服饰，甚至连他们手中提着的公文包，都是他关注的对象。在最开始的几天里，科恩几乎是从每天清早8点钟总参谋部的官员上班开始，一直监视到晚上6点多钟，等到大多数军官和职员离开大楼为止。到了晚上那些人下班之后，他还要继续监视。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全天候。

在连续监视了几个夜晚之后，科恩以一个职业特工的直觉很快注意到，总参谋部的整幢大楼，到了晚上只有5间房子的灯光是彻夜不熄的。他敏感地推测出，那5间房子肯定是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情报部和作战部的办公室，每天晚上都会有人在值班或者是工作。在那些日子里，大马士革和整个叙利亚国家的局势一直风平浪静，因此，整幢大楼除了那5间房子之外，其他的房间几乎是一片漆黑。于是他就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这应该是一种和平的标志。在科恩的眼睛里，那些房间的灯光就成了他猜测叙利亚局势的晴雨表。通过监视总参谋部的情报部和作战部办公室夜间灯光的变化，科恩及时向以色列发回了许多判断准确的情报。

在大马士革的日子，科恩经常同那个年轻的富商

阿尔赫申见面，并通过他的介绍又结识了许多朋友。这些人当中有商人也有官员，从而扩大了他的社交面，为他能更多地搜集各个方面的情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科恩以一个商人的身份，经常装模作样地向那些朋友打听一些生意方面的行情。比如叙利亚向西欧出口哪些商品最赚钱，在商品出口时往往会遇上什么样的麻烦等等。科恩在那些人的眼里，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进出口商，而且财大气粗。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提高自己的身价，有一次在酒会上，科恩故意向那些朋友透露，自己有相当大的一笔钱存在瑞士和比利时的银行里，他想利用这笔资金和他在欧洲的关系，向欧洲出口一批叙利亚的家具和艺术品，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座的人听了，无不羡慕和赞成。

正是通过这种恰到好处的伪装，科恩在大马士革的交际面越来越广，活动的圈子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年轻富商阿尔赫申一次又一次的引荐下，科恩所到之处理所当然地受到欢迎，赢得了更多的叙利亚人的信任。科恩在大马士革如鱼得水，生活得充实、富有、体面而又安全。

不过科恩并没有忘记他的真正使命。他知道自己精心策划的一切，只不过是为自己安全地潜伏在叙利亚拉开一个精彩的序幕，真正的演出还没有正式开

始。作为一名摩萨德的外派特工，现在应该是干正事的时候了。

1962年3月8日晚7时，他突然听到大马士革电台广播说：“今天我们英勇的士兵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粉碎性的打击。叙利亚军队摧毁了在加利利海面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战船，敌人遭到严重损失……。”

科恩听到这段广播后，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他对这条消息的确切性的确是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他猜测到了，那就是叙利亚又在水面上向以色列发起挑衅了。于是科恩就藏在窗帘后面，仔细地观察叙利亚总参谋部的灯光。这一夜，他注意到大楼里面和附近有些异常，那些以前总是漆黑的窗子现在却是彻夜通明。

第二天在见到阿尔赫申时，科恩第一次试探着跟他谈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但是阿尔赫申似乎并不乐意讨论这个话题，科恩也就十分小心地避而不谈了。晚上他又一次在窗旁进行观察。但这一次对面的大楼却一片寂静，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只有那5间房间亮着灯光。

不过第二天他却发现，大马士革街头出现的军车，特别是坦克的数目增加了。他没法去找人打听这其中的原因，只是猜测着大马士革即将出现的军事动

向。后来几天夜里，科恩又发现总参谋部所有房间的灯全都亮了，而且是连续几天晚上都是如此。

科恩判断最近肯定有新的情况发生，于是马上起草了一份电文发往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他在电文中说：“总参谋部的灯连续亮了三夜。大街上有反常的部队调动，确信叙利亚军队处于戒备状态，没有任何要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地方报刊上充满了恶意的反以色列情绪，所有这些都应视为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角

科恩的判断没有错。几天以后，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3·16”战争爆发了。由于科恩及时通报了摩萨德总部，让以色列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加强了加利利沿海阵地上的防御力量，从而大获全胜。

不速之客夤夜造访

战斗结束后的一天晚上，阿尔赫申没有事先通知科恩，就和一个年轻的叙利亚军官来到了他的寓所。这是阿尔赫申第一次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突然登门造访，着实让做贼心虚的科恩大吃一惊。

阿尔赫申似乎也察觉到了科恩惊异的神情，马上就解释说：“我正巧有事路过你楼前，顺便来看看你是否在家。你大概不会介意吧？”

从他的声音里科恩没有听出异常的味道，这才放了心。于是就友好地像往常一样给这两位不速之客让座，并且打开精致的酒柜，请他们喝酒。

这时阿尔赫申主动地对科恩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位好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先生，现任陆军中尉。希望你们也能成为好朋友。”

科恩友好地笑了，对马阿齐·扎赫雷丁的到来表示欢迎。

没有想到阿尔赫申又接着说：“不过，我想你也许并不知道他的叔叔是谁。他的叔叔叫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就是现任叙利亚陆军总参谋长。”

对于阿布德尔·卡里姆·扎赫雷丁这个名字，科恩在以色列时早就知道，但此时他还是表现出一种极大的

兴致。在后来的交谈中，科恩才知道阿尔赫申此次造访并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只不过是老朋友之间一次非常随性的行为。如果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无非就是想让科恩认识一下自己的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因为他的确是为自己有这么一位陆军中尉的朋友而感到自豪。

热情的阿尔赫申又一次实实在在地帮了科恩的一个大忙，让科恩后来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科恩以极大的热情和他们高谈阔论起来，以博得马阿齐·扎赫雷丁的好感。当时科恩并不知道这位年轻的陆军中尉原来是一个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科恩这样一位财大气粗又见多识广的叙利亚富商充满了好奇。在友好的交谈当中，科恩充分发挥自己语言的魅力，给这位年轻的中尉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当阿尔赫申不时热情地称科恩为“我的兄弟卡迈勒”时，马阿齐也备受鼓舞，更加乐意同科恩交谈。

从谈话中，科恩准确地判断出，这位年轻的中尉像他的叔叔一样，属于叙利亚的“德鲁斯”宗教派，他比其他许多高级官员们更了解军队的情况。

为了不引起对方的猜忌，科恩还是十分小心谨慎地谈一些让对方既感兴趣，但又是不着边际的话题，没有提出任何不慎重的问题。不过在谈到前不久发生

的那一次战争时，科恩还是很小心地对马阿齐说：“我想，你对‘3·16’战役的战场一定十分熟悉吧？”

这个问题并没有使马阿齐惊讶。只听到他似乎有点得意地说：“向我了解这个地方吗？战斗打响前两天，我正好在视察叙利亚所有的阵地，它们就在加利利海的周围。我亲眼看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他得意地说。

科恩忍不住地笑着说：“你知道，我在阿根廷时总是避着犹太人，尽管那里犹太人很多。但是我倒是很乐意看看那些带着武器的犹太人，即使是从远处我也非常乐意。”

马阿齐立即对科恩解释说，老百姓是禁止进入边境的军事地带的，只有极少数带着特别通行证的人才允许进入。不过通行证是很难弄到的，必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因为“这个地区到处都是间谍”。

从他的话里，科恩听出来，马阿齐对叙利亚边境的防务是相当了解的，但是科恩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他知道要是自己主动地问这样的问题，那么不是不识时务，就是别有用心。

但是，让科恩没有想到的是，马阿齐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下星期五，咱们三人一块去那片军事地带玩玩。你们可以乘坐我的车子，这样在军事检查哨

就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哪知阿尔赫申并不太乐意到那种地方去“玩玩”。他说他一年前已经去过了。

但是，对于急于想获得这种情报的科恩来说，哪里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就笑着对阿尔赫申说：“你是不是害怕犹太人的子弹啊？”

阿尔赫申当然极力否认。于是大家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等到边境局势稍微平静一些的时候，到前线去旅行一次。

科恩真希望这种“旅行”早一天到来！

就在这时，这个陆军参谋长的侄子又主动地为科恩提供了一条十分重要的消息。他告诉科恩说：“纳哈拉威旅长正在和政府争吵。”

“为什么？那有什么好吵的！”科恩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其实这时他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马阿齐耐心地说：“纳哈拉威是当前叙利亚的最强硬者，他认为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我叔叔尽力劝他应该再给政府一次机会，但他不听劝告。鉴于‘3·16’战役后的前线形势，他深信人民只相信部队。我相信这个上校很快就会给政府带来某些变化。”

令科恩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年轻的中尉倒真是一

个健谈的人。后来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说。他谈到了叙利亚空军的情况，还谈到了和埃及的关系……快到午夜了，两位客人终于起身告辞。科恩虽然希望这样的谈话能一直继续到天亮，但还是热情地站起来欢送他们。等到他们一离开，科恩就立刻关上房门，习惯性地看了看对面的大楼，然后在窗帘后面走来走去。因为今天晚上太意外，他的心一直激动着。最后他还是命令自己冷静下来，把刚才三个人的谈话清醒地梳理了一遍后，马上拟了一份电文，连夜发给了摩萨德总部。

科恩的电文大致如下——

一、叙利亚空军害怕以色列空军。

二、埃及拒绝把他们拿走的米格飞机还给叙利亚。

三、一些叙利亚军官并不掩饰他们对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太软弱，其中最强硬者是纳哈拉威旅长……

对科恩来说，那真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尽管发完电报后他已疲惫不堪，但他直到破晓才入睡。

不过，后来在同马阿齐这样的军界人物交往的同时，科恩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当时边境上的局势虽然很紧张，但科恩还是忙着

办理一些进出口业务，这样才能使他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可信。他经常和大马士革的一些制造商、经营商接触，目的是使他们对欧洲，特别是对慕尼黑和苏黎世出口手工制品感兴趣。他小心谨慎地告诉他们，他和欧洲的一个实力雄厚的进出口公司有联系。公司的主要分部在慕尼黑和苏黎世，经营的品种有桌子、古董、珠宝、各种皮革制品和各种地方艺术品。这些商品在欧洲都有较好的市场。

科恩的话让那些制造商和经营商的心一阵狂跳，他们都想搭上科恩这班车，好在西欧大捞一把。科恩正是以此为由，同西欧国家的那些“代理商”频频联络，通过书信和电报的方式，把他在叙利亚所搜集到的各种情报，甚至还有那些微缩胶片转交给以色列情报局——因为那些所谓的“代理商”，都是摩萨德事先安排的情报人员。到了后来，那些出口到西欧的家具和一些古董的夹层，也都成了科恩存放密件的地方。



藏有微型相机的雕像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正是叙利亚政局动荡不安的时期。先是那个纳哈拉威旅长发动的政变推翻了“软弱”的旧政府，自己取而代之；不久，一支由“自由军官”率领的军队再次发动政变，又把纳哈拉威赶下了台。科恩都能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情报及时传递到摩萨德总部，使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局势了如指掌。

由于叙利亚国内政局动荡，与以色列的边境前线反而平安无事。于是那个年轻的陆军中尉真的开着自己的车子，带上科恩和阿尔赫申到叙利亚的前沿阵地

上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科恩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彻底地查清了叙利亚前线的军事布置，如火力点、迫击炮的型号、重火力点的位置、德国式坦克以及苏联的无后坐力炮的数量和位置等等，晚上回来后，就关起门来连夜向摩萨德发报。他还绘制了许多详细的火力配备图，夹在那张出口到西欧市场的桌子里面，使以色列对叙利亚前沿阵地的那些核心机密尽收眼底，再也无密可保了。

“绝妙的宴会”背后

1962年夏天是叙利亚国内局势最稳定的日子。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大马士革的社交面，科恩在他的寓所里举行了一次沙龙式的酒会。他的那些大马士革的叙利亚朋友都参加了，并且带来了许多新朋友。其中除了有阿尔赫申、马阿齐、阿乐德这些老朋友之外，还有他新结识的许多商界、政界和娱乐界的人士，真是高朋满座。科恩知道，组织这样的“派对”或“沙龙”，在这座城市里的上流社会是经常的事，所以并不会引起叙利亚当局或警方的注意。这次宴会最大的收获，就是让科恩又结识了一位对他很重要的人物，他就是32岁的乔治·塞夫。此人是叙利亚宣传和新闻部的一位高

级官员，时任叙利亚国家广播出版局的局长。乔治·塞夫是阿尔赫申的一位好朋友。和他们一同出席酒会的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是乔治·塞夫的秘书，其实是他的小情人。

在酒会上，科恩几乎给所有的来宾都送上了一些小礼物。他送给马阿齐一打丝绸领带，领带上还标着巴黎和罗马最高级商店的标志；送给阿尔赫申的是从巴黎赫耳墨商店购来的精美的红色皮革面写字本，还配有一套刻有科恩名字“塔贝斯”的讲究的吸墨用具。那个塞夫并不是为礼物而来，而是想听一些有关巴黎夜总会脱衣女郎最新的桃色新闻。因为他曾听阿尔赫申说过，科恩最近到巴黎、罗马转了一圈，是一个风趣幽默而又见多识广的人。于是科恩就投其所好，现编现卖了许多所谓道听途说的风流韵事，把他们一个个听得神魂颠倒。

科恩还发现，那个乔治·塞夫其实是个性情活泼的小伙子，能说好几种欧洲国家的语言。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他对科恩这种既富有又自由的生活很是羡慕，显然他很高兴能与科恩相识。他对科恩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新闻宣传。我得参加一切的官方会议，不管政府的哪个部门我都可以随便出入。不过你应该知道，那是一种相当枯燥乏味的日子，只有这位

姑娘才让我看到一点亮色。”

他竟然一边说一边转过头来，对着他的女秘书“放电”——那位年轻的姑娘自然是嫣然一笑，果然很迷人。

科恩一见自然心中有数，于是他和这个“参加一切的官方会议”的塞夫交上了朋友。他对塞夫说，他向来很羡慕新闻界人士，也曾向往能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可是，恐怕我只能凑合当个商人了”。

“你若是对我的工作有兴趣，请到我上班的地方看看。这是我的名片。”

科恩接过塞夫手中精致的名片，对他的邀请表示十分感谢，并说有时间一定前去拜访。

一周之后，科恩前往叙利亚新闻部拜访塞夫。塞夫热情地欢迎了他，并把他介绍给同事们。他们在新闻部的内部餐厅喝咖啡时，科恩故意装作很自然地谈起阿根廷和他在阿根廷的叙利亚朋友，并好像是无意之中提到原驻阿根廷使馆的武官哈菲兹将军。

塞夫告诉科恩，他与哈菲兹将军很熟，是将军的老朋友。科恩说很想去拜访一下将军，听说他现在回到了国内，好久没有见着他了。

塞夫说“这事太容易了”，并答应为他们安排一次会见。

塞夫果然是个热心肠。就在那个周末，他就带科恩到哈菲兹将军家登门拜访去了。哈菲兹将军的住宅离科恩的寓所并不远。

哈菲兹将军返回大马士革后，积极地参与了叙利亚的“复兴社会党”的政治活动。塞夫曾热情地向他推荐过一个“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归来的叙利亚人”，但是哈菲兹将军当时并没能马上回忆起“卡迈勒·阿明·塔贝斯”这个名字。不过当科恩衣冠楚楚地出现在哈菲兹的客厅里，当面感谢他在阿根廷曾建议自己返回叙利亚时，哈菲兹就立即回忆起同科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愉快的交往，并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

“为了感谢您的宝贵建议，”科恩说，“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他拿出一大听来自德国的上等烟叶送给哈菲兹。科恩记得哈菲兹一向是抽烟斗的。他还对哈菲兹说，他准备向欧洲出口大量的叙利亚工艺品，还打算动员阿根廷的叙利亚侨民到他们的祖国来进行可以赚钱的投资。

哈菲兹被这位热情、老练、富有魅力的商人的言谈打动了，他赞扬科恩为叙利亚所做的努力。为了表示亲近，他竟立刻称科恩为“我的兄弟”。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着。哈菲兹谈到他对叙利亚的内政问题十分焦虑，他认为只有“复兴社会党”才能拯救这个国家。

临别时，哈菲兹还客气地把科恩送到门口，并对他说出了阿拉伯人惯用的那句热情好客的话——“记住，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这次造访，不仅让那个政府官员塞夫进一步见识了这个科恩的能力，更主要的是让科恩今后又多了一个情报来源。没有想到，不久以后，这个哈菲兹将军竟然登上了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主席的宝座。从此以后，科恩的情报工作更是有声有色。

从那一次会面以后，塞夫就经常主动打电话找科恩，约科恩去他的办公室聊天。通过与塞夫频繁的接触，不但新闻部的门房再也不要科恩出示身份证，就连新闻部里所有的人几乎都成了科恩的朋友。科恩同塞夫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超过了他与阿尔赫申和马阿齐的关系。

除了在办公室聊天，塞夫还经常到科恩的公寓里来，而且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既谈政府内部的小道消息，也谈叙利亚政府当前的一些大政方针，几乎是没完没了。这样一来，这个塞夫就成了科恩的义务情报员。后来塞夫在新闻部的职权也扩大了。他被授权在政治方面监管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几种语言的对外广播。科恩对他的升迁同样感到高兴。后来，科恩竟然通过这位春风得意的乔治·塞夫，在大马士革广播电台

的《海外侨胞们》栏目客串了一段时间的节目主持人。《海外侨胞们》栏目的主题是呼吁叙利亚海外侨胞出力，支持“复兴社会党”的革命活动。科恩天生就是一位优秀的电台播音员，他那清晰而带有磁性的男中音让人听上去是那样的亲切，他的家人和摩萨德的上司在特拉维夫的收音机中都听到了他那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

不过，对于科恩要求客串播音员的动机是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也许他是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语言天赋，也许是想通过这种公开方式告诉家人自己一切平安，也许纯粹是为了跟叙利亚当局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而已。

后来科恩发现，这个塞夫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沉溺于女色。有一天，塞夫向科恩提出，希望能在科恩那豪华而体面的寓所里暗地组织一次“绝妙的宴会”。科恩一听，当然明白什么是“绝妙的宴会”。当时就答应了，并且做出一副很乐意的样子。

那天晚上，塞夫仍然带着他那位形影不离的女秘书来了。科恩这一次才发现，塞夫的女秘书的确是一个性感的女人。她身材丰满，有着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双闪亮的大眼睛，对自己的上司永远是一往情深。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一些男男女女，科恩大多都不认

识，因为大都是塞夫的朋友。这其中有一个叫哈图姆的上校军官，竟然是叙利亚伞兵部队突击队的司令。科恩知道，伞兵部队是叙利亚的一支最精锐的部队，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突击队的司令竟然也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而且也带着一位女友。后来科恩还打听到了，哈图姆的相好原来竟是土耳其驻大马士革使馆的一个低级雇员。

那天晚上大家玩得都很开心，就连科恩也不例外——因为他又认识了哈图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开头，后来塞夫就经常在科恩的寓所里举行这样“绝妙的宴会”，科恩和哈图姆也成了好朋友。为了让这样的聚会能继续下去，科恩还特地买了一部电唱机和一批动听的舞曲唱片。在聚会的时候，科恩总是以一个主人的身份为他们斟酒，加饮料，换唱片，偶尔也和姑娘们跳几个舞。但他始终遵守着一条严格的规矩，从来不与她们胡来，只是与她们保持朋友关系。作为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摩萨德间谍，科恩始终保持着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全神贯注地竖起双耳，去捕捉塞夫和哈图姆所说的每一个字，因为他们都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许多机密。往往在酒色和女色之中，那些政府官员的警惕性也开始放假了，何况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所谈的都是一些日常工作。

这种聚会的确是科恩大开方便之门，让他在这种轻松的环境里，就能获得有些特工即使是出生入死也打探不到的国家级机密。尤其是那位哈图姆上校，只要喝了几杯白兰地或者是威士忌之后，就激动起来了，常常直言不讳地高谈阔论，表达他对叙利亚当权者的看法，说他们“胆小如鼠，优柔寡断”；当他酒意方酣的时候，他就会说：“一提起以色列，他们就吓得浑身发抖。现在是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有一次，为了显示叙利亚军队的强大，这位伞兵部队的上校居然对科恩炫耀叙利亚武装部队的全部编制情况。他说：“我们有2个装甲师，5个步兵师，4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可我的突击队比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还要强。我手下的人个个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硬汉子，他们决不会畏惧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哈图姆的这些话，让科恩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后来为了“酬答”塞夫和哈图姆，科恩就把自己的寓所借给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同情人幽会。只要塞夫或者哈图姆给科恩打个电话，说需要用一下房间，科恩就会按事先的约定，把房门钥匙放在门外的信箱里，让他们在这里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不过科恩也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在离开之前必须收拾干净

——他不能因为自己过分的“大方”，让对方怀疑自己对他们另有所图。

为“复兴社会党”筹措了一万美元

1962年12月，叙利亚恢复了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他们借口加利利海岸的防区遭到了破坏，向海上捕鱼的以色列人开火。同时在特尔卡茨基布茨，以色列农民在一块紧靠着边界的争议地区耕种时，也遭到来自叙利亚的袭击；在北部边境靠近达恩河源头的地方，叙利亚还袭击了以色列的一支巡逻队。

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局势又一次紧张起来，双方都准备采取极端的行动。这时科恩又开始忙乎了，他向特拉维夫一封接一封地发去电报。这一阶段，他的电文要比以往多出两三倍，而这些情报都是他那些好朋友马阿齐·扎赫雷丁、乔治·塞夫和哈图姆上校等叙利亚官员为他免费提供的，其真实性毋庸置疑。

1963年春季是叙利亚政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2月间的一次聚会上哈图姆告诉他，前线军队总司令哈里里已经全部控制了驻扎在叙利亚边境的几个师，他目前正在总参谋部策划一场反对大马士革文官内阁的政变。科恩通过密电当晚就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拉

维夫。但是，当以色列的秘密情报专家们认真地研究了这份情报后却认为，科恩关于“叙利亚可能会发生政变”的情报只不过是当地无足轻重的传言而已，不足为信，因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然而，就在一个月后的3月8日深夜，叙利亚真的发生了政变。大马士革政府因对哈里里的企图早有察觉，便把他派到安曼去任使馆的武官。但是他并没去安曼，而是返回了他的部队，率领军人发动了政变。

政变成功后，叙利亚现行政权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执政方式，使叙利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科恩的朋友哈图姆上校在这次政变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就是他指挥部队发动了攻击，占领了位于科恩寓所对面的总参谋部大楼和大马士革广播电台。哈图姆从此进入了现行政权的核心领导集团。哈图姆上校刚刚结束了他的夺权行动，就立即给科恩打电话，要求借用他的寓所和一位土耳其女友幽会。“我想开个庆功会。”他说。科恩当然是毫不迟疑地就答应了。从此科恩又能参与那伙刚刚掌握国家命运的人们的私生活。

这次政变为科恩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政变之后，叙利亚“复兴社会党”掌握了政治大权。让科恩意想不到的，当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结识的哈菲兹在这次“复兴社会党”的夺权斗争中大捞了一把，居然

登上了新政府内政部部长的宝座，因此也成了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这种意想不到的结果，让科恩越来越接近叙利亚的统治核心集团。几天以后，科恩就给哈菲兹将军送来一束鲜花，并附上了一封贺信，向他表示祝贺。

不久之后，科恩又在他的寓所安排了一次大型聚会。两年后，这次聚会被称作叙利亚历史上的“革命的狂欢”。乔治·塞夫、哈图姆和其他几个人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参加聚会的除了有一群花枝招展的叙利亚姑娘外，哈图姆又为科恩带来了一位名叫萨拉赫·戴利的“新朋友”。萨拉赫·戴利当时虽然是一个上校，但他却被称为“复兴社会党的一颗新星”。这次聚会的主题是“为复兴社会党胜利干杯”，而最后却是以最放荡的纵欲结束。

就在这次政变后不久，1963年夏天，叙利亚政局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军方领导人进行了一次大换班，总参谋长哈里里被秘密撤职，而科恩的老朋友哈菲兹将军却飞快地登上“复兴社会党”的最高领导地位，于6月27日以“铁腕人物”的面目登上了革命指挥部国务会议主席的宝座。这个相当于国家元首的显赫职位还满足不了他的欲望，于是他又任命自己为军事总监、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复兴社会党”的主席。

老朋友哈菲兹的快速升迁，让科恩真的感到很高兴。他马上给哈菲兹送去一大盒巧克力，同时附上一张写着“祝您如愿以偿”的名片。科恩的这一招果然得到了回报，他马上收到了一张正式请柬，请他到莫海亚林宫——哈菲兹主席宣誓就职的地方——去参加一次大型招待会。招待会上聚集着一大群衣冠整齐的叙利亚官员，还有许多身穿礼服的外国使节。大家都在频频举杯，气氛隆重而又和谐。科恩和他的另一位老朋友塞夫也在这些人中，举杯祝贺哈菲兹主席就职。

不久，摩萨德总部给科恩下达了一道指令，命令他在近期务必立即弄清楚两件事——第一，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什么时候进入实施阶段？实施的具体方案是什么？第二，立即搞清楚苏联为叙利亚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米格-21”战斗机，因为这种战斗机将会威胁着以色列的“米格-19”战斗机；另外还有一种为埃及提供的“科玛”导弹的小型舰艇。

接到特拉维夫的指令后，科恩立即拜访了哈菲兹主席，并把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复兴社会党”筹措的1万美元的支票交给了他。哈菲兹主席非常感谢科恩为“复兴社会党”所作的努力，并当场表示他将给科恩寄去一封由党的最高领导官员签名的感谢信。同时，这位主席还高兴地看到，他的夫人愉快地接受了这位

叙利亚商人送来的一件貂皮大衣——在阿拉伯国家，赠送这类贵重礼品是最尊敬的象征。科恩和哈菲兹越走越近。在后来哈菲兹当了叙利亚总统后，竟然提名科恩为叙利亚国防部长的候选人。

在后来的日子里，科恩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搞清叙利亚改道约旦河的计划上。他的上司不断来电，要求他放下一切其他工作，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叙利亚改道约旦河计划是1964年在开罗召开的阿拉伯国家最高级首脑会议上定下来的一项战略规划。会议决定，由叙利亚沿着叙利亚高地（也叫戈兰高地）挖一条渠道，把巴尼亚斯河水引到约旦境内的雅穆克河里。这样，每年就从约旦河分流出1亿立方米的水。从以色列的观点来看，这是一项十分邪恶的计划，它的目的是旱死以色列。

当时科恩通过他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哈图姆和戴利上校，已经弄清楚了这个计划的来龙去脉。但是科恩并不满足已经掌握的情报，他又通过大马士革其他的政界朋友，接近了两名负责实施计划的人。其中一位是黎巴嫩的工程师，负责渠道的施工。科恩是在一家餐馆和哈图姆上校共进晚餐时与工程师认识的（因为哈图姆当时的任务是负责渠道的军事防务）。工程师对渠道的走向和功能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说，渠道沿

着戈兰高地修建，全长为44英里。这样不仅有利于叙利亚和约旦利用改道引来的河水，而且还能给需要河水的以色列造成巨大的损失。

科恩找的另一位对他很有用的人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位公共工程承包商，也是通过哈图姆上校结识的。承包商拥有许多美国推土机，负责挖掘工程。科恩从他那里得到了许多从哈图姆上校和黎巴嫩工程师那儿探听不到的细节，还有一份对以色列情报局最有价值的情报——叙利亚政府将委托南斯拉夫的一家工程公司来监管这方面的工作。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科恩终于把零星的情报汇集起来，给他的上级提供了一份有关改道计划的全部详细情报，其中包括渠道结构和地形的草图。科恩在这份情报中写得清清楚楚：整个渠道施工期为18个月；将在巴尼亚斯河上建造一座大型的电泵站，把河水提升到800 英尺高的渠道上去。

科恩的这份情报的确帮了以色列一个大忙，同时也使以色列紧张起来。他们决定不惜使用任何手段来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

在这期间，科恩还三次亲眼目睹了叙利亚防御工事的规模和实力。这些工事是沿着叙以边界，在戈兰高地上修建起来的。每次他都与马阿齐·扎赫雷丁中尉

同行。马阿齐的叔叔虽然倒台了，但他仍是预备役军官。他们沿着高地巡视一周，看到了将把高地建成另一个“马其诺防线”的大型防御工程。每一次他都看见有苏联专家在指挥工程。他知道莫斯科派出了无数的专家前往叙利亚。

与此同时，科恩还同马阿齐中尉参观了埃尔贺马南区军事指挥所的建设工地，而且在那儿的军官宿舍里住了一夜。第三次是在库奈特拉，科恩有机会参观了前沿地区的叙军总指挥部，搜集到一些军事战略资料。

在后来的日子里，科恩还往摩萨德总部发出几条重要的军事情报：

为隐藏15英里射程的苏制大炮而构筑的混凝土暗炮台的详细情报。

可供装甲车和坦克行驶的数英尺深的战壕的详细情报，并且附上了一份详尽的草图。

运输200辆“J-54”型苏制坦克的第一手资料。

4架“米格-19”战斗机和飞行员的详细情报，以及刚刚才运到叙利亚的“米格-21”战斗机的一组照片。

当时为科恩提供情报的叙利亚人员，除了有十分信赖他的戴利上校、哈图姆上校和马阿齐中尉等人，还有叙利亚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军官、文职人员、“复

兴社会党”的上层的朋友，有些情报甚至是从叙利亚军事情报局的局长那儿得来的。这些情报大部分都由科恩以密电码的形式及时发送给了摩萨德总部，也有一部分是用叙利亚出口商品的机会偷运到慕尼黑后转到特拉维夫。

最后一份电报

1965年1月21日早上，伊利·科恩又给特拉维夫发送了一份电报。这时他想起昨天晚上，他和哈图姆一起共进晚餐时，打听到了哈菲兹主席今天将召集叙利亚情报机构的上层官员开会，讨论合并巴勒斯坦组织的计划。哈图姆当时告诉科恩，哈菲兹倾向于成立一支独立的巴勒斯坦突击队，在叙利亚的指挥下进入以色列进行破坏活动。哈菲兹主席还建议应该以阿尔及利亚为榜样，改变对以色列的斗争策略，要通过巴勒斯坦人搞人民战争来收复自己失去的领土。

科恩想到这个消息对以色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天内，自己应该前去“拜访”一下那位哈菲兹主席。于是他坐在床上，就像通常发报一样，打开了他的收音机，一方面在等待接收特拉维夫发来的指示，另一面思考“拜访”哈菲兹主席的方式。他的小型发报

机还放在床上。这时收音机中已出现一阵特有的声音，这种声音告诉他特拉维夫正在发送信号，准备给他发布指令。

然而就在这时，科恩的公寓大门发出了一声巨响。他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大门已被砸破了。他马上站起来，本能地把小型发报机藏在手里。这时3名身着便衣的人冲进房间，用左轮手枪逼着他，命令他举起手来。这时科恩并不知道，他的公寓已经被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叙利亚安保人员包围了，并且封锁了整个繁华的阿布鲁马纳街区。

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个身材魁伟的青年军官。以前也曾同科恩在一张餐桌上用过餐。他就是叙利亚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苏米达尼上校。这时，苏米达尼上校几乎是冲到科恩面前，慢慢腾腾地说：“你这该死的间谍，这回可把你当场捉住了！”

苏米达尼上校并不掩饰他对间谍的义愤和获得胜利的喜悦。

“请不要动手！”科恩镇定地说，“出了什么事？我是从阿根廷回国的叙利亚商人。”

上校厉声说道：“少废话！说出你的真实姓名。”

“卡马尔·阿明·塔贝斯。从阿根廷归来的侨民。”科恩坚持说。

苏米达尼怒吼道：“好吧！不用担心，到时候你会统统说出来的。跟我们走吧！”

就这样，这位享有“犹太第一谍”之称的以色列最优秀的间谍被捕了。

在叙利亚如鱼得水的科恩怎么突然会遭到被捕呢？

原因就是这段时间科恩被自己的成功所迷惑了，丧失了作为一名职业特工人员应有的警惕和谨慎，同摩萨德总部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多，一天平均都有一到两次，多的时候甚至三次，每次发报的时间都在一个小时以上甚至还会更长，在后来的那些日子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从而对他所在的阿布鲁马纳区的大使馆的无线信号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引起叙利亚反谍间部门的注意。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叙利亚反间谍部门对阿布鲁马纳区进行监测，最后锁定了科恩居住的这幢公寓，结果他就成了叙利亚反间谍部门的侦破目标。

科恩被捕的当天晚上，苏米达尼上校命令科恩向以色列的摩萨德总部再发一份电报，内容当然是由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拟定的。然而，科恩就是利用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在发报时通过一点小小的指法变化，把自己落入敌手的事实告诉了特拉维夫。这是他在离

开以色列之前与他的上级商定好了的——如果他落入敌人魔掌，就用这种变换的指法通知上级。

三天后，大马士革电台受哈菲兹主席之命广播了一条官方消息，宣布当局捕获了一名叫卡马尔·阿明·塔贝斯的间谍。接着，叙利亚新闻界正式公布了这个消息——“间谍的真实姓名为伊利·科恩。是一名以色列军人”。

各国首脑和罗马教皇参与拯救行动

科恩被捕后，立刻在叙利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他被捕后的几天内，大约有五百多名叙利亚公民因为科恩的原因落入法网，其中有17位是女性。科恩的朋友沙伊特·阿尔德、马阿齐·扎赫雷丁和乔治·塞夫等人亦未能幸免，而哈图姆和戴利两位上校则获得了豁免权。这时，哈菲兹主席则立即向新闻界讲述了他自己“早有的预感”，并抢先一步发布了这个消息，以免自己受到牵连。一时间，各种荒唐的谣言和无端的猜疑，通过报刊电台在大马士革流传开来。科恩处境极其危险。

此时在科恩的国家以色列，一场营救活动正在悄然展开。科恩被捕的消息被证实以后，时任以色列总

理的艾希科尔立即在特拉维夫召集了各家报社的社长和其他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向他们公开了政府的意图。他说，政府希望能在友好国家和海外知名人士的协助下拯救科恩的生命。他要求新闻媒体不要再发表与科恩有关的新闻，以便为政府赢得主动和时间，可以更好地争取多种手段来营救科恩。

在稳定国内新闻媒体的同时，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营救科恩的政治战和外交战。那些派驻各国的以色列使馆都紧急动员起来了。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的特派代表、非官方人士几乎是全部出动，在世界各国动员和游说那些有影响的友人和名人，希望通过国际舆论达到对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的目的。

两个月之后，叙利亚对科恩的审讯工作结束了。尽管以色列在全力营救，尽管叙利亚也受到了来自国际舆论方面的干扰，科恩最后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原因就是叙利亚受科恩一案牵连的人太多了，其中包括总统哈菲兹在内的政界和军界要人。如果科恩不死，许多人难脱干系。所以哈菲兹一定要置科恩于死地。

但是以色列却固执地相信，只要科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营救就还存在希望。于是他们又投入了新一

轮的营救工作。

就在这时，哈菲兹主席收到卡斯博士的一封信，呼吁“以生命的名义”免予科恩死刑。卡斯博士是一位医生，曾经为哈菲兹动过手术，挽救过哈菲兹的性命。但是，哈菲兹仍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国家的首脑和知名人士也被动员起来了，这些人当中包括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四世、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总理埃德加·富尔、加拿大总理迪芬贝克、国际红十字会及数目多得惊人的美国国会议员、参议员、新闻界人士及各界重要人士。他们都向叙利亚当局发出“对科恩免予死刑”的呼吁，但是全部遭到了大马士革的拒绝。比利时首相胡斯曼和东欧几个国家的领导人甚至亲自来到大马士革，请求叙利亚政府赦免科恩。但他们的请求同样被置之不理。

正当以色列无计可施，处于绝望之时，一起偶然的突发事件又让他们看到了一线希望——1965年3月7日，以色列反间谍机关在海法一下子逮捕了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以色列立即公布了他们的名字，并向叙利亚政府提出，可以用这5名叙利亚特工人员换回科恩。

但是，叙利亚当局对以色列人的这种“亏本”的建议，没有作出任何回应。他们似乎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不能让科恩再留在这个世界上。

尽管如此，以色列的营救工作并没有由此而停止——直到科恩在大马士革的烈士广场被处死后，这种营救活动才宣告结束。

1965年5月18日深夜，科恩的牢门被打开了，几个人走了进来。在微弱灯光下，科恩看到了几个叙利亚士兵的身影，在那些士兵中间还有两个人站在那里：一个是叙利亚特别军事法庭庭长戴利上校，一个是满头白发的法学博士安达博。他们的到来使科恩预感到了什么。

戴利上校命令科恩穿好衣服，立正站好。然后对他宣布：“今晚你将被处以绞刑。”

接着，安达博走上前来，怀着悲痛的心情用颤抖的声音念着希伯来语的祈祷文，为科恩作最后的祈祷。这位慈祥的老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泪水不断地流过他的面颊，以致不时将祈祷的经文读错。科恩轻声而有礼貌地为他纠正——作为一名职业间谍，科恩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所以他的内心很平静。

科恩很快就被押上了囚车送往刑场。囚车来到了大马士革烈士广场，在广场边的警察局门口停了下来。科恩被带进警察局。戴利上校对他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愿意留个遗嘱或写封诀别信。”

科恩平静地说：“我没有罪，也不欠别人的，我不

需要留下遗嘱。但是我要对我的家庭尽最后的义务，我要给他们写封信。”

拿到了笔和纸，科恩就开始不慌不忙地为他的妻子和他的家人，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他的遗书——

我的娜迪亚和亲爱的家人们：这是我写给你们的最后几句话。我恳求你们要一起生活下去。娜迪亚，请你宽恕我，并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你要设法使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你自己要多加保重，要多关心孩子们，让他们不要缺这缺那。同家人要永远和睦相处。

同时，我希望你能再嫁，让孩子们也有个爸爸。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千万不要整天为已不复存在的东西哀伤。要永远向前看。

让我向你吻别，并代我向索非、艾里斯、绍尔和家里所有的人吻别。不要忘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告诉他们，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思念他们。

你们不要忘了为拯救我父亲的亡灵、解救我的灵魂而进行祈祷！

顺致我最后的吻别。

祝一切安好！

科恩用阿拉伯文写完这封信后，踌躇了片刻，又要了一张纸，用法文把这封信再抄了一遍，然后就被士兵押出了警察局，一直朝戒备森严的广场走去。为他准备的绞刑架设在广场上，并用铁丝网围着。

这时许多市民都从梦中醒来，带着惺忪的睡眼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等待着看一看这个神秘的以色列间谍。因为在从科恩被捕到现在的三个月内，大马士革的大小报纸都对科恩进行了极力渲染。对于大马士革的居民来说，这个以色列间谍已成了一个具有神奇魔力的非凡人物。

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科恩平静地走到绞刑架下，让人把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几分钟之后，科恩的生命结束了。

科恩扑朔迷离的一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传奇间谍的形象。在一年之后的那场著名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正是凭借科恩提供的情报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所向披靡，赢得了那场战争。

科恩死后，被叙利亚人埋葬在大马士革广场的墓地里。几十年过去了，以色列政府，还有他的妻子和家人都在要求领回科恩的遗体，但一直没有得到叙利亚的同意。

在摩萨德近60年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许多传奇的特工，伊利·科恩就是其中之一。几乎在科恩落网并被判处绞刑的同时，摩萨德另一名传奇特工也在埃及被警方捕获——他就是被称做“东方佐尔格”的摩萨德特工沃尔夫冈·洛茨。

第八章 “香槟间谍”现原形 五千战俘换回来

摩萨德特工洛茨有“东方佐尔格”之称，他以德国人的身份潜入埃及，以养马专家的身份加入了骑士俱乐部，成了警察局长家的常客；从他的浴室搜出一台微型电台后一切狡辩和抵赖都无济于事；被捕后以色列政府以包括9名埃及将军在内的5000名埃及战俘将他换了回来，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身价竟有如此之高。

一个没有接受“割礼”的犹太人

1921年，沃尔夫冈·洛茨出生在德国曼海姆。他的父亲汉斯是一个基督教徒，戏剧导演；母亲海伦尼是

犹太人，是一位职业演员。由于父亲不是犹太人，因此洛茨小时候没有受过“割礼”。

洛茨的童年是在德国度过的，也许是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洛茨从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表演天赋。洛茨于1931年进入柏林莫姆森人文中学学习。不久他的父母就离婚了。母亲为了逃避希特勒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带着洛茨移居到巴勒斯坦。洛茨进入了本西蒙的一所农业学校学习。在这所学校读书期间，他对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会了骑马、养马、相马和关于马的一切知识，这些知识在他后来的情报生涯中都派上了大用场。

随着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移民之间的对立愈发尖锐，犹太人建立起自己的秘密军事组织“哈加纳”进行防卫。1937年，年仅16岁的洛茨加入了该组织，成为哈加纳中一名最年轻的战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洛茨参加了英国军队。由于精通德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4种语言，他被派到埃及帮助审讯纳粹战俘。整个二战时期，他都是在埃及和北非度过的，成了一名经验丰富的战士。

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洛茨指挥一支部队参加了拉特伦的战斗。由于这支部队都是由一些犹太移民临时组成的，缺乏训练，又没有精良的武器装

备，战斗打得非常艰难。但是由于洛茨指挥有方，最终还是打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从此在以色列的军队中小有名声。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时，已晋升为少校旅长的洛茨率部参加了对埃及的作战。不过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洛茨就永远地离开了部队。

不久，洛茨就被以色列的“阿穆恩”（即军事情报局）看中了，被招募为特工。洛茨之所以能被阿穆恩看中，首先在于他有在在德国生活的经历，以及他那身躯健壮、皮肤白皙、头发金黄的外表。这些都让他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装扮成一个德国人。此外，他又很能喝酒，这也完全符合人们对于德国军官的一般想象，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内在的表演素质。洛茨极善于与人聊天交往，并且很快便可以厮混得烂熟，成为知心朋友。他也适合扮演一个阔气大方又讨人喜欢的男子。而这些素质对于一个特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沃尔夫冈·洛茨就成了阿穆恩的一名特工，开始了他那神秘而又刺激的间谍生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洛茨被送到间谍机关进行专业训练。这种训练对他来说既新鲜又刺激，他克服了种种困难，很快就掌握了一名特工所具备的各种技能。当时，由于以色列和埃及的关系很是紧张，以色列就准备把他派往埃及。于是洛茨的训练又多了一项

内容，就是尽快熟悉埃及政坛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并且把阿拉伯人的一些社交礼仪都弄清楚，不要到时候弄巧成拙。没过多久，洛茨就把这一切都娴熟于心，为他后来在埃及成功地进行间谍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就是等待时机打入埃及。

没过多久，一个机会来了——1954年，埃及政府发起了一场“排犹”运动，纳赛尔政府甚至请来了许多前德国纳粹分子，为其排犹运动效力。阿穆恩认为这正是以色列特工打入埃及的极好时机，就决定让洛茨以德国人的身份进入埃及。在洛茨打入埃及之前，阿穆恩为他伪造了一份半真半假的人生履历。洛茨新的人生履历如下：

1921年出生于德国曼海姆，1933年进了柏林的莫姆森人文中学。中学毕业后参加了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德军元帅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第115师服役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在澳大利亚居住了11年，成了一名跑马场的老板，聚敛了一大笔财富，是一位育马专家。由于思念故乡，后来又回到了德国。

根据这份新的履历，洛茨首先被派往德国，并且在柏林申报了户口。然后又在德国变换了好几个住处，在那里滞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内，洛茨充分发挥自己的表演天才，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职业和身份。他先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对现政府不满的纳粹军官，后来又变成了一名很富有的德国商人。在柏林时，洛茨还加入了一家柏林骑马爱好者俱乐部，并意外地遇上了一位名叫伊莱亚斯·戈登的商人，就是这位德国商人后来为洛茨顺利地打入埃及铺平了道路。

这位德国商人发现洛茨在养马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对他极为佩服，就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也是一位酷爱马匹的商人。后来他们就相约到埃及的尼罗河畔去开展自己的生意，准备在那里建立一个阿拉伯纯种马养殖基地，开办一家马术中心。为了最后敲定这项计划的可行性，这两位商人就决定由他们出钱，请洛茨先去埃及进行一次短期实地考察。这也正是洛茨盼望已久的机会，于是就一口应承下来了。

“育马专家”来到埃及

1961年1月初，洛茨以一名德国旅游者和育马人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踏上了去埃及的旅途。经过一段短暂而愉快的旅行之后，洛茨顺利地来到了埃及的港口

城市亚历山大，住进了一家档次很高的旅馆。安顿下来之后，洛茨就以一名骑马爱好者和育马专家的身份，来到由埃及骑兵军官主办的骑士俱乐部。

一进这家骑士俱乐部，洛茨就成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人。理由很简单：首先他是个骑马爱好者，育马专家；其次他还是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个德国人。在这里，洛茨发挥出表演和交际的特长，很快就认识了该俱乐部的名誉主席——亚历山大市警察局长尤素福·阿里·古拉卜将军，并且很快成了他家的常客。随后，这位尤素福将军又把洛茨隆重地介绍给俱乐部的其他军官，称他是德国首屈一指的育马人和驯马专家。就这样，洛茨仅用了6个多月的时间，就结识了当地一大批社会名流和成功人士。因为马术俱乐部本来就是贵族和名流们聚会的地方，何况还是军队的骑士俱乐部，而且他还是警察局长尤素福将军的朋友。洛茨正是利用这种身份取得了那些人的信任，很快就成了当地的一位名士。

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开头，下面的工作就顺理成章了。在那些人的心目中，洛茨是一个腰缠万贯、骑术精湛的前德国纳粹军官，不但平时出手大方，而且风度潇洒，谈吐幽默，很快就融入了他们当中，成了一名深受当地上流社会所欢迎的人物。为了更好地开

展活动，洛茨特别注意与那些骑兵部队的埃及军官建立友谊，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喝酒，同他们海阔天空地胡侃神聊，在这种吃喝玩乐当中得到有价值的情报。通过半年的时间，洛茨完全可以确定，如果以现在的身份在埃及潜伏下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于是就找了一个借口返回欧洲，在法国同潜伏在巴黎的联络官接上了头，向他汇报了自己在埃及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活动计划。

那位联络官听了洛茨的汇报之后，帮他分析了一下，觉得洛茨的潜伏计划切实可行，就交给他一大笔活动经费和一台微型收发报机，并向他下达了两项正式任务：一、确定埃及防御工事的方位，了解它的军事价值；二、对即将抵达埃及的德国和奥地利的飞机导弹设计师进行监视。

从此，洛茨在埃及的间谍生涯就正式开始了。

不过让阿穆恩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以色列情报机构一名外派的职业间谍，洛茨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实在是太差了。在法国期间，洛茨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位德裔美国女子，对她一见钟情，立即坠入了情网，马上对她频频发起攻势。这位德裔美国女子叫瓦尔特劳德，蓝眼金发，美丽动人。她毕业于瑞士旅游专科学校，在洛杉矶一家大旅馆的经理室担任秘书工作，此

次是回德国探望双亲。

令洛茨没有想到的是，尽管自己也是一表人才，而且还很有钱，但这位美丽动人的金发女郎却不为所动，让洛茨无从下手。但是军人出身的洛茨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抱着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倔强再度出击。也许是洛茨的真诚终于打动了瓦尔特劳德的芳心，没过多久，他们就热恋起来了，出双入对，并且开始谈婚论嫁起来。

洛茨的这个做法让阿穆恩总部知道后，感到又头疼又气愤。更让阿穆恩总部始料不及的是，洛茨不仅执意要与这位美国女子结婚，还向她透露了自己的间谍身份及他所执行的任务。结果，在没有经过阿穆恩批准的情况下，洛茨便同自己心爱的女郎瓦尔特劳德结了婚。阿穆恩总部知道后，也拿洛茨没有办法，只是命令他立刻回埃及，但是不能带着妻子同来。得知总部不同意，洛茨竟然威胁总部说，如果不让带着妻子，他就不回开罗。时任阿穆恩局长的梅厄·阿米特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

阿米特认为，尽管洛茨这个人有种种毛病，的确有时让人感到不舒服，比如说他平时有些过于鲁莽的言行会让人家感到不高兴，又比如说他太喜欢喝酒了，而每次都喝得太多；另外他向那些埃及朋友赠送

礼物时，又过于大手大脚……但是，对于从事谍报工作来说，洛茨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别是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不仅能够巧妙地改变自己的身份，而且成功地获得埃及方面的认可和信任，这就足以证明他是一名优秀的特工人才。就这样，洛茨得到了阿米特的理解，带着新婚妻子一同回到埃及。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洛茨的妻子瓦尔特劳德知道洛茨的真实身份以后，不但不反对，还全力以赴地支持他的工作，后来竟然成了他的一名得力助手。

夫妻双双回到埃及后，洛茨开始对自己的妻子进行一些必要的训练，耐心地给她解释各种秘密工作的规则。在洛茨的指导下，瓦尔特劳德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特殊的生活，成了洛茨得力的帮手。夫妻两人都生活在开罗，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更容易掩护他们那种特殊的身份。如果是一个单身汉住在这里，时间一长，也许会引起别人的怀疑，现在就显得很正常和自然了。从此他们俩密切配合，工作开展得很是顺利。

“香槟间谍”

洛茨带着漂亮的妻子回到埃及后，不但再次受到

了尤素福将军等人的热烈欢迎，而且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成了一个真正的育马人。那些骑士俱乐部的朋友们对他们夫妇更是另眼相待，都亲切地称他为“大胡子”。当时的骑士俱乐部刚好位于尼罗河岛上的吉齐赫体育俱乐部跑马场附近，旁边就是军队驻地，这对洛茨从事间谍活动实在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洛茨夫妇花了一大笔钱买进了几匹阿拉伯纯种马，并且聘请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教练穆里凯做他们的驯马师，帮他进行训练。当时洛茨对外宣传说是看中了穆里凯教练的骑术，实际是看中了赫利奥波利斯马术中心的位置。因为除了运河地区的若干武装部队之外，当时埃及的军队实际上都集中在赫利奥波利斯附近沙漠中的一个庞大的基地上。那些摩托化部队每一次较大规模的行动都必须从这里出发。他们的马术中心正好就在军事基地附近。

于是，每天清晨洛茨都会带着他年轻美貌的妻子来到马场，观看穆里凯训练马匹。在外人看来，洛茨经常站在一个五米高的塔楼上，手持高倍望远镜观察驯马，并且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是出于对自己那些价格昂贵的纯种马的关心，谁会想到，洛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站在高塔上的洛茨这时只要把手中的望远镜稍稍向右移动一下，便可将近在咫尺的军事基

地内的一切活动尽收眼底。凭着间谍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的经验，洛茨几乎一眼就可以辨明基地里那些车辆的类型，并且马上就能判断出，他们是在进行战术调动还是在进行一般日常演习，是部队出来训练还是把军队的车辆开出来修理等等。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观察，洛茨准确地判断出了埃及装甲部队向西奈半岛调动的重要情报。

当然，这一切都是光天化日之下，在埃及军人的眼底下进行的。

骑士俱乐部的军官们很快发现，富有的洛茨先生对这些阿拉伯纯种马的兴趣与日俱增。一次，骑兵军官阿勒维·加齐上校向洛茨打听买马的事情。洛茨明确地告诉他，马肯定是要买的，不过是由于至今还没有自己的马厩，不知道买下马以后该把它们放在什么地方。因为俱乐部的马厩已经塞满了。加齐上校告诉他说，你完全可以把你的马放到阿巴希军营的马厩里来。阿巴希骑兵部队的指挥官、障碍赛马队队长奥马尔·哈达里上校这时也友好地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可以，他有的是地方，每一匹马都可让一名士兵好好地照料。

听到加齐和哈达里两位上校这个友好的建议，洛茨故作惋惜地说：“非常感谢你们这种友好的建议。但

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有一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们知道，我是不能随便出入你们军营的，所以我就不能随时去看我的马了。你们说这不是要了我和我夫人的命吗？”

两位埃及军官听了洛茨的话后都哈哈大笑起来。

加齐上校对洛茨说：“大胡子，不会要你和夫人的命的。这件事我们来帮你解决吧。哈达里上校你说怎么样？”

哈达里上校立刻说：“没问题。我们给你们夫妻办个特别通行证，这样你们不就可以随便出入了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洛茨一听又故作惊讶：“那行吗？我的朋友。”

哈达里上校大手一挥：“明天我就把特别通行证送到你们手上。现在你就把你和夫人的照片给我们好吗？”

洛茨连连说：“好好好，现在我请你们二位去喝一杯，如果你们有空的话。”

从那以后，阿巴希军营便向沃尔夫冈·洛茨夫妇敞开了大门。他们拿着特别通行证，走进埃及人的军营就像走进自己的卧室一样方便。后来次数多了，连门口站岗的哨兵都熟悉了，从来不要他们出示什么证件。而那些军官们更是每次都热情地接待他们，甚至

还带着他们夫妇在军营里到处走动，领着他们参观军营里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对于洛茨来说，埃及的这个军事基地再也无秘密可言了。

从此以后，洛茨的朋友越来越多，除了骑士俱乐部的尤素福将军和手下的一群年轻的军官们之外，还有军事后勤专家阿卜杜勒·萨拉姆·苏来芒将军、军事反间谍局的福阿德·奥斯曼将军和穆赫辛·赛义德上校，到后来甚至连埃及共和国的副总统侯赛因·沙菲都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这些人都把洛茨看成是一位前纳粹军官，对他相当信任，经常和他在一起骑马、喝酒。就在友好的交往当中，在这一次又一次不经意的谈论当中，这些军官们都把许多宝贵的情报免费送给了洛茨，而洛茨和他的夫人每到晚上，都要关上门来忙碌一阵子，把那些从马背上和酒杯中得来的情报一次又一次地传给以色列的阿穆恩总部。

有一次，洛茨夫妇邀请尤素福将军和他的部下到自己家里做客。将军和那些朋友们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他们就在烛光下，在小提琴优雅的乐曲声中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香槟、白兰地和威士忌，吃着松脆的烤松鸡和德国牛排，浪漫而又友好。这时，尤素福将军为了感谢主人的盛情款待，还当场友好地表示在有空

的日子里，愿意陪同洛茨夫妇骑着马一起进行一次旅游，让他们领略一下这座城市的郊外风光。洛茨夫妇愉快地接受了邀请。随后，洛茨便让夫人继续与尤素福将军聊天，自己则转身来到了福阿德将军身边，因为这些人刚才在谈话中提到了“破坏”一词。一种间谍的敏感让洛茨的神经马上兴奋了一下。就举起酒杯对福阿德将军说：“将军，难道您碰上了什么不愉快吗？”

福阿德将军犹豫了一下，还是私下里悄悄地对洛茨说，最近有一家旅馆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死了5个人，据说是以色列人干的。经过调查发现那些炸药是装在一个备件箱里从外面运进去的。福阿德将军说完后对洛茨说：“你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不能让外界知道这件事。”

洛茨默默地点了点头。

几个小时的畅饮之后，宾主之间交谈的兴致越来越高。渐渐地，客人们就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在各说各的，谁也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这时只有洛茨一个人是清醒的，因为他的酒量是没有对手的。一会儿，他就离开了福阿德将军，悄悄地坐到了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的身边。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是负责陆海空三军的调动和弹药运输的。

阿卜杜勒·萨拉姆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被打断了一条腿，所以这位瘸腿将军永远是满腹牢骚，好像全埃及人都欠他一条腿似的。现在他又是老生常谈，说埃及的士兵不仅缺乏训练，士气也不高；指责行政部门办事效率低下，部队军官不能作出任何决定，战术观念又陈旧至极。他还说，虽然政府请了许多苏联人来指导工作，却又不信任他们。军队之间没有配合，发出的命令相互矛盾，或者是完全失去了指挥。对于这样的牢骚洛茨以前也听过，虽然已经没有新意了，但洛茨还是默默地听着，时不时和这位瘸腿将军碰一下酒杯，并恰到好处地附和一下。此时让洛茨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是听说埃及已经把一個步兵旅从此地调到了运河地区，并且装备了一批苏联的飞机和武器。他想通过这位瘸腿将军证实一下埃及人是否准备打仗了。随着交谈的深入，阿卜杜勒·萨拉姆将军不仅证实了部队调动的事，还透露了战争虽然不是立刻就打，但终究不可避免的消息。

当晚，等客人们散了之后，沃尔夫冈·洛茨就把在这次宴会上听来的情报及时地发给了以色列情报总部。后来，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步兵旅调到运河地区的真正企图，洛茨夫妇还装成一对去死海游泳的普通游客，到运河区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

就这样，沃尔夫冈·洛茨在埃及的日子不仅过得惬意而又浪漫，而且广交埃及上层名流，在同那些军官和名流们一次次的推杯换盏之中，轻而易举地搜集到了各种情报。这段时间，洛茨准确地获得了埃及最新式导弹、火箭和飞机制造的情报，掌握了埃及军队的分布情况，他把这些情报及时而又准确无误地报告给了以色列总部。

“两年前我们就对你进行了‘扫描’”

1963年，阿米特调任摩萨德局长后，洛茨也由阿穆恩转到了摩萨德下面，依然归他领导。阿米特对洛茨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称其为特拉维夫的“开罗之眼”。

有一天，定居埃及的约翰·冯·雷斯邀请洛茨夫妇参加他们的家庭酒会。为了结识那些同雷斯频繁来往的德国专家，洛茨夫妇欣然赴约。没有想到在那次酒会上，他们夫妇竟然差一点儿露出了马脚——因为在雷斯家里，洛茨夫妇意外地见到了声名狼藉的埃泽勒。

埃泽勒是一个医生，一个地地道道的纳粹分子。二战期间，他曾在纳粹集中营里对许多犹太人进行过危及生命的“科学试验”，把那些犹太人当成他的试验

品，导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惨死。二战结束后，这个埃泽勒至少受到了十几个国家的通缉，成了一名在逃的战犯。洛茨和他的夫人瓦尔特劳德虽然早已听说这个杀人狂正在埃及政治避难，但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在这种场合下能见到他。

更糟糕的是，雷斯这时竟把埃泽勒这个杀人犯介绍给洛茨。他对洛茨说，这也是我们的一位德国朋友，而且还是个医生，现在就在这里的一家飞机制造厂服务。

洛茨一听，内心真是热血沸腾，恨不得上前一步，一把将他掐死。但他还是冷静地走上前去，同埃泽勒握了握手，嘴里好像还在含含糊糊地说了声“认识您不胜荣幸”。因为他知道，自己如果在这种场合下发作起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不过，这时让他最担心的就是怕自己的妻子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于是马上向她投去了一个警告的眼色。瓦尔特劳德尽管在见到这个埃泽勒的第一瞬间也是怒火中烧，但是，机智而乖巧的瓦尔特劳德在接触到了洛茨的眼光后，并没有同这个恶棍客套，而是赶紧掏出手帕，说自己的眼睛里好像飞进了什么东西，然后就趁机去了盥洗室。她担心自己如果再多看埃泽勒一眼，说不定就会露出破绽。

洛茨和雷斯落座之后，就在一起喝着摩泽尔酒，开始友好地闲聊起来。

就在这时，冯·雷斯竟然毫不掩饰地对洛茨说：“朋友，也许你没有印象，其实我们早就见过面了，那是在战争末期万湖湖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不知你现在是不是还能记得起来？”

雷斯的这番话真的让洛茨听得一头雾水。他那只举着酒杯的手一时定格在那里不动了。他不知道雷斯说这句话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不过他还是很尴尬地笑了笑说：“实在抱歉，过去了这么些年，我好像已经想不起来了。”

雷斯又接着说：“那就让我再提醒您一下好了，朋友。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次您是穿着一身冲锋队常穿的黑色制服，一副精干而又威严的样子，当时真让我嫉妒极了。您不记得吗？”

洛茨一听，终于明白了，雷斯说这番话显然是没有恶意，他不过是在怀念那种逝去的时光。同时，洛茨又意识到，这个自以为是的雷斯肯定是认错了人，把自己当成了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纳粹军官了。但是，洛茨这一次不能再否定了，他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装成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样子，对雷斯神秘地一笑，不置可否。对雷斯的这种张冠李戴，洛茨当然是

求之不得，因为这对自己那种纳粹德国军人的身份无疑是一个人证。但是洛茨却又假装出一副很害怕的样子，矢口否认。

哪知洛茨的这种否认，让那个自作聪明的雷斯进一步肯定了自己的说法。他把洛茨的这种“否认”理解成了是洛茨的一种“害怕”——害怕别人知道了他这个前德国纳粹冲锋队员的身份，于是他马上友好地说：“朋友，您尽管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为您保密的。您说我是那种到处胡说八道的人吗？”

“好吧。那就谢谢您了！”

洛茨对他友好地举起了酒杯。

其实，洛茨根本就不会相信这个雷斯的保证，同时他更巴不得这个雷斯能一天到晚到处传播“认出”了自己的新闻。那样一来，就等于为自己现在的这种假身份做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旁证。在当时的埃及，那些前德国的纳粹军官很是受埃及一些人的欢迎，因此洛茨越是有意否认党卫军经历，相信的人反而越多。果然，那些在座的埃及文武官员一听说此事，立即兴奋起来，并且一个个面带笑容同洛茨频频举杯，并同他一起谈论起那些“光荣历史”。

约翰·冯·雷斯的这一次误会，让洛茨决定来一个将计就计，趁机使他的这种德国人的假身份更加让人深

信不疑。

洛茨首先让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为他搞一份材料，来证实冯·雷斯这种子虚乌有的故事的真实性。那份材料到手后，洛茨就把它装进了一个又大又厚的信封里面。一天早晨，他与瓦尔特劳德出去骑马时，故意把信封放在了起居室内的一张桌子上。他们中午回来后，洛茨就故意问仆人，这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仆人当然一无所知。洛茨打开那个大信封随手翻了翻，突然大叫起来，就当着我的面大骂瓦尔特劳德太粗心大意了，居然把如此重要的东西随随便便放在这儿。洛茨一边骂，一边又煞有介事地当着我的面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把这个很重要的大信封放到抽屉里，并且锁好。

几天以后，当洛茨再次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时，发现撒在信封上的那些粉末已经不见了，就连粘在信封和抽屉上的那根头发也不翼而飞。洛茨心里明白，这显然是埃及情报机关趁自己不在的时候，派人取出了其中的材料并且拍了照片。



情报人员经常使用的秘密开启信封的工具包

洛茨当时的这种估计并没有错——两年以后，他同福阿德·奥斯曼将军的一次谈话就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奥斯曼将军对他说，最近上面有了新的规定，不要轻易同外国人接触。洛茨马上笑着说：“我和我夫人都是外国人，是不是也要避免和我们来往啊？”

奥斯曼将军也笑着说：“你们哪，你们不算。上面对你们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不可能吧？”洛茨故意惊讶地问。

“当然可能。两年前我们就对你进行了‘扫描’，知道你当年就是一个很激进的排犹主义者。”

这次冒名顶替的的确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仅

在当时有效地掩护了他的间谍活动，更重要的还是在他后来被捕之后，因此成功地保住了性命，并没有像他的同事伊利·科恩那样被送上绞刑架。

在约翰·冯·雷斯家里的那次宴会上，洛茨夫妇还结识了援助埃及的德国飞机专家布雷纳尔和舒曼，并且很快就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两位专家喝了酒以后，经常为战斗机设计上的一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为他后来搜集埃及战机制造方面的情报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不久，洛茨夫妇在尼罗河三角洲买下一处环境优美的牧场。这座牧场有马厩、围栏、跑马场和一条赛马跑道，有关设施器材一应俱全。他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该牧场与埃及的一个火箭发射试验场挨得很近。这样，他们就可以近距离地记下火箭发射的准确时间和次数，这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军事情报。洛茨夫妇的埃及朋友们也经常光顾这个牧场，当着洛茨夫妇的面高谈阔论，为他们不断地免费提供着新情报。用洛茨自己的话来说，“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埃及武装部队的参谋部和技术人员找不到其他地方讨论问题似的”，都要到这里来讨论他们的军国大计。

洛茨充分利用埃及人对他们夫妇的信任，经常装成一副什么都不懂、但又什么都想弄明白的样子，常

常装模作样地向他们“请教”一些问题，表现出一种很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让那些埃及官员都觉得这“大胡子”憨厚可爱。洛茨后来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当时那些德国人确信，我连飞机发动机和咖啡粉碎机都分不清楚。我越是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他们越是坚持向我介绍和解释这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性的问题，好像不把埃及人的全部秘密都告诉我，他们就睡不好觉一样。”

洛茨就是利用这种环境和关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参观了连同试验场地在内的两个导弹发射井，听了有关两个飞机工厂的详细情况，并且详细地了解了在军备工业部门工作的几乎所有德国专家的详细人事安排，以及有关红海的军舰情况，同时还获悉了关于西奈半岛上全体部队和物资的运输情况……真可以说是收益颇丰。

有一天，洛茨夫妇在牧马场遇到了德国专家福格尔桑，就同他套起近乎来。很快就知道福格尔桑要到慕尼黑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并且还打听到了福格尔桑此番去慕尼黑所要下榻的旅馆，甚至连房间号码都了解得一清二楚。那位德国专家还对洛茨很感叹地说，自己去德国出席这么一个重要的会议，埃及政府却连一个像样的公文包都不给自己准备，并且说原来

的那个公文包已经太旧了，有的地方还开了线，根本没法装他要带走的计划和资料。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洛茨一听，觉得又是一个机会来了。当天下午，洛茨就买下了一只十分精美而又昂贵的公文包，托人把它捎给福格尔桑。在送包的同时洛茨已经做了手脚，把公文包上一把备用钥匙偷偷地留了下来。当天晚上洛茨向摩萨德总部报告了福格尔桑等人抵达慕尼黑的时间、旅馆名称和房间号码，并且把手中的这把备用钥匙转到了特拉维夫总部。

在这份情报中，洛茨还详细地提到了如何窃取福格尔桑等人的公文和资料的计划。他说，这个福格尔桑只要一到晚上，就喜欢出去同女人厮混，因此晚上他的房间里肯定是空无一人。这样就可以利用这把备用钥匙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开福格尔桑的公文包，找到他们需要的文件和资料。

摩萨德总部得到这份情报后，马上通知了派驻慕尼黑的那些特工，并且在两天之后，派专人将那把备用钥匙送到了慕尼黑。慕尼黑立即派出两名特工，到福格尔桑等人下榻的旅馆开了个房间，而且就住在同一楼，随时密切监视福格尔桑等专家们的动向。那天晚上，等到福格尔桑一下楼，那两名特工就立刻潜入

他的房间，用这把备用钥匙轻而易举地打开了福格尔桑那只崭新的公文包，把里面的文件和资料一字不落地进行了拍照，毫不费力就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情报。

神秘的小轿车开到了导弹基地

1964年夏季的一天，摩萨德总部给洛茨发来一道紧急密电，命令他要不惜一切代价，马上查清楚埃及沙卢发导弹基地的真相，因为他们怀疑那里有一些蒙蔽以色列人的导弹模型。

接到命令的第二天清早，洛茨夫妇就驾着他们心爱的大众牌小轿车上路了。洛茨身穿一件花里胡哨的名牌上衣，下穿白色运动裤子，头戴一顶浅红色的帽子，鼻子上架着一副花花公子眼镜。他夫人也是身穿白色长裙，天蓝色的上衣，戴一顶白色无檐帽。他们带着钓鱼竿，装成到海边去钓鱼的样子。小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奔。快要抵达苏伊士市时，洛茨把车往左边一拐，下了高速公路，然后又拐了两个弯，穿过铁路，来到通往沙漠深处导弹基地的公路上，朝伊斯梅利亚方向驶去。沙卢发导弹基地就在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之间。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公路口。那里竟然没有路障，

只是在岔路口设有一个岗亭。一名戴着警戒袖章的士兵在岔路口站岗，显出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手枪随便地挂在腰带上。当洛茨驾着车从他面前驶过时，居然丝毫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洛茨驾着车子来到了岗亭前，紧挨着岗亭停了下来。突然他发现那名哨兵把腰带和手枪都挂在岗亭里的墙壁上，自己却跑到离岗亭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蹲在地下方便。洛茨觉得是个好机会，立即换上他的妻子开车，并叫她加速前进。瓦尔特劳德在油门上猛踩一脚，车子朝左边飞也似的开去。当车子驶过岗亭很远了，他们才看到前面有一块牌子，上面用阿拉伯文和英文写着“禁止通行”的字样。他们知道这里离导弹基地已经很近了。

这时，他们才听到背后传来呼喊声。洛茨从汽车后视镜中可以看到，那名刚才在方便的士兵这时正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不停地挥动着，朝着他们的车子在大喊大叫。但是洛茨并没有理睬他，而是叫妻子继续加速。他们的车子沿着起伏的公路向沙漠深处驶去。

不久，迎面开来了一辆满载士兵的吉普车。吉普车从他们车旁驶过时，车上的士兵们都好奇地望着这对穿着花里胡哨的外国人，然后掉转车头跟上来。

洛茨知道，吉普车追上来了，他们一定会受到警

告，然后再让他们从原路返回。这时，他突然心生一计，叫瓦尔特劳德把方向盘一打，把车子开到沙漠里去了。洛茨知道，只要把车子一开进去，就得鼓捣好几个小时才能出来。这样既可以让那些士兵相信他们是不小心开到这里来了，又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把近在眼前的导弹基地看个清楚。在洛茨的指使下，瓦尔特劳德加快了速度，把汽车从公路的这一边晃到那一边，装成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洛茨则充分发挥他那出色的表演天赋，扮演起一个粗暴的丈夫的角色，挥动着手臂痛骂妻子无能。同时，他们的车子还一直朝沙漠深处开去。

直到那辆吉普车追上来后，他们才不得不刹住了车。那些士兵跳下车来包围了他们，然后用阿拉伯语问他们“怎么进来的”，“到这里来干什么”，他们才故意装作不懂阿拉伯语，和他们争执起来。这时一名军士命令吉普车司机开车回基地报告情况。十分钟后，吉普车回来了，司机旁边坐着一名上尉。上尉用英语简单地对他们进行讯问，检查了他们的护照，又将他们的车子仔细地搜查了一遍，然后居然把他们带回了基地。

当吉普车开上一座小山坡后，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排列有序的导弹发射架、弹药仓库和指挥大楼。虽然

洛茨和妻子都尽量控制自己不去东张西望，但洛茨仍能感觉到瓦尔特劳德的身体由于兴奋而颤动着。他们把基地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且牢牢地记住了。他们出发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次任务会完成得这样出色。

基地司令对上尉擅自将两人带到基地来深感愤怒，但又无可奈何，随后就开始对洛茨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盘问，洛茨表现得很从容。当基地司令怀疑他们是间谍时，洛茨故意怒气冲冲地发起火来，并搬出了尤素福·古拉卜将军。

他说：“我同尤素福·古拉卜将军是好朋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不信你可以给将军打个电话证实一下。不要跟我没完没了好不好？朋友！”

基地司令果然将信将疑地同尤素福·古拉卜将军通了电话。只听到他对着话筒连声说“是，是。好，好……”

放下话筒后，基地司令马上满脸笑容地向洛茨夫妇道歉，并且说这是自己职责所在，“请多多原谅”。

洛茨一听，就顺势给了基地司令一个台阶，也连声说：“这是应该的。我回去后会让将军嘉奖你。”同时，他还热情地建议基地司令应该考虑在公路旁边竖些横木，以防止今后发生类似事件。然后就同基地司

令热情地握了握手告辞了。当洛茨挽着妻子的腰走过走廊时，基地司令还从旁边赶上一步，走近洛茨说：“奥斯曼将军很敬重您。”并且暗示自己知道洛茨是党卫军军官。

洛茨挥了挥手，然后开着车愉快地离开了导弹基地，当天晚上就把自己看到的关于导弹基地的一切报告发给了摩萨德总部。

1965年春天，洛茨夫妇和瓦尔特劳德的父母以及德国专家克尼泼费尔夫妇等一行数人，应邀一同去马特鲁港。在总督府门前，他们受到了西部地区总督尤素福·阿里·古拉卜将军全家的热烈欢迎，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玩了几天。

浴室里的微型电台

1965年2月22日下午，洛茨一家驱车返回开罗。清晨抵达家门口时，洛茨惊奇地发现马路对面停着四辆汽车。等到洛茨走下车，坐在对面车里的人也从车里走了下来。当时洛茨还在开玩笑地说：“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是不是邻居今天请客啊……”还没等他的话说完，洛茨的头上就重重地挨了一下，身子晃了两下，扑倒在地上，6名大汉走过来把他围在中央。当洛茨明

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咔嚓”一声，他已经被戴上手铐拖走了。

埃及安全机关检察长萨米尔·哈桑亲自审问了洛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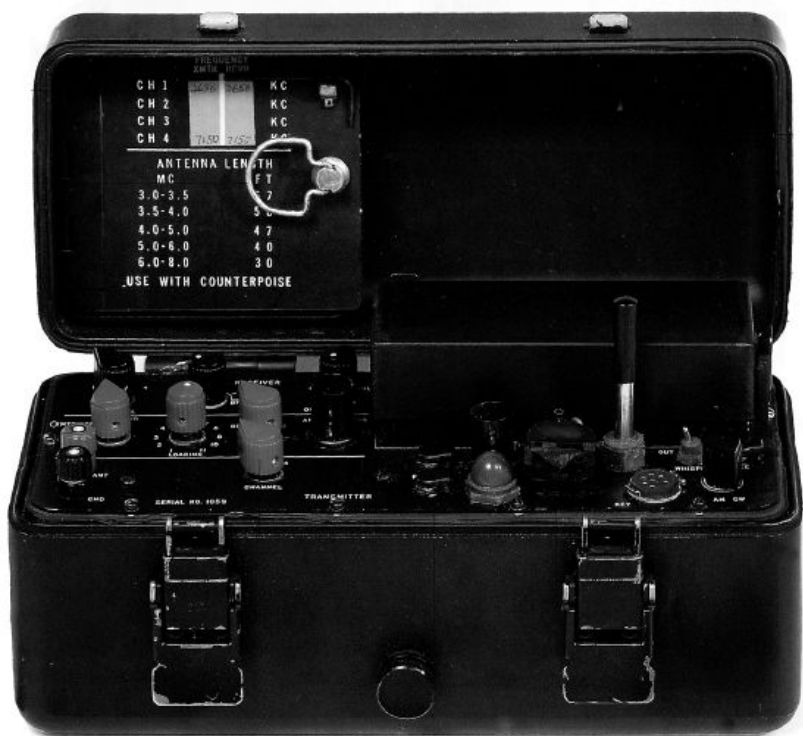
开始洛茨又是故伎重演，搬出各位将军和埃及的那些朋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的这些埃及朋友也都因涉嫌间谍活动而处境不妙。洛茨这才意识到此次事情不妙。他苦苦地回忆着，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出了纰漏。他很清楚，尽管埃及的安全机关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如果没有确凿证据的话，也不敢把一个阔绰的外国人打个半死，并且把他的全家都逮捕起来。

直到埃及秘密警察当着他的面，从他的浴室中取出那台微型电台之后，洛茨才知道自己的一切狡辩和抵赖都无济于事了。这位春风得意的摩萨德特工就这样被捕了。

洛茨被捕是和伊利·科恩犯了同样的错误。由于他大量地发报，频频同摩萨德总部联系，结果被埃及的安全部门测出了发报位置。埃及安全机关甚至录下了3年来洛茨收发的全部无线电信号。不久，埃及专家又成功地破译了所录下的全部电文，至此，洛茨与特拉维夫之间的来往电文已经不再是秘密了。事已至此，

洛茨只得承认一切，说自己是德国人，只是为了金钱才替以色列搜集情报。埃及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早已掌握了洛茨是前纳粹军官的铁证。此外，洛茨还咬定所有活动都是他一人进行的，他的妻子瓦尔特劳德是无辜的，她对此毫无所知。瓦尔特劳德再次表现出了她那间谍的天赋。尽管对方是把她和洛茨两人分开来审讯的，但是他们口供却出奇地一致。

洛茨夫妇被捕了12天之后，埃及安全机关才问他们是否同意接受电视台采访，并声称这样有利于改善他们的公众形象，最终还能获得从轻判决。洛茨自然不相信这些鬼话。他当然知道这些埃及人不过是想通过这件事，向世界表现一下自己，同时还可以趁机对以色列进行一番攻击。不过后来洛茨突然想到，以色列情报机关每天都收看埃及所有的电视节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借这个机会通知摩萨德自己已经被捕了，不能再同自己联系；同时还可以通过一两句话来暗示他们，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们做到心中有数。



谍用无线电台

于是，洛茨就答应了埃及人的要求。在采访中，洛茨承认自己当了间谍，是个爱财如命的德国人，并且强调自己的妻子丝毫不了解自己的间谍活动。当记者问他对整个事件有什么想法，埃及安全机关如何对待他们时，洛茨回答说：“对于我所做的事情，我当然十分后悔。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由于自己利欲熏心而给埃及造成了严重损失。我需要在此声明的是，在我被捕期间，始终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埃及一直把德国人看成是自己的朋友。”

最后，当记者问他是否想对德国的亲朋好友说点什么，洛茨知道这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就说道：“如果以色列今后还要派间谍来埃及的话，它最好应当去找自己的公民，而不要再去收买德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了。同时，我也真诚地劝那些想为以色列干事的外国人赶快放弃这个念头，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对电视台的这次公开采访和对洛茨的那些回答，埃及当局当然感到满意。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洛茨已经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这次机会，向摩萨德的领导人发出了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自己的假德国人身份迄今还没有暴露，请根据这种情况设法采取营救措施。

1965年7月27日至8月21日，埃及法庭对洛茨夫妇进行了公开审讯。在对洛茨审讯之前，为了证实他的德国人身份，法庭找来了两名法医，然后把洛茨带到一个房间里，命令他脱下所有的衣服。当洛茨赤裸裸地站在房子中间时，那两名法医才走上前去，在他全身上下检查了一番，然后又对他的生殖器进行了一番认真的研究。研究的结论证明，洛茨的确是一个没有接受过“割礼”仪式的德国人——如果他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么在他生下来之后就一定会对他实施“割礼”手术。两位法医在洛茨的身份证明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洛茨的德国人身份进一步得到了确认。

但是在审判期间又节外生枝：埃及法庭突然接到了一封来自德国的匿名信，检举洛茨是一名从德国移居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洛茨本人和他的律师都极力否认，并且要求法庭对这封匿名信进行调查。不过最后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埃及法庭并没有相信这封匿名信的内容，而是相信了自己的法医，并且拒绝调查。最后法庭对洛茨夫妇进行了终审宣判。判词如下：

“洛茨先生，本庭经过调查，认为你犯有不断为以色列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敌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罪行。根据你所犯的罪行，理应判处你死刑，但考虑到你的犯罪动机的确是为了钱财，在被捕后又能主动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因此对你实施减刑判决。现决定判处你终身苦役，并罚款33万西德马克。此判决将报请共和国总统最后批准。”

与此同时，洛茨的妻子瓦尔特劳德也被判处3年苦役，并罚款1万西德马克。

表面上看，是因为那么一个小小的“割礼”细节，让洛茨终于免去一死。如果确认了他是以色列人的话，则必死无疑。而实际真正的原因是埃及政府当时出于对外交政策调整的需要，正准备把那些德国专家从埃及清除出去，而又一时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正在这时突然发生了沃尔夫冈·洛茨间谍案，正好为此提供

了借口。于是洛茨就成了德国人的替罪羊。因此，即使当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洛茨是以色列人，埃及政府出于政治和外交的需要，也会说洛茨是个德国人而不是个以色列人。由于埃及当时还需要德国对其在经济上的继续援助，为照顾德国人的面子，洛茨也就被免除死刑了。

三个月后，洛茨被关押进马阿迪市郊区的图拉监狱。图拉监狱正好位于赫勒万军工厂和飞机制造厂之间。洛茨成了图拉监狱的第338号囚犯。

在与妻子分手的时候，洛茨平静而又自信地对妻子说：“我想我们的苦役不会很长的，也就是两年或者三年吧。家里人会设法救我们出去的。”

他的身价是5000名埃及战俘

1967年6月5日早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尽管埃及电台在不断地宣布埃军节节胜利、以军一败涂地的消息，但狱中的洛茨却根本不相信。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认为，以色列军队不可能遭受突然袭击。而埃及那些集结在西奈的庞大军队未被以色列发现，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他非常了解埃及部队的准确位置和兵力部署，他每次发给摩萨德总部的报告都是经过详

细核实的，即使是对那些似乎没有意义的细节也没有忽视，就连一些不着边际的谣言，也从不放过。因为作为一名军人出身的职业间谍，洛茨认为，有些事实的真相就是掩藏在那些往往不为人们所重视的蛛丝马迹之中。因此在战后，洛茨还是很自豪地说：“我没有理由去假设他们在这期间会改变以前的谨慎态度。”

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洛茨在监狱中听到了一阵沉闷的爆炸声。他马上就准确地判断出，这是以色列空军的飞机在附近投下的炸弹，这些飞机攻击的目标很可能就是赫勒万军工厂。他不由得为自己曾向总部精确地提供过一些重要军事目标感到骄傲。果然，几天后便传来了截然不同的消息：埃及军队一败涂地，以军不仅占领了西奈半岛，并且越过苏伊士运河，向开罗逼近。甚至还有传说，埃及纳赛尔总统已经逃到南斯拉夫避难去了。

1967年11月初的一天早晨，洛茨被叫到监狱长的办公室。这时，曾为他辩护过的德国人克拉尔·乌班告诉他一个好消息：“经过多方努力，埃及人原则上已同意释放你和你的夫人。当然，最终实现还需要一点时间。”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开始同埃及就交换俘虏的问题进行谈判，时任摩萨德局长的梅厄·阿米

特坚持要求将洛茨夫妇列入被交换的名单之列。以色列间谍伊利·科恩被叙利亚人送上绞刑架绞死之后，阿米特就一直为未能营救出这位“间谍王子”而感到自责和沮丧。因此，这一次他一定要把洛茨和他的夫人营救出来。但是，以色列政界的某些领导人当时却不愿意公开承认洛茨是以色列间谍，还要把他们算作是德国人。如果是这样，洛茨夫妇就得在埃及的监狱里待到他们服刑期满为止。阿米特认为政府要是这样做，无论是对洛茨夫妇还是对以色列的摩萨德特工都是太不公平了。最后，阿米特以辞职相威胁，使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被迫作出了让步，从而使洛茨夫妇有了逃出囹圄的希望。

1968年2月3日，洛茨被告知获得自由了。这是洛茨3年来无论是踱步于牢房，还是在睡梦中，最盼望听到的一句话。他甚至想象过当自己听到这句话时，或许会高兴得跳了起来，或许会跌坐在椅子上。然而，此时此刻，他竟然脑子里一片空白，仿佛已失去了表现感情的能力。

几天后，洛茨和妻子终于走出了图拉监狱的大门，被释放了。在开罗机场，沃尔夫冈·洛茨与瓦尔特·劳德在一名秘密警察的看押下，等候从卡拉奇飞往慕尼黑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这时，新任德国驻

埃及领事巴尔特勒斯博士也来了。他是担心埃及政府会在最后一秒钟又改变主意，而这种情况在他短暂的任期内已多次发生。

这时，那位领事先生突然压低嗓门问洛茨：“你知道你和你的夫人是怎样被释放的吗？”

洛茨摇了摇头，一脸的茫然。

巴尔特勒斯神秘地告诉洛茨说，其实在他们被释放的背后有一笔特殊的交易。原来，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表示：在埃及人没有释放在押的10名以色列人（其中包括洛茨和瓦尔特劳德）之前，拒绝释放包括9名埃及将军在内的5000名埃及战俘。洛茨听后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竟有如此之高的身价。但领事先生却保证这是事实。

和摩萨德的另一名优秀特工伊利·科恩相比，沃尔夫冈·洛茨是幸运的。几经周折以后，他和妻子终于死里逃生，平安地回到了以色列。

回到以色列以后，洛茨夫妇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乡村里定居下来。他的夫人瓦尔特劳德很快取得了以色列国籍。他们在那里过着幸福、舒适和安静的生活。后来，洛茨夫妇因厌倦了在以色列的生活而移居西德，在那里从事商业活动。但有趣的是，与其高超的表演技能和间谍能力相比，沃尔夫冈·洛茨的经商能

力显然要逊色多了，他在这个陌生的领域里并没有取得成功。

失望之余，他们又举家迁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从此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每当他们回忆起在埃及那些紧张、冒险的日子，洛茨夫妇都觉得那真是一段让人怀念的岁月。

第九章 “诺亚方舟”显神威 导弹快艇越重洋

面对来自埃及海上的威胁，以色列秘密向德国人购买“美洲虎”导弹快艇与之抗衡，不料情报泄密全世界一片哗然，导弹快艇建造工程只好秘密转到法国瑟堡港继续进行；摩萨德奉命实施“诺亚方舟”计划，圣诞节之夜穿越大西洋把5艘快艇偷到以色列，结果凭借这些舰艇赢得了那场“赎罪日战争”。

5艘导弹快艇不翼而飞

1969年12月26日，从法国瑟堡港传来一条惊动全球的爆炸性新闻——法国瑟堡造船厂为挪威建造的5艘导弹快艇，在圣诞节前夜竟然不翼而飞了。

这件事最早是由瑟堡的《英伦海峡灯塔报》记者发现的。当这位记者正要把这条新闻发表在报纸上时，法国的有关部门却给报社主编打来一个电话，叫该报不要报道与导弹快艇失窃有关的消息，否则会有麻烦。因此该报主编就把这条重大新闻给搁置下来了。可是，《法兰西西部报》的记者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在《法兰西西部报》上发表了这条新闻，各大报纸纷纷转载，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这件事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成为头条新闻呢？

原来这5艘导弹快艇不是一般的导弹快艇，是专为以色列海军建造的。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让以色列人给弄走了？一时间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当时可正是西方世界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的年代啊！法国国防部不得不紧急出来辟谣，新闻发言人说：“此事只是关系到该造船厂按合同转让给一家挪威贸易公司的几艘民用船只。”

法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话，更激起了那些记者们的兴趣，一连串的疑问浮出水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是“一家挪威贸易公司”，到底是挪威哪家贸易公司？通过进一步的追查，记者们终于得知，是一家挪威公司不假，不过不是一家“贸易公司”。这家公司是

挪威的一家石油勘探公司，其名称为“斯达博塔-维尔石油勘探公司”。公司的老板叫奥莱·西姆。于是，记者们又找到奥莱·西姆。西姆称确有此事。这5艘快艇是他们公司向法国的瑟堡造船厂订购的。现在这5条船正在驶往阿拉斯加的途中，准备在那里进行石油勘探。

西姆老板的这番话的确是低估了那些记者们的能量。原来那些记者早就打听到了确切的消息，那5艘快艇曾经在比斯开湾加过油。如果它们真是驶往阿拉斯加，那么，它们怎么会出现在驶往中东途中的比斯开湾呢？

面对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西姆只好笑而不答。

结果，法国国防部的那位新闻发言人，又在凌晨2点从床上被上司的一个电话“请”了起来。当他赶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发现那里已经挤满了记者，记者们连珠炮似的向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法国政府决定解除禁运了吗？

这些导弹快艇现在哪里？

你们所说的挪威人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用导弹快艇去找石油？

阿拉斯加？我们可不可以报道说，你能断定这些快艇就是朝阿拉斯加的方向驶去……

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这位新闻发言人已经有点

招架不住了。

紧接着，12月27日晚上，从直布罗陀又传来消息说，那5艘导弹快艇已经高速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正在向东方驶去。于是国际舆论一片哗然。这时所有的焦点都一下子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叫莫迪凯·利蒙——他的身份是以色列海军司令，当时任以色列驻法国巴黎使馆武官，是以色列驻巴黎的军火采购团团长。当时法国是以色列最大的军火商，差不多所有的先进武器都是法国人提供的。法国也由此发了大财。

善于外交的利蒙面对舆论界的质疑，面对记者的镜头，用一种冷静的外交辞令回应：“本人有愿望也有可能协助澄清这个可疑的事件。但是，就我目前所知，这些快艇已经出售给了挪威。或许诸位可以向挪威方面或者是巴黎政府询问一下，我对此的确是一无所知。”

这个皮球又给踢了回来。

不过，利蒙这番话见诸报端之后，却让巴黎市民和法国高层听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巴黎政府开始愤怒了。

要知道，当年正是这5艘导弹快艇的事，曾经惹烦过法兰西共和国的最高领导。刚刚上台的法国总统乔

治·蓬皮杜曾经就此下达过命令，不准这些快艇落到以色列人的手中。乔治·蓬皮杜是前总统戴高乐的学生，戴高乐曾经下达过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的命令，所以他也照章执行。为此，法国方面还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现在这5艘导弹快艇还是向特拉维夫方向驶去。所以，刚从郊区过完圣诞节回到巴黎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还有刚从国外访问回国的外长舒曼先生等人对此大动肝火，他们认为这件事是“整个法国的耻辱”。

法国有关当局被通知严密调查，这5艘导弹快艇是怎么从法国的瑟堡造船厂被偷走的？

秘密军火协议

从地图上看去，以色列国土地形狭长，两面又濒临地中海和红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因此，在以色列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较量中，海军力量的竞争向来就是一个重点。当埃及在20世纪60年代初获得苏联的先进战舰后，以色列也加紧了向德国采购导弹快艇的步伐。然而，就在1967年以色列发动了“六日战争”并且大获全胜之后，为了扼杀以色列的嚣张气焰，法国政府宣布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这对于以色列来说

无疑是当头一棒。本来以色列的海军力量就不强，根本就不是埃及海军的对手，而他们向联邦德国采购的快艇又遭到了法国人的“禁运”。为了获得他们已经订购了的导弹快艇，身负重任的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只好派出特工人员，施展“神偷”的手段，瞒天过海，从法国的瑟堡港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5艘导弹快艇给开走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舰艇。

在中东，以色列的国防装备还算是一个大国。他们的陆军、装甲部队和航空兵的战斗力的战斗力，就是和全世界各国的军队相比，也可以算得上是名列前茅。但是，以色列的海军却不敢恭维，其实力与其他军种相比大为逊色。在两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海军根本就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此加强海军的建设就成了以色列的当务之急。

在以色列的海军序列中，只有那条“埃拉特”号驱逐舰才算有些来头。这条军舰来自美国，原来是一条破冰船，1927年下水，而且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1947年被卖给巴拿马运河公司，后来落入犹太人的军事组织“哈加纳”之手，被更名为“犹太国”号，主要是用来向巴勒斯坦地区运送犹太难民。当年曾经与英国的军舰相撞过，结果它那坚硬的破冰船头给英国军舰以重创。以色列建国以后，“犹太国”号就被更名为“埃拉

特”号。尽管它出身卑贱，且血统不纯，但它还是成了以色列海军的主力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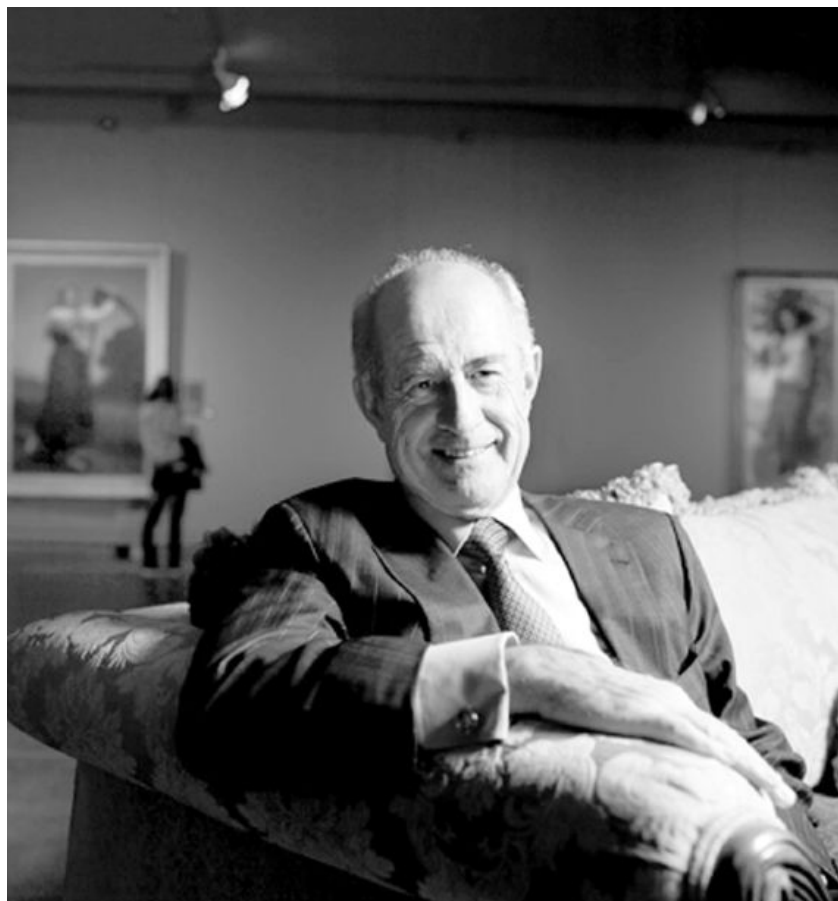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形势的变化，苏联首先提出建造导弹快艇的设想，他们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在海战中能发挥作用的只有那种装备了射程远、命中精度高的大炮，并且能够自动寻找目标的导弹快艇。于是在60年代初期，苏联就率先造出了装备“冥河”式导弹的“蚊子”级导弹快艇。

以色列情报机构很快就获取了这一重要情报，但是对这种海战武器的重要性和在海战中的价值却没有足够的重视。那时各国海军最崇尚的还是航空母舰和各种大型的战舰，对于这种小型的导弹快艇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令以色列人感到忧虑的是，它的敌对国埃及率先从苏联引进了这种导弹快艇，而且一下子就引进了6艘。在1962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从苏联引进的这6艘导弹快艇秘密驶入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军港。

这6艘导弹快艇是苏、埃秘密交易的一部分。当时，中东局势已经是诡秘难测，美国人的势力已经通过以色列在进行渗透。苏联为了打破美国人在中东地区的优势，保持一种势力均衡，便以出售军用物资的方式打入中东。可以说，这6艘导弹快艇就是苏联向中东地区进行势力扩张的前奏。这些导弹快艇对埃及和

整个中东地区来说都是非同小可，它们分别属于当时最先进的“蚊子”级和“黄蜂”级导弹快艇系列，是一种廉价而又有一定攻击能力的轻型舰艇，在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战舰。苏联的这些快艇除了装备“华约”国的海军外，还外销到印度、古巴等国。埃及拥有了这6艘导弹快艇，就使得埃及海军在中东地区保持了一种压倒性的优势。

这6艘快艇悄悄驶入亚历山大军港时，在离军港不远处的一幢高楼上的窗子后面，有一个30岁上下的男子，举着一架高倍望远镜偷偷地窥视到了这一切。这个男子就是潜伏在亚历山大的一位摩萨德特工。第二天，他就通过那些在埃及海军中服役的朋友，把这些导弹快艇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并在当天晚上，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摩萨德总部。



西蒙·佩雷斯

这份重要情报很快就送到了时任摩萨德局长的哈雷尔手中。哈雷尔一看到这份情报，觉得情况非常严重，立即去找总理兼国防部长本-古里安。哈雷尔对本-古里安说，现在埃及海军已经装备了这种威力巨大的导弹快艇，对以色列是一种巨大的威胁，特拉维夫和海法等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都将置于埃及海军的火力射程之内。

本-古里安当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拿着这份情报翻来覆去地看着，一直没有吭声。

这时，坐在一旁的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说：“这么说来，埃及人完全可以在我们的领海周围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了？我们的海岸线就是我们的生命线！敌人一旦控制了我们的海岸，我们将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一直在凝神沉思的本-古里安这时才说：“我们必须要拥有我们自己的先进的战艇。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派重兵防卫海岸线。”

“当然，”西蒙·佩雷斯说，“我们目前只有这么做。不过据我所知，埃及人弄来的这些‘蚊子’和‘黄蜂’级导弹快艇固然比较先进，但是还有比它们更为先进的舰艇，这就是‘美洲虎’导弹舰。在某种意义上说，‘美洲虎’是‘蚊子’和‘黄蜂’的克星。只要我们拥有了‘美洲虎’，我们海军的力量就可以压倒埃及，我们漫长的海岸线就可以获得安宁。”

“看起来，你是想搞到‘美洲虎’？能搞到吗，西蒙？”本-古里安说。

西蒙·佩雷斯没有正面回答总理的问题，而是说：“据国外有关军方资料显示，‘美洲虎’目前只有联邦德国可以生产。我们目前同德国并没有建立正式的

外交关系，但是，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先生已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愿意同我国改善关系。他是一位温和分子，现在年事已高，即将离任，但他一直为二战期间犹太人遭到惨无人道的灭绝性大屠杀而深感内疚。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同阿登纳先生商榷，以他为突破口，打开通向西德军界的大门。我们提出购买‘美洲虎’的要求，相信德国人不会为这种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的事而拒绝我们。”

“那好，我就全权委托你去促成这件事。希望你马到成功！”本-古里安拍着西蒙·佩雷斯的肩说。

哈雷尔也说：“那我们就期待着，西蒙。”

不久，在双方非正式驻外使节的安排下，西蒙·佩雷斯飞到了波恩。

抵达波恩后，西蒙·佩雷斯很快便与阿登纳进行了秘密的接触。阿登纳对西蒙·佩雷斯的来访表示十分高兴，当谈到购买“美洲虎”导弹快艇时，阿登纳表现得十分积极，答应将全力促成此事。最后阿登纳还非常坦诚地对西蒙·佩雷斯说，西方国家包括西德在内，对阿拉伯的石油有着无法摆脱的依赖性，尤其是在现在国家经济处于恢复与发展的关键时刻。所以，对以色列出售军火的事，无论如何不可以让媒体知道，否则，那些阿拉伯人就会鼓噪“新纳粹”与“犹太鬼”在相互

勾结。那样，德国不仅在政治上会受到谴责，就是在经济上也同样会受到那些愤怒的阿拉伯人抑制。如果是那样，德国是绝对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自找麻烦的。只要双方各自信守承诺，这种事情通过暗箱操作还是可以的。

西蒙·佩雷斯对此当然心领神会，于是德以双方很快就秘密签订了一份军火协议。根据协议，联邦德国将向以色列提供12艘先进的“美洲虎”导弹快艇，6年内全部交付。

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进展得相当顺利。然而到了1964年底，就在西德交付了3艘快艇时，《纽约时报》突然刊登的一篇新闻打乱了德以双方合作的节奏。事情是由德方引起的。

瞒天过海

在西德负责建造快艇的技术人员中，有一位叫安德烈的人，此人是一个管不住嘴的家伙，就在西德向以色列交付了3艘快艇后，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这位记者十分精明，一向是为了“第一流”的新闻而不顾一切结交关系的，千方百计结识军方技术人员就是其手段之一。如果从谍报的眼

光来看，这位精明的记者已经具备了准间谍的素质，只不过他的目的纯粹是商业新闻性的。安德烈与这位记者结识后不久，就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结果在一次喝得兴奋的时候侃侃而谈，全然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上司的训令，把这3艘导弹快艇的事当成了他们的“下酒菜”。

这位记者当时的欣喜与惊讶之情当然可想而知。

很快，德以军火交易的新闻顿时充斥了全球的各大报纸和新闻媒体，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更是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些国家怀着巨大的愤怒质问西德究竟意欲何为，一些激进的中东国家甚至质问西德还要不要石油，还有些国家扬言要采取行动抵制西德商品，甚至不再购买西德的“梅塞施密特”发动机。还有的国家向西德政府发出了强烈的外交照会。西德政府不得不为此举行记者招待会。面对那么多的记者，西德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在闪烁其词之间信誓旦旦地保证，此类交易是不可能发生的，德国政府并没有要和阿拉伯国家过不去的意思，希望阿拉伯兄弟不要误会；联邦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同阿拉伯各国保持良好的友谊和合作关系。

西德政府的这一番表白虽然让全世界将信将疑，

但是却让以色列人如坐针毡。对他们来说，仅仅靠现在已经到手的3艘快艇，是远远不足以装备一支强大的以色列海军的。

以色列人不能就这样半途而废。他们再次派出了特使西蒙·佩雷斯同德方进行紧张的磋商。不料德方代表双手一摊，对佩雷斯说：“先生，我们对媒体的无孔不入十分惊讶，发生这样严重的新闻泄密事件我们也感到十分的遗憾。既然事情已经败露，快艇的建造显然是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我们的经济是脆弱的，所以我们不能由于你们的原因失去那么多阿拉伯人的信任。”

“贵国的处境我们当然明白，”西蒙·佩雷斯只有耐着性子说，“但是我们的日子应该比贵国更加艰难。请你们最好不要过早地关上我们合作的大门，你们的快艇的确是我们最迫切的需要。”

看到对方可怜巴巴的样子，德方代表才用商量的口吻说：“我们倒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快艇的建造工程在我国肯定是要停止的。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在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据我们所知，法兰西共和国是贵国最大的军火供应商。如果我们把工程转移到法国去，那么，舆论就不会大惊小怪，阿拉伯各国也会平息怒气了。当然，这一次同样要严守秘密，绝对

不可以再让媒体了解到在法国的这项工程就是原工程的翻版。”

“太好了！贵国政府考虑如此周到，让我深受感动。可是，法国方面是否会答应承接这一工程呢？”西蒙·佩雷斯有点压抑不住自己兴奋的心情，试探性地询问。

“这就要看贵国的外交才能了。既然法国同贵国现在关系良好，我想他们是不会拒绝这种事情的，况且这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坏事。”德方代表微笑着说。

于是，西蒙·佩雷斯又马不停蹄地飞往了巴黎。

见面后，巴黎爱丽舍宫的官员表达了西德政府同样的担心，但是最后还是为西蒙·佩雷斯坚韧的精神所打动，决定承接“美洲虎”导弹快艇建造工程。不过这些浪漫的高卢人却非常严肃地对西蒙·佩雷斯说，在中东，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首先发动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否则，不仅我们法国的日子不好过，你们以色列人也将会因此受到惩罚。世界的体系应该保持一种均衡的态势。

就这样，“美洲虎”导弹快艇建造工程就在悄然无声之中来到了法国，来到了瑟堡港的造船厂。以色列担心这项工程在法国再次流产，就派了海军司令莫迪凯·利蒙上将以驻法使馆武官身份进驻巴黎，监督快艇

的建造。不过，巴黎人当时并不认可莫迪凯·利蒙这种武官的身份，在巴黎人眼里，他的身份是以色列驻法国巴黎的军火采购团团长，幸好他们更不知道利蒙曾是一名摩萨德的资深特工。

导弹快艇建造工程开展得十分顺利，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到了1967年5月，法方已经为以色列生产了4艘快艇。监督快艇建造的利蒙海军上将很是高兴，为此专门召开了招待会，以示庆贺，并且很快就将这4艘导弹快艇迅速运到了以色列。

不过剩下来的那5艘快艇却没有那么顺利。

惹恼了戴高乐总统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突然发动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果仅用了6天就占领了埃及、约旦和叙利亚的大片土地；同年12月，以色列又悍然出动飞机袭击了黎巴嫩的贝鲁特机场，炸毁了13架阿拉伯飞机。以色列这一系列的行动立刻引起了法国政府的不满，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也感到大伤脑筋。他迅速照会以色列驻法代表，对以色列公然违背对盟国的承诺，在中东地区挑起事端的行为极为不满。他认为这在外交上是不能容忍的。尽

管以色列代表十分耐心地向戴高乐阐明了中东整个局势，认为以色列纯粹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戴高乐总统还是十分不快地说：“发生了的就是发生了的，没有发生的就是没有发生，不要加上那些数不清的‘假如’、‘如果’。你们的那些摩萨德特工的情报往往总是捕风捉影，说什么以不发动战争就面临亡国，这纯粹是杞人忧天；相反，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已经打破了中东不战不和的局势，这是对均势地缘政治的一个打击，也是对法国公开的蔑视。”

面对戴高乐总统强硬的态势，以色列代表只有默不作声。不久法国政府就出台了一项决议，宣布对以色列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不仅不会再向以色列出售军火，就连那些已经付过款的飞机、弹药，包括正在建造之中的5艘“美洲虎”导弹快艇，法国政府也将不再交付给以色列了。

法国人的态度让以色列感到十分沮丧，也十分不满。

1967年10月21日，以色列海军的“埃拉特”号战舰在埃及塞德港前面的海面上巡逻时，被埃及的“冥河”式导弹击中，爆炸沉没了。这更让以色列感到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基本的安全感。

以色列内阁立即召开了一次在后来被称之为“瓦拉

希”的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色列的强势人物一个个都义愤填膺，对法国人深表不满。他们都说，这些高卢人真是不可思议，拿了我们的钱，却又借口我们发动了战争而不给我们导弹快艇，真是岂有此理！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只有用我们的方式把它们‘取’回来！”已经是摩萨德局长的阿米特充满自信地说。

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列维·艾希科尔一听，兴奋地说：“你真的有把握把那5艘快艇‘取’回来吗？”

阿米特说：“我想应该没有问题。到时候由军方配合我们一下。”

于是，一个“取”回5艘导弹快艇的计划开始酝酿。这就是摩萨德著名的代号为“诺亚方舟”的计划。

“瓦拉希”会议后不久，利蒙上将就以以色列官方代表的身份，正式给法国瑟堡造船厂老板弗利克斯·阿米奥写了一封信，郑重声明由于法国政府的原因，以色列政府对那剩下的5艘导弹快艇已经无意购买了，只是希望造船厂能帮忙尽快地为这5艘快艇找到新的买主，以便以色列政府能早日收回购买这批快艇所预付的款项。

弗利克斯·阿米奥收到利蒙将军这封信后，立即向巴黎政府请示处理意见。法国总统办公室虽然对以色

列人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满意，但是却一时无法为这5艘快艇找到新的买主，这就让这家造船厂进入了两难之地。因为剩下的这5艘导弹快艇已经接近完工了，如果是接着把它们造完，将来谁会来买；如果就是这样半途而废，那么一笔数额巨大的前期投资又将由谁来承担？

挪威商人找上门来了

瑟堡造船厂老板正在焦头烂额之时，他的一位朋友找上门来了。阿米奥的这位朋友叫奥莱·马丁·西姆，挪威人，当时是挪威船舶公司的经纪人。在前不久的一次巴黎商界集会上，阿米奥经人介绍，认识了这位帅气十足的挪威人，并且很快就成了朋友。阿米奥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风尘仆仆的西姆先生，问他：“您怎么有空来这里，是专门来看望我吗？”

西姆却对他说：“我可没有你们法国人那么多情。我是请您帮忙来了。”

“我能帮你什么忙？”阿米奥说。

“我的一位朋友是斯达博塔-维尔石油勘探公司的股东，从事海上石油开采业务。该公司已经在巴拿马注册了，最近他们的公司正在阿拉斯加海岸钻探海底石

油。他们的那些钻探平台之间缺少用来进行交通运输的快艇。他知道我有您这么一个造船的好朋友，就让我来请您帮忙，帮他解决一下快艇的问题。”

阿米奥一听是来要快艇的，简直是喜从天降，马上就说：“你们需要快艇？需要多少？”

西姆说：“目前我们只需要5艘。不过质量要有保证，我们也希望能够越快越好。朋友，你能帮这个忙吗？”

阿米奥一听，心想这简直就是天从人愿，就连忙说：“没有问题，西姆先生。我们恰好有5艘快艇正在建造当中，马上就要完工了。我相信它们一定完全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

“真的？你这么自信？”这一回轮到这个挪威人吃惊了。

阿米奥小声地说：“老实跟你说，西姆先生，这5艘快艇实际上是一批军用物资。本来是以色列人订购的，不过你知道，目前我们政府对以色列实行了武器禁运，所以这些快艇就不能再给他们了。这些都是非常棒的快艇，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包袱。所以我也想早点卖出去，早点收回我的成本啊！”

西姆迫不及待地问：“是吗？马上可以拿到吗？”

“马上拿到可能不太现实，不过很快就会完工的。

如果贵公司急需的话，我们可以抓紧时间，最迟在一年半内就可以完工。”

“一年半以内？那就是说要等到明年10月份了？”

“对，到那时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交付给贵公司。”

于是，他们就进入了实质性的谈判。西姆一再强调，自己买的这5艘快艇只用于钻探平台之间做交通工具，因此就不需要装上什么导弹武器，同时希望在快艇的价格上能有所优惠。阿米奥则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最后，西姆提出能不能先看一看正在建造当中的快艇，然后他们再签一份意向性的合同。

对阿米奥来说，西姆现在无疑是自己的一个财神爷，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于是就亲自陪着西姆来到船坞，参观了正在建造当中的快艇。随后又带西姆参观了他的造船厂，还到港口转了一圈。看过了之后，西姆表示一切都同自己想象的一样，非常满意，于是就愉快地同阿米奥签署了一份意向书，把这件事情给定下来了。

阿米奥很快向国防部报告了这件事，说这5艘快艇已经让一个挪威商人给订下来了。那些国防部军用物资委员会的官员们也认为这是件好事。因为这些快艇现在没有装备导弹就不是军用物资，所以这只是一项

纯粹的民间商业活动，何况马上就能收回前期支出的成本。于是就同意了这笔交易。

可是令阿米奥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位给他送来大宗买卖、让他解脱当前困境的西姆先生实际上就是摩萨德总部派来的一名特工，他是“踩点”来了。

原来，就在那次“瓦拉希”会议之后，摩萨德的“诺亚方舟”计划就立即开始付诸实施。摩萨德驻巴拿马站的特工利用早已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在巴拿马注册了一个“斯达博塔-维尔石油勘探公司”，然后派一名叫霍德的摩萨德特工乔装成挪威船舶经纪人“奥莱·马丁·西姆”，来到巴黎找机会同瑟堡造船厂的老板阿米奥接触。霍德长着一双深蓝色的眼睛，看上去很像挪威人。通过利蒙将军的安排，霍德在巴黎商界人士的聚会上认识了瑟堡造船厂的老板阿米奥。几杯白兰地下去之后，两个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不久，霍德就来找阿米奥订购这5艘快艇了，以防止他把快艇转手卖给别人。

没有想到霍德一出马，就顺利地获得了阿米奥的信任，一口答应把快艇卖给他们。霍德即向摩萨德总部报告了同阿米奥谈话的全过程，并且根据自己的记忆，绘制出了整个造船厂和瑟堡港口的平面图。阿米特一听知道事情成功了一半，就指示利蒙和霍德等人

要静观其变，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并且指示霍德要经常同阿米奥进行联系，一旦等快艇建造好了，就立即实施“诺亚方舟”第二步行动计划，把快艇偷到以色列来。

此后，霍德就经常同阿米奥保持着联系，他们还在快艇的价格和工程进展情况进行过多次交流。两个人俨然成了一对生意上的好伙伴。

1967年10月，5艘快艇已经如期完工，正摆在瑟堡港码头，阿米奥马上通知了他的好朋友“西姆”等待挪威的那家斯达博塔-维尔石油勘探公司前来提货。霍德一接到通知，马上带了五位助手来到了瑟堡。这五名助手同霍德一样，都是摩萨德特工。

“很抱歉，阿米奥先生，”霍德一走进办公室就对阿米奥说，“本来我们约好了带现金来提货，可是目前的情况恐怕是不允许了。因为我们公司在财务的规划上最近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恐怕一时不能拿出这么大一笔款子。经过我公司商讨，这笔款子全部到位最早也要等到12月26日。只有到那时候才可以支付给您全部现款。作为公司的全权代表，我本人对此十分抱歉。”

阿米奥一听，先是一阵惊讶，没有想到老朋友给他带来这样一个消息。不过作为生意场上的老手，阿

米奥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不快，惊讶之后马上表示理解。公司财务资金在一定时期之内流通不畅，这在生意场中也是正常现象。不过阿米奥最后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贵公司能确保12月26日全部交付现款吗？”

“没有问题，我们确保能够在12月26日全部交付货款。为了表示我公司的诚意，我决定把我的几位助手留在这里，以便保持同你们公司在交款之前的业务联系。我先回挪威监督那里的财务情况，12月26日把全部货款带来。”霍德边说边把自己的三位助手介绍给了阿米奥。

就这样，三位摩萨德特工就顺理成章地留在了瑟堡港，并且很快同造船厂的工人们打成了一片，熟悉了瑟堡港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条路线的走向，而这一切都进行得悄无声息。在留下来的三名特工当中，有一名叫埃兹拉的，是摩萨德内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手，并且是一位导弹快艇的艇长，狡黠而又谨慎，行动迅速但又深思熟虑，在后来的行动中起了关键作用。埃兹拉生就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享有“鲨鱼”之称。他是这三个人中的组长。

身份为艇长的“鲨鱼”埃兹拉，每天都会和自己的同伙去瑟堡造船厂。他神色愉快地逢人就说，在把快艇移交给挪威人之前，应该把每一件小事情都交代清

楚。可是，他每次走上导弹快艇的甲板之后，都要举起他手上的高倍望远镜，对瑟堡港进行长时间的观察。通过观察，埃兹拉发现港口的西航道上船只来往频繁，而东航道却风平浪静，很少有船只通行。后来他故意好奇地向那些工作人员打听，才知道东航道早已废弃不用了。原因是这条航道是路易十六时期开辟的，是一条水下礁石变幻莫测的古航道，船长们都不愿意走这条航线。“鲨鱼”久久地凝视这条航线，嘴角露出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微笑。

另外，“鲨鱼”对雷达也很精通。他还就瑟堡港的雷达问题同当地有关部门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当时他还一本正经地对港口负责人说：“对于这么重要的海港，你们的监视设施实在是太薄弱了。”

其实，在同对方的交谈当中，“鲨鱼”已经摸清了瑟堡港的雷达系统，知道东航道的哪一段会在瑟堡港的雷达荧屏上形成“盲点”。

埃兹拉“艇长”就这样在瑟堡港度过了一段十分紧张而又快乐的时光。谁知到了12月12日这一天，法国总理带领一批要员来到了瑟堡港，要为一艘核潜艇下水举行剪彩仪式，这可把埃兹拉三个人吓了一跳。因为，5艘快艇基本上完工了，此时正整齐地停泊在港口，这引起了一位军官的注意。他当场提议，应立即

把这些快艇移走，以免夜长梦多。他警告造船厂老板阿米奥说：“要永远提防那些以色列人。不管怎么说，这些快艇很可能成为恐怖分子的目标。”

站在旁边的阿米奥连忙说：“长官您尽管放心好了，我知道这是个重要的海军基地，我们的保安措施极为严密。以色列人对这些舰艇已经不感兴趣了，有一家挪威的公司已买下了这批货。”

阿米奥的这番话，才让“鲨鱼”的心跳正常了。

虽然躲过了这一劫，但“鲨鱼”的心还是一直忐忑不安，总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他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1967年12月23日这一天，瑟堡港来了一百多名“游客”，从他们的护照可以看出，他们分别来自西欧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来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欢度圣诞节来了。其实这些人都是阿米特精心挑选的摩萨德特工和以色列的海军官兵。“诺亚方舟”的最后行动将在明天晚上进行。

12月24日，埃兹拉和他的同伴接到了阿米奥先生的请柬，热情地邀请他们与公司的员工一道共度圣诞节。一想到再过两天就可以见到“西姆”，并且能收到全部的货款，阿米奥内心不由得高兴起来，所以他就

热情地邀请“西姆”留下的三个助手共度圣诞。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三位助手竟然婉拒了阿米奥的邀请。埃兹拉首先表示了感谢，继而又带着歉疚的语气告诉阿米奥，他们已经接受了瑟堡港另一位朋友的邀请。善良的阿米奥只好祝他们在异国圣诞快乐，然后离开了造船厂和妻子儿女们欢度圣诞节去了，等过了圣诞节再来接待自己的老朋友西姆。只要拿到了全部的货款，就一切万事大吉了。

圣诞节是西方的传统节日，再没有比这天更有理由合家欢聚了。夜幕轻轻降临瑟堡港，港口周围陆续出现了美丽的灯光，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氛。海风轻轻地吹着，海浪啪啦啪啦地拍打着堤岸，岸边的船只随着风浪的节奏在摇摆。港口那些巡逻的人员基本上都回家团聚去了，只留下几个卫兵在看守。

夜色深了，利蒙海军上将的黑色轿车驶入瑟堡海港。在码头上迎接他的是“鲨鱼”埃兹拉和他的同伙，还有一位就是那个名叫“西姆”的霍德。他们都朝港口中那5艘快艇看了看，显得有些紧张。

利蒙将军说：“如果这海风一直不停的话，那你们今天晚上就不能出海了。要是你们今天晚上不能走掉的话，这些快艇也许就永远都不会到海法港了。因为我们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好机会。”

霍德点了点头，也在说：“真不幸，怎么会是逆风呢？这将使我们的航行更加困难。”

只有“鲨鱼”耸了耸肩膀说：“顶风过后吹侧舷风，侧舷风过后吹顺风。”

“但愿如此……”霍德说。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今天夜里必须起航。”利蒙将军语气坚定地说。

“诺亚方舟”午夜起航

在午夜即将来临之时，那一百多名“游客”借着港口稀疏的灯光，也从不同的方向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港口，然后分别上了5艘快艇，每艘快艇20个人，纷纷在上面忙碌起来。此时，瑟堡港周围的居民，还有几个留下来的卫兵都在虔诚地注目苍穹，等待着午夜零点的来临，等待着倾听教堂那庄严浑厚的钟声，丝毫未觉察出港口发生的这一切。这时，利蒙将军和霍德等人也在默默祈祷，希望万能的上帝给整个行动以最后的保护。

就在钟声即将响起时，瑟堡港内5艘快艇上的“梅塞施密特”发动机一齐轰鸣起来。但是，无论是港口的那些卫兵还是港口附近的居民，此时对这种轰鸣的机

器声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在这些日子里，港口里的那些船，天天晚上都在发动这些机器，他们认为肯定又是船厂的人在试验机器的功能，在圣诞节的夜晚也没有休息，真是太辛苦了。

这时，在瑟堡所有教堂里，隆重的圣诞节弥撒开始了。整个古城到处都是长鸣的钟声。在这钟声长鸣、人声鼎沸的时刻，5艘导弹快艇悄悄地解开了缆绳，向海港出口处滑行。它们按照那条早已探测好的准确路线，驶进了东航道，直向大海开去。埃兹拉带着他的伙伴，开始了漫长的航程。他们将从英伦海峡出发，绕过伊比利亚半岛，直奔东地中海。

此时，只有莫迪凯·利蒙将军站在灯光迷离的码头上，为这5艘远去的导弹快艇送行。他孤独地挥动着手臂，祝他们一路平安。

利蒙将军目送快艇消失在远处黑暗的海面上之后，便立即驱车飞速回到了巴黎。此时他正经历着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快艇出发的最后决定是他作出的，成败如何，将决定着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他在客厅里高度紧张地听着收音机的广播，焦虑使他的眼睛眨也不眨。他不仅要听电台可能宣布的快艇逃跑的消息，而且还要听英伦海峡和比斯开湾的天气预报。

这时，一百多名年轻的以色列人正在浩瀚无垠的

大西洋上，承受狂风恶浪的严峻考验。一般说来，每艘快艇应该有45名水兵，而现在这些快艇上水兵还没有应有人数的一半，这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需要承担两个人的工作量。但是他们还是劈波斩浪，在风浪中加速前进。

圣诞节的清晨来到了。

造船厂的职工惊奇地发现瑟堡港码头上已经空空如也，昨天下午还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的5艘快艇已经杳无影踪。同时他们还发现，昨天在这里一直忙碌的那些说着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也不见了。这些快艇本来就是为以色列人建造的，只是后来才卖给了那个挪威商人。他们心里明白了，这些快艇可能去了什么地方，于是他们马上向上面报告了这件事，还有自己的怀疑。

乔治·蓬皮杜总统在郊外的别墅里同家人欢庆圣诞节刚回来，总统府办公厅的秘书长米歇尔就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总统一听大发雷霆，立刻把外交部长舒曼传来了。舒曼刚从阿尔及利亚和埃及出访归来，一听到这个消息也暴跳如雷。他和总统都把怀疑的目标指向了以色列。在这次访问中，他曾向阿拉伯国家许诺说，法国将是阿拉伯人最忠实的盟友。可是现在，却让犹太人把他们的快艇驾走了，这不是言而无信

吗？“我的脸都丢尽了。我们要立即作出反应。”舒曼对总统说。

然而总统却反问他：“您要我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先生？建议我们派飞机轰炸这些快艇，或者是派出鱼雷快艇吗？”蓬皮杜总统心里很清楚，当时在法国的服役军舰中，没有一艘军舰的速度能赶得上这些导弹快艇。

舒曼外长立即在外交部紧急约见以色列大使，然而前来见他的却是两名以色列大使馆的普通外交官。他们对法国外长说：“很不凑巧，沃尔特大使正在瑞士过圣诞节。”舒曼怒不可遏地吼道：“你们把这些导弹快艇弄到哪儿去了？我要一个回答，一个迅速的回答，像这些快艇一样迅速的回答。”

然而这两名普通的以色列外交官却冷静地告诉外长，快艇事件令人费解，他们从未听说过此类事件，要不他们立即致函以色列政府询问此事。其中一名外交官甚至说：“莫不是你搞错了吧，外长先生。这些快艇不可能开往以色列。万一它们要是开进了海法港，那么对以色列来说后果将是非常严重啊！”

他们的回答实在令舒曼外长哭笑不得。

就在舒曼外长在他豪华的外交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之后不久，在快艇上的埃兹拉已经从他的高倍望远

镜里看到，在离他们的快艇还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他所熟悉的以色列潜艇的炮塔。紧接着，一群以色列喷气式飞机出现在远方的天空，来到了快艇上方。按预定的方式，“鲨鱼”用无线电同这些潜艇和飞机取得了联系。在潜艇和飞机的护卫下，5艘导弹快艇驶进了以色列海域，飞快地向海法港靠去。

远处，传来了隐隐的欢呼声。当以色列人员结束3000海里的航行，把5艘“美洲虎”成功地开到了海法港时，他们受到了聚集在码头的兴高采烈的人群的欢迎。摩萨德又一次获得了成功。

以色列终于将最后的5艘“美洲虎”导弹快艇弄到手了。这些快艇一到以色列，就立刻被进行了改装，配上了以色列自己生产的射程在30公里以上的“加布里埃尔”式的反舰导弹，使整个快艇的性能得到了提升。德国的军事技术与法国的制造工艺，再加上以色列自己的火力系统，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其威力之大远远超过了苏联的“蚊子”和“黄蜂”。

1973年，埃及人发动突然袭击，引爆了著名的“赎罪日战争”。以色列人利用自己先进的快艇从海上进行反击，并且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海上优势，从而赢得了战争，有力地保卫了以色列海岸的宁静。



“赎罪日战争”爆发前惬意的飞行员们

作为摩萨德的第三任局长梅厄·阿米特再建奇功，成功地从法国偷回导弹快艇，使他的声望更加如日中天。

但是，不久之后的一次“准外交”活动的参与，却导致了阿米特最终丢掉了摩萨德局长的宝座。

第十章 收买瑞士工程师 偷得图纸20吨

“诺亚方舟”成功实施激怒了法国总统蓬皮杜，50架“幻影”战斗机合同随之被取消，以色列空军面临瘫痪的危险；摩萨德成功收买生产“幻影”战斗机的高级工程师，买下“幻影”机的全部图纸，几乎可以装满一节火车皮；凭借这些资料以色列制造了自己的“鹰”式战斗机。

“我将进入纺织业”

1968年3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准备秘密访问伊朗，与伊朗国王进行一次私下的会谈。鉴于摩萨德与伊朗方面的某些特殊关系，达扬找到阿米特，

请他替自己这次出访作出安排，并要求阿米特对其行踪严格保密。阿米特局长满足了这位国防部长的要求，却将“密”保到了以色列总理的头上，竟然使一个国家的总理对自己的国防部长出访这样的大事一无所知。

艾希科尔总理发现此事后简直是怒不可遏，认为这不仅仅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伤害。尽管他极为欣赏阿米特的情报才能，并认为阿米特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前任伊塞·哈雷尔，但是，最后他还是挥泪斩马谕，不得不把阿米特从摩萨德局长的位置上给“请”了下来。于是3个月后的一天，以色列情报界大爆冷门——成绩斐然的情报专家梅厄·阿米特，未能像其前任哈雷尔那样在摩萨德局长的位置上连任，毫无情报工作经历的兹维·扎米尔将军接替了他，成为摩萨德第四任局长。

1925年，兹维·扎米尔出生在波兰。出生7个月后，他便随同父母迁居巴勒斯坦。1942年，17岁的扎米尔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帕尔马赫”冲锋队。1946年，他在一次偷运军火时被英国警察逮捕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继续在犹太军事组织工作。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他指挥一个旅团，承担打开通往耶路撒冷通道的任务，从此开始了他真正的戎马生涯。

1950年，兹维·扎米尔成为以色列高级军官进修班的教员。1953年，他又到英国高级军官学校学习，回国后被任命为以色列步兵学校校长。1956年，他在国防部训练司令部担任高级军官，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曾在西奈战场任某旅旅长。1957年，扎米尔离职去希伯来大学攻读文科学士学位，学业完成后被晋升为准将，并主持训练司令部的工作。1962年，他担任了以军南方司令部的领导职务，成为以军独当一面的前线指挥官。在此期间，他曾几度深入加沙地带所谓的“恐怖分子老窝”进行侦察。1966年7月，扎米尔被任命为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在任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武官一职期间，扎米尔承担了从英国购买军火的所有事务。在同英国上流社会的交往过程中，扎米尔受到了英国绅士风度的熏陶，以致他后来一举手、一投足，都俨然透露出一种英国勋爵们所特有的那种潇洒风度。他这种衣冠整洁、服饰讲究的气质，与穿着随便、不修边幅的以色列特工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会显得格外招眼。但扎米尔却我行我素，即使率领特工队行进在40度高温的内格夫沙漠中，他那种绅士风度也不会随便改变。

从扎米尔的全部履历看，尽管他没有情报工作的

经历，但在艾希科尔总理看来，扎米尔的力量却恰恰蕴藏在他的弱点之中。在过去的20多年里，摩萨德一直是由自命不凡的间谍大师当家，无论是伊塞·哈雷尔还是梅厄·阿米特，都是说话算数的超级强人。这些行家里手在情报工作方面的高效率固然可圈可点，但当这种高效率影响到政治家们的决策时，他们宁可挑选一个更为听话的人来担任情报总管。摩萨德首脑毕竟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家，他们不过是为政治家们执行任务的工具，而工具就必须用起来得心应手。因此，当梅厄·阿米特被炒了鱿鱼之后，兹维·扎米尔就成了摩萨德新当家人的不二人选。

从外表看去，扎米尔秃脑门、招风耳，身材修长，几乎有点干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可能患有胃溃疡或胃下垂之类的疾病；同时，他又不苟言笑、离群索居，性格显得有些孤僻不群，据熟悉他的朋友说，他“在家时总是独自待在地下室里”……总之，扎米尔谈不上魅力，是以军中缺少风采、毫无情趣的人物之一。这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是他的劣势，但是，也许这正是艾希科尔总理看中他的地方。

兹维·扎米尔就任摩萨德局长时，正是法国巴黎政府刚刚宣布对以色列实行武器禁运的时候，也是以色列正准备研发核武器的时代。当时为了掩人耳目，以

色列将其沙漠深处的迪莫纳核反应堆称之为“纺织厂”。因此，摆在新局长扎米尔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为以色列的这家“纺织厂”搞到一种至关重要的特殊材料——铀，这将是关系到以色列核武器研制成败的大问题。

因此，在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为武官扎米尔举行的离任告别宴会上，当年轻的肯特公爵问起扎米尔将有何高就时，扎米尔以其特有的幽默回答说：“我将进入纺织工业。”

扎米尔上任后，从其前任阿米特手中接过了搞铀工作。其实早在摩萨德第二任局长哈雷尔下台前夕，这一工作就已经开始了。在经历了摩萨德前后三任局长之手后，为以色列制造原子弹搞铀的工作，最终在扎米尔手中完成了。这应该是扎米尔在担任摩萨德局长期间，为以色列作出的最大的功绩之一。他打破了法国人的武器禁运令，使“舍尔斯贝格”运铀货轮“改变航向”，将200吨氧化铀矿石偷运到了以色列。

除此以外，扎米尔在摩萨德局长职位上还有两项引起世界瞩目的功绩：

第一件出色的买卖，就是成功地策反了一位飞机制造工程师，把法国人引以为豪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搞到了手，将重达20吨的“幻影”战斗机图纸一份不

少地从瑞士运到了以色列；

第二件事就是派出摩萨德特工遍寻全世界，将在西德慕尼黑奥运会上暗杀以色列运动员的“黑九月”恐怖分子斩尽杀绝，从而有力地遏制了恐怖活动。

尽管兹维·扎米尔被认为是一位没有情报工作经验的人，但是，他的摩萨德局长居然干得有声有色。

以色列空军面临瘫痪

法国与以色列的战略盟友关系可谓由来已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成了以色列最大的军火商。当时以色列所有的先进武器，几乎全是从法国进口的。以色列70%以上的军火都是由法国提供的，尤其是以色列在空军装备方面，更是依赖法国提供的先进战斗机，从而使以色列的空军一直在中东处于领先地位。

早在1954年，法国就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开始向以色列提供“暴风式”战斗机；不久，法国又向以色列提供了“神秘2型”和“神秘4型”战斗机。这些先进的战斗机都是由法国的马赛尔·达索公司研制的。

达索公司是法国一家战斗机研发的专业公司。从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公司在全世界战斗机的研发领域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幻影III”到“幻影F1”再到“幻影2000”，一步一个台阶，奠定了法国战斗机在全球范围内同苏美呈三足鼎立之势，也奠定了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地区的空中霸主地位。当年，以色列空军就是凭借法国人提供的“幻影”战斗机，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击败了阿拉伯人驾驶的先进的苏制“米格-21”赢得了那场战争。“幻影”战斗机在实战中显示出的良好性能，立刻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一时间，订购单雪片似的飞向了达索公司，就连苏联在东欧的那些盟友，也对法国的“幻影”战斗机极为欣赏。据说苏联人准备为那些“华约”国的空军装备“米格-21”飞机时，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的飞行员就曾毫不客气地抱怨，“让他们把米格飞机留给阿拉伯人吧，我们宁愿要幻影式飞机”。

然而，也正是因为那场以色列人引以自豪的“六日战争”，让他们断了自己的后路，从而失去法国为他们继续提供先进的“幻影”战斗机的机会，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以色列违背了对法国的“不要向阿拉伯人打响第一枪”的承诺，激怒了法国人，使其宣布对以色列实行全面的武器禁运。在1967年圣诞节那天夜里，以色列人又从法国的瑟堡港开走了5艘导弹快艇，连夜

穿越大西洋，航行几千海里回到了以色列，让法国人颜面扫地。

以色列的这一行为再一次激怒了刚上台不久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他决定继续执行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令，从而彻底断绝对以色列的军火供应。这让以色列感到了一片恐慌，特别是对以色列的空军来说，实在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在此之前，以色列空军几乎是按“幻影”飞机的体制编队的，而且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用于这种机型的地勤设备。当时，以色列空军拥有150架幻影战斗机，在攻占戈兰高地时被叙利亚击毁了10架、击伤了多架，其余的飞机也都因飞行时间过长而零件严重磨损，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以色列的空军就将处于瘫痪状态，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如果法国不再为以色列提供战机，那么以色列的空军也就名存实亡了。以色列如果在中东地区丧失了制空权，那么对这样一个没有纵深防御能力的小国来说，将受到的威胁是不可估量的。

以色列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说服法国，希望法国能一如既往地为自己提供先进的“幻影”战斗机，并为此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是毫无效果。

面对法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以色列内阁只好作出新的决定，那就是筹集资金，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

航空工业，生产出以色列自己的、而且是可以同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抗衡的飞机。

殊不知，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谈何容易。航空工业是一种复杂的工业体系，它是一个国家整体工业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一架现代化的战斗机有上百万个零件，而每一个零件都需要经过反复测试，没有发达的制造技术，没有雄厚的工业基础，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以色列的一个咨询委员会在研究了全部的材料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以色列要想用自己研发和制造的战斗机来装备自己的空军，那起码也得要10年的时间；即使以色列在这10年之内造出了自己的飞机，谁又敢保证这些飞机就能够代表世界航空领域的先进水平，能够与美国和苏联的飞机抗衡？——也许到那时候，以色列人经过千辛万苦制造出来的飞机刚刚离开生产线，就已经成了一种滞后甚至是过时的淘汰产品了。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以色列人要想制造出自己的飞机，并且能够保证是第一流的飞机，最保险的办法就只有走“捷径”——那就是仿制法国现在的“幻影式”飞机。

所以，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能获得一份“幻影”战斗机的图纸。

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呢？

摩萨德的特工把目光转向了一个中立小国——瑞士。

工程师的巧遇

瑞士的防空体系与以色列一样，也是建立在法国“幻影”战斗机的基础之上的。不过与以色列不同的是，由于瑞士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工业，获得了在本国装配达索公司飞机的许可证。按照与法国签订的协议，瑞士将装配100架“幻影III”式战斗机。但是当他们装配完53架整机后，认为造价太高，国民预算已无法承受，便停止了继续装配。

瑞士剩下的47架“幻影”飞机零部件，让以色列人给看中了。他们试探着想与瑞士政府做一笔交易——因为以色列的技师们已经发现，“幻影”战斗机供油系统中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在激烈的空战中很可能因发生故障而坠毁。而以色列工程师们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研制出了一个弥补这种缺陷的救急系统。于是以色列就告诉了瑞士这个秘密，并且对他们说，所有这些有关“幻影”飞机的缺陷及改进意见，只有在实战中才有可能获得，目前只有以色列独家掌握这种技

术。以色列愿意用有关改进“幻影”战斗机性能的重要技术资料，来换取急需的“幻影”飞机零配件。以色列人还保证，一旦达成协议，以方将把这个新系统的全套图纸以及生产新系统必需的设备图纸，全部提供给瑞士政府。以方甚至还愿意预付1.5亿瑞士法郎的订金，来购买那些“幻影”飞机的零部件。

瑞士方面对以色列人提供的技术情报自然很感兴趣，但由于害怕得罪法国人，最终还是拒绝了这笔交易。

既然和瑞士人的生意做不成了，以色列人也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于是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向美国人购买“无隼”式战斗机；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瑞士的那些“幻影”机的零部件。这个棘手的问题就由摩萨德来解决。

当时摩萨德的局长还是梅厄·阿米特。当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郑重其事地和他谈了这件事之后，他并没有马上拍着胸膛打保票，只是很低调地对总理说：“我愿尽力而为。”

摩萨德的目光，盯上了瑞士生产“幻影”战斗机的苏泽尔兄弟公司的工程师。

苏泽尔兄弟飞机制造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叫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当时40来岁，正处于人生年富力

强的黄金时段，而且是这个行当中的佼佼者。他全面主持该公司“幻影”战斗机生产的全过程，掌握着“幻影”战斗机生产的所有资料。

但是，摩萨德特工通过对弗朗克内希特的调查，却发现很难下手。原来这个弗朗克内希特不仅精通业务，工作负责，而且为人非常正直；同时他性格内向，平时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上是沉默寡言，没有什么社交。通过对他的经济收入调查发现，弗朗克内希特还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在当地是一个典型的受人尊重的有钱人。他还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和妻子居住在瑞士的富人区。夫妇俩经常自己驾车去阿尔卑斯山度假，到一些名胜区旅游，不过却很少出国。闲暇之余，他们大多多的时候是在家里看看书，拉拉小提琴，或者是欣赏那些古典音乐，很少出入饭店酒楼和那种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综合各种资料，这个弗朗克内希特就是瑞士公民的一个模范，要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找到突破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那些无孔不入的摩萨德特工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查，最后还是发现了弗朗克内希特一个秘密——和许多成功的男人一样，他也同样在外面金屋藏娇，有一个多年的情妇。这一发现，终于让摩萨德特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那么，摩萨德特工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发现弗兰克内希特的这个秘密呢？原因就在于弗兰克内希特的妻子。弗兰克内希特的妻子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尽管她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但她还是接受了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并没有因此而闹得满城风雨。弗兰克内希特和妻子也就一直相安无事，外界就更不知道。摩萨德的特工打听到这个秘密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好的突破口。他们决定就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因为工作关系，弗兰克内希特会经常去巴黎，同达索公司的负责人洽谈有关的事务。1967年的一天，在巴黎的一次国际飞机制造技术研讨会上，一位同样是飞机制造行业的以色列专家主动热情地结识了弗兰克内希特。

一开始，弗兰克内希特对这个主动接近自己的人并没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只是出于礼貌，才同他泛泛而谈。这倒并不是因为弗兰克内希特傲慢，或者是出于某种戒心，完全是他那种内向的性格使然。因此在与这个以色列人最初交往时态度还有些略显生硬。但是这位技术专家很快就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才能，赢得了瑞士工程师的好感，而且很快就成了他的朋友。

这个以色列工程师对弗兰克内希特几乎无话不

谈。在谈话中，他时不时地谈到以色列空军在空战中所积累的经验。

“弗朗克内希特先生，你们苏泽尔公司在制造‘幻影’飞机过程中，难道就没有发现这种飞机存在问题吗？”以色列专家友好地问。

弗朗克内希特颇感兴趣，笑着问：“你发现有什么问题呢？”

“不过，”以色列专家歉意地笑了笑，“如果我指出来了，恐怕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

弗朗克内希特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上哪有尽善尽美的事物呢！法国人也不是唯一懂得设计战斗机的人。老实说，我对法国人的‘幻影’飞机也并非就那么迷信。”

这时，那位工程师才对弗朗克内希特说：“你知道吗？以色列飞行员发现，‘幻影’战斗机在实战中是不够理想的。原因就是‘幻影’战斗机上的‘阿塔’发动机推力不够，而且在制造工艺上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弗朗克内希特一听，连忙高兴地说：“老兄，这真是真知灼见！你知道吗，我也曾对塞尼卡马公司制造的引擎提出过不知多少次批评，可他们就是不接受……”

对弗朗克内希特来说，这个以色列工程师所说的

一切，都是极有价值的信息。可是提供这些重要信息的以色列人却丝毫没有要他回报的意思，从此，弗朗克内希特就把这个以色列工程师看成了自己的知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或者是喝酒聊天。

一天晚上，他们又在一起共进晚餐。这时，弗朗克内希特注意到这位同行的小臂上刺着一种神秘的花纹，他很小心地问：“朋友，我能否打听一下你这个花纹是什么意思吗？”

那个以色列工程师不假思索地说：“这是我在纳粹集中营留下的纪念。”

“哦，很抱歉。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以色列人的回答使弗朗克内希特感到有些尴尬和不安。尽管在二战期间，他的国家没有遭到战争的荼毒，但是这位善良的瑞士人对犹太人的那种遭遇还是深表同情。后来，弗朗克内希特到德国去旅行时，还专程去参观了那座达豪集中营纪念馆。

“六日战争”后，弗朗克内希特对以色列人在中东的处境更加同情。他认为戴高乐突然宣布的武器禁运令，无异于在以色列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向以色列人背后插了一刀”。因此在巴黎的一次工作午餐上，当达索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将话题转到对以色列的武器禁运问题上时，弗朗克内希特竟毫不客气地谈了自己的看

法：“他们既然已经付了款，你们就应该把这些飞机交给他们。这可是关系到公司信誉的大问题，更不应该拒绝为他们提供他们急需的那些零部件。”

达索公司负责人对弗朗克内希特的这种态度十分惊讶，同时备感尴尬，只好搪塞道：“这是政客们作出的决定，我们也无能为力。”

但这种回答却不能令弗朗克内希特满意。当那位公司负责人举起酒杯，提议请他干一杯时，弗朗克内希特出于礼貌，还是干了，不过干得却十分勉强。最后他还是很有感慨地说：“先生，当我们在这里举起杯子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难道就一定是愉快的吗？”

出于一种正义，这位瑞士工程师心头的重负使他不满足于一般道义上的支持，而是在考虑为那些陷入绝境的以色列人做点什么。他也想找个适当的机会，去说服达索公司，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幻影”机的零配件悄悄地卖给以色列，以解那些犹太人的燃眉之急。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就在弗朗克内希特在心理上准备要帮助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萨德特工也悄悄地向他撒开了一张阴谋的网。

“我需要200万美元”

秋日的一个黄昏，弗朗克内希特又来到了巴黎。这一次他是要同达索公司商量引擎生产的具体技术事宜。下了飞机之后，弗朗克内希特下榻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花园宾馆。这家宾馆环境幽雅，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亲切。洗了一个热水澡之后，弗朗克内希特又来到宾馆内的那座小花园内，踏着幽径上厚厚的黄叶，来到那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下，正要在椅子上坐下来，突然看见那位以色列工程师和一位高大的男子，就坐在前面不远处的另一张长椅子上。

能在这里见到自己的老朋友，弗朗克内希特心里很是高兴，于是他走上前去和他们热情地打招呼。那位以色列工程师一见到他也很高兴。两位老朋友都为能在这里邂逅而倍感惊讶和亲切。

“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那位以色列工程师热情地和弗朗克内希特拥抱了一下，然后指着身边的那位高大英俊、面带微笑的男子说，“这位是我的朋友，迈克·格维格。”

“十分荣幸。”弗朗克内希特伸出了自己的手。就在那一瞬间，他感觉到迈克·格维格的手非常有力，眼神里透露出一种不言自威的神情。弗朗克内希特的直觉告诉自己，这绝不是一位普通人物。

弗朗克内希特的直觉没有欺骗自己，这位“迈克·格

维格”的确不是一位普通人物，他的真名叫多夫·西恩，当时的身份是以色列驻巴黎使馆的武官，同时也是摩萨德驻巴黎情报站的站长。他的岳父就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大名鼎鼎的摩西·达扬将军——当然这一切都不能为弗朗克内希特所道——弗朗克内希特就这样与多夫·西恩相识了。当然，那位以色列“工程师”朋友的真实身份也是个摩萨德特工。

随后他们三个人愉快地共进晚餐，喝着正宗的法国红葡萄酒，在柔和的灯光下听着美妙的轻音乐，聊着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弗朗克内希特觉得巴黎的秋夜是如此美好而充满诗意。从此，他就同多夫·西恩也成了“好朋友”。

在巴黎的那些日子里，弗朗克内希特多次受到了多夫·西恩超乎常规的热情款待。弗朗克内希特从内心对多夫·西恩产生了好感。一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又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弗朗克内希特突然有些多愁善感地说：“哦，我后天就要回瑞士了，真是舍不得你们。人生难有知己之交，我和你们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和你们再次见面。”

“回家团聚也挺不错的呀，看看阔别多时的妻子儿女，重温一下天伦之乐，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嘛，何况我们之间还可以互相想念，你说是不是？”多夫·西恩善

解人意地说。

不料弗朗克内希特却一声叹息，脸上现出一种复杂的表情。原来多夫·西恩的话触及到了他的隐痛。由于经常在外面同情妇厮混，弗朗克内希特的家庭出现了危机，女儿也对自己失去了信任。

弗朗克内希特的这一切，已经都被摩萨德特工调查得清清楚楚，所以今天晚上，多夫·西恩才“哪壶不开提哪壶”。

“您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多夫·西恩不动声色，关切地问。

“没有什么，只不过是家庭的小问题。当然，说小也不小，反正……纯粹是个人问题。”

“或许我们可以帮上您一把。”多夫·西恩试探性地问道。

“你们……恐怕不大可能。”

“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位以色列工程师好像也挺关心似的，“我们认识已经这些日子了，应该是好朋友了，但是我可从来没有见您有什么难言之隐。您就不能说出来，让我们为您分分忧吗？”

弗朗克内希特好像有点犹豫不决。最后他还是支支吾吾地说：“不瞒你说，我……你知道……同别的人一样……在外面……”

“我明白。所以，家里面不那么和谐，对吗？”多夫·西恩故意装出一副终于明白了的样子。

“是这么回事。不过，人之常情的……”弗朗克内希特自我解释了一下。

“这有什么值得您不愉快的。作为一家那么大的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您完全有理由得到、而且应该得到这一切呀。”多夫·西恩火上浇油。

“公司……公司可不这么认为呢。再说，我的薪水也完全不够这方面的花销啊。”弗朗克内希特愤愤地说。

“我的朋友，我倒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可以帮您摆脱目前的困境。”多夫·西恩终于顺理成章地抛出了诱饵。

弗朗克内希特睁大了眼睛，随后又摇摇头。“我的朋友，你愿意帮助我当然高兴，但是我不能随便接受朋友的馈赠。这是违反我做人的原则的。”

“不不不，当然不。您误会我的意思了。”多夫·西恩连忙说，“您具有这么高的地位，又这么聪明，您完全可以利用您这种旁人所不及的优势，来为自己创造一种美好的生活。”

“您的意思是……”弗朗克内希特不解地询问。

“您或许了解中东现在的局势……”

“当然，我对中东的局势非常了解，我对发生在那里的一切感到非常的不安，我对你们国家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待遇深表同情。”

“非常感谢。您知道我们国家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夹缝之中，为此，我们必须保持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在这支国防力量中，空军是占有绝对的重要性的。为了维持空军的强大，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久前，法国的戴高乐总统却宣布对我国进行武器禁运……”

“这我了解，十分了解。而且由于这一禁运涉及到我们公司，我对此深表遗憾。这无疑是在你们的背后插了一刀。”

“现在，虽然‘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先进的战斗机。”多夫·西恩终于亮出了他的底牌。

“哦……”弗朗克内希特若有所思地沉吟起来。

“如果先生能够帮助我们搞到‘幻影’战机，我们绝对不会亏待您的。”

“‘幻影’战机……你们想要获得‘幻影’战机……我明白了。实际上，贵国的飞机制造公司是完全可以制造出这种战斗机来的，可是，这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等待过程……”

“对。这种等待过程是我们所承受不起的。我们的国土随时都在受到阿拉伯世界的威胁。”

“可是要我去替你们搞到这么一架战斗机，简直太困难了。那些飞机都是藏在阿尔卑斯山下的防空洞里，可以说，几乎没有可能，不，根本就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弗朗克内希特稍微考虑了一下，断然说道，“我们公司属于高精尖企业，外部受到严密监视，内部戒备森严，而我又没有飞行经验。”

“可是，先生您忽略了这一点——您是贵公司的首席工程师，您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可以接触机密文件的特权，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弄出那么大一个大家伙来，我们只需要有设计飞机的各种图纸就可以了。”

“图纸，对，图纸，有了图纸你们就可以生产出飞机来。非常正确。”弗朗克内希特低头沉思起来。“我可以帮助你们搞到图纸，但是，图纸的运输将由你们来负责，而且，所有的文件和图纸数量非常庞大，你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

接着，弗朗克内希特谈起了自己的初步打算。

多夫·西恩满意地点了点头。

“鉴于整个行动棘手和繁复，鉴于它潜在的危险性，我希望能够从中获得理所当然的公平的报酬。”弗朗克内希特最后说，“不过，我非常同情贵国政府和贵

国人民，只是这项行动涉及到我个人的生命、荣誉以及家人今后的命运……”

“当然，您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倍感高兴，我们会给出您满意的报酬。请您开价吧。”

“我想我需要200万美元。”弗朗克内希特沉思片刻后说，“这笔钱，如果成功，算是对我承担的风险的补偿；如果失败，可以用来维持我的家人今后的生活。”

“200 万美元……没有问题。可是，这200 万美元我们实行分期给付的办法给您，您看可以吗？”

“当然，我决不无功受禄。”

两天后，弗朗克内希特回到了瑞士。他首先拟定出了一个窃取全套图纸的行动方案。经与摩萨德特工反复研究后，一个最佳行动方案终于产生了。

“火化计划”

1968年初夏，弗朗克内希特开始执行这个方案了。

一天中午，他在公司食堂吃饭时，发现总经理赫尔·多克托·施密特也坐在那里用餐，就走过去坐在总经理身边，一边吃饭一边对总经理说：“赫尔，我想向你提个建议，如果你能采纳，我保证公司每年至少能节

省下10万瑞士法郎的开支。”

总经理一下惊呆了，睁大了双眼望着弗朗克内希特。对于一个商人来说，能节省一大笔资金就等于创造了财富。

“什么建议？是不是让我把公司这免费午餐给免了？不过那也节省不了10万瑞士法郎啊？”总经理笑着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知道，组装飞机的工程已经下马多年了，但那些体积庞大的图纸却始终存放在上千个保险柜里。这些保险柜实在太占地地方了，公司每年都要花费大笔资金另租仓库去存放材料。我在想，既然飞机制造工程已经下马，这些图纸又不知何时才能派上用场，就完全没有必要让它再占用公司宝贵的空间啊！”弗朗克内希特说。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

总经理话还没有说完，弗朗克内希特马上说：“因此我建议，我们把这些图纸全都制成缩微胶卷保存，而将文件原本在严密的监督下全部予以销毁。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仅腾出来的地方，就可以使公司每年至少省出10万瑞士法郎的存储开支。”

总经理边听边连连点头，当即表示，他会很快与瑞士安全部门联系此事，如果得到批准，他将委托弗

朗克内希特主持这项工作。

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确实算得上搞间谍活动的天才，他在没有经过任何间谍职业的训练，在没有任何帮助和辅佐的情况下，独自书写出了谍报史上毫不逊色于职业间谍的一笔。

位于温特图尔市的苏泽尔兄弟公司所承揽的组装“幻影”战斗机工程，属于瑞士政府最秘密的工程，因此自工程一开始，该公司就受到了瑞士安全部门最严密的控制。施密特总经理根据弗朗克内希特提出的建议，立即召集了公司所有的工程师和技术骨干共同商议，最后作出了把飞机图纸全部制成缩微胶卷保存，并将数量庞大的图纸火化销毁的计划。公司将这一计划上报后，瑞士安全部门考虑到此计划确实关系到公司的巨额经济利益，经过再三研究后，还是批准了公司的“火化计划”，但前提是，整个过程都必须在特工部门的严密监视下进行。

瑞士安保部门的官员明文规定，拍摄缩微胶卷的过程必须在一由官方指定的军事安全部门代表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规定每份文件只能拍摄一张照片，拍摄人员也必须经过军事安全部门的严格审查。他们甚至规定了拍摄工作需购买的缩摄机的型号，并且要在公司大楼内为他们找一间最为安全的大厅，作为拍摄

工作间。规定还要求，拍摄后的图纸将装入特制的纸箱，贴上封条，进行统一编号，严密保管，每周四装车运往该市的焚化场去销毁，还严格规定了送达焚化场的时间——凌晨1时整，其他时间一律不得擅自运送，以免在途中出现意外。并且指定此项工程由该公司高级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一个人专门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得接近这些图纸。

负责此项工作的弗朗克内希特一向以严谨著称。在那一次由安保部门召开的会议上，他指出，安全部门作出的所有规定都是完全必要的，为了更加安全，他随后又补充了两点意见：一是在装卸文件时必须要有两名武装人员在场；二是为保证途中安全，他将亲自押车，并由一个他信得过的司机来开车。他随后建议，就由他的侄子来驾驶汽车。他的侄子是市政府的公共汽车司机，完全有这种运送的能力。他可以在每个星期四利用休息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其报酬则由苏泽尔公司支付。

瑞士一向以精细认真的工作态度而著称，它所生产的机械手表之准确更是闻名于世。这一次的整个飞机“火化计划”，就像是一只调整好了的“劳力士”手表一样，丝毫不差地运转起来。购置拍摄缩微胶卷的仪器以及随后的拍摄工作，都在国家安全官员的严密监视

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为了装载那些被销毁的文件和图纸，弗朗克内希特特地订制了一批长120 厘米、宽80厘米、高50厘米的专用纸板箱，并且以专车专用为理由购进了一部菲亚特小型卡车，用来将每周的纸箱运抵焚化场。

这批“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和文件的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仅一台机床的图纸就有4.5万份之多，其总量则可想而知了。为此，经过严格审查的拍摄人员日复一日地工作着，他们先费力地打开面积有好几平方米大的图纸，然后仔细地一块一块地将它们分开拍摄下来，并将它们编好号码保管起来。一天下来，他们已经累得够戗，但是在离开工作室时，他们还要接受军事安全官员的搜身检查。每天快下班的时候，拍摄过的图纸及文件都要在现场官员的监视下，全部被装进纸板箱里，然后进行编号密封。

每个星期四的午夜，这些纸箱又被集中放到专门准备的大木箱里，由武装士兵装上菲亚特小型卡车。随后，弗朗克内希特就坐进驾驶室，由他的侄子开着车，他亲自押着汽车走完从公司到焚化场之间的15分钟的路程。

抵达焚化场后，大木箱被抬进检查大厅，由一位检查员清点纸板箱数目，然后再亲自打开每一个纸

箱，并检查里面装的是否是真的图纸。等到这所有的程序都完成了，并且确保准确无误，再由现场的工人将这些纸板箱一一扔进熊熊燃烧的炉膛里。直到纸板箱全部化为灰烬之后，检查员才在一式两份的收据上签字。

整个过程如此严密，就是最为谨慎的苏黎世银行家们知道后，也会对这一系列安全保密措施赞叹不已。施密特总经理对弗朗克内希特的工作也十分满意，并许诺年底发给他一笔丰厚的奖金以资鼓励。

苏泽尔兄弟公司所做的这一切从表面上看去，的确是万无一失，每一个环节都结合得天衣无缝。但是，在这套程序中，实际上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漏洞——那就是图纸装上汽车后，在运往焚化场途中的那15分钟失去了安保部门的监管。不过瑞士安全部门之所以忽视了这一点，主要是出于对该项工作负责人弗朗克内希特的绝对信任。而弗朗克内希特也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信任，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

实际上，弗朗克内希特订购了双份纸箱。其中一份纸箱运到了公司，而另一份完全相同的纸箱则被送到了他的私人住处。这些东西就是他即将演出的绝妙好戏的道具。

弗朗克内希特还在小卡车每周四都要经过的公路

附近，使用假名租了一间停车房。这间孤零零的车库，正好位于公路旁一条小岔路口上。由于周围被茂密的树木所遮蔽，从公路上根本不可能看到它的存在。这就成了他和他的侄子实施“掉包计”的最好场所。

载着图纸和文件的小卡车离开公司后，都开进这条岔路，并且一直开到隐蔽在树丛后的停车房。在紧闭的大门后面，锁着许多一模一样的纸板箱，不过那里面塞的却是从联邦专利注册局买回的作废的图纸和文件。那些图纸和文件，都是50年前的老古董，堆放在那里实在没有什么用。当时注册局的那些官员听说有人要收购这些东西后非常高兴，就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了弗朗克内希特。因此每个星期四之前，他们就用这些废旧图纸文件将那些纸箱准备好，当他们把车开进车库后，马上将这些纸箱和车子上的纸箱掉换一下就大功告成了。然后他们就继续开着车子快速驶上公路，直奔焚化场而去。整个掉包行动连5分钟都用不了，他们只需在公路上稍微加快点车速，便可以按预定的15分钟准时到达焚化场。

不过在正式行动之前，曾经有一个环节让弗朗克内希特最为担心，那就是秘密文件焚化场官员的检查。为此，他决定最初的两车文件和图纸必须是货真

价实的。结果弗朗克内希特发现，焚化场那些监督汽车卸货和焚烧的督察员，根本就不去翻看纸箱里的文件，甚至连最上面的一张也没有拿出来读一下。那些督察员们告诉弗朗克内希特说，他们必须执行焚化纪律的规定，凡是带有“绝密”字样的文件，他们是无权过目的。听到这样一种解释后，弗朗克内希特最后的一个疑虑消除了，整个窃取行动便开始大胆地运作起来。

于是每个星期四的午夜，这位瑞士苏泽尔兄弟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就和他的侄子准时开着那部装着纸箱的菲亚特小卡车，掉包之后快速地驶向焚化场；然后在每周的星期六早晨，他们又秘密地来到那个路口边的车库，把那些真正的“幻影”式飞机图纸装上小型卡车，飞快地疾驶50公里，来到莱茵河上的边境城市凯泽高斯特，把那些装有图纸的箱子放进一个秘密的仓库里。这一切都是同多夫·西恩上校事先安排好了的。

凯泽高斯特是瑞士的一座历史名城，当年古罗马帝国曾在这里建立过坚固的城堡，用以抵挡来自北部的日耳曼部落的入侵。今天，恺撒帝国那些古老的遗迹犹存，为此一年到头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总是络绎不绝。这是多夫·西恩上校为弗朗克内希特工程师精心挑

选的交货地点。那些熙熙攘攘的陌生面孔，正好可以掩护他们的行动。

具体交货地点在城郊一座属于瑞士罗兹英治公司的仓库。在此之前，西恩上校已委托了他的一位“朋友”——一个被他收买了的德国人汉斯·施特雷克尔将仓库的一把钥匙交到了瑞士工程师的手中。中午12点之前，小型菲亚特卡车开到仓库跟前，弗朗克内希特打开仓库大门，和他的侄子一起把50公斤重的文件和图纸卸下放进仓库里，锁好门后便开车前往那家希尔申饭馆。

等他们到达希尔申饭馆时，正是中午用餐时间，希尔申饭馆里宾客满座。弗朗克内希特装作寻找座位搜索着他要找的接头人。当终于看见了坐在一张桌旁的施特雷克尔投来的目光时，瑞士工程师就向他发出了暗号——看一下手表，随后便找个座位，和他那个辛苦了半天的侄子一起喝起啤酒来。以后的事情就不用弗朗克内希特操心了，那个德国人施特雷克尔将会完成一切，把那些珍贵的图纸完整地交到以色列人手中。

施特雷克尔是罗兹英治运输公司的一名职员，虽然他到这儿工作才不过一年，但却以其勤劳和精明赢得了雇主的赏识和信任。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公司进

出海关办理必要的公文手续。一年来，他通过频繁的边境往返，已经与瑞士和德国的海关官员们混得很熟了。两边的海关官员们都夸赞这位德国人是个热心肠，他总是利用到瑞士或德国办事的机会替他们办些琐碎的杂事。这位豪爽的德国人还是海关官员们的酒友，他总是时不时地要请他的酒友们在边境附近的酒吧间里喝上几杯啤酒。他常说他最不愿意独自喝酒，与朋友共饮才感到痛快。因此每到付款时，他总是慷慨解囊。对于如此豪爽热情的朋友，凯泽高斯特边境两边的海关官员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就这样，施特雷克尔花费了一年的时间为自己的工作铺平了道路。

施特雷克尔接到瑞士工程师发出的暗号后，不等喝完杯中的啤酒便起身离去。他将自己的那辆黑色的默赛德斯轿车开到仓库，把货装进后备厢后，便径直驶向边境。海关官员看到他和那辆熟悉的黑色默赛德斯轿车后，一个个都露出了笑容，争着同他打招呼。他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往返一次边境，这些官员们对于他的这辆黑色轿车早已熟悉。他们愉快地把手一挥就放行了，只等老朋友回来后请他们喝酒了。

一踏上德国的土地，施特雷克尔立刻加快了车速，直奔斯图加特。快到斯图加特城时，他的车子离

开高速公路，向一个小飞机场开去。几分钟后，这批“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和文件，就已经装上了一架在意大利登记的双引擎塞斯纳式运输机，然后向亚平宁半岛南部的布林迪西飞去。在那里，这些图纸和文件再被装上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直抵以色列。

偷运到以色列的图纸足足有20吨

瑞士工程师偷出的第一批图纸是在1968年10月5日到达这个机场的。从那以后，每当来自亚平宁半岛运送图纸的飞机降落前，总有一辆汽车等候在机场，而驾驶汽车的摩萨德特工也总是在飞机一出现就提前发动了汽车，为的是尽快将这些珍贵的图纸送到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技术人员的手中。

就这样，那些从瑞士联邦专利注册局买回的作废的图纸和文件一次又一次地被送进焚化场，那些真正的“幻影”飞机的图纸和文件，却一周一周地安全运抵以色列。那位瑞士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也会和他的侄子，在一个又一个的星期六来到莱茵河上的边境城市凯泽高斯特，来到那家希尔申饭馆喝上一杯可口的德国啤酒。

从事情开始到大功告成，瑞士工程师弗朗克内希

特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先后偷运到以色列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和文件足足有20吨重，几乎可以装满一节火车皮。这可真是一场不可想象的持久战。当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把最后一批图纸送出去之后，他才睡了一个安稳觉。他已经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自己的承诺，为陷于绝境之中的以色列做了点什么。

为了庆祝一下，也为了犒劳一下与自己共同冒着生命危险完成这项神圣使命的侄子，弗朗克内希特特意把他请到家里来，打开了一瓶价格昂贵的陈年白兰地。可是，就在他们举杯相庆的时候，那个德国人施特雷克尔却在凯泽高斯特出事了。

原来，罗兹英治运输公司的两位董事卡尔·罗兹英治和汉斯·罗兹英治兄弟俩得到一位朋友的报告，说是发现有人从他们的仓库里偷东西。他们的这位朋友有在饭后领着心爱的阿尔萨斯名犬散步的习惯，每天都路过这家公司的仓库。久而久之，他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常常会在罗兹英治仓库门前与同一个外国人相遇，而且又总是在星期六午饭过后的时间。

而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每次相遇时，都能见到这家伙从仓库中搬出几个纸板箱，装进自己的汽车后备厢后即开车离去。他开始怀疑这个人有可能是在偷盗他朋友的公司的东西，于是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

的朋友。

罗兹英治兄弟俩也感到可疑，便决定在那个星期六中午亲自去看一看，结果他们发现是施特雷克尔。他们对施特雷克尔本是很信任的，这下也就放心了。但没想到的是施特雷克尔明明已经看到他们，却连招呼都不打一下，就匆匆忙忙地将手中抱着的纸板箱装上车，然后开着车全速离去。罗兹英治兄弟被他的这种无礼态度激怒了。

于是，等到施特雷克尔开车走后，他们就打开仓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在仓库里，他们发现了施特雷克尔最后没来得及装上车的一只纸板箱。他们打开纸箱一看大吃一惊，发现箱子里面装的全是图纸和文件，上面还标有“绝密”和“瑞士军事部制”的字样。罗兹英治兄弟俩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录用的这个施特雷克尔竟然是个间谍。他们立刻赶到附近的警察局报了案。

接到罗兹英治兄弟俩报警后，瑞士立即实行了全境总戒严，通缉汉斯·施特雷克尔。但是此时他早已越过了瑞士边境，坐上那架由两名飞行员驾驶的小小的“塞斯纳”式飞机朝南飞去了。

瑞士警察很快就查明了这个汉斯·施特雷克尔的身份，原来这个化名汉斯·施特雷克尔的家伙根本就不是

什么东柏林的难民，而是一名摩萨德特工。

瑞士警方眼下最急需弄清楚的就是，这些绝密的“幻影”战斗机的图纸究竟通过什么途径飞出了温特图尔市的焚化炉，又是怎么来到了罗兹英治公司仓库里的？瑞士警察与国家安全部门经过几十个小时调查，线索最后集中到了苏泽尔兄弟公司的阿尔弗雷德·弗朗克内希特工程师的身上。

就在警察紧锣密鼓地进行调查的时候，弗朗克内希特已经听到了风声，而且在此期间，他还接到了施特雷克尔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说他已平安离去，并要工程师设法出境，以色列将会妥善安排他的后半生。

但是这位瑞士人却表现得异常镇静。

星期一早晨，他像往常一样到公司去上班。

第二天，他又应邀前往苏黎世附近的杜邦多夫机场，与瑞士国防部长和其他高级军事官员共同探讨了一些有关飞机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弗朗克内希特的意见被认为极有价值，甚至还得到了国防部长的高度重视。

但是，瑞士反间谍机构的官员已等在机场会议室外。会议一结束，他们就逮捕了弗朗克内希特。

审讯官很快就发现低估了弗朗克内希特。弗朗克

内希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他还说，以色列人答应付200万美元买下这些“幻影”飞机的设计图。迄今为止，他已收到20万美元，此外，弗朗克内希特还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整个计划的实施细节。审讯官员们听得一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结束审讯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但我们却没有想到。”

当那些审讯官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时，弗朗克内希特说：“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帮助以色列人。犹太民族是个非常值得同情的民族。犹太人悲惨的历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奥斯威辛和达豪集中营的情景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幻影战斗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法国人单方面终止合同的做法不仅是背信弃义，而且还将以色列的犹太人又推入了新的绝境。为此我必须帮助以色列。我的良心为我所规定的道德准则也要求我必须这样做。

“我从不认为我犯有叛国罪，因为我没有丝毫损害瑞士的国家利益。“幻影”飞机的图纸是法国的，只有法国人才会认为我犯有背叛罪。对于我的所作所为最为愤怒的应该是法国当局，而不应该是瑞士政府。瑞士依然掌握着缩微胶卷上的飞机图纸，而且这些图纸已经没有价值了，因为瑞士再也不想制造这种飞机

了。

“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这件事如果捅出去法国人会作出何种反应。其结果只能是瑞、法两国关系的长期恶化，这对于我国来说是绝对不利的。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够释放我，而我保证将对此事守口如瓶。”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瑞士政府拒绝了这笔交易。1971年4月23日，瑞士法院宣判他犯有工业间谍罪和触犯瑞士军事机密罪，判处劳役4年零6个月。应该说，瑞士法庭还是相当宽容的。弗朗克内希特后来承认，他原以为要被判处20年徒刑呢。但是那些法官们似乎敬佩他的动机——因为他仍然强调，他这样做是出于对以色列的感情，而不是因为贪心。最后，这位被判罪的间谍在监狱实际只待了一年。

以色列将“鹰”式战斗机送上了蓝天

1971年10月的一天，当弗朗克内希特在监狱的图书馆里读报纸时，突然看到了一篇报道，详细地报道了以色列将一种新型的军用飞机“鹰”式战斗机送上了蓝天的消息。这种飞机的名字虽然叫“鹰”，但是根据后来公开的材料披露，以色列的这种飞机正是借鉴了“幻影”飞机的技术而研制出来的。弗朗克内希特不

得不佩服以色列人的创造能力。

1975年4月29日，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机场骄傲地展示了他们最新式的“幼狮”喷气式战斗机。这种飞机与“幻影”飞机的模样极为相似。当时全世界的专家都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在所有正服役的战斗机中，以色列的“幼狮”喷气式战斗机处于最优秀的行列之中。它的速度达到了2.2马赫，安装有复杂的电子导航系统，还能携带导弹。1976年，以色列请求在巴黎航空展览会上展出这种新式的“幼狮”战斗机时，却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拒绝。



以色列政府根据摩萨德窃取的“幻影”图纸制造出了自己的战斗机

当时，对此做出了贡献的弗朗克内希特应邀第一

次来到这个犹太国家，观看“幼狮”的首次飞行。当看到天空中飞过的那种新式战斗机时，他心中当然明白，自己与中东天空中划过的那条银带有着紧密的联系。

然而，当时无论是以色列政府还是摩萨德领导人，在对待弗朗克内希特的态度上都很矛盾，因为没人愿意想起那次行动消极的一面。所以当时以色列政府虽然邀请他来以色列，但是并没有在公共场合向他表示正式的欢迎，既没有红地毯也没有鲜花，据说往返的机票都是他自己花的钱。

弗朗克内希特感到自己被那些摩萨德特工遗忘和抛弃了。一位瑞士法官如是评价说：“在谍报世界，情况就是如此。从来没有人愿意承认什么。”

弗朗克内希特后来生活在瑞士的乡间，过着懒散的日子。作为一个曾经背叛过公司的人，他再也不可能找到新的工作岗位了。尽管如此，弗朗克内希特并没有后悔自己对犹太人的同情。

第十一章 摩萨德偷梁换柱“高酸铅盐”成了铀矿石

总统和总理的一席对话让以色列正式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购买现成的核反应堆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从此摩萨德有了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偷”铀；“高酸铅盐”行动成功地将200吨铀矿石安全运抵迪莫纳核研中心。

战争背后的交易

1945年8月6日8点15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彻广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从此，原子弹就成了当今世界一个恐怖的话题，也成了一种外交场合中的最强音，一位核物理学家曾

感慨地说道：“曾几何时，核爆炸的轰鸣成为这个星球上一种最强硬的外交语言。”

自那以后，各大国竞相开展了核武器研究及核试验，苏美两国之间更是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核竞赛。尽管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库中的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数十次，但是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核国家胆敢再次使用核武器。于是，核武器成了一种只能拥有却不敢轻易使用的战略威慑力量。但是，这种威慑力量也一直在诱惑着中东弹丸之国的以色列。

以色列人对原子弹的渴望可以说是由来已久。建国后，为了能够有一个足够安宁、安全的环境，他们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1948年12月20日，以色列的开国总理本-古里安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来自巴黎的客人，他就是法国原子能委员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也被本-古里安称作是“法国原子炉的建设者”的莫里斯·瑟丁。莫里斯·瑟丁是一名犹太人，1913年出生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曾经一度移居巴勒斯坦，后来定居法国。

那一天，本-古里安和莫里斯·瑟丁谈了好久。这位以色列总理急切想从瑟丁那里知道有关原子弹制造的细节。

195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以色列总统哈依姆·魏茨

曼来到了总理本-古里安的办公室。众所周知，魏茨曼曾是一位具有世界水平的著名化学家，他们之间的这一次谈话，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谜一样的悬念。

魏茨曼向本-古里安问道：“你知道以色列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几？”

总理被问得莫名其妙。他实在是不明白此时总统先生提出这种常识性问题，究竟是想说明什么。他没有做声，只是在静静地等待着。

“还不到百分之零点五。”总统自问自答道，“那么现在再请你猜一下，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犹太人究竟占了多少？不知道吧？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20%！”

“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本-古里安问道。

“这个问题还是靠你的想象力来回答吧。”魏茨曼总统说完，便离开了总理的办公室。

本-古里安目送总统离开之后，想了想，会心地笑了。他知道在对待核武器的开发和研究上，总统和自己想到一块儿去了。于是，以色列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这次简短的会谈，为以色列正式启动核计划亮起了绿灯。

不久，以色列内阁就正式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把研究和发展核武器一事正式提到了议事日程。以色

列的原子能委员会由8名重量级人物组成。其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当代世界杰出的化学家之一厄恩斯特·戴维·伯格曼担任。伯格曼在20世纪30年代移居巴勒斯坦，他在研究癌症和其他课题的同时，还兼任以色列国防部科学机构的负责人，同时还是以色列发展核武器计划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当时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法国只是在1952年刚刚提出发展核武器。以色列刚刚成立5年，就准备启动这项工程，其心情之迫切可想而知。

以色列科学家谈的最多的就是核反应堆的问题。他们清醒地知道，购买现成的原子能核反应堆是以色列发展核武器的第一选择，既可以让以色列轻而易举地跨越许多技术障碍，更可以为以色列节约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于是他们开始寻找这种机会。

1955年，机会终于来了。以色列政府在和平使用原子能协议上签字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一份总统令，决定向以色列提供一座5兆瓦的用于研究的小型核反应堆。反应堆被安装在特拉维夫市以南10英里处的索雷克河畔。不过，该反应堆一直受到美国人的监管，而且规模太小，根本不可能派上军事用场。

从那时起，本-古里安就一直在考虑购买一座大功

率核反应堆的可能性，当然，这在当时美、苏、英三国实行核垄断的情况下绝非易事。但是不久，他们便发现有一个国家可以帮助以色列实现核计划，它就是也正在自力更生发展核武器的法国人。

1955年4月，法国社会党上台执政后，法兰西殖民帝国的势力一下子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东地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蓬勃发展，埃及纳赛尔政府又在1956年7月突然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法国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主要股东，也是中东地区最大利益的获得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法国政府决定对埃及进行报复，不仅冻结了埃及在法国的财产，同时还准备联合英国对埃及发起一场战争。

法国与埃及的矛盾让以色列人看到了希望。时任以色列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的西蒙·佩雷斯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国很有可能帮助以色列实现核计划。他开始频繁往返于特拉维夫与巴黎之间，试探购买核反应堆的可能性。没想到，佩雷斯的这种做法在以色列国内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当时甚至连以色列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也认为，佩雷斯有点“越俎代庖”，企图把国防部变成以色列的第二外交部。但是佩雷斯却依然我行我素。他认为只要总理支持他的行动，其他任何人的反对意见都可以不予理睬。

当时，法国人也想尽快成为核国家，但却苦于得不到美、英两国的支持和帮助，而在核研究领域人才济济的以色列，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以色列已经向法国提供了一些让他们非常感兴趣的研究成果，譬如从磷酸盐（以色列内格夫荒漠中蕴藏着大量的磷酸盐矿）中提炼铀的公式，以及生产不带电重水的公式。这些公式对于核研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法国人没有料到以色列竟然拥有如此之高的核研究水平，并且又表现得如此慷慨。作为回报，法国人破例允许以色列科学家以秘密观察员的身份，了解法国的核研究过程。在法国人看来，以色列人的兴趣不过仅限于核物理的理论研究而已。

现在，以色列又在向法国人尝试着提出了帮助建立大功率核反应堆的请求，但遭到了法国政府的拒绝。以色列人并未因此而气馁，而是继续寻找着机会。尤其是佩雷斯的多次访问，让法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他们的要求。直到1956年2月，法国社会党政府开始执政后，时任总理的居伊·摩勒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态度非常强硬，同时由于埃及政府在苏伊士运河上的态度，让法国政府与同样坚决反对埃及纳赛尔主义的以色列有了许多共同的语言。于是在对待以色列的

核计划问题上他们开始有了新的态度。

1956年9月，一份密电突然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发往位于非洲东北部的一个小国吉布提。在那里的以色列一家公司的总经理阿谢尔·本·纳坦收到了这份电文。电文要求他立即打点行装回国待命。这位总经理其实就是摩萨德的一位资深特工人员。阿谢尔·本·纳坦立即飞回了特拉维夫，来到以色列国防部。正在那里等待他的西蒙·佩雷斯马上给他布置了一项新的任务，命令他立即飞往巴黎。

佩雷斯说：“老人家要你立即飞往巴黎，恢复你在政治处工作期间在那里建立的联系，并且充任国防部负责欧洲事务的特别代表。你最好不要问得太多，一切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明确。”

听到佩雷斯这样说，本·纳坦就知道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只有执行命令，于是又马不停蹄地去了巴黎，按照佩雷斯的指示开展自己的工作。

1956年10月22日，在巴黎郊外以北100 英里处的一幢乡间别墅里，本·纳坦见到了来自以色列、法国和英国方面的许多政界要人，其中包括时任以色列总理兼国防部长的本-古里安，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摩西·达扬，本-古里安总理的主要助手、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法国总理居伊·摩勒，法国国防部长莫里斯·

布歇-莫努里，法国外交部长克里斯莱昂·皮诺，还有英国外交大臣赛·塞尔温·劳埃德等人。这可能是本·纳坦一生当中一次见到的最多的各国军政要人。

三国首脑进行了一场并不轻松的会谈，即准备共同联合起来向埃及发起进攻，由埃及的死对头以色列充当打手，率先在西奈半岛下手。本·纳坦后来回忆说，“整个会谈充满着一种阴谋的气氛”。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建立自己的大型核反应堆，以色列当时就答应了愿为英、法两国入侵埃及打头阵，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求法国帮助自己建立一个大型核反应堆的条件。法国国防部长莫里斯·布歇-莫努里在不提出任何保护条件和核查要求的情况下，当场就代表法国政府将核反应堆作为“蜜糖块”送给了以色列人。此时，本·纳坦终于明白了自己调往欧洲出任国防部代表的原因：他的使命并不是协助做好苏伊士运河战争的准备，而是帮助自己的国家从法国人手中获得第二个核反应堆。

会谈三方一拍即合，以色列当场就制定了代号为“卡代什”的作战计划，英、法也制定了代号为“火枪手”的作战计划。一场共同对付埃及的战争计划就这样出笼了。

这次会谈一个星期后的10月29日，以色列忠实地

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主动挑起事端，在西奈地区发动了战争。那一天，以色列的“达科他”式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降落在埃及的西奈半岛，由沙龙指挥的一个营的伞兵向苏伊士运河以东65公里处的米特拉山东侧挺进。苏伊士运河战争由此拉开了战幕，埃以双方在米特拉山口展开激战。随后，英国和法国借口维护运河的安全，向交战双方提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双方停火，介入了这场大战。在那年的西奈战争中，以色列忠实地同英法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终于改善了巴黎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关系。

1957年1月2日，法国总理居伊·摩勒向以色列人发去一封非常亲切的新年贺信，信中写道：“法国对英勇的以色列人民的敬佩之情难以尽书。以色列完全有权得到法国对其和平努力的全力支持。”

1957年5月下旬，居伊·摩勒政府垮台，布歇-莫努里上台组阁，当上了法国新总理。苏伊士运河事件后，法国的政治局势一直不稳，新内阁出台的阿尔及利亚政策导致了布歇-莫努里政权在执政3个月后即告结束。不过让以色列人感到庆幸的是，莫努里决心要在退出政治舞台之前实现他的承诺。在莫努里的干预下，法国内阁会议最终于1957年10月2日以投票方式就核反应堆的问题作出了决定。10月3日——也就是

莫努里执政的最后一天，他与皮诺外长代表法国政府，与佩雷斯和本-纳坦签署了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概述法、以两国间科技合作的政治条约；另一份则是关于法国向以色列提供一座24兆瓦大型反应堆所需技术和技术人员的协议。

文件一经签署，佩雷斯就立即通过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馆，将这一喜讯用密电发回国内。总理本-古里安很快复电：“祝贺你们取得的重要成果。”

通过佩雷斯和摩萨德在巴黎的努力，以色列获得了一座24兆瓦功率的核反应堆，但是一些以色列的科学家却不领情。出于科学家的良知，那些人认为，如果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发展自己的核力量，必然会导致一场核军备竞赛，这个世界就离毁灭不远了。因此当本-古里安在内阁讨论这一问题时，并没有太多的部长们为此而高兴。而由8名科学家组成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竟然有7个人提出辞职以示抗议。这时只剩下委员会主席厄恩斯特·戴维·伯格曼一个人依然在支持本-古里安的核计划。

大漠深处的“纺织厂”

以色列有了大型的核反应堆以后，佩雷斯为了加

强其安全和保密工作，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核情报工作的安全机构，由曾在以色列“辛贝特”工作过的安全专家宾亚明·布卢姆伯格负责。这个安全保密机构开始是与国防部一起办公。为了掩饰其工作性质，将其命名为“特别任务办公室”。几年以后，它又被命名为“科学联络局”，办公地点也由国防部迁移到特拉维夫商业区附近的卡尔巴赫大街上的一幢偏僻的大楼里办公。

佩雷斯的这种做法，引起了摩萨德的不满。原因是那个负责安全保密工作的布卢姆伯格太敏感了，连摩萨德的人也不相信，当时摩萨德的局长哈雷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不清楚这个“科学联络局”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

尽管佩雷斯对这个核反应堆的获得欣喜若狂，但是这样一座仅仅只有24兆瓦功率的核反应堆，不足以用于军事目的，用美国核专家的话来说，只属于“袖珍型”核反应堆。根据法国和以色列签订的协议，这只是为以色列提供的“第一期工程”，以后该反应堆的功率还要再增加一倍。遵照上述协议，30多名法国原子能专家和几百名法国技术人员和施工顾问陆续来到了以色列，参与这项工程的建设。不过法国人对于这项工程的态度还是相当谨慎的。因为帮助一个中东国家来进行核扩散总是一件受到非议的事情，所以他们在承

包合同书上，只是提到了“温暖气候和沙漠环境”。仅仅是根据这种含糊其辞的提示，一些国外的情报机构还是知道，以色列的这个核反应堆的地址是在内盖夫大沙漠中的贝尔谢巴古城。以色列人之所以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因为根据《圣经》故事的记载，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曾经享受过这块沙漠中的绿洲，所以他们也希望这片沙漠能给今天的以色列带来好运。

法国情报机构派出了许多情报人员来到以色列，协助以色列做好安全保密工作。虽然是搞核扩散，但这种秘密是不能扩散的。据说当时有一位法国情报人员化装成一名神父，对贝尔谢巴的市长进行了试探，问市长对内盖夫大沙漠的前景有什么看法。哪知这位市长竟然告诉这位“神父”说，附近有一座由法国人援建的核反应堆正在兴建之中。这位法国情报人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将这件事报告了巴黎，强烈批评以色列的保密工作太不专业了。结果以色列为了掩人耳目，就说在内盖夫沙漠深处正在修建一座大型的纺织厂——于是才有了后来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那种特有的幽默——“我将进入纺织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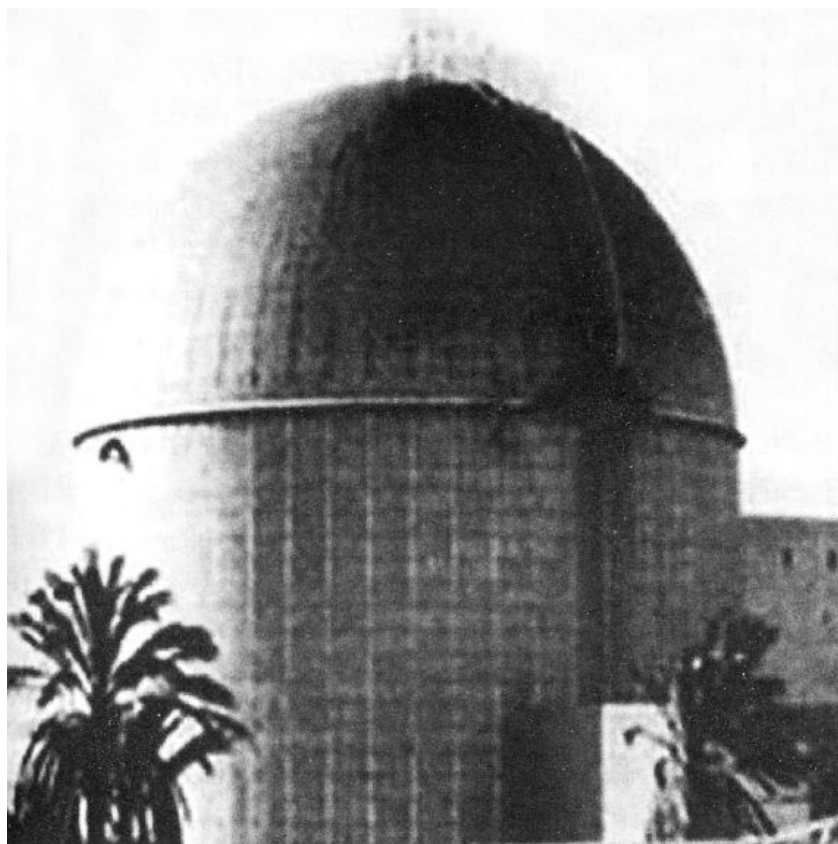
那些派遣到以色列的法国专家们在建造核反应堆工程中很卖力气，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犹太血统，不少人还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于是在内盖夫大沙

漠的深处，很快就出现了一座半球形拱顶的圆形建筑——这就是以色列的迪莫纳核研究中心。这个中心从一开始兴建，就被列为以色列的最高国家机密，并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安全保卫。那里不仅有武装警卫日夜不停地巡逻，而且在距离建筑物还有几公里远的地带就架设着铁丝网；此外，连场区上空都被划为绝对禁区。一次，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在训练飞行中迷航，误入迪莫纳上空。他驾驶的战斗机在未受到警告的情况下，直接被布防的导弹击落。

尽管以色列对这里采取了空前的保密措施，但是迪莫纳的核工程最后还是被发现了。1960年，美国的一架U-2侦察机飞过内盖夫大沙漠上空时，拍下了这座圆形建筑物的照片。美国情报部门几乎没有花多大的气力，就弄清了这座圆形建筑物是一个什么东西。于是，美国和英国新闻媒体马上就出现了以色列在研制原子弹的报道。华盛顿立即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说明事情的真相。但是这并没有让以色列人感到害怕。

真正让以色列人感到苦恼的是戴高乐重新上台执政后，法国人为获得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对中东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结果把以色列这个昔日的盟友给疏远了。1960年5月，戴高乐命令外交部长通知

以色列驻法大使：法国将不再向迪莫纳核反应堆提供铀。这个消息对以色列来说可真是晴天霹雳。因为一旦没有了法国提供的铀，以色列的核反应堆就难为无米之炊了，一切设施也就成了摆设。



迪莫纳核反应炉

听到这个消息后，本-古里安立即于6月13日飞往巴黎，与戴高乐总统见面。见面后，戴高乐就直言不讳地问本-古里安：“以色列究竟为什么需要核反应堆？”

本-古里安只有许诺说：“反应堆将仅用于和平项目。迪莫纳将不再增加提取武器型钚元素的设施。”

回国之后，本-古里安发现迪莫纳核反应堆本身已无密可保，就公开宣布以色列已经进入核时代。1960年12月21日，本-古里安在议会正式宣布，以色列正在建造第二个研究型核反应堆。并且向议会保证，反应堆将仅仅用于和平目的。这种承诺正是法国总统戴高乐需要得到的。

为了维持和法国的这种脆弱关系，讨好法国人，以色列人这时竟然做出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摩萨德忍痛割爱，把一个曾经为以色列提供过大量重要情报的“线人”交给了法国警方。

也许是被以色列人的“忠诚”所感动，法国人终于同意兑现自己的承诺，答应为以色列提供最后的一部分材料。迪莫纳24兆瓦功率的核反应堆如果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出一枚2万吨当量的原子弹，与当年美国投放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级别相等。

莫名其妙丢失的铀

眼看以色列的原子弹制造计划就要好梦成真了——然而好事多磨，到了1962年，以色列的法国伙伴

圣戈贝恩公司在外界的压力下中止了同以色列的合作，这让以色列的核计划又一次面临绝境。

以色列内阁又一次召开紧急会议，他们决不能让以色列刚刚起步的核计划中途夭折。在制造原子弹工程上，以色列人所发愁的不是技术，而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浓缩铀。

自从美、苏、英三大国决定垄断核武器后，刚刚成立的国际原子能管理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关于《防止核扩散协议》的精神宣布：制造原子弹的铀为世界第一战略物资，对世界各地商业性铀矿石原料的生产和销售必须实行最严密的管理和控制。

内阁会上的气氛空前紧张，大家都在沉默不语。这时，摩西·达扬终于打破了这种沉默。他向所有在座的内阁成员问：“迄今为止，我们都一直是从哪里搞到铀的？”

“主要是从法国、加蓬和乍得。”一名负责核研究的专家回答说，“现在法国人已经指望不上了。而自从美国人进一步严格了国际规定后，从第三世界国家搞铀也很困难了。”

“照此看来，我们的核计划就只好因此而中断了？”达扬反问道。

专家回答道：“迪莫纳每年需要大量的浓缩铀，如

果没有办法搞到，我们也只好就此罢休。”

达扬站起身，用他那军人特有的果断口气说道：“我们必须寻找到其他渠道。如果还搞不到，那就去偷！”

就是那次会议以后，摩萨德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偷”铀。而实际上接受这一任务的不仅是摩萨德一家，拉卡姆也被赋予了同样的搞铀任务，只是不为人知罢了。

摩萨德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三个月后，摩萨德特别行动小组的三个方案呈到了局长的办公桌上。方案之一：闯进美国某个生产浓缩铀的特别实验室行窃。虽然要冒极大的风险，但有可能得手。方案之二：袭击运铀车辆。行动地点最好是在美国，虽然防范严密而风险大，但有可能成功。方案之三：对某个原子能实验室的工程师或负责人进行“策反”，劝他为以色列“挪用”部分浓缩铀。此方案风险最小，但“挪用者”则需为此承担较大的风险。

阿米特认真地审阅了上述方案之后，大笔一挥，批示道：“拟择第三方案，集中全力物色策反对象。”

摩萨德驻美国特工很快物色到了几个策反对象，其中纽梅克公司（即核原料及核设备公司，简称

NLJME) 的总经理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最为理想。

扎尔曼·莫德凯·夏皮罗的大致履历如下——1922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坎顿市，父亲是来自立陶宛的一名正统犹太教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夏皮罗在德国的很多亲戚都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命；即使在美国，夏皮罗本人也遭到了反犹太分子的侮辱。这一切都造成了他强烈的复仇心理，使夏皮罗成为了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48年，夏皮罗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约翰·霍金斯大学化学专业，并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此时的他仍没有忘记为犹太事业而战，他成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成员，并且是美国技术学会的成员。美国技术学会同以色列海法技术研究所有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

1949年，这位满头乌发、仪表堂堂的年轻人应聘到威斯汀豪斯电器公司工作。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美国第一艘、也是世界第一艘核潜艇“鹦鹉”号研制艇用核反应堆。由于工作成绩显著，他得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奖金。但是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并不想一辈子局限在技术领域，而想在商界闯出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1957年12月，夏皮罗在宾夕法尼亚的阿波罗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纽梅克公司，也就是“核原料和核装备公

司”，为美国日益增多的商业性核反应堆提供大量的铀。公司自开张伊始便门庭若市，不仅与许多私人企业签订了利润丰厚的合同，而且争得了大宗政府订货。

1958年，夏皮罗又将其公司对外贸易拓展到了以色列，纽梅克公司成为以色列国营康采恩的“技术顾问”。两年后，又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公司的一半股份掌握在以色列人手中。据该公司的营业报告称，其经营项目是“研究使草莓和柠檬果经辐射处理后利于贮存的设备”。从那以后，来自以色列的客人就经常光顾夏皮罗的公司和住宅。其中有一位名叫巴鲁克·西奈的原子能专家，还有一位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负责科技事务的官员，名叫埃夫赖姆·拉哈夫。这两个人是夏皮罗的常客，真实身份是摩萨德特工人员。

这些外国人，尤其是以色列人经常光顾纽梅克，引起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注意，就对这家公司和这些客人进行密切监视。1961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一份秘密文件表明，该公司被监督官员视为“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并且它在经营这种高度危险的物资时，“没有十分严格地遵守”规章。

但是夏皮罗根本无视官方的禁令，擅自把根据政府合同存放在公司里的浓缩铀，同其他品种的铀掺在

一起，偷偷地出售给一些外国人——实际上是卖给了以色列人。以色列通过纽梅克先后搞到了400 磅的铀。如果用这这些铀来制造原子弹的话，足够制造出18枚核弹头。

正当摩萨德为其行动而感到高兴之时，正如其事先估计的那样，偷取浓缩铀的行动给“挪用者” 夏皮罗带来了麻烦。

1965年4 月30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一次例行调查中，偶然发现纽梅克公司的账目存在严重问题。账目上表明，威斯汀豪斯公司向纽梅克公司提供的134磅浓缩铀，竟然莫名其妙地“丢失”了。这些浓缩铀是美国政府用来实施“阿波罗”空间计划的。于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立即对夏皮罗进行了严厉的盘问。

夏皮罗在回答时闪烁其词。他声称纽梅克公司在特殊的生产过程中，曾经埋掉了一部分报废的铀。他还说，这种做法属于十分正常的行为，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检察官却认为这个说法证据不足，坚持要把装有报废铀的容器从地下挖出来才可结案。果然，1965年10月21日的挖掘检查结果表明，被埋掉的铀还不到“丢失”数量的10%。

随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又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调查，结果发现纽梅克公司“丢失”的浓缩铀竟多达391

磅之多，远远超过了原先的估计。检察官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从未有一家公司丢失过这么多的铀。”

夏皮罗却始终矢口否认自己的公司丢失过铀。他坚持说，公司所有的交易手续都是完备的，只是一部分成交凭据在“保持工厂清洁”中不小心散失了。那些检察官当然不能认可夏皮罗的这种说法，于是美国原子能检察官在一份草拟的调查报告中说：“尽管尚不能有把握地断言，未曾发生过该原料失窃或转让事件，但监督小组没有找到可支持这一结论的具体佐证。”

言外之意就是说，对于夏皮罗，他们提不出任何犯罪证据，但是他得赔偿损失。于是第二天，原子能委员会就给夏皮罗送来了一份92.9 万美元的账单，要他支付这笔赔偿款。

但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任霍华德·布朗并没有就此罢休，他求助于美国联邦调查局重新进行调查。然而联邦调查局后来得出的结论也依然是模棱两可。联邦调查局在报告中说，夏皮罗“并不一定是摩萨德间谍，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拥护者”。

为什么神通广大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居然抓不住一家小小的纽梅克公司的把柄呢？据后来爆料显示，这倒并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无能，也不是纽梅克公司和

夏皮罗本人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其真实的原因是他们当时在华盛顿有一顶“保护伞”——美国中央情报局反情报科负责人詹姆士·安格尔顿。安格尔顿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有了这样一位人物的保护，夏皮罗的纽梅克公司当然不会原形毕露。

于是在几经检查之后，纽梅克公司还是照常营业，重新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大宗订货，并且还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划入“能够最为妥善地经营浓缩铀”的国家公司之列。但是后来由于安格尔顿的倒台，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情报“蜜月”也终结了，摩萨德特工在华盛顿为所欲为的日子也到头了。

最糟糕的旅行

尽管以色列的迪莫纳反应堆于1964年6月就已开炉运行，但制造原子弹的指令却迟迟没有下达。消息灵通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内部对于以色列是否应拥有核武器，尚未达成一致的意見。

时任国防部长的摩西·达扬将军和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西蒙·佩雷斯从一开始就是核计划最积极的赞成者，军人们主要是从国家防务和国家财力角度来考虑其必要性的。达扬在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一次谈话

中就公开谈到了自己的理由：“我们别无选择。我国因人口所限，无论在人力上还是财力上，都无法装备越来越多的坦克、越来越多的飞机。否则，用不了多久，我们所有的官兵都将忙于保养飞机和给坦克上油。”

而当时以色列的新总理列维·艾希科尔上台之后，更多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他不同意以色列制造核武器，并且称他的前任本-古里安总理所制定的核计划是个“十足的劣作”。他的意见得到了以色列外交部长等人的拥护和支持。不过，以色列的国民却普遍支持制造原子弹。1966年3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每100个以色列人中，就有76人希望国家拥有原子弹，甚至还有人认为，以色列军队实际上已经装备了核武器。

“六日战争”的大获全胜，让“独眼将军”摩西·达扬成了以色列的传奇人物，他在内阁的争论中获胜，加快了以色列原子弹制造的步伐。1967年8月，以色列内阁终于通过了制造原子弹的秘密议案。

此时，位于内盖夫大漠深处的迪莫纳核工程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安全保密问题。为了解决安全问题，摩萨德特工不得不干掉一名来自法国的科学家，理由是有证据表明，此人当时正在为克

格勃从事间谍活动。于是，摩萨德特工就让这位法国科学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永远闭嘴了。还有一次，一名以色列飞行员驾驶着一架战斗机误入迪莫纳上空禁飞区，经过权衡利弊，最后还是毫不留情地将其击落。

除了安全保密之外，还有一个令以色列人担心的问题，就是缺少制造原子弹的铀。他们急需大量的优质氧化铀，而此种物资在当时的国际市场上已经无法买到。

面对科学家们的呼吁，神通广大的摩萨德又一次挺身而出，接受了这项艰巨的任务。他们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搜寻目标，寻找哪个地方有他们所需要的铀。很快，他们就通过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里的“内线”获得一条信息：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矿业总公司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氧化铀矿石。这批优质的氧化铀矿石是从扎伊尔的一家兄弟公司手中接收下来的，如今正存放在荷兰安特卫普港附近的一个仓库里。

得到这个消息后，摩萨德立即兴奋起来，一个代号为“高酸铅盐”的行动计划出笼了。

“高酸铅盐”行动计划的步骤如下：第一，设法找到一个既为国际原子能管理机构所认可，又愿意秘密接受以色列委托的贸易伙伴；第二，由这位“贸易伙

伴”出面将这批氧化铀矿石通过“正常途径”买下来；第三，在运输途中由摩萨德将这批氧化铀矿石劫持并运送到以色列的迪莫纳核工程基地。

“高酸铅盐”行动计划在理论设计上应该是无懈可击的，但执行起来却是一项极端危险的行动。27岁的摩萨德特工丹尼尔·艾贝尔（化名为丹尼尔·埃特）请缨出征，从特拉维夫总部紧急飞往西德，拜访联邦德国威斯巴登州的一家化学公司的老板——赫伯特·舒尔岑。

舒尔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纳粹德国空军飞行员，为第三帝国打过仗，属于“纳粹分子”之列。战后舒尔岑开始经商，与人合办了一家阿斯马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设在威斯巴登，专门经营消除化学及放射性污染的化学制剂。

摩萨德特工艾贝尔与舒尔岑仅仅只有一面之交。那是在1964年，艾贝尔在威斯巴登的美军基地参观时曾与之相遇。当时，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就对艾贝尔说，舒尔岑先生是个“有趣的人”，并且介绍他们认识了。现在艾贝尔去西德的任务就是把舒尔岑拉下水，通过他买下这批铀矿石，运回以色列。

艾贝尔到了威斯巴登后不久，另一名摩萨德特工埃里亚胡·萨哈罗夫上校也奉命来到了威斯巴登。他的

公开身份是特拉维夫塔尔胶合板厂的老板。经艾贝尔介绍，萨哈罗夫与舒尔岑认识了。萨哈罗夫对阿斯马拉公司的染色剂很感兴趣，同舒尔岑建立了贸易关系。不久，他们谈成了一笔可以使舒尔岑大有赚头的买卖。

二战期间，舒尔岑曾参加过丹麦的空战。他驾驶的战斗机被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击落，他在弃机跳伞时头部负了伤，从此便留下了阵发性头痛病。有一次，萨哈罗夫在他犯病的时候，向他建议去以色列进行一段疗养。

“听我说，老朋友。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人间仙境。那里不仅阳光充沛、气候宜人，”说着，萨哈罗夫向他神秘地挤了挤眼，“更妙的是，那里还有许多妩媚迷人的欧亚混血姑娘。想想看，这将是多么妙不可言。如果你住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滨，又能享受着多情女郎们温柔细心的照看，我看你的病要是不很快康复那才怪呢。”

萨哈罗夫的话说得舒尔岑一阵心跳。萨哈罗夫见他动心了，接着说：“我有一位朋友也得过你这种头痛病，而且比你的还严重，但他现在已经彻底痊愈了。这类神经性疾病最重要的就是心理治疗，心情愉快是除百病的灵丹妙药。相信我吧，你的老朋友是不会骗

你的。”

最后，萨哈罗夫还表示，为了日后的继续合作，他愿意为舒尔岑提供此行的全部费用。

舒尔岑完全被打动了。在他放荡的半生经历中，唯一遗憾的就是还没有领略过那种兼有东西方风韵的阿拉伯女郎的滋味。如今真是天赐良机，有这么一个好朋友解囊相助，不要自己花一分钱，他岂能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于是几天后，舒尔岑便在萨哈罗夫的陪同下，飞往以色列。

一到以色列的海滨城市海法，萨哈罗夫就安排舒尔岑住进了一幢豪华别墅里，并且请了一名以色列脑神经专家每周为他做两次治疗。而在剩下的时间里，则由两名姿色秀美、热情风流的女郎轮流陪伴着他尽情嬉戏、游玩。

完全沉醉于女色的舒尔岑，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入了摩萨德精心设计的陷阱之中。他与妓女们纵欲交欢的种种丑态，已被隐蔽在房间暗处的摄像机全部录下。而舒尔岑此时却完全蒙在鼓里，对萨哈罗夫的慷慨邀请和周到安排感到非常满意。

随着两人感情的不断亲密，萨哈罗夫向舒尔岑亮出了底牌。一天晚上，萨哈罗夫对舒尔岑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且告诉他，自己是代表以色列政府来请求

舒尔岑帮助的，他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以色列政府的。

舒尔岑一听，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他有点惊慌失措地问萨哈罗夫：“朋友，我真的不明白，你们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

萨哈罗夫笑着说：“朋友，你也不要害怕。我们政府对你这样慷慨，自然有我们的理由。因为我们相信，你将会以你的诚信和行为，对我们的政府作出最大的回报。”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舒尔岑说，“难道……”

萨哈罗夫打断了他的话，笑着说：“因为我们以色列目前对一种东西最感兴趣，但这却是一种管制最严格的战略物资。我们相信，只有你才能帮助我们搞到那种东西。”

“那是什么？”舒尔岑越听越糊涂了。

“制造原子弹的氧化铀！”萨哈罗夫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希望通过和你合作，帮我们搞到这种东西。”

舒尔岑直到这时才如梦初醒，知道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以色列为了搞到氧化铀，竟让摩萨德设下了这么一个完美的圈套，让自己不知不觉地钻了进来。对于摩萨德这个特工组织，舒尔岑虽然

是个商人，但是他并不陌生。当年摩萨德到千里之外的阿根廷，把纳粹分子艾希曼抓捕归案一事，在西德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让那些前纳粹分子心有余悸。作为一名纳粹军官，舒尔岑怎能不为自己的性命担忧呢！

这时，萨哈罗夫又不失时机地抛出了金钱诱饵。他向舒尔岑保证，只要他肯合作，事成之后他会得到一笔巨额的报酬。

生命的威胁与金钱的诱惑，实在让舒尔岑难以抵挡。经过反复权衡和再三考虑，舒尔岑终于作出了决定，愿意在摩萨德的帮助下铤而走险。

百密一疏

1968年3月21日，总部设在联邦德国威斯巴登的阿斯马拉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向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业公司发出了购买200吨铀矿石的订货单。订货单上注明：本公司打算转入石油化工产品的成批生产，亟须铀作为辅助催化剂。不过，铀矿石必须经过一系列加工，才能作为催化剂。为此，公司打算将货先运到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希纳加公司加工，然后再运回德国。

布鲁塞尔矿业公司接到订单后，对于这桩生意十分重视。按照公司生意上的惯例，他们马上对买主阿斯马拉公司的信誉进行了调查。而在此之前，舒尔岑早已将以色列提供的850万马克存入了瑞士一家银行。布鲁塞尔矿业总公司得到银行担保后，就派出一名副总裁德尼·德韦亲自前往威斯巴登，与舒尔岑进行商务洽谈。

会谈中，德韦副总裁对阿斯马拉公司开出的价格表示满意。两天后，双方即在200吨铀矿石的买卖协议书上签了字。

德韦副总裁把一切交易手续办妥之后，好心地提醒舒尔岑，摩洛哥不属于欧洲共同体市场的范围，而凡向“欧共体”以外的国家输出铀矿石，必须经过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监督机构特批才能出境。据他估计，这类特批往往是很难获准的。因此他最后建议舒尔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公司就只能通过铁路将这批货直接发往德国。至于以后加工的事，那就只好请贵公司收到货后自行酌情处理了。”

舒尔岑一听就傻眼了。因为摩萨德特工艾贝尔和萨哈罗夫向他交代任务时特别强调过，他只要把装了铀矿石的船驶入地中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他管了。正是为了将这批货装上船，他才坚持铀矿石必须经过

加工才能使用，而且还特意选择了既非欧洲大陆又濒地中海的摩洛哥。显然，艾贝尔和舒尔岑都忽略了这一点，并不知道这批货出口到摩洛哥必须经过“特批”这一关。结果使得原定方案无法执行。

消息很快传到了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阿米特听后大发雷霆，怒斥部下考虑不周，竟连这样重要的细节都忽略了。阿米特命令艾贝尔和舒尔岑马上想出补救措施。

经过一番商量，他们决定由舒尔岑出面，重新在“欧共体”成员国中物色一个新的加工企业。不久，舒尔岑找到了意大利米兰的赛卡公司。

赛卡公司是一家生产染料的公司，老板名叫弗朗西斯科·塞托里奥，与舒尔岑曾经是生意上的伙伴。当舒尔岑建议他做铀矿石加工生意时，塞托里奥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的公司从来没有与铀打过交道。但是舒尔岑对他说，这是一单一本万利的生意。只要你做成了，一定会有丰厚的回报。舒尔岑知道摩萨德在这方面是花得起钱的。而凡是做生意的老板，没有一个不希望能赚钱，何况这一次还是能赚大钱的买卖。威斯巴登很快汇来4万马克的预付金，并且说明这只是用来购买铀加工设备资金的一小部分。见钱眼开的塞托里奥一见这厚厚的票子，终于同意了这笔买卖。

同意意大利商人塞托里奥谈好了之后，舒尔岑立即打电话通知比利时布鲁塞尔矿业公司的副总裁德韦，告诉他已经给铀矿石的加工业务找到了一家新的公司，现在这笔加工业务将由意大利米兰的一家公司承担。为此，请他将合同书上接货的地址也作相应的修改。德韦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现在买卖双方都是“欧共体”的成员国，审批手续简单多了。于是这笔大生意就做成了。

一切就绪后，艾贝尔总算松了一口气，剩下的事情就是着手解决运货的船只了。为了购得一艘运输铀矿石的船只，艾贝尔通过一名驻苏黎世的摩萨德特工进行斡旋，结果还没用24小时，就在利比里亚注册了比斯坎贸易海运公司，艾贝尔和土耳其船舶经纪人哈姆·亚里萨尔成了这家海运公司的负责人。

随后，哈姆·亚里萨尔请汉堡的一位同事、经纪人乌韦·默勒替他物色一艘货轮。三个星期以后，也就是1968年9月，毫不知情的默勒从汉堡奥古斯特·博尔滕船舶公司购得了一艘1062吨的货轮“舍尔斯贝格”号，亚里萨尔也不讨价还价，以1200万马克的大价钱，买下了这艘不过78米长的船只。

到了这时，摩萨德的“高酸铅盐”计划总算是万事俱备，现在就只等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一纸放行批文

了。这时，摩萨德为“舍尔斯贝格”号专备的一批“船员”也及时抵达了这艘货船的停泊港口。这些人都是清一色的摩萨德特工，他们的护照、海员证等都出自摩萨德伪造证件专家之手。“船长”名叫巴罗，现年53岁。为了让这些特工适应一下海上生活，巴罗利用等待批文的时间带领全体“船员”进行了一次试航。

接下来的事情可以说是顺水又顺风。负责审查阿斯马拉公司这桩生意的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官员叫费利克斯·奥卜西尔，是德国的一位法学家，对原子能的制造和这些铀矿石的化学用途一无所知。在审批时，这位手握审批大权的法学家居然还想到了去请教这批铀矿石的卖主德尼·德韦：“铀矿石是否真如你在申请审批报告书上所说的那样，可以用作催化剂？”

德尼·德韦当时一门心思要做成这笔大有赚头的交易，于是他不仅给予了肯定回答，而且还列举出一项类似的贸易加以证实。他说：“荷兰政府就曾为同一目的购买过铀矿石。”奥卜西尔于是深信不疑，于1968年10月30日在这份申请报告书上糊里糊涂地盖上了欧洲最高能源保护机构的公章，批准了以色列人的这份购铀合同。

铀矿石丢失震惊全世界

1968年11月15日清晨，荷兰的安特卫普港一片沉寂，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专程从德国赶来的舒尔岑，悄悄来到了码头，亲自指挥装船。码头工人奉命在7个小时内，把560个密封的大圆桶装上“舍尔斯贝格”号的货舱。一个个的圆桶外面都贴上了“高酸铅盐”的剧毒符号，而圆桶内装的就是那200吨优质铀矿石。

深夜1点半，“舍尔斯贝格”号起锚出海了。航行日志上记载着：方向，热那亚。但是全体“船员”们心里都很清楚，这艘船永远也到不了意大利的热那亚港了。11月24日，“舍尔斯贝格”号本来应在巴利阿里群岛转向朝东北方向行驶，可是它却继续径直向东驶去。

“舍尔斯贝格”号穿过英吉利海峡，沿葡萄牙西海岸继续向南，并由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随后便一直向正东方向驶去。

1969年4月29日午夜时分，“舍尔斯贝格”号神不知鬼不觉地驶抵塞浦路斯附近的公海海域，一艘以色列的油轮正等候在海上。通过事先约定的信号，“舍尔斯贝格”号徐徐地靠上了那艘油轮，在它的舷侧停靠下来。

两船刚一靠拢，以色列的油轮里就走出一大帮彪

形大汉，他们七手八脚把那些大圆桶搬上油轮。不到4个小时，560只大圆桶便全部装到了油轮上。然后，两条船分道扬镳，迅速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满载200吨铀矿石的油轮向以色列全速驶去，停靠在以色列的海法港码头后，这些大圆桶又被装上几十辆大卡车，运往位于内盖夫沙漠中的迪莫纳核研究中心。

至此，摩萨德的“高酸铅盐”行动，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以色列内阁拍板定夺到把这200吨铀矿石安全运抵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前后仅仅花了14个月的时间。

直到7个月后的1968年12月，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才发现自己受了骗，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德国原子能机构关于收到加工铀矿石的业务报告。于是赶紧追查这批铀的下落，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世界第一战略物资——200吨铀矿石竟然神秘地失踪了。

欧洲原子能委员会惊恐万分，他们撤换了疏于职守的审批官奥卜西尔，并且派出安全处处长、意大利核专家恩科里·耶契亚追查铀矿石的下落。后来，有人在土耳其的伊斯肯德伦发现那艘被遗弃的“舍尔斯贝格”号。此时船上已经是空空如也，所有的船员均不知去向。航海日志上也没有关于该船最后两周航程的记载，被调查的几家有关公司都一问三不知，最后只好

都推到了阿斯马拉公司的舒尔岑身上。而舒尔岑则让他的律师代他回答：“顾客身份属于商务秘密。依据欧洲原子能委员会的章程，委员会当局也无权强令业务公司公开商务秘密。”

安全处处长恩科里·耶契亚见查不出什么名堂，只好向“欧共体”成员国及其秘密情报机构作了如实的汇报。随后，欧洲各国秘密情报机构便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他们已经猜出来了，这一切都极有可能是以色列人干的。后来，每当他们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时，都不得不以钦佩的口吻夸赞道：“这可真算得上是一次独具匠心的出色行动！”

1969年3月，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得到捷报：以色列的原子弹已经处于随时可以起爆状态。达扬立刻将他几位最亲密的朋友请到自己家里。他亲手打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苏格兰威士忌，为大家一一斟满，然后举杯说道：“我想荣幸地通知诸位，从今天起，世界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核国家，这就是以色列。”

自始至终领导原子弹研制并为此做出重大贡献的西蒙·佩雷斯，被人们誉为以色列“核武器之父”。他1984年出任以色列总理后，仍为当年实现核计划的往事激动不已。当以色列拥有原子弹已不再是秘密时，西蒙·佩雷斯撰写出版了一部专著——《大卫的原子

弹》。书中以其亲身的经历，向世人讲述了以色列迈进核国家的艰辛而又惊险的历程。他公开承认，以色列确实在迪莫纳地区研制核武器，但这些核武器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它只是起“威慑作用”。

1973年，美国《时代》周刊曾报道说，以色列利用偷到的铀制造了13枚原子弹，全世界为之一震。到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以前，以色列就组建了一支原子特种部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时，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梅厄夫人在国防部长达扬的要求下，曾下令以色列的这支秘密原子特种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并将地下核武器库的原子弹装上他们的“鬼怪式”战斗机，随时准备发射出去。只是后来随着以色列军队在苏伊士运河西岸反攻得手，以色列的原子弹才没有扔出去，而是又重新回到了内盖夫大沙漠中的地下核武器库里。

以色列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但是以色列的核计划却是一个远没有结束的话题。2001年2月，以色列内阁曾举行特别秘密会议，就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进行广泛辩论，这在以色列历史上还是首次。当年5月，世界“核不扩散条约国”大会在纽约开会，因为拒绝其核设施接受全面的国际检查，以色列代表被大会组织者排除在会场之外。

不过，以色列人尽管有了自己的原子弹，但是他们的灾难并没有结束，摩萨德的使命也远远没有结束。

第十二章 午夜惊魂慕尼黑 全球追杀“黑九月”

慕尼黑奥运村“黑九月”大开杀戒，以色列人回国时带去的不是金牌而是11具尸体，以色列举国哀悼；摩萨德局长把一份11个人的“死亡名单”亲手交给“阿夫纳”，“上帝复仇”由此开始……

“慕尼黑惨案”

1972年9月5日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日子。

这一天，巴勒斯坦的一个恐怖组织“黑九月”在慕尼黑冲进了第二十届奥运会的奥运村，当场杀害了2名以色列教练员，并将9名以色列运动员绑架了。“黑九

月”要求以色列政府在当天9点以前释放被他们关押的234名巴勒斯坦人和被联邦德国政府囚禁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帮成员，并派3架飞机把这些人送往由他们指定的地方，他们才将这9名以色列运动员释放，否则他们就要“将人质同时或一个一个地处决”。

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上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还是头一回。这不仅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更是对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挑战。“慕尼黑惨案”不仅让慕尼黑惊呆了，同时也让整个联邦德国乃至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一时间，“黑九月”成了千夫所指，遭到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谴责。

那么，“黑九月”为什么要绑架以色列运动员？“黑九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众所周知，自从犹太人在中东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以色列国之后，中东这片充满宗教色彩的神秘土地就成了世界的火药桶，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随时都有引爆的危险。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旗开得胜，让它不仅在巴勒斯坦地区站住了脚，而且一下子就占有了巴勒斯坦地区总面积4/5的土地，让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失去自己的家园，就像当年犹太人一样沦为无家可归的难

民，从此过着背井离乡的流亡日子。尽管从1948年到1964年，联合国就巴勒斯坦问题通过了16项决议，但是巴勒斯坦人却没有因此而收复一寸土地，也没有一个难民得以重返家园。这些巴勒斯坦人成群结队地流亡到附近的邻国，约旦就成了他们避难的首选之地。后来随着约旦境内巴勒斯坦人难民营的不断增多，再加上巴勒斯坦游击队和以色列军队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冲突，约旦也被扰得鸡犬不宁。约旦国王侯赛因为此大伤脑筋。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约旦政府不得不于1970年9月17日出动军队，向巴勒斯坦游击队发难。在与约旦军队的冲突当中，一盘散沙的巴勒斯坦游击队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在战斗中，约旦军队竟然又冲进巴勒斯坦难民营，在难民营大开杀戒，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难民死亡。这就是著名的“黑九月”事件。

几万难民的鲜血和生命擦亮了巴勒斯坦人的眼睛，让他们认识到，世界上根本没有真正的朋友，一切都需要依靠自己，于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成立了一支秘密部队，代号就叫“黑九月”，用来纪念死在约旦难民营的同胞。

当时“黑九月”的行动队长叫阿里·哈桑·萨拉曼。“黑九月”的第一个暗杀目标就是约旦首相瓦斯菲·塔勒。一年后的1971年11月28日，约旦首相塔勒倒在开罗谢拉

墩饭店的台阶上。几天以后，约旦驻英国伦敦大使扎义德·里菲驱车回大使馆，“黑九月”又盯上了他，差一点又要了这位大使的性命。

不过“黑九月”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约旦和所有的阿拉伯人，而是让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家园的以色列人，他们把仇恨的目光都集中在以色列人身上。“黑九月”公开宣称：任何以色列人都是绝对的仇敌，任何踏上以色列国土的游客都是他们的敌人，任何搭乘以色列和美国飞机的人都是可以打击的对象。从此以后，“黑九月”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暗杀、绑架和爆炸等恐怖事件，血雨腥风，阴云翻滚，一时间让人谈“黑”色变，闻之丧胆。



慕尼黑奥运会会场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黑九月”又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正在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

1972年9月5日清晨4时25分，慕尼黑奥运村一片宁静。经过白天紧张的比赛，运动员已经有些疲劳，此时大都在酣睡之中。那些巡逻的保安人员此时也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只有路灯还在不知疲倦地守候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这时，慕尼黑奥运村东面的铁丝网上突然出现了几条黑影，8名全副武装的“黑九月”敢死队员就像蜘蛛人一样向上攀爬。他们一个个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头戴黑色面罩。

翻越了高高的铁丝网后，他们敏捷地跳到地下，然后迅速地向运动员的宿舍摸去。很快，他们就打开了康诺里大街31号的大门，寻找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黑九月”组织事先知道以色列运动员就住在这一排房间里，但是并不知道具体是哪几间房间。第一个被他们的交谈声和脚步声惊醒的是住在1号房间的约瑟夫·古特弗罗英。他是以色列的一名摔跤教练员，块头很大，体重275磅。他听到门外有人在用阿拉伯语交谈，心里一动，敏感地意识到意外即将发生。于是他连忙跳下床，一边用身子去顶住房门，一边用希伯来语大声喊叫。房间里其他5个人都被惊醒了，他们同样都是身材魁梧的举重教练、举重运动员、摔跤教练

和裁判员。房门最终被挤破了，8名“黑九月”队员冲了进来。在接下来的残酷的搏斗中，两名以色列运动员跳窗逃走了。“黑九月”开枪打死了摔跤教练约瑟夫·古特弗罗英和另一名举重教练摩西·温伯格。秘密行动变成了公开搜捕，“黑九月”又从3号房间找到了5名以色列运动员。5点钟左右，“黑九月”在枪杀了2名以色列教练之后，抓走了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教练，才匆匆忙忙地撤离了奥运村。

惨案发生后30分钟，慕尼黑警察局才接到了那两名逃走的以色列人的报警，并且在慕尼黑的大街上发现了温伯格血肉模糊的尸体。这时，慕尼黑警方收到了“黑九月”的一封信，他们提出了交出人质的条件。

收到“黑九月”的信后，联邦德国政府立即行动。两位部长、奥运村的村长、慕尼黑前任市长和慕尼黑警察局长都表示，愿以自己去交换以色列人质。但是“黑九月”却拒绝了德方的这一要求，只是把交换人质的时间从上午9点延长至中午12点。

机场枪战

惨剧发生以后，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立即同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通了电话，两个人在电话

里就解救人质一事进行了简短的磋商。头发已经花白了的女总理重申了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强硬态度，表示毫无妥协可言，在任何情况下以色列都不会让步；她要求立即停止正在举行的奥运会，以纪念两位殉难的以色列教练员，但是德方拒绝了。他们认为如果这样做，正好让那些恐怖分子的阴谋得逞，达到了他们既破坏了奥运会，又宣传了自己的目的。不过德方组委会最后还是决定，奥运村所有代表队都下半旗致哀。但是，组委会的这一决定却遭到了十多个阿拉伯国家代表队的抗议。他们表示如果要让他们也下半旗致哀，他们将集体退出比赛，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对此事负责。组委会最后又只好妥协，将他们的国旗升到旗杆顶端。

和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的通话一结束，梅厄夫人立即召来了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让他马上飞往联邦德国处理这件人命关天的棘手事件。当天上午10点，扎米尔来到了慕尼黑。他一下飞机就来到了慕尼黑警察局，要求了解慕尼黑警方关于解救人质的行动方案。

慕尼黑警方马上拿出了他们的行动方案，征求扎米尔的意见。一位负责此次行动的联邦德国军方指挥官对扎米尔说，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除了慕尼黑警方

的特种警察外，还调集了德国的边防警察部队。他们的计划是首先佯装答应“黑九月”的要求，满足他们提出的条件，为他们提供飞机。准备等对方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起飞前再动用德国边防警察部队发起进攻，达到解救人质的目的。这个方案，可以让“黑九月”把交换人质的时间由当天中午的12点推迟到当天晚上的12点，这就为营救人质又争取了12个小时的宝贵时间。此时“黑九月”还提出派一架飞机，将他们和人质安全送到埃及的开罗。如果在当天晚上12点以前以色列仍然不交出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在开罗处死这9名人质。

扎米尔看了警方的这个行动方案后，觉得他们还是准备得不够充分，对于警方发起进攻的时间和地点没有作更多的设计，安排的狙击手也太少，配备的武器也不够精良。因此这次行动能否成功，他心中也没有底。

晚上10点钟，扎米尔在德方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慕尼黑市郊的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登上了机场的控制塔。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天晚上机场所发生的一幕悲剧。

10点20分左右，两架直升机从慕尼黑奥运村附近一块草坪上起飞，然后朝菲斯腾费尔德布鲁克机场飞

来。机上载着9名以色列人质和8名恐怖分子。在此之前，这些人是同乘一辆大众牌汽车来到奥运村附近那块草坪的，然后在那里上了直升机。

10点30分左右，两架直升机在机场着陆，离那架波音727喷气式飞机大约一百米左右。全副武装的德方警察已经埋伏在机场内所有的制高点上，狙击手把子弹顶上了枪膛，一个个严阵以待。这时，有4名“黑九月”的敢死队员从一架直升机上走下来，他们用枪逼着那些直升机驾驶员走在前面，一步一步地朝这架波音727客机走去。他们要去检查一下这架飞机是否加满了油，能不能发动。

就在这时，埋伏在高楼上的那些狙击手向他们开火了，一阵密集的子弹向他们飞去。但是由于机场上的灯光昏暗，让那些狙击手难以辨别谁是人质，谁是恐怖分子。尽管他们射出了密集的子弹，但是却没击中目标。这时恐怖分子也迅即举枪还击，双方立即展开一场激战。那几个直升机的驾驶员见势不妙，立刻拔腿就跑，其中两人安全脱险，另外两人被交叉的火力击中，负了重伤。

其时9名以色列人质并没有一个人走出机舱，而是分别坐在两架直升机内，只是眼睛被蒙住了，手脚也被紧紧地捆着。双方激战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德国

警方一边开枪，一边向他们喊话，规劝那些恐怖分子放下武器，放出人质，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但是那些“黑九月”的敢死队员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联邦德国警方的劝降。由于怕误伤人质，德国警方的火力受到了限制，于是他们就临时决定，出动6辆装甲车，掩护突击队员直接冲上前去解救人质。

然而，就在装甲车正要向前冲击的时候，一名丧心病狂的“黑九月”队员竟然向一架直升机中投掷了一枚手雷，那架直升机立即爆炸了，顿时燃起了一团熊熊大火，机上的5名人质无一幸免，全部被烧成了灰烬。就在第一架直升机爆炸的同时，第二架直升机上的恐怖分子也开枪了，把那架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全部杀害了。事后人们才发现，如果那6辆装甲车推迟几分钟进攻，第二架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也许就能够免于一死。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在偷偷地进行自救，捆绑他们的那些绳结上，都留有深深的牙齿痕迹，有的绳子甚至马上就要被咬断了。



“慕尼黑惨案”遇难者家属痛不欲生

枪战一直持续到凌晨1点左右，警方才击毙了最后一名负隅顽抗的恐怖分子。那名恐怖分子叫穆罕默德·马萨尔哈德，当年他曾经以建筑师的身份，参加过慕尼黑奥运村的修建工作，因此对现场极为熟悉。

枪战结束了，9名以色列人质全部遇难，同时还牺牲了两名联邦德国警官。那8名“黑九月”敢死队的队员有5名被当场击毙，3名被逮捕。

由于惨案的发生，第二十一届奥运会被迫停办一天，使原定9月10日的闭幕式延期至9月11日举行，这在奥运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那一届奥运会上，苏联代表队大获全胜，夺得50块金牌，排名金牌排行榜第一；美国名列第二，获得了33块金牌——而以色列

人则运回去11具尸体。

慕尼黑惨案发生后，以色列举国哀悼。9月7日下午，以色列为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国葬。梅厄总理因其姐姐刚刚去世，没有参加这次国葬，阿隆副总理代表她在大会上致悼词。阿隆副总理在悼词中悲愤地说：“这是与奥林匹克精神相违背的残酷行为，我们要战斗到底！”

由于摩萨德对“慕尼黑惨案”的发生事先没有引起警惕，事后又处理不力，威望大降，摩萨德局长扎米尔也遭到了普遍的指责。于是梅厄总理就任命了阿赫莱勒·亚里夫将军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加强了以色列“反恐”的力量，并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对那些威胁以色列安全的恐怖分子采取必要的报复手段。

“死亡名单”

几天以后，梅厄总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一个化名为“阿夫纳”的摩萨德特工，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摩萨德局长扎米尔、以色列强势人物沙龙将军和亚里夫将军等人。等这些人都到齐了之后，梅厄夫人就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他们说，以色列存在于世，就是

要保护犹太人，使他们免遭敌人的欺凌和虐杀。以色列在过去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时，也总是力求要有个限度；即使是在保卫她的孩子们时，她也要尽力克制，从没有逾越一切文明的准则，始终保持自己的清白，不采取不必要的残暴手段。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梅厄夫人平静地对阿夫纳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已经作出了一项决定，那就是复仇。责任由我来承担。”她站起来又补充了两句：“这是我的决定。你们几位可以商量一下。”

梅厄总理说完后，就离开了她的办公室。

阿夫纳当然明白了总理谈话的意图。他知道总理把自己叫到这里来，就是要自己来完成她的那项复仇的决定。这时扎米尔对阿夫纳说：“总理已经命令摩萨德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由你任组长。我们的任务就是对‘黑九月’进行报复。这次行动的代号就叫‘上帝的复仇’。你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任务？”

阿夫纳有些犹豫，这个任务太非同寻常了。坐在一边的沙龙将军说：“我们不要你现在就回答，可给你一些时间考虑，等你考虑好了再作出决定。但是考虑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多一个星期。”

阿夫纳回去之后，认真考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来到扎米尔的办公室对自己的上司说：“我同意接受

这项任务。”

扎米尔一听很高兴，但他还是对阿夫纳说：“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阿夫纳坚定地说：“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不反悔。”

扎米尔这才告诉阿夫纳：“总理命令你带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到欧洲去暗杀那些恐怖分子。你们必须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欧洲独立行动的时间也很长，说不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在执行任务期间，你们不可能随时得到国内的支援，有时你们还要自己寻找武器，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并且尽量少同我们或外界联络。这就像是一个恐怖小组，但能量要比恐怖小组更大。你明白吗？”

阿夫纳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我们是到了以牙还牙的时候了。”

扎米尔又对阿夫纳说：“我这里还有一份条件很苛刻的合同，你和特别行动小组所有的成员都必须在这份合同上签字，从法律上与摩萨德脱离关系。摩萨德将不再雇佣你们，不发给你们津贴费或养老金，不给予法律保护，不承认你们是在为它工作。你们也将得不到以色列驻外使领馆的帮助，永远不要向对方提出任何要求，要是出了问题更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对方。

你们对外界不能泄露自己与摩萨德有任何关系。既然你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你们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听了扎米尔的话后，阿夫纳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他马上就在那份实在是苛刻的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真实的姓名。

特别行动小组人数不多，但都是扎米尔亲自从几百名摩萨德特工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这其中包括爆破专家罗伯特、身材高大魁梧的神枪手史蒂夫、通信专家卡尔和证件伪造专家汉斯等人。

临行前，扎米尔把一份“死亡名单”亲手交给了阿夫纳。这份名单上共有11个人，都是特别行动小组这一次暗杀的对象。这些人都是反对以色列的恐怖组织的得力干将，其中大部分人被视为慕尼黑惨案的主谋或首犯。

名单上的头号人物叫阿里·哈桑·萨拉曼，“黑九月”的头头，慕尼黑惨案的主谋者。他是一个年轻的工科大学毕业生，是“巴解”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忠实追随者。信念坚定，精明强干，深得阿拉法特的器重。

第二个人叫阿布·达乌德，是“黑九月”的爆破专家。此人是头号人物萨拉曼的老同学，慕尼黑惨案的

同谋者。

第三个人叫穆罕默德·哈姆沙里，博士头衔。此人是“黑九月”驻巴黎的外交官，也是“巴解”组织的新闻发言人。

第四个人叫瓦埃勒·兹怀伊特，诗人。他是“黑九月”驻意大利的外交官。

第五个人叫巴西尔·库拜西，法学教授、博士。他是“黑九月”武器的主要提供人。

第六个人叫卡马勒·纳赛尔，是巴勒斯坦“法塔赫”组织的对外联络方面的负责人。1972年以前，他是“巴解”组织的新闻发言人。此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从不隐瞒自己同“黑九月”的关系。

第七个人叫凯马尔·阿德万，是“法塔赫”在以色列占领区进行破坏活动的负责人和主要策划者。

第八个人叫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又名阿布·尤瑟夫，“巴解”组织的高级官员之一，负责“法塔赫”同“黑九月”之间的联络工作。

第九个人叫穆罕默德·布迪亚，是一名演员兼戏剧导演，经常出没于交际场所的花花公子，巴黎的知名人士。他在“黑九月”中负责联络工作。

第十个人叫侯赛因·阿巴德·希尔。他是“巴解”组织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之间的联络官。

最后一个叫瓦迪埃·哈达德博士。此人是“黑九月”的“师爷”——一位知识渊博的高级谋士。

阿夫纳把这份“死亡名单”认真看了几遍，很快就记住了他们的姓名、身份和职业，并且要求行动小组的每个人也像自己一样，把这些人熟悉一遍，并且熟悉得就像自己的老朋友一样。做到了这一步以后，阿夫纳就把这份“死亡名单”还给了扎米尔，让他锁进了摩萨德的保险柜里。这是他们的高级机密。

这11个暗杀目标是摩萨德根据那些人的地位和主次排序的，并不是行动小组追杀的顺序，特别行动小组在行动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行动是否方便而定先后次序。也就是说特别行动小组可以逮住一个解决一个，不要受这个名单上的顺序限制——既然上了摩萨德的“死亡名单”，就一个都跑不了。

特别行动小组为了行动方便，又把暗杀对象分成两类：他们把带有武器和保镖的、对外公开是“法塔赫”或“黑九月”头头身份的人称为“硬”目标，如萨拉曼、纳塞尔等人；把那些从不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只是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在西方国家有着固定的居所的人称为“软”目标，如哈姆沙里、兹怀伊特等人。

阿夫纳决定先从“软”目标开始。因为“硬”目标的名字虽然家喻户晓，但他们戒备森严、行踪诡秘，有非

常隐蔽的安全据点，有的甚至从来不在同一间屋里住两夜，对这些人下手的难度相对要大一些；另外，因为“慕尼黑惨案”刚刚发生不久，“硬”目标在短时期内肯定不会抛头露面，会暂时隐匿一段时间，寻找他们的行踪也比较困难一些。还有一个策略上的原因就是，对他们稍迟一点动手，也可免除社会舆论马上将暗杀行动与慕尼黑惨案联系起来，减少对以色列的国际形象的影响。而那些“软”目标则不那么神秘，他们在西方国家以参加一些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作为掩饰，自以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因此他们很容易被找到。这些人从不乔装打扮，甚至在自己居住的公寓门上挂着名牌。如果有人问起他们的姓名，他们就会彬彬有礼地自报家门。其中有几个暗杀对象目前的住址，居然还可以在有关的情报资料中找到。

当然，这并不是说暗杀小组就可以不做任何准备，就像踹死一只蚂蚁那样轻而易举。事实上，不管追杀对象有多“软”，都得进行周密策划。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人杀死，而在于杀死人后如何安全脱身。万一被当地警方抓住，那就不仅仅是特工个人的生死，也不只是摩萨德的声誉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形象和威望。

“上帝的复仇”开始行动

第一个进入特别行动小组视野的，是“死亡名单”上位列第四的瓦埃勒·兹怀伊特。此人在意大利罗马长期居住，正式工作是利比亚驻罗马大使馆的翻译，而真实身份则是欧洲恐怖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兹怀伊特在1968年一手策划了炸毁以色列航空公司从罗马飞往阿尔及利亚班机的行动，从而拉开了近年来恐怖活动的帷幕。在那一次活动中，他最值得炫耀、最超乎想象的行动，就是曾风度翩翩地与来罗马旅游的两位英国姑娘交上了朋友，主动为她们导游，临别时把一台装有定时炸弹的收录机送给了她们。一无所知的姑娘们把它带上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后发生了爆炸，差一点造成机毁人亡的特大恐怖事件。

行动小组通过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得知瓦埃勒·兹怀伊特当时住在罗马阿尼巴利亚诺广场边上一幢7层的公寓里，并且掌握了他的行动规律。1972年10月16日22点左右，40岁的兹怀伊特像往常一样，从他的意大利女友家里出来，手里拎着一只杂货袋回公寓。他走进公寓大门时，门厅里的电灯熄灭了，黑洞洞的，不过他一点也不在乎四周的黑暗。

就在他朝电梯走去时，电灯突然亮起来了，阿夫纳和罗伯特出现在他面前，但是兹怀伊特丝毫没有感到恐惧，继续向前走。这时，罗伯特用英语问他：“请问您是瓦埃勒·兹怀伊特先生吗？”

其实这只是程序而已，他们曾无数次地仔细研究过眼前这个人的照片，熟记了他的个人履历和有关情况。就在刚才电灯一亮的瞬间，他们一眼就认出这个身材瘦长的巴勒斯坦诗人。罗伯特又很随便且有礼貌问了一遍。兹怀伊特对眼前这两个空着手的男子没有马上产生怀疑，正准备点头承认时，心中突然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马上矢口否认，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阿夫纳和罗伯特已经动手了。

他俩右脚后退半步，双膝微屈，成半蹲姿态。紧贴于体侧的右手撩开上衣，抓住手枪柄，左手心向下，成半圆形压在贝雷塔手枪上，随着拉动套筒发出的“咔嚓”声，击锤和撞针处于待发位置，第一颗子弹从弹夹跳入弹膛，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但是对于这个不到一秒钟的过程，行动小组的成员们曾经操练了不下一万次。阿夫纳和罗伯特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发出柔和的“咔嚓”声，兹怀伊特倒下了，身中14枪。



贝雷塔手枪

据事后马路上的目击者说，事发前，他们看到公寓外面停放着一辆绿色的菲亚特125型小汽车，里面好像坐着一对谈情说爱的男女。突然间，两个男人从公寓大门内冲出来，跳进这辆汽车的后排座位。几秒钟后，汽车就飞快地消失在浓黑的夜幕之中。不久，罗马警方找到那辆被人抛弃了的小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连个指纹也没留下。

特别行动小组为了刺杀兹怀伊特，共花费了35万美元。但是摩萨德局长扎米尔认为划得来，旗开得胜很值得。

第二个暗杀的目标选择了“死亡名单”上位列第三的穆罕默德·哈姆沙里博士。他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的正式代表，地位要比兹怀伊特高。当时他在阿拉伯联盟的办事处主办一份名叫《法赫特新闻》的时事通讯。哈姆沙里和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

的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过从甚密。那些认识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温文尔雅，颇有教养，衣着打扮和举止行为与任何一位外交官相比都毫不逊色。

当时哈姆沙里同他的法籍妻子和女儿住在巴黎第14区一幢中产阶级的公寓里，过着舒适富足的生活。但是，他却利用外交官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巴黎正式代表的合法身份作掩护，策划了好几起让世人震惊的恐怖活动。其中最有名的有发生在哥本哈根暗杀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未遂事件，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在飞往以色列途中空中爆炸的事件，以及这次在慕尼黑袭击以色列运动员的事件。根据情报，哈姆沙里现在又同“黑九月”的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布迪亚策划成立一个新的恐怖组织，名叫“东方巴黎人”，准备网罗那些法国本地和其他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

哈姆沙里虽然是个“软”目标，但他的警惕性很高，身边一直有警卫，公寓临街的大门口以及四周的街道上都布设了便衣暗哨。兹怀伊特死后，他的安全工作又进一步加强了，哈姆沙里和他的上司布迪亚都在小心谨慎地行动。他无论走到哪里，身边总有警卫人员跟着。特别行动小组经过多次实地“踩点”之后，认为不可能再用对付兹怀伊特的办法，而是根据爆破

专家罗伯特的建议，决定将一枚微型遥控炸弹安装在哈姆沙里的电话底座里，在他接电话或者打电话的时候实施暗杀。他们要以这种方式告诉那些恐怖分子，即使是像哈姆沙里这样有身份有警卫的人物，即使是住在戒备森严的公寓里，同样逃不脱被追杀的下场。为了在行动时不伤及无辜，避免伤害哈姆沙里的妻子和他的女儿，特别行动小组对这次暗杀行动进行了周密的设计。

1972年12月的一天，哈姆沙里接到了一个意大利记者打来的电话，说要对他进行一次采访，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业最近取得的新成就。作为“巴解”组织的驻外新闻发言人，这既是他的职责，也是他的使命。双方约定第二天在他家公寓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

第二天见面后，那位意大利记者主动地出示了自己的证件。通过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哈姆沙里才知道这位记者以前是从事体育新闻报道的，最近才刚刚转行从事时事新闻工作。后来在进行交谈时，尽管哈姆沙里发现这个意大利记者对巴勒斯坦的情况竟然一无所知，但是哈姆沙里并没有感到意外。他一边在听哈姆沙里的介绍，一边作一些记录，不时停下笔向哈姆沙里提出询问。最后他还面带愧色地向哈姆沙里建

议，能否给他弄一些这方面的新闻材料，让自己先熟悉一下，然后再对他进行一次采访。哈姆沙里答应了他的要求。临别时他们约定，在这两三天之内他们再电话联系。

12月8日上午8点左右，哈姆沙里那位时髦的法国夫人像平时一样，开着自己的那辆小轿车送女儿上学去了。然后她还要到一家超市去逛一下，一般要到10点多钟才回家。这时，楼下传来一阵熟悉的喇叭声，来接哈姆沙里本人上班的车子也来到了楼下。哈姆沙里习惯地在窗前看了一眼，然后就锁上房门走下楼来，在警卫们的簇拥下上了汽车，去了他的办公室。家中已经是空无一人了。这一切都让坐在车内的阿夫纳，还有爆破专家罗伯特和神枪手史蒂夫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坐的是一辆罗马市的市政工程车，车子就停在公寓门前的马路边上。刚才哈姆沙里的车子经过这里的时候，他好像还朝这辆工程车无意识地看了一眼。

等到哈姆沙里坐的车子不见踪影了，阿夫纳朝罗伯特点了点头。罗伯特立即从工程车里走了下来。他身上穿的是罗马市政工作人员的工作服，头戴一顶安全帽，背着一只工具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慢悠悠地进入了哈姆沙里的公寓。

罗伯特走进公寓后，立即进入电梯，很快就来到了哈姆沙里的门前，然后用他手中的万能钥匙迅速打开了哈姆沙里的房门。他来到哈姆沙里的卧室，找到了那部电话机，老练地把一枚微型炸弹偷偷地装到了电话机的底部，只等在明天同样的时间内把它引爆。

第二天上午8点钟左右，哈姆沙里的夫人和女儿又准时出门了，哈姆沙里又听到楼下响起了那熟悉的喇叭声。他拎着那只大公文包正要出门时，家里的电话铃忽然响了。哈姆沙里走到窗子前朝下面喊了一声“稍等一下”，然后就毫不犹豫地转身来到卧室，一只手还拎着那只大公文包，一只手就拿起了话筒。

电话原来是那位“意大利记者”打来的。因为他们前天已经约好了，这两天在电话里联系。只听到那位“意大利记者”在电话里说：“您好！请问您是哈姆沙里博士吗？”

哈姆沙里已经听出了是那位意大利记者的声音，他马上回答：“对，是我，您要的新闻材料我……”

“对，我正是为这事找您。”对方为了进一步确认哈姆沙里的身份，就打断了他的话，又跟他啰唆了一句。

哈姆沙里说：“我知道。您要找的新闻材料我……”

哈姆沙里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里就传来了一阵刺耳的蜂鸣声，紧接着就是一声闷响，哈姆沙里的电话机爆炸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应声倒下了，手里还握着那只大公文包。整座大楼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哈姆沙里公寓的大玻璃窗震出了纵横交错的裂纹。楼下的那些警卫人员立刻下了车，向公寓的大门冲去。这一切让躲在公寓附近一辆小轿车里的阿夫纳和罗伯特看得一清二楚。一见警卫人员冲进了公寓，他们马上发动车子驶上了对面的大街，立即消失在上班高峰期的车流之中。

可是，令阿夫纳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哈姆沙里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在罗马的一家医院里苟延残喘了整整一个月，直到1973年1月9日才死去。害得阿夫纳他们在罗马整整守候了一个月。如果哈姆沙里没有在医院里死去，他们还要另外采取行动，决不能让他活着走出那家医院。

这时，在那份有11个名字的“死亡名单”上，已经有两个名字被勾去了。扎米尔坐在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的办公室里，在这两个名字上轻轻地画上了一个深红色的大“×”。扎米尔已经接到了阿夫纳的报告，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将是侯赛因·阿巴德·希尔。

又有两个人从“死亡名单”上抹去了

侯赛因·阿巴德·希尔是个“硬”目标，在“死亡名单”上排在第十位。尽管他是个“硬”目标，但是希尔却从不随身携带武器，也没有保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而那个城市是以色列人很难打进去的地方，更是让摩萨德伤心的地方——当年以色列的“间谍王子”伊利·科恩就是在大马士革被叙利亚当局送上绞刑架的。

希尔在大马士革的公开身份是东方语言教师，实际上是“巴解”组织的联络员和恐怖分子的组织者，他当时的任务就是专门负责同苏联派遣在塞浦路斯的克格勃进行联系，所以他也经常去塞浦路斯。希尔总是行踪不定，让阿夫纳的特别行动小组很难捉摸，有几次知道他到了塞浦路斯，结果一赶到那里他又离开了，结果让他们无功而返。

1973年1月22日，阿夫纳的行动小组又一次得到情报，希尔将在明天去塞浦路斯，已经在尼科西亚的奥林匹克饭店预订了房间。至于希尔会在这个地中海上的岛国待多久，还不得而知。

得到情报的当天晚上，阿夫纳就率领他的行动小组的全班人马立即飞抵塞浦路斯首府尼科西亚，决定

对希尔采取行动。他们希望这一次能把希尔的名字，也从他们的“死亡名单”上划去。

阿夫纳带着行动小组来到尼科西亚后，立刻租下了两辆小轿车，然后分散居住。阿夫纳带着罗伯特住到一位朋友家去了。这个朋友是海滨浴场的一位救生员，他的家成了阿夫纳他们在这里的一个很安全的落脚点。卡尔、汉斯和史蒂夫则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有助于识别目标，二是有利于研究饭店的布局，三是可以同饭店的服务员和保安人员进行接触，有利于他们的行动。

第二天晚上，希尔果然来到了塞浦路斯，化名侯赛因·巴沙里，持叙利亚旅游护照，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不巧的是，他的隔壁房间住着一对以色列新婚夫妇。那对新婚夫妇虽然是以色列人，但并不是摩萨德的特工，他们是到塞浦路斯这个美丽的岛国度蜜月来的。这一次，阿夫纳他们同样是准备采用对付哈姆沙里的办法，用遥控炸弹对付希尔。而这对以色列新婚夫妇给他们后来的行动制造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为了防止像上一次炸哈姆沙里那样把对方炸个半死不活的，他们决定增加火药的用量，但是，他们的炸弹又不能把住在隔壁的那两个无辜的同胞也一同炸

死，他们的幸福生活还刚刚开始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爆炸专家罗伯特考虑了好久，最后他们决定给希尔准备一种压力炸弹。

这种压力炸弹内有6个小型炸药包，分别连在两个弹体上。两个弹体由4个力量很强的弹簧隔开，每个弹簧中间均有一颗螺丝。当炸弹放置在汽车坐垫或床垫下时，弹簧可以防止上部弹体的4颗螺丝碰到下部弹体的4个接触点。只有当人体的重量压在上面，才能使上面的弹簧中间的螺丝碰到下面的接触点。这样一来，压力炸弹的保险就打开了，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遥控引爆炸弹。如果没有信号，炸弹不会爆炸；同样，没有人体那样的重物压到炸弹上，什么信号也不会使炸弹爆炸。因此这种炸弹非常可靠。只有当暗杀小组确定炸弹上面躺着的就是希尔本人，启动遥控装置才会爆炸。

希尔住进了奥林匹克饭店，在行动小组的监视之中度过了一个平安无事的夜晚。第二天一大早，希尔就被人用车子接走了。阿夫纳立即派卡尔和史蒂夫乘坐租用的小轿车尾随而去。一旦希尔要回饭店，就立即通知留在饭店里的罗伯特和汉斯安放炸弹。

中午过后，饭店的服务员和清洁工已经把希尔住的房间整理好了，卫生也打扫得干干净净。阿夫纳知

道，下午应该不会有人进那间房间，于是就叫罗伯特和汉斯偷偷地打开了房门，溜进了希尔的房间，把已经准备好了的压力炸弹固定在床垫下面，并且吩咐他们把房间里其他的电灯开关全部破坏掉，只剩下床头灯的开关还可使用。这样，他们在楼下只要发现房间里的床头灯一关掉，就表明希尔已经上了床，并且已经睡在他们的炸弹上了。这时他们就可以立即启动手里的遥控器，引爆希尔身子下面的炸弹。

晚上10点钟左右，早晨来接他的那辆车子把希尔送到了饭店的大门外，然后就掉头回去了。希尔下了车慢腾腾地向饭店走去，阿夫纳装成一名旅客，跟着希尔一起上了电梯，然后走进了汉斯他们住的房间。这时他看到的确只有希尔一个人进了自己的房间。路过那对新婚夫妇的房间时，阿夫纳还注意听了一下，发现那对新婚夫妇还没有回来，他就完全放心了。

20分钟过去了，希尔一直没有走出自己的房间，他房间的床头灯也一直在亮着。阿夫纳猜测他在房间准备睡觉，就跟汉斯他们下楼去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命令神枪手史蒂夫带着卡尔守候在电梯间。他担心希尔会突然离开他的房间，那样就只有由他们在电梯间用手枪解决了。总之，他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不能让希尔活到明天。

阿夫纳和汉斯他们下楼后，就守在饭店前面的树荫下，一直盯着希尔的窗口，看着那点微弱的灯光。他们可真是心急如焚，担心希尔会突然心血来潮，还要从房间里出来，到附近的娱乐场所或海滩上去找女人玩玩。大约又过了5分钟的样子，希尔房间的灯光终于熄灭了，希尔上床了。手持遥控器的罗伯特一见，马上就要启动引爆装置。阿夫纳还是向他摇了摇头，他担心希尔关灯后还没有上床躺下。大约又等了两分钟，阿夫纳才轻轻地对着罗伯特的耳朵狠狠地说了两个字——“动手！”

罗伯特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可是周围却一片寂静，什么也没发生。阿夫纳有点失望，他担心那些弹簧片是不是太硬了，希尔虽然睡在上面却压力不够，没有接触到下面的爆炸点。他正要采取新的措施时，却发现希尔的窗口亮起了一点小小的红光——原来希尔在临睡前还有个吸烟的习惯，这时他正站在窗口一边吸着烟，一边在欣赏着尼科西亚美丽的夜景。又过了两三分钟的样子，希尔终于把手上的烟蒂抛到了楼下，一道美丽的弧线从天而降，他的身影也从窗前消失了。阿夫纳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知道希尔这时正在走向那张死亡之床。

罗伯特又在心里默默地数了20下，终于咬着牙再

次揿动了按钮，差点把手里的遥控器给弄碎。这时终于响起了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一道火舌卷着玻璃碎片和破砖乱石迎面袭来。在霓虹灯的照耀下，那些碎片乱石就像一阵流星雨一样落在饭店前的绿树丛中，样子还是十分动人的。

爆炸刚过，卡尔和史蒂夫几乎是第一时间冲出电梯，进入了希尔的房间。希尔的房间已经是一片狼藉，面目全非，希尔和他的床已经被炸得支离破碎，在那里默默地燃烧。而周围的房间却安然无恙。等到饭店的保安来到楼上时，他们已经在一阵警报声中及时地逃离了。直到这时，住在希尔隔壁的那对以色列新婚夫妇还没有回到饭店。

“死亡名单”上的第三个人就这样被轻轻抹去了。

第四个暗杀的目标也定了下来，他就是巴西尔·库拜西博士——他在那份“死亡名单”位列第五。阿夫纳得到的一份情报说，巴西尔·库拜西将于3月底去巴黎度假。库拜西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贝鲁特亚美利加大学的法律教授，但是他经常会去欧洲同西方的一些军火商联系，负责为“黑九月”在欧洲购买武器炸药。

1973年4月的一天，阿夫纳的特别行动小组在巴黎找到了库拜西住的旅馆。

这是一个美丽的季节。在这个有“花都”之称的浪

漫之都，巴黎的春天总会散发着阵阵鸢尾花和丁香花的芬芳，是那样的沁人心脾。

3月29日库拜西抵达巴黎，在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的介绍下，住进了一家廉价旅馆。这家旅馆位于巴黎第八区的阿卡得大街上。这是一条狭窄的街道，位置又有些偏僻，但是阿夫纳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这里。原因是机场那位漂亮的女服务员其实就是他们在巴黎的一个“线人”。

库拜西是个生活很有规律的人，这就使得监视他的任务非常轻松。库拜西将他的时间一分为二：白天，他常常在圣日耳曼林荫大道附近的酒吧与人接头；晚上，他喜欢在所住的旅馆附近散步。他散步的路线也是有规律的。从旅馆走出来后，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然后沿着加布里埃尔大街，经过美国驻巴黎大使馆和豪华的克里荣饭店，再到协和广场，最后总是走到皇家大街离世界著名的马克西姆餐厅不远的地方，尔后再走5分钟，经过马德莱娜教堂，回到住处。几乎天天如此，这让监视他的人都感到有些腻了。

4月6日的夜晚，库拜西又像平日一样出门散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回头张望，似乎要看看是否有人盯梢。不过他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其实，在他一出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慢慢行走的时候，川流不息

的车流中就有两辆型号不同的轿车来来回回地从他身旁驶过。

库拜西走到冷清的加布里埃尔大街，整条街上静悄悄的，也许除了守卫美国大使馆的法国警察外，再也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库拜西之所以选择这条没有人迹的街道散步，可能是觉得在武装警察高度警惕的注视之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袭击他。这条街道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也使他颇有安全感。只是在从皇家大街路口到他的住处这段短短的路上，他才会孤身一人，步行回去。

库拜西刚走近皇家大街，阿夫纳和汉斯就闪了出来，紧紧尾随其后。罗伯特则开着汽车在他们身后约50米处跟着，保障他们的安全。突然，库拜西在路边停下了，在一家名叫马德莱娜的大药店前踌躇不前。阿夫纳和汉斯趁机从库拜西的两旁穿过，然后猛然转过身来对着库拜西。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从正面看看库拜西，以免弄错人。

“喂，库拜西！”汉斯喊了一声，话音未落，他和阿夫纳同时转身，右手将上衣往后一甩，握住枪柄，左手往后拉开装有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的枪管套。库拜西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他们，嘴里重复地喊着“不！不！”并往后退去，可他的脚后跟碰到了人行道的边

缘，绊了一下，他的身体马上要向后倾倒，两条手臂在空中胡乱地划着。阿夫纳立刻略微调整了一下枪的角度，在庫拜西的身体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向他射出了子弹。汉斯的手枪也以同样的节奏将子弹击中了庫拜西。他身上至少中了20发子弹。罗伯特驾驶的那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就停在马路旁边。这时阿夫纳和汉斯立即跑了过去，钻进了车子，直奔机场而去。

庫拜西就这样倒在人行道上，抽搐了几下就再也没有动静了，只有他的血在静静地流淌着，一点一点地渗进那些铺地的砖缝里。第二天，巴黎的多家报纸上都有这样一条新闻：“巡回大使乔治·哈巴什博士昨晚中弹身亡了……”——“乔治·哈巴什”是他这次来巴黎时护照上的名字。

就这样，“死亡名单”又多了一个深红色的大“×”，已经有4个人的名字被扎米尔亲手勾掉了。

喋血贝鲁特街头

“上帝的复仇”计划第一阶段的行动，都是一些小动作，死去的大都是一些“软”目标。因此，阿夫纳和他的行动小组决定近期来一次大的行动，袭击驻在黎巴嫩首府贝鲁特“巴解”组织的总部，给“黑九月”来一个

具有震慑性的打击。因为近来“黑九月”的恐怖行动并没有收敛，而是愈演愈烈——1973年3月9日，“黑九月”的一个小组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大使馆；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人为了给希尔报仇，又枪杀了一名无辜的以色列商人，并在以色列驻塞大使的家里安放了炸弹；而且几乎在同一时间，“黑九月”的一个行动小组分乘两辆汽车，闯过塞浦路斯机场的关卡，向停放在机场内的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开火。

于是，阿夫纳和他的特别行动小组就决定，把“巴解”组织的老巢给一锅端了，给巴勒斯坦人来一个狠的。于是在巴黎结束了库拜西之后，当天晚上他们就乘飞机离开了巴黎前往贝鲁特。

1973年4月7日，阿夫纳与罗伯特、史蒂夫等人来到了中东的“袖珍之国”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贝鲁特市中心喀土穆大街上有一幢8层的办公楼和一幢4层的公寓，还有几座军火仓库。这就是“巴解”组织的总部。阿夫纳他们在这些房子的周围观察了好几天，最终选择了袭击的路线和撤退的方向。潜伏在当地的摩萨德特工已经事先帮助他们查明了大楼的内部情况，并且详细地标出了“死亡名单”上第六号目标卡马勒·纳赛尔、第七号目标凯马尔·阿德万和第八号目标穆罕默

德·尤瑟夫·纳杰尔等人居住的房间。

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阿夫纳和他的伙伴们制定了一份详细的行动方案，然后在当地旅游公司租用了6辆轿车，用的是他们手中的美国捷运公司的信用卡；接着他们又通过贝鲁特的邮政局，向摩萨德驻巴黎的间谍机构发出了一封普通的商业电报，用暗号向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报告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并且告诉他们一切准备就绪。

两天后的傍晚，两艘快艇从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海法起程，艇上乘坐着30名摩萨德的突击队员，他们是由蛙人、伞兵和特种兵组成的。凌晨1点，快艇悄悄地驶抵贝鲁特海域。突击队员换乘6艘橡皮登陆艇，在僻静的道夫滩头登陆，然后又乘坐由阿夫纳租用的轿车，直奔贝鲁特市中心的袭击目标。

来到喀土穆大街“巴解”组织的总部前，突击队员跳下车来，先干掉3个站在门口的哨兵，然后在卡尔和罗伯特的带领下冲上楼去，留下阿夫纳、汉斯和史蒂夫带领一部分突击队员守在大门口和汽车旁边，阻击前来增援的人。

冲到二楼后，突击队员首先找到了“巴解”组织的第三号人物穆罕默德·尤瑟夫·纳杰尔。据说此人也是“黑九月”的领导人之一。纳杰尔此时正同他的夫人在床上

休息，结果被一阵乱枪打死在床上。他的夫人也成了殉葬品。纳杰尔15岁的儿子从梦中惊醒，跑出房间想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也被乱枪打死。

他们又冲到三楼，找到了“巴解”组织的发言人卡马勒·纳赛尔。纳赛尔的房间还亮着灯光，此时他正伏在办公桌上起草一份文稿，身边放着一台打字机和一挺机枪。几个突击队员踢开房门冲了进去，几支枪同时对着他开火。他的手还没有来得及摸到那挺机枪，成串子弹就把他打得遍体窟窿，连他身后的那张沙发也烧起来了。

在四楼，突击队员遇到了尤瑟夫·纳杰尔的助手凯马尔·阿德万。阿德万刚被外面的嘈杂声惊醒，立即操起一支冲锋枪，对着冲上楼来的突击队员开了火。但是由于他的枪法太差，接连几枪都没有命中目标，而自己却在对方一阵急促的扫射中身亡。

“死亡名单”上又有三个人的名字被勾掉了。整个行动前后还没有用到10分钟。

随后，突击队员又在几个房间搜索，他们迅速打开了保险柜，把里面的全部文件装进了几个纸箱子，又在这些房间放置了大量炸药，然后就向楼下撤退了。几分钟后，贝鲁特的“巴解”组织总部大楼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大楼被夷为平地，楼里面其他的巴

勒斯坦人也全部被炸死了。“巴解”组织存放武器的那些火药库也被炸掉了。

这时，驻扎在其他地方的“巴解”战士听到枪声，立即前来救援，在喀土穆大街上同突击队展开了一场激战。激战之前，阿夫纳等人已经利用大街上的公用电话向黎巴嫩警方报了警，声称巴勒斯坦的对立派在喀土穆大街发生枪战，请他们派人前来镇压。黎巴嫩警方接到报警后，并没有采取行动。尽管是在自己的首都，但他们还是明智地回避了。作为这样一个“袖珍小国”，他们不想卷入、也没有能力卷入这种是非之中。

阿夫纳等人指挥以色列的突击队员凭借那些街道建筑物，在“巴解”组织的废墟上和大门口构建了临时工事，拼命地抵抗冲上前来的那些“巴解”战士，一时成了胶着状态。对方一看正面攻不上来，就用带有吊斗的升降机把人从楼上放下来，准备“空降”到突击队的阵地上投入战斗。但是，每当那些吊斗接近地面时，以色列的突击队员就瞄准那些吊斗射击，把吊斗里面的“巴解”战士一个个地点杀了。尤其是那个神枪手史蒂夫，几乎是弹无虚发，枪枪都能命中目标。

尽管伤亡惨重，但是那些“巴解”战士还不甘心，他们把那些尸体从吊斗里拉出来后，又有人爬到吊斗

里面，再把空吊斗升到空中，继续向以色列人进攻，但是结果还是失败了。阿夫纳知道这是在别人的国土上作战，没有后援，自己的武器弹药和兵员都得不到补充，如果长时间地陷在这里，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他指挥突击队一边阻击一边向海边撤退。

突击队终于按原路撤到了海边，登上橡皮艇，最后又全部登上了泊在海面的快艇，离开了黎巴嫩。这次袭击不仅让“死亡名单”上又勾掉了3个名字，炸毁了“巴解”组织设在黎巴嫩的总部，同时还让那些“巴解”战士付出了一百多条生命的代价，并且获得了对方大量的文件和有价值的情报。从这些缴获的文件中，以色列情报机关找到了对方许多情报员、间谍和联系人的名单，还有一些有关他们未来的计划的材料。在后来的日子里，那些情报员和间谍一个一个相继“莫名其妙地失踪”。

后来当选为以色列总理的巴拉克也曾参与了那次行动。他当时的任务是男扮女装去贝鲁特刺杀3名巴勒斯坦人。他对他的朋友里夫说：“我化了浓妆，戴着假发，当时穿的是裤子，因为那时流行的裙子太短太紧，没法穿。我把手榴弹塞在胸罩里，还提着一个时髦的大手袋，里面装着很多炸药。”

盯上了第八个目标

到1973年5月，“死亡名单”上的11个目标只剩下4个了。“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阿里·哈桑·萨拉曼暂时失去了线索；第二号人物、“黑九月”的爆破专家阿布·达乌德当时已经关在约旦的监狱里；第十一号人物瓦迪埃·哈达德博士是“黑九月”的军事领导人，此人非常谨慎，从不曾离开过中东和东欧国家，更不涉足西欧；只有第九号人物穆罕默德·布迪亚还很活跃。因为他是个“软”目标。作为阿尔及利亚国家剧院的导演，他执导了几出具有政治色彩的戏剧，在法国左翼的社交圈里小有声誉。所以他经常外出活动，常常到巴黎的社交场中去拈花惹草，行动小组会经常得到有关他的情报。

1973年6月下旬的一天，阿夫纳和他的行动小组在巴黎盯上了布迪亚。

6月27日晚上，布迪亚来到了他新结识的情妇家里，并且在她家过夜。行动小组负责监视他的人在门外整整守候了一个晚上。罗伯特本来准备把炸弹安装到他停在公寓前的那辆雷诺轿车的底盘上去，好让布迪亚一出来，就直接坐着车子上天。但是阿夫纳担心布迪亚的情妇会和他一同出门上车。他不想让那个无

辜的女人为布迪亚殉葬，所以他没有同意罗伯特的意见。

6月28日早上6点钟，布迪亚一个人出来了。他上了车子马上就开走了。负责监视他的特工也只好开车紧随其后。布迪亚把车开到巴黎大学那个现代化的“居里夫妇大楼”附近的停车场后，就下了车，徒步向前走去。监视他的特工以为布迪亚又要到另一个情妇家去——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在这附近的社区，布迪亚还有一个情妇——于是史蒂夫和罗伯特就立即开着一辆货车赶来，停靠在布迪亚的雷诺车前。

此时还不到7点钟，大街上的行人很少。罗伯特和史蒂夫很快就弄开了雷诺车门，在司机座位下面安装了一枚小型的炸弹。这种炸弹既不需要连接导火线也不需要定时器，同样是靠压力打开保险，借无线电信号遥控引爆。安装好了之后，两个人把货车开到马路对面的咖啡馆旁边。阿夫纳和卡尔坐的车子也到了那里。他们就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一直到了8点多钟还不见布迪亚出来，罗伯特就建议大家去喝一杯咖啡。结果差不多快到11点钟，布迪亚才慢悠悠地出现了。等到他坐上雷诺，正要启动时，罗伯特就掀下了手中的遥控器按钮。一声巨响，雷诺的门被炸上天了，整个车顶也给炸塌了。41岁的布迪亚当场身亡。

穆罕默德·布迪亚死了之后，“死亡名单”上的目标就只剩下3个人了。

此时，亲手拟定这份11个人“死亡名单”的兹维·扎米尔于1974年局长任职期满后，无声无息地退出了摩萨德。刚刚出任以色列总理不久的伊扎克·拉宾挑选了自己的老朋友伊扎克·霍菲少将出任摩萨德局长。

从此，剩下的这3个人的命运，就将掌握在新任摩萨德局长伊扎克·霍菲少将的手中。

最丢面子的暗杀

1974年夏天，伊扎克·霍菲少将就任摩萨德的第五任局长。

霍菲曾加入过“帕尔马”冲锋队，参加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作为一名伞兵指挥官，霍菲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参与了以色列在西奈和加沙地带的几次冒险行动。当时的空降旅旅长就是后来当上了以色列国防部长的阿米尔·沙龙将军。霍菲将军当年就是他的部下。

1965年，霍菲将军在西奈半岛任以色列空联部队副司令。一年后，他作为制定战略计划的高级官员，参与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略决策。1968年他晋升为

准将，随后又晋升为中将。1974年7月，霍菲将军离开了部队，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是到摩萨德当局长去了。

那年霍菲刚满50岁，其貌不扬，小眼睛，圆脸庞，矮壮的身材。他性格十分内向，待人冷冰冰的，差不多到了郁郁寡欢的程度。有一位和霍菲接触过的德国特工曾对他作过这样的描述：“在刚刚接触的几小时内，人们不禁感到纳闷，这个人怎么会爬上这么高的职位？他沉默寡言，总是洗耳恭听别人的讲话，看上去反应有些迟钝，像是某个集体农庄的农民。但是，接触的时间越长，这个人给你的印象越深刻。什么东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善于判断。我相信他的部下日子不会好过，霍菲是个铁石心肠的人物。”

从后来霍菲的所作所为来看，那名德国特工的描述还是相当准确的。

伊扎克·霍菲出任摩萨德局长后，首先的任务就是继续完成以色列前任总理梅厄夫人制定的“上帝的复仇”计划。

但是，要想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剩下的3个人都是“黑九月”最主要的骨干分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行动小组再也没有获得有关“慕尼黑惨案”的罪魁祸首哈里·哈桑·萨拉曼——也就

是“死亡名单”上第一号人物的任何确切的消息。

在“巴解”组织中，哈里·哈桑·萨拉曼一度被称为“阿布·哈桑”，他还有一个令人仰慕的外号，那就是“红色王子”。

阿里·哈桑·萨拉曼出生于1943年，他的父亲曾是一个信念坚定、战功卓著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领导人，1948年死于犹太民兵的枪口之下。父亲遇难时，萨拉曼才5岁，他从小和母亲栖身于巴勒斯坦的难民营中，过着一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长大成人之后，萨拉曼开始关注和同情那些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和自己的政治生命。高中毕业时，他在一次政治问卷中写道：“职业？我不感兴趣。我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以色列人从我们的国家赶出去！”

1960年高中毕业后，17岁的萨拉曼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进入了贝鲁特美国大学，成了该校建筑工程设计系的一名大学生。尽管他学的是理科，但他热衷的依然是政治。在大学里，他以自己的魅力吸引着一大批年轻的巴勒斯坦大学生，经常同他们在一起探讨巴勒斯坦的建国途径，于是他很快就成了贝鲁特美国大学著名的学生领袖。当时，有一位出身名门、家庭富有的女大学生为萨拉曼的才情和风度所倾倒而爱上了他，最终成了他的妻

子。

结婚以后萨拉曼声誉日隆，在巴勒斯坦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更大了，同时在思想上也更加激进。因为他的妻子的叔父曾经是耶路撒冷一位知名的伊斯兰大法官，极力主张用恐怖手段对付以色列移民。几年后，萨拉曼又结识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著名的领袖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成了阿拉法特忠实的追随者，成了“法塔赫”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72年春天，萨拉曼在东柏林遇到了他的老同学阿布·达乌德。以前他们曾一起在开罗接受过特种训练，于是他们就开始了“慕尼黑惨案”的策划和准备工作。在9月5日“慕尼黑惨案”发生的那一天，萨拉曼本人在国外遥控指挥，“黑九月”的行动小组就在慕尼黑奥运村对以色列运动员下手，从而酿就了世界奥运史上的第一起悲剧。因此，萨拉曼也就上了那份“死亡名单”，并且被列为头号人物，而他的同学阿布·达乌德作为“黑九月”的爆破专家在“死亡名单”上名列第二。

1973年7月，摩萨德得到一份情报，说萨拉曼正在挪威策划一次劫机行动，扎米尔立即把这个情报通知了挪威情报部门，请他们协助以色列特工抓捕萨拉曼，挪威政府同意了以色列的请求。于是摩萨德马上

派出一支暗杀小组赶到了挪威的首都奥斯陆，第二天又坐火车赶到了位于米厄萨湖畔的利勒哈梅尔小镇。因为当时还有情报说，有一个住在日内瓦的巴勒斯坦人将要成为萨拉曼的联络官。此人叫凯麦尔·本纳马内，已经来到了利勒哈梅尔小镇，并且住进了一家叫斯科泰的小旅馆。当时扎米尔认为只要找到了这个叫本纳马内的人，就能找到萨拉曼。于是摩萨德的暗杀小组来到利勒哈梅尔后，也住进了这家小旅馆，并且见到了本纳马内这个人，把他监视起来。

在这支暗杀小组中有一名摩萨德的女特工，当时化名叫帕特丽西娅。其实她的原名叫做西尔维娅·拉菲尔。

帕特丽西娅是南非人。父亲是传统的犹太人，母亲则是基督教徒。不过，帕特丽西娅更多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对犹太教、犹太民族充满热爱。高中时，帕特丽西娅读了里昂·尤里斯的《出埃及记》，开始向往到以色列定居。20世纪60年代初，她终于如愿以偿，有机会到以色列当了一名英语老师。

帕特丽西娅美丽、聪颖，尤其是对犹太民族的忠诚，使她成为了摩萨德的招募对象。帕特丽西娅加入摩萨德后，接受了严格的训练，掌握了做特工必须具备的“十八般武艺”。

1969年，帕特丽西娅曾被摩萨德派去欧洲，她使用“美人计”，让英国记者乔恩·斯万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乔恩主动提出让帕特丽西娅当他的摄影记者，跟他去中东。这样，帕特丽西娅有机会接触了众多中东国家的政要，为摩萨德搜集了很多绝密情报。

这一次，她又随着暗杀小组来到挪威的这座利勒哈梅尔小镇，执行暗杀萨拉曼的行动。她的任务是和另一名男特工装成一对恋人，负责监视那个将要成为萨拉曼的联络官的凯麦尔·本纳马内。

第二天，帕特丽西娅和她的同事发现本纳马内进了一家咖啡馆，他们也跟了进去，结果发现本纳马内旁边坐着一个风度翩翩的阿拉伯人。帕特丽西娅和她的同事一看，大吃一惊，觉得这个阿拉伯人好像就是他们要找的萨拉曼。于是他们就偷偷地拿出萨拉曼的照片一对照，果然发现那个长相英俊的阿拉伯人，正是“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萨拉曼。结果就马上和暗杀小组的同事一起，一阵乱枪把那个阿拉伯人给干掉了。

由于他们做事不太干净利索，暗杀小组的几个特工当场让挪威警方给逮住了。这时他们才知道，那个长相英俊的男子并不是萨拉曼，而是一名摩洛哥人，名叫阿赫迈德·布希基，在利勒哈梅尔的一家饭店里工

作。

在自己的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挪威政府当然不肯罢休，就向以色列政府提出抗议。尽管以色列政府一方面向挪威施加压力，一方面又说这个暗杀小组的行动是得到了挪威安全部门默许的。但是挪威政府却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默许并没有包括授予你们杀人的权力，更没有授权允许你们在挪威的国土上去杀害一名无辜的摩洛哥籍饭店工作人员。

最后，帕特丽西娅与其他4名同事不得不在挪威接受审判，帕特丽西娅被判处了5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

这次错杀事件成了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失败，几乎让摩萨德威风扫地。

无独有偶，1974年1月，摩萨德又差一点儿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当时，摩萨德又得到了一份情报，声称萨拉曼和他的同学，也就是“死亡名单”上的第二号人物达乌德将于本月12日会晤。见面的地点是在瑞士小镇萨尔根斯的一座天主教堂。扎米尔得到这个情报之后，立即派出一支暗杀小组赶到那座教堂。但是当他们正要开枪时，却发现空荡荡的教堂里除了三名教士之外，根本没有一个是他们要找的人。

1974年，特别行动小组行动十分不顺。5月，特别

行动小组的爆破专家罗伯特离开了行动小组，前往比利时试制新的炸弹去了；神枪手史蒂夫也请假去了南非探亲。这时，阿夫纳、卡尔和汉斯又得到了一条内部情报，说萨拉曼最近患有眼疾，将于本月底来伦敦就诊。然而，就在他们正要与那个提供情报的“线人”接触以核实这条线索的真假时，卡尔却在一个女人的卧室里被人开枪打死了。尽管后来他们查到了凶手就是那个叫珍妮特的女杀手，并且立即把她处死了，但是却让他们的伦敦之行流产了。不久又传来消息说，罗伯特在比利时试制新式炸弹时被炸死了。他是一位爆破专家，但最终还是被自己的炸弹炸死在比利时一座小镇附近的田野上。又过了不久，汉斯也莫名其妙地死在法兰克福一座公园里——原来巴勒斯坦人也不是吃干饭的。阿夫纳的暗杀小组成员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这时，剩下的阿夫纳和史蒂夫两人再也无心去完成最后的暗杀计划了，扎米尔也只好立刻通知阿夫纳“停止行动”。从此以后，阿夫纳和史蒂夫中断了他们的刺杀行动。这时，面对层出不穷的恐怖事件，他们也在开始反思这种旷日持久的追杀的合理性。他们觉得这本身已经是一种恐怖活动。于是他们就拒绝接受来自摩萨德的任何指令，并且移居美国，试图真正

地同摩萨德脱离关系。虽然在此之前，他和暗杀小组所有的成员都同摩萨德签约了那么一份“法律文书”，其实那不过是一种幌子。但是阿夫纳和史蒂夫的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幼稚，他们并不可能真正同摩萨德一刀两断。他们移居美国后，摩萨德断绝了他们的一切经济来源，并且以绑架他们的家人相威胁。最后他们不得不和曾经为之卖命的摩萨德反目为仇。这种结局对他们来说，多少有些遗憾。

头号人物丧命街头

刚刚上任的摩萨德局长霍菲将军并没有放弃“上帝的复仇”计划。上任之后，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要将“死亡名单”上的最后三个人在他手中解决。现在，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死亡名单”上的头号人物萨拉曼。

机会终于来了——1975年4月黎巴嫩爆发内战，霍菲趁机派出几名摩萨德特工，杀害了几名伊斯兰教徒，然后盗用被害者的身份，乔装成难民潜入贝鲁特，专门寻找萨拉曼的行踪。

几个月以后，这几名摩萨德特工终于找到了萨拉曼在贝鲁特一个居住的地方。于是他们就在对面租用

了一间房间，日夜进行监视，并且准备了一支远射程的大口径步枪，在枪上安装了一只望远瞄准镜，枪膛里压满了子弹，只要发现萨拉曼的身影就立刻开枪，而且要做到一枪毙命。有一天，他们真的发现萨拉曼出现在对面的窗口，于是就立刻扣动扳机，向那个萨拉曼射击。结果事后发现，被他们击中的并不是萨拉曼本人，而是穿着衣服的仿真塑料模特。

一年以后的一个傍晚，真正的萨拉曼出现了。当时他身边没有保镖，只是一个人在贝鲁特的一块草坪上散步，结果让跟踪的摩萨德特工意外地发现了，于是向他连开了两枪，萨拉曼倒下了。可是，跟在他身后不远的保镖立即冲了上来，把他抬上了车送进了医院，结果手术后大难不死，没有几天就康复了，又逃过了一劫。

不过，这时萨拉曼已经明白，他将终生处于摩萨德的追捕之中，总有一天会倒在他们的枪口之下，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再害怕了。他曾对一名记者朋友说过：“我并不害怕。我知道，劫数一到我就完了，任何人都无能为力。”

就在这时，巴勒斯坦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巴解”组织的领导人、萨拉曼最崇拜的精神领袖阿拉法特也意识到了，恐怖主义解决不了巴勒斯坦的问题，反

而会破坏“巴解”组织的形象，于是他决定放弃恐怖活动，以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对于萨拉曼这样能说7种语言的人才，阿拉法特并没有放弃，反而进行了重用，萨拉曼不仅是“巴解”组织情报机关的头目，而且还成了阿拉法特本人的保安官员和难得的几个亲信之一。

从此以后，萨拉曼摇身一变，从一名“黑九月”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变成巴勒斯坦政坛一名官员，经常衣着光鲜地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特别是在1978年，萨拉曼同“世界小姐”乔治娜·里泽克结婚之后，又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眼球，成为焦点人物。1971年在迈阿密海滩举行的全球选美大赛上，年轻的黎巴嫩美女乔治娜·里泽克小姐脱颖而出，荣获“世界小姐”的桂冠，成了全球名士富豪争相追求的对象，最终萨拉曼抱得美人归，于1978年同她结为夫妻。尽管萨拉曼家中有一位夫人，但是根据穆斯林的教规，他可以拥有两个妻子，于是他没有和第一个妻子离婚，而是生活在两个妻子之间。第一个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依然生活在贝鲁特的“巴解”总部，而第二个妻子则生活在贝鲁特凡尔登大街的新公寓里。萨拉曼就穿梭于两位妻子之间，生活得很有规律。

摩萨德掌握了萨拉曼的一切之后，知道解决萨

拉曼的最好时机到了。摩萨德局长霍菲立即和新任以色列总理贝京商量，请他下令除掉萨拉曼。1978年11月，贝京下令追杀“红色王子”萨拉曼。

不过，当时贝京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命令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因为今非昔比，萨拉曼已经不是当年的萨拉曼了。即使他当年一手策划了“慕尼黑惨案”，真的是一个恐怖分子，但是，如今他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成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一名重要领导人，是巴勒斯坦现行政权的一名政治家，再要下令去追杀他，无异于就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之间挑起国际事端，这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

但是，摩萨德局长霍菲得到这个指令后，并没有考虑那么多，而是立即采取行动。几天以后，霍菲决定启用摩萨德的一位潜伏多年的“睡眠杀手”佩妮洛普来完成这一任务。

佩妮洛普生于英国伦敦，到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学习时，加入了摩萨德，是摩萨德历史上有名的女杀手之一。佩妮洛普的素质和才能都极其高超，被称为“以色列的玛塔·哈莉”（玛塔·哈莉是一战时期叱咤风云的著名德国女间谍）。在接受了数年专业的特工训练后，佩妮洛普1975年被派往德国潜伏。3年后，佩妮洛普结

束“睡眠状态”，开始执行刺杀萨拉曼的特殊任务。

1978年12月下旬，佩妮洛普从德国辗转来到黎巴嫩贝鲁特，在凡尔登大街萨拉曼和新婚妻子住的公寓对面的大楼里，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这一年，佩妮洛普刚刚30岁，她乔装打扮成一名来自英国的老处女、一个极有个性的画家，脾气古怪，行为也很怪异。佩妮洛普住下来之后，很快就同周围的街坊邻居打成一片，像一个真正的老处女那样过着一种悠闲自在的日子。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人们总能看到她撑着一把长柄的黑色遮阳伞，背着画具到贝鲁特的风景区去写生；有时也看到她站在自己寓所的窗前，画着一些速写或者是素描，而题材都是这条街区的风景和建筑物。尽管她的画难登大雅之堂，但她的速写和素描却像照片一样的准确。萨拉曼的新公寓就多次出现在她的画面上。

同时，佩妮洛普还装成一个“思想很革命”的激进分子，称自己不仅是巴解组织的积极支持者，更是萨拉曼的“崇拜者”。佩妮洛普的特立独行果然引起了萨拉曼的注意，两人开始接触并慢慢热乎起来。好几回，他们一起游泳、打网球，仿佛一对正在热恋中的情人。通过接触，佩妮洛普清晰地掌握了萨拉曼的作息时间和每天的日程。

1979年1月，霍菲派出两名年轻力壮的男特工，以商人的身份分别持有英国和加拿大的护照，先后来到贝鲁特。他们一个住在贝鲁特的地中海旅馆，一个住在皇家花园饭店。为了“生意”上的方便，他们都在当地各自租用了一辆小轿车，经常在这条凡尔登大街上来来往往。当他们把萨拉曼的活动规律掌握得一清二楚之后，就开始了最后的行动。根据摩萨德总部的指示，他们还是选择用遥控炸弹来对付萨拉曼。

1979年1月22日，佩妮洛普指挥两名男特工把自己租用的小轿车开到了贝鲁特的郊外，把两包50公斤的炸药分别安放在两辆轿车的底盘上，然后就一前一后地开着车回到了城里，把装有炸药包的两辆小轿车很随意地停放在萨拉曼公寓附近的马路边上。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注意，也是为了保险起见，这两辆小轿车并没有放在一起，中间相隔了大约有一百来米的距离。引爆两个炸药包的遥控器就掌握在对面楼上佩妮洛普的手里。此时她正站在窗帘后面注视着这两辆小轿车，并且紧张地等待着萨拉曼的出现。如果萨拉曼躲过了第一辆轿车，她马上就引爆第二辆轿车上的炸药包。他们都知道，这是萨拉曼每天出门上班的必经之路，他的那辆高级防弹轿车每天都会准时地从公寓地下室的车库开出来，出现在他的公寓门前。

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之后，两名特工就分别使用另外的护照，在贝鲁特机场上飞机，离开了黎巴嫩。

上午9点整，萨拉曼的车库门准时开启，4名荷枪实弹的贴身保镖检查了一下那辆防弹轿车，并且对公寓门前的街道进行了一番观察。在认为一切都很正常的情况下，萨拉曼上了车。他的车子一驶上凡尔登大街，就快速向前驶去。就在他的车子驶过第一辆装有炸药的小轿车时，一直站在窗帘后面的佩妮洛普拿出了遥控器。当时，街道上有大量行人，一群学生和一名修女正好经过那辆满载炸弹的汽车。佩妮洛普连眼都没有眨一下，就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顿时，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让整条凡尔登大街都颤抖了一下。但是萨拉曼的车子并没有起火，也没有停下来，而是急速向前驶去。

然而，让萨拉曼和他的保镖们没有料到的是，几乎就在同时，佩妮洛普又第二次按下了按钮，离爆炸点百米远的另一辆小轿车也发出了一声巨响，让萨拉曼的防弹轿车恰到好处地及时赶上了，也发出了一声巨响。于是在这一先一后的两声巨响之中，那辆小轿车和萨拉曼的防弹轿车几乎是同时飞到了半空中，就像两只引爆的大烟花一样爆裂开来，顿时火花四溅，

人的肢体和车子的部件在火光中迸发出去，然后又像急雨一般落到地面上，熊熊燃烧。萨拉曼和4名保镖当场遇难，一名德国修女和几名英国学生也成了无辜的牺牲品，10多名路人受伤。

完成任务后，佩妮洛普在第一时间悄然离开了贝鲁特，没有人知道她的行踪。

“死亡名单”画上句号

萨拉曼被炸死以后，巴勒斯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人都出现在那次葬礼上。

到此为止，“死亡名单”上的11个追杀目标就只剩下一个了——因为在此之前的1978年1月，名列“死亡名单”最后一位的那个瓦迪埃·哈达德博士因患癌症，已经在东德的一家医院里“寿终正寝”了。现在就只有第二号目标阿布·达乌德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当萨拉曼被炸死时，他的那位一直关在约旦某监狱的同学达乌德，已经在“赎罪日战争”爆发前，被约旦当局释放了。在此之前，他曾在1973年2月伙同几个“黑九月”分子企图绑架约旦政府内阁成员时被逮捕。被捕后，他在约旦的国家电视台公开承认了自己

的身份，并且交代了“法塔赫”和“黑九月”之间的关系。两天以后，他同其他的几名“黑九月”分子一起被约旦当局判处了死刑。但是在临刑前，约旦国王侯赛因却下令把达乌德改判为有期徒刑，从此他就一直关在约旦的一座监狱里，直到“赎罪日战争”前夕又被赦免释放了。

达乌德被赦免释放之后，一直在欧洲各地活动，摩萨德一直没有找到他的踪迹。直到1981年8月的一天，一位摩萨德特工在波兰的一家饭店里意外地认出了这位“黑九月”的头目，于是毫不犹豫地向他连开数枪，阿布·达乌德当场毙命。当时，那位摩萨德特工的任务并不是奉命追杀达乌德，而是另有任务。但是当他意外地发现达乌德之后，完全是出于一种以色列人对“黑九月”恐怖分子的仇恨，才作出了这种举动。“死亡名单”上最后一个目标就这样撞到了摩萨德特工的枪口上。

从1972年10月到1981年8月，持续9年的追杀，终于让“死亡名单”上的11个恐怖分子全部找到了他们应有的归宿，以色列人的“上帝的复仇”计划至此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年在“慕尼黑惨案”中，有11位以色列运动员付出了生命，如今也有11名“黑九月”的恐怖分子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色列人

的“上帝的复仇”计划实在是让世人震惊。

2005年，好莱坞大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将这一过程搬上了银幕，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慕尼黑》。

《慕尼黑》被认为是2006年奥斯卡的夺标热门，但这部影片在以色列上映后却遭到了摩萨德的一些退役特工的批评，称片子里漏洞太多，归纳起来有“三大疑点”。

疑点之一：我们从来不保存发票。

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一名摩萨德官员下令在海外追杀的特工们保存行动中花费的发票，这些前特工说：“这个情节太不真实了，我们在执行海外行动时从来不保存发票，那样会暴露我们的行踪，我们都是回来之后口头报一下花费的情况，上级很信任我们，知道我们不会中饱私囊。”

疑点之二：以色列的报复杀手单独行动。

在影片当中，被挑上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都与世隔绝进行各种专门的训练，他们当中包括可以单独执行任务的爆破专家。但摩萨德前特工却表示，诸如这样的绝密任务一般不会只需要很少的特工，相反会有很多幕后人员帮助，单靠这些特工根本不现实。例如需要有线人为特工提供线索，当目标人物确定之后，还先要在国内进行模拟暗杀演练。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特工说：“我们会制定多种方案，在国内先挑选类似执行任务场所的地点进行练习，然后是预演，以确保万无一失。最后才是集结人员，为他们准备好一切，这样他们才能在海外度过几天、最长几周的时间，每次任务完成他们就会立即撤出。”影片当中几名以色列特工有时会显得有点无能，尤其是不太擅长布置炸弹。而一位前特工称，在20世纪70年代前，摩萨德就已经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他还对片中全都是男性特工表示不满，他说：“在类似的行动当中，派一名或几名女特工加盟几乎是惯例，任何特工都知道，如果有位女同事跟着你去执行任务，掩护起来就会方便得多。”



《慕尼黑》剧照

疑点之三：摩萨德特工怀疑命令。

还有一些前特工批评这部影片里有关以色列特工对于执行暗杀任务产生怀疑的情节，他们说，真正的特工不会怀疑上级的命令。曾在20世纪80年代参加过摩萨德暗杀行动的一个特工说，这样的情节太离奇了。他说：“我们是职业特工，执行上级指令是我们的天职，我们都有战斗经验，我们必须接受击败敌人的任务。所以，对于特工而言，执行暗杀任务很平常，你只希望自己能够按时回家吃早饭，然后送孩子去上学。”

这位退役前特工称，摩萨德设有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帮助那些怀疑自己的工作的特工摆脱这种困扰。

不管怎么说，银幕上那些身怀绝技的摩萨德特工还是给全世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十三章 秘密会晤显身手 “霹雳行动”救人质

9年追杀“死亡名单”画上句号，秘密安排拉宾与侯赛因会晤；劫机事件又让以色列“大力神”远飞4000公里突降乌干达；人质成功解救后以色列人吹起了羊角号，而乌干达总统却愤怒谴责以色列侵犯其主权、打死其士兵还炸毁了他的飞机。

“霹雳行动”始末

完成了“上帝的复仇”行动，摩萨德局长霍菲的一个新任务，就是协助以色列政府，开展秘密外交活动。

1975年3月，摩萨德终于成功地安排了以色列总理

拉宾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在两国边境线上的阿拉瓦平原的秘密会晤。双方会谈的情景都被摩萨德用隐藏的摄像机和窃听器记录了下来。

随后，摩萨德又受命安排拉宾总理秘密出访摩洛哥。1976年，以色列总理拉宾乔装打扮，头戴假发，取道巴黎飞抵摩洛哥首府拉巴特。在这次会见中，拉宾总理请求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设法说服埃及总统萨达特，能同以色列坐到谈判桌边来。

虽然这次出访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但是以色列和摩洛哥之间的秘密合作却得到了发展。摩萨德取得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同等的权利，他们的特工可以在摩洛哥的领土上自由行动，其中包括与“可能有用的人”来往，可以在摩洛哥建立无线电侦收站，对北非各国的行动进行电子侦察。而摩萨德所给予的回报就是，可以就摩洛哥国内安全事务，向国防部及其高级官员提出建议。

与此同时，霍菲还继承着由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当年提出的“外围战略”传统，同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建立一种有限的合作关系。不久，摩萨德就与约旦秘密警察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可以交换有关共同敌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绝密情报。此后，摩萨德就曾多次向其传递了“巴解”组织企图刺杀侯赛因及

其内阁部长的阴谋计划。

1977年5月，梅纳赫姆·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工党中政客们都把“利库德集团”（当然包括贝京本人）看做是一个“会把人吞掉”的恶魔，一个会挑起以色列与其邻邦之间可怕冲突的战争贩子。但贝京却让人们相信，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就在他上任几个星期后，一项试图与以色列最大敌人埃及和解的计划便开始实施。

作为该计划的第一个步骤，摩萨德局长霍菲和副局长戴维·金奇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前往摩洛哥。在伊弗兰宫中，霍菲见到了与世隔绝的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并成功地说服了摩洛哥国王同意作为东道主，促成埃及与以色列人之间举行秘密会晤。

就在当天，埃及副总统哈桑·托哈米和情报局局长迈勒·哈桑·阿里将军，应摩洛哥哈桑国王之邀来到了摩洛哥。在伊弗兰王宫，摩萨德首脑与埃及副总统进行了秘密会晤。由于此次行动是极为机密的，就连身为埃及情报局长的阿里将军也被拒之门外。阿里当时差点气疯了。回到埃及后，阿里就向埃及总统萨达特大肆抱怨副总统托哈米故弄玄虚，把自己拒之会见门外。没想到总统萨达特听了却大笑起来。据阿里后来回忆说，他从来没见过总统这样大笑过，而且直到这

时候，萨达特才对他的情报局长道出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原来摩萨德局长霍菲这一次的摩洛哥之行，就是给埃及总统送上一份极其重要的“人情”——1977年4月，摩萨德把一份秘密情报送到贝京总理的办公桌上，让贝京总理看了之后吓了一跳。原来这份情报显示，1977年4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苏联克格勃特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利比亚将向苏联提供舰船停靠安全和飞机着陆权，以便他们能向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运送武器；苏联则负责向利比亚派遣一支克格勃特工部队，并负责训练巴勒斯坦、德国和日本的恐怖分子。而这些恐怖分子的刺杀目标，就是被卡扎菲称为“阿拉伯事业的叛徒”的埃及总统萨达特。

埃及的情报部门得到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后，一开始还不大相信这是真的，于是他们就向利比亚边境地区派出侦查机。通过侦查，他们果然在一片沙漠绿洲中发现了摩萨德所说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1977年7月25日，埃及特种部队及时摧毁了那个基地。随后，埃及总统萨达特向耶路撒冷表达了谢意。

摩萨德及时送出的这把“火”，终于融化了以色列和埃及两国之间最后的一块坚冰。

8月27日，埃及外长赛义德·马雷出访罗马尼亚，

而以色列总理贝京也在摩萨德的巧妙安排下，“恰好”也在同一天访问罗马尼亚。于是这对中东地区的“天敌”又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秘密会晤了，从而将两国的和解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77年9月，摩萨德又为以色列外交部长德西·达扬和埃及副总统托哈米安排了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托哈米转达了萨达特总统的问候，并通告了总统同贝京会面的唯一条件是：以色列政府必须声明，同意把已占领的西奈半岛还给埃及。

9月18日，达扬乘坐的班机在苏黎世的机场中途着陆时，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会晤了一名来自开罗的代表，向他转达了贝京的承诺：以色列愿意归还西奈半岛。这一信息的传递，为两个月后埃及总统萨达特对耶路撒冷进行历史性的访问铺平了道路。

1977年11月17日，驻埃及的美国大使求见埃及总统，向萨达特递交了一份以色列总理贝京的官方请帖，正式邀请他访问耶路撒冷。埃及总统萨达特看了这份来自以色列的请帖以后，神情庄重地向美国大使说：“我接受邀请。我将去耶路撒冷城。我去了之后，其他的阿拉伯人也会接踵而来的。”

两天后的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正式起程去以色列之前，他的一位助手摇着头说：“此人如果不是

疯子，那么就是一位真正的伟人。”

1977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终于踏上了以色列的国土，主动地访问了这个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涯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国家。这标志着埃、以两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和解之路。

在以色列的路德机场，向埃及总统萨达特伸出欢迎之手的有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前总理伊扎克·拉宾、永远戴着黑色眼罩的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前外交部长阿巴·埃邦，还有一位就是曾在“十月战争”中指挥以色列军队向埃及军队发起猛烈反击的阿里尔·沙龙将军——这些人都是以色列的政界名流和最杰出的政治家。萨达特总统和他们一一握手，甚至拥抱在一起。

萨达特的这次访问，加上美国人的参与，终于让埃、以两国签订了著名的“戴维营协议”；1979年3月，埃、以两国领导人又签订了“埃以和约”。在1980年埃及总统萨达特第二次访问以色列后，埃及和以色列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经过30年的持续战争和战争威胁，埃及和以色列终于“化干戈为玉帛”，成功地走上了和平谈判的道路。



1978年以色列总理贝京（右）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议

尽管摩萨德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同埃及和解的全过程，但是霍菲对于这些内幕却一直秘而不宣。

摩萨德局长霍菲在领导摩萨德进行秘密和平外交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一次“霹雳行动”让世人再次领教了摩萨德的厉害。

1976年6月27日，两名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和两名西德“都市游击队”队员劫持了一架法航139次大型客机。恐怖分子将飞机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飞机上共有230名乘客，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从其中挑选出83名以色列乘客作为人质，而将其余的乘客释放了。

这次劫机事件的总导演就是瓦迪埃·哈达德博士。

对于哈达德博士，以色列人并不陌生。在摩萨德

的“巴勒斯坦危险分子”档案资料中，就有关于他的详细记录。哈达德曾是一名外科医生，但他还是一名狂热的国际“反犹”领导人，并且是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简称“人阵”）的创始人之一。他极力鼓吹对以色列采取恐怖行动，把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列为打击对象，把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作为恐怖活动的战场。他成功地导演了数次劫机和扣留人质的恐怖行动，在全球布下了恐怖主义的阴影。1972年5月，他曾指挥他的部下成功劫持过一架比利时的飞机。哈达德并不是一个单枪匹马与以色列人周旋的“独行侠”，他的恐怖组织与当时西德的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又称“红色军团”）、北爱尔兰共和军、日本的恐怖组织“赤军”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他的每一次恐怖活动计划都制定得相当周密。

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后，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开始采取“以人质换同志”的策略。他们要用劫持的以色列人质去交换那些关押在世界各国监狱里的恐怖分子。于是，1976年6月10日，哈达德在也门共和国的首都亚丁策划了这次恐怖行动。

参加这次恐怖活动策划的人员除了哈达德的“人阵”的一些头目外，还有他的盟友——西德的恐怖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成员温弗里德·伯泽等人。他

们选择了法国一家航空公司作为行动的目标。他们认为，法国人的例行检查向来是极为马虎的。

关于这架劫持的飞机降落在哪个国家的机场，哈达德的首选对象是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因为据他了解，乌干达时任总统伊迪·阿明原是英国军队的一名中士，当过拳击手，性格暴躁蛮横，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暴君式的人物。伊迪·阿明曾经是以色列的朋友，1971年1月阿明发动军事政变时，以色列军事顾问曾对他鼎力相助过。但是，当年乌干达进攻其邻国坦桑尼亚时，以色列拒绝向乌干达提供武器，阿明因此同以色列翻脸了，并且开始憎恨犹太人。当时是利比亚为他提供了武器，所以他对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还是非常钦佩的。

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结束以后，许多非洲统治者都断绝了同以色列的友好往来，乌干达的总统伊迪·阿明也不例外，很快就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不仅如此，伊迪·阿明还把以色列驻乌干达的大使馆，转赠给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反对以色列的据点。同时，他还允许哈达德的“人阵”进入乌干达安营扎寨，并在其首都坎帕拉设立了办公室。以上种种迹象可以表明，乌干达总统阿明是要同以色列对着干到底的。那么，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劫机行动，肯定是持合作态

度。因此哈达德最后就选择了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

1976年6月27日，一架法航139次大型客机从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准点起飞，中途在雅典机场着陆，然后飞往巴黎。班机上载有250多名乘客和机组人员。52岁的帕斯科·科恩带着妻子、女儿兴致勃勃地去巴黎度假。法国女公民朱利亚·阿基泽拉特刚从耶路撒冷看望姐姐回来，这会儿也飞往巴黎。多拉·布洛克是一位75岁高龄的老太太，正想赶往巴黎参加小儿子的婚礼。唯有13号座位上那位年纪较大的先生与众不同，只见他不时神经质地用手帕擦着额头，不安地握着身边那位漂亮的年轻女伴的手。13号的这位先生曾对夫人说去外国“洽谈贸易”，可事实上，他是私约了自己的女秘书，前去巴黎偷情觅爱。

法航139次班机按时飞抵雅典后，又上来52名转机旅客，他们的手提行李没有受检。中午12时许，这架银白色的空中客车沿着雅典机场的跑道徐徐升空，在科林索斯海湾深蓝色的波涛上空划过，甩下一道漂亮的白色弧线。

飞机起飞后不久，那位75岁的老太太多拉·布洛克第一个发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她转过身对同行的儿子小声地耳语道：“你看，那两个阿拉伯小伙子带的箱子那么大，足可以藏武器炸药。”她的儿子笑了笑。也许

他心里很纳闷，母亲平素胆子并不小，天晓得她现在产生了什么念头。

8 分钟后，提示旅客系紧安全带的信号灯还没熄灭，突然，头等舱内一男一女跳起来，拔出手枪，左手挥舞着手榴弹。几名女乘客吓得歇斯底里地惊叫起来。这时总机械师刚刚打开驾驶舱门，迎面就撞见恐怖分子的手枪，一下子愣住了。那个瘦高个男人把他推回驾驶舱，随后跟进来抓起麦克风大声叫嚷：“我的名字叫阿什迈德·基贝西，”他用带有浓重的德语腔调的英语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加沙旅接管了此次飞行的指挥权。如果你们保持安静，没有什么可疑的举动，就会安全无事！”

与此同时，普通舱内两名年轻的“人阵”成员也拔出手枪。他们同那两名恐怖分子重新调整了机舱内旅客的座位。旅客们被指令把舷窗上的遮阳板拉下，这样就看不见机身下到底是山还是水。

此时，机舱内静悄悄的，乘客们不再喊叫。飞机盘旋了几圈，逐渐降低了飞行高度，徐徐降落。

化名阿什迈德·基贝西的伯泽通知法航139次班机的乘客说，飞机已经降落在利比亚的班加西。随后劫机者释放了一名孕妇。

6 小时后，飞机重新起飞。伯泽对“旅客的合作态

度”表示感谢，并宣布飞机将飞往“最终目的地”。星期一凌晨，也就是1976年6月28日当地时间3时，法航139次班机降落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恩德培机场上。

飞机徐徐驶近机场的一栋旧大楼。几扇舱门同时打开了。但是，人质并没有获得自由。他们被迫穿过乌干达士兵“夹道欢迎”的队列，走进旧机场楼大厅。大厅里，肮脏不堪，满目尘土。乌干达士兵搬来了椅子和电扇。天气又闷又热。伯泽用扩音器对大家说：“我想提醒诸位，你们仍然处在我们的监护之下。”

当天下午5点，乌干达总统阿明亲自来看望人质，他说，把所有的人领出飞机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本人将继续关怀人质的生命安全。旅客们有礼貌地报以掌声。

6月29日下午4点左右，乌干达国家电台广播了劫机者的一份声明，要求释放53名身陷囹圄的“自由战士”来换取人质，最后期限是7月1日下午2时。这53名“自由战士”当时分别关在5个国家，其中囚禁在以色列的40名，西德有6名，肯尼亚有5名，瑞士有1名，法国有1名。劫机者还在声明中说，如果在中东时间7月1日下午2点以前得不到答复，就杀死人质，炸毁飞机。

6 月30日，几名人质开始拉肚子，厕所都“客满”了。天气愈发炎热，电扇吹出来的风也是闷热难忍的。

这一天，恐怖分子同意释放47名妇女和儿童。

7月1日，中东时间11点差5分，最后通牒的期限快到了。神经高度紧张的人质开始焦虑不安地看着表，不知自己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其实自从5月27日劫机事件发生以后，以色列内阁成员已经召开了好几次会议，但是一直没有结果。6月30日上午，以色列政府全体内阁成员又一次来到总理办公室，大家沉默不语地坐在那里。这时以色列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打破了沉默，他说：“先生们，政府今天作出了决定。我们将在格林尼治时间7月1日10点20分，即最后期限前40分钟通知巴黎，以色列将同恐怖分子进行谈判，并请法国人从中斡旋。”

会场一片沉默，一张张面孔表情忧郁，到底作出了让步！在公开舆论的压力下让了步，在人质家属的请求下让了步……恐怖分子有望获胜，这对今后的劫机者无疑是一个鼓舞。

佩雷斯打破了沉默的僵局：“我现在想问一下，诸位对解救行动有什么建议？哪怕是荒诞离奇的念头也不要紧。”

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将信将疑地反问了一句：“这么说，我们是在讨论一次与政府决定相悖的行动？”

佩雷斯答道：“我想谈的正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营救行动。”

与会者一下子振奋起来了，一致认为采取军事行动是唯一的选择——尽管这样做也很难取胜，因为其中实在有太多的难题。佩雷斯和与会者询问摩萨德头头霍菲，假如前往营救，特遣行动小组会在地面上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假如前去营救的飞机在途中需要加油的话，应该做何准备？在劫机者觉察到有情况并匆忙杀害人质时，特遣行动小组是否有机会先发制人？等等。

霍菲向政府作出的回答是生硬的。他说他现在还不知道，但他愿意想些办法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从得知飞机被劫的那一刻起，以色列内阁就指示情报机关研究出可行的对策，霍菲一直同佩雷斯保持着联系。这些天来，摩萨德的情报机器一直在高速运转，搜集有关的情报，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结果。摩萨德特工人员已经从某家参加过恩德培机场建筑的以色列公司搞到了该机场的平面图。几个月前打入乌干达的摩萨德特工人员也已经向他们报告了对局势的估计。驻在乌干达邻国肯尼亚的摩萨德特工人员已经奉霍菲之

命，进入最高战备状态。

于是，他们就一边佯装通过了这个“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项最屈辱的决议”，一边把这个消息传递给法国人，请他们转告那些劫机者。

7月1日上午，法国驻乌干达的大使把“以色列人答应谈判”的消息送到了机场大楼。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是机长米歇尔·巴科，他立刻将这个信息告诉那些人质。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简直疯了。他们跳起来，互相拥抱着，亲吻着。他们一边在高兴地笑着，同时又在泪流满面。

当天下午2点，劫机者又释放了100名法国人质，允许他们飞往巴黎。那些以色列人质也被送回到旧机场大楼里那间比较舒适的大厅里。整个气氛似乎缓和多了。

当天下午4点，霍菲得到确切消息，劫机者已经同意把最后交换人质的期限延长72小时，由7月1日下午推迟到7月4日下午。这样，就为以色列的营救工作赢得了非常宝贵的3天时间。

经过反复商量，摩萨德和以军总参谋部最终确定了营救人质的行动计划。他们将派遣一支特别行动小分队，乘坐“大力神”飞机在7月3日深夜进入乌干达，实行突然袭击，解救所有的以色列人质。这次解救人

质行动的代号为“霹雳行动”。当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把这个计划报告给达扬时，达扬当即高兴地说：“这是一个漂亮的计划，完全可以成功！它会让全世界感到震惊！”

乌干达位于非洲中心地带，距离以色列最近的地方也有4000公里之遥。中间还要经过埃及、苏丹、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和肯尼亚等多个国家，才到达乌干达。而这些国家当时对以色列采取的都是不友好甚至是敌对态度，以色列的飞机要途经上述多个国家的领空，除了路途遥远之外，还可能会遭到那些国家防空部队的导弹或火炮的袭击，随时都有被击落的危险。另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就是中途加油的问题。

这时，霍菲的“外围战略”又发挥了作用。长期以来，以色列的摩萨德一直通过内罗毕的情报站，与肯尼亚的安全机构保持着极好的关系。这一次，霍菲又通过这种关系，获得了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的支持，同意以色列的特别行动小分队把肯尼亚作为“霹雳行动”中转站，可以在内罗毕加油，并且营救行动成功之后还可以在内罗毕作短暂停留。

加油的问题解决了，“霹雳行动”就算是万事俱备。于是10名摩萨德和军事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乘飞

机提前来到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部分人筹建中转站，为“霹雳行动”做好准备工作；一部分人则冒充商人或游客，划着小船从肯尼亚渡过维多利亚湖抵达恩德培，去侦察机场地形和士兵分布情况，找列出入恩德培机场的最佳路线。

与此同时，在特拉维夫以北的佩塔提克郊外一座废弃的空军机场上，一支精锐的突击队正在进行突袭恩德培机场的模拟演练。这里有一座土木结构的乌干达恩德培机场模型，是以色列特工部按真实比例赶制出的杰作。指挥这次模拟演练的是这次袭击行动的以色列军方指挥官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此人曾是以色列国防军“戈兰旅”的中校。

1976年7月3日早晨，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气氛十分紧张，大家在为“霹雳行动”的结果作最后的预测。摩萨德局长霍菲力主按计划实施，国防部长佩雷斯也决心要干到底，而有些优柔寡断的拉宾总理此刻还有点犹豫不决。佩雷斯就鼓动他痛下决心，佩雷斯说：“如果成功了，你将成为一名英雄。”

拉宾总理的回答是：“如果不成功，我们大家只能引咎辞职。”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总理终于拍板，决定实施“霹雳行动”。

1976年7月3日下午2时50分，4架“大力神”运输机从以色列最南端的机场腾空而起，率先向恩德培机场方向飞去。这支作战分队共180人，分乘4架大力神飞机：

1 号机，肖姆隆将军和内塔尼亚胡中校率领的营救分队，负责袭击候机楼，保护人质；

2 号机，火力压制分队，负责对付乌干达部队；

3 号机，破袭分队，负责摧毁机场上的乌干达空军战斗机；

4 号机，加油机。

以色列空军司令的佩雷德中将与作战部长亚当将亲临现场指挥这次“霹雳行动”，负责指挥、通讯工作。他们乘坐的飞机和满载着医疗设备、33名医务人员的飞机将直接飞往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总指挥部和“临时医院”就设在内罗毕机场。同时，在4架“大力神”飞机上方，还有10架战斗机，随行作远程保驾护航。

一时间，在这遥远的4000公里航程的高空中，移动着一座不动声色的空中城市。这座“空中城市”的形成，正在显示着以色列人的实力、责任和决心。

乌干达总统大发雷霆

机群起飞后，一开始就大胆地进入民航航线，中途才改变航线南下，目的是绕过埃塞俄比亚，以免一开始就遇到不必要的麻烦。经过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在即将进入乌干达领空之前，4架“大力神”关闭了无线电通讯设施，以保持能看清前面飞机的距离，进入“盲飞”状态，编队向乌干达飞去。

当晚11点03分，第一架以色列“大力神”抵达恩德培机场上空。恩德培机场一片寂静，但是跑道两侧却灯火通明，两旁的照明灯大都亮着。不过机场指挥塔台内的雷达观察人员显然是在睡大觉，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在值班。即使是那些雷达观察人员没有睡大觉也无济于事，因为摩萨德特工事先已经得到了情报，恩德培机场的民用雷达探测范围一般不超过30公里，因此根本就无法发现目标；而性能较强的军用雷达一到夜间就关机了。

按照预定计划，第一架“大力神”着陆的位置，是在机场正中两次正常航班之间的跑道上。在即将降落之前，驾驶员用纯正的曼彻斯特口音镇静地回答了机场指挥塔值班员的询问。他声称自己的飞机出了点小故障，需要降落检修一下。值班人员同意他降落，话语中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惊奇和怀疑。于是第一架“大力神”运输机就在恩德培机场的跑道上着陆了。为防止被

探照灯照到，飞机驶出跑道，向候机楼滑行。经过7小时的飞行，行动小组比预定时间仅仅迟到了1分钟。

就在“大力神”滑行减速的同时，它的后舱门迅速地打开了。“出发！”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同8名部下挤在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车内，驶出“大力神”的机腹。两辆越野吉普车也旋风般地冲了出来，向那幢旧候机大楼扑去。

然而就在这时，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支乌干达士兵巡逻队，他们打着手势让汽车停下来，全然没有显示出对这辆“首长座车”有任何恭敬之意。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理睬，操起装有消音器的冲锋枪就是一梭子，3名乌干达士兵没有开口就一命呜呼了。

就在此时，第二架“大力神”也降落了，向那幢新候机大楼冲去。它的任务是压制乌干达守军，抢运人质和伤员。

紧接着，第三架“大力神”也安全着陆在新跑道上。它的任务是负责摧毁机场停机坪上的乌干达军用飞机，破坏机场设施。

这时，恩德培机场指挥塔上的值班人员终于产生了怀疑——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跑道上怎么突然多出了这么多的巨型飞机，而且好像还有许多不明身份的人在奔跑。于是他立刻拉响了警报，同时关闭了机场

的灯光，实行暗灯封锁。就在这时，第四架“大力神”已经到了机场上空，就要开始降落了。面对突然漆黑一团的跑道，驾驶员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按照平时训练的要求，熟练地操纵着飞机，在黑暗中把飞机安全地降落到跑道上。这架飞机里面是一支预备队，他们的任务是随时准备出击或者是接应。

冲向旧候机大楼的行动队员进展十分顺利。梅赛德斯轿车和越野吉普都在大楼前猛地刹车，行动队员们跳下车来，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身先士卒，带领队员们就往大楼里冲。大楼里，一名警卫人员发现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正要上前阻拦，但是还没有等他伸出手来，就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另一名警卫人员举手敬礼正要询问时，一把军用匕首突然从后面过来，切断了他的喉管。队员们冲进了大楼，内坦尼亚胡首先扣动扳机，一枪击毙了刚想转身的德国恐怖分子伯泽。紧接着丧命的是巴勒斯坦人贾贝尔。那位德国女恐怖分子慌忙投出手榴弹，手榴弹却滚到了19岁的迈默尼的脚下。紧接着飞来一梭子子弹，她身中数弹倒在窗户旁。大厅里面，另外两名“人阵”游击队员用自动步枪和手枪慌乱射击，但马上就被行动队员雨点般的子弹撂倒。

枪声大作，人质处于一片慌乱之中，帕斯科·科恩

猛地扑向妻子和小女儿，想用身体保护她们，结果被一颗子弹击中大腿。

行动队员们一边往里面冲，一边通过手提扩音器用希伯来语反复地高声叫喊：“卧倒！快卧倒！”“我们是以色列军队！”“我们是来接你们回家的，请你们就地卧倒，就地卧倒！”

明白过来的以色列人立即卧倒在地下，而那些莫名其妙的恐怖分子就成了活靶子，被暴风雨般的子弹击倒。还不到一分钟，一楼的恐怖分子就全部解决了。行动队员又往二楼和三楼冲去，在楼梯上他们遭遇了恐怖分子的抵抗。但是行动队员的火力真是太猛了，没用多少工夫，恐怖分子的抵抗就被摧毁了。

事后据乌干达人统计，在那些被打死的士兵和恐怖分子身上，总共有几千个弹孔，平均每个人身上中了10多发子弹。

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旧候机大楼的战斗就结束了。行动队员保护着一百多名人质，带着他们在机场跑道上狂奔起来。这时乌干达的军队发现了他们，并立即进行拦截。负责接应的预备队及时赶到，马上展开了一场激战，很快乌干达的军队就被消灭了，特别行动队员们已经控制了整个机场。他们乘坐装有无后坐力炮的吉普车和装甲车，用反坦克导弹和重型机

枪分头出击，摧毁了机场指挥塔和其他的设施，封锁了机场的所有通道，有力地阻截了乌干达的增援部队。

同时，他们还迅速派出一支训练有素的爆炸小组，摸到军用飞机的停机坪那里。停机坪上居然毫无动静，于是他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安装好了炸药。一阵巨响，4架“米格-21”战斗机中的两架立即葬身火海，另外两架也被炸得断裂开来，机翼和起落架都飞到了半空中。他们还炸毁了3架“米格-17”、1架“米格-15”和其他10多架各种型号的战斗机。熊熊大火冲天而起，照亮了恩德培机场的夜空。他们摧毁了乌干达最先进的机群，几乎让乌干达的空军不复存在了。

11时59分，第一架“大力神”又重新飞上了夜空。机上载有被救出来的一百多名人质、法航139次航班的机组人员和在战斗中死伤的人员。按照规定，行动小组除了子弹壳以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得留在现场，全都要带回以色列。从11点3分第一架“大力神”在恩德培机场安全着陆，11点5分打响第一枪，到11点59分离开恩德培机场，这次行动总共还不到1个小时就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而且是在长途奔袭4000公里以后。这实在不能不让人叹服。

尔后，另外3架“大力神”也相继升空，离开了一片

狼藉的恩德培机场。透过舷舱向下看去，那里是火光冲天。4架“大力神”一同飞到了肯尼亚，在内罗毕机场补充了油料，并将几名重伤员送到了肯尼亚医院抢救，然后全体人员安全返回了以色列。

以色列的这次突袭行动，共消灭了乌干达官兵45人，击毙了恐怖分子7名，活捉了3名，救出人质100多人；而以色列仅死了4人，其中有3名是人质。两名人质是在战斗中误伤身亡，还有1名人质当时正因病住院，事后被恼羞成怒的乌干达总统下令枪毙了。另外1名死亡人员就是行动小组的指挥官约尼·内坦尼亚胡中校。这让以色列人多少感到有点遗憾。



乌干达总统阿明

“霹雳行动”大获全胜。这是一次令人惊愕的成功。佩雷斯得意地称赞这次“霹雳行动”是“前所未有的最远距离、前所未有的最短时间、前所未有的大胆作战”。

“霹雳行动”的成功，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7月4

日那一天恰好是美国的国庆节。而当天全世界的各大报纸和电台、电视台几乎都在播出“霹雳行动”这一特大新闻，以至让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也很少有人关注了。

乌干达总统阿明得知恩德培机场的情况后，气愤至极，大发雷霆，谴责以色列侵犯乌干达的主权、打死乌干达士兵和炸毁飞机是一次暴行。但是最后他也不得不赞叹说：“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认为袭击非常成功。以色列人真是好样的！”

当凯旋归来的机群出现在以色列上空时，已经是7月4日的早晨，明媚的阳光抚摸着这些远道而来的飞机。当以色列国家电台播音员用颤抖的声音播出这一新闻时，整个以色列都在为之疯狂，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涌上街头，他们脸上有灿烂的笑容，也有激动的泪水。全国各地响起了羊角号声——这种号声只有在犹太教士拉比节日里才会吹响。在令以色列人深感丢脸的“赎罪日战争”结束3年后，恩德培行动的成功一扫阴霾，极大地鼓舞了以色列人的士气——尤其是以色列情报界的士气。

不过，以色列政府并没有对摩萨德进行公开表彰。

与此同时，摩萨德局长霍菲因为这一次的成功，

成为恐怖分子的头号打击目标。霍菲的朋友们看到他的座车经常更换，而且都是安装着厚厚的防弹玻璃，并且随时更换不同的牌照。他的家庭住址在不断地变动，他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连他最要好的朋友几乎都一无所知。

但是，霍菲并没有由此而销声匿迹。此时他的眼睛又盯上了伊拉克人的核反应堆，并且很快将其夷为平地。

第十四章 “美人计”窃取机密 核计划胎死腹中

法国政府为了得到石油决定向伊拉克提供两座核反应堆，合同虽然是在秘密中进行但同样逃不过摩萨德特工的眼睛；3名摩萨德特工潜入法国塞恩镇，一次技术高超的爆炸让价值9000万法郎的核反应堆构件成了一堆废铁；“巴比伦行动”为总理赢得了连任的选票，萨达姆的核计划由此胎死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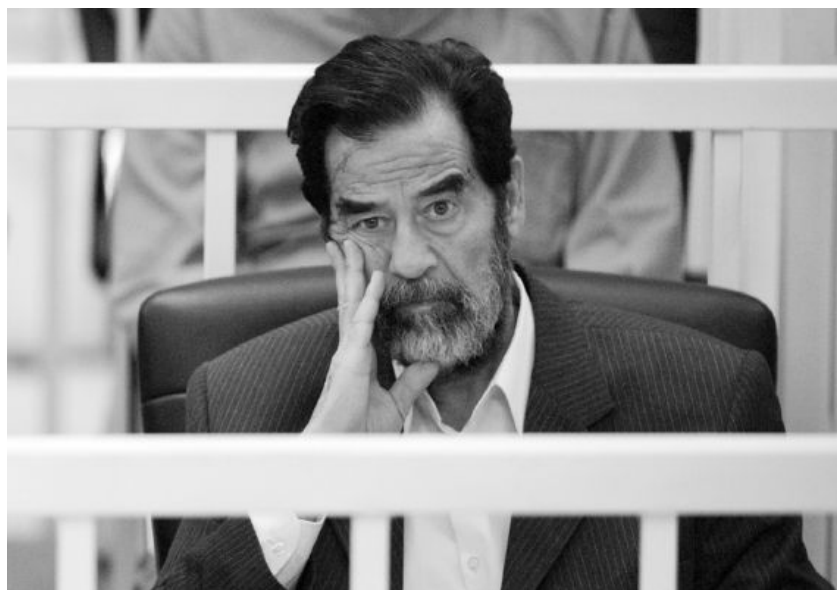
萨达姆的原子弹之梦

1978年，摩萨德利用“美人计”成功地获取了伊拉克的核机密，然后派特工去巴黎，炸毁了法国为伊拉

克制造的核反应堆；随后，摩萨德又为以色列空军提供了准确的情报，使之一举将伊拉克正在建设中的大型核反应堆“塔穆兹1号”夷为平地，从而使以色列继续成为中东唯一的核国家。

以色列为什么要对伊拉克下此狠招呢？那还得先从以色列同伊拉克之间的恩怨说起。

在中东地区，以色列和伊拉克虽然不是相邻的国家，但是由于民族和宗教的历史原因，让它们成了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特别是伊拉克的强势人物萨达姆·侯赛因在1968年通过政变上台后，就一直把以色列视为阿拉伯世界最危险的敌人，对以色列更是虎视眈眈，总想把以色列从中东的版图上抹去。在1979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前往以色列访问前夕，阿拉伯的一些国家在利比亚的首都的黎波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共同谴责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是对阿拉伯民族解放事业的背叛，并且发表了一份《的黎波里公报》。出席这次会议和在这份公报上签字的阿拉伯国家，除了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也门和“巴解”组织的领导人之外，还有一个国家就是伊拉克。这5个国家组成了一个“反美抗以”联盟，而伊拉克就是这个联盟的中坚力量。



法庭上的萨达姆

埃及和以色列正式签订了和约之后，萨达姆又作为东道主，召集除埃及之外的阿拉伯所有的国家，在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召开了一次部长级的“特别会议”，决定断绝同埃及的政治与外交关系，撤回各国驻开罗的大使，中止埃及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资格。而所有的这些决定，几乎都是在萨达姆的操纵下进行的。

以色列拥有了原子弹、成了中东地区的军事超级强国之后，更让阿拉伯世界忧心忡忡，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威胁。当时埃及一家报纸就评论说：“作为犹太人，爱因斯坦的理论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但是他的后代以色列人掌握了核武器，却是阿拉伯世界的灾难。”

为了同以色列进行军事上的较量，伊拉克决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于是在萨达姆·侯赛因的授意下，伊拉克以美元和石油为代价，同法国人谈判帮助伊拉克建造核反应堆的事情。

1972年，萨达姆宣布伊拉克实行石油工业国有化以后，伊拉克的国力很快就膨胀起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伊拉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000美元，成了中东地区名列前茅的富豪。国力强大了，萨达姆的野心也就来了。他给自己定下的奋斗目标是在阿拉伯地区结束“22个国家、22个政府、22种政策和22位领导人”的分裂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世界，而他的伊拉克“复兴党”的口号就是“阿拉伯民族是统一的，肩负着永久的使命”。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得有强大的军事实力。1975年8月下旬，伊拉克政府派出一个贸易代表团来到巴黎，向法国购买先进的武器装备。不久，伊拉克代表团同法国政府签订了一项军火贸易协议，总价值达6亿马克。

但是在萨达姆看来，要想实现自己的野心，光有这样的常规武器还是不够的，必须像以色列一样拥有核武器，有自己的原子弹。于是伊拉克又打算同法国签订关于核技术合作的协议。伊拉克是世界上盛产石

油的几个大国之一。为了能从伊拉克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石油，法国政府就同伊拉克正式签订了这份合同，同意向伊拉克提供两座一大一小的核反应堆。伊拉克对外称那座小的用于科研，那座70兆瓦的大反应堆则用于发电。萨达姆授意伊拉克有关部门，将那座70兆瓦的大的核反应堆命名为“塔穆兹1号”，那座小的则命名为“塔穆兹2号”。两座核反应堆的位置都在距离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约32公里处的图威查克地区，总价值高达2.75亿美元。根据协议的有关规定，法国政府还将派出150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援建工作，两座核反应堆将在1982年以前全部完工。与此同时，法国政府还决定向伊拉克提供75公斤浓缩铀。

“塔穆兹”原本是阿拉伯一位“迎南神”的名字，后来逐渐演绎成阿拉伯语就成了“7月份”的代称。而萨达姆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正是在1968年的7月发动政变上台执政的，因此将这两座核反应堆分别命名为“塔穆兹1号”和“塔穆兹2号”，其用意也就路人皆知了。协议签订以后，伊拉克派出了几个技术代表团，前往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进行核设施考察。伊拉克为了感谢法国政府的慷慨援助，又特意借用时任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的名字，将这项工程称之为“希拉克反应堆”。

虽然伊拉克和法国之间的这种交易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但是同样逃不过摩萨德特工的眼睛。两国之间的协议刚一签字，以色列派驻巴黎大使馆的摩萨德特工就立刻将情报报告给了特拉维夫摩萨德总部。

以色列领导人获得这一消息之后，深感不安。尽管以色列自己已经拥有核武器，但是却不允许阿拉伯国家再拥有它。否则，他们的核武器就起不到核震慑和核讹诈的作用了。他们决定要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让伊拉克和法国之间的这种核合作破产。

以色列当时所采取的手段是“先礼后兵”，总理拉宾展开了秘密外交攻势，试图说服法国、意大利和巴西等有关国家，取消向伊拉克提供塔穆兹工程所需的设备、铀和技术等各项计划；同时，他还请美国人出面进行干预，希望美国总统卡特利用“防止核扩散”的条约来影响和说服法国取消这份协议。

1976年，法国总理希拉克与总统德斯坦之间出现政见分歧，导致总理希拉克下台。希拉克下台之后，法国总统德斯坦迫于华盛顿方面的指责和压力，改变了法国的核政策，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公开宣布反对任何可能导致核扩散的售铀项目。

法国总统的这一招的确给了伊拉克当头一棒。萨达姆眼看梦想成空，自己的人生目标就要泡汤了，就

撕破脸皮同法国人摊牌了——你不给我核反应堆和浓缩铀，我就不给你石油，首先让你的雪铁龙的四个轮子转不了。法国总统德斯坦只好作出部分妥协，同伊拉克人进行谈判，提议用一种浓度较低的被称作“焦糖”的核燃料代替浓缩铀。这种物质虽然也可以产生原子能，却不能用来制造原子弹——这样既不得罪伊拉克，华盛顿那头也说得过去。但是，萨达姆真正要的不是“原子能”而是“原子弹”。对于法国方面的这种敷衍态度，伊拉克方面非常不满。萨达姆态度强硬地对德斯坦说：我们只要浓缩铀！要么干脆取消合同！

法国人当然知道，伊拉克人还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要么你也别想要我的石油！”

当今世界，石油是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伊拉克对于法国来说，当时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最重要的石油供给国。如果伊拉克真的用石油去卡法国人的脖子，那法国人就只有干瞪眼的份了。法国人被伊拉克逼得别无选择，最终只好以妥协和让步结束了这场谈判。伊拉克凭借着滚滚的石油资源，不仅从法国人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又一次战胜了以色列的外交攻势。

以色列人的外交攻势失败了，他们并没有能够阻止伊拉克人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进程，巴格达的“塔穆

兹1 号”核反应堆飞速地建设着。尽管摩萨德和阿穆恩一直在虎视眈眈，但也无能为力。

不幸的是，此时摩萨德又得到了一份情报——自1976年之后，伊拉克原子能委员会每年的预算由500万美元猛增至7000万美元。

此时伊拉克研究核武器的意图已经是昭然若揭了。

摩萨德特工推销香水

1977年5 月，贝京取代拉宾当选为以色列总理后，对伊拉克的核计划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对策。不过他也是先从外交入手，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一天，以色列外交部长沙米尔召见法国驻以色列代办，表示了他对法、伊合作搞核工程的强烈不满。但是，那位法国代办不但不给半点面子敷衍一下，而且还当场指出：“伊拉克已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遗憾的是贵国至今连这一步都没有履行。”言外之意就是说，人家还没指责你呢，你倒反拿伊拉克来说事。何况伊拉克的核工程还装有保险设备，完全可以防止伊拉克通过对浓缩铀的进一步提取来制造原子弹。

沙米尔当场被驳得无地自容，无话可说了。后

来，以色列的其他外交途径也一一失败了。

贝京总理这时才意识到，要想阻止伊拉克人的核武器进程，只有使出杀手锏了。他把摩萨德局长伊扎克·霍菲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命令他们必须不遗余力马上弄清楚“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的全部情况。他对霍菲直言不讳地说，摧毁伊拉克具有生产核武器潜力的大反应堆，已被列为以色列最重要的安全目标之一。以色列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伊拉克成为中东地区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将关系到以色列的生死存亡。

从总理办公室回来之后，霍菲就把自己关在摩萨德总部的办公室里想了三天三夜，最后他终于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这个方案的第一步，就是要从那些直接参与伊拉克核反应堆设计和建造的人员当中，物色一到两个愿意为摩萨德服务的人，为以色列军方提供可靠的情报，在军方的配合下采取行动。于是他立即把手下的几员干将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向他们下达了死命令，命令他们在近日内，一定要把在巴黎北部的萨塞勒核工厂工作学习的伊拉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搞到手。

摩萨德的有关部门经过两天通宵达旦的工作，查阅了伊拉克方面与此有关的所有档案资料，结果是一无所获。于是，摩萨德总部直接给巴黎发密电，命令

摩萨德驻巴黎站的站长戴维·阿贝尔立即办理此事。

阿贝尔是一个能操多国语言的特工人员，他披着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馆外交官的合法外衣，在巴黎进行间谍活动。他经常利用居住在法国的犹太人为他搜集所需要的情报。阿贝尔接到总部的命令之后，就立即行动。这一次，阿贝尔又用上了这个老办法，找到了一个名叫雅克·马塞尔的法籍犹太人。这个马塞尔当时恰好就在萨塞勒核工厂的人事部门工作，阿贝尔要他尽快搞一份在该厂工作和学习的全部伊拉克人的名单，事成之后一定会付给他丰厚的酬金。

这个马塞尔和其他的犹太人一样，对以色列很有感情，加上还有丰厚的酬金，他自然就爽快地答应了。他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第二天就复制了一份伊拉克在该厂的人员名单，交到了阿贝尔的手上。阿贝尔立刻通过以色列驻巴黎大使馆的密码系统把这份名单发回了特拉维夫。摩萨德仔细分析这份名单之后，选定了其中的核科学家布托拉斯·埃木·哈利姆作为目标。

摩萨德确定哈利姆作为进攻目标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首先，在那份名单上只有哈利姆一个人留下了自己的住址，这说明哈利姆的安全防范意识要比其他人差；其次，哈利姆现年42岁，已婚却没有孩子，由此

可以推断他的婚姻并不美满，家庭生活并不称心如意，这样的人更容易上钩。

于是，摩萨德决定在这个哈利姆身上打开缺口。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摩萨德决定马上派出两组人马赶赴巴黎，一个小组负责调查哈利姆是否处在伊拉克或法国安全保卫部门的保护性监视之下，并摸清哈利姆和他妻子的日常活动规律；另一个小组则设法进入哈利姆的家庭实地察看，并且在他的住处安装一个窃听器和一台微型摄像机，以便进一步了解他的行踪和他们的夫妻关系。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哈利姆和他的妻子萨米拉都在家里休息，一位楚楚动人的年轻女子出现在哈利姆居住的那幢楼里。这位自称“雅克琳”的香水推销员正在挨家挨户地推销一种法国香水。

哈利姆的妻子萨米拉对那些香水很感兴趣，于是就同雅克琳滔滔不绝地交谈起来。不一会儿，两个人就像一对老朋友一样的亲热。萨米拉在巴黎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平时也缺少社交生活。自己虽然出身名门又受过高等教育，而且长得也不赖，但是嫁的丈夫却是一个了无情趣的人，因此她生活得很是郁闷，总想找个机会和人说说话，倾诉一下自己的心曲。现在碰上了一位如此热情可爱的女孩子，而且对方还说自

己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推销香水只是为了赚点零花钱，锻炼一下自己的社交能力，让萨米拉想起了自己已经远去的学生时代，于是便把雅克琳当成了知己，并经常邀请她到自己的家里来。从此以后，雅克琳就成了哈利姆家的常客。除了听萨米拉倒倒苦水，还经常送一些小礼物给她。当然，这个所谓的雅克琳就是摩萨德派来的特工。

有一次，雅克琳拿出一只精致玲珑的钥匙圈送给萨米拉，说这是公司赠送的礼品。萨米拉一看这个钥匙圈做工精美，很是喜欢，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房门钥匙就要换上。雅克琳说“我来给你帮忙”，然后趁对方不注意，悄悄地拿出胶泥片，把手中的钥匙按在胶泥上，利索地做了个印模，巧妙地把萨米拉的房门钥匙搞到了手。

几天后，摩萨德特工趁雅克琳带萨米拉去美发的空当，在哈利姆夫妇的卧室里安装了窃听器和微型摄像头，从而掌握了哈利姆的生活规律，并且知道萨米拉最近要回一趟伊拉克的信息。本来摩萨德还准备让雅克琳和萨米拉进一步交往下去，以便了解更多的信息，可是后来在一次窃听时，听到哈利姆夫妇为了雅克琳发生了争吵。原来萨米拉出于一种女人的敏感，发现丈夫哈利姆竟然对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产生

了好感。她担心自己回伊拉克后，丈夫会同雅克琳发生某些故事，于是就警告丈夫不要有非分之想，小心自己回来之后找他算账。

摩萨德于是改变了原来的计划，让雅克琳从此在哈利姆夫妇身边永远地消失了，而趁哈利姆的妻子萨米拉回伊拉克之机，安排了另外一名女特工和一名男特工合作设下了一个圈套，让哈利姆上钩了。

一个开法拉利轿车的商人

一天早晨，哈利姆在他每天上班的公交车站等车时，发现一位肌肤白皙、容貌迷人的女郎也在等车。哈利姆不由得眼前一亮，立刻对这个漂亮的女郎产生了好感。妻子已经去伊拉克好几天了，哈利姆现在是一个单身汉。他想好好地利用一下这个机会，满足一下男人的好奇心。现在看到这么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哈利姆的心不由得动了一下。他整了整领带，正想上前去和这个女郎搭讪时，没想到突然驶来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轿车，在公交车站旁边停下了。车上一个衣饰华美、派头十足的青年男子摘下墨镜，推开车门，向那个女郎打了一个响亮的口哨，招了招手，然后把那位女郎给接走了。

哈利姆一见，只好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

第二天，哈利姆等车时，那位女郎又出现了。只见她左顾右盼，显得十分焦急。这时来了一辆公交汽车，那位女郎叹了口气，就上公交汽车走了。一会儿那辆红色法拉利轿车又急驰而来。那位派头十足的男子跳下车，摘下墨镜向四处张望。哈利姆一见，知道他是在寻找那位漂亮的女郎。他走上前去，好心地对那名男子说：“她已经坐了刚才一辆公共汽车走了，还不到两分钟。”

那名男子笑了笑，对哈利姆很有礼貌地说：“谢谢您，先生。请问您去哪里？我能为您帮忙吗？”

“马德兰纳站，离圣·搅扎勒不远。”哈利姆不假思索地回答。

“哦。正好我也去那里，搭我的车吧。”

哈利姆正在犹豫不决时，那名男子又说：“上车吧！客气什么？反正是顺路。走吧！”

哈利姆想到公共汽车上挤得很不舒服，见那名男子又那么热情，就上了法拉利轿车——他压根儿也没有料到，从此自己就钻进了摩萨德设下的圈套。

法拉利轿车在巴黎郊外的公路上奔驰着。那名男子一边熟练地操纵着方向盘，一边同哈利姆聊起来。那名男子看上去是个很热情而且善于交际的人，他主

动地对哈利姆说，他叫杰克·多诺万，是个英国人，现在在法国经商。他还对哈利姆说，那个女的看起来很高贵，其实是个妓女，只是看上了自己的钱，并不是什么茶花女。现在他已经烦透了她。所以今天就故意迟到了。多诺万还说：“只要你有钱，这样的女人满街都是。”

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哈利姆表现得还是很矜持，一直听多诺万在说。他想到自己工作的特殊性，伊拉克大使馆的官员曾叮嘱过他们，不要与不熟识的人交往，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当哈利姆上车后，只是说自己是伊拉克来的进修生，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说。尽管如此，多诺万还是一路侃侃而谈。也许是多诺万的热情和豪爽感染了他，让哈利姆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好感。临下车时，多诺万给了哈利姆一张精致的名片，上面有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并且邀请哈利姆在方便的时候到他的公司去做客。他的公司在郊区租了一幢乡间别墅，那里有山有水有草地，风景优美，空气也很好，还可以到附近的小河里去钓鱼。

哈利姆丝毫没有怀疑那个男子所说的话。自己一直在那个核工厂里待着，生活实在是太乏味了，于是就答应了多诺万的邀请。从那以后，多诺万经常开车来请哈利姆出去吃饭。有时还陪他去酒吧、电影院或

者是一些娱乐场所，而且出手很是阔绰，从来不要哈利姆埋单。这些日子反正妻子也不在家，回到家里也很寂寞，只要是多诺万邀请，哈利姆从来是来者不拒。渐渐地，他们成了好朋友。

一天，多诺万又给哈利姆打电话，约他去卡巴莱餐厅共进晚餐。在那充满浪漫情调的小包厢里，他们一边品尝着正宗的法国白兰地，一边欣赏着美妙的音乐。这时，多诺万举着酒杯，兴冲冲地对哈利姆说：“朋友，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最近我可找到了一笔来钱的生意。”

“什么来钱的生意？”哈利姆似乎也很兴奋。

“我打算搞一批半新不旧的集装箱卖到非洲去。那里住房短缺，这批集装箱可改做简易房屋。”

“到哪里去搞集装箱？”哈利姆出于好奇问道。

“下周末我要去土伦，已同那里的人接洽好了。要是你有空闲的话，不妨陪我跑一趟，反正路不远，星期日就可回巴黎。事成以后自然还得酬谢你。你就在路上跟我做个伴吧。行不行？”多诺万说道。

“买卖这玩意儿，我可不在行。”哈利姆推托着。

多诺万说：“我不是要你去帮我做买卖，是跟我做伴，管你在行不在行。”

在多诺万的怂恿下，哈利姆终于动了心，同多诺

万去了土伦。回来之后多诺万真的给了他1000美元的酬金，让哈利姆尝到了甜头。为了祝贺这次生意成功，多诺万又邀请哈利姆共进晚餐。多诺万在圣·多尼克第32街的豪华饭店包了房间，并且叫了一名年轻美貌的应召女郎作陪。于是三个人就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渐入佳境之时，多诺万对哈利姆说：“今晚我还有点急事要赶回去处理，就让这位小姐陪你吧。房间我已经订好了，所有的费用我都结清了，你就只管快活吧！”说完，多诺万就开着车子走了。哈利姆趁着酒兴真的同那位小姐快活去了。哈利姆哪里知道摩萨德特工已经在房间里做了手脚，把哈利姆与应召女郎寻欢作乐的过程偷偷拍摄了下来。不过摩萨德并不是想利用这些色情照片讹诈哈利姆，而是以此考察哈利姆对此事的反应和心理承受能力。

两天以后，多诺万又开着车子找哈利姆来了，不过这一次他并不是满脸春风，而是满脸愁云。哈利姆一见，就关切地问他：“遇上什么不称心的事了？”

多诺万说，他同德国一家公司做了一笔医用放射性气动管的生意，虽然可以赚一大笔钱，但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买卖，他本人不懂行，对方向他推荐一位英国科学家来检验产品的质量。他担心这位英国科学家会与这家德国公司串通一气来捉弄自己，所以他

正举棋不定，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或许我可以帮你的忙。”哈利姆不假思索地说。

“你？开什么玩笑，朋友？我需要的是真正的科学家，只有是搞这一行的才能帮上我的忙。你怎么能帮我呢？”多诺万明知对方中圈套了，仍不露声色。

“我就是这方面的科学家。”哈利姆一本正经地说。

“什么？你不是伊拉克进修生吗？”多诺万装作吃惊地问道。

“很抱歉，朋友。以前我只能这么对你说。实际上，我是伊拉克政府派到这里来从事核反应堆项目的专家……”哈利姆终于说了真话。

“那太好了！”多诺万故作惊奇，顿时舒眉展眼地说，“早知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还犯什么愁。这个周末我打算在阿姆斯特丹同那帮人见面。我先动身去那里做些准备工作，星期六早上我会派我的私人飞机来接你。”

星期六清晨，一架从以色列方向飞来的小型喷气式飞机把哈利姆接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这架飞机涂着多诺万公司的标记。一到机场，多诺万亲自驾驶一辆豪华型轿车，把哈利姆接到当地一名富裕的犹太承包商家里。摩萨德特工伊特斯克和装扮成德国商人

的以色列核技术专家本杰明·戈德斯坦等人早已在那里恭候。戈德斯坦从皮包里取出放射性气动管，请哈利姆检查。过了一会儿，多诺万和伊特斯克等人借故离开说要去另一房间进行价格谈判。室内只剩下戈德斯坦和哈利姆两人，他们在详谈技术性问题。戈德斯坦对哈利姆的核专业知识推崇备至，大加恭维。哈利姆更飘飘然起来，把自己的真实工作告诉了戈德斯坦。

阿姆斯特丹的夜景是那樣的令人陶醉。戈德斯坦和伊特斯克在一家环境幽雅的餐厅宴请多诺万和哈利姆。多诺万借口自己另有约会出去了，剩下戈德斯坦和伊特斯克两人陪着哈利姆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们两个人一唱一和，诡秘地向哈利姆勾画着一项伟大的计划。

戈德斯坦说：“朋友，我们打算向第三世界出售核电厂，这完全是为了和平目的。你介绍的伊拉克核反应堆项目，正好为我们树立了样板。要是你能给我们指点一下，无论对你还是对我们都能得到很大好处。”

伊特斯克又接着说：“伙计，这个秘密只限于你和我俩之间。作为生意人，我们不想肥肉落入他人口，让多诺万染指这笔交易。事成后，我们会加倍酬谢你的。至于你的好朋友多诺万与我们做的这笔买卖，目前还是按原来合同进行，你俩仍是好朋友。”

哈利姆开始还有些犹豫，可是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最后还是答应了他们。

第二天，又是那架小型喷气式飞机把哈利姆送回了巴黎。多诺万因这笔交易又给了哈利姆8000美元报酬，同时告诉对方，自己另有一桩买卖要去英国，并留下自己在伦敦的电话号码。

哈利姆回巴黎的两天后，伊特斯克和他的同伴也尾随到了巴黎。他们要哈利姆为他们提供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施工图纸、反应堆的位置和施工进程的详细资料。他们交给哈利姆一些特殊纸张，让他把这些纸放在有关图片资料上面，过几个小时，便会不露痕迹地把图片资料复印下来。

哈利姆完全满足了伊特斯克的要求，同时也得到了巨额的报酬。但是此时哈利姆却开始恐慌起来，担心自己万一失手露了马脚，会被伊拉克安全部门抓住把柄，自己性命难保。哈利姆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多诺万，于是就打电话向远在伦敦的多诺万求救，他说：“我遇到了麻烦事，需要你的帮助。许多事情电话里也不便多说。你早点回来好吗？”

“别着急，我过两天就可以回巴黎了。我们在圣·多米尼克第六街饭店的包房里见面吧。”多诺万安慰他说。

几天以后，多诺万果然回来了。一见面，哈利姆就用近乎哭泣的声音，把在阿姆斯特丹与伊特斯克达成的秘密交易，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和盘托出，请求多诺万原谅他，承认自己财迷心窍，受骗上当了。多诺万表现出一种宽宏大量的态度说：“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我没有任何想法。”

紧接着，多诺万又神情严峻地说：“你说的是德国人吗？这些德国人会不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来的？”

一听到“中央情报局”几个字，哈利姆顿时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十分恐怖地说：“那怎么办！我已经把知道的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他们，可是他们却没完没了，还要向我索取新的东西，你说我该怎么办？”

“让我帮你再想想办法吧。”多诺万安慰他说，“反正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再说，你也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了钱而出卖情报的人。我在巴黎有一些朋友会帮你把这件事摆平，不会让他们再来找你的麻烦的。好啦，还是让我们先轻松一下吧！”

那天晚上，多诺万又请哈利姆吃饭，酒醉饭饱后又为他请了一位迷人的应召女郎。他对哈利姆说：“朋友，她会让你安静的，好好享受吧！”

几天以后，多诺万又找到了哈利姆，对他说：“朋友，我的猜测没有错，那几个德国商人的确是美国中

央情报局的人。”

哈利姆一听就慌了神，他几乎是哭着说：“他们会吊死我的啊！”

多诺万说：“不会的。我已经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说只要你再提供一些情报给他们，就不再找你了。”

“所有的东西我都告诉了他们，他们还要我提供什么情报？”哈利姆茫然不知所措。

“他们想知道伊拉克是如何用那种什么焦糖代替什么浓缩铀的。”多诺万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哈利姆看。“反正我也说不清楚，他们都写在这里，你自己看吧。他们说了，只要你把这个告诉了他们，他们就不再找你的麻烦了。”

沉思片刻，哈利姆终于毫无保留地说：“这个倒不难搞清楚。伊拉克急需浓缩铀和有关设备，近日将派一位埃及籍的核物理学家叶海亚·米沙德前来巴黎，代表伊拉克方面验收有关项目的完成情况。”

“你将同米沙德见面吗？”多诺万问道。

“当然会同他见面。他要找在这里的每一位伊拉克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谈话。”哈利姆说。

“那就好。只要你把这个情报搞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麻烦了。”

哈利姆放心了。随后他又把法国提供给伊拉克的

那套核设备从法国装运到伊拉克的日程安排告诉了多诺万，多诺万对他保证说：“有了这个日程安排表，你就再也不用担心那些中央情报局的人来找你了。”

哈利姆的妻子萨米拉终于从伊拉克回到了巴黎，她发现自己离开的这些日子，丈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大方潇洒，衣着也更加整洁讲究了，就觉得有点奇怪。哈利姆的解释是，自己又涨了工资，现在有钱了。看到萨米拉对自己的话将信将疑，哈利姆就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妻子。萨米拉一听就对他说：“你以为那些德国商人真的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吗？”

哈利姆说：“多诺万说是中央情报局的。”

萨米拉火了，她大声说：“你也不好好想想，美国中央情报局想了解这些干吗？那些人肯定是以色列的情报人员。”

哈利姆一下了惊呆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是以色列人？”

萨米拉说：“我凭一个女人的直觉。除了以色列人和我这个傻女人之外，还有谁愿意自找麻烦和你啰唆呢？”

女人的直觉有时的确是很准的。萨米拉的确没有猜错。

摩萨德特工多诺万得到启运的时间表后，马上向摩萨德总部报告。霍菲立即制定了一个代号为“空运行动”的计划，决定要赶在伊拉克人前面，把这套核反应堆的主要部件在法国炸掉。他把具体爆炸地点定在法国土伦市南部7公里处的塞恩小镇。

一声爆炸价值9000万法郎

1979年4月4日，3名摩萨德特工手持假护照潜入了塞恩镇。这3名特工都是训练有素的高手，其中两位是技术高明的机械师，一位是爆破专家。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与前期潜伏的4名特工接上头，完成“空运行动”。

塞恩镇濒临地中海，是一个只有几万人的小镇，那里既没有供游人嬉戏的沙滩，也没有雄伟壮观的古城堡，连整洁舒适的小酒店也难见到。偶尔有几个旅游者来到这里，都不禁大呼上当。不过，塞恩镇虽然不是旅游胜地，却是法国的一个工业重镇。这里最大的一家工厂是地中海海军造船厂。该厂制造的军舰60%是出口国外，那套为伊拉克人生产的核设施就是由这家造船厂制造的。由于塞恩镇地处偏僻，又没有什么游客光顾，所以造船厂内的安全保卫工作并不怎

么严格，这就给了摩萨德特工以可乘之机。

也就是在3名摩萨德特工潜入塞恩镇的当天，地中海海军造船厂的老板在一家私人运输公司预订了几辆大卡车，说是要将一批货物运走。至于是什么货物，却没有透露。但是，潜伏在该厂的一名摩萨德特工却打听到了这个消息，知道这批货物就是为伊拉克核反应堆制造的部分构件。厂方将于4月8日晚上把这些构件装上卡车，然后沿着N559号高速公路运往马赛港，再在马赛港用一艘货轮把它们运往伊拉克。

那3名摩萨德特工和早期潜伏在塞恩镇的4名特工接上头以后，就化装成一般的游客来到地中海海军造船厂进行观察。他们在厂门口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就进入了厂区。7名摩萨德特工进入厂区后就分散开来活动，几乎走遍了工厂的每一个角落。根据潜伏在厂里的内线提供的情报，他们注意到了那3个涂成红、白、蓝3种颜色大工棚，记下了它们的准确位置。据说那些构件就在那3个大工棚里。他们又牢牢地记住了几架大吊车的位置，并仔细打量了一下厂区四周大约两米高的围墙。回到住处后，他们凭记忆画出了一张造船厂的平面图，并且标出了每一个进出口的位置和距离。他们准备就在厂区把那些构件炸掉，不让它们上车。

4月6日凌晨两点左右，7名摩萨德特工开着一辆大

卡车，悄悄地来到造船厂的围墙外。工厂的大门口虽然有哨兵在巡逻，但是他们知道，那些哨兵这时是绝对不会到这里来，只有在刚刚换岗的时候，他们才会例行公事地到厂区来转一圈。车子停下来后，留下4个人在车上望风，另外3个人就直接爬上围墙，迅速地翻了过去。他们一个个像猫一样悄悄地直奔那3个红、白、蓝色的工棚，用那位内线提供的钥匙，顺利地打开了那扇坚固无比的大铁门，然后破坏了工棚内的报警装置。

根据内线提供的内部平面图，他们对这里已经了如指掌，马上就找到了那些为伊拉克生产的构件。在这些构件旁边，还有一套同样的核反应堆构件，那是为比利时的一座核装置生产的。不过那3名特工连碰也没有碰一下，就跑去揭开了覆盖在伊拉克核反应堆构件上的帆布，准备卸下其中一个被称作“蜂房”的关键部件，把它运到自己的国家去。因为这种“蜂房”很复杂也很值钱。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3个人在悄无声息地工作着，不知不觉已经过了40多分钟。这时他们听到了几声猫叫——这是外面望风的特工发来的信号，告诉他们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轮换岗的哨兵就要到了，要他们赶快离开。这3个特工互相对视了一下，摇

了摇头，不得不放弃拆除那个“蜂房”的计划。这套设备太复杂了，在下一轮哨兵换岗之前，他们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把它拆除并且运到围墙外面的卡车上。于是3名特工只好忍痛割爱，动作娴熟地在这些构件上安装好炸药，接上定时引信，然后快速地撤出工棚，顺着原路翻过围墙，跳上了那辆卡车，瞬间就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之中。

等到下一轮哨兵刚刚换岗，正要到厂区巡逻时，厂区内突然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火光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哨兵立即鸣枪报警，消防车风驰电掣地一路鸣着警笛开了过来。随后那些核专家们也匆匆地赶来了。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那套庞大的核反应堆构件已经成了一堆滚烫的废铁。事后查明，这次爆炸事件造成的损失高达9000万法郎。

让那些法国工程师和伊拉克专家感到惊讶的是，实施爆炸的人也实在是太高明了，炸药的剂量计算得竟然那样精确，那套准备运往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的构件全部被炸毁了，但是那套近在咫尺的比利时的核装置却毫发未损，只是在那些包裹的帆布篷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灰烬。而警方在爆炸现场竟然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侦破线索，这又让他们惊叹不已。

土伦市警方也为此感到困惑，对这次爆炸事件不

知该从哪里下手进行侦破。然而就在当天上午，土伦市警察局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自称是“法国自然生态保护组织”的发言人在电话里说，这次行动是他们干的。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生态平衡，遏止那些核设施的滥用。但是令警方感到蹊跷的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法国有这么一个组织。于是调查工作还是无法开展。

不过，此时却有一个人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件事肯定同以色列人有关——这个人就是伊拉克核专家哈利姆的妻子萨米拉。当天晚上哈利姆回到家里后，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他的妻子就对他说：“看到报纸了吗？我想这一定是你的那些犹太朋友干的好事。你说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哈利姆只是说了一句话：“我也不知道。可是你凭什么说是犹太人干的？”

萨米拉冷笑了一声：“哼，请你不要忽视了女人的直觉。”

哈利姆说：“你以为你真是个巫婆吗？”说着他马上拿起电话，给他的好朋友多诺万打电话。哈利姆在电话里小声地说：“这太可怕了，朋友！你说是不是犹太人干的？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他的朋友多诺万却在电话里笑着说：“伙计，你不

要太紧张了，你该干吗还干吗知道吗？要不明天我带你去个好地方，让你快活一下好不好……”

没有等多诺万说完，哈利姆就搁下了电话。他知道不能再同那个多诺万去快活了。不久，哈利姆就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他的妻子不得不提出申请，带着哈利姆回伊拉克治病去了。

彻底摧毁核反应堆

塞恩镇的爆炸事件让萨达姆·侯赛因暴跳如雷，又进一步向法国施加压力。他不相信伊拉克的石油和美元就不能让法国人动心。果然不出萨达姆所料，就在特拉维夫为摩萨德的出色行动感到高兴时，1980年3月，法国政府突然宣布，法国将信守它与伊拉克达成的协议，继续向伊拉克出售浓缩铀，并答应在1981年年底之前，完成向巴格达提供一座70兆瓦的核反应堆计划，同时在巴黎为伊拉克培训600名核工程技术人员。

伊拉克人的核反应堆建设又开始运转起来，整个工程都是在一位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核专家——就是哈利姆所说的那位埃及籍的核物理学家叶海亚·米沙德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据一些专家估计，伊拉克人最迟

在1984年就有可能制造出原子弹来。伊拉克的核威胁再次让以色列领导人深感不安。贝京总理要求摩萨德立即拿出办法来，再次阻止伊拉克人的核计划进程。

该用什么办法遏止伊拉克人的核计划呢？霍菲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那个叶海亚·米沙德闭嘴。那么，怎么能让他闭嘴呢？

就在霍菲千方百计寻找机会的时候，伊拉克人帮了摩萨德一个大忙——作为伊拉克派出的全权代表，米沙德将前往巴黎验收核项目完成情况。摩萨德通过拦截法国和伊拉克的通话信息，掌握了米沙德在法国期间的日程安排，并且得知米沙德在巴黎期间将住在巴黎子午饭店9041房间。摩萨德得到这一情报后，马上就在巴黎雇用了一名妓女接近米沙德，寻找机会对他下手。

米沙德果然来到了巴黎。6月7日，他在巴黎视察了萨塞勒核工厂，事后他高兴地对在场的法国科学家说：“我们将要改变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此语一出，震惊四座，也让摩萨德更加坚定了要干掉他的决心。

1980年6月13日夜里，米沙德死在巴黎古维翁圣西尔大街的子午旅馆。第二天下午巴黎警方在9041房间发现了他那具浸泡在血水之中的尸体。警方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名叫“马格尔”的妓女，但她却坚称自己当

晚离开米沙德房间时，米沙德还是好好的，只是情绪有点不大好。当巴黎警方正要作进一步调查时，马格尔却在6月15日夜晚突然被一辆急驰的汽车撞倒，肇事汽车逃之夭夭，不知去向。马格尔倒在巴黎街头，死于非命。

巴黎警方的档案里，又多了一件无头案。

伊拉克核专家米沙德的死，立即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名科学家在以色列电台节目中甚至幸灾乐祸地说：米沙德之死，至少使得伊拉克的核计划推迟两年的时间。

实际上，发生在土伦市塞恩镇的爆炸案和发生在巴黎的那起谋杀案，不过是摩萨德为阻止伊拉克核计划所采取的两次小行动。只要伊拉克一天不放弃核计划，以色列就不敢高枕无忧。果不其然，1980年8月，摩萨德得到一个让以色列震惊的情报，伊拉克又为核计划找到了新的负责人，整个核计划不但进展顺利，而且进展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人们的想象。不仅如此，更要命的是，当时德国的一家努克姆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向加拿大订购了11350公斤铀矿石，并且打算偷偷转售给伊拉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不用两年的时间，伊拉克就会成功地制造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颗原子弹。

贝京总理立刻命令摩萨德想办法阻止这笔交易。摩萨德与加拿大情报部门进行了联系，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协助。加拿大政府得到以色列方面的暗示后，很快作出反应，最终以“收货人不详”为理由，撤销了同德国签订的这份合同。与德国的生意虽然没有做成，但是此时法国却已经全面履行了同伊拉克签订的合同义务，巴西也开始向伊拉克提供浓缩铀，意大利又在为伊拉克提供核工程的“热室”设备——这一连串的情报让以色列人不知所措。

贝京总理只好向美国求助。他在一份报告中向时任美国总统的卡特坦诚地表示，现在只有请美国出面施加压力，采取行动阻止伊拉克的核发展计划；否则萨达姆·侯赛因一旦有了原子弹，他将会成为第二个希特勒，犹太人将会遭到第二次大屠杀。卡特总统看完贝京的报告后，当时也同意为以色列人做点事，就与巴格达方面进行谈判。但是伊拉克人却矢口否认，说自己并不是要制造原子弹，完全是和平利用核能源，这纯粹是捕风捉影，嫁祸于人。结果美伊谈判陷入僵局。

山穷水尽之时，以色列上层及情报部门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只有使出最后一招，那就是轰炸伊拉克的核反应堆。贝京总理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摩萨德首脑伊

扎克·霍菲将军和以色列空军司令戴维·艾弗里将军。贝京明确表示，为了以色列的安全和犹太人的生存权利，必须彻底摧毁伊拉克的核设施。但有个原则，袭击的对象仅限于伊拉克核设施本身，不得攻击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伊拉克目标。贝京总理对以色列空军司令艾弗里说：“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国援建人员和周围平民的伤亡。就像动手术，既要摘除毒瘤，又要避免大出血。”

接着，贝京总理又对霍菲说：“空中打击前的情报工作一定要准确。否则空军就会盲目行动。”

接到贝京总理新的指示后，霍菲立即指挥手下人员忙碌起来。

对伊拉克核设施的空中打击日期原本定在1981年4月底，不料当时以色列的一家报纸却披露了一条消息，说埃泽尔·魏茨曼向朋友披露，贝京正准备进行一起大选前的冒险行动。后来，佩雷斯也规劝贝京放弃打击伊拉克的念头。于是空中打击的时间一再拖延。1981年6月30日，以色列即将举行大选，国内形势一塌糊涂，为了在迫在眉睫的大选中捞取选票，贝京再也等不及了——他认为必须在大选前对伊拉克核设施进行毁灭性打击，这样做既可以毁掉伊拉克核设施，消除以色列的心头之患，又可以向阿拉伯国家炫耀武

力，提高以色列在黎巴嫩导弹危机中讨价还价的地
位。

1981年6月7日是星期日。贝京总理在耶路撒冷的
官邸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宣布要对伊拉克的核反应堆
采取军事行动，内阁部长们点头同意了贝京总理的决
定。实际上，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

为了完美地完成摧毁伊拉克的核反应堆的任务，
贝京挑选了24名第一流飞行员组成突击队，由参加过
三次阿以战争的空军上校巴哈里担任指挥员。在绝密
的情况下，艾弗里将军指示空军依据摩萨德所提供的
精确情报，在西奈齐埃拉翁空军基地建造一个与“塔穆
兹1号”核反应堆大小一样的模型，以便进行高精度轰
炸演习。此次行动代号为“巴比伦行动”。

6月7日下午，以色列8架F16和6架F15飞机在齐
埃拉翁空军基地做好起飞准备，一字排列在跑道尽
头。为了掩人耳目，这14架飞机的垂直尾翼上，全部
漆成了约旦空军黑白灰三色军旗。耶路撒冷时间下午4
时，早已潜入伊拉克的摩萨德特工，从巴格达发来了一
份“一切正常”的密码电报。于是以色列各海、空军
基地，各战区司令部，摩萨德驻海外各情报站，担任
空袭任务的空军第二飞行大队，同时接到了空军司令
艾弗里将军下达的命令。14架世界最先进的喷气战斗

机的28台涡轮发动机同时发动，整个机场立时被震耳欲聋的巨响所笼罩，机尾喷射出的强烈气流使机场飞沙走石。

作为第一梯队，6架外挂导弹和副油箱的担任战斗掩护的F15战斗机起飞了。接下来，8架各载着一枚900公斤激光制导穿甲爆破弹的F16战斗轰炸机起飞了。最后，满载高辛烷航空油的大型空中加油飞机也升空了。

8架F16战斗轰炸机升空之后，保持着严整的攻击队形，紧贴着近千公里的以伊边界线南侧低空飞行，飞了大约一半路程后再向北飞行。距离巴格达东南塔穆兹研究中心的伊拉克核反应堆还不到400公里时，一支精干的地面特别爆破小组开始秘密向飞机所要轰炸的目标靠近。万一飞机轰炸未能彻底摧毁目标，那么剩下的活儿将由他们趁乱进行。

巴哈里上校率领这支可怕的战争机器，将从沙特阿拉伯与西奈半岛分开的亚喀巴湾的最北端，沿着约旦—沙特的曲折边界，向沙特与伊拉克边界方向接近。由于实行全航程无线电静默，耳机里，只有在机群左侧2000米上空飞行的电子干扰机发出的滋滋的电流声。它那功率强大的电子吊舱中发出的有源干扰信号，将会使叙利亚和约旦所有的苏制雷达出现迟钝。

此刻，它们的雷达即使对准了以色列机群，显示屏上所看到的也仅是一块带电的高空积雨云。

但是，巴哈里知道，这些电子干扰只能蒙蔽约旦和叙利亚的雷达，而对于引进了美国最先进雷达监测系统的沙特则无济于事。果然，不久就在国际通用的应答频道上，出现了沙特空中管制官员的英语询问。

“约旦空军。例行训练。”早有准备的巴哈里用流利的英语答道。

沙特空中管制官员显然信以为真。沙特和约旦两国素来友好，军用飞机互入国境也是常有的事情。当巴哈里确认沙特已不再注意他们时，便用“黄沙丘”这句暗语，向总部发出了表示“飞行顺利”的密电。

机群编队飞过沙特的图赖夫市上空后不久，前方将到达沙特与伊朗边境。巴哈里驾机飞行在全队最前面，只见他一推操纵杆，飞机突然急速下降，整个机群紧随其后骤然降低高度，进入伊拉克雷达盲区，紧贴着近千公里长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边界南侧低空飞行。

他们沿沙伊边界飞行大约一半路程后，再次降低高度折转向北。随后以60米左右的超低飞行，进入伊拉克领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躲开伊拉克雷达，避开致命的苏制萨姆地对空导弹的攻击。

当攻击机群接近目标的时候，三名摩萨德特工也正在一个隐蔽的制高点上，通过高倍望远镜，监视着伊拉克核反应堆周围的一切。特拉维夫收到的“一切正常”的密码电报正是由他们发出的。

经过千里奔袭的以色列轰炸机群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尽管核设施进行了精心伪装，但以色列飞行员凭借着准确的情报，一眼便认出了那个长32米、宽25米的大工棚，“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就在里面。这个核反应堆三面被土质的马蹄型掩体包围，并有高射炮和地对空导弹保护。

直到这时，伊拉克防空部队才发现敌情，并首先用高射炮发起攻击。以色列的6架F15歼击机首先拉起，在目标和最近的伊拉克空军基地之间的空域执行警戒任务。而8架F16轰炸机群则迅速爬升，爬高到大约6100米，迅速进入轰炸航路，自西向东地用俯冲姿态进入目标区投弹轰炸。



以色列空袭伊拉克核反应堆

第一枚炸弹是由巴哈里上校驾驶的飞机投下的。这枚高爆激光制导的炸弹，从距反应堆体550 米的高空飞速落下。由于重力加速度产生的巨大动能，使炸弹垂直贯穿了反应堆体顶端数米厚的水泥隔层，引起了反应堆内部的猛烈爆炸。被炸开的缺口，扩大了对

反应堆核心部位的破坏效果。其余的7架F16战斗轰炸机紧随队长之后，依次飞过轰炸带，将全部炸弹准确地投向了地面目标。“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已被完全炸毁，一个秘密的地下研究室也被高爆炸弹摧毁殆尽，另外两座建筑物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名法国青年科学家被当场炸死。整个空袭过程用了还不到2分钟。

与此同时，伊拉克防空火炮猛烈还击，苏制6管速射高炮的串串火舌，在空中交织成数道弹幕。硝烟和横飞的弹片充斥着半边天空，但是都没有命中以色列的飞机。

晚上7点左右，夜幕徐徐降落在耶路撒冷，参战飞机全部安全返回以色列。整个空袭行动完美无缺。正在斯莫伦斯路总理私宅等待消息的贝京和他的内阁部长们接到空军司令艾弗里将军打来的电话：“任务完成，所有飞机安全返回。”

6月8日早晨，摩萨德首脑霍菲将军将一叠照片送到了贝京总理的办公室。他兴奋地说，这是昨天空袭行动的战果验收，刚刚由美国最尖端的KH-11卫星实时传输系统发来。“整个行动十分成功。”霍菲不动声色地向贝京总理汇报。

“巴比伦行动”为利库德集团赢得了宝贵的选票。1981年7月5日，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第十届议会大

选中赢得胜利，贝京连任总理。

当以色列人在庆祝自己的胜利的时候，在巴格达的伊拉克“复兴社会党”总部，政治局委员愤怒地向军队提出质问：“我们的飞机、导弹干什么去了？这是情报部门的严重失职！”

伊拉克将军们个个垂头丧气，无言以对。

虽然华盛顿事先没有同意这次行动，但当伊拉克人的核“巴比伦塔”被夷为平地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却均未作出过于强烈的反应。或许它们对于意大利、法国帮助伊拉克建设核反应堆早就暗中感到担忧，现在借以色列人之手除去这一隐患，反倒可以放心了。空袭发生之后，法国新当选的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以这次袭击为借口，减少了同伊拉克的合作。法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帮助伊拉克重新建造被以色列摧毁了的核反应堆。伊拉克拥有原子弹的计划从此成了一种神话。

摧毁了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以后，以色列终于又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它依然是中东地区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军事超级大国。

第十五章 “摩西行动”结硕果 杰哈德惨遭暗算

摩萨德新局长被认为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但“摩西行动”却让人刮目相看，8万多来自世界各国的犹太人重新融入以色列的生活之中；摩萨德特工前往1500英里之外的突尼斯成功暗杀了“巴解”组织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杰哈德，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一次领教了它的厉害。

局长下台

霍菲在摩萨德局长任期内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与黎巴嫩“长枪党”建立起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又是他推行“外围战略”的结果。

黎巴嫩虽然是以色列北面的邻国，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却在黎巴嫩南部建立起了一个军事基地，用以色列的话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国中之国”。“巴解”组织对以军的炮击和对以色列边境的骚扰令以色列极为恼火，于是，以色列就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针。

黎巴嫩是中东各国中唯一不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国家，因为该国只有51%的人信仰伊斯兰教，而49%的人信仰基督教。黎巴嫩的穆斯林及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与基督教派之间长期处于对峙的状态。于是，为共同对付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两家情报机构摩萨德和阿曼自1974年起，就与黎巴嫩最大的基督教民兵组织——“长枪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81年，贝京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后，命令霍菲扩大并加强同“长枪党”的联系，而作为以色列国防部长的沙龙则走得更远，一直策划着与“长枪党”联手，试图将聚集在黎巴嫩境内的“巴解”组织一举歼灭。以色列陆军和空军也摩拳擦掌，期待着采取报复行动。

摩萨德最初反对军事冒险行动，认为这将导致以色列军队直接面对驻扎在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但沙龙坚持认为，这一行动将会改变历史的进程。令人奇怪的是，一直同沙龙唱反调的霍菲局长，最后竟

然同意了沙龙的观点。

1982年6月3日，以色列驻伦敦大使在出席一次外交宴会后，遭到巴勒斯坦人的伏击，成了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为沙龙的入侵提供了借口。6月6日，以色列军队越过边境，大规模入侵黎巴嫩。这完全是一次战争行动，但以色列军方却为之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加加利和平行动”。战争并没有像沙龙事先保证的那样，以“闪电战”一举解决问题，而是遭到了“巴解”组织战士和黎巴嫩穆斯林的顽强抵抗，“闪电战”的梦想化为了长达数月的消耗战。

尽管在以色列军队和美国人的扶持下，贝希尔·杰马耶勒登上了黎巴嫩总统的宝座，但三个星期后，新总统就被一枚高爆炸弹炸死了。杰马耶勒之死，宣告了“加加利和平行动”的彻底失败。

霍菲在1974年至1982年连任两届摩萨德局长，成为在这个位置上任职时间仅次于哈雷尔的人。他本可以凭借着成功的“和平外交”及“霹雳行动”等骄人成绩全身而退，结果却因赞同“加加利和平行动”而破坏了自己完美的形象，从而在1982年下台，导致摩萨德又一次权力更迭，内厄姆·艾德莫尼取而代之，成为摩萨德的第六任局长。

“摩西行动”

内厄姆·艾德莫尼是从摩萨德内部产生出来的第一位局长。摩萨德内部人员似乎更了解他，认为他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一位“普通的人”，一个“当官的”。尽管艾德莫尼可能属于那种没有活力的官僚，但其优点是办事谨慎，且有恒心。53岁的艾德莫尼经过多年的奋斗，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从最底层一级级升上来的。

1929年，内厄姆·艾德莫尼出生在耶路撒冷。几年后，他的父母从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并将“罗特鲍姆”这个姓改成了“艾德莫尼”。他父亲是耶路撒冷公园的设计师，因此艾德莫尼一家得以住在离豪华的戴维国王旅馆不远的雷哈维亚高级住宅区。实际上，以色列政府中的不少官员、一些大学教授和军官都是来自雷哈维亚住宅区。

少年时代，内厄姆·艾德莫尼就在“哈加纳”及其情报机构“沙伊”中工作。1948年的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艾德莫尼考入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专攻国际关系专业。他在那里半工半读，曾在一家犹太人办的学校工作过，并在一家犹太教堂当过看管人，还在一家为美国军队生产军装的工厂干过活。

在加利福尼亚，艾德莫尼遇见了一个让他一见钟情的女孩，并且很快就和她谈婚论嫁。他们在西海岸的5年婚姻生活，应该是他们一生当中最愉快的时光。这也是艾德莫尼在他的前半生能够摆脱秘密战争压力的唯一一段时光。

艾德莫尼之所以选读国际关系专业，是想当一名外交官。但当他回到以色列后，却在位于耶路撒冷的情报专科学校当上了教官。不久，摩萨德从教官队伍中招聘特工，艾德莫尼被选中了，从此成为摩萨德总部政治联络处的情报官。艾德莫尼多次被派驻摩萨德在世界各地的情报站，曾在摩萨德驻华盛顿和埃塞俄比亚等情报站工作过。他在国外情报站一干就是30年，曾参与了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的多项合作工程，成为以色列从事兼职外交活动的专家。

艾德莫尼多年来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使得他在具体的秘密行动方面缺乏实际经验。他不是一个冒险家，也不是一个杀手，但是他工作踏实，非常勤奋，因而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艾德莫尼尽管性格内向，但并不窝囊。在他任摩萨德局长期间，摩萨德同样干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摩萨德曾协助以色列政府成

功地策划和实施了一项称为“摩西行动”的移民计划，将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一万多名犹太人偷偷地空运回以色列。这让艾德莫尼和摩萨德在犹太民族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不过，“摩西行动”真正的发起者，应该是以色列前总理贝京。

1977年，在贝京的支持下，以色列政府开始推行一项浩大的移民工程——“摩西行动”，准备把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几万犹太人运送回以色列。时任摩萨德局长的霍菲是“摩西行动”的最大支持者和协助者。

犹太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而阿拉伯半岛又是一个战乱不断的地方。当年为了逃避战乱，犹太人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据《圣经》记载，远古时代，犹太人就是在他们的祖先摩西的率领下，逃出埃及，来到“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巴勒斯坦地区，并且曾经在这里建立过自己的以色列国。这就是两千多年前的犹太人的“摩西行动”。

在后来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一次又一次的战乱让犹太民族开始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涯。他们远离自己的故土和家园，散居在世界各地。但是，对故国的向往却是他们永远的情结，所以才有了现在的以色列。

列国。以色列国是一个由离散的犹太人组成的大家庭。如果没有全世界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思念和向往，也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以色列国了。建国后，以色列政府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吸引和帮助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把那些处于苦难之中的犹太人解救出来，让他们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祖国。

不过，犹太人的回国之路都是艰难曲折的。有一部分人是通过以色列移民联络局的帮助，从合法的途径回到以色列的。但是，有大多数犹太人却没有那么幸运。如果那些远离祖国的犹太人是生活在同以色列没有任何关系的国家，甚至是以色列的敌对国家，那么，他们的回国之旅就遥远而又漫长。这时，作为以色列国家特殊工具的摩萨德就会挺身而出，为他们铺就一条回国之路。

当年，有一群皮肤黧黑的犹太人远离祖国，居住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他们被当地人轻蔑地称为“法拉沙人”——意思就是“陌生人”或者是“被放逐者”。但是，他们却称自己为“贝塔以色列”，也就是“以色列之家”的意思。他们的祖先离开以色列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过去曾经有人认为，这些人就是古代遗失的12个犹太部落的后裔。但更多的人类学者却认为，他们应该是古犹太人迁徙同化后的当地部落。

这些人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同犹太民族的主流社会分离了，直到今天，这些人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犹太人不一样，他们仍然还保留着犹太民族的一些古老传统和习俗。当时他们居住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一个山区，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部落，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因为时间的迁移，加上地域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影响，这些犹太人的后代已经在这片远离故土的非洲大陆改变了他们的肤色，变成了黑人。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是犹太人的后裔，并没有忘记自己祖先居住的阿拉伯半岛，他们也想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回到祖先的居住地以色列。他们也想看一看那神圣的耶路撒冷，看一看那高高的赫茨山，摸一摸那堵让他们朝思暮想的哭墙。因为他们在埃塞俄比亚永远是一种没有家园的“陌生人”。

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埃塞俄比亚当局还禁止在“法拉沙人”当中传播犹太教和教授希伯来语，并指责一些“法拉沙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间谍。许多犹太教领袖也经常受到骚扰并遭政府监视。同时，那些“法拉沙人”的经济状况极端恶化。许多人生活在干旱、饥荒和战乱中。他们的遭遇引起了以色列国内的极大关注。以色列政府希望能帮助他们离开埃塞俄比亚那贫穷的山区，回到以色列。那些犹太人也知道，

如果没有以色列政府的帮助，他们的回家之路永远遥遥无期。于是，他们就在艰难地等待，等待机会的降临，等待万能的上帝能赐给他们一条回家的路。

机会终于来临了——1974年，埃塞俄比亚又一次发生了军事政变，海尔·塞拉西皇帝在统治埃塞俄比亚几十年之后，终于被赶下了台。一个叫门格图斯的陆军上校组织的军人政府上台了。但是，西方国家却认为门格图斯上校是一个共产主义分子，不应该成为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对埃塞俄比亚进行制裁。

就在刚上台的门格图斯上校一筹莫展之时，以色列政府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同埃塞俄比亚的新政权进行谈判。以色列政府打算为门格图斯的新政府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条件是允许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犹太人离境回到以色列。

门格图斯出于对武器的需求，就答应了以色列人的条件。于是，这些犹太人终于有机会踏上回家的漫漫征途。1978年2月，就有两批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犹太人，先后从埃塞俄比亚的首都起航，直接飞到了以色列，回到了他们梦寐不忘的祖国——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埃塞俄比亚和以色列两国之间秘密进行的。

然而，就在以色列政府的移民行动开始不久，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摩西·达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不小心透露了这个秘密。他说埃塞俄比亚政府之所以允许以色列人回国，是因为以色列正在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达扬此言一出，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些正在对埃塞俄比亚制裁的西方国家一方面谴责以色列，另一方面对埃塞俄比亚实行了更加严厉的制裁，并且在埃塞俄比亚煽动对现政府的不满情绪，鼓动民众推翻刚刚上台的门格图斯政权，把门格图斯赶下台。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埃塞俄比亚政府立刻中止了同以色列人的秘密交易，切断了犹太人出境的通道，甚至限制了一些犹太人的人身自由，让他们的回家之路成了永远的梦。

达扬部长的这次失误，让以色列政府的移民行动面临着夭折的危险，这让贝京总理大伤脑筋。因为达扬当时任外交部长完全是贝京一再坚持的结果，没有想到达扬居然捅出了这么一个大娄子。就在贝京总理不知道该怎样收场时，摩萨德局长霍菲临危请缨，愿意为总理分忧。霍菲向贝京总理谈了自己的“摩西行动”计划，他要为埃塞俄比亚的犹太同胞开辟一条回家的路。

贝京总理同意了霍菲的“摩西行动”计划。

霍菲所说的“摩西行动”，其实就是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一种政治渗透。得到贝京总理的认可之后，霍菲

马上派出了大批摩萨德特工人员，深入到埃塞俄比亚各地，在那里潜伏下来，然后对当地“贝塔以色列”人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工作，让“贝塔以色列”人觉悟起来，让他们懂得只有离开埃塞俄比亚，才能获得新的生活。霍菲的这种做法果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那些摩萨德间谍的宣传教育下，许多“贝塔以色列”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出路就在于离开埃塞俄比亚，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些犹太人不但自己想要离开贫穷的埃塞俄比亚，还鼓动自己的亲人和周围的朋友、邻居。他们开始成群结队地逃亡，纷纷逃出贫穷的山区，逃到埃塞俄比亚的邻国苏丹，准备从那里回到以色列。

埃塞俄比亚政府发现了这个阴谋后，出动大批的警察和军队，沿途拦截和追捕那些逃亡者，结果有很多犹太人给抓回去了，还有不少人被当场打死。但是，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这种暴行，更加坚定了犹太人逃亡的决心。为了躲避政府的追捕，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了一条更加艰难的逃亡之路。在苏丹境内出现了许多犹太人的难民营。

以色列政府派出代表同苏丹总统尼迈里进行秘密谈判，私下里给尼迈里一笔数目巨大的款项，条件就是允许犹太人从苏丹悄悄地过境。尼迈里虽然为利所

惑，但还是没有完全接受以色列政府的全部条件。他只是答应把苏丹当成一个临时转运站，却不同意犹太人由苏丹直接飞往以色列。同时，他还要求以色列政府对这件事要绝对保密，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因为苏丹还是阿拉伯联盟的成员国，他不能让自己变成第二个门格图斯，不能因为帮助犹太人而遭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

以色列只好作出让步，迁就了尼迈里的意见。以色列派出自己的飞机，悄悄地降落在苏丹的机场，空运已经逃亡到了苏丹的犹太人。尼迈里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又作出新的规定，凡是非正常航班以外的航空飞行，一律要经过他本人批准，否则不能予以放行，更不允许以色列的飞机降落。另外，他还在机场附近布置了大量的军警，进行安全保卫工作。当时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整个机场几乎被包围得水泄不漏。

1984年11月21日，以色列第一架运送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飞机终于从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国际机场起飞，直飞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在那里作短暂的停留后，再飞往以色列。埃塞俄比亚的8000多名“法拉沙人”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回到了以色列。他们当中主要是青壮年男子。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境内都是乘坐原始的

牛拉车，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才抵达苏丹境内，再由以色列的飞机偷偷空运到以色列的。

当第一架运送犹太人的飞机在以色列降落后，以色列内阁的许多政要都前往机场迎接，欢迎这些与犹太主流社会隔绝了两千多年的同胞“回家”。当时贝京总理已经下台了，刚上任的以色列总理沙米尔兴奋地说：“这对我们人民、我们国家、世界所有犹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时刻。”

这就是由贝京总理亲手发起的“摩西行动”——以色列要像当年犹太人的祖先摩西一样，把这些“黑色的”犹太人从遥远的埃塞俄比亚运回以色列。这是当时以色列乃至世界范围内最罕见的大规模的集体移民行动。

可是，就在这次“摩西行动”进行不久，以色列政府又出现了泄密事件。当时，以色列一位负责安置工作的高级官员多米尼茨犯了与达扬同样的错误。有一次，他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时，又把这个消息给捅出去了，结果闹得满城风雨。

这时，西蒙·佩雷斯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新总理。佩雷斯上台后，为了继续实施“摩西行动”，他召开了内阁成员大会。在内阁会议上，佩雷斯和外长沙洛姆敦促有关方面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将这些黑人同胞

护送回国。以政府为此成立了一个包括多名内阁成员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整个接收安置事宜。还通过了内政部长伊沙依提出的“紧急接收两万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计划，成立一个由以色列移民接收部、教育部、住房和建设部、财政部以及犹太办事处官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实施整个接收安置计划，从而拉开了以色列历史上更大规模的接收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的序幕。

会后，以色列外长沙洛姆还亲自前往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进行斡旋，就大规模移民计划与埃塞俄比亚政府和苏丹尼迈里总统协商。当时，那些犹太人除了聚集在苏丹边境的难民营中，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也有许多犹太人的难民营。住在这些难民营里的犹太人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他们缺乏必要的食物和医疗设备，很多人居住在破旧的帐篷中，处境非常艰难，因此以色列政府认为接收行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佩雷斯知道“摩西行动”已经不能再悄悄地进行下去了，于是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详细地介绍了以色列的“摩西行动”，把以色列的这项伟大计划公布于众。“摩西行动”一下子轰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尤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受到攻击的不仅仅是以色列，苏丹总

统尼迈里也顿时成了众矢之的，被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拉法特说成是“阿拉伯人民的叛徒”，因为“他帮助以色列征募了更多的战士”。

在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苏丹总统尼迈里终于顶不住了。在佩雷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他就立刻通过美国向以色列发话，必须立即停止通过喀土穆运送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也作出了反应，立即关闭了埃塞俄比亚与苏丹之间的边界，并指责苏丹尼迈里政府同以色列互相勾结，串通一气，共同绑架了埃塞俄比亚的公民。

就这样，以色列的“摩西行动”不得不暂时中断，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未能及时离开埃塞俄比亚，仍然滞留在那些难民营里。“摩西行动”的流产给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造成埃塞俄比亚境内大量的犹太人家庭妻离子散，亲人两地分居。为了帮助他们家人团圆，以色列政府一直努力说服埃塞俄比亚政府，允许其他的犹太人自由离境。为了获得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合作，以色列再次给门格图斯政权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援助。

到了20世纪90年代，埃塞俄比亚内战不休，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再次受到威胁。以色列政府经过艰难的谈判，又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一大批军用物资，其

中包括100辆T-55坦克和许多枪支弹药，同时还向埃塞俄比亚空军提供了急需的飞机零配件。以色列人的慷慨解囊，终于让埃塞俄比亚政府“良心发现”，开始同意那些两地分居的“法拉沙人”前往以色列探亲。

1991年，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局势又紧张起来。那些仇视以色列的叛军向门格图斯政权大举推进，并且逼近了犹太人集中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总统门格图斯眼看大势已去，只有宣布辞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以色列政府立即当机立断，再一次启动“摩西行动”。以色列看守内阁内政部长伊沙依当天表示，接收行动“刻不容缓”。因为这些聚集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犹太人缺乏必要的食物和医疗设备，已经濒临绝境。如果再不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将难以生存。

以色列内阁立即作出决定，由国家直接拨款1亿美元，向以色列航空公司租用了34架大型客机，抢运那些滞留在难民营中的犹太人。在短短的36小时之内，马不停蹄地把埃塞俄比亚境内一万多名犹太人全部接到了以色列，并且作出了妥善安置。这应该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大移民运动。

就在“摩西行动”刚刚结束不久，埃塞俄比亚的首都就被叛军占领了。以色列人不由得为此而感叹——

如果不是这一大胆行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那些犹太人肯定又要遭殃。

埃塞俄比亚境内的与自己的同胞分离了两千多年的犹太人，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结束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日子，开始融入以色列的生活之中。

以色列属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绝大多数人口都受过大学或大学以上教育。但从埃塞俄比亚境内回来的犹太人许多人甚至从未见过电视、自来水等设施，更是第一次乘坐飞机。为了使这些犹太人能尽快地融入以色列主流社会，以色列政府先把他们安置在移民中心，让他们学习希伯来语和一些社会生产技能，然后再把他们安排到以色列各地，使他们能够通过劳动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仅教育费开支一项，以色列政府就付出了数十亿美元。

但总体来说，由于受教育的程度不同，这些回到了以色列的犹太人还只能生活在以色列社会的最底层，许多人只能靠体力吃饭。这些人一般都是家庭成员多，小孩多。2002年底，以色列议会的“收入不均调查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大约有8.5万人左右，而其中有92%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从事低收入工作，他们与阿拉伯游牧部落贝都

因人以及一般不从事工作的犹太教中的极端正统派教徒一起，构成了以色列的穷人阶层。以色列政府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现状。

在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办公室里，曾经挂着一张当年“摩西行动”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情景。巨大的飞机机舱里所有的椅子都被拆除，挤满了衣着褴褛的“法拉沙人”，许多人眼中还闪现着惊恐。在这张照片旁边，是1993年9月他同拉宾一起在美国白宫签署《奥斯陆协议》时的照片。沙龙把这两张照片挂在一起，就是要告诉那些去他的办公室的人，“摩西行动”对以色列人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以色列的“摩西行动”从霍菲任内开始，到艾德莫尼任职时结束，摩萨德在其中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来自突尼斯的情报

艾德莫尼任摩萨德局长期间，摩萨德还在1988年4月精心策划了一起谋杀案，并且配合“马特卡勒塞雷特”突击队前往1500英里之外的突尼斯，成功地暗杀了“巴解”组织最高军事指挥官阿布·杰哈德。摩萨德的这次暗杀行动，让以色列的敌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再

一次领教了它的厉害。

1988年4月初的一天，一份密电传到了以色列摩萨德总部。电文只有短短的几行字——“阿布·杰哈德4月15日晚回别墅，次日凌晨3时将离开别墅赴突尼斯机场飞往一秘密地点。”

摩萨德得到这份重要的情报后，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去突尼斯执行暗杀阿布·杰哈德的任务。

阿布·杰哈德的真名叫哈利勒·瓦齐尔，阿布·杰哈德是他的化名，意思是“圣战之父”。

杰哈德的童年曾饱尝以色列统治之苦。1948年第一次阿以战争爆发后，13岁的杰哈德就随人流亡到加沙，在那里念完中学。从中学时代起，富有理想的杰哈德就积极投身于反抗以色列的活动，被推举为当地的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20岁那年，他被选送去开罗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接受较为先进的专业化军事训练。1956年他考入埃及亚历山大大学。不久，英、法侵埃，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于是他便辍学了，和新一代巴勒斯坦知识分子一起，寻找一条不同于老一代政治家们走过的路，解救被占领的祖国。

1960年，他结识了在科威特担任工程师的阿拉法特，由于志同道合而成为知心好友，共同携手为巴勒斯坦的未来战斗。他们一起秘密筹建巴勒斯坦游击

队“法塔赫”。“法塔赫”在贝鲁特正式成立后，下辖三个分部，他担任阿尔及利亚分部的负责人。

1965年初，“法塔赫”所属的“暴风突击队”开始进行武装斗争，杰哈德调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直接领导部队的军事行动。他亲自指挥巴勒斯坦游击队战士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上成功地发动了一次武装袭击，向以色列打响了第一枪，大大鼓舞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斗志。

多年来，杰哈德一直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突尼斯等国指挥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斗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他率领巴勒斯坦游击队进行顽强抵抗，给以色列造成惨重损失。因运筹帷幄有方，屡获卓著战功，杰哈德被人们誉为“圣战之鹰”。他是巴勒斯坦游击战士和群众爱戴的一位领导人。

尽管杰哈德在“巴解”中是第二号人物，但其对以色列的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超过了阿拉法特。特别是自从“巴解”内部有四个组织因与阿拉法特有路线分歧而分裂出去之后，杰哈德一直在各派之间斡旋调解，几乎成了核心人物。一旦这些组织重新集结于阿拉法特的旗帜下，凭杰哈德出色的军事才能，绝对会让以色列以后的军事进攻更加困难。

由于杰哈德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他所指挥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给以色列的沉重打击，他很自然地成为摩萨德的主要暗杀目标之一。

1988年3月，三个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一家核工厂附近劫持了一辆运送工人上下班的大客车。后来，以色列保安部队强行冲上汽车，交战当中造成六人死亡，其中三个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政府以杰哈德应对这次事件负责为借口，召开了一次秘密内阁会议，通过了派遣摩萨德特工，前往突尼斯刺杀杰哈德的决定。

为使这一刺杀计划做到万无一失，以色列当局作出了极为周密的安排，决定由以色列军队总参谋长亲自挂帅，副总参谋长任行动总指挥，军事情报局长和总理任特别行动顾问参与协助。这次刺杀行动由以色列海军蛙人部队、“野小子”特种部队和摩萨德共同负责执行，这三个部门精选了三十多名精通阿拉伯语，擅长射击、格斗、伪装和跟踪的行动人员组成了一支精悍突击队，准备潜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总部的所在地突尼斯执行这一暗杀计划。

突尼斯位于非洲大陆北端，其首都突尼斯城濒临地中海，是一座风景如画的美丽城市。在突尼斯城北15公里处的赛迪·布·赛义德镇，突尼斯政府为外国使节

开辟了一片住宅区。1982年，“巴解”组织总部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迁至突尼斯城，大部分“巴解”组织的重要领导人都住在赛义德镇，杰哈德也不例外。他和他的妻子、女儿在这里的一幢乳白色两层别墅中安下了自己的家。

为了保卫杰哈德的安全，他的住宅被围上了一道高达两米的高墙，配备了专门的警卫人员。但阿拉法特对于自己亲密战友的安全仍不放心，他觉得杰哈德住宅的防卫措施还不够安全，曾多次提醒和敦促杰哈德注意加强安全防卫。不过杰哈德并没有在意，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奔波于阿拉伯世界各地，很少回到这里。这就给了摩萨德一个除掉他的机会。

从1983年开始，摩萨德就开始监视杰哈德的行踪，他的一举一动，从日常安排到生活习惯，摩萨德均有详细的记录。为了实现除掉杰哈德的计划，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在此之前曾经派出了三名特工人员，持假护照进入突尼斯收集杰哈德的情报。这三名特工中，组长是一名女特工，化名阿伊莎·萨丽迪。她年轻漂亮，黑头发，东方人的脸，能讲流利的法语和阿拉伯语，也能用纯正的英语开玩笑。阿伊莎来到突尼斯后，自称是某大报的专栏记者，此次来突尼斯，是为了采访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斗争情况。

经过“巴解”新闻部门的批准，阿伊莎获得采访“巴解”军事领导人阿布·杰哈德的机会，而采访地点就是杰哈德的别墅。在采访过程中，阿伊莎仔细地观察了杰哈德别墅的内外结构和警卫措施。采访结束后，她亲自提出了行动方案，并建议将这次行动定名为“阿伊莎行动”。为了掩人耳目，为后来的暗杀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在后来的日子里，阿伊莎曾经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主动同杰哈德交谈，请教一些政治问题，并多次登门拜访杰哈德，从而让杰哈德别墅的那些警卫对她放松了警惕，不再把她当成陌生人了。

在这些日子里，摩萨德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地完成任任务，制订了一项周密的训练计划。他们在海法港附近的一座训练基地里，专门搭建了一幢仿真别墅，其仿真度与突尼斯赛义德镇的杰哈德居住的别墅一模一样，据说就连这幢模拟别墅中的抽水马桶的牌子，也与杰哈德别墅卫生间里的一模一样，至于其他的房间结构、楼层高低和院子与房屋的前后距离就更不用说了，那些暗杀特工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训练之后，精确地计算出从发起攻击到暗杀成功到最后撤离别墅大门，前后仅需要22秒钟！

现在是万事俱备，摩萨德特工们所需要的就是等待，等待杰哈德出现在自己的别墅里。

1988年4月，摩萨德特工们终于等到了这份密电。高明的情报人员对简短的密电认真分析后，最终得出了以下结论——阿布·杰哈德可能是要去某国执行一次重要使命，因此在临行之前必然要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其他领导人进行一次谈话。而在他起程之前的几个小时内，会在自己的别墅作短暂的停留，与分别已久的家人来一个短暂的相聚。这时已经是午夜或者是凌晨了，而这样的时间段正是行刺的最好时机。

于是，摩萨德局长艾德莫尼就对行动小组下达了最后的暗杀令，整装待发的摩萨德特工立刻马不停蹄地奔赴突尼斯的赛义德镇，准备将杰哈德在他的别墅里干掉。

赛义德镇午夜枪声

1988年4月15日，前期进入突尼斯境内的三名特工用伪造的黎巴嫩护照，分别从三家突尼斯旅游汽车公司租用了两辆西德造的大众牌面包车和一辆法国造的标致牌305型轿车。当天下午，那名女特工阿伊莎还特地驾车去杰哈德别墅，对别墅周围进行了一番侦查。她发现这里一切如旧，并没有增加岗哨和保安设施。

摩萨德真不愧是一支训练有速的队伍，他们的每一步计划都像瑞士的钟表那么精准。正像他们在分析那份密电时所估计的那样，午夜时分，阿布·杰哈德刚刚结束了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卡杜米等人的会谈，就乘车回到了他的别墅。杰哈德走下车子，还再次叮嘱了一下司机和警卫人员，不要忘记了明天凌晨3时前来别墅接他去机场，因为他乘坐的飞机4时准时起飞。

走进别墅后，杰哈德顾不得休息，同妻子乌姆·杰哈德、14岁的女儿哈娜坐在一起，看了一会儿录像。这是一次难得的相聚，杰哈德已经好久没有这样能和家人在一起，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尽管他已经很疲惫，但是这种家的温馨却让他舍不得离开客厅。他们一边看着录像，一边聊一些家常。只有在这时，杰哈德才觉得自己是一位丈夫和父亲。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杰哈德对他的妻子乌姆和女儿哈娜说：“你们去休息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

等到妻子和女儿各自回到自己的卧室去睡觉了，杰哈德又走上二楼的办公室，在灯光下开始了他工作。此时已是万籁俱寂，整个赛义德小镇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但是杰哈德的窗帘中依然透出一片灯光。然而，此时坐在灯下的杰哈德并没有料到，死亡正向他

一步步地走来。

就在杰哈德回到别墅之前的那天夜里，在波涛汹涌的地中海上，一艘没有标明国籍的轮船在夜色的掩护下，正在急速地向突尼斯的海岸靠近。在离海岸还有一段距离时，轮船停止了前进，一艘摩托快艇从船舷的一侧悄然放入水中，满载着二十多名全副武装的摩萨德特工，急速地驶向预定的登陆地点。快艇到达海滩后，全副武装的摩萨德特工从艇上一跃而起，三名早已潜伏在此的特工立即迎上前去。一转眼，这些特工们就换上了突尼斯国防军的制服，在那三位特工的带领下，走上海岸，随即钻进租来的三辆汽车中，沿着海边公路向幽静的赛义德镇急驰而去。他们的目标就是杰哈德的别墅。

20分钟以后，这三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来到了赛义德镇。在离杰哈德别墅约50米远的树荫下，这三辆汽车停了下来。引擎声消失后，杰哈德的别墅周围依然一片宁静。午夜的海风不时阵阵吹来，让人感到格外的凉爽。这时，九名摩萨德特工立即从汽车上跳下来，迅速地向杰哈德的别墅逼近。其余的人留在原地和别墅围墙外负责警戒和接应。

与此同时，在距离突尼斯国境线约50公里的空中，以色列空军的一架波音707军用飞机正在国际航线

上盘旋。这是一架装有各种电子侦控仪器的军用飞机，正在发出一种强大干扰电波，使整个赛义德地区的所有电子通信设备全部失灵。这时，杰哈德别墅和当地警察当局的电话线也被切断了。

九名摩萨德特工手持装有消音器的冲锋枪，头戴那种只露着两只眼睛的风帽，冲到杰哈德的别墅门前，两名值班的警卫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就被他们用冲锋枪击毙了，他们迅速冲进院子，直接向二楼杰哈德的办公室冲去。杰哈德办公室窗帘中透出来的灯光，成了他们最好的指示灯。这时，警惕性很高的杰哈德发现楼下有异样的声响，就马上关掉台灯，拔出手枪快速跑出房门。他正要向楼下冲去，却不料在楼梯转角处，正好和已经冲上楼梯的摩萨德特工撞上了，他立刻向那几条黑影开枪射击。已经冲上来的摩萨德特工一见，立刻进行疯狂还击，九支冲锋枪一齐朝杰哈德开火，子弹在他的身上发出一声声的闷响。杰哈德当即就被打倒在地上。

杰哈德的妻子乌姆听到声音，立即从卧室里冲了出来，只见阿布·杰哈德已经倒在楼梯口上。乌姆吃惊地喊道：“发生了什么事？”

阿布·杰哈德已经不能回答她了。

这时，摩萨德特工们继续对准阿布·杰哈德轮番扫

射。枪声让乌姆本能地转过脸去，面向墙壁，等待着炙热的子弹射向自己。然而这时她听到的，是女儿哈娜跑出卧室的脚步声。

“站到你妈妈那里去！”一名男子用阿拉伯语向哈娜高声喝道。乌姆和哈娜被他们用枪逼到墙边，不能动弹。但是摩萨德特工最终并没有伤害乌姆和她的女儿。

这时倒在地上的杰哈德已经没有动静了，几名特工跑进阿布·杰哈德的办公室，将所有文件洗劫一空。然后他们又闯入正在酣睡的杰哈德两岁的小儿子尼达尔的卧室，用枪向墙壁和天花板狂射一番。特工们在退回楼下时，又对倒在血泊中的杰哈德补了一阵乱枪，然后才跑下楼，向在别墅外的汽车跑去。这时，参与这次行动的那位女特工阿伊莎用手中的摄像机，拍摄下了谋杀杰哈德的整个过程。

不到半个小时，这二十多名摩萨德特工已经到了距离赛义镇大约30公里的拉乌德海滩上，登上了那艘摩托快艇，飞快地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

特工们逃走后，乌姆立刻扑到丈夫的身上。杰哈德身中七十余弹，浑身被打成了筛子一般。乌姆发疯似的跳起来，冲进杰哈德的办公室抓起话筒，但电话线早已被以色列特工给切断。她又冲向楼下去喊警

卫，但是那两名警卫也早就倒在了血泊之中。乌姆只好站在院中大声呼救，住在附近的一位“巴解”组织执委的司机听到她的喊声后匆匆跑来，与乌姆一起将杰哈德抬上汽车，但在送往医院抢救的路途中，52岁的杰哈德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据阿布·杰哈德的女儿哈娜回忆，那天晚上她回到卧室不久，就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醒了。她立即跑出卧室，发现四名全副武装的蒙面人已将她父亲打倒在地上，母亲也被持枪者逼到墙边。后来那四名凶手又轮番向父亲开火，场面残忍之极。

在父亲的葬礼上，哈娜朗诵了一首诗，表达了对父亲的哀思和继承父业革命到底的决心。其中有一节这样写道——

.....

父亲开创的事业，
使我们懂得许许多多。
他赋予我们伟大的使命，
为了我们的人民和祖国。
现在实现他的愿望的时刻已到，
我们决心光复祖国的山河！

.....

摩萨德成功地谋杀了阿布·杰哈德，让“巴解”组织大为震惊。于是他们也开始了更加疯狂的报复行动。中东大地的恐怖活动从此愈演愈烈。

第十六章 “短剑”千里追杀 叛国者终进铁窗

瓦努努把以色列的核机密卖给了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把以色列的天给捅了一个大窟窿；摩萨德派出“短剑”小组千里追杀，将他抓捕回国判了18年徒刑；刑满释放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对那些认为我是叛国者的人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和欣慰”。

被解雇的“危险分子”

内厄姆·艾德莫尼出任摩萨德第六任局长后，还干了一件让世人震惊的大事，那就是把泄露国家机密的以色列前核物理学家瓦努努捉拿归案。

瓦努努1954年出生在摩洛哥的一个犹太家庭，他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20世纪60年代初，在摩萨德向以色列偷运移民时，瓦努努一家从摩洛哥历史古城马拉喀什搬到了以色列，定居在贝尔谢巴的一个贫民区。瓦努努的父亲靠做一些小生意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

瓦努努长大成人后加入了以色列工兵部队，成了一名下士。后来，他就读于特拉维夫大学，但因一年级物理考试不及格而退学。21岁时，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是以色列的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在招收“受过训练的技术员”。瓦努努一见，马上呈交了一份求职报告，他很快被录用了，在迪莫纳核中心接受了速成训练。两个月后，他通过了考试，被秘密地送到了迪莫纳核研究中心。来到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后，瓦努努按要求在一份保密宣誓书上签了名。该宣誓书的条文规定，凡向任何人（包括同事）泄露其在迪莫纳工作情况的人将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在迪莫纳中心，瓦努努本来会像别的工作人员那样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地工作，然而，性格上的变化使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第一次变化是他与自己的宗教传统彻底决裂。出身于东正教家庭的瓦努努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凡夫俗

子，断绝了与家人的一切联系。

第二次变化是发生在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瓦努努本来与众多的摩洛哥移民一样，是一位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信仰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主张对阿拉伯人采取强硬政策。但是，他在贝尔谢巴大学哲学系读书时，结交了很多阿拉伯民族的同学，成了贝尔谢巴大学附近的左翼团体的活跃分子，他甚至曾经申请过加入以色列共产党。在贝尔谢巴大学读书时，有许多老师因为拒绝去阿拉伯被占领土服役而遭到了监禁，于是学生们就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以色列当局释放那些老师。瓦努努也参加了这次运动，并且表现非常积极，表现出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意识。

同时，瓦努努在大学里还是一位出了名的怪诞人物。有一次在校园里的晚会上，他在表演音乐喜剧时竟然跳起了脱衣舞，当时的情景还让他的同学给拍摄了下来。同时，他还给艺术系的学生当过裸体模特。他曾经和巴勒斯坦的大学生一起打着标语牌，参加过各种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活动。当时贝尔谢巴大学的校报上还引用过瓦努努的话——“停止迫害阿拉伯人”。

瓦努努的所有活动和思想言论，引起了以色列情报机关的注意。1985年，迪莫纳核研究中心的一位安

全官员曾经警告过他，要求他按照研究中心的要求，检点自己的行为，尽量保持沉默，至少不应该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或者惹是生非，恣意生事。瓦努努虽然受到了警告，但他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于是迪莫纳核研究中心便决定开除他。为了避免事情被张扬出去，酿成一种丑闻，核研究中心并没有正式宣布瓦努努为“危险分子”，而是悄悄地在内部对他作了处分，同时向他支付了解聘费。于是在1985年，瓦努努就和另外180 名工作人员一起被迪莫纳核研究中心解雇了。

瓦努努被解雇之后，卖掉了他的旧汽车和小公寓，然后长途跋涉来到了远东地区旅行。在那里，瓦努努对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目标进行了自我反省。

核机密卖了5万美元

瓦努努于1986年5 月抵达澳大利亚的悉尼。在一个犹太教“安息日”的晚上，他信步向有灯光的地方走去，推开了圣·约翰的安利坎教堂的大门。两个月之后，瓦努努终于迈出了他具有决定性的一步——皈依了天主教。瓦努努的这种人生的改变和宗教的选择，不仅是同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家庭出身彻底决裂，而

且是与自己的国家以色列作出了彻底的决裂。

来远东旅行的时候，瓦努努的兜里装着一件小小的纪念品，不过他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但是，当他与一位古怪的哥伦比亚人相识之后，他便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一秘密。那个哥伦比亚人名叫奥斯卡·格雷罗，是一位很不安分守己的自由派记者。格雷罗当时由于失业而在当地的一座教堂做油漆工，给这座教堂涂刷栅栏。瓦努努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他。交往了数周之后，两个人成为了无所不谈的知己，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不久，这位以色列人就向他的这位异国朋友吐露了埋藏心中已久的秘密。

一天晚上，两个人坐在草坪上聊天。瓦努努神秘地对格雷罗说，自从离开以色列后，他就一直携带着两卷彩色胶卷，但不知怎么样处理才好。因为格雷罗曾经是一名记者，对于胶卷这样的事情当然既熟悉又敏感。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眼前的这个犹太人一定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问瓦努努，是什么样的胶卷。

当瓦努努说这是他在迪莫纳核中心上夜班时偷偷拍摄的照片时，格雷罗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作为自由派记者，这位哥伦比亚人本能地产生了获利的欲望。他没有问瓦努努是如何将照相机偷偷带入迪莫

纳核研究中心，又是如何将胶卷带出以色列的，而是马上想到，这个瓦努努即将会成为一只生出金蛋的母鸡。

格雷罗马上告诉他，他的经历完全可以卖钱，而且是可以卖一大笔钱，终生享用不尽。格雷罗这个想法对瓦努努立刻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他仿佛听到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那句经典的咒语。经过与自己良心的较量，他最终认定以色列的秘密是不道德的，应当予以揭露——于是，他终于念出了那句“芝麻，开门吧！”

经过一番策划之后，格雷罗将自己指定为瓦努努的“文字代理人”，他们一道与数家国际出版机构联系，表示愿意提供一条耸人听闻的内幕消息。但是他们所到之处却没有一个人相信，眼前的这个瓦努努竟然曾经是以色列核工程的一名工作人员。美国的《新闻周刊》杂志和澳大利亚当地的大小报纸都拒绝购买他们讲述的故事。最后，他们找到了一家愿意让他们试一试的买家，那就是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这家报纸决定给他一次机会。

《星期日泰晤士报》是出版业巨头鲁珀特·默多克经营的一张自负盈亏的报纸。澳大利亚就是鲁珀特·默多克的出生地。鲁珀特·默多克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将

他的一位资深记者彼得·霍纳姆派往悉尼，以便与这位以色列人会晤并且评估他那奇特的故事的真伪。霍纳姆曾经获得过物理学学位，具有这方面的鉴别能力。他以一位行家的眼光同瓦努努和格雷罗进行了多次交谈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肯定了这个犹太人的故事绝不是“天方夜谭”。他又仔细看了瓦努努的那些照片，更让他大为震惊。

于是他就向瓦努努开价5万美元，独家刊登他的故事和那些照片，最终出版一本书。霍纳姆把他的想法向报社进行了汇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老总也同其他具有商业头脑的出版商一样，觉得那个格雷罗夹在中间是个多余人，就很想摆脱这个所谓的“中间人”。于是，彼得·霍纳姆就以“有必要将瓦努努和他的照片带往英国作进一步的调查”为由，把那个格雷罗给甩开了。

1986年9月11日，瓦努努和霍纳姆从悉尼飞往伦敦，格雷罗到机场为他们送行。这时瓦努努并不想和格雷罗分手，就对他说：“三个星期后我一定回来找你。”但是令瓦努努和霍纳姆没有想到的是，格雷罗等到他们的飞机起飞后，却乘坐了另一架班机跟随他们来到了伦敦。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老总和那些编辑们都十分

清楚，现在他们手中掌握的就是一枚以色列的“原子弹”。如果这颗“原子弹”真的能够爆炸，一定会震惊这个世界。

瓦努努让《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老总和编辑们看了那些照片，然后对他们说，这60多张照片都是自己亲手在以色列的迪莫纳核研究中心拍摄的，有的还是在一栋被他称为“麦昌2号”的大楼内拍摄的。

说到“麦昌2号”，瓦努努神秘地告诉他们，在迪莫纳核研究中心的2700名雇员中，只有150人持有进入“麦昌2号”的安全许可证，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进一步透露，为什么“麦昌2号”会这么神秘呢？就是因为“麦昌2号”是个地地道道的地下核炸弹制造厂，它就在内盖夫大沙漠底下。

那些照片清晰地显示出“麦昌2号”鲜为人知的秘密。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它那深入地下六层的详细草图，还可以看到局部的走廊、实验室、储藏室以及控制面板的画面。在一组仪表的上方，有一个清晰的希伯来文标牌，表明这里是“第九十五小组”。瓦努努对那些英国编辑说，那里有很多这样的工作小组在承担分离一种放射性元素钚的工作，所以照片中有用希伯来文写的“放射性”警告牌。有的照片上还有一种金属的球体，瓦努努说这些都是炸弹模型。

瓦努努声称，有资格进入“麦昌2号”的人，除了以色列国防军的那些高级军官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外，另外就只有以色列总理。其中有一个地方是迪莫纳核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都熟悉的地方，叫做果尔达阳台——当年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就是站在那里观看下面的生产车间的。

此时，《星期日泰晤士报》的那些人完全相信了瓦努努所提供的那些照片和他描述的真实性。因为他所说的这一切，同当年法国的一些报道完全吻合。而以色列的迪莫纳核研究中心就是法国人帮忙建造的。“麦昌2号”就是当年法国派往以色列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挖掘的，那些制造核弹的设备也是由法国人安装的。

瓦努努所提供的照片和一些数据还表明，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法国提供的26兆瓦反应堆显然已经被以色列人提高到150兆瓦。瓦努努的情报有力地证实了一些外国政府和它们的情报机关的怀疑以及国际新闻媒体的报道，以色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其所承认的核能力。同时他们也确切地知道了，以色列迪莫纳核研究中心额外使用的铀，一部分是从美洲的纽梅克公司搞来的，另一部分则是在1968年从地中海上的“普卢姆巴特”号劫获的。

《星期日泰晤士报》请来了英国的一些核工业专家和物理学家研究那些照片，最终证实犹太人瓦努努并没有撒谎。然而就在这时，那个让《星期日泰晤士报》想甩开的所谓的“中间人”格雷罗，做出了一件让瓦努努本人和《星期日泰晤士报》都想象不到的事——在没有获得任何一方同意的情况下，他竟然一个人找到了另外一家报纸来抢先披露这件事。

格雷罗这时已经意识到了，无论是瓦努努本人，还是准备隆重推出这个新闻的《星期日泰晤士报》，这时都已经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对自己被抛弃的做法感到十分的不满，就找到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竞争对手《星期日明镜报》，向该报披露了这一惊天内幕。《星期日明镜报》当时根本就不相信格雷罗，不过，从竞争的角度出发，《星期日明镜报》认为这倒不失为一个攻击对手的绝好机会，于是就拿出几千美元买下了格雷罗的这个“故事”，并利用他所提供的几张瓦努努拍摄的照片，配上一篇轻描淡写的文章，在报纸上把这件事给捅出来了，其目的无非是想以此来嘲笑《星期日泰晤士报》这样一家既有声誉又有口碑的大报，竟然轻信一个犹太流浪汉的一派胡言来小题大做，以此达到欺世盗名的目的。

就这样，在《星期日泰晤士报》还在策划之中，

还在等待新闻官员的态度时，《星期日明镜报》抢先一步，在自己的报纸上率先披露了有关以色列核机密的新闻，一时间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反响。事后，《星期日明镜报》对自己的歪打正着居然还感到有点不知所措。

有关以色列核机密的新闻和照片见报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瓦努努这才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他知道自己肯定会成为以色列特工追捕的对象，顿时感到恐惧万分。

瓦努努的恐惧是很有道理的——当以色列驻伦敦大使看到《星期日明镜报》后，立即报告了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佩雷斯震惊不已，下令务必将这个瓦努努逮捕归案。

邂逅神秘的美丽女郎

以色列自从有了铀以后，拥有核武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但是在此之前，以色列官方却一直是守口如瓶，从来就没有公开承认过，而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大媒体尽管也在寻寻觅觅，但一直也找不出具体的证据来证明以色列的确拥有原子武器。而英国的《星期日明镜报》现在却是言之凿凿，称以色列的武器库里

已经有了原子弹，并且还配有清晰的照片。如果以色列现在还想否认，那可就难了。

不久，以色列总理佩雷斯也亲眼看到了那张《星期日明镜报》。为了控制机密再次泄露，佩雷斯总理又电告以色列驻伦敦大使，要他请求英国新闻界在刊登出这种新闻之后，最好是能低调处理，不要再度张扬。哪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编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却认为，既然以色列总理如此关注，那就证明瓦努努所说的一切都真实可信，于是就决定在自己的报纸上以更大的篇幅，再一次更加全面地渲染一番，把瓦努努提供的那些照片刊登出来。1986年10月5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以头版的位置登出了一篇文章，巨幅醒目的标题是：《昭然若揭——以色列核武器库之秘密》。文章披露，在迪莫纳核研究中心的地下藏有一座6层的秘密核工厂，这个工厂每年生产40公斤钚，足以生产10枚威力相当于当年美国投在长崎的原子弹……

佩雷斯见到这张《星期日泰晤士报》后，立即把摩萨德局长内厄姆·艾德莫尼召来了。当艾德莫尼赶到总理办公室时，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拉宾和国防部长沙米尔已经坐在那里了。佩雷斯指着《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瓦努努的照片，命令摩萨德马上逮捕瓦努

努。他对拉宾和艾德莫尼等人说：“既然我们已经无法制止机密泄露，那么，我们就只有坚决惩罚泄露机密者。无论他在哪里，就是逃到天涯海角，我们都要将他抓回以色列审判。这将告诫其他的叛国者，所有出卖以色列的人最终将难逃法网。”

对于瓦努努其人其行，艾德莫尼早就有所闻。当瓦努努还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就已经被澳大利亚的安全情报局给盯上了，觉得他是一个危险分子，并且在当时就通报了摩萨德。1986年秋天，摩萨德收到了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发来的一份简要材料，材料说一位以色列人正在实施一项特殊的诱惑计划，企图引诱新闻媒体重金购买他的一则“秘密”。澳大利亚情报局认为这个以色列人的“秘密”一定涉及到国家安全，于是就通知了摩萨德。后来得知瓦努努要去伦敦的消息后，澳大利亚情报局又通知了英国的MIS 情报局——因为通过摩萨德前几任局长实施的“外围战略”，这几家情报部门已成了同一行当中的盟友。所以当瓦努努和霍纳姆离开澳洲前往伦敦时，两名摩萨德特工也尾随其后，跟着他们来了伦敦，对瓦努努进行监视。

但是，现在要到英国去逮捕泄露机密的瓦努努，却是非常艰难。佩雷斯本人也非常清楚，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的尊严是十分敏感的，所以

摩萨德的逮捕行动无论如何都不能触犯英国法律，否则，“铁娘子”的愤怒会给以英合作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雷佩斯和拉宾等人又再三叮嘱艾德莫尼，不能因为这次抓捕行动而得罪了英国人，给以色列造成外交上的障碍。

不过，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情报机构之一的摩萨德，似乎还没有不可能做到的事。艾德莫尼接到命令之后，立即采取行动。摩萨德的两名特工在以色列的一家木器厂找到了在那里工作的瓦努努的哥哥阿尔伯特，问他是否收到过瓦努努的来信。一位特工不加解释地对阿尔伯特说：“如果收到你弟弟的来信，就把它交给我们。”

然后，他们又马上用密电指示那两位前去跟踪瓦努努的特工人员，立即同摩萨德驻伦敦情报站取得联系，再通过他们与英国情报局合作，掌握瓦努努最近的一切行踪，并且马上再派出一个特别行动小组连夜乘飞机飞往伦敦，去执行这项抓捕任务。

1986年9月的一个夜晚，艾德莫尼亲自挑选的特别行动小组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伦敦。

就在瓦努努的照片再次见报之后，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就知道以色列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不但会找报社的麻烦，同时也会对这个以色列人下

手，于是就把瓦努努给保护起来了，并且每隔一两天就将他的住处更换一次。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因为这个瓦努努对他们还有用途。一旦日后要和以色列政府对簿公堂的时候，这个瓦努努就是最好的证人。只要他能开口，就可以证明自己所报道的并不是造谣惑众，无中生有。

1986年9月24日晚上，一位身材修长、过早秃顶的男子在霓虹灯和电影院彩灯的映照下，穿行在伦敦市中心的莱斯特广场。这位男子就是瓦努努。这是瓦努努搬到蒙巴顿饭店的第二天，经过多日紧张的等待和孤独的生活，瓦努努在用过晚餐后就去了离蒙巴顿饭店不远的伦敦莱斯特广场散步。瓦努努欣赏着眼前那流光溢彩的灯光，感受着黄昏后广场宁静的气氛，慢慢地，他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几分钟前，几天来一直陪着他的人还极力劝慰他稍安勿躁，并且不同意他到莱斯特广场这样游人密集的地方去。但他是那样的执拗，因为连日来禁闭般的生活，憋得他快要发疯了。

这时，瓦努努信步来到了广场边上一家迪斯科舞厅门前。迪斯科舞厅那疯狂的乐曲让瓦努努感到周身肌肉发紧，同样疯狂变幻的灯光也让他感到热血沸腾、血脉贲张。但是瓦努努此时注意的却是站在门口

的一位高高的、胖胖的、嘴唇肥厚的金发女郎。女郎那美丽、艳媚的眼睛以及轻佻的嘴唇似乎不经意地吸住了瓦努努射来的目光。她那透着娇媚的微笑、极富线条美的身材和那一身入时的打扮，像一颗磁石，深深地吸引住了瓦努努那颗孤寂的心。瓦努努不禁心潮起伏，随即走上前去，和那位女郎攀谈起来——这位女郎就是摩萨德女特工“辛迪”。

“辛迪”的真名叫谢里尔·本托夫，她是摩萨德“短剑”小组中一名出色的女特工。谢里尔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漂亮异常。在美国上完大学后，谢里尔不远万里来到以色列，专攻希伯来语。

在学习期间，谢里尔结识了一名摩萨德特工，两人一见钟情，共浴爱河。为了支持爱人的事业，谢里尔也加入了摩萨德。据说，谢里尔的智商高达140，看东西过目不忘。由于表现出色，她常常得到上司的肯定和嘉奖。谢里尔非常敬业，有一回，上司问她如果任务需要，她会不会同一个陌生人上床，谢里尔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如果任务的成功需要我施展‘美人计’，那么我将不在乎同任何一个陌生男人上床。”

谢里尔说到做到。莫迪凯·瓦努努向英国媒体泄露了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顶级机密后，摩萨德就派谢里尔出马，化名“辛迪”与瓦努努接近。摩萨德特别行动

小组已经完全掌握了瓦努努在英国伦敦的行踪，一直在等待抓捕他的机会。

当时瓦努努才三十来岁，而且还是一个未婚男子。所以对于漂亮异性的渴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一见到这个美女后，瓦努努就主动进行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叫“莫迪”，在澳大利亚时他的朋友就这么称呼他；但在以色列，他却叫莫迪凯。

女郎对瓦努努的这番表白似乎很感兴趣，于是就与瓦努努交谈起来。她说她叫辛迪，是到此孤身旅行的美国人，是一位美容化妆师。瓦努努请她跳完了舞，又与她漫步在莱斯特广场，他们一边走一边聊天，就像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侣一样。

那天晚上分手时，瓦努努把自己旅馆的电话号码给了辛迪，他们相约不久再次见面。回到蒙巴顿饭店的房间后，瓦努努就急于想再次见到这个美丽的金发女郎。晚上他独自睡在饭店的床上时，眼前总是浮现着她那美好的倩影。

仿佛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第二天，辛迪就主动打来了电话，约瓦努努到泰晤士河北岸的泰特美术馆见面。瓦努努一接到这个电话，就像听到了一种天籁之音，他一直在等待和她再次见面的美好时光。

从此，瓦努努就与辛迪频频约会起来，俨然一对

热恋中的情侣，并且一次比一次亲热。

在一次约会时，辛迪试探性地对瓦努努说：“亲爱的，我发现那家《星期日泰晤士报》好像是在耍你，看来他们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是那么的需要你。不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当时，瓦努努对《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做法已经有些不满，那家《星期日明镜报》率先披露了这个新闻不仅不付钱，反而加剧了他的惊恐。而《星期日泰晤士报》事后还吞吞吐吐地说，当时之所以不急于发表那些材料，是想看看以色列的“反应”。

“他们的确不相信我。你的感觉没错。”瓦努努说。

“亲爱的，那你还有什么犹豫的？我们彻底离开《星期日泰晤士报》，离开他们，离开伦敦吧。”辛迪乘机这样建议他——特别行动小组为了不同英国发生外交上的麻烦，决定换个地方对瓦努努下手。

辛迪对瓦努努说，她有个姐姐住在意大利，她希望瓦努努能陪她同去看看姐姐，她还告诉瓦努努说：“如果我们到了罗马，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而在伦敦我总觉得不够踏实。”

尽管《星期日泰晤士报》曾一再告诫瓦努努“不要出国，不要乘飞机，也不要住任何要求出示护照以证

明身份的饭店”，但是他此时已经让这个美丽的辛迪迷住了心窍，把报社的那些叮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手掌上写着“我是在罗马被劫持的”

1986年9月30日，辛迪和瓦努努一同登上了飞往罗马的英国航空公司504航班。在希思罗机场，瓦努努又像在悉尼甩掉格雷罗那样给《星期日泰晤士报》打了个电话，说他要“出城”几天，并保证几天后就会回来。但是从此以后，伦敦的这家《星期日泰晤士报》再也没接到他的电话，直到四十多天以后，他们才听到了有关瓦努努被捕的消息。

英国航空公司504航班在罗马菲乌米奇诺机场着陆后，一名自称是辛迪姐姐的男朋友的意大利男子在机场迎接他们，然后他们驱车来到郊外一栋公寓。瓦努努刚一进门，就遭到了两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摩萨德特工的袭击。特别行动小组的特工们将瓦努努按在地上，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力麻醉剂，然后就把他捆绑起来。他们又在瓦努努的嘴里塞满了布条，然后用一块强力胶严严实实地封上了。

当天晚上，几个彪形大汉抬着一个巨大的麻袋上了一辆小货车，驶向意大利的拉斯佩齐亚港口。当瓦

努努再次苏醒时，他已经身在海边。摩萨德特工用担架把他抬上一艘军用小艇，然后驶向一艘游艇。在游艇上，瓦努努连续七天都被他们铐在床上，直到抵达以色列海岸。游艇一靠岸，瓦努努就被等在那里的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工作人员带走了。瓦努努在离开以色列多年之后，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祖国。这可是他当年去澳大利亚旅行时始料不及的。

对瓦努努的公开审理并不像一般的案件那么简单。一直到1988年3月24日，瓦努努才被宣判因犯有叛国、间谍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尽管瓦努努在法庭上多次表白，“我不是一个卖国贼，并没有企图毁灭以色列国的故意”，但最终并没有改变他的刑期。

当时，对于瓦努努的拘留和审讯都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但是，在一次乘坐戒备森严的警车前往耶路撒冷地区法院出席判决前的听证会时，精神振奋的瓦努努将手掌贴在车窗上，他在手掌上写着“我是在罗马被劫持的”。瓦努努手掌上的字迹成了各国记者们关注的目标。许多人都认为摩萨德触犯了意大利的法律和尊严，结果差一点引起同意大利的一场官司。

瓦努努被判处18年徒刑的事实告诉人们，以色列对叛国者从来是毫不留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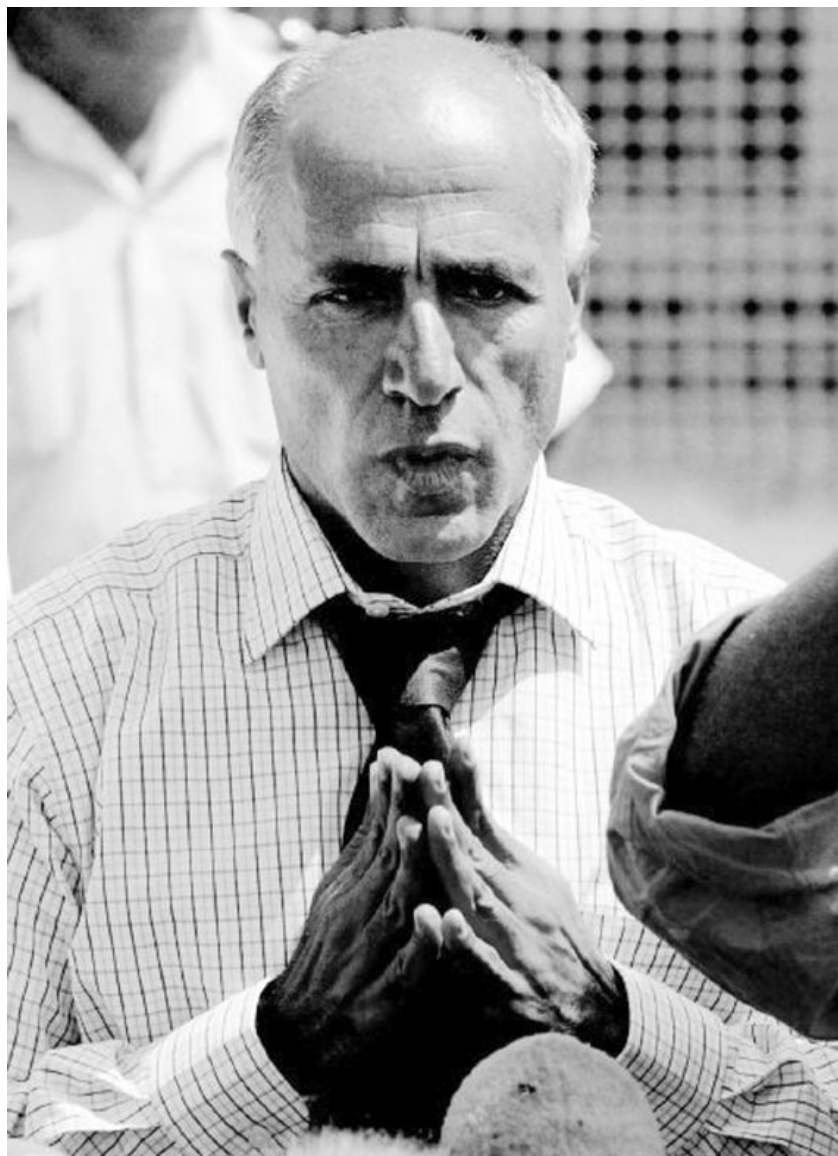
但不管怎么说，被以色列视为国家级高级核心机密的核话题，由于瓦努努事件成为人们公开议论的话题了。同时，在逮捕了瓦努努后，以色列政府始终向外界隐瞒了一个事实：瓦努努间谍案其实是一宗跨国绑架案。

18年以后旧事重提

关于瓦努努的话题并没有结束——18年以后的2004年4月21日，瓦努努终于刑满释放了。当他走出监狱的大门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对那些认为我是叛国者的人说，我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骄傲和欣慰。我非常高兴我成功地完成了那些事”。铁窗生涯后，瓦努努宣称，他今后依然不会“退让或屈服，道歉或忏悔，装聋或作哑”。

瓦努努在铁窗内度过了整整18年。据说，就在他刑满即将被释放的几个小时前，以色列安全部门还在就到底释放还是不释放他进行磋商，原因就在于瓦努努怀揣着以色列的绝对机密。虽然瓦努努坦言已经没有更多核秘密可以泄露，但以色列政府对他仍然不放心。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他被释放的前一个星期还表示，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瓦努努被释放后仍将受

到严密监视，他的护照也可能会被没收。



出狱后的瓦努努

后来有消息说，瓦努努已经提出放弃以色列国籍，申请前往美国生活，但至今还没得到以色列政府

的许可。对于那些摩萨德特工们来说，他们的下一步行动也许就是继续监控这位18年前的泄密者。

第十七章 阿尼斯通走麦城 摩萨德转换新角色

以色列准备进行导弹试验，伊拉克派出突击小分队飞往南非，用“云爆弹头”和“沙林”毒气弹将试验区变成一片废墟；南非政府发现以色列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化学武器后大加指责，一张张巨额支票拍过去后那些高官都保持了沉默；《奥斯陆协议》让巴以谈判取得进展，摩萨德开始扮演新的角色。

“阿尼斯通事件”

1989年9月，内厄姆·艾德莫尼因为南非“阿尼斯通”恐怖袭击事件引咎辞职退休，摩萨德掌门人再次易位，摩萨德原副局长沙巴泰·沙维特成为摩萨德第七任

局长。

沙巴泰·沙维特上任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彻底清查发生在南非的“阿尼斯通事件”。

众所周知，南非是世界上最早能够制造核武器的国家之一，也是唯一的一个成功制造出核武器后又自动放弃的国家。1992年南非的军用导弹计划被宣布取消，一年后南非又开始了一个空间计划。所以，南非的核工程，又成了一个世人关注的话题。

1993年3月24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南非已经制造出了核武器，并称这个装置在1991年7月10日，即南非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之前已经被销毁了。当时南非发展核武器计划主要有两个动机，其一是为了制衡前苏联。因为前苏联介入非洲事务的战略意图给南非领导层带来很大压力。这也就成为后来南非生产核武器的主要动机，想通过核武器来阻止前苏联的侵略。其二是为了制衡西方世界，希望在坚守外界一致反对的种族歧视制度的情况下还可以得到外界的帮助。

而南非的核计划进程，又同以色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非发展核计划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南非有着丰富的铀资源。南非已被探明的铀矿约为35万

吨，占世界总量的11%。截至2000年底，南非已经采掘出15万吨铀。二战即将结束时，南非就开始向出口铀。

1948年，南非通过一项国会法案，成立了全面负责国家核能研究和开发的“AEB”（原子能委员会）。在1957年达成的一份协议下，美国同意向南非提供一个核反应堆“SAFARI-I”（沙发瑞- I）和反应堆所需的核燃料，并答应帮助培训科研人员和反应堆的技术人员。

1961年，南非在比勒陀利亚以西30公里处的佩林达巴修建了国家核能研究中心。虽然一开始这个中心是致力于民用核能研究，但随着国外和国内政治形势的一些变化，“AEB”展开了一项一种独特铀浓缩技术的秘密研发计划。截至1967年底，南非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并实现了实验室规模的铀浓缩。

南非大约有12万犹太人。这些居住在南非的犹太人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一样，对以色列有着一一种天然的感情。虽然他们远离以色列已经有一两千年的历史，但是那种民族和宗教的情结，却让他们和以色列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所以早在20世纪60年代，南非和以色列双方的军事合作关系就全面展开了，不过这种合作还是仅止于常规武器层面，并没有涉及核

武器的开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南非和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已经发展到了由常规武器到核武器的开发，展开了秘密的核合作。当时，南非可以从以色列获取核技术协助，作为回报，以色列则可以从南非获取核能源所必需的铀，从而为以色列刚刚建成的核反应堆提供及时的能源。

两国的合作关系是在常规武器合作计划的掩盖下进行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为外界所知，就连那些对以色列一直虎视眈眈的阿拉伯国家也一直被蒙在鼓里。

20世纪80年代，南非和以色列开始了联合导弹研发计划。

1984年，以色列在南非的阿尼斯通附近建立了一座奥弗贝格试验区，以色列可以在此测试自己的导弹武器。阿尼斯通位于南非第二大城市开普敦东部200公里处，是南非一座有名的渔城。在以色列的帮助下，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很好的试验区域，成了以色列帕尔马欣试验区的一个翻版。

1989年7月的一天，以色列准备在阿尼斯通附近的奥弗贝格试验区，进行南非“杰里科-2”号导弹试验。在此之前，以色列已经研制出了“杰里科-1”号导弹，并正

在同南非合作研发更先进、射程更远的“杰里科-2”号导弹。由于首次试验地是阿尼斯通，这个导弹曾被冠以“阿尼斯通”的名字。整个导弹家族在南非被称为“RSA”（南非共和国），共有四种运载工具（RSA-1到RSA-4）以及一个空间发射器“RSA-5b”。阿尼斯通研发的完全武器化核装置可以作为飞机携带的炸弹，也可以作为“RSA”的弹头。

当时，以色列在阿尼斯通地区集中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还空降了一个营的兵力为“杰里科-2”号导弹的试验作准备。“杰里科-2”号导弹是新式中程导弹，射程为1800公里，几乎能够覆盖整个中东地区。如果再配上以色列自己研制的核弹头，就可以对中东地区的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

以色列的这次导弹试验计划，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验的地点就是在阿尼斯通郊外的奥弗贝格试验区。从阿尼斯通到奥弗贝格试验区不过50多公里路程，一向谨慎的以色列人在南非政府的许可下，在这里部署了一支500人的部队担任警戒；同时，南非军队在奥弗贝格试验区北面的威洛多普驻扎了一个旅的部队。威洛多普与奥弗贝格试验区之间直线距离不过15公里，机动部队15分钟就可以抵达。

整个部署看起来似乎是万无一失，但还是走漏了

风声，让伊拉克得到了消息。伊拉克得到这一情报后，马上派出了一支特种部队秘密潜入阿尼斯通地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阿尼斯通事件”。

事实上“阿尼斯通事件”的发生，责任并不完全在于摩萨德和内厄姆·艾德莫尼本人，还在于以色列人的麻痹轻敌——因为这次事件的制造者是伊拉克著名的特种部队“第36突击营”。

伊拉克当年有两支特种部队，一支是伊拉克的“反恐怖局”，另一支就是“第36突击营”。他们都是伊拉克军队中的王牌部队，其战斗力并不亚于美国的“三角洲”特种部队。当时以色列也有自己的特种部队，先是“第101部队”，后来是“202伞兵旅”，再后来“第101部队”和“202伞兵旅”合并为一支部队，代号是“第55伞兵旅”。这是以色列最精锐的部队，也是以色列的秘密武器。当时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把伊拉克的“第36突击营”放在眼里，认为只有自己的特种部队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殊不知经过连年不断的战争，特别是多年的两伊战争的磨砺，伊拉克的“第36突击营”已经历练成了一支克敌制胜的劲旅。“第36突击营”最擅长的就是近距离格斗，从直升机上顺绳快速下滑着陆的技能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至于擒拿格斗和射击爆破就更不在话下了。“第36突击营”的官兵穿的是伊拉克军队制

服，装备的武器有比利时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和各种现代化的轻重武器。有时他们也会坐着那种名贵而又先进的悍马越野车去执行任务。

这一次，伊拉克的“第36突击营”又派出一支突击小分队来到了南非，他们的任务就是摧毁以色列在阿尼斯通的奥弗贝格试验区，阻止“杰里科-2”号导弹的试验。

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一阵阵带着潮湿的风从大西洋上吹来。奥弗贝格试验区在昏黄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住在试验区营房里的那些以色列核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他们都是以色列核工业方面的精英人物，当中许多人都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甚至在各自从事的研究领域中已经小有名气了。但是，这些人却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了以色列并且加入了军工企业，来到了荒凉偏远的非洲。但这些人却无怨无悔。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曾经历了两千多年的苦难，他们不能让自己的民族再去颠沛流浪。

这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周围是低矮的山峦和荒凉的丘陵、沙漠，那些巡逻的以色列士兵走在这柔和的月光里，就像走在特拉维夫的郊区一样，似乎是

在月光下漫步，他们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危险正在向他们一步步地逼近。

就在这时，距离奥弗贝格试验区几十公里的海面上，四架军用直升机正在作超低空飞行。机身紧贴着海面，几乎触到了大西洋飞溅的浪花。伊拉克“第36突击营”的突击小分队，此时正在这些直升机上，离以色列的奥弗贝格试验区越来越近了。

5分钟以后，四架直升机相继进入奥弗贝格试验区的范围。在机载导航雷达的指引下，它们在山谷里盘旋，一步一步地向试验区逼近。指挥这支小分队的指挥官名叫哈瓦尔，是伊拉克特种部队的一名上校，曾多次成功地指挥过解救人质和偷袭行动，他坐在最前面的一号飞机里。这时，只听到哈瓦尔上校在命令飞行员萨格尔“降低高度，避开以色列人的雷达”，驾驶员萨格尔紧握操纵杆，驾驶着飞机继续往山谷里钻。

伊拉克的直升机进入了群山之中，机舱外一片漆黑，黑黝黝的山峰扑面而来，又从飞机身边擦过。直升机精确地绕开一个个障碍物，向着目标前进。

“马上进入预定机降区，请指示！”飞行员萨格尔在准确地报告。“各位注意，作好滑落准备！”哈瓦尔上校一边下达指令，一边伸手拉开了机舱门。只听到“哗啦”一声，一股强烈的气流猛烈地吹了进来。他

站到机舱门口，看了一眼手腕上的夜光表，时间正是零点25分。

随着哈瓦尔上校的一声令下，伊拉克“第36突击营”的突击队员一个个顺着粗壮的绳索，快速滑落到了地面。为了准备今天晚上的这次突袭，“第36突击营”的突击队员已经进行了整整四个月的秘密训练。

两分钟后，所有的人员在地面集结完毕。然后他们按照预定的编队，向奥弗贝格试验区扑去。这里离奥弗贝格试验区还有10公里的路程。他们离开了丛林，一路疾步狂奔，30分钟后，哈瓦尔上校就率领突击队登上了奥弗贝格试验区后面的小山头，命令各小组迅速进入各自的区域。

哈瓦尔上校果断地作出了几个手势，突击队员立即按照预定方案开始布置阵地。远程狙击手迅速将狙击步枪架设了起来，他们的目标是瞄准奥弗贝格试验区的指挥塔，负责消灭那些指挥人员和救援的士兵。另外的突击队员在紧张有序地布置着火箭炮阵地，专门负责对付试验区的那些仓库和营房。

这是一种专供特种部队袭击用的轻型火箭炮，里面填充的炮弹并不是普通的杀伤榴弹，而是“云爆弹头”（又称“温压弹头”）。由于这里房屋建筑众多，正好利用云爆弹所产生的爆炸冲击波破坏大面积的目

标。还有两门火箭炮筒里装的是一种“沙林”毒气弹。一枚“沙林”毒气弹散发出来的毒气，足可以让周围1.5平方公里范围内所有的人和生物伤亡。它的毒害时间比其他的神经性毒剂要长，毒性更要强，只要一小滴，就可以使人昏迷甚至死亡——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居然置《日内瓦公约》于不顾，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在哈瓦尔上校的指挥下，那些负责爆破的突击队员各就各位。几名爆破专家利用出色的潜行技术，已经渗入到了营地内部。他们正在安装炸弹时，突然一名突击队员发现了营地上的红外动感仪，他立刻用无线电报警。所有的人立刻匍匐在地，等待着他拆除这个装置。就在这名突击队员小心地用多功能匕首拆除这个装置时，一队巡逻的以色列士兵走了过来。旁边的突击队员一见，立刻拔出了装有消音器的手枪，而远处的狙击手也迅速将夜视瞄准镜中的红点对准了巡逻兵的脑袋。谁知巡逻队的以色列士兵却一直走过去了，竟然没有发现黑暗中隐藏着的那些伊拉克士兵。由于这里地处非洲，野生动物很多，所以以色列人没有携带军犬巡逻，否则情况就麻烦了。

看着巡逻队离开了，哈瓦尔上校才松了一口气。那些突击队员也在继续自己的工作。他们很快拆除了

红外动感探测仪的线圈，让它再也无法发出警报。

就在巡逻队再度转回来的时候，哈瓦尔低声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以色列的巡逻队刚刚走到离营地大门不远的地方，只见几条身影迅速举枪射击，以色列士兵立刻倒下了。紧接着，营地背后山头上的狙击手也开火了。短短的两三秒钟，一支10个人的巡逻队就全部被击毙了。除了尸体栽倒在地的声音外，没有发出任何其他的声音。

小山上的那些突击队员一见，迅速朝前面的营地奔跑过去，按照预定计划散开进入指定的位置展开攻击。营地里顿时爆发出耀眼的白光——那些仓库一座接一座地爆炸了，巨大的爆炸声响彻夜空，白色的云团翻滚着朝空中升腾着。刺目的白光下，一股热流迎面扑来。

那些警戒的士兵和技术人员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立即被扑面而来的热浪冲倒在地。伊拉克突击队的那些轻型火箭炮一齐开火了，炮弹落在以色列人的营房里，当即就将这些活动板房连同房间内的人员炸得一片狼藉，血肉和碎铁片落了一地。

营区内已经乱成一团，激烈的枪声响了起来。盲目冲出来的以色列士兵在机枪声中成片地倒了下去，

布置在山坡一端的重机枪阵地猛烈地向以色列人开火了。与此同时，头顶传来火箭弹的呼啸声，两门火箭炮发射的24发云爆弹精确地打在了军营建筑的中间，巨大的闪光和猛烈的气浪瞬间将人体如风中的纸片一样吹得到处横飞。

以色列人清醒过来，知道自己遭到偷袭了，反应迅速的以色列士兵端起武器拼命地还击。

以色列加强营的火力原来是很强的，但仓促之下到处受到袭击，加上存放固体火箭燃料的仓库爆炸了，使得所有人根本没有时间去从容布置反击，到处都是一片混乱。在伊拉克突击队的猛攻下，挤成一团的以色列士兵纷纷倒下，再也没有还手的机会了。

又是一排云爆弹落到了奥弗贝格试验区，顷刻之间，巨大的冲击波立即让那些以色列士兵窒息而死。爆炸的火箭燃料仓库更加速了他们的灭亡，整个奥弗贝格试验区已经成了一片火海，在成片的爆炸声中燃烧。

“打光所有的子弹和炮弹，立刻转移！”哈瓦尔上校通过无线电下达着撤退的命令。奥弗贝格试验区这么大规模的爆炸，几十公里外的阿尼斯通都能看到的火光和烟云，肯定会惊动驻在威洛多普的南非部队。知道近在咫尺的南非援军立即就会赶到，他们必须立

即撤出奥弗贝格试验区。速战速决，这就是“第36突击营”的作战风格。

充分的准备、精确的组织和雷霆般的偷袭，让伊拉克的这支突击小分队干得非常成功。奥弗贝格试验区内所有的导弹仓库和实验中心都被彻底摧毁了，住在附近的以色列工程师们统统被炸上了天。在第四小组的火力策应下，突击队员顺利地冲了出来。120名突击队员只有1人被打死，5人被击伤。当他们沿着原路冲进了那片丛林后，还可以看到后面的天空被熊熊的火光映得通红，剧烈的爆炸声还不时地从后面传来。

一小时以后，南非的军队赶到了奥弗贝格试验区，然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是一片废墟。随后，南非驻阿尼斯通部队的巴斯·尼尔森将军在一班随从的陪同下，也从阿尼斯通郊外的军营赶到了试验区。一下车，眼前的景象让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整个营地黑烟缭绕，焦黑的地上随处散落着铁皮和机器零件。远处的仓库和实验中心已经全部被夷为平地，只剩下焦黑的钢制架子东倒西歪地竖在那里。地下到处是黑红色的血渍和成片的人员尸体，那些穿着防化服的南非士兵正在清理那些尸体。这地狱般的景象让巴斯·尼尔森将军久久回不过神来。

“将军，情况非常糟，简直是再糟不过了。”南非

步兵旅的副旅长莫斯·马什上校走到他身前，行过军礼后紧急地汇报。

“莫斯上校，该死的，你给我解释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巴斯·尼尔森将军怒视着面前的莫斯·马什。

“将军，今天凌晨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一支军队，对这里发动了进攻。估计以色列人是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进攻太猛烈，几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死在了这里。我们派出部队赶来增援，但路上不知什么人埋设了地雷，我们的军车被炸。等我们排除了地雷，赶到这里以后，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我过去看看……”巴斯·尼尔森将军正要向前方的实验区走去。

但是，莫斯·马什上校一把拉住了他，恐怖地对他说：“将军，您不能过去，我们发现里面有沙林毒气的残留。我已经把防化兵派上去消毒了。前方很危险，您不能过去。”

“什么？”巴斯·尼尔森将军怒道，“你是说突袭者使用了毒气吗？”

“不是，我感觉……”莫斯·马什上校压低了声音说，“我感觉可能是以色列人瞒着我们，在这里进行化学武器装载导弹的实验。这次袭击可能引爆了他们的

化学武器仓库，结果……”

“该死的犹太人……”巴斯·尼尔森将军看了一眼远处地上那成片的尸体，不寒而栗。“见鬼了，这下子我们可有好戏看了，一千多名以色列人，竟然只活了几个。一个完整的导弹试验基地竟然被彻底摧毁了。究竟是什么人胆敢深入我们的国境，做出这种事？”

“将军，我们现在必须尽快进行搜索，找到袭击部队的线索，否则，我们将无法向以色列人交代。”莫斯·马什上校连忙提醒道。

莫斯·马什上校的话让巴斯·尼尔森将军皱起了眉头。他说：“那些家伙……该死的家伙，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溜过来的？不管怎样，你还是立刻派出部队去搜索吧！我们要马上向国防部报告，尽快通知以色列方面！”

巴斯·尼尔森将军无奈地叹了口气。他知道这一次事故将是一场大麻烦。因为几乎以色列所有的火箭专家和技术精英都死在这里，后果可不是一般的严重。虽然自己不负主要责任，但是追究起来，恐怕也脱不了干系。

“阿尼斯通事件”发生以后，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马上命令摩萨德组成了一个调查小组，由摩萨德局长沙巴泰·沙维特亲自出马，率领调查小组赶赴南非进

行调查，务必要将这件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弄个明白。

经过一番调查，摩萨德副局长、调查小组副组长乔治·阿米特向沙维特报告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从我们调查的结果表明，这次袭击显然不是附近的那些敌对的小国所能做到的。袭击我们试验区的应该是一支技术高超、装备精良的部队。”

“理由？”摩萨德局长沙巴泰·沙维特问道。和他的前任内厄姆·艾德莫尼一样，沙维特也是一个平静而踏实的人，素以冷静勤奋著称。他在担任内厄姆·艾德莫尼的副手期间，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是摩萨德内部著名的实干人物。

“让空军上校帕里·辛格谈谈具体的情况吧！”乔治·阿米特说。

正在一边的以色列空军上校帕里·辛格站起身说道：“乔治·阿米特副局长的调查组给了我们一组最新的资料，其中有一段雷达信号显示有几架直升机曾经在袭击发生前15分钟在阿尼斯通东南的海面上出现过。”

“是一艘巴拿马货轮上的雷达信号。直升机飞得很低，船员以为是暗礁。我们在马达加斯加发现了这艘船，并且得到了雷达资料，信号专家分析后告诉我们，那其实是直升机。”乔治·阿米特补充解释道。

“按照雷达信号的时间来说，尽管超低空飞行可以避开南非人的雷达检测，但如果从那个方向向大陆飞行，他们还是会在5分钟后进入设立在朗厄山高处的雷达站的监视范围。可是这个雷达站有一个问题，”帕里·辛格上校说，“它的信号向东北方向搜索时会被一座比它矮大约150米的山峰挡住，出现一个小小的死角。如果直升机在进入雷达监视范围前，及时转向东北的话，就能够避开雷达搜索，然后在再次进入雷达搜索区域之前钻进山区。”

“他们躲避的时间是多长？”沙巴泰·沙维特身边的一个身穿陆军制服的军官问道。

“大约是六到七秒钟！”帕里·辛格上校回答。

“只有六到七秒钟？你是说他们的直升机一直维持着高速的超低空飞行，然后在六到七秒钟内就精确地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然后转向进入了山区？”那名陆军军官一脸的惊讶。

“是的！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些，而且飞进了山区，并且是在山区夜间飞行……”帕里·辛格上校摇摇头，叹口气说，“他们的飞行员很出色，飞机上一定装备了地形匹配雷达和性能很好的夜视装置，甚至事先就规划了航线，否则就是上帝也不敢在夜间飞进山区去。”

沙巴泰·沙维特听了眉头一皱，问道：“能够有这种技术能力的国家有哪几个？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们也可以做到！”那名陆军军官傲然地说道。他可不是一位普通的陆军军官，而是以色列国防军“第262部队”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的营长。

“第262部队”在以色列官方的档案里似乎是一支并不存在的部队，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但是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贝鲁特，在突尼斯，在乌干达等国度，当以色列人在创造一个个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时，人们才知道，在以色列还有一支比“第35伞兵旅”还要精锐的部队——“第262部队”。

“除了我们之外，美国人的‘海豹’也可以，英国的‘皇家舟艇中队’也行，但是其他的恐怕就没有这个能力了。”那名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的营长接着说。

乔治·阿米特听了，惊讶地问道：“美国人的‘三角洲’也不行？苏联人的特种部队呢？”

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的营长摇摇头说：“不行，虽然‘三角洲’的实力很强，但是这种渗透技术要求很高，需要地形雷达和先进的直升机。美国海军的‘MH-53’上有这样的地形回避设备也有夜视器材，‘三角洲’的直升机‘UH-60’干不了这个活儿。苏联人的情况我们不了

解，他们的夜视装备应该没有问题，但他们的地形雷达却很难做到。”

“这样一支精锐的部队不会一点风声都没有，我们不能排除是美国人干的可能性，他们对于我们发展核武器一向是不支持的。我看先从这些先进装备上找到突破口吧！去调查一下世界能够生产地形回避雷达和先进夜视装备的厂商，同时调查一下当时阿尼斯通的情况。能够动用四架直升机，肯定在附近有基地存在。先去查他们的基地吧！一旦查出结果，先报告到我这里。”这位冷静的摩萨德局长冷冷地说。

“是。”那些以色列军人低声回答。

“上帝说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以色列人也应该是这样。”沙巴泰·沙维特的脸色铁青地说。

但是调查到了最后，摩萨德的调查小组也没有怀疑到这是伊拉克的“第36突击营”干的。

对于以色列来说，“阿尼斯通事件”的后果是极为恶劣的。尤其是南非政府发现以色列竟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违反了双方的协议，发展化学武器，大大地损害了南非与以色列两国的关系。南非国防部长马格努斯·马兰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尔乔恩纷纷出面指责以色列的做法欺骗了南非方面。马格努斯·马兰甚至立即宣布，暂时推迟与以色列在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合作。

但是以色列方面并没有因为此事而与南非方面翻脸，而是保持了沉默。他们通过南非的犹太势力，很快就打通了南非政府高层人员。在一张张的巨额支票拍过去之后，那些高官们都保持了沉默，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就是沙巴泰·沙维特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不过这次调查却最终也没有什么明朗的结果。

“柏林墙”倒塌后的连锁反应

摩萨德局长沙巴泰·沙维特上任伊始的1989年，是世界局势发生大变革的年头。从那一年开始，世界各地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很快就导致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解体，使二战以后持续了将近40年的“冷战”局面宣告结束。这一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让世界战略格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结果，导致了昔日闻名世界的摩萨德顿时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尤其是在中东地区，“冷战”的结束以及阿以和谈的进展，让摩萨德几乎失去了用武之地。原来互相敌视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以及“巴解”组织，这时都在“化干戈为玉帛”，有的

已经成为或者正在成为以色列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后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奥斯陆谈判”，更让中东的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让这片硝烟弥漫、战乱频仍的土地看到了一缕和平的曙光。

1992年，第二次出任以色列工党领袖和以色列内阁总理的拉宾，从自己戎马半生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了和平的珍贵，决定改变以色列多年来对巴勒斯坦所采取的策略。他不同意对阿拉伯人采取寸土不让的政策，而是主张“以土地换和平”。于是从1993年开始，以色列总理拉宾就宣布解除禁止与“巴解”组织接触的命令，以、巴双方从此就开始进行单独和直接的秘密谈判。后来经过挪威政府居中斡旋，以、巴双方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先后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进行了14轮谈判，终于取得重大的历史性突破。同年9月9日和10日，拉宾和阿拉法特互致函件，宣布双方相互承认。1993年9月13日上午11时15分，在全世界的注目之下，中东地区两大对立阵营中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拉宾与阿拉法特，终于在美国白宫南草坪上，正式签署了以巴第一个和平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奥斯陆协议》。在同一天，双方还在华盛顿签署了《关于在被占领土巴勒斯坦临时自治政府安排的原则宣言》。从此，敌对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两个国家终于走

上了一条和平之路，阿拉法特与拉宾的双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中东的天空终于出现了一缕和平的曙光。



柏林墙绵延155公里，所到之处房屋全部拆除

按照《奥斯陆协议》的精神，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巴以谈判连连取得进展。以色列的军队从1993年12月13日至1994年12月13日撤出加沙地带和杰里科镇，由“巴解”组织接管这两个地区并实行自治。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人先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然后将自治范围扩大到整个西岸地区。于是巴勒斯坦首先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自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然后再延伸和扩大其自治范围。《奥斯陆协议》的签订，为解决因领土纠葛、宗教纷争和政治冲突而导致的巴以矛盾创造了良好开端。

但是，由于几千年沉重的历史的因袭，让中东的局势总是变幻无常。《奥斯陆协议》对一些问题先易后难的处置顺序，日渐显现出它先天的不足，以色列的安全要求和巴勒斯坦方面关于改善生活的要求，一时都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于是失望的情绪开始在双方渐渐蔓延。由于巴以双方对《奥斯陆协议》都有着不同的解读，谈判立场也就渐行渐远，双方的“反和”阵营和极端势力又开始故伎重演。

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被刺身亡，倒在自己同胞的枪弹之下；2004年阿拉法特又不幸离开了人世，再加上双方各派政治势力的阻挠，《奥斯陆协议》直

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实现。从2000年9月底的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开始，双方伤亡数字又在攀升，经济损失加剧，给双方都造成了强烈的心灵冲击和震撼，连绵不断的冲突更使人们心中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对和平之光能否再次降临中东大地已经疑虑重重。

就在《奥斯陆协议》签订前后，以色列总理拉宾、外交部长佩雷斯出于政治和时局的需要，将摩萨德撇在了一边，使得这个曾在以色列不可一世的“知情机构”倍感失落。长期以来，摩萨德一直负责处理那些“不承认以色列的国家”的问题，并长期与这些国家保持非官方外交和安全关系。但是到了“海湾战争”之后，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相继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并与之建立了和平外交关系，摩萨德的地位越来越被以色列外交部所取代。

与此同时，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穆恩”却日趋活跃，其外派人员以驻外使馆武官身份与当地政府建立公开的联系，从而不断获取各种情报。阿穆恩的活跃更让摩萨德显得相形见绌了。

面对这种被动的局面，摩萨德不得不调整策略，决定在新形势下扮演新的角色，并力争保持原有的地位。1994年春天，在一年一度的以色列国家安全与情报工作会议上，摩萨德确定了四项新的工作重点，其

主要内容是：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打击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伊朗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和势力；在阿拉伯世界开展间谍活动；承担一些特殊任务，打击那些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目标。

1994年春天，以色列内阁开始酝酿调整摩萨德的领导班子，物色合适人选以接替任期将满、即将退休的沙巴泰·沙维特。当时据众多行家们分析，摩萨德局长新一任的继任者，最有可能是时任以色列阿穆恩局长的乌瑞·斯古将军。因为斯古将军通晓以色列主要对手国的情况，一直被视作以色列情报界的“重量级”人物。同时还有人认为，另外一个人也有可能成为摩萨德的下一任局长，他就是拉宾总理的军事顾问丹尼·亚托姆将军。

然而，即将离任的沙巴泰·沙维特却不希望这两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人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其理由是，在摩萨德历史上的7位局长中已有3个是将军，在新的形势下不应再出现第4位将军来领导摩萨德。

沙维特的这一观点绝非个人想法。有迹象显示，一旦对斯古将军的正式任命下达，许多心怀不满的摩萨德高级官员将有可能集体辞职。有人分析，如果继任者能够按照沙维特的意愿从摩萨德内部选出，那最可能出任此职的将是以色列反间谍专家戴维·卡米。

但是，让摩萨德和沙维特本人都没有料到的是，以色列总理拉宾突然遇刺身亡，这成了沙巴泰·沙维特下台的导火索，其接班人也就此浮出了水面，他就是人们事先预测的候选人之一——拉宾总理的军事顾问丹尼·亚托姆将军。

摩萨德第七任局长沙巴泰·沙维特从此结束了他的使命。

第十八章 “安曼行动”惨遭失败 铁腕局长力挽狂澜

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后，摩萨德受到了强烈指责，理由是事先没有提供任何情报，为承担责任摩萨德走马换将，然而新局长亚托姆却被认为是一位最失败局长：“安曼行动”刺杀“哈马斯”创始人亚辛未遂反而被人赃俱获；新一任“铁腕局长”力挽狂澜，定点清除计划初见成效。

拉宾遇刺身亡

1995年11月4日晚，以色列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总理拉宾遇刺身亡。

这一天是星期六，正值犹太教的安息日，也是以

色列的法定假日。平时，以色列国内的大部分交通工具到了晚上都会停驶，许多娱乐场所和大小商店亦会关门歇业。可是，那天夜幕降临后的特拉维夫仍然灯火通明，热闹异常。约10万市民沐浴着习习海风，从四面八方涌到市中心的国王广场，在那里举行支持和平进程的盛大集会。

历史进入了 1995 年，中东和平进程仍在跌跌撞撞中向前发展。9月24日，佩雷斯在埃及塔巴与阿拉法特经过九天的艰苦谈判，草签了《扩大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自治的协议》，一般称为《塔巴协议》。根据这项厚达 400 多页的协议，以色列军队将分阶段撤出杰宁、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卡勒基利耶、拉姆安拉、伯利恒等 6 座城市、450个村镇和希伯伦市的部分地区，把这些地区交由“巴解”组织及不久后选出的委员会进行管理。以军将进行重新部署，以保卫在希伯伦市和其他地区 148 个定居点内的犹太居民的安全。到1997年7月以军全部完成“重新部署”后，巴勒斯坦人将控制西岸 90%的领土。

1995年9月28日，拉宾与阿拉法特再次来到华盛顿白宫的南草坪上，正式签署了《塔巴协议》。

《塔巴协议》的签署在以色列国内引发了一股不小的反对浪潮，2 万多人在议会外示威，抨击拉宾和佩

雷斯出卖了以色列的利益。尽管协议在议会以 61 票对 59 票的微弱多数获得批准，但正如新闻评论员所说：“这一比例已到了国内政治所能容忍的极限。”

当然，在以色列，希望实现阿以和平的人占多数。就在右翼势力煽动示威者攻击拉宾和佩雷斯的同时，左翼人士也组织了支持和平进程的集会。

1995年11月4日晚8时，10万以色列群众聚集在特拉维夫以色列国王广场举行“要和平、不要暴力”的和平集会，此次集会是由“支持和谈结束以阿争端总委员会”组织的。这是十多年来特拉维夫规模最大的一次公众集会，拉宾总理、佩雷斯外长和许多以色列政要应邀出席了集会。

8点半，拉宾在一片欢呼声中开始发表讲话。他说：“我当了 27 年的军人，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是因为过去我别无选择。但是，今天，机会——和平的机会来临了，为了今天在这里和不在这里的人们，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对于广大以色列人来说，佩雷斯是和平的设计师，但却不是和平的决策者。和平的决策者是拉宾——他是领兵冲锋陷阵的统帅，知道什么样的和平能保证以色列的安全。他过去只讲和平的可能性，却从来没讲要主动抓住机会去实现和平，这一点使了解拉

宾的人觉得他今天与往日有所不同。

“总会有和平的敌人，”拉宾继续说，“他们正拼命地伤害我们，目的是破坏中东和平。但是，我要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位和平伙伴，那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它过去是敌人，现在它已停止恐怖活动。没有和平伙伴就没有和平。为了解决以阿冲突中最复杂、最持久、最敏感的部分——以巴冲突，我们要作出自己的努力，‘巴解’也要作出自己的努力。我相信，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支持和平，愿意为和平去冒任何危险。”

如果这些话出自佩雷斯之口，人们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本来就是一个“鸽派人物”。然而此话出自被称作“鸽派中的鹰”的拉宾之口，人们多少感到这位演讲者今天好像是换了一个人。



以色列总理拉宾

发言到了最后，拉宾说：“这个大会就是要向以色列人民，向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向阿拉伯世界，向全世界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以色列人民希望和平，支持和平。”

拉宾的话语一落，整个广场响起一片掌声。拉宾

转过身去，同站在身边的佩雷斯紧紧拥抱在一起。自从两人踏上以色列的政治舞台，这两位政治上的对手还从来没有拥抱过。掌声夹杂着欢呼声，整个广场一下子沸腾起来。

当掌声渐落时，拉宾、佩雷斯和全体集会者唱起了过去被斥为失败主义而今天成为和平运动象征的《和平之歌》——

让太阳升起，让清晨充满光明。
最圣洁的祈祷也无法使我们复生。
生命之火被熄灭的人，
血肉之躯被埋入黄土的人，
悲痛的泪水无法将他唤醒，
也无法使他重获生命。
无论什么人，
无论是胜利的欢乐，
还是光荣的赞歌，
都不能使他从黑暗的深渊中，
回到世上与我们重逢。
所以，请唱一首和平之歌吧，
不要小声地祈求神灵。

引吭高唱和平之歌，
这是我们最应当做的事情。

9 时30分，按照程序人们应退场了。佩雷斯先走下主席台，拉宾则与外国使节和群众组织负责人一一道别。就这样，佩雷斯比拉宾早2至3分钟登车离去。

9时40分左右，拉宾来到了自己的专车旁。正待要打开车门时，突然一个男青年从怀里掏出一支9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先向拉宾腹部开了一枪，又在拉宾捂住腹部弯下腰去时两次扣动扳机，其中一枪打到拉宾背上。

行凶的男子是27岁的犹太大学生伊加尔·阿米尔，曾是特工机构的成员，所以能持通行证越过几道警戒线接近拉宾。阿米尔和制造“希伯伦惨案”的戈尔斯坦一样，都是已故的种族主义犹太教士梅厄·卡亨的信徒，反对以色列同阿拉伯人实现和平。在一伙同类型的极端分子密谋下，阿米尔终于向拉宾射出了罪恶的子弹。据凶手后来交代，如果当时佩雷斯也在场，同样会遭到袭击。

中东历史上充满了阿犹之间的仇杀，但一个犹太人因政见而杀害另一个犹太人的事件真可谓绝无仅有。待到保安人员如梦方醒，冲上前去制伏凶手时，拉宾已经倒在血泊之中。

拉宾立即被送往伊希洛夫医院。在被紧急送往医院途中，司机还听到拉宾总理在喃喃地说：“这不可怕，这不可怕。”然后他才垂下了头。

凶手使用的是违禁的、杀伤力极大的达姆弹。尽管医生尽一切努力挽救拉宾的生命，但因伤势过重，在被送入医院后仅过了19分钟，拉宾总理的心脏就于当晚11时10分永远地停止了跳动。他是以色列建国后首位被谋杀的政治领袖。

拉宾遇害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为了稳定国内政局，佩雷斯一方面下令严查凶手并缉拿其同谋，取缔宣扬种族主义的极右组织，一方面也与反对派利库德集团的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对话，寻求对政府的支持。利库德集团的议员在议会批准新内阁的投票中投了弃权票，说明对话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面对国际社会的担忧与猜测，佩雷斯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同意和已经承诺过的任何东西，我们都不折不扣地执行。”至于 1996 年大选与推动和平进程的关系，佩雷斯更是坚定地指出：“在我们看来，当务之急是推动和平进程，赢得和平比赢得大选更重要！”

1995年11月6日，在肃穆的拉宾葬礼上，佩雷斯

面对死者的家人和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在悼词中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中的一段话：“亚卫告诉大家，不要失声地呜咽，不要让泪水遮住视线，所做之工必有回报，未来充满希望。”

接着，他面对拉宾的灵柩，沉痛而又坚定地说：“永别了，我亲爱的兄长，和平的英雄。从今天直至将来，我们要像你生前所求索的那样，也像你的离去所托付给我们的那样，继续承担起伟大的和平使命。”

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后，摩萨德和以色列的其他情报机构都受到了以色列人的指责，因为事先他们没有提供任何情报。为了承担责任，以色列安全情报机构的头目——走马换将。1996年初，以色列国内安全总局辛贝特局长卡米尔·吉隆引咎辞职，以色列政府第一次公开任命阿米·阿亚隆为辛贝特局长；与此同时，时任摩萨德局长的沙巴泰·沙维特也呈交了辞职报告，要求下台。于是，与佩雷斯和内塔尼亚胡关系十分密切的另一个人物——丹尼·亚托姆成为摩萨德第八任局长。

失败的“安曼行动”

1996年3月24日，以色列内阁通过决议，任命前总理拉宾的助手兼军事顾问丹尼·亚托姆少将为摩萨德局长。紧接着，佩雷斯总理亲自签署了任命状，以色列军事监察机构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行文，准许媒体公开报道。第二天，丹尼·亚托姆的生平简况及其将出任以色列新一任摩萨德局长的消息，就赫然出现在报端。从此，以色列开始允许媒体公开报道情报机构首脑的消息，打破了它遵循多年的“情报首脑的一切必须严格保密”的禁忌。丹尼·亚托姆成了第一位被公开报道的摩萨德局长。

与丹尼·亚托姆同时被公开报道的，还有两位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的现任首脑：一位是新任以色列“阿穆恩”局长的摩西·雅隆将军，另一位是以色列国内安全总局辛贝特的新任局长阿米·阿亚隆。

有关以色列情报机构首脑的个人情况历来都是严格保密，鲜为人知的。在西方情报机构推行公开化的潮流中，以色列的这一做法也曾受到了责难，但是以色列内阁并没有予以理睬。当1996年3月丹尼·亚托姆即将就职之前，以色列的一家《国土报》就准备进行报道，以色列的军事监察机关也准备批准。但是当佩雷斯总理得知《国土报》的请求和军事监察机构的打算后却十分恼火，认为这是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

并且准备下令调查并追究以色列《国土报》的法律责任。

自立国以来，以色列的传统做法是，对其情报机构首脑的名字严格保密，丹尼·亚托姆的所有前任的名字都是以字母来代表。

对此，一些新闻媒体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针锋相对地辩驳说，以字母代替情报部门的首脑的真实姓名并无助于他们的人身安全。因为，不仅以色列人，就连外国情报部门也知道某个字母代表的究竟是谁。例如，“辛贝特”前任局长卡米尔·吉隆的代号为“K”，就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也许是在新闻媒体的压力和多方面的要求下，以色列政府才在1996年不得不改弦易辙，正式公开了对丹尼·亚托姆等三位情报机构首脑的任命及其个人的一些简要情况。

从这些资料中，人们知道时年51岁的亚托姆少将从军33年，是个典型的军人，他最初在以色列某特种部队当过突击队员，后到装甲部队服役，担任过某部军事计划处处长、中部（约旦河西岸）军区司令等职。数年前，成为拉宾的助手兼军事顾问。拉宾遇刺身亡后，继任总理佩雷斯继续任命他担任总理助手和军事顾问。

行伍出身的亚托姆在出任摩萨德局长之前，不仅拥有少将军衔，还是一个经常在报纸上抛头露面的新闻人物。1972年，他身着白色机械员工作服的形象，首次出现在当年以色列的多家报纸上。当时，比利时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在特拉维夫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后，身为突击队员的亚托姆参加了对劫机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当时与他在一起参加行动的还有后来出任以色列外交部部长的巴拉克，以及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以色列参加过特种部队的军人，尤其是在那些突击队干过的基本上都有机会得到提升。例如，被任命为辛贝特局长的前海军司令阿米·阿亚隆曾经就是以色列海军“蛙人突击队”的队长；出任阿穆恩局长的摩西·雅隆将军，早年也是一名突击队员；亚托姆被任命为以色列最重要的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一事，又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丹尼·亚托姆为人谨慎，对工作一丝不苟，办事认真，追求尽善尽美。他不善言谈，特别注重细节，有时略显古板，1996年出任摩萨德局长以后，丹尼·亚托姆不断地受到非难和指责，甚至被认为是摩萨德有史以来最失败的局长。

1997年秋，摩萨德为报复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

斯”在被占领区连续制造自杀性爆炸事件，决定派特工到约旦行刺“哈马斯”政治局书记、“哈马斯”驻约旦首席代表哈立德·迈沙阿勒。

“哈马斯”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还得先从它的创始人亚辛说起。

“哈马斯”的创始人名叫艾哈迈德·伊斯梅尔·哈桑·亚辛，加沙人，是巴勒斯坦家喻户晓的“轮椅斗士”，阿拉法特早年在开罗大学的同学和好友，被人们尊称为“谢赫”。

1982年，亚辛秘密成立了一个叫“巴勒斯坦圣战者”的组织，主要目的是筹集武器。事情败露后，以色列占领当局以私藏武器、企图从事“恐怖”活动等罪名，于1983年判处亚辛有期徒刑13年。1985年，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与以色列达成一项交换战俘的协议，亚辛也因此提前出狱。此后，亚辛继续从事抵抗以色列军事占领的地下活动，并于1987年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成立了一个让以色列人心惊肉跳的激进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

中东和谈开始后，“哈马斯”认为巴以签订的协议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出卖，强调对以色列继续进行武装斗争，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民族自治权力机构对“哈马斯”也奈何不得；以色列则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

必欲除之而后快，一有机会就派摩萨德特工去暗杀“哈马斯”领导人。

1997年9月25日，摩萨德奉命派出两名刺客向“哈马斯”驻约旦首都安曼办事处负责人哈立德·迈沙阿勒行刺。

9月25日，两名冒充加拿大游客的刺客趁迈沙阿勒不防之时，向其头部注射了神经麻醉毒剂。两小时后，药性发作，迈沙阿勒被送进侯赛因医学城。约旦医生们都从未见过这种怪病，虽然怀疑是遭到化学武器袭击，却束手无策。



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右）



哈立德·迈沙阿勒

据大难不死的哈立德说：“9月25日那天，我正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两个男子从身后向我冲过来。当

时，我左耳后面听到什么东西响了一声，然后就觉得浑身战栗，像遭到电击一样。两个刺客一看就是犹太人的长相。”

这两名刺客就是摩萨德派去的两名特工。他们用装有毒药的针管刺中了哈立德的颈部，但没有致命，自己却不幸当场被约旦警方逮捕，人赃俱获。此事当即激怒了约旦国王侯赛因。尽管以色列否认此事系摩萨德所干，但是约旦国王还是亲自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明确表示，除非以色列提供毒药的名称和解药，否则约旦将考虑召回驻以色列大使，以色列可能会接连遭到自杀性爆炸事件的攻击。为了不让那两名特工在约旦坐牢，以色列有关部门不得不送了解药，约旦政府才答应放人。

约旦方面如此恼火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旦以色列的这一计划得逞，约旦是少不了背黑锅、担嫌疑的。约旦政府抱怨特拉维夫蓄意制造事端，嫁祸于人，几乎酿成“哈马斯”兴师问罪的祸水。约旦方面经过仔细调查后认定，两名刺客涉嫌受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的派遣，奉命毒杀驻安曼的“哈马斯”负责人。两名刺客所持的是加拿大护照。加拿大方面随后也证实，两名谋杀者并非加拿大人。正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释放了被他们再次关押的亚辛。

以色列突然释放亚辛，说法很多。以色列军方随即发表的一份公报说，“亚辛健康状况的明显恶化是以色列将其放逐到约旦的原因之一”。时年61岁的亚辛是一个离不开轮椅的半身不遂的瞎老头，两耳也几乎丧失听力。1989年亚辛再度被捕入狱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以色列担心亚辛如果死在狱中，势必遭到巴勒斯坦人的指责和报复。

但新闻媒体却议论纷纷，普遍认为亚辛被放逐是约以达成的幕后交易。

侯赛因国王在否认约以幕后交易的同时，声称他要求以色列释放亚辛由来已久。哈立德遇刺事件发生后，侯赛因国王于9月30日敦促特拉维夫立即释放亚辛，作为恢复巴以信任、改善和谈气氛的措施之一。10月2日，即亚辛被放逐到约旦的第二天，阿拉法特就赶到安曼与侯赛因国王紧急磋商。会晤后，笑逐颜开的阿拉法特称“谈得非常好”，但两人没有透露会谈细节。此前，侯赛因国王曾两次与美国总统克林顿通电话，就中东和谈以及约以关系的突发事件和释放亚辛等问题商议办法，侯赛因告诉克林顿，他将派王储哈桑飞赴华盛顿传书送信。

哈桑王储在前往华盛顿之前，曾于9月28日秘密访问了以色列；在以色列宣布放逐亚辛的前夕，以色列

政坛元老、国家基础设施部部长沙龙、国防部长莫迪凯和政府秘书长纳菲一行也秘密访问了安曼。以色列电台说，约以达成的秘密交易的两个要点是：以色列以“放逐”的名义释放“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约旦庇护并交还两个摩萨德的特工人员。

1997年10月5日，亚辛和哈立德搭乘阿拉法特的专机离开安曼返回巴勒斯坦。当亚辛6日返回他的故乡加沙时，欢迎他的盛况有如海潮奔涌。

在亚辛被释放的第二天，约旦就释放了这两名刺客。另外几名特工当时被安置在以色列驻安曼大使馆内。

和约旦的问题算是暂告一个段落，但由于护照的问题又让以色列同加拿大之间风波迭起。

尽管这次“安曼行动”疑云重重，但最让加拿大人关注的还是那两张加拿大的护照。这一事件突出显示了加拿大护照的价值。

10月1日，加拿大反对党“改良党”在国会中质询的重点是，加政府应当清楚表明，是否在他国的要求下，把加拿大护照发给外国人干违法之事。不过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对这一质询，立即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没有。”

尽管如此，各种谣言使加拿大人对各方面的答案

都表示怀疑。为了把事情真相弄清楚，加拿大外长阿克斯沃西特地飞往纽约与约旦外长和以色列外长会晤。加拿大已召回驻以色列大使“商讨此事”，以示对冒用护照事件的抗议。

加拿大为什么对这两张护照如此重视呢？原来事出有因。据有关报道指出，以色列间谍冒用加拿大护照的事已经不止一次。1981年，以色列情报局的特工就曾冒用加拿大的护照，结果被加拿大警方抓了个现行。事后，以色列政府保证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还有报道说，一位以色列摩萨德前工作人员曾透露，在他没有离开摩萨德之前，曾经在摩萨德总部的一个大纸箱中，看到了至少有一千本空白的加拿大护照。以色列人员一向喜欢使用加拿大护照掩护自己的身份，已经是加拿大政府早就心知肚明的事。

那么，以色列特工为什么单单看上了加拿大护照呢？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元文化背景，使加拿大成了世界上没有敌对国家的少数国家之一，所以持有一本加拿大护照几乎可以在全世界通行无阻；再加上加拿大人种复杂，任何肤色或讲任何一种语言的人持有加护照，都不会被人怀疑其中有诈。所以，加拿大

护照不但受一般人士和各国海关欢迎，不法分子也对加拿大护照情有独钟。

由于摩萨德“安曼行动”的失败，不仅导致了以色列和约旦关系的紧张，同时也引发了以色列同加拿大之间的外交纠纷，于是在以色列国内政坛酿成了一场“倒内”与“保内”的政治风波，以色列内部几乎乱成了一锅粥。

当时以色列新闻界纷纷指责总理内塔尼亚胡“缺乏预见和判断力”，要求他提出辞呈，认为内塔尼亚胡坚持实施的“安曼行动”是以色列的“战略损失”。

为了平息民愤，缓和众怒，内塔尼亚胡拉上支持“安曼行动”的政坛元老、国家基础设施部长沙龙和国内口碑颇佳的国防部长莫迪凯，于10月6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内塔尼亚胡极力为“安曼行动”辩解，大谈恐怖主义的危险。当有记者问他是否准备辞职时，他沉下脸来说，反恐怖是一场战争，你说我能临阵脱逃吗？

尽管亚托姆对此次行动怀有异议，并且在事前就向内塔尼亚胡建议行动要慎之又慎，但处于内外交困中的以色列总理必须找到一个“替罪羊”，以转移公众和新闻媒体的注意力，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摩萨德局长亚托姆只得代人受过，给总理当一回“替罪

羊”，出面发表声明，宣布自己承担“安曼行动”失败的责任。

但是，摩萨德局长亚托姆的确是流年不利——就在“安曼行动”失败而引起的风波刚刚平息，特拉维夫的摩萨德总部又传出新的丑闻。

摩萨德丑闻不断

1997年12月，以色列发行量最大并最有影响的《国土报》披露了一起摩萨德资深特工编造假情报欺骗摩萨德领导人亚托姆，并从中渔利的惊人事件。这一新闻使声名赫赫的摩萨德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遭受到了第二次沉重打击。

事情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1996年 9月，一份秘密情报被放到了摩萨德局长的案头。这份情报称，据可靠的阿拉伯内线提供的消息，叙利亚正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以色列。短短的几行字引起了亚托姆的极大震惊，立刻指示要迅速搞到叙利亚军队调动的详细情况。

这份情报的提供者是摩萨德资深特工耶胡达·基尔。基尔时年62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由于他从事间谍活动数十年，并且在阿拉伯国家中物色和发展

了许多阿拉伯人充当以色列间谍，所以亚托姆决定让他退而不休，继续为摩萨德发挥余热。

基尔随后报上了更为详尽的叙军调动情况：根据总统的命令，叙利亚第10机械师的一个旅已从首都贝鲁特以北调到贝卡谷地；叙利亚的特种部队第14师已从贝鲁特调到了赫尔蒙山以东地区；两支部队总人数达 1.2万人，目前已处于可以对驻扎在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军队进攻的位置。

亚托姆感到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命令摩萨德有关部门对基尔的情报进行核实。反馈回来的消息证实，基尔所提供的叙军调动情报是准确的。至此，亚托姆对基尔的情报深信不疑。于是，他紧急约见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这份绝密情报交给了他，并建议政府发布紧急动员令，准备战斗。

内塔尼亚胡接到情报后也极为吃惊。他一面紧急召集军方高级领导人商讨对策，一面向盟友兼调解人美国传递了有关信息。不久，《国土报》披露了叙利亚要进攻的消息，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和以色列国内的极大震动。

然而，以色列军方却对基尔的情报表示怀疑。以色列国内治安部长可维格多·卡哈拉尼说：“我想我们很难理解叙利亚为什么调动了部队。在我看来，叙利亚

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要使外交进程运转起来。”军队情报机构虽然也获得了叙军调动的情报，但不认为叙利亚有发动战争的迹象，相反却是一个和平的信号。军方的情报使内塔尼亚胡总理发热的头脑渐渐冷却了下来，他开始重新审视摩萨德的情报。

1996年11月，充当调解人的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抵达以色列，向内塔尼亚胡保证：“我已去过大马士革，并没有得到叙利亚准备对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的印象。”几乎同时，一直不明真相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也终于弄清了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他公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无意进攻以色列。

松了一口气的内塔尼亚胡对报告假情报的亚托姆大发雷霆，而窝了一肚子火的亚托姆则又将怨气撒在了基尔的身上。他咆哮着命令基尔向有关部门提供情报来源的详细材料并对其进行调查。然而，基尔拖了好几天也没有把材料交上来，这才引起了亚托姆的怀疑。他想起以前出现过的摩萨德情报不实的事件，好几起都同基尔有关。

在获得内塔尼亚胡的同意后，亚托姆成立了一个秘密调查小组，对基尔展开了调查。调查小组对基尔实施全面监控，并窃听了他的住宅电话。经调查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基尔向摩萨德报称的许多新发

展的阿拉伯情报员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在基尔的要求下，摩萨德却一直在向这些子虚乌有的间谍提供着大笔经费，总数多达数十万美元。调查小组还发现，许多情报都是基尔在家中闭门造车炮制出来的。

1997年12月初，在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后，调查小组正式将基尔拘捕，并对其寓所进行了搜查，从中找到了以支付“内线”名义领取的大量酬金。基尔被捕后，采取了与警方合作的态度。他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歉意，同时声明自己的做法完全是因个人心理危机所致，而无任何政治动机。以色列特拉维夫地区检察院以诈骗、滥用信任和威胁国家安全等罪名对他提出起诉，摩萨德也对基尔提供的所有情报进行审查，以辨真伪。

基尔被捕的消息在《国土报》上报道后，立刻又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舆论乘虚而入，矛头直指摩萨德，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甚嚣尘上。摩萨德前官员加德·希姆龙认为：“与暗杀哈马斯领导人未遂事件相比，这件事对摩萨德造成的破坏更大。”

希姆龙的话代表了以色列大多数人的观点。因为它表明，当年以神通广大和效率极高而著称的摩萨德，如今不仅失去了往日的锐气，而且正在退化成一个效率低下的官僚机构。出卖假情报从中牟取暴利，

竟然不讲一点职业道德，这应该是摩萨德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在公众的质疑和舆论谴责面前，摩萨德威信大打折扣，它在以色列所有的情报机构中的权威地位也受到了威胁。

真是祸不单行——1998年2月，一名摩萨德特工在瑞士克尼茨镇一所公寓安装电话窃听装置时，中途失手，又被瑞士警方当场逮捕。

当时以色列军事情报组织注意到一名黎巴嫩籍瑞士人和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联系非常密切，行踪可疑。于是，就命令一名特工去打探一下详细情况。随后这名摩萨德特工就带着任务飞到了瑞士，他化名为伊萨克·本托，和当地的另外四名以色列谍报人员接上了头。

他们互通情况后来到了瑞士首都伯尔尼郊区，那里有一幢小楼。那名被他们盯上的黎巴嫩籍瑞士人就居住在那幢小楼里。他们运用非常娴熟的特工技巧，掌握了周围的地形，以及那幢小楼地下室的一些情况。

伊萨克·本托很快回国汇报了有关情况后，再次飞到瑞士。这一次，他随身携带了一块特制的内空木板条，用来搁置窃听器，并且打算“偷梁换柱”，把地下室的一块木板换下。

2月19日深夜，伊萨克·本托等五人来到了小楼附近准备下手。伯尔尼市区还有一人通过远程遥控，接应他们。伊萨克·本托吩咐其中的一男一女在楼房附近放哨，自己则带着另外两人用万能钥匙打开大门，潜入地下室。然后，他们反锁了地下室大门并开始撬地板条，准备“移花接木”。

但是，一位瑞士妇女的无意介入使摩萨德精心安排的此次行动失手。这位家住伯尔尼的妇女遭受严重失眠的折磨，经常至深夜还不能入睡。2月19日凌晨2点，她偶然朝窗外一瞥，发现一伙人形迹可疑。她发现这几个人有的在外面望风，有的潜入一户人家，并且携带箱子、背包和工具。这位妇女起了疑心，马上打电话报了警。

几分钟后，警察迅速赶来。楼外放风的两名以色列特工立即用无线对讲机通知了地下室内的伊萨克·本托。但是，已为时太晚。他们被堵在地下室，警察当场盘问了他们，还要检查他们随身带的包。伊萨克·本托谎称自己的包中有重要的外交文件，不适合当场打开。不过，警察注意到包的封口是后来封上的，而且包旁边的口袋中还有几件撬东西用的工具。警察认为他们的行动非常可疑，要将他们带回警察局。

就在此时，楼房外面传来了呼救声。原来那两个

扮做夫妻在外放风的特工中，其中的“丈夫”突然心脏病发作，不省人事了。警察闻讯赶来，将在场的五人全部带走，将其中的“丈夫”送到了医院，经抢救后也把他带回了警察局。

被当场逮住的三人到了警察局后，暴露了真实身份。于是，瑞士警方和以色列摩萨德进行交涉。最后，以色列方面同意先出300万美元将伊萨克·本托保出来，两年后再继续对他开庭审理。伊萨克·本托出生于1954年7月10日，是一名出色的摩萨德特工。他是大学数学专业毕业，并且是一位计算机能手。

两年后的2001年7月7日，瑞士联邦法院刑事法庭经过审理，以间谍行为、匿名入境等罪名判处摩萨德特工伊萨克·本托12个月徒刑，缓期一年执行。当时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向瑞士道歉。在以色列向瑞士支付了200万美元保释金后，瑞士才允许伊萨克·本托保释回国。本托是被证实身份后，在境外受审的第一名摩萨德特工。

这一次真是让摩萨德偷鸡不成蚀把米，又一次丢尽了颜面。此案发生不久，摩萨德首脑亚托姆不得不提出辞职。在摩萨德历史上，他应该是任期最短的一位局长。

“铁腕局长”的定点清除计划

亚托姆辞职之后，1998年3月开始，埃弗拉伊姆·哈勒维接任了摩萨德局长一职，成为摩萨德历史上的第九任局长。

哈勒维在英国伦敦长大，他儿时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火车司机。然而，哈勒维于1948年移民以色列后，却走上了职业特工道路。

哈勒维自1998年3月至2002年9月执掌摩萨德期间，以一个“铁腕局长”的姿态出现，接连干了几件让摩萨德露脸的事。其中最出色的一次行动，就是2000年从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眼皮底下，将一批犹太教的珍本古籍悄悄地偷运出境，运到了以色列。

在哈勒维任职期间，正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导人进行“定点清除”的同时，巴勒斯坦也在疯狂地进行报复。于是双方就展开了暗杀比赛。

2001年8月17日，约旦河西岸某地，有四名穿着阿拉伯长袍、头戴黑头巾并佩戴各种银首饰的巴勒斯坦妇女在路边卖着李子和葡萄。但她们的目光却瞟着路过的两位男子。

原来这四名“妇女”并不是妇女，也不是巴勒斯坦

人，而是以色列派出的四名摩萨德特工，正在以卖水果为掩护，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当那两名男子从他们面前路过时，这些特工认为这两名男子就是“杀害无辜的以色列人”的凶手，于是就毫不迟疑地把他们给干掉了。

事后，以色列的一名安全官员对美国记者说，这两人都是“伊斯兰圣战组织”的成员，“他们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任何杀害以色列人的家伙都将付出代价”。

在那些日子里，以色列正在对数十位所谓的进行恐怖活动的巴勒斯坦人实施暗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至少有60名被以色列认定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遭到各种方式的暗杀。

以色列的这种行为立即遭到了国际社会谴责。美国、俄罗斯、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国际人权组织对以色列的这种暗杀行动进行批评，认为这同巴勒斯坦人的那些自杀性炸弹事件一样残忍。

“即便是对美国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爆炸案元凶麦克维那样的恶魔，也要经过审判才将他处死。”一位人权组织的成员说。

“谋杀不能取代严格的法律程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也表示，“我们不认为这种有目标的谋杀是一

种好政策。它是错误的，对任何受其波及的人都是一个可怕的悲剧。”

面对这种指责，以色列则辩解说，自2000年9月底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进行的28起自杀性炸弹爆炸事件及其他数十起攻击行动，已经造成了近150名以色列人死亡。在这场冲突中死亡的巴勒斯坦人则有500多人。

“我们所做的并不是暗杀，而是将自杀性人体炸弹制止在实施途中。”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长兰道说，“作为民主政府，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我们的人民。任何能够拯救生命、拯救以色列国家的行动，我们都将付诸实施。”

这种行动被以色列称为“防御性打击”，据说在以国内获得75%的支持率。在以色列，大多数民众都要求沙龙政府立即制止以巴冲突爆发以来，不断发生的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动；然而，即使在美国，支持以色列这种政策的人也寥寥无几。

当时的国际舆论认为，以色列人的这种谋杀，并没有能够制止巴勒斯坦人的“人体炸弹”。“以色列应该明白：他们这种黑手党式的暗杀只能唤起我们的人民回之以更多的报复。”“哈马斯”组织的精神领袖亚辛说，“我们会有无尽的自杀性人体炸弹待命出征。以色

列要暴力，那么它会得到的。”

面对巴以之间这种愈演愈烈的流血冲突，作为摩萨德的领导人，哈勒维必须同样拿出铁的手腕。因此，哈勒维当时同样参与了多项暗杀行动方案的制定。其中最受争议的行动方案就是围攻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官邸和对他的“定点清除”计划。

2002年5月23日，哈勒维秘密会见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内特，他们的会见主要谈及了巴勒斯坦当局的改革问题，特别是12支安全部队的重组问题。

以色列方面一直反对美国对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军事支持。而美国方面则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保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在访问巴勒斯坦以外地区之后能够返回家乡。

因为在前些日子有报道称，阿拉法特将要访问埃及、沙特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然而那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都向阿拉法特强调说，你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离开你自己的国家。如果你要是离开了巴勒斯坦土地，以色列可能不允许你再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因为这些国家领导人已经掌握了以色列的有关情报，得知以色列总理沙龙和摩萨德头目哈勒维正在制定一项计划，那就是准备将阿拉法特“软禁”在他的官邸，不让他走出巴勒斯坦一步。

阿拉法特也知道自己的出行是很危险的，但是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被困在官邸里也不安全。当时就有一名巴勒斯坦官员向阿拉法特透露，他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摩萨德正准备派遣特工，想办法接近阿拉法特，然后把一种慢性毒药秘密吹入阿拉法特的耳朵，将他毒害致死。

阿拉法特一听就觉得好笑，说这未免有点像天方夜谭里的故事。

这名官员说：“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因为向你的耳朵里投毒比向你开枪要简单而且容易得多。现在你已经被他们的军队围困了，而你又经常要接见许多来见你的人，并与他们拥抱亲吻。凶手只要携带一个充有毒气的小气囊，在同你拥抱时就可以把毒气吹入你的耳朵里。”

后来经多方证实，当时这正是摩萨德准备毒杀阿拉法特的方式之一。

2004年阿拉法特逝世后，一直就有传闻说他是被以色列给毒杀的。因为这让人们想到了1997年摩萨德特工在安曼毒杀“哈马斯”领导人哈立德的往事。而阿拉法特在逝世前，他患病的症状同当年哈立德中毒后出现的症状一模一样。不过当时那些给阿拉法特治病的法国医生却没有找到他中毒的证据，此事也只能成

为一个永远的谜。

不过，注射毒药或者是让对方服食有毒性的食物，然后造成慢性中毒最后导致对方死亡的方法，往往是摩萨德特工惯用的伎俩。当年美国《时代》周刊驻耶路撒冷记者克莱因出版的《回击》一书，就详细记录下了当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如何追踪到巴勒斯坦“人阵”领袖哈达德，并暗中除掉他的全过程，首次曝光了暗杀哈达德的内幕。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



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领土上宣告成立，60万名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1964年，聚集在黎巴

嫩贝鲁特的巴勒斯坦人成立了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久，“巴解”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哈达德和另一志同道合者另立山头，成立了激进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即“人阵”)。

哈达德鼓吹对以色列采取恐怖行动，把每一个以色列人列为打击对象，把世界的每个角落作为恐怖活动的战场。他当时最主要的恐怖活动就是经常制造劫机事件。1968年7月23日，哈达德第一次策划了劫持飞机事件。“人阵”恐怖分子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飞机劫持到阿尔及利亚，胁迫以色列释放20名巴勒斯坦俘虏。

1976年6月27日，在哈达德的一手策划下，一架法航班机被劫持至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二百多名犹太人又成了他手中的人质。不过，这一次以色列却没有让步，而是在摩萨德和以色列空军的配合下，实施了一次震惊世界的“霹雳行动”，成功地解救了人质。

从此以后，哈达德就被摩萨德列为头号追杀对象。后来哈达德为了活命，不得不躲到了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他知道以色列不会放过自己，也深谙摩萨德对付仇敌的各种手段。他知道自己无论是行走在街道上，还是接听电话，都有可能遭到枪杀或炸弹袭击。因此，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哈达德的行动相当谨

慎，从不轻易外出，根本没打算离开伊拉克。哈达德的这种敏感和警觉一度让摩萨德对他无从下手。

但是以色列人的坚忍让摩萨德一直没有放弃。终于，摩萨德发现了哈达德这位体重达140公斤的彪形大汉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特别爱吃巧克力。当时在巴格达，西方国家制造的纯巧克力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品。

于是摩萨德特工就从这方面下工夫。他们首先买通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让他与哈达德建立了亲密关系，不时为哈达德送上比利时生产的名贵的纯巧克力。哈达德哪里会想到，巧克力上那漂亮的蕾丝镶边竟然是经过摩萨德精心处理过的，里面含有慢性毒药。摩萨德没有马上把哈达德毒死，而是要他在6个月以后，慢慢因体内积聚的毒素而死亡。

几盒巧克力下肚后，哈达德就一病不起。但是医生却始终查不出他得了什么病。因为他的种种症状都与白血病相仿，可血液化验的结果却正常。结果到了1978年3月，医治无效的哈达德终于在东德的一间破旧的旅馆内病逝。当时巴勒斯坦官方给出的死因是白血病，因为验尸官没有查出任何中毒的迹象。

哈达德之死一直是个谜，而深知谜底的摩萨德当然不会透露半点内幕，只是一直偷着乐。直到克莱因

的《回击》一书问世之后，才真相大白。

哈勒维退休后，他在耶路撒冷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国防与安全”栏目的新闻编辑康·库格林的采访时，讲述了他当年的这段情报生涯。

哈勒维说，2002年，以色列出兵围困了阿拉法特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官邸。当时，刚刚出任以色列总理的沙龙决定把阿拉法特“软禁”起来。哈勒维并没有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因为当时他同阿拉法特之间已经结下了“私仇”。因为在2001年10月，与哈勒维私交甚密的以色列旅游部长雷哈瓦姆·泽维在耶路撒冷一家旅馆里，被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给杀害了。哈勒维对采访他的英国记者库格林说：“这是战争时期，在战争中你必须采取激烈措施以击败敌人。”

2004年“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也成了以色列“定点清除”的对象，成了这个计划的受害者。当时，以色列武装直升机向这位老人发射了三枚导弹，导致他当场身亡。哈勒维说，这两起震惊世界的大事件都与摩萨德有关，而自己自然脱不了干系。

哈勒维当时正在筹备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影子里的人》，来向世人讲述他的摩萨德生涯，也希望能够为自己正名。因为即使是到了那时，他对这些决策都没有丝毫的悔意。因为“泽维是我的朋友”，哈勒维在

回忆录中写道。

在那部即将出版的《影子里的人》一书中，哈勒维透露，沙龙起初想将阿拉法特赶出约旦河西岸并将其放逐，但鉴于这样做可能造成的国际影响，沙龙最终才决定将阿拉法特围困在拉姆安拉的官邸中，逐步削弱他的影响力，并且强硬地不改变颇受国际舆论非议的“定点清除”计划。哈勒维本人也自始至终坚持认为这是一项颇为有效的政策。他坚信正是这项计划，迫使“哈马斯”在后来暂时停止了自杀式爆炸活动。“那时巴以双方都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哈勒维说。

《星期日电讯报》在报道中分析，这种力不从心的状态导致了以色列在2001年8月单方面从加沙地区撤军的行动。哈勒维支持从加沙撤军，但却对单边行动颇有微词。他说：“在中东地区，你不能在毫无回报的情况下放弃利益，对方会认为这是示弱的表现。”

对于“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胜出，哈勒维依然不改变他的强硬立场，他说：“如果他们拒绝承认以色列，我们是不可能与之谈判的。”

2002年2月“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在杰宁市的第二号人物那吉耶被遥控汽车炸弹炸死；同年7月，以色列出动数架F - 16战斗机轰炸“哈马斯”加沙城军事领导人萨拉赫·谢哈德的住所，他本人及15名巴勒斯坦平

民在轰炸中毙命。

在哈勒维即将离任的9月，“阿克萨烈士旅”领导人伊萨·阿布·阿巴贾兰姆在加沙乘出租车时又遭以色列火箭弹袭击身亡。

这一系列的“战绩”都和哈勒维执掌的摩萨德连在一起。

2002年9月，埃弗拉伊姆·哈勒维离开了摩萨德。尽管他在这些年内，又让摩萨德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和声誉，但是他没有连任的可能。因为以色列总理沙龙在2001年上台之后，就为摩萨德物色了一位理想的掌门人，并且对这位新的掌门人寄予了厚望。

摩萨德这位新掌门人就是沙龙的老战友和老朋友梅尔·达甘。

第十九章 达甘执掌摩萨德 谍战智斗本·拉登

居住在肯尼亚的以色列人连续遭到了恐怖分子袭击，摩萨德再次公开露面，最后将目标指向“基地”组织和本·拉登，唤醒“休眠”特工，命令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追缉猎杀恐怖爆炸事件的幕后元凶，达甘将“定点清除”发挥得淋漓尽致。

“嘴咬尖刀”的情报“一哥”

2002年9月，就在“9·11”事件刚刚发生一周年之际，摩萨德内部又在进行权力更替，换上了新的掌门人。这位新掌门人就是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的老朋友梅尔·达甘。

梅尔·达甘，原名梅尔·休伯曼。他于1945年出生在一辆由西伯利亚开往波兰的冰冷刺骨的大货车上。当时他的家人为了逃避战争和德国纳粹的魔掌，正惊慌失措地从寒冷的西伯利亚逃往波兰。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呱呱降生，来到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

五年后，这名犹太男孩跟随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父母偷渡到以色列。偷渡船在大海的风浪中挣扎着，随时都有颠覆的危险。当时达甘就蜷缩在黑暗而又潮湿的船舱里，紧紧地靠在母亲的身边。他听到他的母亲在暗暗地祈祷，请万能的上帝保佑他们能平安到达以色列海岸。然而，茫茫大海突然刮起了风暴，几乎掀翻了那艘船。海水不断涌上船头，大人们在恐慌地尖叫。达甘也惊恐地趴在快要倾覆的船舱里，一只手死死地揪着母亲的衣服，另一只手里却紧紧攥着一个橙子。这时他以为自己就要死了。

达甘就是这样随着家人来到了以色列。大海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成了他一生的记忆。他成了摩萨德掌门人之后，以色列的资深记者伊拉娜·达扬曾这样评论他：“在达甘的内心深处，他仍是一个难民。”

达甘的故事就是第一代以色列移民的缩影，这里面承载着犹太民族太多的苦难史。也许正是这段刻骨铭心的难民经历，促成了达甘由一个拿着橙子的无辜

儿童到手握尖刀、崇尚“以暴制暴”的以色列“斗士”的转变。51年后，他被自己的好友、以色列总理沙龙委任为摩萨德的掌门人，他立志要将摩萨德变成一个“牙齿间有把刀子”的间谍机构。

1963年，18岁的达甘高中还没有毕业就退学入伍了。当时他希望能进入以色列国防军中最精锐的特种部队总参侦察队服役，但是未能如愿。后来他被分配到伞兵旅的侦察分队，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他的战友回忆说，达甘是个目的性很强、有准备的人。当其他新兵在刻苦训练之余抓紧时间休息的时候，他却一个人对着树干或者电线杆练习掷飞刀。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达甘作为一名连级指挥官，先后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执行任务。

1970年，达甘奉时任以色列国防军南部军区司令的沙龙之命，组建了一支被媒体称为“暗杀部队”的特别行动部队，在加沙地带秘密行动，追踪、逮捕或暗杀巴勒斯坦活动分子。那时，达甘留着一头长发，充满自信而又勇猛剽悍。有时还会带着他的宠物狗——一条杜宾犬参加军事行动。

在加沙地带的一次战斗中，达甘徒手从敌方一名士兵手里夺走一枚即将爆炸的手榴弹，并因这一英勇的行为而获得首枚战斗勋章。

还有一次，达甘和他的手下伪装成巴勒斯坦人，乘坐一艘渔船进入加沙，与一群“巴解”组织成员狭路相逢，并将其全部歼灭。极端的作战方法减少了以色列境内的恐怖袭击，也表现了达甘性格残忍的一面。达甘手下的一些士兵后来回忆说，他们当时从背后打死了巴勒斯坦人，然后声称对方是想逃跑，达甘并未因此受审。他为自己进行辩护说：“我们从不认为对妇女儿童开枪是可以被允许的行为，但是按照命令开火是两回事，那时的限制很少。”

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达甘作为沙龙所领导的战争指挥部的一名军官，与沙龙共同率军渡过苏伊士运河，使以军在战争中反败为胜。在32年的军旅生涯中，英勇善战的达甘两次获得嘉奖，也曾两度负伤，以至于后来走路必须拄着拐杖。

达甘后来被调到国防军总参谋部，任军事行动部负责人，同时还担任总参谋长特别顾问。

1995年，达甘从国防军退役，曾先后在内塔尼亚胡政府和巴拉克政府中担任总理反恐安全顾问。

应该说，达甘最终能够在几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同他与沙龙的特殊关系是分不开的。两人除了在历次战争中建立的亲密关系和友谊外，2001年沙龙竞选总理时，达甘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达甘崇尚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作风一直延续到他
从军队退役之后。据《新闻周刊》报道，2001年，达
甘曾带领一支特别行动小组调查恐怖分子的资金来
源。当他手下的人告诉他，发现了一家欧洲银行充
当“哈马斯”的洗钱渠道，为“哈马斯”提供资金支持后，
达甘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有这家银行的地址，对
吧？烧掉它！”与会的情报官员们全都惊呆了，他们纷
纷退会以示抗议。

在军旅生涯中，达甘作为沙龙的老部下、老战
友，一直颇受沙龙的赏识。2001年，沙龙当选以色列
总理。他感觉摩萨德的前任掌门人太过“软弱”，于是
决定将摩萨德交到自己的好友达甘手中。

2002年，时年65岁的梅尔·达甘终于取代了亚托姆
将军，成为摩萨德第九任局长。当时沙龙就明确地告
诉达甘，以色列需要一个“牙齿间有把刀子”的间谍机
构。在就职演说中梅尔·达甘信誓旦旦地说：“我将对摩
萨德进行彻底改革，将其置于国际反恐战争舞台的中
心位置。”

他的这种誓言正是沙龙所需要的。因为他的前任
亚托姆毫无建树，已经让沙龙感到很不满意。所以达
甘上任之后，就被坊间称为“嘴咬尖刀”的情报“一哥”。



梅尔·达甘

2002年达甘上任时，曾在他的特拉维夫摩萨德总

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照片。照片上，一名纳粹士兵正举枪瞄准一位犹太老人的头部。这位犹太老人就是达甘的祖父。达甘用这张照片提醒自己为犹太人的自卫和生存而战。他曾经说过：“我们必须强势，利用自己的智慧保卫自己，这样大屠杀才不会再次发生。”

但是，尽管达甘雄心勃勃，踌躇满志，他却生不逢时——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全球恐怖活动最猖獗的时代。一年前发生在美国的“9·11”事件已经将全球的恐怖活动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基地”组织和本·拉登的出场使摩萨德和达甘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遇上了一位江湖高手。

炸弹落在“天堂酒店”

2002年，梅尔·达甘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了当头一棒——居住在肯尼亚的以色列人连续遭到了恐怖分子袭击。

肯尼亚是以色列人的海外度假热点，几年来，前后共有十多万以色列人到肯尼亚度假。当时肯尼亚本身的人口约2900万，以基督徒为主，穆斯林是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的25%。肯尼亚自1963年脱离英国独立后，以色列一直与这个东非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和友好的关系。1973年中东战争以军占领埃及西奈半岛后，曾有30多个非洲国家表态支持埃及，跟以色列断交，但肯尼亚并没这样做；1976年，以色列派遣的特别行动突击队到乌干达解救人质，肯尼亚又大力协助并提供后勤支持。

但是，肯尼亚却是一个是非之地。因为在肯尼亚东邻的索马里，多年来一直是拉登“基地”组织在非洲南部的根据地，设有好几个训练营。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的大使馆遭到袭击，导致231人丧生，其中包括12名美国人，另外还有5000多人受伤。几乎就在同一时间，美国驻肯尼亚邻国坦桑尼亚的大使馆也发生爆炸，导致12人丧生，80多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政府因担心恐怖分子会在当地再针对他们进行袭击，随即协助肯尼亚政府训练治安人员，防止再有恐怖事件发生。

美国联邦调查局从2001年开始，一直在肯尼亚东南沿海村庄，追踪涉嫌与肯尼亚使馆爆炸及“9·11”袭击有关的恐怖分子。肯尼亚情报官员称，“9·11”事件发生之后，蒙巴萨街头曾出现了不少支持拉登的标语，其中的一条街道甚至在“9·11”之后竟然被人改名为“拉登街”。

那些年，在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方面，以色列和美

国可以说是一对“难兄难弟”。据统计，近年来，美国人在国外受到恐怖袭击的次数最多，死伤人数也最多；而以色列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

2002年11月28日早晨，肯尼亚海滨旅游城市蒙巴萨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生两起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事件：以色列人经营的一家“天堂酒店”遭到自杀爆炸袭击；一架从蒙巴萨起飞的以色列客机差一点被导弹击中。

蒙巴萨是肯尼亚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广受以色列人欢迎的旅游城市。11月28日上午8时30分左右，约140名以色列游客乘该国拉基阿航空公司的包机抵达蒙巴萨，前往“天堂酒店”入住。饭店特地组织了一群肯尼亚儿童在大堂跳起桑巴舞欢迎来宾。当游客们正在办理登记手续时，三名外貌长得像阿拉伯裔的袭击者突然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绿色帕捷罗四轮驱动吉普车，撞倒酒店门口的栏杆后冲入酒店大堂。一名袭击者从车上跳下来，冲向登记处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与此同时，另外两人则引爆了车上的炸弹。只听几声巨响，众多客人和儿童逃避不及，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据当地警察部门统计，至少造成15人死亡，80多人受伤。死者中有9名非洲人，3名以色列人，3名作案者也当场粉身碎骨。这座“天堂酒店”大楼也受到严重

损毁。

有酒店员工说，袭击发生时，有一架小型飞机在酒店上空盘旋，并投下三枚炸弹，一枚落在酒店游泳池，一枚落在楼顶，还有一枚落在海里。“天堂酒店”附近另一座以色列酒店的老板哈梅尼胆战心惊地说：“我看见大堂里许多尸体。整座酒店都烧了，到处都是浓烟，酒店整个楼顶也塌了下来，而撞入饭店的汽车已完全损毁。”

就在爆炸发生前的几分钟，一架载有261名在蒙巴萨欢度完假期的以色列乘客的IZ582号客机返回特拉维夫。这是一架以色列拉基阿航空公司的波音757客机，上有机组人员10人。飞机起飞后，三枚地对空导弹向客机呼啸而来，与客机擦身而过，在离飞机不远的高空爆炸，部分碎片击中机身，所幸客机只受了轻伤。在与以色列官员进行协商之后，机长随后决定直接飞回以色列。最后在以军战斗机的护航下，客机于当地时间12时40分安全降落在特拉维夫机场。

袭击事件发生后，一个前所未闻的自称是“巴勒斯坦军”的团体给路透社发来传真，声称他们派出两组人马到肯尼亚执行攻击任务。他们还称，这次攻击是刻意选择在“巴勒斯坦被分割55周年纪念日”，以谴责联合国通过这项让犹太人欺压阿拉伯人的决议。行动日

期之所以选择在11月28日，是因为1947年11月29日是联合国决议通过之日。这项联合国决议将巴勒斯坦一分为二，由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各占一半。伦敦一名支持拉登组织的伊斯兰领袖巴克里28日称，有伊斯兰武装组织一星期前就曾在网上聊天室警告会在肯尼亚发动袭击。

以色列人在蒙巴萨市受到连续攻击之后，蒙巴萨警方在机场附近找到了导弹发射器和其他器材。警方表示，两起袭击分别是由两个三人小组进行的。警方指出，在距机场2公里处，有人从一辆白色三菱帕捷罗车上至少发射了两枚导弹。当时三名阿拉伯裔人坐在车里，事后逃走了。肯尼亚警方已在蒙巴萨拘捕了两名男子，怀疑与袭击包机事件有关。

当天下午，蒙巴萨又有一架载有16名欧洲游客的轻型飞机坠毁，至少7人受伤。当局表示会调查坠机事件是否与导弹袭击以色列包机有关。

蒙巴萨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政府决定所有从国外机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全部暂停，以色列国防部长莫法兹立即宣布向肯尼亚派遣一支紧急医疗队，救援以色列伤员；并命令以色列空军马上派出专机，负责把在肯尼亚受伤的以色列公民运回国内接受治疗。

在肯尼亚度假的以色列人接连受袭事件震惊了以

色列全国。以色列政府表示一定要向施袭者进行强硬报复。除了怀疑是拉登的“基地”组织所为，有的“鹰派”高官更将矛头直指巴勒斯坦人。

摩萨德唤醒“休眠”特工

2002年11月28日，正是以色列右翼执政党利库德集团进行领导人选举之日，时任总理的沙龙获胜，有可能在明年1月的大选中胜出，连任以色列总理。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北部贝特谢安镇一个利库德集团选举投票地点发生枪击事件，至少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警方称，事件发生时，至少3名枪手向等候投票的人群开枪并投掷手榴弹。枪手随后被当地保安人员击毙。当天上午，沙龙就曾在发生枪击事件的市镇附近投票。事件发生地距离沙龙投票的票站仅有10分钟车程。当时警方称，这次袭击的目标很可能是针对沙龙的。事后没有组织宣称对此次枪击事件负责。

以色列总理沙龙的顾问舒瓦尔称，沙龙早前已下令，要求摩萨德会同国防部等部门共同调查。多数猜测仍认为，“基地”组织很可能是攻击案的幕后主使。舒瓦尔也指出：“近来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攻击事件，无论是印尼巴厘岛爆炸案还是蒙巴萨攻击案，其手法

都大致雷同。”

当时肯尼亚警方已经在机场附近四处搜捕长相类似阿拉伯人的男子，一共抓到了12名嫌犯，除一人是肯尼亚人外，其余全为外国人。

当时摩萨德立即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召开紧急会议重新审查在国外的工作计划，二是立即派人前往有以色列代表机构的世界各地和关系以色列利益的敏感地区，以加强防范措施，避免新的针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从28日晚间到29日中午，大批摩萨德人员和以色列安全人员离开特拉维夫，前往相关地区加强那里的保卫工作。

摩萨德派出的调查团抵达肯尼亚首都后，立即和肯尼亚情报机构以及美国、英国调查人员一起进行调查。

通过初步调查，摩萨德把目标锁定了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局长达甘认为，从种种迹象表明，在当时也只有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才敢于向美国和以色列挑衅。

那么，本·拉登是何许人也？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与以色列抗衡呢？

本·拉登1957年3月10日出生于沙特的吉达，在52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17。拉登在吉达接受了中小学教

育，之后进入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并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他当过工程师，靠石油及建筑业发财，在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国家拥有数家公司，个人财产估计达数十亿美元。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拉登离开家庭参加了阿富汗“伊斯兰圣战组织”，展开了反对苏联的斗争。拉登组织了一批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志愿者，提供他们去阿富汗的路费，还建设了一些训练设施。拉登还把世界各地的游击战、破坏和隐匿专家聚集在一起，为他们提供战术指导。

阿富汗战争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抗和全球争霸的一部分，当时的本·拉登不仅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甚至还有人将其称为“英雄”。拉登的许多阴谋诡计和暴力手法就是从中央情报局那里学来的。美国给了这些“抗苏斗士”们大量援助，其中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导弹等尖端武器。中央情报局每年拨出5亿美元军费来武装和训练贫穷且手无寸铁的游击队员。美国高科技武器中的不少尖端产品陆续进入了拉登的兵器库。

1988年，拉登及其“圣战者”们建立了一个名为“阿尔·伊达”的大本营，专门训练“圣战者”。“阿尔·伊达”的目的就是采取极端暴力手段推翻几乎所有的在拉登眼

中看来“腐败无能”的穆斯林政府，驱逐这些国家的西方势力。



被美国视为头号恐怖分子的拉登

1989年苏联撤军后，拉登重返沙特。由于和沙特政府发生矛盾，1994年4月拉登的沙特国籍被取消。

1996年5月，拉登辗转返回阿富汗，巩固了他的基地，从此通过高科技手段同阿拉伯世界的追随者进行联系。

在见过拉登的西方记者眼里，拉登是一个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害羞的人，身材瘦削，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像个文弱书生，平时常穿一件白色的阿拉伯长袍，讲起话来轻声轻语，极有礼貌，跟阿凡提一模一样。

1998年2月，本·拉登组织了“伊斯兰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国际阵线”（“伊斯兰圣战组织”是其派生组织）。本·拉登宣称：“美国人是真正的恐怖分子”，华盛顿在中东的驻军是“十字军”。拉登说，他毕生的目标就是使用暴力手段，将所有的美国人赶出伊斯兰世界，不管他是军人还是平民，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儿童。拉登认为，打击美国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恐怖活动。

1998年5月，拉登说，美国陷入黑暗的一天将会很快到来，不久将有震惊世界的暴力事件发生。果然时隔不久，美国驻东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使馆同时发生爆炸。

美国立即悬赏500万美元捉拿拉登。克林顿还不惜动用巡航导弹对苏丹的希法制药厂和拉登穴居的阿富

汗山区进行轰炸。

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本·拉登发现，由于阿富汗陷入军阀混战之中，非常不利于自己创建的“基地”组织继续发展壮大，他决定带领手下“走进”非洲，并在国土面积广大但经济落后的穆斯林国家苏丹“隐居”起来。

有消息说，拉登前后共在苏丹生活了四年，期间他充分利用当地混乱的局势和相对宽松的治安措施，在“非洲之角”地区建立了完善的恐怖组织体系，并成功取得了当地穆斯林的“同情与支持”。

由于非洲之角地区阿拉伯后裔的穆斯林人口众多，因此非常适合拉登招兵买马并休养生息。拉登最初前往非洲的目的是“避难”，可后来他发现这里原来可以成为自己的根据地和大本营。美国认为，1992年，正是拉登头号军事顾问阿提夫在索马里策划并导演了“黑鹰坠地”的惨烈场面。这位恐怖头子鼓动当地群众将美军士兵尸体拖过摩加迪沙的大街，迫使美国总统克林顿立刻从索马里收兵回国。

1998年8月7日，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被炸，结果造成219人丧生，与此同时，在肯尼亚邻国坦桑尼亚，美国大使馆也遭到袭击。美国随后认定“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策划了这两起袭击事件，并对苏丹多处拉

登“产业”和藏身地发动了空袭。拉登再次逃回了塔利班控制下的阿富汗。

肯尼亚事件发生后，刚刚当选利库德集团主席的看守内阁总理沙龙在事后发誓要进行报复。

当世界正在对沙龙内阁拭目以待的时候，英国媒体11月29日披露说，在事件发生之后，紧急飞赴肯尼亚的并不是以色列国防军的医疗救护队，而是一个由资深特工组成的摩萨德别动队。这支别动队的任务是：部分特工立即对现场展开勘探，尽最大可能搜集线索，以期能判定制造恐怖事件的幕后黑手；部分特工与肯尼亚警方和情报机构展开情报交流，以图获得最有价值的线索；部分特工则利用以色列与肯尼亚的特殊关系，以及以色列人在蒙巴萨的历史渊源，对这起恐怖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12月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出更为惊人的消息：摩萨德开始唤醒“休眠”特工，命令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追缉猎杀制造蒙巴萨恐怖爆炸事件的幕后元凶！

所谓的“休眠”特工，就是奉命长期潜伏在世界各地，只有在以色列重大利益受到危害时才开始行动的摩萨德秘密行动人员。尽管这些“休眠”特工个个身手不凡，都接受过摩萨德的专业训练，但他们抵达潜伏

地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会参加任何的行动，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然而，一旦接到命令，他们就恢复特工本色，立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行动。

摩萨德这一次唤醒的“休眠”特工中，就包括一支曾令恐怖分子闻风丧胆的“死神突击队”。这支突击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具体地说就是1972年9月。当时，全世界千百万电视观众都在谛听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的旋律，观看以色列在特拉维夫机场迎接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被“黑九月”恐怖分子杀害的11名以色列运动员实况，摩萨德立即组成一支“死神突击队”在世界范围内追杀制造“慕尼黑惨案”的元凶或其他暴力行动的罪魁祸首。他们当时开列了一份“死亡名单”，上面列出的追杀对象也是11个人。经过这支暗杀小组的卓越工作，被追杀的对象一个都没有放过。摩萨德以自己的行动向那些恐怖分子宣告，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安全之地了。以色列人复仇的“大卫之剑”可以说是无所不及。

摩萨德这次动用“休眠”特工，希望达到同样的效果。

11月29日，几乎与摩萨德特工同时出现在肯尼亚恐怖袭击现场的，还有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的秘密特工。他们的任务是协助肯尼亚和以色列进行调

查，迅速查清这些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拉登有关。

美国特工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出现在肯尼亚现场，是因为他们自“9·11”事件发生之后，就一直在非洲调查“基地”组织在当地的活動情况，但效果不理想。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说：“非洲各国之间边境线、海岸线漫长，人口众多，所以恐怖分子非常容易在此隐身。”

但是，尽管有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协助，肯尼亚仍无法确定谁是这起恐怖事件的幕后指使。12月1日的《纽约时报》引述肯尼亚内政部长苏库里的话说：“以前基地组织也炸过肯尼亚，所以我们不能将基地组织排除在外。”

直到 12月8日，“基地”组织才正式宣布，对两起针对以色列人袭击事件负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摩萨德首脑达甘应总理沙龙的要求，马上派出两名特工前往肯尼亚介入调查。

摩萨德的这次公开调查行动，也是该机构自1972年德国“慕尼黑惨案”以来再次公开露面。这也是摩萨德首次公开介入全球反恐战争。

虽然在针对“基地”组织的反恐战争中，摩萨德还算是新手，但是摩萨德对拉登这个人并不陌生，并且在“9·11”事件发生的五年前，就曾制订过一个暗杀拉登

的计划。

1996年，摩萨德在协助美国和埃及情报部门对一起试图暗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阴谋进行调查时，发现本·拉登就是暗杀阴谋的参与者之一，于是，摩萨德就在设计怎样除掉本·拉登。当时，摩萨德把目光锁定在本·拉登的一位女性密友身上，对她软硬兼施，最终逼得这位女士同意加入暗杀本·拉登的秘密行动。据披露，当时以色列的“游说”工作得到了该女士出生国的情报机构的大力协助。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当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关系恶化引发了一场新的危机，导致了摩萨德和外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于是蓄谋已久的暗杀本·拉登的计划也宣告流产。

2002年12月8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播放了“基地”组织将要对以色列进行新的打击的声明。在此之前，摩萨德情报部门已经得到了重要情报，“基地”组织将对居住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发动袭击。此外，还有多个外国情报机构也都向以色列发去信息，称“基地”组织将袭击目标瞄准了居住在国外的以色列人。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对手，梅尔·达甘并没有感到这是一种威胁。达甘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就职誓言

——“我将对摩萨德进行彻底改革，将其置于国际反恐战争舞台的中心位置。”

巴基斯坦《伊斯兰报》曾报道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将担当起保卫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的任务。摩萨德的情报人员是应美国政府的邀请抵达阿富汗的，预计还有更多的以色列情报人员将陆续抵达阿富汗。

报道说，一个由85人组成的摩萨德特殊小组已经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将与阿富汗政府的安全机构合作，担负起三项任务，一是保卫阿富汗领导人卡尔扎伊，二是帮助阿富汗政府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秩序，三是打击塔利班和阿富汗伊斯兰党等阿富汗反对势力发动的游击战。

卡尔扎伊是当今世界上处境最危险的国家领导人，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想杀掉他，阿富汗的军阀们也在寻找机会对他下手。对他的保卫工作一直由美国特种部队担任，但后来交给了美国一家私人军事公司——戴恩公司。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媒体曾多次报道过戴恩公司派出的人员素质不高。这也许是美国要求以色列情报机构参与对卡尔扎伊保卫的原因之一。摩萨德已经由中东开始走向全球“反恐”战场。

但是，2003年11月15日，位于土耳其历史名城伊斯坦布尔的两座犹太教堂又遭到汽车炸弹袭击。这一爆炸被以色列舆论看作是对摩萨德的一记响亮耳光。从那以后，要求改组摩萨德的呼声更加强烈。

摩萨德局长的“成绩单”

2004年巴以之间又爆发了大规模流血冲突。以色列决定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实施“定点清除”，这就给摩萨德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根据摩萨德提供的准确情报，3月22日，以色列决定首先定点清除“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当天早晨5点，亚辛像往常一样前往加沙城内离家不远的清真寺做祈祷。就在祈祷结束后，保镖们推着亚辛的轮椅准备进入汽车时，等候在清真寺外的一架以军直升机突然发射了三枚导弹，将亚辛和两名保镖当场炸死。导弹爆炸的时候，包括亚辛儿子在内的其他十余人也遭到弹片的袭击受伤。在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的时候，另有至少三人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目睹了整个事件经过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哈达德说，他看到导弹击中了亚辛和保镖们，“他们的身体立即被炸成了碎片”。在清真寺暗红色的铁门上，留下了

几个导弹炸开的裂缝，地上还有一摊红色的血迹和直升机机枪扫射留下的弹孔。亚辛每次出行都乘坐的那辆轮椅也被炸成几块，散落在清真寺的大门外。谁也没有想到，与以色列纠缠了一生的“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发后，以色列军方人士透露，暗杀亚辛的命令是以色列总理沙龙下达的。

4月17日，亚辛的继任者、“哈马斯”的新领导人兰提西又在“定点清除”中丧生。当地时间晚9时左右，加沙城的电力供应突然中断，黑漆漆的街道上汽车仍然在行驶。突然，城内一条繁华大街上传来爆炸声，一辆白色“标志”汽车遭到导弹袭击。

现场目击事件全过程的巴勒斯坦人说，汽车爆炸前，他们并没有听见以色列直升机的轰鸣声，而爆炸过后，头顶才传来“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声音。被炸汽车旁舍法医院内人山人海。“哈马斯”支持者、附近居民纷纷涌向现场，求证这一消息。愤怒的人群在焦黑的汽车内外寻找尸体碎片、死者遗物，最后将汽车翻转过来，站上去呼喊“复仇”口号。

兰提西被抬进舍法医院急救室时，浑身是血，紧闭双眼，但手指还可以动弹。医生们赶紧为他接上氧气、止血……

20分钟后，医护人员证实，兰提西身亡。

不过，尽管对亚辛和兰提西两次成功的“定点清除”，在摩萨德厚厚的功劳簿上写下了一笔，但是，来自另外一个人的挑战，却让摩萨德和达甘没有心情去庆祝他们的胜利。因为在第二天，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段拉登的讲话录音。拉登在讲话中说：

“我们的行动是对你们行动的回应，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你们杀害了我们的家人，杀害了亚辛，复仇即将来临。对欧洲人的杀害是因为他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所作所为，而那一天在纽约针对美国人的行动则是因为他们与犹太人的勾结和他们在海湾的驻军行动……”

拉登的这段录音不管是真是假，马上在以色列和整个阿拉伯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摩萨德和达甘本人当然清楚，这段被舆论视为体现了拉登政治诉求的讲话，毫无疑问把以色列列为最主要的敌人之一，甚至将“9·11”和以色列联系在了一起。

在对“哈马斯”领导人一次又一次的“定点清除”行动中，最著名的是在2008年，对真主党创始人伊马德·穆格尼耶和叙利亚将军穆罕默德·苏莱曼的谋杀行动。穆格尼耶是莫名其妙地死于汽车爆炸，而对苏莱曼的谋杀行动就显得更为诡异，充分显示了摩萨德的“无影神

功”——当时，苏莱曼正在地中海一处别墅的后院里休息。夕阳斜照，海风悠悠，充满着无限风情。苏莱曼的几名保镖守卫着前门，一个个荷枪实弹。然而就在这时，门前的海面上一艘游艇慢慢驶过，游艇上坐着几位少男少女，正在打情骂俏。游艇过处虽然没有任何异样的响动，但是，靠在太阳椅上的苏莱曼却突然扑通一声倒在地下，一颗子弹正好贯穿了他的头颅。

8年的时间过去了，长得腰粗膀圆却言语温和的达甘没有辜负沙龙的期望。在他的领导下，摩萨德的暗杀行动和“定点清除”策略得到加强，配合以军清除了多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高级领导人，一扫过去的阴霾，让摩萨德恢复了其无情与高效的本来面目，在以色列国内以及国际上都声名大振。达甘本人也获得了连任。据说不是达甘每周去总理办公室汇报，而是内塔尼亚胡经常到他的办公室来，像老朋友一样和他谈工作。

再有两年的时间，梅尔·达甘就可以功成名就，全身而退了。但是，发生在2010年的“迪拜门”却将他和摩萨德以及整个以色列都推入了世界舆论的深渊。

第二十章 “迪拜门”谍影迷茫 以色列有口难辩

马巴胡赫机场泄密，内塔尼亚胡用对摩萨德特工的一声“祝福”为他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乔装酒店服务员的女特工骗开房门，其他特工一拥而入用电击和注射药物等手段制造了“迪拜门”；假造护照引起外交纠纷，摩萨德再次成为世界舆论焦点。

总理签署了“死亡通知书”

2010年新年伊始，“迪拜门”暗杀事件让摩萨德再次成了世界舆论的焦点。

迪拜酋长国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第二大酋长

国，位于出入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内湾的咽喉地带。迪拜市是阿联酋第二大城市，位于阿拉伯半岛中部、阿拉伯湾南岸，是海湾地区中心，被誉为“海湾明珠”。近20年来，迪拜利用“石油美元”建成了一系列现代化配套基础设施，使得迪拜成了奢华的代名词。

迪拜是座风景秀丽的海湾城市，并被定位成阿拉伯世界“悠闲之都”。不过在这浮华的背后，永远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当地那些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内经常有谋杀事件发生。近年来，迪拜已取代了贝鲁特，成为恐怖分子和黑道社会进行各种罪恶的交易场所，成了买卖情报和政治谋杀的行动中心。2010年1月20日，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高级官员马哈茂德·马巴胡赫就在迪拜市布斯坦罗塔娜酒店遇刺身亡，成了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时年50岁的马巴胡赫出生于加沙杰巴里亚难民营，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创始人之一。从1989年开始定居叙利亚。20世纪80年代策划绑架了两名以色列士兵和一系列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从此成为摩萨德追杀的对象。



阿拉伯世界“悠闲之都”迪拜

由于这些原因，马巴胡赫被暗杀后以色列成了主要怀疑对象。

尽管真相曾一度扑朔迷离，但布斯坦罗塔娜大酒店内的闭路电视监控和迪拜警方的尸检报告却显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用毒药注射或电击等手段，将马巴胡赫之死伪造成心脏病复发的假象，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惯用的刺杀手法便是注射药物或使对方窒息死亡。

后来，迪拜警方和有关部门根据有关资料，初步还原了这起“暗杀门”的全过程——

2010年1月初的某一天，两辆崭新的黑色奥迪A6

轿车停在以色列港口城市特拉维夫北部郊区一座小山丘上，车子的背后是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小楼——这里就是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的总部。

车子停下来后，先是一名以色列军官和总理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从车里出来，站在车子旁边，然后走出汽车的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走出车子后，与等候在车门边的梅尔·达甘握手寒暄。摩萨德局长梅尔·达甘时年64岁，依然精神焕发。这时他手里拄着一根拐杖，和总理握了握手之后，就匆匆地把内塔尼亚胡和另外一名军官带进了室内。

此时在摩萨德总部的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正坐着一群摩萨德特工，他们就是准备前去暗杀马巴胡赫的暗杀小组成员。他们正一边开会，一边等待总理的到来。内塔尼亚胡在达甘的陪同下走进来了，同这些特工礼节性地打了一下招呼，会议继续进行。整个会议进行的时间并不长。最后由内塔尼亚胡拍板定局，批准这项举世震惊的暗杀计划，同意摩萨德马上派出特工赶赴迪拜，暗杀巴勒斯坦“哈马斯”的高级指挥官马哈茂德·马巴胡赫。

在会议结束时，内塔尼亚胡以深沉的嗓音，对所有在座的人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声：“以色列人民信任你们，祝你们好运。”

这些人心里都明白，内塔尼亚胡的这声“祝福”，其实就是亲手签署了一道“死亡追缉令”，或者是马巴胡赫的“死亡通知书”。

几天以后的2010年1月19日，阿联酋航空公司的EK912次航班由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机场起飞，马巴胡赫就在这架飞机上。他没有带保镖，也没有任何随从人员，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这是马巴胡赫一贯的风格。

马巴胡赫的行动一向是谨慎而又保密的，这一次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机场上，他用手机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这个细节，让早就潜伏在机场的摩萨德特工掌握了他此去迪拜的行踪，并且知道他到迪拜后下榻在那家叫布斯坦罗塔娜的五星级大酒店，甚至还知道他入住的房间号码。

据事后巴勒斯坦有关方面透露，马巴胡赫这一次去迪拜不是旅游观光，也不是去寻欢作乐，而是去为哈马斯谈一笔军火交易。

这架EK912次班机起飞后，就一直向南飞去。潜伏在大马士革机场的那位摩萨德特工马上用暗语发送了一条信息：目标已在飞往迪拜途中。

接收这条信息的正是摩萨德的那个暗杀小组。此时，暗杀小组的11名成员已经身在迪拜。几天前，他

们使用伪造的欧洲护照分别去了巴黎、法兰克福、罗马和苏黎世等地，然后又分别由那些城市飞抵风光旖旎的迪拜市。这11本假护照中，有6本是盗用了侨居以色列的英国公民身份炮制，剩下5本护照中有3本是爱尔兰护照，1本法国护照和1本德国护照。除6本英国护照外，其余5本护照都是伪造的。这些特工人员所持护照的名字和号码属欧洲人所有，但在护照上却是贴上了他们自己的照片。

暗杀小组到了迪拜之后，分头入住了迪拜国际机场附近的酒店，包括布斯坦罗塔娜酒店。就像以往每次行动之前一样，他们还在当地找了一家宾馆，在房间内进行了严格的模拟训练。不过这家宾馆的负责人和那些服务员却完全不知情，以为他们是在玩某种有趣的游戏。

这次暗杀行动的头目使用的是法国护照，他的化名为彼得·埃尔万热。还有一位名叫盖尔·福利亚德的女性，她在所有公布的女嫌犯当中非常引人注目。据悉，盖尔是摩萨德中最精英的“短剑”小组48名成员中仅有的6名女特工之一。她当时使用的是爱尔兰护照。

迪拜警方事后公布的酒店监控录像显示，暗杀小组采取的行动“十分专业”。在整个暗杀行动期间，他们多次更换下榻的酒店，不时更换自己的伪装，包括

戴假胡子、假发等；负责望风的成员成对在酒店大堂晃来晃去，但在每个地点逗留的时间都不会很长。此外，他们一直只用现金付账。

那个名叫盖尔·福利亚德的女特工去了迪拜机场，她要去为马巴胡赫“接机”。马巴胡赫一下飞机，盖尔就始终盯着他。马巴胡赫取走行李，走出机场大门并截的士前往酒店后，她通知了迪拜特工组头目。根据事先部署，特工组全部乔装成游客，分五个小队行动，四队负责监视，一队负责暗杀。当马巴胡赫到达酒店登记时，至少一人站在他附近偷听房号，另两名身穿网球运动装的特工则跟他乘同一电梯，确定其入住房号，然后订下对面房间。

在暗杀活动中，福利亚德与另一名使用爱尔兰护照的成员“凯文·达弗罗恩”负责在酒店二楼望风。那天下午，两人都更换了居住的酒店，并且装扮成了酒店工作人员的模样。光头的凯文戴了深色的假发和眼镜，而福利亚德则摘掉了金色假发，露出黑色的头发。

在整个行动过程中，暗杀小组11名成员十分谨慎，为了协调各自的行动以便跟踪暗杀目标，暗杀小组成员选择使用精密的短程通讯设备。尽管如此，迪拜警方仍然追查到，有暗杀小组成员曾经使用三部手

机，与奥地利的潜在指挥部四名成员通过电话和短信密切联系。

被称为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败笔

19日下午3点25分，在暗杀小组成员的密切注意下，马巴胡赫登记入住布斯坦罗塔娜酒店。与以往一样，马巴胡赫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他选择了没有阳台的房间，并且锁紧了窗户。抵达酒店后，他还将装有文件的箱子存进了酒店的保险箱。

然而，马巴胡赫并没有注意到，自己搭乘电梯到二楼时，有两名男子跟着他一起进了电梯。其中一人身材矮胖，留有小胡子，另一个则更高一点。两名男子都穿着运动服，带着网球拍，看上去与其他到迪拜享受冬季阳光的欧洲游客没有任何区别。

走出电梯后，马巴胡赫在酒店服务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230号房间。在他身后，高个男子悄悄跟着穿过走廊，记下了马巴胡赫的房间号，以及对面的房间237号。这些异常情况，马巴胡赫完全没有注意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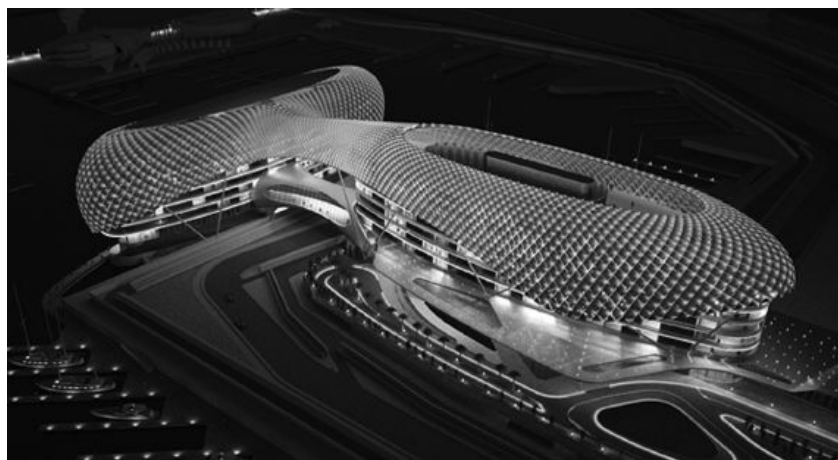
负责跟踪的高个男子随后将马巴胡赫所住的房间号码，以及对面的房间号第一时间通报了后台的指挥部成员，后者又通过电话告诉了仍在布斯坦罗塔娜酒

店附近“潜伏”着的埃尔万热。

距离马巴胡赫登记入住还不到一个小时，暗杀小组已经确认237号房间无人居住，便电话预订了这个房间。随后，七名暗杀小组成员先后进入这个房间，开始等待机会刺杀他们的目标。在接下去的几个小时内，237号房间成为了暗杀小组的临时“补给站”。

尽管没有目击证人，但酒店的监控录像忠实记录下了随后几个小时发生的事。

借着马巴胡赫短暂离开酒店去见一个接头者的机会，四名魁梧的暗杀者迅速来到了237号房间。



布斯坦罗塔娜酒店

或许是出于建筑设计方面的原因，没有监控摄像头安置在能够拍摄到马巴胡赫所住230房间房门的位置。因此，没有任何视频显示暗杀小组如何进入到230房间。酒店的监控录像显示，在8点左右，暗杀人员尝

试着改变马巴胡赫房间的门锁，而在二楼大堂负责望风的凯文则将一名乘坐电梯来到二楼的客人吸引住，给同伙争取时间。

晚上8点24分，马巴胡赫回到了酒店，他没有意识到，这时暗杀他的人已经全部到位。

8点46分，即马巴胡赫回到酒店不到20分钟，监控摄像头拍到了四名暗杀者离开酒店二楼。在他们之后，原先在237房间的望风者也相继离开，接着是酒店大堂里的监视小组。

显然，暗杀小组对行动结束后的收尾工作也安排得十分周详。不到两个小时，凯文和福利亚德已经登上了前往巴黎的飞机。其他暗杀小组成员则分别搭乘飞机经由欧洲前往香港、南非等地。

直到第二天下午1点30分，马巴胡赫才被发现在房间中气绝身亡。当时警方没有发现任何强行闯入酒店的痕迹，马巴胡赫最初被判定为死于心脏病突发。

不过，随后的尸检发现，马巴胡赫的两边耳后有电击的痕迹，他的鼻子流血，牙齿有损伤。法医发现，死者旁边的另外枕头上残留有他的血迹。据推断，凶手曾拿枕头捂住死者的鼻子和嘴巴，令其窒息。

结合酒店的监控录像，直到这个时候，迪拜警方

才相信这是一起暗杀。

2月15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警方宣布，11名持有欧洲国家护照的神秘特工是刺杀“哈马斯”领导人的真凶，并且公布了这些特工的照片、姓名和护照号码。

然而关于马巴胡赫的确切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据称，警察和法医没有发现马巴胡赫患有心脏病。马巴胡赫的血液样品被送到法国巴黎分析检测后，检测人员从中发现了有毒物质。“哈马斯”武装组织随后宣称，暗杀者将毒药注入马巴胡赫的体内诱发他突发心脏病死亡。

而马巴胡赫的弟弟法耶兹·马布霍则说，马巴胡赫“被扣在头上的电器电击致死”。

马巴胡赫的遗体被安葬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

马巴胡赫一案发生后，“哈马斯”谴责说摩萨德是这起暗杀行动的罪魁祸首。随后，迪拜公布了宾馆录像，录像清晰地再现了当时的场面，这也使得这次暗杀活动成为摩萨德历史上第一次被监控记录下的暗杀行动，被称为摩萨德历史上最大的败笔。

为报复以色列，“哈马斯”开始向其海滨地区投放“炸弹桶”。以色列则派出拆弹机器人专门在靠近加

沙地带的海滩上截留这些顺流而来的“炸药桶”。以警方透露，爆炸装置重约20公斤，配备远程控制系统。一旦过往船只遭这样的爆炸装置袭击，将造成严重后果。

多国护照节外生枝

暗杀事件发生之后，国际刑事警察组织于2月18日发布红色通缉令，追捕刺杀“哈马斯”军事组织领导人马哈茂德·马巴胡赫的11名嫌疑人。阿联酋警方当天说，几乎可以肯定这起暗杀事件是由以色列情报机构参与制造的。这一起暗杀事件犹如一个导火索，再次点燃巴以间的仇恨火焰，埋下双方发生新冲突的隐患。

迪拜警方并没有公布摩萨德特工是如何谋杀马巴胡赫的录像，外界有两种推论：其一是趁着马巴胡赫外出，摩萨德特工潜入房间，等他回来实施谋杀。但这样的话，他们就必须顺利通过房间的电子锁，这是最大的困难。第二种可能是摩萨德特工假扮酒店工作人员诱使马巴胡赫开门。特工得手后，还在酒店房间门口留下“请勿打扰”的牌子。

马巴胡赫一直非常小心，他用假护照进入迪拜，

特意挑选了一间窗户密封且没有阳台的房间，以防他人潜入。在酒店期间他甚至没有喝过一口水——害怕有人在水中下毒。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他生命最后6个小时，特工一直在他身边监视着他。

“迪拜门”让整个世界震惊。迪拜警方说，现实情况表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是谋杀马巴胡赫的元凶。尽管以色列谴责这种论调毫无根据，但不可否认的是，暗杀事件已经演变成国际外交争端。为报复摩萨德暗杀马巴胡赫，“哈马斯”多次发出警告，要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开战。

迪拜警方负责人查希·哈勒凡说：“（刺杀行动）可能是摩萨德特工所为……但不排除其他组织暗杀马巴胡赫。7名甚至更多嫌疑人参与暗杀，他们持有不同欧洲国家的护照。”哈勒凡拒绝谈论具体国家，他说：“我们眼下正与这些国家政府取得联系，调查护照的真实性。”

由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使用了由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奥地利等国签发的护照，因此，所有相关国家均要求以色列说明护照造假问题。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过去常派拥有双重国籍或假护照的情报人员进行暗杀行动，此次自然难脱“故伎重施”的嫌疑。

英国与爱尔兰在事发后相继召见以色列大使，严词要求以色列必须配合国际调查，说明护照的来源。英国外相米利班德表示，英国首相布朗已针对此事启动调查，希望以色列能与英国合作。爱尔兰外长马丁也说，任何破坏爱尔兰护照信誉的行为，爱尔兰均会严正看待。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则表示，已有情报显示，德国将被迫对马巴胡赫的死因进行调查。2月25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蒂芬·史密斯紧急召见了以色列驻澳大使，言辞强硬。史密斯在会见后说：“我们的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严重的、通过伪造或盗用身份来滥用澳大利亚护照的事件，目前我们尚未得出结论，但我已向以色列大使表明，如果调查结果显示刺杀案件涉及的澳大利亚护照是以色列官方授意、或经以色列政府允许而伪造的，澳大利亚将认为这是不友善的举动。”世界舆论一致指向以色列。

法国外长库什内则在迪拜警方公布新证据后，谴责了摩萨德疑似介入马巴胡赫刺杀案，同时还大力呼吁欧盟国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

此外，由于嫌疑人所持有的信用卡出自美国，尽管在迪拜境内他们全部使用现金，但前往迪拜的机票用信用卡购买，这暴露了他们的许多信息。美国媒体披露，美方很可能以此为由介入案件的进一步调查。

奥地利也卷入这次事件当中，据悉，嫌疑人所用的手机卡均来自奥地利。

欧洲国家的立场无疑让以色列的国际处境变得相当难堪。

而在中东，伊朗核危机也在发酵的情况下，以色列的任何举动都可能引发难以预知的冲突。在马巴胡赫刺杀案前，伊朗一名核专家在家门前遇刺，伊朗方面指责以色列是幕后凶手。

慑于公众压力，摩萨德宣布暂时中止在中东地区的一切间谍活动，主要是因为担心其特工的安全再也无法保证。但尽管如此，很少有人相信，这个甚至敢跟美国中情局叫板的间谍机构会因此而销声匿迹。

对以色列来说，他们面临的指责声越来越大。几名生活在以色列的英国人抱怨，摩萨德特工在秘密谋杀过程中伪造使用自己的护照，致使自己平白无故卷入谋杀争端中，甚至面临被暗杀的危险。

迪拜发生的“哈马斯”高官马巴胡赫被暗杀事件，把即将退休的摩萨德头目梅尔·达甘推到了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国际和国内要求达甘立即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以色列强人的命运究竟将何去何从，尚无定数。

“鹰派”作风树敌无数

迪拜刺杀案发生后，虽然有人要求达甘辞职，但是大多数以色列人依然支持他留任。以色列情报机构研究员艾龙·本·戴维认为，这是因为达甘重振了摩萨德过去在中东地区令人闻风丧胆的气势。

达甘的“鹰派”立场和强硬作风在为他赢得尊敬的同时，也为他树敌无数。

在情报领域，最激烈的竞争莫过于经费的争夺。达甘执掌摩萨德后，除了改革摩萨德内部外，也加强了与以色列另两大情报机构——军事情报局及国内安全局（辛贝特）的竞争，让对手抱怨甚多。他曾任命一个化名为“A先生”的官员专门给军事情报局找难堪。由于关系紧张，军事情报局的官员对摩萨德的总部大楼敬而远之，他们也直接用“A先生”来称呼达甘。

在以色列国内，在摩萨德内部，达甘同样得罪了不少人。他常常秘密视察各工作站，对特工大吼：“最近为我做了什么事？”他的暴脾气引发了辞职潮，200多名摩萨德雇员在达甘当政时期辞职。“让他们走。”他对此不以为然，并且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尽管达甘令摩萨德声望日高，但是却以频频损害

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作为代价，这也是达甘最饱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新西兰曾经中断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因为摩萨德窃取其国民的护照信息，用来进行刺杀行动。

瑞典曾经召开特别议会，通过议案希望以色列恪守自己作为文明国家的本职，不能在国外开展刺杀行动。

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更是紧张。2009年2月17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引用美国情报机构的消息说，以色列已经改变了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战略，改为进行“秘密战争”，即利用暗杀和破坏小组、空壳公司、双重间谍，阻止伊朗实施生产核武器的核计划。以色列“秘密战争”的核心是有组织地消灭伊朗实施其计划的主要人物。

报道说，以色列政府认为，鉴于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改变了布什政府的对伊朗政策，美国新政府不会同意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报道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军官的话说，以色列对伊朗的“秘密战争”是通过伊朗人不知情的方法破坏伊朗的核计划，而这一方法由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实施，在执行过程中与美国情报机构和欧盟空壳公司合作，搜集伊朗核设施的图片、资料和机密材料以及伊

朗导弹的位置等。

报道还说，2007年伊朗顶尖核科学家哈桑布尔神秘死亡以及伊朗铀浓缩和原材料供应链的几个关键人物死亡，这背后就有摩萨德的黑手。

2007年2月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伊朗一名顶尖核物理学家不久前因“毒气中毒”而亡。死亡原因众说纷纭：哈桑布尔死于1月18日，但是他死亡的消息推迟了六天才被两家伊朗媒体公布出来。这两家媒体都表示，该科学家死于“毒气中毒”。而一家电台则称，物理学家的死因是“烟尘吸入过量”。



2006年4月16日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公布的伊朗伊斯法罕铀转化工厂的卫星照片

一名核专家死亡本不应激起太多波澜，但美国战略预测公司在其网站上公布的一个报告宣称，哈桑布尔被摩萨德瞄上已经很久，该公司的情报专家发现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他被摩萨德暗杀。报告给出的死亡原因是“放射性中毒”。据悉，摩萨德早已经将多位伊朗核专家列入黑名单。

2010年1月12日中新社德黑兰消息：伊朗一名核物理学家12日遭爆炸袭击身亡。德黑兰指责这起暗杀事件是美国和以色列特工所为。

官方媒体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遇害者是生前在伊朗德黑兰大学执教的核物理专家马苏德·阿里·穆哈马迪。事发时穆哈马迪正准备开车上班，这时一辆停在他家旁边、绑着遥控炸弹的摩托车突然爆炸，穆哈马迪当场身亡。

报道称，2009年6月，伊朗已有一名任职于该国原子能组织的学者失踪。2009年12月9日，伊朗一位核科学家被绑架。

有报道称，在最近两年里，美国、以色列和欧洲国家通过绑架、策反、暗杀，至少让13名伊朗核科学家“神秘失踪”。然而，西方情报分析家分析认为，近

两年在伊朗和欧洲发生的数起核专家死亡事件非常可能系以色列策划，目的在于阻止伊朗获得核计划项目的关键技术，从而大大延滞伊朗核研发的进程。

“我们提供杀手般的低价”

据英国《泰晤士报》、以色列《国土报》等报道，随着迪拜警方宣布27名持欧洲国家护照的摩萨德特工是刺杀“哈马斯”领导人马巴胡赫的真凶，国际社会为之震惊。然而，一家以色列连锁超市近日却巧妙“搭车”这一热点新闻，模仿迪拜警方公布的“暗杀门”监控录像场景，打出一则雷人促销广告：一对貌似摩萨德特工的男女在超市跟踪一名购物男子，标题是“我们提供杀手般的低价”。消息传出后，立刻在以色列国内引发轩然大波！

值得一提的是，该广告拍摄时刻意放弃了昂贵的高清摄像机，而采用了模糊不清的监视摄像头。这则短片最后，画面上闪出一行雷人的广告语：“消灭价格”、“几乎免费”以及“我们提供杀手般的低价”。末了，那位“女杀手”甚至还模仿以色列在迪拜暗杀案中表现出的态度，对着镜头说“什么都不能承认”。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模仿迪拜警方公布的迪

拜“暗杀门”中的监控录像里的场景。对此，连锁超市毫不讳言。

据该超市的市场广告总监谢菲·萨克德介绍：“对于我们以色列人而言，马巴胡赫就是本·拉登，我们对于暗杀他的行动很自豪。政府可能不愿承认摩萨德是否应对此负责，但是大多数以色列人都相信这是摩萨德所为。”

自从迪拜“暗杀门”曝光之后，以色列许多书店热销摩萨德的大事记，摩萨德组织的官方网站访问量急剧上升，很多人希望获得如何成为间谍的信息。

一名参与拍摄“超市杀手”广告的演员在接受以色列电台采访时不以为然地表示，“这不过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已。既然全世界都认为我们干的……为何我们不趁机拿自己开涮一把呢？”

第二十一章 女杀手天生丽质 准总理政坛称雄

摩萨德“美女特工”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短剑”小组中的6名女特工更是“特工中的特工”；她们中有的被称为“民族英雄”，有的却要用高科技手段“易容”，从此人间“完全蒸发”；唯有以色列前外长是一个例外——尽管她也曾是摩萨德“短剑”小组成员，据说还与一些谋杀案有关，却成了以色列政坛风云人物。

摩萨德“美女特工”不再是秘密

自2008年底以色列进攻加沙造成巴勒斯坦千余名无辜平民死伤后，欧洲国家对以色列的声讨就从未平

息过。2009年12月，英国法院还签发了逮捕令，要求追捕以色列前外长利夫尼，理由是她是以色列出兵加沙的决策人士，难辞其咎。

此令一出，以色列一片哗然。

在以色列，利夫尼可是一个知名度不一般的政坛女强人。她不但是以色列的前外交部长，而且还是以色列前进党的现任领导人。还有人预测她将是下一届的以色列总理候选人。她的经历可以说是充满传奇色彩——因为她曾经是一名摩萨德的“美女特工”。

时至今日，摩萨德“美女特工”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2010年1月20日，“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马巴胡赫在阿联酋迪拜被谋杀之后，迪拜警方就公开宣布，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是刺杀马巴胡赫的最大嫌疑对象，而刺杀者中有数名女性杀手。一时间，摩萨德女特工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据英国《星期日邮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雇佣“美女刺客”搞暗杀是摩萨德的一贯伎俩，这些“美女刺客”会通过“美人计”和“糖衣陷阱”诱惑暗杀目标上钩。她们一个个外表漂亮、身怀绝技，而且又心狠手辣，在暗杀行动中常常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她们有时甚至会亲自引爆炸弹，将暗杀目标炸上西天。

摩萨德从来不乏女特工，前几年，摩萨德甚至在网上公开以重金招募优秀女特工。摩萨德内因表现出色而“成名”的女特工，也不在少数。以下几位是在前文出现过的女特工——

1．谢里尔·本托夫——摩萨德“短剑”小组里一名出色的女特工。成功将出逃在外的以色列前核武器专家莫迪凯·瓦努努诱骗到罗马，押回了以色列，使之以“叛国罪”被判处18年徒刑。

2．达尼米——1967年化名“莫妮卡”，在巴格达的一次招待宴会上“偶然”结识了伊拉克军人雷迪法，成功策反雷迪法驾驶着一架当时最先进的苏制“米格-21”叛逃到以色列。

3．佩妮洛普——摩萨德的一名“休眠杀手”。成功接近策划“慕尼黑惨案”的头号人物萨拉曼，掌握了萨拉曼的作息时间，亲手把萨拉曼连人带车炸上了天。

4．盖尔·福利亚德——“短剑”小组成员，涉嫌刺杀“哈马斯”军事组织领导人马巴胡赫的女刺客。

调查人员相信，盖尔·福利亚德是摩萨德特种分队“短剑”小组48名特工中的6名女特工之一。“短剑”小组成员都是“特工中的特工”，他们接受的训练包括徒手搏斗、武器使用、高速驾驶汽车和摩托车、追踪术等，负责执行刺杀和绑架任务。他们的训练基地位于

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

早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摩萨德负责人梅厄·阿米特就在一份文件中为“短剑”小组的女特工定下了一套一直沿用至今的行为规则：“现代情报史充斥着女特工用性作为武器报效国家的故事……这不仅仅是指一旦需要，你必须和某个人上床……”

对于“短剑”小组的特工来说，加入“短剑”就如同加入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会尽一切力量保护他们的安全，而一旦需要，他们也必须以任何手段来为这个“家庭”效劳。

对于刺杀马巴胡赫的“短剑”小组女特工盖尔·福利亚德的下落，摩萨德内幕人士称，她此后将彻底消失，她可能会接受高科技整容手术，彻底改变自己的容貌。以后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包括她的丈夫、男友或家人会被允许和她进行联系。

在摩萨德的女特工当中，最幸运的莫过于以色列前外交部长、前进党现任领导人齐皮·利夫尼。摩萨德特工的职业生涯通常不会超过7年，大多数人在结束特工生涯后往往都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但齐皮·利夫尼却是一个例外。

齐皮·利夫尼1958年7月8日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一个特殊的家庭，她的父母20世纪40年代曾因被控从

事恐怖活动而遭到逮捕。利夫尼的父亲埃坦·利夫尼出生于波兰，是犹太人地下运动“伊尔贡”的关键人物，当埃坦·利夫尼还是个6岁孩童时，就参加了地下犹太复国主义军事组织“伊尔贡”。1946年，埃坦策划在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破坏一条铁路，结果行动失败，埃坦被捕后被判入狱15年，两年后他成功从狱中脱逃。此时，第一次中东战争已经打响，埃坦迅速投入战斗。在这场战争中，他认识了著名的“伊尔贡”女战士萨拉。他们都坐过牢，都想要复国，共同的志向让他们相爱并成为了夫妻。以色列建国后，埃坦加入利库德集团，曾三次当选国会议员。

利夫尼的母亲萨拉的经历同样惊心动魄。在英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利夫尼的母亲萨拉领导着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武装组织，曾亲自参与抢劫火车的行动。后来萨拉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自己当时不寻常的经历。“我化装成一个孕妇，从一列火车上截获35000英镑。我们还引爆了一列从耶路撒冷驶往特拉维夫的火车。”这名勇敢的女性活了86岁才离开人世。

在不平凡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齐皮·利夫尼，注定要在以色列的政治舞台上演绎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利夫尼自小聪明过人，性格坚强。童年的利夫尼很少和父母在一起。在庄园里，父亲曾教她如何使用枪、如

何通过社交手段达到目的。利夫尼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长大，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假小子，不但聪明伶俐，而且非常喜欢运动。在一些好友的记忆中，利夫尼从小就养成了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12岁那年她宣布皈依素食主义，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摩萨德美女特工、以色列前外长利夫尼

20世纪80年代，利夫尼在军队里服役。在训练营中，她两次获得“最杰出表现奖”，其坚毅的性格“令同伴们震撼”。据报道，摩萨德的前任长官梅厄·阿米特这样评述齐皮·利夫尼的特工训练课程：“她学会了利用性来诱导、逼迫、控制一个男人。这对摩萨德的特工来说是很困难的，这不仅仅是跟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那么简单，还要让这个人相信，如果他告诉你某些秘

密，你会以这种方式‘回报’他。”

军旅生涯结束后，她在法学院待了一年，随后在女友的推荐下加入了摩萨德，成了一名女特工。当时她才22岁，据说她是一位智商高达150的聪明女性。

由于表现出色，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利夫尼曾被派驻巴黎潜伏了4年。她在巴黎的核心任务就是在欧洲各地追踪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高级成员。1982年，当时22岁的利夫尼已经是深受摩萨德重用的特工，隶属于闻名于世的“短剑”小组。

1983年8月21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高官马穆·莫拉什在雅典被摩萨德特工刺杀。据称当时利夫尼正在为摩萨德效力，而且在那起暗杀事件发生前后，她曾在雅典停留过。还有人说利夫尼就是这次刺杀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但并不是直接参与刺杀。行动中，两名年轻男特工驾驶摩托车停在莫拉什所乘的汽车旁边，开枪朝他射击。至于利夫尼在摩萨德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现在仍旧是一个谜。

更加令人起疑的是，莫拉什遇刺后不久，利夫尼就选择了退役，即以工作压力大为由辞职，从欧洲返回以色列完成了她的法学的学习，接着做了10年的律师，专业领域包括商业法、宪法和房地产法，随后转入政坛发展。虽然至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利夫尼

参与了那次暗杀行动，但她在摩萨德的历史一直没有解密。

利夫尼称，当时就连与她最亲近的家人也不知道她的间谍身份；她的父亲去巴黎探望她，十分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聪明能干的女儿非得要待在巴黎，“整天无所事事，浪费时间”。利夫尼感慨，为摩萨德工作，就好像是“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她说：“一方面，我为自己正在奋斗的事业感到自豪，我觉得自己是一支特殊力量中的一员，为了以色列的安全贡献着一己之力；另一方面，我得时刻管好我的嘴巴，跟谁都不能透露半句。”

利夫尼本人从未公开谈及她在摩萨德的岁月，但她的前同事、同时也是她现在的办公室主任加尔曾含糊其辞地提到上司的这一身份：“她曾经历过极大的风险。”一名熟悉她的人说：“利夫尼并不是一个办公室女孩。她在欧洲的表现非常出色，以一种很巧妙的方式混入了欧洲各国的首都，与男性特工一起共事。要知道，那些男特工大都是突击队员出身，与大多数突击队员出身的男同事相比，她一点儿都不逊色，甚至比他们还要优秀。”

利夫尼从不谈起她在摩萨德的日子，但通过分派到欧洲的一名关系亲密的女同事之口，我们还是可以

一瞥她的工作性质。利夫尼部长办公室负责人米拉·加尔说：“危险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不小心犯错，就可能面临被捕的命运，同时给以色列的政治带来一场灾难。”

对那段日子，利夫尼表示，她过得一点也不轻松，身边随时带着子弹上了膛的手枪，无论去哪儿都得警惕是否有人跟踪。

四年间先后担任过七个部的部长

1996年，利夫尼决定参选议员。初出茅庐的她虽然以微弱的差距败北，却引起了当时利库德集团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注意。不久，内塔尼亚胡派她负责一个私有化项目，该项目对日后以色列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利夫尼初涉政坛，即担任以色列政府公司注册部主任，负责政府公司和垄断企业的私有化进程。

1999年，利夫尼作为利库德集团的代表参选议员成功，正式步入政坛，第一次进入以色列议会。此时，她已年过40岁。虽然起步较晚，但不久就得到了契机，此后在政坛上平步青云。

2001年，利夫尼认识了沙龙。沙龙喜欢她的勤

勉，欣赏她的忠诚，2001年7月沙龙组阁，作为沙龙高级助手的利夫尼在内阁中担任重要职务——地区合作部长。在沙龙的扶持下，短短四年间，利夫尼先后担任地区合作部、农业部、移民部、住房建设部和司法部等七个部的部长。以色列人开玩笑说，没有哪个“跳槽高手”能比得上利夫尼，连椅子都没坐热、名片都没用完就“跳槽”了。

这样的历练让利夫尼迅速成长为沙龙的左膀右臂，就连她坚定的犹太复国信念，也在沙龙的影响下变成了“土地换和平”。当沙龙实施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单边撤军计划时，她在各派力量间巧妙协调，使这一方案在以色列议会顺利通过。

2005年11月，由于受到党内保守派强大的压力，以色列总理沙龙宣布，退出自己一手创立的利库德集团，另立走中间道路的“前进党”，现任总理奥尔默特和利夫尼一路追随。利夫尼也是沙龙退党行动的坚定支持者。

利夫尼随即追随沙龙加入前进党，并担任政府司法部长，从此逐渐在以色列政坛上层崭露头角，被视为前进党政治明星，一跃成为以色列政坛的风云人物。

2008年9月17日，利夫尼在前进党的初选中以微

弱优势获胜，根据相关规定，她取代奥尔默特成为前进党成立三年来的第三任党主席和第一位女性党主席。

利夫尼让人们看到了以色列女特工所爆发出的强大能量，但也许，正是更多女特工的默默无闻才引起了人们对她们神秘生活始终难以磨灭的兴趣。

摩萨德在20世纪80年代最有名的行动当属成功利用“美人计”抓回叛国者莫迪凯·瓦努努，在被问到自己是否也在这一行动中充当过“美人”一角时，利夫尼答道：“如果你问我是否曾为了国家的利益与某人发生关系的话，我的回答是‘从未有过’。但如果当时摩萨德叫我这么做的话，我还真说不好自己会不会听从命令。在摩萨德，每个人的任务和职责都是量身打造的。”

作为以外交部长，她曾率领以代表团参加2008年11月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召开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中断多年的巴以和谈重启后，她曾多次与美国国务卿赖斯、巴勒斯坦前总理库赖举行会谈，讨论巴以核心问题。

以色列媒体在利夫尼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她，称利夫尼就像一朵玫瑰花一样：“她很优雅，但是带刺。”

黎以冲突引发的以色列政坛危机时，外界一度盛

传执政党甚至考虑让利夫尼接替奥尔默特的职位，利夫尼或许会利用这次机会，成为以色列总理。但最后以色列媒体透露的消息称，党内对奥尔默特投信任票的时候，利夫尼也投了赞成票。她的支持，让奥尔默特安然度过危机，并一直执政至今。

利夫尼是一位低调的女性，但却是一位高调的外长。她的雄心壮志只能和她的低调进行反复拉锯地较量。利夫尼喜欢谈论政治，也喜欢政治活动，她谈到每年5月1日劳动节：“每个人都会走到大街上挥舞红旗，我也是挥舞以色列国旗的游行队伍中的一员。”

但一旦问到了个人，她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会耸耸肩，用“嗯……”来考虑措辞和凝聚思绪。

美国国务卿赖斯曾回忆她与利夫尼的第一次见面：“那是1999年的夏末，我当时待在以色列，如今的布什总统当时还是州长，我作为他的外交政策顾问到以色列与前总理沙龙会晤。拜会沙龙时，我也见到了他的几位高级助手，其中有一个自信、与我年纪相仿并且充满吸引力的女性让我眼前一亮，她的名字就是齐皮·利夫尼。”

同样作为女性，也同样负责一国外交事务，赖斯对利夫尼的亲近感显得自然而然。2007年，利夫尼入选《时代》100名人物，身为美国国务卿的赖斯撰文描

写了她眼中的利夫尼。

赖斯透露利夫尼不仅仅是她的同行，还是她的朋友，两人曾经坐在一起畅所欲言，甚至有时会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争吵。赖斯对利夫尼的评价是：“她是一个讲信用、聪明且平和的女人。我深深地尊敬她。”

利夫尼在采访中谈到自己时，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当年利夫尼出任以色列外长后，曾在特拉维夫的寓所外接受媒体采访。在当选以执政党前进党主席后她发表演讲，表示将立即着手组建稳定的政府。

在以色列公众眼中，利夫尼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以色列政坛一直被老迈的男性军方要员把持，利夫尼的登场无疑为改变政治面貌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可以说，利夫尼的特工经历是以色列制造暴力的一个缩影。对于利夫尼来说，成为单方面撤离和组建巴勒斯坦国的拥护者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一次重要转折。她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要在包括整个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更伟大的以色列”。但她后来意识到，与巴勒斯坦人共存是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生存下来的必要条件。

2006年，利夫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与父母一样，有责任捍卫犹太人和整个以色列

的权利。我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有责任保护犹太人的祖国以色列以及民主价值观。我要在梦想中作出选择，为了能够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度，我宁愿放弃一些土地。”

利夫尼的媒体曝光率一直较低，以至于一些人认为她过于冷淡。她尽量不让家人暴露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利夫尼已婚，有两个孩子，分别是奥姆利和尤马尔，一个在服兵役，一个在上学。她的丈夫叫纳弗塔利·斯皮策，是一家广告公司老板。

利夫尼漂亮的外在形象掩饰了她强硬的一面。有传闻说，丈夫斯皮策甚至将她称为“一个强硬路线者”。以色列报纸《Ha'aretz》报道说，斯皮策曾对朋友说，她的右翼倾向要比保守的反对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更严重。

在政坛打拼的日子里，利夫尼经常面临与安全有关的进退两难的局面，例如是否袭击伊朗的核实施，如何对真主党的威胁作出回应以及如何与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打交道。她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军事选择已经摆在那里，对我来说，除军事以外的所有选择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此外，她也从不掩饰对“哈马斯”的态度。“如果他们重新开火，我会首先采取行动，然后再看结果。”

利夫尼被支持者称为“清廉女士”，奥尔默特和其他人遗留下的腐败问题将在她手里走向终结。她曾在她的竞选声明中说：“这是树立以色列形象，进行受损修补的第二个机会。”

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因被指责接受了美国商人50万美元的现金贿赂，在以色列受到了广泛抨击，所以以色列政治观察家普遍认为，奥尔默特会在近期辞职。利夫尼接替其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党内的支持率节节攀升，登上总理宝座的日子似乎并不遥远。

利夫尼在前进党内拥有压倒多数的支持率，她最大的对手是以色列前国防部长莫法兹。曾有民意调查显示，利夫尼在党内的支持率是莫法兹的两倍。

“她是玫瑰，也带刺”

2006年4月，特拉维夫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利夫尼在内阁会议上力排众议，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借助国际社会的力量向“哈马斯”施压，而不是以暴制暴。两个月后，一名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在加沙地带遭“哈马斯”绑架。紧接着，又有两名以军士兵被黎巴嫩真主党绑走。以色列军方勃然大怒，在展开营救行动的同时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报复行动。岂料，营救行动非但没

有成功，还使事态进一步恶化——以军屠杀了黎巴嫩加纳村的平民，并将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的观察员炸死。

一夜之间，谴责声从全球各个角落扑来。那段时间，利夫尼奔走在联合国、欧盟和美国之间，采取补救措施……她在以色列人中的声望随之飙升，人们评价说：“她是玫瑰，也带刺。”

2009年2月10日，以色列举行第18届议会选举，从11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来看，由外长利夫尼领导的前进党以微弱优势险胜。选举前，前进党一直在民调中落后于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因此前进党的这次胜利可谓是最后一刻的大翻盘。

2009年2月20日，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宣布，已选定利库德集团主席内塔尼亚胡负责组建以色列新政府。在以色列总统官邸举行的仪式上，佩雷斯向内塔尼亚胡正式颁发了授权书。3月30日，内塔尼亚胡通知以色列议会代议长米哈尔·埃坦，他已成功组建新一届以色列政府。3月31日，由内塔尼亚胡领衔的以色列新一届政府在议会宣誓就职。外交部长由备受争议的右翼人士阿维格多·利伯曼担任。利夫尼成为议会反对党领袖。

以色列舆论认为，在利夫尼举止优雅、言谈机敏

的外在气质下是其正直诚实的内在修养。利夫尼的政治理念是希望建立一个与非犹太人享有同等权利的犹太国家，她从记事起就知道雅布廷斯基对于犹太国家的五大期望，即拥有良好的衣、食、住、教育和健康条件。利夫尼与其他以色列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对雅布廷斯基理想的尊敬，并努力为之进行不懈的奋斗，直至最终实现。她多次在国际场合表示以色列不是一个恃强凌弱的国家，只是希望求得生存。

齐皮·利夫尼的经历是以色列女性的一个传奇，也是摩萨德女特工的骄傲。

第二十二章 新一代无意谍战 摩萨德路在何方

摩萨德心想事成占尽风光，叙利亚总统的尿样都成了窃取的对象；“飞箭”队更是无孔不入，然而时过境迁，摩萨德不得不用漂亮的广告公开招聘，前局长阿米特只能无奈地承认，时代不同了，如今谍报工作后继乏人。

摩萨德向来是一枝独秀，占尽风光

2004年3月28日，以色列国会下属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公布一项报告，以空前严厉的措辞对摩萨德和军情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指责。主要罪责包括：提供了关

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准确情报；对于利比亚曾试图发展核武器并储藏了4.4万磅芥子气的情况一无所知；对近年世界各地发生的多起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事件，没有提供有效的情报支持。

特委会提出，应该将以色列三大情报机构摩萨德、辛贝特和阿穆恩重新调整分工，由辛贝特负责国内安全情况调查和反间谍工作；摩萨德将大部分情报搜集工作转给军事情报局，使军情局由原来单纯搜集军事情报转为在全球范围内搜集情报；而摩萨德今后的主要任务将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特别行动，包括消灭针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恐怖组织、抓捕恐怖分子头目以及摧毁其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

“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以色列当局也对其谍报机构进行了调整，保留了情报与特殊使命局摩萨德、军事情报局阿穆恩、国内安全总局辛贝特和外交部政策计划与研究中心等机构。其中，情报与特殊使命局摩萨德是以色列实施对外谍报战争的骨干力量；国内安全总局辛贝特承担着以色列的反间谍和军事情报专项搜集任务。几十年来，在以色列众多的情报机构中，摩萨德一直处于龙头老大的地位。

从1977年开始，为了协调各情报机构的工作，以

色列建立了由各情报机构负责人和各方面的总理顾问组成的“安全事务委员会”，在摩萨德局长的主持下，每两周开会一次，直接向总理汇报情况。从此，摩萨德长期处于中心地位，对其他情报机关的活动起着指导与协调作用。几十年来，每星期三下午4点，各个情报机关的头目都要到摩萨德的总部举行例会，进行交流与协调。而这样的例会一般都由摩萨德的首脑主持，由摩萨德局长直接就整个情报体系的工作向总理汇报。

半个多世纪来，摩萨德不仅在以色列国内众多的情报机构中一枝独秀，占尽风光，就是在国际情报机构的同行里面，摩萨德同样是傲视群雄，不可一世。摩萨德那只让人恐惧的无影之手，可以触及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远赴阿根廷擒拿纳粹元凶，奔袭乌干达解救人质，轰炸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核反应堆，从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眼皮底下将50卷价值连城的犹太教珍本古籍偷运出境……哪一样不是如探囊取物，手到擒来，且不说摩萨德当年成功地盗铀、盗图纸、盗快艇的辉煌，单是成功“盗尿”而滴水不漏的故事就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披露，当年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谢泼兹敦举行以、叙历史性和谈之际，摩萨

德曾与约旦特工组织合作，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赴约旦参加国王侯赛因葬礼时，窃取了他的尿样，以判定他的健康状况，其目的是让两国政府提前为发展阿萨德之后的以叙和约叙关系做好准备。

1999年2月，约旦国王侯赛因去世，一贯很少出国的阿萨德总统一反常态，亲自率叙利亚政府代表团飞赴安曼参加葬礼。他的尿样正是在此期间被以、约特工窃取的。

现代医学的发展使我们可以通过人的尿样获知几乎全部重要的健康信息。在各国政府首脑和要人的健康状况都被列为高度机密的情况下，窃取尿样就成为获得其健康信息的非常手段之一。摩萨德对阿萨德的健康状况最为关注。1998年7月，阿萨德总统在法国动手术，摩萨德当时就曾通过阿萨德医疗小组中的一位犹太医生偷取阿萨德的病历。以色列和约旦两国这次窃取阿萨德的尿样，是想判断他还能活多久，两国将据此调整外交政策。

为达到目的，约旦方面为阿萨德总统准备了一个供他单独使用的卫生间，当阿萨德提出如厕时，保镖就将其领到这个卫生间，在那里，他的尿样不是流入下水道，而是流入了一个储尿罐。就在阿萨德乘专机回国的同时，他的尿样也被空运到特拉维夫附近的特

尔·哈舍默医学中心。很快，医学专家的鉴定结果连同情报机构的报告就摆在了以色列总理的办公桌上。报告说，阿萨德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阿萨德除患有心脏病外，还有糖尿病和泌尿系统癌症，化验显示他的尿道有癌变的迹象，每隔几个月就须入院换血；更重要的是，以色列病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发现，其尿样中含有止痛药的成分，这表明阿萨德的病情正在恶化。71岁的阿萨德的健康状况已经日薄西山。他没能出现在以、叙和谈会场上的唯一原因就是他的健康。

摩萨德窃取的情报成功地地为以色列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参考。

精湛的技艺和高超的手段让摩萨德名震世界，更让摩萨德特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就连美国白宫那种戒备森严的地方，都成了他们经常光顾的场所，让美国中央情报局也难奈其何。

摩萨德内部有一个代号为“飞箭”的特别行动队，它专门对付国外的高级机要部门。摩萨德前特工曾坦言：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使领馆他们不曾光顾过，这种行动几乎每周都有。只要国家利益需要，“飞箭”指哪儿射哪儿，不管对象是谁。新“版本”的“白宫间谍案”说得更是有鼻子有眼。据曾参加过“钻入白宫”行动的以色列前特工透露，打入白宫属于绝密中之绝

密，即使一些摩萨德高级官员也无从知晓。

据称，以色列首次对美国总统“下手”是1974年。当时以政府急于了解刚刚上台的福特政府计划向沙特出售早期预警飞机的有关情况。以政府担心，一旦沙特拥有此型飞机，以色列空军在中东地区的一切行动必将被阿拉伯国家了如指掌。

以色列认为，在卡特、里根和布什时代，从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到国务卿詹姆斯·贝克都有亲阿倾向，因而这些人都曾成为摩萨德定期“光顾”的对象。

198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挖出了在美国海军情报部门中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犹太间谍乔纳森·波拉德。波拉德至今仍被关在美国狱中。以色列先是死不承认，直到事情水落石出后才勉强为波拉德承担责任，给他以色列国籍，并多次要求美方释放波拉德，但美国方面就是不给面子。1985年，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帕纳德因向以色列出卖情报而被捕。在18个月中，帕纳德共向以色列提供了上千份敏感文件，许多情报属于绝密级别。美国最后判帕纳德终生监禁，美以关系一时陷入低潮。

波拉德虽然落网，但以色列的间谍行动根本没有偃旗息鼓，反而不时传出使美国首脑出一身冷汗的报

道。据有关消息说，波拉德只是奉命到具体地点将有关情报偷出来的执行者，而指示他偷出“可堆满一屋子”秘密情报的幕后指挥者究竟是何人一直是个谜。人们相信，目前仍有个代号为“米加”的间谍活跃在白宫里，此人比波拉德厉害得多。

对于以色列窃取美国高层机密的事，美国也或多或少知道一些。1997年，美国安全部门截获了一段摩萨德官员通过以驻美大使馆与其在特拉维夫上司的电话后，怀疑在白宫中确有以色列特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遂开始进行秘密调查，但始终没有查出个所以然。

摩萨德利用高技术进行情报收集，其水平之高，全球难有与其比肩者。美国白宫堪称壁垒森严，但对以色列电脑高手来说，钻进去也只是小菜一碟。美国白宫、国务院的电话，甚至克林顿总统的电子邮件，摩萨德均能获取。

摩萨德还掌握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长达30个小时情意绵绵的录音，并曾想以此要挟克林顿。在1998年斯塔尔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对克林顿性丑闻的调查报告中，人们大多忽视了这样一段话：莱温斯基说，1997年3月29日，她和克林顿在总统办公室拥抱时，克林顿对她说，他怀疑某国使馆一直在窃听他的电话。克林

顿还对她说，如果有人问电话调情如何解释，就说他们为防范窃听，将计就计，用调情来迷惑对方。

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段话高度警觉，当即跟踪一位在美国电话公司工作的以色列人，他的妻子是以色列使馆外交官，据说是摩萨德官员。特工搜查他时，发现了一份联邦调查局最敏感的电话号码清单，非常吃惊。

1999年3月，美国《纽约邮报》披露了这一特大新闻，说以色列准备以此“柔情对话”的录音要挟克林顿放弃对以色列的反间谍行动。不过后来白宫和以色列对此都矢口否认。如果这一报道真的属实，美国可真算是大象在老鼠面前丢尽了脸面。在找到证据以前，美国也只能把打碎了的牙往肚里咽。

2003年初，美国《洞察》杂志透露，美国反间谍机构侦破了一个以色列超级间谍网，逮捕、驱逐了120名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以色列人。

2004年8月27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特别节目突然播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美国国防部里潜伏着一名间谍，该间谍已经打入了高层，并从五角大楼“拿走”了许多绝密文件。报道称，这名间谍并非被伊朗等美国的“敌人”收买，而是为美国最亲密的“友邦”以色列服务的。

此人是国防情报局的一名上校，名叫劳伦斯·富兰克林。他是国防部第三号人物、分管制定政策的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手下的一员“爱将”，在费斯直接分管的一个特别办公室工作，而且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2003年国防部曾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递交了一份有关美国对伊朗关系的绝密文件，这份文件快完成时，这名间谍将草稿交给了以色列，估计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沙龙甚至比布什还要早知道这份绝密文件的内容。

2008年初，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美国情报官员披露，针对伊朗的核武器计划，以色列官员意识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不太可能支持对伊朗核设施的武力攻击，因此，以色列已经放弃直接军事打击的手段，转而采取暗杀等方式，以无限期推迟伊朗研发核武器进程，直到找到另外的替代攻击方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情报机构官员表示：“以色列在刺杀敌对国家的武器专家时从来都不犹豫。在对付伊拉克时是这样，因此他们对伊朗也不会手软。”

伊朗2009年宣布已经逮捕了一批接受摩萨德培训的间谍，并收缴了部分高科技通讯设备。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总司令贾法里表示，这些间谍已经招供曾经在以色列接受有关实施暗杀和爆炸的训练，一直在搜集有关伊朗境内核技术中心和革命卫队等敏感机构的情报，监控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及其他伊朗军政官员，并将情报传回以色列。贾法里表示，摩萨德向这些间谍提供资金，供他们购买汽车和其他设备，“被逮捕的人对此供认不讳”。

摩萨德屡屡失手，风光不再

尽管摩萨德声名显赫、战果辉煌，但是长期以来，以色列高层对摩萨德的赞誉，也助长了它的骄横和大意，使它在几十年的间谍活动中，不乏失败的记录，也有特别尴尬的丑闻。

以色列出版的《1947年到1993年的以色列战争》一书披露，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前，埃及一个“双重间谍”用错误的情报欺骗了摩萨德，使以色列军队在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军队的突然袭击面前措手不及，在战争早期遭受了惨痛打击。该书引用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消息说，这个埃及间谍是埃及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据说还是当时埃及总统萨达特的亲信。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他在英国访问时，与以色列驻英使馆

的摩萨德特工接上了头，表示要向以色列提供情报。摩萨德特工在核实了他的身份以后，大喜过望，答应了他以金钱换情报的要求。不久，这个间谍提供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局局长的案头，使以色列及时了解了埃及的许多情况。

根据这位间谍的情报，以色列得知，埃及总统萨达特1971年3月访问苏联时曾要求苏联提供包括飞毛腿导弹在内的新式武器，苏联人虽答应了埃方的要求，却迟迟不向埃方供货，使萨达特回击以色列的战略计划落空。以色列因此松了一口气，认为埃及“根本没有能力向以色列发动一场愚蠢的战争”。事实证明，这个埃及间谍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久而久之，他成了摩萨德信得过的“王牌间谍”。

但是，这名埃及间谍所负的特殊使命实际上是埃及特工部门安排的。埃及方面通过他，故意向以色列方面透露，埃及将在1973年5月15日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为此埃及在当年春天举行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征召了预备役人员。摩萨德从其他渠道也证实了这个消息，于是以色列宣布全国进入战时总动员。虽然后来埃及军队没有发动进攻，但摩萨德还是对埃及间谍的情报坚信无疑。

同年8月19日，以色列军队出于同样的原因再次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但埃及军队还是没有发动进攻，两次备战使以色列官兵疲惫不堪，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4500万美元，以色列方面开始认为，埃及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不敢向以色列发动进攻。就这样，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在以色列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完成了战备部署。

为了进一步迷惑以色列，埃及特工部门指示那个间谍在1973年10月5日，也就是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军队发动进攻的前一天，与摩萨德特工头目在伦敦举行了一次紧急会面，告诉以色列一个“十万火急的情报”：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军队将在10月6日下午6点向以色列发动进攻。而摩萨德以为这又是埃及方面玩“狼来了”的把戏，没有把埃及间谍的情报当回事。结果，10月6日下午2点，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军队突然向以色列军队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仅用了6个小时就突破了以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巴列夫防线”，收复了大片失地，取得了战争早期的辉煌胜利。

1999年1月17日，以色列军方透露了一个惊人内幕，该国情报机构摩萨德曾制定一份详尽的暗杀计划：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到巴格达北部某地看望其情人时干掉他。

执行暗杀计划的重任落到了代号为“262”部队（即总参侦察营）的身上。按照摩萨德的计划，262部队将在萨达姆离开情人几分钟后用导弹把他炸死。

摩萨德曾经把这一计划向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作了汇报。内塔尼亚胡过去曾在262部队服过役，对这支部队的能力深信不疑。内塔尼亚胡详细地阅读了暗杀计划后立即与几名内阁部长进行了研究，但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军事情报部门认为成功的概率只有1/5，因而不赞成把这一计划付诸实施。

摩萨德辩解说，暗杀萨达姆的机会虽然很小，但非常有诱惑力。据可靠情报，萨达姆什么时候到北部地区的情人那里过夜很难预测，但一旦他到了那里，便很少改变过夜地点。萨达姆一般在黄昏时分抵达情人住处，然后拜访这一地区的亲戚，接着在情人那里过夜。早上一般到附近的一座军事基地。摩萨德的一位内线声称，可以提前获悉萨达姆何时去看望那个女人。如果消息准确的话，在他离开她家之后到抵达军事基地之前的这段长约15到20分钟的时间是对他下手的最佳时机。摩萨德认为，此时刺杀萨达姆很有把握。

以前摩萨德也制定过多个暗杀萨在姆的计划，却难以实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萨达姆神出鬼没，行踪

很难把握。长期以来，萨达姆对自己的日程安排非常注意保密，只有他身边的几个亲信知道未来几小时他要到哪里去。晚上，十几个地点同时为萨达姆准备晚餐，谁也说不得他决定在哪里用餐。他最后休息的地方也只有在最后时分才通知身边的人。另外他还有许多替身。

为了证实情报的可靠，摩萨德派一名特工潜入伊拉克，对萨达姆情人的住处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很快这名特工便兴冲冲地返回以色列向摩萨德展示了他偷拍的数张非常清晰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萨达姆。摩萨德高层显得非常兴奋，他们终于掌握了萨达姆的确切行踪。

密谋开始了。新被任命为摩萨德第二把手的阿米拉姆·莱文亲自登门向总理内塔尼亚胡介绍他们掌握的情报，认为暗杀计划切实可行。内塔尼亚胡在陆军服役时，莱文是他的上司，所以莱文对内塔尼亚胡的性格非常熟悉，他自信完全可以说服内塔尼亚胡。事实的确如此，在莱文的鼓动下，内塔尼亚胡真的心动了，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干掉萨达姆。

内塔尼亚胡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在美国的不断施压下，联合国特委会加紧了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工作，萨达姆对此越来越不耐

烦。他越不耐烦，以色列面临的威胁便越大。其二，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萨达姆下令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在美国的极力劝说下，当时以色列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现在暗杀萨达姆便有了借口。另外，以色列国内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越来越严厉，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面临的政治危机，如果暗杀萨达姆的行动成功，那么他的政治前景可能会出现转机。

暗杀萨达姆一直是以色列的梦想。1992年11月初，以色列就曾经制定了一项代号为“荆棘”的暗杀萨达姆的计划，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拉宾和参谋长巴拉克授权对萨达姆采取特别行动。当时，拉宾对是否实施暗杀计划显得犹豫不决，巴拉克便向他保证，以色列的特种部队绝对有除掉萨达姆的能力。拉宾终于被说服了。

此后，特种部队在尼吉沙漠里进行最后一次演练，巴拉克和他的副手，还有军事情报首脑和其他数名高级军官亲赴现场观看演练详情。然而，演练变成了一场灾难，一名军官竟然错误地发射了一枚真正的导弹，装扮萨达姆及其随从的5名士兵全部被炸死。巴拉克一怒之下，下令取消了这个暗杀计划。

然而以色列并没有彻底放弃暗杀萨达姆。莱文被任命为摩萨德副手后，更加快了准备步伐。接到萨达

姆与情人相会的情报后，代号为“荆棘2号”的暗杀计划立即出笼，262部队的士兵为此接受了数月的训练。

“荆棘2号”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一旦摩萨德获悉萨达姆已经上路准备到情人那里，担负主要任务的由40名战士组成的小分队将乘坐一架130“大力神”飞机飞到伊拉克，并在一边远地区着陆。在此之前，以色列人已经确认了一条空中走廊，130“大力神”在这条走廊里飞行，将躲过伊拉克的雷达。

接着，小分队兵分两路。一路由10名士兵组成，他们将进入能够看到萨达姆的那个地点附近。另一路约由30名士兵组成，他们装备有以色列特制的代号为“希伯来人的足迹”的导弹，在约10公里外待命。

第一路人马负责瞄准萨达姆，方式是用一个视频监视器跟踪萨达姆。这个监视器与第二路人马的识别仪相连接。一俟时机成熟，第二路人马将向萨达姆及其随从发射三枚导弹。一旦向萨达姆发射导弹，不管结果如何，两路人马将立刻撤出伊拉克。然而，正当以色列紧锣密鼓地准备暗杀计划时，美国和英国不声不响地对伊拉克发动了“沙漠之狐”军事行动。此时，摩萨德紧急要求继续实施暗杀行动。但外交部长戴维·利维和国防部长莫迪凯拒不批准，他们除了对摩萨德计划尚存怀疑外，主要担心这个时候实施暗杀计划会

使以色列陷入外交困境，它不仅会破坏中东和平进程，还会破坏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萨达姆因此逃过一劫。

此后，摩萨德的运气坏到了极点，屡屡失手，威风 and 颜面尽失。

1999年底，摩萨德特工制造叙利亚备战的假情报，差点把以色列拖入对叙利亚的战争。

2000年，由于摩萨德特工使用加拿大假护照，致使加拿大和以色列关系降温。

到了2010年，迪拜“暗杀门”又让摩萨德陷入世界舆论的深渊。

由于摩萨德这几年失败多于成功，使摩萨德渐渐失去了以往的光环。

摩萨德公开招聘

综观摩萨德60年的成功与失败，摩萨德情报工作的高效率最终还是建立在拥有大量的高素质特工基础上的。除了先进的高科技之外，最关键的还是一个“人”的问题——每一位特工人员的素质，它决定摩萨德的整体素质，也决定着它的光荣与耻辱。因此“招聘”与“训练”两道工序，就成了摩萨德打造一支精锐之

师的祖传秘方。

说到摩萨德采用的成员招募办法，其独特性近似于荒唐，但却行之有效。它所招募的人几乎个个都是“间谍天才”。

众所周知，以色列国其实是一个弹丸之地，国力有限，人力也有限，因此不可能维持一支庞大的情报机构，何况他们的情报机构又是那样的种类繁多。因此精干、高效是摩萨德的最大特点。

不过，以色列有一个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犹太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犹太人还散居在世界各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几千年的苦难成就了这个民族独特的精神和信念：自强不息，坚韧勤劳，还有对以色列国家的向心力和对自己本民族的一种凝聚力。

以色列正是依靠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招聘到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国家理想的感召使摩萨德麾下聚集了大批犹太民族的精英。他们的绝对忠诚加上对专业技能的钻研，创造了摩萨德惊人的效率。

那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后代一旦成为摩萨德特工之后，他们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一是语言，二是各国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几乎不需

要经过模拟培训，只要外派到对口的国家和地区，就会像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应付自如，游刃有余。那些外派的摩萨德特工，基本上都能说三种以上的语言，有的甚至会五六种语言，这就为他们的人际交流和从事间谍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摩萨德能够拥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当地”特工，而不需要经过加工。

除了语言之外，摩萨德在招聘特工时，从它的第二任局长哈雷尔开始，就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标准。当年哈雷尔曾公开声明，摩萨德不需要凭兴趣的志愿者，不欢迎“007”那样的冒险家，而是要暗中考核选拔那些能力和气质俱佳而又有非凡经历的人。

最初，摩萨德招聘特工不是公开招聘，而是秘密考核和筛选，当然也有从军队中直接选拔的。摩萨德招募特工条件极为严苛。情报部门首先按规定遴选出候选者，首要条件必须是犹太人，最好曾在以军服役，特种部队老兵和军官是首选。

通过首轮选拔后，候选者会接受持续数月的各种测试，包括心理测试和背景调查。摩萨德对候选者10岁以后交的所有朋友都要进行了解。经过层层选拔和淘汰后，幸运留下的人将接受“试训”。摩萨德为他们指定新的名字和身份，让他们执行外人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在15分钟内获得一个陌生人的名

字、住址、银行卡号和父母姓名等信息。有许多人在这一阶段会自动退出或者遭到劝退。最后，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通过考验，成为摩萨德特工。

摩萨德的招募工作是由一批被称作“波拉松”的专家进行的。他们经常在商店、俱乐部等公共场所观察和物色；有时还到不同国家或通过第三方招募人选。一旦观察对象被确认适合发展，就由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员想方设法去接近他。当然，这项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勇气才能有成果。

有时，摩萨德还伪装成别国情报机构，以此来招募特工或者给这些被蒙在鼓里的新雇员派任务。而有时候，这些伪装的他国情报机构也被用作考验真正摩萨德特工的忠诚度。那些拒绝执行针对以色列的任务的特工相当于通过了“忠诚度”的考试，往往会迅速在摩萨德内部获得提升。

摩萨德录用间谍没有固定的模式，那些长相、举止都很一般的人往往更容易被录用。如果一个人被看中，并声明愿意为国家做“特殊工作”，他就有可能作为“预选人员”接受进一步的审查。只有通过了这些审查的人，才可能被允许参加为期一年的训练。

在开头几个月，被招募人员接受的是情报工作的基础训练，与其他国家对新闻谍的训练没有什么差

别，包括使用各种枪支和器械、运用密码、练习柔道、格斗等技术。除此之外，被招募人员接受的是摩萨德特有的专门训练，如用羽毛中装有电子发射装置的信鸽来进行空中侦察；操纵在机身中装备有电视摄像机的航空模型飞机，搜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训练营地的情况等。

在这些专业训练中，“最让人伤脑筋的是连续不断的记忆训练，”一个被淘汰的被招募人员在事后回忆说，“给我们放了一部电影，突然，放映机停止，教官马上让我们详细地讲述刚才看见的一切。比如，请立即说出刚才画面中出现的20件东西是什么以及它们的形状和颜色。”通过这种训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提高特工们对图纸、文件、照片的记忆力。

被招募人员还要练习如何进行跟踪而不被发现，或让别人跟踪自己，再如何甩掉“尾巴”。如果学员轻松地完成任务，教官就会派出更有经验的对手以增加训练的难度。

经过六个月的训练考察后，大约三分之一的不合格者被淘汰出局，他们不是自动放弃，就是被教官劝退了。

在最后的半年里，剩下的学员将接受更为全面的训练，使他们能更适应派往国家的生活环境。首先，

他们必须掌握派往国的语言，并从外表上看与当地人没有明显的区别。摩萨德招募成员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就是以色列人的多国家性，在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中，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挑选到熟悉所在国情况的间谍人才。

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是适应间谍生活的关键时刻。在这段时间的主要学习内容是，在可能被派往从事间谍活动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怎样穿着？与人们谈些什么？付多少小费？例如，那些有可能被派往德国的情报人员，必须记得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战况；有时候，教官甚至还要求他们知道德国国家足球队主力球员的姓名、身体状况、技战术水平和特点。

这个阶段的训练不仅是在训练营地进行的，还包括到目的国家和地区的实地考察。一位已退休的摩萨德间谍回忆说：“他们把我派到英国的曼彻斯特，一个联络人员把我从机场接回来，并约定了当晚和我碰头的地点和时间，告诉我碰头时我将领受任务并得到钱。但是，当我按时到达碰头地点后，那里根本没有人，后来我又去了一次，依然扑了空。这下子我明白了，摩萨德给我设了一个圈套，让我一文不名地待在英国，看看我将如何应付。”他说，他完全可以去找警察局，或者到当地的以色列领事馆去，不过这样就会

暴露身份。最后，他没有去找任何人，而是在夜间砸开了一家超级市场收款处装钱的箱子，弄到了钱后就乘飞机回到了特拉维夫，向他的教官做了汇报。就这样，他终于通过了考试。据他讲，其他人也许还要接受更困难的“反应能力”考试，例如，有个情报人员在法国被“敌国”间谍组织的人抓住了（其实，这些人是以色列的特工伪装的），他们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如果他经受不了，说了实话，那么，他的考试就失败了。

在结束了所有的训练科目之前，每一个参加训练的预备间谍都会获得一个新的身份，以完成毕业考试或在将来从事间谍活动时使用。为了避免复杂的具体背景带来的麻烦，他们的新身份一般都是“孤儿”。

训练结束后，摩萨德会根据每一个参训人员的成绩分配给他们相应的工作：那些成绩一般的人会留在总部办公室工作，例如，在情报搜集处收集、分析情报，在政治行动与联络处负责和友好国家的情报部门保持联系，或在秘密的外交部里工作（这个秘密的外交部负责处理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的非外交渠道事宜）；只有那些成绩特别优异的、大约占总数八分之一的人，才有幸被分配到负责向国外派遣行动和暗杀小组的协调、计划行动处。

被分配到协调、计划行动处的人员，还要在海尔茨吕阿海滨浴场附近的别墅里接受为期三个月的特别强化训练，学习各种谋杀手段。

摩萨德下属最重要的机构是代号为“恺撒里亚”的特别行动队，类似特种部队。这一机构的新人需要接受一至二年的严格训练。新人需要尽快掌握大量间谍基本技能，包括跟踪、反跟踪、偷拍、窃听、徒手格斗、使用武器炸药、驾驶各种交通工具包括飞机以及“经营”自己的假身份。培训结束后，合格新人将会“上岗”，长期远离家人和朋友，在海外执行任务。他们接受的任务将会随着经验和能力累积不断“升级”。

摩萨德向每位特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以免他们因压力过大而崩溃。由于压力比较大，摩萨德特工生涯较短，通常不超过七年。“退役”后，他们将不再抛头露面，大多返回总部工作。

摩萨德并没有一支庞大的队伍，最高峰期，所有的工作人员大约保持在20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在位于特拉维夫的总部工作，少数在海外搜集情报。

在海外的那些摩萨德特工大多在一些合法机构的掩护下进行活动，如大使馆、公司、商务处、旅游局、航空公司、航海公司等。

摩萨德还在几个大国建了名义上的合法机构，掩护它的间谍活动，并从这些国家招募情报人员。这项工作主要是通过目的国人员或第三方来进行的。

摩萨德所直接从事的特殊行动五花八门：既有暗杀、劫持和破坏，也有骗诱、恐怖和偷窃等等。每一次行动之前，各个行动处室都要准备几套行动方案，然后交给突击队员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实施。首先是对行动的地点、人物及其习惯、设施状况都有详细的情报；然后再根据情报列出周密的计划，设想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赋予行动负责人果断处理一切变化的权力；接下来就是用最少的人和最快的速度，对目标进行闪电般的攻击，并尽力避免冲突扩大。

严苛的条件，社会的发展，使摩萨德也面临着招募难的困境。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的发言人曾表示，摩萨德很难吸引顶尖人才。“高科技公司和商界对顶尖人才更有吸引力，它们能提供摩萨德所不能提供的丰厚薪酬、奖金和优越的社会地位。”

从本世纪初开始，摩萨德开始在招募工作上作出新的尝试。不但在其官方网站上提供工作申请表格，还在其他政府部门网站甚至以色列报刊刊登招聘广告。例如，一则刊登在以色列报纸上的广告写道：“我们向有志成为摩萨德特工的申请者承诺一份激动人心

的事业。”

2001年7月20日摩萨德首次在英文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在更大的范围内招考情报人员。据路透社报道，摩萨德在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上刊登了一则非常漂亮的彩色广告，格外引人注目。天蓝色的背景下，画有以色列国徽的深蓝色大门敞开着。用希伯来文书写的广告词更是充满诱惑——

摩萨德已经敞开了它的大门，当然不是对每一个人，也不是对许多人，但是它的大门可能正对你敞开着。发挥你的潜力，开发你的能力，前面是广阔的未来和崇高的贡献。

号称世界四大情报组织之一的摩萨德竟然也公开刊登招聘广告，这对习惯于对国家安全和机密守口如瓶的老一辈犹太人来说实在难以接受。摩萨德前局长阿米特无奈地承认，时代不同了，如今谍报工作后继乏人。老一辈人可以毫无怨言地为复国理想奋斗，而当今的年轻人则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虽然摩萨德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优秀的特工，但由于生活

在和平环境中的年轻人国家安全观念淡薄，禁不住高科技企业优厚待遇的诱惑，根本不愿到国家安全机构工作，使摩萨德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摩萨德公开招聘特工的计划得到了以色列总理的支持和批准。政府发言人还为此发表声明说，目前，情报部门已难招聘到一流人才，摩萨德必须适应人才市场竞争，效法美、英等国，采取公开的方法征召精英。

在以色列，摩萨德长期以来一直秘密行动。不过，这一状况也已得到改变。当年，以色列司法部发言人阿米尔·阿伯拉莫维茨对新闻界说，摩萨德有可能获得公开地位，目前的问题是，如何给该组织确立一个目前尚不存在的明确身份。

亚托姆将军出任摩萨德局长时，以色列媒体进行了报道，首次向公众公开了其名字，慢慢地揭开了罩在摩萨德头上的神秘面纱。近年来，一系列行动上的失误损害了摩萨德的形象，招致国内外舆论的关注。这一切都促使以色列当局决心给摩萨德以公开地位，希望通过合法化等措施，规范其调查方式和行动手段，进一步加强其打击犯罪活动的职责，使其更顺利地展开工作。

司法部发言人阿伯拉莫维茨又说，如果公众知道

摩萨德的权力有多大，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会有助于改变摩萨德目前面临的局面。

他还表示，以色列议会已经在考虑通过一项法令，将负责国内情报调查工作的以色列安全总局辛贝特合法化，一旦这一步骤顺利完成，下一步行动就是将摩萨德的地位公开合法化。

摩萨德路在何方？人们将拭目以待。

附 录：摩萨德历任局长名单

第1任局长

1952年

第2任局长

1963年

第3任局长

1968年

第4任局长

1974年

第5任局长

1982年

第6任局长

1989年

第7任局长

1996年

第8任局长

1998年

魏弗挂姆·哈

勒维2年

翰尔健局臣

今

摩萨德大事记

摩萨德正式成立，罗文·希洛出任首任局长。

摩萨德驻巴格达谍报网被破获。

伊塞·哈雷尔出任摩萨德局长。

摩萨德特工开始推动以色列新一轮移民潮。

摩萨德竞争的阿穆恩特工在埃及进行破坏时被当场捉住，随后引发“拉冯事件”。

摩萨德获取到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伊塞·哈雷尔亲率摩萨德特工奔赴阿根廷捉拿艾希曼。

梅厄·阿米特出任摩萨德第三任局长。

摩萨德特工使用“美人计”策反伊拉克王牌飞行员穆尼尔，获得米格-21。

摩萨德特工参与诱捕摩洛哥反政府分子本-巴卡，最后导致与法国情报局断绝关系。

摩萨德利比亚的摩萨德特工伊利·科恩被捕，5月被处以绞刑。

摩萨德及阿穆恩摩萨德特工沃尔夫冈·洛茨被捕，三年后被交换回国。

摩萨德特工从法国偷回导弹快艇。

兹维·博米尔出任摩萨德第四任局长。

摩萨德特工收买瑞士工程师弗朗克·内希特，取得“幻影”战机图纸。

摩萨德特工实施“高酸铅盐”计划，成功获得200吨铀矿石。

1962年“黑九月”在慕尼黑屠杀以色列运动员，摩萨德特工开始以牙还牙。

1964年霍菲出任摩萨德第五任局长。

摩萨德特工协助特种部队远袭恩德培解救人质。

在总理贝京的推动下，摩萨德组织“摩西行动”，此行动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

摩萨德利用“美人计”成功地获取了伊拉克核机密，随后派特工去法国炸毁了为伊拉克生产的核反应堆。

以色列空军根据摩萨德特工提供的情报炸毁伊拉克核反应堆。

1967年艾德莫尼出任摩萨德第六任局长。

1985年列充当间谍的波拉德被捕，美、以情报局陷入尴尬境地。

1986年特工制作以英国国籍为掩护的假护照被媒体披露，引起英国的强烈不满。

1988年埃及画家艾德哈米在伦敦被刺杀，最后引发英国情报局与摩萨德断绝关系。

再次使用“美人计”策反黎巴嫩飞行员阿迪勒，获得米格-23。

摩萨德特工成功刺杀“巴解”组织领导人塔米米。

摩萨德特工成功破坏巴解组织策划的“回归航行”。

摩萨德特工和特种部队配合，远袭突尼斯，成功刺杀“巴解”组织高级领导人阿布·杰哈德。

摩萨德绑架泄露国家核机密的瓦努努。

摩萨德特工使用伪造的外国护照，在迪拜布斯坦罗塔娜酒店暗杀“哈马斯”高官马哈茂德·马巴胡赫，震惊全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 / 詹为为，詹幼鹏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317-2634-0

I. ①绝… II. ①詹… ②詹…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②情报机构—史料—以色列 IV. ① I25
② D738.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6488号

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

作 者 / 詹为为 詹幼鹏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封面设计 /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8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24

字 数 / 280千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45.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634-0